

〔俄〕鲁·格·皮霍亚 著  
徐锦栋等译



# 苏联政权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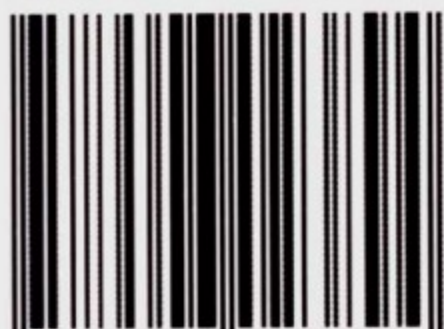
(1945 ~ 1991)

東方出版社



**苏联政权史**  
SULIAN ZHENGQUAN SHI  
(1945 ~ 1991)

ISBN 7-5060-2389-X



9 787506 023894 >

ISBN 7-5060-2389-X

定价：62.00元



[俄] 鲁·格·皮霍亚 著  
徐锦栋等译



# 苏联政权史

(1945 ~ 1991)

東方出版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 – 1991

© Пихоя Р. Г., 1998, 2000

©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2000

本书中文版版权通过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取得,由东方出版社独家出版。

图字:01 – 2004 – 6605 号

责任编辑:魏 华

封面设计:肖 辉

版式设计:程凤琴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苏联政权史(1945—1991)/[俄]鲁·格·皮霍亚 著 徐锦栋等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6.5

ISBN 7 – 5060 – 2389 – X

I. 苏… II. ①皮…②徐… III. 政权-历史-苏联-1945—1991  
IV. D75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2006 号

## 苏联政权史

SULIAN ZHENGQUAN SHI

(1945—1991)

[俄]鲁·格·皮霍亚 著 徐锦栋等译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28.125

字数:776 千 印数:0,001 – 5,000 册

ISBN 7 – 5060 – 2389 – X 定价:6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 本书译校者名单

徐锦栋 崔寿智 吕允连 于春芳 邢临江  
焦广田 王国芳 王鸿雁 张建民 彭 晔  
贾宝弘 张丽芝 李春梅 徐志华 志 凌  
李 勍 王华利 罗婉兴

全书由徐锦栋审校



## 前 言

4

俄罗斯作为苏联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的那个历史时期已经结束。苏联已经不复存在，它变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

这本书题为战后《苏联政权史》。选择这个题目有几个原因，首先是因为战后苏联的政权史尚未被认真研究过。这当然绝对不是说，过去没有人涉猎过这个课题。遗憾的是在苏联时期，历史学家往往试图驾驭历史，使历史的面目符合下一个阶段政权面临的任务和执政者的观念。按照苏联发展所特有的内部逻辑，誓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历史经验的政权在每一个新阶段都要把以往的一段历史一笔勾销。过去历史舞台上的一些主要登场人物，如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和 A. И. 李可夫，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和 K. Б. 拉杰克，Н. И. 叶若夫和伊·亚·谢罗夫，格·马·马林科夫和阿·亚·库兹涅佐夫，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和格·康·朱可夫，Д. Т. 谢皮洛夫和亚·尼·谢列平……他们早已经不在人世。约·维·斯大林、尼·谢·赫鲁晓夫，甚至弗·伊·列宁也没有永留人间。有关他们的许许多多文献资料一直被保密到苏联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一些日子。

苏联政权对于本身历史的研究采取了先入为主、提出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和分别评价好坏的做法。他们宣布下列原则作为先验性的真理：

- 阶段斗争具有“历史火车头”的作用；
- 承认从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另一种更先进的社会经济结构过



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断言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峰;

- 因此,可以把所有历史进程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种;
- 坚信苏联共产党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起到了良好作用;
- 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是进步和“爱好和平外交政策”的化身。<sup>1</sup>

这些基本原则不仅成为确定历史研究内容的出发点,而且成为接触档案资料的政策。<sup>2</sup>

- 5 在苏联,档案资料历来被国家领导人视为重要的意识形态领域,视为预先确定 20 世纪史科研究成果的有效方法,因为控制文献资料是党对社会科学实行领导的一部分,而且特别注意控制有关党机关活动的那些文献资料,接触任何党的档案资料必须得到党机关——从州委和边疆区党委到苏共中央的同意。大约 90% 党机关的档案资料和 20% 政府机关的档案资料印有“密件”或其他限制的字样。

1991 年 8 月事件以后,即在根据俄罗斯联邦总统令,把苏联共产党的文献列为国家档案馆馆藏的一部分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急剧变化。

在一些有关可以公开档案资料的法律文件被通过以后,研究人员才得以接触过去的一些重要政治文献——历次党的全体会议和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

苏联解体以后,研究人员接触国家历史文献的范围大为扩大,先入为主和众口一词的历史研究方法被抛弃,这种情况为研究战后国家历史奠定了良好基础。

本书记叙的年代范围——从伟大卫国战争胜利到 1991 年 12 月苏联不复存在。倘若说 1945 年以后是苏联政治制度取得辉煌胜利、苏联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超级大国、国家赖以存在将近 50 年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大大巩固的时期,那么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则是经济和政治危机迅速加剧、内部联系削弱、意识形态依据丧失并最终使国家解体的时期。

如上所说,本书研究的对象是苏联政权史。这里所说的“苏联政权”这一概念不是指曾经被准确表达的那样,属于苏联历史的制度范畴。所以,我在意识到难以完美确定“苏联政权”这一概念以后,往往试图采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来描述这一现象。苏联政权——这毫无疑问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

首先,苏联共产党作为一个直接和通过党组织履行管理职能的群众性政治组织,不可能为其成员提供参与作出管理决策的机会,作为党组织的基础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实际上使“自下而上”成为不可能。苏共领导人通过的那些决议完全不符合苏共党章规定的程序。

有人说,苏联的政权属于实际上(而不是根据党章)控制着党的那个机关——它的政治局,这种认识也没有得到证实。是的,政治局的成员中有国家最高领导人,但是,在国家的许多历史时期中(20世纪30年代末<sup>3</sup>,战争年代,战后时期,几乎直到1956年),最重要的决议不是在政治局内通过的,而是以所谓的“询问的程序”通过的,亦即事后形成的。这个时候,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大概更为重要,苏联部长会议的权力比党领导人本身的权力更大。

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行动命令通常是由少数几个领导人作出的。<sup>6</sup>例如,在卡廷枪决波兰军官的决定是由四个最高领导人作出的,他们是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国防人民委员克·叶·伏罗希洛夫,人民委员会主席兼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对外贸易人民委员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后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伊·加里宁和石油工业人民委员兼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莫·卡冈诺维奇也表示同意。<sup>4</sup>苏军1979年12月12日入侵阿富汗的决定是在列·伊·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作出的,当时在场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国防部长德·弗·乌斯季诺夫,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康·乌·契尔年科,只是在后来才形成中央政治局的决议。<sup>5</sup>

一些重要的人事变动(从1953年3月确定“斯大林继承人”的人



选到1964年10月尼·谢·赫鲁晓夫下台)是由极少数国家领导人预先确定的,只是在后来才以政治局、苏共中央全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予以确认。

在苏联早已流传的一则笑话说,苏联的权力集中在花园里的一个圆圈内,这对花园的居住者和整个国家都是件好事。不能说这些笑话没有根据,战后苏联的权力集中在国家最高管理层,首先掌握在四个主要部门的领导人手中。这四个主要部门是:老广场——苏共中央机关,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卢比扬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阿尔巴特军区”——苏联国防部。

地方和中央政治机关的主要领导人——州委书记、边疆区党委书记,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sup>6</sup>,各部部长、副部长、部领导成员,加盟共和国各部和部门领导人<sup>7</sup>,苏维埃机关、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司法部门、工业部门、学术部门、宣传和文化部门中担任党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的领导人也是一部分有权势的上层人物。<sup>8</sup>在当地掌握实权的机关工作人员,如州、边疆区、加盟共和国党委办公室主任,也可以被归入有权势的上层人物。<sup>9</sup>

是不是可以这么说,战后苏联的政权属于隐藏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后面、使用经苏维埃选举的群众性共产党组织进行伪装的寡头政体。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的成员被列为由上级任命的干部,这是这一寡头政体的外在表现形式,寡头政体的内在实质是,它可以在苏联所有生活领域国有化的条件下直接参与管理国家的进程。

7 从政府通信用户名单上大概可以了解到国家最高层权力机关的更为准确的数量。首先让我们看一看众所周知的莫斯科《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它有红色的硬书皮,封面上印有苏联国徽和“政府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的字样,电话本里当然少不了有官员的姓名,一看就知道是寡头政体国家最高权力机关使用的电话本。

使用这种电话的官员打一个普通的电话,就可能对某个工业部门或文化部门、对某个工厂或电影制片厂的领导人产生某种后果。“电

话权”(20世纪80年代新闻记者们常用的讽刺语)确实是寡头政体权力机关常用的一种权力。

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的用户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苏共中央书记,一些政治评论家和总编,高级将领和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各部委领导人,大型工厂厂长和著名大学校长。1991年6月1日印发的《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中共有600多名这样的大人物的姓名。<sup>10</sup>

居住在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首都,以及边疆区和州中心的领导人也享有这种特权。被收入长途自动电话用户名册的人包括党和国家高级官员,大型工业企业负责人,军区司令员、驻外军队集群司令员,国家安全委员会各个局的局长,这本供全苏联使用的长途自动电话用户名册中共有大约2800名地方官员的名字。<sup>11</sup>

地方权力机关和中央权力机关之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莫斯科,所有主管部门(从中央机关到部长会议和各个部)都注意保持与州委第一书记的不间断联系,认真听取他们的需求和意见。同州委第一书记交换意见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这样做有多种原因,首先是因为州委第一书记大多是苏共中央委员,参与中央全会的表决,因此必须注意同州委第一书记搞好关系,以加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权力。1957年6月苏共中央全会说明了这一点,因为当时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是注定要下台的。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解除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也说明了这一点。同各州州委第一书记搞好关系,这是确保苏共中央全会和党的代表大会上“表决机器”无故障运转的重要保障。

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央政府实施的工业、国防、农业方面的计划能否完成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州委和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所做的工作,没有他们发号施令,就得不到“地方资源”,难以完成全国性的任务。

而地方领导人对中央政权的依赖程度更大,从中央对地方的资金投入到下拨资源(工业原料和食品供应),从退休后在莫斯科分得舒适的住宅到安排子女进入好学校,这一切都要依靠中央政权才能解决。 8



地方政权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很大,而地方官员对本地区周围一帮人的依赖程度则要小得多。

由此看来,在战后苏联历史舞台上,主要登场人物的数量大概超不过3000人<sup>12</sup>,正是这些人成为苏联政权的体现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互相依靠,互为利用。

表面上看,所有国家官员都是由党机关任命的,但是,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并不是国家政权组织的通用法则。是的,没有党机关(中央委员会的各个部,秘书处或政治局)的批准,就不能取得相关职务的任命。但是,如果没有把干部人选同有关部门(部长会议,有关的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协商,任命任何国家和党的机关的主要职务都是不可能的。后来,重要职务的任命一定要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成为一条必须遵守的规定。这实质上就是说,必须兼顾官员的相互利害关系,相互利害关系的链条一旦断裂,官员的仕途到此结束。

政权存在的机制通常必须以许多管理部门(各部委,部长会议及其下属各个部,苏共中央机关、秘书处和政治局)密切协作为前提。然而,一旦到了需要迅速作出决定,或者这些决定具有很高的政治价值时,那些似乎完美无缺的协商制度和事先进行专家鉴定的规定就被取消了,由一些最高政治领导人(通常由党的领导人同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队的头头)根据他们所认为的政治合理性(准确地讲,是根据某一时刻的政治合理性)匆促作出决定。许多领导人往往断然否定专家的意见,违背以前通过的决议。苏联政权组织所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从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作出决策。

本书的任务是,研究哪些人在国家战后历史中作出了哪些决定,这些决定是怎样形成的,国家政权在其各种不同表现形式中怎样行使权力,为什么被认为有效的、拥有巨大资源的体制停止了存在。

受“根据行为分别评价”的诱惑(应该指出,这是我国历史学研究的一贯做法),我们努力做到根据事实和文献证据来“削足适履”,这当然不是最合适的做法,因为这有碍于进行有效的综合和从社会学的角

度得出结论,但是毕竟能够向读者提供以往历史的真实情况,并向学者们提供验证本书所做的那些观察的可能性。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 H. A. 克里沃娃、俄罗斯总统档案馆的工作人员 A. B. 科罗特科夫、A. C. 斯捷潘诺夫、C. A. 梅利钦、A. Д. 切尔涅夫、当代文献保存中心主任 H. Г. 托米利娜、俄罗斯国家电影文献档案馆馆长 Л. P. 扎普里亚加耶娃的帮助,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忱。Г. H. 谢沃斯季亚诺夫院士和 A. H. 雅科夫列夫院士阅读本书手稿后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 注 释

- 1 类似的现象也发生在西方国家对苏联的研究中,在很大程度上是苏联官方史学研究的镜面反射。当然,观点是相对立的。
- 2 См. : Пихоя Р. Г.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б архивной реформе //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1994 г. М., 1996. С. 3—17.
- 3 见 О. В. 赫列夫纽克:《政治局:30 年代的政治权力机制》,莫斯科 1996 年版,第 266 页。作者认为,约·维·斯大林 1941 年 5 月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后,政治局实际上已不再是一个常设的政治领导机关,说好听些,变成了一个附属斯大林的会议机构。关于这一点实际上不存在什么异议。不能不同意一种说法:战争期间和战后年代,权力重心从政治局移到了苏联人民委员会(1946 年起改为苏联部长会议)。
- 4 См. : Катень: Пленники необъявленной войны / Под ред. Р. Г. Пихои, А. Гейштора и др. М., 1997. С. 385.
- 5 ЦХСД, ф. 89, оп. 14, д. 31, л. 1.
- 6 В начале 1990г. число таких должностей составляло 799. См. : Материалы делегату XXVI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М., 1990. С. 19—20.
- 7 据我们估算,有将近一万名官员。
- 8 大约将近 500 人(见《苏联共产党二十七大会材料》,莫斯科 1987 年版,第 337—339 页)。
- 9 В 1986 г. —2 113 должностей ( см. : Материалы делегату XXVI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С. 20).
- 10 见《截止 1991 年 6 月 1 日的政府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莫斯科 1991 年版。作者没有研究过政府二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因为它和政府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大致相同,只不过增加了某些为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中列举的官员提供工作保障的管理机构工作人员。
- 11 См. : Список абонентов автоматических междугородных телефонных станций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ой междугородной связи республик, краев и областей на 1 февраля 1990 г. М., 1990.

- 12 令人感兴趣的是,在约·维·斯大林会客登记本上记录了将近3000名在不同时期(从1924年到1953年)进入他办公室的人,这些人中包括外国外交官和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 см. : 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Журналы (тетради) записи лиц, принятых первым генсеком. 1924—1953 гг. / Изд. А. В. Коротковым, А. Д. Черневым, А. А. Чернобаевым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4. № 6; 1995. № 2, 3, 4, 5—6; 1996. № 2, 3, 4, 5—6; 1997. № 1. )



# 目 录

前言 ..... (1)

第一章 苏联的社会政治发展(1945年—1953年) ..... (1)

战后。饥荒。集体农庄的农村和尼·谢·赫鲁晓夫鲜为人知的倡议。货币改革和取消食物购买证。“冷战”。对胜利者的恐惧。“飞行员案”。猎捕格·康·朱可夫。将军们的私下交谈。格·康·朱可夫元帅案。格·马·马林科夫失宠。安·亚·日丹诺夫案和他的死亡。列宁格勒“反党集团”。尼·谢·赫鲁晓夫。拉·帕·贝利亚。全国性的反犹太人运动。国家安全部的毁灭。医生谋杀案和国家安全部。

第二章 缓慢消融的坚冰(1953年3月—1957年底) ..... (99)

约·维·斯大林之死。拉·帕·贝利亚的改革和对战后政治进程的重审。拉·帕·贝利亚的覆灭。国内对清除贝利亚的反应。贝利亚被清除后的内务部。政治意识的变化。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博特温尼克和苏共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的一场“比赛”。苏共二十大前夕。“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和苏联社会。苏共中央和国内抵触情绪的产生。二十大与社会主义阵营。对1956年的政治总结。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第三章 尼·谢·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 ..... (206)

缓解农民的税收压力。“在人均肉类、牛奶、油料产量方面赶超美国”。《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

决定》。新切尔卡斯克悲剧。尼·谢·赫鲁晓夫和军队。1962年加勒比海导弹危机。“阿纳德尔”行动计划。世界处在战争边缘。走出危机的泥潭。国家机构和党机关的改革。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二十二大。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十月政变。

#### 第四章 从稳定到停滞(1964年11月—1968年)…………… (299)

迈出“集体领导”的头几步。农业。经济改革尝试。苏共二十三大。寻找意识形态新目标。约·维·斯大林的遗产。越南战争和苏联(1965年—1968年)。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的观点。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层变动。“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很像当年的匈牙利”。确定立场。五月军事演习。政治解决或军事解决。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的8月13日对话。极端措施。

#### 第五章 从停滞到危机(1969年—80年代初)…………… (378)

科学界的“意识形态纪律”。“新方向”的毁灭。《新世界》杂志和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亚·伊·索尔仁尼琴与政权。新斯大林主义和为“意识形态净化”而斗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尾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苏联的对外政策。越南。阿富汗。两种大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和波兰的“团结工会”。

#### 第六章 领导人相继去世(1982年—1985年)…………… (458)

列·伊·勃列日涅夫之死。尤·弗·安德罗波夫：重建共产主义基础的尝试。韩国“波音”飞机的悲剧。康·乌·契尔年科执掌政权。

#### 第七章 改革,公开性,社会政治危机加深 (1985年—1989年)…………… (499)

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尤·弗·安德罗波夫的遗

产。作为“改革”第一阶段的“加速”(1985年—1986年)。与酗酒作斗争和冲击预算。继续镇压。传统的断裂。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班子。鲍·尼·叶利钦的出现。变革的困难。切尔诺贝利悲剧。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的。叶利钦“造反”。198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民族问题。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 第八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1989年—1991年) ..... (615)

准备选举。选举苏联人民代表。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国内经济危机的尖锐化。选举苏联总统。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500天”纲领的命运。莫斯科郊外收获土豆的军队。戈尔巴乔夫班子的新变化。方针——巩固苏联总统的地位。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和新奥加廖沃进程——从对抗到合作。选举俄罗斯总统。联盟领导层危机尖锐化。围绕联盟条约草案的斗争。八月叛乱。车臣:悲剧的序幕。俄罗斯国家体制的重建。从新奥加廖沃进程到“别洛维日丛林”。

结束语.....	(791)
再版的话.....	(800)
人名索引.....	(828)

# 第一章 苏联的社会政治发展

10

(1945年—1953年)

“他难道不知道要给他判刑？”

“不”，……军官说，“给他判刑是无益的，因为他的肉体已经感受到了判决”。

——弗·卡夫卡  
写于劳动教养所



## 战 后

俄罗斯历史上最艰难、最可怕的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结束了，以我国取得胜利而告终。德国被粉碎，一个统一的国家被消灭。苏军占领了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参与解放了布拉格、华沙、布加勒斯特。苏联不仅保留了根据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公约移交给它的所有土地，而且依靠东普鲁士、千岛群岛和萨哈林岛南部、中亚的小共和国图瓦，使自己的版图得到扩大。

苏联成为世界公认的首领国。苏联作为联合国的创始国之一，能够做到使东欧诸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听命于自己，东欧各国成立了共产党政府，很快就把所有其他政党排挤出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国夺取政权的斗争结束具有重大的意义，以毛泽东为首、依靠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人成为胜利者。温·丘吉尔 1946 年在富尔顿发表讲话时指出，显而易见，世界已经分为两大政治阵营，一个以美国为首，另一个以苏联为首。从那个时候开始，世界上无论什么地区发生什么样的冲突，人们都会从中发问：冲突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美国有利？

11 当时苏联的政治制度是绝对不可动摇的。战后，“各族人民和所有进步人类的伟大领袖”约·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达到了极限，并且被涂上了新的色彩——战胜法西斯德国和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最高统帅。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关于被战争毁坏的工业得到顺利恢复的报道。

伟大卫国战争似乎并没有导致国家的国内政策发生巨大变化和进行改革，这在俄罗斯的战史尚不多见。战争胜利成为苏联制度不可动摇的最好证明。战争年代出现的广为流行的一句话——“战争使一切速度加快”有其另外的政治含义。约·维·斯大林在 1946 年 2 月 9 日同选民的一次交谈中说：“战争表明，苏联的社会制度是比其他任何非苏联的社会制度都要好的社会组织形式”<sup>1</sup>，他据此得出了

另一个结论：“在卫国战争的岁月中，党以反对法西斯侵略者全民斗争的鼓励者和组织者的身份出现。党的组织工作使苏联人民团结一致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使我国的所有人力物力都从属于粉碎敌人的事业。”<sup>2</sup>

苏联制度在战争中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地得出结论：必须在战后继续奉行战前确定的并在战争中被证明是正确的国内政策。必须指出的是，这不仅仅是来自“上层”的政治方针，而且是在这场战争中感到自己是胜利者的广大居民的共同社会认识。<sup>3</sup> 政治领导人的军事化意识中还保留着战前苏联发展的方向标。

这表现在经济领域继续建立旨在首先提高国家防御能力的重工业。1946年2月，约·维·斯大林在会见选民时说：“至于说到更长的时期，党打算掀起新一轮的国民经济巨大高潮，使我们能够提高我国工业生产的水平，例如，使工业生产比战前翻一番。”根据他的指示，生铁的熔量应该增加到5000万吨，钢产量增加到6000万吨，即增加2.3倍，石油产量达到6000万吨，增加一倍。斯大林最后说：“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以认为，我们祖国有了能防范任何意外事件的保障……为此至少需要三个新的五年计划。但是这件事是可以办成的，我们应该办成它（暴风雨般掌声）。”<sup>4</sup>

重走老路（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不仅对社会保障政策和居民的生活水平造成影响，而且首先必须使主要的工业部门恢复到战前的技术水平，包括恢复战争年代被毁坏的工业。工业企业争先恐后动用根据战争赔款从德国运来的设备，恢复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工艺，知识密集型新技术被优先用于国防工业，用于建造新式武器装备。然而，民用工业部门却享用不到这些新技术，保守秘密的要求好比一堵高高的厚墙，把新技术同民用工业部门隔离开来，所以，新技术不可能对民用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产生多少重大的影响。

战前几十年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被保留了下来，此外战后重工业所占的比重逐年增加（见表1）。<sup>5</sup>

表 1 一类和二类生产在工业总量中所占的比重

年份	一类生产	二类生产
1940	61.2	38.8
1945	74.9	25.1
1946	65.9	34.1
1953	70.0	30.0

国家的工业不得不进行重组。战争结束后,军事订货的数量减少,不少人民委员部(后来改称为部)所属的生产武器装备的企业改变了生产侧重面。1946年3月,迫击炮装备人民委员部被改为机器和仪表制造部,弹药人民委员部改为农业机器制造部,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改为运输机器制造部。<sup>6</sup>

工业重组导致民品生产量扩大,居民和国民经济需要的复杂技术产品的产量增加。例如摩托车,1946年的产量仅为300辆,1949年增加到116600辆。照相机1947年的产量为90500台,1949年增加到154500台。飞机制造厂开始生产压缩机、水泵、挖掘机、金属切削机床、光学机械仪表和光谱装置。<sup>7</sup>

虽然民用工业的生产量扩大,军工生产所占的比重并没有减少,反而不断增加(见表2)。

表 2 航空工业部的产量

生产部门	1946年		1947年	
	百万卢布	百分比	百万卢布	百分比
民品	2128	43.75	2628	42.16
军品	2736	56.25	3606	57.84
共计	4864	100	6234	100

注:上表据《苏联与冷战》第166页编制。

所有主要工业部门的产量呈绝对下降趋势。1945年生铁的产量为1940年产量的59%,钢、轧制钢材和石油的产量分别为1940年产量

的66%、65%和62%。拖拉机、康拜因、火车头、汽车的产量比战前减少50%—80%。<sup>8</sup>

迅速恢复工业生产成为亟待解决的任务。

大规模建设和开发新的工业潜力成为劳动力短缺和务工者数量增加的原因,农村继续成为劳动力的主要补充来源。

但是,只要认真审视就会发现,这个战胜国国内发生的某些进程同它所进行的大张旗鼓的宣传相互矛盾。

## 饥 荒

战争给农村带来巨大灾难,最可怕的灾难是人员伤亡。有劳动能力的集体农庄庄员的数量从1941年18189200人减少到1945年11430900人。<sup>9</sup>

卫国战争一结束,可能取消集体农庄的说法广为流传。后来证明,这种说法毫无根据。

受战争之害最深的农民继续挑起在“胜利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条件下保障国家食品供应的重担。

国家开始出现饥荒,其规模不亚于20世纪30年代初集体化引发的饥荒。<sup>10</sup>

据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安·安·安德烈耶夫提供的统计资料,战后第一年(1946年),大面积的粮食作物因干旱死亡,不少庄稼迟收或弃之不收。260万公顷秋播作物在入春前死亡。大面积的可耕地颗粒无收或旱死,其中粮食作物202.4万公顷,向日葵32.1万公顷,土豆4.7万公顷。

统计资料中说,在罗斯托夫州、赤塔州和沃罗涅日州,庄稼大面积死亡。西伯利亚的粮食收成不好。

根据阿·伊·米高扬的指示,1946年9月莫斯科同它认为有多余粮食的几个州的州委书记进行了谈判,参加谈判的有伊尔库茨克州、新西伯利亚州、克麦罗沃州、鄂木斯克州、托木斯克州、秋明州、阿尔泰边



疆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以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领导人,谈判中这些州委书记和边疆区区委书记都不同意采购部的意见,拒绝用预付款和提前支付款的方式提供粮食。粮食普遍短缺,他们都想为本地区留一手。

14 那些没有食物购买证、不享受国家分配保障的居民,被当作农村对待的地区居民、农民、需要赡养者,首先成为饥荒的牺牲品。尤其是农民,他们深受饥荒的煎熬:他们要把集体农庄的所有农产品交给国家,支付大笔的实物税,却没有有保证的工资和实物报酬,没有购买食物的钱。

基洛夫州一个名叫 C. Д. 科里科夫的农村苏维埃代表给苏联部长会议写了一封信,对农村发生饥荒的原因进行独特的社会经济分析。他在信中写道, he 自己是“受集体农庄庄员的委托”写这封信的。

他在信中写道,1946 年夏天他从部队返乡后发现,邻近五个集体农庄 70% 的农户没有粮食吃。农民们吃一种代用品,这种代用品中面粉只占 40%,其余的是三叶草、酸草料和亚麻籽糠秕。“儿童吃的也是这种东西。”他写道:“夏天才过去一半,许多人就外出务工,去伐木业部门采伐木材,以挣钱养活自己和家庭。”

什么原因呢?他自问自答道:第一,耕地少,播种面积锐减。土地贫瘠,因为多年不施肥。田野上长满树木,没有清理土地的劳动力。第二,集体农庄的劳动力被吸引到伐木场去了。“伐木的季节一到,所有的主要劳动力不管本人愿意不愿意,都会按照原定的采伐计划去伐木。”这位农村苏维埃代表写道。第三,他把工人和集体农庄庄员的状况进行对比后得出结论说,集体农庄庄员的境遇要坏得多,工人凭票证可以得到 700 克粮食,他们的家庭成员也可以得到粮食,而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日所得却少得可怜,其结果是所有的人,只要能外出的,都离开了集体农庄。“可以举一个例子,就在我们这个地区,有 18 个人从部队复员,回到斯科平克斯克村苏维埃管辖的一个名叫‘战斗队员’的集体农庄。这 18 个人中,只有两个人在家务农,其中一人还是二等伤残,其他的人都外出挣钱去了,有的去伐木,有的去当售货员,以养家糊

口。集体农庄的劳动力严重短缺。”

这位村苏维埃代表的结论充分反映了当时农村缺少劳动力的普遍趋势：有劳动能力的人以种种借口离开农村。

饥荒在诺夫哥罗德州、乌里扬诺夫斯克州、科斯特罗马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高尔基州、基洛夫州蔓延，在北高加索的一些州和共和国蔓延。饥荒袭向乌克兰，袭向布里亚特。

留种用的粮食也被从集体农庄偷走，阿尔汉格尔斯克州乌斯季扬斯克地区的 89 个集体农庄中，只有 19 个农庄有种子粮。集体农庄庄员一个劳动日只能得到 100—150 克粮食，有些集体农庄连这么一点儿粮食都发不出。 15

在维诺格拉多夫、申库尔斯克、科特拉斯、维列戈、尼亚多马和其他一系列地区，许多集体农庄发不出劳动日所得粮食。阿尔汉格尔斯克州北部地区的居民完全断绝了粮食供应，因为根本没有种下粮食，这个州开始发生饥荒。

即便根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官方资料，情况较好的俄罗斯中部奔萨州集体农庄庄员人均粮食消费水平也只有每人不超过 5 普特<sup>11</sup>，其中包括劳动日所得粮食（69 公斤）和用额外收入购买的粮食，甚至包括其他非法搞到的粮食，如捡麦穗，簸扬糠秕，在收割时盗窃集体农庄的粮食，等等。这里必须指出的是，根据 19 世纪末俄国地方行政机构的统计，当时的人均粮食消费为将近 25 普特。

权力机关试图采用老办法使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发展的苏联农业走出危机的泥潭。1946 年夏天（7 月 27 日），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确保粮食完善保存、不许浪费、盗窃粮食、防止粮食霉变的决定》。1946 年秋天（10 月 25 日）又通过了《关于确保国家粮食完善保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决定》指出，“一些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的领导人、检察机关和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对盗窃和浪费国家粮食的现象听之任之……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确保粮食完善保存”。《决定》还强调指出，目前解决粮食问题的途径不是生产，而是检查和登记。

这两项《决定》出台后造成的直接后果是,为数众多的集体农庄主席被指控对所有发现的问题承担责任,他们中许多人受到了迫害。1945年5757名集体农庄主席被判刑,1946年9511名被判刑,不少生产队长和农场负责人也被定罪。<sup>12</sup>在某些地区,被判刑的集体农庄主席占集体农庄主席总数的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sup>13</sup>

## 集体农庄的农村和尼·谢·赫鲁晓夫 鲜为人知的倡议

在粮食危机最为严重的时候(1947年2月),召开了联共(布)中央全会。正如新闻报道所指出的那样,这次全会的议题是讨论加强农业的措施。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把农业的现状说成是“集体农庄制度的胜利成果”,说什么苏联已经拥有“先进的、装备现代化技术设备的农业”,从而得出结论说:“加强农业确保了集体农庄社会财富和集体农庄庄员福利的增加。国家采购的粮食、肉类、食油和其他农产品的数量保证了国家对粮食和原料的需求,并形成了相当数量的储备。”

16 全会对农业现状的“深刻”分析成为党的行动指南,一些加强农业的措施先后出台。首先是完善党对农业的领导,要求“彻底消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指出的违背农业劳动组合章程的现象,如不正确分配劳动日所得,占用集体农庄的公有土地,私分集体农庄的财产,违反劳动组合管理的民主原则。”

全会通过的决定中指出,集体农庄现行的劳动定额“过时和偏低”,导致劳动日浪费。决定中还对播种和收割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值得注意的是,这份文件没有提供关于农民将得到什么的任何信息,哪怕是出于宣传的需要。国家让农村承担新的义务,自己却不承担任何保证,国家对农村的监督反而进一步加强。还应该指出的是,在“占用集体农庄的公有土地,私分集体农庄的财产”这句话的背后含义是,要求削减集体农庄庄员从事副业的范围,而从事副业是当时集体农庄庄员生存的主要条件。重新审查“过时、偏低劳动定额”的建

议更为令人吃惊,这明明是为了减少集体农庄庄员赖以挣钱糊口的劳动日数量!

总之,社会主义集体农庄制度的基本原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这样的农业无法养活国家是件明摆着的事,摆脱集体农庄生产危机状态的出路何在呢?还是老办法,镇压。1948年6月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将故意逃避农业劳动和过着反社会的不劳而获生活方式的人迁往边远地区的命令》。这一倡议的提出者是当时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尼·谢·赫鲁晓夫<sup>14</sup>,他引证乌克兰在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农业备受摧残后出现的问题说,战争导致集体农庄制度受到削弱,因此他向斯大林和贝利亚提出建议说,国家要对那些不愿意在集体农庄里干活的农民采取严厉的政策。

赫鲁晓夫援引法律上的先例,把不愿意在集体农庄里干活的这些人说成“犯罪分子和不劳而获分子”。这位乌克兰领导人写道:“在沙俄时代就有过这样的法律,根据这一法律,村社可以作出把某些人赶出村子的判决,‘让这些继续留在这里危及当地的福利和安全’(《俄国法律汇编》第4卷第3页)。”赫鲁晓夫继续写道,“显而易见,这种法律保护私有财产,是针对对沙皇地主制度有威胁的人的。现在,为了进一步保护社会主义所有制,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颁布类似的法律,集体农庄庄员大会会有权作出强迫那些不想从事社会有益劳动的最危险的反社会犯罪分子迁出共和国的判决。”<sup>15</sup>

在莫斯科看来,赫鲁晓夫的提议不仅对乌克兰而且对整个苏联都有好处。于是,根据赫鲁晓夫递交的报告制定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命令,参加制定的有格·马·马林科夫、安·亚·日丹诺夫、拉·帕·贝利亚、米·安·苏斯洛夫以及内务部部长谢·尼·克鲁格洛夫和国家安全部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看完这一草案后在上面作出了醒目的批示:“不下发。约·维·斯大林。”<sup>16</sup> 17

这份命令没有正式颁发,这显然是因为它有针对农民之嫌。尽管没有正式颁发,它的内容还是被传达到了每个集体农庄和集体农庄庄



员。召开集体农庄庄员大会、把那些没有完成最低劳动日指标、生活比较富裕的集体农庄庄员强制迁移出去的浪潮席卷全国。

根据苏联内务部特殊移民处的资料,从1948年到1953年初,有33266名集体农庄庄员和13598名他们的家庭成员被强制迁移。1948年是强制迁移的高峰年,这一年有27335人被流放。“紧接着进行的没收生产工具和土地”是加强集体农庄强制性劳动的另一项镇压措施。在苏联政府下属集体农庄事务委员会的一份注明1948年9月的文件中指出,“在集体农庄采取这些措施以后,劳动纪律性大大加强,以前不参加劳动生产的集体农庄庄员出工的天数增加”。<sup>17</sup>

1947年还通过了《关于对盗窃国家和公共财产的行为追究当事人刑事责任》的新法规,其中规定“对偷拿、侵占、盗用集体农庄、合作社或其他公共财产的人,处以在劳动改造营监禁五到八年,并没收或不没收其财产”。

## 货币改革和取消食物购买证

1947年12月通过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决议——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进行货币改革和取消食品和工业品购买证的决定。用不着分析这份文件的内容就可以断定,这项改革使国家再也不用为确保凭证供应承担什么责任了,从而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不过,由于货币兑换条件对城市居民更有利,使他们生活条件恶化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纠正。一般的货币兑换标准为十卢布兑换一卢布,而存进银行的钱如果达到3000卢布,兑换标准为一卢布兑换一卢布,国家公债券的兑换标准为三卢布兑换一卢布。由于存款和公债券多半在工人手里,使从定量配给制向更高的国家统一价格过渡的难度得到缓和。

在取消食物购买证和进行货币改革的同时,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宣传运动,大讲苏联经济所取得的成就和集体农庄制度在迅速消除战争后果中所起的作用。但是这场运动的幕后情况是,货币改革具有

强行没收的性质,国家把保证向居民和工人定量配给的所有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国家规定的新价格大部分高于战后批准的配给制下的非配给价格。苏联报刊当然不会披露这些情况,令人吃惊的是,苏联的史料研究也从来不涉及这个问题(改革具有没收的性质)。

其实,改革的所有环节都具有没收的性质,国家无疑是牺牲了公民的利益解决本身存在的问题。居住在莫斯科的外国人,其中包括美国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也跟着倒霉,他们按照 3:1 兑换货币,这当然要比苏联公民好得多,苏联公民兑换货币要高于 10:1 的最低限额。美国人当然不打算同意这种规定,美国大使馆同苏联外交部之间开始长时间的书信往来,美国大使馆的金融专家们阐述了他们对改革后果的看法。

他们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同过去的配给价格相比,苏联政府 1947 年 12 月 14 日规定的新价格体系只使四种消费品的价格略有下降……其他食品实际上比过去更贵”。<sup>18</sup>美国大使馆的经济专家按当时通行的标准——8 卢布兑换 1 美元的兑换价进行换算,对华盛顿和莫斯科的食品价格作了比较后指出,1948 年在莫斯科的生活费用比在华盛顿高昂。

在 1948 年 8 月 3 日美国驻苏大使斯米特同副部长安·亚·维辛斯基会晤之前,美国大使馆准备了如下一份表格。<sup>19</sup>

表 3 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价格比较(按 8 卢布兑换 1 美元)

食品	莫斯科	华盛顿
一级面粉做的白面包 1 公斤	7 卢布	1.88—1.94 卢布
一级白面粉 1 公斤	8 卢布	1.57—1.73 卢布
苹果 1 公斤	16—25 卢布	1.47—1.94 卢布
牛奶 1 升	3—4 卢布	1.61—1.94 卢布
通心粉 1 公斤	10 卢布	2.65 卢布
一级肉 1 公斤	30 卢布	10.4—12.16 卢布
食用油 1 公斤	64 卢布	13.6—14.96 卢布
茶叶 100 克	16 卢布	1.76 卢布
咖啡 1 公斤	75 卢布	6.79—8.96 卢布

在谈及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时必须指出,集体农庄生产只能保障部分食品供应,向农户征收的税收(实物税和货币税)是食品供应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农户、集体农庄庄员、个体农民、有家畜的工人和职员都必须纳税。战后,平均一个集体农庄农户要缴纳:肉类40公斤,鸡蛋5—100个,牛奶280—320升。<sup>20</sup>货币税迅速增加:1940年平均一个农户要缴纳的货币税为112卢布,1949年增至419卢布,1950年为431卢布,1951年为471卢布,1952年为528卢布。<sup>21</sup>

税收中货币部分不断增加导致集体农庄的劳动货币收入不足以缴纳税收,因此,唯一的办法是把宅旁园地栽种的东西拿到集市上卖钱纳税。政府的税收政策迫使农民走向集市,导致农产品价格下降。农民被迫把许多东西廉价出售,他们害怕因不纳税受到惩罚,只好把能卖的东西都卖掉,沦为赤贫。苏联司法部的一名官员1951年3月在回答一名集体农庄庄员提出的问题时说:“征购农产品时欠缴的税款必须追缴,未按时完成征购任务的要罚款,过去对这种做法不太适应。现在可以根据法院的民事判决,拉走欠税人仅有的一头牛。”<sup>22</sup>

1950年掀起了一场扩大集体农庄和缩小自留地的运动,在下半年(从1950年11月到12月),有199800个集体农庄被合并,占1950年5月全国集体农庄总数的79.3%。<sup>23</sup>

1951年3月4日,赫鲁晓夫在《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大讲他的建立“农业城”的思想。按照他的说法,在“农业城”里居住的人应该包括农民和甚至非农民。农村工人具有城市日常生活方式的所有优点,他们没有自己的产业,没有私有者固有的心态,这样,工人和农民就会融合为一个阶级。<sup>24</sup>将来这种思想将成为苏联土地问题专家、哲学家、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家的固有观念。更可悲的是,后来他的这种思想竟成为党和政府作出农业问题决策的依据。

虚构的按照共产主义原则解决农业问题成为把农民(而不是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的正式依据。当时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拥有的农业用地占96%—98%,拥有的复杂农机设备占100%<sup>25</sup>,然而出人意料的是,集体农庄庄员、国营农场、工人新村的宅旁小块地却赛过了国

营农场和集体农庄的大块地,这简直违背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所有公理。在一份关于 50—60 年代农家庭院在国家经济中所起作用的专门研究报告中指出,1950 年,集体农庄庄员宅旁园地的产量占全国农产品总量的 38%,工人和职员宅旁园地的产量占 13%。宅旁园地经营在畜产品生产中所起的作用更大,分别占 46% 和 16%。由此可见,宅旁园地经营提供了农产品总量的 51% 和畜产品总量的 62%。<sup>26</sup>在俄罗斯中部地区的一些州,农户宅旁园地经营所起的作用更大,例如图拉州的农户在 1950 年生产的肉类占 75%,牛奶占 80%,鸡蛋占 85%。 20

在正统的苏联社会主义理论家看来,这简直是糟糕透顶的疏忽大意。这些理论家应该看到,尽管农业生产资料私有制已被消灭,农民所有的一切——土地、家具、马匹都被充公,使用雇佣劳动的任何可能已被排除,但是这种生产不仅保留了下来,而且客观上在国家经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此外,宅旁园地的农作物产量比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平均高 1—3 倍,畜产品产量平均高 1—2 倍。<sup>27</sup>

宅旁园地经营的最重要特点是,它主要面向家庭(事情不在于可以挣到钱,而在于可以免于饿死,可以养活子女,给他们一杯牛奶,给桌子摆上土豆,可以把鸡蛋、牛肉、猪肉拿到集市上出售,以缴纳货币税)。土豆和牛奶是战后农村和小城市一代人的主要食物<sup>28</sup>,依靠神话般的集体农庄劳动日(就像当时人们说的“靠划杠杠”)和微薄的战后工资无论如何是活不下去的。战后,所有城市和村镇周围任何一小块合适的地段——道路两旁,林边空地都被开垦种上土豆,集体化时期和战时荒芜的割草场也被恢复。

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资料,在集体农庄劳动的货币收入占将近 20%。下面是 1950 年一个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

集体农庄的工资(劳动日报酬,附加工资)	221 卢布
受雇在国营单位和合作社工作	220 卢布
个人义务交售和向国营单位、合作社、 集体农庄出售牲畜、家禽和食品的收入	35 卢布



在市场上出售牲口、家禽、从集体农庄分得的产品和自产的产品	487 卢布
国家发放的养老金、补助金和其他收入	114 卢布
从亲戚和别人那里得到的钱	56 卢布
1950 年所有货币收入	1133 卢布

从上表可以看出,集体农庄的工资(劳动日报酬、附加工资)在经济上对于集体农庄庄员本人是无济于事的。

根据上述统计资料,集体农庄庄员在集体农庄劳动 211 天所得的报酬还不到他在自留地上所能挣到钱数的 25%。<sup>29</sup>

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看,这说明国家监控不力,不知道这种经济成分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我国社会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看来,这无疑是件令人伤心的事。他们下决心从几个方面入手,对它实行监控,首先是实行以义务交售形式出现的征收粮食税,这种征收一直保留到 1958 年,交售数量以每个农户为单位计算,在城市和镇按牲畜头数计算,交售的粮食按照完全象征性的价格(为实际价格的 10%)收购。

对这一经济成分施加影响的另一种方法是不止一次没收集体农庄庄员“多余”的份地。此外,还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对“私有制倾向”的宣传运动,有组织地惩办“损公肥私分子和不正当分子”。

由此可见,一方面是按照社会主义原则组织的农业发生危机,另一方面是农产品生产的私有成分相对发展。格·马·马林科夫在十九大上提出的“粮食问题已经得到切实和彻底解决”的说法当然不可能被苏联政治领导人所接受。

1953 年,粮食总产量为 8000 万吨,肉类——580 万吨,牛奶——3650 万吨,动物油——49.7 万吨。<sup>30</sup>

## “冷 战”

来自主要军事敌人——纳粹德国和日本的威胁被削弱以后,同盟国之间的关系开始复杂化。早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同盟国就尽其

所能相互迷惑对方,力争将来取得更强大的地位。美国和英国在研制原子弹方面加紧合作,不让自己的盟友——苏联获取核秘密,如同大家所知道的那样,这使苏联的核间谍活动成为苏联情报机关最重要的一项工作。美国和英国反对苏联对波兰的政策,对苏联在伊朗、巴尔干半岛、罗马尼亚的地位得到加强感到不安。<sup>31</sup>

苏联外交部认为,将来同以前的盟国发生冲突在所难免。1943年担任外交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的И. М. 迈斯基还在当年就谈到过战后世界格局的前景,他写道:“将来在世界政治中起领导作用的是苏联、美国和英国,事件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三个强国之间的关系性质。战后,特别是在初期,美国可能具有什么样的地位呢?情况表明,在这一时期,美国是高度发展的帝国主义的堡垒,它将竭力追求在世界各地——在美洲、亚洲、澳大利亚和非洲广泛扩张,欧洲大概也不能幸免,当然,美国在欧洲的扩张形式将略微有别于其他地区。不言而喻,美国的扩张将是新型的扩张:扩张的手段与其说是领土吞并(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排除),不如说是财政经济吞并。”<sup>32</sup> 22

在战争的最后一些日子中,如1945年4月23日,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华盛顿白宫会见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米·莫洛托夫时以极其严厉的口气说:“如果承受战争主要负担的三个主要盟国不解决波兰问题,势必引起世人对我们战后是否团结一致和有决心表示怀疑。”<sup>33</sup>又如1945年5月4日,莫洛托夫在同美国国务卿E. 斯退丁纽斯和大不列颠外交大臣A. 艾登在成立联合国的圣弗朗西斯科(旧金山)举行会晤时,后者指责苏联当局逮捕了以L. 奥库利茨基将军为首的16名波兰政治活动家,照艾登和斯退丁纽斯的话说,被逮捕的人中有“莫斯科小组的英国和美国代表提出的协商人选”。<sup>34</sup>

美国在战争年代研制的核武器成为向苏联施加军事政治压力的工具。陪同杜鲁门参加盟国波茨坦会议的杜鲁门的女儿记录了她父亲在1945年7月16日试验原子弹前夕说的一番话:“我想,如果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就有治这小子(指斯大林)的办法了。”<sup>35</sup>

但是,“冷战”并不是马上诞生的,盟国之间不但存在着矛盾,而且

都清醒地意识到必须联手行动。超级大国相互角逐,互相勾心斗角,同时互为需要。必须寻找出对一些国家——德国的盟国的一致立场,做好同这些国家缔结和平条约的准备,在远东调整同中国和朝鲜的关系。虽然达成了一些协议,但是其进程十分艰难,不过,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对世界布局的主要共识还是使盟国都感到满意,成为大部分妥协的框架。莫斯科密切注视美国的政治力量配置,对1946年的美国过渡选举抱有众所周知的希望。<sup>36</sup>

战后头几年,外交部长常设会议的机制还在起作用。1945年9月到10月在伦敦召开的部长会议讨论了调整同德国的前盟国——意大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芬兰的关系问题。1945年9月20日,在美国国务卿伯恩斯同维·米·莫洛托夫进行协商过程中,伯恩斯提出了异乎寻常的建议。伯恩斯对莫洛托夫说:“美国人民通常不与其他国家缔结条约,但是,现在美国人民对不允许德国重新武装起来充满信心。如果莫洛托夫认为这样做有好处的话,我伯恩斯可以建议杜鲁门说服国会领导人同意美国和苏联签订条约。签订条约的目的是解除德国的武装20—25年。”

但是,莫洛托夫不仅对伯恩斯的建议反应十分冷淡,而且严厉指责美国对罗马尼亚政府的立场,因为美国批评罗马尼亚政府不够民主。莫洛托夫一再向伯恩斯“施压”,要求伯恩斯取消美国对罗马尼亚政府的批评。<sup>37</sup>

两天以后,莫洛托夫在再度同伯恩斯会晤时明确表示,莫斯科对同美国签订关于德国的条约不很感兴趣,莫斯科认为,签订关于“反对日本可能再度侵略”的美苏条约更为重要。苏联领导人感到不安的是,“日本主要岛屿的一些日军成建师正在进行复员,并没有被美国人俘虏,所以日本还拥有训练军官和士兵的干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美军统帅部没有同盟国协商的情况下发生的”。<sup>38</sup>从此,日本问题成为不断困扰苏美关系的难题。<sup>39</sup>

温·丘吉尔在富尔顿的讲话向来被视为“冷战”公开化的开端,但是从苏联外交部的文献资料看,他的这次讲话并没有引起当时苏联驻

华盛顿大使馆的多少注意,有关这次讲话的消息只是在大使馆的刊物上进行了简评。这位离职的大不列颠首相关于存在“铁幕”、美国原子垄断有好处和操英语国家在战后世界中起主导作用的观点在国际上得到了共鸣,这引起了斯大林的愤怒。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丘吉尔的讲话具有权威性,但毕竟是一个失去权力的人的个人看法。1946年3月14日,《真理报》刊登了斯大林口气尖锐的谈话,丘吉尔本人和“不仅在英国而且在美国的他的朋友”受到了斯大林的抨击,但是,斯大林没有批评这些国家的国家政策。<sup>40</sup>

1946年2月,美国驻莫斯科代办D.凯南在离开苏联之前给华盛顿寄去了一份关于苏美关系前景的政治报告,稍后,在1947年7月,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中有所披露。凯南写道:“……我们在这里同一些政界人物打过交道,他们狂热拥护这么一种意见:同美国不可能达成不变的临时协定。为了确保苏联政权的安全,破坏美国社会的内部和谐、摧毁美国的生活方式、消除美国的国际影响是必需和必要的。”凯南认为,苏联政权是一个“对理性逻辑接受差……对暴力逻辑很敏感”的政权。<sup>41</sup>

苏联的历史学家对凯南给华盛顿发去的这封“长电报”都不陌生。<sup>42</sup>但是许多人并不知道另外一件事:苏联驻圣弗朗西斯科总领事馆获取过凯南1946年10月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记录,当时这份文件被寄送莫斯科外交部。<sup>43</sup>

D.凯南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确切了解这个外交官是如何认识美国对苏政策的。凯南说,资本主义包围的理论是苏联对外政策学说的最重要论点。按照凯南的说法,在这种理论的背后是“实际依据”,即根据苏联原先的经验。他断言,无论苏联政府或苏联人民都不希望爆发新的世界大战。所以他认为,主要的问题不在于同俄国人有没有建立关系,而在于同俄罗斯建立什么样的关系。

24

凯南认为,战争使苏联衰弱,使它失去大量劳动力和部分工业潜力。所以,尽管苏联在同邻国关系方面的地位得到加强,但是这个国家没有侵略的计划。



凯南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实际上否认了他本人说过的应该从实力地位出发同苏联对话的观点。他说,对苏联施加威胁,那将起不到任何作用。凯南对自己的听众说:“我们要态度强硬地宣布,当我们本身的利益确实受到损害时,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立场。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美国人的实际利益没有被损害,恐吓和不妥协则是极大虚弱的表现。”<sup>44</sup>他认为美国对波兰的立场就是一例,对于美国来讲,犯不着因此同苏联发生冲突。“只要我们不产生臆造的和引发臆造的结局”,就可以避免相互不理解。

凯南在回答听众提问时说,苏美战争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可能是“鲨鱼和老虎的争斗”。<sup>45</sup>

凯南认为,苏联保持着内部统一,它不存在政府和军队之间的冲突,俄国人民有捍卫自己领土的悠久传统和能力。俄国人对西方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准备随时证明“俄罗斯具备更大的力量”。凯南说:“我劝大家不要低估他们,共产党政府比原先认为的要强大得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一些老资格、久经考验的地下工作者,他们坐过牢……为了自己的信仰……”<sup>46</sup>

凯南 1946 年 10 月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中所阐述的立场,比起他同年 2 月给华盛顿的“长电报”中所表明的那些观点要谨慎得多,甚至比他用 X 笔名写的发表在《外交》季刊上那篇文章的观点也谨慎得多。

在 1946 年,美国和苏联都在寻找两国之间的未来关系模式,说那个时候冲突比妥协更重要未必正确,这并非夸大其词。即便在核武器问题上,美国的立场也不是完全一致的。所谓的巴鲁赫计划的前提条件是,联合国通过对制造核材料、研制和利用核武器实行监督的提案和为此在联合国内成立专门机构,尽管巴鲁赫计划具有“美国式中派主义”的色彩,但是美国外交部不能不考虑苏联在核武器问题上的意见。

25 1946 年夏天在比基尼岛试验原子弹时邀请苏联方面作为观察员参加,就是试图在核武器领域增进苏美合作的一次尝试。当时,苏联方面接受了这一邀请,派去了三名苏联代表。<sup>47</sup>

苏联领导人提交联合国的以销毁核武器为前提条件(当时只有美

国有核武器)的所谓葛罗米柯计划也没有得到采纳。

1947年,苏美关系开始迅速恶化。1947年2月,苏联驻纽约总领事在给莫斯科的一份报告中写道:“与去年11月和12月相比,1947年1月和2月美国人对我们的态度变坏很多,共和党人范登堡、塔夫脱、杜勒斯以及巴鲁赫等对报刊和电台的导向使局势更加恶化。”<sup>48</sup>

1947年初,明显可以感觉到苏联和美国发生了公开冲突,“冷战”从此开始。1947年2月,在美国参议院讨论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人选时,参议员麦克勒尔向美国副国务卿迪·艾奇逊问道:“您难道不认为俄罗斯有了原子弹以后,就会把欧洲和世界的剩余部分占领吗?”艾奇逊在回答时说:“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侵略和扩张的”,实际上对这个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sup>49</sup>

苏联外交部从中觉察出关系恶化的迹象,很快就对美国参议院的讨论作出了反应,外交部起草了莫洛托夫给美国的照会,照会草案中说“苏联政府提请美国政府注意,艾奇逊先生的行为是不能容许的。他竟然不顾自己的官方地位,在参议院发表敌视苏联和与苏美关系准则完全格格不入的讲话。”

莫洛托夫接到这份照会草案后亲自进行了核定,使语气变得更加不客气。他亲自在照会的正文中写上艾奇逊的讲话是“对苏联的粗暴诬蔑和敌视”,甚至把末尾的外交用语“致热诚的敬意”也改为“尊敬您的……谨上”。<sup>50</sup>

美国国务卿收到苏联的照会后,针锋相对,可以把美国国务院的行动视为对苏联外交的“镜面反射”。美国国务院在答复照会中不厌其烦地援引艾奇逊的如下原话:“……我充分意识到,俄罗斯的对外政策是侵略和扩张的。我认为,联合国所采取的巨大努力之一是寻找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您把这段讲话的内容说成是对苏联的诬蔑和敌视,按照我们的标准,对属于外交政策的问题**提出有分寸的批评**(莫洛托夫在黑体字下面画了着重线——作者)不是诬蔑。”<sup>51</sup>

苏联收到这份照会后直接给美国国务卿乔·马歇尔又发去了一份照会。

26 苏美发生外交冲突的消息上了报纸。1947年3月21日,美联社和合众社播发了迪·艾奇逊在外交事务委员会发表讲话的消息。艾奇逊在讲话中声称,“世界任何地方存在的由共产党人掌握政权的政府对美国的安全都是危险的”。这次讲话成为轰动一时的消息,但是美国方面予以否认。

“冷战”的蜡烛被双方点燃了。

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乔·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时,宣布了对受过纳粹侵略的那些欧洲国家实行援助的计划。

在援助欧洲计划(所谓马歇尔计划)的准备过程中,打算利用大不列颠、法国和苏联部长会议这一机制。苏联外交部长被邀请前往巴黎参加会晤,以制定这个计划的主要框架。

美国的这一计划无疑对饱受战争之害的欧洲国家具有吸引力,此外,它为战后被划分为四个占领区的德国在经济上联合创造了机会。苏联驻德国军事行政当局总指挥瓦·丹·索科洛夫斯基收到过德国经济委员会的一封信,信中说:“德国的各个州或地区不可能单独摆脱战后的混乱,只有恢复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统一,使各个州密切合作,才能走出困境……德国人民现在期待盟国外交部长在巴黎会议上就立即恢复德国统一问题达成协议。”<sup>52</sup>

战后属于苏联势力范围的一些国家——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都向巴黎请求得到援助。<sup>53</sup>

苏联科学院院士叶·萨·瓦尔加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对“马歇尔计划”进行了经济鉴定。瓦尔加认为,“马歇尔计划”与其说是个经济援助计划,不如说是个政治渗透计划。他得出结论说,美国人谋求在欧洲市场上抛售自己的商品,试图从那些在经济关系方面还不可靠的伙伴那里取得政治报酬。

瓦尔加认为,“马歇尔计划”的最终结果可能是:

——德国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统一;

——为美国提出取消“铁幕”、获得商品、经济和政治情报自由流通的权利提供可能性(瓦尔加估计,苏联会把这种情况视为对它

的敌视)；

——欧洲资产阶级国家建立反对苏联的统一战线。<sup>54</sup>

使克里姆林宫愤愤不平的是，苏联被排除在按照这个计划准备援助的国家之外。表面上的原因是，苏联曾经宣布它已经达到了预算顺差，所以，美国方面认为，苏联不需要取得援助。但是，“马歇尔计划”正式宣布的目标是援助受法西斯侵略之害最深的那些国家，如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对苏联提出这个附加条件显然是不公平和几乎是恬不知耻的。 27

在莫斯科的压力下，中欧一些国家(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波兰，芬兰和后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和1947年7月12日在巴黎召开的全欧会议。<sup>55</sup>

归根到底，“马歇尔计划”是一个如何实现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妥协和解决划分欧洲势力范围争端的政治经济计划。

1947年9月，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一届会议上发言时说：“大家看得越来越清楚，实施‘马歇尔计划’将意味着欧洲国家听命于美国方面的经济和政治控制，意味着后者对这些国家内务的直接干涉。此外，这个计划是试图把欧洲分裂为两个阵营，并借助大不列颠和法国组成敌视东欧民主国家和首先敌视苏联的利益的欧洲国家集团。”<sup>56</sup>

苏联对“马歇尔计划”作出了回应，恢复了对全世界共产党实行领导的统一机构，加强对东欧和中欧国家的控制。1947年9月组建了各国共产党情报局(Коминформ)，它的出现成为放弃“国家社会主义道路”的构想<sup>57</sup>，亦即放弃战后头几年克里姆林宫内有分歧的政治理论的见证。

正是在1947年，东欧各国开始“揭露反共和国和反民主的阴谋”。首先是在匈牙利，这个国家的共产党领袖马·拉科西痴迷于寻找敌人，他不满足于仅限于在本国作出这种努力，指望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中扮演政委和检察员的角色。然后，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马·拉科西在1947年4月同维·米·莫洛托夫会晤时叹息说：“真可惜，看来阴谋家们确实没有武器库，否则我们就可以更彻底揭露他们……我们想粉碎反动派，重新提出搞阴谋的问题。现在我们已经搞清楚有1500个非犹太人出身的法西斯分子，他们是一些种族主义者、教授、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我们应该把他们清除。”

这种狂妄的态度引起了莫洛托夫的怀疑：“难道大部分匈牙利知识分子都卷入了阴谋活动？如果你们反对匈牙利的所有知识分子，你们的日子会很不好过。”<sup>58</sup>

28 “冷战”加剧使苏联对其仆从国的政策发生改变，加强了“意识形态纪律”，提出了按照苏联方式划一的严格要求。1947年9月，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在波兰召开的一次共产党代表会议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政治力量发生了新的配置，形成了两个阵营，一个是以美国为首的反民主的帝国主义阵营，一个是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的民主阵营。反动派阵营的主要目标是，加强帝国主义，准备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同社会主义和民主国家进行斗争，到处支持反动的、反民主的、亲法西斯的制度和运动。民主阵营的目标是，反对新的帝国主义战争和扩张的威胁，巩固民主国家和根除法西斯主义残余。<sup>59</sup>

1948年春天，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整套论证必须根本改变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成员组成的材料，这些秘密公文对四个国家——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党内和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批评。与此同时，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还对波兰工人党的政治路线进行了类似的分析批评。<sup>60</sup>

1948年爆发了“冷战”时期的第一次大规模冲突，世界第一次处在新的战争边缘。柏林危机就其本身而言是合乎规律和不可避免的，在划分欧洲势力范围中，柏林的特殊地位使它成为角逐场。这座城市聚集了互相角逐的国家集团的大量军队，这里发生的冲突可能迅速变成一场在欧洲中心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参与冲突的各方都清楚地意识到显示实力转变为使用武力的危险性。

早在1947年底，一些西方大国就在伦敦召开的外交部长会议上，



提出了所谓的“补充原则”，规定从原先的同盟国在德国的义务向在西部占领区建立国家过渡。在德国问题上的矛盾如此深刻，以至于同盟国定期召开的外长会议从这个时候开始实际上已经停止。<sup>61</sup>

1948年3月1日，苏联在德国东部的行政当局对柏林和西部占领区之间以及东部占领区和西部占领区之间的通信、运输和贸易实行限制。

几乎与此同时，产生了西方国家——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的军事政治联盟，建立这一联盟的计划受到了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公开支持。1948年6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了所谓的“范登堡决议”，直接参加已经组成的合众国军事联盟从此成为可能，“马歇尔计划”参加国的范围和新的军事政治联盟参加国的范围相吻合。

紧接着，开始在德国西部占领区实行新的货币标志，并在柏林的西部地区推行，这导致对西柏林的封锁不断加强。美国和英国、法国一道，使用“空中桥梁”向西柏林运送一切必需品——食品、燃料和其他商品。 29

欧洲和世界两大政治力量中心的矛盾开始公开化，并随时存在着加剧的危险，从而使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外交活动更加频繁。

双方不断互致照会。以前的同盟国指责苏联封锁柏林是“对在柏林的其他占领国的直接挑衅”。苏联政治领导人则说，正是同盟国违背了原先达成的关于柏林的协议，在柏林西部一带单方面进行货币改革，导致贬值的旧马克流入柏林和德国东部各州，使那里的经济形势恶化。<sup>62</sup>

1948年8月30日，美国、英国和法国的代表在莫斯科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进行谈判，他们在8月2日还曾经同斯大林进行过谈判。

斯大林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其中包括：

——取消柏林和西部占领区之间的运输限制；

——把在德国的苏联占领区流通的德国马克作为柏林的惟一货币单位。<sup>63</sup>

在莫斯科的谈判达成了初步协议：西部占领国准备取消在柏林流通西部马克，并同意使用苏联占领区的马克，其条件是四国对它在柏林的发行、流通和使用进行监督。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后，斯大林于 1948 年 8 月 23 日对四国监督问题表示同意，并亲自提议成立四国委员会，监督金融协定的实际实施，并建议在苏联占领区德国发行银行的监督下，在柏林实行统一的货币并确保其进一步流通。<sup>64</sup>

但是这些协议也没有变为现实。建立两个德国的准备工作全力以赴进行，柏林仍然是纷争之地，封锁还在继续。只是在过了一年以后，即在 1949 年 5 月，在纽约举行的四国谈判才达成协议：从 1948 年 5 月 15 日起，苏联和西部占领国各自取消在德国东部占领区和西部占领区之间以及在西柏林和东柏林之间的封锁。

1949 年 9 月，由三个西部占领区组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 10 月，在属于苏联占领区的德国一些州的基础上组成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与此同时，建立军事政治同盟的进程速度加快。1949 年 4 月，北大西洋同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立，参加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丹麦，挪威，冰岛，卢森堡。后来，土耳其和希腊（于 1952 年）、联邦德国（于 1955 年）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sup>65</sup>

与此同时，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军事联盟。

两个军事同盟之间冲突的另一个地区是远东。大国制定朝鲜统一政策的尝试完全失败，朝鲜很快变成为新的局势紧张中心。战后，这个国家被分为两个势力范围——南方在美国控制之下，北方在苏联控制之下。1948 年成立了以美国走卒李承晚为首的韩国政府，北方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的亲苏政府。两个政府都从自己的伙伴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援助，韩国根据 1948 年 8 月同美国签订的条约，得到了大量的军事装备。

类似的进程也在朝鲜进行。1949 年 3 月 5 日和 14 日，以斯大林

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和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领导人举行了会晤<sup>66</sup>，金日成在这两次会晤中请求苏联提供军事援助。据他说，南朝鲜有 1.5 万—2 万美国军人和将近 6 万南朝鲜士兵和军官。斯大林问：“哪一边的军队更强大——北方军队或南方军队？”朝方代表回答说，北朝鲜的军队更强大。斯大林建议金日成要有自己的空军。

双方就苏联提供军事援助和在苏联训练朝鲜军官问题达成了协议。<sup>67</sup>

1950 年 1 月 19 日，莫斯科收到了苏联驻平壤大使 T. Ф. 什特科夫的一封电报。电报中说，两天以前（1 月 17 日），金日成说：“中国的解放即将结束，现在该轮到解决朝鲜解放的问题”，按照朝鲜领导人的话说，“游击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1950 年 4 月 10 日，斯大林同金日成举行了会晤。<sup>68</sup>

6 月 25 日，北朝鲜军队向南方发起进攻，冲突迅速国际化。联合国站在南朝鲜一边。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谴责“北朝鲜军队武装进犯朝鲜共和国”，要求朝鲜把军队撤到“三八线”，并敦促联合国所有会员国“为执行本决议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和不向朝鲜政权提供援助”。31

美国军队打着联合国的旗号介入朝鲜南北方的冲突；中国的军队和苏联军队（首先是飞行员和防空部队）站在朝鲜一边。

美国飞行员和苏联飞行员在朝鲜上空展开了激战。苏联飞行员被绝对禁止飞越“三八线”和深入南朝鲜空域，这使苏联飞行员免遭南朝鲜及其盟国军队地面防空火力的伤害。美国及其盟国的飞行员在朝鲜上空作战，损失惨重。

苏联总参谋长谢·马·什捷缅科在回答斯大林询问时说，在战斗行动期间——从 1950 年 11 月 1 日到 1951 年 12 月 6 日（斯大林询问的那一天），苏联共损失 63 架米格-15 和米格-15-бис 以及 30 名飞行员，苏联高炮部队中死 29 人，伤 53 人。在这段时间中，共击落敌机 569 架，其中 510 架被苏联歼击航空兵的飞机击落，59 架被苏联防空炮兵的火力击落。

但是,朝鲜在地面战斗行动中屡受挫折,对南方的进攻行动遭到失败。在朝鲜南部仁川的美军空降兵重创朝鲜军队,切断了他们同燃料和弹药基地的联系。1950年9月26日,金日成下令“立即采取措施把人员从南朝鲜撤出,用于在北朝鲜重新组建,不让南方人利用他们。”

战争进入了艰难和浴血的持久阶段,这场军事冲突有发展成为世界大战的危险。世人在拭目以待,准备应付新的世界大战。

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相对抗的华沙条约是在后来(1955年5月)才正式产生的,参加华沙条约的国家有苏联、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但是,以苏联为首的军事同盟实际上早就形成。据匈牙利共产党总书记马·拉科西回忆,“到1950年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令人恐惧的整个大轮廓已经显现。显而易见,这个联盟旨在反对社会主义世界,社会主义国家不能袖手旁观,听任越来越大的霍霍磨刀声。”

马·拉科西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了1951年1月8日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会议的事实:“苏联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斯大林,几位政治局成员。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还有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和当时担任苏军总参谋长的什捷缅科将军。”与会者中有苏联阵营的各国共产党总书记和国防部长。什捷缅科在会上报告说,“到1953年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完全做好了准备。为了达到力量均等,必须适当部署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当时的波兰前国防部长康·康·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说:  
32 “什捷缅科提出的为波兰组建部队的计划在1956年前组建完毕。”斯大林打断了这个固执而任性的元帅的话说:“如果罗科索夫斯基能保证在1956年前不会发生战争,可以按照最初的发展计划。如果保证不了,就要采纳什捷缅科的建议。”<sup>69</sup>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时不长的和平很快就变成了不久前的盟国之间的旷日持久的“冷战”,而“冷战”越来越明显有变成大规模世界性冲突的危险。

## 对胜利者的恐惧

在战争的头一年,斯大林感到恐惧和失望,对俄罗斯人民的忍耐精神感到惊讶。俄罗斯人民虽然受到世界大战的可怕折磨,但并没有同犯下如此之多错误的自己的政府离心离德。斯大林的这种感情在他1945年5月24日破例宴请红军各军兵种司令员致祝酒词时有所流露。斯大林说:“我国政府犯下了不少错误,我们在1941—1942年有过绝望的时刻……别的国家的人民可能会对政府说:你们辜负了我们的期望,请你们滚开,我们需要的是同德国媾和并能保证我们安宁的政府。但是,俄罗斯人民没有这样做……俄罗斯人民对苏联政府的这种信赖是确保对人类的敌人——法西斯主义取得历史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谢谢他们,谢谢俄罗斯人民的这种信赖!”<sup>70</sup>但是,斯大林在对俄罗斯人民的信赖感到惊讶的同时意识到,这种信赖绝对不会是无止境的。这种意识进而转变为对往昔的胜利者、首先是对那些在红军部队中作战的元帅和将军们的不信任。

国家政权机关对军队将领们的态度——迄今为止仍然是个被很少研究的问题。

战争不可能不使军队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在苏联的政治现实中,这意味着党的领导的影响受到削弱。1944年8月,国防人民委员部在向政府汇报国家军官队伍状况时自豪地写道:“我们现在拥有过去任何时候都没有过的最可宝贵的军事干部,他们同样是最优秀的——比世界上任何军队的干部都优秀。”<sup>71</sup>

当时的军官和将军们都很年轻,具有前线作战经验,学会了打防御战和进攻战。38.7%的团长不超过35岁,45岁以下的师长、军长和集团军司令员所占比例分别为73.2%、60.5%和44.8%。战争年代,在红军中(不含海军、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红军政治部和其他一些部门)有1753人扛上了将军肩章<sup>72</sup>(1944年8月在职的将军共计2952名)。



另一方面,战争使大量无党派人士成为苏联社会的上层人物(成为军官和将军)。到1944年5月,还有286名红军将军不是联共(布)党员,此外,238名将军只是在战争年代才成为党员。<sup>73</sup>

33 军官们值得引以为豪,他们继承了俄罗斯军队的老传统。此外,在战争年代,曾经有意识地仿效革命前军队的一些做法——恢复军衔,佩戴肩章;按照旧俄培养军官子弟的士官武备学校的样式建立苏沃洛夫陆军学校和纳希莫夫海军学校;红军总干部部长Ф.И.戈利科夫提出对军事学校系统进行改组,明确指示要把“旧军队军事学校”作为样本。<sup>74</sup>

军队干部眼看着就要变成特权阶层——规定对服满一定年限者必须授予勋章和奖章。勋章获得者有附加津贴,校官和将军得到了去议价商店购物的权利。

其他一些部和部门开始有意识地推行军队的做法——满一定服务年限者授予专门称号,发给制服和奖金。

设立“荣誉法庭”这一形式显然也是取自革命前的经验。1947年3月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在苏联各个部和中央部门设立荣誉法庭》的决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约·维·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书记安·亚·日丹诺夫签发了这一决定。

这是为另一部分上层人物——在苏联各个部和中央部门工作的官员设立的公务法庭。

脱胎于十月革命前俄国的“荣誉法庭”首先应该起到党组织在苏联所起的那种作用。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这一反自然的杂交品种所应起到的作用是,培养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爱国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忠于苏维埃国家利益,认清自己在同损害苏维埃工作人员荣誉和尊严作斗争中的国家和社会义务。

上层人物开始受到威吓,扬言有回到1937—1938年恐怖时期的可能,提醒他们说,“斯大林同志说过,资产阶级国家……不断相互密派间谍,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派到我们这里的间谍很少。恰恰相反,资产阶级国家派到我们这里的间谍要比派到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间谍多

一两倍。”

斯大林从来不信任军人，甚至不信任那些似乎很卖力气的执政者。内务人民委员会和它的继承者——国家全部和内务部几乎对每一个军队大头头都进行监视。例如，1925年开始对谢·米·布琼尼进行监视，在他的住宅安装窃听装置；对克·叶·伏罗希洛夫元帅、他周围最亲密的人和亲属进行观察，并把观察结果随时向斯大林报告；对炮兵主帅尼·尼·沃罗诺夫的监视从1938年开始后一直没有中断过；对谢·康·铁木辛哥元帅的监视——从1942年开始。对伟大卫国战争英雄格·康·朱可夫元帅特别留意，国家全部早在1939年就开始监视朱可夫，这项行动被称为“‘枢纽部’间谍案”。朱可夫元帅的住所和别墅都被安上了窃听装置，国家全部到处收集诋毁朱可夫和成百上千在某种程度上同他有工作联系的人的材料。<sup>75</sup>

朱可夫在军队和居民中的巨大声望引起了斯大林的嫉妒。斯大林以及党机关（其中包括军队的党机关）对这位卫国战争时期红军最著名的军事长官的独立性和荣光不能原谅。朱可夫元帅在柏林主持过接受德国投降，在莫斯科主持过胜利大阅兵，斯大林不饶恕他的胜利，他的荣誉。 34

还有一件事也使斯大林不能宽恕他。在克里姆林宫为庆祝战胜德国举行招待会的第二天，朱可夫邀请了一些军队司令员到莫斯科附近索斯诺夫卡的他的别墅，应邀的司令员有：A. B. 戈尔巴托夫上将、И. И. 费久宁斯基上将、瓦·伊·崔可夫上将、B. И. 库兹涅佐夫上将、装甲兵元帅 С. И. 波格丹诺夫、瓦·丹·索科洛夫斯基元帅、К. Ф. 捷列金中将、B. B. 克留科夫中将，以及克留科夫中将的妻子、最受欢迎的女歌唱家 Л. А. 鲁斯兰诺娃。他们自己一帮人在一起庆祝胜利，并把朱可夫当做战胜德国的主要胜利者谈论。<sup>76</sup>

在朱可夫别墅里的所有谈话记录第二天就摆到了斯大林的办公桌上。

朱可夫被任命为苏联驻德国军事当局总指挥后受到了监视。朱可夫的特点是肯于独立思考，不依赖别人，他的同事和部下都支持他，朱

可夫同他的副职——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副部长职位调任这一职务的伊·亚·谢罗夫建立了十分亲密甚至是好朋友的关系。<sup>77</sup> 根据某些资料,朱可夫希望谢罗夫担任国家安全部长,朱可夫自己则指望担任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sup>78</sup>

但是,形势的发展并不像苏维埃国家的将军们所希望的那样。在胜利的1945年下半年,维·谢·阿巴库莫夫中将领导的军事反间谍机构——除奸部被用于收集对高级指挥人员的诋毁材料。但是,不能利用“1937年方案”、至少不能用30年代末使用的那些方式来迫害朱可夫,需要进行更充分的准备工作,以便系统地损害这位元帅的声誉。

除奸部的调查人员确定了三条主要方针:第一,收集对格·康·朱可夫元帅的诋毁材料;第二,揭发军用航空和军事工业部门中的“危害分子”;第三,揭露军事活动家和政治活动家之间的联系。斯大林本人和前任武装力量部部长尼·亚·布尔加宁是侦查工作的直接“导演”。负责这一案件组织工作的有:前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在1946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全体会议上被任命为组织部成员和中央书记的阿·亚·库兹涅佐夫;1946年5月被任命为国家全部部长的原中央干部部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阿巴库莫夫以前领导的除奸部不再归属苏联武装力量部,归入国家全部的编制);联共(布)中央下属党的监督委员会副主席 M. Ф. 什基里亚托夫。

## “飞行员案”

首先遭到沉重打击的是空军的一些领导人。空军总司令、空军主帅 A. A. 诺维科夫和第12空军集团军司令员、空军元帅 C. A. 胡佳科夫被逮捕,他们受到了严厉的全面审问。“飞行员案”为侦查人员及其背后的人收集诋毁朱可夫和其他斯大林觉得有危险的人的材料提供了广泛可能性。1946年初被逮捕的空军元帅 C. A. 胡佳科夫的供词成了侦查的关键。他在1946年2月说的话证明,他隐瞒了自己的出生地,把自己的名和姓改为俄罗斯人的名和姓(他的真正的名、父称和姓是

阿尔梅纳克·阿尔捷莫维奇·汉费良茨)。后来,他被迫“承认”和英国人有间谍联系,承认替亚美尼亚达什纳克党干过事,因此差点儿同巴库的26名政治委员一道被执行枪决。1946年4月初,他供认自己反对过许多空军将领和航空工业部门的领导人。在审问中他也没有忘记提到朱可夫元帅。

在侦查人员的酷刑迫供下,胡佳科夫开始指控空军总司令 A. A. 诺维科夫、空军总工程师 A. K. 列平和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以及他们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说什么“他们在空军推行一条罪大恶极的路线,从航空工业部门接收了一些明知有重大缺陷的飞机和发动机,导致空军大量人员伤亡……”还说什么“沙胡林(前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作者)最了解空军内部的事情,想方设法掩盖一些问题。诺维科夫明知航空器材有各种故障,但是他既不采取措施也不向最高统帅报告。”<sup>79</sup>胡佳科夫在供述时继续说道:“至于说诺维科夫、我、列平和希曼诺夫(上将,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兼联共(布)中央军事航空部部长——作者)有哪些具体的犯罪事实,我认为主要的错误是从航空工业部门接收了好几种有严重缺陷的飞机,用这些飞机装备空军。”<sup>80</sup>

按照胡佳科夫的说法,前线航空兵装备的主要飞机,如著名的飞机设计师雅科夫列夫设计的“雅克”系列飞机,以及伊尔-2、拉-7、佩-2、图-2等飞机,无论在设计或生产上,都存在严重的问题。胡佳科夫这么一招供,就把著名的飞机设计师亚·谢·雅科夫列夫、谢·弗·伊柳申、谢·亚·拉沃奇金,以及一些飞机制造厂和飞机发动机制造厂的厂长推到了被告席上。

斯大林看了审问记录后,决定让莫洛托夫、贝利亚、马林科夫、日丹诺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传阅<sup>81</sup>,随后就发动了新一轮的逮捕行动,审讯更加具有政治色彩。4月11日,斯大林专门就这件事写了一封信,收到这封信的有:政治局的所有委员和候补委员,联共(布)中央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和Г. М. 波波夫,内卫部队、武装力量部和工业部的几个领导人——K. A. 韦尔希宁(新任武装力量总司令),M. B. 赫鲁尼切夫(新任航空工业人民委员),亚·谢·雅科夫列夫(飞机设计师

和航空工业副人民委员), П. В. 杰缅季耶夫(航空工业副人民委员)和亚·米·华西列夫斯基(总参谋长)。斯大林在信中写道:“最近我们对空军的工作进行了检查,收到了一些飞行员发自前线的有关国产飞机质量不过关的投诉信,从中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负责为前线提供飞机的前航空工业人民委员沙胡林和负责接收飞机的前武装力量总工程师列平及其下属谢列兹尼奥夫三个人串通一气,把质量不过关的飞机当做好飞机提供和接收,以此来蒙骗政府,然后以‘完成计划’和‘超额完成计划’为名邀功请赏。上述几个人的这种犯罪活动持续了将近两年时间,导致前线大量飞行员伤亡。前武装力量总司令诺维科夫在明知上述几个人有犯罪行为的情况下,非但自己不向政府报告,还禁止他的部下向上级报告,因为他担心,一旦上述犯罪行为被揭发,首先要由诺维科夫他承担责任。这种犯罪行为持续时间很长,前线不断收到质量不合格的飞机,事故一起接着一起发生,我们的飞行员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

前线的飞行员帮助我们揭发了这一案件,因此我们不得不逮捕上述直接责任人,他们是沙胡林,列平,谢列兹尼奥夫,以及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希曼诺夫……”<sup>82</sup>

斯大林的这封信下发的时候附有上述被捕者审问结果通报。为了公正起见,应该立刻指出,当时并没有附上关于“来自前线飞行员”投诉的通报,所有指控均来自被捕者的口供。

斯大林责令政治局和秘书处把定期向最高政治领导人报告审查进展情况列入工作日程。1946年4月和5月,一份份“犯罪活动”审查报告陆续被送到政治领导人的办公桌上,被审查者不仅包括被逮捕的那些人,还包括一些在职的政界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他们随时可能被换上囚服,投入列弗尔托沃监狱的牢房。再说,那些阅读过由维·谢·阿巴库莫夫拟写和签字、但是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特别处处长 A. H. 波斯克列贝舍夫下发的《审讯结果通报》的人,也可能被卷入这一案件,《通报》上随时可能出现他们的名字。

1946年5月10日到11日,苏联最高法院审理了对“飞行员案”被



告提出的指控,并在判决书中写道:“被告把大批明知有毛病的飞机和发动机列入武装力量装备,并且互相串通一气,导致武装力量一些作战部队的事故和灾难频发,飞行员伤亡惨重。”沙胡林、列平、诺维科夫、希曼诺夫、布德尼科夫和格里戈良被判处不同刑期的监禁。

### 猎捕格·康·朱可夫

所有参加审讯的工作人员都想方设法找到有助于指控朱可夫的供词,为此必须绞尽脑汁,从被投入“侦查磨盘”的所有人嘴里敲出有用的招供。前空军司令 A. A. 诺维科夫的供词成为迫害朱可夫的主要根据,他供述说,朱可夫企图拉拢一些高级军事将领,其中包括诺维科夫本人和伊·亚·谢罗夫。说什么朱可夫“十分狡猾和谨慎小心……试图贬低最高统帅部在战争中的领导作用,恬不知耻地把自己说成是统帅,吹嘘他自己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甚至声称……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附近粉碎德国人的战役是根据朱可夫他一个人的思路制定、准备和实施的。关于莫斯科保卫战,朱可夫也讲过类似的话。”<sup>83</sup>

审讯人员把一些最能说明朱可夫对斯大林态度的话写进了审问记录,如“举止傲慢”,“斯大林的决断不正确”,“朱可夫对最高统帅(指斯大林——作者)和苏联政府采取的某些措施提出批评”等。<sup>84</sup>

诺维科夫在审讯中供述说,他被解除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后,有一次在朱可夫的办公室里诉说自己的委屈,说斯大林把他撤职和逮捕一些军队领导人的做法是不正确的。“朱可夫对我的说法表示支持,他说:‘应该把过失推在别的什么人身上’。此外,朱可夫还对我说:‘你瞧,谁也不替你说话了,哪怕是在斯大林作出这种决定时说一句话也好。’尽管朱可夫没有明说,但是我从他的谈话中能听得出来,他并不同意政府作出的关于解除我武装力量总司令职务的决定。”

诺维科夫说,他向朱可夫说起他最后一次见到斯大林是在后者宣布解除他总司令职务的那一天,当时斯大林找他谈话时马林科夫也在场。“马林科夫对空军是否从航空工业部门接收有缺陷的航空器材十

分了解。当我这样说的时候朱可夫插话说：‘现在谁也不愿意帮你的忙了，所有的人都保持沉默。’”<sup>85</sup>

斯大林同他的两名助手——布尔加宁元帅和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根据诺维科夫和其他受“飞行员案”牵连被捕的将领的供词，以及根据除奸部及其继承者国家安全部的“肃反措施”，于1946年6月9日起草了一份准备用来侮辱和贬低格·康·朱可夫的“苏联武装力量部部长命令”，上面标有“绝密”字样。<sup>86</sup>

38 这份命令中说：“朱可夫元帅已不再谦虚，完全沉迷于自负感，总是认为自己的功劳没有被充分评价。他在同下属交谈中，把伟大卫国战争的所有主要战役，其中包括那些和他没有任何关系的战役的顺利制定和实施归功于自己。”命令中还说，朱可夫“同制定和实施歼灭斯大林格勒附近敌军集群的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后来还查明，朱可夫元帅同制定和实施歼灭克里木德军集群计划也没有关系。后来又查明，歼灭科尔孙—舍甫琴科夫斯基德军集群计划并不是像朱可夫元帅所说的那样（黑体字系约·维·斯大林所加），是由他制定的，而是科涅夫元帅制定的……最后还查明，在承认朱可夫元帅在攻打柏林中的功绩的同时，不能不提到和（黑体字系被约·维·斯大林勾掉的部分）像朱可夫元帅那样否定（黑体字系约·维·斯大林所加）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的功劳，如果没有科涅夫元帅从敌军南部和罗科索夫斯基从敌军北部发起突击，柏林就不可能被朱可夫元帅如期包围和攻克。”此外，命令中还指控说，朱可夫的周围聚集了一些“不合格和被免除工作的军事长官”，指控他与政府和最高统帅部对着干。

1946年6月1日，军事委员会建议解除朱可夫元帅的陆军总司令、苏联驻德国最高军事行政当局总指挥和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职务。1946年6月3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这一决议，朱可夫被任命为敖德萨军区司令。当时美国总统杜鲁门邀请朱可夫访问美国，被苏联政府以“他刚到任，公务繁忙”为由谢绝。<sup>87</sup>

一些和朱可夫有过工作联系或者受过他保护的将军被陆续逮捕。1947年1月初，苏联英雄、前伏尔加河沿岸军区司令员瓦·尼·戈尔

多夫和他的副职、1942年因弃守刻赤被降为少将的格·伊·库利克，以及该军区参谋长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被逮捕。国家全部在戈尔多夫和库利克住宅安装的窃听设备记录下来的谈话成为逮捕他们的主要依据。

格·伊·库利克和瓦·尼·戈尔多夫成为主要的被告，他们俩历史上各有一些纠缠不清的事情。库利克之所以受到特别注意不仅因为他的军衔高（当然是说他过去的军衔高），而且因为他本人和他领导的讨伐队不幸在伟大卫国战争之前就受到了斯大林的怀疑。斯大林曾经下令秘密绑架库利克元帅的妻子，因为斯大林怀疑她搞间谍活动。据贝利亚的副职B. H. 梅尔库洛夫说，库利克元帅的妻子（库利克—西莫尼奇）于1940年5月在大街上被捕，后被关进苏哈诺沃监狱，审讯了一个半月时间，“但是，库利克—西莫尼奇说什么也不承认自己从事间谍活动……过一段时间后贝利亚说……应该把库利克—西莫尼奇枪毙，让她消失得无影无踪，然后向外界宣布我们正在寻找她。据贝利亚说，这是斯大林的指示。对库利克—西莫尼奇一案，法庭没有作出过任何判决。”<sup>88</sup>库利克元帅很快就得悉自己的妻子失踪，他本人被告知说，已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这种寻找从1940年5月8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52年1月，甚至在格·伊·库利克本人被枪决一年半后还在继续寻找。 39

战争爆发后的头几个月，致命的威胁再次降落到当时担任军械部部长的库利克元帅头上，这种威胁不是来自敌人，而是来自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战争初期被捕的军械部第一副部长M. M. 卡尤科夫，在酷刑迫供之下，开始胡乱诬告自己的首长，说什么库利克元帅发展他加入了反苏组织。不过，他很快就翻供说：“我从来没有搞过阴谋活动，谁也没有让我参加什么反苏组织。”<sup>89</sup>卡尤科夫被执行枪决，库利克这一回被留下命一条。库利克元帅曾经因为1942年前线失利被严厉处分过，军衔被降为少将，并被收回以前对他的所有奖赏。朱可夫元帅曾在1944年为失宠的前元帅库利克说情。朱可夫对他周围的人说，1944年秋天，他在斯大林面前替库利克辩护，请求斯大林授予库利克苏沃罗夫

勋章。被斯大林拒绝后,朱可夫又请求斯大林给库利克解决归还降职时被没收的勋章和奖章问题,也被斯大林拒绝了。“朱可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向我诉说他心中的委屈的。朱可夫说,他得不到支持,斯大林不同意他的意见,斯大林这样做是不对的。”(前武装力量总司令 A. A. 诺维科夫的供词——作者)。<sup>90</sup>

## 将军们的私下交谈

这些将军的案卷实属世所罕见,因为案卷中不仅有他们的“供词”,而且有他们在家中和同他们信任者交谈的谈话录音。所谓的“供词”是严刑迫供出来的,这些“供词”先由“布罗维尔曼的厨房”进行精心加工,再由阿巴库莫夫领导的秘书处使用肃反工作人员惯用的语言进行改头换面,最后形成审讯记录,上报上级机关。而谈话录音本身就是使部分高级将领丧失政治觉悟、使人们改变对苏联将军看法的“杀手锏”。请看案卷中是怎么说的:

1946年12月,瓦·尼·戈尔多夫的住所。同妻子和自己的副职菲·特·雷巴利琴科少将交谈。戈尔多夫上将说,使他改变对生活看法的原因是:“自从我被选为代表后就断送了自己,我的不幸就在这里。当上代表后我走了不少地方,见到了许多骇人听闻的事情——我完全变了一个人,我不能目睹这一切……我敢说,我相信,如果今天取消集体农庄,明天就会秩序井然,就会出现市场,就会什么都有。应该让人们活下去,他们有权活下去。生活是他们用生命换来的,用生命保卫的!”两个将军谈到了农村形势,谈到了饥荒。说人们饥饿难忍,不得不把猫、狗、老鼠杀了吃。雷巴利琴科对自己的交谈者说:“集体农庄的粮食被搞走了,什么也不剩,连种子也吃光了……应该直截了当地说,集体农庄庄员痛恨斯大林,都等待他完蛋……人们期待斯大林完蛋,集体农庄完蛋。”<sup>91</sup>

40 两个将军抱怨说,贪污受贿盛行,阿谀奉承随处可见。在他们的交谈中,最重要的话题是对斯大林的态度。戈尔多夫的妻子建议说,他应

该去向斯大林当面提出请求,戈尔多夫听后暴跳如雷反驳说:“找他干什么?去跟他说,我想效忠他?想让我去说这话,我说不出口。我不能这样做,我要自己结束我的政治生命,我不想当面一套背后一套。你是不是想让我去说假话,为自己打掩护,好让你有块面包吃呢?这我绝对做不到,我的血液里就没有这种东西。瞧这个人都干了些什么事——使俄罗斯沦为赤贫,要知道长此以往俄罗斯将不复存在!我从来不干偷偷摸摸的事,不想当个不诚实的人。你总是说——去找斯大林,让我到他面前说:‘我有罪,我错了,今后我一定为您诚实效劳,忠实于您。’为卑鄙下流的人诚实效劳?荒唐!给如此残酷无情的人效忠,只有死路一条!”<sup>92</sup>

他们在交谈中不时提起朱可夫元帅……

“——这下子朱可夫屈服了,又干起工作来了,——雷巴利琴科说。

——表面上看他在干工作,其实他心里头老大不高兴,——戈尔多夫纠正说。

——像朱可夫这样的人精神也被摧垮了,——戈尔多夫的妻子对丈夫说。

——可不,没有情绪了。

——他说:‘请原谅,我不会再那样了。’就去上班了。如果他像你所说的那样,抱定一种信念,那他可能提出辞职,远离这一切。

——他不可能这样做,从政治上讲,不可能。反正没有把他免职,现在只好把朱可夫比较信赖的人一个个清洗掉,收拾掉。朱可夫在一两年还受宠,后来说他搞小圈子,完蛋了!我有许多事情想不到,我干嘛要绞尽脑汁?像乌博列维奇、图哈切夫斯基、沙波什尼科夫他们这样的人都完蛋了,我考虑再多又有有什么用。”

令人震惊的是,两个将军企图建立与政府对抗的政权。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互相打气说:

“——我们需要有一个真正民主的政权(戈尔多夫)。

——是的,要有完全真正民主的政权(雷巴利琴科)”<sup>93</sup>



国家全部提出了如下指控。

指控瓦西里·尼古拉耶维奇·戈尔多夫：“背叛祖国，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企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1946年，他与同谋者……雷巴利琴科……库利克一道，向联共（布）和苏维埃国家领导人发出威胁，扬言必须推翻苏联政府。多年来，他时常纠集一些敌对分子，在交谈中对联共（布）和苏联政府进行肆无忌惮的无耻诽谤，恶毒攻击苏维埃国家领导人……”

指控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库利克：“背叛祖国，积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纠集敌对分子，试图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与自己的同谋者戈尔多夫和雷巴利琴科一道，向联共（布）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人发出威胁……被告的供词证明，他是反苏军事阴谋的参加者。”

41 指控菲利普·特罗菲莫维奇·雷巴利琴科：“背叛祖国，同自己的同谋者……戈尔多夫……库利克一道，无耻诽谤联共（布）和政府领导人。拥护在苏联复辟资本主义，扬言必须推翻苏维埃政权。他与一些臭气相投者一道，心怀敌意，极力鼓吹取消苏军中的政治机关……”<sup>94</sup>

根据阿巴库莫夫的提议，经斯大林亲自批准，这几名将军被判处死刑。<sup>95</sup>

对军事将领的迫害后来仍在继续。1951年12月31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C-60型57毫米自动高射炮的缺陷》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尼·雅科夫列夫、总军械部部长И.沃尔科特鲁边科、装备部副部长И.米尔扎哈诺夫被撤职和送交法庭。1952年2月，他们被指控从事破坏活动正式逮捕。

## 格·康·朱可夫元帅案

在1947年2月举行的联共（布）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元帅被撤销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在中央委员会派人对这位被贬黜的元帅曾经指挥过的敖德萨军区进行又一次检查以后，联共（布）中央于1948年1月20日通过了一项决定，决定中说：“对朱可夫同志提出最后一次

警告,最后一次给他提供改正错误和做一名不愧于指挥员称号的诚实党员的机会。同时,联共(布)中央解除朱可夫同志的敖德萨军区司令员职务,准备任命他指挥一个小军区。”<sup>96</sup>

通常在作出这种决定后马上就会抓人,由于朱可夫患心肌梗塞<sup>97</sup>,所以他没有被马上逮捕,但是继续逮捕一些亲近他的人。最为令人惊讶的是,在这种情况下竟然还有一些将军试图保护朱可夫,其中一个是在1945年到1946年初担任苏联驻德国占领区军事委员会委员的K. Ф. 捷列金<sup>98</sup>,结果捷列金被从联共(布)中央委员降为候补委员,后来连他自己也被逮捕。

刑侦人员的策略开始发生变化。国家安全部将军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在审查大部分将军中惯用的“拿手好戏”是,挖空心思证明受侦讯者“恶毒攻击苏维埃国家领导人”。但是,他们在审查朱可夫时看来不怎么使用这种手法,哪怕朱可夫也可能对党和国家领导人构成威胁,再说还必须找出朱可夫反对斯大林的证据。所以他们另辟蹊径,采用了一种无比下流和恬不知耻的做法,试图证明朱可夫只不过是一名刑事犯,试图指控朱可夫在德国境内敲诈勒索、趁火打劫。为了获取这方面的证据,1948年初,逮捕了内务部驻柏林作战处处长A. M. 西德涅夫和内务部机关派驻德国的一些军官。

1945年到1946年初和朱可夫共过事并且和朱可夫关系比较好的内务部副部长伊·亚·谢罗夫也面临被逮捕的危险,对他的审查被限制在很少几个人范围内——斯大林本人,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联共(布)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sup>99</sup>。在朱可夫家中进行过几次秘密搜查,逮捕了朱可夫的两名亲信——B. B. 克留科夫中将和B. K. 捷列金中将,并对他们进行刑讯。 42

在办案人员看来,要想查出朱可夫的问题,B. B. 克留科夫是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他和朱可夫一样,骑兵出身,战争期间一直担任近卫骑兵军军长。他和朱可夫私交很深,有一段时间担任朱可夫身边的办事人员。克留科夫的妻子Л. 鲁斯兰诺娃和朱可夫夫妇过往甚密,她荣获卫国战争一级勋章是苏军驻德军队集群军事委员会提名的,这件事

本身无可厚非——战争年代,鲁斯兰诺娃是最著名和受爱戴的一位女歌唱家,多次赴前线演出。尽管如此,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在1947年6月举行的一次特别会议上还是作出了没收鲁斯兰诺娃这枚勋章的决定。不久,她被逮捕,她收藏的绘画作品、瓷器及一些私人物品被没收,她的丈夫被指控在德国工作期间利用职务大肆搜刮艺术珍品。

和其他被捕的将军一样,克留科夫也被关押在列弗尔托沃监狱,受到过连续许多小时的日夜审讯,但他拒绝供认存在着以朱可夫为首的阴谋集团。不许他前往监狱的售货亭购物,先以酷刑相威胁,然后经常毒打他。负责审讯的利哈乔夫上校和萨马林大尉以及他们手下的工作人员轮番用橡皮棍抽打,连续四天四夜折磨他,说:“为什么你害怕招供?大家都知道朱可夫是个叛徒,你只有招供才有出路,因为你只不过是名小卒。”<sup>100</sup>

上面提到的捷列金中将也被逮捕。到1948年9月,他向刑侦人员提供了重要书面供词,内容包括朱可夫如何批评斯大林,如何高度评价美国军队的装备和给养,以及有关朱可夫在军内受到广泛支持的情况。<sup>101</sup>

下面该轮到朱可夫本人作出解释了。他于1948年1月给安·亚·日丹诺夫写的一份解释报告仍保留至今。

这份文献资料的重要之处在于,元帅本人并没有私有财产,因为他的别墅和住宅都是国家安全部的财产,别墅和住宅内的所有物品都处在国家安全部的管理之下。<sup>102</sup>所以,所有关于朱可夫侵吞财产的指控不攻自破。

43 当时担任苏联内务部副部长的伊·亚·谢罗夫也给斯大林写了两封信,第一封信写于1948年1月31日<sup>103</sup>,第二封信写于当年2月8日<sup>104</sup>。两封信在时间上相隔一个星期,在内容上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相似之处是,都对阿巴库莫夫提出了尖锐批评。谢罗夫在第一封信中指出,阿巴库莫夫由于担心谢罗夫他可能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部长,出于个人仇恨命令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收集他的材料,以败坏竞争对手的名声。他不承认自己同朱可夫在德国一起工作期间有什么

滥用职权的行为。第二封信中对阿巴库莫夫的批评具有指控和告密的性质。谢罗夫在信中回忆说,部队刚刚解放克里木,阿巴库莫夫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出现在那里,准备用作战飞机运走大量战利品。谢罗夫也没有忘记,1941年秋天,阿巴库莫夫给自己订购了过沼泽地用的皮靴,准备“从莫斯科溜出去”,指责阿巴库莫夫没有组织好国家全部的工作,说阿巴库莫夫自己在战争期间也曾经过分吹捧朱可夫元帅。

1948年底,对朱可夫案的兴趣突然减弱。这并不意味着给一些将军捏造罪名的活动已经停止,也并不意味着高级将领中已经没有表示不满的人——军队中还有不满的人,也有过对苏联当局的批评。不过,那种把军队中出现的任何不满情绪都同朱可夫元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做法已经不见了。

应该分析一下其中的原因。当然,可以认为,把朱可夫打发到乌拉尔军区任司令员,把他身边的大部分军官调走和撵走,这些措施多少动摇了朱可夫在军队中的地位。但是,朱可夫作为苏联最高军事长官的威望毕竟“成就”了最高总司令——约·维·斯大林的威望。

是否可以推测,到1948年(苏美关系开始恶化,“冷战”开始加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再次认识到,具有无可置疑军事天才的朱可夫是个用得着的人。

但是,作者认为,必须看到“飞行员案”超出了军队和军工部门范围的一面,“飞行员案”直接涉及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的力量对比,也就是说,部分军队高级将领同苏联某些政治领导人之间存在着联系。

## 格·马·马林科夫失宠

在战争年代,国家政权属于国家国防委员会。战争爆发前夕,斯大林把人民委员会主席(政府首脑)和联共(布)中央书记的职位合二为一,几乎忽略了党的最高机关的活动。许多年中停止召开党的代表大会(1939年召开了十八大,十九大到1952年才召开);战争期间只召开了一次联共(布)中央全体会议(1944年),政治局会议偶尔才召开一

次。后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决议被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取而代之。

后来,苏联人民委员会改为苏联部长会议,各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人民委员会改为这些共和国的部长会议。从此,国家机关在苏联政权中的作用才有所提高。<sup>105</sup>

44 斯大林老了,年岁不饶人。克里姆林宫的那本会客登记本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在办公室接见客人的数量开始减少。1940年他会见了2000名来宾,1950年减少为700人,在1951年和1952年则减少到每年不到500人。他经常几个月不在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露面。1950年他有将近五个月(从8月2日到12月22日)没有会客,然后,从1951年8月9日到1952年2月12日没有会客。<sup>106</sup>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争夺权力和苏联政权应该由谁继承的斗争势必悄然展开。

战争结束后不久,苏联政权的最高层就开始重新配备干部。在局外人看来,干部的调动和安排并非都合情合理。党的领导人早在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谴责过派别活动,宣布派别活动和搞小集团是对党的最严重犯罪,尽管如此,党内有派的现象依然存在,在由上级任命的干部中间存在着形形色色的小集团,而使人们拉帮结派的原因并非显而易见,如果不研究党和国家高层官员中存在的小团体利益,不对他们之间名副其实的血腥斗争和有时令人感到不合乎情理的结盟进行分析,就不可能搞清楚战后苏联的政权史。

在分析这些复杂进程时不能不提到一个关键人物——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他早先是党机关的一名普通工作人员,当过办公室文书,后来在H. И. 叶若夫领导的联共(布)中央组织调配处工作。1937年,这个原先不爱吭气、默默无闻的人突然名声大噪,给人以一种不祥的感觉。那一年马林科夫去过苏联的许多州和共和国(罗斯托夫,萨拉托夫,图拉,坦波夫,埃里温,喀山),在这些地方主持召开揭露“人民的敌人”的全体会议。他领导的检查机构总共逮捕了15万多人,其中大多是各地的党和经济领域的积极分子<sup>107</sup>,这些人大部分被执行枪决。在埃里温,马林科夫开始同贝利亚打得火热。<sup>108</sup>



尼·谢·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938年,斯大林曾经建议设立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主席的职务,以加强 Н. И. 叶若夫领导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叶若夫亲自提议让马林科夫担任这一角色。叶若夫在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主席之前在中央负责干部调配问题,他提议让本单位的马林科夫担任他的副手也是合情合理的。据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不同意,对叶若夫说:“不,你用不着带走马林科夫,因为他现在主管中央干部工作,那里更需要他。”<sup>109</sup>后来拉·帕·贝利亚于1938年8月22日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主席,成了叶若夫的副手,而马林科夫则当上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部部长(1938年到1946年)。

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毫无疑问与马林科夫有关系。他企图使整个镇压行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仅想方设法扩大镇压的规模,而且在他认为政治上必要的时候指控镇压的直接执行者,批判镇压行动的真正组织者。正是他,在1938年联共(布)中央一月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党组织在清党中的错误、关于联共(布)存在的对待上诉书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态度和关于纠正这些缺点的措施》的报告。

马林科夫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对镇压共产党人的行动表示谴责,批评执法机关无视党的监督,恣意妄为。此后,便出现了所谓的“叶若夫之流”的说法,这只不过是马林科夫捏造的彻头彻尾的谎言。任何执法机关从来都是处在党的监督之下,也就是说,处在联共(布)中央机关的监督之下,Н. И. 叶若夫绝对与对抗党领导的政治活动家的角色不相匹配。马林科夫的真正用意是,把人们对镇压的不满情绪“分流”,在镇压行动的模范执行者中寻找“替罪羊”。45

1946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会上决定,大量增加组织局的成员人数——从9名增至15名。三个人获得了党内的特殊地位,与此同时,这三个人——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都成为政治局、组织局和秘书处的成员。从那个时候起,以日丹诺夫为首的一派和以马林科夫为首的另一派开始了争夺党内第二号人物地

位的斗争,他们两人都具有党机关工作的丰富经验。

马林科夫同叶若夫的继承人贝利亚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sup>110</sup>在1946年3月18日联共(布)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成为政治局、组织局和秘书处的成员,也就是说,他同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一道成为联共(布)中央所有最高机关的成员。但是,在当年4月,亦即在中央全会结束后没过几天,就停止给他送苏联部长会议开会的材料了。1946年5月4日,根据斯大林的报告,他被指责在战争年代(当时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负责航空工业工作)对接收航空技术装备监管不力,因此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宝座。5月6日,他被撤掉中央书记职务,选举H. C. 帕托利切夫取代他的职位。5月13日,根据苏联部长会议决定,马林科夫被任命为火箭技术装备专门委员会主席。<sup>111</sup>7月10日,被任命为雷达装备委员会主席。8月2日,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部长会议作战部副部长(部长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拉·帕·贝利亚兼任)。<sup>112</sup>

之所以要如此详尽列举马林科夫担任的职务是因为,马林科夫当时的影响力一时受到削弱的原因至今尚不得而知。有一种意见认为,这是因为马林科夫在1947年被调到乌兹别克斯坦工作的缘故。<sup>113</sup>根据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这种说法没有得到证实。中央秘书处和政治局档案中有关格·马·马林科夫的材料都没有提到过他曾经到乌兹别克斯坦出差的事。当然,马林科夫那个时候究竟都去过哪些地方,这个问题尚难以搞清楚,不过,这不是指1947年,而是指1946年。一些间接的证据(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文件发送对象)可以证明,在1946年5月到10月初这段时间中,马林科夫不在莫斯科。1946年10月初,马林科夫回到莫斯科,部长会议内他的秘书处就是在那个时候(从10月5日起)开始工作的。因此可以断言,马林科夫在1947年并没有在塔什干工作过。

马林科夫在中央委员会的地位一度摇摇欲坠,而更重要的是,他不再是原先斯大林眼中的那个马林科夫了,关于这一切,最清楚不过的是国家安全部。负责此案两个人(利哈乔夫和格拉西莫夫)终于取得

了败坏马林科夫名声的供词,他们说:“案件有进展,格·马·马林科夫完蛋了”。<sup>114</sup>在1953年7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审理贝利亚一案时,安·安·安德烈耶夫回忆说:“贝利亚知道,斯大林完全和充分信任马林科夫同志,把马林科夫视为自己的朋友,因此贝利亚必须搞掉马林科夫同志。贝利亚是个地地道道的挑拨离间者,他表面上把自己装扮成马林科夫的朋友,实际上在耍滑头,无中生有,制造沙胡林和诺维科夫一案。此案毫无疑问是贝利亚捏造的。”<sup>115</sup>

对于诸如此类的回忆进行必要的纠正在所难免,不过,作者认为,安·安·安德烈耶夫的这段回忆在当时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几年以后,马林科夫本人在受到党的审判时(1957年6月中央全会)提醒说,他自己受到过贝利亚的多次审讯<sup>116</sup>，“我同他(指诺维科夫元帅——作者)一起被撤掉了中央书记职务”。<sup>117</sup>不过,大案要案审讯者根据空军一些领导人的供词作出的预测看来为时过早,马林科夫在1948年重新确立了他在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地位。从当时的政治逻辑推测,这不可能不对他的竞争者——安·亚·日丹诺夫的地位产生影响。

### 安·亚·日丹诺夫案和他的死亡

马林科夫的地位遭到削弱(后来的情况表明,只遭到了暂时的削弱)以后,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日丹诺夫被推到了首要位置上。谢·米·基洛夫被暗杀身亡以后,安·亚·日丹诺夫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党组织领导人,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4年,同时兼任组织局委员、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1934年起)、政治局候补委员(1934年起)和政治局委员(1935年起)。有的人认为,安·亚·日丹诺夫向来同那些在1946到1949年期间担任国家和党关键性职务的人关系密切,作者认为,这是完全可能的。

这些人中,首先应该提到的是长期(从1939年到1949年)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的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他原先担任人民委员会第一副主席,1946年起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任苏联国家计

划委员会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有别于苏联部长会议内大多数同行之处在于,他是位学者,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sup>118</sup>。作为一名天才的经济学家,他写出了战争年代苏联第一部经济学巨著。<sup>119</sup>1947年,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成为政治局委员。1948年3月2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异乎寻常重要的决定,决定中有一段近乎于政治预测的话是这样说的:“今后,苏联部长会议委员会会议将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同志和沃兹涅先斯基同志轮流主持。”这里必须指出的是,部长会议主席是约·维·斯大林,因此,在当时的苏联,年迈的领袖斯大林有两个继承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皇太子”。

47 在列宁格勒党组织工作多年的阿·亚·库兹涅佐夫紧随日丹诺夫从列宁格勒调到了莫斯科。他原先担任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二书记(1937年到1945年1月)<sup>120</sup>,1945年1月被任命为列宁格勒市和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不久,在1946年联共(布)中央三月全会上,他被推荐为中央书记和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委员,后在中央机关担任关键性职务——联共(布)中央干部部部长,负责对各行政机关、内务部、国家安全部以及军队实行党的监督。干部部部长无疑是个有权有势的职务,但是对于库兹涅佐夫本人来讲,这又是个十分危险的职务。由维·谢·阿巴库莫夫负责的国家安全部对最高领导人进行系统的监视<sup>121</sup>,定期向斯大林报告观察结果,许多人随时可能成为这些告密材料的牺牲品。然而,对于告密者本人来讲,同样随时存在着致命的危险,这当然完全取决于斯大林的意愿。<sup>122</sup>显而易见,自从库兹涅佐夫出现在中央机关并行使对镇压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监督职能以后,斯大林周围的力量配置开始发生变化,库兹涅佐夫成了战后进入中央机关、并且日益壮大的那一派的关键性人物。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库兹涅佐夫“主宰”行政机关时期,苏军的许多高级指挥员遭到了杀害,并且开始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成员进行迫害,发生了苏联人民艺术家、莫斯科国家犹太剧院艺术指导索·米霍埃尔斯被暗杀的事件。库兹涅佐夫个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了这些迫害尚需进一步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他所担任的职务预先决定了他必须参加这些案件

的审理。

毋庸置疑,安·亚·日丹诺夫是这一派的中心人物。倘若说党内了解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和阿·亚·库兹涅佐夫所作所为的人为数不多,那么安·亚·日丹诺夫则是一个“公众人物”。他曾经是党的一名主要思想家(当然排名在斯大林之后),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实际上的第二书记”,日丹诺夫“把全部精力倾注在党的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sup>123</sup>,党对科学、文化、知识分子的政策发生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密切相关。

持不同政见的文学活动家中有一些人是属于不同派别的作家——从那些当时被视为对苏维埃制度有抵触情绪的作家,到那些创造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和自命为坚定共产党人的作家,这种情况不可能不引起党的领导人的不安。但是,承认这一事实意味着承认党对知识分子创作阶层的所有政策完全失败。所以,党的思想家、党的“第二书记”安·亚·日丹诺夫认为,必须对某些处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边缘的作家——安·安·阿赫马托娃和 M. M. 左琴科实行镇压。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党领导的传统斗争——与形式主义、阶级异己分子思想影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作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另一方面可以给作家们“定位”,起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于是,出现了日丹诺夫亲自起草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火》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决定中说:“……责成《星火》杂志和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采取措施,务必消除本决定所指出的该杂志存在的错误和缺点,端正该刊物的办刊方向,不让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之流的作品出现在该刊物上,确保刊物具有高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sup>124</sup>日丹诺夫的这一“新发明”为以后几十年党对知识分子创作阶层的政策定下了基调。瞧,他说得多么动听,党并不想为难文化界,绝对不!党只是为了提高文学创作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党并没有追究刊物的编辑人员,它只是希望刊物坚定正确的方向,提高作品的质量,所以要求刊物不要刊载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之流的作品。

应该给予日丹诺夫应有的评价,他“功”不可没——在战后时期和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当局依靠大棒加胡萝卜政策,基本上实现了对文学和艺术的控制。在日丹诺夫亲自起草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星火》和《列宁格勒》杂志”的决定出笼以后,紧接着又出现了中央委员会关于电影、戏剧创作、音乐的类似决定。

日丹诺夫的另一杰作是,试图把爱国主义宣传列入党的政治方针,使“爱国主义”这一概念含有忠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在“冷战”开始的时候,安·亚·日丹诺夫成为意识形态战线的统帅。1947年夏天,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各党组织下发了一份题为《关于克柳耶娃教授和罗斯金教授案》的秘密函件,它也是在日丹诺夫的亲自参与下炮制的。<sup>125</sup>给两个医学教授罗列的罪名是,他们企图在美国发表有关治疗癌症的文章,中央的函件把这种举动定性为“反爱国主义和反国家行为”。<sup>126</sup>这份秘密函件还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新方针——必须坚决反对“在资产阶级西方国家当代反动文化面前卑躬屈节和谄媚逢迎的现象”,函件声称,“崇拜外国是一种危险的疾病,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可能使那些最不坚定的知识分子不可救药”。函件还规定了同这一顽疾进行斗争的措施,首先是确保“工人、农民和士兵”不染上这种疾病,确保他们“善于捍卫苏维埃国家的利益,不做有损于我们祖国荣誉和尊严的事情”。此外,函件还建议仿效各部委和科研机构的做法,建立“荣誉法庭”。<sup>127</sup>

不过,有一点应该予以肯定,日丹诺夫和沃兹涅先斯基一帮人在经济领域还是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取消了凭证配给制度,进行了货币改革,使国家的商品和货币关系得到某些加强。

安·亚·日丹诺夫的突然死亡使权力最高峰(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力量配置开始发生急剧变化。

对于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阿巴库莫夫和贝利亚来讲,要使他们做到不把偶然性当做规律性看待是很难的。安·亚·日丹诺夫确实患有重病,他意外死亡之前,曾经在同苏联科学院院士特·杰·李先科的冲突中遭到了意识形态战线(他自己领导的战线)上的一次最严重失败。

49 科学家们心知肚明,李先科的“种子春化处理”毫无秘密可言,纯粹是

招摇撞骗。早在1948年春天,安·亚·日丹诺夫就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加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的领导问题,并对农科院院长特·杰·李先科的工作提出了批评。安·亚·日丹诺夫的儿子尤里·日丹诺夫当时任联共(布)中央科学部部长,他站在父亲一边反对李先科。

但是斯大林本人支持李先科。当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和苏联部长会议采用先进技术国家委员会主席的B. A. 马雷舍夫,在他日记中记述了斯大林在1948年5月31日—6月1日在政治局开会讨论颁发斯大林奖金问题时的讲话。斯大林在讲话中对尤里·日丹诺夫提出了严厉批评,后者曾经发表过反对李先科的讲演,斯大林不喜欢他这么做。斯大林说:“我们党内没有个人的看法和个人的观点,有的是党的观点。……尤里·日丹诺夫的目的是置李先科于死地,这不对……李先科是农业技术领域的米丘林……李先科是学者,是人,也会有缺点和错误,把李先科这样的一个学者一棍子打死,并且把这当成自己的任务,这无异于落井下石。”<sup>128</sup> 请注意,斯大林是在尤里·日丹诺夫的父亲安·亚·日丹诺夫在场的情况下,当着政治局所有成员的面,在各科学院、部长会议和中央委员会“负责科研工作”的官员面前大骂尤里·日丹诺夫的。<sup>129</sup>

1948年7月7日,尤里·日丹诺夫给斯大林写了一封悔过信。这封绝对不能公开的信竟然被刊载在1948年8月7日的《真理报》上,这一天恰是臭名远扬的列宁格勒国家农业科学院例行会议闭会的日子。<sup>130</sup>

对于苏联人来讲,刊载在《真理报》上的指控要比检察官的结论重要得多。对于一名党的活动家来讲,在《真理报》上被直接或间接点名意味着政治上死亡。

有关安·亚·日丹诺夫生命最后几天的情况至今不很清楚。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在所谓的“医生谋杀案”中以及在与“世界主义者”进行斗争中,有关安·亚·日丹诺夫临死前的一些情况被广泛利用。

对于这些情况的描述一开始被刊载在 1953 年初的一些报纸上,后来成为伊·爱伦堡<sup>131</sup>在他的著名的回忆录中和尼·谢·赫鲁晓夫在党的二十大上作“秘密报告”时讲述日丹诺夫的医生 Л. 季马舒克的主要依据。但是,存放在苏共中央档案馆的资料有助于我们重新审查对一些事件的说法。

1948 年 8 月底,安·亚·日丹诺夫在瓦尔代一所专供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使用的疗养院休养。8 月 28 日,克里姆林宫医院心电图室主任 Л. Ф. 季马舒克被叫到那里去。当日 12 时,她撕下心电图纸并作出诊断说,日丹诺夫的“左心室前壁和心室中膈部位心肌梗塞”,负责定期观察日丹诺夫健康情况的几名医生坚决不同意她的这一诊断。П. И. 叶戈罗夫教授、В. М. 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和马约罗夫医生认为,心电图上的变化是由于硬化和高血压导致的“功能紊乱”引起的,这种情况他们以前就发现过,三名医生经过会诊后要求季马舒克重新写出心电图结论。第二天,日丹诺夫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季马舒克又一次被从莫斯科叫来,三名医生又一次要求她改写心电图结论,在自己的直接首长 П. И. 叶戈罗夫教授的执意要求下,她照办了。当时季马舒克的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她不是日丹诺夫的主治医生,她所下的极其负责任的结论却受到了多年给日丹诺夫看病的经验丰富的医生们的怀疑,然后又不得不以书面的形式改变自己的正确诊断。她心里很清楚,如果日丹诺夫的病治好了,她可以得到应有的政治评价,如果没有治好,她至少会因为同自己的上司发生冲突而丢掉在克里姆林宫医院工作的位置。为了保险起见,她给苏联国家全部警卫局局长 Н. С. 弗拉西克写了一封申诉信,并把信亲手交给了日丹诺夫的警卫长 А. Л. 别洛夫。

第二天,即 8 月 30 日,日丹诺夫死亡。当天,国家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把季马舒克的申诉信呈送斯大林,并在随函中写道:“从季马舒克的申诉信中可以看出,她坚持自己所作的关于日丹诺夫患心肌梗塞的结论……而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叶戈罗夫和维诺格拉多夫院士则认为不是心肌梗塞,要她重下结论。”<sup>132</sup>在这份文献资料上有斯大

林的亲笔批示：“送交存档”。

季马舒克本人并不知道她这封申诉书的命运，因为她没有得到回音。

给日丹诺夫治病的一些医生继续就季马舒克所下的诊断结论是否正确争论不休。1948年9月7日，根据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П. И. 叶戈罗夫的命令，季马舒克被从克里姆林宫医院调到门诊部工作，此后她继续捍卫自己的正确性，曾经给联共（布）中央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写去一封申诉信，依旧没有得到回音，克里姆林宫当局直到1952年夏天才想起她。<sup>133</sup> 日丹诺夫之死看来正符合马林科夫的心意。

### 列宁格勒“反党集团”

从1948年3月起，斯大林实质上正式确定了两个接班人——沃兹涅先斯基和马林科夫，这两个人都有非凡的阅历，前者有经济领域的阅历，后者有党机关及其心脏——中央干部部的阅历，两个人都不是老广场和克里姆林宫的新来乍到者。沃兹涅先斯基和负责监督惩办机构工作的中央委员会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关系密切，而马林科夫作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部部长和苏联部长会议内贝利亚的副手与贝利亚有过多年的合作。

日丹诺夫死后，以尼·阿·沃兹涅先斯基为首的一派的影响力仍然保持了一段时间，与此同时，这一派同以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斗争加剧。正如苏共中央20世纪30—40年代和50年代的镇压材料重审委员会提供的官方资料所指出的那样，“斯大林在私下交谈中说道，他认为中央书记、组织局委员阿·亚·库兹涅佐夫是自己的党务工作的接班人，而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是自己的国务活动的接班人。”<sup>134</sup> 51

库兹涅佐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冲突早在1946年就爆发了。库兹涅佐夫是“飞行员案”的办案负责人之一，正如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机

关一位工作人员后来回忆的那样,库兹涅佐夫“揭发了马林科夫在主持干部部和航空工业部工作期间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并在联共(布)中央机关会议上对这些问题给予应有的批评。”<sup>135</sup>

1948年7月,马林科夫再度当选中央书记,新老中央干部部部长之间的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指控阿·亚·库兹涅佐夫、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И.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州和列宁格勒市第一书记П.С.波普科夫在列宁格勒举办全俄批发交易会,成了迫害所谓的“列宁格勒反党集团”的表面上理由,这显然是莫须有的罪名。这种指控毫无根据,因为举办批发交易会,分两次(1948年10月14日和11月11日<sup>136</sup>)出售多余商品的决定是以格·马·马林科夫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作出的。作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是,指控他们搞党早在十大就禁止并受到过斯大林严厉批评的派别活动。

马林科夫接到曾在列宁格勒工作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М.И.罗季奥诺夫呈送的关于举办全俄批发交易会的报告后,马上授意在政治局内部讨论“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阿·亚·库兹涅佐夫同志、候补中央委员М.И.罗季奥诺夫同志和П.С.波普科夫同志反党活动”问题。1949年2月15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的决定指出,列宁格勒的领导人与以前在这个城市工作过的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和阿·亚·库兹涅佐夫有密切的联系,列宁格勒市委书记曾经请求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对该城市进行“指导”。地方党政机关同被提拔到中央工作的人有这样或那样的联系本来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中央政治局的这一决定中却提醒全党不要忘记“季诺维也夫……企图把列宁格勒党组织变成反对列宁的派别活动根据地”的那个时期。<sup>137</sup>

1949年2月,马林科夫被派往列宁格勒。由于两派之间的斗争早已奠定了思想基础,长达几十年的政治诉讼程序已经定型,所以剩下的事情就是残杀的技术了。列宁格勒市委第二书记、战争年代列宁格勒保卫战的积极参加者Я.Ф.卡普斯京被逮捕,后被迫承认自己是“英国



间谍”，审讯人员“帮助”他回忆起往事：1935年他在英国曼彻斯特市几家工厂生产实习期间赢得了英国人的好感和信任，他在那里同一位教他英语的英国姑娘发生了恋爱关系，那位英国姑娘劝他留在英国。所有这些事实说明“卡普斯京可能已被英国谍报部门收买”。<sup>138</sup>

另一个被逮捕和审问的人是后来被任命为联共(布)克里木州州委第一书记的前列宁格勒州执行委员会主席 H. B. 索洛维耶夫，他被指控“曾经提出过成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组织局，试图建立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是双料的大国沙文主义分子”，还指控他“在克里木工作期间恶毒攻击苏联国家元首”。<sup>139</sup> 52

1949年8月13日，阿·亚·库兹涅佐夫、П. С. 波普科夫、М. И. 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 П. Г. 拉祖金、前列宁格勒市执行委员会主席 H. B. 索洛维耶夫等人在走出格·马·马林科夫的办公室时被逮捕。必须指出，他们是在未经检察人员批准的情况下被捕的。

与此同时，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М. Ф. 什基里亚托夫<sup>140</sup>的直接领导下，开始多方寻找诋毁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材料。沃兹涅先斯基被指控故意贬低国家计划的意义，提供虚假的统计数字，伪造报表。后来又指控他丢失国家计划委员会的秘密文件，由于国家计划委员会的所有文件都属于密件，所以这种指控实质上是要让沃兹涅先斯基永远不得翻身。1949年9月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定，建议把沃兹涅先斯基开除出党，移交法庭，追究其丢失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文件的法律责任。<sup>141</sup> 这一决定由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什基里亚托夫亲手呈交马林科夫。1949年10月27日，中央全会批准逮捕沃兹涅先斯基，移交国家全部和由几名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组成的专案组审讯。

库兹涅佐夫、卡普京、沃兹涅先斯基兄弟、罗季奥诺夫、列宁格勒市苏维埃副主席加尔金被捕后都受到了严刑拷打，直接参与审讯的除了国家全部的侦查人员以外，还有马林科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国家

安全部的一名侦查人员后来回忆说：“我把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带进去(审讯——作者)时,看见马林科夫端坐在中间的那张椅子上,贝利亚斜靠在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布尔加宁站着。”<sup>142</sup>在他们三人视察关押“列宁格勒案”被告的监狱后,“监狱内更加戒备森严,气氛陡然紧张,每个被捕者的审讯人员增加到两名,每次审讯的时间持续到第二天早晨四点钟左右。”存放在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档案室的资料印证了这名侦查人员的回忆。<sup>143</sup>

请看有关审讯罗季奥诺夫的时间记录:

“1949年11月29日——13时40分到17时10分,23时50分到4时50分

1949年11月30日——18时50分到19时50分,23时30分到3时

1949年12月8日——13时30分到17时20分

1949年12月16日——22时30分到2时50分

1949年12月23日——11时10分到17时15分”<sup>144</sup>

前雅罗斯拉夫尔州党委第一书记И. М. 图尔科在解释他为什么要在伪造的审讯记录上签字时说:“我一看这个人(指国家安全部的侦查员普京采夫——作者)就知道,要是我不签字的话,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是迫不得已而为之的。我当时有气无力地爬到普京采夫跟前,53 抱住他的靴子,恳求他不要再审问下去了,因为当时我开始出现幻觉,感觉到自己已经丧失了理智。”

此案在侦查(如果这里可以使用“侦查”这一术语的话)过程中使用的手段极其残忍,简直不亚于中世纪刑讯的残酷程度,连孕妇也被拷打,亲属被株连(例如,除了逮捕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外,还逮捕了他的弟弟、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长阿·阿·沃兹涅先斯基、他的妹妹列宁格勒市一个区的区委书记米·阿·沃兹涅先斯卡娅,以及其他被告的一些亲戚,其中包括14名妇女)。

对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主要指控是他丢失了秘密文件。根据1947年通过的《关于对泄露国家机密和丢失含有国家机密的文件承担

法律责任》的法律,最严厉的惩罚是在劳改营中关押 10 年到 15 年<sup>145</sup>。战后,苏联正式取消了死刑,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一项决定中宣布,“和平时期再也没有必要使用死刑”,“这一思想符合工人和职员工会联合会和其他能够表达社会各界意见的权威组织的愿望”,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因此决定取消死刑。<sup>146</sup>

但是,为了实施镇压,这一法律规定不久就被修改了。1950 年 1 月 12 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了《关于对背叛祖国者、间谍和爆炸破坏分子使用死刑》的命令,其理由依旧是“由于收到了各民族共和国、工会、农民组织以及文化活动家关于恢复使用死刑的请求”。<sup>147</sup>

随后进行了审判。按照常规,判决书首先报送斯大林和政治局批准。1950 年 10 月 1 日零时宣布判决书,判处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奥诺夫、波普科夫、卡普斯京和拉祖金死刑。后来,从 1950 年到 1952 年,逮捕和法庭审判始终没有停止过。<sup>148</sup>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资料中至今仍保留着一份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决定草案,上面注明的日期为 1949 年 8 月。这份决定责成国家安全部“把居住在列宁格勒市的 1500 名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右派、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德国人、芬兰人有某种联系的人连同他们的家属一道迁移出该城市,把他们永远移居阿尔泰边疆区,置于内务部有关机构的监督之下。”1957 年夏天,时任列宁格勒州州委书记的 Ф. P. 科兹洛夫在中央全会上说:“成千上万无辜的人当时被赶出了列宁格勒,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投入监狱,其中许多人被枪决,不少人死于非命,许多人被用军用列车拉走。”<sup>149</sup>

沃兹涅先斯基和库兹涅佐夫及其追随者被清除出政界和被杀害后,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争权夺利斗争并没有因此得到缓和,但也没有变得更加激烈。从表面上看,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取得了全面胜利,但是这一派参加者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仅举出一件事足可以证明这一点,1946 年马林科夫差一点成为贝利亚侦讯的对象),何况斯大林本人 54  
在让“自己的一帮人”参加政治游戏时,一直以疑虑的目光注视着他们。斯大林当时已经说了,尼·亚·布尔加宁可能是他的苏联部长会

议主席职位的继承人。<sup>150</sup>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的一些老战友对他的影响力日益减弱。首先是克·叶·伏罗希洛夫的地位下降,他被任命为驻匈牙利盟国监察委员会主席(1945—1947年),后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文化委员会主席和苏联军事部总军事委员会委员(1947—1953年)。另一个是维·米·莫洛托夫,1949年让他兼任外交部长,而他在1939年就已经担任了外交人民委员。

战后时期,布尔加宁的影响力增大。战争末期,他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1944—1946年),后任苏联武装力量部副部长(1946—1947年)。1947年,他得到了武装力量部部长职位,兼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1950年布尔加宁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布尔加宁职务上的晋升说明,在执政的上层人物中,他始终处在比较独立的位置上,无论是马林科夫的地位临时削弱,或者所谓的“列宁格勒集团”颠覆,都没有对他的仕途造成多大影响。

## 尼·谢·赫鲁晓夫

尼·谢·赫鲁晓夫成为权力斗争的新参加者,严格地讲,他并不是老广场的新人。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党组织工作期间,他在几年之中,走过了从1931年任联共(布)鲍曼区区委书记到1934年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35年同时任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的道路。赫鲁晓夫同大多数自己的战友(第一书记们)不同,他在1936—1939年“大清洗”期间安然无恙。1938年,他离开莫斯科去乌克兰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可想而知,他应该也参与了镇压行动,是他所管辖地区的镇压行动的组织者。因此,他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应该有过合作,这是他担任乌克兰共和国第一书记时的实际情况。1938年起担任乌克兰国家全部副部长的A. 3. 科布洛夫1954年4月被关押在布蒂尔斯克监狱时,曾经给格·马·马林科夫写过一封信,这封信保留至今。信中指出,乌克兰镇压的规模相当大,乌克兰联共(布)第一书记

本来可以做到限制镇压的规模进一步扩大,但是他并没有这样做。<sup>151</sup>

战争期间,赫鲁晓夫先后担任西南方向(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东南方面军、南部方面军、沃罗涅日方面军、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将军衔。他的儿子(列昂尼德)在空军第一集团军服役,死于一次空战。<sup>152</sup>

1949年底,乌克兰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被斯大林召唤到莫斯科。据赫鲁晓夫讲,斯大林对他说:“我们想把您调到莫斯科。列宁格勒那边出了点麻烦,发现有人搞阴谋活动,莫斯科这里的情况也不妙。我们想让您再度领导莫斯科的党组织。”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当时给我的印象是,斯大林把我叫到莫斯科是想对首都的各派势力施加某种影响和降低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作用(斯大林并没有告诉我这一点)。我有时甚至觉得斯大林本人有点儿怕贝利亚,想把贝利亚搞掉,又不知道怎么做更好一些。把我调到莫斯科似乎是为了利用我来与贝利亚抗衡,束缚贝利亚的手脚。”<sup>153</sup>

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没有涉及一系列至关重要的详细情况。但是,他说,斯大林对莫斯科党组织的工作很不满意,这无疑是事实。看来,“列宁格勒案”之后该轮到莫斯科了。1949年10月20日,约·维·斯大林和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收到了莫斯科一家工厂三名工程师的一封联名信(后来查明,信尾的署名使用了假名字),信中指出了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米·波波夫工作中存在的严重缺点。

按照斯大林的提议,中央政治局成立了一个由格·马·马林科夫、拉·佩·贝利亚、拉·莫·卡冈诺维奇和米·安·苏斯洛夫组成的小组,负责核查信中所揭发的事实。根据核查的结果,于1949年12月12日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格·米·波波夫同志工作中缺点》的决定,对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的工作进行了评价,指出波波夫犯有比信中所揭发的更为严重的错误和缺点。例如,决定中说,莫斯科州委推行了一条不正确对待中央各部委的路线,试图压制和指挥中央各部委,不把中央政府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放在眼里,擅自越权行事。批评



“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所关心的是经济事务,对党务和政治工作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1949年12月13日—16日,联共(布)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承认中央委员会“正确和及时指出了波波夫以及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工作中的重大缺点”。全会还谴责“莫斯科州委和莫斯科市委书记和委员们的无原则立场。他们压制批评和自我批评,某些领导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干部工作中犯有严重错误。”全会解除了波波夫担任的所有职务,责成共青团莫斯科州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共青团莫斯科州和莫斯科市委书记H. П. 克拉萨夫琴科工作中的错误。

1949年底,赫鲁晓夫被任命为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1950年2月,莫斯科州委第二书记С. А. 若尔宁、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И. А. 帕尔菲奥诺夫、莫斯科州委书记О. В. 科兹洛夫被解除职务。同年5月,莫斯科州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П. Г. 布雷利切夫被解除职务。

56 赫鲁晓夫的出现成为由马林科夫、贝利亚、卡冈诺维奇和苏斯洛夫组成的小组的工作成果。许多年中,赫鲁晓夫在工作上与马林科夫和贝利亚亦步亦趋,特别是同卡冈诺维奇关系最为密切。赫鲁晓夫口口声声说,他同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有矛盾,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极力把自己装扮成这些人的死敌。

即便像赫鲁晓夫所假设的那样,20世纪40年代末斯大林企图利用他来与这些人进行抗衡,他在这段时期中的影响力也比不上当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帕·贝利亚在克里姆林宫确立的领导地位。但是,斯大林如同他所敬仰的伊凡雷帝那样,天生具有“让石头缝里冒白烟”的能力。此后不久,党的机关成了赫鲁晓夫大显身手的天地,他不仅亲自参加镇压行动,把乌克兰一些著名的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上置于死地,而且成为揭发个人崇拜时期镇压行动最热心的一个人。

## 拉·帕·贝利亚

拉·帕·贝利亚 1899 年生于阿布哈兹共和国梅尔赫乌利地区一个名叫緬格列尔的村庄。他的党龄从 1917 年算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几个月士兵。1921 年参加肃反工作,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肃反委员会供职。1931—1938 年担任外高加索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后任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第一书记和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sup>154</sup>他的妻子尼娜·泰穆拉佐夫娜·格格奇科里是前格鲁吉亚孟什维克政府外交部长诺伊·若尔丹尼的侄女。

在“大恐怖”时期,贝利亚成为同“人民的敌人”作斗争方针的最忠心耿耿的-executioner 之一。1937 年,他在担任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期间,同马林科夫有过密切的合作,后成为马林科夫领导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调配部的一名工作人员。他们一道在埃里温地区留下了血迹,共同参与对许多被告的刑讯<sup>155</sup>,这些人中大部分被枪决。

1938 年是马林科夫和贝利亚政治仕途上最春风得意的一年,正是在那一年,马林科夫就任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干部部长。1938 年 8 月 22 日,拉·帕·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一副部长。

1938 年 11 月 24 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解除 Н. И. 叶若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的决定,随后他被逮捕和枪决。1938 年 11 月 25 日,拉·帕·贝利亚被任命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他把这一职位一直保持到 1945 年底。

1941 年 2 月,拉·帕·贝利亚兼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负责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有色冶金人民委员部、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和江河船队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进行监督。 57

战争爆发后,贝利亚成为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1942 年 2 月 4 日,国防委员会作出关于委员会成员工作分工的决定,委托贝利亚分管飞机和发动机生产及空军组建问题;此外,后来贝利亚还分管武器装备

(迫击炮,弹药,坦克)生产问题,并负责对石油人民委员部、煤炭人民委员部和交通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进行监督。1944年,拉·帕·贝利亚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国防委员会作战委员会主席,1943年9月30日,贝利亚因“在加强武器装备和弹药生产方面功勋卓著”,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45年7月,他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

战争年代,贝利亚直接参与苏联核武器的研制,苏联从一开始研制核武器就让贝利亚负责这项工作。1944年12月3日,苏联国防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建立伊·瓦·库尔恰托夫试验室的决定,责成贝利亚“负责监督铀的生产工作”。1945年8月20日,国防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拉·帕·贝利亚、格·马·马林科夫、尼·阿·沃兹涅先斯基、鲍·利·万尼科夫、A. П. 扎韦尼亚金、伊·瓦·库尔恰托夫、皮·列·卡皮察、B. 马赫涅耶夫、米·格·别尔乌辛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从1946年起,该委员会归属苏联部长会议),负责“对利用铀内核能的所有工作进行领导”。1949年10月29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苏联部长会议专门通过了一项决定,对拉·帕·贝利亚在“组织原子能生产和顺利完成原子武器试验中所做的工作”表示感谢,他因此荣获列宁勋章和一等斯大林奖金。1953年3月,苏联政府责成特别委员会负责领导“原子工业、‘金雕’和‘彗星’系统、远程导弹”方面的所有工作。

正如苏联核计划的老功臣安·德·萨哈罗夫和Ю. Б. 哈里顿所指出的那样,这个冷酷无情、厚颜无耻的人是个能干的组织者。贝利亚爱骂人,而且不停地用粗鲁话督促下属工作,不把下属当人看待。被骂者都很清楚,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945年9月6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组建苏联人民委员会作战委员会,由拉·帕·贝利亚任主席,格·马·马林科夫任副主席,安·伊·米高扬、拉·莫·卡冈诺维奇、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和阿·尼·柯西金任委员,负责与工业企业和铁路运输有关的工作问题。

战争结束后不久,贝利亚的地位就发生了动摇。1945年12月29

日,他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尽管仍然担任苏联人民委员部(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关于他被解职的报道(与关于叶若夫被解职的报道惊人地相似)中说:“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考虑到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拉·帕·贝利亚同志在中央工作负担过重,同意他提出的不再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的请求,任命谢·尼·克鲁格洛夫同志担任苏联内务人民委员。”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中,贝利亚面临新的威胁。

在格鲁吉亚,开始审查所谓的以格鲁吉亚联共(布)中央 M. 巴拉米亚为首的“缅格列尔民族主义集团”,此案是由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安全部一手制造的。“缅格列尔民族主义集团”被指控企图借助帝国主义国家的力量消灭格鲁吉亚的苏维埃政权、受贿和搞民族主义活动。

1951年11月,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格鲁吉亚发生受贿现象和关于以巴拉米亚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定。同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将敌对分子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迁移出去》的决定。此后,格鲁吉亚有37名党政工作人员被逮捕,一万多人被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移居哈萨克斯坦边远地区。

斯大林有时管贝利亚叫“大缅格列尔”。眼下,这个“大缅格列尔”自己也跌进了被审查的轨道。

不过,贝利亚的最重要一点是他扮演了“恐吓部长”的角色。在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期间,由他管辖的那些部门实际上起到了对每个人的生活进行监督的作用,他可以对居住在苏联境内的任何一个人进行镇压,把任何一个人变成“集中营的尘埃”,不论这个人的职务和地位如何。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简直到了没有贝利亚就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地步。如果没有预先得到贝利亚的支持,几乎无法向斯大林报告任何事情。如果在向斯大林报告时有贝利亚在场,他必定要对你所报告的任何一件事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刁难,使你难堪,被斯大林瞧不起,陷入困境。”<sup>156</sup>

不过,作者在这里想指出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本人熟知面见斯大林的程序,他为什么没有提到,除了贝利亚以外,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马林科夫也有权直接向斯大林报告最重要的内外政策问题,这两个人扮演了“党内安全部长”的角色。另外一个人是躲在贝利亚背后的贝利亚以前的同事、国家监察部长卡梅尔库洛夫。这几个人都没有成为赫鲁晓夫回忆录中的主人公。还必须指出,赫鲁晓夫本人念念不忘的是,尽量把进行镇压和忠实执行苏联“国家元首”(在国家安全部的文件中称斯大林为“国家元首”)或者“主人”(斯大林有时在书信往来中为了保密起见,自称“主人”)的方针推到贝利亚一个人身上,标榜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自己是他为之辩解的那个制度的正确活动家。

### 全国性的反犹太人运动

59 始自日丹诺夫的“反对崇洋媚外”的斗争,在他和马林科夫的煽动下,很快就转化成一场反对“世界主义”的运动。最初的一些逮捕行动为卫国战争后对犹太人组织进行刑事和政治迫害奠定了基础。1947年底,И. И. 戈利德施泰因和З. Г. 格林贝格被逮捕,通过刑讯逼供,取得了指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的供词。

1948年2月3日,在马林科夫的主持下召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通过了《关于解散犹太人作家联合会和查封犹太语刊物》的决定。

根据斯大林的亲自指示,准备杀害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著名的演员С. М. 米霍埃尔斯。

1948年初,斯大林紧急指示苏联国家安全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组织杀害米霍埃尔斯的行动。这位演员早已经被监视和盯梢,斯大林知道米霍埃尔斯要乘车前往明斯克。据阿巴库莫夫后来说,斯大林批示就在这个城市制造一起交通事故<sup>157</sup>,由国家安全部副部长С. И. 奥戈利佐夫、国家安全部第二局局长Ф. Г. 舒布尼亚科夫和白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Л. Ф. 察纳娃<sup>158</sup>直接实施杀害米霍埃尔斯的行动。制



造交通事故尝试了好几次都不成功,于是制定了一个包括邀请米霍埃尔斯晚上到察纳娃的别墅做客在内的计划,他所乘坐的汽车由国家安全部提供。当晚十点钟左右,C. M. 米霍埃尔斯在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 B. И. 戈卢博夫的陪同下乘车抵达位于明斯克市郊的察纳娃的别墅,两人在那里同时被击毙,他们的尸体被扔在一辆货车下面。两个小时以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面目全非的尸体被扔在明斯克市一条偏僻的街道上。这次行动的参加者后来得到了苏联政府奖赏。<sup>159</sup>

1948 年底,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解散,它的参加者被指控“进行反苏民族主义活动,同国外犹太人反动组织保持联系和从事间谍活动”。<sup>160</sup>

1948 年 12 月 24 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书记 И. С. 费费尔被捕,从他那里取得了关于他本人、C. M. 米霍埃尔斯、当时的联共(布)中央委员、前苏联情报局局长 C. A. 洛佐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有过合作的人进行犯罪活动的所谓供词。1949 年 1 月 13 日,洛佐夫斯基被叫到马林科夫那里去,由马林科夫和什基里亚托夫一起对他进行谈话和审问。洛佐夫斯基被指控在 1944 年同费费尔和米霍埃尔斯一起给斯大林写信,建议在克里木建立犹太人社会主义共和国。还指控洛佐夫斯基会见的美国记者中有美国谍报人员<sup>161</sup>。

1948 年 1 月 18 日,洛佐夫斯基被开除出党,1 月 26 日被逮捕。1949 年 1 月被逮捕的还有诗人 Л. 克维特科和 С. 马尔基什,博特金医院主任工程师 Б. А. 希梅利奥维奇,犹太剧院艺术指导 В. Л. 祖斯金,Л. 施特恩院士。

反犹太人运动的旋转速度越来越快,这场运动很快就波及犹太人自治州——该州的领导人被逮捕。随后,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作出了《关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收到一些戏剧评论家反爱国主义声明》的决议,Б. 罗曼绍夫、Н. 维尔塔、А. 索夫罗诺夫等人的作品被中央点名,指控他们“贬低和咒骂苏联优秀的戏剧作品”。<sup>60</sup>

反犹太人运动迅速发展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还通

过了一项《关于戏剧评论中的资产阶级唯美主义现象》的决定,以及《真理报》发表的一篇题为《把揭发世界主义者和反爱国主义者的斗争进行到底》的编辑部文章。一场系统迫害“世界主义者”的运动随之在苏联作家出版社、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全面展开。其中给苏联作家出版社罗列的罪名是出版И. 伊利夫的《十二把椅子》和Е. 彼得罗夫的《小金鹿》,据А. 法捷耶夫说,这两部作品“侮辱历史唯物主义,嘲弄马克思主义的导师、一些著名的苏联活动家和苏联机构”。这场运动几乎波及国家的所有机构——从学校和玩具厂到科研机构和州委员会。<sup>162</sup>研究过这个问题的Ю. С. 阿克肖诺夫曾经公正地指出:“一系列镇压行动的反犹太人倾向无疑反映了斯大林本人的观点和情绪。”

维·米·莫洛托夫的妻子П. С. 热姆丘任娜也被卷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并受到了指控。作者认为,当时反犹太人运动已成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除此以外,发动这场运动也与居住在苏联境内、已经有了自己国家机构的那些犹太人同“整个进步人类的领袖”保持着某种距离有一定的关系。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在30年代下半期,居住在苏联境内的朝鲜人和爱沙尼亚人受到过迫害,而在战争年代和战后,德意志人和芬兰人受到了迫害。

已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斗争一个因素的斯大林反犹太主义,使拉·莫·卡冈诺维奇丧失了积极参与争夺权力的可能性。作为斯大林—叶若夫—贝利亚实施的所有行动(从实行强制集体化和酿成乌克兰饥荒<sup>163</sup>,到1940年3月4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决定把关押在卡廷和其他集中营和监狱的两万多名波兰人枪决)的热心参加者,拉·莫·卡冈诺维奇在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执政者”中的地位得到了不断巩固。伟大卫国战争中他成为国防委员会委员,1942—1943年担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同时兼任交通人民委员。战后,他的地位受到了动摇。表面上看,他仍然位高权重,1946年起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实际上被免除了所有重要的政治职务,1946—1947年,卡冈诺维奇担任建筑材料工业部部长。1947年3月12日,卡冈诺维奇任乌

克兰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回到莫斯科后,他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物资技术供应委员会主席这一虽然重要、但绝对不是关键性的职务(1947—1952年)。

斯大林对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娶犹太女子为妻的疑虑不断增加,暗中怀疑他们的妻子参加了西方国家的间谍组织。1952年12月1日,斯大林对自己信任的几个人说:“任何一名犹太人民族主义分子都可能是美国的间谍。犹太人民族主义分子认为,美国拯救了他们的这个民族(在那里可以成为富人和资产者等等),他们认为自己必须成为美国人。”<sup>164</sup> 61

再来谈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一案。正式的指控显然没有多少,却牵连了莫斯科政界和文化界的一大批人。国家安全部没有完成自己的任务,准确地讲,没有按照要求完成任务。尽管不断使用“非法审讯方法”,甚至严刑拷打,也没有能够做到从被捕者中找出能够提交法庭审判的罪犯。按照要求,应该在1950年3月结束侦查,但是据谢·杰·伊格纳季耶夫讲:“在审查指控C. A. 洛佐夫斯基、И. С. 费费尔及其同谋者的侦查材料时发现,该案件处在无人办理状态,能够证明被捕者供认在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掩护下从事间谍和民族主义活动的材料几乎完全没有。”<sup>165</sup> 然而,最后还是找到了结案的办法,虽然不可思议,但是符合当时苏联社会的现实情况。

## 国家安全部的毁灭

由维·谢·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国家安全部主要负责完成斯大林交代的最重要任务——对国家高级官员进行政治监督。“飞行员案”就是由国家安全部负责侦查的,迫害格·康·朱可夫元帅的准备工作也是由这个部门的工作人员亲手实施的,国家安全部还收集了大量诋毁马林科夫及其他党务和国务活动家的材料。国家安全部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一道,对“列宁格勒案”的被告进行了侦查。

前面已经说过,1945年底,拉·帕·贝利亚因“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负担过重”被解除内务人民委员职务,这自然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后改称内务部)在中央各大部中的作用降低。国家全部依靠裁减内务部编制使它的权力扩大,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1946年初,由П. 苏多普拉托夫中将任处长(Н. И. 艾廷贡少将、Н. С. 萨济金中将和 А. 3. 科布洛夫中将任副处长)的“С”处(对付破坏、恐怖和其他危险活动的特种任务处)被从内务人民委员部移交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7年初,内务部的内卫部队、内务部运输局、克里米亚政府设施(利瓦吉亚宫、沃龙佐夫宫和尤苏波夫宫)警卫部队被移交国家全部管辖,同时被移交的还有政府通讯管理局及其警卫部队和维护人员。1949年10月,边防军和武警部队被从内务部移交国家全部。

由谢·尼·克鲁格洛夫领导的内务部除了仍然履行警察职能以外,还保留有: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ГУЛАГ)、战俘和拘留者管理局(ГУПВИ)、监狱管理局(由内务部副部长 В. В. 切尔内绍夫领导)、档案总局和由内务部副部长 А. П. 扎韦尼亚金中将领导的所谓第9局(苏联原子弹方案执行局)等。此外,内务部还负责参与管理德国境内的苏联占领区(起初由内务部副部长伊·亚·谢罗夫负责这项工作)和管理流浪街头的儿童(由安全部副部长 Б. П. 奥布鲁奇尼科夫负责),参与管理和保卫大量的工业企业和建筑工地(地质勘探项目、工业企业和建筑企业),由副部长 С. С. 马穆洛夫负责。<sup>166</sup>

国家全部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和内务部第一副部长伊·亚·谢罗夫之间存在着个人恩怨,这对于他们周围的人来讲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阿巴库莫夫想方设法指控谢罗夫与格·康·朱可夫关系密切,仅此一点就让谢罗夫在1946—1947年吃尽了苦头。而谢罗夫则多次给斯大林写信,检举阿巴库莫夫滥用职权,谢罗夫在其中的一封信中说:“国家全部和内务部之间不存在任何有利于事业的工作关系,在机关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两个部门如此敌对的时期……斯大林同志!”谢罗夫大声疾呼道:“恳请您派人核实信中所列举的事实,我所说的一切都可以得到证实。我相信,在核实过程中,还能发现很多对国家安全

部工作造成负面影响的其他事实。”<sup>167</sup>

可以看出,在1948—1950年期间,斯大林尽量做到少依赖国家安全部的执行者,开始组建一些既不同于内务部又不同于国家安全部、直接依靠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机构。例如,把对外侦查的职能移交给外交部成立的、实际上隶属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情报所。斯大林对国家安全部的不信任还表现在他计划建立独具一格的“党内安全制度”,扩大党机关对侦查诉讼程序的直接干预范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格·马·马林科夫和党的监察委员会主席M. Ф. 什基里亚托夫在实现斯大林的这一意图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里所说的不是指党机关对侦查过程的干预,而是指在当时苏联已成为见怪不怪现象的党机关行使司法职能。

斯大林不止一次提出过,要为重要的政治犯建造特殊的监狱,这种监狱既不隶属于国家安全部,又不隶属于内务部。后来,在1958年,尼·亚·布尔加宁在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说:“我在斯大林那里见到了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我记不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指赫鲁晓夫——作者)是不是也在那里。斯大林多次谈到应该建造这样的监狱。”

沙图诺夫斯卡娅(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为什么?

布尔加宁:用来关押党内的罪犯。斯大林是这么说的,我可以证明,我自己听见的……

什维尔尼克(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他是不是想甩开国家安全部?

布尔加宁:看来是这样的。斯大林死后,一切都变得更加明朗。我想,他当时连国家安全部也不信任了。”<sup>168</sup>

马林科夫经常亲自参加审讯,他一般使用中央委员会办公楼五层那个紧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组织局大厅的房间进行审问,这是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最神秘和戒备最森严的地方。陪同马林科夫审讯的中央委员会工作人员通常身着国家安全部军官制服。<sup>169</sup>

……1950年2月28日,苏联内务部监狱管理局局长命令他的副



手И. Т. 克列伊苗诺夫前往老广场中央委员会马林科夫的秘书处。克列伊苗诺夫抵达那里时,看见会客室里坐着内务部长谢·尼·克鲁格洛夫、干部部副部长Б. П. 奥布鲁奇尼科夫、监狱管理局处长普戈夫金。他们一起被请进马林科夫的办公室,后者向克列伊苗诺夫提了几个问题,问了问他的经历和原先在部队干什么工作。

当天晚上,克列伊苗诺夫返回单位时才得知,自己已被任命为“特殊监狱”的监狱长,副监狱长是在联共(布)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部工作的舍斯塔科夫。后来,马林科夫详细交代他们说,“特殊监狱”既不隶属于内务部,也不隶属于国家安全部,而是归马林科夫和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的监察委员会直接管辖。

第二天,即1950年3月1日,克列伊苗诺夫在马林科夫的办公室里看见了阿巴库莫夫。

斯大林早就交代过要建造一个能关押30—40名犯人和可供审理政治案件的特殊监狱,这种监狱必须具备“特殊的制度,快速的周转率,特别的警卫”<sup>170</sup>,以及多达一百人的大编制<sup>171</sup>。不久,“特殊监狱”建造完毕,它位于“水兵的寂静”大街18号,由莫斯科内务局的一座监狱改造而成。

“列宁格勒案”的一些主要被告被转移到了这座“特殊监狱”,这里还关押着诗人И. С. 费费尔,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一些领导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名老牌告密者(连他也没有逃脱被捕的命运),以及在斯大林警卫队工作过的И. И. 费多谢耶夫。后来,在马林科夫的保密柜中发现了一份准备提审费多谢耶夫的问答提纲,同这份提纲存放在一起的有:马林科夫写的关于建造“特殊监狱”的报告,关于组织对高级指挥员进行窃听的材料,苏共中央关于在斯大林死后应立即任命的国家重要职务人选的决定草案。马林科夫本人解释说,这份问答提纲是斯大林直接向他口授记录下来的。<sup>172</sup>

1950年3月,马林科夫亲自提审费多谢耶夫。克列伊苗诺夫后来回忆说:“……我把囚犯И. И. 费多谢耶夫带到中央委员会……交给马林科夫审问。我们两人乘坐的‘胜利’牌轿车绕过伊帕季耶夫胡同,

下车后乘专用电梯上楼。我把费多谢耶夫带进了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

我先后两次把费多谢耶夫带到苏共中央委员会办公大楼，交给马林科夫审问……3月17日，给我安装了‘转盘’（指政府自动通讯电话——作者）。<sup>173</sup>

费多谢耶夫多次惨遭毒打。他曾经诉苦说，他总觉得从‘特殊监狱’的各个不同角落传来一阵阵细语声和沙沙声，似乎有人总在小声地说：‘承认吧，承认吧，你是叛徒。’<sup>174</sup>残酷审问费多谢耶夫无疑与试图收集指控苏联国家全部领导人的材料密切相关。随后的事件表明，诗人费费尔也被关进‘特殊监狱’事出有因……” 64

1951年6月12日，一辆轿车驶到“特殊监狱”大门前，车上走下当时任国家全部边防总局局长的H. П. 斯塔汉诺夫中将、国家全部副部长C. A. 戈格利泽和军事检察院的两名工作人员。“特殊监狱”监狱长克列伊苗诺夫在回忆时着重指出，当时和他们一起走下轿车的还有身着便装的国家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戈格利泽转过身子，向克列伊苗诺夫问道：“您认识这个人吗？”

克列伊苗诺夫答道：“我认识。”

“他被逮捕了，请收监。”

当即腾出了几间囚房，阿巴库莫夫被关进了其中的一间。<sup>175</sup>

第二天，国家全部侦查处的工作人员A. Г. 列昂诺夫、M. T. 利哈乔夫和Л. Л. 什瓦尔茨曼也被投入了“特殊监狱”。

这些人虽然被逮捕，但是没有对他们提出正式指控，甚至没有解除阿巴库莫夫的部长职务。

苏联国家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员M. Д. 留明被确定充当阿巴库莫夫的直接起诉人的角色，他的任务是为“特殊监狱”已经准备好了的起诉书“配音”。1951年7月2日，他在写给约·维·斯大林的一封信<sup>176</sup>中说，阿巴库莫夫故意阻挠对“犹太人民族主义分子”Я. Г. 埃廷格尔医生一案的侦查。按照留明的说法，此案的侦查有助于取得关于医生们从事破坏活动的证据。

告密立即产生作用。1951年7月4日,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以检查留明的说法是否属实,委员会成员包括马林科夫(委员会主席)、贝利亚、什基里亚托夫和伊格纳季耶夫。调查委员会应该在三四天内完成检查工作。<sup>177</sup>

审讯的螺旋开始飞快旋转。被审问的人有:大案要案侦查处处长 A. Г. 列昂诺夫和他的两名副手——M. T. 利哈乔夫和 B. И. 科马罗夫,第二总局(反间谍局)局长 Ф. Г. 舒布尼亚科夫和他的副手坦吉耶夫,侦查处处长助理普京采夫,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С. И. 奥戈利佐夫和 E. П. 皮托夫拉诺夫。

调查委员会查明:已被国家安全部逮捕的 Я. Г. 埃廷格尔医生“在没有受到任何逼供的情况下承认,在给联共(布)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A. C. 谢尔巴科夫治病期间有过恐怖主义意图”。调查委员会强调指出,这宗案件是20世纪30年代政治诉讼案的继续,当时 Д. Д. 普列特尼奥夫医生和 B. C. 莱温被指控预谋损害瓦·弗·古比雪夫和马·高尔基的健康。

委员会认为,阿巴库莫夫对此案的侦查工作漠不关心,这完全是一种犯罪行为。阿巴库莫夫认为,这些供词是凭空虚构的,说“这起案件将把国家安全部拖进泥潭”。阿巴库莫夫被指控下令把埃廷格尔医生关进一间寒冷的牢房,导致这个重要的受侦查者在1951年3月2日死去。

65 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还被指控应对另外一件事承担罪责——1950年春天,与苏联核计划有关系的“维斯穆特”股份公司副总经理萨利马诺夫出逃德国的美军占领区,国家安全部错过时机,没有及时侦破此案(侦查的时间过长,事后才上报审问记录)。

最重要的一项指控是,阿巴库莫夫明知“犹太人反苏青年组织”的参加者已被逮捕,也知道他们已经供认准备“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施恐怖行动”,但是没有指示有关工作人员把这些供词写进审问记录。<sup>178</sup>

斯大林不仅不相信犹太人,他连国家安全部也不信任了。1952年12月1日,他在会见自己的一些亲信(多半是在自己的别墅里会见)时

说：“我们取得的胜利越大，敌人的破坏活动就越猖狂。我们有一些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忘记了这一点，表现出心慈手软，粗心大意和骄傲自大。”斯大林还说：“医生中有许多人是犹太民族主义者”（B. A. 马雷舍夫记录下了“主人”的这句话）。当天晚上，斯大林还谈到了国家安全部，说这个部门的状况令他感到不安。斯大林说：“国家政治保安局（斯大林按照老习惯称呼国家安全部）的情况不尽如人意，警惕性不如以前高了。他们自己承认是一堆废物，工作一塌糊涂。应该给国家政治保安局治治病……否则将危及所有部门——在胜利面前盲目乐观，被胜利冲昏头脑……中央委员会对国家安全部的工作监督不力，懒惰。国家安全部面临全面崩溃。”<sup>179</sup>

政治局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与留明写给斯大林的信中所揭发的问题几乎没有两样，阿巴库莫夫被认为对党和国家犯下了罪行，责令国家安全部重新侦查“埃廷格尔和犹太人反苏青年组织搞恐怖活动一案”，向国家安全部派去了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党和共青团机关部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作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驻国家安全部的代表。7月11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根据以马林科夫为首的调查委员会的结论（结论是马林科夫预先准备的），通过了《关于苏联国家安全部处在不尽如人意状态》的决定。两天以后（1951年7月13日），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向全国所有党组织下发了一封非公开信，它实际上成为对阿巴库莫夫的第一个指控结论。<sup>180</sup>

越来越多的人被投入侦查“磨盘”。每一轮审讯过后，都向斯大林呈送了审讯报告，并将副件抄送马林科夫。在每一份审讯记录中，审讯中提到的被捕者的姓名用大写字母打印，尚未被捕者的姓名用手写字母注明。只几天的工夫，审讯记录上就增加了许多用大写字母打印的名字。

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圈套，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接二连三出现。维·谢·阿巴库莫夫充当了“替罪羊”的角色。维克托·谢苗诺维奇·阿巴库莫夫1908年生于莫斯科，在他的个人履历表上可以看到：“出生——工人家庭，文化程度——低，无专业，军衔——上将，1930年

成为联共(布)党员,1932年参加肃反工作”。<sup>181</sup>他12岁开始务工,19岁成为警卫队神枪手,24岁进入人民内务委员部工作。此后步步高升,起初担任特派员,后任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侦查员。1937—1938年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保安总局工作,从那里被任命到罗斯托夫州任该州的内务人民委员(1939—1940年),38岁(1940年)成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副内务人民委员。在短短的八年中,他从一名普通的特派员跃升为副部长。战争期间,阿巴库莫夫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处处长、国防人民委员部除奸部反间谍局局长。

1946年,他被任命为国家安全部部长。他经常给斯大林打报告和提供资料,斯大林对他提供的情况十分重视。与惩戒部门的其他同行相比,他并没有多少过人之处,除非是因为他具有这一行当中罕见的能力。阿巴库莫夫在莫斯科有两处住宅,其中一处住宅的面积约120平方米,铺橡木地板,摆放古色古香的红木家具,多不胜数的壁毯和地毯,这里供他的妻子居住。另一处住宅约300平方米,坐落在尖顶胡同,供他自己和情妇居住。为了使这位国家安全部长能在这一住宅内尽情寻欢作乐,曾经下令让附近的16户居民搬走。

在这两处住宅内,各式各样昂贵的餐具和卧具随处可见,当时莫斯科见不到的外国冰箱在这里也能见到,收音机和收音电唱两用机共计13台,手表30块,各种布匹数百米(战后生活富足的象征)。住宅内的所有陈设都是在阿巴库莫夫的亲自参与下并根据他对幸福生活的理解布置的,充分反映出这个文化程度极低的国家安全部长和上将的生活方式。此外,阿巴库莫夫家中有一个存放300根人参的箱子,一个实际上属于他的车库,里面停放几十辆小轿车,足见维克托·阿巴库莫夫有长期过幸福生活的打算。<sup>182</sup>

他是他那个时代有代表性的一个执行者。为什么要让他扮演负责侦查政治案件的角色?他所扮演的这个角色究竟有多大的独立性?他是不是只是一名跟着别人指挥棒转的演员,或者说,是一名从导演那里学到了一点后准备自导自演的演员?据说,在阿巴库莫夫的“大卧室内、衣柜中、床单下发现了大量含有国家重要机密的文件”(作者援引



审问记录里的一段话),这个将军是不是就这么简单?<sup>183</sup>

阿巴库莫夫本人在意识到对他提出的指控的分量后,给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什基里亚托夫、伊格纳季耶夫写过多封信,试图证明自己无罪。他在信中提出了自己的说法。

据他说,国家全部第二总局早在1949年前就对Я. Г. 埃廷格尔的一举一动进行监视。埃廷格尔“不止一次恶毒攻击领袖的话都被监听设备记录下来”。<sup>184</sup>1949年11月,曾经对是否逮捕埃廷格尔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是,斯大林私人警卫队领导人弗拉西克中将向他传达上头的方针说,准备首先让埃廷格尔和另一个生物化学科学家、肿瘤学专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Б. И. 兹巴尔斯基担任不那么引人注目的职务,然后逮捕他们。

阿巴库莫夫回忆说,正是国家全部于1950年4月15日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提出准许逮捕埃廷格尔的请求,但是,又没有得到批准。阿巴库莫夫在为自己辩解的信中写道:“逮捕科学家向来是件重要的事情,我们历来按照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特别小心行事。”<sup>185</sup>11月16日,阿巴库莫夫再次打报告,这一次是直接给在索契疗养的斯大林打报告,请求允许逮捕埃廷格尔。报告先是在波斯克列贝舍夫那里放了一段时间,然后落入布尔加宁手中。后者问阿巴库莫夫说:“你说怎么办?”失宠的国家安全部长写道:“我回答他说,埃廷格尔是个大恶棍,应该逮捕他。然后布尔加宁同志表示同意逮捕。”

阿巴库莫夫亲自参加了对埃廷格尔的审讯。在审讯中,国家安全部长要求埃廷格尔承认“他如何治死了谢尔巴科夫”。埃廷格尔辩解说,谢尔巴科夫本来就患有重病,并出示了各种让阿巴库莫夫不可理解和震惊的医学证明材料,以证明给谢尔巴科夫治病的不是埃廷格尔,而是维诺格拉多夫(埃廷格尔只是担当顾问医师)。“埃廷格尔也没有说出维诺格拉多夫在治疗中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sup>186</sup>阿巴库莫夫不承认是他下令把埃廷格尔关进冷冰冰的牢房,从而导致后者死去的指控,说把犯人关到什么地方是侦查员留明自己决定的,“埃廷格尔是在被留明同志审问出来后死去的”。<sup>187</sup>

67

但是,阿巴库莫夫把责任推到他的下属身上的辩解没有被采纳。在阿巴库莫夫手下工作的留明(顺便提及,正是阿巴库莫夫本人把留明调到国家全部总部机关的,这无疑是由于留明对被侦查者肯下毒手)对自己以前的部长提出了新的指控,说阿巴库莫夫曾经要求他在审讯中收集诋毁某些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人的材料,其中包括收集Б. П. 瓦尼科夫和А. П. 扎韦尼亚金,以及同拉·帕·贝利亚有密切联系的一些负责苏联原子武器研制工作的人的材料。<sup>188</sup>

在侦查过程中查明,阿巴库莫夫的下属、格鲁吉亚安全部长曾经指示收集诋毁贝利亚本人的材料。在贝利亚的母亲在第比利斯的住宅内发现了窃听装置,国家内务部“制造”了贝利亚的妹夫有形迹可疑的联系。<sup>189</sup>

对阿巴库莫夫还提出了其他指控——违反侦查程序,制造虚假的审讯。关于这两点,这个前国家安全部长的辩解更加令人信服。他说,在1951年8月10日的那次审讯中,“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交代我和我的副手奥戈利佐夫,让肃反机构不要害怕对被捕的人——间谍和其他罪犯使用肉体作用的措施。”<sup>190</sup>

阿巴库莫夫建立全面监视系统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经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批准的。1950年9月9日,即在“阿巴库莫夫案”案发前不到一年,政治局通过了第77/310号决定,根据这一决定,国家全部成立了第二处,负责“在苏联国内使用特别的方法制止某些人进行的敌对活动,完成特殊的任务”,这个处的职能极其广泛,包括“监视和吸收某些人参加间谍活动”,“通过败坏声誉,秘密除掉,肉体作用和罢免职务等途径制止犯罪”活动。第二处从出租汽车司机、理发师、医院职工和医生、饭店服务员中招募间谍。从政治上置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米霍埃尔斯于死地的行动实际上已经合法化(如果这里可以使用“合法化”这一概念的话),此外,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住处和办公室秘密安装监视装置也已经合法化,阿巴库莫夫因此成为许多权力斗争参加者的危险人物。

终于向阿巴库莫夫提出了正式指控——背叛祖国罪,理由是他拒

绝对犹太人恐怖主义组织的活动进行侦查和丢失秘密文件。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 1947 年 6 月 9 日命令的规定,对泄露秘密材料和丢失密件者必须追究其法律责任,把丢失密件的罪名加在阿巴库莫夫身上,使他永远不得翻身,这种做法与此前不久给“列宁格勒案”被告尼·阿·沃兹涅先斯基定罪的方式如出一辙。

国家全部的大多数领导人同阿巴库莫夫一道被捕。惩罚机构之间的角逐(这里指阿巴库莫夫领导的国家全部和内务部之间的竞争)由来已久,在这场角逐中,同马林科夫结盟的内务部显然占了上风。被逮捕的国家全部领导人有:国家全部副部长 С. И. 奥戈利佐夫和 Е. П. 皮托夫拉诺夫,大案要案侦查处处长 А. Г. 列昂诺夫和他的副手——М. Т. 利哈乔夫、В. И. 科马罗夫和索科洛夫,国家全部“Д”处处长 А. М. 帕尔金,前国家全部第一总局局长 Г. В. 乌捷欣,阿巴库莫夫的助手 Я. М. 布罗维尔曼。作者注意到,在向他们提出的多不胜数的指控中,几乎都谈到了他们“在侦查工作中严重违背社会主义法律……在办案过程中,大部分案件没有审讯记录……对被捕者使用反常的侦查方法,包括对被捕者广泛使用经前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批准的肉体作用措施。”

“阿巴库莫夫案”的侦查工作由马林科夫和斯大林直接督办、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具体负责实施,确定了两个主要的、相互联系的侦查方向。

### **医生谋杀案和国家全部**

“反革命医生间谍活动和恐怖活动”一案毫无疑问是主要的侦查方向,该案具有显而易见的反犹太人政治色彩,它是 20 世纪 40 年代末政治诉讼案——“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间谍活动中心”案的延续。另一个侦查方向是摧毁拥有干预权力斗争的国家全部(在后来一些年中,国家全部的这种能力部分得以实现)。1952 年 7 月 23 日,国家全部副部长 С. И. 奥戈利佐夫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提

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反革命医生秘密集团》的报告。

对多年给苏联“当权者”治病的医生进行审讯,其用意在于把“克里姆林宫医生谋杀案”变成“克里姆林宫案”,从而达到指控这些医生的病人的目的。例如,侦查人员试图通过沃罗诺夫元帅的医生尤金(斯克利福索夫斯基研究所外科主任医师)获取(准确地讲,是伪造)指控这位元帅搞军事阴谋的供词。<sup>191</sup>作者想提请读者注意一个相当重要的特点:早在“大恐怖”时期,医生谋杀案就被视为最重大的政治诉讼案,它是斯大林的政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内务部实施类似行动的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行动的组织者和执行者都认为,20世纪30年代末的事件与50年代初发生的事情之间存在着联系。前面已经提到,普列特尼奥夫和莱温医生曾经被指控是“人民的敌人”,说什么他们缩短了古比雪夫、高尔基和他的儿子马·佩什科夫的生命,在后来的一些侦查文件中,经常把此事当做案例提起。“医生谋杀案”终于浮出了水面,克里姆林宫医务处的一些著名医生被逮捕。

被投入监狱的有:М. С. 沃夫西教授,М. И. 佩夫斯纳教授,И. Г. 连贝尔斯基教授,Н. А. 舍列舍夫斯基教授,В. М. 维诺格拉多夫教授,Б. С. 莱温教授,С. Е. 卡尔帕伊教授,П. И. 叶戈罗夫教授,В. X. 瓦西连科教授。直接参与审讯的留明后来说,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经指派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当他的“监督人”,伊格纳季耶夫曾经指示他把这些人“往死里打”。此外,留明本人曾被指责下毒手不够。留明在1951年11月底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中辩解说:“我只承认在侦查过程没有采用极端措施(这里和下面的黑体字系原件上所有),但是在接到相关指示后我改正了错误。”<sup>192</sup>

可以证明“反革命医生们”从事犯罪活动的事实显然不足。是的,可以把日丹诺夫、谢尔巴科夫、加里宁的死亡解释为医生们实施恐怖活动的结果,但是,这种解释难以令人信服,即便有人“承认”,其价值也不高。当时在侦破过程中利用了季马舒克在1948年写的那封为自己辩解的申诉书,她在信中说,自己的诊断是正确的,试图说明自己在同克里姆林宫的医生们发生冲突中没有过错。她把信交给了日丹诺夫的

警卫长,希望通过他呈交国家全部领导人。这封信大概是形成指控的主要根据。

早在1948年就对季马舒克的申诉信进行过鉴定,认为她的申诉是没有根据的。四年过后,又把季马舒克的这封信搬出来,其原因显然是由于侦查中可供利用的证据不足。在对阿巴库莫夫的指控结论中,这一证据也曾经被充分利用,显而易见,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证明克里姆林宫医院的医生们从事犯罪活动和存在着犹太人恐怖主义组织,而且是为了指控一些领导人本人。

再来看一看“医生谋杀案”是如何变成国家全部内部的“恐怖分子案”。1952年11月,谢·杰·伊格纳季耶夫给斯大林呈送了一份详细的总结报告,这份报告不仅对“医生谋杀案”下了结论,而且介绍了侦查经过和所持的侦查立场。这份报告还提供了下述情况:曾经根据中央委员会1951年7月11日《关于国家安全委员会处在不尽如人意状态》的决议,成立了一个专门的侦查小组,对各个不同时期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工作的医务人员的所有情况进行摸查。 70

这些医务人员都受到了监视和秘密窃听,在克里姆林宫医院治过病的病人被逐一调查。侦查人员认为,一些国家著名医疗专家所做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经过对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的医务工作人员的材料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个重要医疗机构的干部队伍极其不纯,有一些人很难让人相信他们没有同过去那些从事敌对活动的反苏分子有过联系。”通过这种契卡式的政治审查,得出了那里“不具备可靠治疗病人的必要条件,没有对包括德田球一<sup>①</sup>、多列士<sup>②</sup>和季米特洛夫<sup>③</sup>在内的外国共产党和人民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认真负责的治疗和必要的护理”的结论。

A. C. 谢尔巴科夫和安·亚·日丹诺夫的死因引起了侦查人员的

---

① 日本共产党创建人之一,1945年起任日共中央总书记。——译者注

② 法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30—1964年任法共总书记。——译者注

③ 保加利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48年起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译者注



注意。谢·杰·伊格纳季耶夫断言：“对谢尔巴科夫同志的治疗是有预谋的犯罪”。给谢尔巴科夫看过病的“巴尔维哈”疗养院的副院长雷日科夫、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布萨洛夫、医疗卫生局顾问维诺格拉多夫被逮捕，兰格和埃廷格尔在受审查期间死去。这些医生被指控“没有利用恢复心脏功能的疗法，不正确使用吗啡、潘托平、星帕妥之类的烈性药物和各种安眠药”，“故意允许”谢尔巴科夫在心肌梗塞后下床。伊格纳季耶夫还在报告中断言，“对日丹诺夫同志的治疗也是有预谋的犯罪”，逮捕了在日丹诺夫生命的最后几年中给他看过病的所有医生——叶戈罗夫教授，维诺格拉多夫教授，瓦西连科教授，马约罗夫医生和卡尔帕伊医生。病理解剖学家费奥多罗夫也被逮捕，他被指控故意隐瞒有关日丹诺夫心肌梗塞的病情。

“经查明，叶戈罗夫和费奥多罗夫是道德败坏分子，马约罗夫——地主家庭出身，维诺格拉多夫——过去追随过社会革命党人，瓦西连科——隐瞒自己1922年被开除出党的事实，他们与犹太人民族主义者卡尔帕伊都有联系。这些人组成了在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内活动的反革命集团，企图利用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治病的有利条件缩短他们的生命。”伊格纳季耶夫在呈送斯大林的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所有被捕者在刑讯逼供之下都被迫承认，他们与苏维埃政权为敌。他们结成有组织的恐怖活动集团已经有好几年的时间，这个集团的领导人是П. И. 叶戈罗夫教授。说什么“叶戈罗夫敌视党和苏维埃政权，他按照人民的敌人阿·亚·库兹涅佐夫的指示行动。库兹涅佐夫心怀不轨，有除掉日丹诺夫的打算。”他们这么一供认，就把“医生谋杀案”与“列宁格勒案”直接联系起来。但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

斯大林的私人警卫队领导人弗拉西克中将也被指控，说他阅读了季马舒克1948年8月29日写的那封申诉信，并在8月30日或31日将这封信交给了阿巴库莫夫。在呈送斯大林的指控结论初稿中，这一事实被说成：“阿巴库莫夫和弗拉西克出卖了季马舒克……使她受到了外国间谍和恐怖分子叶戈罗夫、维诺格拉多夫、瓦西连科、马约罗夫的迫害。”斯大林不同意这种说法，对这一文件进行了修改，强调指出：

“他(指日丹诺夫——作者)不是病死的,而是被阿巴库莫夫害死的。”这样一来就使两个不同的侦查方向产生了联系,“反革命医生谋杀案”变成了国家全部内部的“恐怖分子案”,两宗案件都直接涉及“列宁格勒案”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sup>193</sup>

在逮捕国家全部的工作人员过程中,可以发现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一开始被逮捕的是“埃廷格尔案”的一些涉案人员,其中大多数是大案要案侦查处的工作人员(上面已经提到,这个处的处长是列昂诺夫)以及阿巴库莫夫的一些亲信。

这些人被逮捕预示着国家全部的另一些工作人员面临厄运。开始逮捕肃反工作人员中的犹太人,被逮捕的有:国家全部特别处处长 Н. И. 艾廷贡少将,负责研制无线电通信设备的处长 Е. 安采洛维奇,国家全部“К”处处长 А. Я. 斯维尔德洛夫,国家全部第一总局副局长 М. И. 别尔金中将,国家全部第二总局副局长、研制毒剂特别试验室领导人 Г. 迈兰诺夫斯基,同国家全部有密切联系的检察院刑侦处处长 Л. 舍伊宁等。

他们每个人都在惩戒部门工作过多年,在他们的上司眼中,这些人立下过不少“丰功伟绩”——筹划暗杀托洛茨基,参加制造政治诉讼案,参与在战争期间组建破坏小组。

然而,连这些“有功之臣”也被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派驻国家全部的代表谢·杰·伊格纳季耶夫视为危险的恐怖分子抓了起来。А. Я. 斯维尔德洛夫成了抓捕这些人的最好借口,在他的住宅内发现了大量用于从事破坏活动的武器装备,其中包括几支装有剧毒毒剂的玻璃管,一些伪装成小风箱的定时爆炸装置,五把口径不同的手枪,一支自动步枪,一些子弹和手榴弹……

在“肃反工作战线”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的儿子辩解说,这些武器弹药是他在1941年领来的,当时发给他这些武器弹药的目的是,一旦莫斯科被德国人攻占,就利用这些武器弹药从事破坏活动,而且这些武器弹药是按照后来担任国家全部特别处处长 П. А. 苏多普拉托夫的指示下发的。1946年采取过收缴这些武器弹

药的措施,但是在战争年代丢失了不少。在苏多普拉托夫那里也发现过剧毒毒剂短缺的现象。斯维尔德洛夫本人对他藏有这些武器的解释是,自己健忘和酷爱武器。不过,斯维尔德洛夫历史上有污点——他曾经被指控与20年代末的托洛茨基主义有关系,先后两次(1935年和1938年)被捕,这也成为他被立案的主要依据。<sup>194</sup>

72 1952年9月,负责大案要案侦查处副处长Л. П. 什瓦尔兹曼进行审讯的侦查人员制服了他的强硬态度,使他不得不供认自己诬蔑过党和国家大多数领导人以及惩戒部门的领导人。据负责审讯他的人讲,他诋毁过卡冈诺维奇、赫鲁晓夫、梅尔库洛夫、B. B. 科布洛夫、马穆洛夫和菲京。但是,当时伊格纳季耶夫、马林科夫和斯大林对他的这些招供并不感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是什瓦尔兹曼的供认——他准备对马林科夫实施恐怖行动。什瓦尔兹曼说,了解他的这一行动计划的人包括阿巴库莫夫、赖赫曼、帕尔金、伊特金、艾廷贡、前检察长多龙。还说什么他是从美国大使馆武官费蒙威尔和大使哈里曼那里得到实施恐怖行动的指示的。有两件事促使他准备暗杀马林科夫,第一件事是“以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为掩护的民族主义分子被粉碎”(1950年),第二件事是阿巴库莫夫的活动被揭发(1951年),他要为阿巴库莫夫报仇。<sup>195</sup>

为了得到什瓦尔兹曼的这些供词,付出了众所周知的代价——连续许多天“流水线作业”式的审讯,不让什瓦尔兹曼睡觉,严刑拷打他。极权主义的可怕逻辑使昔日忠心耿耿的刽子手变成了牺牲品……

什瓦尔兹曼的供词简直是一场“及时雨”。他的供词成了为镇压“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辩解的理由,“阿巴库莫夫案”从此被改名为“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有了他的这些供词,开始大张旗鼓对其他人进行审讯。

说阿巴库莫夫是“列宁格勒案”的共犯,这未免有点牵强附会。还曾经试图把他说成是“医生谋杀案”的共犯。要证明这两点是不容易的,因为正是国家全部部的侦查人员从阿·亚·库兹涅佐夫、П. С. 波普科夫、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尼·阿·沃兹涅先斯基的亲戚嘴里“敲”

出了供词的,而什瓦尔兹曼就是这些侦查人员中的一个。

于是制造了新的指控,说什么国家安全部的侦查人员在阿巴库莫夫的压力之下,故意忽略“列宁格勒案”的被告同外国间谍机关的联系,并且让阿巴库莫夫回忆起他曾经说过:“被捕的人都是党内担任领导职务的人,哪里有什么间谍活动。除了卡普斯京以外,他们中谁也没有同外国人见过面。”

阿巴库莫夫的一名副手——奥戈利佐夫也被指控,说他“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指在审问被告的时候——作者)……有点儿坐立不安,因为以前他曾在列宁格勒担任安全局副局长”,在国家安全部中进行调查时还提到他进行了侦查活动。多年担任国家安全部第一总局副局长的М. И. 别尔金也被逮捕,他被指控是犹太人恐怖主义集团安插在国家安全部的成员。在严刑拷问之下,他供认遵照阿巴库莫夫的旨意,把一些犹太族的工作人员安插在国家安全部的所有重要岗位上,说什么国家安全部的间谍活动早就与西方国家谍报机关有过合作,并且说匈牙利国家安全局局长彼得·加博尔与西方国家谍报机关有联系。于是,一场把犹太人从国家安全机关中清除出去的运动波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一些东欧国家开始迫害在外交、国家安全部门和政府中工作的犹太人。 73

从指控结论中被斯大林修改的那些地方可以看出,他亲自领导了侦查工作和定罪。他利用了“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希望从中找到为战后一系列政治迫害进行解释和辩解的依据。他修改指控结论的用意显然是为了突出阿巴库莫夫的“罪行”,特别强调阿巴库莫夫所起的作用——极力阻挠对“人民的敌人”库兹涅佐夫同外国谍报机关建立联系的事实进行侦查。

指控结论的修改者尽其所能强调阿巴库莫夫的个人罪责。请看指控结论的初稿:

“阿巴库莫夫及其同伙列昂诺夫和科马罗夫(黑体为作者所加)是一帮破坏分子,他们拒不执行苏共中央关于对人民的敌人及其在党和政府机关中活动的叛徒集团参加者同外国谍报机关建立联系的事实进

行侦查的指示。出于犯罪的目的,他们诱导侦查人员把库兹涅佐夫及其同谋当做与国外没有任何联系的、个别的、有局限性的、孤立的集团对待。”

再来看一看经斯大林修改后的指控结论:

“阿巴库莫夫拒不执行苏共中央关于对人民的敌人及其在列宁格勒党和政府机关活动的叛徒集团参加者同外国谍报机关建立联系的事实进行侦查的指示,不止一次采用狡猾手段和侦查当局捉迷藏。出于犯罪的目的,他诱导侦查人员把库兹涅佐夫及其同谋者当做与国外没有任何联系的、个别的、有局限性的、孤立的集团对待。”<sup>196</sup>

阿巴库莫夫还被指控企图组织暗杀马林科夫<sup>197</sup>,这样一来,就把他同什瓦尔兹曼关于准备暗杀马林科夫的供述联系在一起。1952年1月,伊格纳季耶夫向斯大林报告说,30年代末40年代初<sup>198</sup>中央政治局有人向英国提供情报,战后不久开始对此事进行调查,由国家安全部第二总局副局长赖赫曼负责调查,但是没有查出结果,这些情报的内容直接涉及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因为据伊格纳季耶夫估计,情报至少是从政治局某个成员的秘书处泄露出去的。

与党机关上层人物有直接关系的政治诉讼案在斯大林在世时召开的最后一次党代会和苏共中央全会的报告中有所反映。十九大是在1952年10月份举行的,当时正是侦查(如果这里可以使用这个术语的话)“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达到最高潮的时候。不过,在党代会的速记记录中几乎找不到这宗诉讼案的痕迹。

但是,“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和“列宁格勒案”的侦查结果在这次党代会(准确地讲,是1952年10月16日召开的中央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它是一次最不为人所知的中央全会)的一些决议中有所反映。<sup>199</sup>这次中央全会属于最没有被充分研究的一次会议,它没有被写进正式的党史出版物。<sup>200</sup>与中央委员会的一贯做法不同,这次会议的材料没有被速记下来,斯大林在全会上的讲话也没有被速记下来,全会的会议记录中没有提到斯大林的这次讲话。

但是,有关斯大林这次讲话的记忆留存了下来。据赫鲁晓夫回忆,



“斯大林已经把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的命运‘吊了起来’。在代表大会结束后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建议成立一个由25人组成的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取代政治局,并逐一系列一些新人的名字……当时斯大林有没有建立主席团政治局的打算呢?显然,他觉得立即把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撵走不太合适,因此首先建立了一个扩大的主席团,然后成立人数较少的主席团常委。”赫鲁晓夫写道:“……他既没有让莫洛托夫也没有让米高扬进入主席团常委,也就是说,把他们‘吊了起来’。我相信,如果斯大林再活一段时间,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可能遭受灭顶之灾。总而言之,党的十九大结束后,斯大林马上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实行隔离政策,没有邀请他们前往我们以前一道去的那些地方——别墅,住宅,电影院。但是,伏罗希洛夫被选进了主席团常委。有趣的是,有一次我们在斯大林那里进餐,吃饭的时间拖得很长,他突然说道:‘伏罗希洛夫是怎么混入常委的?’我们都垂下了眼睛,不敢看他。一开始我们都在想,‘混入’是什么意思?他怎么可能是‘混入’的?然后我们才说:‘您自己点了他的名字,他是被选进去的。’斯大林曾经对我们不多的几个人说,他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间谍……他对莫洛托夫总有点儿‘怀疑’……莫洛托夫可能是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投靠了美国人。”<sup>201</sup>

曾经面临镇压威胁的阿·伊·米高扬对1952年秋天发生的事件有过更详细的回忆。据他讲,在十九大召开前几天,斯大林在会见政治局成员时提议裁减代表大会主席团的人数,他建议只选出15人,而不是原先的27人到29人。由于通常只有那些年龄大、资格老的官员才能当选主席团成员,因此斯大林的这一建议本身含有令人不安的成分。米高扬在回忆这件事时是这么说的:“这是令人震惊和难以理解的。这样一来,许多著名的党的活动家进入代表大会主席团的可能性被他剥夺了,他们是完全有资格当选的。”后来更加变本加厉,斯大林干脆宣布:“不应该让米高扬和安德烈耶夫进入主席团,他们不配当政治局成员候选人。”<sup>202</sup>

米高扬认为,他和斯大林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是,莫洛托夫不同意

斯大林提出的放弃商品关系和货币关系的思路,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建议得到了政治局一些成员(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支持。

75 十九大一结束,马上召开了中央全会。前面已经讲过,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的讲话没有被速记下来,但是有一个参加全会的人(Л. Н. 叶夫烈莫夫,他当时任库尔斯克州州委第一书记)却把斯大林的讲话极其详细记录了下来。他所记录的内容与米高扬、Д. Т. 谢皮洛夫、赫鲁晓夫、作家 К. 西蒙诺夫等人在回忆录中对这次讲话的回忆相吻合,因此可以证明他的记录是比较准确的。请看叶夫烈莫夫记录下来的斯大林讲话的片断。斯大林讲话一开头就令人大为震惊,他说:“许多人可能以为我们(指苏联共产党——作者)十分团结,然而我们并没有这种团结,某些人对我们的决议表示不同意……”

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不让一些著名的党务和国务活动家担任部长这一重要的职务,这该怎么说呢?

我们解除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和其他一些人的部长职务,让一些新人取代他们,为什么呢?什么理由呢?部长的工作是件粗活,要求有大力气,有具体的知识和身体。我们之所以解除某些劳苦功高的同志所担任的职务,任命一些更内行、更有首创精神的工作人员取代他们,原因就在这里。

至于说政治和国务活动家,他们仍然还是著名的政治和国务活动家,我们可以让他们去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你瞧,我连自己有几名副手都不知道。”

斯大林在对自己的战友和中央委员会副书记们讲了这句双关语后“转入人身攻击。”

叶夫烈莫夫记下了斯大林的原话:“我们在谈论我们事业的团结问题时,不能不涉及某些著名活动家的不正确行为,我指的是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同志。莫洛托夫是个忠于我们事业的人,可以这么说,他没有动摇过,把毕生献给了党,这一点我毫不怀疑,但是不能回避他的不体面行为。我们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同志甜酒喝得太多了,他在接见英

国大使时,竟然同意在我国出版资产阶级的报刊。为什么呢?这种同意有什么根据?难道他不清楚,资产阶级是我们的敌人,在苏联人民中发行资产阶级的报刊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一个错误。

莫洛托夫同志关于把克里木交给犹太人的建议有什么意义?<sup>203</sup>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严重错误……莫洛托夫同志提出这个建议的依据何在?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犹太人自治区,难道这还不够?但愿这个共和国得到发展,用不着莫洛托夫同志充当对我们的苏维埃克里木有非分之想的犹太人的律师。这是莫洛托夫同志的第二个错误。

莫洛托夫同志不像是一个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同志是如此敬重自己的夫人,以至于我们还没有来得及通过政治局对某个重要政治问题的决议,热姆丘任娜同志<sup>204</sup>就很快知道了……显而易见,政治局成员的这种行为是不能允许的。

现在说一说米高扬同志。大家看到了吗?他反对增加农民的农业税。他是谁?我们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他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农民是我们的债务人,我们同农民有牢固的联盟,我们把土地交给集体农村永久使用,他们应向国家缴纳税收。所以说,不能同意米高扬同志的观点。”

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党的老领导人安·安·安德烈耶夫没有被列入主席团的成员。

斯大林在这次会议上说,由于自己年纪大了,他不想再担任中央委员会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随之出现了与16世纪俄国历史上的一件事(伊凡四世在实行削藩制前夕在亚历山大自由村宣布退位)极其相似的一幕:全体会议的参加者一齐恳求斯大林继续担任国家元首。<sup>205</sup> 76

根据十八大的决议,政治局应由9名委员和两名候补委员组成,秘书处应有4名成员,然而在1952年10月16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取代政治局的主席团却由25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秘书处有10名成员。从有许多铅笔涂改之处的全会决定初稿上可以看出,直到最后时刻党的最高机关的组成人员才确定了下来。经过多次变动后确定

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是：B. M. 安德里阿诺夫，阿·鲍·阿里斯托夫，拉·帕·贝利亚，尼·亚·布尔加宁，克·叶·伏罗希洛夫，谢·杰·伊格纳季耶夫，拉·莫·卡冈诺维奇，Д. С. 科罗琴科，阿·亚·库兹涅佐夫，O. B. 库西年，格·马·马林科夫，B. A. 马雷舍夫，Л. P. 梅利尼科夫，阿·伊·米高扬，H. A. 米哈伊洛夫，维·米·莫洛托夫，米·格·别尔乌辛，潘·孔·波诺马连科，马·扎·萨布洛夫，约·维·斯大林，米·安·苏斯洛夫，尼·谢·赫鲁晓夫，Д. И. 切斯诺科夫，尼·米·什维尔尼克，M. Ф. 什基里亚托夫。主席团候补委员是：列·伊·勃列日涅夫，安·亚·维辛斯基，H. Г. 兹韦列夫，H. Г. 伊格纳托夫，И. Г. 卡巴诺夫，柯·尼·柯西金，H. С. 帕多利切夫，H. M. 别哥夫，A. M. 普扎诺夫，И. Ф. 捷沃相，П. Ф. 尤金；中央委员会书记——阿·鲍·阿里斯托夫，列·伊·勃列日涅夫，H. Г. 伊格纳托夫，格·马·马林科夫，H. A. 米哈伊洛夫，H. M. 别哥夫，潘·孔·波诺马连科，约·维·斯大林，米·安·苏斯洛夫，尼·谢·赫鲁晓夫。<sup>206</sup>

人数较多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了新的“领导干部”的“繁殖场”，但是，苏共的党章并没有规定设立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委。从这次中央全会筹备过程中为数不多的手写材料中可以看出，常委成员直到最后的时刻才确定下来。一开始常委的成员有斯大林，贝利亚，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和赫鲁晓夫，后来加上了伏罗希洛夫和别尔乌辛的名字。<sup>207</sup>毫无疑问，伏罗希洛夫的常委成员候选资格是后来在代表大会或全体会议进行过程中才确定下来的。在常委成员名单中没有党的老领导人——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安德烈耶夫的名字，这证明“党的老近卫军”在斯大林周围的人中的作用已明显下降。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有许多新人，这种扩大客观上使战后形成的那个党内领导集团的地位受到了削弱。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人和中央机关中资格不太老的新人进入了党的高级领导岗位。

党的十九大以后，开始了新一轮的逮捕。这一次是在斯大林的亲信中抓人，被逮捕的有：斯大林的常任秘书和助手 A. H. 波斯克列贝

舍夫；斯大林私人警卫队队长 H. C. 弗拉西克中将；在斯大林私人警卫队中工作的 C. Ф. 库兹米切夫少将。1953 年 1 月，斯大林的亲信中有五人被逮捕，他们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sup>208</sup>

1953 年 1 月 9 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委召开会议（常委成员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只有斯大林本人没有到会），批准在报刊上公开报道逮捕反革命医生集团成员。

1953 年 1 月 13 日，《真理报》专栏刊载了塔斯社的一篇报道：“不久前，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个旨在通过有害的治疗缩短苏联积极活动家生命的医生恐怖小组。”塔斯社的这则新闻断言，恐怖小组的大部分参加者同美国谍报机关建立的“国际犹太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 Joint 有联系……” 77

“侦查工作将在近期结束”——这则新闻最后以这种意味深长和带有威胁的口吻说道。

与这些诉讼案同时被继续侦查的还有“缅格列尔案”——迄今为止仍未被充分研究的一宗大案。1953 年 2 月 4 日，谢·杰·伊格纳季耶夫给斯大林呈送了几份审讯已被捕的格鲁吉亚安全部长 H. M. 鲁哈泽<sup>209</sup>的审问记录。这些审讯材料证明，格鲁吉亚上层曾经发生过激烈角逐，被撤换的几名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当时被指控从事民族主义活动，曾经广泛收集过诋毁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其中包括收集诋毁贝利亚本人的材料。这些审讯材料还证明，把贝利亚和“缅格列尔案”联系在一起是斯大林的一贯做法。显而易见，“缅格列尔案”与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那些大案要案一样，都被列为政治诉讼案，所有这些诉讼案都涉及高层政治领导人。这样一来，就使这些案件与 1937—1938 年的政治诉讼案挂起钩来。

党的十九大以后任命了许多新人，形成了可以顺利取代权力集团中“老家伙”的“干部潜力”，因为维·谢·阿巴库莫夫的国家安全部长职位已被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取而代之。但是，好景不长，斯大林（这场戏的导演）之死使这种取代陷于中断。

\* \* \*



在苏联历史中,战后时期对苏联的未来至关重要。这首先是因为,战争取得胜利成为论证国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不可动摇的论据。战后,更加注重加快发展重工业和军工综合体的方针。和30年代一样,受国家无情剥削的集体农庄的农村再度成为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恐怖再度出现。20世纪30年代的“大恐怖”被系统性镇压取而代之,不让苏联有出现反对派的任何可能性,大力加强对各个领域的监督和控制。不让人们有丝毫的怀疑,一经发现,就对其中的首要人物施加迫害。朱可夫元帅之所以被迫害,空军和海军的许多指挥人员之所以被逮捕,原因就在这里。此外,所谓的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列宁格勒集团”被粉碎,在中央各部委设立“荣誉法庭”,“国家安全部案”,审判“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医生谋杀案”等,都是这种迫害的产物。

78 在战后的苏联,联盟的国家机构本身的影响力大于党政机关的影响力。曾经有过扩大各加盟共和国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作用的小心翼翼的尝试,提出过扩大俄罗斯联邦权利的建议,但是这些尝试在1948年被坚决制止。

在国家领导层中,两个主要集团(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集团和马林科夫—贝利亚集团)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斯大林本人很大程度上挑起了他的亲信们之间的冲突。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曾经有过对最高管理层进行根本性变动的计划,他想抛开他已经不再需要和让他厌烦的惩戒机关的那些领导人,以阿巴库莫夫为首的国家安全部的一些大头目被逮捕,等候他们的是审判,贝利亚开始被“包围”,“党的老近卫军”的代表人物——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的地位被削弱。

党的十九大以后,苏共中央主席团的组成立即被扩大和扩充,使斯大林得以建立准备随时更换老一代领导人的“预备队”。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的这一政策是20世纪20—30年代整个政治传统的延续。

## 注 释

- 1 Сталин И. В. Речь на предвыборном собрании избирателей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г. Москвы 9 февраля 1946 г. М., 1946. С. 10.
- 2 Сталин И. В. О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1946. С. 119.
- 3 Об этом см.: 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ы. 1945—1964. М., 1993. С. 33—37.
- 4 Сталин И. В. Речи на предвыборных собраниях избирателей Сталинского избирательного округа г. Москвы. М., 1954. С. 22—23.
- 5 Лейбович О. Реформа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1953—1964 гг. Пермь, 1993. С. 60.
- 6 См.: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 1995. С. 128.
- 7 Там же. С. 132—134.
- 8 См.: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30—1950-е годы: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М., 1996. С. 192.
- 9 См.: Островский В. Б. Колхозн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СССР: Политика партии в деревне и е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результаты. Саратов, 1967. С. 27.
- 10 В. П. 波波夫对 1946—1947 年饥荒有过专门研究。见 В. П. 波波夫:《40 年代苏联社会(如俄罗斯农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历史学博士学位论文》,莫斯科,1996 年版;《战后(1945 年 6 月—1953 年 3 月)的俄罗斯农村:文件汇编》,莫斯科,1993 年版;《农民和国家(1945—1953 年)》,载《俄罗斯现代史研究》,巴黎,1992 年第 9 期;《饥荒和国家政策(1946—1947 年)》,载《国家档案资料》1992 年第 6 期第 36—60 页。
- 11 См.: Попов В. П.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С. 137—138.
- 12 Там же. С. 41.
- 13 Там же. С. 42.
- 14 См.: Попов В. П.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 Хрущева. (О подготовке Указа

- 1948 г. о выселении крестьян) //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1993. № 2. С. 31—46.
- 15 Там же. С. 35—36.
- 79 16 Там же. С. 36—37.
- 17 Там же. С. 45.
- 18 АВП РФ, ф. 0129, оп. 32, портфель 2, д. 304, л. 8—9.
- 19 Там же, л. 11.
- 20 См. : Попов В. П.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 . С. 177.
- 21 Там же. С. 180, 219.
- 22 Там же. С. 211.
- 23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Т. 4.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упроч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45—конец 1950-х гг. М., 1988. С. 84—85. Безнин М. 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двор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ечерноземья в 1950—1965 годах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1992. № 3. С. 16.
- 24 См. : Верт Н.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00—1991. М., 1992. С. 298—299.
- 25 См. : Безнин М. А. 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двор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Нечерноземья в 1950—1965 годах. С. 16.
- 26 Там же. С. 16—17.
- 27 Там же. С. 17.
- 28 据苏联中央统计局的资料, 1950年农村居民一个月的人均粮食 21 公斤, 土豆 24 公斤, 牛奶 13 升, 肉和鱼 1.39 公斤, 动物油 0.24 公斤, 糖和糖果点心 0.25 公斤(见 В. П. 波波夫:《农民和国家(1945—1953 年)》第 217 页)。
- 29 通常用 0.25 公顷作为丈量集体农庄宅旁园地面积的基本单位, 官方允许每户拥有 0.25 到 1 公顷的宅旁园地(见 В. П. 波波夫:《农民和国家(1945—1953 年)》第 286 页)。
- 30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 1987. Ч. 2. С. 450.
- 31 См. : Секретная переписка Рузвельта и Черчилля в период войны. М., 1995. С. 701, 743.
- 32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 Т. 1. 1941—1945. М., 1985. С. 333—360.

- 33 АВП РФ, ф. 06, оп. 7, папка 43, д. 677, л. 49—51.
- 34 Там же, л. 59—60.
- 35 Daniels I. The Man of Independence. Philadelphia; N. Y., 1950. P. 266;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 М., 1995. С. 25.
- 36 АВП РФ, ф. 0129, оп. 30, портфель 81, д. 187, л. 136—144.
- 37 Там же, ф. 06, оп. 7, папка 43, д. 678, л. 71—73.
- 38 Там же, л. 74—77.
- 39 См.: Сафронов В. П. СССР—США—Япония в контекст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60) //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 1995. С. 155—190.
- 40 См.: Сталин И. В. Сочинения. М., 1997. Т. 16. С. 25—30.
- 41 См.: Нежинский Л. М., Чельшев И. А.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43.
- 42 С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Филитов А. М. Как начиналась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 47—68.
- 43 АВП РФ, ф. 0129, оп. 30, папка 187, д. 81, л. 96—111.
- 44 Там же, л. 98.
- 45 Там же, л. 99.
- 46 Там же, л. 103.
- 47 Там же, портфель 1, д. 178, л. 89.
- 48 Там же, оп. 31, папка 192, д. 12, л. 3—5.
- 49 Там же, фонд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Молотова, оп. 9, папка 68, д. 1049, л. 1.
- 50 Там же, л. 2.
- 51 Там же, л. 5—6.
- 52 Там же, л. 17—33.
- 53 Там же, инд. 912, папка 19, д. 192. Подробнее об отношен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к «плану Маршалла» См.: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СССР и «план Маршалл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Архива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Ф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3. № 2. 80
- 54 АВП РФ, фонд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Молотова, оп. 9, инд. 213, папка 18, д. 191,

л. 4—18.

- 55 См. : Мурашко Г. П. , Носкова А. 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 1945—1948 ) //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 . С. 92—93.
- 56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17—1975. М. , 1976. Т. 2. 1945—1975. С. 141.
- 57 См. :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80.
- 58 См. : Мурашко Г. П. , Носкова А. Ф. Советский фактор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й Восточной Европе ( 1945—1948 ). С. 92—97.
- 59 См. : Нежинский Л. М. , Чельшев И. А.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 45.
- 60 См. :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 Мурашко Г. П. , Носкова А. Ф. Начало создания соцлагеря //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89—90.
- 61 См. :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17—1975. Т. 2. С. 79—81.
- 62 АВП РФ, ф. 0129, оп. 32, портфель 3, д. 204, л. 13—19.
- 63 АВП РФ, портфель 1, д. 204, л. 27.
- 64 АВП РФ, портфель 4, д. 204, л. 51.
- 65 См. :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17—1975. Т. 2. С. 145.
- 66 См. : 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 / Публ. А. В. Короткова, А. Д. Чернева, А. А. Чернобаев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5—6. С. 49—50.
- 67 См. там же. С. 285.
- 68 См. : 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Сталин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 1. С. 11.
- 69 «Людам свойственно ошибаться»: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 Ракош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 5—6. С. 7.
- 70 Правда. 1945. 25 мая.
- 71 «Мы располагаем самыми лучшими кадрами»: Записки о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устройстве армии // Источник. 1996. № 2. С. 103—147.
- 72 Там же. С. 152.
- 73 Там же. С. 149.
- 74 Там же. С. 133.



- 75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306.
- 76 Там же, л. 102.
- 77 Там же, л. 112—115.
- 78 Там же, л. 116—117.
- 79 Там же, д. 311, л. 82.
- 80 Там же, л. 85.
- 81 Там же, л. 77—78.
- 82 Там же, л. 98—99.
- 83 Там же, д. 312, л. 78—79.
- 84 Там же, л. 80. См. также: Г. К. Жуков: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биографии* //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М., 1993. Вып. 1. С. 176—183.
- 85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312, л. 80—81.
- 86 Документ без комментария / Публ. В. А. Лебедева // *Воен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3. № 5. С. 27.
- 87 АП РФ, ф. 0129, оп. 30, папка 178, д. 1, л. 81.
- 88 Архив Главной военной прокуратуры, архивное уголовное дело 0029, ОП, л. 187—188, 221, 223.
- 89 Архив Главной военной прокуратуры, архивно-следственное дело Р—664, л. 75.
- 90 Г. К. Жуков: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биографии*. С. 181.
- 91 Максимова Э. *Подслушали и расстреляли* // *Известия*. 1992. 16 июля. 81
- 92 Там же.
- 93 1950年8月对瓦·戈尔多夫、菲·雷巴利琴科、格·库利克开庭审判。三名将军被控企图背叛祖国,准备实施暗杀行动和反苏活动。他们不承认自己有罪,被判死刑,执行枪决。六年后被平反,因为这是一宗“假案”(摘自艾·马克西莫娃:《窃听和枪决》)。
- 94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306, л. 164—165.
- 95 Там же, л. 157.
- 96 Чернев А. *Личные дела трех маршалов* // *Известия*. 1992. 8 мая.
- 97 См.: *Георгий Жуков*. М., 1995. С. 282—283.
- 98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306, л. 132.

- 99 См. :Г. К. Жуков: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биографии. С. 196.
- 100 Там же. С. 217.
- 101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306, л. 99—139.
- 102 См. :Г. К. Жуков: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биографии. С. 239—241.
- 103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308, л. 32—39.
- 104 См. :Г. К. Жуков: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биографии. С. 208—213.
- 105 См. : Ведомости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1946. № 10.
- 106 Подсчеты произведены А. С. Степановым и А. В. Коротковым.
- 107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2.
- 108 Там же, л. 30.
- 109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 ВИ. 1992. № 2—3. С. 84.
- 110 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帕·贝利亚有过合作的详细情况在维·米·莫洛托夫的回忆记录中有记述,见《与莫洛托夫的 140 次交谈:摘自 Ф. 丘耶夫日记》,莫斯科,1991 年版第 328—329 页。
- 111 马林科夫在 1947 年 5 月前任火箭技术委员会主席整一年时间。
- 112 感谢苏联内阁档案室主任 В. Б. 达维多夫向我提供材料。
- 113 См. :Геллер М. , Некрич А. Утопия у власти.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1917 г. до наших дней. Лондон, 1989. С. 553.
- 114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223, л. 119—121.
- 115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 2. С. 183.
- 116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57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 ЦК КПСС, 1957. С. 14—15.
- 117 Там же. С. 241.
- 118 尼·阿·沃兹涅先斯基 1935 年被授予学位;1934 年前他从事教学工作;当年他当选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苏联监察委员会委员。
- 119 См. :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Н. А. Во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СССР в период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 , 1947.
- 120 См.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2. С. 135.
- 121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2—7 июля 1953 г.): «Хрущев. ... Если сейчас разобрать архив МВД, то я убежден, что там на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количество граждан имеются анкеты и на многих дела разрабатываются»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 1. С. 155).
- 122 维·谢·阿巴库莫夫战争年代任除奸部部长,苏联国家全部部长,1951年6月被捕,1954年12月被审讯和枪决。
- 123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2. С. 126.
- 124 РЦХИДНИ, ф. 77, оп. 1, д. 979, л. 182—183. Не позднее 14 августа 1946 г.
- 125 安·亚·日丹诺夫还起草过对 Н. Г. 克柳耶娃和 Г. И. 罗斯金开设“荣誉审判庭”的秘密材料。
- 126 См. :Аксенов Ю. С.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удар по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 Кентавр. 1991. Октябрь-декабрь. С. 82.
- 127 См. там же. С. 82—83. 82
- 128 《Пройдет десяток лет, и эти встречи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уже в памяти》 [Дневник В. А. Малышева] // Источник. 1997. № 5. С. 103—147. А. Р. Жебрак (1901—1965)—ученый-генетик, президент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Белоруссии в 1945—1948 гг.
- 129 5月31日和6月1日政治局会议参加者见《约·维·斯大林办公室客人》,载《历史档案》1996年第5—6期第36页。
- 130 См. :Медведев Ж. Взлет и падение Лысенко:История биологической дискуссии в СССР (1929—1966). М., 1993. С. 161—163.
- 131 См. :Эренбург И. 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 Собр. соч. :В 9 т. М., 1967. Т. 9.
- 132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423, л. 1.
- 133 Там же, л. 174. Переписка Л. Тимашук с властями, точнее, копии ее писем, отправленных в «инстанции», была издана по личному архиву семьи Тимашук( см. :《Цель была спасти жизнь больного》:Письма Лидии Тимашук в свою защиту // Источник. 1997. № 1. С. 3—16).
- 134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2. С. 127.
- 135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42.
- 136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2. С. 127—128.
- 137 Там же. С. 128.
- 138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107—108.
- 139 Там же, л. 53.

- 140 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什基里亚托夫(1883—1954)在党的监察机关工作了20年(从1934年到1954年),其间担任过联共(布)中央下属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
- 141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2. С. 130.
- 142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57.
- 143 Там же, л. 58.
- 144 Там же, л. 198.
- 145 См. : Вестник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1947. № 20.
- 146 Там же. № 17.
- 147 Там же. 1950. № 3.
- 148 С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2. С. 131—132.
- 149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июнь 1957 года). С. 91.
- 150 См. там же. С. 89.
- 151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535, л. 127—135.
- 152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458, л. 95—98.
- 153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С. 89—90.
- 154 См. : Чернев А. Д. 229 кремлевских вождей. М., 1996. С. 106.
- 155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2, 30.
- 156 Мемуары Никиты Сергеевича Хрущева. С. 89.
- 157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5. М., 1996. С. 351—357.
- 158 有预谋的暗杀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的惯用手法,如1939年7月暗杀苏联驻中国大使 И. Т. 博夫昆—卢加涅茨及其妻子。他和他的妻子被用大锤猛击头部,然后制造车祸(见总军事检察院档案馆,刑事档案 0029, ОП, 第 220—221 页)。
- 159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536, л. 103—107. В этом описании событий, основанном на письме Л. П. Берии в Президиум ЦК КПСС на имя Г. М. Маленкова и датированном апрелем 1953 г., *могут быть опущены важные детали*, невыгодные и автору письма, и его адресату.
- 160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201.
- 83 161 Там же, л. 202—203.

- 162 См. : Аксенов Ю. С. Послевоенный сталинизм. . . С. 84—86.
- 163 拉·莫·卡冈诺维奇 1933—1934 年负责联共(布)中央农业部的工作。
- 164 《Пройдет десяток лет, и эти встречи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уже в памяти». С. 103—147.
- 165 Там же. С. 206.
- 166 См. : Лубянка: ВЧК—ОГПУ—НКВД—НКГБ—МГБ—МВД—КГБ. 1917—1960: Справочник/Сост. А. И. Кокурин, Н. В. Петров; ред. Р. Г. Пихоя. М., 1997. С. 103—142.
- 167 Г. К. Жуков: Неизвестные страницы биографии. С. 208—213. См. также: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308, л. 32—39.
- 168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77—79.
- 169 См. :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57 года). С. 281.
- 170 Там же. С. 13.
- 171 ЦХСД, ф. 6, д. 13/78, т. 36, л. 101.
- 172 Там же, л. 47.
- 173 Там же, л. 112.
- 174 Там же, л. 47.
- 175 Там же, л. 112.
- 176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216, л. 1.
- 177 Там же, л. 1—2.
- 178 Там же, л. 2—11.
- 179 《Пройдет десяток лет, и эти встречи не восстановить уже в памяти». С. 103—147.
- 180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216, л. 12—14.
- 181 Там же, л. 13.
- 182 Там же, л. 61—171.
- 183 Там же, л. 77.
- 184 Там же, л. 40.
- 185 Там же, д. 217, л. 106—107.
- 186 Там же, л. 47.
- 187 Там же, л. 40—59.



- 188 Там же, д. 216, л. 53.
- 189 Там же, д. 222, л. 174.
- 190 Там же, л. 95.
- 191 Там же, д. 223, л. 132.
- 192 Там же, д. 222, л. 246.
- 193 За главным охранником Сталина слежка велась с 1939 г. См. :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534.
- 194 Там же, д. 219, л. 139.
- 195 Там же, д. 221, л. 164—215.
- 196 Там же, л. 212.
- 197 Там же, л. 216.
- 198 Там же, оп. 24, д. 484, л. 87.
- 199 Там же, ф. 2, оп. 1, д. 22, л. 1—20.
- 200 См. , например: КПСС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 Ч. 2, 1925—1953. М. , 1953; Ч. 3, 1930—1954. М. , 1954.
- 201 Хрущев Н. С.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Избранные фрагменты. М. , 1997. С. 263.
- 202 Микоян А. Так было.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минувшем. М. , 1999. С. 570—575.
- 203 这里指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 1944 年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出的关于在获得解放的克里木建立犹太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建议。后来,这一建议成为对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参加者的一条重要指控。
- 204 П. С. 热姆丘任娜, 维·米·莫洛托夫的妻子。1919 年到 1948 年从事党务和经济工作。十九大召开期间她不在莫斯科, 因为根据苏联国家全部特别会议的决定, 她已于 1949 年被逮捕并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1953 年被释放和完全恢复名誉。
- 84 205 Ефремов Л. Н. Дорогами борьбы и труда. Ставрополь, 1998. С. 12—16. См. также: <http://www.gull.ptt.ru/Geller/Stalin4.htm>.
- 206 АП РФ, ф. 2, оп. 1, д. 22, л. 1. См. также: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7. С. 75—77.
- 207 АП РФ, ф. 2, оп. 1, д. 22.
- 208 Там же, ф. 3, оп. 24, д. 484, л. 87.
- 209 Там же, оп. 58, д. 222, л. 123—175.

## 第二章 缓慢消融的坚冰

85

(1953年3月—1957年底)

……他们相互对视了一下——突然间感到惭愧，他们不明白周围都发生了些什么，但是能感觉到空气中充满了肮脏东西，以致于再也不能呼吸。

——M. E. 萨尔特科夫—谢德林：  
《一座城市的历史》

## 约·维·斯大林之死

1953年3月1日,斯大林在昆采沃别墅。他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有在克里姆林宫露面了。他最后一次去克里姆林宫是2月17日接见印度大使梅农的那一天。<sup>1</sup>

警卫们没有见到斯大林,一开始他们并不感到吃惊。但是,他的一名“贴身警卫”M.斯塔罗斯京在发现这座“近处的别墅”常见的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以后,决定查个究竟。他以送邮件为借口进入了斯大林的房间,眼前的情景使他震惊,斯大林躺在地板上,发出阵阵呼哧声,但却不能说话。此时是夜里11时。

警卫扑向电话,开始呼唤首长。直接首长——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吩咐给“上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格·马·马林科夫和拉·帕·贝利亚打电话。

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在3月2日凌晨2时抵达斯大林的别墅,他们看了看此前已被抬到沙发上的斯大林后,吩咐不要打搅他,就乘车离开了别墅。

上午9时,马林科夫、贝利亚、赫鲁晓夫和医生们一起在别墅露面。<sup>2</sup>

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马上从那里前往克里姆林宫,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已经在那里等待他们。上午10时40分,贝利亚、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洛夫、赫鲁晓夫、什维尔尼克、什基里亚托夫走进了斯大林的办公室,与这些党的领袖们一起进入办公室的还有在“医生谋杀案”侦查过程中被释放、1952年9月1日被任命为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局长的И.И.库珀林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党机关部指导员A.C.托尔卡切夫。

86 十分钟后,库珀林和托尔卡切夫走出了办公室。他们有许多要办的事情,库珀林要组织起草《关于斯大林病情的政府通告》,《通告》中说,斯大林的“脑溢血已经蔓延到对生命至关重要的脑区”。托尔卡切

夫和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人员负责把未来中央全会的参加者紧急召集到莫斯科。斯大林即将死亡,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克里姆林宫的这次会议很快就开完了,20分钟后,斯大林的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sup>3</sup>

当天晚上,贝利亚和随后赶来的其他苏共战友再次聚集在斯大林的办公室,在那里的“外人”只有库珀林和新任卫生部长 A. Ф. 特列季亚科夫(他也是在“医生谋杀案”后被任命的)。

3月3日,从莫斯科向所有中央委员发出立即前往首都参加中央全会的紧急召唤,中央全会的日程安排没有宣布。<sup>4</sup>

3月3日和4日,一些决定以后几年政治发展进程的决议起草完毕。几年后,这些决议的起草经过成为进行专门的、尽管不无偏颇的调查对象。在调查过程中发现,3月4日,贝利亚在和马林科夫商量后,拟制了一份预先分配国家重要职位的报告。

3月5日20时,“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sup>5</sup>开始召开。

赫鲁晓夫主持了这次会议。在收到苏联卫生部长特列季亚科夫关于斯大林健康状况的报告后,马林科夫首先发表讲话,他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委托他“向大家报告在成立党和国家领导班子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以便作为党的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联合决议予以通过。”但是,马林科夫刚开了个头,贝利亚就把话接了过去。现将贝利亚讲话的记录援引如下:“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认真讨论了斯大林同志不在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中后形成的我国形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政治局认为,现在就任命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是必要的,政治局提议任命格·马·马林科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治局成员一致同意推举马林科夫同志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我们相信,您一定会同意,在我们党和国家的这一严重时刻,我们只能有一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位的候选人——候选人马林科夫同志(许多人在座位上高喊:“正确!同意!”)。

马林科夫得到支持后继续讲话。他宣布,建议由贝利亚、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担任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提出了一揽

子干部调动和任命建议,其中包括把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为内务部,任命拉·帕·贝利亚为内务部长,维·米·莫洛托夫为外交部长,尼·亚·布尔加宁为武装力量部部长。他还提出了把许多部合并的建议。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个具有原则性意义的建议:“按照党章的规定,苏共中央委员会将只有一个机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再有两个机构——主席团和主席团政治局。”

但是在实际操作时被取消的不是主席团政治局,而是主席团本身,主席团人数被减至原先主席团常委的规模,这多少使遵守党章的努力黯然失色。原来主席团人数为25人,现在主席团只有11人和4名主席团候补成员。主席团成员有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主席团候补成员有什维尔尼克,波诺马连科,梅利尼科夫,巴吉罗夫;中央书记是伊格纳季耶夫,波斯佩洛夫,沙塔林。从1953年3月7日《真理报》刊载的这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中可以看出,主席团成员中已经没有斯大林的名字。

3月5日会议上发生的人事变动至关重要,然而从苏共党章的观点看是不合法的,其不合法的程度不亚于其重要程度。这些人事变动的非法性是一目了然的,可不是吗?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竟然需要以苏共中央全会、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合决议的形式出现。党机关和国家机关联合作出决议,这在以前还没有过先例,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给对苏共十九大决议进行如此重大修正披上合法的外衣。<sup>6</sup>

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实际上操纵着国家惩戒部门的格·马·马林科夫得到了斯大林原先担任的国家职务——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他近几年的盟友(拉·帕·贝利亚)当上了一个新成立的部(由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而成,仍使用内务部老名称)的部长,国家安全部与内务部之间的角逐从此成为历史,贝利亚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法庭、拘押场所、工业企业的庞大部门的首领,这个部门实



实际上可以对国家内外政策的任何问题实行干预(对国内政策问题的干预通过侦察机关实施)。极其重要的一点是,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合二为一以后,完全排除了未经贝利亚批准收集反对他的材料的可能性,他成了有关他同事以往活动材料的独占者,拥有监督他们行动的所有可能性。

已经得到武装力量部部长职位的尼·亚·布尔加宁成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斯大林死后再度出任外交部长的维·米·莫洛托夫也成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值得注意的是,连拉·莫·卡冈诺维奇也成了部长会议副主席。在斯大林生命的最后几年中默默无闻的克·叶·伏罗希洛夫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

尼·谢·赫鲁晓夫和他们不同,他没有得到任何国家职务,仍然“只是”个苏共中央书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88

给人造成了这么一个印象:赫鲁晓夫的这些党内战友都争先恐后抢占苏联部长会议的领导职位。这显然是由于他们认为,国家机构是权力的主要源泉,在政治上继承斯大林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位要比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这一职务重要。这种推测并非没有根据。

按照政治传统,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主持政治局(后改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大部分党的决议只有通过国家机关才能付诸实现。因此,大家都认为,谁控制了国家政权,谁决定党的政策。

可以看出,每一次重新配备党的最高层领导人都明显具有独特的连续性,这样做一方面可以使战后斯大林在党内的领导地位得以巩固,另一方面可以使斯大林周围的那些“势不两立的朋友”之间的矛盾保持下去。从马林科夫在3月5日的那次会议上的讲话可以看出这一点,他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委“委托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同志采取措施,整理斯大林同志使用过的和已经存档的文件和公文。”<sup>7</sup>接触斯大林的档案资料意味着可以利用斯大林遗产中的权力杠杆,当时我国只有三个人有这种权利。谁负责斯大林的档案资料这一经常被谈论的话题成了是否属于后斯大林时期苏联正宗政权的指示器。

阿·伊·米高扬和维·米·莫洛托夫本来已经丧失了在一九大后组成的主席团常委的地位,现在他们回到了主席团。

M. Д. 巴基罗夫和 П. К. 波诺马廖夫成为主席团候补成员。M. Д. 巴基罗夫历来被视为“贝利亚的人”。П. К. 波诺马廖夫是党机关一名经验丰富的工作人员,先后担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游击运动总参谋长、苏联采购部部长,与拉·帕·贝利亚有过多年的合作。尼·米·什维尔尼克仍然是主席团成员,但不是主席团常委成员。中央书记的组成发生了重大变化,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和 H. H. 沙塔林当上了中央书记。谢·杰·伊格纳季耶夫是“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的制造者之一,在阿巴库莫夫被捕后当上了国家全部副部长,他是约·维·斯大林和格·马·马林科夫给国家全部下达的那些任务的忠实执行者。H. H. 沙塔林原任苏共中央干部部第一副部长(当时格·马·马林科夫是这个部的部长)。<sup>8</sup> 彼·尼·波斯佩洛夫也当上了中央书记,他是一名党内宣传家。

89 格·康·朱可夫当时被从他指挥的那个军区所在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叫去参加中央全会。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莫洛托夫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看得出来,他为眼前发生的事情侷促不安;伏罗希洛夫——一副明显惘然若失的样子,从他的外表难以看出他是不是惶恐不安,是忧虑重重,或者压根儿就没有自己的主意,以前斯大林在世时,也可以看到他在工作时有这副样子。另一种可能是,他还不相信斯大林不可避免要死去,所以决定暂时再等一等,等待时机;马林科夫、赫鲁晓夫、贝利亚和布尔加宁情绪高昂,看来要比其他人更了解斯大林很快就要逝世。他们对斯大林在世时国家现存秩序的那些议论和批评说明,当时他们百分之百相信斯大林很快即将死去,所以他们胆大气壮,不怕说出自己的意见。贝利亚坐在布尔加宁的旁边,极力装出一副心慈面善的样子。如果认真观察一下,还是能够从他那尽管戴着眼镜的眼睛中看出他的狡猾和冷酷无情。很显然,他是想以这副放肆的样子告诉别人:‘够了,什么斯大林的秩序,斯大林在世时让我们受够了,从今以后一切将是另一个样子。’

……其他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面部毫无表情,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和斯大林在世时一个样。大多数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心情沉重,大多数人确实为斯大林的病情担忧。当时不可能有其他的想法,斯大林毕竟是公认的权威和领袖。”

联席会议持续的时间不长——40分钟,在20时40分结束。

一个多小时以后(21时50分),医生们确认:斯大林死了。

斯大林死后,马上在他的办公室又召开了一次会议。根据斯大林会客室秘书记录,第一个进入办公室的是贝利亚,随后依次是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米高扬晚一些时候才进去。斯大林的遗产已经被瓜分完毕,该举行葬礼了。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米·安·苏斯洛夫和彼·尼·波斯佩洛夫、中央书记H. M. 别哥夫、《真理报》总编Д. T. 谢皮洛夫等人被指定负责葬礼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

葬礼必须有其他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参加,指定中央外交委员会主席B. Г. 格里戈良负责与外国共产党联系。

前武装力量部部长亚·米·华西列夫斯基、前国家安全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国家安全部副部长里亚斯诺伊、莫斯科军区司令П. A. 阿尔捷米耶夫、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管理处处长H. K. 斯皮里多诺夫被指定负责葬礼的组织和安全保卫工作。

需要给斯大林的尸体涂防腐剂,为此叫来了卫生部部长特列季科夫。

会议一直开到下半夜。会议的主要参加者到早晨4时左右才离去。

第二天,各报纸和广播电台报道了斯大林逝世的消息,宣布全国哀悼四天。

在克里姆林宫,每天都召开工作会议,一些外交官、宣传人员、军人和医务工作者被叫到那里去。所有主席团成员几乎每天都参加开会, 90  
每次开会时总是贝利亚第一个跨过斯大林办公室的门槛。

宣传部门号召永远纪念斯大林——天才的领袖和导师,马克思一

恩格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计划广泛宣传斯大林的遗产。宣布在国内兴建“永远赞颂苏维埃国家伟人的纪念堂”，把装弗·伊·列宁遗体的石棺和装约·维·斯大林遗体的石棺，以及埋葬在克里姆林宫宫墙旁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杰出活动家的遗体移到那里去。

在修建纪念堂之前，斯大林的遗体应该放在列宁—斯大林墓里。开始为修建纪念堂发动全民捐款。计划把纪念堂建在克里姆林宫对面，位于莫斯科河岸边的索非亚沿岸街，或者位于离莫斯科大学高层大厦不远，在从克里姆林宫到列宁山<sup>9</sup>的直线上。此外还提出了其他选址方案。

全国人民陷于深深的悲痛，这种悲痛之情是真实的。斯大林是国家政权的化身，如同我国历史上常有过的那样，他也是自己国家的化身。他的去世引起了人们不安——将来怎么办？数十万莫斯科人来到工会大厦大厅同斯大林告别。告别仪式的组织工作糟糕透了，由于过于拥挤，数百人被挤伤。

1953年3月9日，斯大林的遗体在礼炮齐鸣声中被放进陵墓。在追悼仪式上，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贝利亚先后发表讲话，他们每人按照自己的方式宣誓忠于列宁—斯大林的事业。

### **拉·帕·贝利亚的改革和 对战后政治进程的重审**

斯大林去世了，死人不应该妨碍活人。如果把斯大林尊为“圣者”，可能成为实现早就应该进行的变革的巨大障碍，而当时是需要进行重大变革的。国家不能够养活自己的人民，即便在莫斯科，连最普通的食物——土豆也严重短缺。苛捐杂税使农民沦为赤贫，他们中许多人一有可能就设法离开农村。国内有两支大军，一支是实际上按照战时编制生活的大军，另一支是“伟大的共产主义建设工地上”（建设水电站、道路、大工厂）的劳动大军，这两支大军在数量上相差不多。这意味着人们必须按照强加给他们的所谓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生活，必

须放弃商业活动,放弃商品货币关系。几乎人人都心知肚明,这一类的新玩意儿是多么荒诞无稽。所以,应该少花点时间给斯大林办理丧事,“悄悄地”挡住对他的敬仰浪潮,削弱他的“理论遗产”的影响。

葬礼后的第二天(3月10日),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发表讲话时对苏联的报刊提出了批评,要求“……我们认为必须停止个人崇拜的政策”,命令中央委员会负责宣传工作的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加强对报刊的监督,指定赫鲁晓夫密切注视那些打算发表的有关斯大林的材料。<sup>10</sup>

随后发生了一些令人惊讶的事情。3月14日(斯大林死后第九天),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sup>11</sup>,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认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兼任苏共中央书记是不合适的”(全会的决定中这样写道)。斯大林的政权组织系统的基石轰然倒塌——这显然出于把党的权力同国家权力机关分离开来的想法。马林科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还可以主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因为只有一名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赫鲁晓夫)没有国家职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组成实际上是对苏联部长会议领导权的一种重复。

原先开足马力进行的“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的侦查工作和试图把该案更名为“反革命医生谋杀案”的努力由于斯大林的死亡被绊了一跤,然后爬了起来。早在2月份,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就已经批准逮捕马丽·魏茨曼医生——仅仅因为她是以色列第一总统 H. 魏茨曼的妹妹而被定罪;被批准逮捕的还有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著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Л. П. 戈诺尔,他在战时任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制造厂厂长、战后负责导弹武器生产工作。此外,还从审讯前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和前格鲁吉亚安全部长 H. M. 鲁哈泽的审问记录中找到了准备逮捕的候选人。1953年3月5日,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向马林科夫、贝利亚、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呈送了一份报告(原报告上的排名次序就是这样的!),报告中说,军队中有人议论斯大林的死因,从窃听到的这些议论中看,有一些反犹太人的议论值得引起注意,例如,有的



人说,斯大林的病是卑鄙的犹太人医生下毒手的结果。

随着斯大林的去世,仿佛突然间一切都发生了改变:3月17日,贝利亚给马林科夫送去一份审讯记录,被审讯的一名女公民说,前国家安全部副部长 M. Д. 留明逮捕她的丈夫后企图进入她的住所。贝利亚因此得出结论说:“留明是在侦查工作中造假和歪曲真相的组织者,我已经指示逮捕留明。”于是马上开始重新审理对“医生谋杀案”参加者提出的指控,从被侦查者那里得到了有关对他们使用过“侦查技巧”的详细供述。<sup>12</sup>然而,对于贝利亚来讲,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当上了内务部长的贝利亚开始重新审理战后时期的那些政治诉讼案。

92 新部长的第一道命令是,要求成立一个重新审理一系列大案要案的侦查小组,这些大案要案包括:“被捕医生案”(请注意,使用的术语变了!),“被捕前苏联国家全部工作人员案”,“被捕前苏联军事部总军械局工作人员案”,“被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全部逮捕的当地工作人员案”。指定由苏联内务部副部长 C. H. 克鲁格洛夫、B. 3. 科布洛夫和内务部第三局(侦察和反侦察局)局长 C. A. 戈格利泽负责重审这些案件。

1953年4月2日,贝利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五份关于 C. M. 米霍埃尔斯被杀害的报告。报告中说,同米霍埃尔斯相识成了指控 M. C. 沃夫西、B. B. 科甘、A. M. 格林施泰因医生以及莫洛托夫的妻子 П. C. 热姆丘任娜从事恐怖活动和间谍活动的根据。报告指出,对米霍埃尔斯的所有指控都是伪造的,他被杀害的真正组织者是斯大林、阿巴库莫夫、C. И. 奥戈利佐夫和前俄罗斯国家安全部长 Л. Ф. 察纳娃。<sup>13</sup>

第二天(1953年4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基本上是同年1月9日开会的那些人),就苏联内务部关于“反革命医生谋杀案”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议,这一次主席团成员们作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

“(一)采纳苏联内务部的如下意见:

(1) 给因所谓的‘反革命医生谋杀案’被捕的医生及其家庭成员共计 37 人彻底恢复名誉,解除对他们的拘押;

(2) 追究严重歪曲苏联法律、制造这一挑拨离间性案件的前苏联国家全部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

(二) 批准报告的附件。

(三) 责成前苏联国家全部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就国家全部严重歪曲苏联法律和伪造侦查材料问题作出解释。

(四) 贝利亚同志已指示内务部采取措施避免内务部机关在今后工作中出现类似的问题,希遵照执行。

(五) 鉴于现在已查明真实情况,撤销苏联最高苏维埃 1953 年 1 月 20 日关于授予 Л. Ф. 季马舒克医生列宁勋章的不正确命令。

(六) 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如下建议提交苏共中央全会审批:

‘鉴于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同志在领导前苏联国家全部中犯有严重错误,我们认为不能再让他担任苏共中央书记职务。’

(七) 将本决定连同拉·帕·贝利亚同志的报告和苏联内务部专门侦查小组的意见分发所有苏共中央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一书记、各边疆区和各州的党委第一书记。”<sup>14</sup>

应该指出,在这宗臭名昭著的案件中,伊格纳季耶夫只不过是一名走卒。这宗案件本来就是按照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开始办案的,在办案的所有阶段,斯大林和马林科夫都亲自督办和指挥。4 月 5 日,伊格纳季耶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4 月 28 日被免去中央委员。侦查的指针沿着相反的方向转动,背后的人物是谁逐渐明朗化,又一次试图通过侦查的途径查明本来就已经非常清楚的事情,侦查工作具有了新的政治色彩。是啊,“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应该结案了,但是贝利亚提出的方案未必能够使某些主席团成员和中央书记以及国家高级官员产生热情。出现了新的威胁,不仅危及一些“代上级受过的人”,而且危及高层的人物……

1946 年因“飞行员案”被判罪的一些军人和航空工业部门领导人

也被恢复了名誉。1953年5月26日,贝利亚向马林科夫报告说,在指控前航空工业人民委员 A. И. 沙胡林、空军司令员 A. A. 诺维科夫、空军总工程师 A. K. 列平、空军军事委员会委员 H. C. 希曼诺夫、空军订购总局局长 H. П. 谢列兹尼奥夫、联共(布)中央干部部的两名处长——A. B. 布德尼科夫和 Г. M. 格里戈耶夫的案件中,内务部没有找到犯罪的依据。<sup>15</sup>

开始采取措施让那些根据苏联国家全部特别会议的判决“被非法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迁移出去”的人返回家园。根据贝利亚的提议,准备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战争年代被专门移居的德意志人具有苏联公民地位的建议。<sup>16</sup>

除了为一些政治诉讼案的被告平反外,贝利亚还建议对当时的司法体系进行一系列改变。他提议在全国进行大赦,他在1953年3月26日写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中说,全国的监狱、劳动教养院、劳动改造营中的犯人共计2526402人,其中被视为特别危险分子的共计221435人。

贝利亚说,1947年有过对盗窃国家和私人财产、职务犯罪(集体农庄主席和生产队长,企业工程师和领导人职务犯罪)给予重惩的指示,现在许多被判长期徒刑的犯人是根据这一指示定罪的,他们不属于特别危险分子。劳动改造营中关押了许多因擅自离开工作岗位被判刑的人、病人和上了年纪的人。

贝利亚建议对将近一百万名刑期在五年以下的犯人、职务犯罪者、有10岁以下子女的女囚犯、未成年犯罪者、重病犯人和年迈犯人实行大赦。

1953年3月2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颁布“大赦令”,将近一百万被判五年以下徒刑的人走出了监狱,占苏联犯人总数的三分之一多!几个月以后,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对已被逮捕的贝利亚进行独特的政治审判时说,这次大赦是“廉价的蛊惑宣传”,根据《刑事法典》第58条。判刑的政治犯、杀人犯和匪徒不应该被大赦。

按照贝利亚的建议,打算取消苏联最高苏维埃 1948 年 2 月 21 日颁布的命令,根据这一命令,对于特别危险的国家级罪犯,可以判处他们终身流放!按照当时的政治术语,这一类罪犯包括间谍、恐怖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孟什维克分子、无政府主义者、民族主义分子、白俄、其他反苏组织和集团的参加者,以及“建立反苏联系统和从事敌对活动的危险分子”。此外,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有权对一些已经服满刑期的人作出终身流放的判决。据苏联内务部统计,在 1949—1953 年这一命令生效期间,共有 58218 人被长期流放。以贝利亚为首的苏联内务部向苏联政府和最高苏维埃提出的建议指出,这一命令违背苏联的所有立法法案,应予以撤销。<sup>17</sup>

内务部还建议限制特别会议的权力。特别会议属于非司法机构,它有权对被告作出直至枪决的惩处,有权把以前因被指控从事间谍、破坏和恐怖活动或参加反苏组织而被捕的人长期流放,有权强迫“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参加者和其他一些从事民族主义活动的人迁出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乌克兰西部地区。按照贝利亚的建议,特别会议的权力应该受到限制,它只有权审理那些“从工作考虑不可能移交司法机关”的案件,只有权采取不超过十年的惩戒措施。

苏共中央主席团本来准备通过一项决定,附上贝利亚的报告下发,要求“重新审查近些年联共(布)、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颁发的违背苏联刑事立法和向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提供太多惩戒职能的命令和决定”。<sup>18</sup>毫无疑问,重新审查这些命令和决定势必引起对原先被特别会议立案的案件进行重审。

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贝利亚的建议没有得到赞同。赫鲁晓夫在得到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支持的情况下宣布,他“坚决反对这一建议,因为这样一来就必须对整个逮捕、审判和侦查体系进行重新审查……判处 20 年徒刑或者 10 年徒刑,这个问题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因为可以先判 10 年,然后再判 10 年和又一次判 10 年。”<sup>19</sup>

1953 年 4 月 4 日,贝利亚签发了一份命令,这份文件中写道,禁止使用“残酷的‘审讯方法’——严重歪曲苏联法律,逮捕无辜苏联公

民……毒打被捕者，整昼夜用手铐倒铐双手……长时间不让睡觉，强迫被捕者脱光衣服，在寒冷的囚房中关禁闭。”命令中指出，刑讯逼供造成被侦查者心理崩溃，“有时甚至丧失人的道德面貌”，“侦查人员利用被捕者的这种状态造假，逼迫他们‘承认’从事反苏活动、间谍活动和恐怖活动。”

95 这份命令要求：禁止对被捕者使用“肉体作用措施”，“取消前苏联国家全部领导人在列弗尔托沃监狱和内部监狱设立的刑讯室，对所有刑具进行清理。”<sup>20</sup>

内务部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贝利亚就任内务部长后不久，就向马林科夫提出把原先属于内务部的全部企业和建筑工程移交出去的建议，其中包括把克里木北部边远地区专门建筑工程托拉斯、叶尼塞河专门建筑工程管理局、矿山冶金工业管理局移交冶金工业部，把水利工程设计院移交苏联电站和电气工业部，把内务部的工业企业分别移交石油工业部、交通部、建筑材料部、林业和造纸工业部、海运和河运部。

这样做势必导致使用劳动改造营犯人无偿劳动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劳动建设工程”停止存在，这些建设工程包括萨列哈尔德—伊加尔卡铁路，贝加尔—阿穆尔大铁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叶尼塞斯克大铁路，连接萨哈林群岛的海底隧道，以及从土库曼运河主干道到伏尔加—波罗的海水路的许多水利工程项目。<sup>21</sup>

贝利亚还准备把内务部的劳动改造营管理局（劳动改造营、教养院及其管理机构和军事化警卫部队）移交苏联司法部管辖。<sup>22</sup>

贝利亚的这些行动直接接触及苏联经济的最重要特征。那时的内务部不仅是一个惩戒机构，而且是一个工业生产部门。当时，内务部仅基本建设预算造价一项就是一个巨大的数字——1050 亿卢布。

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在人员编制方面开始发生巨大变化，许多因涉嫌“阿巴库莫夫案”被定罪的前国家全部工作人员在斯大林去世后，被平反，重返工作岗位，在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工作。乌捷欣少将又当上了秘密政治局局长，他的“帮手”是斯维尔德洛夫、利特肯斯和边



杰尔斯基；曾经担任过第九局（名声显赫的“九局”是国家高层领导人警卫机构）局长的库兹米切夫中将回到了内务部机关；“阿巴库莫夫”的主要被告之一赖赫曼中将被任命为内务部监督检查局局长。

阿巴库莫夫 1950 年根据政治局决议建立的另一个机构——第二特别处被保留了下来。第二特别处承担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电话交谈进行窃听和录音的任务（前面已经介绍过，这种做法在 1950 年前早已有之）。

贝利亚本人对内务部的一些最重要的机构实行监督，这些机构包括第三局（苏联陆海军侦察和反侦察局），第九局（政府警卫局），第十局（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管理局），干部局，密码局，侦查局，监督检查局，等等。

对于苏联历史中的拉·帕·贝利亚现象，还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96  
许多年中（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他一直是我国历史学家“忌讳”的人物。二十大和二十二大以后，他背上了恶棍和刽子手的坏名声，T. E. 阿布拉泽导演的影片《忏悔》使他的这一坏名声在改革时期的公众意识中牢固确定，这部影片赋予主要的反面人物（集极权主义的恶事于一身）以贝利亚的特征。在如何看待贝利亚上，逐渐形成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对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贝利亚是镇压的化身，是个人崇拜的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是阴险狡猾的大坏蛋。党的宣传工具支持这些评价，但是又试图把贝利亚和“脱离了党的监督的惩戒机关”凌驾于党和党的领导人之上，说什么党的领导人什么都不知道，所以他们不是往昔的罪人。所有这些评价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当然，贝利亚要对当局犯下的罪行负责，但是他只应承担他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责任，他的战友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甚至包括在不同时期被枪决的亚戈达、叶若夫、加米涅夫、布哈林、库兹涅佐夫，他们也应该承担各自的责任，更不用说斯大林了。可以这么说，与其他党的领导人、他的同志们相比，贝利亚的道德水准不比他们高，但是也不比他们低，这样说可能不合乎我国和外国几代研究苏共历史的人的心意，但这是明摆着的事实。

与自己的同事相比,贝利亚自有其出众之处。

在当时的领导人中,他无疑是消息最灵通的人,而且他所掌握的情况无所不包、准确性高,不受其他部门的制约。作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他所掌握的情况涉及国家经济现状、某些经济部门的现状,尤其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劳动建设工程”的情况;作为情报机关的领导人,贝利亚通晓许多政策和国际关系问题,了解苏联和其他国家之间产生的现实问题。

贝利亚直接负责核武器研制工作,这使他同军队建立了联系,使他了解新式武器装备,了解在导弹核武器出现后武装力量应该发生哪些变化。

他掌握着关于国内政治局势、人们思想情绪、不论什么样的抗议表现形式的最可靠情报。他未必意识到自己要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规模镇压负责,贝利亚是1938年秋天才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的,当时大规模镇压的高潮已经过去了。1939年,部分被镇压的人甚至被释放,这虽然不是这位新任内务人民委员的个人功劳,但是毕竟说明他不同于应对30年代的恐怖承担个人责任的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或赫鲁晓夫。

战后时期积累起来的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国家不可能再按照战时标准供养军队,监狱里关押着250万犯人,“伟大的建设工程”耗费巨资,农民仍然受到“残酷剥削”。世界上冲突四起,甚至不久前的盟友也成了新的敌人(如南斯拉夫),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关系随时有发生爆炸的危险。执政的官员阶层不稳定,他们随时面临镇压的威胁,这种状况使国家的管理能力削弱。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贝利亚成为意识到必须下决心进行改革的第一人。他开始以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身份干预一些不属于他直接管辖的国家生活领域,而且干预的力度越来越大,往往使人始料未及。后来,在对他进行批评成为一件完全没有危险的事时,分歧开始全面暴露。1953年7月2日到7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审议了“关于贝利亚反党和反对国家的罪行”问题。

例如,在国际关系方面,贝利亚坚持认为,首先必须尽快实现同南斯拉夫的关系正常化,消除斯大林时期遗留的意识形态冲突。按照马林科夫的说法,贝利亚曾经提出“不是纠正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而是让它放弃任何社会主义的方针,坚持建立资产阶级德国的方针。”<sup>23</sup>后来,这成为对前内务部长贝利亚的一条主要指控。尼·谢·赫鲁晓夫则指责贝利亚对党的领导作用估计不足。

赫鲁晓夫首先援引贝利亚说过的一段话:“中央委员会算什么?但愿部长会议决定一切,中央委员会只管干部和宣传工作。”

然后赫鲁晓夫对全会的参加者说:“他这样说让我大为吃惊。这说明贝利亚想取消党的领导作用,使党的作用仅限于干部和宣传工作。难道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难道列宁和斯大林教导过我们这样对待党?贝利亚看待党的观点和希特勒的观点没有任何区别。”<sup>24</sup>

维·米·莫洛托夫随声附和赫鲁晓夫说:“从3月份起,我们这里就开始出现不正常的现象……为什么把所有国际政策问题都交给部长会议主席团讨论,违背了布尔什维克的老传统,不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了……所有这一切都是贝利亚施加压力造成的。”<sup>25</sup>

作者在这里想提请读者注意,贝利亚曾经主张在苏联实行更为积极的民族政策<sup>26</sup>,主张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干部应该主要由本共和国的人担任,这项工作在他领导的内务部中得到了顺利进行。显而易见,贝利亚的这一主张触犯了机关中最神圣的东西——干部任免规则。按照常规,当时列·伊·勃列日涅夫可能被任命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而潘·孔·波诺马连科可能被任命为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

但是,后来的情况表明,贝利亚的地位根本不是人们所想像的那么稳固。首先,在国家的党机关中没有人支持他,他同苏共中央机关本身的活动缺乏联系。在苏联部长会议中,他的活动范围十分狭窄。研制核武器的工作极其重要,但它属于活动范围较为狭小的经济和工业部门。他在内务部中的地位也完全不是不可动摇的。请读者注意,他在1945年12月已经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了,只是在1953

年才重新当上内务部长,此时的内务部是由两个相互敌对的部门——国家全部和内务部组成的,因此,新成立的这个内务部不可能是团结一致的。此外,大量 20 世纪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被逮捕的前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走出监狱,回到新组建的内务部工作,他们中许多人被贝利亚委以重任,造成了新的矛盾和冲突。

这个由两个部合并而成、老矛盾成堆、在多不胜数的镇压运动中受过特别技能训练的部门,当然从来没有从中央委员会政治领导人的视线里消失过。随后发生的一些事件表明,中央领导人对重新审查“医生谋杀案”和改变惩戒政策不满意。新组建的内务部根本不是贝利亚可以依靠的“独块巨石”。

在克里姆林宫走廊展开的权力斗争中,贝利亚面临强有力的竞争对手,首先是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此前不久,马林科夫直接领导过惩戒部门的工作。在党的机关中,他的地位牢固,大家都知道他多年担任苏共中央干部部长。另一个竞争对手是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他继承了斯大林的这一党内职务,受到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的支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是 20 世纪 30 年代在莫斯科的老同事,当时赫鲁晓夫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布尔加宁任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

种种迹象表明,贝利亚和他的同志们(党的领导人)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不可避免。贝利亚利用档案部门归内务部管辖的有利条件,指示中央档案局局长 Д. С. 斯特罗夫收集诋毁马林科夫的材料。果然,在红军中央国家档案馆和契卡洛夫州国家档案馆找到了这样的材料。<sup>27</sup>

由于种种原因,贝利亚成了许多人心目中越来越危险的人物,各种各样的人害怕他,恨他。在一些人看来,贝利亚是一个企图重新评估斯大林政策基本理论的修正主义者,是一个坚持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于 1953 年 5 月 9 日通过的《关于节日期间游行队伍和建筑物装饰的决定》的人,是一个取消盛大活动中悬挂领导人肖像这一惯例的人。他的这种对苏联党和国家政权“非神圣化”的做法使党的各级领导人十分恼火。

在军方高层人物看来,贝利亚是个危险的敌人,是 3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镇压运动的可恶的“将军”，把他的名字同战后时期对高级指挥员的迫害联系在一起（这并非没有根据），贝利亚安插在苏军中的“特别处人员”对于任何指挥员来讲都是形影不离和难以预测的威胁。所以他们特别痛恨这一帮人。

请允许作者不揣冒昧推测，贝利亚亲自参与领导导弹核武器研制工作，以及由此引起苏军结构和兵种作用发生不可避免变化，这也不是军队高级将领们所喜欢看到的。 99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各地的内务机关和当地的权力机关“平起平坐”，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待遇不错，他们什么都干预，却什么责任也不承担。所以，无论是党和国家的官员，或是经济部门的领导人，都把他們视为危险人物。

### 拉·帕·贝利亚的覆灭

贝利亚在1953年6月2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或者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在当时的情况下，无论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或者召开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会议都一个样）上被宣布逮捕。他的覆灭是私人关系密切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协商一致的结果<sup>28</sup>，和他们一起实施逮捕行动的主要当事人有：武装力量部部长布尔加宁，朱可夫元帅，以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其他一些成员。这次有预谋的行动曾经被多次描述，大量的回忆录记述过贝利亚被捕的详细情况。<sup>29</sup>党的惩戒传统得以保留，并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发扬光大。逮捕贝利亚的方式和逮捕前联共（布）中央书记阿·亚·库兹涅佐夫的方式差不多，库兹涅佐夫是在走出马林科夫的办公室时被“擒拿”的，贝利亚则是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被逮捕的。军队高级将领的代表人物扮演了技术执行者的角色，其中包括莫斯科军区司令莫斯科连科将军和朱可夫元帅。<sup>30</sup>

但是，这里面有许多没有明说的事情：成为贝利亚凶恶敌人的他的战友们一口咬定贝利亚是阴险狡猾的阴谋家和恶棍，却避而不谈自己



行为的内心动机。在回忆录里说自己阴险狡猾和搞阴谋,这当然不是很好说的话题,这种话题会引起未来几代的历史学家们产生许多推测:像1953年6月26日发生的这类事情在准备过程中一般是没有多余的公文的,只有在特殊的情形下才可能记入档案。作者在列举这些事实前想提请读者们注意,“医生谋杀案”和“阿巴库莫夫案”后来继续一变再变,昔日的侦查人员成了被侦查者,并且从他们嘴里敲出了供词——谁是他们的“订货人”?

6月25日,即在贝利亚被捕的前一天,他给马林科夫送去了审问留明的审讯材料,这些材料清楚地表明,留明的直接领导人是伊格纳季耶夫。留明的供词令人信服地证明,伊格纳季耶夫不仅在“医生谋杀案”上制造假口供,而且在“列宁格勒案”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上造假。

贝利亚写道:“留明在伊格纳季耶夫的赞同和授意下对被没有根据逮捕的公民广泛使用肉体作用措施,伪造侦查材料。”<sup>31</sup>

留明的这些供认势必导致伊格纳季耶夫被逮捕,从而不可避免将导致马林科夫被侦查。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对“医生谋杀案”和40年代末50年代初其他一些政治诉讼案的前因后果进行调查,将首先危及马林科夫的政治生命。因为贝利亚进行了这种侦查,所以正是他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的危险的对手。可想而知,马林科夫一心一意想除掉贝利亚。

贝利亚被逮捕后,国家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制定出一系列重要的国内政策,其中包括:在1953年6月中央全会上由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亲自正式宣布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评,对“没有根据的镇压”的谴责,并且把所有镇压的责任全部推到贝利亚身上,不无成功地把贝利亚变成这些镇压的象征。“贝利亚案”所引起的巨大社会反响值得注意,不管它的实际内容如何,这一案件已经具有象征性的意义,意味着开始同斯大林时期决裂。

贝利亚就这样被逮捕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不想等待法庭判决,于6月26日(逮捕贝利亚的这一天)颁布了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签署的命令,剥夺了贝利亚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资格,撤除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收回了授予他的所有称号和奖赏,把他本人送交法庭审判……

贝利亚曾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被授予过苏联元帅。在为斯大林举行葬礼时,他代表苏联领导人发表讲话,宣布自己为斯大林的政治继承人,声称斯大林死后通过的一项最重要的、“旨在确保对国家实行不间断和正确领导”的决议是,“列宁的天才学生和斯大林的忠实战友格奥尔吉·马克西米利安诺维奇·马林科夫被任命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此后不到4个月他就被逮捕了。

1953年7月2日到7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讨论“贝利亚的反党和反对国家的罪行”问题<sup>32</sup>。请读者注意,这次中央全会和其他一些讨论干部问题的中央全会一样,是党的高层人物“公众意见的真实记录”。当时,对于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官方观点还来不及形成和奉为经典,党的领袖们可以各抒己见,大家所议论的问题要比提到议事日程上的问题更为广泛。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对贝利亚一案有三种观点。马林科夫首先提出了他的观点。他在全会上的声音当然具有特殊的意义,所有后来的发言者都表示同意他的发言,赋予他的发言以特殊的分量,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H. A. 米哈伊洛夫是个典型例子,他说:“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一针见血揭示了党和苏联人民的敌人贝利亚的卑鄙、挑拨性的反苏活动。马林科夫同志的报告还阐述了我党面临的最重要任务。”尽管马林科夫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但是当时已将他视为党内头号人物和国家的最高公职人员。 101

马林科夫指控贝利亚的依据是什么呢?

他说,贝利亚企图分析各加盟共和国领导干部的民族成分和用当地的干部取代他们。马林科夫列举的主要的指控事实取自乌克兰利沃夫州内务局局长的报告。

他指控贝利亚违背中央委员会1952年12月4日《关于国家内务部现状和关于医疗工作中从事危害活动的决议》,违背《决议》中提出

的关于“消除对国家全部的工作监督不力的现象并使国家全部的工作置于中央和地方的经常性监督之下”的要求,以加强警卫工作为借口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全面监视。

他还指控贝利亚干预国家制定的国际政策,主张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sup>33</sup>,放弃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

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还对贝利亚实行大赦提出了如下批评:“我们认为……实行大赦这一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贝利亚的真面目暴露以后,我们才认识到,他这样做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有他自己的计划和打算。”(请读者注意,他说得有点儿含糊其辞,或者说小心翼翼,而他的同事们在谈及这个问题时则要比他明确得多)

马林科夫最后指控贝利亚要对斯大林不正确评价莫洛托夫和米高扬一事承担责任,说斯大林之所以对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有看法,是因为“受到了内务部心怀敌意分子诬蔑诽谤的影响”。马林科夫认为,贝利亚在这件事上是有责任的。

赫鲁晓夫的观点稍有不同。如同他后来的历次讲话一样,赫鲁晓夫爱“饶舌”,而且爱讲“粗话”,经常唠叨一些可能与他本人观点自相矛盾的事情。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去世以前,他听到了贝利亚想当内务部长和“企图抢占对政治局成员实施间谍活动的阵地”的消息后,大概有一天一夜坐立不安,并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布尔加宁(看来,了解贝利亚提出的关于斯大林死后权力分配意见的人不止马林科夫一个人)。

赫鲁晓夫指控贝利亚制造类似“医生谋杀案”、“缅格列尔案”的“假案”。

他还语无伦次地(这当然不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的优点)指控贝利亚让一些被不公正判罪、但是在斯大林死后获得自由的人担任高官。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讲述贝利亚企图划清党和国家的权力界限,使党的各级组织的影响力仅限于干部问题。他说:“这是由于他(贝利亚——作者)认为,党的作用应该退居次要位置。”赫鲁晓夫据此断言,

贝利亚本来就想消灭党。

请注意,马林科夫在讲话中根本没有涉及党的领导问题。

赫鲁晓夫不厌其烦和添油加醋地讲述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领导人经常面临来自内务部的威胁,说什么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实际上不受中央和地方的监督。请看这次中央全会速记记录:

赫鲁晓夫对中央全会的参加者说:“同志们,我是一个旧制度的过来人(笑声)。我第一次见到宪兵大概是在我24岁的时候。我所在的矿上没有宪兵,只有一个经常一边走路一边喝酒的哥萨克人警察,我们乡里头也有一名警察。而现在我们的每一个地区都有内务局局长,他手下有一大帮工作人员和侦缉人员。内务局局长的工资最高,拿的钱比区委书记还多。

座席上有人说:比区委书记多一倍。

赫鲁晓夫:他既然拿那么多的工资,就得表现表现自己……于是一些工作人员就开始制造假案,做出下流的勾当。”

赫鲁晓夫毫不吝惜对贝利亚使用修饰语——下流的东西,挑拨离间者,帝国主义的走狗,聪明的,阴险狡猾的,背信弃义的……把贝利亚说成是苏联所有问题(从40年代末50年代初政治诉讼案和外交政策问题到农业歉收和城市居民吃不上土豆)的罪魁祸首。

请注意,赫鲁晓夫的讲话中有几点至关重要。

首先一点,赫鲁晓夫强调指出,党的领导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放弃党的领导意味着中了贝利亚的歪门邪说!这样说使他无形中赢得了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的支持,使党的机关在除掉贝利亚后保持稳定和平静。赫鲁晓夫把所有镇压、所有制度的罪责都推到贝利亚身上,让贝利亚充当主要的、即使不是惟一的“替罪羊”,这种做法不仅让人始料未及,而且极其富有成效(在后来几十年中仍在起作用)。

赫鲁晓夫的观点得到了莫洛托夫的支持。莫洛托夫回忆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人选是贝利亚提出的,而不是苏共中央书记赫鲁晓夫的意见。他还对审批程序提出了批评,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经常不经过苏共中央书记签字(斯大林是要签字的)就被悄悄地通

过了。很难对莫洛托夫的观点作出其他解释,他不外乎是想与赫鲁晓夫结成同盟,以便对付将来可能成为他们对手的马林科夫。显而易见,马林科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回避权力(党的权力和国家权力)划分问题对他是不利的。莫洛托夫用十分肯定的口气指出,贝利亚是促使斯大林在30年代和40年代搞大规模镇压的阴谋家,这说明莫洛托夫是很有预见性的,因为暂时把这一时期镇压的责任都推到贝利亚身上,就可以把在贝利亚来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成为斯大林的亲信的一些人——

103 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加里宁……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

斯大林时期政治局的老成员——拉·莫·卡冈诺维奇和安·安·安德烈耶夫的发言代表第三种观点。他们在评价贝利亚时没有大骂一通,只是泛泛地说他是“反对国家的罪人”,“法西斯阴谋家”,“间谍”,“想为复辟资本主义而进行夺权的敌人”。

引起卡冈诺维奇和安德烈耶夫勃然大怒的是些什么事情呢?是贝利亚的“大赦”计划。他们认为,被大赦者可能成为“贝利亚法西斯匪帮的核心力量”。卡冈诺维奇指责贝利亚“用最不堪入耳的侮辱性语言侮辱和描述斯大林,说什么我们现在应该按照新生活……贝利亚急不可耐,越来越猖狂,充分说明他是个急于往上爬的人,是个冒险家。他想破坏斯大林的威信,毁坏我们赖以生存和扫清道路的基础。他想破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基本理论……斯大林是列宁、马克思恩格斯事业的伟大继承者,贝利亚对这种说法怀有敌意。今天,我们除掉(!)了贝利亚这个叛徒,我们应该完全恢复斯大林的合法权力,把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更名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理论(掌声)。”卡冈诺维奇继续说道:“对于我们来说,党高于一切……对于我们老布尔什维克来说,中央委员会是党对全党和全国的各个领域实行政治和经济领导的机构。”

安·安·安德烈耶夫附和卡冈诺维奇说,贝利亚“开始损害斯大林同志名字的威信,往列宁之后最伟大的人脸上抹黑。实际上,在主席团关于医生、格鲁吉亚等案件的会议记录中,就有贝利亚签字的材料,怎么能往斯大林脸上抹黑呢?要知道这是他的事情。”



大厅里的声音：正确。

安德烈耶夫：他是故意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葬送斯大林的名字和轻而易举篡权……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了个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要知道，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这个问题早已经解决，在生活实践中也早已经解决。广大人民心中很清楚，群众运动的天才领导人具有多么重要的作用，列宁和斯大林过去和现在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为什么还要提出个人崇拜的问题，这是贝利亚在搞鬼。

伏罗希洛夫在主席台上说：完全正确。

安德烈耶夫：他想葬送斯大林的名字。他不但想葬送斯大林的名字，而且把矛头指向斯大林同志的继承人马林科夫同志。

大厅里的声音：正确。

马林科夫：我们大家都是继承人，斯大林同志不可能只有一个继承人。

安德烈耶夫：您是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同志担任过这个职务。

大厅里的声音：正确（暴风雨般掌声）。”

请读者们注意一个事实，指控贝利亚依据的主要事实是，内务部干预党机关的工作，甚至党的高级官员在内务部工作人员面前也处于无权地位。这些事实主要取自乌克兰党组织提供的材料。

104

在苏联共产党内部，习惯上把关于领导人变动的决议称为组织问题。“组织问题从属于政治，组织问题和政治密切相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拉·莫·卡冈诺维奇这样说道。他的话言简意赅，但是不那么让人明白易懂。一些活动家在政治上（有时是肉体上）消失，另一些活动家出现在党的“权威性评议会”上，这本身比说什么话都更加清楚反映了现实力量的分布情况和未来的政治前景。

全会结束前几个小时，赫鲁晓夫向与会者提出了中央机关领导人组成变动的建议，他说：

“同志们，1953年4月28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将伊格纳季耶夫同志从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组成中除名的决议，你们都了解这个问题，未必应该详细报告。有人建议现在就重新审议这个问题，恢

复伊格纳季耶夫担任苏共中央委员的权利。

叫喊声：正确。

赫鲁晓夫：因为这个决议是根据众所周知的诽谤作出的，所以应该马上重新审议和纠正。”

同志们进行了“重新审议和纠正”，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又当上了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所说的“众所周知的诽谤”是指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1953年4月28日通过的决议，该决议中说，“医生谋杀案”是国家安全部从中挑拨的结果，国家安全部长谢·杰·伊格纳季耶夫应对此承担责任。

谢苗·杰尼索维奇·伊格纳季耶夫重新当上了中央委员，后来又给他从政治上恢复名誉——把他调到巴什基尔担任州委第一书记，再也没有提起他曾经参与执行格·马·马林科夫及其在苏共中央和国家安全部的战友们所作出的那些决定。

朱可夫元帅也突然间飞黄腾达，他从中央候补委员晋升为中央委员。

党的最高层领导人也发生了变化，拉·帕·贝利亚当然被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除名，在全会召开期间试图为贝利亚辩护的M. Д. 巴吉罗夫被免去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成员并被逮捕。

尼·谢·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工作时的老战友A. И. 基里琴科成为主席团候补成员。<sup>34</sup>

贝利亚的亲密战友C. A. 戈格利泽和B. 3. 科布洛夫被从中央候补委员中除名。

这次中央全会造成的政治后果难以估价，后来几年的国家政治局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贝利亚的敌人队伍中出现的那些分歧。

从这次中央全会与会者发言中可以看出，矛盾的焦点有两个——关于党在苏联社会中的作用和关于对斯大林的历史评价，关于使用“个人崇拜”这一概念是否合法。第三个问题是组织问题，乍看起来它是个局部问题，其实同前两个问题密切相关，如同拉·莫·卡冈诺维奇所说——“组织问题从属于政治”。这是一个涉及实现所谓“集体领

导”的途径问题。

这次中央全会的最重要成果大概是,不是在理论上而是以实际例子重申,党的领导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和各州、地区、工矿企业日常生活问题的最重要原则。从今以后,任何划清党的权力和国家权力的企图都将被视为“贝利亚反对国家和反党危害活动”的一种表现。这次中央全会的另一个成果是,苏共中央书记这一职务的重要意义得到了提高,尽管全会的参加者纷纷强调马林科夫在党内的特殊作用。在随后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1953年九月全会)上,决定设立由尼·谢·赫鲁晓夫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使他得以确立在苏联共产党中的特殊地位,这是一个完全符合逻辑的结果。从此,中央委员会秘书处成为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推行政策的工具,倘若说以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有一个“权威性评议会”(其成员包括兼任国家职务的尼·亚·布尔加宁,克·叶·伏罗希洛夫,拉·莫·卡冈诺维奇,格·马·马林科夫,阿·伊·米高扬,维·米·莫洛托夫,米·格·别尔乌辛,马·扎·萨布罗夫,尼·谢·赫鲁晓夫,候补成员 A. И. 基里琴科,潘·孔·波诺马连科,尼·米·什维尔尼克),那么现在秘书处则成了党内有实权的、被尼·谢·赫鲁晓夫控制的党的政权组织工具。

在权力角逐过程中,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联合起来对付贝利亚,但是他们俩都想方设法谋求自己的利益。两个以前的盟友一开始角逐,赫鲁晓夫就明显占了上风。

“二头政治”面临的第二个问题是,怎么评价斯大林的活动?允许不允许公开承认与他的活动有关的错误?这个问题更为复杂。贝利亚主张承认斯大林对政治镇压承担责任,请读者注意,这可能导致把责任从党的领导人和党那里转移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马林科夫很快就对贝利亚的这种观点予以肯定。早在1953年3月10日,马林科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发表讲话时就对苏联报刊提出了批评,他说:

“我们认为,必须停止个人崇拜的政策。”他命令主管宣传的中央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监督报刊,责成赫鲁晓夫注视打算发表的关于斯大林的材料。<sup>35</sup>他的这种立场没有在党的领导人中获得广泛支持,

从这次中央全会讨论这个问题时卡冈诺维奇和安德烈耶夫的发言、伏罗希洛夫在主席台上插话以及与会者表示支持的喊叫声中可以明显看出这一点。

在这次中央全会的形势开始“动摇”和因此可能导致“斯大林之鹰们”——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在政治上重整旗鼓的关键时刻(请注意,为斯大林唱赞歌的人数正是在全会快结束的时候陡然增加!),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表现出了谴责“个人崇拜”的坚定性。

106 马林科夫在致闭幕词时对全会的参加者说:“在这里,在中央全会上,有人谈到了个人崇拜问题,应该讲,他们说得不正确。我指的是安德烈耶夫同志的发言,在捷沃相同志的发言中也可以捕捉到类似的情绪。所以,我们必须澄清这个问题。

赫鲁晓夫:一些没有发言的人也有这样的想法。”

马林科夫批评宣传工作“落后于对个人在历史中作用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他接着说:“事情不仅仅在于宣传工作。个人崇拜问题与集体领导问题有直接的联系……同志们,你们应该知道,斯大林同志的个人崇拜在日常的领导工作中已经达到了近乎病态的不正常程度,集体领导的工作方法已被抛弃。在我们高层领导人中,根本就没有什么批评和自我批评。”

在马林科夫看来,“个人崇拜”意味着在党的头号人物恣意妄为和专横面前丧失自卫能力。他赞同“集体领导”的机制,认为“集体领导”在实践中应该表现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形成力量均衡,表现在以中央书记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同主持主席团会议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平起平坐。部长会议领导人(马林科夫本人,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莫洛托夫)在主席团组成中的广泛代表性应该成为防止“纯粹的”党的工作人员干预国家部门工作的可靠保证。

当时,在1953年7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明确表示他对“个人崇拜”持反对态度,但他不打算阐述自己对这一现象的观点。他要在晚一些时候、在苏共二十大讨论报告的过程中谈这个问题,给“个人崇拜”下一个自己的定义。然而,1954年到1955年发生在苏共二十大之

前的一些事件证明,对“个人崇拜”还有别的、完全不同于马林科夫说法的解释。

……官僚主义宣传机器的轮子由于惯性继续转动。4月16日,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所所长奥比奇金和中央列宁博物馆馆长莫罗佐夫给中央书记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信,建议把中央列宁博物馆更名为中央列宁—斯大林博物馆,并对扩建博物馆所需地皮面积和有关斯大林生活和工作的陈列品数量进行了详细计算。中央委员会对他们的建议表示同意,作出了关于扩建博物馆的决定。为了执行中央委员会的这一决定,需要把一些住户从博物馆所在地“历史胡同”迁走……

过了将近一个月(1953年5月14日),博物馆方面才收到了莫斯科公用事业委员会的答复,指出“莫斯科公用事业委员会没有能力让居住在‘历史胡同’6号楼的公民外迁……和满足奥比奇金和莫罗佐夫同志在信中提出的提供地皮的请求。”这一答复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奥比奇金和莫罗佐夫同志两人都是受人尊敬的苏共意识形态中心的领导人,他们是为了执行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申请地皮的,没有想到碰了一鼻子灰。

建造“伟人祠”的计划很快就“石沉大海”——好像从来没有过这回事。1953年9月,纪念斯大林的惟一一个展览——斯大林70寿辰贺品展也被取消。

在给“个人崇拜”下定义中,承认斯大林本人及其亲信首先是贝利亚,违反“党的生活准则”跃居首要位置。贝利亚成了党的历史的“脏水坑”,成为一切不符合关于党的作用的经典学说的源头,而对斯大林的评价则支支吾吾,转弯抹角:一方面……另一方面……在研究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著述中,至今仍能看到这种评价。

107

这次中央全会对贝利亚的政治审判立即引起了在内务部中进行大清洗。清洗的原则很简单:谁以前因阿巴库莫夫案被逮捕,后被平反回到内务部工作,就把谁清除出去。1953年8月22日,内务部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行政和商业金融机关部共同起草了一份题为《关于根除贝



利亚敌对活动后果》的报告<sup>36</sup>，呈送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交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亲阅。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工作时的助手、1953年3月被任命为秘密政治局局长的H. C. 萨济金中将其手下的工作人员斯维尔德洛夫、利特肯斯、边杰尔斯基、布林德被解除工作。内务部监督检查局局长Л. Ф. 赖赫曼中将、他的副职A. 3. 科布洛夫、助理什柳格尔被解除工作，不久就被逮捕。被解除工作和逮捕的还有：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Л. E. 弗洛齐米尔斯基中将，他的副职帕拉莫诺夫，警卫局局长С. Ф. 库兹米切夫中将，特种任务处领导人П. A. 苏多普拉多夫和H. И. 艾廷贡。在《关于根除贝利亚敌对活动后果》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按照贝利亚的指示、组织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谈话进行窃听和录音的第二特别处处长H. A. 卡拉肖夫已经被解除工作和逮捕。

与此同时，“伊格纳季耶夫带来的一批干部”被恢复了工作，他们于1951年同伊格纳季耶夫一道来到国家全部，又于1953年同时被解除工作。其中包括国家全部检查局代局长A. H. 别佐特维特内赫，第三局副局长米罗诺夫。和往常一样，一些经验丰富的共产党员被调到内务部工作，苏共无产阶级革命委员会书记B. И. 乌斯季诺夫当上了警卫局局长，内务部的许多领导人是根据党机关的提议任命的。这里必须指出，这种做法并不是什么新发明，号召共产党员奔赴国家全部岗位的做法早已有之。据作者掌握的材料，最后一次大规模动员共产党员奔赴国家全部发生在1946年，当年8月20日，政治局决定派遣6000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去新组建的国家全部工作。

清洗很快就波及各加盟共和国和州。

1953年12月，在苏联最高法院召开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拉·帕·贝利亚、B. H. 梅尔库洛夫、B. Г. 杰卡诺佐夫、B. 3. 科布洛夫、С. A. 戈格利泽、П. Я. 梅希克、Л. E. 弗洛齐米尔斯基被指控背叛祖国、组成反苏叛徒集团实施恐怖行动，并被判处死刑。<sup>37</sup>

108 阿巴库莫夫及其前国家全部的战友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1952年年底在马林科夫和斯大林亲自参与下拟订的老的指控结论已经不合时宜了，前面已经讲过，阿巴库莫夫当时被指控非但不揭发“医生谋杀

案”，而且阻挠侦查，说他是“列宁格勒案”的从犯，他手下的一些人是恐怖分子，同犹太人恐怖组织“Джойнт”有联系。

1952年4月30日，苏联最高法院为“列宁格勒案”涉案人员恢复了名誉。1954年3月3日（疑为5月3日之误——译者），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一项决定，委托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和总检察长P. A. 鲁坚科“向列宁格勒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传达这些决定”。<sup>38</sup>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公开指出“医生谋杀案”是一宗挑拨离间性案件之后，原先的那些指控看来已被全部推倒。

但是，苏联司法机关在执行苏共中央指示的道路上是不会遇到障碍的！1954年12月，亦即在审判贝利亚后过了整整一年，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在列宁格勒开庭审判维·谢·阿巴库莫夫、前苏联国家安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局局长A. Г. 列昂诺夫、部长秘书处处长B. И. 科马罗夫和副处长Я. М. 布罗维尔曼，对他们提起公诉的依据和原先相同，但指控结论却“倒了个”，原先指控阿巴库莫夫等人是“列宁格勒案”的从犯，这一回却指控他们是“列宁格勒案”的制造者。阿巴库莫夫等人试图证明，他们的行动不是独立的，是“上级机关”（指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的，但是无济于事，阿巴库莫夫、列昂诺夫、科马罗夫和利哈乔夫被执行枪决，布罗维尔曼被判处25年徒刑，切尔诺夫被判15年。<sup>39</sup>告密出卖阿巴库莫夫的那个人——M. Д. 留明也被判处死刑。

后来，国家安全部的另一些工作人员也受到了审判。在随后进行的侦查中，关于以П. А. 苏多普拉多夫和H. И. 艾廷贡<sup>40</sup>为首的国家安全部第四局的工作人员在国内外搞恐怖活动的材料被广泛利用。苏联国家安全部第四局承担的任务除了侦察以外，还包括直接窃取美国核计划的材料，不断向苏联科学院院士伊·瓦·库尔恰托夫和伊·康·基科因、苏联导弹核计划领导人阿·帕·扎韦尼亚金和鲍·利·万尼科夫提供这方面的情报。在卫国战争期间，在第四局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在敌占区活动的特别小组，共产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和多洛雷斯·伊巴露丽直接参与过该特别小组的组建工作，内务人民委员会下属学校的一些毕业生、一些优秀运动员和有地下工作

经验的政治侨民被派到那里去。一些在卫国战争史上留下名字的人——Д. Н. 梅德韦杰夫、Н. И. 库兹涅佐夫、Р. 阿贝尔、К. П. 奥尔洛夫斯基、С. А. 沃普沙索夫等,曾经在这个小组工作过。该小组的许多成员获得过英雄勋章。

109 战后,无论是斯大林、马林科夫还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本人,都曾经利用过苏多普拉多夫领导的第四局工作人员的特殊技能。

苏多普拉多夫的另一个罪名是,他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的最初日子里直接与保加利亚大使斯塔麦诺维奇进行谈判,探讨以割让大片领土为代价换取签订媾和条约的可能性。苏多普拉多夫不否认进行谈判这一事实,但指出他是按照贝利亚的直接指示做这件事的,而贝利亚这样做是得到当时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本人同意的。1953年8月5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专门开会审查这件事,赫鲁晓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出席了这次会议。据苏多普拉多夫后来回忆,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马林科夫对他说:“您,苏多普拉多夫,还像以前那样,继续在国家安全部干您的工作。”<sup>41</sup>后来把进行这次谈判的责任归到了莫洛托夫身上。

苏多普拉多夫的一条最严重的罪状是指控他参与组建微生物试验室,研制军用毒素和毒剂,并在人的身上做试验。对此苏多普拉多夫本人坚决予以否认,尽管苏多普拉多夫领导的国家全部第四局同该试验室(准确地讲,是试验室研制的那些东西)及其活动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1957—1958年,苏多普拉多夫和他的副职艾廷贡被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定罪,其罪名是,按照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和梅尔库洛夫的指示组建了一个制订并实施杀害苏联公民的小组。苏多普拉多夫被判15年徒刑,艾廷贡被判13年。<sup>42</sup>

苏共中央委员会尽管对这些人进行了审判,但是丝毫没有放弃把实施恐怖行动作为政治活动方式的打算。1953年下半年,中央委员会决定在苏联内务部第二总局设立第十二处(特别处),其任务是实施恐怖行动(这种表达方式在改稿时被涂掉,代之以更好听的措辞——积

极行动),以“对付资本主义国家中最卖力、最凶恶的敌人、外国谍报人员、反苏移民组织的头目和祖国的叛徒”。苏共中央按照老规矩,再一次规定“苏联内务部第十二处(特别处)的所有行动须经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审查和批准”。

在讲述这些事件时有必要介绍一下当时苏联公众对除掉贝利亚的反响。在对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权力斗争内幕一无所知的普通苏联人看来,随着斯大林的去世和对“医生谋杀案”制造者的审判,过去国家日常生活常见的恐怖活动将从此一去不复返,即所谓“从乱到治”。1953年夏天贝利亚被逮捕后,全国到处都在焚烧州内务局的档案材料。人们普遍认为,新政权和党已经同过去决裂,罪人必将受到惩办,无辜者必将被宣告无罪,人们期待着向好的方面转变。这种想法成为50年代中期社会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关情况将在本书的另一章详细介绍。 110

值得一提的是,人们的这种情绪本身变成了政治事实,变成了吹向尼·谢·赫鲁晓夫驾驭的帆船的顺风。

### 国内对清除贝利亚的反应

贝利亚被逮捕了,一名“集体领导”的成员被枪决了,人们开始对以往的政治进程进行思考,但是这种思考总跳不出习惯的思维方式;这个敌人一贯企图爬到党和国家权力的最高峰;幸亏党和国家揭露了这个阴险狡猾的敌人;这个人是在往日大规模镇压、农业崩溃、妨碍党办好各种事情的罪魁祸首。

但是,眼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使人们的思维陷入混乱状态,例如,“医生谋杀案”的侦查工作突然停止,制造该案的组织者被政治审判,开始释放劳动改造营里的犯人,斯大林去世半年后开始禁止悬挂党和国家领导人肖像。似乎不可动摇的一些老的意识形态方针开始发生晃动,战后时期灌输的一些概念开始发生变化。

各种各样的传说、预测和推测在全国各地不胫而走。各级党组织

和内务部的有关机构把收集到的种种说法进行整理后报送国家政治领导人,当然,在报送时考虑到了“集体领导”成员的个人偏爱。在贝利亚被捕后的最初一些日子里,尼·谢·赫鲁晓夫收到了一份关于对贝利亚被捕的反应的汇总材料,材料是立陶宛、拉脱维亚、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共产党委员会提供的。莫斯科对这几个民族共和国的反应之所以感兴趣,大概是因为贝利亚曾经企图用一部分俄罗斯的官员取代当地的干部和计划扩大这些共和国的部分权力。

汇总材料中说:“各地劳动人民一致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采取的消除贝利亚冒险主义敌对行动的及时和果断措施。”并且指出,“劳动人民提出了许多问题”。

现将其中的一些问题列举如下:

“释放医生和大赦的问题同贝利亚的活动没有联系吗?(换句话说,贝利亚在停止侦查‘医生谋杀案’和大赦问题上是有罪的。)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问题的决议以后要不要执行?

为什么只揭发了贝利亚一个人?难道再也没有其他人了?他有没有从犯?

贝利亚歪曲民族政策的本质是什么?

贝利亚歪曲集体农庄制度的本质是什么?

是否停止从各民族共和国召回俄罗斯的工作人员?

贝利亚歪曲关于个人在历史中作用的原理,表现在什么地方?

111 贝利亚是否参与今年6月17日的柏林事件?

约·维·斯大林之死和贝利亚无关吗?

怎么审判贝利亚:公开审判或秘密审判?

前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同志现在怎么处理?”<sup>43</sup>

从这些问题的提法中不难看出,提这些问题的人当然不是什么“劳动人民”,而是试图探听莫斯科发生的事件可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后果的各加盟共和国党和国家机关的代表人物。

在呈送赫鲁晓夫的这份汇总材料上还可以看到如下“社会各界有



针对性的评价”：“帕涅韦日斯糖厂的电工帕什克维奇说：‘马林科夫同志把贝利亚从苏共中央清除出去是为了自己能够更加逍遥自在。’……‘阿迪泰斯’联合企业（里加市）的工人什诺列同志说：‘贝利亚被撤职和逮捕是苏维埃国家的一件大事。有一点十分清楚，斯大林死后高层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么办。’某些劳动者对指控贝利亚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他们问：‘难道这些医生的事就毫无结果？’并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该相信谁？’”<sup>44</sup>

1953年7月13日，内务部向格·马·马林科夫呈送了一份关于在莫斯科人们如何议论贝利亚被捕一事的极为详细的报告，上面列举了一些钳工、司机、作家、科学家、工业部门领导人、军工企业设计师、医生、律师、艺术活动家和军人关于贝利亚的谈论。从中可以看出，所有的人都痛恨贝利亚，找不到一句替他辩解的话，如果有的话，应该是会被写进这份报告的。

有的人认为，党和政府“铲除”贝利亚这个“可恶的敌人”的决定受到了广泛支持。有的人抱怨说，“怪不得我们有许多间谍，因为长期以来内务部被一些人民的敌人——亚戈达、叶若夫、贝利亚所控制”。这份由新任内务部长谢·尼·克鲁格洛夫呈送的报告上有不少称赞马林科夫的话，如“应该用黄金给马林科夫铸半身像”（作家E. 佩尔米金），“马林科夫给人民以力量，让人民的敌人闻风丧胆”（煤炭工业部工作人员И. В. 科尔津科），等等。

下面是莫斯科一些名人对贝利亚的评价。

苏共中央委员、苏联卫生部第四局X射线主任医师И. Л. 塔格尔教授<sup>45</sup>说：

“如果我们政府不及时揭露贝利亚独揽大权的企图，他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铁托。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气焰嚣张是贝利亚纵容的结果，贝利亚的犯罪活动导致农业停滞发展。可以预计，政府在揭露贝利亚的真面目后，一定会采取措施巩固集体农庄和改善集体农庄庄员的物质状况，从而使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

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第301工厂总设计师（飞机设计师）和领导人

C. A. 拉沃奇金说：

112

“贝利亚做了许多不正确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儿子捧上了天，结果他儿子的周围聚集了一大批谄媚奉承、溜须拍马的人。他听不进军方人士关于研制和使用新式装备的意见，不让军人参与开发新装备，这在我们国家还是第一次发生……”

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学术秘书、技术学博士 С. И. 科斯捷林说：

“贝利亚是我们的大敌，他被揭露是件大好事。贝利亚断送了我们整个国防工业，他什么都知道，掌握了所有国防秘密，他要求所有有关秘密装备的资料都要向他上报。贝利亚搞乱了科学院的科研干部队伍，支持所有值得怀疑和不可信赖的犹太人。”

海军总参谋长叶利谢耶夫海军中将说：

“贝利亚是个知名度不太高的人物，所以中央全会的决定没有使人特别感到遗憾。大家感到满意的是，终于知道了这个人的图谋。不过，他当了那么长时间领导人，一直没有被揭露，万一他的阴谋得逞，那就让人太遗憾了。”<sup>46</sup>

与此同时，一些新思想在莫斯科人中开始传播。教育科学院初级研究员 П. Г. 沃罗比约夫说：“党中央最近作出的决议中指出，历史的创造者是集体，而不是某些个人，这一点极其重要。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党在谴责贝利亚的同时再次强调了这一思想。”类似这种把逮捕贝利亚和克服个人崇拜联系在一起的说法还有不少。

内务部呈送的这份报告也列举了一些不合乎官方或半官方观点的看法。

著名的演员和图书编目学专家 Н. П. 斯米尔诺夫—索科利斯基就是其中之一，他说：“贝利亚进了监狱，下一个人是谁？我相信，还会有人进监狱的。无论这部机器多么强大，终归是要垮台的，这不，现在不是开始垮台了吗？贝利亚是头一个人，后面的人是谁还不知道。这都是因为我们把什么都国有化了，不仅所有的部门，而且连呼吸、生病、睡觉都被国有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恶棍都可以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多么令人憎恶的大丑闻。现在我们倒要等一等，看看下面

该轮到什么人了。”

斯米尔诺夫—索科利斯基的同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功勋演员、斯大林奖金获得者 И. С. 纳巴托娃也有类似的想法，她说：

“对于我们来说，谁拿指挥棍都一样。领导人变了，制度却没有变，这实际上是警察制度。我不相信贝利亚等人的行为有什么思想动机，这是公开的权力斗争。贝利亚只不过是个平常的斯大林的模仿者，依我看，不仅仅只有贝利亚一个人想篡权，瓜分权力的斗争刚刚开始。

无论怎样，这个机构早晚是要垮台的，这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转折对于人民来讲实质上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变——制度还是那个制度。制度的真正崩溃可能来自西方国家。”<sup>47</sup> 113

形形色色的议论——从谴责贝利亚染指斯大林的遗产，对贝利亚十分反感，到把贝利亚连同苏联的整个制度一起否定——证明，国家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

### 贝利亚被清除后的内务部

贝利亚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以后，他以前领导的那个部门——内务部的情况怎么样呢？这从内务部呈送尼·谢·赫鲁晓夫的一份关于内务部机关召开党员大会的情况报告中可见一斑。在一个星期中（7月11日到18日），在党员大会上发言的内务部工作人员超过1600人，足见当时讨论规模之宏大。内务部部长谢·尼·克鲁格洛夫和兼任内务部副部长的苏共中央书记 Н. Н. 沙塔林也参加了党员大会，可想而知，在党员大会上发言的人一定尽其所能迎合自己领导人的口味，多说一些国家政治领导人爱听的话。另外，免不了要涉及内务部本身的话题——怎样对待老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后成立的新内务部中发生的那些变化。

“医生谋杀案”是发言者的中心话题。这份报告中说：“共产党员奥德利亚茨基、诺索夫、波卢卡罗夫在发言中指出，停止对一些医生如

沃夫西医生和科甘医生继续侦查是不合法的,按照贝利亚的指示成立的由科兹洛夫、利瓦诺夫和扎哈罗夫组成的小组做得不对,既不重视采用技术手段取得的证据,又不重视这些敌人的口供……许多发言的同志认为,沃夫西医生和科甘医生从事敌对行动证据确凿,建议内务部领导重新审查以前关于把这两名医生释放的决定,还建议苏共中央委员会不要再让那些逮捕后被释放的医生担任克里姆林宫医疗卫生局领导人。”<sup>48</sup>

许多内务部工作人员对停止侦查犹太人“医生谋杀案”持反对意见,他们对内务部第五局局长 H. Д. 戈尔林斯基和副局长 Ю. А. 特罗菲莫夫提出了尖锐批评,说他们“在审理案件中试图为犹太人民族主义分子开脱罪责,说什么这些犹太人从事敌对活动与当时国内的某种局势有关。特罗菲莫夫关于停止侦查“T”案(“T”指托洛茨基分子——作者)的指示是没有根据的……发言者举例说,特罗菲莫夫当着一些同志的面吹捧托洛茨基,说托洛茨基是“伟大的演说家”、“组织家”,等等。罗马什科同志举例说,“特罗菲莫夫有一次在间谍秘密接头地点对他说,苏联存在着排斥犹太人的制度”<sup>49</sup>。

114 值得注意的是,发言者都没有提到内务部领导人和普通工作人员中究竟哪些人公开支持过停止侦查“医生谋杀案”。可以断言,发言者实际上倾向于原先斯大林在世时设立国家全部和内务部两个惩戒部门的老办法,在他们看来,贝利亚的主要罪责就在于他改变了原来的方针。其实,对贝利亚最不利的一条罪状是指控他下令停止对斯大林的亲信同英国侦查机关合作一案进行侦查,说什么该案涉及 1938—1941 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工作材料和中央全会决议泄密事件。这个问题从 1946 年初就开始调查,但是直到 50 年代初也没有查出任何结果。当时新任国家全部部长的伊格纳季耶夫给斯大林本人呈送的一份报告中又提出了这些指控,导致斯大林的亲近助手 A. H. 波斯克列贝舍夫和斯大林私人警卫队队长 H. C. 弗拉西克被逮捕。<sup>50</sup>斯大林本来计划利用这宗案件在 1937—1938 年的政治诉讼案和指控国家最高领导人(多半是指控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米高扬)之间架起一道桥梁。

内务部的某些领导人和工作人员说,能够证明前内务部长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贝利亚及其追随者萨济金、罗季奥诺夫、乌捷欣、斯韦尔德洛夫和利特肯斯从事敌对活动的例子之一是,“在中央和各地区的农业领域搞秘密侦查,虽然现在这种做法已被明令禁止,但是从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可以清楚地看出,以前贝利亚这样做的最终目的是破坏集体农庄制度”。

还有些人认为,逮捕贝利亚有助于内务部转向原先的体制,他们赞同这种转变,因为贝利亚在内务部主要依靠忠实于他的一些人,首先是依靠前国家全部中因“阿巴库莫夫—什瓦尔兹曼案”被逮捕和在斯大林死后被立即释放的那些工作人员,其中一些人后来被再次逮捕,并被加重判刑。作者认为,把这些人绳之以法与其说是一种正义的行动(严格地讲,原国家全部和内务部的每一名高级军官都是有罪的),不如说纯粹是一种政治镇压,没有被定罪的内务部领导人不比被判刑者好多少和坏多少。无论是早期的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或者是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和国家全部,他们所建立的那套政治侦查审判、监督和镇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犯罪,这种制度把刑讯逼供作为取得证据的主要方式,把不经过审判的逮捕作为诉讼程序的主要方法。在这种制度下工作的每一个人严格地讲都是有罪的,他们犯罪的根源在于党和国家经常作出一些违背法律的规定,而且这些规定不断发生变化。许多执行中央指示的人之所以被起诉和严惩,正是因为他们执行了中央的指示。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如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 Г. Г. 亚戈达于 1938 年被枪决,国家全部部长维·谢·阿巴库莫夫上将于 1954 年被枪决,内务部长拉·帕·贝利亚于 1953 年被枪决,此后,谢尔盖·尼基福罗维奇·克鲁格洛夫被任命为副内务人民委员,1945 年 12 月底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长)。斯大林死后,贝利亚当上了内务部长,克鲁格洛夫被任命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贝利亚被捕后,克鲁格洛夫任内务部长直到 1956 年 1 月 31 日。

贝利亚倒台的后果之一是,内务部再度被划分成两个部门——内



务部和苏联部长会议下属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54年3月13日,伊万·亚历山德罗维奇·谢罗夫成为第一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亚·谢罗夫曾获苏联英雄称号,1939年初起在内务人民委员部从事领导工作,1939年9月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后来先后任苏联国家安全第一副人民委员、内务人民委员部副内务人民委员、内务部副部长(从1941年7月30日到1954年3月13日),中间有两年(战争结束后)担任苏联驻德军事行政当局副总指挥。

命运和他们开了个玩笑,正是这些人和他们所领导的部门参与了起草实际上把他们以前的所有活动一笔勾销的二十大政治决议。

但是时代变了。人们已经开始用另一种历史观点看待斯大林之死和贝利亚被枪决。一些确实参与大规模镇压的人先后被逮捕证明,过去的镇压制度已经分崩离析。许多被关押在监狱的人陆续被释放说明,错误已被纠正,公正已被恢复。乐观主义的蜡烛已经点燃,温暖的烛光照亮了试图让所有的人过上幸福生活、然而被某些人盗用和据为己有的社会主义思想。

## 政治意识的变化

如上所说,斯大林去世以后,人们马上开始重新看待他在国家历史中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从上层开始的)。死去的斯大林妨碍了活着的领袖们,这已经不成为秘密。亚·尼·谢列平回忆说,在他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曾经打算把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更名为苏联列宁斯大林共产主义青年团,为此曾经起草了一些必要的文件,并向当时的国家政治领导人打了报告,但是共青团领导人的这种热心没有得到支持。

清除贝利亚的行动不可能阻挡对国内外政策进行迫不得已的必要变革,本书有一章专门详细介绍农业政策方面的变革。这里只想提请读者注意,1953年8月,马林科夫宣布降低向农民征收的农业税。1953年9月,赫鲁晓夫在中央全会上宣布大幅提高农产品国家收购

价。这些措施的实行使粮食生产的形势得到了某些改观,刺激了肉类、牛奶、蔬菜、奶制品个体生产的发展,改善了城乡亿万公民的生活,为全国个体副业生产和农户经营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广大居民阶层把国家政治领导人采取的这些步骤归功于马林科夫的领导,使他在1953年—1955年成为国内最受欢迎的人。

采取了一些改善苏联国际地位、降低苏联同他的潜在敌军事对抗水平的措施。斯大林之死和德·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使朝鲜战争停战协定得以签订,1953年6月27日签署了停战协议。这场冲突长达三年零32天,夺去了南朝鲜40万居民、14.2万美国人、1.7万在这场冲突中站在联合国一边的其他国家士兵的生命。据各种不同的资料,中国和朝鲜共计损失200万—400万人。替朝鲜作战的苏联空军损失飞机335架、飞行员120名<sup>51</sup>。苏联各部队和兵团在这场战争中共计损失299人,其中军官138人,士兵161人<sup>52</sup>。停止军事行动使这场战争“演变”成世界战争的危险得以消除。

1953年8月,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上第一次使用“缓和”一词,呼吁降低军事对抗水平。1954年3月12日,他发表声明说:“苏联政府主张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坚决反对‘冷战’政策,因为这是准备新的世界大战的政策。使用现代武器装备进行世界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毁灭。”

马林科夫的讲话说明,苏联政府已经开始认识到,使用核战争的手段不可能取得符合愿望的政治成果。这里有必要回忆一下马林科夫在五年前(1949年11月6日)的另一次讲话,当时他说,如果发生新的世界战争,帝国主义将被消灭。<sup>53</sup>而后来在1954年2月,他的讲话中已经流露出完全不同于这种说法的思想。不过,马林科夫的观点同苏联其他政治领导人的意见并不一致,时过不久,在1954年4月,他不得不进行自我纠正。后来马林科夫关于在核战争条件下人类可能灭亡的见解成了他的一条过错。<sup>54</sup>

几年后,苏联开始在战略武器领域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追赶美国。1953年8月12日,苏联进行了氢弹试验,氢弹的研制者是安·德·萨

哈罗夫和他的同行们——Ю. Б. 哈里顿, Я. Б. 泽利多维奇, В. А. 达维坚科, К. И. 晓尔金, Ю. А. 罗曼诺夫, Г. А. 齐尔科夫, Ю. А. 特鲁特涅夫, Е. И. 扎巴宾, Е. А. 扎哈连科夫, С. Г. 科恰良茨, В. Н. 米哈伊洛夫, А. И. 帕夫洛夫斯基, Ю. А. 济辛, Л. П. 费奥克蒂斯托夫等。苏联开始第一次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氢弹的爆炸威力大大超过原子弹, 参与试验的一名科学家写道: “热辐射、核辐射和冲击波形成的综合作用力在武器技术装备制造史上前所未见。” 在原子技术领域工作多年的 А. П. 亚历山德罗夫回忆说, 苏联核计划领导人伊·瓦·库尔恰托夫被氢弹的巨大威力所震惊, 他在试验后返回途中心情压抑地说, 不能允许有目的使用核武器。<sup>55</sup>

与此同时, 成功研制出能把核弹头送到欧洲任一地点的导弹(P—5 导弹), 后来又研制成功能把核弹头送到世界任一地点的导弹(P—7 弹道导弹)。苏联政治领导人从此有了向自己的外交敌人施加压力的工具。

所以, 马林科夫关于核战争意味着世界文明毁灭的思考遭到赫鲁晓夫的激烈反对是可以理解的。随着核武器的出现, 世界发生了变化, 有这种认识的人只是那些研制原子武器的科学家, 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报告中实际上重申了斯大林的理论模式: 只要有帝国主义存在, 世界战争不可避免, 所以, 消灭资本主义是消除战争不可避免性的唯一道路。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 为全力推动世界革命和扩大社会主义范围而斗争被视为比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更为重要的任务。

## 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博特温尼克和苏共 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的一场“比赛”

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受到了重新审视和重新评价。在后斯大林时期的最初几年, 可以觉察到当时的鼓动宣传机关不知所措, 失去了原先具有的明确单一的定位点。这一时期苏联领导人在内外政策上表现出的实用主义(朝鲜停战, 开始在农业领域进行改革, 大赦)与

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相互矛盾,重新审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那些似乎不可动摇观点的企图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

这是攻打意识形态堡垒的最初一次尝试。遗憾的是,这个问题几乎没有被研究过,现在有必要对它进行认真分析。

减轻意识形态压力的最初迹象使知识分子看到了希望。物理学家皮·列·卡皮察是个勇敢的人,他从赫鲁晓夫在1953年九月全会的报告中看到了新东西:“这个报告不仅让远离农业的人很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它表现出在列宁去世后开始被忘却的勇敢和坦率,因为不惧怕坦率的批评才是强大社会制度的基本特征和国家健康成长的标志……”

……1954年5月29日,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米·莫·博特温尼克给苏共中央书记、苏联共产党的一个主要思想家彼·尼·波斯佩洛夫写了一封信。博特温尼克在这封笔迹美观工整的信中用不无调侃的言语写道:

“尊敬的彼得·尼古拉耶维奇:

有的时候,一些棋艺很差的棋手会带着自己的理论‘研究成果’去找特级象棋大师求教,尽管特级象棋大师极其宽容大度,还是发现这些‘研究成果’往往是不中用的。

我深知自己对政治一窍不通,但是我还是寄希望于您的宽厚大度。恳请您,彼得·尼古拉耶维奇,挤出点时间看一看随信寄去的这篇短文……”

博特温尼克写得密密麻麻的这篇“随信寄去的短文”共计九页,题为《西方国家能否不经过第三次世界大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说到这里,作者认为有必要马上提请读者注意,米·莫·博特温尼克当时完全知道以世界社会主义命运为题进行理论探讨的危险性,写这封信和这种投信方式无异于“自投罗网”,博特温尼克本人后来多次谈到了这一点。

博特温尼克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将是一场核战争,其结果是地球上的生命遭到毁灭。他把艾·杜勒斯和格·马·马林科夫的讲话进行了对照后指出,美国政治家和苏联政治家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几乎是

相同的。博特温尼克得出的下一个结论(只有那些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在世界上进一步传播的垄断资本家才希望战争)毫无新奇之处,但是他进一步得出的一些结论就不同凡响了,竟然探讨起如何使社会主义变得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更具吸引力这个问题上来。

他首先对历史上发生的一些事件稍加回顾后指出:“至于说到某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无产阶级的盟友问题可以通过给农民分配土地解决——这些国家的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不难看出,以前的苏联、俄罗斯就是这样的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无产阶级是依靠农民的广泛支持才取得胜利的。这一观点后来得到了苏联职业历史学家的支持,但是受到了党的尖锐批评。

工业化的西欧国家则是另一回事。博特温尼克提出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建议:“应该让大多数居民阶层对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物质兴趣。”他以大不列颠共产党制定的《大不列颠之路》纲领为例,认为在这个国家用不着宣传社会主义。

119 大不列颠共产党人给自己国家的同胞许下了哪些承诺呢?博特温尼克引经据典地说,大不列颠共产党人只是许诺说:“小商人和企业主也可以像农村地区的小土地所有者那样不受垄断资本家的限制”,“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许诺”,因此,大不列颠共产党人提出取消所有的股份,对大私有者和小私有者不加任何区分。博特温尼克由此得出结论:“大不列颠的中间阶层仍然对共产党不信任,他们更愿意听到保守党党员和工党党员的声音,这难道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吗?”博特温尼克认为必须依靠小私有者。他说,这种私有者的数量“占全部或部分依靠他人劳动生存的人(亦即财产将被剥夺者)总数的十分之九”。

博特温尼克建议保护这些人的非劳动(!)收入。他在这篇短文的最后一段写道:“我认为,如果(西方国家)能够确保小资产阶级保留他们在革命后的100%收入,确保大资产阶级保留他们的部分收入,就可以使垄断资本家在人民中间陷于孤立,人类就可以免受核灾难的威胁。”

彼·尼·波斯佩洛夫看了这篇短文后赶忙向苏共中央报告。他认



为,博特温尼克的观点是“为了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而同帝国主义者妥协的自由主义的、和平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米·博特温尼克由于不懂得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帝国主义者追求最大的利润和世界霸权……提出了他的天真、盲目、反马克思主义的想法:‘能不能让垄断资本家感到他们并不需要原子战争……’并且建议在共产党的纲领中写进,一旦发生革命,不仅要保留资本家从国有化企业中取得的利润,而且要依靠缩减军费扩大这种利润的承诺……”中央书记波斯佩洛夫把博特温尼克的这些想法定性为“英国工党型资产阶级思想和害怕资本主义包围的表现”,指示工作人员把世界冠军叫到中央宣传鼓动部,指出他的观点的反马克思主义性质,如果他仍然坚持这些观点,“我觉得他就不能再做一名党员”。

作者认为有必要提请读者注意,无论是博特温尼克或是他的论敌,在涉及要害问题时都故意避重就轻。博特温尼克的文章表面上看是谈对外政策问题,实质上涉及国内事务。把保护小私有者写进党纲的建议不可能不引起共产党人对苏联发展历程中的一些做法,如整个经济国有化、集体化、没收富农的生产手段和土地等,进行思考。承认私有者的权利无疑同苏联共产党一贯否定任何所有制(除了社会主义的国家所有制)的整个思想相抵触。博特温尼克竟然说出这种让人看都不敢看一眼的异端邪说。

但是双方的论战到此并没有结束,半年后,亦即在1954年12月,博特温尼克对苏共中央提出的那些反驳进行了答复。他又一次说,人类的主要任务是制止核战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博特温尼克是建立一个免受核战争威胁的大同世界的拥护者,所以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但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胜利)的拥护者。

在这一次论战中,米·莫·博特温尼克和彼·尼·波斯佩洛夫都改变了声调。经验丰富的博特温尼克这一次同党的思想家进行论战时,要比过去勇敢和观点明确得多。波斯佩洛夫承认有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博特温尼克则援引了波斯佩洛夫在作家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博特温尼克写道:“如果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同核战争联系在一起,那人

120

类付出的代价未免太高昂了。如果物理学进一步发展,最终岂不是会出现把孩子连同洗澡水一起泼掉的危险(意指毁灭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人类)。”<sup>56</sup>

博特温尼克丝毫不退让,坚持认为必须保护和承认私有者的权利。他写道,人们搞社会主义革命不就是为了有吃有穿和能找到工作,“当人民明白这个道理时革命就发生了,俄国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而在西方国家,大部分人吃穿不愁,文化水平高,住房有保障。对于他们来讲,社会主义革命暂时还不是迫切需要的,所以那里要么没有发生革命,要么革命没有取得胜利。”<sup>57</sup>

博特温尼克坚信,革命是由于不能确保应有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水平不高产生的结果。在人类发展进入崭新阶段、出现核武器和导致人类自我毁灭的核战争的条件下,需要真正的世界性的社会改革(姑且称之为博特温尼克式的革命)。

从这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的另一个建议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所主张的社会变革的基本原理:“我认为,如果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看到革命可以使他们避免核灾难和一定会满足他们的本能需求,他们就会站在革命一旁。”

米·莫·博特温尼克给苏共中央书记写信说明他希望变革,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苏共中央的信赖,相信苏共中央会考虑到他的建议并付诸实施。敢于对苏联的社会政治现实及其在世界的地位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与党的思想家进行对话和讨论,这证明社会开始出现摒弃斯大林式单一模式的征兆。

## 苏共二十大前夕

当时国家和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需要解决的问题成堆:受冤假错案牵连者需要平反,直接参与镇压者需要对其提起公诉,此外,需要查明进行镇压的政治责任。当时,几乎所有苏联政界上层人物的亲属和朋友都进过监狱和劳改营,他们中每个人都面临被镇压的威胁,

刽子手和牺牲品之间的角色转换速度之快令人惊讶,有时在同一个人身上要转换好几次。苏联政界上层人物、党和国家的官员好不容易才迎来了安全和保住自己地位的一天,贝利亚、前国家安全部长阿巴库莫夫以及国家安全部和内务部一系列大头目被审判和枪决为人们的安全感创造了众所周知的条件。

从1953年起,特别是从1954年春天起,在为被镇压者恢复名誉的道路上迈出了最初几步,但是涉及的政治活动家为数不多,主要是一些因“列宁格勒案”被逮捕和枪决的人。阿·亚·库兹涅佐夫、尼·阿·沃兹涅先斯基、M. И. 罗季奥诺夫以及那些与他们一道被判罪的人被宣告无罪,维·谢·阿巴库莫夫和前国家安全部的一些工作人员锒铛入狱,这两者之间毫无疑问存在着联系,给一部分人平反意味着另一部分人有罪。但是,随着平反工作的全面展开,凸显出另一个对于了解内情的人来说已不是秘密的问题:当时的所有政治领导人都是镇压的参加者。平反工作得到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大力支持,人们一致谴责把镇压当作权力斗争的武器。

把镇压当作权力斗争的武器最早出现在1938—1939年,当时把惩戒工作中“走极端”的责任全部推到了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和他的工作人员身上。毫无疑问,贝利亚在1953年也试图掌握这种武器,因为他十分清楚马林科夫在制造“列宁格勒案”和“医生谋杀案”中所起的作用,了解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等人参加镇压的事实。

但是,贝利亚的图谋没有得逞,他的政治竞争对手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反过来指控贝利亚本人组织镇压,他不仅被逮捕,被加上一条同外国侦查机关合作的大罪名,而且把30年代到50年代初所有镇压的责任推到了他一人身上。对贝利亚的指控是公开进行的,苏共中央散发了“非公开信”,介绍中央七月全会对贝利亚进行的政治审判,新闻媒体报道了对贝利亚的指控。

把贝利亚清除出最高政治领导层并没有使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愈演愈烈的权力斗争停止下来,因为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角逐使

为无辜者恢复权利的问题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这种斗争的加剧导致恢复名誉的进程走向极端。

前面已经介绍过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在农业政策上的不同观点。1955年初,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指责马林科夫缺乏经济工作和苏维埃工作的必要知识和经验。马林科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第五届会议上发表讲话中曾经谈到,必须稍微放慢重工业发展速度,增加对轻工业的拨款。赫鲁晓夫认为,马林科夫关于发展轻工业、为居民多生产商品和减少对重工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指减少对军事工业的投资)的呼吁“理论上不正确,政治上有害,用发展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速度对抗发展重工业的速度。”<sup>58</sup>

赫鲁晓夫还用类似的表达方式批评马林科夫的外交观点:“帝国主义者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能导致‘世界文明毁灭’的说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政治上是有害的。”赫鲁晓夫认为,“散布这种观点不仅无助于动员社会舆论积极投入反对帝国主义者发动核战争罪恶图谋的斗争,反而促使产生绝望的情绪……”<sup>59</sup>马林科夫还被指责支持贝利亚曾经提出的关于建立一个统一中立的德国的建议。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第一次被公开指控与贝利亚合作,说他必须为“列宁格勒案”和40年代到50年代初的一系列政治诉讼案承担责任。

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以后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二月例行会议解除格·马·马林科夫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当时政治体制中的关键性职务),任命尼·亚·布尔加宁(一个蔫不唧和优柔寡断的人)担任这一职务。

这些人事变动使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的地位得到了加强。

马林科夫被指控参与镇压,这成为赫鲁晓夫反对马林科夫的最有分量的理由,其后果是重新为一些人恢复名誉,这一次主要为党内被镇压的人恢复名誉。这样一来,镇压已经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正式成为党内政治问题。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个问题(镇压和如何看待

斯大林)成为苏共二十大(斯大林死后召开的第一次党代会)的最重要议题。

## “秘密报告”

历史上经常有一些离奇的现象。关于苏共二十大及其最高潮部分——尼·谢·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人们说过不少的话，作过许多评论，然而，对于这次代表大会的筹备和秘密报告的起草经过，以及代表大会的近期后果，却几乎没有人进行过认真充分的研究。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室的文献资料使我们把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公布于众成为可能。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之前，苏共中央主席团于1955年12月31日召开过一次会议，会议的议程中包括“与恢复名誉有关的问题”，在会议记录简报中说，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立了一个“由波斯佩洛夫、科马罗夫、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等同志组成的小组，并委托该小组审查所有的材料”<sup>60</sup>（后来这个小组被称为“波斯佩洛夫小组”）。

从主席团会议记录简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小组的宗旨和任务。该小组在提交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报告中说，成立这个小组“是为了查明，对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选举的大多数联共(布)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镇压是如何成为可能的……小组吸收下列党员参加文件材料的起草工作：国家安全委员会伊·亚·谢罗夫同志(1926年入党)；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主任多布罗霍多夫同志(1932年入党)；国家安全委员会登记和档案处处长普列特尼奥夫同志(1939年入党)；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检查处处长卡利斯托夫同志(1940年入党)；苏联总检察院副军事检察长捷列霍夫同志(1943年入党)。”<sup>61</sup>

123

在二十大召开前夕，中央主席团中关于斯大林镇压问题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前苏联国家全部大案要案侦查员、40年代末政治诉讼案的主要执行者之一、后被投入监狱的鲍里斯·罗多斯直接被带到主席团会议上，他的供词表明，斯大林亲自领导了政治暗杀活动。我们可不



是天真幼稚的小孩！绝大多数主席团成员要比鲍里斯·罗多斯更了解这件事，他们自己当时就是“三人领导小组”的参加者，定期按照枪决名单“限额”向斯大林汇报工作，并向斯大林索要消灭“人民的敌人”的新“限额”。至于说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当时坚持要把斯大林对政治暗杀负责的问题提交代表大会并表明自己对这个问题的态度，那是另一回事。把前国家全部侦查员鲍里斯·罗多斯从监狱叫到主席团对质，只能说明赫鲁晓夫想一查到底。

讨论期间就如何在即将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评价斯大林的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莫洛托夫认为，尽管镇压的事实已经人所共知，但是斯大林仍然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这一点务必在代表大会上讲明。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对此表示支持，米高扬和萨布罗夫——反对。萨布罗夫说：“如果事实可信，这难道是共产主义？这是不能饶恕的。”马林科夫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讨论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干的事情太残忍。他毁掉了党，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把人的所有神圣的东西全抹掉，想怎么干就怎么干。”<sup>62</sup>

1956年2月8日（二十大开幕前夕），“波斯佩洛夫小组”向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关于过去镇压情况的多页报告，报告的起草时间不长——一个月。这份绝密报告谈到了国家在1935—1940年期间进行镇压的规模，但是，报告的撰写者所列举的材料仅限于因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而遭到镇压的人，侧重于说明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迫害，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故意避而不谈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和赫鲁晓夫本人在30年代镇压中所起的作用，只字不提农民在集体化时期的遭遇，不提那些反对把苏联劳改营变成法西斯集中营的军人的悲惨命运，尽管如此，这份报告还是给人们展示了一幅当局对国家居民进行大规模镇压的可怕画面。

“波斯佩洛夫小组”的报告证明（尽管它所依据的统计数字不完整），仅在两年时间内（1937—1938年），就有1548366人因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被逮捕，其中681692人被枪决；党和苏维埃国家的领导层被

摧毁——每一个共和国、边疆区和州都有 2—3 名领导人被逮捕；联共（布）十七大 1966 名代表中被逮捕 1108 名，其中 848 名被枪决。

“波斯佩洛夫小组”的报告试图通过一些重大的政治诉讼案揭示进行镇压所采取的手段和设下的圈套。现将这份报告的一些标题列举如下：“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进行镇压的命令”，“人为虚构的反苏组织、反苏集团和各种反苏中心”，“关于侦查过程中严重违背法律”，“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密谋’”，“检察机关在对内务人民委员部侦查工作进行监督中的违背法律现象”，“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任意审判”，“关于不经过法庭审理案件”。“波斯佩洛夫小组”在谈及大规模镇压的原因时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出了“本报告在材料准备和打印过程中确保严守机密”的承诺。

该小组的成员认为，造成大规模镇压的原因是：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后不久，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 1934 年 12 月 1 日通过的那个决定为后来“大量违反社会主义法律开创了一个先例”，斯大林和日丹诺夫 1936 年 11 月 25 日的致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的那封电报中提出的大规模镇压的方针，成为 1937 年 2 月—3 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基础。“波斯佩洛夫小组”的报告明确指出，斯大林应该对使用刑讯逼供、不经法庭审判镇压和枪决承担个人责任。<sup>63</sup>

令人震惊的报告、可怕的具体事实、受害者和害人者（害人者在 1939—1949 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大清洗”期间大部分也被枪决）的供词摘录证明，确实存在刑讯逼供的现象，斯大林原先的那些战友曾经向斯大林乞求手下留情。该报告以三份附件（三份文献资料）结束，他们是：斯大林 1939 年 1 月 10 日的一封电报，它证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经允许在审讯中“使用肉体作用”（即刑讯）的方法，关于斯大林批准枪决 138 名担任领导职务的工作人员的证明材料；农业人民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P. И. 埃赫临死前给斯大林的一封信。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于 2 月 9 日听取了这份报告，当时的局面令人难堪，主席团成员立即就要不要在代表大会上讲这些事情和如何评价斯大林等问题展开了争论。莫洛托夫坚持认为应该正面评价“人民的

领袖”，他说：“30年来，党始终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生存发展，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取得了战争胜利，并在胜利后成为强国。”卡冈诺维奇举棋不定，他说：“我们也应该承担责任，但是情况就是如此，我们不可能逆转。”他谈到了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由于害怕受到镇压而自杀的命运，同时又忧心忡忡地说：“但愿我们别在代表大会上惹出祸来。”阿里斯托夫和谢皮洛夫是向代表大会递交报告的拥护者，马林科夫再次表态赞同作报告，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卡冈诺维奇最终表示反对。在这种情况下，赫鲁晓夫试图找出妥协性的决定，他说：“不谈过去的事。”<sup>64</sup>

125 1956年2月10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收到了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M. Ф. 什基里亚托夫的顾问谢苗诺夫递交的一份答复报告，介绍了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对1935—1938年被逮捕者的案件进行审理的过程。

然而，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已接近尾声。在中央委员会党机部拟制的会议议程草案中没有提到赫鲁晓夫准备就这个问题作报告，在发给代表的请帖中也没有这一项<sup>65</sup>，但是在代表大会临近召开前对议程进行了重大修改。1956年2月13日，亦即在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把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必须在代表大会非公开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和指定尼·谢·赫鲁晓夫为报告人的建议提交苏共中央代表大会”。<sup>66</sup>

讨论这个问题的速记记录保存至今，全文照录如下：

**赫鲁晓夫：**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显然是指代表大会讨论报告和确定中央委员会领导机构人选之前……在应邀的客人不在场的情况下）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有没有反对意见？

**与会者：**没有。”<sup>67</sup>

这里必须指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虽然同意由赫鲁晓夫作报告，但是这个时候报告的全文根本就不见踪影，需要马上起草。

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sup>68</sup>的报告稿直到1956年2月18日才写完,尼·谢·赫鲁晓夫看了以后感到不满意,于是亲自参加起草:2月19日,在代表大会工作最紧张的时候,他把一名女速记员叫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的报告稿方案。<sup>69</sup>最后,两个方案(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赫鲁晓夫口授记录下来的报告稿)被合二为一,为后来的“秘密报告”奠定了基础。在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中,有一个部分是专门从理论上阐述问题的——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谴责个人迷信,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的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耻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们的命运,列举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本人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上面。此外,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问题,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价。

126

赫鲁晓夫对这些问题有他自己的看法,他1956年2月19日的口述报告稿证明了这一点,<sup>70</sup>正是这份口述报告稿成为后来二十大报告的主要素材。赫鲁晓夫当然利用了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但是着重强调的地方有所不同,更主要的是,他对按时间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进行了改变。赫鲁晓夫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儿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sup>71</sup>

赫鲁晓夫援引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

程》中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sup>72</sup>

赫鲁晓夫不仅仅局限于国家的战前情况，他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赫鲁晓夫的评价不无偏颇之处，所列举的一些事实显然没有事先进行核实。他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的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这种相互角逐在以他为首的“集体领导”中仍在进行。赫鲁晓夫的口述报告稿前言不搭后语，一个问题没有讲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时间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他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的声誉。

赫鲁晓夫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陋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方的结果。我说的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讲，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的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sup>73</sup>

127 赫鲁晓夫把对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把基辅附近、1942年在哈尔科夫附近被包围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



赫鲁晓夫把过去的一些政治诉讼案——“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缅格列尔案”的责任统统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赫鲁晓夫口授报告稿时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医生谋杀案……”<sup>74</sup>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时说的最后一句话值得注意。他说：“应该说，这是‘莫斯科案’。”<sup>75</sup>这句话看来没有说完，在“秘密报告”的正式文本中没有这个话题。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肯定地说，斯大林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曾经试图在莫斯科制造类似“列宁格勒案”的诉讼案。

不过，赫鲁晓夫在口述报告稿中并非仅限于查明斯大林的责任，他还直言不讳地指出，某些在职的高层政界领导人也应该对过去的罪行承担责任。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在他们起草的报告稿中费尽心机在斯大林、贝利亚和其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在1935—1940年的镇压和现实之间筑起的一道高墙被赫鲁晓夫彻底推倒，这未必是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一时情绪激动所为。他在口述报告稿中以“医生谋杀案”为例谴责斯大林实行的侦查方法，赫鲁晓夫说：“在座的代表中有伊格纳季耶夫（1951—1953年初任国家安全部长，二十大期间任苏共巴什基尔州州委第一书记——作者），斯大林曾经对他说：如果不想办法让这些人承认，就要您的脑袋。伊格纳季耶夫于是叫来了侦查员，亲自给他指导，教给他侦查方法，这个方法就是一个字——打……”在讲述斯大林在战争中的作用和1942年哈尔科夫附近的那次大灾难时，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了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向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

表面上看，赫鲁晓夫是在说伊格纳季耶夫和斯大林，实际上把矛头指向了马林科夫，因为马林科夫当年担任国家安全部长，是斯大林最亲近的一个人。显而易见，赫鲁晓夫的意思是说，马林科夫等人要为斯大

林承担罪过。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之间的权力斗争进入了最后决战的时刻,赫鲁晓夫在这场决战中采取步步逼近的方法,不仅剥夺了马林科夫的全部权力,而且使他威信扫地。

正是赫鲁晓夫的口述报告稿成为他在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后一天(1956年2月25日)宣读的“秘密报告”的基础。有一种传说认为,在宣读“秘密报告”的前两天,赫鲁晓夫曾经和谢皮洛夫一起对他的口述报告稿进行了加工,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宣读的就是他们俩定稿的这份报告,它和赫鲁晓夫最初的口述报告稿区别不大。<sup>76</sup>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那么代表大会实际上已经结束:代表们所知道的议事日程已经结束,该进行苏共中央委员会选举了。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报告出乎大多数代表的意料之外,代表们大为震惊,默默地听着,会场里一片寂静。报告结束后没有热烈的掌声,大克里姆林宫长厅里只有寥寥的掌声响起,之后是各种各样的猜测。正如这份报告的出版者所指出的那样:“这次秘密会议的经过没有被记录下来……报告结束后决定不对报告进行讨论。”<sup>77</sup>此外,还决定向各党组织传达报告的内容(不许登报)。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

——赫鲁晓夫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违背了党的代表大会的传统做法——党的领导人的政治报告必须预先经过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

——赫鲁晓夫的讲话稿是在代表大会召开期间,或者说是在会议结束前几天匆忙写成的;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讲话不许记录,不许速记;

——代表大会决定向苏共党员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为此首先必须拿出报告的正式文本。

这当然是需要时间的。3月1日,把已经宣读过(!)的讲话稿拿出来让主席团成员、候补成员、中央书记们讨论和最后定稿,此外,增加了一些必要的注释——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中找根据,苏共代表大会的报告不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话是不可思议的。1956年

3月5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传达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的决定》。《决定》中指出:

一、建议各个州委会、边疆区区委、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的无党派积极分子传达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二、把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印成小册子下发各党组织,小册子上应标有“内部材料”字样,但不标“严格保密”字样。<sup>78</sup>

可见,从宣读报告(2月25日)到加工、修改和批准报告(1956年3月5日),中间相隔一个星期。

所以说,向各个党组织传达的赫鲁晓夫的报告是经过了校订和修正的文本,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究竟都讲了些什么不得而知,要想查明印成小册子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和他宣读的报告是否一致看来已经不可能了,因为目前还没有发现讲话的录音。从赫鲁晓夫喜欢即兴讲话这一点推断,他在二十大上作报告时应该还讲了其他一些内容。

赫鲁晓夫讲话所造成的社会后果难以估计,在赫鲁晓夫讲话之前已经有过公开批评斯大林的尝试——安·伊·米高扬在二十大开幕后第三天宣读的报告。米高扬在讲话中指责斯大林在世时不重视集体领导,还对斯大林的理论著作——《苏联社会主义的经济问题》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出了批评。当时这种批评斯大林的尝试引起了代表大会部分代表和客人的抗议,代表大会主席团收到的一张纸条中说:“我不同意米高扬这个右派分子(原文如此——作者)的讲话,这是对所有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心目中的斯大林神圣形象的侮辱,资产阶级将因此而幸灾乐祸。斯大林培养了我们,伟大的约瑟夫,他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捷普利采市街头浴血战斗的统帅。”<sup>79</sup>

在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出台以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纸条,但是出现过提其他问题的纸条,例如,有代表问赫鲁晓夫:“在您发表讲话以后,斯大林同志还配不配和列宁安葬在一起?”<sup>80</sup>

随后作出了一项史无前例的举动——向全国成年人传达赫鲁晓夫的报告,并向世界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散发这份报告,引起了广泛反响。<sup>81</sup>第四国际执行委员会领导人给莫斯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写信,建议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拉科夫斯基以及成千上万的其他布尔什维克恢复名誉,要求对一些东欧和中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赖克,斯兰斯基,科斯托夫,多日等人的案件进行重新审理。<sup>82</sup>托洛茨基的妻子纳塔利娅·谢多娃—托洛茨卡娅从墨西哥给莫斯科写信,请求为她的丈夫恢复名誉。<sup>83</sup>

### “秘密报告”和苏联社会

许多共产党员看了赫鲁晓夫的报告后给中央写信<sup>84</sup>,信的内容各种各样。写信的人中有不少被镇压者,其中以列宁格勒人居多,他们都是在谢·米·基洛夫被暗杀后发生的一些事件的受害者或受牵连者。

但是,从这些来信中可以发现,不少人对在二十大上提出个人崇拜问题表示不满。在向党员传达报告的决定通过后没有过几天,苏联科学院俄罗斯文学研究所工作人员 И. А. 阿列克谢耶夫(1920年入党)就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写了封信。写信的日期是1956年3月9日,在该研究所召开会议向党员、科学院通信院士、博士、高级研究员、研究生、共青团积极分子传达报告的第二天。И. А. 阿列克谢耶夫在信中写道:“所有与会者听到报告后都大为震惊,其震惊的程度难以用几句话表达。”他在信中专门强调指出,无论他本人或他的亲戚都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恐怖和迫害,他相信斯大林。但是,在评价斯大林死后和贝利亚被捕以后出现的新气象时,他得出了比赫鲁晓夫的报告走得更远的结论。И. А. 阿列克谢耶夫写道:“真正的悲剧不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我们共产党员看来,苏维埃制度中独揽大权的历史性行为是更大的悲剧,是群众、党和人民的真正悲剧……”为此他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党应该对斯大林进行死后审判的建议。写信者反对采用向代表大会提交“秘密报告”的方式,“不能仅局限于听报告和垂头丧气,传达

文件不是为了讨论,而是为了‘公布周知’”<sup>85</sup>,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党应该设立党的法庭审判斯大林……使每个基层党组织有机会专门就斯大林问题发表意见……让每一个共产党人在党员大会上说一说斯大林是不是国家的罪人,通过党内全民投票来回答他是不是一个反人道主义的罪人。”<sup>86</sup>

不难看出,这名共产党员的思维远离苏共二十大的方针。默不作声倾听尼·谢·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被议论纷纷取而代之:为什么会发生“个人崇拜”?谁应该承担罪责?如何使党内独揽大权的悲剧不再重演?提出这些问题和试图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的举动显然与只有党(准确地讲,只有党的最高领导人)才有权利回答所有问题的惯例背道而驰。剥夺党对真理的垄断权被视为大逆不道和政治犯罪。

但是……在党内一些人看来,药物比疾病更为可怕。倘若说赫鲁晓夫把往昔的可怕事实公布于众是为了抨击自己的对手,那么听他说这些话的人却陷入了深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苏联的制度同纳粹德国的秩序有什么两样?为什么这些在党机关工作了几十年、参加过“三人领导小组”、编造和签发过“枪决名单”的人要对斯大林和贝利亚进行批评?

尽管有过禁止讨论“秘密报告”的规定,但是许多党组织还是进行了讨论。下面是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院、荣获列宁勋章的苏共中央附属高级党校基层党组织<sup>87</sup>在讨论中提出的部分问题:

为什么无论在代表大会上或者在代表大会闭幕后都没有对赫鲁晓夫的报告进行讨论?

为什么自我批评少?

反对个人崇拜的客观保证何在?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对个人崇拜的形成没有责任吗?

斯大林的遗体是否还在墓中?现在到处仍然有斯大林的巨大纪念像吗?

怎样对待斯大林的著作?



否定斯大林的著作对不对？

为什么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不公开？

关于无辜者恢复名誉和惩办参与镇压的罪犯问题。

关于被镇压者返回家园问题。已经在移居地定居的那些人怎么办？

马林科夫有那么多错误为什么还让他当领导人？

如何真正实现选举民主化？

131 是否真的有一个右翼中派恐怖活动中心或其他阴谋活动中心？

从伊尔库茨克、托木斯克到列宁格勒，各大城市的大学生纷纷举行集会。

在格鲁吉亚，赫鲁晓夫的报告受到了抵制，谈论这个特殊的话题被视为对格鲁吉亚伟人斯大林的攻击。3月5—9日，在阿布哈兹，格鲁吉亚人和缅格列尔人同俄罗斯人、亚美尼亚人和阿布哈兹人发生冲突，秩序一片混乱。<sup>88</sup>3月9—10日，第比利斯的混乱状态达到了顶点。<sup>89</sup>

当局心急如焚，坐立不安。

党的领导人强令各地召开会议，传达党的决议，介绍党的高层会议上曾经发生过的一些争论，这种做法本身导致一些人产生抵触情绪，其中包括一些原先对党的领导人抱有天真幻想的党员。

苏共二十大和赫鲁晓夫在二十大最后一天宣读的“秘密报告”无疑为国家社会意识的发展创造了崭新的条件。二十大的决议受到了政界上层人物的欢迎，因为这首先意味着在党内斗争中彻底摒弃镇压和恐怖的手段，党内中高层干部从此有了安全感，意味着不仅再也不会发生1937—1938年式的大浩劫，而且再也不会重演“列宁格勒案”。谴责“个人崇拜时期”和审判贝利亚使地方上的许多政治诉讼案的执行者和组织者如释重负，因为他们再也不用承担什么责任了，可以保住他们的职位了。对斯大林和贝利亚的批判越严厉，越不会去追究其他人的责任。

然而，二十大决议也带来了另一种后果。赫鲁晓夫的报告使评价党在国家历史中作用的统一口径不复存在，不管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愿

意不愿意,他毕竟挑起了关于要不要变革、关于斯大林造成了哪些悲剧、关于党本身的命运和建设“光明未来”的思想是否正确的争论。摧毁单一的思维方式和摒弃《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教规不可能不引起走向另一个极端。

## 苏共中央和国内抵触情绪的产生

可以举一个例子说明当时显然已经出现了知识分子抵制当局的现象。1956年3月23日,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召开非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会议进行了两天(3月23日和26日)。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在讨论中指出,“秘密报告”是一个对党、二十大、中央委员会及其领导人进行诬蔑诽谤的报告。会议参加者的发言被立即报送中央委员会。例如,初级研究员 P. Г. 阿瓦洛夫说:“人民的力量太弱”,所以一小撮人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只有人民拿起武器,才是消除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有害现象的最根本措施……”Г. И. 谢德林(技术员)说:“我们总是说党的力量和人民的权力,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我们跟着斯大林一起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个人崇拜,吹捧赫鲁晓夫。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他的关于‘合理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实强加于我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斯莫利亚金(初级研究员)说:“真是让人困惑莫解,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许我说得不对,不少党员丧失了独立性和党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党票是得到生活中好位置的手段。”<sup>90</sup>

初级研究员 Ю. Ф. 奥尔洛夫的发言成了这次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奴隶社会进行比较呢……”“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二十大上就是这样……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的印象是可

怜巴巴的,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让人觉得好笑。我们的党还是那个老样子:阿谀奉承,拍马屁,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机关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培养了一些打手。”<sup>91</sup>

许多与会者纷纷发言,对奥尔洛夫<sup>92</sup>的发言表示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扭转讨论的话题,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奥尔洛夫被叫到了热工学研究所政治处,在那里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补充说,他早在1946年在部队当兵时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当时他就对一些军官说过,党内所有的人服从一个人是不正确的,1947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时向同年级的大学生说过同样的话。<sup>93</sup>

这次党员大会上发生的事情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注意,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某些人在讨论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恶意攻击的决定》。<sup>94</sup> P. Г. 阿瓦洛夫、Ю. Ф. 奥尔洛夫、B. E. 涅斯捷罗夫、Г. И. 谢德林被指控“鼓吹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攻击党和苏维埃机关,犯自由主义。他们被开除出党、责令该研究所的所有党员必须进行重新登记,研究所政治处主任被撤职。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发生的事只不过是一个典型例子,在契卡洛夫、基辅、萨哈林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实际上当时全国各地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的议论。

133

看来,对于诸如什么是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他在苏联历史中起到了什么作用等问题,需要拿出明确、标准的说法,为此准备专门召开一次中央全会,由朱可夫元帅作主要报告,就1945年后出现的那些问题进行更详尽的阐述,因为讲述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是朱可夫元帅的强项。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元帅给赫鲁晓夫寄去了一封关于军事问题的短信,他在信中说,自己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即将寄出,请赫鲁晓夫阅毕提出意见。<sup>95</sup>在这份发言稿中,朱可夫元帅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全面抨击,朱可夫说:“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直到最近依然是个人迷信横行……某些同志认为,继续深入讨论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问题是不合适的,因为他们认

为,深入批评个人崇拜将给党的事业和我国的武装力量造成危害,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

朱可夫元帅不同意这种估价。他首先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年代的作用进行了全面评价,受到朱可夫元帅尖锐批评的不仅有死去的最髙统帅斯大林,还有斯大林的一些战友、健在的党和国家髙层领导人。朱可夫元帅在指出红军对德国进犯缺乏准备后写道:“斯大林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维·米·莫洛托夫知道不知道德军在我国边境附近大量集结呢?他们是知道的。”之后朱可夫援引了许多呈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侦察报告,以证明德国当时已经作好了进攻苏联的准备。

朱可夫还提供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材料。他说,斯大林在1941年6月22日3时25分就收到了朱可夫关于德国开始对苏联采取军事行动的报告,但是他命令朱可夫不要开火,因为斯大林认为这不是战争,而是德军小股部队进行挑衅。直到早上6时30分,斯大林才决定下达开始战斗行动的命令。<sup>96</sup>

朱可夫元帅的报告稿中有几处专门讲述斯大林如何对待武装力量的一些髙级将领,例如,“关于所谓的‘斯大林战役’、‘斯大林军事科学’和关于消除个人崇拜的”任务;“关于不正确对待从法西斯战俘营返回祖国的军人”。他列举了许多事实说明个人崇拜给军队指挥人员造成的后果,证明那些在战争初期因被指控背叛和指挥不力而被枪决的将军是无罪的,捍卫了那些被俘后逃脱、战后被枪决和关禁闭的军官的荣誉和人格。

朱可夫元帅认为,估价苏联的军事成就必须摈弃妄自尊大和盲目自信,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战争经验必须认真研究,“苏军的军事思想工作质量低下,有时脱离了具体的训练任务”。

不难看出,朱可夫元帅希望把对斯大林的批评进一步深入下去,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为一些军队指挥人员彻底恢复名誉,促进军官队伍职业化,无成见地研究潜在敌的经验,减少党机关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然而,老广场的政治之风吹向了另一边。朱可夫元帅对斯大林的有根有据的尖锐批评不被看好,他的报告稿被打入了冷宫,被搁置在苏

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将近40年时间。党内新理论家Д. Т. 谢皮洛夫和朱可夫的老战友尼·亚·布尔加宁促成了这种结果,当然,尼·谢·赫鲁晓夫本人是同意这样做的。原定的代表大会没有召开,改为由苏共中央向所有党组织下发一封题为《关于讨论二十大决议情况总结》的非公开信,以期制止“思想混乱”现象,明确规定在批评斯大林个人崇拜时哪些情况是允许的,哪些情况是不允许的。确定成立一个由苏共中央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为首的小组负责非公开信的起草工作。

1956年6月16日,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递交了非公开信的初稿。初稿详细介绍了全国各地讨论“秘密报告”的情况,指出某些人在讨论中进行民族主义蛊惑宣传和提出一些挑衅性问题,某些作家和艺术家在讨论发言中“反对党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反对在文学艺术创作活动中坚持党性的原则”。<sup>97</sup>

让苏共领导人更为不安的是,“党的敌人利用党内民主来反对党”<sup>98</sup>。尽管党内民主被限制在极小的范围内,但是它与苏联共产党的建党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是完全不相容的。非公开信的初稿中说,有些共产党员“打着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号全面否定领导人的作用”;他们认为,“集体领导的原则与领导人的个人威信和执行领导人指示的必要性不能并存”。

在非公开信初稿中,撰稿人冒险指出了不满情绪的客观原因。例如,初稿中说,许多企业修改了生产定额,降低了计件工资定额,引起了工人不满。增加生产定额的同时没有采用更完善的新工艺,“许多企业只是单纯地降低计件工资定额,导致工人的劳动工资急剧下降”。<sup>99</sup>

初稿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被全部删除,其原因可想而知:在中央文件中提起这个问题无疑只会引起新的不满情绪。

仅靠散发非公开信显然是不够的。

于是,苏共中央又于1956年6月30日出台了《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和消除其后果》的决定,这份文件对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表现性质及其造成的后果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苏共中央的这一决定明确指



出,之所以产生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因为,“往日的阶级”同苏维埃政权的政策顽抗到底,苏联身处的国际环境复杂,党内有矛盾,存在着尖锐的派别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党不得不放慢民主化进程,“提高警惕性,加强中央集权制”。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是如此,一方面说他是个忠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杰出活动家,另一方面又说他滥用职权。

## 二十大与社会主义阵营

135

在苏联领导人看来,中欧国家除了具有意识形态价值以外,还具有地缘政治价值。欧洲随时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西德尤为让他们感到不安。自从1955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加入北约以后,苏联领导人的这种不安与日俱增。苏联采取的对等步骤是在1955年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参加该组织的有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华沙条约为苏军进驻这些国家提供了合法理由。

赫鲁晓夫未必能想到,诸如谴责斯大林的错误和苏联过去的镇压等一些纯属苏联内务的事情,竟然成为一些中欧国家出现反共言论的导火索,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实际上在斯大林死后不久就开始发生动荡。莫斯科重新评价过去(“揭发”贝利亚,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下台)为中东欧各国执政的上层人物提供了先例,他们开始谋求各自的利益。这些国家的领导层中存在着各种各样争夺权力和影响力的集团,他们在相互角逐中不择手段“玩弄俄国牌”,寻求苏共中央的帮助和支持,指责对手犯有政治错误和罪行,借“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索要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兄弟的国际主义援助”为名,行权力斗争或保住自己权力之实。

斯大林死后不久,大部分“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领导层开始动荡,政治局势开始趋向紧张化。1953年6月,苏联党政代表团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谈判<sup>100</sup>。会晤中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对当时的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格罗、法尔卡什和雷瓦伊提出了批

136

评,指责他们垄断权力,要求他们改变经济活动的优先方面,充分考虑本国特点,增加政界领导层中匈牙利人的比例(当时匈牙利政界领导人中犹太人居多),为受到政治镇压的人平反。苏共领导人还指责拉科西在国内搞大规模镇压(仅1952年九个月中,匈牙利就有54万人被判罪)<sup>101</sup>,并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建议把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的职务和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分开,因为这两个职务由马·拉科西一人担任。苏联领导人坚持让政治局委员、副总理伊·纳吉担任匈牙利总理<sup>102</sup>。

1953年7月,伊·纳吉被任命为匈牙利总理,他随即宣布进行一系列经济改革和为一系列政治诉讼案的被告恢复名誉。1951年被判终身监禁的前匈牙利共产党副总书记兼内务部长亚诺什·卡达尔获释。

伊·纳吉(“匈牙利的马林科夫”)后来落了个与马林科夫同样的命运。在1953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受到了批判,说他主张加快发展轻工业,导致重工业停滞发展,此外,还指责他搞平民主义,免去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年1月,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马·拉科西在莫斯科同苏联领导人会晤时指责伊·纳吉右倾,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伊·纳吉被免去匈牙利总理职务。拉科西走得更远——1955年4月14日,伊·纳吉被免去所有职务和开除出党,匈牙利的改革停止了脚步。<sup>103</sup>

马·拉科西及其追随者的这些举措给匈牙利造成极其不良的后果,这个国家发生了全面危机——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匈牙利在危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中欧各国都在发生变化,匈牙利依然故我,拉科西的镇压制度成为正在发生剧变的中欧的残留物,对马·拉科西的不满情绪遍及整个匈牙利劳动党。

在匈牙利的邻国波兰,党的领导层内部在1954年到1955年期间争吵不断。被视为搞斯大林那一套的波兰共产党人领袖博·贝鲁特一派与试图摧毁镇压制度的部分党的领导层发生冲突,波兰社会安全部被解散,许多政治犯获得了自由,其中包括前波兰工人党总书记瓦迪斯

瓦夫·哥穆尔卡。

苏联发生的事件(审判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为一些政治活动家平反,克里姆林宫内的权力角逐,一些领导人被指控参与镇压)无疑对波兰社会产生了影响。

波兰同样存在谁应该对过去的罪行负责的问题,波兰人民更加有理由注视这个问题的进展情况。“卡廷事件”、“波兰一分为四”的伤口还在流血,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给波兰造成了严重后果。严格的报刊检查开始松动是当时波兰社会形势的一个特点,1955年,波兰报刊上出现了许多批评当局的文章,这个国家的社会紧张程度开始加剧。

137

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的消息差不多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博·贝鲁特在莫斯科去世的消息同时传到了波兰。华沙面临确定党的新领袖,这不可避免导致“上层”的冲突加剧。1956年3月15日,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抵达波兰,赫鲁晓夫除了参加博·贝鲁特的葬礼以外,还要参与确定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的人选。赫鲁晓夫在谈判中持谨慎的立场,竭力阻止斯大林主义的公开拥护者获得这一职位,提出让中派人物爱德华·奥哈布作为第一书记的人选。赫鲁晓夫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证明,他力图使与会者相信他无意干涉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人事问题。<sup>104</sup>

这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向波兰的基层党组织传达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各方面对这一决定的反应十分强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什切青市委员会,工作人员竟然讨论起关于重新评价华沙起义、关于在卡廷枪决波兰军官、关于驻波兰苏军是否合法的问题。在格但斯克、比得哥什、托伦——全国到处都在争论波苏关系、斯大林和斯大林分子等问题。波兰的其他一些政党——联合农民党、民主党开始蠢蠢欲动。

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1956年6月28—29日,波兹南发生示威游行,参加者举着“自由!”“面包!”“上帝!”“打倒共产主义!”的标语牌。示威游行过程中发生了街头冲突,安全部门派部队介入,对示威游

行者开火,后来动用了正规军镇压,共打死70人,打伤将近500人。<sup>105</sup>一个月以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七次全体会议,波兰的政治发展道路问题再度成为争论的焦点,与会代表纷纷要求恢复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撤销原先对他提出的“右倾和民族主义倾向”的指控。

苏共二十大和波兰事件立即在匈牙利引起反响,1956年4月底,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尤·弗·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报告说,匈牙利领导人马·拉科西和安·赫格居斯认为,恢复“右倾分子”亚·卡达尔和约·雷瓦伊<sup>106</sup>在党内的领导地位是不合适的,他们希望苏联领导人相信这一点。这本身就是对苏共二十大决议的反驳,匈牙利的斯大林追随者不愿意为以前党的领导人恢复名誉。

1956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叶·伏罗希洛夫同马·拉科西举行了谈判,谈判的结果显然让伏罗希洛夫焦急不安。他在呈送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中说,匈牙利的经济形势恶化,拉科西在党内和知识分子中的威信下跌,大部分匈牙利人希望“得到西方和东方的物质援助”。<sup>107</sup>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为此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匈牙利局势,出席会议的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B. H. 马林后来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这次会议的一些情况,文章虽然很短,但是它成为证明匈牙利事件以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和苏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了哪些决策的最宝贵材料。在收到伏罗希洛夫的报告后,1956年6月9日和12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决定派阿·伊·米高扬前往匈牙利,实地调查匈牙利发生的事件。决议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的破坏活动针对波兹南和匈牙利,他们打着独立的旗号削弱国际主义联系,以达到分离和各个击破的目的……”<sup>108</sup>

米高扬在1956年7月13日抵达匈牙利,先后会见了马·拉科西、安·赫格居斯、埃·格罗、匈牙利劳动党佩斯州州委书记亚·卡达尔和其他一些党的活动家。苏联代表对匈牙利的局势表示严重不安,要求

拉科西自愿放弃中央第一书记职位。米高扬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尤·弗·安德罗波夫就第一书记职位的可能人选问题进行了紧急磋商,他们提出的人选中包括亚·卡达尔。但是,匈牙利的大部分中央委员推举拉科西的老战友埃·格罗为第一书记,亚·卡达尔当选中央书记(匈牙利劳动党实际上的第二书记),另一名中央书记由伊·科瓦奇担任。<sup>109</sup>

匈牙利劳动党领导层对所采取的这些步骤反应不一。有人向莫斯科告密说,拉科西的追随者企图复辟资本主义。<sup>110</sup>但是,拉科西被免去中央第一书记以后,匈牙利的紧张局势在一段时间中有所缓和。尤·弗·安德罗波夫也向莫斯科报告了这一情况。

但是,邻国波兰的局势继续恶化。1956年8月2日,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波兰统一工人党内的领导地位被恢复。1956年10月初,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开始就哥穆尔卡及其追随者进入最高领导层问题进行谈判,波兰的政治进程开始具有雪崩的性质。10月12日,哥穆尔卡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委员。10月17日,他成为新政治局筹备小组的成员。新组成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定于10月19日召开第八次全体会议。波兰领导人在研究这些问题时忽视了邀请莫斯科的客人参加,气氛骤然紧张起来,驻扎在波兰境内的苏军随时可能对波兰的局势进行干预。10月19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抵达华沙,紧张气氛达到了最高点。

双方进行了激烈争吵,关系处在破裂的边缘。在哥穆尔卡提出波兰不打算退出华沙条约的保证后,苏联领导人才善罢甘休。苏联领导人最终同意让哥穆尔卡担任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并同意让战后不久被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 K. 罗科索夫斯基离开波兰。毫无疑问,苏联方面作出这一让步与哥穆尔卡受到国内居民广泛支持有关。 139

波兰发生的事件受到匈牙利的热烈支持。9月中旬,匈牙利各地爆发大学生学潮。在布达佩斯、德布勒森、米什科尔茨、塞格德、松博特海伊、佩奇等城市,大学生们要求摒弃斯大林式的治理国家方法,停止



在高等院校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密切注视匈牙利发生的事情。10月20日,主席团召开会议,首先向与会者报告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代表团已抵达华沙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中央全会,之后听取关于匈牙利局势的介绍。会议决定由朱可夫下令让士兵返回自己的部队,召回驻匈牙利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莫斯科在作出这一决定时考虑到了处理波兰问题的经验。<sup>111</sup>

10月22日,布达佩斯综合技术大学的学生提出了如下要求: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把斯大林分子从领导层中清除出去,扩大社会主义民主,恢复伊·纳吉的总理职务,给农民减免税收。此外,还呼吁实行多党制,进行自由选举,恢复使用旧的国家标志,苏军撤出匈牙利。10月23日,布达佩斯发生数万人参加的示威游行,伊·纳吉成为最受欢迎的政治家。示威者聚集在议会大厦前,要求党的领袖埃·格罗向他们发表讲话。埃·格罗在广播讲话中没有表现出任何寻找妥协的意图,反而以镇压相威胁。作为对他这次讲话的回应,部分示威者向斯大林纪念像进发,试图将其推倒。另一部分示威者要求面见格罗,遭到议会大厦楼顶发射的火力阻击。一些警察和军人站到了示威者一边,对抗转化为武装斗争。<sup>112</sup>

10月23日,赫鲁晓夫在政治局召开会议之前同格罗通了一次电话,后者坚持请求苏军进入首都,赫鲁晓夫要求格罗递交书面请求,格罗推说不可能召开部长会议。最后两人商定,由总理赫格居斯以后补寄书面请求。10月23日深夜,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朱可夫报告匈牙利局势。他说,布达佩斯发生大规模群众示威,广播电台被焚毁。在德布勒森,州委大楼和内务机关大楼被占领。

赫鲁晓夫果断决定:必须进兵布达佩斯。布尔加宁表示支持,米高扬反对。请看当时的会议记录,米高扬说:“没有纳吉就控制不了局面。我们怎么能轻易出兵,关我们什么事?让匈牙利人自己去整顿秩序,出兵只会坏了我们的事情,先试一试采用政治的途径,然后再出兵也不迟。”莫洛托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不同意米高扬的意见,坚持

必须出兵。卡冈诺维奇、朱可夫、苏斯洛夫肯定地说,匈牙利的局势不同于波兰,匈牙利“政府随时可能被推翻”。

不过,赫鲁晓夫也不排除寻求妥协的可能。他说:“应该让纳吉参与政治活动,但是暂时不能让他担任总理。”<sup>113</sup>会议决定派遣苏斯洛夫和米高扬前往布达佩斯就地考察局势。

与此同时,军事机器加快了运转速度。10月23日23时,驻扎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喀尔巴阡军区的五个步兵师拉响了战斗警报,两个歼击航空兵师和两个轰炸航空兵师进入了战斗准备状态。10月24日清晨,一个特种步兵军进入布达佩斯,准备占领这座城市的一些最重要的设施<sup>114</sup>,苏联军队开始同起义者发生冲突,匈牙利国家安全机关的部队协同苏军行动。<sup>115</sup>

匈牙利首都的局势尚不明朗。10月24日,伊·纳吉成为匈牙利总理<sup>116</sup>,进入党的最高领导层。已经抵达布达佩斯的米高扬和苏斯洛夫认为,匈牙利党的领导人过分担心,武装抵抗的据点已被迅速摧毁。10月25日,格罗被撤去匈牙利劳动党第一书记职务,被亚·卡达尔取而代之。新任总理伊·纳吉10月25日在发表广播讲话中声称,苏军将在“恢复和平和秩序后立即撤出”。<sup>117</sup>10月26日,匈牙利成立执政内阁——政府和匈牙利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各党派联合成立的临时机构,其成员包括亚·卡达尔,伊·纳吉,安·赫格居斯,安·阿普罗和埃·桑托。全国各地建立的工人委员会纷纷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亚·卡达尔在会见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时说,“我们控制不了局面,人民群众已经不听我们的话了,党在工人阶级中的威望急剧下跌,特别是由于过去的错误”。他还指出,反犹太人和反苏情绪正在居民中蔓延。<sup>118</sup>

10月27日,匈牙利成立新政府,政府成员中包括非共产党的代表。伊·纳吉对苏联代表说,匈牙利领导人“除了准备动用军队镇压叛乱以外,还打算与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和解”,他认为,仅依靠苏联军队和部分党员可能只会导致党在人民中陷于孤立和“为美国人进来打开通道”。与此同时,亚·卡达尔提出,“鉴于有的省局面动荡”,请苏联增派军队,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向莫斯科报告了卡达尔的这一

请求。<sup>119</sup>

苏斯洛夫和米高扬还向莫斯科报告说,他们建议把一些“有影响的小资产阶级民主社会活动家”吸收进匈牙利政府。<sup>120</sup>显而易见,克里姆林宫的这两名使者同意伊·纳吉提出的和平解决冲突的方针。

表面上看,匈牙利的领导人在如何摆脱危机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实际上隐藏着深刻矛盾。一些政治活动家(安·赫格居斯,伊·科瓦奇,安·阿普罗)坚持认为必须用武力消灭抵抗力量;另一些人(佐·瓦什,弗·多纳特)认为必须进行谈判。<sup>121</sup>10月28日,伊·纳吉在再次发表广播讲话中不再把学潮称为反革命骚乱,而称其为人民民主运动。纳吉发表广播讲话后,匈牙利工会代表要求按照波兹南夏天发生的事件,把匈牙利事件定性为“民族民主起义”。当天,发表了停止战斗行动的声明,在征得苏联代表同意后解散了所有的安全机构。<sup>122</sup>

莫斯科也出现了意见分歧。朱可夫元帅在10月2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建议不要消灭抵抗据点(有两个抵抗据点,一个设在布达佩斯“基利安”兵营,另一个设在“科尔文”影剧院),认为应该表现出政治灵活性。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持另一种意见,他们指责米高扬和苏斯洛夫没有完成交给他们的工作,过于软弱和让步。莫洛托夫说:“局势越来越糟糕……事情到了我们向他们投降的地步。纳吉刚刚发表了反对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同志心中无数,总是商量,让步,让到什么时候为止……关于同苏联友好问题,关于我国出兵帮助的问题——这是最起码的问题。米高扬同志总是说……”布尔加宁坚决支持莫洛托夫的意见,要求“马上给米高扬打电话,告诉他,匈牙利劳动党政治局必须当机立断,否则我们就不管他们了,我们该怎么干就怎么干,可能的话,由我们来指定政府人选。”<sup>123</sup>

赫鲁晓夫认为,必须“考虑现实情况”。他担心一旦冲突加剧,纳吉有辞去政府首脑的危险,匈牙利的联合政府就会垮台,匈牙利军队可能站到起义者一边。赫鲁晓夫建议支持匈牙利的新政府,帮助它在各个省站稳脚跟。赫鲁晓夫说:“我们可以向居民、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发出呼吁,发一个告人民书,否则只有开枪。”他建议动员中国、保加利

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共产党向匈牙利领导人发出呼吁,同时又说:“必须坚决镇压武装的起义者”。

卡冈诺维奇支持赫鲁晓夫的意见,他说:“用不着指责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他们做得对……如果不支持匈牙利政府,那只有出兵占领这个国家,这和我们的目标相去甚远,还是支持为好。”卡冈诺维奇建议同意匈牙利新政府“关于撤军”的宣言。马林科夫、朱可夫、萨布罗夫同意卡冈诺维奇的意见。赫鲁晓夫在总结讨论结果时说,应该支持匈牙利政府,告诉纳吉和卡达尔:“我们支持,你们用不着发表什么宣言。我们停火,把军队撤出布达佩斯,但是有一个条件,抵抗据点也必须停止射击。”赫鲁晓夫补充说:“英国人和法国人正在埃及惹出麻烦,我们别和他们一样。”<sup>124</sup>

10月29—30日,苏军开始撤出布达佩斯。10月3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建议同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商谈关于苏军从一些人民民主国家撤出的问题,大部分主席团成员认为,从越南和其他一些国家撤军势在难免。谢皮洛夫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同一些人民民主国家的关系出现危机,反苏情绪蔓延。”他呼吁查明这些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消除驻外军队引起的不满成分。谢皮洛夫说:“关于武装力量,我们应该坚持不干涉的原则。只要匈牙利政府同意,我们就准备撤兵。”142

朱可夫插话说:“……反苏情绪蔓延,从布达佩斯撤军……如果需要的话,就从匈牙利撤军。至于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波兰的军队,这个问题更为重要,应该拿到协商会议(指华沙条约协商会议——作者)上讨论。必须召开协商会议,否则的话,不知道会闹出什么结果。”<sup>125</sup>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马·扎·萨布罗夫看来眼光看得更远一些,他说:“我们在二十大上做了件好事,但是后来没有注意发挥和引导群众的首创精神,我们不能违背人民的意愿。”

这次会议结束后,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进一步发展和加强苏联同社会主义国家友谊和合作的宣言。宣言中说:“最近发生的事件表明,必须重申苏联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互关系中、首先是在经济和军

事领域中相互关系的地位。”<sup>126</sup>10月30日,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一宣言,第二天在报刊上发表。

似乎出现了政治解决冲突的方法。然而,就在开完主席团会议的第二天,即10月31日,莫斯科改变了态度,可以说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此前米高扬和苏斯洛夫从布达佩斯发回的消息表明,匈牙利的局势既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10月31日,赫鲁晓夫和哥穆尔卡通过电话商定,波兰领导人和苏联领导人定于1956年11月1日在布列斯特举行会晤,共商对匈牙利事件的态度。作者认为,促使赫鲁晓夫态度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原因在远离匈牙利的地方。

10月30日夜,以色列军队入侵埃及。24小时后,英国和法国政府向埃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

- 埃及在12小时内停止在陆地、海上和空中的一切军事行动;
- 埃及军队从苏伊士运河后撤十海里;
- 埃及允许英国和法国军队占领塞得港、伊斯梅利亚运河和苏伊士运河的关键阵地。

英国和法国威胁说,如果埃及不接受这些条件,将对它发动武装干涉。<sup>127</sup>

苏联立即作出了反应,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递交了谴责以色列侵略的议案。英国和法国动用了否决权,美国投了弃权票。

10月31日,英军和法军开始对埃及发动进攻。

143 世界本来已经形成的平衡遭到了破坏,赫鲁晓夫马上作出了强烈反应,在他看来,现在有足够的理由加强苏联在匈牙利的地位。他在10月31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引自会议记录):

“应该重新估评形势。军队不要撤出匈牙利和布达佩斯,要采取主动措施,整顿匈牙利的秩序。如果我们离开匈牙利,只会使帝国主义者——美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振作精神。如果我们表现软弱,我们的党不会饶恕我们,他们就会得寸进尺,得到埃及之后还想得到匈牙利。我们别无选择……”

应该成立以卡达尔为首的临时革命政府……邀请这个政府就撤军



问题进行谈判……如果纳吉同意,就让他当副总理。明尼赫请求我们提供帮助,我们就帮助整顿秩序。应该同铁托谈判。告诉中国的同志,告诉捷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不会打大战的。”<sup>128</sup>

从会议记录可以看出,只有萨布罗夫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他说:“昨天讨论了一天都白搭了。我们这样决定反而证明北约是正确的。”<sup>129</sup>

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出决定以后,马上开始为动用苏军镇压匈牙利的起义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米高扬回到了莫斯科,但是他呼吁“再等待10—15天,以便向匈牙利政府提供支助”。然而,伊·纳吉没有得到苏联政府提供的支助。11月2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会见了亚·卡达尔和费·明尼茨,让他们俩人组建一个亲苏的新政府。卡达尔介绍了匈牙利的局势,认为苏联必须进行干预,因为“纳吉的政策含有反革命的成分”,匈牙利的法西斯分子受到奥地利和西德的支持。

11月1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托朱可夫、苏斯洛夫、科涅夫元帅、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以及勃列日涅夫准备“对匈牙利事件采取必要的行动”<sup>130</sup>。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霍尔蒂分子(匈牙利的法西斯分子)从奥地利和西德向匈牙利渗透的消息。奥地利政府提出了抗议,奥地利驻苏联大使正式要求停止报道这类消息。他说,奥地利严守中立,不想参与匈牙利发生的事件。<sup>131</sup>

……11月4日早晨,苏军12个师开始执行恢复苏联在匈牙利影响力的“旋风”行动计划,扶持以亚·卡达尔为首的工农临时革命政府上台成为入侵匈牙利的正式理由。军事行动进展顺利:仅用不到两天时间就摧毁了所有武装抵抗据点。11月7日,亚·卡达尔在苏军两辆装甲车护送下抵达布达佩斯。<sup>132</sup>

苏联的干预造成了人员伤亡。匈牙利人在大小战斗中共死亡2502人,伤19226人,苏联方面共计死亡和失踪720人,伤1540人。20多万匈牙利人逃离这个国家。 144

苏联创造了动用苏联兵力兵器解决“社会主义阵营”争端的先例,

社会主义国家从此对苏联心存疑虑。苏联扮演了欧洲人所共知的 19 世纪上半叶俄国在波兰和匈牙利“整顿秩序”的宪兵的角色。

匈牙利事件也在苏联引起巨大反响,它成为发生几乎席卷整个苏联的大学生学潮的原因之一。在 11 月 4 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除了讨论涉及匈牙利的问题以外,还专门讨论了“关于清除高校中不良分子”问题,朱可夫、赫鲁晓夫、福尔采娃和别尔乌辛就这个问题发表了讲话。会议的决议中写道:“责成福尔采娃、波斯佩洛夫、谢皮洛夫、叶留金(B. П. 叶留金当时任苏联高教部长——作者)就清除高校不良分子问题提出意见。”<sup>133</sup>

### 对 1956 年的政治总结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 1956 年作出了政治总结。这一年以苏共二十大开始,以波兰学潮、苏军镇压匈牙利反共骚乱、苏联国内的不满情绪有增无减结束。总的看来,这一年的情况很糟糕。1956 年 12 月 14 日,主席团讨论了苏共中央致各党组织的公开信初稿,题为《关于加强党组织在击退反苏敌对分子攻击方面的工作》<sup>134</sup>,这封公开信由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专门成立的一个委员会起草,委员会成员有:苏共中央书记、主席团候补委员列·伊·勃列日涅夫(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主席团委员格·马·马林科夫,中央书记阿·鲍·阿里斯托夫,中央书记 H. И. 别利亚耶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亚·谢罗夫,苏联总检察长 P. A. 鲁坚科。公开信初稿被赞同,只是对标题稍加进行了修改,最后改成《关于加强党组织在群众中开展政治工作和击退反苏敌对分子的攻击》。

1956 年 12 月 19 日,主席团决定把公开信下发所有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市和地区的党委,供所有基层党组织讨论。遗憾的是,这封公开信从未被认真研究过。<sup>135</sup>

这封公开信和各地党组织讨论公开信的情况反映了二十大后苏联的社会情绪。让我们先来看看这封公开信的内容。<sup>136</sup>

公开信开头几句话就引人注目：“最近一段时间，国际紧张局势有所加剧，反苏分子加强了反对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敌对活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引起全党注意，动员共产党员加强群众性政治工作，坚决击退反苏分子的攻击。”公开信紧接着指出，“最近以来，反苏敌对分子活动猖獗”，“匈牙利有些人打着争取自由和民主的旗号，利用部分居民对匈牙利前国家和党的领导人所犯错误的不满情绪，进行反对匈牙利人民的反革命勾当。”

苏共中央在公开信中承认，匈牙利事件对苏联国内、甚至党内形势产生了直接影响。“在国际反动势力的影响下，我国一些敌视社会主义制度的残余反苏分子企图利用我们的暂时困难以达到他们的卑鄙目的……他们利用某些共产党员和党组织领导人的政治上冷漠和庸俗的宽厚，打着批评和自我批评、‘争取民主’的旗号，从事敌对活动……”公开信指出，“有这种观点的人在苏联亿万人民中只占极少数……不少例子说明，一些共产党员和党组织领导人对反苏宣传没有予以坚决制止，对敌对分子的攻击不进行反击……有些共产党员丧失党性，打着与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的旗号，滑向反苏立场，对党进行蛊惑人心的攻击，怀疑党的路线的正确性……一些党组织态度消极，回避这些事实……没有组织党员对反党言论进行反击，没有采取果断的措施制止反苏敌对分子的活动，这是极其危险和绝对不能容许的。应该直截了当地说，许多党组织已经忘记，与反苏敌对分子进行不调和和最坚决的斗争是党的一贯立场。”

公开信列举许多批判个人崇拜“扩大化”的例子——不仅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且批判导致出现个人崇拜的制度。事实证明，一些青年、大学生以及创作团体和学术单位的知识分子受这些思想影响最深。公开信特别指出，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考纳斯、塔林、埃里温等城市，一些青年进行了反苏演讲，例如，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工学院学生涅梅尔科夫在该院举行的共青团会议上发表反苏演讲，受到了与会者的支持，该院党组织领导人没有对他进行反击。在立陶宛，一些大学生对匈牙利的暴乱分子表示声援。

党的领导人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恶化。公开信中说：“最近一段时间，一些政治上不成熟、庸俗习气严重的文学艺术工作者背离了党的立场，试图怀疑党在发展苏维埃文学艺术所坚持路线的正确性，放弃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提出了文学艺术不要党的领导和确保‘创作自由’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要求。”公开信举例说，作家康·格·帕乌斯托夫斯基公开发表演讲，为苏联俄罗斯作家弗·德·杜金采夫的长篇小说《不只是为了面包》辩护；苏联俄罗斯女作家奥·费·别尔戈利茨反对苏共中央1946—1948年通过的关于文学艺术问题的决定。公开信点了一些学术期刊的名字（《历史问题》，《哲学问题》），苏共中央认为，这些期刊上一些阐述国家社会政治历史和社会思维问题的文章有严重错误。

公开信指出，苏联社会上出现了新动向——一些被大赦和恢复名誉的人，“特别是前托洛茨基分子、右派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他们仇视苏维埃政权”，这些人的观点对社会意识产生了一定影响。

公开信号召国家安全机关的共产党员“明辨是非，捍卫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警惕敌对分子的阴谋，依照苏维埃政权的法律制止各种犯罪活动。”

公开信散发全国，并要求所有党组织讨论。这是苏共中央在一年内发出的第三封公开信。

公开信发出后马上产生了效果。从各地呈送的讨论公开信总结报告中可以看出，不少人公开表示不满，其中包括一些共产党员。公开表示不满当然很危险，列宁格勒市委书记Ф. P. 科兹洛夫的总结报告说明了这一点。<sup>137</sup>列宁格勒石油学院四年级学生布罗，由于诬蔑苏联制度被开除团籍，由于同样原因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有：军事机械学院学生卡列林，外语学院学生涅斯捷罗夫和研究生斯季利维。因散布反苏言论被逮捕的有：工艺学院副博士戈洛瓦诺夫，苏联科学院某研究所工作人员鲁达科夫，列宁格勒大学学生克拉西利尼科夫。

一些被平反出狱的老布尔什维克让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十分头疼，

“因为他们中某些人的反苏言论对一部分青年人具有腐蚀作用”，Ф. Р. 科兹洛夫在总结报告中提到了几个经常批评党和政府政策的老布尔什维克的名字，他们是 М. И. 切尔尼亚克（1915 年入党），斯捷潘诺夫（1920 年入党），О. Я. 布赖特什特劳斯（1932 年入党）。

不要认为对党和政府的政策提出批评的人都是知识分子，列宁格勒一些工厂，如“列宁格勒水路管理局”、以加里宁的名字命名的“金属工业工人”等工厂的工人也公开表示不满。

赫鲁晓夫本人也介入了关于斯大林和个人崇拜的争论。为了表明自己对斯大林的看法有所改变，他选择了一个合适的场合：1957 年 1 月 1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一天后（1 月 19 日），《真理报》详细报道了赫鲁晓夫在招待会上的讲话。众所周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对批评斯大林持谨慎态度，不同意对斯大林提出尖锐批评。更为重要的是，赫鲁晓夫竟然在那里宣布斯大林可以成为共产党人的榜样，他说：“但愿每个共产党员都能像斯大林那样奋斗。”赫鲁晓夫在承认斯大林有“缺点和错误”的同时，又把这些“缺点和错误”的原因归结为他的性格特征以及阶级斗争的尖锐性和不可调和性，说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斯大林的个人悲剧”。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这次讲话显然与他不到一年前宣读的“秘密报告”截然不同。其后果之一是，赫鲁晓夫的这次讲话引起了社会上那些在二十大以后跟他走和相信他的人大为不满。

对这种陡然改变方针表示抗议的信件雪片般飞向中央委员会。图阿普谢市一位名叫 М. 彼得雷金的工程师在写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一封公开信中说：“人们对尼·谢·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秘密会议上的讲话和苏共中央随后就这一问题散发的公开信还记忆犹新。如果把尼·谢·赫鲁晓夫过去的讲话同他 1957 年 1 月 17 日的讲话进行对照就会发现，苏共中央有两个尼·谢·赫鲁晓夫：一个尼·谢·赫鲁晓夫坚持列宁主义的原则，公开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另一个尼·谢·赫鲁晓夫为斯大林执政 20 年的缺点和错误辩护……尼·谢·赫鲁晓夫的讲话只是起到了混淆视听的作用，使人们对斯大林的



个人崇拜及其后果能否在我们国家得到彻底消除更加怀疑……”

但是,苏共中央也收到了不少内容截然不同的信件。1957年1月,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在听了格·伊·彼得罗夫斯基<sup>①</sup>在他们那里发表讲话后,给苏共中央寄去一封口气尖锐的信。他们在信中指责这位前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过去厚着脸皮讨好和巴结斯大林,现在又往斯大林脸上抹黑。“我们认为,对斯大林的任何污辱,特别是出自您、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之口的污辱,简直是杜勒斯、阿登纳以及季托夫之流求之不得的战利品。”<sup>138</sup>

148 1957年4月,里加市一名老布尔什维克(女)在信中说,在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斯大林的名字竟然被忘却,她感到气愤无比。她写道:“二十大以后,中国共产党人是怎么告诉我们的:不应该忘记斯大林的功勋。”<sup>139</sup>

值得注意的是,苏共中央有关机关对收到的所有信件都进行了分门别类,以便于所有中央书记和主席团成员阅读。

1957年2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共中央党机部对俄罗斯联邦各党组织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情况进行总结后,拟制了一份题为《关于某些共产党员在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发表反党言论》的文件,文件上注明的日期是1957年2月12日,文件的附件上注明的日期为1957年2月21日。<sup>140</sup>

这份文件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它谈到了俄罗斯一些大城市的工厂工人、工程师和职员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反应。

一个“共产主义建设工程”(古比雪夫水电站)的党组织在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出现了批评苏共中央的声音,一些工程师、工地负责人和施工工人说,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的问题,似乎有不对劲的地方,一开始谴责斯大林,现在又开始重新吹捧他。有的人说,文学艺术不需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妨碍文学艺术的发展,“许多作品让人厌恶,没有

---

<sup>①</sup>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彼得罗夫斯基(1876—1958),苏联国务和党的活动家,1919—1938年任全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什么好看的……套话空话太多。”工人们对生活状况不满意，“讨论快要结束的时候，电工捷尼亚金同志提出了一个挑衅性问题：苏联人的最低生活费究竟是多少？”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铸造厂在组织党员讨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老共产党员安德烈耶夫批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对某些政治局委员进行诽谤”（上面已经提到，马林科夫主张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和发展轻工业，赫鲁晓夫反对），“吹捧党和人民的敌人布哈林、李可夫和季诺维也夫”。后来，安德烈耶夫被开除党籍。

雅罗斯拉夫尔汽车制造厂设计师基谢廖夫在讨论会上批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通篇都是威胁和暗示——“要么保持沉默，要么蹲监狱”。他在党员大会发言中大声谴责苏共中央对匈牙利事件的外交政策，说苏联的报纸不敢报道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讲话。还说波兰哥穆尔卡在民众风潮中上台后举行了“真正的选举，而我们国家还是实行机械呆板的投票”。这位设计师引用列宁的话证明苏联工人的现状不如革命前。

基谢廖夫的发言受到了这个工厂许多党员的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打断他的发言，但是没有取得成功。会后，基谢廖夫被叫到工厂党委办公室，他在那里不仅不承认错误，而且继续辩论。他说：“匈牙利共产党的错误……也是我们党和政府的错误，社会将为这些错误付出亿万卢布的代价。必须对这些错误进行谴责……”他还说，党成了一些向上爬的人和骗子的庇护所。 149

在与这个汽车制造厂相邻的雅罗斯拉夫尔包装器材厂，工人赛金对布尔加宁提出了批评，他说，布尔加宁到全国各地巡游是为了说明自己被撤职的真相（其他工人在发言中也谈到了这个话题）。

俄罗斯联邦苏共中央党机关部在总结报告中还专门提到布良斯克林业技术学院五年级学生进行的一次关于哲学问题课堂讨论，这次课堂讨论上发生的争论被布良斯克州委会说成是一宗政治案件，实际上只不过是一场关于哲学在林业工作中是否有用的争论。一些大学生在争论中说，俄国劳动者总是过苦日子，如果说1913年以前还能吃到白

面包,那么现在连黑面包都欠缺,“为什么给国家提供粮食的集体农庄庄员还要去城市找饭吃”。

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亲自对斯大林进行致命的批评,某些党的领导人试图利用反对个人崇拜谋取利益,导致大量的普通党员开始参与政治生活,这是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应该对苏共中央机关给予应有的评价,“美国之音”和英国广播公司办不到的事让他们做到了,苏共中央的这封公开信让广大的共产党员了解到,原来全国各地对苏联共产主义制度有这么多的不满和批评。讨论公开信反而使社会各界和普通党员产生更多的抵触情绪。

### 最后一个反党集团

苏共中央 1953 年七月全会表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内部还存在尚未解决的矛盾,其中主要是马林科夫的集体领导原则与赫鲁晓夫捍卫的不是赫鲁晓夫的、而是列宁斯大林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之间的矛盾。“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内容是中央集权制和一长制,而苏共中央总书记(第一书记)的决定性作用是一长制理所当然的体现。

捍卫一党专制的斗士成功地利用了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为对付自己政敌的武器,这是那个时代虽然离奇但是确实存在的一种历史现象。

150 上面已经指出,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这两个不久前的盟友第一次公开交锋发生在 1955 年 1 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在那次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指责马林科夫“不仅觊觎政府领导权,而且希望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领导位置”,还捎带指责马林科夫追求在人民中的“廉价的声望”。正是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马林科夫第一次被指控参与制造“列宁格勒案”,不过,在对阿巴库莫夫的审判正式结束后,这个问题已经不属于刑事犯罪范畴,而是一个党内问题了。一月全会以后,马林科夫被免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保留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位置,后被任命为能源部长。此前担任苏联武装力量部

部长、一个毫无开创精神、性格软弱的人(有文献资料为证)——尼·亚·布尔加宁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之间的冲突在苏共二十大筹备期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后来,在1957年召开的六月中央全会上,莫洛托夫回忆说:“我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1955年1月收到过赫鲁晓夫同志准备在二十大上宣读的总结报告稿(请读者注意,这说明本来是打算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作总结报告的),那里面说:‘十九大以后不久,死神夺走了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约·维·斯大林的生命。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我们党在30年中实现了列宁的遗训’……但是,在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这些话不见了。”莫洛托夫还指责赫鲁晓夫违背1955年4月28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决定,不让主席团成员“接触有关约·维·斯大林的档案材料”<sup>141</sup>,这显然是对主席团成员的歧视。

二十大没有使党内高层人物的斗争暂时告一段落。由谁来管理国家——由党通过党的机关或是由国家机构在党的帮助下进行管理,依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时的局面具有过渡的性质,从党机关领导人的组成中可以看出这一点。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别尔乌辛、萨布罗夫、赫鲁晓夫等人仍旧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组成人员,这些人都是在斯大林去世的那一天“自我邀请”到主席团的,后来理所当然地成了主席团委员。二十大召开前(1955年七月中央全会)增补了安·帕·基里连科和米·安·苏斯洛夫为主席团委员。主席团候补委员变化较大,大部分都是新人——列·伊·勃列日涅夫,格·康·朱可夫,Н. А. 毛希丁诺夫,叶·阿·福尔采娃,尼·米·什维尔尼克,Д. Т. 谢皮洛夫。中央书记处成员有:尼·谢·赫鲁晓夫(第一书记),阿·鲍·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列·伊·勃列日涅夫,彼·尼·波斯佩洛夫,米·安·苏斯洛夫,叶·阿·福尔采娃,Д. Т. 谢皮洛夫。<sup>142</sup>

二十大以后,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成员们开始感觉到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那只强有力的手”。什么事都是赫鲁晓夫说了算的旧的“好传统”再度恢复,这对于斯大林时期过来的党的领导人来说显然隐藏

着危险,对斯大林的那种批评随时都有可能落到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头上。他们躲过了使用警察的方法进行权力斗争的贝利亚,却遇到了赫鲁晓夫,一个使用党和政治的方法进行权力斗争和精于此道的人。

151 1957年春夏之交,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在一起商讨如何“制服”赫鲁晓夫的问题。据米高扬证实,关系从1957年2月开始进一步恶化,当时按照某些主席团成员的意见匆匆忙忙开始对工业进行改组,决定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赫鲁晓夫有一次在对文学和艺术活动家发表讲话时直截了当地指出,主席团内部有矛盾,他与马林科夫有过私人冲突。从此以后,关系更加紧张了。

5月20日,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开始商谈如何处置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也参加了商谈。不难看出,大部分主席团成员达成了一致意见,不设第一书记职务。但是,政治局成员未能就政治局未来的管理方式达成一致意见,忠于自己的“集体领导”原则的马林科夫认为,应该由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主持主席团会议,萨布罗夫和别尔乌辛则认为应该由主席团全体成员轮流主持会议。

决定把赫鲁晓夫打发去当农业部长,任命苏斯洛夫为文化部长,免去谢罗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让布尔加宁或帕托利切夫取代谢罗夫。朱可夫的情况比较复杂,也同他进行了商量。后来莫洛托夫回忆说:“朱可夫走到我和其他人跟前说,可以提出不设第一书记的问题,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不设第一书记,可以设公共事务书记的职位。”<sup>143</sup>

按照“党的优良传统”进行的“党内政变”已经准备就绪,时间定在主席团成员准备前往列宁格勒参加庆祝该市建立250周年的前夕。6月18日白天,赫鲁晓夫按原定计划会见匈牙利新闻记者,此时有人向他提出了召集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开会的要求,表面上的理由是商讨在列宁格勒发表讲话的发言稿,8名主席团委员和3名候补委员出席了会议<sup>144</sup>。朱可夫由于在路上耽搁迟到。

临开会前马林科夫曾经找朱可夫谈话,试图说服朱可夫站在他一边,确保罢免赫鲁晓夫的行动得到军队的支持。一开始主动权完全掌



握在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手里。马林科夫首先发言,他提议让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主持主席团会议,并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尖锐批评。但是会上有人要求在第二天继续开会,以便让主席团全体委员都能够参加。这是个原则性问题:大多数主席团委员是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他们的力量足以把赫鲁晓夫立即免职。按照党内惯例,必须凑够法定人数(卡冈诺维奇特别强调了这一点),会上光这个问题就讨论了两个小时,翻来覆去,议而不决,其情景酷似1953年6月26日主席团收拾贝利亚的那次会议。

然而,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很不走运,他们倒霉就倒霉在他们自己 152  
提出让布尔加宁主持这次会议上。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关系密切,30年代赫鲁晓夫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时候,布尔加宁是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主席,他们后来一直保持着特殊关系。布尔加宁在主持会议时犹豫不定,左右摇摆,他同意把会议改在第二天(6月19日)上午召开。这给了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们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们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第二天上午,会议一开始讨论的问题仍然是应该由谁主持主席团会议。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萨布罗夫、别尔乌辛和伏罗希洛夫仍然建议让布尔加宁主持。马林科夫指责赫鲁晓夫挑拨主席团成员的关系,制造他的个人崇拜,说赫鲁晓夫“和季诺维也夫一样,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党的专政”,不能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相互关系。他还严厉批评赫鲁晓夫近些年提出“在肉类、奶制品产量方面赶超美国”的口号。

马林科夫的讲话得到了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萨布罗夫、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谢皮洛夫、别尔乌辛的支持。卡冈诺维奇在发言时也批评赫鲁晓夫提出的“赶超美国”的口号,指责赫鲁晓夫“在全国各地瞎溜达”,卡冈诺维奇还提出了不设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建议。为赫鲁晓夫辩解的人有:基里连科,米高扬,苏斯洛夫,朱可夫,什维尔尼克,福尔采娃,科兹洛夫,毛希丁诺夫,勃列日涅夫,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波斯佩洛夫。这一长串人名只能说明赫鲁晓夫在主席团委员中处

在少数派地位,但是他得到了主席团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们的支持。

关于1957年6月18日到21日召开的这次主席团会议的详细情况,人们了解得还不多,因为没有会议的速记记录。<sup>145</sup>无论赫鲁晓夫的拥护者或者他的反对者都对公开会议的详情不感兴趣,因为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不愿意承认他们故意拖延了会议时间,而赫鲁晓夫的反对者则不愿意因为承认他们批评苏中央第一书记而使自己难堪。

突然,一群由军人带领的中央委员们出现在主席团会议的参加者面前,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不知所措,整个冲突的局势达到了最高潮。将军们要求准许他们参加会议,这绝对是一个没有过先例的要求,从而导致党的最高领导机关的“第二梯队”——中央书记们和各大部部长在主席团内有解决问题的表决权,他们坚决要求召开中央全会,这实际上是要求限制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权力,要求主席团同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委员们(中央委员中大多数是边疆区区委书记和各个州的州委书记)一道重新分配权力。军界高层人物和军队高级将领(他们都是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介入了党内事务和政治。

153 中央委员们的出现使那些自以为已经制服了赫鲁晓夫的会议参加者大惊失色,他们本来以为有大多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通过就能办成这件事,没有想到军人们(中央委员们)竟然摆出了一副要取消主席团决议的架势!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谋反!赫鲁晓夫本人后来对当时的情景有过生动的描述:

“一些主席团委员叫嚷道:

‘这成什么体统?谁搞的?怎么能动用坦克包围我们。’

我回答说:

‘安静点,这不是坦克,是中央委员们。他们来了。’

我说,应该让中央委员们进来。莫洛托夫大声说:

‘我们不接待。’

于是我说:

‘同志们,我们都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我们是中央全会的公仆,而中央全会是主人。’”<sup>146</sup>

曾经在这次会议上积极为赫鲁晓夫辩解的朱可夫后来对这一事件进行了这样的解释：据他说，全会的召开“是中央委员们坚决要求的结果，中央委员们一直注视这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会议是根据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谢皮洛夫、布尔加宁、别尔乌辛的要求召开的，萨布罗夫不在其中，但是名单上大概有他的名字。他们对赫鲁晓夫什么没有指责呢……他们最后说，现在他已经不可能得到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信任（会场里议论纷纷）。他们还说，不排除在这些人冲进（请注意，他们使用了“冲进”一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后，坦克会冲进克里姆林宫的可能，克里姆林宫可能被军队包围。”<sup>147</sup>

主席团委员中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想必会回忆起不久前发生的事件，那时他们也参加了一次主席团会议——宣布逮捕贝利亚的会议。说来也巧，当时承担逮捕贝利亚的技术方面事务的莫斯科军区司令莫斯卡连科将军和朱可夫元帅，这一次又共同活跃在政治竞技场上。

萨布罗夫后来的供述证明，马林科夫的拥护者们当时陷入了极度恐慌。萨布罗夫说：“一名军人带领中央委员们走了进来……我说，这是不允许的，这可能是赫鲁晓夫同志策划的。我说，尼基塔，过去我信任你，现在不信任了。然后我说，今天来的是军人，明天可能是坦克。”另据波斯佩洛夫说，谢皮洛夫当时接过萨布罗夫的话嚷叫道：“然后是逮捕。”

萨布罗夫所说的那个威逼会议参加者的军人是苏联国防部副部长伊·斯·科涅夫元帅。此前不久，他和尼·格·伊格纳托夫都担任过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后任高尔基州州委书记。科涅夫元帅当时坚持允许中央委员们参加会议。

谁组织了这次“反政变”？它是如何策划的？谁破坏了这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秘密会议？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同大多数主席团成员唇枪舌剑的时候，中央机关承担起了秘密筹备中央全会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被瞧不起、人员构成经常发生变化（取决于政治局委员）的中央机关第一次“凶相毕露”。

在中央全会的文献资料中，至今仍保存有一些中央委员要求立即

154

召开中央全会的声明书。当时收到了7份这样的声明书,其中2份集体署名的声明书尤其引人注目,一份声明书上有42人签名,另一份声明书上有27人签名,签名的人包括州委书记,军队高级指挥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领导人,各部部长和副部长。两份声明书的内容一字不差,这说明当时肯定存在一个组织签名、给中央委员们打电话并把他们集合起来的中心,并且肯定给了这些参加干预“高层交锋”的人某种许诺。

这两份内容相同的声明书中说:“我们这些苏共中央委员获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断召开会议。我们还获悉,你们正在讨论关于谁领导中央委员会和书记处的问题。这些与我们全党利害攸关的重要问题不应该对中央全会的成员们隐瞒,为此我们苏共中央委员请求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并将这个问题提交全会讨论。我们中央委员不可能对谁来领导我们党的问题袖手旁观。”<sup>148</sup>

其他几份个人署名的声明书明显具有已经看过两份集体署名的声明书的痕迹,而且都写上了这么一句话:“我听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一些原则性问题未能形成统一的意见……”当时各个州的州委书记都已经到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到,准备参加一个农业会议,这为迅速征集这些签名和中央委员们准备发言稿创造了良好条件,书记处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对于赫鲁晓夫来讲,这也是惟一的天赐良机……站在赫鲁晓夫一边的国防部长朱可夫下令使用军用飞机把各地的中央委员迅速运送到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

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们取得了第二个胜利。首先,他们成功地做到了让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会议拖延时间,然后召开中央全会并迅速把中央委员集中在一起,使数量优势牢牢掌握在“赫鲁晓夫的团队”手里。这一次“赫鲁晓夫的团队”把利用中央机关和上级任命的干部进行党内权力斗争的方法运用得惟妙惟肖。

6月22日,即在苏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中央委员和军人采取行动后的第二天,召开了中央全会。中央全会开幕前几分钟,赫鲁晓夫向他的反对者们发动第一次冲击,他建议马上召开中央全会,然后他又安排

星期日这一天休息,让中央委员们自由活动。这简直有点令人不可思议,好不容易把大家召集起来了,又不抓紧时间开会。但是,老谋深算的莫洛托夫很快就悟出其中的奥妙,休息一天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央机关可以利用这一天时间拉拢全会的参加者,找他们个别谈话,充分作好准备。中央全会进行的这种悄悄的幕后活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莫洛托夫以为,大部分主席团成员不会同意召开中央全会,但是他失算了,赫鲁晓夫的建议被采纳。

全会以苏斯洛夫发表讲话开幕,他向与会者通报了主席团会议上的争论情况。随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他强调指出,中央主席团只不过是中央全会的仆人,以此来博得苏共中央委员们的欢心。 155

朱可夫元帅的讲话是第一天的重头戏,可以说也是整个全会期间的头等大事,这不仅仅由于他的“军人分量”起到了特殊作用,他的这次讲话完完全全是在作政治报告。朱可夫分析了全党和全国的形势,阐述了形成目前局面的根源,预测了今后的可能发展。讲话一开始他庄严宣布:“苏联武装力量全体人员向自己的党、向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保证,他们无限热爱党和毫不动摇地忠于自己的祖国。”朱可夫明确指出,军队服从中央委员会,而不是主席团。

朱可夫在讲述自己对主席团内发生的事情的看法时着重指出,主席团准备罢免赫鲁晓夫。他说,如果赫鲁晓夫被撤职,必然产生一个问题:谁来接他的班?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如果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胜利了,我们国家和党的政权就会落入往日斯大林的追随者手中。随后朱可夫公布了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亲自参与30年代到50年代初镇压的档案材料。

朱可夫的讲话有根有据,极具说服力。他一再引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和苏联最高法院军事审判庭的档案材料,不厌其烦地详细介绍过去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从文献材料中……可以看出,从1937年2月27日到1938年11月12日(贝利亚被任命为内务人民委员之前——作者),内务人民委员会先后得到了斯大林、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的批准,审判了……采用了最高惩办措施——枪决了38679人……斯大



林和莫洛托夫在一天中(1938年11月12日)就批准了对3167人执行枪决。1938年11月21日这一天,内务人民委员会就上报了一份对292人执行枪决的名单。”朱可夫提请全会的参加者注意,被枪决的那些人都是“他们的同行”——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军队高级指挥员。

朱可夫说,由此可见,如果让莫洛托夫这一帮人重新掌权,现在的这些中央委员就有被肉体惩罚的危险,专横和镇压将再度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

朱可夫援引了一份吓人的文献资料——基辅军区司令员И.Э.亚基尔被执行枪决前写给斯大林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斯大林同志:我不揣冒昧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正如大家所说的和我自己所认为的那样,我是个诚实的战士,多年来我一直忠于党,忠于国家和人民。为了党,为了党的领导人,我毕生自觉忘我工作,恪尽职守。临死之前,我要说的话是,我爱您,我爱党和国家,我坚信共产主义必将胜利。”

156 朱可夫举出了卡冈诺维奇亲自组织镇压铁路员工的事实。他说,卡冈诺维奇在担任“铁路人民委员”期间主观臆断,根据自己的“技术知识”判断有人要组织怠工,决定把一些专业人员执行枪决。

朱可夫在发表讲话时把主要矛头指向马林科夫。他对全会参加者说:“马林科夫的罪行比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但负责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实行监督,而且是杀害我们的人、我们的干部是这一见不得人的、反人民的勾当的直接组织者和执行者。马林科夫对于自己的犯罪活动不仅不向中央委员会表示悔过,而且私藏以前内务人民委员会的黑材料……”朱可夫认为,马林科夫要对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的镇压承担直接责任。

外交部长Н.П.杜多罗夫在发言中证实说,朱可夫说的话完全属实,马林科夫确实私藏黑材料。在马林科夫的保密柜里发现了对苏军领导人进行监视的材料、他起草的关于修建关押党的领导人的监狱的指示,以及“预先拟制的审讯问答提纲”。

马林科夫终于等到了发表讲话的机会,他避而不谈镇压的问题,厉

声责问赫鲁晓夫道：“赫鲁晓夫同志，我们这些人中难道就你一个人最清白？”他指责赫鲁晓夫“违背了向全党全国发表讲话的规矩和习惯”，并且强调指出，他说的话代表了大部分主席团成员——萨布罗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别尔乌辛的意见。马林科夫还指责赫鲁晓夫提出“在肉类和奶制品产量方面赶超美国”的任务，指责赫鲁晓夫把主席团内部的分歧公开，说主席团的本意“不是把赫鲁晓夫撤职，而是取消第一书记职务”。

马林科夫的这些冠冕堂皇的辩解立即被勃列日涅夫厉声打断。勃列日涅夫作证说，马林科夫坚决反对召开中央全会，只是在主席团已经定下人事变动名单后才勉强同意。

马林科夫说，大部分主席团成员同意取消第一书记职务，这句话显然让在场的各州、边疆区和共和国的第一书记们惊惶不安，于是马上就有人发问道：“为什么要取消中央和地方的第一书记？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马林科夫：“我不认为取消地方上的第一书记职务是合适的。”

这种回答当然不会让全会的参加者感到满意。参加会议的都是一些“久经沙场”的有阅历的官员和机关工作人员，他们心里都很清楚，莫斯科、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一有风吹草动，下面的各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甚至各个地区都会闻风而动。倘若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被取消，他们的第一书记位置、甚至工作位置也未必能保得住。

157

因此，在大多数与会者心目中，马林科夫和他的战友们是极其危险可怕的人物，即便他们不同于叶若夫、贝利亚、阿巴库莫夫和伊格纳季耶夫之流。

卡冈诺维奇在讲话中指责赫鲁晓夫在作家们面前公开批评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说：“我国畜牧业产量增长24%，但是主要是个体经营的成分增长，而集体农庄的产量三年中只增长了3%。”卡冈诺维奇认为，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不成功。

卡冈诺维奇还说了一些对于他来讲未必不是关键的话。他说：“我们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缺点，自觉不自觉地在全世界面前否定

了我们30年中所做的工作,导致现在我们羞于谈论我们的成就,羞于谈论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卡冈诺维奇拒绝回答自己是否参与镇压的问题,指出他的所作所为都是按照政治局的决议办事的(他这样说并非没有道理)。

星期一,全会继续进行。星期天这一天所做的工作马上立竿见影。布尔加宁和萨布罗夫发表了表示悔过的讲话,开始“栽赃”不久前的所有战友,并把主席团的“内幕”全给抖搂了出来,说他们打算让赫鲁晓夫去当农业部长,让苏斯洛夫当教育部长或文化部长,计划免去伊·亚·谢罗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

别尔乌辛也表示悔过,试图表明自己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和马林科夫不是一路货色。

休息一天的结果显然有利于中央全会的组织者。

莫洛托夫在讲话中表示,他不同意批评斯大林。

“赫鲁晓夫同志把双脚放在了桌子上”——莫洛托夫这样评论中央第一书记。与布尔加宁、萨布罗夫、别尔乌辛不同,老资格的莫洛托夫毫无悔过之意。

Д. Т. 谢皮洛夫的讲话在全会上独树一帜。以前有人常常愤恨不平地批评他学识欠缺。在全会上,面对当时泾渭分明的局面,他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表态。会上有人问他:“您是何许人?”谢皮洛夫没有给提问者所希望听到的答复,而是回答说,他出身工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先后在雅库特和西伯利亚工作。他说:“伟大卫国战争爆发后,我递交了上前线的申请书,但是却得到了‘不要搞民粹主义’的回答。三天后,我以普通一兵的身份自愿上前线。6月份,我随同我所在的那个师徒步上前线。1941年7月初,我离开了部队,1946年5月回到了莫斯科。”坐在会场里的人都知道,谢皮洛夫所说的那一个师是在战争爆发后头几个月匆忙组建起来的,这个师几乎每个人都被留在了莫斯科近郊,这与谢皮洛夫所说的以普通一兵身份徒步上前线的事实大相径庭。

谢皮洛夫声称自己是二十大决议的一贯拥护者。他回忆说,自己参加过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和其他一些单位举办的数十次会议,在

每一次会议上都表态“捍卫党谴责个人崇拜的路线”。

对于他本人是否参与主席团的这次阴谋活动问题,谢皮洛夫反驳说:“这哪里称得上阴谋活动?别用这个东西来吓唬主席团成员。”谢皮洛夫说:“对于在这个讲坛上发表讲话的每一个人,我们都应当问一问他:您在1937—1938年表现如何?为什么您对无辜者的‘供认’信以为真?以避免与个人崇拜有关的某种现象再度产生。”

把马林科夫的追随者的角色安在谢皮洛夫头上恐怕是不合适的,因为谢皮洛夫曾经在《真理报》上撰文批评马林科夫的经济政策。中央第一书记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有力配合,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这似乎是让谢皮洛夫感到不舒服的主要原因。不过,谢皮洛夫的特点是立场前后不一致。他说:

“……尽管斯大林在他生命的某一时期干了一些历史不能原谅他的坏事,但是他对社会主义事业还是作出了巨大贡献……难道大家愿意我们现在就向各国共产党和我们的人民宣布,这些年来领导我们党的人都是一些应该坐上被告席的凶手?难道你们愿意听到别人说,你们的党哪里是马克思主义的党……最重要的是,党确实已经根除了目无法纪的现象,纠正了那些违背法律现象。现在需要的不是重写历史,而是行动起来。”

我们可以发现,谢皮洛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与后来被党的理论家谴责和摈弃的官方立场相吻合。

阿·鲍·阿里斯托夫的发言使与会者又听到了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及其追随者大声指责的声音。阿里斯托夫援引二十大前成立的委员会(委员会由什维尔尼克、波斯佩洛夫、科马罗夫和阿里斯托夫组成,吸收谢罗夫和总检察长鲁坚科参加)的材料,指责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搞大规模镇压。据他提供的数字,1936年被执行枪决的人共计1118人,第二年(1937年)为353074人。阿里斯托夫还提供了马林科夫参与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镇压的材料。

勃列日涅夫在发言中旗帜鲜明,丝毫不讲客气,严厉指责赫鲁晓夫反对者。别利亚耶夫在发言中对赫鲁晓夫大加颂扬。他们俩的发言

使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们溃不成军。该轮到伊格纳季耶夫发言了,他首先对勃列日涅夫和别利亚耶夫的发言表示支持,之后便破口大骂马林科夫及其追随者。想当初,这位国家安全部长紧跟马林科夫亦步亦趋,忠实执行马林科夫和斯大林对阿莫库莫夫案和所谓的“医生谋杀案”的所有指示,如今他摇身一变,反戈一击了。这一次中央全会以赫鲁晓夫的敌人被粉碎、高层领导重新配置而宣告结束。

159

赫鲁晓夫的敌人——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被从主席团的组成中除名,谢皮洛夫被免去主席团候补委员职位。在全会上多次表示悔过的布尔加宁和伏罗希洛夫暂时被留在主席团内:前者被留用到1958年,后者被留用到1960年。在全会上真诚表示悔过的别尔乌辛和波斯佩洛夫被从主席团委员降为候补委员。一些赫鲁晓夫的追随者成了主席团中的新人,他们是:阿·鲍·阿里斯托夫,Н. И. 别利亚耶夫,列·伊·勃列日涅夫,尼·格·伊格纳托夫,弗·罗·科兹洛夫,奥·维·库西宁,阿·伊·米高扬,米·安·苏斯洛夫,叶·阿·福尔采娃,尼·米·什维尔尼克。格·康·朱可夫也成为主席团委员。<sup>149</sup>

全会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定,通过了苏共中央致各党组织的公开信,以及致全体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信。必须指出一个重要的细节:在供发表的全会决定中禁止公布关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参与大规模镇压的材料。<sup>150</sup>

作者认为,这次全会在苏联历史中的意义明显被低估了,这与以前人们看不到有关这次全会的文献资料多少有点关系。苏共中央最高机关正是在1957年夏季在同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为代表的国家政权机构的这场冲突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1990年,苏共中央机关成了国家政权的真正主人,在此之前,都由国家权力机关的首脑(从列宁到斯大林和马林科夫)主持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主席团)会议,领导国家和党。今非昔比,如今苏共中央机关(党的将军团)——中央书记、中央委员会各个部的部长,边疆区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可以根据自己小圈子的利益确定政策和为所欲为了。



在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书记由他一人担任的时候),部长会议和国家机构居于首要位置。赫鲁晓夫采取了另一种做法,他把中央委员会机关变成主要的国家机构,由中央机关的各个部指挥政府的各个部委,中央书记们领导中央机关的各个部。干部的任免机制掌握在党机关手中,使整个最高国家机构完全隶属于党机关,置于党的监督之下。赫鲁晓夫是不是这次中央全会的胜利者呢?也是也不是。可以说他是胜利者,因为他终于摆脱了惹人厌烦的反对派的纠缠,打败了他的私敌。但他又不是胜利者,因为他为这一胜利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从今以后,赫鲁晓夫把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命运直接寄托于党机关的支持上面,只要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行动不符合党机关的利益,党机关就可能不再支持他,非但不支持他,还可能动用赫鲁晓夫亲手创建的权力机制来收拾他。

党机关是无所不能的。朱可夫元帅也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他曾经两次干预党的历史进程,一次在1953年夏天,他参与了逮捕贝利亚,另一次在1957年夏天,他参与了撕毁主席团的计划。赫鲁晓夫及其同伙不会忘记朱可夫元帅曾经孜孜以求要把陷害红军高级将领的真相一挖到底,不会忘记朱可夫元帅的最终目标不是仅限于审判贝利亚一个人。赫鲁晓夫当然会记住那一天,当军人们出现在主席团会议参加者面前时,主席团成员们大惊失色的情景。军人太厉害了,他们能够挫败任何党的阴谋。是的,朱可夫元帅救了赫鲁晓夫,但是“不设第一书记”、让赫鲁晓夫去担任公共事务书记的话难道不是出自朱可夫之口?在萨布罗夫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它的主席谢罗夫感到害怕时,难道不是朱可夫对萨布罗夫说:“让他去逞能,只要我给他两下子,卢比扬卡<sup>①</sup>就一命呜呼”?<sup>151</sup>朱可夫的敢作敢为,他所特有的那种客观上与党机关的专制形成对抗的立场当然是不会被原谅的。

作者认为,赫鲁晓夫也好,朱可夫也好,他们俩可能都想过一个同样的问题:既然西欧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美国驻德国占领军司令、五

---

<sup>①</sup>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在地。——译者注

星上将艾森豪威尔能当上美国总统,为什么苏联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不能当苏联国家元首呢?

中央委员会在对朱可夫采取行动中大耍阴谋诡计。首先让国防部长朱可夫元帅前往阿尔巴尼亚和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1957年10月19日,在朱可夫不在国内的情况下,召开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决定免去朱可夫的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和国防部长职务,其理由是军队中的党务工作和政治工作存在严重问题。朱可夫元帅回到苏联后召开了中央全会,苏斯洛夫、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在会上对他进行了猛烈抨击,指责他藐视政治工作人员,搞波拿巴主义。苏斯洛夫援引告密人的话说:“朱可夫同志在一次政治工作人员会议上说:政治工作者40年中已经习惯于空话连篇(请注意,据告密者说,这件事发生在十月革命40周年前夕——作者),他们像一群老猫,丧失了嗅觉……他在另一个场合说,只要给他们(政工人员)贴上棕红色的胡须,再给他们每人一把短剑,他们就会去砍杀军队指挥员。”<sup>152</sup>朱可夫的另一条罪过是,他没有同中央委员会进行商量就成立了侦察学校——未来特种部队的雏形,他以国防部长名义颁发的一些命令也没有事先征得中央委员会的同意。

朱可夫为自己进行了辩解,他提醒说,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他参与了组织“对七人反党集团的反击”……他的话还没有说完,赫鲁晓夫就对他提出了新的指责,说他夸大了自己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对武装斗争的新形式认识不足,还说他都快61岁了,应该给其他人让路了……赫鲁晓夫的话得到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和索科洛夫斯基元帅的附和。被认为是朱可夫朋友的科涅夫元帅也同朱可夫划清了界限……

作者在阅读这次中央全会的材料时,始终难以摆脱这么一种想法:这一次迫害朱可夫的方式与当年斯大林迫害朱可夫的方式何其相似。在这一次中央全会上,实际上等于把斯大林1946年签署的关于解除朱可夫元帅陆军总司令的秘密命令重念了一遍,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1946年把49岁的朱可夫打发去指挥一个军区,而1957年给60岁的朱

可夫准备好了失宠的退休金领取者的命运……

朱可夫退出政治生活意味着最后一个试图同党机关闹独立的国家机构已被清除。无论是以贝利亚为首的内务部、以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为首的部长会议,或者是以朱可夫为首的军队,都没有逃脱被苏共中央机关一一收拾的厄运。 161

\* \* \*

斯大林死后,苏联开始了改革。改革是迫不得已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其实,早在战后年代,就有过不同形式的改革尝试,当时还提出过实现改革的可能方案。

例如,在工业方面——从进一步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国防工业,到降低这些部门的比重和加大对轻工业的投入。在农业领域——从建设“农业城”、依靠农业工人的力量加快发展国营农庄生产,到减少国家对农村的干预、提高收购价和减少税收。在对外政策方面——从加强苏联的地缘政治作用、把苏联变成一个装备导弹核武器、能够与全世界对抗的国家,到推行更为谨慎的、以统一的德国非军事化为目标的政策、在中欧和苏联的远邻国家建立不参加任何军事联盟的中立地带。

国家的惩戒系统也必须进行改革。在30年代到40年代,镇压被视为管理国家机构和党机关的方法和向全社会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如今这种方法和手段已经不灵了。

在进行改革的同时,苏联政治领导层内部的权力斗争始终没有停止过,不过,权力斗争的形式有时表现为赞同或反对某种改革方案之争。

苏联早期的改革毫无疑问与贝利亚的活动密切相关。正是贝利亚首先推动了给一些人恢复政治名誉和软化苏联惩戒系统的进程,正是贝利亚首先提出以德国非军事化和不加入军事联盟为代价实现德国统一的主张,贝利亚还力主与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在国内政策方面,他强调必须明确划分国家机构和党机关的职能,提高国家机构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贝利亚很早就意识到民族问题对苏联未来的重要性。

贝利亚所进行的改革显然过于激进,而当时的权力斗争又过于激

烈。贝利亚被除掉以后,他的某些改革主张(同南斯拉夫关系正常化,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大规模平反)被推后了两三年才实现;他的另一些改革建议后来再也没有被采纳,有的改革主张(划分国家机构和党机关的职能)直到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在“火车已经驶离”苏联社会主义车站的时候,才得以实现。

162 马林科夫曾经试图改变苏联经济发展的先后顺序,扩大民用必需品产量所占的比重。和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农业改革使俄罗斯农村的生活在一段时期中充满了活力,并为个体副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马林科夫在经济领域的这些主张受到了得到苏共第一书记尼·谢·赫鲁晓夫全力支持的“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家们”的坚决抵制,他们主张保留斯大林原先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国防工业的方针。赫鲁晓夫为了抵制马林科夫在农业领域的政策,提出了向国家未被开发地区大量投资的“开垦荒地计划”,后来又提出了在农产品产量方面“赶超美国”的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这些措施导致农业陷入更深刻危机,使苏联更加依靠从国外购买粮食度日。

赫鲁晓夫因此得以使苏联仍然保持时刻威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形象。他由于激愤脱口而出的那句话——“我们一定会埋葬你们(指美国人——作者)”表明,他坚信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他把加快发展苏联导弹核计划当做苏联同美国、北约成员国和整个世界保持平衡的手段,从而使苏联深深陷入了军备竞赛的泥潭。

赫鲁晓夫从50年代初以前的各种不同的改革主张中选择了一些最保守的改革方案,这些改革方案被他的追随者们一直保留到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他在二十大上所作的“秘密报告”,从一方面看是斯大林死后立即出现的对斯大林批评的继续,从另一方面看是继续进行党内斗争的武器。苏联社会和整个世界从揭发斯大林这件事中看到了更多东西,想得比报告人所想的更远,这是另一回事。赫鲁晓夫后来的所作所为证明,他想方设法不择手段限制对“秘密报告”进行广义的解释,为此,他在国内不惜动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镇压措施,逮捕那些过于相信“二十大思想”的人,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军事干涉,

或以军事干涉相威胁。

急风暴雨般的 50 年代中期提出的那些政治原则,直到 80 年代下半年仍然是苏联党和国家制度的奠基石。干部相对稳定的原则就是那个时候提出来的,干部稳定不仅有利于工作,而且使在苏联被称为特权的那些东西得到保障。赫鲁晓夫后来试图改变这一原则,结果付出了在 1964 年丢掉职位的代价。干部稳定的原则使以前广泛使用的把大规模镇压作为管理方法的悲剧不再重演,苏共二十大的决议之所以受到党机关的支持,其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些年中,党机关和国家机构之间进行了最后一次决战。40 年代到 50 年代初,斯大林被称为“苏联国家元首”,无论在苏联部长会议、党机关或者在执行权力机关中,都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现在国家机构的各方面活动中都确立了党的领导的原则,内务部、国防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丧失了其关键性作用。苏共中央委员会各个部的作用尽管比较隐蔽,但是要比上述部门重要得多。1957 年六月全会以后,党机关的作用明显增大。 163

个人起作用的时代已经过去。党机关起作用的时代、苏联 60—70 年代“群英会”的时代已经来临。



## 注 释

- 1 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Журналы (тетради) записи лиц, принятых первым генсеком. 1924—1953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7. № 1. С. 38.
- 2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талин. Кн. 2. М., 1999. С. 597—598.
- 3 Посетители. . . С. 38.
- 4 АП РФ, ф. 2, оп. 1, д. 24, л. 2.
- 5 Последняя отставка Сталина / Публ. А. Чернева // Источник. 1994. № 1. С. 106—111.
- 6 С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1. С. 76—77.
- 7 Последняя отставка Сталина. С. 110.
- 8 С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7. С. 108, 131.
- 9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53.
- 10 Наше Отечество. Опы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М., 1991. Т. 2. С. 443.
- 11 АП РФ, ф. 2, оп. 1, д. 25, л. 1—10.
- 12 Там же, ф. 3, оп. 58, д. 223, л. 50—104.
- 13 Там же, д. 536, л. 103—107.
- 14 Там же, д. 423, л. 1—2.
- 15 См. : Старков Б. Сто дней «лубянского маршала» // Источник. 1993. № 4. С. 82—90; «Следствие прибегло к извращенным приемам» // Источник. 1993. № 4. С. 91—100.
- 16 См. : Кокурин А. И., Пожаров А. И. «Новый курс» Л. П. Бер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4. С. 152—156.
- 17 作者吃惊地发现,这一命令直到1955年才被撤销,而且是根据1953年春天提出的理由撤销的。
- 18 Кокурин А. И., Пожаров А. И. «Новый курс» Л. П. Берии. С. 160—161.
- 19 Старков Б. Сто дней «лубянского маршала». С. 85.
- 20 Охотин Н. Г., Петров Н. В., Рогинский А. Б., Мироненко С. В. Экспертное

- заклучение к заседан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РФ 26 мая 1992 г. М., 1992. С. 15.
- 21 Кокурин А. И., Пожаров А. И. «Новый курс» Л. П. Берии. С. 137—142.
  - 22 См. там же. С. 148.
  - 23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1. № 1. С. 144.
  - 24 Там же. С. 153.
  - 25 Там же. С. 161—162.
  - 26 Сужены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о ситуации в западной Украине, Белоруссии, прибалтий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ах в 1953 г. 3—10 октября. Проект решения. См.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архивохранилище, ф. 5, оп. 30, д. 6.
  - 27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84, л. 110—111.
  - 28 См.: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кризисы и ракеты.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М., 1994. Т. 1. С. 57.
  - 29 См.: Берия: Конец карьеры. М., 1991.
  - 30 См.: там же. С. 262—289.
  - 31 АП РФ, ф. 3, оп. 58, д. 223, л. 112.
  - 32 Этот материал съезда ЦК КПСС опубликован в «Сужены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1991 г. № 1—2, ниже съезд участники 164  
речи все взяты из «Сужены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го материала.
  - 33 Через два года, Хрущев в поездку в Югославию в Белград просит нормализации отношений с этой страной и говорит, что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ь за ухудшение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ССР и Югославией «теперь должна быть возложена на врагов народа — Белия и Абакумова» (см. «Правда» 1955 г. 27 мая), не говоря о том, что именно Белия стремился к улучшению отношений с Югославией.
  - 34 См.: Состав руководящих органов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партии — Политбюро (Президиума) (1919—1990 гг.)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7. С. 77.
  - 35 См.: Наше Отечество. Опыт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Т. 2. С. 443.
  - 36 ЦХСД, ф. 89, оп. 18, д. 28.
  - 37 См.: Правда. 1953. 24 декабря.
  - 38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2. С. 132.
  - 39 Там же. С. 133.
  - 40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А. Разведка и Кремль. М., 1996.
  - 41 АП РФ, ф. 4, оп. 20, д. 873, л. 94 об.

- 42 Там же, л. 83—84.
- 43 Там же, ф. 3, оп. 24, д. 484, л. 1—2.
- 44 Там же, л. 2.
- 45 Совет卫生部第4局为国家高层政治领导人服务。
- 46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84, л. 21—22.
- 47 Там же, л. 28.
- 48 Там же, л. 85—86.
- 49 Там же, л. 91.
- 50 Там же, л. 86—87, 117.
- 51 苏联飞行员伤亡人数较少的原因是严禁苏联飞机越过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分界线。
- 52 См.: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 1995. С. 210.
- 53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 31.
- 54 См.: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 1995. С. 53; Правда. 1954. 14 марта.
- 55 См.: Иорыш А. И. Ядерный джинн. М., 1994. С. 327—329; Правда. 1954. 27 апреля.
- 56 Турнир длиною в три десятилетия. ЦК КПСС—М. М. Ботвинник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 2. С. 58—67.
- 57 Там же. С. 64.
- 58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7. С. 82—135.
- 59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格·马·马林科夫的决定”(1966年1月31日苏共中央全会会议一致通过)。
- 60 当时,彼·尼·波斯佩洛夫任苏共中央书记,П. К. 科马罗夫任苏共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副主席,阿·鲍·阿里斯托夫任苏共中央书记,尼·米·什维尔尼克任全苏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 61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89, л. 89.
- 62 См.: Наумов В. «Утвердить докладчиком товарища Хрущева» // Московские новости. 1996. № 5. 4—11 февраля. Источниковой основой публикации стали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сделанные заведующим Общим отделом ЦК В. Малиным.

- 63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89, л. 23—111.
- 64 См. : Наумов В. «Утвердить докладчиком товарища Хрущева».
- 65 АП РФ, ф. 1, оп. 2, д. 1, л. 50, 52.
- 66 Там же, л. 64.
- 67 Там же, л. 66—67.
- 68 Там же, ф. 52, оп. 1, д. 169, л. 2—29.
- 69 Там же, л. 29—63.
- 70 Там же, л. 29.
- 71 Там же, л. 31.
- 72 Там же, л. 31—34.
- 73 Там же, л. 53.
- 74 Там же, л. 43.
- 75 Там же, л. 63.
- 76 据当时以苏共中央指导员身份参加二十大最后一天工作的亚·尼·雅科夫列夫说,谢皮洛夫在“秘密报告”定稿工作中起到了作用。他还说,赫鲁晓夫始终没有离开过发言稿。
- 77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 3. С. 166.
- 78 Там же.
- 79 АП РФ, ф. 1, оп. 2, д. 14, л. 46.
- 80 Там же, л. 55.
- 81 Там же, ф. 3, оп. 24, д. 490.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от 28 марта 1956 г. об ознакомлении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компартий с докладом Н. С. Хрущева.
- 82 Там же, ф. 1, оп. 2, д. 14, л. 48.
- 83 Там же, л. 68.
- 84 Отклики на решения XX съезда из-за рубежа и из страны см. :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40, 350.
- 85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93, л. 30 об.
- 86 Там же.
- 87 ЦХСД, ф. 5, оп. 30, д. 139, л. 5—27.
- 88 Там же, д. 138, л. 81—67.

- 89 Там же, д. 140, л. 53—65.
- 90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90, л. 23—27. Кроме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охранились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активного участника этого заседания—Ю. Ф. Орлова. Они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в кн.: Орлов Ю. Ф. Опасные мысли: Мемуары из русской жизни. М., 1992. С. 114—118.
- 91 АП РФ, ф. 3, оп. 24, д. 490, л. 24.
- 92 Там же, л. 28.
- 93 Там же, л. 39.
- 94 С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от 5 апреля 1956 г.
- 95 Чего стоят полководческие качества Сталина: Непроизнесенная речь Жукова / Публ. Л. Киевской, В. Лебедева, С. Мельчина, Ю. Мурина, А. Чернева // Источник. 1995. № 2. С. 143—159.
- 96 朱可夫的这种说法与赫鲁晓夫的说法有矛盾,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说,斯大林得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躲在自己的别墅里,有一段时间不理朝政。
- 97 АП РФ, ф. 1, оп. 2, д. 1, л. 91—95.
- 98 Там же, л. 98.
- 99 Там же, л. 106.
- 100 匈牙利方面参加谈判的有: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马·拉科西,匈牙利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长、匈牙利劳动党政治局委员埃·格罗,副总理、政治局委员伊·纳吉,政治局委员、匈牙利劳动党中央书记安·赫格居斯,匈牙利主席团主席伊·道比,以及几名年轻的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R. 费尔德瓦里,В. 萨拉伊,И. 希达什。苏联方面参加谈判的有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苏联驻匈牙利大使 Б. 基谢廖夫。
- 101 См.: Желицки Б.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С. 242.
- 102 苏联领导人之所以要让纳吉当匈牙利总理是因为,纳吉曾在 1929 年移居苏联,1933 年 1 月起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保安总局间谍,绰号“沃洛佳”,向苏联提供关于匈牙利、德国、意大利政治侨民的情报,以及关于苏联派驻共产国际、盟国无线电委员会、国际无线电委员会工作人员的情报。马林科夫早在 1940 年就知道纳吉从事这方面的活动,那个时候他就有过将来利用这一点控制纳吉的打算。



- 103 См. : Желицки Б.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 . С. 245.
- 104 См. : Орехов А. М. События 1956 года в Польше и кризис советско-поль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 . С. 218—222.
- 105 Там же. С. 224.
- 106 ЦХСД, ф. 89, оп. 45, д. 1.
- 107 Там же, д. 2.
- 108 Как решались «вопросы Венгрии»: Рабочие записи заседаний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КПСС. Июль—ноябрь 1956 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2. С. 77.
- 109 ЦХСД, ф. 89, оп. 45, д. 3.
- 110 Там же, д. 4—5.
- 111 Как решались «вопросы Венгр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2. С. 81—82.
- 112 См. : Желицки Б.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 . С. 257—259.
- 113 Как решались «вопросы Венгр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2. С. 82—84.
- 114 ЦХСД, ф. 89, оп. 45, д. 6.
- 115 См. : Венгрия, октябрь—ноябрь 1956г. : Из архива ЦК КПСС/ Подг. С. А. Мельчин, Е. А. Орехова, В. Т. Середя, А. С. Стыкалин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 5. С. 135.
- 116 这使政治形势陡然紧张。当时已不再担任总理的赫格居斯在请求苏联出兵匈牙利的“邀请函”上签字。
- 117 Желицки Б.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 . С. 265—266.
- 118 См. : Венгрия, октябрь—ноябрь 1956г: С. 136—137.
- 119 ЦХСД, ф. 89, оп. 45, д. 8.
- 120 Венгрия, октябрь—ноябрь 1956г. С. 137—138.
- 121 См. : Желицки Б.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 . С. 267.
- 122 См. : там же. С. 268—269.
- 123 Как решались «вопросы Венгр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2. С. 88—89.

- 124 Там же. С. 90—92.
- 125 Там же. С. 98—99.
- 126 ЦХСД, ф. 89, оп. 45, д. 13.
- 127 Доклады Совет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енеральной Ассамблее ООН за период с 16 июля 1956 по 15 июля 1957 г. Нью-Йорк, 1957. С. 35. См. также: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17—1945. М., 1986. Т. 2. 1945—1985. С. 239—240.
- 128 Как решались «вопросы Венгр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3. С. 89—90.
- 129 Там же. С. 90.
- 130 ЦХСД, ф. 89, оп. 45, д. 16.
- 131 Там же, д. 20.
- 132 См.: Мусатов В. Л. СССР и венгерские события 1956 г. С. 18; Желицки Б. Будапешт—Москва. . . С. 277—278.
- 133 Как решались «вопросы Венгри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6. № 3. С. 112.
- 134 ЦХСД, ф. 89, оп. 6, д. 1.
- 135 Там же, д. 2.
- 167 136 Письмо ЦК КПСС к партийным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 «Об усилен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ы партий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в массах и пресечении вылазок антисоветских, враждебных элементов».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 66 заседания Президиума ЦК от 19 декабря 1956 г.
- 137 ЦХСД, ф. 89, оп. 6, д. 3, 4.
- 138 Там же, ф. 5, оп. 30, д. 189, л. 5—9.
- 139 Там же, л. 1—4.
- 140 Там же, ф. 89, оп. 6, д. 5, 6.
- 141 См.: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57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ЦК КПСС, 1957. С. 54. В период завершения работы над первым изданием этой книги появилось издание материалов пленума: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Сост. Н. Ковалева, А. Коротков, С. Мельчин, Ю.

- Сигачев, А. Степанов. М. , 1998.
- 142 См.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7. С. 76—77.
- 143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57 года). С. 44.
- 144 主席团委员基里连科、苏斯洛夫、萨布罗夫、候补委员什维尔尼克、毛希丁诺夫、科兹洛夫,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别利亚耶夫、波斯佩洛夫等人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 145 См.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57 года). С. 3.
- 146 Там же. С. 6—7.
- 147 Там же. С. 8—9.
- 148 Там же. С. 279.
- 149 Подробно 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высшем партийн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с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 7. С. 77.
- 150 См.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57 года). С. 253.
- 151 Там же. С. 32.
- 152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Октябрь 1957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ЦК КПСС. Исх. № П 3020. С. 5.

### 第三章 尼·谢·赫鲁晓夫 下台的原因

在我了解到发生这些重大事件和转折的真正原因以后,当我获悉他们把自己的胜利归功于微不足道的偶然性时,我对这些人的智慧和正直有了新的看法。

——D. 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

## 缓解农民的税收压力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这是我国政治历史的重要分界线。人们习惯上把赫鲁晓夫下台视为进行自相矛盾、很不彻底、反斯大林的改革时期宣告结束。赫鲁晓夫的下台是多年积累起来的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者认为,在分析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时必须考虑到两种因素,第一种因素是促使赫鲁晓夫作为党和国家头号人物的影响力受到削弱的国内客观进程,第二种因素是赫鲁晓夫与当时党政军、工业部门的当权人物之间的私人关系。

苏联共产党有这么一个传统,它在每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的时候,总要对农业的现状提出尖锐的批评,并且相信今后可以依靠巩固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解决所有问题。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此,“食品纲要”的创始人米·谢·戈尔巴乔夫时期也是如此。不过,党从来没有像赫鲁晓夫时期那样重视对农业的领导。

农业问题显然是斯大林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对于集体农庄庄员来讲,在集体农庄里干活是无利可图的。按理说,在集体农庄劳动应该成为主要的收入来源,可是由于报酬低得可怜,农民只好去寻找“外快”。

据苏联中央统计局提供的数字,集体农庄劳动力只能提供将近 169  
20%的货币收入。

在斯大林去世后召开的头几次中央全会中,有一次(1953年七月全会)是专门讨论农业问题的。这一次中央全会与往常不一样,它破天荒一次坦率承认食品供应保障计划以失败告终,强调指出提高农民物质保障水平的必要性。

这一次中央全会承认,征收农民的宅旁园地税是不正确的。全会指出,高税收只会导致农民自己饲养的牛、猪、羊的数量减少。全会通过的一些决议中规定了支助农村的具体措施,其中包括有助于增加个人饲养牲口总头数的税收优惠,有家畜的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拖



欠的畜产品税被一笔勾销。

1954年取消了对养牛养猪的征税,1958年取消了宅旁园地农产品税。肉类、牛奶、食油、粮食的收购价多次提高,从1952年到1958年,牛的收购价提高了11倍,小麦的收购价提高了5倍。集体农庄庄员的货币收入明显增加。<sup>1</sup>

格·马·马林科夫认为,必须降低对农民的税收压力。他主张在传统农业地区——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大力发展农业,提倡“集体农庄和农户的发展模式”,提出了必须降低税收、不干涉农民的副业生产、国家不向农业增加投资的建议。可以把马林科夫式的农业改革归结为一句话:以向农民提供起码的权利为代价让农村自行摆脱危机。在这一段时间中,国家对农民外出务工不再横加干涉,开始按照农民的要求给他们发放身份证,国家对农民的压制力度有所松弛。

马林科夫的经济发展计划很快就受到了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1955年中央一月全会上,对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作出了“不够内行”的评价,马林科夫还被指责企图博取在人民中的“廉价声望”。

赫鲁晓夫对解决农业问题持另外一种观点。他主张建立大型的机耕农场,在这种农场里干活的不是农民,而是农业工人。赫鲁晓夫捍卫的这种方针的最终目的是,缩小城乡差别,消灭农民生活中的小资产阶级残余,建设“农业城”。这种发展模式(姑且称其为“国营农场和工人的发展模式”)成为赫鲁晓夫农业政策的主要方面。

赫鲁晓夫认为,只有走这一条道路才能解决积重难返的农业生产问题。他在1954年1月递交苏共中央委员会的一份报告中说,国家的粮食产量持续下降。赫鲁晓夫指出:“1949年的粮食收购量为22.25亿普特,1953年仅为18.5亿普特,减少了3.75亿普特。与此同时,由于国民经济全面增长、城市人口大量增加和实际劳动工资上升,粮食的消费量逐年增多。”

赫鲁晓夫认为,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提高农作物的产量,使每公顷的产量达到1500公斤。首先必须改变粮食的播种结构,增加玉

米的播种比例(在此之前,俄罗斯中部地区没有种过玉米)。赫鲁晓夫把美国和苏联的农业生产进行了一番比较,他写道:“在苏联,玉米播种面积仅占粮食播种总面积的3.6%,而美国,玉米播种面积所占的比重为36%。美国的粮食产量为什么那么高呢(每公顷1730公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种玉米较多,美国每公顷玉米的产量比小麦和燕麦多一倍。”他认为,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途径是大量增加播种面积,由于在俄罗斯中部地区、苏联南部地区和国家的欧洲部分已经没有后备的土地,因此必须在哈萨克斯坦北部、西伯利亚西部和乌拉尔附近地区“开垦荒地”。

“开垦荒地”是赫鲁晓夫时期制定的一个规模最为宏大的农业行动计划。赫鲁晓夫对所有忠告都不加理睬,其中包括哈萨克斯坦领导人提出的必须三思而后行的建议。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说,哈萨克斯坦地区缺少粮食外运的交通道路,储存粮食的仓库和专业人员的工作场所严重不足,即便是那些“生荒地”也并非弃之不用,哈萨克斯坦的辽阔草原是天然的牧场,是哈萨克人传统经济部门——养马业的命根子。但是,赫鲁晓夫却另有主见,他在1954年初召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开会时说:“在哈萨克斯坦养鸡也比养马合算。马践踏牧场,吃光干草,浪费大量劳动力。”<sup>2</sup>

在赫鲁晓夫的坚持下,哈萨克斯坦的领导层发生了变动。以前任白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后任苏联文化部部长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潘·孔·波诺马连科被任命为这个共和国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当时任苏联国防部总政治部副主任的列·伊·勃列日涅夫被推荐担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二书记。赫鲁晓夫在战前就认识勃列日涅夫,当时后者在乌克兰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书记。赫鲁晓夫曾经说:“我们都知道,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一位能干的党的工作人员,是一名既懂农业又懂工业和熟悉党务工作的领导人。”<sup>3</sup>

开垦西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生荒地和熟荒地,成为确保完成苏共中央领导人提出的主要农业任务的最重要条件。最初计划在3年内开垦荒地将近1300万公顷,但是实际开垦了将近3300万公顷。 171

开垦荒地在一场声势浩大宣传运动的伴随下展开。报刊、广播电台、电影都被用于塑造魅力十足的“垦荒者”的形象——有文化的年轻人克服重重困难，奔赴光秃秃的荒野，从在冻结的土地上打下第一桩开始建设新的国营农场——“农业城”。这种充满社会主义乐观主义的形象符合当时国内的社会氛围——人们普遍认为斯大林主义造成的悲剧已经一去不复返。1954年—1957年，55924户家庭被移居外乌拉尔、西西伯利亚、阿尔泰和哈萨克斯坦地区开垦荒地，新迁来的居民中来自俄罗斯欧洲部分的集体农庄庄员占多数<sup>4</sup>。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雇用农业工人的国营农场，仅在1954年到1955年中就在垦荒地上建起了425个生产粮食的大型国营农场<sup>5</sup>。赫鲁晓夫关于建设“农业城”的设想变成了现实，开展这一运动无疑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产生了作用，首先是使粮食的产量明显增加。从50年代中期起，开垦荒地的收获量占全国粮食生产总量的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

国家为建立新的粮食生产基地投入了大量资金，使新的粮食主产区的农业机械化水平高于其他粮食主产区。与此同时，怀疑主义者的担心得到了证实，新垦区的粮库严重不足，道路网不发达，大量的庄稼烂在地里。机械检修能力滞后，在庄稼收获季节机械师严重匮乏，每年农忙季节都不得不从其他地区调集大学生和军人支援。所以，新垦区的粮食生产成本要比苏联中部地区高。

开垦荒地引发的其他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在后来才开始显现出来。首先一个问题是，缺乏在大片垦荒地上冒险耕作的粮食种植技术，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辽阔的草原地带和半森林半草原地带垦荒种地引发了新的生态问题，表现为从60年代初开始沙尘暴不断袭击这些地区，导致60年代中期新开垦的土地严重歉收。

垦荒运动的组织者完全不顾历史和人口因素。苏共领导人出于一时的政治考虑，对俄罗斯联邦和哈萨克斯坦的行政区划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划定，把俄罗斯联邦奥伦堡州和鄂木斯克州的一些地区“划分”给了哈萨克斯坦，所有这一切后来成为苏联政治领导人想不到的长期起作用的政治因素。

综上所述,在50年代中期,国家为居民提供粮食保障的状况有所改善。这有赖于两种不同的因素,首先是依靠对私人副业生产采取税收减免措施,其次是依靠发展垦荒地国营农场和进行大规模的国家农业生产。在苏共中央九月全会(1953年)以后的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增加了50%,其中耕作业产值增加了54%,畜牧业产值增加了24%。<sup>6</sup>

### **“在人均肉类、牛奶、油料 产量方面赶超美国”**

1957年5月22日,尼·谢·赫鲁晓夫在列宁格勒发表讲话时提出了成为他后来全部活动的一种象征的口号。敢于冒险的赫鲁晓夫寄希望于增加耕地面积和粗放耕作以及依靠个体经济成分来解决国家面临的难题,他把发展个体经济视为“掩盖”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的一种方法。

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密切相关,外部因素所起的作用未必比不上内部因素。波兰事件以后,尤其是匈牙利事件以后,国内对苏联党领导人的不满情绪广泛蔓延。尼·谢·赫鲁晓夫认为,在与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比赛中只能胜利不能失败,这是证明社会主义必将取得历史性胜利的一个决定性条件。赫鲁晓夫对会议的参加者说:“这将是我们的巨大成就。要知道,现在美国正在利用他们的生产量对整个西方世界施加心理影响。经济落后的国家成天战战兢兢过日子,哪里还敢想与美国一比高低,过去俄国就是一个这样的国家。只有在苏联人民夺取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以后……才有可能提出完全切实可行的任务——在人均生产水平方面赶超美国。”<sup>7</sup>

也可以这么说,“赶超美国”的口号使赫鲁晓夫的政策“人格化”,使人们头脑发热,不惜采用任何手段增加粮食、肉类和牛奶的产量。

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苏联,干部滥用职权、国家蒙骗老百姓、政治领导人大发慈悲的现象比比皆是。在这些现象面前,19



世纪俄国伟大的讽刺作家和勾勒官场群丑图的高手萨尔特科夫—谢德林笔下官员的所有欺诈行为都相形见绌。正是由于欺骗成风,才导致党机关把主要精力放在如何写出符合尼·谢·赫鲁晓夫“口味”和使他满意的总结报告上面。

173 赫鲁晓夫式农业改革的一个特征是,承继斯大林时期早已有之的一种信念——相信会找到摆脱农业困境的神奇方法。这些方法除了开垦荒地以外,还包括在全国所有地区种植玉米<sup>8</sup>,推广正方形穴播法,消灭休闲地,推广不拴系饲养法和分片收割法<sup>9</sup>。赫鲁晓夫刚上台时多次承认:“我给人的印象是只会种玉米。”后来他曾经更加明确地表示,自己对种植玉米有偏爱:“同志们,玉米是什么,玉米是战士驾驶的坦克,我这里所说的战士是指集体农庄庄员;坦克可以越过障碍物,玉米可以使我们排除为我国人民提供大量食物道路上的障碍。”

赫鲁晓夫指挥的“骑兵和坦克”步步逼近,顺利越过了对社会主义农业的健全思维的障碍。在党机关的压力之下,播种面积的结构发生了变化:种植玉米的土地从1956年的1800万公顷增加到1962年的3700万公顷。<sup>10</sup>赫鲁晓夫喜爱的“田地王后”撒播在从南部的库班和斯塔夫罗波尔到北部的伏尔加格勒州和阿尔汉格尔斯州的俄罗斯辽阔原野上,玉米的种植面积相当于、甚至超过了耗费无数劳动力开垦的、已经进入农业流通领域的耕地面积。必须指出的是,许多原来用于种植传统粮食作物——小麦和黑麦的好地都被种上了玉米。

但是,当时的苏共中央并不打算放弃手中惯用的工具——党的领导原则。然而,事实表明,党的领导只能确保下面各级组织写出讨好上级的总结报告。早在1958年,作为实现赫鲁晓夫“赶超美国计划”不可分割组成部分的欺骗行为就已经初露端倪。

欺骗的手法有好几种,其中最主要的一种是虚报粮食产量。这种造假的手法既不用费脑筋又十分有效,表现在把根本不存在的、没有打下的粮食说成是存在的,胡说什么这些粮食目前还存放在边远地区的“粮食收购站”,暂时还运不来。于是,这些子虚乌有的粮食也被列入了国家统计数字,并下拨了劳动工资。等到要求向国家上交这些粮食



时,就把留作来年播种用的粮食上交。接下去便是向加盟共和国政府和联盟中央政府要救济粮,其理由不外乎是农业耕地面积增加,自然灾害歉收,等等。这种造假方法于1958年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被首次曝光,在鄂木斯克州、诺夫戈罗德州、秋明州、基洛夫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也有类似的情况。

### 《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 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

1958年8月2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这一决定是执行赫鲁晓夫“在肉类、牛奶和油料产量方面赶超美国计划”的必然结果。无论赫鲁晓夫或者党中央机关都认为,这个计划既然已经宣布,就必须在农业方面作出能够看得见的、哪怕是临时的成绩。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上号召代表们(他们中大部分是全国各地的党机关工作人员)“使肉类产量增加1.5—2倍”,“如期超额完成粮食、肉类和其他产品的生产任务”。<sup>11</sup>

174

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上宣布:“现在已经飞来了几只燕子,向我们预示夏天的好兆头。例如,梁赞州承诺今后(1959年——作者)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肉类产量要比1958年增加2.8倍,斯塔罗夫波尔州——1.5倍,罗斯托夫州——1倍。”<sup>12</sup>梁赞州州委第一书记A. H. 拉里奥诺夫是倡议的发起人,该州成为社会主义农业的象征和“灯塔”。

尼·谢·赫鲁晓夫亲自出面支持这一倡议。苏共二十一大结束后没有过几天,他就前往梁赞州,看望该州的集体农庄村员,在梁赞州党委和州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授予这个州列宁勋章,因为这个州在1958年超额一倍完成肉类生产计划,而1959年的肉类产量如同代表大会上所说的那样,将比1958年增加2.8倍。州委第一书记拉里奥诺夫因为实现了自己的承诺,在一年之中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胜利的乐曲在1959年十二月中央全会上奏响:播种面积增加,

1959年肉类产量猛增,鸡蛋和羊毛的产量增多。苏联有一项指标(牛奶的产量)甚至赶上了美国。先进分子受到了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被广为宣传。在苏共中央十二月全会上,梁赞州被树为先进典型,受到了高度评价,并号召其他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和州以梁赞州为榜样。怎么可能在一年之内把肉类的产量翻两番呢?国家领导人中谁也没有提出这个简单的问题。显而易见,即便把所有的牲畜杀光,也不可能在一年之内把畜产品的产量翻一番或两番,因为这不符合生物学定律。因为在发展农业和肉类生产方面超额完成计划而荣获列宁勋章的地区有:库尔斯克州,基洛夫州,基辅州,罗斯托夫州,斯摩棱斯克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图拉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这些地区州委书记的上衣上出现了金星勋章。

党的领导人知道不知道推广梁赞州第一书记的倡议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呢?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部长、未来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B. E. 谢米恰斯内知道,苏共中央农业部主任多罗申科知道,中央书记尼·格·伊格纳托夫知道,赫鲁晓夫本人也是知道的。他们明明知道,却仍然把这个州树为“灯塔”,树为一面旗帜。梁赞州州委第一书记A. H. 拉里奥诺夫突然自杀身亡,他死得正是时候,因为再也没有必要去弄清这场农业大投机的原因了。<sup>13</sup>

人们不禁要马上提出第一个问题:在1958年一年之中,牛奶的收购量是如何翻一番的呢?

1958年8月20日,俄罗斯苏维埃联盟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牲畜的决定》。这一决定涉及1958年有自己菜园子的1250万户城市家庭。<sup>14</sup>

175 这可以说是赫鲁晓夫时期作出的一项最严厉、最不明智、在经济上最不划算的决策。这一决定一经通过就马上在全国各地得到执行(强行没收牲畜,移交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饲养),其后果是所有牲畜都被屠宰,因为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根本就没有饲养这么多牲畜的场所和饲料。50年代依靠个人副业逐渐增加的牲畜总头数几乎在几个月之中化为乌有。

从统计学的观点看,发生了期待已久的“奇迹”——肉类的采购量剧增,成为在二十一大和十二月全会(1959年)上大吹大擂的根据。从健全思维的角度看,发生了无可挽回的事情——牲畜总头数锐减,其直接经济后果之惨重难以估计。许多城市、工人新村、区中心和老城镇的居民由于没有自己饲养的家畜,只好走进国营商店,依靠国家供应的肉类和牛奶生活。广大居民阶层自我保障的机制被彻底摧毁,而执政党和国家又拿不出取代这种机制的有效办法。

更严重的后果是,赫鲁晓夫和他的战友们(从中央到地方的战友们)把亿万人同土地和农业保持密切联系的传统生活方式毁于一旦,这种既在工厂干活又搞点家庭副业、既养牛又种土豆、兼有农村生活和城市生活特征的传统生活方式是几代人长时间内形成的。在禁止城市和工人新村的公民私养牛马的同时,各家各户的牲畜过冬草料和刈草场也被没收,居民自愿成立的合作组织——畜牧社被全部取缔。

扭转这种局面需要好几年的时间,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试图利用马林科夫过去的老办法恢复家庭副业,但是成效不大。这几年中,无数的刈草场杂树丛生,成了被遗弃的荒野。人们变得懒惰起来了,过去大清早就起来喂牲口挤牛奶,现在习惯于多睡两个小时再起来上班。许多人突然发现,夏天闲得无聊,而在过去,夏天是刈草备料的最忙碌季节。到60年代中期,从事家庭副业的社会阶层基本上已经不复存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利用马林科夫的老办法恢复家庭副业的希望成了泡影。

统计数字和实际情况相差越来越远。在中央政府的纵容姑息之下,许多地方当局都建立起无懈可击的“重复计算”制度。

以库尔干州为例。该州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每年照例要向国家交售牛和猪,交售的数量自然要被列入国家统计数字的,交售者领取交售款,交售的牛被留下继续饲养,以增加体重,到此为止,一切看来都是照章办事的。然而,所有被收购的牛不是被留在收购站继续饲养,而是被拉回交售这些牛的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场饲养。过了一段时间,这些牛被再次交售。同一头牛被两次收购,两次领取交售款,两次列入国家

176

统计报表,该州的肉类产量何以增加一倍可想而知。不仅库尔干州这么干,沃罗涅日州、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也采用了这种投机取巧的办法。

谁能想到,尼·瓦·果戈里《死魂灵》一书的主人公——冒险盲动的奇奇科夫出售和购买“死魂灵”的尝试,竟然在几百年以后,在完成党提出的发展农业的历史性任务中得到了创造性发展!所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奇奇科夫把售购“死魂灵”当做一项诚实的谋生手段,而他的追随者们却不仅在一个州、而且在全国范围内用这种方法投机取巧。

官员们的矫揉造作得到了党中央机关的赞赏。超额完成计划当然要给予奖励,一段时间内,勋章、奖状、锦旗满天飞。在苏共中央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的宣传画上,身穿蓝色工作服、脸部皮肤黝黑的工人努力建设“蓝色的城市”,满脸笑容的集体农庄庄员嘴里露出洁白的牙齿,不会说话的奶牛两个月中体重增加两普特,一幅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动人画面。不,这哪里是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这分明是把党的意志凌驾于自然规律之上!米丘林的一句名言——“我们不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而应该向它索取”就产生于那个年代。“库班河按照布尔什维克的指引流淌”的形象说法也是在那个时候出现的,这一切并非偶然。遗憾的是,这个美妙的世界同国家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毫不相干。

农业政策一败涂地已经显而易见。到1961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都对振兴农业不再抱任何幻想,应该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了。然而,党的宣传工具继续重弹美好未来的老调,要大家克服“暂时的困难”,说什么困难是由于部分农村劳动者“私有观念作怪”引起的。但是,在莫斯科却开始了一场争夺资源——争取中央政府提供更多食品的斗争。<sup>15</sup>

在1961到1962年,开始明显感到食品短缺,不仅肉类、食油和牛奶短缺,而且面包、大米、面条、糖也短缺,也就是说,一般商店柜台上常见的那些食品供不应求。1962年起向国外、主要是向美国购买粮食,国家开始依赖进口粮食生存。

## 新切尔卡斯克悲剧

作者不禁回想起 20 世纪 50—60 年代乌克兰著名演员 Ю. Т. 季莫先科和 Е. И. 别列津表演的一出滑稽剧, 剧中一人问道: “你到哪里去购买食品?” 另一人答道: “我把食品袋挂在收音机上。”这一问一答逗得观众哈哈大笑。是的, 那个时候的报纸、广播电台和电视台经常报道农村劳动者在人均肉类和牛奶产量方面赶上美国的激动人心的消息, 说什么我国有不少指标已经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 苏联在同整个世界的竞赛中已经获胜。但是, 商店里的食品却越来越少, 尤其是肉类和奶制品。后来, 植物油、面包和大米突然间变得短缺起来。在 1962—1963 年, 许多州的大部分食品实行凭证购买。 177

当局不得不提高食品的零售价。从经济上看, 采取这一措施是可以理解的, 当局希望通过上调零售价提高农业生产的利润率。但是从政治上和人们的心理承受能力看, 出台这种措施是绝对不妥当的, 因为它不符合官方的多年宣传, 使人们难免要回忆起 40 年代末 50 年代初的好日子, 那些年中, 每逢宪法日都要实行商品大减价, 首先是食品大减价。

1962 年 5 月 31 日,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发了提高肉类、奶制品价格的决定, 这是赫鲁晓夫农业政策失败的表面表现形式。提高肉类和奶制品价格是一种迫不得已的措施, 尽管采取这一措施多少可以减少国家预算补贴的压力, 以及通过提高收购价和零售价提高农业企业的利润。

这是一项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措施, 因为第一, 没有相应出台弥补居民额外支出的措施; 第二, 这是战后和取消食品配给证制度以后国家第一次宣布提高价格, 人们普遍缺乏心理准备, 因为它与官方的多年宣传发生矛盾。过去国家一再向居民灌输说, 世界各地生活费用高昂, 只有苏联物价稳定, 并且有下降的趋势, 这全靠国家的经济政策好。在 50 年代末, 为了使苏联在同美国的经济竞赛中获胜, 官方加大了这种



宣传的力度。

物价上调立即引起了激烈反应,这并不奇怪。6月1日,亦即在提高肉类和奶制品价格的决定公布后的第二天,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就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居民对物价上调的反映<sup>16</sup>,说一些城市居民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莫斯科有人张贴传单,一些建筑物上出现“诽谤苏联政府和要求降低食品价格”的标语。在莫斯科州的一些城市、列宁格勒、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也发现了传单。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报人员报告说,“在第比利斯市……一些人说,这项决定证明经济政策已经失败。”其他城市也有类似的言论。

178 1962年6月2日,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远东地区出现了不满情绪和“攻击一位党和政府领导人”(克格勃内部用语,指尼·谢·赫鲁晓夫)的传单。

号召举行罢工和示威抗议的声音此起彼伏。弗努科沃机场一个名叫拉平的工作人员号召大家“在红场集合,要求取消提高食品价格的决定”。下塔吉尔火车站副机车司机马祖尔在大量工人面前发表演讲,说生活越来越差,工资下降,物价上涨,“对现政府没有什么可指望的了,必须举行罢工,要求改善生活条件。”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62年6月2日的报告中指出,号召罢工的声音广为传播,有人在分析提高价格的原因时说:“禁止私人饲养牲口的决定是错误的,如果允许工人和农民饲养和繁殖牲口,就不会发生涨价的事,肉类食品就不会短缺。”“个人养的牛都被杀了,没有牛生小牛了,哪儿来的牛肉?多么大的失误呀。”

在知识分子中,议论最多的话题是“赶超美国”的计划失败。演员扎斯夫斯基说:“哪怕不说我们已经赶上美国也好。最讨厌听我们的广播,整天说我们怎么样,我们如何如何,全是瞎吹牛。”担任政治学习小组组长的英语女教师别利洛夫斯卡娅说:“我在讨论中经常给大家介绍我国赶超美国的宏伟计划,说劳动人民的福利不断提高。现在我说些什么呢?我再也不相信了。”

不再相信的不光只有别利洛夫斯卡娅一个人。牛顿第二定律关于

“任何作用等于和对立于反作用”的原理也适用于政治。围绕苏共“赶超美国”宏伟计划展开的大规模宣传攻势，十年取得对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二十年在地球上建成共产主义，所有这一切最后换来的是大失所望、共产主义信念危机、冷淡无情、厚颜无耻和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

没完没了地强调“提高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却换来了“张贴恶毒攻击一位党和政府领导人的标语”——“找州委会去！”（高尔基市），“找州委第一书记去，对这一决定表示抗议！”（克麦罗沃市），“哪里都没有真理，当官的都不能相信！”（彼尔姆市，一个以加里宁名字命名的工厂）。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的这些动态在1962年6月初新切尔卡斯克事件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6月1日清晨，在一天的工作开始之前，新切尔卡斯克市电气机车制造厂铸钢车间的八九个造型工人在一起议论物价上涨的事。不巧的是，正当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罗斯托夫州苏联共产党委员会工业部主任布扎耶夫到这个厂“向工人们宣讲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对全国工人的号召书”。自发性群众集会开始了，其他车间的工人也参加进来了。部分工人停下了手中的活儿，聚集在工厂的小公园里。

179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 П. И. 伊瓦舒京后来对发生在新切尔卡斯克的事件有过详细的、尽管带有倾向性的介绍。据他讲，在罗斯托夫州委会工业部主任布扎耶夫宣讲党和政府的政策以后，电气机车制造厂厂长库罗奇金随之发表讲话，他的讲话导致了冲突进一步加剧。

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献资料中没有提到库罗奇金当时都讲了些什么，但是他的这次讲话所造成的后果是众所周知的，不少车间的工人都扔下了手中的活儿，向工厂的小公园走去。工人们纷纷指责工厂的劳动条件不好，劳动安全无保障，工资太低。机车车身组装车间的工人以劳动条件太差为由开始罢工。绕线绝缘车间的工人也以发生大量中毒事故为由发动罢工。工人们情绪激愤，指责厂方降低计件工资额，使他们的劳动工资减少30%。

厂长在工人们的叫骂声中向厂部跑去,一些工人紧随其后,一边奔跑一边召唤其他工人都到厂部讲理去。就是在那个时候,大约在上午11时,工人们开始打出要求增加肉类、牛奶供应和提高工资的标语牌。半个小时以后,大批工人聚集在厂部大楼前的广场上,对提高物价和降低计件工资额表示抗议。中午12时,一辆从萨拉托夫开往罗斯托夫的旅客列车停了下来,几名工人爬上车头,拉响了汽笛——召唤市民们到广场集合。

州委书记马亚科夫马上驱车前往电气机车制造厂。随后,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罗斯托夫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梅京、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伊万诺夫、州安全局副局长拉扎列夫和安全局的工作人员陆续赶到工厂。广场上的人群迅速扩大,不少市民参加了进来。州领导人躲进了厂部大楼,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说:“他们没有走到工人中间去,没有采取任何维持秩序的果断行动。”工人们冲进了厂部大楼,要求州领导人出来说话。州委第一书记巴索夫开始发表讲话,人群安静了下来。他刚讲了几句话,就被人群中的叫嚷声打断:“我们早就看到了号召书,我们又不是不识字。你说说看,我们往后该怎么活下去,工资额降低,物价却提高了。”州委第一书记无法继续讲下去了,州执行委员会主席扎梅京的讲话也被立即打断,骚动的人群冲向麦克风,但是,“电线被立即切断”。

6月1日晚上,官方开始采取镇压行动。一开始动用了200名警察,被工人们驱散。于是动用了军队,不过没有使用暴力。

180 第二天(6月2日),工人们打着红旗,举着列宁的肖像,向市中心市委大楼进发。由工人和市民组成的人群突破用坦克和汽车组成的障碍,冲进了市委大楼。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中说:“几名流氓爬上阳台,出于挑衅的目的悬挂红旗和弗·伊·列宁的肖像。”群众开始在市委大楼前举行集会,要求降低食品价格和提高工资。军队向工人开枪,当场打死20人,有3名工人后来死亡,40人受伤,大量的骚动参加者被捕。

当日,阿·伊·米高扬抵达新切尔卡斯克市,通过广播电台发表讲

话,但是骚乱仍在继续。这一天,当局同骚乱参加者的代表举行了几次谈判。国家全部部的调查报告中没有提到谈判的详细内容,只是强调指出谈判本身就是对这一严重犯罪行为的审判。参加谈判的代表一共9个人,领头人物 Б. Н. 莫克罗乌索夫后来被执行枪决,判决书中说:“莫克罗乌索夫是匪徒和流氓的代表,他在同抵达新切尔卡斯卡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领导人交谈中态度傲慢,说话无礼,公然要求军队撤出城市,恶毒攻击现存社会制度,对党和政府领导人进行威胁和粗暴污辱。”

第二天(6月3日),人群开始在民警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的大楼前聚集。市内反复播送阿·伊·米高扬头一天的广播讲话。北高加索军区司令 И. А. 普利耶夫下达全城宵禁的命令。15时,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弗·罗·科兹洛夫发表广播讲话。他对新切尔斯克市的居民说:“我们同你们(即新切尔卡斯卡市居民,当时还不敢把他们称做‘匪徒和流氓’——作者)派出的代表进行了谈判,他们提出了如何维持新切尔卡斯卡市和电气机车制造厂的秩序问题……他们请求我们在当地广播电台发表讲话,表明我们对一些流氓分子制造混乱的态度……他们同我们谈完话后回到了大街上,向人们讲述同我们会晤的情况……他们中有人说,布琼尼工厂(即电气机车制造厂,该厂以布琼尼的名字命名)停工和这个工厂参加骚乱是由于工人对劳动定额、商品销售网络的工作以及提高肉类和肉制品的价格不满……”

我们负责任地宣布,我们一定认真调查这些工厂的计件工资问题,采取措施改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状况……”随后弗·罗·科兹罗夫对提高畜产品价格的必要性进行解释,他谈到了农业资金困难,确

181

保国防开支的必要性,战争后果,帝国主义的威胁,等等。科兹洛夫保证说:“尽管这是一些临时措施,但是在近一两年内就可以见成效。我们国家的产品一定会更加丰富,物价会下跌的,生活水平会提高的。”

弗·罗·科兹洛夫在讲话中多次呼吁尽快恢复城市的正常秩序,他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无论如何要尽快恢复这座城市的正常秩

序。着手工作吧,同志们!”

新切尔卡斯克市终于恢复了平静。在这场骚乱中共计打死 23 人,逮捕 49 人,116 人被追究刑事责任。8 月 14 日,开始在新切尔卡斯克市对骚乱的参加者开庭审判,8 月 20 日审判结束。14 名骚乱的组织者中 7 名(扎伊采夫,莫克罗乌索夫,库兹涅佐夫,切列帕诺夫,科尔恰奇,索特尼科夫和舒瓦耶夫)被判处死刑,其余 7 人被判 10 到 15 年徒刑。

依照惯例,指控结论被预先送交苏共中央主席团审批,然后作出判决。

对骚乱参加者的审判一直持续到 1962 年 11 月。

新切尔卡斯克事件是苏联共产党农业政策失败的象征。

新切尔卡斯克一带是俄罗斯南部的粮食主产区,在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尚且解决不了食品供应问题,谈何实现全国性食品保障计划。依靠社会主义农业和苏联共产党对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保持“敏感”领导解决食品供应问题的幻想彻底破灭。

## 尼·谢·赫鲁晓夫和军队

赫鲁晓夫和军队的关系向来不怎么好,大量裁减武装力量给他与军队之间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国家已经没有能力供养一支庞大的军队(截止 1953 年 3 月 1 日,军队的编制员额为 5396038 人)<sup>17</sup>,只好作出大规模裁减军队的决定。在 1955 年—1958 年期间,苏军分三个阶段共计裁军 214 万人,这一举措无疑刺痛了军队领导人的心,何况这一次大规模裁军主要涉及作战部队、指挥机关、军事院校和军工企业。

裁军引起了军队人心动荡。军人们留恋卫国战争初期军队的待遇,他们说:“要是在 1941 年,我们就不会被裁减。”许多在军队服役多年的军官被削职为民,他们没有职业,没有退休金,甚至找不到工作。伊·斯·科涅夫元帅在 1956 年 6 月写道:“在敖德萨州……去年被裁减的军官中仍有 329 人没有得到安置,其中 120 人没有领取退休金的



权利。”<sup>18</sup>两年后,情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呈送“上级机关”的一份报告中说,在对后贝加尔军区一个星期(从1958年2月10日到17日)中收到的军人来信进行暗中检查后发现,有100封军官来信对裁军表示强烈不满,请看其中一封信是怎么写的:

“不知有多少次我们总是担心被裁减,这一回看来是躲不掉了。我们的师将被解散,我们这个团只留下五个人(据说),也就是说,几乎全团的人都要退入预备役……我们这些军官每人都有两三个孩子。应该说,如果留在部队,还能供得起他们吃穿,如果被裁减——没有军装,没有钱,什么都没有了。退役费仅够花一年半到两年。现在大家心情都非常不好,简直是一场瘟疫。该怎么办呢……”<sup>19</sup>

大量裁军使军队的管理面临种种难题。大量年轻军官要求转业,军事院校毕业生不愿意把自己的命运同军队联系在一起;报纸幸灾乐祸地报道军队中有人放火焚烧新式飞机的消息;士兵和士官听到裁军的消息高喊“乌拉”;军队的纪律松弛。

在1957年六月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本人得到了苏联最著名的军事将领——格·康·朱可夫元帅的支持。这件事本身使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军队随时有介入国家政治生活的可能。在赫鲁晓夫眼中,朱可夫已成为一个危险的人物,朱可夫本人也料到了这一点。历史又一次重演,只不过这一回不是斯大林而是赫鲁晓夫想方设法甩掉朱可夫,启用了各方面都比较平庸的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取代朱可夫元帅担任国防部长。

然而,这种做法导致赫鲁晓夫同军队高级将领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朱可夫的住所成为军队中反赫鲁晓夫一派的聚集中心,与其说他们是赫鲁晓夫的政治反对派,不如说他们是赫鲁晓夫的思想反对派。直言快语的朱可夫在评价新任国防部领导人时无所顾忌,说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只会拍马屁,阿谀奉承,是个“眼下最吃香的人”。朱可夫认为,马利诺夫斯基“纵容总政治部主任戈利科夫大将为所欲为,戈利科夫搞垮了军队。”朱可夫说,马利诺夫斯基还纵容军队的政工人员,“《红星报》上每天都有呼吁提高政工人员威信和批评军事指挥人员的文章,

这样搞下去军队非瓦解不可。”<sup>20</sup> 值得一提的是,朱可夫的一言一行都受到了窃听和监视(赫鲁晓夫时期的窃听和监视活动丝毫不亚于斯大林时期),并定期向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报告。

这位失宠的元帅认为,把大量的钱投入探索外层空间的活动是不明智的。每当提起给外国客人赠送丰富礼品的事他就抑制不住大骂一通。他甚至想起了斯大林,朱可夫说,斯大林从来不给任何人签名赠书。

183 朱可夫是怎样看待卫国战争史的呢?这是一个需要专门谈一谈的问题。在伟大卫国战争本身还没有成为历史的时候,许多战争的“登场人物”同时又是政治家,在最初出版的一些战争历史书籍和军事回忆录中,回忆战争历程成了他们贬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试验场”<sup>21</sup>。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中利用回忆卫国战争批评斯大林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赫鲁晓夫还利用伟大卫国战争史为自己树碑立传,涂脂抹粉。他利用自己在国家的地位操纵当时的宣传工具,按照他自己对战争的理解,把他在战争中的一些亲身经历说成是最重大的事件。例如,在1961年出版的三卷本的《伟大卫国战争史》中,在介绍从战争爆发到1943年库尔斯克会战期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时,赫鲁晓夫(战争期间任方面军军事委员)的名字被提到了多达96次,而最高统帅斯大林的名字被提到85次,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名字——16次,另一个方面军司令员——科涅夫的名字被提到10次,朱可夫的名字——11次。

朱可夫对卫国战争史的态度不难想像。他有一次对他亲近的几个人说:“有人粉饰历史。我认为,尽管德国将军也歪曲历史,但是他们写得比较真实,我们的伟大卫国战争史绝对不真实。”<sup>22</sup> 朱可夫按照自己的方式继续同赫鲁晓夫抗争:“……最主要的一点是只字不提打败仗的事。他(指赫鲁晓夫——作者)当时是西南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他可以骂我在战争初期打败仗,但是1942年已经不是战争初期了,他从巴尔文科沃退到哈尔科夫,一直滚到伏尔加河岸边,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被写进去。他和铁木辛哥节节败退,导致一批德军抵达伏尔加河

沿岸,另一批德国人进入高加索。西南方面军和南方面军归他们管辖,按理说力量是足够强大的。”<sup>23</sup>朱可夫还谈到了一个被苏联官方史料闭口不谈的问题——关于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到的作用问题:“现在总是说,盟国从来不帮助我们……可是有些事实是不能否认的,例如美国人给我们运送过许多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我们就没有储备品,就不可能继续打下去……我们得到了35万辆坦克,都是一些很棒的坦克……当时我们缺少炸药,缺少火药……没有步枪子弹,美国人帮我们解决了弹药问题……”<sup>24</sup>

1959年7月27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给军人和军人家庭发放退休金和补助金的决定》,这一决定使军队的不满情绪再度爆发,因为退休金减少了,而且在部队干到领退休金年龄的可能性变得更加困难了。请读者注意,这一《决定》是在继续裁减军队的情况下通过的。根据《决定》,只有军龄满40年的人才能领取退休金,而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到1959年总共才有14年,也就是说,大部分卫国战争爆发后入伍的军官不够40年军龄,没有资格领取退休金。他们发牢骚说:“不到40年什么也不给。”

军队中怨声载道,不少军官躺倒不干,许多军官不断给苏共中央写信。空降兵一名军官提议每人写一封表示抗议的信,在全师举行演习时从空中抛撒抗议信。军人们开始怀念斯大林。有的军人说:“我们帮助别的国家——帮助埃及建水坝,帮助伊拉克,自己却勒紧裤腰带。”已经退休的军人也牢骚满腹,因为他们的退休金一下子少了许多。<sup>25</sup> 184

1959年8月,克留科夫将军与世长辞。在战争年代,克留科夫将军和朱可夫元帅关系密切,他和自己的妻子、著名的女歌唱家利季娅·鲁斯兰诺娃因此被逮捕和流放。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参加了克留科夫的葬礼,葬礼结束后鲁斯兰诺娃设宴酬客,朱可夫和铁木辛哥在宴席上公开指责苏联部长会议的这一决定,朱可夫还补充说,要是他当国防部长,就不会让这一决定通过。<sup>26</sup>

1959年9月,苏联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第十六届会议上提交了

《普遍和全面裁军宣言》。《宣言》中说,苏联政府建议一些大国在较短时间内实现全面裁军,在裁军的第一阶段,三个国家(苏联,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把自己的军队裁减到170万人,英国和法国各减至65万人。第二阶段削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第三阶段销毁所有的核武器、导弹、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根据苏联的建议,整个裁军计划应该在四年内完成。尽管苏联的建议得到联合国大会1959年11月20日决议的赞同,但是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完全不切合实际的、天真幼稚的建议:不仅让美国裁军是不现实的,而且让明显远离苏联的中国裁军以及奉行独立政策、有自己野心的英国和法国裁军也是不现实的。<sup>27</sup>

这一建议的惟一实际成果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60年1月15日单方面决定再度大量裁减军队——裁减120万人,占苏军总数约三分之一。<sup>28</sup>

1960年到1961年是苏联原先提出的外交倡议连遭挫折的时期。联合国大会裁军委员会的活动陷入困境。1960年5月1日,美国一架U-2侦察机在苏联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上空被击落。全国人民感到震惊的是,美国的这种飞机可以飞越整个苏联领土,对苏联进行经常性的空中侦察。尤其让人们感到震惊的是,赫鲁晓夫同时宣布,美国的U-2飞机是被苏军的首发导弹打下来的<sup>29</sup>。

苏联同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盟国(美国,英国和法国)在日内瓦举行谈判中提出的德国不得参加未来军事联盟、不得在其境内建立军事基地的要求也没有被采纳。尼·谢·赫鲁晓夫和约翰·肯尼迪1961年7月3日到4日就同德国签订和平条约问题举行的谈判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苏联的外交活动连遭挫折,与此同时,美国的军事实力不断增强。美军的装备中增加了使用固体燃料和地下井发射的“民兵”战略导弹,它有别于苏联的液体燃料导弹,可在几分钟内进入战斗准备状态。美国的导弹核潜艇装备了“北极星”潜艇导弹,其活动半径比苏联的同类导弹大将近一倍。<sup>30</sup>“北极星”海基导弹的数量从96枚增至144枚,美国处在战斗值班的导弹核潜艇数量增加(从6艘增至9艘)<sup>31</sup>。美国

“宇宙神”液体燃料洲际导弹的数量大大超过苏联的同类导弹。

美国的军事基地实际上形成了对苏联的包围圈。美国可以利用这些军事基地使核武器运载工具靠近苏联领土,同时免除对美国领土的直接威胁。美国从1959年开始加紧在土耳其、英国和意大利部署中程导弹。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是对苏联的巨大威胁,因为这些导弹就部署在苏联欧洲部分几个重要大城市附近。此外,美国陆军、海军、空军的人数增加<sup>32</sup>,技术装备更加精良。

苏联人都记得有一幅宣传赫鲁晓夫建议苏联和北约国家相互裁军的宣传画,在这幅宣传画上,一个被裁员的士兵问几个美国士兵道:“我已经退伍了,你们呢?”宣传画上苏联军人的呼吁当然是不会被美国人理睬的,在赫鲁晓夫一再公开叫嚷“我们(指苏联)要把你们(指美国)埋葬!”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出现军事领域相互信任的局面呢?

从1961年起,苏联与美国和北约国家的冲突不断升级。1961年4月17日,卡斯特罗政权的敌人入侵古巴的行动以被全部粉碎告终;1961年8月,在与华沙条约参加国进行协商后在柏林构筑了柏林墙。世界处在战争的边缘。

## 1962年加勒比海导弹危机

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成为新的一场冲突,古巴成为苏联对外政策的新目标。一开始莫斯科认为,富·巴蒂斯塔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菲·卡斯特罗在古巴进行的权力斗争纯属这个国家的内政。50年代末,卡斯特罗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好感还表现得不明显,1959年1月1日卡斯特罗在哈瓦那执政似乎也并不预示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将在这个国家传播。美国对古巴的投资额在拉丁美洲居首位<sup>33</sup>,在与巴蒂斯塔独裁进行斗争的最后阶段,美国仍然保持中立<sup>34</sup>。古巴的老共产党人不信任菲·卡斯特罗,指责卡斯特罗有亲美的观点<sup>35</sup>。但是有人向莫斯科报告说,卡斯特罗与美国政府的关系比原先预计的要复杂和紧张得多。

1960年2月,阿·伊·米高扬访问古巴,苏联在古巴举办展览会



成为这次访问的理由。此行使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苏联老资格政治领导人的米高扬第一次有机会认识古巴革命的领导人,从而导致苏联对古巴新领导人的政策发生急剧变化。苏联方面发现,原来古巴同美国的矛盾如此之大,美国政府实际上已经开始对古巴进行经济封锁,停止向古巴购买糖和提供石油产品<sup>36</sup>,这是古巴和苏联进行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好机会。根据这次访问中签署的协议,苏联方面承诺,五年中每年向古巴购买500万吨糖,确保向古巴供应汽油和石油,向古巴提供一亿美元贷款。

美国方面立刻作出了回应。3月17日,艾森豪威尔签署秘密命令,支持反卡斯特罗的古巴侨民实施入侵古巴的登陆战役<sup>37</sup>。一个月以后,即在四月份,一艘法国内燃机船在古巴港口被炸沉,船上载有古巴政府为自己军队购买的比利时生产的军火,这一恐怖主义行动促使菲·卡斯特罗向赫鲁晓夫提出提供武器的请求,苏联政府马上表示支持。1960年6月,苏联两次(6月9日和16日)通知美国政府说,苏联准备向古巴提供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必要帮助。

古巴瞬间变成了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纷争的起源。对于美国而言,古巴是它的传统势力范围,是它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利益的目标;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讲,古巴是敢于向美帝国主义挑战的“自由之岛”,是共产主义思想在全世界胜利传播的最好证明,支持古巴革命就是在实践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毋庸置疑,如果哈瓦那出现同苏联结盟的制度,苏联就更有本钱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

1960年下半年,苏联领导人和古巴领导人的接触更加频繁。1960年9月,菲·卡斯特罗和尼·谢·赫鲁晓夫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期间举行了第一次私人会晤,赫鲁晓夫亲自前往曼哈顿岛哈莱姆古巴革命领导人下榻的一家小旅馆同卡斯特罗会面。赫鲁晓夫的这次纽约之行由于他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桌子而尽人皆知,苏联和古巴两国领导人的“心理结盟”就是在赫鲁晓夫的这次纽约之行期间产生的,这自然引起了美国政界不愉快。1960年11月,埃·格瓦拉访问莫斯科,两国达成了向古巴派遣一个苏联军事专家小组的协议(专家

小组以 A. A. 杰缅季耶夫将军为首,其任务是帮助古巴人掌握苏联武器)。苏联开始向古巴提供先进的火炮、迫击炮和装甲车,为古巴军队训练军事专业人员。<sup>38</sup>

美国政府不打算放弃它在古巴的影响力。要想恢复美国在古巴的影响力,唯一的办法是推翻菲·卡斯特罗政府,于是制定了军事入侵这个岛国的计划,古巴侨民在这方面起到了特殊的作用。1960年11月开始组建所谓的登陆强攻第2506旅,作为在古巴登陆的突击部队。按照计划,这个旅主要由古巴侨民组成,配合美国军队行动。

美国新政府继承了上一届政府制定的推翻菲·卡斯特罗政府的方针。1961年4月4日,约·肯尼迪主持国家安全会议,决定最迟在1961年春天实施代号为“冥王星”的入侵古巴的行动。中央情报局局长艾·杜勒斯和他的副职 R. 比斯尔在会议上阐述了占领古巴部分领土、建立登陆场和控制部分岛屿的必要性。入侵小组登陆后必须坚守72小时,等待主力部队——美军登陆。美国大西洋舰队载有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的战舰预先在岛屿附近集结。<sup>39</sup>

1961年4月17日,古巴侨民根据这一计划在吉隆滩地区开始入侵古巴<sup>40</sup>,但是他们未能完成预定的任务——建立登陆场,巩固战果和引发反古巴起义。1961年4月19日,入侵行动基本上被粉碎,大部分侨民被俘。

1961年夏天,美苏再度发生军事对抗,局势陡然紧张,柏林问题再度成为冲突的焦点。1961年8月1日,美国空军的65支部队和分队进入战斗准备状态<sup>41</sup>。8月13日,爆发了新的柏林危机,柏林墙禁止通行,军事对抗加剧,美苏两国的坦克相距数米对峙,双方剑拔弩张,战事一触即发。

在这种形势下,古巴和苏联的军事合作开始具有新的色彩,抗击美国对古巴的入侵成为苏联领导人的重要任务。

8月4日,苏联和古巴签订了一个军事条约,根据该条约,苏联向古巴提供价值4850万美元的军事装备,古巴只需要支付现款600万美元<sup>42</sup>。当年9月30日,两国签订了苏联向古巴提供武器装备的第二个

条约,这一次提供的武器装备价值 1.4955 亿美元,古巴只需支付现金 6755 万美元。两个条约规定的贷款期限都是十年,年息为 2%。

苏联承诺提供轻武器、迫击炮、火炮、坦克、装甲运输车、通信器材、无线电台、米格—15 多用途歼击机、伊尔—28 轰炸机、运输机、直升机、机场设备。古巴海军将得到鱼雷快艇和反潜舰船。条约还规定由苏联方面负责训练古巴的军事专业人员。<sup>43</sup>

188 美国政府不打算放弃采用包括军事入侵在内的方法推翻卡斯特罗的统治,华盛顿开始制定代号为“芒果树”的行动计划。根据该计划,美国政府打算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在政治上孤立古巴政府,在古巴国内实施破坏活动和针对古巴政治领导人、首先是对菲·卡斯特罗的暗杀活动,以及对古巴的军事入侵。1961 年 11 月 30 日到 1962 年 1 月 18 日为制定该计划的初始阶段,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泰勒将军和总检察长 R. 肯尼迪为首的特别扩大小组(SAG)。

1962 年,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被用于继续制定和完善这一计划,最后由约翰·肯尼迪总统在实施“芒果树”行动计划的命令上签字。根据日程安排,应该在 1962 年 10 月完成推翻古巴政权的行动。美国政府的这一份文件中指出:“美国政府将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国内和国外的资源推翻古巴政府,尽管美国政府意识到最终取得胜利需要美国的坚决军事介入。”

美国报纸掀起了一场反对古巴的运动。在美国施加压力下,美洲国家组织不顾墨西哥、智利、乌拉圭和玻利维亚的反对,把古巴从该组织中除名。1962 年 2 月,肯尼迪总统签署了对古巴实行贸易封锁的命令。

对古巴内务的军事干预力度不断加强,向古巴派遣破坏小组的数量不断增加,各种各样的人侵计划相继出笼。为了对推翻菲·卡斯特罗的各种计划实行统一领导,成立了以陆军准将 B. 哈里斯为首的工作小组,其成员包括美军各军种、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国防部情报局的工作人员。

无论执行哪一个人侵计划都需要首先对古巴实施海上和空中封

锁,之后在古巴建立美国军事行政当局。美国政府认为,取消实施“芒果树”行动可能导致面临世界战争的危险。到1962年7月底,实现“芒果树”计划的大部分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但是美国政府对苏联领导人是否知道这一计划还拿不准。不过,即便苏联领导人没有得到有关这一计划的准确情报,美国政府准备入侵古巴的政治意图早已昭然若揭。得到美国支持的古巴侨民不久前入侵古巴虽然以失败告终,但是美国并不会因此善罢甘休。美国报纸对卡斯特罗的攻击始终没有停止,对古巴的经济封锁实际上已经开始,所有这一切证明,美国政府随时准备除掉菲·卡斯特罗和推翻古巴政府。然而,在“冷战”继续的条件下,有限冲突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规律逐渐演变成一场苏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冲突,苏联和美国进入了军事政治角逐的新阶段。一个致力于发展同苏联军事联系、用新式军事技术装备和导弹核武器装备自己军队的古巴政府的出现正中苏联政治领导人的下怀,因为苏联可以利用古巴来化解来自北约轰炸航空兵和部署在土耳其、意大利境内美国导弹对苏联造成的威胁。 189

1962年5月18日,苏联国防会议对在古巴部署装备导弹核武器的苏联军队的可能性进行了讨论。一个星期以后(5月24日),苏军参谋部起草了一份关于在古巴建立军队集群的报告。5月底,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在古巴部署导弹问题。1962年5月7日就任苏联驻古巴大使的A. A. 阿列克谢耶夫后来在回忆这次扩大会议时说,他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听到要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情。会上赫鲁晓夫问他说,“卡斯特罗对在古巴部署导弹可能持什么态度”,“我回答说,菲德尔·卡斯特罗未必同意,因为他把保卫革命的战略建立在得到世界舆论、特别是拉丁美洲社会舆论声援的基础上,而在古巴部署导弹势必使古巴失去这种声援,导致古巴在世界舞台上陷于政治孤立。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在发言中对我的这种看法表示强烈反对,他认为,在古巴部署导弹不仅是为了保卫古巴,而且首先是出于苏联防御利益的需要。”<sup>48</sup>

赫鲁晓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说,为了防止美国入侵古

巴,必须找到一种可以制止美国实施其计划和使古巴成为世界政治焦点的具有恐吓作用的工具。应该让美国人懂得,侵犯古巴将使他们不仅要面对一个不屈不挠的国家,而且要面对苏联的援助。显而易见,只有核武器才是这种具有恐吓作用的工具。赫鲁晓夫强调指出,这样做的目的不是要发动核战争,而只是把它当做一种遏制侵略者的手段。他认为,这样做不会导致直接军事冲突,因为讲求实用主义的美国人未必敢于轻率冒险。我们也是如此,美国人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联邦德国部署导弹,我们也不敢轻易对这些瞄准苏联的导弹采取行动。在古巴部署导弹有助于恢复美国和苏联的力量均衡,使我们可以同美国人平等谈判。我们的这次行动成功与否取决于部署导弹的行动是否能够秘密进行,取决于能否使导弹部队保持高度的战斗准备状态。

A. A. 阿列克谢耶夫指出,无论在这次会议上或者在其他场合,没有一个苏联领导人(包括阿·伊·米高扬)对赫鲁晓夫的这个计划表示过反对,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对于受到美国军事基地包围的苏联来说,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有助于苏美两国势均力敌,从而起到核遏制的作用(只有葛罗米柯表示过怀疑。他认为,不可能做到越洋运输导弹和军队不被发现)。阿列克谢耶夫在评论这次会议的最后结果时指出:“一旦导弹被发现,美国人进入战斗准备,我们该怎么办?会上对这个问题没有拿出任何应急方案。”<sup>49</sup>

190 为了同古巴领导人协商,苏联政府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寄希望于得到古巴领导人的肯定答复,为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准备条件。代表团成员包括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III. P. 拉希多夫、战略火箭军司令谢·谢·比留佐夫元帅和驻古巴大使 A. A. 阿列克谢耶夫。代表团的这次古巴之行名义上是商讨古巴和苏联在农业领域的合作问题,为此,决定由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夏·拉·拉希多夫任团长,比留佐夫元帅装扮成农业问题专家,改名叫“彼得罗夫工程师”。1962年5月29日,代表团抵达哈瓦那后马上同古巴领导人进行谈判。A. A. 阿列克谢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大家都认为菲德尔不会同意。”<sup>50</sup>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卡斯特罗表示同意,并对在古巴部署苏



联导弹十分感兴趣。

在取得古巴方面的同意后,事件开始加快速度发展。6月1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拉希多夫提交的报告。向古巴运送导弹的具体决定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作出的。

## “阿纳德尔”行动计划

“阿纳德尔”行动计划的意图是,以进行战略演习为名,使用海上运输工具,把苏联军队从北海、巴伦支海、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一些港口运往加勒比海。计划形成一个兵力为5.1万人的军队集群。<sup>51</sup>把这次行动取名为“阿纳德尔”显然是为了起到迷惑敌方的作用。苏联有阿纳德尔河,阿纳德尔港,还有一个阿纳德尔市,它是楚科奇自治区的中心。

“阿纳德尔”行动计划的最大特点是高度保密。给军人发放了防寒的衣帽和靴子,配备了滑雪板,造成他们要去北极地带执行任务的假象。舰长得到了整个世界大洋的海图;指挥人员得到了当时世界所有热点地区(埃及,古巴,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印度)的参考材料。

只许舰长们在军舰驶进公海时拆开秘密公文,那上面标有航行目的地——古巴。

现场侦察小组(先遣支队)装扮成农业专家乘飞机前往古巴,迎接他们的是古巴农业部的代表。

舰船抵达古巴后只许在夜间让人员下船和卸货。<sup>52</sup>

为导弹和核弹头运输制定了以防万一的措施,要求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把运输船炸毁或沉没。

7月2日到16日,古巴的二号人物——劳尔·卡斯特罗一直待在莫斯科。他同尼·谢·赫鲁晓夫和苏联国防部长罗·雅·马利诺夫斯基举行了会晤,双方在谈判期间继续对苏古合作条约进行加工,并草签了这一条约草案。新的苏古条约取消了古巴方面拖欠的债务,苏联方面承诺在两年内无偿向古巴提供武器弹药。<sup>53</sup>古巴方面责成古巴国防

191

部长劳尔·卡斯特罗负责条约的修改工作,赫鲁晓夫责成国防会议秘书С. П. 伊万诺夫负责提出苏联方面的修改意见。8月初,菲·卡斯特罗对条约草案做了一系列国际法性质的补充,9月份,经过菲·卡斯特罗修改的条约文本由埃·格瓦拉带到莫斯科,赫鲁晓夫采纳了古巴领导人的所有意见。这一条约草案不仅提到了“保卫古巴领土”,而且提到了“建立军事合作和相互防御”,为在“自由之岛”部署苏联导弹创造了前提条件。

这一条约草案考虑到了苏军在古巴长期驻扎的可能性。驻古巴的苏军归苏联政府管辖,但是必须服从古巴的法律。条约草案还规定双方在五年内有声明废除条约的权利。<sup>54</sup>赫鲁晓夫并不打算公开苏古合作条约,在他看来,宁肯让美国人知道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也比让他们抓到直接证据好。另外,赫鲁晓夫还认为,公布这份文件对肯尼迪不利,因为美国正在准备大选。<sup>55</sup>

为什么苏联选择了秘密部署导弹的方式呢?这无疑是赫鲁晓夫的一次政治失误。经过双方商定并草签的苏古合作条约文本类似于美国和土耳其签订的关于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核武器协定,既然有过这样的国际法先例,苏联和古巴将来可以如法炮制,公开签署在古巴部署苏联导弹的协定。再说,这样做也可以在确保古巴安全问题上对美国施加外交压力。然而,喜欢大轰大嗡和在政治上大做文章的赫鲁晓夫希望在1962年11月他访问古巴期间签署苏古合作条约,以在古巴部署导弹这一事实显示苏联的强大实力。

7月,被任命为苏联驻古巴军队集群司令的普利耶夫大将抵达哈瓦那。И. А. 普利耶夫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指挥过骑兵部队和骑兵机械化部队,1958年起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1962年6月初新切尔卡斯克发生骚乱期间,他曾奉命率领军队前往镇压。选择普利耶夫担任驻古巴军队集群司令多半是因为他具有在山地和亚热带气候地区指挥军队的经验。

美国政府继续制定入侵古巴的计划。1962年8月10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特别扩大小组(SAG)会议上决定实施扩大的“B方案”——

在古巴组织地下活动,促使古巴国内反卡斯特罗分子发动起义,为入侵古巴寻找借口。<sup>56</sup>从1962年1月到8月,在古巴实施了5780次破坏活动,其中716次属于针对大型工业企业的破坏活动。<sup>57</sup>

当年8月和9月这两个月中,苏联舰队不停地把人员和军事技术装备运往古巴,在古巴建立了由陆海空三军组成的强大军队集群。装载核弹头的“因迪吉尔卡号”货船驶离北莫尔斯克<sup>58</sup>,装载核弹头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干货船紧随其后。

按照原先制定的计划,苏军驻古巴军队集群的组成应该包括大量的海军兵力:一个潜艇分舰队,一个水面舰艇分舰队,一个导弹快艇支队,一个“泥火山”导弹团,一个海军鱼雷舰空兵团,一个保障船支队。计划在古巴总共部署:11艘潜艇(其中导弹潜艇7艘),2艘巡洋舰,4艘驱逐舰(其中导弹驱逐舰两艘),12艘“蚊”式导弹快艇,6具“泥火山”导弹发射架,33架伊尔—28轰炸机和五艘辅助船。

实际上向古巴运去了一个伊尔—28航空兵团、一个“蚊”式导弹快艇支队(每个导弹快艇支队三个导弹快艇大队和四艘导弹快艇)。驻古巴的海军编成中也有一个导弹团(每个导弹团四个导弹营和两具发射架),装备“泥火山”式“地对海”巡航导弹,共向古巴运去了34枚这种巡航导弹。“阿纳德尔”行动计划中关于派遣一个水面舰艇分舰队的规定在9月底召开的苏联国防会议上被取消,派遣一个潜舰分舰队的计划后来也没有实施。越洋运输军队和装备的保障任务改为由7艘突击潜艇承担。<sup>59</sup>使用集装箱运输伊尔—28轻型轰炸机遇到一些难题。一个航空兵团的这种轰炸机编制数为42架,到加勒比危机发生前夕一共只组装了6架。

苏军驻古巴军队集群的编成中有导弹核武器,这具有特殊的意义。驻古巴的战略火箭部队是第43导弹师(师长И. Д. 斯塔岑科少将),该师由5个导弹团组成,其中3个导弹团装备P-12导弹(活动半径2300公里),两个团装备P-14导弹(活动半径5000公里)。装备P-12导弹的三个导弹团共有导弹42枚,其中6枚为教练导弹,36枚为作战导弹,弹药基数为1.6。每一个导弹团配备一个核弹头检修基地。

1962年9月底,运载P-12导弹的船只分别抵达古巴翁达港、马里埃尔港和卡西尔达港。<sup>60</sup>10月4日,运载P-12导弹核弹头的“因迪吉尔卡号”货船抵达马里埃尔港。<sup>61</sup>到10月20日,“因迪吉尔卡号”运送的核弹头经过检验后被送往各导弹检修基地。<sup>62</sup>

到危机爆发前(10月22日前)共运送弹药:

——P-14导弹核弹头(百万吨级)60枚;

——巡航导弹核弹头80枚;

——供一个伊尔-28轰炸机航空大队使用的炸弹(每架轰炸机6枚5000—6000吨级炸弹);

——6具“月亮”发射架使用的2000吨级战术导弹;

193 ——6具海上发射装置使用的导弹。

运抵古巴的核弹头共计164枚。<sup>63</sup>由于开始封锁,P-14导弹没有被运走,装载P-14导弹的运输工具在苏联境内待命,但是已有24枚P-14导弹的核弹头先期运抵古巴。

后来,苏联一些老战士——当年加勒比海危机的参加者曾经就苏联当时可能不可能单方面使用核武器问题进行过激烈争论。在古巴危机期间领导过一个核武器专家小组的H. K. 别洛博罗多夫中将<sup>64</sup>和Л. 加尔布兹将军认为,苏军当时根本不可能单方面使用核武器。当时担任苏军驻古巴军队集群参谋长的A. И. 格里布科夫持另一种观点,据他证实,赫鲁晓夫曾经口头指示驻古巴军队集群司令普利耶夫,如果形势需要或同中央失去联系,可以单方面使用核武器。苏军总参谋长曾经把赫鲁晓夫的这一口头指示拟制成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命令,准备下达给苏军驻古巴军队集群司令普利耶夫。但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拒绝在这份命令上签字。据普利耶夫讲,后来他再次收到了赫鲁晓夫关于酌情使用核武器的口头指示。<sup>65</sup>

到危机爆发前(10月22日前),在古巴的苏军总人数将近43000人,驻古巴苏军的编成内包括战略火箭部队、防空部队、陆军、海军、空军、后勤保障部队。构筑了主要和备用发射场,修建了兵营、军火库和道路。

美国侦察部门看来并没有准确掌握苏军在古巴的部署规模。美国侦察机关9月份估计,在古巴的苏军总人数为4000—4500人,11月份对原先的估计进行了核实,改为12000—16000人,1963年初又估计为22000人。美国方面当时并不知道在古巴有苏联的核弹头(“月亮”发射架发射的战术核弹头,巡航导弹战术核弹头以及航空炸弹),也不知道P—12和P—14导弹的核弹头已运抵古巴。美国情报部门以为,这些弹头还装在“波尔塔瓦号”内燃机船上,由于封锁未能运往古巴。<sup>66</sup>

### 世界处在战争边缘

频繁运输人员和武器装备不可能不引起外界注意,所以,9月11日塔斯社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说,苏联正在向古巴提供军事援助,但是“苏联用不着向包括古巴在内的任何一个国家运输武器装备,古巴自己拥有反击侵略和实施反击的力量。苏联拥有巨大杀伤力的核武器和……拥有威力强大的携带核弹头导弹,用不着在苏联境外寻找部署导弹的地点。”

194

在研究古巴危机时,难免会提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1962年10月14日在美国的U-2侦察机拍摄到苏联在古巴部署的导弹之前,美国最高行政当局知道不知道苏联向古巴运输和部署导弹呢?可以肯定地说,在此之前肯尼迪总统已经收到过这方面的情报,因为:第一,1962年夏季,美国加强了电子侦察活动。第二,无论苏联方面或者古巴方面都很清楚,隐瞒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是不可能的。运输导弹、修建发射场、铺设道路、建立其他设施等如此浩大的工程不可能不被移居美国的古巴侨民发现。此外,苏联导弹部队中有一名军官(O. B. 佩内科夫斯基中校)已被美国人雇用为间谍,他肯定向美国人提供过这方面的情报。耐人寻味的是,此人正是在10月22日即肯尼迪总统发表关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电视讲话的那一天被逮捕的。<sup>67</sup>再说,赫鲁晓夫本人多次公开表示苏联要在古巴部署导弹,作为对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的回应。给人的印象是,美国政府故意避而不谈苏联可能在古巴



部署导弹的事。<sup>68</sup>

1962年9月4日,美国总统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认为,苏联向古巴提供的军火属于防御性武器。美国总统的立场引起了美国立法者的怀疑。9月17日,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武装力量事务委员会讨论了关于古巴形势和准备军事入侵古巴的问题。9月19日,美国政府向美国总统提交了一份题为“苏联扩大在古巴的军事存在”的专门侦察报告,这份报告以肯定的口气指出,苏联不可能在古巴部署中短程导弹,因为这不符合苏联目前的政策。

作者认为,美国政府故意避而不谈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问题显然与当时美国即将开始总统换届选举有关。肯尼迪总统和他的亲信们故意暂时不公布这方面的情报,他们显然在等待时机,一旦时机成熟就公诸于世,以造成最大的政治心理效应,完全改变美国在古巴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从潜在的侵略者变为苏联背信弃义的受害者)。<sup>69</sup>

苏联和古巴继续闭口不谈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问题反而给美国政府提供了伺机而动的绝好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指责苏联背信弃义,这样做对美国人和世界舆论的影响当然要比直接用军事的手段干涉古巴内政更加有效。

195 1962年10月,苏联和美国的关系开始迅速恶化。尽管苏美两国政府都没有公开宣布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消息,但是这一消息已经在世界各地不胫而走,而且越传越广。10月10日,美国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公开指责美国政府在苏联在古巴修建军事基地和部署中程导弹期间无所作为。<sup>70</sup>这位参议员所掌握的情报还是很准确的,当时苏联在古巴部署P-12导弹的工作已经结束,威力更大的P-14导弹及其核弹头正在运往古巴。克里姆林宫正在等待时机——11月中旬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访问古巴期间向全世界宣布苏联的导弹已经部署在离美国几十海里远的地方……

但是,华盛顿再次展开外交攻势。这一次的外交攻势既及时又击中要害,其理由是,美国U-2飞机1962年10月14日在古巴上空拍摄的照片显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不容争辩。第二天,照片被呈

送总统和中央情报局领导人。但是,肯尼迪总统仍然坚持在适当的时候公布这一情报。

1962年9月18日,安·安·葛罗米柯同约·肯尼迪举行会晤,会晤持续了很长时间——2小时20分,双方讨论的重点是古巴问题,但都避而不谈各自的真实意图。苏联外交部长对美国总统说:“说什么古巴对美国构成了威胁,谁会相信这一点呢?至于说苏联援助古巴,苏联政府让我重申,我们的援助只是为了加强古巴的防御能力和提高它的经济出口能力。无论是古巴的工业、农业……还是苏联专家训练古巴人员,以及古巴要求我们提供某些防御武器,都不可能对任何人构成什么威胁。”葛罗米柯说这番话的时候苏联在古巴安装导弹发射架的工程已经接近尾声。

肯尼迪针锋相对地回答说:“……美国政府没有入侵古巴的任何打算……但是,赫鲁晓夫先生也不告诉我一声,就突然加快向古巴提供军火的速度,尽管这不会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但是没有必要这样做……我们对古巴现政权持什么态度,苏联政府是知道的。我们认为,如果那里有另外一个政府更好一些,但是我们没有任何进犯古巴的打算……”<sup>71</sup>肯尼迪说这番话的时候美国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已接近尾声,1962年10月是实现“芒果树”计划——推翻古巴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的规定的时间。

约·肯尼迪还安慰苏联方面说:“美国政府相信苏联政府关于向古巴提供的军火纯属防御性武器的声明。”<sup>72</sup>

请读者注意一个重要的情况:葛罗米柯在同肯尼迪交谈时没有回答肯尼迪提出的关于苏联导弹的问题,因为美国方面没有提出这个问题。美国方面也不想听到苏联方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因为保持外交攻势的突然性更为重要。 196

10月22日,美国开始发动这种外交攻势。当天晚上七时,肯尼迪总统通过美国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发表声明,指责苏联背信弃义,在古巴部署导弹,使美国受到巨大威胁,美国必须予以回击。肯尼迪在讲话中宣布“建立最严格的检查制度,以阻止向古巴运送任何进攻性武

器”，必须对所有驶向古巴的战舰进行检查。总统说，他已经命令美国武装力量进入一级战斗准备，让美国在古巴关塔那摩军事基地的军人家属后撤。他还说，美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会议。当天晚上有报道说，美国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已作好了发射准备。当天早上，肯尼迪颁发关于成立以他为主席的国家安全会议执行委员会的第196号总统令，以加强对紧急状态下整个国家的领导。<sup>73</sup>

在肯尼迪发表讲话前一个小时，即在华盛顿时间18时，向苏联驻美国大使馆递交了约·肯尼迪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的亲笔信，这封口气尖锐的信中说，美国准备利用一切手段清除苏联在西半球的军事存在。

信中指出：“……我们在讨论柏林问题和就这个问题交换意见过程中，我最担心的一点是，贵国政府可能不清楚美国在某一具体情况下的意志和决心，因为我不希望您或者其他任何一个思维健全的人把核时代的世界推向战争。无可置疑，没有一个国家能打赢这场战争，战争只会给包括侵略者在内的整个世界带来灾难性后果……我正是为了防止贵国政府在古巴问题上作出某种不正确的判断才公开发表声明指出，如果古巴发生什么事情，美国将采取一切措施保卫自己和它的盟国的安全。

此外，美国国会通过了对这一公开宣布的政策表示支持的决议。尽管如此，贵国仍继续在古巴部署远程导弹和其他进攻性武器系统。我要郑重告诉您，美国对消除危及西半球安全的威胁充满信心……”<sup>74</sup>

197 苏联领导人极其认真对待肯尼迪的声明。第二天(10月23日)4时，广播电台播发了苏联政府声明，声明中说，为了回击美国政府的“挑衅和侵略行为”，苏联政府命令：

“一、战略火箭军、防空部队和潜水舰队暂停老兵复员工作。

二、全军人员停止休假。

三、全军进入一级战备。”

与此同时，华沙条约部队联合司令部也宣布进入一级战斗准备。<sup>75</sup>

苏联政府的声明由著名播音员尤·列维坦宣读。他在卫国战争年代就开始播送苏联政府的声明和最重要的消息。每当广播电台播送苏联国歌“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广大……”以后出现他的嗓音,几乎都意味着国家发生了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可想而知,当时的苏联人听到由列维坦播音的苏联政府声明一定会意识到,苏联处在同美国发生战争的边缘……

约·肯尼迪发表讲话以后,苏联国防部长罗·雅·马利诺夫斯基立即致电驻古巴苏军集群,命令他们采取一切措施加强战备,准备迎击美国侵略者。一旦美国进攻古巴,就动用驻古巴的所有苏军(斯塔岑科将军和别洛博罗多夫将军指挥的导弹部队除外)<sup>76</sup>同古巴军队一道击退侵略者。现在回过头来看,如果当时美国真的进攻古巴,难保苏军不会使用核武器,因为驻古巴的苏军各个兵种都掌握有核武器。如果战争吃紧,总指挥部同各部队失去联系,核武器的使用就有失控的可能。

苏联广播电台播送苏联政府声明之前一小时,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递交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约·肯尼迪的一封信,这份简短的文件中说:“您的来信刚刚收到,我也看到了您10月22日就古巴问题发表的讲话全文。恕我直言,您信中所说的措施是对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安全的严重威胁……美国政府的声明不可能不被视为对古巴共和国、苏联和其他国家内政的公然干涉。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准则没有授权任何一个国家在国际水域对驶往古巴共和国的船只进行检查(请读者注意,当时苏联“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干货船就位于离古巴海岸线不远的海域,船上载有供P-14导弹携带的核弹头,如果美国海军拦船检查,就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作者),我们不承认美国具有对古巴共和国用于加强其防御能力的武器进行检查的权利。我们重申,古巴境内不论哪一种武器都仅用于和平之目的,用于保卫古巴共和国不受侵略者进犯。”<sup>77</sup>

赫鲁晓夫的这一封信实际上承认了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事实,尽管信中没有提到导弹本身。信中指责美国政府准备对过往船只进行检

查违背国际法并非没有根据。1958年《日内瓦公海公约》规定有“公海自由的原则”，该《公约》恰巧在加勒比海危机前夕——1962年9月30日生效。《公约》第2条规定：“公海对所有国家开放，任何国家无权对公海的某一部分提出主权要求”。<sup>78</sup>但是美国人奉行另一个标准——门罗主义<sup>①</sup>的标准，尽管这是美国总统门罗在1823年提出的论点，但是它已经在美国人的政治意识中根深蒂固。

10月23日，美国总统颁布了对古巴周围海域过往船只实行检查的第3504号公告，并命令美国武装力量阻止任何运送进攻性武器的船只驶近古巴。所有驶向古巴的船只都必须接受美军检查，如不服从就将其扣留，押往美国港口等候处理。<sup>79</sup>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尽管当时苏联和美国的对抗和冲突步步升级，但是两国政治领导人之间的联系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频繁。在这段时间中，两国之间至少有17条可供直接联系的渠道。<sup>80</sup>

例如，赫鲁晓夫和约·肯尼迪之间、苏联驻美国大使阿·费·多勃雷宁和美国国务院、司法部长罗·肯尼迪、总统特别助理T.索伦森、美国评论家华·李普曼之间、安·安·葛罗米柯和美国国务卿迪·腊斯克之间、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阿·伊·米高扬和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之间、苏美谈判美方代表约·麦克洛埃、E.史蒂文森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B. B.库兹涅佐夫之间、苏联驻联合国代表B.佐林和联合国代理秘书长吴丹之间、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因恰斯泰基和K.列丘卡以及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的苏联间谍机关代表B.博利沙科夫同美国司法部长罗·肯尼迪之间都有直接联系的渠道。

肯尼迪总统在10月23日致赫鲁晓夫的一封信中把发生冲突的责任完全推到苏联方面。他在信中写道：“我想，您应该承认，贵国政府向古巴秘密提供进攻性武器是当前发生一系列事件的导火索。”在苏

① 1823年美国总统一·门罗在致国会咨文中公布的美国政府对外政策纲领，提出美国是否强大将取决于对新领土兼并的论点，这一论点后来被用作美国在拉美进行扩张的依据。——译者注



美之间的这场冲突中,美国方面抓住了主动权,并成功地利用了国际舆论的支持。肯尼迪声称,“我们将把这个问题提交安理会讨论”,从而使冲突进入了新阶段。肯尼迪在写给赫鲁晓夫的信中以最后通牒的口吻写道:“我希望您立即命令贵国的船只必须遵守美洲国家组织今天午后表决通过的、并在10月24日格林威治时间14时生效的检查规定。”

肯尼迪在信中还敦促赫鲁晓夫说:“但愿我们双方都表现出克制和理智,不要做任何使事态进一步恶化的事情。”显而易见,肯尼迪这样说绝非玩弄外交辞令。

赫鲁晓夫实质上也是这样看待肯尼迪的这封信的。他写了一封言辞极其尖锐、不时夹杂着谩骂的回信,这封信在10月24日莫斯科时间23时30分递交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赫鲁晓夫在信中写道:“您10月23日的来信收悉,现回复如下……总统先生,您用这些条件向我们提出了挑战,究竟是谁让您这样做的?您有什么权利这样做……总统先生,您这不是在宣布对船只进行检查,而是在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和威胁,让我们服从您的要求,否则就要动用武力。您好好想一想,您都说了些什么……不,总统先生,我绝对不能同意!我想,您一定在想,自己是正确的(原文如此——作者)。我相信,您如果处在我这个位置上也会这样做的。援引美洲国家组织的决议丝毫不能证明美国目前提出的要求是正确的,这个组织绝对没有任何权利或理由作出您在信中所说的规定……您想迫使我们放弃所有主权国家都享有的那种权利,试图在国际法问题上另起炉灶。”

赫鲁晓夫接着威胁说:“……美国对待古巴的行为无异于劫掠,简直是帝国主义败类的丧心病狂。遗憾的是,这种丧心病狂只会使各国人民深受其害,美国人民也不能幸免,因为自从出现新式武器以后美国已完全丧失了昔日的可望而不可即……这种侵略行径只会使人类陷入世界导弹核战争的深渊……我们当然不会对公海上的海盗行为淡然视之,我们将不得不采取我们认为必要的、足以捍卫自己权利的措施。”<sup>81</sup>

双方在互致提出最后通牒的信件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说到做

到,即开始转入可能立即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战斗行动,要么改变主意,收回说过的话。

200 第一种选择似乎已经成为不可逆转。菲·卡斯特罗是第一种选择的热心拥护者。10月24日早晨,在哈瓦那古巴革命军指挥所召开了有总司令菲·卡斯特罗和总参谋长希门尼斯参加的会议,讨论实行全国总动员和军队战略部署问题。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如何对付美国的空中打击,但是除了空中打击以外,还有美国侦察飞机经常在古巴上空活动的问题,菲·卡斯特罗在会上说:“我们没有任何政治上的理由或者其他什么理由不把在300英尺高空上飞行的美国飞机击落。”

10月24日晚上,菲·卡斯特罗参观苏联的“地对空”导弹,并命令古巴的防空部队对其实施掩护。<sup>82</sup>古巴防空部队出现在苏联“地对空”导弹部队的阵地上增加了苏联军人卷入对美国飞机的直接战斗行动,为军事升级开辟了道路。

第二天(10月25日),运输P-14导弹核弹头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干货船突破封锁,抵达古巴港口拉伊莎贝拉<sup>83</sup>,而P-14导弹本身是用其他船只运输的,这些船只在苏联潜艇的掩护下正在驶往古巴途中。此时,执行封锁任务的美国战舰也在公海上游弋,双方随时有发生冲突的危险,如果发生冲突极有可能引发一场核战争。世界处在战争的边缘。

赫鲁晓夫和肯尼迪都很清楚这一点。肯尼迪为此又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这封信由送急件的信使在10月25日夜间送到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第二天2时左右被送到莫斯科。肯尼迪这封信的基调和10月23日的那封信似乎没有什么不同,信中再一次指出,“事件的连续性显而易见。8月份有过苏联的军事装备和专家抵达古巴的报道,9月初我极其明确地指出,任何向古巴提供进攻性武器的行动都将被合众国视为严重的问题。”

但是肯尼迪在这封信中流露出恢复双方信任感的愿望,总统强调说,他相信苏联方面关于在古巴没有进攻性武器的所有声明,他写道:“我国政府注意到贵国政府及其代表通过公开和非官方渠道传递的关

于没有向古巴提供任何进攻性武器的十分明确的信息,从塔斯社9月份发布的声明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为此我曾经敦促我国一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人保持克制……然而,后来我才知道,所有这些信誓旦旦的保证原来都是假的,贵国军方不久前已开始的古巴构筑导弹基地。我想,您大概不会否认这一事实吧。

我再次对由于这些事件使我们的关系恶化表示遗憾,希望贵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恢复原状。”<sup>84</sup>

肯尼迪的这封信显然十分重要,信中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传递的信息很多。肯尼迪实际上向赫鲁晓夫解释说,美国政府所作出的那些决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美国政府最终还是没有顶住一些“要求采取行动的人”施加的压力,并且暗示赫鲁晓夫也受到了来自“贵国军方”的压力。此外,这封短信中实际上提出了双方如何摆脱冲突的建议——“恢复原状”,也就是说,苏联从古巴撤走导弹,美国承诺不改变那里的政治局势。

肯尼迪的这封信好比为需要者发出一个信号,莫斯科收到这个信号后立即作出了反应。两个半小时以后(!),苏联外交部向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递交了赫鲁晓夫的回复,四个小时以后,赫鲁晓夫的这封写于10月26日的长信被送到美国国务院。赫鲁晓夫在信中说:“您的来信使我感觉到,您对当前局势的严重性和自己的责任已经有所认识,我对此表示重视。我再次代表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保证,关于在古巴有进攻性武器的说法没有任何根据。从您的来信中可以看出,我们对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更确切地讲,我们对什么是进攻性武器有不同的理解。”赫鲁晓夫请肯尼迪相信,苏联方面没有计划利用古巴领土作为对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桥头堡。

赫鲁晓夫在信中写道:“我们不应该受一时的冲动和激情所左右,不应该受某个国家是否举行选举所制约,这都是一些转瞬即逝的东西,而如果爆发战争,那就不是我们所能左右得了的,因为战争有其内在的规律……”双方在冲突和试图制止冲突的过程中都认识到,苏美两国的相互关系并不是取决于战争,而取决于双方进行战争的能力保持

均衡。

202 赫鲁晓夫继续写道：“我们的运输船看来很快就要进入贵国舰队巡逻的海域。我请您相信，这些驶往古巴的船上装的都是无害于和平的货物，难道您真的以为我们只会干这种运输所谓进攻性武器、原子弹和氢弹的蠢事……所以，总统先生，但愿我们都表现出理智。请您相信，那些驶往古巴的军舰上没有任何武器(!)，古巴防御所需要的武器已经有了……如果总统和合众国政府能保证美国不参与进攻古巴并阻止其他人采取类似的行动，如果您召回贵国的舰队，那么局面将立即得到改变。”赫鲁晓夫要求美国总统放弃入侵古巴的计划，放弃实施被美国军方命名为“芒果树”的行动计划。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向美国总统保证说：“倘能如是，我们不仅可以在销毁被您称做进攻性武器的问题上、而且可以在销毁所有其他武器问题上持另一种立场。”

读了赫鲁晓夫这封信就知道，关于美国记者 D. 斯卡利和以记者身份作掩护的苏联克格勃间谍 A. 福明(费克利索夫)在克服古巴危机中起到特殊作用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当时斯卡利坚持认为，苏联方面应该首先对肯尼迪的这封信进行正式表态，福明(费克利索夫)也是这么认为的，这不符合苏联的外交利益，莫斯科希望美国总统首先对赫鲁晓夫在正式场合提出的关于把妥协作为摆脱冲突方法的建议给予正式答复。<sup>85</sup>

10月26日早晨，菲·卡斯特罗下令从10月27日起对飞越古巴上空的美国飞机实施打击，他说：“古巴不承认……任何侵犯我国领空的飞机有海盗行径的权利……我们捍卫领空的合法权利无可置辩。因此，任何入侵古巴领空的作战飞机都有被我国防空火力击落的危险。”<sup>86</sup>当天哈瓦那时间7时，苏联驻古巴军队集群指挥部向莫斯科报告说，美国人计划在近期发起进攻。10月26日后半夜，菲·卡斯特罗前往苏联驻哈瓦那大使馆，说他已下令击落美国飞机，并且说美国人可能在最近24小时到72小时内发起进攻。菲·卡斯特罗口述了一封致赫鲁晓夫的信，提醒赫鲁晓夫说，美国人最不讲信用。A. A. 阿列克谢夫把这封信的主要内容用电报发往莫斯科，赫鲁晓夫在10月28

日才看到这封信的全文。<sup>87</sup>

菲·卡斯特罗显然不愿意在两个大国的冲突中扮演次要角色,他希望双方的冲突进一步升级。第三者——菲·卡斯特罗的积极干预使冲突变得难以控制。

10月27日,古巴防空部队向美国飞机开炮,没有击落飞机。苏联防空部队使用“地对空”导弹击落一架美国U-2侦察机。

## 走出危机的泥潭

在世界处在战争边缘的时候,苏联领导人迈出了异乎寻常的一步。为了尽快让美国方面了解苏联的观点,10月27日莫斯科时间17时,莫斯科广播电台通过普通广播网播发了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致美国总统约·肯尼迪的一封信,这封信同时被抄送联合国秘书长吴丹。

赫鲁晓夫在信中写道:“您在回复吴丹先生的信中表示要采取措施防止我们两国的船只发生接触,以避免造成无可挽回的不幸后果,我对此甚感满意……您为本国的安全着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古巴也是为本国安全着想的,所有的国家都希望国泰民安。但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对苏联和我们的盟国形成包围圈……你们在那里部署导弹……你们的导弹部署在英国,部署在意大利,直接指向我国,你们的导弹部署在土耳其……你们的这些行动让我们苏联、我国政府怎样评价呢。 203

古巴让你们不得安宁。您说过,古巴之所以让您感到不安是因为它距离美国海岸线不足90海里。但是您要知道,土耳其就在我国旁边,我们两国的巡逻兵经常打照面……你们在土耳其、在我们近在咫尺的地方部署被您称为进攻性武器的杀伤力巨大的导弹……为此我提议:我们愿意从古巴撤走被您称为进攻性武器的那些兵器,我们准备向联合国作出这种承诺。贵国的代表也应该宣布从土耳其撤走类似的兵器,让苏联消除不安和忧虑。让我们商定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实施期限,之后由联合国安理会派人实地调查各方实现承诺的情况。”



这也就是说,各方(苏联和美国)都应确保土耳其和古巴的边界不容侵犯和主权,并且不让第三国干涉。

当天(10月27日)晚间,美国总统约·肯尼迪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的信从华盛顿发出,美国方面也破例在当天晚上公开报道了这封信的全文。两国这样做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免去外交电报的加脱密程序,节约时间。肯尼迪在信中写道:

“我看到了你10月26日的来信(这实际上是肯尼迪对赫鲁晓夫10月26日和27日两封信的回复,肯尼迪之所以采取这种表述方式是为了避开谈及美国在土耳其部署导弹问题,也是为了避免被指责在苏联施加压力下作出让步——作者),我注意到并喜见您致力于寻找尽快解决问题途径的声明。但是,目前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停止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并从古巴撤走所有进攻性武器,在联合国的有效监督下……

读了您的信后,我得出了您的建议基本上可以接受的结论。据我理解,您所提建议的关键部分是:

204 一、您同意在联合国的适当观察和监督下撤出这些武器,并承诺停止向古巴运送这些武器。

二、我们同意(在通过联合国就履行承诺问题达成一致的情况下)(1)立即取消目前采取的检查措施;(2)保证放弃入侵古巴的行动。我相信,西半球其他一些国家也会这样做的。”(肯尼迪在10月27日的信中直接引用了他已经知道的赫鲁晓夫10月27日信中的一段话:“这种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解决办法有助于我们在涉及‘其他武器’问题上达成一致。您在第二封信中提出了这一建议,贵国政府也公布了这一建议。”)<sup>88</sup>

此后,紧张的局势开始趋向缓和。10月28日,尼·谢·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约·肯尼迪宣布:“为了尽快消除冲突危险,以造福于和平事业,为了给渴望和平的各国人民以信心,为了使和苏联人民一样希望和平的美国人民放心,苏联政府在原先下令停止部署武器的基础上,又下令拆除被您称为进攻性武器的兵器,将其进行包装运回苏联……我

尊重并相信您 1962 年 10 月 27 日来信中所说的美国和西半球其他国家不进攻、不入侵古巴的声明,倘能如是,我们当然也没有必要向古巴提供同样性质的援助……”

10 月份的最后几天,在古巴的所有苏联核弹头都被装上了一艘苏联的干货船。12 月 1 日 13 时,这艘船离开古巴驶向苏联的北莫尔斯克。<sup>89</sup>

综观二次世界大战后两个核大国的这次未必不会导致世界面临核大战威胁的对抗,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一、冲突是在苏美两国在世界各地进行对抗的“冷战”背景下发生和发展的,古巴危机是持续不断的柏林危机的副产品。加勒比海危机的特点是,美军和苏军都开始装备以前只有试样的新式武器(携带各种活动半径核弹头的导弹),包括战略导弹、中程导弹和战术导弹……新式武器的问世要求两个超级大国放弃正面对抗。

二、作为冲突双方的美国和苏联很快就发现,古巴不仅是冲突的发源地,而且是经常使冲突的参加者(苏联和美国)出乎意料之外的地方。苏联领导人原先担心古巴不会同意苏联在那里部署导弹,没有想到古巴方面很爽快就答应了;卡斯特罗不仅希望苏美两国的冲突升级,而且在 10 月 26 日命令古巴防空部队拦截美国导弹,并且提醒苏联方面说,美国人最近几天将袭击导弹基地。卡斯特罗认为,赫鲁晓夫向美国人让步是对他的背叛,认为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只不过是对美国人在土耳其部署导弹而采取的一种对等行动。由于卡斯特罗持这种观点,难怪他后来拒绝联合国派国际观察员到古巴,并对 11 月 25—30 日苏联方面撤回伊尔—28 轰炸机提出抗议。

205

三、美国入侵古巴的行动是有预谋的。美国政府在 1961 年 10 月份以前就制定了入侵古巴的计划,入侵的准备工作一直持续到 1962 年 9—10 月。作者认为,入侵的准备工作持续那么长时间与美国总统换届选举前夕的政坛内部斗争有关。

四、从军事的观点看,苏联实施的“阿纳德尔”行动计划是无可挑剔的。苏联的运输船成功地把 P-12 中程导弹及其核弹头和其他武器

装备运抵古巴,在古巴形成了一个兵员数量为43000人的驻外军队集群,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显然是不成功的,苏联运输P-12和P-14导弹的“因迪吉尔卡号”和“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货船顺利突破了封锁线(运输核弹头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克号”是在封锁最严密期间驶抵古巴的!)。美国侦察机关对苏军兵力估计不足(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到危机开始前的10月22日,苏军人数最多为8000—10000名)。当时苏联36枚P-12导弹(活动半径2500公里)携带的核弹头(百万吨级)已进入发射阵地,而美国政府(据美国方面说)直到1989年才知道(根据苏联方面后来提供的资料得知)当时古巴有苏联的核弹头。

五、苏联当时会不会使用核武器呢?“阿纳德尔”行动计划的主要目的是显示苏联的军事实力,但是苏联和古巴的专家都认为这个行动不可能保密到最后。当时主管核弹头运输和存放的H. K. 别洛博罗多夫将军和部署在古巴的三个中程导弹团中一个团的主任工程师A. M. 布尔洛夫上校认为,只有在收到莫斯科命令的情况下才可能使用导弹核武器。苏军总参谋部驻古巴代表A. И. 格里布科夫大将和苏联古巴军队集群司令员И. Д. 普利耶夫大将收到过赫鲁晓夫的口头指示——在与莫斯科失去联系或需要自行决定时可以使用核武器。国防部长罗·雅·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拒绝在以国防部名义下达给普利耶夫的关于有权自行决定是否使用核武器的命令上签字,但是赫鲁晓夫通过电话再次向在古巴的普利耶夫下达了这样的命令。

六、关于美国记者D. 斯卡利和克格勃派驻华盛顿的间谍A. 福明(费克利索夫)进行的所谓秘密谈判只不过是苏美两国领导人的联系渠道之一(其中包括罗·肯尼迪同以新闻记者身份作掩护的苏联间谍B. 博利沙科夫以及同阿·费·多勃雷宁的接触)。

七、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可能在苏联部署导弹问题上作出强硬反应估计不足。从军事上看,存在着在苏联的P-12导弹准备发射的那一时刻将其摧毁在发射阵地上的可能性。P-12导弹使用液体燃料,临发射前加注一次燃料,准备发射的工艺循环周期为两个半小时。在导弹发射阵地距美国领土90海里、飞临时间为10分钟的情况下,在导弹

发射前将其摧毁是可能的(据 H. K. 别洛博罗多夫中将估计)。所以,苏联领导人在收到军方提供的关于美国准备发动进攻的情报以后,在得知卡斯特罗下令从 10 月 27 日起对飞越古巴上空的美国飞机实施打击,获悉肯尼迪准备在 10 月 27 日发表电视讲话以及估计到总统可能在电视讲话中宣布对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采取军事行动以后,迈出了史无前例的一步:在肯尼迪总统发表电视讲话之前通过苏联广播电台播发赫鲁晓夫致肯尼迪总统的信。

#### 八、在这一次对抗中谁胜谁负呢?

从军事战略的角度看,苏联是这一次对抗的胜方,因为美国撤走了在土耳其和意大利部署的导弹,确保了古巴领土不受侵犯,当然苏联也付出了从古巴撤走导弹的代价。后来,由于远程战略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把导弹核武器部署在靠近对方领土地区的必要性随之降低。

从政治和宣传的角度看,美国是胜方,因为在世人眼中美国是苏联扩张主义的牺牲品,是西半球安全的有效保护者,从而赢得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和支持。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导弹核危机,它表明导弹核武器并不能作为用军事的方法实现政治目标的工具,核武器在它被使用之前只是一种政治因素。这一次危机以后,苏美两国在多次冲突中都尽量避免直接接触,转而利用仆从国的相互对抗为自己谋取利益。

九、这一次危机以后,军队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分量加重,军队在国家生活中的作用提高。不过,赫鲁晓夫对军队始终怀有戒心,一直在寻找加强对军队实行监督的方法,每当有人提出加强监督军队的建议时他就如获至宝。有关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将详细介绍。 207

## 国家机构和党机关的改革

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那些年是国家管理层变革最为频繁的时期。在斯大林时期,超中央集权的、军事化的经济培育出包括

各种专业化的部和指令性行政管理机构在内的相应管理体系。中央政府的部和各加盟共和国的部直接或通过下属各个管理局对企业实行管理,给企业下达国家计划数字和规定各种指标——企业人员编制数,劳动生产定额,等等。企业的原料由谁供应,产品销往何处,都是由部确定的<sup>90</sup>。部是国家执行权力机关的分支机构,每一个经济部门、工业部门和管理部门都有自己的“总部”——部。战后时期全苏联共有将近50个部(见下表)<sup>91</sup>。

年	部		
	共计	中央政府的部	加盟共和国的部
1946	49	30	19
1947	58	36	22
1948	59	36	23
1949	48	28	20
1950	51	30	21
1951	53	32	21
1952	51	30	21
1953	25	12	13
(截止3月份)			
1954	46	24	22
1955	51	25	26
1956	55	27	28
1957	52	23	29
(截止4月份)			

斯大林去世以后,这一体系受到了第一次打击。到1953年3月15日,部的数量锐减为25个,被砍掉的主要是国防工业和机器制造业部门的一些部。汽车和拖拉机工业部、机器制造和仪表制造部、车床制造部、农机设备制造部被合并为一个部——苏联机器制造部;重工业部、运输机器制造部、建设和道路机器制造部、造船工业部被合并为运输和重工业部;新成立的国防工业部由原先的军械部和航空工业部合并而成。<sup>92</sup>



稍后,在1953年召开的中央七月全会上,把部的数量锐减的责任推到了贝利亚身上,指控贝利亚把许多部砍掉是别有用心的。不难理解,部的数量锐减引起了首都官僚们的不满。到了1954年,原先斯大林时期存在过的那些部几乎被完全恢复。

1957年,尼·谢·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完善工业部门和建设部门领导》的报告,建议成立一个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央书记、州委书记和各部部长组成的委员会。赫鲁晓夫的建议被提交1957年中央二月全会审议。这无疑是一个走极端的建议,它要求把原先的工业管理体制整个推倒重来。<sup>93</sup>

赫鲁晓夫在1957年中央二月全会上作报告时指出:“根据国民经济继续发展的要求,必须把对工业部门和建设部门实行有效领导的重心移向企业和建筑业,为此……必须改变原先通过各部委管理的模式,转向按照区域原则管理的模式,例如,把国民经济委员会作为其中的一个管理模式。”<sup>94</sup>

偏爱政治考古学的赫鲁晓夫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苏维埃政权最初年代成立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于1917年底到1918年初,存在于整个20年代),要求从垂直管理模式(党发指示,苏联部长会议作出决定,工业部门各个部向企业发指令)向取消工业部门的部过渡。

1957年5月1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部门和建设部门管理体制》的法律,以立法的形式批准了赫鲁晓夫在中央二月全会上提出的建议。<sup>95</sup>

从此以后,各经济行政管理区的国民经济委员会成为最关键的部门。所谓国民经济委员会首先是指对经济实行统一管理的范围,在俄罗斯联邦,国民经济委员会管理的范围与各个自治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地理范围相吻合,俄罗斯联邦共计成立了70个国民经济委员会。乌克兰成立了11个国民经济委员会,哈萨克斯坦——九个,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各成立一个。第二,国民经济委员会是一个对辖区内的工业企业、建筑企业、经济机构实施统一领导的管理机

构,它除了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机构本身以外,还包括各工业部门成立的部门生产管理机构其他职能机构(运输机构,财政机构等)。一些知识密集型和最重要的军事工业部门仍保留中央集权管理体制。<sup>96</sup>

在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的头几年取得了值得肯定的经济成果。

运输业的原材料和产品消耗量减少,国民经济委员会辖区内企业之间的合作和联系得到了加强。但是,成立国民经济委员会也引发了一系列矛盾和社会后果。这一改革首先引起了首都官僚们的巨大不满:几十年中形成的由人民委员部(后来改称为部)垂直管理的体制轰然倒塌,许多人因此丢掉了官帽和工作岗位,让他们离开首都去外地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显然不合他们的心意,再说也不现实,因为外地的领导机关早已经物色好了人选。

另一方面,地方党政机关上层人物把取消各个部视为扩大自己权力的好机会,生产部门的上层人物成了最大的赢家,许多国营农场主席、副主席、局长、处长进入了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层。1960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个决定,根据这个决定,许多大企业和建筑工程的经理也进入了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层。请读者注意,国民经济委员会领导层中没有州委会领导人的位置。当然,国民经济委员会和州委会之间存在着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没有被正式规定。

因此,常常出现一些生产部门的领导人同州委会闹独立的现象。

可能在赫鲁晓夫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原则性问题。赫鲁晓夫在同自己的老对手——首先同马林科夫、后来同布尔加宁进行权力斗争中(他们两人先后担任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最终下决心由他自己来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1958年2月,布尔加宁被免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赫鲁晓夫集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于一身——既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又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从而导致两种后果,一种后果是国家机构的权力扩大,另一种后果是党机关工作人员担心赫鲁晓夫不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和捍卫者,使他在苏共中央1957年六月全会上得到的捍卫党机关利益的勇士的光环黯然失色。

1961年10月党的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新党章成了党的

机关干部们的绊脚石。新党章规定,党的机关——从苏共中央主席团到基层党组织必须定期吐故纳新,党的基层组织(包括区一级的党组织)在每一次换届选举中至少要淘汰掉原班人马的二分之一,共和国和州一级的党组织——三分之一,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四分之一。此外,还对同一个人几次被选进同一个党机关的可能性进行了限制。这些规定对党机关保持稳定构成了威胁。

1962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两个极其重要的决定。一个决定题为《关于建立党和国家监督系统》,有关情况将在下面详细介绍。另一个决定题为《关于发展苏联经济和改革党对国民经济的领导》,这个决定意味着按照生产的原则把党组织一分为二,党组织(从州一级党组织到基层党组织)被划分为工业部门党组织和农村党组织两种,这样一来,在同一个州或者边疆区里面就有了两个州委会或边疆区区委会。州和边疆区的苏维埃和执行委员会也随之被一分为二,成立了州(边疆区)工业苏维埃(工业执行委员会)和农村苏维埃(农村执行委员会)。农村地区的区委书记也受到了冲击,根据这个决定,农村区委书记的职务被取消,管理地区农业的职能被移交管辖几个地区的生产管理机构——国营农场。

变革还涉及社会团体和其他国家组织——共青团,工会,民警机关。据这段时间担任国家安全机关领导人的B. E. 谢米恰斯内回忆,赫鲁晓夫甚至还想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也按照生产的原则一分为二,谢米恰斯内回答说:“难道要我把间谍也分为工业间谍和农村间谍?”据他说,他当时没有能够改变赫鲁晓夫的主意,只是提醒赫鲁晓夫说,按照生产的原则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一分为二将导致国家安全委员会中的军官和将军的人数大量增加。谢米恰斯内回忆说:“赫鲁晓夫很讨厌国家安全委员会中佩戴军衔肩章的人,经常说:‘应该把他们的肩章扯下来,把将军军裤上的红彩条撕掉’。”<sup>97</sup>

国营农场也受到了牵连,他们的职能发生了变化。例如,国营农场的管理范围扩大到建设部门和工业领域。国营农场的数量锐减至47个,一个国营农场的辖区包括好几个州。不难理解,这进一步削弱了那

些根据 1962 年十一月中央全会决议成立的工业州委会。工业州委会不仅隶属中央委员会,而且隶属地方国民经济委员会。

这一决定使地方权力机关陷入全面慌乱状态,对于党政官员来说简直是一场噩梦<sup>98</sup>。在党机关和苏维埃机关被一分为二之后,工会和共青团也被划分为工业组织和农村组织两种,管理机构的数量剧增。例如,在弗拉基米尔州古西赫鲁斯塔利内市,同时存在着市党委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管理党委会、工业生产党委会、农村区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

所有这些措施都激起了愤怒,被普遍认为是胡闹。但是作出这些决定自有它的道理,把地方党的领导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村党组织的做法本身是扩大党和国家机关的符合逻辑的继续。正是农村党机关的出现使人产生了可以通过加强党的领导解决农业问题(在此之前已经十分尖锐)的习惯性幻想。

请读者注意,地方党和苏维埃领导受到削弱客观上使经济管理人员的地位得到加强,因为国营农场仍然是惟一的地区管理机构。但是,经济管理干部的影响力比不上党机关工作人员,由上级任命干部的体制使他们处在完全依从党机关的地位。各级党组织书记的习惯性威胁:“我有权不让你干这份工作,我什么时候都能把你撤职”是完全可能成为现实的,何况任命经济管理干部必须经过党机关同意。所以,苏共中央 1962 年十一月全会上通过的这两个决定非但没有使赫鲁晓夫赢得新盟友,反而使不少有影响力的州委书记们——中央全会的多数派从此成为他的宿敌。

## 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

赫鲁晓夫下台(换句话说,免去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阴谋得逞)自然会使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他为什么下台?要想找到这个问题的正确答案,必须首先分析一下赫鲁晓夫同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关系。

贝利亚被逮捕以后,他的第一副职谢·尼·克鲁格洛夫当上了内务部部长,前面已经列举过许多事实证明,内务部的许多工作人员把贝利亚被铲除视为恢复斯大林时期秩序的一个信号。然而,事态的发展完全出乎审判贝利亚的会议参加者的意料之外,受贝利亚一案的牵连,内务部的许多工作人员被清洗。1953年8月,内务部领导人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递交的一份关于清洗内务部机关和各个州内务局领导人的情况报告中说,许多原先的领导人被送交法庭审判,其中不少人被判处死刑或有期徒刑。

内务部被视为30年代到50年代初大清洗的“急先锋”,这无疑使它的影响力一落千丈。1954年3月12日,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宣告成立,伊·亚·谢罗夫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曾经多年担任内务部副部长、后来几年(从1953年初起)担任贝利亚的副职,然后担任谢·尼·克鲁格洛夫的副职。原先内务部的一系列职能被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1955年,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命令,组建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内务部。请读者注意,俄罗斯联邦已经长达25年没有本共和国的内务部(原先的俄罗斯联邦内务人民委员部在1930年12月被取消)。

1956年初,在二十大前夕,谢·尼·克鲁格洛夫被免去内务部长职务,前苏共中央建设部主任H. П. 杜多罗夫被任命为内务部新部长。1956—1957年对内务部机关进行过一次大清洗,内务部的几个副部长都被免职,一些多年从事党务工作的人被任命为副部长。1957年9月,边防军被从内务部移交国家安全委员会管辖。 212

1960年1月13日,苏联内务部被取消,它的职能被移交各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不久,各加盟共和国的内务部也先后改名,1962年俄罗斯联邦内务部被更名为公共秩序维护部。

国家安全委员会则是另外一种情况。首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伊·亚·谢罗夫同尼·谢·赫鲁晓夫关系密切,因为他们在乌克兰共过事。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期间,伊·亚·谢罗夫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从1939年9月2日到1941年7



月25日),所以谢罗夫一直被视为“赫鲁晓夫的人”,谢罗夫在为赫鲁晓夫起草二十大“秘密报告”中起到过关键作用。在1957年6月18—21日召开的那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谢罗夫被免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前面已经讲过,在那次会议上,赫鲁晓夫本人也险些被免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sup>99</sup>

谢罗夫不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被调任苏联国防部侦察总局局长,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们现在不可能搞清楚。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国防部侦察总局局长的职务尽管也很重要,但这是一个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职务,主要是在政治上帮不上赫鲁晓夫什么忙。不管怎么说,谢罗夫不当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对赫鲁晓夫个人来讲是个很大的损失。

取代谢罗夫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是苏共中央机关部主任、前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亚·尼·谢列平。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成立就开始履行一系列政治方面的职能<sup>100</sup>,亚·尼·谢列平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这种职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并被载入1959年1月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的《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条例》。《条例》中说:“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是实现党中央和政府确定的保护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国内外敌人侵犯方针的政治机关”。<sup>101</sup>

213 谢列平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清洗工作并没有停止。谢列平的继承人谢米恰斯内(他也担任过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就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不久给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递交的一份总结报告中写道:“从1954年起国家安全机关中……有46000多名军官被开除,其中1959年以后被开除的军官占一半。”清洗运动不仅波及国家安全委员会总部机关,而且波及下属的侦察和反侦察机关。这份文件中说:“反侦察机关90%以上担任领导职务的将军和军官是最近四年任命的。”

谢列平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后,国家安全机关基本上是从持有党团组织介绍信的人和党团组织工作人员中征聘克格勃工作人员。

在1960到1962年间,国家安全委员会有不少领导人被调到党组织、苏维埃和检察机关工作。

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和党的各级机关建立起了密切联系,而以前的国家安全机关——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只是充当党的命令(包括罪恶的命令)的执行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比过去内务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更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是“党的武装队伍”的一员,因此更具有主动性和独立性。这种状况对赫鲁晓夫本人并没有好处。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些新举措,如裁员11万人、降低工资、取消一系列特权(药物免费,工龄津贴,等等)不可能不引起不满。

国内各阶层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不可能不引起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的不安。谢列平1962年6月递交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1962年上半年,全国发现的反动传单和匿名信同比增加了一倍,破获非法反苏集团60个(1961年上半年为47个),发现传单和匿名信7705件,书写反动传单和匿名信的人2522名,其中1039人已被查明身份(工人364人,职员192人,大中學生210人,无固定职业者108人,领取养老金者105人,集体农庄庄员60人)。这些人中40%以上受过中等和高等教育,47%年龄在30岁以下,有一些人是军人和老共产党员。

震惊全国的新切尔卡斯科事件发生以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治警察职能进一步扩大。骚乱被镇压以后,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立即采取一系列旨在加强政治审查和监督持不同政见者的措施。1962年7月1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一个决定中指出:

“一、同意委员会提交的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总检察院关于加强同反苏分子的敌对活动进行斗争的决定草案……

二、允许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把每一个地区安全机关反侦察组织的在编人数增加400名。”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通过的这一决定还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严厉批评,指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在高校、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科研机构、文化界、艺术界的宣传工作软弱无力,在同敌对分子作斗争中心慈

214

手软。

苏共中央委员会下发的这一决定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命令》，《命令》中指出“最近以来，一些城市发生冲击政府办公大楼的大规模骚乱……”，“某些刑满释放分子、前德国法西斯雇用的讨伐队员、神职人员和教派信徒千方百计使一些自发性的事件具有反革命的性质。”（请读者注意，这一评价完全不符合新切尔卡斯克星期日骚乱的具体情形）。

《命令》要求“……消除安全机构中间谍活动力量薄弱的不足”，“对归国侨民、思想反动的神甫和前德国法西斯雇用的讨伐队员要特别提高警惕”，“更有效地利用各种技术侦察手段对付持反苏立场和企图破坏人民对党和苏联政府信任的人……协同党的机关采取措施制止反苏分子、书写反革命传单和匿名信者和试图挑动大规模骚乱者的任何敌对活动……”

《命令》号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提高间谍活动和刑事侦察工作水平，坚决制止神甫和讨伐队员的任何敌对活动，对非法团体的领导人和组织者要绳之以法。”

215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尼·谢列平的这一《命令》最后要求“国家安全委员会、各安全局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委员会驻各城市、各地区特派员密切配合各级党组织的工作，为党中央、边疆区区委、州委会、市委会……提供准确的情报。”

安全机关插手国家政治生活，克格勃的领导人直接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这种现象不可能不引起不满情绪在全国进一步蔓延。当时要想控制住局面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加强镇压（请读者注意，恢复政治镇压并使镇压合法化的臭名远扬的《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70条就是在1962年7月通过的），另一条出路是更换国家政治领导人，把导致国家发展屡遭挫折的那个人——尼·谢·赫鲁晓夫的名字从国家政治领导人的名单中抹去。

赫鲁晓夫本人不可能不为国家的形势担忧，他不得不面对令人难以置信的大量欺骗上级和造假现象，而且蒙骗造假者都是一些州委书

记和大型企业的领导人<sup>102</sup>。当然,党可以通过揪出“坏典型”的办法罢免一些领导人的职务,以杀一儆百,达到教育其他人的作用。但是法不敌众,特别是在农业领域,几乎所有党、苏维埃和经营管理部门的大小官员都在搞欺骗造假。

赫鲁晓夫试图同这些行为进行斗争,他亲自到全国各地巡视,一有机会就厉声训斥那些造假的官员,并亲自组织大检查,但是情况并没有改观。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不可能做到对执行决议的情况实施有效的监督,因为这样的国家政权总以为它基本上不会作出不正确的决定,所以总是把罪责推到没有执行它英明指示的人身上。要想使它的指示得到执行,就必须像伟大的列宁说过的那样,再建立一个机构,建立一个确保“检查和监督”的部门。

## 苏共二十二大

赫鲁晓夫在像斯大林那样成为党和国家的头号人物以后,有那么几年的时间忘掉了斯大林。在1959年1月27日到2月5日举行的苏共二十一大大上没有关于斯大林的议题。

但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突然间再度响起批判斯大林的声音,这种声音先从赫鲁晓夫的红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亚·尼·谢列平的发言中,后从赫鲁晓夫1961年10月27日宣读的闭幕词中传出。这里没有赫鲁晓夫所特有的“意识流”,他主要谈30年代发生的事情,指出“反党集团”妨碍了对个人崇拜的揭发。给人的印象是,赫鲁晓夫在重弹二十大报告的老调——只讲过去。赫鲁晓夫指责斯大林组织暗杀基洛夫,指责斯大林在1937年搞垮了军队。

在此之前,反斯大林的话题已成为赫鲁晓夫特有的一种政治记号。作者认为,他重提反斯大林的话题显然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国家经济崩溃、特别是农业一团糟的视线。所以,赫鲁晓夫一方面在宣布苏联共产党新党纲时许诺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另一方面极力表现出他致力于“党内民主”,完全有能力对付像“斯大林分子”那样的新敌人。

在随后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会议在10月30日早晨开始)<sup>103</sup>,主持会议的什维尔尼克让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斯皮里多诺夫发言。

斯皮里多诺夫回忆说,列宁格勒深受1934—1938年和1949—1950年的大规模镇压之害,这两次镇压都是按照斯大林的直接指示或者经他同意实施的。

斯皮里多诺夫说:“列宁格勒的党员和劳动者早在讨论苏共二十大总结报告时就一致认为,把斯大林同志的遗体放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陵墓中、放在世界工人阶级的伟大领袖和导师的旁边是不合适的……因为斯大林有许多违法行为。

现在,许多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要求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弗·伊·列宁陵墓。”斯皮里多诺夫提议尽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弗·伊·列宁陵墓移到其他地方。<sup>104</sup>

在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之后发言的是杰米契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他发言的时间不长,说话时情绪不那么激动,他也要求把斯大林的遗体移出列宁墓。但是有一个重要的细节情况没有逃脱作者的视线,在杰米契夫原来的发言稿上写道:“我们听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闭幕词后,为我们党在个人崇拜时期所经受的艰难困苦而难过。”而在速记记录稿上,“在个人崇拜时期”<sup>105</sup>这几个字上面被涂上密密几道细线条,透过细线条勉强能辨认出是什么字。显而易见,这几个字是他在发言的那一天涂掉的……这未必是件偶然的事情。后来,杰米契夫成为以亚·尼·谢列平为首的集团的一员,参与了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看来,他早在那个时候,在1961年底就已经“心怀鬼胎”,不愿意在他的发言记录稿上留下“在个人崇拜时期”这几个字。后来,在1965—1966年间,官方宣传物上禁止使用“个人崇拜时期”这一概念。

在杰米契夫之后发言的是格鲁吉亚共产党代表贾瓦希什维利(格鲁吉亚中央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没有在会上发言,显而易见,他对1956年3月5—10日发生在格鲁吉亚的那场骚乱还记忆犹新)。贾瓦希什维利的发言主要是罗列被斯大林迫害的格鲁吉亚党的活动家的名字。

217 接下去发言的是Д. А. 拉祖尔金娜——一位革命前入党的老党



员,档案馆至今仍存有她的发言稿——小心翼翼地批评斯大林,把斯大林同列宁进行比较,充满了对尼·谢·赫鲁晓夫的感激之情。她在发言中说:“我至今还记得我满怀对如此热爱党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无限崇敬之情离开日内瓦时的情景……可是,同志们,连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遭到了迫害。我当时在列宁格勒市委担任领导职务,当然也被逮捕。

……我蹲了两年半时间监狱,后被送进劳改营,之后被流放。但是当时我丝毫不责怪斯大林,始终在捍卫斯大林的声誉,我对狱友们说:‘我们的斯大林是列宁主义者,他是绝对不会那样做的……’1954年我被完全恢复名誉。我是在二十大召开期间才第一次听到代表大会揭发的那些事实……

我认为,斯大林尽管在过去、在1934年以前有过功劳,但是绝对不能把他同最伟大的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相提并论。”

从会议速记记录稿上可以看到,拉祖尔金娜讲到这里时,赫鲁晓夫插话说:“完全正确!”(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sup>106</sup>

最后发言的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尼·维·波德戈尔内,他的发言使会场的气氛达到最高潮。波德戈尔内宣读了《苏共二十二大关于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的决定》,《决定》中说: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决定:

一、把位于红场克里姆林宫宫墙旁的陵墓命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墓,以永远纪念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永垂不朽的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奠基人、全世界劳动者的领袖和导师。

二、承认继续把装有约·维·斯大林遗体的石棺存放在陵墓内是不合适的,因为斯大林在个人崇拜时期严重违背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诚实的苏联人,因此不能再把装有他遗体的石棺留在弗·伊·列宁墓内。”<sup>107</sup>

与会代表通过表决一致通过了这一决定。

10月31日,装有斯大林遗体的石棺被移出陵墓,埋葬在克里姆林

宫宫墙旁……

218 一个月以后,1961年11月28日,当时被视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的弗·罗·科兹洛夫在苏联中央高级党校向学员们发表讲话。

这是一次试图向党校学员——党机关工作人员宣传新方针的讲话。科兹洛夫首先在讲话中指出,“共产主义运动用不着进行任何‘意识形态更新’,谁提出这种要求,谁就是企图为我们的阶级敌人雪中送炭,就是试图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添乱。”<sup>108</sup>

科兹洛夫谈到了二十二大总结报告,谈到了讨论“个人崇拜”问题和“反党集团”,谈到了新党章对党员任职时间进行限制的规定。但是,科兹洛夫的讲话并没有引起党校学员们的共鸣。

有学员问,对那些已经担任领导职务10—15年的党员干部有什么规定?科兹洛夫回答说:“……根据新党章,他(指党员干部——作者)应该被撤换……这个问题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样的党员干部自己应该很清楚,到了让位的时候了。”<sup>109</sup>

学员们异口同声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为什么赫鲁晓夫还不让位?”有的学员甚至说:“应该通过一项决定——限制赫鲁晓夫的在位时间。”<sup>110</sup>

从学员们提出的这些问题中可以明显感觉到,党机关工作人员对继续批判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试图破坏刚刚出现的党员干部队伍稳定局面的做法十分不满。

党机关工作人员为自己的将来忧心忡忡,他们不仅要求高级党校给他们颁发党校学习结业证书,而且希望得到普通大学文凭。

苏共二十二大就其实质而言是赫鲁晓夫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失败之举,它使赫鲁晓夫在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地位受到了削弱。

## **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 国家监督委员会**

在赫鲁晓夫推行的许多行政机构改革中,下面要介绍的这项改革

大概最不为历史研究人员重视,尽管它在60年代中期所发生的事件中具有明显的作用。

对监督机构进行过许多次改革。原先的国家监督部(Л. 3. 梅赫利斯在1946—1950年、B. H. 梅尔库洛夫在1950—1953年担任过该部部长)在1957年与其他一些部一道被撤销,取而代之的是苏联部长会议苏维埃监督委员会。但是在赫鲁晓夫看来,这个机构还不够有效。

1961年底,赫鲁晓夫产生了建立一个既能够对党的机关又能够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的专门机构的想法,以加快实现不久前在苏共二十二大上通过的在苏联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

极力表现自己致力于发扬列宁主义传统的赫鲁晓夫这一回试图对列宁关于监督的指示作出他的诠释。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起草决议过程中,向赫鲁晓夫提供了关于1923—1928<sup>111</sup>年由时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劳动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和工农监察人民委员的A. Д. 秋鲁帕领导的委员会活动的文件原件(请读者注意这一情况!),这些文件谈到了这个委员在改进国家机关工作和同滥用职权作斗争方面所做的工作。该委员会是根据费·埃·捷尔任斯基的倡议成立的,其成员包括人民委员和司法机关的代表。

苏联60年代初监督机构的改革历时久长(这不合乎赫鲁晓夫快速改革的习惯)。据亚·尼·谢列平回忆,阿·尼·柯西金和阿·伊·米高扬<sup>112</sup>坚决反对建立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1962年1月8日,出台了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关于国家监督和党的监督问题》<sup>113</sup>的决议案,但是没有通过。1962年2月19日,尼·谢·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对党和政府指示执行情况加强监督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加强党和国家监督的必要性,实际上是强调指出必须对党政机关和监督机构进行重大改革。

赫鲁晓夫一反常态,亲自动手写报告,并且在报告中多处引用列宁的讲话。他在报告中写道:“鉴于苏共二十二大委托中央委员会采取措施改进和完善党、国家和社会舆论监督,我们中央委员会必须立即认真考虑完成苏共二十二大的委托问题。我想就采取哪些措施问题讲几

点我个人的考虑……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列宁建立的非常好的党和国家监督制度实际上被推翻,代之以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的监督机构。”<sup>114</sup>

220 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详细讲述了法院、检察机关和律师的贪污受贿问题。他说:“近两年,仅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就有许多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刑事侦察人员、莫斯科市法院和莫斯科州法院的工作人员、人民陪审员和律师因为受贿被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必须建立新型的监督机构,以防止此类现象蔓延。

怎样建立这种新型的监督机构呢?赫鲁晓夫夸夸其谈指出:“吸收广大劳动人民群众参与监督是根本改进监督机制的主要和决定性条件……所以,除了有党的专门监督机关以外,还必须在党的监督机关领导下形成一个包括企业、建筑工程、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各种机构……在内的社会舆论监督系统。”

赫鲁晓夫接着提出了第一个改革计划:“据此,我以为最好建立一个统一的监督中心——苏共中央党的监督委员会,并在各地设立分支机构,对各个方面实行监督。这才能贯彻列宁的指示。”<sup>115</sup>

赫鲁晓夫认为,未来党的监督委员会的任务应该是:“严格监督遵纪守法情况,同任何闹独立的现象进行斗争,反对欺骗造假、虚报产量、铺张浪费……严格经济制度和财务核算制度。党的监督委员会及其在各地的分支机构应该特别注意加强同给我们的事业造成巨大损害的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进行坚决斗争。”<sup>116</sup>

赫鲁晓夫写道:“苏共中央党的监督委员会应该具有广泛代表性,它可以由80—100人组成,包括全苏工会理事会、共青团中央、苏联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大众媒体的代表、工人、集体农庄村员和知识分子的代表、各加盟共和国、最大的边疆区和州的党的监督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成员由中央全会批准,任期五年。委员会的领导成员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批准……委员会必须对国民经济各部门和各地区行政机关实施有效监督。委员会可以聘请已经退休的、有能力履行社会义务的共产党员和党外人士担任编外检查员。”<sup>117</sup>

赫鲁晓夫预见到了建立这种机构的危险性,他写道:“我想强调指出,党的监督委员会具有广泛的权力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和苏共中央分庭抗礼。委员会的所有工作必须置于苏共中央及其主席团的领导之下,委员会必须定期向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汇报工作,把它的工作计划提交中央委员会审查。委员会机关的所有负责人必须由苏共中央任命。”<sup>118</sup>

请读者注意,赫鲁晓夫最初的想法是建立党的监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应该置于苏共中央的监督之下,委员会的人数不要太多。 221

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提交的这个报告专门通过了一个决定,决定中说:

“一、同意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在其1962年2月19日提交的报告中提出的建议……并将该报告分发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二、责成苏共中央书记起草苏共中央《关于对执行党和政府指示的情况加强监督的决定》。”<sup>119</sup>

但是,半年多时间过去了,建立党的监督委员会的决定仍未被通过。在1962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亚·尼·谢列平认为,迟迟未能通过决定的原因是赫鲁晓夫的这种想法遭到了阿·尼·柯西金和阿·伊·米高扬的抵制。<sup>120</sup>

赫鲁晓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客观上使党的机关受到削弱的把党组织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以及扩大国营农场的建议。此外,这次中央全会还通过了《关于成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决定》。

赫鲁晓夫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发表讲话时提议由苏共中央书记、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亚·尼·谢列平担任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还建议让谢列平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赫鲁晓夫说:“应该让他去管一管各个部和国家机关,给他必要的权力。”<sup>121</sup>

让克格勃的头头担任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这样安排究竟合



适不合适呢？在赫鲁晓夫看来，谢列平是完全符合要求的。谢列平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飞黄腾达，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本应该感谢赫鲁晓夫。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具备对国家生活的各方面实施监督的丰富经验，后来又具备了在党机关工作的经验——在二十二大上他被选为苏共中央书记。

成立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另一个目的是为了抵消党和国家机关中日益严重的权力分散现象。中央十一月全会的决议中写道：“必须成立一个统一的党和国家监督机构——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及其各地的分支机构。党和国家监督机构的任务是协助党和国家完成党的纲领，系统检查党和政府指示的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监督党纪国法的遵守情况。”<sup>122</sup>

222 1962年12月18日，苏共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审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及其分支机构条例》。主席团的决议中写道：“主席团决定由科兹洛夫（召集人）、勃列日涅夫、米高扬、科西金、沃罗诺夫、苏斯洛夫、谢列平等同志组成一个审查委员会，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的这次会议上提出的意见，对提交中央委员会的有关方案和《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机关及其分支机构条例》进行审查，并将审查结果报送中央委员会。”<sup>123</sup>

党的最高领导层如此重视这个新成立的委员会并非偶然，因为这个不伦不类的官僚主义机构不仅具有巨大的监督权，而且具有苏共中央各个部和苏联部长会议机关的权能，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有权和行政机构一道进行专门的调查。<sup>124</sup>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中央机关成立了与苏联国民经济各部门、社会领域各机构、国家行政机构和军事机关一一对应的部和处，例如，党和国家监督部；冶金工业部，地质部，重工业部；燃料工业处；普通机器制造处；重型和运输机器制造处；运输和邮电部门党和国家监督部；能源和重工业电气化处；建筑工业处；城市和农村建设处；建筑和设计处；食品工业和捕捞业处，等等。

按照赫鲁晓夫原先的设想,这个新成立的监督机构的人员编制数在80人到100人之间,但是在它成立的时候有383名“负责工作人员”和90名技术人员,这还只是刚成立时中央机关的人员编制数!

成立这个委员会成为整个党政机构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1962年12月20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审查“关于对各个州、边疆区、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的党的领导机关进行改组问题”。在就这个问题形成的决议中写道:“根据苏共中央十一月全会(1962年)关于按照生产的原则自下而上建设党组织的决定,苏共中央决定……在新组建的工业和农村边疆区区委(州委会)中,一般应该有四名边疆区区委书记(州委书记),其中一名主管思想政治工作,一名主管党和国家监督工作,其余两名……”

地方苏维埃一级的机构也是如此,州执行委员会的一名副主席担任州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也就是说,各级(从中央到区一级)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实际上都是对党和苏维埃系统的一种重复设置,都有权进行调查、惩罚和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和法院。1963年3、4月份间,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取得了武装力量、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共秩序维护部进行监督的权力。<sup>125</sup> 223

权力悄无声息地从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手里“流”向他的红人——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谢列平那里。

到1963年4月,全国共建立了3270个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其中共和国一级的15个,边疆区和州一级的216个,市和区一级的1057个,企业、建筑工程、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监督委员会348个。此外,还建立了工作人员总数超过240万的人民监督岗17万个。

然而,这部庞大机器运转的成效甚微,监督大军并没有产生预期的经济效应。

正如我们在后来所看到的那样,事情适得其反,赫鲁晓夫反而被人利用了。他本想加强监督,而自己却被他所提出的那种监督制度捆住了手脚。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建立为从组织上清除赫鲁晓夫创造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对于任何一名官员来讲,谢列平的权力比苏共中央

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的权力更现实、更直接,所以更有威胁性。

请读者注意另一个离奇的现象: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这一制度本身成了在反对赫鲁晓夫方面起作用的附加刺激因素。所以,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久就想方设法甩掉党和国家监督机关,他这样做并非偶然。

## 十月政变

有关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准备过程的详细情况一直是个未被彻底搞清楚的问题。由于保留下来的文字材料少得可怜(何况这些材料已被有关人员——事件的参加者改动),现存的一些回忆录也是这些人写的,许多“技术”上的详细情况至今不很清楚,但是,一些主要的事件还是可以复原的。例如,早在1962年就已经显而易见,苏共新党纲——“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纲领确定的一些主要目标是无法实现的。农业领域的失败不可避免地被视为赫鲁晓夫的个人失败。1962—1963年,我国大部分城市和工人新村实行凭证供应食品,重要的食品严重短缺,不得不紧急向外国购买粮食。资金严重匮乏,1963年国家黄金的出售量创下了战后最高纪录——520.3吨,其中372.2吨直接用于购买粮食。

224

在农业领域,赶超美国的口号再也不敢喊了。通过在古巴部署导弹的途径实现在军事政治领域同美国抗衡的尝试不仅没有取得成功,反而使世界处在战争的边缘,最后不得不从古巴撤走进攻性武器,同美国达成了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美国导弹的秘密协定。

政治上的问题丛生,赫鲁晓夫开始乱了方寸,他的行动前后不一致,没有连续性,常常自相矛盾。给人的感觉是,他在不断地逐个挑选能够稳定局势的组织管理方案。他先是提出按照生产的原则把党组织分成两种类型,后来又试图通过成立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途径加强监督机制。赫鲁晓夫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也前后不一致,他一方面对

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A. И. 索尔仁尼琴、E. A. 叶夫图申科的反斯大林作品表示支持,另一方面又对“形式主义者”进行迫害,竭尽全力加强党对文化的领导。

在1963年举行的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作为正式报告人的中央书记列·费·伊利乔夫说:“社会主义的敌人指望把党和人民所做的一切连同消除个人崇拜后果一笔勾销,人民选择的历史道路的正确性受到了怀疑,某些政治上不成熟的人或对社会不满的人被资产阶级的宣传所蒙骗……某些知识分子代表其中包括思想上不是很坚定的年轻人接受了几代人冲突的传言……”<sup>126</sup>伊利乔夫于是得出了“必须提高苏联人革命警惕性”<sup>127</sup>的结论。赫鲁晓夫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现出了高度革命警惕性,他在讲话中大骂作家B. П. 涅克拉索夫,要求把后者开除出党<sup>128</sup>。他还说了一大堆侮辱科学家的话,要求取消科学界的学位津贴。给人的印象是,赫鲁晓夫对科学家们提出的那些建议大失所望,他再也不想再在制定党和国家政策中考虑他们的忠告了。

赫鲁晓夫成了一个多余的人,一个经常添麻烦的人,成了孤家寡人。至今仍保留有一张令人感兴趣的照片——1964年4月17日,再次授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金质奖章<sup>129</sup>,作为送给他的生日礼物。这张由M. 库利科夫拍摄的照片忠实记录了举行盛大仪式的场面——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给苏共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谢·赫鲁晓夫赠送生日礼品,但是,摄像机镜头摄下的情景却与这一盛大仪式不太相称。从照片上看,似乎只有两个人在认真对待这一仪式——宣读授奖命令的勃列日涅夫一副庄严肃穆的样子<sup>130</sup>,听他宣读命令的赫鲁晓夫似乎有点儿不好意思,脸上露出夹杂着不知所措和哀伤的不自然笑容。参加仪式的其他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看起来似乎都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有一个人脸上露出哪怕是装出来的喜庆的笑容。从照片上看,可以把仪式参加者分为两类:一类是那些表情冷漠、无动于衷的人(这类人占少数):什维尔尼克闭着眼睛,头向后仰,苏斯洛夫眼光低垂,伊利乔夫望着大厅里的吊灯;另一类是大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都直挺挺地盯着赫鲁晓夫

和勃列日涅夫,似乎在打量着什么,露出不友善的目光。

当时的克格勃领导人谢列平和后来取代他的谢米恰斯内在追忆这些日子时说<sup>131</sup>：“早在春天,在他70岁生日(4月份)前夕,周围的人就觉得再也不能容忍他(指赫鲁晓夫——作者)了。”<sup>132</sup>赫鲁晓夫已经讨人嫌了。此外,他越来越成为一个让人不舒服和甚至是危险的人。频繁的、毫无章法的改革使党机关工作人员没有稳定感,许多人当然心里不痛快;居民把对凭证购买食品的不满情绪泄向他一个人(或者如同克格勃报告中所写的那样,“泄向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当然成了一个危险人物。免除“一名领导人”的职务意味着可以消除国内日益增大的不满情绪。

1964年夏天,赫鲁晓夫再次对国家管理体制进行改组,和往常一样,农业领域再度成为他的改革“演练场”。1964年7月11日,当时正在举行的中央全会本来有一个议题——任命阿·伊·米高扬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因此必须免去列·伊·勃列日涅夫所担任的这个职务,让他担任党的“第二书记”,但是,赫鲁晓夫置会议的议程于不顾,在全会上宣读了一个大报告,提出建立所谓的专业化生产管理机构,不让党机关插手农业管理。前面已经讲过,两年前赫鲁晓夫实际上取消了数量最多的党机关——农村区委会,用生产管理委员会取而代之,现在他又要把生产管理委员会也取消掉。此外,赫鲁晓夫还在报告中严厉批评苏联科学院和农业科学院效率不高,扬言要关闭这两个科学院,把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农业科研机构交给地方管理。

一个星期后(7月18日),赫鲁晓夫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农业走上集约化道路后的领导问题》的详尽报告<sup>133</sup>,进一步阐述了他不久前在全会上提出的一些改革建议。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了两种改革方案,一种是激进的改革方案,包括建立全联盟和共和国一级的农产品生产管理系统,这些农产品包括粮食、甜菜、棉花、植物油、土豆、蔬菜、葡萄和其他水果、肉类和牛奶,猪肉、禽肉、牛肉和羊毛、混合饲料。



赫鲁晓夫抱定一种信念：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建立专门的机构<sup>134</sup>，其直接后果是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赫鲁晓夫用几乎是侮辱性的语言严厉批评当时的农业科研机构，但同时又号召提高部门科学的作用，加强专业化管理，减少党机关对农业的干预。

另一个是比较温和的改革方案，尽管改革内容和第一个方案差不多。认真研究这个方案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赫鲁晓夫不仅准备对农业领域而且准备对其他部门进行机构改革。1964年7月20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把赫鲁晓夫的报告下发各地征求意见。<sup>135</sup>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决定在1964年11月份讨论这个报告。干部队伍再次面临动荡。Д. С. 波利亚茨基和 В. И. 波利亚科夫受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委托，在1964年8月起草了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农业集约化和生产专业化领导问题的决定》。<sup>136</sup>

除此以外，赫鲁晓夫还做了一件让大部分党的高级领导人完全想不到的事情：他有一次向州委书记们发表讲话时宣布执行国民经济八年计划。原先执行的七年计划没有实现，这已成为高层领导人公认的事实，所以所有计划部门都在为从1966年起改为执行五年计划进行紧张的准备工作的。

赫鲁晓夫宣布执行国民经济八年计划这件事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他试图推卸责任，给大部分指标都没有完成的七年计划“涂脂抹粉”。他以为自己年事已高（赫鲁晓夫已70岁了），用不着为自己的活动后果承担责任了。第二，改为八年计划对于苏联的所有官僚们来讲简直是一场噩梦，有关部门——从区一级到中央一级必须从头再来，重新收集材料，重新计算数万个指标，对八年内甚至八年以后的资源调配进行预测。导致整个垂直行政管理体制和经济规划系统一下子乱了阵脚。

赫鲁晓夫的蛮横无理和言语粗鲁世所罕见，他经常用最不堪入耳的话谩骂他周围的亲信。就贬低和侮辱他人的流氓相和放肆程度而言，在苏联历史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

“赫鲁晓夫式”的改革计划这一回是命中注定无法实现的，“猎捕”

主要改革者的行动开始了。

“猎捕”赫鲁晓夫行动初始阶段的一些情况是行动参加者——亚·尼·谢列平、B. E. 谢米恰斯内、H. Γ. 叶戈雷切夫的回忆录提供的，他们虽然提供了一些很重要的情况，但是都没有谈到一个主要的问题：谁、什么时候和为什么决定转入对赫鲁晓夫采取“主动进攻”？他们都说行动的主要组织者是“第二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而勃列日涅夫的主要战友是尼·维·波德戈尔内。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录中多次提到，勃列日涅夫建议他（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采用投毒、制造车祸或飞机失事和逮捕等方式除掉赫鲁晓夫，但是，据谢米恰斯内说，他不同意采取这些方式。赫鲁晓夫的儿子——C. H. 赫鲁晓夫写的一本书中也是这样说的。<sup>137</sup>

很长一段时间中，历史学家们只能进行种种推测，事件参加者的回忆录是后来才陆续问世的。但是，回忆录的作者们普遍担心提供的事实有误，所以都尽量留下一些对往事的美好回忆。等到讲述1964年中央十月全会成为不是一件忌讳的事情时，回忆录作者们提供的情况又往往自相矛盾。当时国内影响力巨大的两个人（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在回忆往事时故意把自己在行动准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说得过小。他们俩都声称，早在7月份，中央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就已经公开谈论要对赫鲁晓夫采取行动的事情。

他们俩在回忆录中都提到，同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在工作上有直接联系的苏共中央行政机关干部主任 H. P. 米罗诺夫是密谋行动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因为米罗诺夫在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分管军队、安全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和内务部。米罗诺夫以前在勃列日涅夫担任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州委书记时是该州的一名区委书记，调到中央工作之前在列宁格勒安全机关担任负责人。当时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叶戈罗夫回忆说，正是米罗诺夫吸收他参加这一次密谋行动的。<sup>138</sup>

据谢列平说，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策划了中央十月全会。他说：“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找每一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谈话，

找每一个中央书记谈话。他们俩还找各加盟共和国的中央书记谈话，找一些大部门的领导人谈话，甚至找一些市委书记谈话。同马利诺夫斯基、科西金谈了话，也同我谈了话，我表示同意。赫鲁晓夫在乘飞机前往皮宗达疗养之前提交的那份关于重新对整个农业生产部门进行改组的报告成为召开中央十月全会的最后推动力和‘铃声’。”<sup>139</sup>

准备推翻赫鲁晓夫和筹备赫鲁晓夫原定召开的中央全会之间显然存在着联系。勃列日涅夫究竟起到了多大作用呢？谢列平、谢米恰斯内、叶戈雷切夫都强调说，勃列日涅夫态度不坚决，在最紧要的关头动摇了。谢列平把勃列日涅夫说成是主要的密谋者，又说他犹豫不决，但是他并不为自己自相矛盾的说法感到难为情。谢列平说：“勃列日涅夫胆怯了——他去了民主德国。找谢米恰斯内谈话是在勃列日涅夫不在国内的时候。”谢米恰斯内马上出面纠正说：“早在给赫鲁晓夫祝贺70岁生日的前夕，也就是说，在1964年春天就说过现在还不能这样做。我是最早被找去谈话的一个人……”<sup>140</sup>

那么究竟是谁找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谈话，让他们参与反对赫鲁晓夫的密谋行动呢？请读者注意，1964年春天勃列日涅夫不是“第二书记”，而是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几乎是“观赏性”的职务。在勃列日涅夫的背后应该有一个别的什么人，一个强有力和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叶戈雷夫的回忆证实了这种推测，他说：“勃列日涅夫仍然待在民主德国（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夕）。虽然正式访问已经结束，但是228他没有回国，他打猎去了。有人让谢米恰斯内给他打电话（这个人是谁——作者）说：‘您要是不回来，全会将在您不在的情况下召开，您自己看着办。’勃列日涅夫这才坐飞机回来。”<sup>141</sup>

作者认为，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在推翻赫鲁晓夫行动中的作用显然被夸大了，简单推算一下时间就可以证明这一点：勃列日涅夫10月11日才乘飞机离开柏林回国，波德戈尔内<sup>142</sup>是在主席团会议临召开前从基什尼奥夫乘飞机抵达莫斯科的，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前和推翻赫鲁晓夫的中央全会召开前，勃列日涅夫和波德戈尔内都不在莫斯科，他们俩都没有筹划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的可能。那

么是谁筹划的呢？谁能够命令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给在柏林的勃列日涅夫打电话，并且敢用威胁的口气说话呢？

这个人就是亚·尼·谢列平，他不是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执行者，而是组织者。这个不久前的克格勃领导人在担任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和在领导层的地位得到了巩固以后，实际上把克格勃、军队、党和国家机关置于自己管辖之下。在前苏联，凡是这样做的人通常是要付出代价的，谢列平也不例外，他后来很快就被免除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职务<sup>143</sup>，他的这个委员会也被改组。但是在1964年，只有谢列平有成为推翻赫鲁晓夫行动协调人的可能性。作者认为，他就是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中心人物，至于说什么勃列日涅夫起到了特别坏的作用——多半是为了便于将来为自己推卸责任。

主席团成员预先就召开会议的日期达成了一致，这是罢免赫鲁晓夫职务的一个主要程序。主席团会议必须赶在十一月全会之前召开，因为按照预定的计划，在十一月全会上不仅要按照赫鲁晓夫的建议通过关于改变农业管理体系和执行八年计划的决议，而且要对主席团和苏共中央秘书处的人员组成进行变动。

多年给后来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当助手的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不知道1964年10月13日夜间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有没有会议记录，但是，我对有会议记录的说法持怀疑态度。”他还指出，通过合法途径把国家头号人物担任的党内外职务——赫鲁晓夫担任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同时免掉，这在苏联历史上绝无仅有。<sup>144</sup>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错了。当时参加这次会议的苏共中央公共部主任B. H. 马林就对与会者的发言做过简要记录，他用十一张大卡片记录了所有人讲话的主要内容。马林的记录稿后来被存放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不久前才被发现和解读。

因此我们才知道当时与会者都讲了些什么，赫鲁晓夫的政治命运是在什么时候被决定的。这不是事件参加者30年以后的回忆，而是珍贵的文献资料和证据，从中可以了解在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进入最后

阶段时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和怎样发生的。

在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馆中还找到了另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准备在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中央全会上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名义宣读的报告稿,它共计70页,由当时担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Д.С.波良斯基主持编写(以下简称“波良斯基报告”)。“波良斯基报告”的开头部分写道:“同志们!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必须把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不正确行为造成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现状向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们如实报告。”

“波良斯基报告”对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进行详细剖析后指出,国家搞成这个样子的责任在赫鲁晓夫,指责赫鲁晓夫完全放弃“列宁主义原则和党的领导准则”,无视主席团成员和中央书记处的意见,侮辱他们的人格,试图搞他的个人崇拜。报告的编写者写道:“他甚至不顾起码的礼节和行为准则,动辄破口大骂,满嘴粗言野语,令人不堪入耳,无地自容。‘傻瓜,废物、懒汉,滚开、肮脏的苍蝇,可怜虫,臭狗屎,混蛋,王八蛋’——这些只不过是经常挂在嘴边的比较‘文明’的骂人话,还有许多他脱口而出的污言秽语是不能上纸面和令人羞于开口的。”

报告对赫鲁晓夫的国内政策进行了详尽分析。报告的编写者认为,赫鲁晓夫犯下了一连串的错误,以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党纲为例,“党纲中提出的许多指标根本无法如期完成,因为这些指标没有经过认真论证,脱离了实际。”二十二大报告中所列举的统计数据证明,所有建设共产主义的计划都没有实现。赫鲁晓夫“极盛时期”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速度急剧下滑,1954—1956年的年均增长率在10.6%到11.1%之间,1959—1963年下跌为6.9%到5%。

优先发展“B”类工业的计划也没有实现,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仍然比轻工业快一倍。赶超美国的希望落空,劳动生产率增速持续下跌。工业部门改组导致采用先进技术停滞不前。

赫鲁晓夫的住房建设计划也以失败告终。用合成预制板盖房顶的五层住宅楼(当时被称为“赫鲁晓夫式居民楼”)普遍不受欢迎,因为仅

230



修建管道一项每平方米的造价就要比九层到十二层的住宅楼高出许多。

赫鲁晓夫在农业领域的所作所为也受到了否定。战后过了20年再度实行凭证供应制度,向资本主义国家购买粮食用去了国家860吨黄金。报告的编写者认为,所有提高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计划都化为泡影,从1958年到1963年,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日所得一共只增加了33戈比——从1.56卢布增加到1.89卢布。同1940年相比,集体农庄庄员的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1940年每一个农户可以分得820公斤粮食,而在1963年只有370公斤。报告稿的编写者没有忘记提到赫鲁晓夫推广种植玉米,用国营农场取代集体农庄造成的后果,还提到了赫鲁晓夫向埃及总统纳赛尔传授农业技术的事。

这份文件对赫鲁晓夫进行的无数次机构改革进行了专题批判。“机构改革以后,国民经济的形势反而恶化,导致前所未有的机构重叠,人浮于事和一片混乱。按照生产的原则把所有党、国家和苏维埃组织一分为二的结果是怨声载道。”

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也受到了尖锐批评,指责赫鲁晓夫搞冒险主义,使国家好几次处在战争的边缘。苏伊士运河危机“使我们处在战争一触即发的危险状态”。在处理“柏林问题”中,赫鲁晓夫向美国总统肯尼迪提出了显然无法接受的最后通牒——要么让柏林成为一座自由的城市,要么战争。古巴危机差点儿引发战争,“赫鲁晓夫坚持向古巴运输我国的导弹,导致出现深刻危机,使世界处在核战争边缘……我们没有其他的出路,只好接受美国提出的所有要求和条件。”

报告的编写者认为,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导致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侮辱毛泽东——称毛泽东为“老倔头”;批评罗马尼亚领导人格·乔治乌—德治不懂农业;在同阿尔及利亚领导人艾哈迈德·本·贝拉交谈时,说他的朋友菲德尔·卡斯特罗是一头什么红布都敢冲上前去的公牛。报告的编写者总的来说对赫鲁晓夫推行的对中国的政策给予否定的评价。报告的编写者认为,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恢复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

报告在评价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政策时指出,无论从经济或政治上看,这种帮助都是没有效果和不合算的。尽管苏联向几内亚提供了大量帮助,苏联以前的盟友艾哈迈德·塞古·杜尔还是“撵走了我们”;苏联帮助伊拉克的项目多达200多个,其结果是苏联和当地共产党的敌人在伊拉克上台;叙利亚、印度尼西亚的情况也是如此。苏联无偿向印度、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提供了巨额资金和大量武器。

赫鲁晓夫推行外交政策的方式方法也引起了不满——他出访的时间总是很长,有时长达一个月,而且总是带一大帮随从和自己的亲属。据报告的编写者计算,1963年他到国外访问的时间共计170天,1964年截至10月份——150天。赫鲁晓夫在外交场合说话随便——以“挖地三尺”相威胁,行为古怪——在联合国用皮鞋敲桌子。他威胁德国驻苏联大使说:“我们要把你们所有德国人都打死,把你们从地球上抹掉。”人们对赫鲁晓夫的女婿——《消息报》总编A. И. 阿朱别伊实际上履行外交部长角色愤愤不平。

报告的编写者建议:解除赫鲁晓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两个职务;提高苏共中央全会的作用,每年在中央全会上讨论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活动情况;废止按照生产的原则把党组织一分为二的做法。

“波良斯基报告”指责赫鲁晓夫骄傲自满,蛮横无理,不够内行,在国内政策上犯冒险主义,不具备作为一名苏共中央书记所应有的个人品质。报告列举种种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制定的所有国家经济计划都由于农业问题成堆,不得不动用数百吨黄金向外国购买粮食,国家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最后以失败告终。报告的编写者指出,党的二十二大通过的苏联共产党纲领和关于国家很快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说法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主义的表现。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10月12日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格·伊·沃罗诺夫,安·帕·基里连科,阿·尼·柯西金,尼·维·波德戈尔内,Д. С. 波良斯基,米·安·苏斯洛夫,尼·米·什维尔尼克;主席团候补委员B. B. 格里申,Л. Н. 叶夫列莫夫;中

央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彼·尼·杰米契夫,列·费·伊利乔夫,В. И. 波利亚科夫,鲍·尼·波诺马廖夫,А. П. 鲁达科夫,В. Н. 季托夫,亚·尼·谢列平。会议由列·伊·勃列日涅夫主持。

作者认为,这次主席团会议很可能讨论了罢免赫鲁晓夫的“技术问题”,因此会议通过了题为《关于即将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远景计划问题的决定》,这份文件上注明的日期是1964年10月12日。

232 决定中说:

“一、鉴于许多人对即将在今年1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和制定新五年计划的一些原则性问题还不清楚,必须立即召开有赫鲁晓夫同志参加的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委托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苏斯洛夫和波德戈尔内等同志通过电话同赫鲁晓夫同志取得联系,向他转告本决定精神,使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在1964年10月13日如期召开。

二、鉴于赫鲁晓夫同志1964年7月18日《关于集约化道路上农业的领导问题的报告》(第П1130号)下发各党组织后造成各地思想混乱,决定收回这一报告。

三、考虑到上述问题的重要性和必须马上进行讨论,会议认为最好把所有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召集到莫斯科,以便把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讨论结果向中央全会报告。

苏共中央全会什么时候召开的问题应在有赫鲁晓夫同志参加的情况下作出决定。”<sup>145</sup>

第二天,赫鲁晓夫被从皮宗达叫回莫斯科,同机返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的还有和赫鲁晓夫一起去疗养的阿·伊·米高扬和几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候补委员——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В. П. 姆扎瓦纳泽,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К. Т. 马祖罗夫,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夏·拉·拉希多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П. Е. 谢列斯特。

上面已经讲过,苏共中央公共部主任В. Н. 马林1964年10月13

日和14日上午对与会者的发言做了简要记录,他的记录不仅有助于再现苏共历史上惟一一次罢免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主席团会议的基本情况,而且有助于更深刻地揭示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幕后”情况。

勃列日涅夫首先在会上发言,他解释说,之所以要召开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是因为各个州的州委书记都对为什么要执行八年计划不理解,对按照生产的原则把州委会一分为二和频繁进行机构变动表示不满。勃列日涅夫批评赫鲁晓夫不跟大家商量就宣布执行八年计划,他说,赫鲁晓夫经常只是用写报告的方式和领导成员们保持联系。最后他建议大家就这个问题发表看法。

勃列日涅夫讲完话后赫鲁晓夫紧接着发言。从马林的简要记录看,赫鲁晓夫说话小心翼翼,模棱两可。他承认勃列日涅夫说得有道理,并且说他热爱党,总想做点对党有益的事,他没有察觉也没有想到对他提交主席团的报告会有这样的反应。赫鲁晓夫认为把州委会一分为二的做法并不违背统一领导的原则。他承认自己经常对其他人“动怒”,但是马上补充说,他把会议的参加者视为“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准备竭尽全力做好工作。 233

显而易见,赫鲁晓夫并没有下台的打算,但是正是因为他不想下台才让他下台的。

在赫鲁晓夫后面发言的是谢列斯特,这位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发言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乌克兰向来是赫鲁晓夫的“世袭领地”。谢列斯特首先说了些党和国家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套话,指出“仍有一些明显的缺点和失误”,存在对成绩和新思路估计过高的现象,说完这些话后他马上对赫鲁晓夫提出了极其尖锐的批评:个人意志决定一切,缺点错误一大堆,问题丛生,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他认为,党的全体会议变成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谢列斯特说,他不同意赫鲁晓夫报告中提出的关于改组农业管理机构的建议,因为这只会降低党机关的作用。

谢列斯特说,由于没完没了地进行机构改革,党机关的工作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赫鲁晓夫1957年宣布的“赶超美国”计划以失败告终,

建设住宅的计划没有完成,提高工资的许诺也没有兑现,“各个共和国只有责任没有权力”。

沃罗诺夫在发言中说:“由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不正确和缺乏党性的态度,导致产生许多不能容忍的问题,产生了赫鲁晓夫新个人崇拜……集体领导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他容不得任何不同意见……成天吆喝,骂人。”

弗·罗·科兹洛夫在此之前已经是一个重病缠身的人<sup>146</sup>,他在不久前刚刚成为“苏共中央第二书记”。科兹洛夫委屈地说,赫鲁晓夫“既当工程师又当农艺师”,不让他过问管理事务。科兹洛夫转过身子对赫鲁晓夫说:“您不让我到全国各地转一转,说我是个最危险的人,禁止我过问农业,也不让我过问国防技术装备。”科兹洛夫说,必须“禁止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现象”,正是科兹洛夫第一个提出让赫鲁晓夫“领取退休金”的建议。

谢列平的发言显然是经过认真准备的。马林的记录证明,谢列平发言的基调和“波良斯基报告”的内容相差无几。谢列平是个经验丰富的发言人,善于观察听众的反应,他先向赫鲁晓夫提一个问题:“恕我直言,您为什么要抢在前面发言?”

谢列平指责赫鲁晓夫独揽大权,说赫鲁晓夫把中央全会变成群众集会,由于赫鲁晓夫滥用权力,形成了不能容忍的局面和个人崇拜,赫鲁晓夫违背了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谢列平说:“列宁对斯大林的鉴定完全适用于您。您为什么要挑拨离间,贬低主席团委员的作用,造成主席团成员之间互相猜疑?波利亚科夫<sup>147</sup>同志在里面起了很坏的作用。您一点儿也不谦虚。”

谢列平发言中谈到经济问题的那一部分与“波良斯基报告”的内容特别相似。谢列平说:“您说形势大好有什么根据?这十年中,国家收入从11%下跌到4%,您凭主观意志推广盖四五层居民楼,农业一团糟,13万台‘Z形挤奶器’<sup>148</sup>成了废品,集体农庄庄员劳动日所得五年中才增加33戈比。”

谢列平指责赫鲁晓夫试图解散科学院,说工业领域的改革使科研



工作与生产相脱离。

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受到了谢列平尖锐批评,这位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主席不喜欢和平共处的方针,他说:

“我们不应该对帝国主义者手软,您在关键的时刻退却(指赫鲁晓夫在苏伊士运河危机、柏林问题、古巴危机中退却)。古巴危机是玩弄各国人民命运的冒险行为。”

作者再次提请读者注意,谢列平的发言不仅具有对赫鲁晓夫进行全面批评的特点,而且基本内容和“波良斯基报告”相似。

基里连科、马祖罗夫、叶夫列莫夫、姆扎瓦纳泽也在发言中谴责赫鲁晓夫,他们主要批评赫鲁晓夫在农业、党的建设、“赶超美国”计划方面的错误,指责赫鲁晓夫蛮横无理,行为粗鲁,指出“民族主义抬头的倾向”。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中最有威望的苏斯洛夫在发言中说:“没有健康的环境,从干实事的观点看,主席团中没有一个正常的环境。总路线不正确,违背列宁主义的领导原则,实际上不可能发表不同的意见,对待工作人员蛮横无理。把一切功劳归功于赫鲁晓夫,把缺点推到州委会身上,鼓励阿谀奉承。携家带口出国访问,让女婿阿朱别伊出访没有好处。天生性急,对报界乱发议论,自我吹嘘。在外交方面——自  
235

以为是,在同日本社会主义者交谈时讲了许多不该讲的话。”

当时担任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格里申和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苏斯洛夫讲完话后先后发言,他们俩主要从自己的活动领域角度重复前面一些人发言中的主要看法。格里申指责赫鲁晓夫不重视工会的作用,拉希多夫批评赫鲁晓夫乱搞试验。

他们俩讲完话后宣布休会。马林的记录证明,第二天(10月14日)早晨继续开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波良斯基。<sup>149</sup>

波良斯基说:“代表大会的路线是正确的,执行得怎么样是另一回事。”他认为,10月14日继续举行的这次主席团会议是“历史性的会议”。他指出:“赫鲁晓夫似乎变了个人,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最近总想凌驾在党之上,开始粗暴……不成体

统。农村的事情没有搞好,30万个农村——愚昧落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您不让别人过问农业。”

从马林的记录可以看出,正是波良斯基在发言中提出罢免赫鲁晓夫所有职务的建议,他说:“只有一个结论:您什么职务也别当了,让位。”这个时候,米高扬试图替赫鲁晓夫解围,但是立刻被谢列平制止,谢列平说:“米高扬同志这样做不对,听他的。”米高扬反驳说:“苏斯洛夫说得对,代表大会的决议还是正确的。主席团的组成还是稳定的——有能力治理国家。外交方面——一开始赫鲁晓夫还不太懂外交,但是后来很快就懂了。苏伊士运河危机——还没有到爆发战争危险的地步,当然有点儿危险。柏林问题——我持反对态度,但总的来看,处理得还算正确。古巴危机——我提出过争议,派出潜艇——本身就是一种冒险举动。关于新疆问题——危险的话题,同外国人谈(指赫鲁晓夫同外国人谈)得很不错。爱发脾气,动怒——这是对的。”

米高扬认为,赫鲁晓夫犯错误与他周围的人——公共部主任马林和赫鲁晓夫的助手舒伊斯基有一定的关系,所以他得出了与波良斯基相反的结论:“一刀切的做法不对,给赫鲁晓夫同志减轻点负担,应该保留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

但是,没有人对米高扬的意见表示支持:赫鲁晓夫已经被彻底击溃了。柯西金说:“我对会议的讨论结果感到很满意,路线是正确的……主席团是团结的,会得到中央委员会支持的。采用治标的办法解决不了问题。赫鲁晓夫同志的工作作风不是列宁主义的工作作风。”

柯西金声色俱厉地说,赫鲁晓夫什么事都包办,在二十二大上一人作了两个报告,自绝于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耍阴谋,掩盖由于他的过错产生的困难。柯西金还说,他作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没有忘记赫鲁晓夫提交的报告,没有忘记赫鲁晓夫企图实行八年计划,企图垄断军事问题。他引用了赫鲁晓夫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时说过的的一句话:“有了粮食就能找到装粮食的口袋”。柯西金最后厉声说,召开中央全会,解除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不能由一人同时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和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设立苏共中央第二书记职务。

波德戈尔内接着发言。他说,除了米高扬的发言以外,其他人的发言他都同意。他完全同意柯西金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他给自己和会议参加者提出了一个问题:“国际和国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然后马上自言自语答道:“什么事也没有。最好他自己提出辞职请求。”

该轮到主持主席团会议和准备接替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勃列日涅夫发言了。与在他前面发言的那些人不同的是,至今仍保存着勃列日涅夫本人用红色泡沫塑料吸水笔书写的发言稿,在主席团会议和中央全会结束以后,勃列日涅夫把这份发言稿交给他的助手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保管,并且交代说:“就放在你这里,别放在其他任何地方,任何人也别给。”1994年,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把这份发言稿公布于世。把这份发言稿与马林的记录进行比较后可以确认勃列日涅夫就是按照这份发言稿发言的,也可以确认发言稿是他自己写的。此外,还可以看出,勃列日涅夫的发言并没有受“波良斯基报告”的影响。

勃列日涅夫说:“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应该很清楚,这25年中我是怎么对待您的。在您最艰难的时候,我忠实于您,相信您,勇敢地为了您、为了列宁主义路线而奋斗,”说到这里时,勃列日涅夫转过身子,对赫鲁晓夫说:“我当时有病:我心肌梗塞,但是即便重病在身,我还是竭尽全力奋斗。”

今天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我想按照党性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为什么今天我们不得不涉及重大的错误和失误——为什么我们大家都指出主席团和中央委员会面临的严重局面?

我认真思考这些问题后认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如果您没有诸如贪权、自我陶醉、自以为是这些毛病,如果您有哪怕一点点谦虚精神,您就不会搞您的个人崇拜。但是,很遗憾,您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加强这种崇拜。

您不仅不采取措施阻止反而助长电台、电影、电视宣传您个人……您喜欢这种宣传,它使您陶醉,使您独断专行。

您喜欢事必躬亲,什么问题都管,自以为没有一个人能代替您担此重任——这是您所有错误的根源所在。

我们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们、中央书记们看到了这个问题,指出过这个问题,试图纠正这个问题,遗憾的是,您听不进不同的意见,说什么这是新路线……

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纠正我们的电台、报刊、电视台的一些做法。我同意对阿朱别伊同志的批评,我认为解除阿朱别伊的职务是正确的。

我想谈几个问题,说明个人崇拜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危害。同志们,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发生在梁赞州的事情。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您是这件事的发起人,您去了那里,拍了部电影,大加赞扬两个书记——拉里奥诺夫<sup>150</sup>和赫沃罗斯图欣……结果怎么样呢?阿里斯托夫和卡利琴科被解除职务,许多干部被开除党籍。

在工业方面,我们把那些领导人变成了官僚主义者,只好对工业部门进行机构改革。这谈何容易,不是一顿饭的工夫就能办成的事。

您如何评价书记处的工作呢?您并不了解书记处的工作,书记处做了大量的工作,您却说,我们都是黑狗,笨蛋……我们中有谁没有被您骂过呢?”<sup>151</sup>

勃列日涅夫的结论和马林记录中所记下的一样:“解除赫鲁晓夫的所有职务,把两个职务分开。”

其余的中央书记们都对勃列日涅夫的意见表示支持:“安德罗波夫同志——主席团做得对,我支持大家的意见;波诺马廖夫同志——我也支持;伊利乔夫同志——同意;季托夫同志——同意这个结论;波利亚科夫同志——同意这个结论……什维尔尼克同志——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做得不对,应该解除他的职务,满足大家的要求。”

米高扬让步了,他说:“我说过,我要考虑一下。同意大家的意见。”

赫鲁晓夫在众人围攻之下终于缴械投降,他说(据马林的记录):“我不可能同你们斗下去,因为同你们的斗争是同一个反党集团的斗争。我珍惜你们的诚实,当然有所区别,请波良斯基和沃罗诺夫原谅我

的粗暴。我的主要错误——表现软弱,后来又没有进行抵抗。关于职务兼任问题,我本来的考虑是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兼任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政治局主席。我承认对萨哈罗夫<sup>152</sup>态度粗暴,对克尔德什的态度也不好。

粮食和玉米问题——只好由你们来管了。

国际问题。关于古巴——冒险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应该更理智一些。关于柏林问题——我们的政策还是好的。关于生产管理,把州委会一分为二了。

关于巩固社会主义阵营,所有的事情都应该做,以防出现裂缝。

我不想请求宽恕——既然已经决定。我对米高扬同志说过——我不准备斗下去了。一个原则,我为什么要给你们抹黑呢?我很高兴——党成长了,能够控制和监督任何一个人了。集中在一起,开个会——就把人置于死地,我不可能表示异议。我已经感觉到自己不能胜任了,尽管如此,还是产生了骄傲自满情绪。 238

我请求免去职务,如果应该那样的话——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在哪儿都一样。

谢谢主席团的工作,谢谢大家对我的批评。”

赫鲁晓夫认输了,放弃继续斗争,在预先准备的辞职申请书上签了字。

1964年10月13日到14日举行的主席团会议最后通过的决议<sup>153</sup>中说:“赫鲁晓夫同志的错误和违背列宁主义集体领导原则的不正确行为”导致主席团本身形成不正常状态;赫鲁晓夫集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两种职务于一身,脱离了苏共中央的监督<sup>154</sup>。主席团的决议中指出:“鉴于赫鲁晓夫同志的不良个人品质、年迈、健康状况恶化,他已经没有能力纠正所犯下的错误和不讲党性的工作方法。”由此得出结论:接受赫鲁晓夫“因年迈和健康情况恶化”辞去所有党和国家职务的请求,决定今后不能一人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决议指出,必须立即召开中央全会。可想而知,如果没有预先进行



大量的准备工作,是不可能在两天的时间中把所有分散在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中央委员召集在一起的。

赫鲁晓夫的命运受到了戏弄:中央全会的参加者都到莫斯科了,只等待一件事——宣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然而,全会的参加者早已知道这个决议了。

10月14日,中央全会正式开幕<sup>155</sup>。这次中央全会显然是预先经过排演的,差不多完全套用赫鲁晓夫本人1957年对付朱可夫元帅的那种模式解决组织问题。首先由勃列日涅夫致简短开幕词,然后由主要报告人苏斯洛夫<sup>156</sup>作详细报告,赫鲁晓夫本人没有发言。报告没有经过讨论,许多与会者说:“一切都很清楚,建议不用讨论。”勃列日涅夫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柯西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场内高呼:“强大的列宁主义的党和中央委员会万岁!”——全会闭幕。<sup>157</sup>

10月16日,《真理报》对这次中央全会进行了简短报道,各边疆区区委和州委会收到了有关这次中央全会的详细材料,没有要求讨论,也没有给普通党员寄送“非公开信”,显然吸取了50年代中期的教训。

上面提供的文献资料有助于搞清楚赫鲁晓夫倒台以前发生的一些事情。显而易见,谢列平是反对赫鲁晓夫阴谋活动的主要策划者,我们有权利把波良斯基也算作一个主要的阴谋者。然而,10月1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中的“少壮派”却经受了第一次、也是一次战略性的失败,239 “波良斯基报告”本来是作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报告起草的,可资证明这一点的是报告的开头语写道:“同志们,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认为有必要向苏共中央委员们报告……”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宣读报告的是米·安·苏斯洛夫<sup>158</sup>——历次中央全会的“职业起诉人”,他宣读了另外一种文本的报告。他的报告尽量少提50年代末60年代初国家的经济危机,没有对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及其在柏林和加勒比海危机中的冒险行为提出批评,没有谴责赫鲁晓夫对毛泽东的中国的政策。给人的感觉是,勃列日涅夫和他的未来党的领导层的战友们(苏斯洛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有思想顾虑,他们担心“波良斯基报告”言辞过激,担心“少壮派”对国家在赫鲁

晓夫领导时期所执行的方针路线进行谴责时走极端。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的“少壮派”过于活跃引起了党的新领袖——勃列日涅夫的疑虑。在中央十月全会上，勃列日涅夫第一次亮出了后来成为他的“政治名片”的“杀手锏”——尽最大可能保持继承性和避免“走极端”。

赫鲁晓夫下台了。他虽然输了，但是他并非是个战败者。他只不过是经常以主席团会议名义出现的、在党内被视为完全合法的、而实际上是不道德的阴谋活动的牺牲者。在苏联，这些牺牲者经常成为人们心目中值得同情的、然而与原型相差甚远的政治传奇人物。

一个月以后，又召开了一次中央全会。赫鲁晓夫的那些最令人厌恶的决策被宣布废止，把党组织划分为工业党组织和农村党组织的做法也被取消，恢复了各个州的原先管辖范围。

赫鲁晓夫下台说明了赫鲁晓夫本人确定的方针——党机关独裁的方针取得了胜利，赫鲁晓夫1957年夏天说过的“主席团成员只不过是中央全会的仆人”这句话再一次得到了印证。正是中央全会（苏联共产党机关的组成部分之一）使妨碍党机关活动和使它不稳定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寿终正寝。从今以后，赫鲁晓夫的继承者必须为党机关服务，确保党机关的稳定性、继承性和党机关本身不受惩罚，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成了这样的一个人，而精力充沛的年轻领导人（比方说，谢列平）只能成为“待征召者”，实际情况果然如此。

广大居民对赫鲁晓夫下台没有提出明显的抗议，因为赫鲁晓夫的经济方针已经完全失败是显而易见的。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统计，第二年（1965年），全国的“反苏言论”——侮辱政治领导人的传单数量减少了一半。引起人们浓厚兴趣的话题只剩下一个——赫鲁晓夫原先推行的谴责斯大林、批判“个人崇拜时期”的方针还会不会保留。

## 注 释

- 1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 1987. Ч. 2. С. 453.
- 2 ЦХСД, ф. 4, р. 618, оп. 9, д. 1502, л. 137.
- 3 Там же, л. 136.
- 4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крестьянства. Т. 4.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годы упрочения и разви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1945—конец 1950-х гг. М., 1988. С. 285.
- 5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Ч. 2. С. 455.
- 6 Народ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СССР в 1958 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М., 1959. С. 350.
- 7 Хрущев Н. С.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СССР и развитие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М., 1962. Т. 2. С. 446.
- 8 С. 145;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РСФСР. Б-10/1 с. 6. 08. 1956.
- 9 См.: Лейбович О. Реформа и модернизация в 1953—1964 гг. Пермь, 1993. С. 145;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РСФСР. Б-10/1 с. 6. 08. 1956.
- 10 Хрущев Н. С.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коммунизма в СССР и развитие сельского хозяйства. Т. 3. С. 498.
- 11 Там же.
- 12 См.: Беседа с А. Н. Шелепиным и В. Е. Семичастным//Неиз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 XX в. Вып. 1. М., 1992. С. 275—276.
- 13 См. там же. С. 276.
- 14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класса. В 6 т. Т. 4. М., 1965. С. 251—252.
- 15 См., например,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РСФСР и Совмина РСФСР от 28. 02. 1961 г. № 152 «Об увеличении дотации мясопродуктов Свердловской области на 1961 г.».

- 16 Здесь и дальше цит. по: Новочеркасская трагедия/Подг. к печати Р. Г. Пихоя, Н. А. Кривова, С. В. Попов, Н. Я. Емельяненк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 1. С. 110—136; № 4. С. 143—177. См. также: ГАРФ, ф. 8131, оп. 31, д. 93661, л. 269—290.
- 17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М., 1993. Вып. 1. С. 283.
- 18 Там же. С. 293.
- 19 Там же. С. 301—302.
- 20 Там же. С. 226.
- 21 见《苏联历史百科全书》中介绍朱可夫的条目,其中写道:“在朱可夫的参与下,树立了对他的个人崇拜,过分夸大了他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作用。”(《苏联历史百科全书》,莫斯科,1964年版,第5卷)。
- 22 АП РФ, Письмо КГБ СССР в ЦК КПСС Н. С. Хрущеву № 1651-С от 17 июня 1963 г.
- 23 朱可夫因此被叫到中央去见勃列日涅夫,后者指责元帅“说了一些不符合党性的话”(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 1963 年 6 月 17 日呈苏共中央尼·谢·赫鲁晓夫第 1651—С 号公函)。
- 24 Военные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Вып. 1. С. 227—228.
- 25 См. там же. С. 226.
- 26 См. там же.
- 27 См.: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17—1985. М., 1986. Т. 2. 1945—1985. С. 328—331.
- 28 Там же. С. 332.
- 29 当时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近百万人参加五一节游行,人们亲眼看到有数枚导弹飞向空中,本书作者也亲眼目睹了这一情景。当时就听说有一架拦截 U-2 的苏联飞机被其中的一枚导弹击落,这种说法后来得到了证实。 241
- 30 См.: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кризисы и ракеты.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В 2 т. М., 1994. Т. 2. С. 153.
- 31 См.: Путилин Б. Г., Шопова Н. А. На краю пропасти: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1962 года). М., 1994. С. 13.
- 32 См. там же. С. 14—15.
- 33 См. там же. С. 19.

- 34 См. там же. С. 22.
- 35 См. :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 . Т. 2. С. 59—60.
- 36 См. : Алексеев А. И.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1962 г. в архивных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и, США и Кубы: анализ, итоги, уроки»: Доклады и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далее—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М. , 1994. С. 294—295.
- 37 См. : Путилин Б. Г. , Шепова Н. А. На краю пропасти. С. 23.
- 38 См. там же. С. 24.
- 39 См. там же. С. 24—25.
- 40 См. : Грибков А. И. Разработка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плана операции «Анадырь»//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24—25.
- 41 См. там же. С. 28.
- 42 Мелиан П. Г. Меры куб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по обеспечению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ответ на подготовку прямого вооруженного вторжения США: Соглашения и военные договоры между Кубой и СССР в 1961 и 1962 гг.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169.
- 43 См. :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169—170.
- 44 См. там же. С. 28—29.
- 45 История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 Операция «Мангуста»//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157.
- 46 См. : Путилин Б. Г. , Шепова Н. А. На краю пропасти. С. 30.
- 47 См. : Грибков А. И. Разработка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плана операции «Анадырь». С. 350—353.
- 48 Алексеев А. И.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С. 296—297.
- 49 Там же.
- 50 Там же. С. 297.
- 51 К 22 октября 1962 г. на Кубе находилось 43 тыс.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еннослужащих.
- 52 См. : Грибков А. И. Разработка и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е плана операции «Анадырь». С. 350—353.
- 53 См. : Мелиан П. Г. Меры куби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 . С. 170.
- 54 См. : Алексеев А. И.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С. 298.



- 55 См. : Акоста Т. Д. Роль Кубы в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и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в стране. Позиция Кубы в отношении возможности секретного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я этих сил//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192.
- 56 См. : История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 Операция «Мангуста». С. 157.
- 57 См. там же. С. 158.
- 58 Белобородов Н. К.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Москве в 1994 г.
- 59 См. : Акоста Т. Д. Роль Кубы в развертывании группировки советских войск в стране. С. 188.
- 60 Белобородов Н. К.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Москве в 1994 г.
- 61 Там же.
- 62 Там же.
- 63 Грибков А. И.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Москве в 1994 г.
- 64 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 Н. К. 别洛博洛多夫是一名上校, 领导在古巴的苏联核武器专家小组。
- 65 Из дискуссии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Москве в 1994 г.
- 66 См. : Амосов И. 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спекты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ых органов США в период Кариб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361—362.
- 67 См. :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 . Т. 2. С. 192—196.
- 68 另一种观点认为, 美国情报机关在同苏联军事机器进行角逐中失利, 没有向美国政府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在分析 1962 年 7 月到 10 月获取的情报上犯下了一系列严重错误。见 И. А. 阿莫索夫:《加勒比海危机期间美国侦察机关活动的某些侧面》, 第 357—367 页。 242
- 69 См. там же. С. 365.
- 70 См. :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 . Т. 2. С. 247.
- 71 Три беседы с Дж. Ф. Кеннеди: Памяти выдающегося американц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3. № 3. С. 113—116.
- 72 Там же. С. 115.
- 73 См. :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 . Т. 2. С. 265, 269—270.
- 74 30 лет Кариб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1962—1992); Российско-

- американск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жизнь. 1992.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С. 8—10.
- 75 См. :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 . Т. 2. С. 274.
- 76 См. : Алексеев А. И.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С. 300.
- 77 30 лет Кариб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С. 12.
- 78 Колодкин А. Л.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правовой аспект морской блокады Кубы в 1962 г.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111.
- 79 См. : 30 лет Кариб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С. 14.
- 80 Лебедев И. В. Из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Москве в 1994 г.
- 81 30 лет Кариб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С. 16—18.
- 82 См. : Лечуга К. В центре бури: Ф. Кастро, Н. С. Хрущев, Дж. Ф. Кеннеди и ракетный кризис. М. , 1995. С. 97—99.
- 83 Белобородов Н. К.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Москве в 1994 г.
- 84 30 лет Кариб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С. 20.
- 85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 Феклисов А. С. За океаном и на острове: Записки разведчика. М. , 1994. С. 219—227; Добрынин А. Ф. Сугубо доверительно: Посол в Вашингтоне при шести президентах США (1962—1986). М. , 1996. С. 65—79.
- 86 Акоста Т. Д. Кубинская позиция в отношении разведывательных полетов над территорией Кубы до и после кризиса//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С. 213.
- 87 См. : Алексеев А. И. Карибский кризис: как это было. С. 299.
- 88 30 лет Карибского ракет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2 г. С. 38—40.
- 89 Белобородов Н. К.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на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в Москве в 1994 г.
- 90 См. : Попов Г. Х. С точки зрения экономиста: О романе А. Бека «Новое назначение»//Наука и жизнь. 1987. № 4.
- 91 См. : Цикулин В. А.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в СССР. 1936—1965 гг. М. , 1966. С. 52.
- 92 См. там же. С. 80.
- 93 См. : Шапиро Л.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Лондон, 1990. С. 771.
- 94 О дальнейше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мышлен-

- ностью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по докладу тов. Н. С. Хрущева, принятое 14 февраля 1957 г. М., 1957. С. 4.
- 95 Закон «О дальнейшем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управлен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ю и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м». М., 1957.
- 96 См.: Цикулин В. А. Истор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учреждений в СССР. С. 53—55.
- 97 Хрущевские времена/Запись Н. А. Барсукова//Неизвестная Россия. XX в. Вып. 1. С. 273.
- 98 См.: Коммунист. 1964. №16. Передовая; Правда. 1964. 17 ноября.
- 99 Последняя «антипартийная» групп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июньского (1957г.)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3. С. 32, 39, 57—58.
- 100 См.: например, сведения о слежке за физиком Л. Д. Ландау: По данным агентуры и оперативной техники; Справка КГБ СССР об академике Л. Д. Ландау//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3. С. 151—162.
- 101 Охотин Н. Г., Петров Н. В., Рогинский А. Б., Мироненко С. В. Экспертное заключение к заседанию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го суда РФ 26 мая 1992 г. М., 1992. С. 31.
- 102 С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ЦК КПСС и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О мерах по предотвращению фактов обмана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о усилению контроля за достоверностью отчетов о выполнении планов и обязательств» от 19 мая 1961 г.
- 103 ЦХСД, ф. 1, оп. 4, д. 134.
- 104 Там же, оп. 4, д. 134, л. 3—5.
- 105 Там же, л. 15.
- 106 Там же, л. 27—33.
- 107 Там же, л. 39—41.
- 108 Там же, ф. 5, оп. 30, д. 459, л. 201.
- 109 Там же, л. 206.
- 110 Там же, л. 208.
- 111 АП РФ, ф. 3, оп. 55, д. 26.

- 112 См. :Хрущевские времена. С. 286.
- 113 АП РФ, ф. 3, оп. 55, д. 23, л. 1.
- 114 Там же, л. 3—5.
- 115 Там же, л. 10—13.
- 116 Там же, л. 14.
- 117 Там же, л. 16.
- 118 Там же, л. 17.
- 119 Там же, л. 2.
- 120 См. :Хрущевские времена. С. 286.
- 121 АП РФ, ф. 3, оп. 55, д. 24, л. 1.
- 122 Там же, л. 48.
- 123 Там же, л. 50.
- 124 Там же, л. 106.
- 125 Там же, л. 151—160, 191—192.
- 126 Пленум ЦК КПСС (июнь 1963 года) :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 1963.  
С. 5.
- 127 Там же. С. 9.
- 128 См. там же. С. 37.
- 129 РГАКФД, №0—315442.
- 130 列·伊·勃列日涅夫的战友亚·尼·谢列平在回忆勃列日涅夫时说：“别忘了,他是个出色的演员,应该授予他人民演员称号。”(见《赫鲁晓夫时期》第286页)。
- 131 Там же. С. 270—290.
- 132 Там же. С. 278.
- 133 АП РФ, ф. 3, оп. 30, д. 260, л. 22—170.
- 134 “... Из-за бескормицы, —писал Хрущев, —с января 1964 г. пало  
(овец. —Авт. ) :
- Казахская ССР—2107 тыс.
- Узбекская ССР—622 тыс.
- Таджикская ССР—357 тыс.
- Азербайджанская ССР—354 тыс.

Туркменская ССР—450 тыс.

Таковы результаты неорганизованности и, я бы сказал, отсутствия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за овцеводство” (АП РФ, ф. 3, оп. 30, д. 260, л. 43).

135 Как снимали Н. С. Хруще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октябрь 1964 г.) / Публ. С. А. Мельчина, Ю. В. Сигачева, А. С. Степанова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1. С. 18.

136 АП РФ, ф. 3, оп. 30, д. 260, л. 159—170.

244

137 См. : Хрущев С. Н. Никита Хрущев. . . Т. 2. С. 471—472.

138 См. : «Собирая грибы», решали судьбу Хрущева: Интервью с Н. Месяцевым // Арг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1995. № 43.

139 Хрущевские времена. С. 278—279.

140 Там же. С. 279.

141 Там же. С. 290—303.

142 Там же. С. 280.

143 与朱可夫元帅的命运多么相似。朱可夫元帅在 1957 年的权力斗争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此后不久便被从政坛抛弃。

144 См. :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А. М. От 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М. , 1994. С. 127.

145 尼·谢·赫鲁晓夫也是这样被罢免的。

146 弗·罗·科兹罗夫, 1957—1964 年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根据 1963 年 1 月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决议,他有权在尼·谢·赫鲁晓夫不在的时候主持主席团会议,他因此是中央“第二书记”,但他履行这一职责的时间不长,1963 年 4 月起重病缠身。1964 年 9 月起停止给他送中央委员会的材料,这意味着实际上已停止他在党内的领导工作。在参加 1964 年 10 月 12—14 日举行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以后,科兹洛夫在 1964 年苏共十月中央全会上再度当选政治局委员。从 1964 年 10 月 22 日起恢复给他送中央委员会的材料。1964 年 11 月 16 日因病重被解除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职务。1965 年 1 月去世。

147 В. И. 波利亚科夫 1962 年任苏共中央农业部部长和主管农业的中央书记,此前在《真理报》社工作,1960 年起任《农村生活报》总编。

148 赫鲁晓夫提倡使用的挤奶器。



- 149 О том, что Полянский выступал именно утром 14 октября,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т особенности документа. Именно с этой карточки Малин изменил датировку записей. Все пять предшествовавших ей карточек датируются 13 октября, начиная с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олянского—на шестой карточке и далее до 11-й—стоит другая дата—13 - 14 октября. Другим внешним признаком,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ющим о том, что Малин должен был прервать конспектирование и начать заново, служит тот факт, что выступление Рашидова было закончено на лицевой стороне листа 7; л. 7 об. не был использован для записей. Малин всегда конспектировал записи в течение дня на обеих сторонах листа. Записи за новый день начинались с нового листа. Конспект выступления Полянского и начинается с нового листа, которому предшествует пустой оборотный лист. Отметим, что Малиным или сотрудниками архива перепутана нумерация листов и следом за л. 7 идет л. 6, а за ним—л. 8.
- 150 У Брежнева ошибочно—Иларионова.
- 151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А. М. От Коллонтай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С. 127—130.
- 152 А. Д. Сахаров, академик.
- 153 См. :Как снимали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4—5.
- 154 赫鲁晓夫本人在1957年中央六月全会上也是用这种理由对付他的政敌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的。
- 155 1964年中央十月全会的速记记录已公布(见《尼·谢·赫鲁晓夫是怎样被罢免的》第5—9页)。
- 156 在1957年举行的反对“反党集团”的中央六月全会和同年举行的反对朱可夫元帅的中央十月全会上,苏斯洛夫也是主要报告人。
- 157 См. :Как снимали Н. С. Хрущева. С. 16—17.
- 158 См. :там же. С. 3—19.

## 第四章 从稳定到停滞

245

(1964年11月—1968年)

我们希望好一些，结果还是老样子。

——维·斯·切尔诺梅尔金

## 迈出“集体领导”的头几步

赫鲁晓夫下台是突然间发生的事,但是没有引起任何抗议,因为赫鲁晓夫权力的社会基础极其薄弱。他是被党机关免除职务的,因为在党机关看来,赫鲁晓夫的活动没有什么成效:他没有确保这一社会阶层的稳定。触犯党机关的利益——不仅仅只是触动了冰山的顶峰,因为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把党、经济部门和军队的领导层紧密联结在一起,赫鲁晓夫不断进行的机构改组触犯了这一阶层的利益。所以,集体领导、稳定、少变动成了后来执政的勃列日涅夫的主要口号。大部分居民已经对赫鲁晓夫感到十分厌烦了。

执政者一贯正确的观念开始分崩离析。大多数国民心目中如此可望不即和何等英明的当权者的光环因赫鲁晓夫而黯然失色。外表有点儿稚气、傻头傻脑、衣着随便、经常炫示自己接近群众、不管事情重要不重要都要说上好几个小时的赫鲁晓夫,使不敢批评和嘲笑当权人物的心理障碍轰然倒塌。在人们的心目中,赫鲁晓夫是一个趣闻逸事不断、闹出许多笑话的“可爱的人物”,他既不是英明的领袖,也不是令人敬畏的统治者,而更像一个喋喋不休的说教者,一个爱用十分简单方法解决复杂问题的人。人们不再相信他、不想支持他了。

新上台的苏联共产党领导人为了显示他们反对赫鲁晓夫“唯意志论”的决心,所做的第一件事是摈弃赫鲁晓夫在党和国家管理领域所推行的那些改革。赫鲁晓夫下台一个月后,苏共中央在1964年11月举行了一次全体会议,尼·维·波德戈尔内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州、边疆区党组织和苏维埃机构合并的报告》,承认必须恢复按照辖区和生产部门的原则建设党组织的做法。波德戈尔内说:“主观主义、热中于搞不切实际的计划和毫无根据的即兴改革与党的正确领导是绝对不相容的。”<sup>1</sup>

246

这次中央全会宣告赫鲁晓夫原先进行的所有对党机关的改革寿终正寝。首先是恢复了所谓按照辖区和生产部门的原则建设党组织及其

领导机构的做法,实行中央委员会——州委会——区委会式的垂直领导,各级党组织拥有辖区(共和国,边疆区或州,区)内的所有党权(还拥有不少的行政权),恢复了原先被取消的最基层(数量最为众多)的党组织,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党委会被改为农村的区委会,原先的苏维埃、共青团和工会的机构也被恢复。

由于“党的垂直领导”(中央委员会——州委会——区委会)的作用加大,把州委会和边疆区区委会一分为二的做法随之被取消,党对经济部门的监督作用被恢复,具有广泛权能的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的时代一去不复返。1965年9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宣布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停止存在,恢复各个经济部门设立部的做法,这意味着首都的官员在国家管理系统中的作用得到恢复。赫鲁晓夫倒台和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集体领导”进行的反改革使全国的党机关和首都的官员成为最大的赢家。

在恢复过去的权力体制和取消赫鲁晓夫的“新发明”过程中,不可避免会产生如何对待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问题。推翻赫鲁晓夫的行动是在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参与之下才得以顺利实施的,争夺党内领导职务的未来斗士们当然清楚这一点,这方面的经验对他们当然颇具诱惑力,然而他们也十分清楚这个机构对各级党机关构成的威胁性。所以,勃列日涅夫在赫鲁晓夫下台后想方设法甩掉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并非偶然,为此他不惜采用阴险狡猾的手段。

在中央全会开幕的前四天,突然间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中又增加了一个议题:“审议关于把党和国家监督机构改为人民监督机构问题。委托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作有关这个问题的报告。”

1965年12月6日,中央全会开幕。列·伊·勃列日涅夫向与会者宣布,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提议:“本次中央全会的议程中除了由尼·康·巴伊巴科夫同志和B.Φ.加尔布佐夫同志的报告以外,再增加一个议程项目——关于党和国家监督机构改组问题和其他组织问题。大家有没有意见和其他建议?”

**场内声音:**没有。

会议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请允许我宣布议程项目被一致通过。”<sup>2</sup>

247 剩下的只是个“技术问题”了。请看关于取消庞大的党和国家监督机构问题的讨论过程：

“会议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请允许转入讨论第二个议程项目，我们已经把关于党和国家监督问题列入议事日程。为此，请允许我讲一讲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对进一步完善现存监督制度的观点，这个问题与我国的经济建设密切相关……党和国家监督机构三年来的工作实践表明，他们在协助党和政府发展我国经济、改进国家机关和经济部门工作、吸收广大群众、共产党员和无党派人士参与监督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我国的苏维埃监督制度是真正属于人民的最民主的制度。

但是也出现了关于监督机构名称的问题。现在的监督机构名叫党和国家监督机构，这种不完全准确的称谓不足以完全反映我国实行的是人民监督的这一事实，所以正确的做法是把他们更名为人民监督机构……为了广泛吸收劳动者参与检查和监督事务，提高他们在监督工作中的作用，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把党和国家监督机构改名为人民监督机构，使其成为党和政府更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确保对党和政府决定和指示的落实情况进行有效监督和检查、加强党纪国法的有效工具之一。请苏联部长会议根据本决定批准《人民监督机构条例》。

大家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场内声音：没有意见。

会议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中央委员们有什么问题没有？

场内声音：没有问题。

会议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有没有人想就这个问题发言？

场内声音：没有，一切都很清楚。

会议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们，那就让我们表决吧。同意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向全会提交这个决定的请举手，请放下。有弃权的



没有？没有。有反对的没有？没有。一致通过。同志们，我们认为，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不要兼任中央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只担任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我们认为这种建议是正确的。

**场内声音：**正确。

会议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因此不打算让谢列平同志担任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谢列平同志将只担任苏共中央书记。如果大家没有什么意见，就用不着就这个问题通过决议了，因为谢列平同志已经是苏共中央书记。关于解除他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的问题由明天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解决。这样处理是正确的吧，同志们？

248

**场内声音：**正确。

会议主席列·伊·勃列日涅夫：关于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的人选问题我们现在不提交讨论，这个问题稍后再提出。

**场内声音：**正确。”<sup>3</sup>

这次中央全会的参加者（他们好比古希腊的合唱队）都很清楚，这不仅仅是个改名称的问题。原先的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改名为人民监督委员会后将丧失它以往的所有支配权，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的创建人、推翻赫鲁晓夫行动的组织和主要执行者谢列平的地位从此一落千丈。显而易见，勃列日涅夫把谢列平视为觊觎党内最高位置的人物，他执意让谢列平扮演次要角色。

## 农 业

苏联共产党新领导人上台后迈出最初几步再次证明了我国政权史上存在的一个普遍的政治和经济规律——苏联领导人的每一次换班都是以批评农业形势一团糟、许诺尽快解决“食品问题”开始，以实行食品定量配给和号召节约粮食结束。列宁在世时实行新经济政策和征收食品税，斯大林时期实行普遍集体化，赫鲁晓夫时期开垦生荒地，都说明了这个问题。勃列日涅夫也不例外，无论从政治意义上或者从经济意义上看，他都必须成为国家农业问题的“总设计师”。农业是赫鲁晓

夫的“世袭领地”，是他个人政治生涯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勃列日涅夫看来，对赫鲁晓夫的农业政策进行重审毫无疑问势在必行，他试图在改组党机关的同时在农业领域进行一系列改革。

勃列日涅夫在1965年召开的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作了题为《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措施的报告》。勃列日涅夫对农业的现状十分不满，他实际上认为，过去的农业政策完全失败了。

根据控制数字，七年（1959—1965年）中农业总产值应该增长70%，实际上在1959—1964年六年中只增长了10%<sup>4</sup>，农业生产在原地踏步。统计数字表明，农业生产陷入了深刻危机。在1958—1964年，粮食平均每公顷产量为1000—1100公斤，1963年由于歉收，平均每公顷产量仅为830公斤。粮食人均产量下降，1913年人均产量为540公斤，1958年为651公斤，1963年为573公斤。<sup>5</sup>

勃列日涅夫在《关于进一步发展苏联农业的刻不容缓措施的报告》中把农业落后的原因归结为如下三个方面：

——不顾农村的客观条件和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忽视经济刺激的方法；

——没有采用符合经济规律的办法，特别是没有通过使用价格杠杆发展农业；

——耕作水平低，不注重提高土地肥力。

中央三月全会为此决定：把原定1965年收购粮食40亿普特的计划减为4亿普特，并保持这一收购量到1970年。保持稳定收购量的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防止出现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农业生产的那种大起大落。与此同时，计划提高农产品——小麦、黑麦、荞麦和牲口的收购价，其中牲口的收购价上涨幅度最大，比原收购价翻了一番。此外，计划实行经济刺激，以增加农业产量：粮食补贴总额比原定计划增加50%。

打算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计划在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期间投入农业和与农业有关部门的总投资额为710亿卢布，其中包括加大对生产设施、农机设备、发展农村电网和改良土壤的投资<sup>6</sup>。

计划建立大型的专业化生产单位——乳品场,养猪场,家禽饲养场,粮食生产基地。

勃列日涅夫对赫鲁晓夫在解决农业问题中采用“唯意志论的方法”大加抨击。但是必须指出,赫鲁晓夫在他执政的最后几年已经认识到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勃列日涅夫认识到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充其量只能算作保持了继承性。农业越来越成为需要国家补贴的部门,也就是说,成为依靠国家其他预算支出生存的部门。规模宏大的土壤改造计划使对农业的投入陡然增加,根据1966年苏共中央三月全会批准的土壤改造计划,准备向中亚地区各共和国、俄罗斯南部一些州和边疆区投入巨额资金(约100亿卢布),用于兴建水利设施、扩大可灌溉耕地和沼泽地的改造,以及实施自以为高明的把北方地区河水引向哈萨克斯坦和中亚地区草原和沙漠的“北水南调”方案。为了实现这一规模宏大的计划,专门成立了许多管理机构及其下属的土壤改造和建设企业,耗费了不少资金,真正用于土壤改造的资金所剩无几。

250

赫鲁晓夫本人在1964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上曾经强调指出通过提高劳动工资刺激生产量增长的必要性。他说,那些不大的劳动集体——大田工作组和生产队应该成为物质刺激的“重点”。<sup>7</sup>

旨在刺激农业生产的措施导致产生始料未及的社会后果。勃列日涅夫在支持农业生产方面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是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了《关于提高集体农庄庄员在发展社会生产中的物质利益的决定》,并于1966年7月1日开始实行。这一决定为集体农庄庄员规定了最低保证工资额。但是,这个最低保证工资额使劳动付出与经济效益和工资之间的联系受到了破坏。这里需要指出的是,1962年国营农场工人用于食品的工资仅占全部工资的4%—6%<sup>8</sup>。而现在集体农庄庄员的劳动工资变成了一种社会救济方式,反而导致“吃大锅饭”思想抬头。

税收政策也发生了变化。以前对集体农庄庄员的所有现金收入、包括生产关系成本都要征税,现在改为只征收纯收入税加上15%的利润税。

限制集体农庄庄员、工人和职员发展个体副业的最令人反感的做法被取消。60年代中期,官方的宣传材料中开始出现保护副业经济合理性的内容<sup>9</sup>。但是,马林科夫在50年代中期通过发展个体副业生产解决全国性食品问题的成功尝试在60年代中期再也行不通了,因为人们再也不相信当权者了,群众担心政策多变。

## 经济改革尝试

251 苏联在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期间曾经进行过经济改革尝试。这些年是学术界争论经济问题最激烈的时期,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如何利用劳动者关心个人物质利益的机制尽快提高社会主义生产率。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年代,党的出版物和文件中经常把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后开始的那个时期称为“停滞时期”,但是作者认为,把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执政的头几年也算进“停滞时期”是不太合适的。60年代初,我国出版的一些经济书籍提到过工业生产率低下的问题,例如,到1963年初,苏联共有金属切削机床250万台,比美国多,但是其中大部分被用于辅助性服务(修理,工具制造等)。劳动消耗量大、生产效率低、工人技能水平不高<sup>10</sup>是所有生产部门的共同特征。

在通过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前夕,报刊上曾经就苏联经济发展道路问题进行过一场热烈讨论,争论主要围绕B. C. 涅姆奇诺夫发表在《共产党人》杂志上的一篇题为《社会主义的生产经营和生产计划》的文章<sup>11</sup>进行的,这篇文章提出了在当时看来是十分激进的建议。作者首先建议改变制定计划的程序——制定计划不是从上到下,而应该自下而上,由企业首先提出制定计划的建议。计划中的数字与其说是下达任务指标,不如说是订货指标。B. C. 涅姆奇诺夫写道:“制定计划的机制应该与企业的经济核算和公共生产基金密切结合……计划中提出的任务指标必须首先征得企业的同意,在企业同意的情况下以书面形式确认,把计划中的任务指标变成为订货指标。对于

计划机构来讲,这种制定计划的程序更为复杂,但是它有助于防止唯意志论的赤裸裸表现。可以把这种制定计划的方式称为计划核算制度,因为它把计划和核算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助于有效调节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任何经济活动。”<sup>12</sup>整个经济杠杆系统应该通过长期起作用的定额和价格进行调整,使完成指令性计划和数字指标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sup>13</sup>

当时的苏联高层领导人也认识到进行经济改革的必要性。在1965年苏共中央九月全会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尼·柯西金作了题为《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完善计划和加强工业企业经济刺激的报告》,呼吁重新对管理体制进行审查、撤销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恢复部门管理原则。柯西金澄清说,不是恢复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成立前的那种部的建制,而是把集中领导同扩大企业的经营管理独立性相结合。工业企业的产品产量应该成为主要的指标。报告中第一次使用了诸如“市场”、“利润”、“资本投入有效性”等概念。尽管这一次的经济改革尝试提出尽量扩大“自下而上”制定计划的范围,但是丝毫不意味着放弃中央集权的计划体制,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比例和速度仍然取决于计划经济<sup>14</sup>。

252

1965年10月2—3日通过了一些关于改变管理机构和成立29个全联盟的部和加盟共和国的部的法律。1965年基本上实现了从辖区管理原则向部门管理原则的过渡,成立了11个全联盟的部和17个加盟共和国的部<sup>15</sup>。到1975年底,工业部门的部共计35个<sup>16</sup>。1967年7月10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部管理条例》。

九月中央全会成为经济改革的起点。1966年第一季度,43个企业改为实行新体制。第二季度又有200个企业实行新体制,其中180个为全联盟和加盟共和国一级的企业,20个为共和国一级的企业。被改制的都是一些高利润的企业,所以说,改革是从轻工业和食品工业部门开始的。<sup>17</sup>

但是,改革很快就遇到了问题——经济规律和政治方针之间的矛盾。改革一开始就凸显价格结构不合理的问题。经济学家A. B. 巴楚



林在《共产党人》杂志上撰文指出：“现行的价格体系明显与苏联经济发展的水平发生矛盾。”他说，煤、铁矿石、锰矿石、硫酸生产的价格过低，导致金属的价格过低，某些工业部门、企业和产品无利可图。煤炭工业亏损，1964年煤炭工业的亏损率为16%，与此同时，另外一些部门（主要指军工综合体——作者）的利润过高，有的高达50%。在食品工业部门，所有的肉类生产和加工企业都出现亏损。奶品和水产品工业部门处在亏损的边缘。在重工业和加工工业，石油、天然气和机器制造部门获利最大。《共产党人》杂志发表的另一篇署名B.西特宁的文章建议实行使一些工业部门赢利的新的价格体系，例如，他建议把煤炭价格提高7.5%，黑色金属价格提高8%到15%，机器制造——降低20%到15%，并建议从1967年7月1日起实行新价格体系<sup>18</sup>。然而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因为党对各个工业部门的重要性及其对完成国家重要任务的影响有它自己的认识，党的政治方针是优先发展军工综合体，而轻工业只能处在苏共经济政策的外围。

苏联前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对这一段时期的经济改革有过中肯的评价，他说：

253 “1965年柯西金式的经济改革对原地空转的国民经济起到了明显推动作用。第八个五年计划中工业产量增长了50%，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三分之一。民用必需品的增长速度终于赶上了向来被偏重的生产资料的增长速度。”<sup>19</sup>

## 苏共二十三大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第一次召开的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苏共二十三大对巩固勃列日涅夫的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同的人对这一次代表大会有不同的、互相矛盾的期待。在列·伊·勃列日涅夫宣读的总结报告中不乏批评赫鲁晓夫的内容，例如，指责赫鲁晓夫对经济核算的经营管理方法估计不足，没有充分利用物质刺激和精神鼓励的方法<sup>20</sup>。勃列日涅夫重弹反对成立苏联国民经济委员会的老调，他

说：“工业辖区管理体制的后果是，分散了对工业部门的领导力量，破坏了科技政策的统一性……”<sup>21</sup>

许多与会代表特别认真倾听勃列日涅夫对他的前任“频繁改革和改组党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管理机构”的谴责。勃列日涅夫认为，这些改革和改组“往往导致毫无理由的人事变动，使工作人员心中无数，妨碍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为不负责任提供温床。”<sup>22</sup>勃列日涅夫对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提出了批评，建议取消新党章中关于定期轮换党机关工作人员的规定，他的这番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鼓掌<sup>23</sup>。

不少人本来预计苏共二十三大可能为斯大林恢复政治名誉，然而勃列日涅夫在报告中实际上有意回避这个问题，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 H. Γ. 叶戈雷切夫在大会发言中甚至继续批评斯大林。

政局发展的矛盾性质还表现在斯大林时期使用的一些党机关的名称被恢复。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被更名为政治局，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更名为总书记。不久前发生的谴责作家 IO. 丹尼埃尔和 A. 西尼亚夫斯基的事件也成为这一次代表大会的议题。米·亚·肖洛霍夫在代表大会发言中不仅完全支持对这两名作家的镇压，而且建议当局采取更果断措施对付像他们一类的作家。肖洛霍夫甚至在发言中回忆起“革命觉悟高涨”时代和国内战争年代。<sup>24</sup>

## 寻找意识形态新目标。

### 约·雅·斯大林的遗产

赫鲁晓夫的“乌托邦”尽管不现实，但毕竟出自真心，至少在一段时期中受到过社会上一部分人的支持。如今赫鲁晓夫的“乌托邦”过时了，用什么来取代它呢？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官方在对待艺术创作方面开始有意识地同赫鲁晓夫的“瞎胡闹”（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对艺术创作的不理解，把一些艺术活动家视为阶级异己分子和敌对分子）保持距离。在《共产党人》杂志（苏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上陆续出现对

254

一些艺术家给予尊重和赞扬的文章,例如正面评价散文作家 B. 阿克肖诺夫和诗人 A. 沃兹涅先斯基的作品,肯定 C. 帕拉贾诺夫导演的影片《被遗忘先辈的影子》,为曾经引起俄罗斯联邦艺术家协会<sup>25</sup>官员愤怒的画家 Г. 莫辛和 M. 布鲁西洛夫斯基的作品《1918 年》恢复名誉,等等。对一些意识形态方针进行了重新审视,“战斗的无神论”的声势有所减弱,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下达了《关于取消对“耶和华派”<sup>①</sup>、“真正的东正教基督教派”<sup>②</sup>、“英诺肯提乙”<sup>③</sup>、“基督复临派”<sup>④</sup>参加者实行专门流放》的秘密命令。

但是,文化领域的松动迹象很快就被加强意识形态监督取而代之。1965—1966 年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列为重点监督对象的作家安·多·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马·丹尼埃尔的日子又不好过起来了。安德烈·多纳托维奇·西尼亚夫斯基和尤·马尔科维奇·丹尼埃尔都生于 1925 年,两人都参加过卫国战争,尤·丹尼埃尔在卫国战争中受了重伤,成为残疾者。根据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刑法第 70 条第一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鼓动或宣传活动”对他们俩人提出了指控,其罪名是他们在 1956—1963 年在国外出版被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性为“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著作。国家公诉人在法庭上宣布,被告“撰写和出版恶毒诽谤和号召推翻国家制度的文学作品”<sup>26</sup>。安·西尼亚夫斯基和尤·丹尼埃尔被审判表明当局开始公开进行政治迫害。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并不鲜见的政治审判不同的是,这一次政治审判是公开进行的,而且伴随着在报刊上开展声势浩大的宣传。当局为了确保对尤·丹尼埃尔和安·西尼亚夫斯基的审判万无一失,进行了认真的准备。起诉书由国家安全部、苏共中央文化部和作家协会领导人共同起草,并经过世界文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文学语

---

① 亦称“耶和华见证会”,基督教的一个派别,苏联曾因耶和华派反苏而禁止其活动。——译者注

② 苏联东正教的一派,20 世纪 30 年代出现于苏联。——译者注

③ 正教的一个教派,1908 年出现于俄国,创立者为修士英诺肯提乙。——译者注

④ 新教教派,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苏联有 2.1 万信徒。——译者注

言分院、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的一些作家加工润色。《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由一些著名作家联名写的猛烈抨击尤·丹尼埃尔和安·西尼亚夫斯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上署名的作家有Л.索博列夫、谢·安东诺夫、А.巴尔托、К.费定、Н.吉洪诺夫、К.西蒙诺夫、А.苏尔科夫、沃罗诺夫、В.斯米尔诺夫、С.米哈尔科夫。3.克德林在《文学报》、Д.叶廖明在《消息报》上撰文对这一次审判表示支持。

与此同时,我国一些最著名的文化活动家(К.楚科夫斯基,伊·爱伦堡,В.什克洛夫斯基,Е.多罗什,Р.普利亚特,阿·阿尔布佐夫,尤·卡扎科夫等)向苏共二十三大主席团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写联名信,为尤·丹尼埃尔和安·西尼亚夫斯基辩护。

请读者注意,一些著名科学家和文化艺术活动家联名向苏联领导人写信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苏联人民表示政治抗议的一种特有的形式。这些联名信以手抄稿的形式在全国各地广为流传,有的被收入“个人出版物”,有的被西方广播电台用作对苏广播材料。一般来讲,在这些联名信上签名的人都受到过不同程度的迫害。 255

为了使政治迫害有法律可依,当局对刑事立法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补充。1966年9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批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对《俄罗斯联邦刑法》进行补充的命令。经过补充的《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90条第(1)点写道:“对于经常以口头形式或者以书面形式散布和印发诋毁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作品者处以剥夺自由三年或劳动改造一年,或罚款一百卢布的惩罚。”

反对派运动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举行公开抗议活动。1965年12月5日,一些著名作家(安·德·萨哈罗夫,尤·加兰斯科夫,А.金兹堡,В.布科夫斯基,А.阿马尔里克,А.博戈拉兹,Н.戈尔巴涅夫斯卡娅,А.沃尔平)在莫斯科市中心普希金广场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苏联当局恢复原先制定的法律。我国的护法运动从此诞生。

社会上对如何对待斯大林、如何看待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决议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以《十月》杂志总编В.科热夫尼科

夫为首的一派代表“斯大林主义者”的立场。雕塑家叶·维·武切季奇致《真理报》的一封信引起了巨大社会反响,他在信中对使用“斯大林个人崇拜时期”这一概念表示抗议。他认为,在我国历史上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时期,而只有国家主要领导人犯某些错误的时期。当时国内的情况是,一部分人期待新上台的国家领导人为斯大林恢复名誉,另一部分人则担心出现这种局面。

1965年恢复庆祝胜利纪念日——5月9日的活动,“1941—1945年伟大卫国战争胜利20周年”纪念章也是那一年设立的。勃列日涅夫在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在苏共二十大后第一次提到了斯大林作为战争年代最高统帅的功勋,他的讲话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与此同时,25名杰出文化活动家(列·安·阿尔齐莫维奇、皮·列·卡皮察、安·德·萨哈罗夫、И. Е. 塔姆等)联名给国家领导人写信,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一次讲话提出抗议。

256 作家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成为社会上反斯大林主义的领袖人物和象征。索尔仁尼琴因发表苏联第一部描写劳改营生活的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引起前所未有的社会反响而名声大噪。他的这部小说最初刊载在《新世界》月刊上,在社会上引起了超出纯文学评论的反应。所有苏联——从大学生到工人都争相阅读这部作品,报刊上、机关单位、企业、农场——到处都在争论这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所描述的内容显然与当时半官方性质的为斯大林部分恢复名誉的趋势格格不入,索尔仁尼琴因此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加上索尔仁尼琴当时正处在创作高峰期,他的新作品试图证明斯大林的罪过是列宁奠定的政治制度的必然结果,索尔仁尼琴的这种观点与那些在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涌现出的作家和诗人对列宁和革命早期阶段的讴歌背道而驰。

国家安全委员会早在1965年就对索尔仁尼琴进行不间断监视和追查他的手稿,定期向苏共中央汇报这位作家的观点。当局从索尔仁尼琴尚未发表的长篇小说《第一层》、《机关来的文学研究家》中得出结论认为,作者的目的是“证明苏联存在着‘奴隶劳动’,并且企图证明建



设社会主义是对人的肆意剥削,是建立集中营,强迫囚犯劳改,是国家有预谋有组织地滥用劳动力……作者试图抹杀苏维埃国家的全部历史(国内战争,集体化,头几个五年计划,卫国战争)……试图证明十月革命是不正确的……”<sup>27</sup>

苏联作家协会领导人遵照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共中央的指示在1966年初作出了没收索尔仁尼琴的手稿的决定。1967年3月10日,苏共中央秘书处专门召开会议讨论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尤·弗·安德罗波夫在会上把索尔仁尼琴说成是一个“从事反苏活动的人”。彼·尼·杰米契夫在发言中说:“这是一个生活放荡的作家……应该进行坚决斗争。”维·瓦·格里申说:“他什么人都骂,诬蔑我们所有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叶·谢米恰斯内建议作为第一项惩办措施应该把索尔仁尼琴从苏联作家协会开除出去。<sup>28</sup>

但是,索尔仁尼琴是一个不愿意按照当局规定的“游戏规则”行事的人。他没有为自己辩解,没有躲藏起来,而是单枪匹马转入进攻,他给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主席团写了封公开信,要求取消书刊检查制度,对“我国文学书籍长达几十年受到书刊检查机关越来越不能容忍的压迫”<sup>29</sup>表示抗议。索尔仁尼琴的观点受到了许多作家的支持,84名作家向作家代表大会写了封联名信,还有15名作家给代表大会发去了电报<sup>30</sup>。西方一些国家报刊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公开信,这一纯属苏联内政的问题一下子成了世界舆论关注的中心。

当局不知所措,他们已经不可能“按照规则”惩办索尔仁尼琴了,把一个在斯大林时期坐过牢、在劳改营关了许多年的作家再次投入监狱显然不是个办法。在中央委员会“主管”文化工作的彼·尼·杰米契夫提出了一个办法——向全国党组织散发非公开信,“揭露索尔仁尼琴的行为和观点”。1967年7月18日,中央秘书处召开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德·弗·乌斯季诺夫、Ф. Д. 库拉科夫、И. В. 卡皮托诺夫、米·安·苏斯洛夫等人否决了杰米契夫提出的建议。中央秘书处最后决定采纳苏斯洛夫的建议:“责成作家协会加紧审查索尔仁尼琴的问题并拿出意见,然后秘书处再讨论这个问题……”<sup>31</sup>

1967年9月22日,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在有索尔仁尼琴参加的情况下“坚决和不妥协地”谴责他“在伟大卫国战争50周年前夕为外国的反苏歇斯底里提供食粮的行为”,要求索尔仁尼琴收回自己的声明,表示悔过。但是,索尔仁尼琴非但不打算悔过,而且继续坚持自己的立场,要求取消对他已发表作品的“非法封禁”,允许他在国内出版不让出版的著作。<sup>32</sup>

镰刀碰到了石头。

258 在这一段时间中,我国文坛上除了出现引起激烈争论的追忆以往岁月的文学作品外,还涌现出一批农村题材的所谓“农村散文式”的文学作品,如瓦·伊·别洛夫的中篇小说《木匠的故事》,鲍·安·莫扎耶夫的中篇小说《费奥多尔·库济金生活片断》(描写一个勤劳肯干的正常人在集体农庄中生活下去是不可能的),弗·亚·阿卜拉莫夫描写苏联北方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普里亚斯林一家》,这些作品的问世是对祖国文化起源的回归。弗·阿·索洛乌欣的抒情中篇小说《俄罗斯博物馆书简》和《黑板》也是在这一时期家喻户晓的。列宁格勒普西金之家出版的古俄罗斯文学作品也深受读者的喜爱,60年代末70年代初成为我国寻找古俄罗斯文学足迹的时代。以前鲜为人知的由科学院图书馆和普西金之家定期举办的“书籍探秘”成为莫斯科、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雅罗斯拉夫尔、高尔基城许多大学和大学生们生活的一部分。

翻译欧美作家的文学作品和出版60年代一代人不太熟悉的俄罗斯作家文学作品的数量不断增加。苏联读者终于有机会阅读奥地利作家弗·卡夫卡反映人们在可怕、荒诞无稽国家机器面前悲剧性软弱无力的小说。这些年中,苏联俄罗斯作家米·阿·布尔加科夫的名字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他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格丽特》、《白卫军》、《戏剧性风流韵事》等向读者展示了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文艺和道德价值。

与此同时,官方的宣传机器也加强了意识形态攻势,当局借庆祝十月革命50周年的机会为再版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大造

舆论。在再版的高校学生必读的苏共党史教科书中,有关批评“个人崇拜”的内容被大大压缩。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以后摇摇欲坠的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纪律”又站稳了脚跟。大学教师们还清楚地记得,1956年大学生们正式建议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226部著作,而现在(1965年初)仅(!)研究138部<sup>33</sup>。

惩办持不同政见者的老办法——剥夺苏联公民资格和驱逐出境被重新使用。1968年4月15日,政治局批准了苏联检察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关于剥夺И. Я. 加拜和А. Т. 马尔琴科公民资格的建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中写道,他们的“行动不符合苏联的国民身份,他们的反社会行为有损于苏联的威信”。

259

分析这一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献资料可以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最让当局不能容忍的是那些在社会主义选择方面同苏共领导人唱反调和批评党左右摇摆的人。当局在总结联共(布)和苏共的历史经验后得出结论认为,党内反对派和不听话的东欧国家(南斯拉夫,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仍然是党面临的主要危险,于是,所有国家安全机构、党组织的意识形态工作部、许多高级党校、社会科学教研室、政治教育之家、党委办公室和相关部门都被动员起来,投入反对这些“意识形态敌人”的斗争。

这样的意识形态考虑导致当局对于危及苏联制度的另一种危险——在国家生活中表现越来越明显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估计不足。

官方认为,苏联已经不存在民族问题了,党的宣传工具一再声称民族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官方宣扬的“社会主义族际关系”成了解决民族问题的良方,并被誉为“新型的民族关系”<sup>34</sup>。列·伊·勃列日涅夫为了证明“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巨大胜利”,硬说什么“历史上形成的新的社会和民族统一体”是党的工作成果。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取代了民族感情和民族文化的作用。不过,应该肯定的是,苏联各共和国的青年都享有接受高等教育和中等专业教育的同等机会。苏联从50年代中期起不再实行按照民族特征限制公民权利的政策,不论任何民族

的公民都有接受教育、晋升职务的机会。

260 但是,不同共和国的居民在生活水平、文化程度、心理素质等方面存在的差别被当局视而不见。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亚美尼亚、格鲁吉亚、乌兹别克斯坦、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历史被说成是俄罗斯历史的延续;俄罗斯各个中学的教学计划规定,除了学习俄语以外,还必须学习一门外语,但是不包括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语言;会讲俄语被作为苏联男性公民服兵役的必备条件之一。这些不合理的规定迫使各加盟共和国许多望子成龙的父母把小孩送到俄罗斯的中学学习。<sup>35</sup>

大部分工业建设项目的工程技术人员是俄罗斯人,甚至乌兹别克斯坦的飞机制造厂、摩尔达维亚和立陶宛仪表制造厂需要专门技能的工作也由俄罗斯的工人完成。有人提出了“苏联所有民族和人民社会同型”的论断,委婉地说,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情况。勃列日涅夫也说过,“苏联人民的全民族自豪感……比组成我们国家的每个民族独有的天生民族感更深更广”。<sup>36</sup>他的这一论题对民族文化并非无害。这些说法看起来无关紧要,其实是十分有害的。

可想而知,对苏联文化和民族文化相互关系进行这样的解释只会激起愤怒和仇恨。

不同民族建立自己国家机构的权利是不相同的,尽管官方从来不承认这一点,但是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只有 14 个所谓“有封号的民族”才有成立加盟共和国的权利,他们是阿塞拜疆人,亚美尼亚人,白俄罗斯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摩尔达维亚人,塔吉克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乌克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他们之所以有成立加盟共和国的权利,据说是因为大部分这些民族参加了 1922 年成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还有的民族如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摩尔达维亚人是自愿加入苏联的。俄罗斯的情况更为复杂,它是作为一个联邦存在的,有数量众多的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自治共和国,布里亚特自治共和国,达吉斯坦自治共和国,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科米自治共和国,马里自治共和国,莫尔多瓦自治共和



国,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图瓦自治共和国,乌德穆尔特自治共和国,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楚瓦什自治共和国,雅库特自治共和国。其中有的自治共和国有两个“有封号的民族”,例如卡巴尔达人和巴尔卡尔人组成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车臣人和印古什人组成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有封号的民族”有权建立国家机构——成立自己的部长会议、最高苏维埃、共和国一级的党组织、国立大学和科学研究中心(在加盟共和国——科学院),他们可以选派“本民族的代表”担任国家管理机关的重要职务。

俄罗斯人无处不在——不存在没有俄罗斯人的苏联国家机构,党和国家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把俄罗斯等同于苏联,惟独俄罗斯没有各加盟共和国所应该有的国家政体标志物。与此同时,把俄罗斯等同于苏联的政策引发了反俄罗斯人的情绪。苏联的民族国家制度使俄罗斯人在各共和国中处于两难的境地,他们一方面被视为“执政的民族”,另一方面却没有资格成为“有封号的民族”的“本民族”代表,他们不可能在各民族共和国中担任一系列管理职务,至少在那里存在着“自己的竞争者”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苏联科学院院士伊·沙法列维奇与伊·亚·索尔仁尼琴和安·德·萨哈罗夫一样都是持不同政见者,他对这种现象有过准确的描述。伊·沙法列维奇写道:“在看待其他民族方面,俄罗斯人的典型毛病是,看不到把我们同其他民族分隔开来的那种界限,内心深处不承认他们有权利存在于他们特有的环境中。我经常听说,一些幼稚无知的俄罗斯人带着困惑莫解的心情试图搞清楚,为什么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或者立陶宛人不想好好学习俄语和变成真正的俄罗斯人……这也许是由于他们曲解了我们的民族平等感情,因为在我们看来,他们与我们是平等的,我们一向把他们当成俄罗斯人对待(尽管未经他们许可)。可以设想一下,其他民族的人、特别是那些弱小民族的人,当他们看到多不胜数的、一眼望不到边的俄罗斯人迎面走来、随时可能把他们一个不剩地同化掉的时候是什么心情,他们肯定惊恐不安,愤愤不平……是的,我们没有反感他们,没有歧视他们。但是我们必须看到,比方说爱沙尼亚人,他们不仅希望在所有方面和我

261



们平起平坐,希望和我们一样过上富裕生活,而且这个勇敢的小民族随时准备为了不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作出任何牺牲。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可能不可能出现呢?我想是可能的,当然我不相信这种可能性会实现。积存的问题太多,剩下的时间可能太少了……”<sup>37</sup>

出现了奇怪的现象:当局一方面宣布民族平等是社会主义的民族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又把各少数民族分为“有封号的民族”和“无封号的民族”,制造并激化民族矛盾,何况这种矛盾已经存在了即便没有几个世纪也有几十年时间了。把一些少数民族代表人物驱逐出境,迫害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篡改某些少数民族的历史,乌克兰发生“饥荒瘟疫”,中亚集体化期间发生骇人听闻的事件,迫害在苏维埃俄罗斯的少数民族神职人员,签订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战争年代北高加索地区为数众多的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站在德国一边,不考虑各共和国的实际财政能力,所有这些事实都被当局故意掩盖和闭口不谈,成为滋养民族主义和民族极端主义的“上好营养清汤”。

党的宣传工具不断鼓吹“民族问题已经解决,这是社会主义的辉煌成就”,而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却不断上报发生民族冲突的消息。

请看下面几个事实(摘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报告):1965年  
262 11月6日到7日(苏联国庆节前夕!),挂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州委大楼、市执行委员会大楼、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接待室门前、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大楼上的牌子,以及阿拉木图一些机构和大学的牌子都被人砸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报告中写道:“哈萨克师范学院集体宿舍附近”的俄文标语被人用刀切成碎块。最近,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不断发现有人散发民族主义性质的匿名信,其中两封匿名信是一个名叫阿梅诺夫·图克的人写的,此人生于1939年,巴甫洛达尔道路建设管理局电工。他在1965年5月写的匿名信中说什么由于‘俄罗斯人蔑视哈萨克人’,必须成立独立的哈萨克人国家……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农业部集体农庄事务管理总局副局长 A. Ж. 别克塔索夫,1910年生,哈萨克人,苏共党

员,1935年入党。他不久前给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和共和国政府写信阐述自己对农业形势和某些问题的看法,说什么在哈萨克斯坦存在着隐蔽的大国沙文主义和防御性的地方民族主义……一些知识分子代表人物和大学生对高等院校使用俄语处理公文和教学、对许多党和国家领导职位由俄罗斯人担任表示不满。”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份报告还列举了一些属于民族对抗性质的事实:“阿拉木图破获了一起写匿名信的案件。写匿名信者И. М. 斯科别利斯基,1937年生,乌克兰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科学院司机,多次向各报刊写匿名信诬告哈萨克人。”<sup>38</sup>

在乌克兰西部卢茨克市,有人散发传单,号召“拿起武器,打倒残酷压迫几乎所有欧洲人的红色俄国佬”。

1965年7月,有人在塔什干市散发用乌兹别克文书写的传单:“中亚人民党号召自己的人民以阿尔及利亚、古巴、马里为榜样,奋起反对俄罗斯占领者,解放自己的祖国……不惜牺牲生命拯救被俄罗斯人灭亡的自己的民族,为解救自己的人民而奋斗,把俄罗斯占领者赶出自己的土地。”

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国家安全局破获了一起散发反动传单案。犯罪嫌疑人乌格里诺夫,1924年生,乌克兰人,无党派人士,工人,“在罗日尼亚托夫斯克区斯帕村和波戈雷列茨村散发传单,以所谓的‘乌克兰民族民主联盟’的名义号召当地居民在企业 and 集体农庄实施破坏活动,以及对党和苏维埃工作人员实施恐怖活动反对苏维埃政权。”

新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在呈送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敌人寄希望于通过宣扬民族主义从内部动摇社会主义的基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各个机构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我国一系列地区(乌克兰,波罗的海沿岸地区,阿塞拜疆,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制止有组织的民族主义活动。”

1967年6月爆发“七日战争”以后,苏联开始严格限制犹太人出国,准确地讲是禁止犹太人出境。一年后,即从1968年6月开始允许犹太人出境,但是每年不得超过1500人,而且“只允许未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老年人出国”<sup>39</sup>。这些限制引发了受到广泛国际支持的犹太人抗议运动。

“苏联不存在民族问题”,这是苏共中央一贯坚持的十分明确的意识形态目标,它因此从来没有认真解决过这个它认为不存在的问题,从而间接地为苏联解体创造了条件,尽管当时看起来还没有这种可能性。

### 越南战争和苏联(1965年—1968年)

赫鲁晓夫下台为改变苏联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可能,首先为改善两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提供了可能。赫鲁晓夫的反斯大林言论使他成为宣布自己是斯大林和列宁事业继承人的中国共产党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私敌,赫鲁晓夫被推翻使两个国家领导人再度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减少。

越南北方的事态发展成为中苏两国改善关系的契机。1964年8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批准美国作为越南南方的战略盟友在越南实施直接军事行动的《东京湾决议》。

超级大国之间的传统角逐又有了一个竞技场。美国加强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地位受到了削弱,所以,苏联领导人认定中国可能成为苏联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帮助的盟友。

在此之前不久(1964年6月),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中央委员黎文兴为首的代表团向苏联提出了扩大向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提供帮助的请求,希望苏联方面增加射击武器、防空火炮、反导弹兵器、弹药、药品、美元的供应量<sup>40</sup>。如果说当时苏联领导人对这种请求持谨慎态度的话,那么现在他们已经把提供军事援助视为巩固苏联在这一地区地位的必要条件。

1965年2月5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自己的盟友一道采取所有必要措施确保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安全。声明中说:“苏联人民一定履行他们承担的对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随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访问河内、北京和平壤,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柯西金的行动表示支持。柯西金访问河内期间,胡志明主席再次请求苏联向越南北方提供军事援助。

柯西金离开河内回国途中访问北京。1965年2月11日柯西金同毛泽东的会晤成为轰动一时的外交事件,参加会晤的还有其它一些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罗瑞卿,刘晓,杨成武。

会晤在彼此挖苦中开始:

“毛泽东:我很高兴在东方见到您。

柯西金:说得对,不过您也应该去西方走走。

毛泽东:没有人请我去啊。

柯西金:我们请您去。

毛泽东:那我们就去。我老了,不怎么参加政治局会议了。看来,我也快死了……我们顶住了美国最厉害的第七舰队。1958年我们开始炮轰美国人占领的几个岛屿,他们就派几艘航空母舰到那里,后来又派去了第六舰队的一部分兵力。

柯西金:苏联在德国遏制美国的兵力。

毛泽东:那你们就主要在西方开辟战线,我们在这里,在亚洲作战。美国人逼使我们协同行动。”

毛泽东说,他反对苏联关于召开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建议,因为他是“教条主义者”,拥护他的人数不会多。他说,陈毅、周恩来赞成;我、刘少奇、邓小平、康生——我们是顽固不化的教条主义者,你们要开会我们也没有意见。毛泽东建议把中苏两党之间的那场在1964年2月达到最激烈的争论继续进行下去。

柯西金对中共中央主席的这番话提出了异议,他说:“不是我们想召开会议,而是全世界的共产党人……您应该考虑到莫斯科在十月中

央全会以后出现的新条件和新情况,您还是不想这样做的。”

“毛泽东:我们看到了一些事情。”

柯西金:我们现在就可以让步,同志式的。出于尊重……”

但是,柯西金的让步不是无止境的。他坚决不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关于收回苏共中央 1964 年 7 月 14 日尖锐批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信和撤销苏共中央 1964 年二月全会决议的建议。

柯西金坚持共同支持越南北方和使用苏联飞机运输军火的意见。他提醒毛泽东说:“刚果利用了苏联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这些飞机从阿尔及利亚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把军火运往刚果。”

265 柯西金离开北京回国后一直以为中国方面会允许苏联方面利用中国领空运输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人。1965 年 2 月 23 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越南民主共和国对空防御的决定,为此准备派遣一个装备“沃尔霍夫”防空导弹系统的防空导弹旅和 4000 名兵力。计划在 1965 年 2 月底使用 45 架安—12 飞机把军事技术装备经中国运往越南。

然而,这项计划从一开始实施就遇到了严重困难。无论中国或越南(多么令人吃惊)都不希望苏联在印度支那的地位得到加强,中国方面不允许苏联利用它的空中疆域。

1965 年 3 月 23 日,勃列日涅夫在红场纪念宇航员的群众集会上说:“我们中央机关收到了不少苏联公民表示准备加入越南人民争取自由和独立斗争的申请书,我们完全理解他们的兄弟般团结精神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感情。”后来,在列·伊·勃列日涅夫与以黎笋为首的越南北方代表团莫斯科谈判后于 1965 年 4 月 17 日发表的联合公报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联合公报中写道:“如果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规模扩大,苏联政府将在必要的时候,在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请求的情况下,允许……希望为越南人民的正义事业而战的苏联公民前往越南……”<sup>41</sup>

但是,这些话只不过是“专供外卖”的声明,并没有反映出越南北方和苏联之间关系的真实情况。越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武元甲早在



1965年3月就明确表示过,越南需要的只是军事技术装备,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并表示对训练越南的军事技术人员感兴趣。后来双方就派遣志愿人员的问题进行过多次秘密讨论,越南领导人的观点是:首先需要的是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军事技术器材,越南的人才资源是足够的。<sup>42</sup>

北越方面的这种立场背后显然有其实用主义的考虑:苏联方面为了遵循“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和履行政治义务,在任何条件下都将不得不提供援助。例如,据苏联方面统计,到1965年4月,在再次向越南大量提供武器之前,苏联已经向那里无偿提供价值1.915亿卢布、按照非现金结算提供价值230万卢布、以贷款形式提供价值695万卢布的武器。

死守政治教条的苏联在外交上陷入了绝境,它的伙伴们可以不考虑苏联本身的利益。

1965年4月,苏联方面根据柯西金的河内之行工作总结和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的决议,决定再向越南提供价值1.4亿卢布武器,并计划在1965年下半年和1966年上半年提供装备“泥火山”导弹的海岸导弹营。1965年7月2日,在越南的苏联专家共计332名(在整个军事冲突期间,苏联的军事顾问总人数都没有超过500名,也就是说,不到一开始计划数的十分之一)。在1965年7月前,在越南的苏联专家主要从事防空导弹发射装置的维护工作,美军加强轰炸后,北越领导人请求苏联提供空军飞行员,但是苏联方面认为,这样做不合适,因为“战斗一打响人家就知道它们(飞机)是俄国人驾驶的”。

关于部署在北越的苏联防空导弹,曾经发生过戏剧性的事情,苏联驻越南大使A. C. 谢尔巴科夫<sup>43</sup>1965年7月31日发给苏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谈到过这件事。他在电报中写道,苏联导弹团头两次的战斗行动发生在7月24日和26日,越南方面一开始不太相信导弹的威力。谢尔巴科夫说:“战斗行动开始前,中国专家曾经告诉越南方面说,这种导弹是旧的,不可靠。”这些导弹确实是1956—1958年生产的。谢尔巴科夫继续写道:“战斗任务下达后,越南人实际上回避参加战斗,苏

联专家和导弹营士兵只好单方面作战。”原先商定的由苏联和越南专业人员组成“混编战勤班”的思路无法实现,越南人“洗手”不干了。

但是,初战告捷,七枚苏联导弹击落了五架美国飞机。越南高层领导在有范文同和武元甲参加的情况下对第一次战斗结果进行了讨论。谢尔巴科夫在电报中写道:“胡志明答应派一个分队参加战斗,但是直到7月31日还没有派来。”

截止1965年10月1日,在越南的苏联军事人员共计475人,其中导弹专业人员413人,空军专业人员44人,其他技术装备的专业人员18人。

苏联除了向越南北方提供军事援助外还提供了外交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援助。1966年4月6日,苏共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促使完全彻底停止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世界性运动》的决定,指示苏联在各国际组织的代表加紧开展这方面的工作<sup>44</sup>。

但是,越南北方领导人却想方设法使苏美两国的关系更加紧张。267 苏联海运部1966年7月18日在写给苏共中央的一封信中谈到了向越南运输货物中遇到的困难和双方关系极不融洽。

信中说,苏联船只在进入东京湾时经常受到美国飞机扫射。在东京湾海域,经常有2—3艘航空母舰不间断巡逻,每艘航空母舰附近有一艘巡洋舰和6—8艘驱逐舰定期来往行驶。苏联船只实际上是在美国航空母舰、驱逐舰的封锁和空中飞机的不间断扫射下通过这一海域的。

但是,使苏联方面担心的是另一件事:“从苏联船只最近在越南海防地区的工作条件看,海运部认为有必要报告如下情况:

一、越南海务当局故意延长苏联船只的卸货时间,他们认为,海防港停泊的苏联船只越多,那里的安全越得不到保障。”

海运部列举了许多例子证实这一结论。等待卸货的苏联船只一停就是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其中有些船只运载的是危险货物,例如石油。

“二、故意安排苏联船只停靠在最危险的地方附近,例如,停靠在

海岸高炮阵地附近。这样安排的目的是为了利用苏联的船只保护高炮阵地免遭美国飞机轰炸,或者是某些居心叵测的人有意让苏联的船只挨炸。

三、在发生空袭的时候,越南的一些海军快艇开到苏联船只附近向空中开火,从而引起美国飞机向苏联船只射击;还发生过中国船只在苏联船只附近用自动武器向美国飞机射击的事情。

四、在海防地区发生的一次空袭中,美国飞机扔下了一些不明物体……可能是深海水雷。我们的海员请越南朋友检查,越南朋友态度冷淡,实际上没有好好检查。7月10日,越南的引航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海域。7月11日,苏联‘车里雅宾斯克号’轮船为了检查是否有海底水雷,以避免危及苏联军舰,决定驶过危险区,但是越南的引航员不向‘车里雅宾斯克号’船长提供有关情况。”

苏联海运部给苏共中央写这封信是它职权范围内的事,其目的很简单——建议苏联政府告诉越南朋友,苏联方面将继续派遣船只向越南港口运输货物,但是越南方面必须确保及时卸货,并保证苏联船只的安全。<sup>45</sup>

苏联军人和越南军人之间的关系很不融洽。驻河内的苏联武官抱怨说:“越南方面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奉行不让在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苏联人对这个国家的事态发展施加任何影响的方针。苏联派去的许多兵种军事顾问被退回,只留下一些提供一般性技术帮助的军事顾问和文职顾问。这是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奉行亲中国方针的必然结果。”<sup>46</sup>

苏联方面当然对美军的新式军事技术装备十分感兴趣,希望对被击落的美军飞机和其他战利品进行认真研究,因此,苏联在向越南提供武器的同时明显表现出在这方面与越南人进行合作的意向。但是,从专门研究美军装备的苏联专家小组1967年3月14日呈送的一份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他们在履行双方已有协议的道路上碰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现将这份报告的部分内容照录如下:

“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苏联专家小组不得不在困难的环境中开展工作,许多困难往往是越南朋友故意制造的。按照越南方面规定的程

序,苏联专家可以前往被击落美国飞机的坠落地点采集样品。但是,越南同志利用种种借口不把飞机坠落地点告诉我们,或者不让我们前往飞机坠落地点,甚至故意拖延时间,使我们去不成……我们的专家抵达飞机坠落地点时却发现已经有人看过了,后来才知道是中国的专家先来了一步,这样的情况并不鲜见。例如,今年1月击落了美军一架携载导弹的改进型侦察机,请我们的专家去看,我们到那里后发现,飞机上所有贵重设备已被中国人取走,并已做好了把飞机残骸爆炸的准备工作。

拒绝苏联专家观看被击落飞机和以各种无理借口不把已取得的样品交给我们的事情经常发生……

……双方互换情报的情况也是如此。提供给我国军人的情报往往内容不详细,不重要,有时甚至故意隐瞒真情,提供虚假情报。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越南方面有义务每个月向我方通报敌人的部署和行动情况,有关空战的情况,定期向我方提供被活捉的美军飞行员的供词,向我方报告美军使用干扰和导弹的情况,以及美国空军和海军航空兵的战术特点,实际上这些协议都没有被认真执行。”<sup>47</sup>

这份报告间接回答了苏联军人有没有同在越南上空被击落美机的飞行员接触的问题。苏联专家不仅没有接触过这些飞行员,而且经常看不到审讯这些飞行员的记录材料,而这些材料对于苏联方面有效利用军事技术装备是至关重要的。

值得指出的是,据大致统计,从1964年8月5日到1968年11月1日,越南防空兵力共计击落美国空军和海军的飞机3423架。

1964年10月到1968年是苏联国内矛盾丛生时期,是一方面试图进行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极力巩固政治生活保守趋势的时期,是持不同政见者公开与当局对抗的第一次尝试时期,是苏联在世界各地与美国抗衡并取得一定胜利的时期。

然而,发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事件使苏联领导人面临一系列复杂的任务。

## 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莫斯科的观点

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促使苏联社会各个方面——从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力量配置和改变外交政策,到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运动发展,都发生了转折性变化。后赫鲁晓夫时期使诸如“改革应该深入到何种程度”、“改革对社会主义基础触动的最后界限在哪里”之类的问题又一次摆在最高政治领导人面前。对于苏共领导人而言,提出这些问题是理所当然的: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敌视和包围,不断发生的军事冲突(越南战争,“七日战争”,苏联在中东的盟友被击溃),维·罗斯托宣扬的“趋同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互相接近和相互渗透)所造成的精神压力——可想而知,所有这一切使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代苏联政治家无时无刻不感觉到来自外部的威胁。

他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制度是否巩固信心不足。1953年柏林起义、1956年匈牙利事件、波兰骚动还留在他们的记忆中。他们知道,南斯拉夫、中国、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等国或多或少试图摆脱苏联共产党的控制。

“布拉格之春”事件对苏联产生了多大影响呢?在寻找这个问题答案之前,必须首先分析苏联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引起了苏联社会各阶层的巨大反响。

苏共中央政治局和秘书处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当时发生的许多事情是了解的。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获取情报的渠道很多——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和驻布拉迪斯拉发总领事馆,在莫斯科各类党校学习的捷克斯洛伐克活动家,到苏联公务出差的捷克斯洛伐克公民,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人物。这些情报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各个阶层,并反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各种不同观点。捷克斯洛伐克政界不同派别的上层人物都想证明自己的观点是正确的,都希望获得莫斯科的支持,他们争先恐后向苏联提供大量各种各样的消息。对于这些消息,苏联政界领导人当然进行了认真分析,但是如果认为他们是



出于外交活动的考虑未免有点儿头脑简单。作为“兄弟的社会主义阵营”组成部分之一的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当然和苏联的国内事务密切相关。当时苏联正在进行改革“现实的社会主义”的危险实验,它很可能使苏联产生(实际上已经产生)像在捷克斯洛伐克产生的那种后果。

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早在1967年就向国内呈送过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意识形态发展不良倾向的报告。布拉格大学生1967年11月的公开演说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代表会议对国家政治方针的批评同样引起了苏联方面的注意。波兰党的领导人惶恐不安地注视邻国的事态发展。例如,1967年12月19日,波兰向苏联提供了一份关于捷克斯洛伐克有发生意识形态蜕变危险的详尽报告<sup>48</sup>。

### 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层变动

捷克斯洛伐克党的最高领导层内部争夺权力的斗争日趋激烈,各方面都对兼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安托宁·诺沃提尼提出了尖锐批评。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于1967年12月访问布拉格的。他的这次捷克斯洛伐克之行根本不是如同官方所说的那样,是想邀请安·诺沃提尼在捷克斯洛伐克休养和打猎。勃列日涅夫并没有去打猎消遣,而是三番五次找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磋商,最后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同意撤换诺沃提尼。“这是你们自己的事”<sup>49</sup>——苏共中央总书记用这句话把安·诺沃提尼的命运交给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内诺沃提尼的竞争者们随意摆布。克里姆林宫认为,安·诺沃提尼和他不久前的庇护者尼·谢·赫鲁晓夫是一路货色的人物。和赫鲁晓夫一样,诺沃提尼也被克里姆林宫指责独揽党政大权,搞“唯意志论”,不实行“集体领导”。克里姆林宫当然也没有忘记,在罢免赫鲁晓夫问题上,安·诺沃提尼有他自己的、有别于莫斯科的看法。

在1967年12月至1968年1月举行的捷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发生

了激烈的政治交锋,党内形成了三种相互交叉和相互作用的政治集团(必须指出,捷共领导层至少在1968年8月之前还没有形成有组织的集团,所以这里和下面所介绍的捷共领导层内的集团纯属人为划分)。第一个集团(“共产党原教旨主义者”)在这次捷共中央全会上是绝对少数派,其代表人物是斯洛伐克民族议会议长米哈尔·胡迪克,他的斯洛伐克同事瓦西尔·比拉克曾经以明显嘲讽的口吻说,胡迪克“救过工人出身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三任总统一命。他大声嚷叫说,有人希望党分裂,不关心党内团结,他们想把诺沃提尼同志交给肆无忌惮的大学生和教授。”<sup>50</sup>瓦·比拉克认为,胡迪克把自己凌驾于捷共中央主席团之上。

可以把第二个集团称为“党内改革派”。苏联驻布拉迪斯拉发总领事馆向莫斯科报告说,胡迪克认为,这一派的领袖人物是经济学家奥·希克和他的追随者奥·切尔尼克、德·科尔德、亨德里赫<sup>51</sup>。

最后一个集团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斯洛伐克帮”。安·诺沃提尼在60年代初削弱地方权力的做法使斯洛伐克的机构处在完全受布拉格中央各个部和部门制约的状态<sup>52</sup>,斯洛伐克人对此愤愤不平。斯洛伐克的作家抱怨说,最高法院的领导层中没有一个斯洛伐克人,派到国外的318名医生中斯洛伐克人只有14名。还有一件事虽然不算什么大事,但是也刺痛了斯洛伐克人的心:据布拉迪斯拉发的一些作家说,诺沃提尼的儿子领导的专门从事买卖艺术品和工艺品的“阿尔迪亚”公司收购的艺术品中,捷克人创作的占99%,斯洛伐克人创作的只占1%<sup>53</sup>。安·诺沃提尼本人认为,“斯洛伐克帮”的领袖人物是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安·诺沃提尼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中的地位总的来说是稳固的,但是不足以确保他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位置不受动摇。按照德·科尔德的话讲,主席团分成两半:五比五。在中央全会上,大部分代表反对安·诺沃提尼。科尔德、亨德里赫、切尔尼克、杜兰斯基和考茨基等人提出必须让诺沃提尼下台,他们的这一立场得到了瓦·比拉克的支持。他们都坚持不能由一人同时担任中央第一书记和捷克斯洛伐克总

统两个职务的观点。

支持诺沃提尼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只有两名——西穆涅克和胡迪克。除此之外,诺沃提尼还得到了国防部党委的坚决支持。国防部党委在致中央全会的决议中说:“国防部党委对在执行捷共中央1967年10月通过的决议方面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观点深感忧虑,这些观点导致捷共领导层发生变动,破坏全党的思想和组织统一。”决议要求中央全会考虑这些意见。<sup>54</sup>

272 但是,大部分中央全会参加者要求党政第一把手不能由一个人担任。在中央全会的会场外,代表们私下里都在议论谁可以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问题,杜布切克、巴尔比雷克、亚尼克、萨多夫斯基认为,奥·切尔尼克是第一号人选。他们不排除“捷克同志们”推选亚·杜布切克当候选人的可能性,但是由于杜布切克是斯洛伐克人,当选的可能性不大。他们的这种意见得到了德沃尔斯基和博加的赞同。除了切尔尼克和杜布切克以外,捷克民族议会议长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捷共中央书记阿·英德拉也被视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可能竞争者,他们俩“尽管有点儿教条,但他们是忠诚于党的事业和忠于苏联的可靠和正派的活动家。”

这一次捷共中央全会以通过不由一人担任党政最高职务的决定告终。1968年1月5日,亚·杜布切克被宣布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安·诺沃提尼仍然是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不过当总统的时间不长)。

勃列日涅夫打电话祝贺杜布切克当选第一书记,并邀请他正式访问莫斯科。杜布切克在接受这一邀请时提出,在正式访问之前,先以个人的名义去一趟莫斯科“就某些问题进行协商”。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的密切交往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作者认为,勃列日涅夫之所以与杜布切克过往甚密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必须对杜布切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这件事负责到底,从而对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全年的事态发展产生了众所周知的影响。

1968年1月1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第一次审议与捷克

斯洛伐克有关的问题。勃列日涅夫在介绍他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交谈的情况时,捎带谈到了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他说:“关于捷共中央全会……哥穆尔卡同志担心发生某种意想不到的变化,希望我们帮助杜布切克,使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无论在国内事务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都能继续奉行一贯的方针<sup>55</sup>。”勃列日涅夫还介绍了他同杜布切克通电话的情况。<sup>56</sup>

勃列日涅夫讲完话后,苏联驻捷克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开始报告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他首先指出:

“在捷共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大使馆多次通过写报告和打电报向国内报告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从我们报告中可以看出,这种局面是迟早要出现的。大使馆自始至终都是根据可靠的情报来源向国内报告的。”<sup>57</sup>

契尔沃年科大使在评价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说:“第一,局势还在发展,情况错综复杂。”他认为,捷共中央全会选出了第一书记说明这个党是团结的。他指出,这一次捷共中央全会上谈到了中央集权领导软弱无力、意识形态战线形势不容乐观和民族矛盾尖锐等问题。契尔沃年科大使说:“批评诺沃提尼处理问题缺乏灵活性,指责他教条主义,这都是正确的。但是也有人企图浑水摸鱼,动摇党的根基,修正党的基本立场,否定党在捷克斯洛伐克推行的方针路线的基本方向……关于干部问题……当然,西方国家希望罢免列纳尔特(捷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主席),谁来取代列纳尔特呢?显而易见,切尔尼克。”

他认为,这一次捷共中央全会的主要成果是“防止了党可能产生的分裂,这是因为苏联共产党、我们的党中央……进行了及时干预,特别是勃列日涅夫同志在中央全会召开前去了一趟捷克斯洛伐克。”<sup>58</sup>契尔沃年科大使指出,“杜布切克目前信心不足……杜布切克同志无疑是个诚实的人,是苏联的忠实朋友。”<sup>59</sup> 273

契尔沃年科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同捷共新领导人联系的建议,认为最好邀请杜布切克正式访问莫斯科,派遣一个“高级别的代表团”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参加2月份举行的庆祝共产党人执政20周年,认真

研究加强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合作问题。

这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还讨论了苏联和罗马尼亚友好合作和相互帮助条约草案的起草问题。罗马尼亚政府坚持认为,必须对条约草案的第7条进行修改,写进“只有在帝国主义国家或帝国主义国家集团进犯的情况下”才能实施联合军事行动,以排除利用罗马尼亚的军队对付某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可能性。勃列日涅夫评论说:“这实际上是暗指中国,暗指苏联可能与中国发生冲突。”外交部副部长列·费·伊利乔夫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证实说,罗马尼亚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不过,后来很快就发现,罗马尼亚的用意还在于避免利用罗马尼亚的军人参与华沙条约国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行动。

人们很容易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发生的变化和诺沃提尼被免去第一书记职务同赫鲁晓夫下台联想起来。1968年2月,苏共中央收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博什克维查市党代会代表联名写的一封信,信中对“1964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坚持原则立场表示感谢,这种立场鼓舞我们克服党内的主观主义”。<sup>60</sup>

这一次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的行动全部付诸实施——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的个人接触继续进行,其中包括通过电话进行接触,苏联派遣一个高级别的党政代表团在2月份访问了布拉格。1968年3月初,在索菲亚举行的筹备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协商委员会会议上,杜布切克与勃列日涅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进行了多次会晤。

### **“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很像当年的匈牙利”**

1968年2月份和3月初,无论苏联、捷克斯洛伐克或者“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政治局势普遍恶化。波兰大学生闹学潮是第一个令人不安的信号,这次学潮打出的一个主要口号是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波兰大学生把安·诺沃提尼被免除第一书记职务视为对斯大林主义残余的胜利,把捷克斯洛伐克取消新闻检查制度视为一件



大事。

苏联同罗马尼亚的关系也是在这一段时间中开始恶化的,罗马尼亚随时可能退出华约组织。1968年3月3日,苏联国防部长安·安·格列奇科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现在已经十分清楚,他们(指罗马尼亚——作者)开始重新审视整个华沙条约……我们的司令部(指华约组织武装部队联合司令部)是很有战斗力的,如果罗马尼亚退出,华沙条约不会受到任何损害。”<sup>61</sup>

捷克斯洛伐克报刊批评华沙条约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种种迹象表明,捷克斯洛伐克有步罗马尼亚后尘的危险,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也退出华约组织,将导致华沙缔约国的西线空虚,或者至少大大削弱。

在苏联,国内意识形态形势日趋严峻,正统的共产主义信念开始发生动摇。经常制造麻烦的二次大战杰出军事家朱可夫元帅不仅在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时期不受欢迎,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也不受欢迎。在1968年3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怒气冲冲地对他的政治局战友们说:“最近我们这里冒出了许多回忆录……例如,有人在回忆卫国战争时期时胡说八道,他们对一些文献资料进行歪曲和断章取义……这些人的资料是从哪里搞来的?为什么我们现在对档案的管理如此松懈?”

格列奇科说:“……我们会查清这个问题的。关于朱可夫的回忆录,我们很快会写出结论的,那里面有不少不应该写进去和有害的内容。”

另一个让中央领导人心烦的回忆录作者是曾经地位显赫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他写回忆录的事是安德罗波夫报告的,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听到后先后发了话,于是决定由“安德罗波夫负责这件事。对赫鲁晓夫写回忆录的事加强监视,没收他的材料。过些日子把他叫到苏共中央,让他停止这项工作。”<sup>62</sup>

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日趋活跃。勃列日涅夫在3月3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形形色色的作家,例如亚基尔、叶赛宁,还有其他一些作家,把许多事情全给抖搂出来。他们写的东西到了国外,BBC广播

电台播发了……”波德戈尔内插话说：“应该查一查作家协会，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组织。作协也有人在报纸上发表这一类的文章。”安德罗波夫说，有人正在筹备“声援利特维诺夫”的游行示威。波德戈尔内建议说：“应该想些办法，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把这一号人赶出莫斯科，从哪里来的就把他们送到哪里去。”<sup>63</sup>会上对这个问题展开了积极讨论，勃列日涅夫不同意波德戈尔内的意见，他认为不宜采取惩办措施，而应该采取对知识分子施加影响的措施，“想办法把可能给我们带来严重危害的‘病菌’消灭在萌芽状态”。勃列日涅夫说：“知识分子是个严重问题，不能简单采用行政措施解决。我们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即便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和建立后的最初年代也是如此。对于某些知识分子，比方说作家，我们历来是采取鼓励的办法。所以，我们应该多往这方面想一想，比方说，成立文学艺术研究院，选择一些合适的人，为他们创造工作条件。”

会议没有深入讨论成立文学艺术研究院的问题，但是决定在政治局内部成立一个意识形态工作小组，负责处理一些刻不容缓的事务，小组的成员包括基里连科、谢列平、佩尔谢、杰米契夫和安德罗波夫……<sup>64</sup>

在2月份和3月初，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势也开始恶化。这个国家基本上已经停止实行新闻检查。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兹德尼克·姆利纳日在他的《来自克里姆林宫的严寒》一书中写道：“开始公开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工会、国家安全机关和司法机关，一些中央书记、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人、内务部长和总检察长被撤职。”<sup>65</sup>捷共领导层内部的矛盾使局势进一步恶化，诺沃提尼的反对者们的目标很明确——让他连总统也当不成。各种政治力量在反对诺沃提尼的旗帜下联合起来，纷纷举行群众集会，要求诺沃提尼下台。

1968年3月15日，捷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个问题，局势因此更加紧张。从讨论的过程可以看出，莫斯科不同意罢免诺沃提尼的总统职务。苏共领导人同波兰领导人瓦·哥穆尔卡和匈牙利领导人亚·卡达尔的磋商也在紧张进行，因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同波兰大学生

闹学潮密切相关。从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简报》中可以看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态度也是在1968年3月15日这一天突然发生变化,政治局原先对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持谨慎态度,现在变成了赤裸裸的敌视,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取消了新闻检查,捷共领导层中亲苏派势力受到了削弱。政治局一致认为必须马上发出一封致捷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公开信,尼·维·波德戈尔内建议在公开信中“指出他们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放纵行为,指出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阵营、脱离苏联的危险倾向,这一点必须明确指出……还必须指出,他们现在已经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站在一起了……”1956年参与镇压匈牙利起义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说:“形势确实很严峻,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很像当年的匈牙利,表面上看乱七八糟……其实有章可循。匈牙利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后来组成了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最后是社会民主党人。”勃列日涅夫认为,“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杜布切克身上,他也可能被撤职,因为他很难控制住局面……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他们罢免了诺沃提尼的总统职务以后,还会搞掉总检察长、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然后该轮到洛姆斯基(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作者)了,再往后该找杜布切克算账了。”

勃列日涅夫在这次政治局开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期间曾经离开会议室给杜布切克打了个电话,然后返回会议室,把打电话的情况告诉大家。勃列日涅夫说,杜布切克在电话中告诉他说:“我们这里,无论布拉格或者整个国家,都不会发生像波兰那样的事情,需要帮助他们……我们有能力应付我们这里发生的事情。”

276

勃列日涅夫在电话中告诉杜布切克,苏联方面准备给捷共中央写封信;他们在电话中也就卡达尔和杜布切克会晤的事达成了一致(卡达尔在1968年一直扮演苏共中央和捷共中央联络员的角色,相关的书籍似乎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此外,还就苏共和捷共领导人会晤一事达成了一致。

但是,局势继续迅速恶化。诺沃提尼在大规模群众集会要求他辞去总统职务后递交了辞呈。诺沃提尼本来准备发表电视讲话,讲话稿

都写好了。他在讲话稿中提到了他同斯姆尔科夫斯基之间的争论,诺沃提尼严厉指责斯姆尔科夫斯基在12月份和1月份没有调动安全机关的力量对他进行保护<sup>66</sup>。但是,诺沃提尼的讲话稿没有被电视台播放。

3月20日,同比拉克的交谈记录被呈送莫斯科。比拉克认为,“中央领导人控制不住党和国家的局面……诺沃提尼的一派人偏左,斯姆尔科夫斯基的一派人偏右,杜布切克疲于从中斡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和所有劳动者一样,要求成立联邦制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比拉克还说,被推举为总统候选人的还有:卢·斯沃博达,约·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具有英雄兼苦行者光环”的古·胡萨克<sup>67</sup>。

诺沃提尼被免去总统职务,一些主张奉行亲苏方针的人纷纷落马,莫斯科勃然大怒,忧上加忧。1968年3月2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制定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具体措施。勃列日涅夫首先发言,他详细回顾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在1967年冬天和1968年春天的关系发展情况,以证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恶化和捷共中央控制不了局面。勃列日涅夫说,他同杜布切克有过多次接触,杜布切克总是说“他们那里平安无事,事情还没有发展到有人上街游行的地步”,然而实际情况是不断发生“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其中许多集会和游行具有明确的反苏性质。事情越来越明朗,制造这些事件的不是捷共中央,而是斯姆尔科夫斯基、希克和其他一些有怨气的人。显而易见,他们的目的是最终把诺沃提尼、列纳尔特、洛姆斯基等同志和其他一些苏联的好朋友拉下台。”勃列日涅夫还说,杜布切克请求他并请契尔沃年科大使转告苏共中央政治局,请不要把那封信发给捷共中央,因为那样可能使杜布切克的日子不好过。勃列日涅夫表示同意,所以没有让这封信发出去。

277 勃列日涅夫这样说显然是为了证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将如同他所预见的那样发展。

勃列日涅夫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深感忧虑,“保加利亚日夫科夫同志,波兰哥穆尔卡同志,匈牙利卡达

尔同志,他们向我们提出了请求,希望苏联共产党采取某些措施,干预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但是他们没有说应该采取哪些具体措施,最近这些日子,我们每天都在进行谈判。”最后商定在民主德国德累斯顿同捷克领导人举行一次会晤,参加会晤的除了苏共中央和捷共的代表团以外,还应该有民主德国、波兰和匈牙利的代表。日夫科夫和苏联领导人认为,保加利亚也应该派代表参加。

勃列日涅夫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十分复杂,必须专门召开苏共中央全会进行讨论,为此他建议推迟召开讨论农业问题的例行中央全会,在4月份专门开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和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所应吸取的教训。勃列日涅夫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以后,我们无论在政治或经济领域都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我国的各个领域仍然出现了不能不让人忧虑和警觉的现象和问题。我们国家也有形形色色乱嚷嚷的人,特别是那些知识分子和大学生,当然,不是所有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而是某些地区的一小撮人,例如,在利沃夫、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就有这样的人,而在西伯利亚、乌拉尔、顿巴斯就没有这种现象。”勃列日涅夫要求改进意识形态工作,开展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事件的宣传运动。

会议参加者在讨论中情绪都很激动。

柯西金说:“……他(杜布切克)现在心乱如麻,喜怒无常,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太幼稚,例如,你问他:‘你们军队的情况如何?’他回答说:‘我们的军队情况正常……因为大部分师长是我的熟人’。

你问他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情况怎么样,他也回答说完全正常,可是没有过几天就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撤职。

你问他:‘您现在依靠主席团里的什么人?’他回答说:‘坦率地说,我不知道谁可以依靠。’我觉得,他对诺沃提尼心怀不满。看来,现在没有人能救得了诺沃提尼……依我看,捷克斯洛伐克准备仿效当年的匈牙利,但是目前他们还不敢轻举妄动。”柯西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之后将出现波兰事件”。

在评价勃列日涅夫所做的工作时,柯西金语意双关地说:“我认



为,我们的政治局和勃列日涅夫同志个人的功劳不可磨灭。我们都很冷静,都满怀信心,齐心协力使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问题往好的方面发展。不过,大家也都看到了,事情做得不彻底。”

278 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 П·Е·谢列斯特抱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乌克兰局势产生了不良影响。他说:“尽管我们那里比较闭塞……但是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事情还是通过各种渠道在人们中间传播……”他举了几个具体例子说明捷共对乌克兰党组织的不良影响。谢列斯特最后得出结论说:“事情关系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关系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命运。必须加紧利用和寻找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有关方面应该加紧开展工作,还应该采取一些军事方面的措施。”

波良斯基对勃列日涅夫所做的工作表示支持。他说:“我认为,迄今为止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不过,在同他们会晤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可以直截了当提出来,哪些是微妙问题,例如人事安排问题……波兰也有让我们操心的问题。不把这些事情向人民和党公开是正确的。应该直接同他们谈,多了解一些情况。”

谢列平在讨论过程中建议利用各种方式向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施加压力。他认为,可以让亚·卡达尔向捷克人讲述 1956 年匈牙利事件造成的后果。谢列平说:“应该明确表态,我们不会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让给任何人,杜布切克看来是个昙花一现的人物。应该表现出强硬态度,这是正确的,不过也要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走。”谢列平建议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工厂、党组织和各个城市中积极开展工作,对捷克斯洛伐克社会各阶层施加影响。他继续说道:“应该做好采取极端措施的思想准备。是的,我们看来是救不了诺沃提尼了,但是诺沃提尼、列纳尔特、洛姆斯基他们这些人暂时还在台上,可以让他们在中央全会召开之前向我们提出给予帮助的请求,这样我们就有出面帮助的理由。应该帮助他们,这一点很清楚,这种帮助将使所有的人头脑清醒一点,首先是我们的敌人。”

谢列平也像勃列日涅夫和谢列斯特那样强调指出,应该特别注意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可能给苏联带来的意识形态后果,注意大学生“听

美国之音,酗酒,瞧不起社会科学”的倾向。他建议尽快通过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决议。

杰米契夫在发言中对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的力量配置情况进行了分析。他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分为三类: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科尔德为一类,照杰米契夫的话讲,这三个人喜欢讲时髦的话,搞时髦的改革;列纳尔特、戴维、诺沃提尼——实际上已被粉碎;斯姆尔科夫、希克等人——大搞复辟活动,是最危险的敌人。杰米契夫最后说道:“我们不要害怕被人指责干涉内政,现在这种话早已经不时兴了。波兰的局势正在按照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发展。”

苏共中央书记米·谢·索洛缅采夫只讲苏联国内一些值得注意的动态,例如,一些知识分子,特别是科技界知识分子和一些作家有抵触情绪,防止一些事情演变成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他说:“报刊上对审判金兹堡等人的报道不全面。应该把社会机体上的一些脓包消灭在萌芽状态。”他支持谢列平关于尽快通过意识形态问题决议的建议。

安德罗波夫认为,“我们还应该制定军事方面的具体措施,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漠然置之,哪怕有几条措施也好。” 279

3月21日的政治局会议证明,莫斯科的苏共领导人对杜布切克能否遏制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党和反苏情绪蔓延的疑虑越来越大,他们十分担心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波及“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首先是波兰和苏联,这种疑虑和担心决定了苏共代表团在德累斯顿会晤期间所持的立场。苏共中央根据这一次政治局会议的讨论结果向全国党的积极分子下发了一份材料,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目前情况十分复杂,矛盾重重”<sup>68</sup>。

3月23日在德累斯顿举行了会晤。捷共领导人在这次会晤中被告知,苏联共产党对捷共活动的主导思想不理解,批评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刊、电台和电视台……失去控制”,由于媒体大肆抨击,“党和国家许多久经考验的干部”被撤职,其中在莫斯科学习过的人占80%,大量的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被罢免。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也开始变质,有些军人参与了群众集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先推行的外

交政策的基础被毁坏。

其他国家共产党代表实质上持同样的立场。德累斯顿会晤是华约组织大部分欧洲成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第一次联合表态。

4月9—10日匆忙筹备和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重申并确认了政治局的这种立场,这次中央全会的主旋律是:“我们绝不把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交出去”。

## 确定立场

4月份,各方的立场逐渐趋于明朗化。4月4日,捷共中央批准了《行动纲要》,如果认为这是所谓改革派的《行动纲要》未免有点儿天真,它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党政上层人物的利益,怪不得斯洛伐克第一书记瓦·比拉克毫不难为情地说:“赞成《行动纲要》的人是我们的朋友,反对《行动纲要》的人是我们的敌人。”<sup>69</sup>

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一开始对待《行动纲要》的态度不尽相同。在德累斯顿会晤期间,波兰领导人瓦·哥穆尔卡对《行动纲要》草案提出过批评,但是,《真理报》4月12日刊载了《行动纲要》的部分内容。4月18日,匈牙利领导人亚·卡达尔公开表态,赞成捷共中央采取的行动。

卢德维克·斯沃博达将军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候选人也是一个给人以希望的信号,莫斯科无疑认为,较之竞选总统的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是更加合适的总统候选人。莫斯科举办德累斯顿会晤的本意在于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施加影响,塔斯社在4月3日即在德累斯顿会晤以后,转发了亚·杜布切克在捷共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可见各方都在寻找共同点。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政治局势却向着另一个方向发展。

4月份,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继续猛烈抨击共产党,捷共内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对抗仍在继续,与此同时,反共运动甚嚣尘上,一些反共组织开始公开行动。4月份下半月,报纸上出现要求把过去参

与镇压的人清除出党的文章,这种要求得到了部分社会舆论、首先是青年的支持。如果满足这种要求,可能产生难以预测的后果。在战争年代同苏联地下工作者合作,参与实现社会主义在捷克斯洛伐克取得胜利,40年代末50年代的政治镇压,出于阶级斗争的信念参加各种政治运动——所有这一切都可能被视为参加镇压行动。如果满足这种要求,捷克斯洛伐克的整个政治制度有毁于一旦的危险,直接危及几乎所有党和国家上层人物的政治生命。

1968年4月26日,作家埃·戈尔德斯图克和亚·普罗哈兹基在捷克斯洛伐克军官之家发表演讲,全面否定1948年2月以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发展历程。戈尔德斯图克把苏联称做“典型的专政国家”,把波兰起义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相提并论,照他的话讲,都是为了争取自由。

亚·普罗哈兹基补充说,约·帕维尔将军当外交部长候选人不合适,因为“他与过去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有关系”。这位作家在评论50年代政治诉讼案的责任人之一扬科将军自杀一事时说,后者“是一个诚实的人”。但又不怎么高明地开玩笑说道:“我可没有说要把总参谋部的人都枪毙。”<sup>70</sup>

## 五月军事演习

5月4日,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比拉克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参加会晤的有勃列日涅夫、波德戈尔内、卡图谢夫和鲁萨科夫。在这次会晤中,杜布切克等人(他们不久就成为苏共的政敌)对勃列日涅夫说:“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局势的发展超出了纯属我国内政的范围,并已经波及兄弟国家,例如苏联。”<sup>71</sup>双方的会晤持续了很长时间——九个小时。莫斯科对这次会晤的结果很不满意。

281

勃列日涅夫在5月6日举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和我本人同杜布切克同志有过多谈,给人的印象是,他说一套做一套,尽管他经常说话模棱两可,不具体。”勃列日涅夫说,他曾经劝杜布

切克要注意保留干部,但是杜布切克却把干部从下到上换了个遍,使“党没有人领导”。在谈到捷共中央制定的“行动纲领”时,勃列日涅夫厉声说道:“我觉得,我们大家大概也都认为,这是一个为在捷克斯洛伐克复辟资本主义提供可能性的不好的纲领……空话、漂亮话一大堆,小资产阶级情调。”

勃列日涅夫说,斯姆尔科夫斯基在这次会晤中说话不多,他发言的主要内容是谴责过去进行的镇压。勃列日涅夫在谈到双方在会晤中争论的问题时说,他是第一次见到斯姆尔科夫斯基的,给他的印象是,这个人个性很强,办事认真,但是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勃列日涅夫说,他看不出斯姆尔科夫斯基的发言中有任何积极的建议。苏共中央总书记对切尔尼克的发言评价不高,认为切尔尼克说话语无伦次,尽说些无法兑现的许诺。

勃列日涅夫对比拉克的评价最高:“能感觉到他对国内的现状和局势发展忧心忡忡。例如他说,事态的发展可能危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成就,所有民主党派趾高气扬……”

勃列日涅夫最后说道:“今天我们召开了军事会议,讨论了一些问题,其中包括讨论应对目前局势的具体措施。首先,我们准备通知他们,我们将派出一个以科涅夫元帅和莫斯卡连科元帅为首的、由20—25名元帅和将军组成的代表团前往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庆祝胜利日活动……我们还讨论了其他一些措施,具体内容我稍后再给大家介绍。”

柯西金对勃列日涅夫的讲话进行了一些补充,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想组建一个新党,组建一个资产阶级的党,建立资产阶级的秩序。”

柯西金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提出用黄金做抵押借款5亿卢布的请求具有挑衅的性质,“他们明知我们不会借钱给他们还这么说,故意耍我们”。

282 苏联方面参加会晤的另一个领导人(波德戈尔内)介绍了他同斯姆尔科夫斯基交谈的情况。波德戈尔内问他:“你们那里出现了这么多的政党和‘俱乐部’,你们能容忍吗?”,斯姆尔科夫斯基答道:“关于



‘俱乐部’我是一个星期前才知道的。关于政党活动的事，我是一个月前才知道的。”波德戈尔内说，斯姆尔科夫斯基向他保证说，他们将大力整顿秩序，捷共中央主席团下决心控制住报纸。但是，斯姆尔科夫斯基一再强调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特殊，那里存在着许多特殊性。

讨论结束后，勃列日涅夫建议说，必须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搞一次军事演习，向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施加压力。勃列日涅夫说，在演习过程中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引起资产阶级国家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提出抗议，“那又怎么样，我们也不是第一回这么干。要想保住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也只有这么干了，不能让他们小看我们。”

勃列日涅夫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所谓健康力量进行了如下排名：“第一——英德拉，第二——科尔德，第三——比拉克，第四——萨多夫斯基，第五——切尔尼克。”

勃列日涅夫的建议得到了政治局全体成员的支持。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在谈到把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集中到莫斯科开会一事时说：“反革命活动越来越猖獗，如果捷克斯洛伐克步罗马尼亚的后尘，华约组织就有崩溃的可能。”政治局会议接着讨论了一些细节问题，决定派谢列斯特同比拉克接触；马祖罗夫呼吁不要犹犹豫豫。波良斯基说，如果杜布切克在捷共中央全会上被免职，局面更不好收拾。他认为，华约其他国家的军队也要介入。谢列平对此表示同意，为此他建议把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第一书记和政府首脑召集到莫斯科，他认为，必须尽快开始行动。<sup>72</sup>

5月8日，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5月13日，国防部长安·安·格列奇科、华约联合部队总司令И. И. 雅库鲍夫斯基向苏共中央递交了苏联军事代表团准备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政治局会议制定的措施开始付诸实施。

5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这一次讨论的问题与阿·尼·柯西金即将访问布拉格有关，中心议题是柯西金要不要同杜布切克会晤，也就是说，要不要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

会面,因为这涉及今后还要不要在政治上信任他。

283 此外还讨论了另一个问题:捷克斯洛伐克还存在不存在健康的领导核心?它由哪几个人组成?勃列日涅夫认为,他们是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列纳尔德,斯姆尔科夫斯基“在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波德戈尔内表示怀疑,他说:“我们在这里把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同志视为健康的力量、健康的核心,但是他们是怎样评价杜布切克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呢?他们说,杜布切克讲得很好。我当然不是说他们几个人有什么问题,他们也可能是身在其中不得已而为之。”

杰米契夫打断了他的话。杰米契夫说:“他们这几个人一再声称要自己的社会主义模式,所以我觉得他们推行的是一条和我们对着干的路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武力解决问题。”柯西金同意对杜布切克给予否定的评价,但是他又说:“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这几个人团结不团结?他们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行动计划?这些问题只有通过和他们交谈才能搞清楚。”关于军事演习和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问题,柯西金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调去了军队,下一步怎么办?这个问题我们也不清楚。这个问题在这里是解决不了的,只有在那里,多半是同他们、同这些健康力量一道才能解决。应该利用一切可能性吓唬一下杜布切克……主要的一点是要预见到如何结束。如果能查明他们这几个人确实属于健康的力量,就可以同他们一道工作……”

但是,政治局的大部分成员不同意柯西金的意见。安德罗波夫说:“不排除同他们一道工作的可能性,但是我认为要作派兵的打算。”乌斯季诺夫说:“时不我待。杜布切克还在欺骗我们,如果我们等到捷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那就为时已晚……必须做好使用军事力量的准备。”

勃列日涅夫总结说,看来用不着同杜布切克会晤(本来计划同杜布切克会晤),应该争取让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同意搞演习。如果他们同意,“那我们就以另一种方式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进行军事演习的事就这样定了下来。由一些高级将领组成的代表团抵达捷克斯洛伐克,几个苏联元帅同捷克斯洛伐克政界最高领导人

举行了多次会晤。苏联驻捷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向苏共中央报告这个代表团的访问情况,他的结论是:“我国军事代表团的访问有助于捷克斯洛伐克朋友相信苏联不会干涉他们的内政,真心实意提供必要的帮助……”

5月23日,安·安·格列奇科向政治局报告苏联军事代表团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访问结果。他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已经瓦解,命令得不到执行,许多军人参加群众集会,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队报》宣布独立,驻扎邻近联邦德国边境地区的几个陆军师的齐装满员程度仅为40%到50%。经过讨论后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小组——应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行动小组,其成员包括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佩尔谢、谢列平、马祖罗夫、鲁萨科夫、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和叶皮谢夫。<sup>73</sup>

5月26日,勃列日涅夫把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德国统一社会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的情况通知杜布切克。

5月27日,柯西金向政治局报告他的捷克斯洛伐克之行情况。柯西金说,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和他原先的预计和他原先在政治局会议上所坚持的看法完全不一样,他得出的最重要结论是:“这个国家除了现存的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以外,没有能够控制局势的其他政治力量。”因此,他现在对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领导人的力量配置有了另一种看法。他把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分为三种人,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斯沃博达属于第一种人;科尔德、比拉克、什特劳加尔属于第二种人;克里格尔、齐萨日、斯拉维克等是第三种人。柯西金认为,“第一种人和第二种人没有多大区别,他们对局势的看法相差不多,提出的问题大致相同,但是第二种人主张采取更加坚决的行动,不过这两种人对一些原则性问题的看法基本上是一致的。”柯西金的结论是:“根据各方面分析,目前这个党和国家还没有比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沃博达更有威望的人,所以,我们应该酌情开展工作。”

不难看出,柯西金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估计开始接近于勃列日

涅夫。

柯西金还说,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到处都在指责诺沃提尼态度傲慢,搞阴谋,人们普遍厌恶他。

柯西金和勃列日涅夫显然都寄希望于1948年2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在苏联支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粉碎资产阶级政党的局面再度在这个国家出现。

柯西金在评述捷克领导人时对斯姆尔科夫斯基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在莫斯科之行以后“始终坚持了原则性立场”。柯西金说,莫斯科到处在传说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存在着矛盾,他认为这种传说没有根据,他们俩不存在任何矛盾。他同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交谈过几次,杜布切克一再表示他寄希望于捷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如果决议顺利通过,他就可以放手去做。杜布切克还表示,希望得到苏联军队的帮助。

285 柯西金最后指出,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复杂社会政治局面不是十几个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造成的,而是阶级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无论杜布切克或斯姆尔科夫斯基都不是苏联的敌人……在柯西金的报告即将结束的时候,有人请勃列日涅夫去接电话。

电话是谢列斯特打来的,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他在斯洛伐克同比拉克交谈的情况。比拉克请谢列斯特转告莫斯科,“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国家的秩序不能得到恢复,我们这些人将被全部撤职,连我们的‘教主’(指杜布切克——作者)也会被撤职……我们大家,斯洛伐克人和俄国人,只好再一次为解放捷克斯洛伐克而斗争。”他请求莫斯科方面在形势恶化的时候把他的一家人接到苏联的乌日哥罗德居住。比拉克表示“准备为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斗争到底”,希望苏联领导人不要错过时机,“我们斯洛伐克人全力支持这一事业”。比拉克还说,捷共领导层内存在着“另一个中央”。

勃列日涅夫认为,比拉克看问题比较切合实际。柯西金的汇报到此结束。

## 政治解决或军事解决

6月4日,通过外交渠道同比拉克又进行了一次交谈。这一次比拉克详细讲述了捷共领导层的情况,并且特别提到了所谓的布拉格中心。他认为,布拉格中心由希克、什帕切克、齐萨日、克里格尔、帕维尔等人组成。后来,捷共中央政治组织部部长科拉日和国家行政机关部部长普尔赫利克也加入了该中心。这些人多次在捷共中央委员会办公楼齐萨日的办公室内召开会议,商讨如何损害杜布切克的威信。

比拉克建议说,首先找两个或三个人讨论局势,如果找两个人,就找亚·杜布切克和瓦·比拉克;如果找三个人,就再加上一个杜布切克和比拉克“两个人都完全信任”的奥·切尔尼克。然后多找几个人——弗·巴尔比雷克,什·萨多夫斯基,伊·列纳尔特,阿·英德拉等。比拉克说,国防部长楚尔和民警机关“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召开期间或召开后……有可能采取行动,使党和国家免遭分裂”。他还说,除此之外,杜布切克拥有约一万名最忠实的士兵和军官,只要杜布切克“按一下电铃”,他们就会进入战斗准备状态<sup>74</sup>。

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继续不断恶化。让苏联当局担心的还有一种倾向——在捷克斯洛伐克军队领导层中,要求重新看待捷克斯洛伐克在华约组织中地位的声音越来越响亮。首先提出这种要求的是军事社会研究所、以克·哥特瓦尔德的名字命名的军事政治学院和以普尔赫利克将军为首的捷共中央军事行政机关部。

286

这三个单位在5月底向捷克斯洛伐克政界最高领导人提交了两份备忘录,一份备忘录“阐述军事领域的国家利益”<sup>75</sup>,另一份备忘录提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行动纲领》<sup>76</sup>。这两份备忘录的编写者认为,国家防御能力的现状令人堪忧,追随苏联的政策,把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作为与北约对抗的华约武装力量的一部分,捷克斯洛伐克在华约组织中处于不平等地位。在题为《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军行动纲领》的备忘录中指出:“可以把军事建设中的反常现象概括为:照搬苏联的



模式,它来源于按照统一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方针。”<sup>77</sup>

这份备忘录提出了如下保卫捷克斯洛伐克的军事构想:

——华约框架内的国家防御面临在不久的将来华约被双方或单方解散的危险;

——以谋求中立确保国家安全;

——捷克斯洛伐克参加区域集体安全机构;

——国家自卫<sup>78</sup>。

不难看出,这些军事构想的出发点是根本改变捷克斯洛伐克同华约和苏联的关系。葛罗米柯关于华约面临瓦解威胁的预言开始应验。

在整个6月份,苏联方面继续同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频繁接触。6月6日,契尔沃年科大使同杜布切克举行会晤。6月8日,勃列日涅夫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文化部长、捷共中央候补委员博·赫努佩克。6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进行一次秘密会晤。6月13日,勃列日涅夫向政治局汇报他同亚·卡达尔讨论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情况。

布拉格的局势进一步恶化。6月20日,人民警察积极分子大会通过了致全国人民公开信。6月21日,《真理报》<sup>79</sup>报道了这一消息,6月22日,《真理报》全文发表这封公开信。莫斯科方面认为,这封公开信具有特殊意义。可以断定,莫斯科寄希望于动用警察对付“右翼”工人纠察队,使1948年2月的事件在1968年重演。此后,全国各地许多基层党组织的电报雪片般飞往布拉格,对亲自指挥人民警察的捷共中央第一书记亚·杜布切克<sup>80</sup>表示支持。可想而知,这场声援运动是苏共中央发动的,其目的是向杜布切克施加压力。

287

然而,1948年2月的事件并没有在1968年重演。

苏共中央拟制了一份题为《关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和罗马尼亚领导人采取的某些外交步骤》的文件,下发全国所有党组织,要求各地进行讨论。特别要求乌克兰和莫斯科的党组织认真讨论,因为这些地方受捷克斯洛伐克思潮影响最为严重,并要求把讨论情况上报苏共中央。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瓦·格里申亲自布置了两个讨论题:南

斯拉夫学潮的原因何在？波兰和南斯拉夫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如何？<sup>81</sup>

7月份，捷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谴责《两千句话》<sup>82</sup>的文件，形势陡然紧张，苏共中央开始就是否对捷克斯洛伐克内政进行干涉的问题争论不休。1968年7月2日，驻捷大使斯·瓦·契尔沃年科被紧急召回国内参加政治局会议。契尔沃年科在评价这一文件时说：“这说明斗争进入了新阶段，有人公然要求取缔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试图把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迄今为止捍卫的所有基本思想‘枪毙’，试图自下而上瓦解党的领导。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起到了极其不好的作用，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为右派分子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创造了有利条件……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同右派分子进行斗争。确实存在着另一个党中央，现在这已不成为秘密，其成员包括克里格尔、齐萨日、斯拉维克等，国家安全部长（原文如此——作者）帕维尔也算一个……”但是，契尔沃年科建议采用政治解决的方法，把以华约成员国进行军事演习为借口（“演习”的期限已经结束）部署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军队撤回。他对政治局成员们说：“……现在应该撤军了，因为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我们的军队还待在那里，是得不到捷克斯洛伐克人民支持的。目前人们对我国军人的态度还不错，但是继续待在那里就会引起他们反感。”

契尔沃年科的结论得到了被政治局专门派往布拉格研究形势的《真理报》总编米·瓦·齐米亚宁的支持。他说，杜布切克显然已经不知所措和毫无斗志，已经没有能力作出决断。齐米亚宁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经分裂，干部队伍涣散，200多名州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失业”。主席团成员不执行主席团的决议，主席团成员克里格尔在捷共中央主席团通过谴责《两千句话》文件的当天发表电视讲话，公开批评主席团的这一决议。勃列日涅夫补充说，杜布切克不仅自己拒绝在这一决议上签字，还“劝说”其他主席团成员不要签字。齐米亚宁也认为，必须赶快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苏斯洛夫和谢列平支持齐米亚宁的意见。

但是，大部分与会者不同意契尔沃年科的结论。波德戈尔内、佩尔

谢、姆扎瓦纳泽、谢列斯特、安德罗波夫坚持不撤走军队的观点。葛罗米柯主张保持强硬态度和尽快采取行动,他认为拖下去对苏联不利,因为“刚才格列奇科说,军队中有80%的人支持我们,但是不知道明天还有多少人支持我们。”葛罗米柯说:“现在已经显而易见,不采取武装干涉的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柯西金同意外交部长的意见。

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持谨慎立场。他说:“当务之急是要搞清楚,我们是否正确判断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我们的所有措施都取决于这一点。”勃列日涅夫实际上支持对捷克斯洛伐克施加压力的政治解决的意见。

第二天(7月3日),政治局继续开会,会议是在紧张的气氛中进行的。首先由勃列日涅夫介绍他同匈牙利领导人亚·卡达尔会晤的情况。根据这次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记录”,卡达尔坚决主张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军事和政治干预,他从勃列日涅夫那里得悉,苏共中央准备给捷共中央主席团写信后说,《两千句话》是“旨在推翻这个国家的苏维埃政权、瓦解共产党、把领导权拱手让给社会民主党人的反革命纲领。”他同意勃列日涅夫提出的关于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一同给捷共中央主席团写信的建议,并且认为“已经到了不得不占领捷克斯洛伐克的时候了,如果需要这样做就不要犹豫。”他还说,他们政治局准备讨论这些问题,他估计政治局会支持他的意见。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匈牙利方面参加会晤的还有福克、阿策尔、埃德里。福克似乎想说点什么,但是被卡达尔抢走了话头,福克脸色苍白坐在那里,一声不吭。”<sup>83</sup>

在这次会议休息的时候,勃列日涅夫给华沙的瓦·哥穆尔卡打了个电话,然后告诉政治局的其他成员说:“哥穆尔卡同志同意我们采取的措施,同意写信。他说他们政治局将开会讨论,并准备给捷克人写信。”哥穆尔卡同意原定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在波兰华沙举行。

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心怀敌意,这显然是由于捷克报纸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伊·纳吉命运的报道激怒了他。7月5日,卡达尔给勃列日涅夫写信介绍“处在危险之中的捷克斯洛伐

克的局势”，试图利用苏联的影响向捷克斯洛伐克报界施加压力。卡达尔还给杜布切克写了封信。

苏共中央的信发出以后，布拉格的报界如获至宝，按照杜布切克的话讲，“舆论一片哗然”。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通了电话，得悉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拒绝举行多方会晤，他们希望进行双边接触，首先希望同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接触。

勃列日涅夫勃然大怒，他对杜布切克说，拒绝多方会晤意味着苏共和捷共的关系进入了新阶段。杜布切克辩解说，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确实犯了错误，特别是发表了关于伊·纳吉的文章，有一些反苏的言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这种情况了……一切正常。”<sup>84</sup> 289

勃列日涅夫怒气未消，给哥穆尔卡打了个电话，把他自己同杜布切克电话交谈的情况告诉哥穆尔卡。据勃列日涅夫讲，哥穆尔卡说，不要指望杜布切克会说什么好话，多方会晤没有捷克人参加也必须举行。亚·卡达尔也同意在没有捷克人参加的情况下举行会晤，但建议勃列日涅夫首先同他们举行双边会晤。

在7月9日举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获悉捷共中央主席团拒绝参加华沙会晤。柯西金提请政治局成员们注意，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正在寻找支持：“他们马上倒向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他们说：‘现在我们并不孤立，我们三个一伙’。”这一次政治局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向比拉克、英德拉、科尔德、什维斯特卡提供支持。安德罗波夫在评论比拉克提出的行动计划时说：“事态已经十分严重，我们应该好好讨论。”

布拉格把那封邀请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参加华沙会晤的来函称为“五国请帖”，并将其视为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内政，这并非没有道理。冲突加剧，捷共中央主席团没有参加这次会晤。会晤开始前一天（1968年7月13日），莫斯科收到了捷共中央的回函，信中说：“捷共中央主席团一致决定，请你们（即苏共领导人——作者）研究可否在不久的将来在布拉格举行我们两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一级的会晤。”<sup>85</sup> 这表明捷共领导人当时的目的是拒绝同华约各国共产党领导人进行谈判，

只愿意同苏联领导人共同寻找解决危机的途径。

在7月14—15日举行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华沙会晤上,没有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参加。

整个7月份,苏联领导人忙于商讨对策,其中包括同所谓的捷克斯洛伐克领导层健康核心的代表人物进行多次接触。7月10日,契尔沃年科汇报了他同列纳尔特的会晤情况。7月11日,莫斯科再度收到关于布拉格力量配置的报告。报告中说,比拉克、里戈、科尔德同意参加华沙多方会晤,克里格尔、齐萨日、什帕切克、姆利纳日——反对。斯姆尔科夫斯基也不太同意,杜布切克和往常一样,遇到有争议的问题就持中间立场。值得注意的是,胡萨克在斯洛伐克的威望大增,特别是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此外,胡萨克没有同苏联大使馆和苏联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进行过任何接触,回避所有的会晤<sup>86</sup>。7月16日,莫斯科收到了波诺马廖夫关于他同比拉克交谈的情况报告。

莫斯科还收到了发自布拉格的坏消息。捷共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管理事务部部长报告说,苏联大使馆、苏联外交人员居住的别墅处在被监视之中,他们的所有会晤活动,包括到机场迎接客人都有人跟踪。他还警告说,捷共中央右翼分子准备在十四大前夕把大批党务工作者免职。

290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苏联境内的活动加剧。国家安全委员会定期向苏共中央报告居民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反应,并对事件的未来发展动向进行判断,供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参考。7月16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许多居民都认为必须派遣苏军“整顿那里的秩序”<sup>87</sup>。外喀尔巴阡地区有不少人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表示同情,并受到了要求言论自由的莫斯科大学学生的支持。

7月17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审议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全会一致认为“决不把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交出去!”这一次中央全会虽然没有对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进行任何重新评价,但是它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未来行动提供了“政治合法化”。

7月18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报告说,《法兰西晚报》报道了苏



军在捷克斯洛伐克边境集结的消息。

7月19日,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是否与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举行双边会晤问题。勃列日涅夫说,苏联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开始进入新阶段,他认为“形势对我们不利。布拉格正在等待齐奥塞斯库和铁托到访,那里的人都在谈论什么多瑙河会晤和多瑙河协议。”他提请政治局成员们注意,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正在寻求欧洲共产主义运动的支持,意大利和法国共产党建议召开欧洲会议,捷共中央的行为可能得到赞扬。勃列日涅夫作了一系列重要指示,首先他预计“捷克斯洛伐克的健康力量不会向我们寻求帮助”,由此他得出另一个结论:“不仅出现了新时刻,而且对我们的行动提出了新要求……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新问题:我们是坐视不管,听任我们的政治影响力丧失殆尽,或者采取极端措施?我们在中央全会上宣布,我们将采取一切取决于我们政治影响的措施,如果这样做不起作用,那只有采取极端措施了。”

勃列日涅夫明确表态说,他是向捷共中央施加政治压力的拥护者,他对采取“极端措施”持谨慎态度。柯西金对此表示同意,认为双边会晤能够成为施加政治压力的一种形式。

但是,政治局会议的许多参加者不同意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立场,他们都认为已经到了采取极端措施的时候。与会者展开了争论,他们都不好意思直接批评总书记,结果柯西金成了他们攻击的目标。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说:“我认为双边会晤用处不大,所以,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您用不着攻击我。他们现在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以杜布切克为首的右派分子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行动纲领。我们在准备,他们也在准备,而且准备得很充分。他们正在发动工人阶级,组织工人纠察队,准备对付我们。”<sup>88</sup>

柯西金反驳说:“安德罗波夫同志,我并没有攻击您,而是您在攻击我<sup>89</sup>。在我看来,他们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纲领,为了实现他们的明确目标——首先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南斯拉夫,然后变成像奥地利这样的国家。”

乌斯季诺夫、马祖罗夫和卡皮托诺夫支持安德罗波夫的看法。

大部分政治局成员认为,应该举行会晤,作为向捷共领导人施加压力的最后一招。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立场尤为令人感兴趣,他说:“四月中央全会和六月中央全会重申,我们绝不会把捷克斯洛伐克交出去……我认为现在用不着举行双边会晤,因为如果举行会晤,我们就得向他们和盘托出,他们肯定不会接受我们的意见,我们只好考虑是否采取极端措施的问题。他们现在大讲同苏联友好……我们当然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约翰逊和其他竞选美国总统的人也在讲同苏联保持友好……当然,应该考虑采取极端措施会引起什么后果。但是我认为,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采取极端措施不会导致形势加剧,不会引起世界大战……如果我们把捷克斯洛伐克拱手交出去,那就正中人家的下怀;如果我们保住了捷克斯洛伐克,等于巩固了我们自己的地位。”<sup>90</sup>

7月24日,安德罗波夫再次向苏共中央政治局报告国内居民对七月中央全会关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决议的反应,据他掌握的情报(确切地讲,应该是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情报),大部分居民支持这一决议。安德罗波夫在报告中阐述了自己对事态发展的观点,他认为,从捷克斯洛伐克的现状看,必须立即发动工人阶级和人民警察参与同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斗争,必要时——组建工人革命队伍。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掌握的情况,居民中有人持另一种观点,最典型的是苏联老外交官伊·马·迈斯基院士,他坚决反对“兄弟党”联名给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写信,因为他认为,那样会引起苏联同英国和美国发生冲突。<sup>91</sup>

事实表明,葛罗米柯是正确的,迈斯基院士的担心是不必要的。1968年7月22日同美国国务卿迪·腊斯克的会晤表明,美国人不想介入冲突。腊斯克说:“美国政府在评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十分注意掌握分寸,我们不希望被卷入或参与这些事件。所以,我们对苏联试图把我们卷入这些事件甚表惊讶……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干预捷克斯洛伐克事务,这是捷克人自己的事情,是捷克人和华约其他国家的事情。”美国人当时关注的是就裁军问题举行高级会晤。<sup>92</sup>

苏联政界领导人吃了颗定心丸: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极端措施不

会引起美国方面的激烈对抗。

于是,开始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7月19日和22日的决议匆忙制定“极端措施”。计划分两步实施,第一步是华约部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和更换捷共领导人,第二步是发布捷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政府关于内外政策宣言、告捷克斯洛伐克公民和军人书<sup>93</sup>。这两项措施分别在7月20日和26日制定完毕。

此外,还准备发布苏共中央《告苏联人民书》,指出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生死攸关的紧急关头。《告苏联人民书》中说:“捷克斯洛伐克优秀的共产党员、党中央主席团成员、各地党组织的代表,在充分认识到国家面临巨大危险的情况下,组成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政府,承担起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国家事务的全部责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政府作出了别无选择的决定,命令苏军有关部队向捷克斯洛伐克革命政府提供帮助……与我们一道履行国际主义义务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也作出了这样的决定。”<sup>94</sup>

7月26—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文件——《告苏联人民书》、《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政治局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革命政府宣言》和《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书》进行最后定稿。

但是,不放弃采用另一种途径——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继续谈判的政治解决途径,为此也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以便随时同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晤。

1968年7月22日,政治局以通过决议的形式对这两方面的工作予以正式确认,并指示苏联驻布拉格大使转告捷方说,苏方同意捷方提出的关于苏共中央政治局同捷共中央主席团举行会晤的建议,并提出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举行这次会晤。与此同时,在决议的另一段(《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中写道:“批准安·安·格列奇科……等同志提出的建议,允许格列奇科同志根据政治局会议提出的意见如期采取措施。”

1968年7月26—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正式批准应对捷克斯洛伐克局势发展的两种方案——政治解决的途径和采取“极端措施”的途径。

293 在讨论苏共中央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中应该持什么样的立场时发生了激烈争论。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П. Е. 谢列斯特说:“我觉得,有些问题不应该提出来,例如,主观主义、个人崇拜等。为什么要提出这些问题呢?为什么要给他们抓辫子的机会呢……”尼·维·波德戈尔内随声附和说:“我想也是,不要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方面的材料在这种场合提出不合适……应该讲主要问题:我们党在工业、农业、文化等领域所做的工作……必须讲我们党在苏共二十三大以后所做的工作,讲我们所取得的成就,表明我们并不软弱,我国的农业形势大好,我们不保守。”<sup>95</sup>与会者不仅对拟制的谈判方案提出了批评,而且批评了方案的拟制者——当时负责社会主义国家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康·费·卡图谢夫和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部主任K. B. 鲁萨科夫。与会者一致认为,在谈判中应该坚持意识形态领域的立场,不让对方有染指苏联社会历史污点的可能。

苏联官方确定的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异己思想进行斗争的立场,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苏联方面非常重视即将举行的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为此专门为勃列日涅夫起草了一份谴责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报告,给参加谈判的人每人发一本谈判时使用的备忘录,上面载有谈判注意事项和准备向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提出的基本要求。这些要求包括:禁止捷克斯洛伐克所有反社会主义的政治组织、政党和俱乐部活动;确保党对大众媒体的监督;恢复共产党在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中的领导作用;罢免克里格尔、什帕切克、齐萨日、斯拉维克、希克、帕维尔、普尔赫利克<sup>96</sup>等人的职务。此外,还为参加兄弟党会议的苏共代表团成员配发了备忘录,上面也载有准备向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提出的要求:“只有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行动中实行这些措施,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才不会诉诸武力。否则,直截了当告诉你们,我们除了采取极端措施之外,别无选



择。”这些要求显然是赤裸裸的最后通牒。

一开始预计在蒂萨河畔希埃尔进行的谈判用不了多长时间——7月29日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计划在7月30—31日在莫斯科召开兄弟党(苏联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德国统一社会党,波兰统一工人党)会议。原先预计谈判很可能破裂,采取“极端措施”势在必行。然而,谈判的进展情况并不是像原先预计的那样。7月30日,政治局指示驻兄弟党和国家大使们分头通知乌布利希、哥穆尔卡、卡达尔和日夫科夫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在谈判期间按照苏联方面的条件达成了一致”,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中。在这一阶段,主张政治解决的方针显然占了上风。原定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领导人会议改为8月3日召开,地点改在布拉迪斯拉发。

谈判过程中出现了妥协,军事干涉的威胁退居次要地位,苏共和捷共之间的论战暂告停止,这本身意味着捷共领导人同其他共产党、首先是同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的冲突得到了缓解。但是,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为这种妥协付出了巨大代价,首先,他们必须确保对捷共的全面控制,站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保住捷克斯洛伐克在华约组织中的位置。为此,必须恢复对大众媒体、首先是对电视新闻的监督,承诺免去齐萨日(他被视为捷共内部所谓的布拉格中心的领导人)<sup>97</sup>的捷共中央书记职务,确保捷共十四大的筹备工作不落入“右派”手中,把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一分为二(另外组建社会秩序维护部和国家安全部),减少内务部长帕维尔掌管的警察数量。谈判的结果被以简短的联合公报的形式公布于众。

294

双方承担的义务属于口头性质的,没有写成文字。勃列日涅夫和切尔尼克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向各兄弟党领导人通报了谈判结果,两党的公开论战暂时停息,出现了妥协可以维持下去的希望。

然而,双方的这种妥协是不牢固的,因为互相都不太信任。值得注意的是,在布拉迪斯拉发会晤期间,苏共领导人收到了由比拉克、英德拉等人签名的所谓邀请函<sup>98</sup>,敦促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



## 勃列日涅夫和杜布切克的8月13日对话

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后一个星期中发生的事情迄今为止依然鲜为人知,原因很简单——苏共领导人疗养的季节开始了。政治局委员中几乎没有人留在莫斯科,安·帕·基里连科在大部分政治局委员缺席的情况下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委员们在南方的别墅成了党的临时总部,可想而知,在那里进行的讨论、交谈和争论没有被认真记录下来,留下的文献资料当然要比在莫斯科开会时少得多。

8月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苏共中央关于苏捷两党领导人蒂萨河畔希埃尔谈判和社会主义国家党的领导人布拉迪斯拉发会议结果情况通报》,参加起草《情况通报》的有苏共中央书记康·费·卡图谢夫、鲍·尼·波诺马廖夫、米·安·苏斯洛夫和中央委员会行政管理部部长K. B. 鲁萨科夫。《情况通报》详细介绍了苏共和捷共领导人之间存在的重大矛盾和捷共内部发生的冲突,简要阐明苏联方面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中所持的立场。这份文件中说:“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必须以最尖锐的口气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杜布切克、切尔尼克和斯姆尔科夫斯基在会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反革命活动危险性估计不足”,因此,“无论是捷共中央的立场,或者是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和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以后事件的发展,都难以令人足够相信,六个兄弟党联合声明中的条款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在双边会晤中的承诺能够得到兑现”。<sup>99</sup>

8月9日,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打电话,对捷共中央书记齐萨日公开批评双方不久前达成的协议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要求捷共领导层进行人事变动。杜布切克同意在即将召开的捷共中央全会上做这件事,他向勃列日涅夫保证说:“我们过十天就召开中央全会。”勃列日涅夫在电话里提醒说,在希埃尔会晤中,杜布切克本人以及斯姆尔科夫斯基和切尔尼克答应在几天之内进行改组,并把内务部一分为二。杜布切克保证说,切尔尼克和列纳尔特正在制定禁止自发举行群众集会的

措施。勃列日涅夫反驳说：“这些群众集会……不是什么自发性的，是齐萨日和其他反党分子组织的。”<sup>100</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向德国统一社会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发函，通报8月9日同杜布切克交谈的情况时指出，双方交谈的主要话题是如何实现在蒂萨河畔希埃尔达成的协议，其中包括：

- 关于控制大众传媒的措施；
- 关于禁止社会民主党和俱乐部活动的措施。

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函件中说：“勃列日涅夫同志希望乌布利希同志在同捷克斯洛伐克同志进行会晤时把主要精力放在必须准确遵守兄弟党的声明、履行希埃尔会晤达成的协议上。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期间，勃列日涅夫同志当着杜布切克同志和切尔尼克同志的面向各兄弟党通报了希埃尔会晤达成的协议。”<sup>101</sup>

勃列日涅夫选择8月13日这一天再次给杜布切克打电话并非偶然。这一天是星期二——捷共中央主席团开会的日子。勃列日涅夫给杜布切克打电话的目的无非是敦促他立即行动，并将苏联的立场告知布拉格的捷共高层领导人。

勃列日涅夫在电话中指责捷克斯洛伐克的媒体攻击苏捷两党领导人不久前达成的协议，进行反苏和反社会主义宣传。他由此得出结论：“我们政治局在交换意见<sup>102</sup>后一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目前的局面违背了希埃尔会晤中达成的协议，我所说的是我们俩单独交谈时达成的协议，还有我们四个人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以及我们党政治局和你们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之间达成的协议。”<sup>103</sup>

杜布切克解释说，据他所知，“最近没有发生任何攻击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社会主义国家的事”。勃列日涅夫反驳说：“最近两三个月……许多报纸继续发表诽谤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的文章。我们政治局的同志们要我立即向您提出这个问题，并准备提交抗议照会，我不能阻止他们这样做……”杜布切克说：“我们召开了报刊工作人员会议，对一些报社记者的不正确行为进行了谴责……”勃列日涅夫打断杜布切克的话说：“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并不是让你们开会……应该采取具

296

体措施。我们当时一致认为佩利坎在其中起了很坏的作用,必须把他收拾掉,作为整顿大众传媒的第一步。”

勃列日涅夫在电话中旧话重提——捷克斯洛伐克方面原先许下的改组内务部和党的领导层的诺言。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的活动不可能不引起苏联领导人的警觉。早在1968年6月,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馆工作人员就已经获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开始进行监视活动,为此采取了某些防范措施<sup>104</sup>,后来,捷克斯洛伐克前总理奥·切尔尼克在1970年9月29日呈送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一份报告中说,捷共中央领导人已经获悉,加入“布拉格中心”的内务部长约·帕维尔制定了一个应急计划。这份报告指出,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认为必须做好准备,以防右派分子公开发表演讲<sup>105</sup>。比拉克1968年6月说的话证明,局势有这样发展的可能,他说:“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召开期间或召开之后可能动用警察,以防止党和国家发生分裂。”他还说:“杜布切克同志掌握将近一万名忠于他的士兵和军官,可以随时进入战斗准备。”<sup>106</sup>

杜布切克在电话中告诉勃列日涅夫说,捷共主席团的议事日程中包括“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中商定的”把内务部一分为二的问题。

“勃列日涅夫:那你们打算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想提请您注意,当时向您提出这个问题时,您问了一下切尔尼克,切尔尼克回答说,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并且说,已经确定了另一个职务的人选,在五天内把这件事交给斯姆尔科夫斯基去办。”

杜布切克: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国目前正在推进联邦化进程……所以,我们主席团只能在政府和部长提出相关意见后着手解决这个问题……稍微推后一段时间。

勃列日涅夫:什么时候?

杜布切克:10月份,10月底。

勃列日涅夫:瞧你说的,这不是又在骗人吗?”

297

所有关于人事变动的许诺都没有兑现。勃列日涅夫提醒说,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期间,“我在同你、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斯沃博达四个人交谈时,指出过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但是,当时你们不

以为然,答应在不久的将来解决这些问题。”勃列日涅夫坚持必须解除齐萨日、克里格尔和佩利坎的领导职务。杜布切克还是说,情况发生了改变,人事问题只能通过中央委员会解决。勃列日涅夫再次提醒杜布切克说,他8月9日曾许诺过在最近十天内召开中央全会。杜布切克回答说,争取在8月底或9月初召开中央全会。

表面上看,双方在磨嘴皮,互相指责和埋怨,实际上明确表明了各自的立场。勃列日涅夫指责杜布切克搞欺骗,说话不算数,他一再强调说:“我受政治局的委托同您交谈……”,“我的政治局的同志们关心这些事,请您讲清楚,我好向政治局委员们交代……”显而易见,勃列日涅夫试图装出他本人同“集体领导”的意见不太一样的样子。

请读者注意,政治局并没有通过召开会议的正式程序委托勃列日涅夫进行这次谈话,勃列日涅夫所说的“政治局的同志们关心这些事……”纯属虚构。当时勃列日涅夫本人、政治局委员——沃罗诺夫、柯西金、佩尔谢、波德戈尔内、苏斯洛夫、谢列平、谢列斯特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格里申、库纳耶夫、马祖罗夫、马谢罗夫、拉希多夫都不在莫斯科,他们都前往南方疗养,在自己的别墅。同他们在一起疗养的还有匈牙利党的领导人卡达尔。所以说,当时没有人会去关心不久前签署的协定的执行情况问题。

杜布切克一再推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捷共中央主席团不可能解决所提出的问题。

“我们也认为必须做这件事(指把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一分为二——作者),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应该以另一种方式对待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已经不取决于我们了。”

勃列日涅夫:请允许我向你提个问题,究竟什么事情取决于你们主席团……”

“我仅仅指出一点,”勃列日涅夫继续说道:“你们中央主席团什么也领导不了。我们深感遗憾的是,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期间我们竟然不知道这一点……”

勃列日涅夫一再劝说杜布切克在8月13日马上召开捷共中央主

席团会议,解决人事变动问题。他说:“给你最后一次不用费太大力气和免遭太大损失扭转危局的机会,如果你不向主席团提出这些问题,将面临损失巨大的糟糕局面。”

298 勃列日涅夫警告杜布切克说:“你要知道……如果不履行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期间许下的承诺,将形成另一种局面……迫使我们重新估价形势和采取新的单方措施。”

杜布切克:勃列日涅夫同志,请便,请你们政治局采取你们认为正确的所有措施。

勃列日涅夫:你要是这样回答我,那我就要告诉你,萨沙,这是极其不慎重的回答……”

勃列日涅夫所说的措施显然是指华约组织派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杜布切克当然很清楚这一点,他至少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期间就已经明白这一点。

杜布切克试图证明,他将尽其所能履行承诺,但是不可能在十天之内做成这件事。他说:“如果您认为我们是骗子,那就请采取你们政治局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

杜布切克希望推迟履行承诺的时间,但是不要作出任何口头保证(他也不可能作出这种保证)。勃列日涅夫坚决不同意,他说:“我不能背着政治局成员解决新问题,不可能同意你提出的任何理由……现在的情况是,你提出了新的条件,你什么时候履行把内务部一分为二的承诺呢?不清楚,也不明白。你要知道,我们是在高层会晤上达成协议的……现在看来,你们这些人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既然你同意苏共中央采取认为应该采取的措施,那看来我们只能不得不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杜布切克左右为难,他暴跳如雷嚷道:“但愿下一次中央全会选另一个人来当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说:“萨沙,别走极端。看来,我们完全不应该进行这一次交谈。”杜布切克不肯就此罢休,说:“我去干适合我做的工作,我不珍惜这个职务,让别人去干好了,让更合适的人去当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好了。没有人支持我,老有人跟我过意不去,我怎



么可能继续干下去。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刚才告诉过您,下一次中央全会将选出新书记,我准备不干了。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请您原谅,我今天过于激动。”

勃列日涅夫安慰了杜布切克几句,但是仍然一再追问,捷共中央主席团究竟打算不打算履行承诺?杜布切克的回答证明,捷共中央主席团没有能力履行承诺,尽管杜布切克本人一再声称他忠实于原先达成的协议。

两个人沉默不语了一段时间,都在思考对策。勃列日涅夫本来希望,在他给杜布切克通电话时,比拉克能在杜布切克的旁边,因此预先向布拉克提出了这一请求,可是,在杜布切克身旁的是斯姆科夫斯基。勃列日涅夫本来指望捷克斯洛伐克那边有人把他同杜布切克交谈的内容转告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捷共中央书记们,然而这一切并没有发生。所以,莫斯科方面认为,杜布切克已经驾驭不了捷共中央主席团,捷共中央主席团已经控制不了国家局面。杜布切克说,已经不让他参与筹备捷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了,他不得不在最近退出党的领导。

299

作者在研究这一次电话交谈记录时不免疑窦丛生,许多问题在莫斯科的档案资料中无法找到答案。亚·杜布切克在电话交谈中一再说情况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什么情况?当然不仅仅是如他所说的那样,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联邦化进程。从他说话的前后意思可以断定,党的领导层内部力量配置发生了变化。所以不能不让人提出如下问题:究竟什么东西导致捷共内部1968年夏天得到绝大多数居民支持的那一派地位遭到削弱<sup>107</sup>?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和1968年8月21日谈判以后,捷克斯洛伐克高层领导人作出了哪些决定?捷克斯洛伐克内务部发生了什么变化?

约·帕维尔将军制定了哪些紧急措施?这些措施是如何制定的?在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参与之下制定的镇压右派分子政变计划的命运如何?莫斯科认为,进一步搞清楚这些问题对了解1968年事件具有重要意义。

## 极端措施

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由安·帕·基里连科主持,与会者有:马祖罗夫,波良斯基,安德罗波夫,杰米契夫,卡皮托诺夫,卡图谢夫,库拉科夫,索拉科夫,索洛缅采夫。基里连科首先向与会者介绍政治局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提交的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局势的最新报告,他说:“报告对截至8月13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局势进行了分析,苏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分析的结果,并考虑到列昂尼德·伊里奇按照第一种方案所作的指示,向捷共中央主席团提出了建议。今天晚上我们必须把新方案告知在南方疗养的同志们,据我所知,他们现在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基里连科还说,在制定决策过程中考虑到了也在南方疗养的卡达尔向勃列日涅夫同志陈述的意见,并同日夫科夫、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进行了磋商。

8月16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勃列日涅夫致杜布切克的信件全文,这封被打印成两页的信将由驻捷大使契尔沃年科递交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信中列举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尚未履行的承诺。8月13日勃列日涅夫同杜布切克电话交谈的结果是使苏共中央政治局下决心写这封信的主要原因,在这封以勃列日涅夫的名义发出的信中说:“给我的印象是,捷共中央主席团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主动性和坚定性,而这一点对反击右翼反社会主义和反革命分子、保护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成果是至关重要的。您可能被我们生活中常有的某些客观情形所左右,您在结束电话交谈时希望我们给予谅解,然而我们所关切的问题最终悬而未决。我不想预先说明拖延时间可能导致什么后果,所以请您通过契尔沃年科同志给我明确答复。”<sup>108</sup>

给契尔沃年科大使下达了指示:“尽可能让比拉克、科尔德、英德拉、里戈、巴尔比雷克、皮列尔、卡佩克、什维斯特卡等同志了解这封信的内容。为此,您可在前往拜访杜布切克同志途中装作在捷共中央委

员会办公楼里碰见了科尔德同志和英德拉同志,或者上述这些人中的某人,告诉他们您是来递交勃列日涅夫同志写给杜布切克同志的一封信,这样他们就有理由在捷共中央主席团内要求杜布切克同志公开这封信的内容。”<sup>109</sup>

第二天(8月17日),苏共所有政治局委员从疗养地返回莫斯科。勃列日涅夫亲自主持会议,首先介绍他同卡达尔磋商的情况。匈牙利领导人卡达尔表示,已做好参与“帮助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所有行动的充分准备。卡达尔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全会“一致”通过了相关决议,军队也处在战斗准备状态。与此同时,他试图作最后一次努力,寻找政治解决冲突的出路。他对政治局委员们说:“是否可以再向杜布切克施加一次正面影响,使他摆脱右翼势力的左右。”勃列日涅夫让卡达尔同杜布切克会面,并把会晤的日期定在8月1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那一天。为此准备了另外一封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件。

勃列日涅夫还详细介绍了他8月13日同杜布切克电话交谈的情况,他的结论是:“杜布切克在政治上误入歧途,局势更加复杂了。”

勃列日涅夫认为,即将召开的捷共十四大隐藏着许多令人担心的事情,可能导致捷共内部的右翼势力取得胜利。

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准备工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政治局《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问题》的决议中说:“苏共中央政治局对捷克斯洛伐克最近几天的形势进行了全面分析,对捷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向苏联、波兰、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提出的提供军事援助对付反革命势力的请求进行了认真研究,一致认为,捷克斯洛伐克近几天的事态发展具有最危险的性质。右翼分子依靠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公开和秘密支持,准备实施反革命政变……鉴于苏联共产党和其他兄弟党在竭尽全力之后再也无法采用政治手段对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施加影响,为了敦促他们反击反对社会主义的右翼势力,苏共中央政治局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采取积极措施捍卫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了,并一致决定动用军事力量向捷克

斯洛伐克共产党和人民提供帮助和支持。为此,苏共中央向保加利亚、匈牙利、民主德国、波兰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兄弟党提出建议——1968年8月18日在莫斯科召开这些国家党和政府领导人会议讨论这个问题。”<sup>110</sup>

301 莫斯科在作出这一决定中考虑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健康核心”的意见。勃列日涅夫说:“健康力量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同步行动的建议和他们本身的行动计划。我认为,他们的计划总的看来是可行的。他们建议在8月20—21日行动,我看可以。所以,我们今天必须讨论和确定这个问题,这是个非常重要和重大的问题。”<sup>111</sup>

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没有围绕华约组织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讨论和争论,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形势问题》的决定和苏共中央政治局致捷共中央主席团的信件原文,批准了《告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公民和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书》,规定了同所谓的“五人小组”(主张苏联出兵的捷克斯洛伐克活动家)进行联系的方式。

起草了供捷克斯洛伐克“健康力量”宣布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宣言》,《宣言》草案中写道:“混入党和国家领导层的右翼修正主义分子向人民许下了种种诺言。实际情况表明,他们是政治上的破产者……捷共中央主席团和国家政府为了我们祖国的社会主义未来,主动承担起团结所有爱国力量的重任。反动派正在准备发动一场自相残杀的内战,使我们不得不求助于苏联和其他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盟国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派出本国军队帮助我国度过这一艰难的时刻。捷共中央主席团和革命政府呼吁所有公民向盟国的部队提供帮助。”《宣言》草案谴责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推行的国内政策,列举革命政府成立后将向国家公民提供的种种优惠,声称将奉行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友好的外交方针。

责成契尔沃年科大使把在莫斯科起草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宣言》转交比拉克和英德拉,并向他们指出“这份文件可供朋友们起草告人民书时参考”。

第二天(8月16日),准备派部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华约成员国

领导人飞抵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会议参加者作报告,之后乌布里希、日夫科夫、哥穆尔卡和卡达尔先后发表讲话,说明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他们“表示完全同意苏共中央政治局的评价和结论”。

8月19日,所有苏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书记、边疆区区委书记和州委书记被召集到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向他们讲述执行四月中央全会决议的必要性,通知他们准备在捷克斯洛伐克实施军事行动。当天,向苏联驻布拉格大使送去了关于五国联合行动的实施细则,并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介绍了即将发生的事件。批准了塔斯社声明全文,声明中说,应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的请求,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道向社会主义制度面临威胁的捷克斯洛伐克提供了刻不容缓的帮助。

第二天(8月20日),向苏联驻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使发去了指示。向契尔沃年科大使发去了紧急指示,让他在8月20日夜间23时20分,即在行动开始前一小时,前往拜会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卢·斯沃博达并通知他说,苏共中央和其他“兄弟党”已经收到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成员和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许多成员提出的提供军事援助消除反革命威胁的请求。对契尔沃年科大使的紧急指示中说:“如果总统同意各兄弟国家的要求,您就把我方拟写的告人民和军队书交给他,供他起草告人民和军队书时参考。”预计斯沃博达会立即将此告知杜布切克或捷克斯洛伐克的某位领导人。

8月21日,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

然而,周密计划的军事行动很快就变成了一场政治上的失败,捷克斯洛伐克的公民强烈反对军队进入他们的国家。广大居民的反苏情绪比苏共中央和“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预计的要强烈得多。作者不打算描述这一显而易见的事实,介绍捷克斯洛伐克各族人民反对出兵这个国家的书籍多不胜数。

军事行动遭到失败的另一个标志是,依靠“健康力量”的所有计划都没有实现。在军队进入捷克斯洛伐克的头一天,成立革命政府的希望就成了泡影。苏共中央领导人在8月19日满以为他们的行动会得



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大部分成员的支持,然而在出兵后的头几个小时,这一幻想就破灭了。8月21日,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什帕切克、西蒙等人被苏军逮捕,两天后被遣送莫斯科,同几天前表示不信任他们和打算把他们赶下台的那些人进行谈判。

事实证明,柯西金关于捷共领导层不存在什么有影响力的所谓“健康力量”的意见是正确的。

8月23日,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波德戈尔内同卢·斯沃博达进行谈判。当天,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波德戈尔内、沃罗诺夫与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进行了长时间谈判。8月26日,签署了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谈判结果备忘录。<sup>112</sup>

303 8月25日,在谈判还在继续紧张进行的时候,苏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实际上承认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的“极端措施”已经完全失败。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唱主角的是柯西金,而不是基里连科(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总书记不在时主持政治局工作)。柯西金在发言中指出,“兄弟党”领导人对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的事态发展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是卡达尔的意见,他的观点和苏联方面的观点相吻合,其实质是让杜布切克继续领导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二种是日夫科夫的观点,他认为战争不可避免,应该一切推倒重来,坚决镇压反革命,主张成立革命政府。第三种观点(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的意见)和日夫科夫的观点相近,所不同之处仅在于表达得更为准确。乌布利希和哥穆尔卡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已经完全瓦解,捷克斯洛伐克已经不存在共产党了,所以必须成立革命政府。他们对勃列日涅夫在莫斯科谈判期间试图同捷共领导人达成妥协的做法表示抗议。乌布利希说:“如果还让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领导,那还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干什么?”哥穆尔卡随声附和说:“谁也搞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出兵……”

柯西金在介绍了“兄弟党”领导人的观点后提出了三个方案供政治局讨论:

第一个方案是成立以总统为首的革命政府。柯西金认为,副总统可以由切尔尼克担任,“胡萨克表现也不错”。

第二个方案是成立以切尔尼克为首的政府,或者让切尔尼克任中央第一书记,胡萨克任部长会议主席,也就是说,把杜布切克清除出政治舞台。

第三个方案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和捷共中央主席团的谈判备忘录草案中已经提出过,即保留原先的领导班子,实质上回到捷共中央主席团在蒂萨河畔希埃尔会晤期间的那些承诺——免除克里格尔、齐萨日、希克和比拉克等人的职务。

政治局在讨论这三个方案过程中出现了三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赞成第三个方案。勃列日涅夫指望找到政治解决的途径。柯西金不喜欢也不信任杜布切克,说杜布切克是“头号大坏蛋”,认为没有人能够领导临时政府。谢列平同意柯西金的意见。杰米契夫坚决支持这条路线,他说:“我认为,第三个方案是惟一可行的方案。如果不采用这个方案,那么除了战争之外别无他途,难道非要打仗不可,应该好好考虑这个问题。” 304

安德罗波夫反驳说:“我觉得,不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认为三个方案都应该利用,不过,第一个方案更好一些。”他建议把躲藏在斯沃博达总统府官邸的所有部长赶出来,逮捕躲藏在那里的内务部长帕维尔。乌斯季诺夫坚持必须成立革命政府的意见。

波德戈尔内赞成第二个方案,主张把杜布切克从领导层清除出去。波良斯基建议借捷克人之手搞掉杜布切克,他说:“让他们召开中央全会,在中央全会上收拾杜布切克。”柯西金反驳说:“这是不可能的,谁也不会去收拾他,不会出现这种结果。”<sup>113</sup>

勃列日涅夫的妥协路线在实践中取得了胜利,捷克斯洛伐克的“正常化”进程用了整整一年时间。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波德戈尔内、谢列平坚持的走极端的方针没有被采纳。指望得到捷克斯洛伐克“健康力量”支持的所有计划均化为泡影。

军事行动失败的又一个标志是,8月21日,成千上万的斯洛伐克人把苏联驻布拉迪斯拉发领事馆团团围住,苏军不得不动用坦克开炮驱散人群。俄罗斯人民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不复存

在,苏联从此有了侵略者的坏名声。

把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苏联领导人从此开始认识到,现实的社会主义原则上是不可能改革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是两个不可能搭配在一起的概念,要么选择改革,要么选择社会主义。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失败成为苏联结束改革的起点。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镇压力度开始加强。对于苏联社会舆论而言,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意味着革命人道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幻想破灭。当局开始变得更加厚颜无耻,更加头脑简单,因而更加明白易懂。

305 1968年8月事件不是由于国与国之间的冲突引起的,而是由于党与党之间的冲突引发的,有关国家的人民成了冲突的人质。东欧各国政府把自己的生存首先归功于苏共和苏联的支持,这些国家同苏联和苏联同这些国家不是通过外交渠道、而是通过理顺党与党之间的关系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报纸上的几篇文章、中央全会上的某一次改选和大街上的坦克都可能成为党与党之间关系恶化的理由。

党与党之间的冲突经常演变成国与国之间的冲突。

\* \* \*

1964年秋天到1968年秋天的这几年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苏联在这一段时间中遇到了一系列非此即彼的选择,首先表现在确定领导国家的内政方针上。50年代下半期确定的那些治理国家的原则在赫鲁晓夫不再当政的条件下被证明是正确的,“稳定的原则”不仅预先决定了赫鲁晓夫最终下台,而且预先决定了赫鲁晓夫的主要敌人——谢列平在政治上的覆灭。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官员们不希望看到有一个超级机构时刻在监督他们,干预党和国家机关的工作,所以,党和国家监督委员会很快就被取消,以此再次证明“党的领导”原则的正确性。

在解决50年代末60年代初遗留的经济问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取消国营农场、重建一些赫鲁晓夫时期被取消的部对发展工业生产产生了一定的临时效应。第八个五年计划(1965—1970年)是最成

功的一个国家经济计划。西伯利亚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的开采量剧增，成为对国家经济形势产生越来越大影响的重要因素。

值得肯定的还有，国家对向外国购买粮食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1966年基本上没有购买粮食，1967年购买粮食的数量大大低于平均数。

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在同时起作用。60年代下半期，欧洲和世界社会政治形势的“左倾”使苏联的社会主义经受来自“左”的批评。社会主义改革、“人道主义”、“新左派”的思潮在波兰的政治动荡和捷克斯洛伐克开始的改革中得到了实际体现。

“社会主义阵营”及其各国共产党领导人不得不重新确定对待改革的态度，因为他们都看到了丢失政权的威胁。以苏军为首的华约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不仅成为东欧各国人民、而且成为苏联的政治分界线。苏联的经济改革再也进行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起到80年代末，逐步确立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实际上不可以改革的信念，后来发生的一些事件只不过证实了这一结论的正确性。 306

## 注 释

- 1 Коммунист. 1964. №16. С. 4.
- 2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декабрьского (1965г.)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М., 1965. С. 208.
- 3 Там же. С. 209—213.
- 4 См.: К итогам мартов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 Коммунист. 1965. №6. С. 4.
- 5 Панников В.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перед большим делом // Коммунист. 1965. №6. С. 30.
- 6 Коммунист. 1965. № 5. С. 3—7.
- 7 См.: Коммунист. 1964. № 3. С. 7.
- 8 Панников В. Сель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перед большим делом. С. 39.
- 9 См.: Назаров Р. Подсобное хозяйство: его роль и место в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м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 Коммунист. 1966. № 16. С. 68—74.
- 10 См.: Хейман С. Интенсификаци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го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 Коммунист. 1964. №11. С. 80—88.
- 11 Немчинов В. С.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е хозяйствование и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 Коммунист. 1964. №5. С. 74—87.
- 12 Там же. С. 77—78.
- 13 См.: там же. С. 85.
- 14 См.: Лекции по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Вып. 3. Минск, 1974. С. 327.
- 15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Ноябрь 1917 г. —декабрь 1991 г. М., 1994. С. 201.
- 16 Там же. С. 235.
- 17 См.: Бачурин А. Актуальные проблемы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й реформы // Коммунист. 1966. № 11. С. 40—53.
- 18 Ситнин В. Хозяйственная реформа и пересмотр оптовых цен на промышленную продукцию // Коммунист. 1966. № 14. С. 36—46.
- 19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М., 1995. С. 44.



- 20 См. : Брежнев Л. И. Отч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ЦК КПСС XXIII съезду КПСС. М. , 1966. С. 51.
- 21 Там же.
- 22 Там же. С. 99.
- 23 См. там же. С. 111.
- 24 См. : XXIII съезд КПСС: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 1966. Т. 1. С. 358.
- 25 См. : Михайлов А. Условность в ре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искусстве // Коммунист. 1965. № 15. С. 74—85.
- 26 Миф о застое. М. , 1991. С. 70—71.
- 27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Сост. А. В. Коротков и др. М. , 1994. С. 17.
- 28 См. там же. С. 40—41.
- 29 Там же. С. 43.
- 30 См. :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Бодался теленок с дубом. Париж, 1975. С. 181.
- 31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 54—55.
- 32 Там же. С. 70.
- 33 См. : Коммунист. 1965. № 2.
- 34 См. : Развитой социализм: Проблемы теории. М. , 1979. С. 206.
- 35 这里必须指出,俄语作为世界文化和苏联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媒介,作为了解我国各民族文化成就进而了解世界文化成就的必备条件,具有无可置疑的作用。
- 36 Брежнев Л. И. Ленинским курсом. Т. 4. М. , 1974. С. 100.
- 37 Шафаревич И. Путь из-под глыб. М. , 1991. С. 90—91.
- 38 Письмо КГБ СССР в ЦК КПСС от 24 февраля 1966г.
- 39 Письмо Ю. Андропова и А. Громыко в ЦК КПСС от 10 июля 1968г.
- 40 ЦХСД, ф. 5, оп. 50, д. 631, л. 163—164.
- 41 Там же, оп. 58, д. 262, л. 83.
- 42 Там же, л. 85.
- 43 АП РФ, ф. 3, оп. 64, д. 541, л. 18—21.
- 44 ЦХСД, ф. 4, оп. 20, д. 349, л. 104—108.
- 45 Там же, ф. 5, оп. 58, д. 263, л. 38—41.

- 46 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武官 1966 年 11 月 11 日写给国防部的一封信。
- 47 АП РФ, р-9636, ф. 5, оп. 59, д. 320, л. 43—46.
- 48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299, л. 1—5.
- 49 Млынарж З. Мороз ударил из Кремля. М., 1992. С. 77.
- 50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299, л. 11—15.
- 51 Там же, л. 7—8.
- 52 Там же, д. 323, л. 1—5.
- 53 Там же, л. 8.
- 54 Там же, д. 309, л. 1—2.
- 55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л. 19.
- 56 Там же, л. 29.
- 57 Там же, л. 37.
- 58 Там же, л. 37—38.
- 59 Там же, л. 39.
- 60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08.
- 61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л. 92.
- 62 Там же, л. 93—95.
- 63 作者认为,波德戈尔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苏共中央莫斯科市委员会、苏联国家安全部、苏联社会秩序维护部和苏联检察院联名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并提交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加强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身份证登记制度的决定”草案。
- 64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 г., л. 93—95.
- 65 Млынарж З. Мороз ударил из Кремля. С. 126—127.
- 66 См. там же. С. 114—131.
- 67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23, л. 108—111.
- 68 《... От раскрытия архивов по “пражской весне” никуда не уйти...》// 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 1993. № 3. С. 86—89.
- 69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23, л. 181.
- 308 70 Там же, д. 309, л. 4—7.
- 71 АП РФ, ф. 3, оп. 91, д. 100, л. 11.

- 72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л. 200—220.
- 73 Там же, л. 262.
- 74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23, л. 38—41.
- 75 Там же, д. 309, л. 58—72.
- 76 Там же, л. 73—78.
- 77 Там же, л. 75.
- 78 Там же, л. 78.
- 79 См.: Журавский В. Наша дружба и братство нерушимы: Письмо участников обще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актива народной милиции ЧССР//Правда. 1968. 21 июня.
- 80 См., например: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08, л. 46—50.
- 81 Там же, л. 40—42.
- 82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л. 357—398.
- 83 Там же, л. 399—400.
- 84 Там же, л. 402—403.
- 85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08, л. 63—64.
- 86 Там же, д. 324, л. 143.
- 87 Там же, д. 308, л. 59—62.
- 88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 г., л. 419.
- 89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治局委员柯西金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据当时担任安德罗波夫助手的弗·亚·克留奇科夫回忆,1967年,柯西金曾经提议免除安德罗波夫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改任当时被视为不那么重要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见弗·亚·克留奇科夫的《个人档案》一书,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第一卷,第79—80页)。
- 90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л. 425.
- 91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08, л. 165—169.
- 92 АП РФ, ф. 3, оп. 91, д. 98, л. 25—26.
- 93 Там же, л. 58—89.
- 94 Там же, л. 55—57.

- 95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л. 438—439.
- 96 Там же, ф. 3, оп. 91, д. 99, л. 12—13.
- 97 据苏联方面掌握的情况,捷共“布拉格中心”的成员有:希克,什帕切克,齐萨日,克里格尔,帕维尔。捷共中央组织政治部部长科拉日、国家行政机关部部长普里赫利克也加入了该中心。
- 98 即“五人邀请函”,他们是阿·英德拉,德·科尔德,安·卡佩克,奥·什维茨基,瓦·比拉克。
- 99 《... От раскрытия архивов по “ пражской весне ” никуда не уйти...》 С. 92—95.
- 100 АП РФ, ф. 3, оп. 91, д. 120, л. 1—18.
- 101 Там же, № 94/82 от 10.08.1968г.
- 102 有关蒂萨河畔希埃尔协定执行情况的讨论发言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中没有留存下来,由此至少可以得出三种结论:第一,由于技术上的原因没有做会议记录(有过这种情况);第二,没有举行正式会议,而是由政治局委员直接交换意见;第三,勃列日涅夫以政治局的意见为借口,以加重自己的指责分量。
- 103 АП РФ, ф. 3, оп. 91, д. 120, л. 2.
- 104 ЦХСД, ф. 5, оп. 60, д. 300, л. 1—4.
- 309 105 Там же, оп. 63, д. 368, л. 24.
- 106 Там же, оп. 60, д. 323, л. 41.
- 107 据捷克斯洛伐克内阁在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进行的民意测验,杜布切克的支持率为 90.3%,斯沃博达——75.8%,胡萨克——64%,斯姆尔科夫斯基——42.2%,切尔尼克——25.8%,比拉克——25.2%,齐萨日——15.1%,列纳尔特——14.4%,诺沃麦斯基——10.3%,楚尔——10.1%。
- 108 АП РФ,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 94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от 16 августа 1968 г., л. 1—2.
- 109 Там же, л. 3.
- 110 Там же,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 95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от 17 августа 1968г.
- 111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л. 477.
- 112 Подробнее о них см.: Млынарж З. Мороз ударил из Кремля. С.

161—274.

113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й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968г. , л. 484—  
491.



## 第五章 从停滞到危机

(1969年—80年代初)

改革本身包含着两种行为：一是除旧，二是布新。在这两种行为中，哪种是有害的呢？二者都一样……

——亚·尼·奥斯特罗夫斯基  
《一切智者都是相当普通的》

## 科学界的“意识形态纪律”

意识形态领域的气候很快就发生了变化。1968—1969年刮起的刺骨寒风,到70年代初就变成了一场暴风雪。对60年代与科学、文化和艺术领域的成就同时出现的事物重新进行评价的危险,日益明显地出现了。这是对一部分知识分子立场的进攻,这些知识分子认为,社会主义的思想是历史性的进步,但同时,他们又确信,在苏联的条件下,在“个人崇拜时期”,这种意识形态变形了,而这种畸形状况迟迟得不到纠正;这也是对另一些人的立场的进攻,这些人诚心诚意地想依靠祖国的过去和文化,依靠民族传统,依靠世界文明成就,对社会主义进行修正。意识形态领域的压力将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对永恒的对手——“亲西方的改革者”和“亲斯拉夫主义者”暂时联合、团结在一起。苏共中央科学与院校部部长、列·伊·勃列日涅夫在前线时的战友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成了一位反对改革的倡导者。他的偏执、教条主义成了街谈巷议的话柄。即使是在中央委员会里,特拉佩兹尼科夫所代表的也是这样一些势力,他们与勃列日涅夫顽固地站在一起,反对前一个时期的意识形态自由。这一方针所造成的后果是,一大批从中央委员会机关来到科技领域的苏联科学院工作人员受到了惩罚。

不能说这一方针(特拉佩兹尼科夫方针)没有受到过抵制。科学院院士阿·马·鲁缅采夫<sup>1</sup>于1970年7月给中央委员会写信,这封信成了“解冻时期”社会科学的一部殉难史。院士在信中说,在科技界的领导人中,司空见惯的是“粗鲁、外行的申斥……随心所欲的行为,特别是在组织学术讨论和确定一些科学方针的命运时,这种行为更是常见。”

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阿·马·鲁缅采夫也列举了一些例子。例如, 311  
《社会主义工业报》对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工作人员B. B. 拉基茨基的著作《企业的经营领导形式》和已故院士叶·萨·瓦尔加的著作进行的斥骂。阿·马·鲁缅采夫说,这种斥骂是直接根据中央委员会科

学部的指示,并在科学部工作人员的参与下进行的。鲁缅采夫提醒说,A. П. 布坚科的哲学著作也遭到了尖锐的,他认为是没有依据的批判。

在鲁缅采夫的信中,对历史研究现状的分析占据了特殊地位。鲁缅采夫认为,1968—1970年间进行的一次次改组(将历史研究所一分为二:苏联历史研究所和通史研究所,撤销了史学治学方法研究室),只是削弱了历史学的理论水平。鲁缅采夫认为,对史学治学方法研究室主任 M. Я. 格夫捷尔<sup>2</sup>的武断批判,许多工作人员被开除,历史学家大会筹备组被解散,就是这方面的例子。

鲁缅采夫做出结论说:“……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只要他们沾染了这种否定主义,他们的立场和行为就会产生直接的实际损失和政治损失。恐惧是一个对人产生不良影响的东西。科学工作者如果害怕人们对自己的误解,竭力使自己的观点和意见迎合习惯的说法的话,那么,他们就不能及时地帮助党解决社会发展的新的复杂问题。正如马克思和列宁所指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应当在对待当前事件方面具有超前的特点,否则的话,这种科学也就不需要了。而这种超前,毫无疑问,只能在学术界自由交换意见的条件下才能够实现。基于统一的世界观的学者们所持观点多种多样,这是自然的,也是必要的。而惟一有害的是,某些学者企图掌控真理。当那些受党委托负责领导科研生活的人企图成为垄断者,并且,这些人为了此目的而采用下命令的方法的时候,就会出现科学与政治脱节,从科学走向政治的出路被堵死的危险……”

人们习惯上把党等同于苏共中央。党对科学与政治的关系持有另一种意见。这一观点在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的笔记中,得到了阐述。该笔记上注明的时间是1970年7月24日,他的观点后来受到了中央书记处的谴责。

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声称:“令人十分痛心的是,在已经出版的作品中,存在个别不合要求,甚至是不成熟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出现了重大的思想错误。”由此,特拉佩兹尼科夫做出了对他来说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要加强党的领导! 特拉佩兹尼科夫还说:“正因为这一

点,苏共中央科学与院校部建议苏联科学院各分院和各研究所利用学者们的力量,区分并帮助犯错误的同志纠正其错误。正是按照这种方式,对许多作品组织进行了大讨论。例如,苏联科学院哲学与法律分院,在费·瓦·康斯坦丁诺夫院士的主持下,对《列宁主义与社会发展辩证法》一书进行了讨论。参加讨论的有大约 30 名科学工作者,其中,有 28 人做了发言。该书含有一系列有价值的章节,但同时存在着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对这些错误我们已经向苏共中央做了汇报。”

苏共中央科学部部长说:“从大多数学者们的反映看,此次讨论会是在高水平、实事求是和坚持原则的情况下进行的,它有助于对哲学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确立正确的立场。在苏联科学院历史学分院领导机关里,在叶·米·茹科夫院士的主持下,对《历史学与若干现代问题》一书进行了类似的讨论。该书有许多有益的条目。但书中也有一些根本错误的内容。因此,令人毫不惊奇的是,这类错误的内容,不仅引起学者们的愤怒,而且引起他们的忧虑。在这本书中,作者呼吁人们“重新阅读”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什么叫‘重新阅读’……原来,‘重新阅读’指的是重新考虑列宁关于政党、社会主义革命、国家、社会经济结构的学说。在讨论会上发言的大学者有伊·伊·明茨、彼·尼·波斯佩洛夫、叶·米·茹科夫、鲍·亚·雷巴科夫、博·加·加富罗夫、M. И. 基姆,以及其他一些大学者。他们在发言中,对该书中的重大错误和歪曲之处,提出了原则性的、具有深刻科学道理的、事实确凿的批判。”

接下来,在引用学术权威们的话“证明”鲁缅采夫院士的学术论据站不住脚后,特拉佩兹尼科夫向其对手发起了人身攻击,这种人身攻击逐渐升级为政治告密行为,演变成一出著名的活剧《给上级的一封信》。特拉佩兹尼科夫在信中写道:“老实说,我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也根本不能想像鲁缅采夫同志会为这种明显错误的著作辩护,会对这种完全民主的讨论持怀疑态度。更有甚者,他拒绝参加对这些作品进行真正科学而客观的讨论。”

特拉佩兹尼科夫继续写道:“本作者要求进行公开‘自由’的辩



论。”人们不禁要问特拉佩兹尼科夫,他这里所说的“自由”指的是什么?显然,一切问题在于,鲁缅采夫作为苏联科学院负责社会科学的副院长,没有与科学院各分院和研究所保持密切联系,他对自己所负责的工作单位里的真实情况不甚了解。

313 最后,特拉佩兹尼科夫对鲁缅采夫做出了具体的指责,说他缺乏必要的警惕性,推行错误的干部政策,直接帮助“政治上不成熟”的人。特拉佩兹尼科夫写道:鲁缅采夫院士将一个叫列维特的人招收进了研究所,此人是被卡卢加州党委开除的。当这件事在卡卢加州传开后,卡卢加州党委开始到新的工作单位调查列维特,鲁缅采夫将列维特调到了社会科学信息研究所;他帮助被撤销了国际运动史研究所副所长职务的E.安巴尔楚莫夫安排工作,他甚至还帮助经济学家Г.利西奇金,此人因为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党委第一书记Л.叶夫列莫夫<sup>3</sup>公开进行论战而出名,他因此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上受到批判。更有甚者,鲁缅采夫示威性地不仅拒绝与科学部协商他的讲话稿,而且,还拒绝将讲话稿上报给科学部(这跟别人,比如说跟科学院院长不同)。

从上述这一切中,自然而然就可以得出结论。特拉佩兹尼科夫露骨地建议,解除鲁缅采夫负责人道主义和社会科学的科学院副院长的职务。

正如上面已经谈到的,特拉佩兹尼科夫的信在中央书记处进行了讨论,并得到了支持。在经济学和历史学领域发生的进程,最先受到了党的批判。党对经济改革的实际放弃,招致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他们继续论证在苏维埃经济的条件下采用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在这方面,最能说明问题的是鲁缅采夫院士的信中所提到的B. B. 拉基茨基的著作《企业的经营领导形式》的遭遇。该书得到了许多人的好评,这些人有Л.佩卡尔斯基、Л.邦达连科、Э.杜纳耶夫、Ю.苏博茨基、E.亚辛。

但是,中央科学部收买的最主要的评论员们却持相反的意见。不能不为这些评论员们说句公道话:他们吹毛求疵,在书中找到了作者证明必须放弃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的一切论据,发现了作者论证采用市场方法管理经济的必要性的一切企图。他们也没有放过下面这个观



点,这个观点认为,“社会物质利益”并不能刺激具体个人的行为(简言之,就是说,全民福利在没有变成个人的物质利益之前,依然是一个空洞的口号);拉基茨基提出了一个大逆不道的说法。他说:“党和国家上级机关参与确定合同的经济内容,是不合适的。”中央科学部的评论员公正地指出:“这样提出问题是错误的,因为它贬低了党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领导作用。”

令中央科学部的评论员们愤怒的是,拉基茨基提出了“管理权分散”的概念,试图论证生产的领导者对生产集体负有责任,论证行业内部进行竞争的必要性。然而,令评论员们感到最不满的是拉基茨基关于在“弹性价格”条件下,在签署经济合同时,“自由地”选择伙伴的意见。评论员们的结论被严格纳入保护指令性经济的框架内:必须恪守计划价格生成原则和资金流动控制原则。

### “新方向”的毁灭

1969年5月,在乌拉尔大学举行了一场学术会议。谁都会说,对于大学来说,这是常有的事。是的,我也相信,但这一次,举行会议的广告宣传非同寻常,会议的举办者除乌拉尔大学外,还有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伟大十月革命史》问题学术委员会。此次会议召集了最著名的研究19—20世纪初俄罗斯历史的史学家,西欧史、拉丁美洲史专家,东方学家和法律学家。

乌拉尔大学成为历史学家们碰头的地点并非偶然。多年来,该大学的俄罗斯历史教研室里存在着一个史学家小组,其领导人是B. B. 阿达莫夫。该小组证明说,1917年革命前夕,俄罗斯最大的工业区乌拉尔在经济关系方面并不是单一的。在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同时,该地区还存在着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关系。即使引用列宁早期著作的说法,也不能改变该地区的本质:工业的、资本主义的乌拉尔,传统上被视为未来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哨,但按照B. B. 阿达莫夫和他的学生的解释,乌拉尔地区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堡垒,而乌拉尔地区的工人,则是保

留了许多资本主义以前的特征的特殊群体。

初看起来,这些研究只是局部的。但它触及到了无比重要的、普遍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史学家中引起了数不清的争论:俄罗斯在历史中的道路是典型的还是不典型的?十月革命本身合乎规律吗?它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必然结果呢?还是工人和全体农民(从贫雇农到中农和富农)联合起来反对政权呢?或者说,这场革命是特殊的,因为它在20世纪的历史舞台上出现,是多种因素巧合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绝对不适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和最后阶段”和“十月革命是帝国主义时代的第一场无产阶级革命”这种理论。

关于20世纪初俄罗斯发展水平的争论,在苏联史学界从50年代末开始进行的、被人称做是“新方向”的许多讨论中,成了最突出和政治上最尖锐的问题<sup>4</sup>。“新方向”是历史学界一次独特的运动,它联合起了不同专业的历史学家。这些史学家们的观点常常大不相同,但他们具有共同的追求,力求重新审视30—40年代在极其严酷的思想压制条件下形成的史学研究的陈规旧套。对此做出最准确定义的是著名史学家И. Ф. 金丁。他坚决反对1968年苏联—意大利历史学家大会的正式构想<sup>5</sup>。50—60年代下半叶,就俄罗斯历史中的君主政体、19世纪—20世纪初资本主义关系发展水平、国家经济的多种成分、十月革命的前提条件和推动力等问题,苏联国内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新方向”运动的领导人是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帕·瓦·沃洛布耶夫,К. Н. 塔尔诺夫斯基,И. Ф. 金丁,М. Я. 格夫捷尔。

然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会议召开的时候,正赶上意识形态领域的气候开始在一定程度上遭到破坏:1969年,关于“俄罗斯特色道路”的说法,未能幸免被指责为“布拉格之春”后果的厄运。可以说,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之所以被选为会议地点,也是因为在莫斯科安排这种会议已经很困难了。

从70年代初开始,就有人企图对“新方向”进行批判,不过,从表面上看,他们还试图将这种批判行动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但是,315 学术讨论本身并没有进行。本书作者有幸看到的是,1972年初,在苏

联历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长达数天的会议上，“新方向”运动的拥护者们明显地得到了支持，讨论会被一种最无礼貌的方式打断了：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中年人走上讲台，自称是苏共中央科学部的工作人员。此人按照最优良的布尔什维克传统，简短明确地宣布，“新方向”运动及其拥护者，包括研究所所长、苏联科学院通讯院士帕·瓦·沃洛布耶夫都是错误的。随后，他下令停止进行讨论。

即使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思想上的自由也产生了不良后果。《乌拉尔工人报》刊登了高级党校教授 В. Я. 克里沃诺戈夫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指责自己的同行们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背离了列宁关于十月革命的学说，歪曲了乌拉尔的历史。乌拉尔大学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其他高等院校的教员们，被召集在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政治教育楼豪华的大厅里<sup>6</sup>。州委科学部部长向他们发表了讲话，并宣读了苏共中央科学部在苏共中央组织召开的历史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科学共产主义专家会议的速记记录。

党的老思想家彼·尼·波斯佩洛夫为在中央委员会举行的讨论会定了调。波斯佩洛夫也是院士，就在举行此次会议前不久，他因为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做出的贡献，而获得了卡尔·马克思金质奖章。人们从速记记录中得知，波斯佩洛夫院士强调了苏共中央总书记列·伊·勃列日涅夫对社会主义理论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并指出，资产阶级的史学观企图证明，俄罗斯在伟大的十月革命前是一个落后的国家，而个别历史学家竟对工人阶级与农民在革命中的联盟说三道四，这是令人发指、令人震惊的缺乏意识形态纪律的行为（关于工人与全体农民联盟的命题是帕·瓦·沃洛布耶夫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他在革命史方面写有大部头的专著）。苏联历史研究所所长受到大量恶毒的批判，并不仅仅被做出了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们的新东西是不是更像资产阶级的？许多挺身而出的人（例如科苏利尼科夫教授）声称，沃洛布耶夫客观上在为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效力。

无论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会议和会议的组织者，还是在此次会议基础上出版的学术论文集，都受到了全面的惩罚，因为“乌拉尔大学的

论文集包含有‘新方向’运动的一切思想。”帕·瓦·沃洛布耶夫想为论文集辩护,企图把出版论文集的目的说成是为了弄清多种经济成分的复杂问题。看来,他的这种行为只是使他的反对派暴跳如雷。

316 宣读完在中央委员会举行的会议速记记录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会科学部部长宣称:“这种事情怎么会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发生呢?”在对乌拉尔大学党委、大学所在的区委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提出老生常谈的指责后,部长要求“防止在我们的工作中出现犯思想错误的机会”。

当我来到乌拉尔大学时,我看到,尚未散发的会议论文集在被销毁,接下来是党委会的召开,教研室主任 B. B. 阿达莫夫的职务被撤销,19 世纪—20 世纪初俄罗斯社会经济历史专家的培训被停止,“在思想上有害的”出版物的文章被禁止引用(时间长达 10 年),以及研究这些问题长达数十年的那些人所经历的坎坷遭遇。

“新方向”运动在莫斯科也遭到了毁灭。苏联历史研究所的领导人被撤换,与“新方向”运动有牵连者的著作多年不能出版,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的课题研究方面,苏联的史学研究明显落后了数十年。

实际上,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者社会学家的每一宗沾染上政治色彩的案件,都会像水银泻地一样,迅速传遍全国。通过党的委员会,传达到科研机构、院校,以及学院的社会科学教研室,对那些受到意识形态迫害的人,提出数百起小规模、常常是不显眼的,但很可怕的诉讼<sup>7</sup>。对于确定社会科学的状况而言,“意识形态纪律”这个词语是最关键的。苏共中央明确地告诉人们,不允许存在思想差异,社会科学的作用是重新圆满地诠释“党和政府的历史性决议”。

## 《新世界》杂志和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

如果说,围绕经济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的争论,多半具有“小圈子”的特点,不太被大众阶层所了解的话,那么,围绕《新世界》杂志所形成的局面,几乎牵涉到了每个知识分子家庭。该杂志享



有“左翼”知识分子(按照 60—80 年代的意义理解的)领袖的鼎鼎大名。该杂志的突出之处在于,它不仅发表优秀的文学作品,而且,还刊登一些维护自由价值观的犀利的批判文章。该杂志被载入了苏联的社会思想史,因为它刊登了亚·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该文就其意义而言,不啻为祖国文学界的一篇《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新世界》还刊登了伊·爱伦堡的回忆录,其中包含了对国家历史的新理解。意识形态领域的风向突变,不可避免地触及到了《新世界》杂志及其作者们。Л.丘科夫斯卡娅、Л.科佩列夫、布·奥库贾瓦受到了严厉批判。粉碎《新世界》编辑部的理由是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长诗《记忆的权力》在国外发表了。1970年2月3日,苏联作家协会秘书处会议做出决定,从编辑委员会中开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拥护者:В.Я.拉克申,А.И.孔德拉托维奇、维诺格拉多夫,第一副总编由一名特瓦尔多夫斯基不认识的人担任。

特瓦尔多夫斯基说:“我向苏共中央和作家协会秘书处提出过异议……(该决定不仅没经我同意,而且还是我不在场的时候通过的)。做出该决定是毫无理由的,我从来也没有见过博利绍夫同志,根本就不认识他。我认为,不通知我,也不经我同意就任命他,这是史无前例的侵犯主编权利的行为,是对我的侮辱。”

317

特瓦尔多夫斯基试图抗争。1970年2月7日,他写信给勃列日涅夫,试图解释说,他的长诗本来早在1969年夏就已经完成排版工作,准备出版了,但没想到,被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新闻检查机关)阻止了。特瓦尔多夫斯基向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康·亚·费定发出请求,请求他在作家协会里对长诗进行讨论,并撤销新闻检查机关的限制,但没有成功。特瓦尔多夫斯基说,过了一段时间后,没经他同意,长诗在西方国家发表了。此后,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要求长诗的作者谴责这一行为。特瓦尔多夫斯基给勃列日涅夫的信写道:“我本来准备坚决地这么做,满腔愤怒地抗议外国报刊盗窃并残缺不全地发表我的作品。但是,我过去和现在始终认为,最好的驳斥方式是(在经过相应的讨论后)发表我真版的长诗,这将使那些诽谤我这部作品的挑衅企图,化为泡影。”



继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后,1970年2月9日,A.贝克、B.卡韦林、B.莫扎耶夫、A.雷巴科夫、尤·特里福诺夫、A.沃兹涅先斯基、叶·叶夫图申科、M.阿利格尔、E.沃罗比约夫、B.坚德里亚科夫、尤里·纳吉宾、米·伊萨科夫斯基……也给勃列日涅夫写信。他们写道:

“亲爱的、尊敬的列昂尼德·伊里奇:

我国文学界所形成的局面,令我们感到不安。我们认为,向您求助是我们的责任。最近正在进行反对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及其所主持的《新世界》杂志的运动,其目的在于撤销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杂志社领导职务。改组《新世界》编辑部的决定已经通过了,从本质上讲,这一决定是为了将特瓦尔多夫斯基赶出杂志社。

可以大胆地将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称做是俄罗斯的民族诗人和苏联的人民诗人。他的创作活动所具有的意义,对于我国文学来说,是不可估量的。在我国,没有一位诗人能够在才华和重要意义方面与他比肩。他所主持的杂志,乃是高度艺术性的标准,这种艺术性对于向人民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来说,也是极其重要的。该杂志奉行苏共二十大至二十三大的路线,以科学的态度,深刻分析现代社会发展的复杂问题。该杂志将许多最有天才的现代苏联作家汇集在它的版面上。

不考虑这一因素,将是一个贻害无穷的错误。我们完全相信,为了整个苏联文化的利益,必须让《新世界》杂志在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领导下,依靠他认为对杂志有利的编辑委员会,继续运作。”

然而,不论是特瓦尔多夫斯基本人的信件,还是他的同行们的信件,全都石沉大海。1970年2月11日,特瓦尔多夫斯基写下了自愿退出的申请。50—60年代的《新世界》停止了存在……

318

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来说,这是一场悲剧。国家安全委员会继续对他进行跟踪和窃听。他因为遭受文学界和官场的嘲弄而饱受折磨。国家安全委员会显然根据“穿便衣的文学家”们的情报,向中央委员会报告了窃听到的这位诗人的话:

“我十分清楚地知道,关于我,存在着流言飞语,说什么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现在斯大林不时髦了,可想当年,他给斯大林写了差不多

500 行歌功颂德的诗句……用不着害臊,我们在芬兰战争期间用诗给斯大林写过贺信。我们相信,我们是在做一件崇高的事情。今天那些企图为斯大林辩护的人应当感到害臊,因为他们心里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再说了,他们也体验到了他们在做什么,但他们用崇高的政治意图来为自己开脱:政治形势要求这样做,真是国家的意图!瞧吧,年底在《文学报》上将会刊登关于《新世界》的评述:这是一份内容多么丰富,多么有趣的杂志啊……”

但是,这样的评述没有出现。《新世界》作为文学和社会生活的一种现象,停止存在了许多年。而特瓦尔多夫斯基也去世了。

亚·索尔仁尼琴写道:“杀害诗人的方法有多种。对特瓦尔多夫斯基的杀害,是通过取缔《新世界》杂志的方法实现的。”

### 五·伊·索尔仁尼琴与政权

作家与政权之间的尖锐对立日益严重。在这种对立中,作家拒绝按照大量意识形态部门,其中包括主要的意识形态部门:苏共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识形态部门的游戏规则开展游戏。亚·索尔仁尼琴要求取消新闻检查制度,要求就党的宣传人员对他的污辱进行道歉,并向西方社会发出了呼吁。他的这一系列举动,首先引起了“上面”的惶恐不安。但是,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发生后,当局已经不想再顾及苏联和西方社会的舆论反应了。1969年1月22日,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B.绍罗向政治局报告说:“有一种意见认为,已经到了该研究一下亚·索尔仁尼琴是否应当继续留在作家协会中的问题的时候了。并且认为,将亚·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的决定,最好由该文学家所在的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梁赞分会来做出,然后,由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对决定予以批准。”<sup>8</sup>

1969年11月4日,亚·索尔仁尼琴因“违反苏联作家协会宗旨与任务的反社会行为”,被梁赞州作家协会开除。<sup>9</sup>

然而,当局面临着另外的考验:开除索尔仁尼琴的决定,在西方媒

体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西方媒体发表了亚·索尔仁尼琴致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秘书处的公开信。作家们对其上级的决定也意见各异。谢·安东诺夫、Г. 巴克拉诺夫、Б. 奥库贾瓦、B. 坚德里亚科夫、B. 莫扎耶夫、A. 阿尔布佐夫、叶·叶夫图申科、A. 施泰因、Л. 科佩列夫、Л. 丘科夫斯卡娅反对开除索尔仁尼琴,要求在作家协会全体会议上研究这一问题。<sup>10</sup>

319 亚·索尔仁尼琴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尽管苏联宣传部门尽了一切努力加以阻挠(而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正是因为它们的阻挠),但1970年10月8日,索尔仁尼琴荣获了诺贝尔奖。尽管苏联的宣传机构讳莫如深,但获奖这一事实明确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事实:可以将索尔仁尼琴开除出作家协会,但要将他从文学中,从俄罗斯和世界文学中开除出去,那是不可能的。索尔仁尼琴再次要求当局(这一次他是向“灰衣主教”米·安·苏斯洛夫提出要求)出版长篇小说《癌病房》和刚刚完成的《1914年8月》。<sup>11</sup>

“索尔仁尼琴的问题”要求当局做出决策。1970年10月29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提出了这样一个解决方案:“如果索尔仁尼琴正式提出前往瑞典领取诺贝尔奖的话,可以满足他的这一要求。至于他返回苏联的问题,将根据他在国外的表现来决定。如果索尔仁尼琴决定留在国外,那么,我们认为,采取一切措施迫使他回国未必就是合适的。”<sup>12</sup>当局指望“问题能够自行解决”:作家去领奖,肯定会在那里发表一些声明,而这些声明很容易被视为反苏声明,那样的话,也就不允许他回家,不允许他返回俄罗斯了。而更好的情况是,如果他自愿留在瑞典的话,那么当局就可以指责他背叛祖国,说他没有爱国主义精神……

然而,索尔仁尼琴看穿了当局设立的陷阱,拒绝前往瑞典领奖。于是,安德罗波夫与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一起,在一个月之后,也就是1970年11月20日提出建议,建议颁布“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关于剥夺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sup>13</sup>

在这种情况下,内务部长尼·阿·晓洛科夫所坚持的立场却令人

感到意外。他直接上书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饶有兴趣地读了晓洛科夫的信件,并在一些文字下面画了很多道道。这一立场与安德罗波夫的意见截然不同。晓洛科夫证明说,索尔仁尼琴成了思想斗争的大人物,“客观上讲,索尔仁尼琴是个天才。是文学界不同寻常的人物。”晓洛科夫写道:“在解决索尔仁尼琴问题的时候,必须分析一下我们过去对创作者所犯下的错误。”晓洛科夫提醒说,就在不久前,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时候,索尔仁尼琴因为写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这本书而被吸收进作家协会,并获得了巨大的荣誉,却又因为站在同样的立场上写了另一本书《癌病房》而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内务部长肯定地说:“索尔仁尼琴问题是文学界愚蠢的行政管理者制造出来的。”内务部长提到了当局过去在对待作家(从布宁、安德烈耶夫、库普林到帕斯捷尔纳克)方面犯下的众多错误。按照自己的自由思想,晓洛科夫将军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历史证明,我们对待这些作家的态度是不正确的。更有甚者,在对待索尔仁尼琴这件事上,我们今天正在重犯当年对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犯下的最愚蠢的错误。”将军的这些结论如果从别人的嘴里说出来,肯定会被视为反苏言论。晓洛科夫认为,禁止作家领取诺贝尔奖而造成的最严重失误,又因为作家获奖后遭受迫害而“扩大了100倍”。

320

晓洛科夫的意见是:我们应当做的,不是公开地处死敌人,而是紧紧地拥抱他们。这是文学界的领导同志们应当懂得的基本常识(这是勃列日涅夫画了线的一段文字)。

晓洛科夫的建议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意见截然不同:允许索尔仁尼琴出国后,无论如何也不能剥夺他的国籍;立即在莫斯科给索尔仁尼琴提供一套住宅。晓洛科夫写道:“简言之,应当争夺索尔仁尼琴,而不是将他抛弃。应当为争夺索尔仁尼琴而斗争,而不是反对索尔仁尼琴。”(这是勃列日涅夫画了线的一段文字)<sup>14</sup>

不论是对晓洛科夫的报告,还是对待总书记的意见,苏共中央书记处的态度极其慎重。苏斯洛夫于1971年10月7日主持书记处会议,将晓洛科夫的笔记归纳为一个问题——是否给索尔仁尼琴在莫斯科上



户口的权利。书记们认为,最好将索尔仁尼琴迁到梁赞,或者,至少要允许在马雷雅罗斯拉夫策建房子,但最好还是与国家安全委员会商量一下。在大棒加胡萝卜政策方面,书记处更倾向于使用大棒。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全世界到处发表污辱索尔仁尼琴的公告,对他步步紧盯,还对他的亲朋好友进行跟踪。从1972年春开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联总检察院一起,再三要求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并将他驱逐出境。1972年3月30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专门非常仔细地研究了这一问题。会议还提出了一系列其他问题,这些问题对于理解当时苏联政治来说非常重要。例如,索洛缅采夫指责索尔仁尼琴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声称:“民族主义本身就是危险的,而当它与反苏主义和反共主义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更危险了。”他认为,与持不同政见者有关的许多问题,应当由赫鲁晓夫承担责任。他说:“就是赫鲁晓夫发现了亚基尔……发现并抬举了索尔仁尼琴……”苏斯洛夫补充说,米高扬应当与赫鲁晓夫共同承担这一责任。波德戈尔内、索洛缅采夫、格里申、库纳耶夫在发言时,都谈到了民族主义和民族政策的问题。他们明显感到不安,但解决办法还是老一套:改善宣传工作,不鼓励“一切形式的历史旧习”,同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在对索尔仁尼琴一致抱有敌意的情况下,会议将有关索尔仁尼琴问题的争论归结为一个问题:哪种方法更合理、更安全?是将他在国内进行隔离,还是将他驱逐出国?<sup>15</sup>会议责成波德戈尔内和安德罗波夫拿出意见。

1973年9月5日,索尔仁尼琴给勃列日涅夫发去一封政治性论文《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该文本身就值得进行专门的分析。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苏联,该文是对俄罗斯在苏联的命运,对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相互关系以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与其陈旧、僵硬的思想外壳之间的日益增长的冲突,对俄罗斯和世界文明发展的实际前景进行首次研究的行动之一。努力研究俄罗斯在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特殊道路,是索尔仁尼琴的特色。<sup>16</sup>

321 对自己《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这篇论文,索尔仁尼琴根本不抱幼稚的幻想。他明白,领袖们“心里的夙愿是要保持我国的国家制度



和思想体系不发生变化,并千秋万代地保持下去。但是,在历史中,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即使在今天,索尔仁尼琴论文中的许多观点,也是具有迫切的现实意义的。

小说《古拉格群岛》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指责极权主义制度在整个苏联历史中所犯下的罪行。该书出版后,索尔仁尼琴开始受到新一轮迫害。大量诽谤性的文章再次出现,索尔仁尼琴的问题也再次出现在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记录中。在1974年1月7日举行的会议上,政治局通过了对索尔仁尼琴追究刑事责任的决定,因为他“恶毒从事反苏活动,将书、信和访谈手稿交给境外的出版社和新闻机构,这些手稿的内容攻击苏维埃制度,攻击苏联、苏联共产党及其内外政策,亵渎人们对弗·伊·列宁和苏联党和国家其他活动家、对伟大卫国战争和德国法西斯占领期间牺牲的人们的真诚怀念……”<sup>17</sup>

国家安全委员会一次又一次地建议驱逐索尔仁尼琴,剥夺他的国籍。1974年2月11日,该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批准。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了“不得公布的”“关于剥夺亚·伊·索尔仁尼琴苏联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

国家安全委员会以自己的方式竭力折磨索尔仁尼琴:在流放索尔仁尼琴之前,将其逮捕,关进列弗尔托沃监狱。先是向他宣布指控他背叛国家的正式起诉书,然后,又向他宣读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关于将其驱逐出境的命令。<sup>18</sup>

## **新斯大林主义和为“意识形态净化”而斗争**

斯大林被埋葬了。克里姆林宫城墙旁的斯大林墓长时间没有树立起半身纪念雕像,在党的领袖们的墓群中,这是惟一的。30年前,也就是1969年12月17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政治局委员们突然谈起了约·维·斯大林90冥诞将至的话题。

提起这一话题的原因是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关于斯大林的文章?很快,这一话题演变成了一场争论,并且,是一

场原则性的争论。因此,该争论被以政治局“工作记录”的形式,记录下来。<sup>19</sup>

勃列日涅夫提出了问题:从整体上讲,应当发表文章吗?

苏联的主要思想家米·安·苏斯洛夫坚持发表文章。苏斯洛夫说:“我认为,全国都在期待着这样的文章,更别说格鲁吉亚了……格鲁吉亚人特别期待发表这样的文章。我想,所有的人,包括一些同志提到的知识分子在内,都会正确地理解我们的立场的。不能正确理解的,可能只有索尔仁尼琴和索尔仁尼琴之流,而正常的知识分子占大多数,他们会正确地理解的。”

322

尼·维·波德戈尔内持反对意见。需要提醒的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正是波德戈尔内提出了将斯大林遗体移出陵墓的建议。波德戈尔内提醒政治局委员会们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包括苏斯洛夫在内,都曾经反对过个人崇拜。他说:“我不认为应当以什么方式庆祝斯大林诞辰90周年。如果要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话,那么,应当写的是,有什么人丧生在他的手中,有多少人丧生在他的手中。我认为,不需要这么做,这么做是不正确的……没有任何人逼着我们发表文章。也没有任何人请求我们这么做。那样做的话,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将不理解我们。所以,我认为,这种文章除带来危害外,毫无益处。”

阿·雅·佩尔谢也反对发表这种文章。他说:“斯大林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危害,而这种痛苦至今还感觉得到。要知道,受害的那一代人还活在我们中间。90岁,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也不会产生任何新意。也许,不需要发表长篇文章,也许,可以发条简讯。”

鲍·尼·波诺马廖夫谈了在《真理报》上发表纪念斯大林的文章可能带来的危害。

然而,接替波德戈尔内担任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职务的П.Е.谢列斯特,对波德戈尔内进行了攻击。他说:“可能我说的观点与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有些对立,不过,我的观点意思明确。我觉得,文章是需要的……我觉得,文章不必太长,应当是正确的,既需要做一些肯定,也需要有一些否定。我国大多数人,包括知识分子在内,

会正确地理解我们的：再说了，还应当考虑的是，最近几年，我们的元帅和将军们在其回忆录中都大量地描写了斯大林……”

波德戈尔内说：“既然说到历史，那就应当写有多少人被他杀害了。”

谢列斯特说：“问题不在于列举数字，而是应当根据中央委员会决议的精神，指出他存在着的错误。而在斯大林领导下进行的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该怎么写呢？全世界谁都知道这一点。我想，应当发表文章。也许，还需要对文字进行研究，但那是另一回事儿。”

谢列斯特的意见得到了基·特·马祖罗夫的支持。马祖罗夫说：“我觉得，发表文章比故意不提这一事实更有利。文章应当短小，但应当观点正确……如果我们不把历史中发生的事件写出来，怎么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

而且，我觉得应当考虑给斯大林墓树立纪念雕像的问题。我告诉您们胡萨克同志（古斯塔夫·胡萨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他在苏联的帮助下，取代了共产党改革派分子亚·杜布切克——作者）对这件事的反应。当我陪同胡萨克去瞻仰列宁墓，走近斯大林墓的时候，胡萨克问我，斯大林墓为什么没有纪念雕像？我告诉他说，最初我们没来得及树立纪念雕像，而后来不知怎的，没再研究这件事。胡萨克说：我认为，这是不对的。应当树立纪念雕像。这就是曾经遭到斯大林迫害的胡萨克的观点。是的，我想，任何一位正常的人都会这样看的。”

安·帕·基里连科的立场更为谨慎。他赞成发表文章，但又强调说：“人们的心情是各不相同的，现在很难说什么人赞成，什么人反对，有多少人赞成，有多少人反对。”基里连科警告说：“在欧洲没有一个党会拥护这种文章。我们应当考虑。”

323

不过，大多数政治局委员赞成发表文章。这些人有：维·瓦·格里申、亚·尼·谢列平、德·弗·乌斯季诺夫、阿·尼·柯西金、根·伊·沃罗诺夫、米·谢·索洛缅采夫、伊·瓦·卡皮托诺夫、丁·艾·库纳耶夫、夏·拉·拉希多夫、弗·瓦·谢尔比茨基。

谢列平提醒说：“举个例子，战胜希特勒德国 20 周年之际，勃列日涅夫同志在报告中提到了斯大林，当时人们是什么态度呢？因此，我想，人民将会做出良好反应的。”

尤·弗·安德罗波夫声称：“毫无疑问，这种文章是需要发表的。如果我们这样做了，不会造成任何危害。当然了，如果我们不发表这样的文章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害处的。不过，同志们，这个问题是我国的内部事务，是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应当自己解决，不要在乎国外的反应……我告诉您们一个国外的反应。以卡达尔为例子，他在同我交谈时说：‘您们为什么不将伏尔加格勒改名为斯大林格勒？不管怎么说，这是历史上的名称’。这就是卡达尔的反应。我也认为，应当发表这样的文章。”

白俄罗斯领导人彼·米·马谢罗夫随声附和安德罗波夫的意见。他说：“我完全明确并且毫不动摇地认为，应当按照在座的同志们所说的精神，发表这样的文章。人民会很好地接受的。不发表文章会引起大量的猜测和疑问。”

勃列日涅夫在进行总结时强调：“我觉得，从基本上讲，在座各位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至于说到发表文章的事，我坦率地告诉大家，最初我是持否定立场的。我曾经认为，我们不应当发表文章。并且，我的出发点是，我们现在一切都平安无事，所有的人都已经平静下来了……我们值得再次提出这一问题吗？但是，在与多位州委书记交谈，重新进行思考和听了您们的发言后，我想，如果我们发表这样的文章的话，的确将会利大于弊……当然了，这里说的并非是要列举一些死亡人员数字等等。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要心平气和地发表文章，在于苏共中央对该问题的理解程度，在于要符合苏共代表大会决议精神和中央相关决议的精神。”

文章发表了。1970 年，斯大林墓树立起了纪念雕像，纪念雕像是由雕塑家 H. B. 托姆斯基雕刻的。

在经历了 1968 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苏联国内开始匆忙进行经济改革，也就是“柯西金改革”。新斯大林主义被确立起来：信奉

老的思想价值观、“意识形态纪律”和在斯大林时代被扩大到神秘程度的“领导层稳定”。

政治晴雨表明显偏向于斯大林“大清洗政策”的拥护者一边。因此,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看来,对过去的批判成了对现行制度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心怀不满的证据。

《十月》月刊及其主编 B. C. 科切托夫是与《新世界》杂志相对抗的文学家集团无可争议的领导者。1969 年,科切托夫发表了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部文学作品,不如说是一桩政治丑闻。小说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充满恼恨,不接受苏共“二十大”对过去的揭露,深信西方影响对国家的危害,对法西斯入侵苏联的行动与美国情报人员、破坏分子、间谍和传统道德的败坏者的行动之间的界限,进行了大量的描写和评价。政治上的恶毒明显地损害了文学造诣,而小说立即成了人们嘲弄和讥讽的对象。 324

1970 年 4 月,国家安全委员会向苏共中央委员会报告说,莫斯科正在流行科切托夫的长篇小说《你到底要什么?》的讽刺性模拟作品,作品是打字机打出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那些“穿便服的文艺学家们”认为,该模拟作品的作者是讽刺作品作家 3. 帕佩尔内。他利用了科切托夫小说的情节:在模拟作品中有一名意大利人,他的妻子是俄罗斯人。意大利人在莫斯科的时候是一名共产党员,而在意大利,则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他告别了自己的共产主义昨天。还有一名美国女歌唱家,她受特工机关的委派,到莫斯科来腐蚀苏维埃人。还有一个萨马林工人朝代。下面是模拟作品中的一段:

“……费利克斯·萨马林朝代的工人不存在父子之间的冲突。”

“好吧,父亲,让我们谈谈吧”,儿子说。

“好吧”,父亲同意了。“但只能谈心里话。我不想在鸡毛蒜皮的小事上耗费精力。儿子,什么事让你担心?”

“有两件事情让我心里不安”,费利克斯坦率地承认说。“一件是德国复仇主义,一件是美国帝国主义。父亲,在这方面应当有所作为。还有一个难题。我早就想问了。请告诉我,有 1937 年吗?莫不是在



1936 年结束后,马上就开始了 1938 年?”

“有 1937 年! 怎么会没有呢!” 父亲含糊地说。他的观点变得冷冰冰的,但双眼却变得温和起来。“这是一个含有 X、Y、Z 三个未知数的方程……” 父亲心里默默地说。

“……”

“请原谅,父亲,又打扰你了”, 费利克斯边说边走进屋来。“因为还是那个问题,到底有 1937 年,还是没有? 我不知道究竟该相信谁”。

“没有”, 父亲回答说。他的声音像慈父般地柔和。“孩子,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1937 年,苏联历史的标志年,是否存在过? 官方宣传机构越来越常见的做法是努力遵循讽刺作品作家开的药方:“1936 年结束后,马上就开始了 1938 年。”

历史学家 A. M. 涅克里恰将当年苏联对外政策出现错误的责任都推到了最高统帅的身上,认为这些错误使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准备工作变得容易了。他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失算在相当程度上造成了战争初期的悲剧。涅克里恰的这些反斯大林言论,使这位历史学家成了政治迫害的对象,结果,他不得不流亡国外。

对待斯大林的态度,对待过去发生的政治大清洗的态度,在政治上具有了迫切的意义。对过去的批判,在更大程度上成了知识分子政治觉悟的一部分,而这种过去,被与当代的生活直接地联系起来。

许多团体,主要是青年团体和大学生团体进入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视野。在这些团体中,也有相对无辜者。例如,在图阿普谢市,就曾存在过一个地下团体“争取民主俱乐部”,这个团体是由图阿普谢市第三中学 8—9 年级的一些学生组成的。这些学生对历史感兴趣,在父母们“带有偏见的”行为的影响下,评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所造成的后果。他们听 BBC 和“自由电台”,起草了自己的纲领和章程,书写了近 40 份传单。

较为严重的是萨拉托夫的一个大学生团体。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资料,该团体从 1967 年初开始存在,直到 1969 年 8 月。加入该

团体的有一些高等院校函授部和函授部的大学生,主要是萨拉托夫的高等院校。该团体的成员不赞同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国家管理、经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方面的政策,提出了与现行制度进行斗争的任务。他们认为,必须组织起地下支部和小组,然后将这些支部和小组联合成一个“新的、真正马克思主义类型”的政党,必须培养宣传人员,以便做群众的工作,通过宣传,为进行“新的革命”,推翻苏维埃政权创造条件。小组拥有章程,章程对小组的机构、接受新成员的程序、成员的义务、依靠成员缴纳会费积累起来的资金,都做出了规定。小组印制并以不同方式复制了“反苏和政治上反动的”文件。

萨拉托夫法学院的大学生奥列格·米哈伊洛维奇·谢宁、瓦连京·伊万诺维奇·基里科夫、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博布罗夫,萨拉托夫大学的大学生和毕业生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罗曼诺夫、德米特里·格奥尔基耶维奇·库利科夫、米哈伊尔·格奥尔基耶维奇·福克耶夫加入了地下小组。

该组织成员都是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的优秀大学生。这些高年级的大学生们(其中有的人已经有了家室)在函授部和夜校部打工,挣点生活补贴。他们出身于大学生的典型家庭:父母是教师、工人、退役军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在大学宿舍和教室里进行正常的生活学习,而是去建立了组织。这种组织被他们视为社会主义的组织。但这种社会主义,并不是前不久列入苏联全体高校教学计划的《科学共产主义教程》中的公式化的社会主义。再者,这些大学生们努力自己分析国家的历史,试图自己理解在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与他们的生活环境进行对比时出现的矛盾。而感觉到了这些明显矛盾的教师们,意味深长地保持沉默。所有这一切,促使这些大学生们走进科学图书馆,迫使他们自己拿起笔,尝试着研究和弄清国家所坚持的那个制度。

下面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给苏共中央的函件中的一段:

“在实施逮捕行动时,从小组成员那里……查获了大量反苏作品:手稿 20 份,计 167 页;打字稿 72 份,计 566 页;照相复制品 15 份,89 页;照相胶片 100 张,上面拍有反苏材料和文件。还查获了复制这些材

料的设备:打字机4台、照相机和用于阅读胶片的幻灯片放映机4部。

326 查获的材料包括《资本的末日》、《自由的号角》、《说谎的制度》、《论斯大林主义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与炸肉包》、《苏联帝国主义的对外政策》等等。这些材料否定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性质,歪曲苏维埃国家的基本发展阶段;认为苏联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阐述了在苏联建立地下支部与小组,进行敌对宣传,组织罢工、游行示威和起义的纲领性目标;诬蔑社会关系、教育制度、党政机关的工作;粗暴地歪曲国家政策,煽动推翻苏维埃政权。”

文学作品和当时的政论文章对这些年轻人的政治信仰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给中央委员会的函件中,列举了萨拉托夫地下组织成员在其文章中引用的这些书籍的清单,包括:亚·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A. 杜金采夫的《不单靠的是面包》,B. 萨温科夫的《一名恐怖分子的回忆》(“拍岸浪”出版社,哈尔科夫,1926年),B. 莫扎耶夫的《费奥多尔·库兹金的一生》(《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6期),叶·叶夫图申科的《我的生平经历》(手稿),列·托洛茨基的《列宁论托洛茨基和托洛茨基主义》和《新方针》(《大学》杂志,1925年第1、2期),M. 弗伦克尔的《民族—党派—官僚》(《世界政治与国际关系》杂志,1968年第11期),Л. 戈尔巴诺夫斯基的《自由与民主》,《杜宾卡监狱面向过分聪明者》(《科学与生活》杂志,1968年第1期),Л. 普列沙科夫的《为什么我不穿西装背心》(《共青团真理报》1967年6月28日),瓦·贝科夫的《死者心里不难过》(《新世界》杂志,1966年第1期),A. 沙罗夫的《亚努什·科尔恰克与我们的孩子》(《新世界》1966年第10期),B. 坚德里亚科夫的《长眠》(《莫斯科》月刊,1968年第3期),A. 加尔金的《德国法西斯》(“科学”出版社,1967年)。叶·叶夫图申科的自传非常受欢迎,叶夫图申科被形容为“革命诗人,争取社会公正的斗士”。

受到这些青年人喜欢的还有其他一些私自出版的作品(他们阅读了尤·达尼埃尔和A. 西尼亚夫斯基的讲话,亚·伊·索尔仁尼琴致作家协会的信)。

摆在这些大学生面前的,本应是才华横溢的毕业生所拥有的锦绣前程。其中的一名大学生(基里科夫),被请进了苏共历史教研室的研究生班,他被许以“受到保护的”党的历史学家的丰厚福利待遇。他认为,这种有失体面、恬不知耻的许诺,是对他的污辱;而其他的大学生们,本来大概也会成为优秀的法律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学者的。然而,他们大声地说出了自己的推断:苏联是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的统治阶级是官僚,他们掌握了一切政治和经济权力,而苏联的工人阶级受到官僚的剥削。因为这些推断,谢宁被判处监禁7年,流放2年,基里科夫被判6年劳改,2年流放,罗曼诺夫被判6年劳改,库利科夫——5年劳改,博布罗夫——4年劳改,福克耶夫——3年劳改。

这就是因为信仰而受到“迫害”一词的准确含义。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一个自称为“自由俄罗斯党”或“革命工人党”的青年小组被破获。该小组成员主要是一些青年工人和大学生。他们是:佩斯科夫兄弟两人、沙布罗夫、乌兹洛夫、别尔谢涅夫、库利科夫、乌哈博夫。不过,破获该小组的工作并不复杂。因为该小组自己暴露了自己,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动,毫不夸张地说,是当着全市人的面采取了行动。11月7日,该小组成员在工学院和法律学院的节日游行队伍中分撒传单。传单是用打字机打印的,名称叫“苏联劳动青年致苏维埃政府的照会”和“否定未来,肯定过去,就是当代的社会主义”。

327

同时,抗议运动出现了一定的变化。

我们可以用下列方式来描述他们:曾经天真地信仰50—70年代初的社会主义,希望建设“带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希望通过其“非斯大林化”的运动,改变政治制度。他们的信仰与希望逐步破灭。政治抗议行动的中心课题,几乎变成了为争取西方式的,而不是社会主义式的人权与民主而斗争。替代他们的社会主义信仰的,是一些要求:要求严格遵守法律,通过使本国法律接近国际法律标准的途径,修改国家的法律。

其他抗议方法的采用,以及向国际社会舆论求助的行动,创造了一个运动,被称之为“持不同政见运动”。抗议运动变得“更加具有职业水

平”，并且，与国际人权组织的活动联系在一起。1970年，B. H. 恰利泽建立了保护人权委员会，委员会成员有科学院院士安·德·萨哈罗夫和科学院通讯院士И. P. 沙法列维奇，1973年，“国际大赦”组织中产生了俄罗斯分支机构，领导人是B. Ф. 图尔钦和A. H. 特韦尔多赫列博夫。

1975年8月1日，苏联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终文件。对于持不同政见运动而言，这是最重大的事件。最终文件承认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承认战后国家边界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作为回应，苏联政治领导人不得不承认人权和一定的政治自由权，承认对上述权利遵守情况的监督实现“国际化”，不再只是一个国家的内政问题。

结果，人权保护组织在苏联应运而生，它们的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法的庇护。苏联领导人不想认同这一局面。就扩大了剥夺持不同政见者国籍并将其驱逐出国的实践应用范围，特别是对那些在西方国家已经拥有名气，又不能采用传统的处罚措施加以惩罚的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也改变了方式。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了诉讼前的，或者准确地讲，叫诉讼外的“诉讼”这一特别方式，大大地提高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能力。<sup>20</sup>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75年10月提交给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提供了初看起来令人快慰的事实，证明政治迫害案件在减少：“对1959—1966年和1967—1974年两个时期进行比较表明，在后一个时期中，被追究刑事责任者的数量，几乎下降了一半（从8664人下降到了4879人）。在一些特别严重的刑事犯罪案件方面，这种下降趋势更加明显：因叛国而受到起诉的罪犯人数从1467人下降到773人（减少了一半）；因从事反苏宣传和鼓动而被起诉的罪犯人数，从2103人下降到了739人。”

328 然而，恰恰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家安全委员会所谓的“预防警告”工作大幅度地加大了力度。正如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自己所写的：“1967—1974年间，受到刑事追究者的人数与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预防警告’的人数的比例为1:25。而在诸如从事反苏宣传鼓动之类特别重大的国事犯罪方面，这一比例值为1:96。”所谓的“预防警告”，成了得到当局批准的、直接干涉人们生活的方法，因为这



些人的思想和行动不应按照苏联法律进行审判,但却被潜在地认为对政权构成威胁。国家安全委员会还从许多受到警告和恐吓的人中,为其间谍机关招募人员。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引用了重要的统计数据(参见表1)。值得注意的是,“多次受到警告者”的数量超过了被追究刑事责任者的数量(大约为20倍)。表一最令人信服地表明,国家安全委员会活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打击政治敌人——每300—400名被指控从事反苏活动的人和将近每六万名“受到警告者”中有十名被当做间谍逮捕。

表1 1959—1974年间被追究刑事责任者和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预防警告者的人数资料

	1959—1962	1963—1966	1967—1970	1971—1974
被追究刑事责任者总人数	5413*	3251*	2456*	2423*
因叛国罪	1010	457	423	350
因从事间谍活动罪	28	8	0	9
因从事反苏宣传鼓动罪	1601	502	381	348
因走私罪	47	103	183	474
因违反外汇业务规定罪	587	474	382	401
因非法穿越国境罪	926	613	704	553
因泄露国家机密罪	22	31	19	18
因其他犯罪	1003	1011	328	258
受到警告的总人数	无统计	无统计	58298	63108
其中:				
与外国人保持可疑联系 有叛国动机者			5039	6310
因政治有害行为			35316	34700
在公众参与下(在会议、 同志审判庭、公众代表参 加的谈话中)受到警告者			23611	27079
(1973—1974年)被正式 宣布警告者				981
先受到警告后被追究刑 事责任者			100	50

\* 资料来源如此。

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中,为“意识形态纯洁”而斗争几乎成了主要工作之一。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的报告说,“由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积极行动……破坏了反苏分子从组织上团结起来,打着保护苏联‘人权’的旗号,在国内煽动重大敌对行动的企图,破坏了敌人试图将赫尔辛基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最后文件的普遍原则用于敌对目的的企图。

在按照文化、科学交流计划和作为旅游者进入我国的外国人中,发现了大量外国犹太复国主义组织和其他反苏组织的密探,因企图在苏联从事意识形态破坏活动,有 114 名外国人被驱逐出境。679 名外国反苏团体的密探和工作人员被禁止进入苏联。

没收了外国破坏组织寄到苏联的 29 万 multiple 份思想上反动的材料,1975 年,对 2 万名实施了政治上有害的行动、但却没有故意犯罪的人进行了‘预防警告’处理。25 名积极参加犹太复国主义行动和煽动其他反苏行动者,被通过移民渠道驱逐出境……犹太民族主义分子的敌对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得到遏制。他们反社会的挑衅行动被制止。他们企图叫喊在苏联建立所谓‘犹太文化自治区’的口号,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以扩大其影响的图谋被粉碎。移居国外的趋势减弱,许多积极的民族主义组织发生分裂。某些日耳曼族公民和克里米亚一鞑鞑‘自治分子’的集体反社会行为受到孤立。

许多所谓的教会理事会的首领、具有反动思想的天主教司铎、主教和其他这类人员的敌对行动,也受到孤立。敌人企图建立新的合法的与地下的教会—宗派组织的计划被粉碎。

……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防止了苏联科学院历史、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研究所的个别科学工作者,以及某些反对在文艺中坚持党性和思想性的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家、电影工作者在地下修正主义基础上,联合成集团的行动。

粉碎了萨哈罗夫及其同伙企图充当国内各个敌对分子集团联系人,以及这些集团与国外的破坏组织之间的联系人的企图。”

从国家安全委员会 1975 年的报告中摘出的这一大段引文,对于国

家安全委员会在70—80年代初起草的、反映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情况的其他报告来说,是相当典型的。<sup>21</sup>

## 政治改革

20世纪70年代下半期成了通过苏联新宪法的时期。该宪法不仅将取代旧的、1936年通过的、赫鲁晓夫统治集团近年来企图更换的斯大林宪法,而且,还要代替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承诺在20年中,也就是在80年代初建成共产主义的、在一定程度上最终失败了的苏共纲领。

1977年的苏联宪法宣布,将在苏联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该部宪法声称:“人类开始了从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变。在打退了帝国主义的干涉,取得了国内战争中的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实施了最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永远地结束了人剥削人的制度,结束了阶级对抗和民族仇恨……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建立了劳动群众的真正民主。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

宪法将苏联描述成“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利益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按照宪法,“以生产资料归国家(全民)所有和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为形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构成了苏联的经济制度基础。……任何人无权利用社会主义财产谋取私利和将社会主义财产用于其他自私的目的。”国家财产是全苏联人民的共同财富,是社会主义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此外,苏联承认集体农庄合作社所有制(需要指出的是,在许多方面这只是供观赏的,实际上与国家所有制区别不大)。

宪法中第一次列出专门条款,宣布苏联共产党是“政治制度的核心”。党作为苏联最重要的国家机构这一从不掩饰的角色,变得绝对明确。这一原则在修改苏共章程时,做出了规定。修改后的党章规定,任何机构和企业的活动,都要置于其党组织的监督之下。结果,党的机

构：州委大楼、区委大楼、政治教育大楼、高级党校、党的档案馆和特种门诊部等，像发酵一样迅速地在苏联各地发展起来。

331 苏联共产党企图控制和领导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不经当地党组织的批准，就不能通过任何决定，不管该决定重要与否。这样的后果是，苏联共产党的人数迅速增加。这是存在国家党的另一面。因为取得党员资格是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各级党组织中存在着实用主义者，他们对共产主义的华丽词藻无动于衷。虽说过去也存在着这样的人，但现在党组织中这种人的数量增加了。党员资格成了一切升迁的必要细节。为了努力担当领导责任，党本应当不仅根据思想上的表现，而且，还要根据最普通的、技术方面的表现，接受人们加入到它的队伍中来，直接推荐人们成为共产党员，以便对所有的管理机关实施监督。而与此同时，大多数普通党员明显地与党的机关相脱离了。

按照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轨道进行有关新宪法的讨论，以及依据苏联新宪法通过加盟共和国新宪法的工作，意外地遇到了严重的问题。在新通过的苏联宪法中，没有关于国家语言的条款。这符合关于苏联各民族亲近和建立新的同一民族——苏联人民的理论前提。

然而，在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及纳希切万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的宪法中，已经设立了关于国家语言的条款。威胁取消关于将格鲁吉亚语作为国家语言的条款，将会导致格鲁吉亚人，首先是知识分子和大学生阶层的公开抗议行动。

1977年12月23日，党的思想家鲍·尼·波诺马廖夫、康·乌·切尔年科、伊·瓦·卡皮托诺夫和米·瓦·齐米亚宁给苏共中央写信说：“不能排除的是，从外高加索诸共和国，特别是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共和国宪法中，取消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的关于国家语言的条款，可能招致一定阶层民众，甚至国际社会的负面反应。”

宪法被通过了。苏联宣布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家家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我们本来等着在1980年实现共产主义，但却等来了

奥运会。”

## 经济改革的尾声

尼·伊·雷日科夫是苏联的倒数第二位总理。60—70年代曾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的工程师,他回忆说:“改革真诚地开始了,而在60年代末,却突然草草地收场了。而且,在基层,在生产部门,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和令人心痛:刚刚缓过气来,氧气就被切断了……那些认为经济变革将对政治稳定构成威胁的人,只是在等待扼杀这场改革的理由。而这种理由,到底还是让他们等到了。1968年春,布拉格之春,可把教条主义思想的中坚人物和维护者们吓坏了。”<sup>22</sup>

苏共中央十二月(1969年)全会决议规定,放弃进行经济改革。决议中还包含了习惯性的要求:改善生产潜力的利用,加强国民经济中的管理制度。经济管理杠杆被行政指令方法所取代,中央号召打击破坏国家和劳动纪律分子,反对经营不善,加强对遵守劳动纪律情况的监督。 332

国家获得了大量的、实际上是意外的外汇收入来源。1960年,在西西伯利亚北部地区发现了大型石油天然气储量后,国家获得了额外的资金,这使解决经济中所存在问题的的工作,失去了必要性。石油成了苏联经济的毒品,国家越来越依赖于石油天然气的出口。从1970年到1980年,西西伯利亚的石油开采量从3100万吨增加到了3.12亿吨,同期的天然气开采量从95亿立方米增加到1560亿立方米<sup>23</sup>。巨大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将燃料输送到西方国家换取外汇,再用这些外汇为国家购买食品和高技术设备。

苏联农业部门出现的危机,决定了国家整个的经济危机,迫使政治领导人从国外购买粮食。为此消耗了国家大量的黄金储备和外汇资金(参见表2)。



表 2

国家动用黄金储备购买粮食的资料

(单位:吨)

年份	总量	出口	其中用于购买粮食
1963	1082.3	520.3	372.2
1964	749.1	483.7	
1965	577.1	335.6	335.3
1966	739.2	5.2	
1967	864.4	50.2	50.2
1972	1243.7	458.6	458.2
1973	1032.0	382.5	382.5
1975	1221.0	141.0	
1976	1001.4	362.8	362.8
1977	774.4	390.0	390.0
1978	498.0	412.0	
1979	510.0	168.0	158.0
1980	502.0	156.0	156.0
1981	452.0	286.0	
1982	576.0	30.0	30.0

注:本资料是由 A. B. 科罗特科夫和 A. C. 斯捷潘诺夫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室的资料计算出来的。缺 1968—1971 年间的资料和 1974 年的资料。

333

国家对在国外采购粮食的依赖,变得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危险。谷物饲料类产品的进口实际上持续增长:1973 年的采购量占苏联国内总产量的 13.2%,1975 年占 23.9%,1981 年占 41.4%。<sup>24</sup>

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经济上的不平衡现象在悄悄地加剧。即便是根据官方的统计,也是如此。1975 年,俄罗斯联邦可以将在其境内征收的营业税的 42.3% 留给自己,乌克兰——43.3%,拉脱维亚——45.6%,摩尔达维亚——50%,爱沙尼亚——59.7%,白俄罗斯——68.2%,阿塞拜疆——69.1%,格鲁吉亚——88.5%,亚美尼亚——89.9%,塔吉克——99.1%,吉尔吉斯——93.2%,立陶宛——99.7%,乌兹别克——99.8%,哈萨克——100%,土库曼——100%。此外,乌

兹别克、哈萨克、立陶宛、吉尔吉斯、塔吉克可将从国民手中征收的所得税 100% 地列入其国家预算收入中。这一情况在苏联 1976 年和其他年份的“苏联国家预算法”中可以看到。对其他加盟共和国经济的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要比对俄罗斯的这一指数高出 1—3 倍。<sup>25</sup>

但与此同时,这些加盟共和国却形成了这样一种观念:它们每个加盟共和国中存在的经济难题,恰恰是俄罗斯给造成的。

到了 20 世纪 70 年代末,经济中的大量问题变得清晰起来。对工业企业建设的大量投资,对诸如将北方的河流改道使其流向南方,流进中亚地区之类雄心勃勃项目的大量投资,并没有产生回报,长期不能完成的“胡子工程”数量增多,工业部门广泛使用手工劳动和低专业水平的劳动,造成劳动力资源不足,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和其他一些工业部门,情况更是如此。军备竞赛对国家经济所造成的不良趋势,虽说不太明显,但却非常危险。就本质而言,苏联企图单枪匹马地在军事领域与美国和北约、中国进行竞赛。大量的资源被投进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黑洞”里。

20 世纪 70 年代末,苏联试图在工业领域推行改革。这次改革行动,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阿·尼·柯西金及其副手:B. H. 诺维科夫和 B. A. 基里林的名字是分不开的。然而,他们并没有走多远。1979 年,根据苏联部长会议的指示,关于苏联经济的分析报告制定完毕。报告起草小组的领导人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 B. A. 基里林院士。报告描述了苏联经济形势的真实情景,并指出,国家的财政—经济问题将不可避免地越来越突出,工业部门需要进行彻底的结构改革,在使用新技术方面,苏联开始处于无望的落后状态。报告引起了愤怒和不满。基里林被撤销了职务,而报告也被封存了十多年。

在经济中,除了所谓的宏观经济指标外,还有一个人人都明白的指标,那就是人们菜篮子里和冰箱里所装的东西。从 70 年代下半叶开始,居民的食品供应情况明显恶化。产业工人对劳动报酬的不满日益增长。这种不满情绪的后果是,发生了对当时的苏联来讲真正严重的事件——罢工。这迫使苏共中央书记处于 1980 年 10 月通过了专门的

334

《关于因安排和支付职工劳动报酬方面的缺点而出现的消极现象的决议》。决议指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立陶宛、爱沙尼亚、车里雅宾斯克州、乌克兰、塞瓦斯托波尔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发生了工人罢工事件。<sup>26</sup>

在70年代末,苏联的政治领导层发生了一些人事变动。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这个职位,有两个候选人被考虑:苏共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区委第一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和苏共波尔塔瓦州委第一书记费·特·莫尔贡。中央委员会对戈尔巴乔夫很熟悉,因为苏联党的高级领导人常常在高加索的矿水城进行休息和疗养,而戈尔巴乔夫按照礼节,必定与他们见面。此外,政治局中两位最重要人物米·安·苏斯洛夫和尤·弗·安德罗波夫的履历与斯塔夫罗波尔有关联。戈尔巴乔夫之所以只从事农业工作,原因在于斯塔夫罗波尔地区是农业生产的传统中心,而戈尔巴乔夫通过函授的方式,从斯塔夫罗波尔农学院毕业,在获得莫斯科大学毕业证之后,又得到了一个农学院的毕业证书。

费·特·莫尔贡在最困难的年代,也就是在1954年底至60年代中期,在哈萨克斯坦工作过,参加过开荒劳动。最初担任国营农场场长,后来,升任切利诺格勒州农业局局长。还在哈萨克斯坦的时候,他就与农业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开始持之以恒地推行土壤耕作自然保护技术,数十年来,坚持反对采用深耕深犁的方法。后来,他又在苏共中央农业处工作了4年,在吉尔吉斯工作了3年(1969年—1972年),担任过吉尔吉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而从1972年底开始,担任波尔塔瓦州委第一书记。<sup>27</sup>

作为负责农业工作的中央书记的候选人,莫尔贡的专业水平,毫无疑问,要高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的同行。况且,因他在哈萨克斯坦工作的缘故,勃列日涅夫本人也认识他。然而,戈尔巴乔夫被优先考虑了。

不过,戈尔巴乔夫差一点自己毁了跻身中央委员会的前程。1978年11月底,戈尔巴乔夫被召到莫斯科。他并不知道此次被召进莫斯科的原因。康·乌·契尔年科的助手B.普里贝特科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他奉命立即找到戈尔巴乔夫。因为戈尔巴乔夫被提名为负责农

业的中央书记候选人,本来已经安排好了这位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与契尔年科见面的日程。但是,戈尔巴乔夫没等到见面,就到自己朋友那里参加酒宴去了。好不容易才在宴会上找到了他。先是将他送到契尔年科那里,后来,又送他去见勃列日涅夫。<sup>28</sup>假如这位助手不太机灵的话,那么,在苏联的政治历史中,就会出现别的人物了。

1978年11月2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决议,增补尼·亚·吉洪诺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增补的另一名政治局候补委员是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勃列日涅夫在对政治局委员们发表讲话时说:“在我们这里,来自高加索共和国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是阿利耶夫同志,他是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大家都知道,格鲁吉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加盟共和国,而格鲁吉亚党组织是我党的主要党组织之一。大家还记得,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早先曾进过政治局,因此,建议将增选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同志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问题提交全会讨论。谢瓦尔德纳泽同志是一位有能力的领导人,能够正确地解决问题。”

没有反对意见。

后来,勃列日涅夫推荐了戈尔巴乔夫。他说:“我们现在没有负责农业问题的中央书记。大家都知道,农业非常重要。农业口的工作,不能不由一名中央书记来负责。在这方面需要一个人,他首先要受过农业教育,具有在重要农业地区工作的经验。我认为,最好能够推荐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同志担任中央书记。我们大家都了解戈尔巴乔夫同志,他年轻,精力旺盛,很熟悉农业生产。他们今年的工作做得非常好,上交了大量农产品。”<sup>29</sup>

对此,也没有反对意见。

##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苏联的对外政策。越南**

20世纪70年代,在苏联的对外政策中,继续坚持积极支持全世界

社会主义国家的方针,既支持奉行“社会主义方针”的国家,也支持奉行“社会主义方针”的政治运动。在宣布“和平共处是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的原则的同时,苏联领导人继续奉行保持和扩大社会主义制度范围的方针<sup>30</sup>。就其本质而言,这一政策是“冷战”的继续,然而,在苏联与美国进行争夺的世界各地,具有了真正战争和军事冲突的色彩。

印度支那战争的继续,是苏联与美国外交利益冲突的最明显表现。而在所有的冲突中,主要的对手是相互需要的,他们努力将这种冲突控制在不使双方发生世界大战的边缘。令人惊奇之处在于,冲突双方相互依赖,就像依赖“客户”一样。对业已意识形态化了的对外政策原则的忠诚,常常使苏联变成了自己的伙伴们——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领袖们的“人质”。争取大国地位的逻辑,必定使苏联与其强大的对手美国形成复杂的关系:它们都有赖于其所支持的政治力量。争夺成为帝国的权力是要付出代价的,而有时候,这一代价是高昂的。

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一直保持着接触。336 美国国务卿 D. 拉斯克在 1967 年 7 月 19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问题并不在于没有外交渠道,而在于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对解决冲突的可能途径的观点,存在着原则上的对立。为了按照自己能够接受的条件,寻求摆脱越南战争的出路,里·尼克松政府在执政后不久就开始试探,试图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秘密讨论直接按照白宫的路线,解决越南战争的原则问题。

从越南冲突开始,到约翰逊政府宣布停止轰炸北纬 20 度线以北的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之日(1968 年 3 月 31 日)止的这一段时间里,美国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一切接触,实际上都是通过第三国的代表进行的。同时,美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提出的许多最重要呼吁,都是林·约翰逊政府通过苏联政府来做出的。这些呼吁直接关系到停止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以及在巴黎就越南问题开始谈判等问题。美国与越南的先期会晤于 1968 年 5 月 13 日在巴黎开始举行,后来,从 1969 年 1 月 18 日起,这种会晤变成了越南问题巴黎四方协商的正式会议。



在1969年1月前半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试图与北越人商定,亲自在巴黎或别的地方与北越人举行秘密会晤,以讨论业已形成的局面,寻求可能的解决方法,然而,他遭到了断然拒绝。因此,美国人向苏联提出了一系列建议,但美国人得到的答复是,苏联政府不会代替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举行任何谈判。

1969年3—6月,美国试图安排在巴黎举行不公开的秘密会晤。一方面,美国代表团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之间举行会晤,讨论军事问题,而另一方面,(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与西贡政府代表之间举行会晤,讨论政治解决越南南方的问题。然而,经过若干次会晤后,北越方面放弃了会晤,认为这种会晤是美国企图解决美国感兴趣的问题,而避免讨论政治问题。

1969年4月14日,亨利·基辛格受里·尼克松总统的委托,通过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向苏联政府递交了关于越南问题的意图的备忘录。美国方面希望苏联将这一意图告知河内。在声称愿意在相互能够接受的基础上解决越南问题的愿望的同时,尼克松表示,准备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莫斯科或华盛顿举行秘密谈判,以制定解决越南的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基本原则:从南越撤出所有的军队,在保证(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拥有参与南越政治生活、包括参加日期有待确定的选举的权利的条件下,实现停火。然而,尼克松不同意在举行选举前,在越南南方建立联合政府。美国的意图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大约5年内),越南南方保持“独立”,在此之后,美国不反对越南统一。

1969年8月4日,基辛格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团长春水在巴黎举行了第一次秘密会晤。基辛格在此次会晤中发展了美国1969年4月14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原则,以及尼克松在1969年5月14日的讲话中阐述的原则。大约与此同时,在7月中旬,尼克松通过非正式渠道给胡志明发去了一封亲笔信。他在信中笼统地呼吁各方共同做出努力,解决冲突。8月30日(胡志明去世前3天),越南民主共和国做出了答复。北越方面实际上重申了自己的正式立场。

337

1970年,在巴黎举行谈判期间,基辛格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领导人举行了5次秘密会晤(2月21日、3月16日、4月4日,9月初和9月末)。越南方面参加头3次会晤者,除代表团团长春水外,代表团特别顾问、越南劳动党政治局委员黎德寿也参加了会晤。

北越方面一直坚持要求美国军队在具体规定的时间内,无条件地全部撤出越南南方,要求美国停止支持阮文绍政权,在越南南方组建临时联合政府,并授权该联合政府在越南南方筹备并举行选举。

美国方面在提出分阶段从南越撤出美国军队的各种方案(开始是说在16个月的时间里,后来改成在12个月的时间里撤军)的同时,总是要求把相互停火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从南越、老挝和柬埔寨撤军作为美方建议的条件,并表示,愿意同意所谓的北越军队秘密地实际性撤军。

美国断然拒绝强行废除西贡政府;美国只同意在各方撤出军队后,建立一个负责在越南南方举行选举工作的三方混合委员会,成员包括越南南方的西贡政权、临时革命政府以及其他社会政治团体的代表。

这样一来,在美国与越南举行秘密会晤期间,双方所持的立场,从本质上讲,仍然是双方在其正式声明和建议中所阐述的立场。

从1971年1月开始,美国政府再次开始试探,其中包括通过苏联政府,试探能否恢复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的秘密会晤。

同时,基辛格极力想弄清楚的是,如果美国承诺在一定的日期之前,撤出自己的军队的话,北越人是否能够保证在美国军队从南越撤军时和在撤军后的一段时间里,履行停火的义务。为了商定恢复会晤的问题,1971年5月,基辛格前往巴黎。根据某些资料可知,基辛格在巴黎与春水进行了会谈。在此次试探后,基辛格又与黎德寿和春水举行了3次会晤(6月26日、7月12日和7月26日),并于1971年8月16日,再次与春水举行了会晤。

338

基辛格提出的解决越南问题的方案分3个阶段:

1. 秘密制定和通过关于解决原则的宣言。
2. 在越南问题巴黎会议上,依据解决原则宣言,制定并签署最终

协议。

3. 召开印度支那问题新的国际会议,参加会议者除直接参与冲突的国家外,还应包括苏联、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以研究国际担保问题,巩固所达成的协议。

按照美国的意思,解决原则的宣言应包含下列内容:

- 美国军队撤出南越的最后日期;
- 美国承担不支持西贡任何一个政府的义务;
- 尊重南越的中立地位的义务;
- 按照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商定的额度,限制向南越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
- 在整个印度支那地区相互停火;
- 释放并遣返战俘。<sup>31</sup>

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北越否决了美国代表试图将南越政府视为此次谈判伙伴的企图,坚持要求美国及其盟国的军队撤出越南。美国原则上同意从越南撤出军队,但要求北越从南越撤回自己的部队。美方的要求遭到反对,关于越南军队的问题应当由越南人自己解决。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立场得到了1969年6月5—17日举行的国际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支持。会议专门发表声明说:“越南人民进行斗争保卫自己祖国的权力,是各民族神圣不可侵犯的自卫权利。”会议号召“反对帝国主义和爱好和平的力量,展开多种形式的、更加有力和更加协调一致的行动,支持正在为反抗美国侵略而战斗的越南人民。”<sup>32</sup>

随着越南与美国开始进行频繁的会谈,苏联的盟国陷入了艰难的地步。1970年7月,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通报说:“苏联—越南在党和国家层次上进行的政治协商,主要是在党和国家代表团进行访问期间,以及通过外交渠道,在莫斯科、河内和巴黎进行的。这种政治协商在交换意见和相互阐明观点,首先是有关越南问题的意见与观点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大使馆指出:“苏越两国的外交合作,特别是在工作层面上的外交合作,不能说是令人满意和完全合格的。而在

苏联与越南各种形式与方式的合作中,恰恰是外交合作存在着最严重的缺陷。而这并不是苏联方面的错误。在建立更广泛的外交合作方面,我们始终积极行动,但越南同志在这方面表现得很谨慎。

339 我们向越南同志传递了我方广泛的外交信息,但越南同志却没有对此采取互惠的行动,没有及时地将自己的措施通知我们,包括解决越南问题方面的措施,例如,有关建立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问题,胡志明与尼克松之间书信往来的问题等等……

越南人不愿意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各种国际组织的框架内与我们密切协作;直到最近,两国实际上也没有通过外交部进行直接的、可信的接触。例如,越南人没有直接与华沙条约组织接触,讨论与协调支持印度支那各国人民的集体行动,而是秘密地请求支持他们。当然了,在这一点上,越南方面也有自己的道理:既能得到支持,又不承担任何义务,只需表示感谢就可以了,而感谢的话也是悄悄地说的。”大使馆抱怨说。

“苏联外交人员常常只是执行北越同行的请求,充当不光彩的角色。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部甚至形成了一定的提出请求的表达方式:‘请使您的行动与我们协调一致。’”

苏联外交官指出,北越领导人致力于与中国保持经常的接触。苏联大使馆说,北越领导人与中国领导人定期举行高层协商,并且,越南领导人常常认为这种协商对于越南民主共和国来说,具有艰难的和持久的特点。越南人最近不能总是得到中国领导人的理解。越南民主共和国感兴趣的是继续从中国得到物资支持,特别是在最近,由于柬埔寨和印度支那局势紧张,越南与中国的协商范围扩大了。苏联驻越南民主共和国大使馆 1970 年的政治报告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十月革命 53 周年前夕,北越再次出版了《联共(布)简明历史教程》,该教程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编写的、颂扬苏联历史的出版物。苏联外交官说,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继续保持着巨大的影响。越南劳动党很清楚,中国近,苏联远<sup>33</sup>。

苏联外交官写道,北越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接触没有意义,朝鲜

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除外。苏联驻河内大使馆指出：“越南同志从满足越南的民族利益为出发点考虑自己的国际活动。他们常常将越南的利益凌驾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根本外交利益之上。例如，他们想让苏联与美国关系产生紧张，以符合越南的利益，想在世界上再出现若干个新的‘越南和古巴’（范文同的说法）……越来越明显的是，越南同志在许多方面总是夸大越南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作用，常常自私地解释越南对社会主义国家承担的国际主义义务，把国际主义义务只看成是解决越南民族问题的斗争，这是令人遗憾的。”<sup>34</sup>

在北越工作的苏联军方代表也有自己的苦衷。他们向莫斯科抱怨说：“在与苏联代表进行正式交谈时，越南同志表现得不诚实，不能坦诚相待，千方百计地压缩信息交流的数量，而有的时候还故意歪曲信息。”1970年，在越南民主共和国长期驻有250—300名苏联军事专家，主要是防空部队的专家。苏联军方代表报告说：“越南人民军在口头上高度评价我国专家的工作，但同时，又竭力将苏联专家的工作限制在技术援助的范围内。这样，保证了他们在解决军事技术装备战斗使用问题和作战战术问题时，不受我国专家的影响……应当指出的是，尽管工作中的接触有了一定的扩大，但我们仍然没能取得军事合作方式的进一步完善，没能够取得越南朋友的信任和坦诚相待。越南同志给我们提供的军事信息通常是笼统的。在对所缴获的敌人的技术装备和战术资料进行研究方面，双方的合作水平和从前一样，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越南同志极力阻挠苏联专家接触所缴获的美国新式技术装备。越南方面继续推行过去的路线：实际上使我们完全失去了安心工作的可能性……过去向越南高层发出的呼吁也没有任何成效。”<sup>35</sup>

不过，这些评论只报告给了苏联政治领导人。而在政治生活的表面上，展现的则是“兄弟的苏联人民和越南人民牢不可破的友谊”。苏联除了向越南提供武器外，还提供了面粉、石油产品、化肥，提供了大笔贷款<sup>36</sup>，以及工厂的全套设备。1970年，苏联对越南的经济援助大约为3.16亿卢布，占社会主义国家对越援助总额的45%。其中，通过军事部门向越南提供援助1.2亿卢布，通过对外贸易部提供援助1.52亿



卢布,通过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提供的援助超过了3400万卢布。在苏联对越南的援助中,大约60%用于民用经济部门,其余的用于军事。将近40%的援助是无偿提供的。

1970年8月28日,在讨论苏联向越南提供援助的计划时,苏联大使提醒越南总理范文同说,越南堆积了从苏联运来的90座工厂的设备,这些设备已经堆放了不止一年。对此,范文同的回答是请求苏联专家<sup>37</sup>帮助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指出的是,在越南民主共和国工作的有将近600名苏联的文职专家,这几乎是在越南的苏联军事专家的两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向北越提供了援助(参见表3)。

341 表3 1970—1971年间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除外)  
对越南北方的援助额 (单位:百万卢布)<sup>38</sup>

国名	1970	1971	国名	1970	1971
中国	235	360	保加利亚	18	18.5
波兰	20	28	罗马尼亚	8	8
民主德国	42	35	北朝鲜	10	10
捷克斯洛伐克	5	20	蒙古	2.5	1.5
匈牙利	30	30	古巴	1	1

越南与苏联之间的关系之所以不平常,除其他原因外,还因为越南最高领导层内部的争斗。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书记黄英在1970年12月—1971年1月初举行的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所做的报告,为人们提供了一些有关越南劳动党内部争论的情况。

这份报告公开承认:“在我党40年的历史中,还不曾有过如此严重的分歧。”越南共产党人激烈争论的问题不少。首先是他们对待集体化的态度问题。在越南劳动党第十七、十八和十九次中央全会上,对集体化的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确定继续进行战争的战略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黄英说:“我们严厉谴责那些只想通过军事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人,那些想向

越南南方派出 200 万军队,并在那里不断进行战斗的人……我们应当将军事、政治和外交斗争这三种斗争方式结合起来……而反对派想干什么呢?他们想把外国军队引进我国境内,并同他们一起占领老挝,解放越南南方。”

报告还承认战争对北越形成沉重的压力。1968 年的新年进攻战和 1 月—2 月的进攻战,使越南付出了 10 万人的代价。据越南估计,在越南南方进行的 10 年武装斗争中,越南人损失了 41 万人,其中死亡与失踪者达 23 万人。1970 年损失 10 万人。1970 年,越南向越南南方、老挝和柬埔寨投入了 27.3 万吨武器、弹药和食品。1970 年在越南南方作战的北越正规军有八个师(约 11 万人)。

越南劳动党中央书记黄英阐述了越南对两个最重要的盟国:苏联和中国的态度。他对出席中央全会的代表们说:“许多同志不理解我们的方针,对我们在与中国、苏联的相互关系中所持的立场和其他问题做出批评。例如,我们并不认为苏联的现任领导人是修正主义者,会威胁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至于谈到中国,我们赞同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但我们不同意文化大革命的实施方法。因为这种不同意,我们受到了一些同志的批判。”

亲华方针的拥护者(按照越南劳动党当时的术语,叫“机会主义者”<sup>342</sup>)在北越的武装力量中拥有强大的地位。黄英说:“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证明机会主义者给我们带来的危害。例如,许多加入了机会主义集团的高级军事领导人,拒不执行领导的指示,这对作战行动造成了不良影响。例如,在美国—西贡军队侵入柬埔寨后,政治局决定对西宁地区实施突击,以保护在柬埔寨作战的我军部队。然而,该地区的军队领导人却坚持别的意见,而他们的行为与政治局的决定背道而驰,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降低了我军的作战成效……目前,机会主义集团中有 16 名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他们一贯批评我党的方针,一些人还散发印刷品……在第十九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党内的帮派活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战争进程的复杂化,美国、南越和泰国对柬埔寨和老挝作战行动的

扩大化,导致北越部队遭受到密集轰炸。1971年初,美国在柬埔寨动用了B-52轰炸机、海军兵力和地面部队。在对老挝进行的空袭中,连续几天,同时有近400架飞机参加空袭行动,投下近100吨炸弹。泰国军队也开进了老挝。

在这种情况下,到1971年初,北越领导人开始越来越积极地打“战俘牌”,将其作为影响国际舆论的方法,再通过国际舆论对美国政府施加影响。从这一时刻开始,北越开始有意识地采用“复式簿记”的手法:公开宣布的美国战俘人数是一个数据,而自己心里实际上还有另外一本账。

例如,在前面已经引用的黄英在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二十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说,北越掌握着735名美国战俘,但只公布了368名飞行员的名字。

1971年夏,黎德寿和春水与基辛格在巴黎举行会谈时,越南方面要求:

1. 美方确定在1971年撤出美国军队的日期。
2. 停止支持阮文绍。
3. 撤出美国军队和释放战俘同日进行,并同时结束。
4. 禁止歧视与任何一方进行过合作的人。
5. 尊重国际担保。

343 不难看出,越南方面将保证归还美国战俘变成了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的主要手段。

苏联驻越南大使A. C. 谢尔巴科夫在知道了越南方面的这一计划后,对该计划的现实性表示严重怀疑:将撤军问题与遣返战俘问题捆绑在一起,其战术目标很明确。但是,美国人未必只是为了使战俘获释,就同意确定撤军的日期。

美国政府缺乏有关被俘军人的确切信息,这决定了美国必须搜集这类情报。我们认为,正是出于这一目的,1971年夏,美国向苏联方面提出建议,通过联邦德国一家旅游中介公司“东方旅游公司”,以一位名叫克诺布洛赫的人的名义,将一批游客(近5000人)从河内经莫斯

科运送到巴黎和美国。一开始,莫斯科只是将该建议看成是纯商业性的,苏联总参谋部和民用航空总局同意从河内向巴黎和美国运送旅客,直到“主管机关”对该建议产生了兴趣。“主管机关”的分析完全正确,在河内不可能有5000名需要紧急运送到西半球国家的游客,这些人只能是准备遣返回国的战俘。如果苏联认可所声明的数量或者说出别的数字的话,那么,这最有可能就是被俘的美国人的数量。然而,苏联自己没有这方面的情报,而越南方面仍然阻止苏联与美国战俘进行任何的直接接触。

实际上,在克诺布洛赫先生的掩护下,美国企图将莫斯科拖进有关美国战俘遣返的问题。在对局势进行充分的分析后,苏联当局理智地拒绝了这一建议,他们尤其不能完成这样的建议。

1972年5月27—28日,苏联与美国就越南问题进行了协商。参加协商的是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和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在向苏联政治领导人汇报与美国进行协商的结果时,葛罗米柯说,基辛格关于美国对越南问题立场的表述,以及他对我方就此提出的问题的答复,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如果从纯实际的角度看待这件事的话,那么,一下子就解决越南问题全面(在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达成协议,是相当艰难的。因此,应当分两个层面研究和解决下列问题:一是在近期可以、也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二是在第一步措施落实后,特别是在美国完全撤军后,在形成了新的、可以最终解决越南问题的政治形势或新的政治现实的情况下,才容易进行协商的问题。

2. 美国并不认为自己依恋越南南方的某个具体政府。根据该国事态发展和一定的变化结果看,将来可能掌握政权的是新的政治力量。可能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对此,美国将不会加以干涉。但美国不能现在就亲手做这件事。

3. 此外,如果能就军事方面的某些措施达成协议,美国准备就基本原则发表声明或宣言,阐述美国按照基本原则将承担的义务,并单方

面地同意下列几点：

(1) 南越应当是中立的国家；

(2) 美国不会对南越将来可能发生的政治进程进行干预；

(3) 美国准备减少对南越的经济和军事援助，并将援助的具体规模通报另一方。当然，这里指的只是在那些根本不想获得美国援助的力量（由于形势的变化）在南越取得政权之前的时期。

美国还准备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在与南越另一方进行协商后发表声明，宣布南越应当推行中立政策；越南的统一应当让越南人自己，也就是让北越和南越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条件下，经协商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实现（实际上这是越南人提出的著名的“七点建议”之一，基辛格同时做了补充）。

4. 事态的发展决定了美国也会同意政治解决越南问题，但是，在此之前，应当先解决军事方面的某些问题，这将为下一步的全面推进，打下良好的基础。

5. 兼顾双方利益的头等军事问题如下：

(1) 停火；

(2) 释放美国战俘；

(3) 从越南南方撤出美国军队。

如果美国能够从苏联得到必要的保证，停火协议不一定是签署的某种形式的文件，它可以是事实上的协议。

协议甚至规定，释放美国战俘与美国全部撤军在一定程度上要平行进行，并且，这两个进程要同时结束……

葛罗米柯报告说，美国人保证说：“在举行选举前一个月內，现任西贡总统和副总统将会辞职。”此外，美国人还详细地描述了在越南南方进行拟议中的选举的程序。

按照葛罗米柯的话说，基辛格重申，白宫坚信，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故意不想与美国达成任何协议，目的是有意在美国社会舆论中造成巴黎会谈完全走进死胡同的印象，企图通过美国的社会舆论对尼克松总统施加影响，迫使他对河内的要求做出让步，特别是在选举时期做出



让步。

基辛格说,北越人这样做的原因,纯粹是宣传的手法,现在,不论是在巴黎举行的全体会议上,还是在秘密会晤时,北越人都采取这种宣传手法。基辛格认为,北越人断然拒绝讨论美国的任何建议,甚至是妥协性的建议。他们坚持只讨论他们提出的“七点”建议。白宫认为,北越人这样做的原因还在于,河内同意在基辛格4月莫斯科会谈后,恢复在巴黎举行的公开会谈和秘密会晤,但同时,他们在越南南方开始了新的军事进攻。军事进攻与北越人继续奉行的纯宣传路线一起,导致了这些会晤再次失败。<sup>39</sup> 345

我们可以认为,美国人的建议无疑具有妥协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苏联方面的支持。1972年5月,在印度支那的战斗行动进行得最激烈的时候,尼克松总统对莫斯科进行的引起了轰动反响的访问,就是这方面的证明。

而北越在立场方面也出现了变化,这些变化表明,越南领导人的目标是要在战争中取得军事胜利。

在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于1972年9月15日举行的会议上,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陈文光中将报告说<sup>40</sup>,根据政治局和政府会议的决定,与南越政权的著名人士举行了协商。其中包括南越第2军区司令吴庭祖中将,在吴庭艳被推翻后担任过3年总理的阮庆,杨文明,前安南皇帝保大,南越前国防部长阮文伟。

这些人物各不相同。其中有反共分子,但是,反美情绪和民族主义情绪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越南民主共和国政治领导人向这部分人承诺,在联合政府里给他们留有位置。

北越还在南越的省级政权和南越军队中积极寻找盟友。陈文光认为,为了摸清南越军队上尉和上尉以上级别军官的政治观点(他们的观点是反动的,当他们在法国军队中服役时,就已经形成了),与南越军队的军官和将领们进行接触是有益的。

在试图分化南越社会统治阶层的同时,北越领导人继续实施“南进”计划(旨在铲除南越政权省级和省级以上积极工作的官员的破坏

行动计划)。为此目的,400多名北越特工在越南南方开展活动。陈文光将军高度评价了这些特工的工作,并强调说,“南进”计划成了“决定战场态势的转折点”。

在陈文光将军的报告中,有关美国战俘的问题占有特殊地位。他说:“到目前为止,美军战俘的人数没有公布,我们对这一数字保密。在今天的政治局会议上,同志们,我将向您们报告美军战俘的准确数字”。他说,经他确认,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抓获的美军战俘总数为1205人。这位越南将军报告了这些战俘的详细情况。

详情摘录如下:

346 “671人是在越南北方被抓获的,143人在南方被俘。这些人有飞行员、特工船上的顾问、潜水员。在越南,包括北方和南方,共抓获美国战俘814人。

在印度支那地区抓获391人,其中,在南越抓获283人,在柬埔寨抓获65人,在老挝抓获43人。”

按照陈文光将军提供的数据,在越南北方抓获飞行员624人。其中,上校7人,中校85人,少校183人。被俘的飞行员中,有3人接受过航天飞行训练,15人的飞行时间超过了4000小时。

在越南北方被俘的其他47名战俘中,有别动队顾问36人,有直升机投下的负责监视运输干线的别动队员和侦察兵,还有被损毁的船上的海军人员。

在越南南方被抓获的美国飞行人员有153人,大部分是直升机飞行员,少部分是喷气式飞机驾驶员。

将军继续说:“我们现在有11座监狱关押着美国战俘。以前有4座大的监狱。在美国企图解救河西监狱的美国战俘后,我们把监狱的数量增加到了11座。每座监狱大约关押着100名美国战俘。上校战俘(共16人,空军7人,其他9人)被关在同一座监狱里,104名中校也关在一起,235名少校分别关在两座监狱里。”

在这个问题上,将军强调说,在正式公布时,只公布了368名战俘的情况。美国战俘依然被视为向美国施加压力的手段。

在进行总结时,将军向越南劳动党政治局报告说,1973年必须动员25万人,将其派往三个方向:20万人派往越南南方,5万人派往老挝和柬埔寨。

大概,北越与南越部分政治和军事上层人物之间达成的交易,促进了北越部队作战效果的提高。值得注意的是,1972年6月9日,一架直升机在中央高原地区被击落。机上人员中有美国驻南越第二军区顾问团团团长约翰·维恩将军。需要提醒的是,在第二军区指挥南越部队者,正是北越当局与之进行过谈判和协商的吴庭祖中将。在类似情况下死亡的还有美国将军R.托尔曼,时间是1972年7月9日,一个星期后,南越航空兵第4师师长阮辉英准将也在同样的情况下死亡。<sup>41</sup>

1973年1月27日,在经过长时间的会谈后,关于在越南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协议终于在巴黎签署。根据该协议的条款,1973年2月26日至3月2日,在巴黎举行了越南问题国际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团有越南民主共和国、美国、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南越政府,以及苏联、法国、中国、英国和越南问题国际监督委员会推荐的4个国家:匈牙利、波兰、加拿大和印度尼西亚。<sup>42</sup>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从70年代开始,苏联对越南冲突的兴趣和直接参与程度明显地下降了。在保持反美论调的同时,苏联领导人对在347一定程度上降低与美国的军事对抗程度,明显地表现出了兴趣。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从1973年开始运作,在1975年结束,4月10日,关于禁止研制、生产和储存生物武器国际公约得以签署。苏联与美国签署了关于限制反导防御系统条约、关于防止核战争协议、关于在限制战略进攻型武器方面采取某些措施的临时协议,以及关于限制进行地下核武器试验的条约。<sup>43</sup>

1975年4月30日,北越部队占领西贡。越南北方和南方在共产党的政权下统一起来。

美国在印度支那的失败产生了一系列政治后果。在与越南相邻的国家里(老挝和柬埔寨),越南的影响大幅度地增长。

“社会主义大家庭”得到了扩大。美国在东南亚的地位被大大地

削弱了。苏联海军获得了使用越南金兰湾和岘港的港口与基地的权利。在两个“不共戴天的兄弟”——越南和中国关系恶化后,越南作为苏联对付中国的战略伙伴的作用增长了。当然了,与越南的友谊是要付出代价的。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向越南提供了其所需要的80%的石油产品、金属和化肥,苏联对越南经济的财政影响力也增长了。<sup>44</sup>

结果是,苏联被卷入了冲突,支持声称坚持社会主义方针的一方,花费了一定的资源,但只限于“数量有限”的军事参与,主要是派遣了300—500人的军事技术专家,最后,却获得了重大的政治思想利益和军事战略利益。

后来,出现了重演这一幕的诱惑。

越南战争的另一个教训被人们忽略了,这就是“现代化的技术装备并不能战胜斗志昂扬的人民”。

在70年代,苏联加强了扩大其势力范围的活动。党的思想政策在这一时期越来越与对外政策等同起来,而苏共中央国际处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活动常常替代和重复了外交部的工作。大量的文件证明,苏联的国家资金被用于支持世界各地共产党的活动,从美国、法国共产党到“黑非洲的社会主义方向党”。为了间接地资助各国共产党,市场上走俏的苏联石油、木材和其他商品被低价出售给了这些共产党所创办的公司,随即又被这些公司按照世界市场的高价格倒卖出去。在美国、  
348 英国、伊拉克、西班牙、孟加拉国、巴拉圭、爱尔兰和塞浦路斯,由共产党员和“苏联的朋友们”控制的印刷厂,常常接到印刷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的极其优惠的订单。苏联购买了全世界的共产党报刊,以支持出版者。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进行的比较合适的活动是,组织别国共产党的译电员和报务员进行“特种训练”,为阿根廷、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巴拉圭、苏丹、土耳其、智利、厄瓜多尔、爱尔兰和塞浦路斯共产党培训了安全部门工作人员,对世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员进行了军事训练。

苏共中央与国家安全委员会联合起来,推动政治领导人直接与自称奉行亲苏方针和马克思主义方针的恐怖主义组织进行合作。

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致函勃列日涅夫称:“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政治局委员、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外行动处处长瓦迪阿·哈达德保持着秘密的事务接触。

……瓦迪阿·哈达德在坦诚的交谈中,阐述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进行恐怖性破坏活动的前景计划,主要内容如下所述。

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特种行动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打击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的斗争效率。因此,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主要恐怖破坏活动方针是:

——继续利用阿拉伯国家‘石油战’这一特种武器,对支持以色列的帝国主义势力实施打击;

——对美国、以色列驻第三国的人员采取行动,以获取有关美国和以色列的计划与意图方面的可靠情报;

——在以色列境内实施恐怖破坏活动;

——对主要资本属于以色列、英国、比利时和西德公司的钻石托拉斯组织实施破坏行动。

根据上述方针,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目前正在准备实施一系列特种行动,其中包括对世界各个地区(沙特阿拉伯、波斯湾、香港等地)的大型石油库实施打击行动,摧毁油轮和超级油轮,对美国和以色列驻伊朗、希腊、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代表人员采取行动,袭击特拉维夫等地的钻石中心大楼。

瓦迪阿·哈达德请求我们帮助他搞到实施破坏行动所必不可少的某些特种技术器材。

在与我们进行合作和向我们求助的同时,瓦迪阿·哈达德准确地考虑到了我们原则上反对恐怖行为的态度,也就没有向我们提出与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上述活动方针有关的问题。

我们与瓦迪阿·哈达德建立的关系的特点,使我们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对外行动处的活动,对其施加有利于



苏联的影响,以及为了我们的利益,利用该组织的力量,在遵守必要的保密规定的情况下,采取一些行动。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应当在下一次会晤时,在总体上答应瓦迪阿·哈达德的请求,向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提供特种技术器材援助。至于说到提供援助的具体问题,这里指的是,他们需要自己决定在各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并要兼顾苏联的利益,防止对我国的安全造成可能的损失。

请予以批准。安德罗波夫。”

在该文件上还有一处手写的标注:“有关批准事宜已通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1974年4月26日。”

在完成扩大苏联在全世界影响的任务时,苏联领导人们是不择手段的。

## 阿 富 汗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做出的最惨痛决策,是让苏联卷入阿富汗冲突。这场冲突演变成了一场苏联在阿富汗的全面但却是没有宣布的战争。在“改革与公开性”时期,有关发动这场战争的情况被仔细地掩盖起来。战争发生了,也出现了人员伤亡。可是,成为这场战争的开端的进军决策,是谁做出的呢?“关于向兄弟的阿富汗人民提供国际主义援助情况”、“关于有限数量的苏军部队击退土匪武装的行动”的胜利战报,变成了关于苏联最高领导人颞颥无知的议论和种种借口:做出决策的是已故的勃列日涅夫、葛罗米柯和乌斯季诺夫,而他们在政治局里的继承人对此一无所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曾做出努力,试图从戈尔巴乔夫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那里获得关于开战情况的明确答复。但这种努力再次变成了他们对个别人,而不是对整个制度的指控。人们不由地产生了这样一种念头:决定战争开始的文件被完全销毁了……掩盖阿富汗战争真相的做法,与掩盖卡廷事件真相的做法,惊人地相似。

……1992年,出现了可以对前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进行分析的机会,Д. А. 沃尔科戈诺夫和鲁·格·皮霍亚开始查找关于派遣苏军开进阿富汗的情况的文件。查找工作非常艰难。在查找过程中,一个很好的“预兆”是找到了一份1983年3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此次会议讨论的是“关于阿富汗局势及改善阿富汗局势的补充措施”问题。在此次会议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对政治局委员们说:“大家知道,我们在处理派军队进入阿富汗这一问题时,是非常困难和谨慎的。列·伊·勃列日涅夫坚持让政治局委员们进行记名投票表决。出兵的问题是在中央全体会议上研究的。”<sup>45</sup>

这一情况给查找工作指明了方向。但是,查遍了1979年的“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只找到了大量关于苏联—阿富汗关系的资料,并没有给下面的问题找到答案:入侵的决定究竟是什么时候做出的? 只是 350  
在同一份政治局档案里找到一个封口的信封,里面有一些手写的文件。在这些文件页上,编有公文处理序号,这证明这些文件具有政治局决议的地位。第一份文件名字叫“关于阿富汗局势”,日期是1979年12月12日,是一名老者清晰可辨的笔迹。手写的记录上有公文处理序号,证明“关于阿富汗局势”一文是作为政治局第№П176/125号决议办理的。这份文件中说:

“1. 同意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德·弗·乌斯季诺夫同志、安·安·葛罗米柯同志提出的意见和措施。

允许他们在实施这些措施过程中,进行非原则性的修正。

需要中央委员会决定的问题,须及时报告政治局。所有上述措施的实施,由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德·弗·乌斯季诺夫同志、安·安·葛罗米柯同志负责。

2. 责成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德·弗·乌斯季诺夫同志、安·安·葛罗米柯同志向中央委员会报告落实上述措施的进程。

中央委员会书记 列·伊·勃列日涅夫。”<sup>46</sup>

在同一个信封里,还有一份康·乌·契尔年科写的证明书。证明书里说:

“关于1979年12月12日之№П176/125号决议事宜

1979年12月26日(来到别墅的有:列·伊·勃列日涅夫、德·弗·乌斯季诺夫、安·安·葛罗米柯、康·乌·契尔年科诸同志),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请注意:在座者中没有提到他——作者)诸同志报告了关于执行苏共中央1979年12月12日之№П176/125号决议的进程问题。

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谈了许多原则,同时,同意同志们拟定的近期行动计划。

并认为,中央政治局小组以目前的人员组织,按照所报告的计划方针行动,是合理的,要仔细考虑每一步行动……

№13—ОП 康·契尔年科,1979年12月27日。”<sup>47</sup>

正是12月12日这个关于开始直接干预阿富汗冲突的№П176/125号决议(被掩饰成“关于阿富汗局势”的决议),成了“苏联的越南战争”的启动机构。

1979年12月27日,苏联特种分队占领了阿明在喀布尔的王宫,扶持巴·卡尔迈勒成为阿富汗国家元首,12月25—28日,苏联军队开进阿富汗。战争开始了。

安德罗波夫在另一个问题上的说法也是正确的。他说政治局关于开始入侵的决议(自然,该决议取得了政治局委员们的同意,他们是知道的)得到了1980年6月23日通过的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决议的支持。

让我们摘录中央全会有关苏联干涉阿富汗的速记记录<sup>48</sup>:

351 “勃列日涅夫说,……阿富汗就是一个例子。美国统治集团,还有中国不会善罢甘休,其中包括发动武装侵略,目的就是干扰阿富汗人依据1978年四月革命的理想,建设新的生活。而当我们应阿富汗政府的请求,帮助我们的邻国阿富汗打退了侵略的时候……华盛顿和北京就掀起了前所未有的轩然大波……而一切问题在于,他们将阿富汗拖入帝国主义政治轨道,从南方对我国形成威胁的计划破产了……

葛罗米柯说,……有没有可能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呢?有,有可能……首先必须制止针对阿富汗的外来武装入侵……在这方

面,与阿富汗和伊朗签署协议具有重要意义……同志们,苏联不会为自己在阿富汗的行动,为我们对革命的阿富汗履行国际主义团结义务,为侵略者已经受到的应有的打击,向任何人道歉……

谢瓦尔德纳泽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比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更有威望,更彻底的国务活动家了,他深受尊重,深得信任……当你亲眼目睹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从事天才的工作时,当你拜读他的谈话记录、具有重大价值的著作、有关国际国内政策的讲话时,你会从内心感到喜悦和自豪,因为你意识到,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是一位集渊博的学识、列宁主义的原则性、无产阶级的坚定性、革命的大无畏精神、高度的人道主义、罕见的外交灵活性于一身的人……

……而他对阿富汗采取的勇敢的、惟一正确的、惟一明智的步骤,受到了每一位苏联人的理解和拥护。”

中央全会“关于国际形势与苏联的对外政策”的决议写道:“……中央全会完全同意就全面援助阿富汗打退外来武装进攻与干涉所采取的措施。外来武装进攻与干涉的目的是,扼杀阿富汗革命,在苏联南部边界地区建立亲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登陆场。”

如此说来,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的说法的确是正确的。他说苏联入侵阿富汗的计划在政治局讨论过,而这种入侵行动也得到了苏共中央全会的支持。

现在谈谈上述决议通过前发生的一些情况。阿富汗是一个传统上与苏联友好的国家。苏维埃俄国于1919年第一个承认了阿富汗的独立,并与之建立了外交关系。阿富汗的苦难始于1973年,当时,由于国内发生的政变,君主制度被推翻,而国王的表兄弟穆罕默德·达乌德成了阿富汗总理。阿富汗军队被卷入了冲突。在阿富汗军队的军官中,有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拥护者。人民民主党宣布自己奉行马克思主义方针,组织了政变行动,并于1978年4月27日在喀布尔夺取政权。领导阿富汗政府的是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他也是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巴·卡尔迈勒任副总理。

352

声称忠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力量在阿富汗掌握了政权,莫斯科认为,这是“继续巩固与扩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个机会。苏联最有经验的外交官、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Г·М.科尔尼延科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党的思想家和国际问题专家们,首先是米·安·苏斯洛夫和鲍·尼·波诺马廖夫,马上就把阿富汗视为社会主义国家(在不远的将来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人的眼前浮现出的情景是:阿富汗成了从封建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二个蒙古’。”<sup>49</sup>

在塔拉基政府统治的一年时间里,阿富汗的国内形势动荡不安。统治集团推行恐怖行为,不仅同“反革命分子”进行斗争(况且,反革命的概念涵盖面很广),而且,还要与“持不同意见的”共产党员——党内的“旗帜派”进行斗争。所有这一切,都对国内局势的动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阿富汗社会复杂的种族成分,普什图族、塔吉克族、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哈扎拉族之间的矛盾,与争权夺利的斗争、笨拙的改革行动、人民民主党内部“人民派”和“旗帜派”两大派别之间的争斗,交织在一起。塔拉基政府所依靠的社会基础迅速萎缩。

1979年3月15日,步兵第17师在赫拉特省发动起义。这是阿富汗发生内讧的第一个危险信号。

1979年3月17日,阿富汗外交部长哈菲祖拉·阿明往莫斯科给苏联外长安·安·葛罗米柯打电话。他肯定地说,阿富汗的局势依然稳定<sup>50</sup>。然而,到了第二天,也就是1979年3月18日,形势急转直下。这天,努尔·穆罕默德·塔拉基往莫斯科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阿·尼·柯西金打电话。一开口就对阿富汗国内局势叫苦不迭。他通报说:“在最近几个月里,大约有4000名穿便服的军人从伊朗方面渗透到了赫拉特市和部队中。现在,整个步兵第17师已经被他们所掌握,包括炮兵团和防空营,防空营还向我们的飞机开火。”据塔拉基提供的数据,有近5000人转到了叛乱者一边,而忠于塔拉基政府的,只有师长为首的大约500人。

柯西金试图弄清的是,在赫拉特是否可以指望得到当地居民的支



持？塔拉基的回答令人不安。他肯定地说：“根本得不到居民的积极支持。居民几乎都受到了什叶派口号的影响。”阿富汗当局也无法得到工人们的支持，因为在赫拉特市 20 万—25 万居民中，工人只有 1000—2000 人。塔拉基肯定地说，赫拉特在最近几天就会沦陷，叛乱者将向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推进。塔拉基请求立即派出苏联部队镇压叛乱，他一再坚持使用苏联陆军和空军对付阿富汗叛乱者。阿富汗领导人一次接一次地要求苏联干预阿富汗内部冲突。阿富汗当局坚持要求苏联派遣战斗直升机及其飞行员，建议苏联坦克兵（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改穿阿富汗军服参加政府一方的战斗行动，并建议派苏联空降师进入阿富汗。这种请求与要求每月有许多次。

苏联领导人最初的反应较为谨慎。1979 年 4 月 12 日的政治局会议指出：“我们做出拒绝阿富汗民主共和国领导人关于向赫拉特省派遣苏军部队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这一路线应当坚持，即使阿富汗出现新的反政府行动，而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不能排除。”<sup>51</sup> 1979 年 4 月 21 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苏联战斗直升机飞行员不应当参加镇压阿富汗反革命行动”的决议。阿明提出的关于派遣 15—20 架苏联战斗直升机及其飞行员参战的请求，苏方认为不合适。“因为这种举动会被阿富汗革命的敌人和外部敌对势力用来造谣生事。”阿富汗方面请求一次，苏联方面拒绝一次。1979 年 10 月 27 日，在与哈菲祖拉·阿明会晤时，苏联方面甚至拒绝直接向阿富汗派遣军医院，但建议在必要情况下，阿富汗军人可以直接在苏联接受治疗。<sup>52</sup>

但与此同时，苏联向塔拉基政府（后来是推翻了塔拉基的阿明政府）提供了物资和军事援助。5 月 24 日，苏联向阿富汗提供了 1500 辆汽车和大量军事技术装备。苏联还决定在 1979—1981 年间，向阿富汗无偿提供 5300 万卢布的特种物资，其中包括 140 门火炮和迫击炮，90 辆装甲输送车，大量枪支，大约 1000 支火箭筒，还有其他武器装备，但没有派出战斗人员。

1979 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有关苏联被迫直接参与武装冲突的原因问题，至今依然没有完全弄清楚。大概，同时起作用的有多种因

素。而苏联支持所谓的四月革命和阿富汗新政权,从来就不是秘密。因此,如果苏联在阿富汗的政治盟友失败,会使苏联在本地区推行其政策的能力受到怀疑。苏联本想与塔拉基政府保持距离,避免在军事上直接参与冲突,但苏联对“他的”阿富汗政府的命运依然承担了政治责任。很有诱惑力的情况是,答应阿富汗政府的某些请求,只派出“数量有限的”部队,就能够对阿富汗的政治斗争进程产生影响。而与此同时,苏联与美国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明显了。美国与伊朗发生了冲突:1979年秋,美国将军舰开进了波斯湾。曾经参加过国家政治领导层阿富汗问题讨论会的Г. М. 科尔尼延科写道:“既然美国能够在离其国境数万公里之外的地方这样做……那我们为什么不敢维护自己在邻国阿富汗的地位?——乌斯季诺夫大体上是这样说的。”<sup>53</sup>

我们认为,阿明在1979年9月,也就是在塔拉基从莫斯科回国几天后发动的政变,迫使莫斯科考虑是否应当在喀布尔派驻特种部队,以便直接干预喀布尔的阴谋行动。塔拉基由于阿富汗人民民主党领导层内部两派(人民派与旗帜派)的流血斗争被打死。令苏联产生疑虑的是,阿明一方面千方百计地表明自己忠于苏联,请求莫斯科提供军事援助,另一方面又企图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减少阿富汗对苏联的依赖<sup>54</sup>。美国驻喀布尔大使与阿明的频繁会晤表明,美国对塔拉基被推翻后的阿富汗局势的关心程度提高了<sup>55</sup>。莫斯科不相信阿明,并且认为,阿明大肆镇压人民民主党活动家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将会刺激国内不满情绪增长,挑起阿富汗的内部冲突,进而,损害苏联在阿富汗的地位。

看起来,莫斯科的手中握有顺利干涉阿富汗事务的一切王牌:与阿富汗长达数十年的传统友好关系;喀布尔当局千方百计表明忠于与苏联的盟友关系;阿富汗国内有大量的苏联顾问;双方拥有共同的边界,这有助于莫斯科对其政治盟友提供有效的支持。看上去,不足之处很少:缺乏莫斯科正确的现场指导,能够帮助阿富汗政府的苏联部队人数有限(这一次不用加引号了)。如此说来,在世界地图上,将会出现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前面提到的Г. М. 科尔尼延科在其回忆录中谈

到了在苏共中央委员会里交换意见时的有趣情景。他提出的关于阿富汗将成为中立国家的意见,遭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鲍·尼·波诺马廖夫和副部长 P. A. 乌里扬诺夫斯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阿富汗的未来将是“第二个蒙古”,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Г. М. 科尔尼延科问:“莫非真的可以认为,阿富汗搞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乌里扬诺夫斯基对此回答说:“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不能搞社会主义。”<sup>56</sup>(需要指出的是,在苏共中央里,直接负责全面监督阿富汗局势的官员正是乌里扬诺夫斯基。)

对于使阿富汗局势向着莫斯科所希望的、有利于苏联的方向转变来说,还存在着“备用领导人”——实际上是被流放到捷克斯洛伐克的巴·卡尔迈勒。还在一年前的时候,也就是 1978 年,从捷克斯洛伐克传来了对巴·卡尔迈勒的抱怨声,说他在政治上过于积极了:他将塔拉基和阿明的敌人纠集在自己周围。现在,在新的条件下,巴·卡尔迈勒应当取代哈菲祖拉·阿明。

在喀布尔发生的政变和推翻阿明的行动,是由苏联特种部队实施的,而这些特种部队是应阿明的请求到喀布尔来保卫他的王宫的。阿明一再请求苏联给他派一个摩托化步兵营,负责警卫他的官邸。苏共中央政治局做出决定,将总参谋部情报总局人数为 500 人的特种大队派往阿富汗。派遣特种大队去阿富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于 1979 年 12 月 6 日取得中央政治局同意的。

355

代号为“雷”和“天顶”的特种部队攻占了阿明的王宫。阿明被击毙。

在巴·卡尔迈勒成为阿富汗政府首脑后,苏共中央马上开始行动,试图对阿富汗人民民主党的形势施加影响,以使人民民主党的政策较能够被阿富汗大众所接受。在“关于 1979 年 12 月 27 日事件后在阿富汗人民民主党中央继续做工作的若干方面问题”<sup>57</sup>的专门记录中,苏共中央呼吁停止“人民派”与“旗帜派”之间的内部斗争,放弃塔拉基和阿明工作中所特有的、针对神职人员和军官们的镇压政策,使用政治方法解决骚乱和起义。苏共中央建议将神职人员、小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

吸引到巴·卡尔迈勒一边来。

新政府对政治犯实施了普遍大赦,宣布了尊重伊斯兰教的打算。

所有这些建议都是相当理智的,不过,这种理智是抽象的,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是不大合用的。

另一个事实也是无可争议的:各阶层民众所憎恨的阿明,是被他的苏联主子推翻的,换上来的是另一个奴仆——巴·卡尔迈勒。

苏联以其直接干预的行动,为阿富汗的局势承担起了全部的责任。而这个局势是最为复杂的。阿富汗“四月革命”后开始的土地改革,遇到了难题。一方面,只占农业人口5%的人拥有一半的可耕地,而不加补偿地没收多余的土地<sup>58</sup>,导致了显而易见的对抗。况且,在拟被没收土地的土地所有者中,有军官和伊斯兰教神职人员,还有清真寺和穆斯林学校。土地问题与阿富汗更为复杂的另一些问题纠缠在一起:混乱的种族关系,一些部族觊觎其他部族的土地,普什图族与哈扎拉人、努里斯坦人之间的争斗。阿富汗现政权指责从前的领导人犯下了“小资产阶级的左倾急躁冒进”和“超越阶段”的错误,但对将来是否继续进行土地改革的问题,却没有明确说明。

1980年4月,苏联驻喀布尔大使馆向莫斯科报告说:“阿富汗领导人在对待神职人员和信徒,对待种族和民族资产阶级方面,采取了错误的,且常常是挑衅性的行动,这使反革命很容易招募到心怀不满者……加入武装匪帮。阿富汗大约40%的国土、连接喀布尔与外省的重要交通要道,都处在武装匪帮的控制之下……军队和警察因为遭到清洗,失去了大量有经验的干部……士气低落,战斗力大幅度下降。开小差现象极为普遍,整分队,甚至整营和整团的部队转向了叛乱者一边。”

大使馆强调说,阿富汗新领导人致力于克服过去政策中最令人厌恶的缺点,试图同曾与塔拉基和阿明政府处于战争状态的普什图族人改善关系。卡尔迈勒政府与这些部族签署了大量协议,承诺向谢赫(伊斯兰教对教长和神职人员的尊称——译者注)、毛拉(伊斯兰教学者的尊称——译者注)和军人们支付生活费,而部族则保证保护阿富汗与巴基斯坦之间的通道。不过,大使馆在报告中说,这些部族在对政



府保持忠诚的同时,并不急于保卫边界。

与此同时,阿富汗人民民主党内部“人民派”与“旗帜派”之间的斗争在继续,常常十分激烈。与阿明站在一起的“人民派”在军队(85%—90%的军官加入了“人民派”)、警察和安全机关里拥有自己的拥护者,而巴·卡尔迈勒支持的“旗帜派”则在党和国家机关里占优势。<sup>60</sup>

战斗行动有胜有负。政府军在库纳尔、拉格曼、楠格哈尔等省份,使游击队遭受了一系列的失败,但是,反对派武装的活动并没有被削弱。

在经济方面,阿富汗的困难日益严重。生产规模下降,这首先是因为私营部门生产下降造成的。私营部门生产下降了四分之一还多,达到了26%。物价上涨<sup>61</sup>。苏联成了阿富汗经济的主要供血者。

很快,人们就明白了,阿富汗事态正在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而这一逻辑不仅不受苏联顾问和阿富汗政府的左右,而且,常常也是其他文化与传统背景的人无法理解的。阿富汗事件和苏联在阿富汗扮演的角色,越来越与南越和美国人在南越的状况相似。

改革与投资没能产生政治盟友,战斗行动也没能改变局势,因为在政府军及其外国同盟军离开后,一切马上就会恢复原样,而且,在每一次军事行动后,当局的敌人就会大量增加,他们是受到伤害的平民。

1981年秋,苏联《真理报》政治评论员И. 谢德罗夫向苏共中央提交了关于阿富汗局势的详细报告。谢德罗夫名气很大,他实际上是苏联参与的所有“小型战争”的目击者和参加者。在阿富汗,他担任了阿富汗《四月革命真理报》的顾问。谢德罗夫的报告在保持传统的乐观主义的同时,报告了许多紧急情况<sup>62</sup>。谢德罗夫报告说,据从苏共顾问那里得到的消息,阿富汗政府只控制着不足15%的村庄,政府军的数量是对手的3倍,但却无力肃清任何一个省份的敌人,“旗帜派”和“人民派”还在继续内讧,“旗帜派”的人占据了阿富汗29个省中的27个省的省长职位。谢德罗夫认为,在处理部族冲突方面,政府毫无作为。据他得到的资料,大约占阿富汗人口45%的普什图人觊觎国家领导人

357



的宝座,但忽视其他民族:塔吉克人(占人口的35%),乌兹别克人,哈扎拉人,吉尔吉斯人,努里斯坦人和俾路支人的利益。因此,在非普什图族占多数的省份里,出现了宣布独立于中央的“哈扎拉共和国”、塔吉克和乌兹别克族的半国家性质的国家。

谢德罗夫写道:“‘追捕土匪’和‘捣毁匪巢’的战术遭到了当地居民越来越多的批评:在这些行动的实施过程中,居民的住房、庄稼常常遭到损毁,平民遭受伤亡,而结果,一切照旧:土匪卷土重来,重新控制这些地区。”<sup>63</sup>

苏联军队在阿富汗遭遇了巨大的困难。战斗行动是在山区里进行的,这对一切都造成了影响:部队的战术、武器的特点、无线电通信和饮食。军队被迫同采用游击战术的武装民众作战。官兵疾病频发,肝炎流行。士兵中吸毒现象普遍。据在阿富汗作战的第40集团军司令B. B. 格罗莫夫将军说,从中亚加盟共和国征召来的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和吉尔吉斯族士兵,拒绝执行命令<sup>64</sup>。只好用从俄罗斯征召的士兵替换了他们。多年来,时刻准备对付北约军队的苏联部队所进行的传统训练,不适合在阿富汗的作战行动。苏联在阿富汗驻军的目的也不明确。主要的战斗行动应当由阿富汗军队实施,而苏军部队应当用于警卫大的中心城市和交通干线。但在实际中,苏军部队不得不直接进行战斗行动。

在儿子应征入伍被派往阿富汗后,噩梦就时刻伴随着许多家庭。被派到阿富汗作战的是年轻的军人,他们的父母是最新一代没有经历过战争,只是从故事、书本和电影中了解战争的人。苏联国防部有权征召从前可以缓服兵役的大学生入伍。“阵亡通知书”不断传回国内,大街上出现了年轻的伤残人。早在1982年,苏联领导人就开始采取有力的行动,以停止战争。1982年7月18—19日,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与美国国务卿A. 黑格就阿富汗问题举行了会谈。葛罗米柯阐述了苏联的立场,认为阿富汗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不结盟国家。如果国际上能够保证巴基斯坦和伊朗不干预阿富汗事务的话,那么,苏联保证从阿富汗撤出自己的军队。

黑格声称,美国方面赞成阿富汗局势实现正常化。他说,美国希望在喀布尔建立一个“独立的、不结盟的政府”。苏美双方商定,就阿富汗问题举行磋商,建立常设的专家小组。<sup>65</sup>

局势再次与前不久的越南事件相似。苏联和美国准备推行协商一致的政策。然而,内战的逻辑阻挠了越南人与越南人、阿富汗人与阿富汗人之间达成协议。阻挠达成协议的因素,除内战的逻辑外,还有对政治后果的考虑:也就是在被保护人失败后,对其保护人可能产生的政治后果。苏联政策的目标是:撤出自己的军队,保留在苏联帮助下获得了政权的政府,实现阿富汗国内人所共知的政治稳定。但是,这三项任务是不能同时完成的。

战争在继续。苏联外交部门试图直接参与解决阿富汗的内部问题:苏联外交官访问了阿富汗的许多省份,与部族代表举行会晤,试图促进问题的解决。这是一项艰巨而危险的工作,负责进行停战磋商的斯坦尼斯拉夫·彼得罗维奇·加夫里洛夫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是在1983年牺牲的,死因至今不明。

对苏联来说毫无希望的、沉重的、没有意义的、苏联官方媒体讳莫如深的阿富汗战争,拖延到了1989年2月。这场战争夺去了14453名苏联人的生命,有10万多人身患肝炎从阿富汗回国,有62万名苏联军人去过阿富汗。苏军部队有组织地撤出了阿富汗。他们所支持的政府又存在了三年。该政府倒台后,阿富汗内战开始了一个新的更可怕的阶段。而这一次,战争逼近了苏联解体后形成的中亚国家的边界。

## **两种大团结: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团结和波兰的“团结工会”**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波兰出现了国民反对现政权的大规模运动。波兰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第一个出现了对抗政治权力问题的国家。“团结工会”的影响在国民中迅速扩大。在本书中,我们只谈波兰与苏联关系中的一个方面——苏共中央领导人对波兰发生的事件

的态度。

波兰发生的事件令苏联领导人感到非常紧张。这一局势的特殊性在于,第一,波兰式的反对派在工人中巩固了地位,而从意识形态上讲,波兰工人本应当是波兰政权的支柱力量;第二,苏共中央对波兰同行一直持小心谨慎的态度(如果算不上是警惕的态度的话)。此外,波兰是将苏联与“潜在的敌人”北约国家隔离开来的最大的西部邻国。

359 从1980年夏开始,苏联与波兰政治领导人频繁接触。同年7月,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爱德华·盖莱克与列·伊·勃列日涅夫在克里米亚举行会晤,详细讨论了波兰局势。勃列日涅夫告诫盖莱克说:“要坚决取缔利用民族主义培养反社会主义、反苏联情绪,歪曲苏联—波兰关系史真相的一切企图……要展开不妥协的反宣传运动,驳斥在‘所有波兰人都是兄弟’的口号下,抹杀社会主义的爱国主义中阶级的内容的行径……在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中,不能退守,而应当向它们发动连续不断的进攻。”

此后不久,8月21日,勃列日涅夫致函盖莱克,8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局势问题的特别决定》<sup>66</sup>。鉴于波兰出现的日益严峻的形势,政治局决定成立一个政治局特别小组。

政治局决议规定:

“1. 同意列·伊·勃列日涅夫同志关于波兰人民共和国局势的报告。

2. 成立一个政治局小组,人员包括:米·安·苏斯洛夫(召集人),安·安·葛罗米柯,尤·弗·安德罗波夫,德·弗·乌斯季诺夫,康·乌·契尔年科,米·瓦·齐米亚宁,伊·瓦·阿尔希波夫,列·米·扎米亚京,奥·鲍·拉赫马宁。

责成该小组认真关注波兰人民共和国目前的局势,全面系统地向政治局报告有关波兰事态发展的情况以及我方可以采取的措施。所拟定的建议视情报告苏共中央政治局。”

“苏斯洛夫小组”起草了与波兰领导人进行会谈的建议,政治局于1980年9月3日予以批准。

会谈建议包括下列原则：

“1. 对局势做出准确评估,明确表明对波兰当局与格但斯克、什切青所谓的‘联合罢工委员会’签署协议的态度……从本质上讲,该协议意味着非法的反社会主义的反对派取得了合法地位……”

2. ……任务在于,准备反击,恢复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丧失的阵地……”

3. ……必须使加强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立即采取措施提高各级党组织的战斗力和战斗力,应对政治危机,在考虑波兰国内现存特殊情况的同时,坚决开除公然与党离心离德的人……”

4. 为恢复遭到破坏的党与工人阶级的联系,对工会进行彻底革新。尽一切努力,防止现行工会(工会中央理事会)及其各级组织被解散或自行解散……工作重点放到限制所谓的‘自治’工会在群众中的活动和影响,这一任务主要通过适当地动员社会舆论的途径来完成。积极向所谓的‘自治’工会派遣忠于党的人……”

5. 鉴于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所构成的威胁,要通过国家机关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加强对军队的关心,特别关注部队人员的军事政治素质。寻找机会,吸收军队指挥干部参加党务工作。

——采取必要措施,揭露反对派头目的政治面目和政治阴谋。

6. 在大众传媒和宣传领域,集中力量,继续加强党对该领域的活动的领导与控制……要向大众传媒表明,波兰发生的事件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缺点引发的,而是错误和失误,以及某些客观原因(自然灾害等)造成的……要讲清与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进行合作的经济利益……”<sup>67</sup>

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波兰事件的发展明显感到不满,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没有采取果断行动镇压反对派感到愤怒。这种不满在1980年10月29日举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公开地爆发出来。

当时,会议讨论的是筹备迎接波兰党政代表团即将访问苏联的问题。代表团成员包括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斯塔尼斯瓦夫·卡尼亚和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皮尼科夫斯基。<sup>68</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表明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安德罗波夫发言说:的确,在波兰,不论是报刊,广播电台,还是电视台,都没有直接提出波兰存在反革命的问题,就连波兰领导人也没有这样说过。

勃列日涅夫:他们那里已经开始抢夺议会了,而波兰领导人还说什么军队站在他们一边……也许真的需要实施军事管制……

乌斯季诺夫:如果不实施军事管制,事态将会很糟糕,并且,会更加糟糕。波兰军队已经出现动摇。不过,我们的北方部队集群已经有所准备,全面处于战备状态……

葛罗米柯:应当坚决地毫不客气地告诉波兰朋友……至于说到雅鲁泽尔斯基同志,当然了,他是一位可靠的人,不过,他现在的讲话开始有点不太热情。他甚至还说,部队不会去镇压工人。总的说来,我认为,应当向波兰人讲明一切,要不客气地讲……至于说在波兰实施紧急状态,这应是一项拯救革命成果的措施……我们不能失去波兰。苏联在解放波兰时,在同希特勒分子的战斗中,牺牲了60万官兵,我们不能容许反革命……”

次日来访的波兰领导人已经得不到克里姆林宫的信任了。安德罗波夫甚至建议不要把准备好的材料交给波兰代表团。

他说:“如果我们将材料交给他们,不能排除材料会落到美国人的手里。”

勃列日涅夫说:“这确有可能。”

361 戈尔巴乔夫说:“我认为政治局邀请波兰领导人到莫斯科举行会谈的做法非常正确。应当当面坚决地告诉波兰朋友。他们暂时还没有采取应有的措施,只占据了某种防守的阵地,而在这种阵地上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他们会败下阵来的。列昂尼德·伊里奇,需要您首先发言,启动会谈。所起草的材料,我认为很好,没有什么意见。材料中包含了



需要告诉波兰朋友的全部想法。在您讲完后可以听听他们的说法……”

政治领导人们很清楚,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补给,波兰政权将无法幸存。因此,需要对波兰继续提供经济援助。然而,苏联自身的资源在减少。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 H. K. 巴伊巴科夫在会上指出:“我们能做什么呢?当然了,我们可以答应他们延长数额达 2.8 亿卢布的信贷期限,然后,再给他们提供 1.5 亿卢布的贷款。这是短期贷款,他们需要这笔贷款支付借款利息。接下来,可以说,我们可以在 1981 年多少扩大对波兰的燃料供应量,比如说增加 5 亿卢布。也许,还可以同意减少从波兰的商品进口量大约 2.5 亿卢布。总的算起来,我们通过上述方式,向波兰提供了大约 10 亿卢布的援助。我想,也许我们应当给兄弟党写信……我们只好取消对所有兄弟国家的石油供应,古巴、蒙古、越南除外。”苏联立即可以做的是向波兰提供粮食 50 万吨,棉花 50 多万吨,增加柴油燃料供应量 20 万吨。

1980 年 10 月 31 日,在总结已经结束的访问成果时,勃列日涅夫说:“……我们直截了当地问卡尼亚,当人民政权面临公开的威胁时,波兰统一工人党有没有应付紧急情况的计划。他说,有应付这种情况的计划,他们知道应当逮捕谁,如何利用军队。不过,从一切迹象看,他们暂时还不准备采取这一步骤,将这一步骤推迟了一定的时间……我刚才已经说过,卡尼亚只是在实施紧急状态这一问题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谨慎。至于我们提出的其他措施,他声称同意我们的意见。在对危机产生的原因和反革命威胁的程度的评价方面,双方完全互相理解……”<sup>69</sup>

1980 年 12 月 5 日,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国家领导人在莫斯科举行会晤。社会主义国家领袖们的共同立场与苏联领导人的立场很少有出入。苏共无可替代的思想家米·安·苏斯洛夫在向政治局委员通报情况时说:“在所有其他同志的发言中,都给波兰朋友提出了建议:应当怎么做,打击反社会主义分子要坚决。例如,胡萨克同志从 1968 年的实际情况中举了许多例子,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

右派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卡达尔同志也谈了反革命分子 1956 年在匈牙利的所作所为,当时,他只能采取果断的行政措施,消灭反革命。忠于本国传统的齐奥塞斯库同志谈论更多的是关于自主行动,主权和不干涉内政等……”

因为担心“团结工会”的思想对苏联社会舆论产生影响,苏共中央下令限制波兰报刊<sup>70</sup>在苏联的发行,并减少了两国间的旅游。<sup>71</sup>

362 苏联方面对波兰领导人的压力在持续加强。1981 年 1 月 22 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苏联国防部长德·弗·乌斯季诺夫报告了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华沙条约组织武装部队总司令 B. Г. 库利科夫访问波兰的结果:“库利科夫同志的印象是,波兰没有发生重大的转折。我们需要持续不断地向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源源不断地给他们提供援助。我们拟于 3 月份在波兰举行大演习。我觉得,应当把这次演习的规格提高一些,也就是说,反过来说,要让人知道,我们的部队已经准备好了。”<sup>72</sup>1981 年 2 月 23 日,列·伊·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六大上宣布:“我们决不允许社会主义的波兰受欺负。”

3 月 30 日,在与卡尼亚举行会谈时,勃列日涅夫指责卡尼亚和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说他们为了防止国内出现全面罢工,对“团结工会”做出了太大的让步。勃列日涅夫甚至说波兰领导人是投降派<sup>73</sup>。按照葛罗米柯的说法,这会导致“团结工会”合法化。

1981 年 4 月 2 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在布列斯特与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举行秘密会晤。在讨论即将举行会见的问题时,葛罗米柯建议:“如果他们打算在部分地区采取紧急措施的话,那么,就需要问问他们,他们是否确信波兰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机关将会站在他们一边?我想那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做出正确的分析……知道波兰军队是否是主要力量,是否还可以依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告诉波兰同志,必须采取更严厉的紧急措施,整顿秩序,对于他们来说,继续退缩是不能接受的,继续退缩已经完全不允许了。”<sup>74</sup>

安德罗波夫随声附和葛罗米柯的话说:“的确,我们需要告诉他们

要采取紧急措施……不要怕这种措施可能会造成流血事件。要知道，他们不采取紧急措施，却拿所谓的‘政治解决’来搪塞我们。我们一再告诉他们要采取军事措施，行政措施和司法措施，可他们只是采取政治措施。与此同时，我们需要向波兰朋友认真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要让他们迫使‘团结工会’对波兰发生的事件负责。否则的话，怎么会形成这样糟糕的事态呢？经济混乱不堪，食品供应等处处短缺，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团结工会’的罪过造成的，却要让政府来为此承担责任……”<sup>75</sup>

勃列日涅夫建议说：“应当告诉他们，什么是戒严，要跟他们详细解释清楚。”

安德罗波夫继续说：“是的，应当清楚地告诉他们，实行戒严，指的是实行宵禁，限制城市交通，加强对国家机构、党的机构和企业的警卫等等。”安德罗波夫还说，波兰事件开始对苏联，特别是对白俄罗斯和格鲁吉亚产生影响。

1981年4月9日，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报告了在布列斯特举行会晤的结果。安德罗波夫说：“我与德·弗·乌斯季诺夫同志根据与波兰同志举行会晤的决定，前往布列斯特，在布列斯特附近的一节车厢里，我们举行了会谈。会谈在晚上9点开始，夜里3点结束。考虑选择这个时间，是防止波兰同志的行踪被人发现。”

363

安德罗波夫说：“卡尼亚只好承认，反革命比当局强大。至于说到调部队（苏联军队——作者注）进去，波兰同志直截了当地说，这根本不可能，就像不能实行戒严一样。他们说，那样的话，他们将得不到理解，他们将无力做任何事情。波兰同志在会谈时强调说，他们将依靠自己的力量整顿秩序。”<sup>76</sup>

在举行秘密会晤时，双方甚至讨论了关于实行戒严的文告。文告草案是从莫斯科带去的，但是，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实际上拒绝批准这一计划，他们说，晚些时候签署这一文件。<sup>77</sup>

4月23日，“苏斯洛夫小组”的又一份报告“关于波兰局势发展与我方的若干措施”被提交给了政治局会议。<sup>78</sup>

报告开门见山地指出：“波兰国内发生的政治危机具有旷日持久、连续不断的特点。波兰统一工人党在相当程度上丧失了对社会中所发生的事态的控制。与此同时，‘团结工会’变成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能够与党和国家的活动分庭抗礼，实际上已经有能力掌握政权。反对派之所以暂时还没有夺取政权，这首先因为他们担心苏联军队进入，他们想以不流血的方式，通过爬行式的反革命行动，实现自己的目标。”

“苏斯洛夫小组”将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划分为三个集团。费什巴赫、韦尔布里扬、拉科夫斯基、雅布翁斯基是右派。他们被划为“修正主义分子”，在深受“团结工会”影响的党组织里拥有支持者。

格拉布斯基、扎宾斯基、奥尔绍夫斯基、科切列克被“苏斯洛夫小组”划为左派。

卡尼亚和雅鲁泽尔斯基被宣布为中间派。“苏斯洛夫小组”强调说，他们两人坚持与苏联友好的立场，赞成保留对华沙条约的义务。“这两人，特别是雅鲁泽尔斯基在波兰享有声望。目前，除了他们，实际上没有别的人能够领导党和国家。”

报告提出建议：加强波兰统一工人党的统一，保留左派在领导层中的地位，加强党在军队和内务部中的影响力。

364 看起来，一切都在按照人们已经熟悉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情景在发展：国内危机重重，最高政治领导层出现矛盾，莫斯科对其伙伴的行为感到不满，“在对抗反动派阴谋的斗争中，保持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际大团结”——所有这一切和从前一样。然而，在经过认真研究后，就会发现不同之处。首先，引人注意的是，波兰领导人比捷克斯洛伐克党的领导人更团结。最起码，华沙没有发出各式各样的“邀请信”，刺激苏联领导人采取积极行动“保卫社会主义”。而更重要的还不是这一点。在政治局的所有记录里，没有一份直接谈到苏联军队准备对波兰进行可能的人侵行动的材料。关于对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关于坚持要求实行戒严的材料很多，但有关准备人侵的材料却一份也没有。

苏联被无情地陷在了阿富汗。在政治局讨论“关于与巴布拉克·



卡尔迈勒同志举行会谈情况”<sup>79</sup>的老问题时，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出人意料地声称：“阿富汗问题显然对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局势造成了影响。”吉洪诺夫指的是经济方面的问题。对阿富汗战争的开支在增长，而此时又增加了波兰的经济问题。需要拨出贷款，支付波兰的债务，给波兰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而波兰向苏联提供的煤炭，在当前的情况下，只达到了计划的57%。而阿富汗问题中的军事政治问题更为严峻。苏联军队直接参加战斗行动已经有一年半的时间了，而这种战斗行动仍然没完没了。亲苏联的巴布拉克·卡尔迈勒政府只控制了阿富汗35000个村庄中的5000个。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没能完全控制任何一个省份。阿富汗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日益严重<sup>80</sup>。苏联军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人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了所发生的事态的危险性，认识到苏联不可能从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中脱身。

在这种情况下，再在国家的西部边境主动采取行动（如果苏联军队开进波兰的话，这种积极行动将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能的。

从这一点出发，只剩下向波兰领导人施加压力这一种可行的做法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C.卡尼亚的行为，令列·伊·勃列日涅夫越来越愤怒。在勃列日涅夫的眼里，卡尼亚成了向“团结工会”中的政敌退让投降的象征。在6月16日与卡尼亚进行电话交谈时，在克里米亚与卡尼亚会晤时，在1981年9月10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甚至没有掩饰自己对这位波兰领导人的这种态度。

1981年8月31日，苏联国防部、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苏共中央国际处共同起草了《关于波兰局势发展趋势和我们可能采取的行动方针的报告》。该报告建议波兰领导人时刻准备好对个别企业、部门（如交通部门）或地区实行特别制度，直至实行戒严。

卡尼亚辞职和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当选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使莫斯科松了一口气，并产生了希望。勃列日涅夫立即给雅鲁泽尔斯基打电话。10月19日，波苏两国领导人举行了详细的电话会谈。

除了向雅鲁泽尔斯基正式表示祝贺外，勃列日涅夫还呼吁：“要不



失时机地采取您已经确定的行动,镇压反革命。我们希望让所有的人,不论是波兰国内的,还是国外的,都感觉到,波兰的事态完全不一样了。”

365 雅鲁泽尔斯基表示同意勃列日涅夫的说法:“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采取果断的行动,在有希望获胜的地方,展开战斗。我马上去召开武装力量军事委员会和国防部会议。我将在会上布置相应的任务。我们将使军队广泛地参与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昨天,在中央全会结束后,我会见了各省委第一书记,告诉他们,不要因为我们将调动军人参与实施某些措施而感到委屈,我们将扩大军官与工人阶级进行会晤的机会,以使工人阶级免受‘团结工会’的影响。当然了,我们不会改变我们的总方针,即:争取人民当中那些因为上当而加入‘团结工会’的健康力量,吸引他们站到我们一边来,同时,我们还将打击敌人,当然了,一定要打出成果来。”

显然,在雅鲁泽尔斯基掌握政权后,苏联当局最终为自己解决了关于不能在波兰动用苏联军队的问题。1981年10月29日,安德罗波夫在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波兰领导人开始谈论兄弟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的问题。但是,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路线——我国军队不能进入波兰。”

紧随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安德罗波夫之后,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说:“总的看来,应当说,不能将我国军队开进波兰。他们波兰人不欢迎我国军队。”<sup>81</sup>

需要提醒的是,乌斯季诺夫和安德罗波夫不仅是政治局里有影响的人物,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对入侵阿富汗负有责任的人。他们的立场对于政治局全体人员来说,无疑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因为不准备入侵波兰,苏联政治领导人承担了增加对波兰的经济援助的义务,正如他们向雅鲁泽尔斯基承诺的那样。苏联将向波兰提供3万吨肉类,增加石油天然气的供应量。资金的筹集相当困难,肉类是从国家储备中调用的,需要各加盟共和国增加肉类的供应量。由于苏联的食品不足,这种供应行动开展得十分艰难。勃列日涅夫本人以

怀疑的目光看待食品援助问题：“我始终在考虑的是，尽管我们向波兰提供了3万吨肉类，但我们提供的肉对波兰人未必会有帮助。不管怎么说，我们尚不清楚的是，波兰下一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雅鲁泽尔斯基同志没有提出任何建议。”<sup>82</sup>

随着雅鲁泽尔斯基的执政，波兰政治领导人与苏联拉开了一定的距离。这并不意味着莫斯科与华沙之间的联系被削弱了。而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将主动权从克里姆林宫那里拿了回来。他并不掩饰自己打算实施“X行动计划”的意图，但他把自己向苏联提出的一系列要求作为条件。在1981年12月10日举行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安德罗波夫说：“雅鲁泽尔斯基相当固执地向我们提出了经济要求，并将我国的经济援助作为实施‘X行动计划’的条件。我想说的是，他甚至还提出了军事援助的问题，尽管不是直接提出来的……因此，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立场和从前在政治局会议上制定的立场一样，列昂尼德·伊里奇早先多次谈到过这一立场，这一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不能从这一立场后退。反过来说，我们所持的立场是国际主义援助的立场，我们关心波兰所形成的局面，但至于说实施‘X行动计划’的问题，这完全应当由波兰同志自己决定。他们怎么决定，就怎么办。在这方面我们不会坚持自己的意见，也不会去说服他们。”<sup>83</sup>

从安德罗波夫这些话中不难看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现出了不应有的犹豫不决，甚至是惊慌失措，而他却曾拥有“武装干涉主义分子”的名声（需要提醒的是，在1968年对待捷克斯洛伐克事件时，在组织入侵阿富汗时，他的反应特别严厉。）

根据我们手头拥有的文件判断，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种。第一个原因与苏联切实取消了“X行动计划”的准备工作有关，而且，苏联方面没有掌握有关波兰准备实施戒严的情报，这就更令人感到震惊了。在实际中，苏联的情报来自多种渠道：党、军队、外交、国家安全委员会，但苏联竟然没有得到这方面的情报。12月10日，也就是在波兰实施戒严前不到3天的时候，苏共中央政治局仍然没有得到准确的情报，不仅不知道“X行动计划”的实施日期，而且，竟然连是否实施戒严

都不知道！

负责“管理”社会主义国家事务的中央书记康·维·鲁萨科夫报告了大家已经知道了的事情：在最近一次会议上，波兰统一工人党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表示，赞成实施戒严。而接下来，鲁萨科夫就开始了猜测。刚刚从波兰回来的鲁沙科夫援引苏联驻波兰大使得到的消息说，雅鲁泽尔斯基在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省委书记们发表讲话时，“没有提出清晰、准确的路线方针。谁也不知道最近几天会发生什么。他谈到了‘X行动计划’，一开始说该计划将从12日0时起实施，后来又说从13日0时起实施。而现在，波兰人已经开始说，大约从20日开始实施。”12月9日，安德罗波夫打电话给波兰同行米列夫斯基，“向他询问波兰将采取什么措施，什么时候开始实施。米列夫斯基回答说……他不知道‘X行动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日期。如此看来，要么是雅鲁泽尔斯基向自己的同志隐瞒了具体的行动计划，要么是他干脆就不想实施这项措施。”

苏联军方情报机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乌斯季诺夫元帅肯定地说，对雅鲁泽尔斯基的计划，他一无所知：“我与西维茨基交谈过。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他们也不知道雅鲁泽尔斯基将军的想法。如此说来，这位现在实际上是履行波兰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职责的人，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部长会议主席和部长将会采取什么行动。”

另一个原因是苏联直接干预波兰内部事务将会产生的国际、军事政治和战略后果。本书作者认为，对这些后果的危险性，克里姆林宫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了。应当指出的是，雅鲁泽尔斯基千方百计地强调说，自己将来采取的行动取决于苏联。那位鲁萨科夫说：“雅鲁泽尔斯基指的是就这一问题与盟国进行联系。他说，如果波兰军队不能战胜‘团结工会’的抵抗的话，那么，波兰同志希望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直至向波兰境内派遣武装部队。同时，雅鲁泽尔斯基还引用了库利科夫同志的讲话。库利科夫同志似乎说，苏联和盟国将会提供军事援助。不过，库利科夫同志不是直接说的，他只是重复列·伊·勃列日涅夫同

志曾经说过：“我们决不允许波兰人民共和国受欺负。”<sup>84</sup>

雅鲁泽尔斯基引用库利科夫的话，而准确地讲，是把这些话解读为苏联保证干预波兰的内部事务。这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里遭到了明确的反驳。雅鲁泽尔斯基用这种方法将苏联捆到了波兰党的政策的战车上。这给双脚深陷阿富汗，与西方国家关系陷入紧张的苏联造成了很大威胁。

因此，安德罗波夫对鲁沙科夫的说法做出了激烈的反应：“如果库利科夫同志确实说过将部队开进去这种话，那么，我认为他这样说是不对的。我们不能冒险。我们不想把军队开进波兰……我不知道波兰的形势将会怎样发展，但即使波兰这样的国家陷入‘团结工会’的统治下，也就那回事儿。可如果资本主义国家都指责苏联，而且，它们又已经达成了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的相应协议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十分艰难。我们应当关心我们的国家，关心苏维埃联盟的巩固。这是我们的主要路线。”<sup>85</sup>

乌斯季诺夫元帅开始为自己的副手库利科夫辩解：“至于说似乎库利科夫同志说了有关将部队开进波兰的话，我可以完全负责任地说，库利科夫没有说过这种话。他只不过是重复了我们和列昂尼德·伊里奇都说过的话：我们不允许波兰受欺负。库利科夫很清楚，波兰人自己要求不要派军队进去……至于我们在波兰的驻军，我们正在予以加强……”<sup>86</sup>

经验丰富的苏斯洛夫对讨论结果进行了总结：“……就让波兰的同志们自己决定他们应当采取什么措施吧。我们不应当督促他们采取什么果断措施……波兰人直截了当地说，他们反对我们派军队进去。如果派军队进入波兰，这将是一场灾难。我想，我们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根本就不应当谈论派军队的事情。至于说到对波兰实施援助的问题，我们向波兰提供的援助超过了10亿卢布。前不久，我们已经做出决定，向波兰提供肉类3万吨，已经起运了16000吨……”苏斯洛夫反对解散波兰统一工人党，建立新党。<sup>87</sup>

12月13日，是波兰实施戒严的日子。这一天，勃列日涅夫与雅鲁

泽尔斯基举行了电话会谈。勃列日涅夫说：“您做出了一项尽管很困难，但无疑却是正确的决定……我们高度评价您发表的告人民书……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您可以指望从政治上和道德上得到我们的坚定支持。我们还将向你们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援助。”

368

一天后，12月15日，雅鲁泽尔斯基与勃列日涅夫又一次举行电话会谈。勃列日涅夫通报了向波兰提供经济援助的情况；雅鲁泽尔斯基则通报说，波兰领导人完全掌握了局势，行动坚决，罢工的地区减少了，实施了宵禁，警察和军队正在整顿秩序……

\* \* \*

习惯上被称做“停滞时期”（60年代末80年代初）的这段时间，也是苏联社会主义发展的最高点。这个巨大的国家逐步地、连续不断地扩大了工业生产规模。自然资源（石油、黄金）被用于购买农产品。创造了能够克服因粗放式发展而已经显现的经济危机的错觉。国家领导人有意识地放弃进行改革，认为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对“现实社会主义”构成了威胁。

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确立了“新斯大林主义”，也就是最严厉的思想控制和专政，对任何异端思想加以迫害，彻底提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社会中的作用，使其能够与苏共中央委员会并驾齐驱，而在许多情况下，其作用甚至超过了苏共中央委员会。这与所谓的“关心干部”政策——保持党和国家领导层的稳定分不开的。

苏联的影响不仅遍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除外），而且，还传播到了非洲（安哥拉、埃塞俄比亚、苏丹、索马里、利比亚、刚果、佛得角、几内亚、几内亚比绍、马里）。“第三世界”成了“冷战”的战场，而对于这些国家来说，这可是真正的战争。

然而，在70年代—80年代初，出现了发生危机的迹象。如果说，入侵阿富汗是扩大苏联影响政策的合理继续的话，那么，拒绝积极干预波兰的行动，则成了苏联意识到自身存在着日益严重困难的证明，而这些困难已经到了再也不能忽视的地步了。



## 注 释

- 1 作家和批评家、60年代《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成员 В. Я. 拉克申在他的日记中对 А. М. 鲁缅采夫有过简要评述：“1964年11月9日。自由主义之风微微吹动。他到《真理报》取代萨秋科夫当总编，曾经和他一道在布拉格工作的卡里亚金对他的评价不错。”
- 2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70. 28 февраля.
- 3 Об этой полемике см. : Черниченко Ю. Две тайны // Если по совести: Сб. ст. М., 1988. С. 326—327; см. также: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М., 1995. Кн. 1. С. 117—118.
- 4 См., например: Российский пролетариат: облик, борьба, гегемония. М., 1970; Тарновский К. Н. Проблемы аграр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периода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дискуссия начала 60-х гг.) // Проблемы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М., 1971; Волобуев П. В. Об обще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 особенном в опыте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научная конференция 369 «Пятидесятилетие Октября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рабочий класс»: Доклады и сообщения. М., 1967;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 Проблема многоукладности. Свердловск, 1972.
- 5 Гиндин И. Ф.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по докладу Л. В. Черепнина «К вопросу о складывании абсолютной монархии в России (XVI—XVIII вв.)»] // Документы советско-итальянск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сториков 8—10 апреля 1968г. М., 1970. С. 224—236.
- 6 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政治教育楼的会议记录系作者本人所做，现存鲁·格·皮霍亚私人档案室。
- 7 Примером такой обкомовской разборки стало дело заведующего кафедрой Ставропольского сельско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го института Ф. Б. Садыкова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119—120).
- 8 См. :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Сост. А. В. Коротков и

- др. М. , 1994. С. 79.
- 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Бодался теленок с дубом. Париж, 1975. С. 538.
  - 10 См.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 С. 81—83, 86.
  - 11 См. там же. С. 92—93.
  - 12 Там же. С. 103—104.
  - 13 Там же. С. 132—134.
  - 14 См. там же. С. 169—172.
  - 15 См. там же. С. 203—217.
  - 16 См. там же. С. 256—288.
  - 17 См. там же. С. 352.
  - 18 См.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Бодался теленок с дубом. С. 436—470.
  - 19 Здесь и дальше цит. по: «В спокойном тоне дать статью». Лидеры партии об оценке Сталина//Источник. 1994. № 4. С. 145—151.
  - 20 См. : Письмо КГБ при СМ СССР в ЦК КПСС от 31 октября 1975г. «О некоторых итогах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рганов КГБ».
  - 21 Подробно о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м движении в СССР в этот период см. :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М. , 1995. С. 235—272.
  - 22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М. , 1995. С. 45.
  - 23 Кратк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М. , 1983. Ч. 2. С. 582.
  - 24 由 А. В. 科罗特科夫和 А. С. 斯捷潘诺夫根据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室的资料计算出来。
  - 25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Ноябрь 1917г. —декабрь 1991 г. М. , 1994. С. 201—202.
  - 26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 ст - 233/8с от 24 октября 1980г. «О некоторых негативных проявлениях, связанных с недостатками в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и оплате труда рабочих и служащих».
  - 27 См. : Моргун Ф. Конец света? Или. . . М. , 1994. С. 4—5, 221.
  - 28 См. :Прибытков В. Аппарат. СПб. , 1995. С. 73—76.
  - 29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27 ноября 1978г. , л. 2—3.
  - 30 См. : Нежинский Л. М. , Чельшев. И. А. Проблем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и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М., 1995. С. 65—67.

- 31 ЦХСД, ф. 5, оп. 63, д. 513, л. 69—73.
- 32 Там же, л. 365.
- 33 Там же, оп. 62, д. 495.
- 34 Там же, д. 492, л. 136—149.
- 35 Там же, д. 495, л. 92—214.
- 36 Там же, д. 489, л. 146—147.
- 37 Там же, л. 150—152.
- 38 Там же, д. 495, л. 92—214.
- 39 Там же, оп. 64, д. 41, л. 115—119. 370
- 40 越南人民军副总参谋长陈文光中将 1972 年 9 月 15 日在越南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
- 41 См. : Агрессия США в Юго-Восточной Азии. Ч. 7. М. : Генштаб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 1977.
- 42 См. : Истор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1917—1985. М., 1986. Т. 2. 1945—1985. С. 401.
- 43 См. там же. С. 595.
- 44 См. : Хазанов А. М. Политика СССР в странах «третьего мира» //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1945—1985) : Новое прочтение. М., 1995. С. 435—436.
- 45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0 марта 1983г., л. 13.
- 46 ЦХСД, ф. 89, оп. 14, д. 31, л. 1.
- 47 Там же, д. 32, л. 1.
- 48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1980г.)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М., 1980.
- 49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 М., 1995. С. 190.
- 50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7 марта 1979г. См. также: Громов Б. В. Ограниченный контингент. М., 1994. С. 23.
- 51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2 апреля 1979г.
- 52 ЦХСД, ф. 5, оп. 76, д. 1045, л. 112—113.

- 53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193.
- 54 См. : Марчук Н. И. Война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зм» в действии или вооруженная агрессия? // Советская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в годы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С. 457—459.
- 55 См. там же. С. 459.
- 56 См. :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190.
- 57 ЦХСД, ф. 5, оп. 77, д. 800, л. 1—14.
- 58 Там же, д. 803, л. 2.
- 59 Там же, д. 801, л. 1—3.
- 60 Там же, л. 14.
- 61 Там же, л. 16.
- 62 Там же, оп. 84, д. 855, л. 42—54.
- 63 Там же, л. 51.
- 64 См. : Громов Б. В. Ограниченный контингент. С. 284.
- 65 ЦХСД, ф. 5, оп. 88, д. 974, л. 108—109.
- 66 АП РФ, № П210/П, от 25 августа 1980г.
- 67 Там же, П213/38 03. 09. 80.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О тезисах для беседы с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ми польского руководства».
- 68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9 октября 1981г.
- 69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31 октября 1981г.
- 70 通过了苏共中央秘书处的两个决定——1980年10月4日和1980年12月22日“关于加强对波兰出版物在苏联传播进行监督补充措施的决定”。
- 71 中央秘书处1980年11月28日“关于暂时减少苏联和波兰旅游往来数量的决定”。
- 72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2 января 1981г.
- 73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 апреля 1981 г., л. 6.
- 74 Там же, л. 8.
- 75 Там же, л. 10.
- 76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9 апреля 1981 г., л. 2—3.

- 77 Там же, л. 3—4.
- 78 Там же, № П7/VII.
- 79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4 июня 1981г., л. 371  
11.
- 80 ЦХСД, ф. 5, оп. 84, д. 855, л. 43—44.
- 81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9 октября  
1981г., л. 5.
- 82 Там же, л. 7.
- 83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0 декабря  
1981г., л. 532.
- 84 Там же, л. 530—531.
- 85 Там же, л. 532.
- 86 Там же, л. 535.
- 87 Там же, л. 527—536.



## 第六章 领导人相继去世

(1982年—1985年)

安德罗波夫一上台,共产主义也远离了!

——尤·库布兰诺夫斯基<sup>1</sup>

## 列·伊·勃列日涅夫之死

80年代初成了苏联发生危机的时期。这并非经济学家的学术观点：任何一个公民都能感觉到发生危机的明显迹象。苏联深陷阿富汗战争，城市里，乡村里，到处都在传说着杀害苏联士兵的巴斯马奇分子的可怕故事。电视台大讲“国际主义援助”，而死亡通知书接连传回国内。商店里空无商品。商品不是去买到的，而是去“搞到”的。商品出现了“脱销”。鞋子和蛋糕，衬衣和书籍，汽车和洗衣粉，电视机和药品，都需要人们去“搞到”。人们向往着“搞到”进口的录音机和避孕用具。一些商品是在“跳蚤”市场，在全国各个城市到处滋生的旧货市场上，花上超过国家规定价格一倍的价钱搞到的，而另一些则是通过在商店工作的“熟人”搞到的。许多城市实行了凭票证供应的制度，人们凭票购买肉、油。日子好过的是那些有权在商店订购商品者。机关和组织（从厂矿企业工会到科技文化机构）要向“商业机构”，也就是有权给各个商店分配商品的国家企业打申请报告。在申请报告中请求：“以领导帮助的形式，批准我们购买紧俏商品给在我单位工作的退伍老战士和劳动模范。”而日子最好过的是那些有权在机关内部供应商店、在国营百货商店特别供应部“提货”的人。党和国家的高级官员属于这一类人。

当贸易被分配所取代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违法现象。出现了各种不同的钱的问题。准确地讲，钱是一样的钱，但是，用一样多的钱，普通老百姓能够买来的东西，比官员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而一般官员，要比他们党内的同事能够买来的要少得多。因而，所有的人都羡慕那些由公家的黑色伏尔加车送货上门的人，并且，在心里仇恨他们。部分给“老战士”准备的商品，从商店流进了“黑市”，在旧货市场上被以原价二倍、三倍的价格倒来倒去。“影子经济”成了现实，各阶层的民众都参与其中。

在莫斯科，这些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更为严重，只是在1980年奥运

会期间,苏联首都才成了耀眼的“社会主义橱窗”。在这个橱窗里,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苏联人梦想的一切——各种食品、饮料和其他商品看上去应有尽有。人们私下里讥笑说,在1980年,苏联共产党所许诺的共产主义没有实现,只是举办了奥运会。然而,奥运会闭幕了,短时间的商品供应充足的局面也就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排起的长队。

国家经济中的危机虽然不明显,但却是危险的。工业部门继续生产武器。苏联实际上企图单枪匹马地与美国、北约和中国进行军备竞赛。大量的资源被投进了军事工业综合体的“黑洞”里。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他方面的比例失调现象也越来越严重。国家越来越依赖石油天然气出口。1871—1980年间,燃料的开采量翻了两番,其中,天然气的开采量增长了7倍,石油增长了近6倍。巨大的石油天然气管道将燃料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方国家,用于换取外汇,再用这些外汇给国家购买食品和高技术设备。经济陷入停滞状态。难以完工的“胡子”工程数量增多,国家对工业部门的投资效益低下。所建设的切博克萨雷重型拖拉机厂、耗资数十亿卢布的“北水南调”工程,成了糊涂决策的耻辱碑。

维·伊·沃罗特尼科夫是一名精力充沛的党的官员,在安德罗波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青云直上。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国家丧失了发展速度,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机关对此漠不关心:即使这样,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种无动于衷和无所作为的行为,令许多人,其中包括我们这些中央委员、州和部委的领导人感到震惊。列·伊·勃列日涅夫失去工作能力已经好多年了。长期忘我地拉着经济大车的阿·尼·柯西金被累得筋疲力尽,身患重病。他于1980年退休,不久,于当年12月去世了。”

国家政治领导人老态龙钟。跟随勃列日涅夫多年的安·帕·基里连科变得萎靡不振。他的大脑开始萎缩。勃列日涅夫身边的战友索洛缅采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契尔年科、库兹涅佐夫等人,在年龄上与他不相上下。苏联国内的“政治时钟”停止了走动。而让时钟走起来的标志是,这些老人们步履蹒跚的身影几乎每天晚上都出现在电视屏

幕上。他们的胸前挂满了金星,或者互相祝贺又一个纪念日的到来,或者给别人授予奖章,或者自己接受奖章,或者口齿不清地照着稿子发表简短的讲话。

关于最高政治领导人及其亲属,存在着种种传闻和谣言,这是 80 年代初的现象。有关勃列日涅夫的传闻和谣言最多。说他实际上已经失去活动能力。大量的笑话和趣闻在全国流传。其中的一则笑话试图以其独特的方式阐述苏联的历史。这则笑话说,列宁在知道了有关建设铁路的事情后,扛起一根枕木,与战友们一起,把枕木送到了工地;斯大林什么也没有扛,他是沿着新铁路坐车来的。他乘车前进着,而周围的一切都颤抖起来;赫鲁晓夫知道铁轨到头了以后,下令从后头拆铁轨,再向前面铺路;而勃列日涅夫把自己关在车厢里,下令放下窗帘,命令警卫人员摇晃车厢,以便造成车在行走的感觉。

374

有关勃列日涅夫失去行动能力的传闻得到了证实:电视常常播放年迈的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镜头,为了避免因为注意形象“编辑”而过分为难自己,总书记就把自己的真实面貌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年老体弱,对周围人反应迟钝,而跟随在他周围的是跟他一样憔悴的老人们。

有关总书记身边的人收受贿赂的传闻更有针对性。全国都在谈论 1982 年冬天,在 1 月底发生的大剧院歌手、演员、吉普赛人鲍里斯·布里亚策被捕的事件。传闻说,此人是勃列日涅夫女儿加林娜的情夫。在搜查他的房屋时,发现了据说是属于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的钻石首饰。国家马戏院院长 A. 科列瓦托夫的被捕也与加林娜有关。在科列瓦托夫的家里搜查出了大量美元和钻石首饰。这不仅牵涉到了加林娜·勃列日涅娃,而且牵扯到了她的丈夫尤·米·丘尔巴诺夫上将和苏联内务部部长尼·阿·晓洛科夫<sup>2</sup>本人。最后,这一切责任都推到了列·伊·勃列日涅夫身上。

还有一些传闻讲到了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格·瓦·罗曼诺夫。罗曼诺夫在 1976 年,当他 53 岁的时候成了政治局委员。在 70 年代末,他被勃列日涅夫列为总书记的接班人。然而,在 80 年代初,苏联到



处流传着这位列宁格勒第一书记在埃尔米塔日国家博物馆大厅里给自己的女儿举办豪华婚礼的情况。在婚礼上,客人们用博物馆珍藏的沙皇用过的餐具大吃大喝。

实际上,既没有举行过豪华的婚礼,也没有出现打碎了餐具的事情。这些事情都没有<sup>3</sup>。然而,传闻起了作用。罗曼诺夫的名誉受到了败坏,也就被取消了角逐总书记职位的候选人资格。

与此同时,还有关于安·帕·基里连科的儿子叛逃到国外的传闻。在这些传闻与谣言中,最轰动的是有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库·茨维贡自杀的消息。传说他的自杀是被迫的,因为他似乎是坚持要追究加林娜·勃列日涅娃的刑事责任。

在了解国家最高领导人私生活中的隐秘的同时,人们不会不做出这样的结论:这些负面消息都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策划的。

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放弃了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职位,担任了苏共中央“第二书记”,成了勃列日涅夫的正式接班人。但他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保留了实际上的控制权。

11月7日,在照例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时候,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站在列宁墓观礼台上向游行群众致意。游行活动结束后,他乘车前往城外的官邸,位于扎维多沃的狩猎场。在那里住了两天后,勃列日涅夫回到了莫斯科,确切地讲,是回到了位于首都郊区的别墅里。11月10日,警卫人员发现勃列日涅夫已经死了。警卫军官试图恢复他的呼吸,忙活了半个多小时。第一个赶到的是安德罗波夫,他听了警卫的报告后,就去见勃列日涅夫的夫人。第二个赶来的是叶·伊·恰佐夫,他是国家头号医生,是国家元首的太医。他听了警卫人员的汇报后,问:“安德罗波夫在哪里?”<sup>4</sup>

苏联历史的完整延续,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去世结束了。

苏联各边疆区和各个州的党的官员只是在当天晚上才知道了勃列日涅夫去世的噩耗。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11月10日21时20分,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安全局局长Г.И.瓦西连科给我家里打电话,说有紧急通知,让我在家里等他。他开车赶来



了。告诉我说,他接到了电报,列·伊·勃列日涅夫去世了。我们马上赶到边疆区委员会。我想通过高频通信(保密的政府通信线路——作者)与中央委员会联系,但中央里找不到人。也许是电话没有接通。我把电话打到了 M. B. 索科洛娃(苏共中央公共部工作人员)那里,她告诉我说:请等待指示。只是到了 22 时 30 分,我们才在边疆区区委会接到了正式电报:政治局通知说,11 月 10 日凌晨,列·伊·勃列日涅夫猝然去世。”

让我们继续引用维·伊·沃罗特尼科夫的回忆:“1982 年 11 月 12 日,中央全会在斯维尔德洛夫大厅举行。10 时整,大厅里静悄悄的。所有的人都坐在那里。政治局委员们走了进来,他们是:尤·弗·安德罗波夫,尼·亚·吉洪诺夫,康·乌·契尔年科,弗·瓦·谢尔比茨基,安·安·葛罗米柯,德·弗·乌斯季诺夫,格·瓦·罗曼诺夫,丁·艾·库纳耶夫,维·瓦·格里申,米·谢·戈尔巴乔夫。”

尤·弗·安德罗波夫宣布中央全会开始,他首先做了 15 分钟的发言:‘党和国家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我们的同志和朋友、一位心胸开阔的人、忠诚于……事业者去世了。请默哀一分钟悼念列·伊·勃列日涅夫。’接着,安德罗波夫讲了列·伊·勃列日涅夫对党的贡献和意义。他说,现在必须加强团结统一。他说:‘全会即将决定选举苏共中央总书记的问题。请同志们发言。’”

政治局委员康·乌·契尔年科是勃列日涅夫办公室不可替换的办公室主任(1960 年开始),还是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他宣布说,政治局委托他提议尤·弗·安德罗波夫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因为安德罗波夫同志坚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视野广阔,才干突出,品德优良,很好地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领导作风。

沃罗特尼科夫在回忆录中特别谈到,契尔年科竭尽全力强调说,安德罗波夫注重与集体共同工作。在致答辞时,安德罗波夫除对选举他“担任总书记一职”礼节性地表示感谢外,还极其模棱两可地表示,保证“尽可能地集体解决问题。但不可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sup>5</sup>

## 尤·弗·安德罗波夫：重建 共产主义基础的尝试

376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担任了苏共中央总书记，时年68岁<sup>6</sup>。他于1914年出生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7年制中学毕业后，成了一名电影放映员，积极地参加共青团的工作。在雷宾斯克中等水利技术学校学习过；在内河船上当过水手和大副。1936年起，他成了一名职业的共青团工作者，后来，成了职业的党务工作者，历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负责人，共青团雅罗斯拉夫尔州委第一书记，卡累利阿—芬兰共和国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指导员（1950年起）。斯大林去世后不久，安德罗波夫离开了中央委员会。1954年，他被派到匈牙利担任大使，在这里，他成了镇压匈牙利1956年骚乱的关键人物之一<sup>7</sup>。毫无疑问的是，匈牙利事件使大使队伍中的安德罗波夫脱颖而出，变成了国家最高政治领导人本人认识的人物。

1961年，安德罗波夫成为中央委员，1962年11月，当选为苏共中央书记，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联络事务。1967年6月，安德罗波夫取代弗·叶·谢米恰斯内，成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意味着，在将积极参与反赫鲁晓夫政变行动的人物之一排除出政治生活后，勃列日涅夫已经使苏联政治警察完全服从自己了。可以证明安德罗波夫政治作用提高的另一个事实是，他几乎同时被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在安德罗波夫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了其在苏联社会中的影响力。安德罗波夫的发明是，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再采取直接镇压和司法审判的方法，而是推行所谓的“预防警告”措施——对那些被潜在地视为危害制度者的生活，进行司法外的干预。受到这种“预防警告”的人数，是受到司法审判者的10倍。1963—1966年，国家安全委员会审判了3251人，1967—1970年，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审判的人有2456人，而同期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预防警告”的人数则达到了58298人。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安德罗波夫是人

侵捷克斯洛伐克的积极拥护者之一。他一再要求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1973年4月,安德罗波夫成了政治局委员。从贝利亚至今,国家政治警察领导人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在勃列日涅夫生命的最后几年,正是安德罗波夫与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一起,在许多方面决定着苏联的政策。1982年5月,安德罗波夫放弃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成了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

与此同时,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头目,安德罗波夫与党的最高领导层内的其他人相比,有着更好的情报保障。他从整顿国内秩序着手,开始了自己的工作。他掌握着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任何一位领导人所没有的权力。只有他能够办成贝利亚因之而受到指责的事情:拉拢国家和党的机关,用人们对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极度恐惧,将他们捆绑在一起。整顿秩序,这首先要求党和国家机关按照他安德罗波夫提出的要求,根据党的领导人本人的愿望,进行工作。

1982年起,西方媒体开始散布消息说,安德罗波夫是开明的专制者,不是与西方价值观格格不入的人。毫无疑问,这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树立新形象的间谍机关干的。

1982年11月18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最高领导层进行了工作分工。安德罗波夫承担的工作是国防、内外政策的主要问题、政治局的组织工作、对外贸易工作。康·乌·契尔年科获得了巨大的权力。他获得了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力,在政治局里负责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中央行政部(负责领导法院、检察院和护法机关的工作)的工作。此外,契尔年科还负责领导思想、文化、科技、党的机关和信访等部门。公共部依然归他负责,他领导该部已经超过了20年<sup>8</sup>。这次职务分工和契尔年科获得了召集书记处会议,且在安德罗波夫不在位的情况下可召集政治局会议的权力这两件事表明,契尔年科获得了成为总书记接班人的权利。

11月22日,星期一,举行了中央全会<sup>9</sup>。尤·弗·安德罗波夫宣布会议开幕。在此次中央全会上,盖·阿·阿利耶夫由政治局候补委员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已经病人膏肓的安·帕·基里连科被解除了中

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当时,全会还建立了苏共中央经济部,批准尼·伊·雷日科夫为部长,并选举他为中央书记。

新任总书记与前任不同的是,他相当明白地理解新闻作为一种管理方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正是新任总书记做出了扩大新闻接触人员范围的重要决定。当然,这种接触是受苏共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督与控制的。不过,这种接触改变了国家的新闻局面。从1982年12月11日起,苏联开始每周定期公布“苏共中央政治局通报”。每周四是政治局举行会议的日子,而在周五早晨,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就会播报有关政治局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的消息。无论如何不能小看这一步骤的重要意义:正是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才出现了关于国家最高政治领导机关工作情况的报道,而这些报道内容从斯大林时代开始,就被列入最高级国家机密之列。

安德罗波夫还批准公布有关经济犯罪案件的负面性质的材料。1983年11月23日,中央书记处通过了《关于在苏联媒体上报道有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中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的结果》的专门决议<sup>10</sup>。下面,让我们详细地研究一下这个重要文件。不过,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并不仅仅在于公布这个文件的原因(尽管在这个具体情况下,这个文件完全符合安德罗波夫“整顿秩序”的政策)。重要的是另一个方面: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新闻领域的“潘多拉盒子”被稍稍打开了一点儿。新闻具有自身的逻辑和自身的规律。在存在着对新闻进行控制的明确愿望和巨大可能性的情况下,报道那些在过去完全保密的有关当局活动情况的消息,这创造了先例,也为扩大这类报道的规模提供了动力。

安德罗波夫就职后,马上开始“整顿秩序”。在俄罗斯,在这一口号下隐藏着许多内容。“整顿秩序”,表明了国家政权机关严格遵守国家要求的决心。

安德罗波夫试图复苏和恢复行政命令式的国家管理方法,恢复过去在斯大林时代曾经存在过、但在赫鲁晓夫时代,甚至是勃列日涅夫时

代遭到了相当程度削弱的直接命令式的机制。

1983年1月2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说,国家的战略是加快社会生产的集约化,提高社会生产的效率,广泛应用科技。“对所承担的事业具有崇高的责任感”,乃是实现这一加快战略的条件。这句看上去十分刻板的套话在具体的情况下,却充满了特别的含义: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实际存在着领导干部终身制的情况下,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概念实际上并没有被采用。同一篇社论还要求“加强生产领域的劳动纪律和责任感”。

378

苏共中央1983年1月7日举行的会议证明,社论中发出的这一最新呼吁并不是空谈。此次会议讨论了“关于按照中央11月全会(1982年)指示和苏共中央总书记尤·弗·安德罗波夫同志的指示和论断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的问题”<sup>11</sup>。苏联总检察长亚·米·列昆科夫在苏联《真理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不迁就。公民,社会,法律”的文章,阐述了应该如何执行“总书记的指示和论断”<sup>12</sup>。

为了揭露违反纪律者,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对商店、影剧院、浴池,甚至城市街道组织进行突击检查,“收容”那些在这个时候本应当在工作岗位上的人。违反纪律者被处以严厉制裁。最倒霉的是那些因公到别的城市出差,白天在商店里被抓住的出差者。他们的出差证明上将被盖上大印,并注明不得给该出差者报销出差费和路费。一个“出满勤干满点”的运动开始了。

不过,也出现了大量“无意中的违纪者”。自始至终存在着的一些问题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在大量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很难得到任何介绍信;商店、邮局、洗衣店、房管所、民警局的工作制度只方便了本单位的工作人员,而对大量的客户来说,并不方便。这些办事机构的工作时间与主要的工厂企业和机关的工作时间完全一致。因此,人们不得不占用工作时间,在办事机构和商店里排队。为改变这一状况,苏联部长会议专门颁布了《关于整顿为居民服务的企业、组织和机构的工作时间的问题》的政府令。<sup>13</sup>

安德罗波夫亲自干预加强劳动纪律的运动。1月底,他视察了莫



斯科 C. 奥尔忠尼启则机床制造厂,会见了工人,并在会议上发表了讲话。他提出的问题很简单,更具有礼节性和迫不得已的性质。他问工人们:在这个厂子里已经工作了多少年,劳动报酬有多少,这些报酬够不够用。不过,他在会议上按照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讲述了主要的内容。出席会议者纷纷要求加强劳动纪律和生产纪律。在此次会议上发言时,安德罗波夫声称:“用列宁的话说,我们本应当抓住的那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环节,究竟在哪里呢?目标是远大的,也是艰苦的。尽管不能把一切都归结为纪律,但是,同志们,恰恰就是要从纪律开始抓起……我想,加强纪律的问题并不是仅仅针对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的,这针对所有的人,从部长开始。希望同志们能够正确地理解。”

整顿秩序的目的就是要加强整个垂直管理体系。在这个普通而又明显的决定的背后,是要努力保住制度,加强命令式的经济管理方法。

在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审理大批经济案件。其中反响最大的案件是莫斯科一些商店经理的案件。结果是,有好几个人被枪决。

对舞弊、腐败现象实施的打击,以及在服务与商业领域开展的镇压行动,规模越来越大。如前所述,对于人们理解危机现象来说,商业的状况最明白,也最直观。因为制度本身是没有罪过的<sup>14</sup>,所以,就要在商业领域找到有罪者。

为此目的,150名经验丰富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被派到苏联内务部工作。商业领域最大的舞弊案件被破获。当时的莫斯科民警机关打击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倒把行为局局长、前国家安全委员会反间谍军官 A. 斯捷尔利戈夫回忆说:“无法无天的行为来源于党的机构……有的人因为40戈比的缺斤少两行为,就被送进了劳改营,而一些大的投机者非法赚取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卢布,却依然逍遥法外。”<sup>15</sup>

斯捷尔利戈夫证明说:调查商业部门中的舞弊行为的工作,引起了党的精英们的不满。调查行动是“受到控制的”。

莫斯科市执委会商业总局局长 H. П. 特列古博夫遭到逮捕,受到

审判,最后被枪毙了。此人早在1970年就开始担任这一职务,被认为是与政治局委员维·瓦·格里申关系密切的人。特列古博夫是在6月被逮捕的,在他被捕后,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又关押了莫斯科商业总局的25名重要工作人员和一些最大商店与食品店的经理,包括莫斯科国营百货商店所属食品店经理B. C. 特韦里季诺夫,“叶利谢耶夫斯基”食品店经理、卫国战争参加者索科洛夫,还有“海洋”公司、“南方港”汽车商店和其他一些公司与商店的经理们。经调查发现,每个商店都向区商业局送礼,而区商业局都向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送礼。商业总局又用钱贿赂各部委甚至内务部的官员。<sup>16</sup>

许多商店的经理遭到逮捕。他们受到审判,一些人被枪毙了。位于斯摩棱斯克广场,在外交部大楼对面的第2号食品店的经理C. Г. 诺尼耶夫自杀身亡。苏联商业部长A. И. 斯特鲁耶夫比较走运,他只是被安排退休了<sup>17</sup>。审判中发现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司法权力机关的警觉。

与此同时,这些案件促使报刊开始大规模地谈论国家和党的机关里存在腐败现象的问题。看上去,这一切是在最严格的控制下开始的。前面提到的中央委员会1983年11月23日做出的《关于在苏联媒体上报道有关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法院对……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的结果》的决议说,应当“同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建议……”。结果,《消息报》、《莫斯科真理报》和《莫斯科晚报》三家报纸,受委托“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同意后,刊登法院对莫斯科执委会商业总局‘美食家’商店工作人员中的巨额受贿者进行刑事调查方面的材料。” 380

三家报纸刊登的材料成了大量侦探故事、剧本、故事片的素材,成了新的、已经提升到“地方”和“地区”层次的揭露性政论文的素材。“黑手党”一词在新闻媒体中出现后,成了现代政治体制的定义之一。当然了,出现这种结果,是首先开始进行这些案件调查的人们所万万没有料到的。

案件调查涉及到苏联共产党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C.

Φ. 梅杜诺夫,此人过去曾被指控收受贿赂。受到调查的还有内务部长尼·阿·晓洛科夫。早在1982年3月,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就向书记处提交了《关于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领导干部中大量收受贿赂的事实的报告》。这份报告被批复重新进行核实,进行补充调查。不仅动用了党的监察委员会的人力。而且,还动用了苏共中央党的组织工作部和行政机关的人力参加调查。<sup>18</sup>

1982年5月31日,在中央各部的参与下,调查人员起草了新的报告,证实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报告中的事实。

勃列日涅夫知道了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舞弊事件,但断然反对安德罗波夫提出的将边疆区委第一书记梅杜诺夫逮捕并交审判的建议。勃列日涅夫劝安德罗波夫说:“不能这么做,他是那么大的一个党组织的领导人,人们相信他,跟着他走,而现在却要审判他?他们边疆区的事情很顺利……我们不能因为一个失去道德的人,玷污一个很好的边疆区的……把他调到别的地方去吧,让我们看看他在新地方的表现吧。”

实际上,在勃列日涅夫活着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就已经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开始了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逮捕行动。7月20日,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会议由安德罗波夫主持。苏联驻古巴大使维·伊·沃罗特尼科夫被召回莫斯科。安德罗波夫在会上说,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被发现存在着大量的违法事实,其中包括党的积极分子,已经有152人被捕,99人受到调查。梅杜诺夫被召回,听候中央的处理<sup>19</sup>。维·伊·沃罗特尼科夫被派到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接替梅杜诺夫。7月21日,这一决定以政治局决议的形式办理<sup>20</sup>。7月23日,在苏共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员会全体会议上,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当选为区委第一书记。而梅杜诺夫的政治命运,则在将近一年后,在1983年6月14日举行的中央全会上做出了裁定。

对苏联内务部长晓洛科夫的调查,与对梅杜诺夫案件的调查工作同时进行。晓洛科夫因为与勃列日涅夫关系亲近而著名。在勃列日涅夫的庇护下,他敢于干预纯粹归国家安全委员会管辖的问题。这一点

从晓洛科夫给勃列日涅夫的信件中就可以看出来(参见前一章)。这位内务部长在信中一再证明不需要将索尔仁尼琴驱逐出境,坚持要求当局改变对待这位作家的态度,坚持必须尽力“收买”这位作家。需要提醒的是,安德罗波夫一直坚持要求驱逐索尔仁尼琴。关于晓洛科夫,有传闻说他把自己的口袋与国库弄混了。

勃列日涅夫去世一个月后,晓洛科夫被解除了职务。接替他的是维·瓦·费多尔丘克。费多尔丘克此前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职务已经一年半了。前内务部长晓洛科夫被打发到了所谓的“极乐小组”——国防部监察员小组,被派到这里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大将和元帅。然而,晓洛科夫的厄运才刚刚开始。负责对前不久的苏联内务部长进行调查的是苏联军事检察院。检察院收集了大量证明晓洛科夫营私舞弊的材料,其中包括盗取公用的“奔驰”车、被没收的物品,特别是古董。

在1983年6月4日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契尔年科严厉指责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他说,政治局建议将晓洛科夫和梅杜诺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晓洛科夫被指控出于个人的目的走上了营私舞弊的道路。他还被指控为自己和亲属建造别墅,将为内务部领取的三部汽车据为己有,“为人不诚实,不进行自我批评”,批准动用5万卢布的公款拍摄描写自己的电影,以庆祝自己的70岁生日。梅杜诺夫则被指控“粗暴地违反党的纪律”,边疆区里行贿受贿现象泛滥,亲自出面保护高级领导中的受贿者。

除在战争年代荣获的奖章外,晓洛科夫被褫夺了其他一切奖章。晓洛科夫试图寻求保护,于是,就求救于与自己相识30多年的老熟人——中央“第二书记”契尔年科。不过,契尔年科已经不能也不想提供帮助了。在等待例行的搜查和不可避免地沦为囚徒的时候,晓洛科夫开枪自杀了<sup>21</sup>。法学博士A. И. 古罗夫将军在回忆内务部这一时期的历史时说,在费多尔丘克的领导下,内务部各机关被开除者达10万人,民警机关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特别局的长期监督。<sup>22</sup>

对勃列日涅夫女婿、苏联内务部副部长尤·米·丘尔巴诺夫上将



案件的调查具有丑闻的性质。这一案件是所谓的“乌兹别克案件”造成的后果。1983年,乌兹别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布哈拉州执委会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局长穆扎法罗夫提起刑事诉讼,此人在收受贿赂时,当场被捕。为对这一案件继续进行调查,1983年9月,该案被移交苏联检察院。检察院成立了以T. X. 格德良为组长的侦查小组。在不同的时间里,在该小组工作过的人员超过了200人。格德良和他小组的工作人员从被捕者那里,查到了有关他们在莫斯科的保护人和帮助者的情况。同时,侦查人员完全“按照苏联方式”,使诉讼规则服从于政治合理性。

382 党的各个地区委员会中都设立的(负责处理党员问题的)党的委员会,被赋予了监督与控制,甚至是惩罚的职能。通常,党的这个委员会负责研究入党者的申请,受处分党员的“个人事务”,并决定准许什么人可以出国旅游、休养或工作。现在,该委员会被赋予了实际上不受限制的监控职能。<sup>23</sup>

国家的生活“上冻了”。党的各级机关大力贯彻“思想纪律”的概念,也就是说,所有新闻与出版机关必须进行自我检查。新闻界展开了整顿纪律的运动,并与揭露酗酒现象结合在一起。这些公开的行动,在调门上与两年后戈尔巴乔夫执政时开始实施的禁止出售酒精饮料的尝试,是不谋而合的<sup>24</sup>。指责过去的大清洗,评价斯大林的文章已经完全不见诸报端了。这类问题已经不存在了。在这方面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苏联《真理报》上刊登长篇文章,纪念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元帅。米·尼·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是红军的创立者之一、国内战争的积极参加者,后来在斯大林进行大清洗时被处死。文章详细介绍了图哈切夫斯基的生平经历,阐述了他在苏联军事理论研究方面的作用。而有关他被处死的情况,文章是这样描写的:“他突然凄惨地死去了。”<sup>25</sup>这样的语句通常用来描写交通事故中的死亡者,而不是这样一位与数万红军指挥员一起受到不公正审判后被处死的人。他是一名元帅,在苏共二十大后,成了斯大林大清洗运动受害者的象征。

“上层”在慢慢地发生着改变。在负责经济的中央书记尼·伊·



雷日科夫之后,又增加了担任苏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已经积累了在中央工作经验的叶·库·利加乔夫。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他被派到了西伯利亚,去了托木斯克。在这里,他担任了州委第一书记。利加乔夫是为数不多的全国知名的州委书记。他以要求严格著称,狂热地推行健康的生活方式,要求托木斯克州委机关人员从事体育锻炼和滑雪运动,严厉限制在本州范围内出售酒精饮料。他还是当地剧院的保护者。现在,他被召回莫斯科,被任命为组织部部长,这是苏共中央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实际上正是他领导着地方党组织的工作,掌握着一种能够将党的官员沿着权力的阶梯“提拔”上来,或者,将其淘汰出局的权力。在他的主持下,“勃列日涅夫”的老干部被新人所取代<sup>26</sup>。格·瓦·罗曼诺夫被从列宁格勒调到莫斯科,担任负责国防部门事务的苏共中央书记。令人反感的苏共中央科技与高等院校部部长谢·佩·特拉佩兹尼科夫退休养老,替代他的是担任过苏联社会科学院院长的瓦·安·梅德韦杰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这一重要职务由尼·叶·克鲁奇纳担任。米·谢·戈尔巴乔夫1983年5月顺利访问加拿大后,当时负责安排此次访问的苏联驻加拿大大使亚·尼·雅科夫列夫被调往莫斯科,担任了有威信的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一职,该所与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一样,与苏共中央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383

许多大的共和国和州的党组织也发生了变动。1983年10月31日,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夏·拉·拉希多夫自杀身亡。当局对棉花生产和向国家出售过程中出现的大量舞弊事件的调查,是造成这次自杀的原因。来自莫斯科的调查组慢慢地把矛头对准了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位最高领导人。替代拉希多夫的是伊·布·乌斯曼霍贾耶夫,此人也未能幸免被指控有受贿和舞弊行为。在白俄罗斯,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吉·雅·基谢廖夫死亡。替代他的是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尼·尼·斯柳尼科夫。许多州的领导人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州包括敖德萨州、伊尔库茨克州、列宁格勒州、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和达吉斯坦。

党和国家领导层的这些变化,力度是相当大的,但却不是决定性

的。不过,这些变化引起了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的强大的地区与部门领导集团的惴惴不安,首先是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由契尔年科成为领袖的“勃列日涅夫帮派”的不安。

国家最高领导层也出现了政治上的不稳定: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契尔年科、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等元老派与罗曼诺夫、戈尔巴乔夫这些“少壮派”形成对立。而这种对立是非常缺乏灵活性的。在争夺权力的斗争中,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妥协。安德罗波夫本人尽量与这些未来的总书记候选人们保持相同的距离。获得了巨大的权力的契尔年科,在国内依然是不为人们所知的人物。在安德罗波夫担任总书记的15个月的时间里,契尔年科在媒体中只出现了几次——会见莫桑比克代表团,在中央六月全会上做报告,出席纪念马克思诞辰165周年紀念会<sup>27</sup>……戈尔巴乔夫的情况怎样呢?他抛头露面的机会比其他人多——举行老党员见面会,安德罗波夫在会上做了发言。在中央十二月全会(1983年)上,戈尔巴乔夫受安德罗波夫委托,替他做报告(后来人们才知道,这是安德罗波夫生前的最后一个报告)。戈尔巴乔夫的名字常常出现在新闻媒体上。不过,与他作对的是一些有影响力的政治局委员,首先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罗曼诺夫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在莫斯科,他是初来乍到之人,在中央机关里没有可靠的支持,而这种支持在争夺权力时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他作为国防工业部门监督人的地位,决定了他既能与军方,又能与部长会议结成联盟。

安德罗波夫身体状况急剧恶化是造成政治不稳定的另一个原因。在中央机关里,人们开始谈论说:“他已经活不长了”<sup>28</sup>。生病和接连出现死亡的气氛笼罩着老广场上的这栋苏共中央大楼。毫不令人惊讶的是,仅在1983年,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曾三次(3月24日,5月31日和11月24日)研究“关于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工作制度”的问题。

384 3月24日讨论的问题是:改变政治局的工作制度,取消星期六的会议,以及讨论佩尔谢的请求:“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希望您本人

能够遵守这一工作制度,保重自己的身体,关心自己的身体。”<sup>29</sup>

在1983年5月31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上,契尔年科提醒说:“同志们,我们曾经就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和中央书记的工作制度问题做出了两项决定。规定要大幅度地降低每个政治局委员的工作负担,将工作时间限定在9时至17时,给年龄超过65岁的老同志提供更长的假期,每星期可以在家办公一天。应当说,我们做出的这两项决定没有得到遵守。因此,我建议,明确这两项决定,并将两者合在一起,要认真地遵照执行。”

契尔年科的发言得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支持。安德罗波夫提醒说:“政治局的这两项决定是根据列·伊·勃列日涅夫的提议做出的。他对党的领导干部的身体特别关心。我们应当继续推行这一路线。要知道,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待政治局的年龄构成。这里是我党政治经验的集中地,因此,不加思考地匆忙地更换人员并不总是有利于事业。对这一问题需要持谨慎、认真和深思熟虑的态度。”

在给元老们“请安”后,安德罗波夫话锋一转:“同志们,现在我想说说我非常想向您们报告的主要问题。这里说的是关于改善我们各个部门的工作,提高我们对所承担的任务的个人责任感问题。”

这不仅涉及我安德罗波夫,而且也涉及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我们大家都要对自己所领导的那个部门的工作局面负责。

吉洪诺夫同志需要牢牢掌握粮食供应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同志要少拿天气作借口,要争取丰收,要动员人们,不要让人们老是埋怨干旱和拿坏天气作借口,而要加倍地工作,利用好每一个晴天,争分夺秒地收获更多的产品,尽我们所能,增加粮食及其他作物和牲畜的收获量。

阿利耶夫同志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改善交通状况。卡皮托诺夫同志应当关注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在这方面需要再加一把劲儿。

杰米契夫同志要严格审查剧院的节目,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缺点很多,其他一些有关文化发展的问题也要多加注意。彼得·尼洛维奇,人

们对文化方面的需求很大。

我不想说其他同志了,他们都了解自己负责的部门,知道自己的任务。我想,需要把自己的部下都召集起来,向他们讲清楚这些任务……”<sup>30</sup>

385 在引用的这一大段文字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如下:安德罗波夫确定了政治局里的优先顺序。安德罗波夫、乌斯季诺夫和葛罗米柯的名字在这里都无缘无故地被提到了,这是为了表明对所有的人都严格要求的氛围。令人感兴趣的是安德罗波夫的其他意见。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被要求“牢牢掌握粮食供应问题”。可是,粮食供应问题,这首先是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分内的事情。安德罗波夫给戈尔巴乔夫提的意见具有冷嘲热讽的味道:“要少拿天气作借口,要争取丰收,要动员人们,不要让人们老是埋怨干旱和拿坏天气作借口,而要加倍地工作……”戈尔巴乔夫所得到的批评意见的数量与中央负责文化工作的杰米契夫所得到的批评数量相当。正如人们过去和现在所描述的,“自由主义者”安德罗波夫要求杰米契夫“严格审查剧院的节目”,他还提醒说:“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缺点很多”。

在此次会议上,安德罗波夫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为领导干部建造别墅的问题”。

建造别墅这件事在莫斯科已经搞得满城风雨。当局对在花园地段建造房屋制定了绝对统一的标准。新闻界、人民监督委员会、党委会全都以应有的姿态,竭尽全力地监督人们严格遵守这种房屋的建筑标准:面积不超过25平方米,外廓不超过10平方米,房高不超过2米半。按照规定,不能在花园里建造公共浴池,却可以建造兔舍<sup>31</sup>。在追求标准统一的背后,体现出了人们不允许出现私有财产现象;不允许违背国家规定的“人人平等”原则的愿望。然而,事情做得并不好。人的本性是不能用同一个标准衡量的。发生了一件滑稽可笑的事情:有关部门给莫斯科市人民监督委员会在伊斯特林斯克区霍尔谢维基村附近的公共花园里建造了房屋。很显然,房屋是严格按照标准建造的。但是,该监督委员会里有一个人居然在房屋的下面挖出一个2平方米的地下室!



此人只好做出检讨,将这个不符合标准的地下室填平了。

与此同时,党和国家的上层人物们在莫斯科郊外风景最美丽的地段拥有非常体面的国家别墅。有职务,就有别墅,这不算什么。职务被解除了,就应当交回别墅。这应当是普遍的实际情况。这种实际情况还有点政治意义:每一名官员都舍不得职务。没有了职务,他就无足轻重了。<sup>32</sup>

理所当然,安德罗波夫不能避而不谈违反这一公共原则的人。他对政治局的同行们说:“同志们,我想问你们一下,我们是否还要继续增建别墅?我这里有份资料,举个例子。甲某某给自己建造了一座别墅(120平方米),现在,他把别墅以32000卢布的价格卖给了乙某某。同时,甲某某的儿子和女儿又各自得到了地皮,显然,他们也准备在爸爸的帮助下给自己建造别墅。同志们,这是无秩序现象,这是利用职权营私舞弊的行为。”

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两种态度。“少壮派”的政治局委员们坚持“停建别墅”。阿利耶夫说:“应当干脆禁止给领导干部建造别墅。”沃罗特尼科夫抱怨说,苏联部长会议做出的给科学院院士建造别墅的规定,“遭到了全面的破坏。别墅的建筑标准也没有得到遵守,对这件事情没有严厉的原则性态度。在莫斯科郊外的尼科林山上,一些学者和艺术家建造的别墅简直就是宫殿,而所有这一切用的都是国家统一分配的材料,花费的都是国家的资金。”

386

“元老们”则要谨慎一些。他们提醒说,总体上说,还是有标准的,经部长会议同意后是准许建造的。吉洪诺夫说:“我们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是经过苏联部长会议同意,并获得莫斯科公共事业委员会批准的。”格里申说:“总的说来,准许建造集体的别墅。”不久前刚被从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职位上提拔进中央的罗曼诺夫随声附和元老们的意见。他说:“我们允许在列宁格勒郊外给院士和其他大科学家建造别墅,而其他的人则租用别墅5年,在必要时,可由列宁格勒市执委会将这一期限延长。此外,一些工厂和其他经济单位在合作的基础上建造别墅。”



安德罗波夫加重语气说：“不，同志们，我认为应当从自己开始……这—问题是原则性的，我们应当继续增建别墅吗？”

当总书记的意见看起来已经决定了的时候，戈尔巴乔夫投入了“战斗”：“我是这样认为，这里说的是党中央和政府领导干部的事。现在，建造别墅的事情在全国已经具有投机倒把的性质。在这方面出现了大量不像话的事情。我认为，应当委托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重新研究这—问题。”

然而，戈尔巴乔夫错了。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反驳说：“不，过去形成的局面，今天不能推托，也不能将问题推给监察委员会。我这里谈的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政府官员和部长们的事。”

这时候，所有的人都清醒过来。多尔吉赫说：“应当全面解决这—问题。”齐米亚宁说：“要责成政府制定—切规定，并整顿秩序。”

“同意这—点”，安德罗波夫对自己提出的问题进行总结说。“让我们这样做出决定。第一，要强调在建造别墅的过程中，出现了严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第二，责成苏联部长会议……采取措施，严厉整顿秩序。”<sup>33</sup>

总书记发出了威胁，同时表明，他了解每个人的一切情况，但没有必要时，他是不会张扬的。对于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和部长们来说，有他们自己的法律。而党的规范不是为他们制定。他们只受总书记的奖励和惩罚。

然而，总书记患了重病，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事态的后果是“上层”的斗争加剧。戈尔巴乔夫正是如此评价苏共中央六月（1983年）全会的结果的。在此次全会上，契尔年科做了题为《党的思想工作和群众政治工作中的迫切问题》的报告。戈尔巴乔夫认为，该报告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精神。安德罗波夫不喜欢这样做，于是，他委托戈尔巴乔夫主持全会第二阶段的会议。戈尔巴乔夫写道：“如果知道在当时这意味着什么，就不难理解这对契尔年科的打击有多么沉重了。”<sup>34</sup>

此次中央全会做出了一些人事变动。格·瓦·罗曼诺夫成了政治

局委员,维·伊·沃罗特尼科夫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尼·阿·晓洛科夫和С.Ф.梅杜诺夫被从政治局除名。

争夺权力的斗争旷日持久。“元老派”和“少壮派”两大集团继续存在。不过,如前所述,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这种对抗,绝不是绝对的对抗。在这两派的各个派别中,都存在着自己的矛盾。在政治局里,谁都清楚的是,归根结底,权力要交给“少壮派”中的代表,而“少壮派”的戈尔巴乔夫和罗曼诺夫也都明白,没有部分“元老派”的支持,是不可能得到权力的。还有一个因素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至今也没有对其进行研究。在本书中,本书作者只是把这一因素称做苏共中央机关里存在的、并向部分国家机关扩散其影响的那些集团之间的争斗。争夺权力的斗争具有旷日持久的特点,而妥协、协议、相互让步,成了这种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

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与德·弗·乌斯季诺夫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他希望与苏联军事工业集团的领导人结成盟友<sup>35</sup>。戈尔巴乔夫与乌斯季诺夫在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方面,两人立场相近。1983年7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问题。这次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证明,当时的思想形势决定了必须进行“改革”,实行“公开性”。

对过去的历史做出评价的起因,是契尔年科讲的关于他与莫洛托夫会面的故事。政治局做出决议,恢复了莫洛托夫的党籍。

“我接见了维·米·莫洛托夫,与他进行了交谈。他十分高兴地接受了我们的决议,差一点掉下眼泪来。莫洛托夫说,这一决议给了他第二次生命。莫洛托夫现年93岁,但他精神矍铄,声音洪亮。他说,中央政治局保留并继续从事党在过去曾经从事过的工作。他说,不好的一点,就是你们和我们从前一样,工作到深夜。莫洛托夫说他很关心新闻,爱读报纸杂志。他说:你们做得对,因此,赢得了人民的支持……”

乌斯季诺夫说:这是他做出的重要评价。

吉洪诺夫说:总而言之,我们恢复了他的党籍,这件事做对了……

契尔年科说:不过,这件事过后,中央委员会收到了马林科夫和卡

冈诺维奇的来信,还收到了谢列平的来信。谢列平在信中说,他一直反对赫鲁晓夫,他还提出了许多请求。请允许我读一下卡冈诺维奇的来信(他读信)。马林科夫的来信内容相似,他承认自己有错误……

388 **乌斯季诺夫说:**我认为,应当给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恢复党籍。毕竟他们曾经是政治家,是领导人。恕我直言,假如不是赫鲁晓夫的话,就不会通过开除这些人党籍的决定了。也就不会发生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犯下的那些令人发指的恶行了。不论我们怎么评价,斯大林就是斯大林,这就是我国的历史。赫鲁晓夫在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方面,以及在对待斯大林方面的政策,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是任何一个敌人所做不到的。

**葛罗米柯说:**我认为,应当恢复这两人的党籍。他们曾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长期领导着一个方面的工作。我不相信他们会是不诚实的人。对于赫鲁晓夫来说,主要的课题就是要解决人事问题,而不是弄清个别人犯下的错误……

**切布里科夫说:**我想告诉大家的是,西方电台早就开始广播莫洛托夫恢复党籍的消息。并且,它们还广播说,我国劳动人民和全党至今对此还一无所知。也许,我们应当在苏共中央新闻简报中发一条关于给莫洛托夫恢复党籍的消息?

至于说到给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恢复党籍的问题,我请求给我们一点时间,就这两位活动家在被清洗者名单上做的那些批示,准备一些说明资料。要知道,在给他们恢复党籍后,我们将会源源不断地收到50年代获得平反者们的来信,他们当然会反对给这两人,特别是给卡冈诺维奇恢复党籍。不过,对此应当有所准备。我想,在通过最终决议时,这份说明资料应当受到政治局的关注。

**吉洪诺夫说:**是的,如果不是赫鲁晓夫的话,他们两人就不会被开除党籍了。赫鲁晓夫在全世界的面前,败坏和诬蔑我们和我们的政策。

**切布里科夫说:**此外,在赫鲁晓夫时期,许多人被非法地平反了。问题在于这些人当初受到惩罚,是罪有应得。比如说索尔仁尼琴就是个例子。

戈尔巴乔夫说：我想，不在苏共中央新闻简报上刊登给莫洛托夫恢复党籍的消息也是可以的。中央组织工作部可以将此事向党的边疆区委和州委发情况通报。至于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我也赞成给他们恢复党籍。并且，恢复党籍的时间，显然不需要与即将举行的党的代表大会联系起来。

罗曼诺夫说：是的，这些人已经上了年纪，来日无多。

乌斯季诺夫说：关于对赫鲁晓夫的活动进行评价，我完全赞成。他给我们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只要想一想他对我国历史干了些什么，对斯大林干了些什么就足够了。他对苏联在外部世界中的正面形象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打击。西方国家从来也没有喜欢过我们，这不是秘密。可是，赫鲁晓夫把那些让我们长年蒙受耻辱的论据和材料，送到了他们的手里。

葛罗米柯说：实际上，正是因为这一点才产生了欧洲共产主义。

吉洪诺夫说：可他对我国经济都干了些什么！我本人在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过。

戈尔巴乔夫说：在党务方面，他竟然将党分成工业党组织和农业党组织…… 389

契尔年科说：至于说到谢列平的来信，归根结底，他请求给他提供他原来的政治局委员级别的待遇。

乌斯季诺夫说：我认为，就他而言，在退休时能领到养老金就已经足够了。这样的问题，他提出来也白搭。

契尔年科说：我想，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暂时还只限于交换意见。不过，你们大家也都知道，对这些问题我们还会再讨论的。”<sup>36</sup>

从完整意义上讲，这些讨论表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惊人地一致。而在这方面也有领头人物跳了出来。乌斯季诺夫就是这样的领头人。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拼死地”坚持自己对赫鲁晓夫的负面看法，因为在对斯大林进行恶意污辱方面，赫鲁晓夫负有责任。

对于政治局委员们来说，苏联历史的反面角色并不是斯大林。“赫鲁晓夫在对待我们党和国家的过去方面，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灾

难,这是任何一个敌人所做不到的。”乌斯季诺夫肯定地说。不论是葛罗米柯,还是戈尔巴乔夫,都同意他的说法。

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乌斯季诺夫和其他老态龙钟的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从这种随声附和行为的背后,人们可以听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我是自己人,我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

在苏联各级党组织举行选举时推行述职报告制度,对于加强安德罗波夫执政以来开始进行的改革来说,具有重要意义。中央委员会根据尤·弗·安德罗波夫的建议,在1983年8月通过决议,在秋季和冬季,举行基层、区、市、专区、州和边疆区党组织述职报告和选举活动。该决议提出了重要的要求:“不能容忍的是下列事实:会议按照现成的方案举行,不经过认真的和公开的讨论,与会者的发言事先经过编辑,而倡议和批评受到压制。”<sup>37</sup>实际上,中央在通过这个决议的同时,还批准了苏联部长会议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补充措施的决议》<sup>38</sup>。

《关于加强劳动纪律的补充措施的决议》严厉批评了一些部委及其机关。决议指责它们没有“为正常的高效能工作”创造必要的条件,部机关本身“没有为各级组织做好榜样”,不论是行政机关,党的机关,还是工会机关,普遍容忍纪律松散现象,掩盖经营不善的现象。

决议要求加强对工作时间的监督,对旷工行为规定了多种惩罚方法。例如,迟到3小时和3小时以上者,算旷工;准许将旷工者和酗酒者调到报酬低的工作岗位3个月;从旷工者的假期中扣除旷工的时间。决议还规定了意义重大的登记记录——“依法”追究旷工者的责任。而受到处罚的并不仅仅是旷工者。决议还规定禁止“为吸引其他企业的工人而无理地提高物质奖励标准”。

390

决议也没有忘记对领导者的处置:如果在某位领导者所领导的集体中出现了纪律涣散的情况,那么,应当解除其所担任的职务。

正式提高对领导者的要求与推行述职报告和选举制度相结合,为各级领导者开创了全新的局面。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但却估计不足的情况是:绝大多数各级领导人根据规定进入了经过选举产生的党的



机关：从党支部和党委会到州委会和党中央。而提高要求的呼声，为党内职务的任命和与之有关的国家机关和经济机构中的干部任命工作，创造了一种新的、与勃列日涅夫时期完全不同的氛围。著名的“干部稳定”政策和列·伊·勃列日涅夫时代形成的有错不咎的做法一样，开始成为过去。

国内的经济形势继续令人不安。在安德罗波夫领导下进行的加强纪律性的斗争，促进了生产规模的明显扩大和生产效率的明显提高<sup>39</sup>。然而，发生危机的危险性依然存在。1983年8月15日，在接见老党员时，安德罗波夫指出了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他说：“现在，应当把损失的时间补回来。除其他一切方法外，这还需要改革计划的拟定，改革经营机制。”<sup>40</sup>

1983年7月10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社论，承认必须重新研究过去的经营机制，支持私人副业。这篇社论显然不是偶然的。从赫鲁晓夫时代开始，私人副业就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被认为是过去的残余，是私有制倾向的化身。在这篇社论里，一切都变了样。社论强调说，副业不仅在家庭经济中具有重要作用，而且在子女教育和在劳动技能培训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真理报》就此问题发表的这篇社论，毫无疑问，考虑到了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观点。

8月28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颁布《关于加快国民经济中科学技术进步的措施的决议》<sup>41</sup>。令人好奇的是，在这项决议中，在要求向工业部门推广更完善技术的同时，还提出了纯行政手段的解决方法。例如，决议规定，从1984年起，对一切商品的评定，将按照两个标准进行：高级类和一级类标准。不接受评定的商品，应在两年的期限内，停止生产。准许给高质量的新产品提供30%的补贴；所生产的低质量的旧式产品，须降价30%出售。需要重点指出的是，监督的职能（哪些商品是一级类，哪些是高级类，哪些是低级类）由国家机关承担，而不是由实际需要决定。

## 韩国“波音”飞机的悲剧

1983年9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例行会议。会议计划讨论一些陈规旧套的老问题——关于在1983年11月份召开例行中央全会的问题,关于自行推进轮式起落架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问题,关于与埃及的贸易问题和援助阿富汗的问题等……<sup>42</sup>惟一能使此次会议具有历史意义的问题,可能就是安德罗波夫的身体问题。疾病使此次政治局会议成了安德罗波夫出席的最后一次会议<sup>43</sup>。可是,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对于政治局来说,最重要的新消息是夜里被击落的美国侦察机实际上是韩国的一架客机。1983年9月1日早晨,当美国副国务卿R.伯特询问有关韩国一架载有269名乘客从纽约飞往汉城,中间在阿拉斯加降落过的客机在萨哈林地区失踪的情况时,这一消息才传到了莫斯科。与此同时,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确信,9月1日凌晨在萨哈林上空被击落的是美国一架R-135型侦察机,而客机失事的消息完全出乎意料。

在总参谋部举行的会议上宣布,防空军已确认击落了美国一架R-135型侦察机。该型号的多架侦察机对苏联从西部地区向勘察加发射导弹的实验行动进行了侦察。这架飞机在当地时间(勘察加时间)凌晨2时45分侵入苏联领空。4时51分,从阿拉斯加方向飞来的另一架飞机接近了它。苏联防空部队确认,这是R-135的同类飞机。

这就是那架不幸的“波音-747”。难以设想的是,装备有良好的雷达导航设备,时刻保持着不间断无线电联络的客机,竟然能够偏离规定航线500—600公里。而令人不解的是,美国和日本的无线电控制部门怎么会发现不了这架飞机航线的这种改变(致命的改变!)呢?为什么美国和日本的无线电控制部门不通过苏联无线电控制部门与日本和美国的同行之间所使用的通信频道,通知苏联方面呢?“冷战”的烙印在整个这起悲惨事件上得到了反映。<sup>44</sup>

被苏联防空部队确定为侦察机的这架飞机,跟平时的飞行不一样,没有沿海岸飞行,而是向勘察加飞来,接近了苏联战略核力量所在地区。防空指挥部下令歼击一截击机起飞,企图迫降入侵的飞机。这一企图没有成功——入侵飞机向东飞去,并在6时5分离开了苏联领空。苏联的电子监控部门发现,这架飞机一直与地面保持着无线电联络,它在6时10分时通知地面说:“我们顺利地通过了勘察加南部。”

6时13分,这架飞机再次进入苏联领空,这一次是飞到了萨哈林岛上空。苏联防空指挥部确信自己是在同一架侦察机打交道。一架苏-15型歼击一截击机腾空而起。该机接到的命令是:“发信号警告”,“将其迫降到我方机场”。6时20分,飞行员接到命令:“开炮警告。”入侵飞机还是不服从命令,并开始迅速拔高飞行。于是,6时24分,防空指挥部下达了“摧毁目标”的命令。截击机发射了2枚导弹,击中目标。后来,驾驶这架苏-15型歼击一截击机向入侵飞机发射2枚导弹的飞行员奥西波夫说:“我怎么也不能想像,我会去击落一架客机。说是什么飞机都可以,这的确不是客机!”<sup>45</sup>苏联防空指挥部9月1日确信,在“冷战”条件下,这是司空见惯的一件常事。

在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的情况下,9月1日,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指责苏联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苏联打算发射曳光弹向这架飞机提出警告。”舒尔茨的这个声明是让苏联承担故意击落客机的责任。然而,舒尔茨故意地歪曲了美国截听到的苏联飞机的无线电情报。按照这份情报的说法,苏联飞行员报告说,他飞机上的信号灯已经打开,也开炮打了一个点射。<sup>46</sup>

出席在苏联总参谋部举行的会议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马·科尔尼延科,在向安德罗波夫汇报所发生的事情时,坚持认为,在强调韩国飞机侵入苏联领空,并拒不服从苏联防空飞机的要求的同时,还要在声明中通报说,韩国飞机已经被击落。安德罗波夫犹豫不决。一方面,他相信这架飞机发生的事情是“里根的阴谋”,而从另一方面讲,应当通报所发生的事件。他对科尔尼延科说:“德米特里(即乌斯季诺夫——作者)坚决反对承认我们跟飞机被毁事件有关。”安德罗波夫马

上打电话给乌斯季诺夫,乌斯季诺夫劝安德罗波夫不要着急,说:“一切都将恢复正常,任何人永远也找不到任何证据。”<sup>47</sup>

根据讨论的结果,政治局在9月1日做出决定,发布了一条非常没有条理的塔斯社正式声明。

声明在9月2日发布。声明说:“今年8月31日深夜,一架不明国籍飞机在勘察加上空进入苏联领空,后来,该机再次侵入萨哈林上空的苏联领空。与此同时,该机关闭了空中导航指示灯,拒绝回答询问,也不与无线电技术部门通联。起飞拦截入侵飞机的防空歼击机试图协助该机降落到附近的机场。但入侵飞机对苏联歼击机所发射的信号和警告不予理睬,继续向日本海方向飞行。”<sup>48</sup>

393 就在9月1日这天,尤·弗·安德罗波夫吩咐政治局委员第二天再次开会,专门分析所形成的局面。列席会议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米·切布里科夫,国防部总参谋长尼·瓦·奥加尔科夫,外交部副部长格·马·科尔尼延科。

1983年9月2日,政治局举行会议。由于安德罗波夫不能出席,此次会议由康·乌·契尔年科主持。契尔年科提醒说:“有关韩国客机的事件政治局委员们在昨天已经讨论过了。大家也都知道,有关这一事件的通报也已经公布了。较详细的材料也发给了大家,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希望在政治局会议上对这一复杂问题拿出意见。”

契尔年科说,召开此次会议的直接原因是“美国和整个帝国主义世界的新闻媒体就这一事件掀起了一场反苏运动。我们应当全面地交换一下意见。”

而在讨论过程中还出现另一个问题:侦察机怎么会变成客机了呢?为什么被击落的是一架客机呢?

击落侵入领空的侦察机的权力无须讨论。这在“冷战”<sup>49</sup>时期已有多年的实践。可这一次不是侦察机,而是客机。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在查阅1983年9月2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时<sup>50</sup>,给人越来越明显的感觉是,这件事使最高政治领导人措手不及,根本谈不上对这一事件

预先拟定计划。不过,毫无疑问的是,韩国客机的悲剧,是保持多年的临战局面所注定的。

苏联的“主角们”是这样即兴发言的:

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元帅说:我可以向政治局保证,我军飞行员的行动完全符合军人职责的要求,所提交的报告中所叙述的一切都是真相。我们的行动绝对正确,因为美国生产的这架韩国飞机深入我国领空 500 公里。从外形轮廓上,很难将这架飞机与侦察机区分开。苏联军事飞行员已经对客机进行过射击警告。而在这种情况下,我军飞行员们的行动完全正确,因为他们根据国际规则,多次向这架飞机发出信号,让其降落在我国的机场上。

**戈尔巴乔夫**说:这架飞机在我国领空飞行的时间很长。如果说它迷航了,美国人就应当通知我们,可是他们没有这么做。

**乌斯季诺夫**说:不论是在勘察加上空,还是在萨哈林上空,我军飞行员对这架飞机做出多次警告。这架飞机闭灯飞行。飞机的窗户没有灯光。我军飞行员按照国际规则,发射曳光弹进行了警告。后来,飞行员向地面报告说,这架飞机是军用机,应当击落。我的意见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我国报刊上发表必要的报道。不过,我们不能惊慌失措。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最近一段时间里,在我国太平洋边界地区发生了 12 起这种侵犯领空的事件。大家都知道,1978 年,在摩尔曼斯克地区我们曾经采取行动,迫使一架韩国飞机降落在我国机场上。 394

我建议委托国防部、苏联外交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立一个工作组,就目前所形成的局面,负责制定必要的措施,并提出建议。该工作组可吸收尼·瓦·奥加尔科夫同志(总参谋长——作者)和克留奇科夫同志(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即情报局局长——作者)。

**吉洪诺夫**说:我不明白的是,汉城的飞行员想干什么。他应当知道他这样做是在找死。他也看到了我国飞机的信号灯,也知道了让他降落的要求。我认为,这是蓄意的挑衅,目的是使国际形势复杂化和尖



锐化。

乌斯季诺夫说：很难说韩国人是怎么想的。而完全可能的是，这就是蓄意挑衅。问题在于，该怎样报道我们的攻击行动更好一些。

葛罗米柯说：不能否认我们的攻击行动。

杰米契夫说：他们当然知道这是实弹攻击。

格里申说：韩国飞行员说过什么？

乌斯季诺夫说：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

沃罗特尼科夫说：是不是韩国飞机的通信出了故障？

乌斯季诺夫说：这一点谁也不好说。

奥加尔科夫（苏联总参谋长）说：我们掌握了韩国飞机与地面联络的情报。

切布里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说：我想对大家说的做一点补充。第一，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方面非常准确地知道韩国飞机的飞行情况，并对它进行了跟踪观察。第二，日本人公布的第一批资料，所依据的只有一个来源：从美国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国家安全局得到的情报。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人对这架韩国飞机如此关注？第三，根据我方的情报，这架失踪的飞机跟美国的飞机没有进行联络，干脆就是静默飞行。最后，也就是第四点，美国人自己也承认，这架飞机深入了苏联领空，并且是在勘察加和萨哈林地区苏联最保密的设施上空飞过……

戈尔巴乔夫说：他们确定了这是实弹射击吗？

切布里科夫说：没有确定。不过，我想再次强调的是，我方的行动是完全合法的，是苏联军队条例直接规定的。

395 另外，我想说的是，现在，我们必须给民航局下达关于严格遵守国际飞行走廊和航线的指示，也许，甚至可以减少飞往东部和美国的飞行次数。毫无疑问的是，帝国主义势力将会挑动在我国驻外使馆前举行示威行动和其他敌对行动。因此，必须给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外交部各机构发出相应的指示。

罗曼诺夫说：我支持大家说的意见。在我们的报道中，首先应当做

到的是,第一,要指出,韩国的飞机是军用飞机还是民航飞机,很难区分。第二,应当强调这架飞机违反了最重要的国际公约。第三,需要说明这架飞机对任何询问和信号都不做出回答。要知道,依据现行法律,我们有权迫降在我国领空非法飞行的外国飞机。当然了,应当确定我们在新闻媒体和在国际场合做出表态的时机和顺序……”<sup>51</sup>

9月3日,当西方国家所有的媒体都报道说,苏联击落了韩国一架载有269名旅客的“波音”飞机的时候,塔斯社发表了一份更加没有条理的公告,将政治局委员们在9月1日和2日阐述的观点同时公布了出来。关于韩国“波音”客机事件,塔斯社报道说,这架侵犯了苏联领空的飞机,被苏联防空部门发现,防空部门的战斗机起飞,沿这架飞机的飞行方向发射了曳光弹,此后,过了大约10分钟,这架“波音”飞机“还处在雷达监视区里,此后,对这架飞机就失去了监视。”<sup>52</sup>将政治局的话翻译一下,意思是说:看到了这架飞机,对它进行了射击,但没有击中。飞机飞走了,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们就知道了。

刚刚开始捏造的假话,立刻使有关萨哈林上空必定发生悲剧事件的报道变得毫无意义。这则报道说,这架韩国飞机与美国多架侦察机一起飞行,这些飞机深入苏联境内,准确地讲,是飞到了苏联远东地区已经正式宣布的、且已经事先向各航空公司声明过的禁飞区。这则报道还说,这架“迷航”的飞机始终处在美国电子监控设备的监控区里,美国人有责任警告“波音”飞机上的驾驶员,因而,他们应当对这架客机侵入禁飞区承担责任(如果认为这架飞机是迷航了的话)。

苏联官方机关公开撒谎,一下子被美国政府抓住了把柄,使得美国能够展开强大的宣传攻势,在这场宣传攻势中,野蛮地击落客机的行为所引起的正义愤怒,与美国企图摆脱不愉快问题,逃避对所发生事件责任的企图,结合在了一起。

苏联宣传机器启动很慢。9月4日,苏联新闻媒体对这一悲剧实际上继续保持沉默。9月5日,在西方社会大量愤怒行动的压力下,防空部队司令C.罗曼诺夫上将在《真理报》发表谈话,承认飞行员在夜

间,在云层里,无法将侦察机与客机区分开。

396

只是到了9月7日,苏联政府才援引后续情报,发表正式声明,谈到了前些时候人们已经知道了的情况(不幸的“波音”飞机的飞行情况,苏联防空部队的行动情况),并且承认对所发生的悲剧承担责任,还对“无辜人员”的死亡表示遗憾<sup>53</sup>。然而,这种认错行动为时已晚,并且,显然是被迫的。

9月8日,美国国务卿D.舒尔茨与苏联外交部长安·安·葛罗米柯在马德里举行会晤,此次会晤的特点是双方互相指责。结果,会晤不欢而散。会晤结束后,苏联领导人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步骤:举行新闻发布会。在新闻发布会上,总参谋长尼·瓦·奥加尔科夫做了讲话,并且,列举证据,说明韩国飞机侵犯苏联边界与美国侦察机的行动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行动与“FERRET-2”(“雪貂-2”)间谍卫星飞行的相互协调。后来,苏联空军元帅彼得·基尔萨诺夫公布了这架韩国“波音”飞机在安克雷奇机场滞留了40分钟的情况,按照苏联军事专家的意见,这是为了保证间谍卫星、“波音”客机和美国的侦察机同时出现在勘察加和萨哈林的上空。基尔萨诺夫还说,韩国客机一直处在美国“LORAN-C”(“罗兰-C”)无线电导航系统的监控区里。他还说,这架客机的机组人员不寻常地从18人增加到了29人,驾驶这架飞机的是韩国预备役上校陈冰英和预备役中校孙淳允,这足以证明这架飞机在美国的侦察行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这些本身就很重要的情况并不能抹杀客机被击落这个不争的事实,也不能抹杀苏联领导人企图向全世界和本国掩盖凌晨在萨哈林上空发生的这一悲剧的事实。

## 康·乌·契尔年科执掌政权

安德罗波夫病倒了。他住进了昆采沃医院,身上插满了“人工肾”的大量管子。关于他的病情没有报道。可是,1983年11月7日,总书记没有出现在列宁墓观礼台上,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观礼台”

上的仪式总是受到人们的特别关注。11月7日,勃列日涅夫在去世前两天,还在观礼台上向游行队伍致意。而安德罗波夫在一年后没有出现在观礼台上,这是不可避免地很快就要更换领袖的标志。安德罗波夫正式的接班人是康·乌·契尔年科。然而,契尔年科是勃列日涅夫多年的战友和部下,他的身体状况远不能满足愿望。他患有哮喘和肺病。并且,在1983年夏天,在南方,在新任苏联内务部长维·瓦·费多尔丘克家里吃了新熏制的鲑鱼后,发生了严重中毒。<sup>54</sup>

1983年12月26日,苏共中央举行中央全会。此次全会本应当早一些,在11月份举行。本来是希望安德罗波夫能够出席全会,但是,事情已经很清楚,会议只能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与会者都拿到了安德罗波夫的报告。内容是呼吁完善管理制度,提高经济杠杆的作用,提高经济效益和集约化程度<sup>55</sup>。戈尔巴乔夫受安德罗波夫委托,向与会者宣读了这份报告。会议选举米·谢·索洛缅采夫和维·伊·沃罗特尼科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米·切布里科夫为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叶·库·利加乔夫为中央书记。

397

新年,1984年在人们对不可避免的变革的期待中来到了。1984年1月2日,《真理报》写道:“1983年结束了,它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记忆。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人民为实现党的方针而紧张劳动的结果。党的方针是,更有效地利用发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和优越性,加强社会生活各领域的纪律性和组织性。”

1月4日,苏共中央公布了《普通与职业院校改革的基本方针草案》。在这件事上,“一切跟往常都不一样了”。第一,苏共中央公布的是草案,而对苏共中央的草案进行讨论是极其罕见的,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是的,在列昂尼德·伊里奇时代,的确公布过宪法草案,但并没有进行讨论,也不可能进行讨论。有什么可讨论的?对“苏联共产党是政治制度的核心”这一点进行讨论?还是对“苏联实现了最高级的真正民主”这一点进行讨论?谁都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如果有人怀疑这一点,那么,他将被送到疯人院进行治疗。而现在,提交给大家进行讨论的是教育课题,而在这个问题上,按照苏联笑话所说的,人人都

是专家,就像在医学领域,谁都治过病,谁都生过病一样。经过上头批准的讨论和在比较安全的教育层面发生的令人不习惯的争论,成了与国家一起发生的、人们还不太明白的某种变革的实际表现。这种变革初看上去并不明显,但是,与它同时发生的是,人们开始对官场的窃贼说他们是贼,还能因他们的盗窃行为对其加以惩罚,能向各级无所事事的官员询问工作情况,政治局自己认为(尽管是咬牙切齿地、短时地)需要向全国通报政治局做出了什么决定。

然而,过去的政治遗产被全盘地保留下来。“社会主义民主是在行动中”——这是1984年1月13日《真理报》社论的标题。这篇社论说,全国到处开始举行选举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的竞选大会,莫斯科劳动人民在国家音乐厅举行大会,一致推举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尤·弗·安德罗波夫为他们的代表。天哪,实在难以想出比发表这样的文章从本质上更具有反苏性质的事了。经过上级挑选的劳动人民竟然推举一位已经好几个星期徘徊在生死线上的人,一位在医院里即将死去的人,一位已经失去了行动能力,但在这个巨大国度里却是党和国家权力的化身的人,作为他们的代表。

1984年2月9日,尤·弗·安德罗波夫去世。

第二天,政治局举行会议。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亚·吉洪诺夫第一个发言,建议选举康·乌·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职务。支持他的有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格里申、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是在“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完全按照政治局的意见,在最近一次中央全会上被推荐当选为总书记的。

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于1911年9月出生在西伯利亚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上过三年学,后来,在莫斯科党的组织者高级党校学习过。当他开始在摩尔达维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时,通过函授的方式,获得了基什尼奥夫师范学院的毕业证。契尔年科与其党内的大多数同行一样,在党内的职务是从共青团起步的。他担任过共青团诺沃谢洛夫斯基区宣传鼓动部部长。在边防部队服役2年。战争期间,他在莫斯科,在高级党校学习。



他曾经担任过奔撒州党委负责思想工作的书记。1948—1956年在摩尔达维亚工作,在这里与勃列日涅夫相识。就是在这里,契尔年科进入勃列日涅夫的圈子。多年来,两人的生涯密切相关。

1956年,紧随勃列日涅夫之后,契尔年科进入了中央委员会。在勃列日涅夫之后,契尔年科又进入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从1965年起,契尔年科在中央委员会里担任公共部部长职务。这使他能够每天都向总书记报送材料,下发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各项决定。契尔年科不仅成了一名好部长,还成了勃列日涅夫不可或缺的人物,不仅是部下,而且是朋友。70年代末,党的这位办公厅主任在政治上开始飞黄腾达。1976年,这位公共部的部长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1978年成为政治局委员。

“你这是怎么搞的,科斯佳,干吗答应这件事呢?”妻子安娜·德米特里耶夫娜问这位年已73岁的总书记。

“应当这样”,契尔年科回答说:“没有别的办法……”<sup>56</sup>契尔年科“应当这样……”的做法,使得政治局里保持了暂时的平衡。“元老派”——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库纳耶夫、格里申,以及中央和地方那些支持他们的党的机关,努力尽可能长时间地保持自己的地位。戈尔巴乔夫和为数不少的党的机关在这个时候还没有实际可能排挤“勃列日涅夫一代人”。然而,不论是哪一派,都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元老派”的时代在结束。任命契尔年科,只不过是“长老掌权制”延续一段时间,这是提前为自己培养接班人所必需的。意识到自己年老体弱、身患重病,无力胜任总书记的全部职责,契尔年科建议由戈尔巴乔夫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的会议。

这一建议遭到吉洪诺夫的反。吉洪诺夫说,戈尔巴乔夫会把书记处会议变成农业部的部务会议。然而,乌斯季诺夫和契尔年科本人坚决支持戈尔巴乔夫。另一个问题的解决更加艰难,而这一问题传统上是要通过专门的政治局决议才能解决的:主持书记处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在总书记本人缺席的情况下,还有权主持政治局会议。吉洪诺夫再次表示反对。经验丰富的葛罗米柯找到了摆脱这一冲突的出路:他

建议暂时推迟就这一问题做出决定<sup>57</sup>。戈尔巴乔夫可以主持政治局会议,但每次都须征得契尔年科的同意。

399 就这样,戈尔巴乔夫也就没有得到政治局的决议。尼·伊·雷日科夫写道:“他独自控制了每周二举行的书记处会议,谁也不能侵犯他主持会议的权力。而每个星期四早晨,他就会孤独地呆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紧张不安地等待着病体缠身的契尔年科的电话:他是亲自参加政治局会议呢还是请戈尔巴乔夫替代他一次。”<sup>58</sup>

契尔年科执政的13个月是一个奇怪的时期。政治局选择了“最不合适、最不方便的人”,这种实用主义近乎恬不知耻。(这哪里是近乎恬不知耻!简直远远超出了政治上恬不知耻的界限!)

安德罗波夫的那套“纪律性与组织性”变成了笑料。契尔年科执政,意味着安德罗波夫所奉行的对官员的清洗政策被放弃了。看起来,一切都“恢复了原状”。就在安德罗波夫去世的那天,有关部门还从负责对莫斯科商业部门犯罪情况进行调查的苏联总检察院侦查局局长B. И. 奥列伊尼克那里,调走了有关莫斯科一些商店经理的案件材料,以便向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瓦·格里申报告。不久,苏联总检察长亚·米·列昆科夫要求结束调查行动,立即将案件移交法院。被告们很快就受到了审判,一些人被判枪决,另一些人则被判长期监禁。这些人与党和国家的某些精英人物牵扯在一起的线索,被扯断了。<sup>59</sup>

突然间,制定新的苏共纲领,以及关于苏联是发达的社会主义还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苏联建成了社会主义还是进入了发达社会主义阶段<sup>60</sup>的争论,一时成了最重要的事情。人们对这些抽象空洞的谬论认真地、有理有据地进行了讨论。奄奄一息的总书记声称,旨在“推动国民经济加速发展”<sup>61</sup>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必须“更好地利用群众中积蓄的积极性,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完善社会的整个政治制度。”<sup>62</sup>

与此同时,所有的人都明白,争夺权力的斗争在广播电视越来越频繁出现的哀乐声中进行着。1980年,阿·尼·柯西金去世,1982年1月——米·安·苏斯洛夫,1982年11月——列·伊·勃列日涅夫,

1983年5月——阿·雅·佩尔谢,1984年2月——尤·弗·安德罗波夫,1984年12月——德·弗·乌斯季诺夫。全国到处流传着一个恶意的笑话:苏联发明了一个新的体育项目:灵车追逐赛。

1985年3月10日,康·乌·契尔年科去世。

“勃列日涅夫去世后的时代”成了“社会主义改革”希望变得渺茫的时代。安德罗波夫的共产主义基础显得不牢固,它依靠人们对清洗的恐惧而维持着。但是,80年代的苏联社会与卫国战争前和卫国战争后的苏联是不一样的。世界发生了变化。而这在韩国“波音”飞机的悲剧中得到了明显的反映。契尔年科的统治也变成了笑料,变成了对勃列日涅夫的丑化,也变成了对安德罗波夫的丑化。政权在衰退中。

- 1 Из интервью Ю. Кублановского//Новое время. 1996. №28. Июль. С. 43.
- 2 См. : Соловьев В. , Клепикова Е. 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 Тайный ход в Кремль. СПб. , 1995. С. 248—250.
- 3 См. : Григорий Романов. Наследник партийного престола//Профиль. 1997. № 41. С. 58—62.
- 4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Человек за спиной. М. , 1994. С. 178—179.
- 5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М. , 1995. С. 15.
- 6 См. : Соловьев В. , Клепикова Е. 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
- 7 См. :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Галерея лидеров СССР. М. , 1995. Кн. 2. С. 121—123.
- 8 См. там же. С. 138.
- 9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5.
- 10 ЦХСД, № Ст-133 11 гс.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 133 заседания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от 23 ноября 1983 г. «О публикации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ечати сообщения о результатах рассмотрения Верховным судом РСФСР уголовного дела на крупных взяточников из числа работников торгова “Гастроном”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орговли Мосгорисполкома».
- 11 Правда. 1983. 8 января.
- 12 См. там же. 9 января.
- 13 См. там же. 18 января.
- 14 当时有一则广为流传的笑话:管道工人看了看已经生锈的管道说:“事情不好,应该更换系统。”房子的主人惊恐不安答道:“可别变换制度。”(俄文 система 一词有“系统”和“制度”两种含义——译者。)
- 15 Стерлигов А. Опальный генерал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ует: Канцелярия предательства. М. , 1992. С. 5.
- 16 См. : Гуров А. Красная мафия. М. , 1995. С. 60.

- 17 См. : Медведев Р. Генсек с Лубянки. М. , 1993. С. 131—132.
- 18 ЦХСД, № Ст-52/89гс. Выписка из протокола № 52 заседания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от 16 марта 1982г.
- 19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4. Медунов был назначен заместителем министра плодоовощн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 20 АП РФ, № П69/43.
- 21 См. : Прибытков В. Аппарат. СПб. , 1995. С. 199—200.
- 22 См. : Гуров А. Красная мафия. С. 143.
- 23 См. : Правда. 1983. 9 января.
- 24 См. , например, статью В. Холина «Градус падения»,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ую в «Правде» 18 февраля 1983г.
- 25 См. : Правда. 1983. 16 февраля.
- 26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М. , 1995. С. 72—73.
- 27 См. : Прибытков В. Аппарат. С. 156.
- 28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М. , 1995. Кн. 1. С. 241.
- 29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4 марта 1983 г. , л. 20—21.
- 30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31 мая 1983 г. , л. 13—14.
- 31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92.
- 32 Например, «建议»中央机关工作人员不要有私家车,这种建议实际上是命令。
- 33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7 июля 1983г. , л. 21—22.
- 34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242—243.
- 35 См. там же. С. 248—251.
- 36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2 июля 1983г. , л. 22—25.
- 37 Правда. 1983. 14 августа.
- 38 Там же. 7 августа.
- 39 Ханин Г.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СССР в 80-е годы// ЭКО. 1991. № 5. 401 С. 30—31.



- 40 Правда. 1983. 16 августа.
- 41 Там же. 28 августа.
- 42 См. :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Кн. 2. С. 164—165.
- 43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31.
- 44 См. :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 ее участника. М. , 1995. С. 214—217.
- 45 Известия. 1991. 25 января.
- 46 См. :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С. 222.
- 47 См. там же. С. 219—220.
- 48 Правда. 1983. 2 сентября.
- 49 См. :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Кн. 2. С. 166.
- 50 Эта стенограмма частично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в кн. :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Кн. 2. С. 167—172.
- 51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 сентября 1983 г. , л. 1—9.
- 52 Правда. 1983. 3 сентября.
- 53 Там же. 7 сентября.
- 54 Подробно об этом см. в мемуарах помощника К. У. Черненко В. Прибыткова(Прибытков В. Аппарат. С. 13—17).
- 55 См. : Прибытков В. Аппарат. С. 33.
- 56 Там же. С. 64—65.
- 57 См. там же. С. 167—169.
- 58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57.
- 59 См. : Гуров А. Красная мафия. С. 172—174.
- 60 См. : Печенев В. Взлет и падение Горбачева: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а. М. , 1992. С. 109.
- 61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Кн. 2. С. 263.
- 62 Там же. С. 262.

## 第七章 改革,公开性,社会 政治危机加深

402

(1985年—1989年)

对一个不好的制度来说,最危险的时刻  
恰恰是它试图改善之时。

——叶·塔尔列  
《克里木战争》

804

## 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

1985年3月10日19时20分,苏共中央总书记康·乌·契尔年科去世。他的死亡并不出人意料。就在当天晚上,几近夜间时,政治局委员们开了会。这不是正式会议,正式会议原定在次日下午2时召开。3月10日的晚间是比较重要的,因而也是比较神秘的,因为当时决定了谁当总书记,用党内的行话说——“研究了人选”。米·谢·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讲了晚间会议的一些重要细节。还在会议开始之前,他“单独”会见了安·安·葛罗米柯。用戈尔巴乔夫的话说,他们商定:“我们俩现在应当相互配合。”<sup>1</sup>

这种商定至关重要,因为葛罗米柯是政治局中人数渐少的“老人”队伍的首领。葛罗米柯成为戈尔巴乔夫的追随者并非偶然。以前,他对这个来自斯塔夫罗波尔的中央书记如果说不是心怀戒心的话,也是颇为谨慎。但是1984年和1985年初,两位领导人作出了建立联系的努力。接触是通过外交部和既亲近戈尔巴乔夫又亲近葛罗米柯的人进行的。为他们牵线搭桥的人包括时任苏联科学院非洲研究所所长葛罗米柯之子阿纳托利、时任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所长的叶·马·普里马科夫、已是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的离任不久的驻加拿大大使亚·尼·雅科夫列夫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这三个研究所所长对当时国内政局的发展产生过直接影响,也许,这在苏联科学院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后来,两人的接触是通过亚·尼·雅科夫列夫进行的。正是在这些事先磋商的过程中形成了相互的义务:葛罗米柯支持戈尔巴乔夫做总书记人选,事成后,戈尔巴乔夫推荐葛罗米柯出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一职——国家名义上的最高职务,苏联立法机构领导人。按照惯例,该职务通常由总书记担任<sup>2</sup>。

在晚间的政治局会议上,莫斯科盛传将出任总书记、年届七十的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维·瓦·格里申出乎众人意料,建议任命戈尔巴乔

夫为契尔年科治丧委员会主席。按苏联的政治传统,这意味着下一任总书记就是戈尔巴乔夫<sup>3</sup>。格里申讨好戈尔巴乔夫的这一步意味着,总书记的选举不会出现争斗。

后来,在一些研究历史的著作中有许多被广为流传的说法,说什么政治局内部有尖锐的斗争,表决几乎使政治局成员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阵营,这些说法不符合当时国内和最高政治领导层的实际情况<sup>4</sup>。其实,引发这些推测的是叶·库·利加乔夫,1988年夏天,他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断言:“必须道出全部真相:这是令人不安的几天。有可能作出截然不同的决定,有这种现实危险。”利加乔夫所说的现实危险,是指维持政治局内的“长老掌权”,莫斯科党组织领导人维·瓦·格里申当选总书记的危险性。尼·伊·雷日科夫与他争论说:“我现在也绝对深信不疑:不可能是任何其他决定,不存在任何现实危险!……戈尔巴乔夫胜出不是听天由命。不是,这是精心准备的行动,它有两大基础。其一是边疆区和州的党的新干部已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自1983年起的数年中,大约90%的州委书记和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书记被更换,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这些人是思维健康的那部分勃列日涅夫‘近卫军’。其二是对即将到来的经济改革的信念,必须向现代经济思维转变的理念……”<sup>5</sup>

尼·伊·雷日科夫指出,正式任命戈尔巴乔夫为党内一号人物之前数年就已开始的准备工作很大一部分正是由身为中央党务工作组织部领导人的利加乔夫做的。在“上层”那里,会有而且确实有不满戈尔巴乔夫当选的人,但是,没有人具备戈尔巴乔夫那样的条件:担任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时间较长,1983—1984年期间在两三个地方做党的领导工作,因而有影响干部配置的实际可能性。除此之外还要考虑到他的年龄,对于苏联领导人来说,54岁简直是青少年!

对于那些曾经因国家领导人年迈而感到惭愧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因论资排辈移交国家权力而痛心的公民来说,这一情况有巨大的政治意义。 404

党机关不能不考虑这种情绪。当时担任戈尔巴乔夫助理的瓦·博

尔金在回忆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总书记的情况时写道：“这时，中央委员们聚集在全会大厅里……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情绪是一样的——再也不能选举高龄的领袖。各级党组织可能不理解这一点，但是，他们最终会理解的。不能选举没有工作能力的短命总书记，需要坚强、果断的领导人。”<sup>6</sup>

全会前夕举行了政治局会议。1985年3月1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所谓“工作记录”保留至今，它记录了正式推举米·谢·戈尔巴乔夫出任党中央总书记一职的详细情况。

根据“工作记录”，戈尔巴乔夫当选的经过是这样的。

会议一开始由叶·伊·恰佐夫报告契尔年科病故的医学结论。然后，主持这次政治局会议的戈尔巴乔夫说：“他（契尔年科——作者）的病情确实严重。这一情况我们亲自目睹了。当然，医生竭力抢救了病人，但是病情太重，医生采取的内科治疗措施没有奏效。一想到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离开了我们，心情非常难过。不过，生老病死，毫无办法。我们今天开会要解决有关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葬礼、人事安排以及提前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的问题……”

考虑到除谢尔比茨基同志外，他现在正在途中，苏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全体书记都出席了会议，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问题。请同志们就这个问题发言。”<sup>7</sup>

戈尔巴乔夫话音一落，葛罗米柯随即开始发言。他的讲话出乎利加乔夫的意料，利加乔夫本人在他的回忆录中也承认这一点。而且，葛罗米柯的讲话是左右整个讨论过程的关键。请继续看“工作记录”：

“葛罗米柯：当然，对于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的去世，我们大家非常沉痛。但是，不管多么沉痛，我们都应当面向未来，充满乐观主义，相信我们的理论和实践是正确的。

我的话开门见山。当你考虑苏共中央总书记的人选时，你当然会考虑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以我之见，这是绝对正确的选择。我们大家都非常了解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和他一



起共事了七年。我记得,当年讨论调米·谢·戈尔巴乔夫到莫斯科工作时,列·伊·勃列日涅夫曾征求过我和其他同志的意见。我毫不怀疑,当时我们大家都正确地支持了这一建议。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他才华横溢,渴望多做工作,做好工作。

第二,待人的态度。一个人的地位越高,越要注意人际关系,讲原则,严于律己。我从未听说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刚愎自用。没有,他总是把党的利益、社会利益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第三,米·谢·戈尔巴乔夫有丰富的党务工作经验。这就是在边疆区以及中央工作的经验。他做过中央书记,做过政治局候补委员,最后是政治局委员。他主持过书记处会议,后来在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不在时主持政治局会议。做这项工作不仅需要知识,还需要沉着、党性。这是非常可贵的品质。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们应该面向未来。恕我直言,我们中许多人不可能未卜先知,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无权容许我们的团结一致遭到丝毫破坏,无权让世人发现我们关系中的裂隙,以防国外利用这个问题兴风作浪。这就是说,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对我们伟大事业的责任,应当团结一致行动。

我不认为自己提到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的全部品质。不过我认为,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如果选举他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我们不会错。我想再次强调,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不过,这些经验应当再加上我们的经验。我们保证给予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以尽可能的协同和帮助。您,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可以完全指望这种协同和帮助”。

葛罗米柯的发言一锤定音,决定了讨论进程。葛罗米柯是党的领导人中的元老,不久前,勃列日涅夫本人也不得不倾听他的意见,在政治局的“老人”中,他是毋庸置疑的首领。他的支持意味着,“老人们”支持把戈尔巴乔夫推到党内最高职位上,他们与戈尔巴乔夫事先达成了妥协。

紧接着发言的是维·瓦·格里申,他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竞

争对手。他支持葛罗米柯的提议,从而“结束”了权力之争,承认戈尔巴乔夫毫无争议胜出。

接下来开始竞相恭维。盖·阿·阿里耶夫谈到戈尔巴乔夫在斯塔夫罗波尔和莫斯科积累的“丰富经验”,说他“已成为大政治家、泰斗级活动家。他通晓经济和内政,在经济和社会生活许多方面表现出渊博知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朴实、谦虚、平易近人”。

406 格·瓦·罗曼诺夫指出,戈尔巴乔夫“很快弄懂了许多非常复杂的科技进步问题,而且开始探索把科技成果应用于生产的途径。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吉洪诺夫谈到过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在完善经济机制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该委员会里定调子的是吉洪诺夫同志,而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依靠党中央的一些部,得体地提出自己的建议,这些建议大都得到委员会的支持”。

维·伊·沃罗特尼科夫以提问的方式说:“为什么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接待室里总是挤满了人?因为他善于倾听大家的意见,想帮助大家。不过,他不是个菩萨心肠的领导者,他善于问责,善于提出要求,对于我们一个大国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品质。”

意识形态战宿将鲍·尼·波诺马廖夫指出了戈尔巴乔夫高深的理论修养和他思想的坚定性:“我个人深信,他深刻地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善于分析最复杂的纲领性问题……最近三年我们失去了三位总书记: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和康斯坦丁·乌斯季诺维奇·契尔年科。但是,我们党的力量在于,我们前进,我们团结,任何损失都不能动摇我国共产党人的团结一致”。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米·切布里科夫意味深长地说,他征求过同事们的意见,国家安全工作人员完全支持推选米·谢·戈尔巴乔夫担任总书记。

爱·阿·谢瓦尔德纳泽习惯性地对新总书记致了颂词,对他大加赞扬,其程度不亚于以前颂扬列·伊·勃列日涅夫。

彼·尼·杰米契夫强调:“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

夫在我们国内很有名,在国外也有知名度。他对英国、加拿大和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的访问,令人信服地表明他善于做外交工作……他是个有魅力的人。尤·弗·安德罗波夫去世后,他负责处理中央委员会的所有问题,尤其是在发展我们的农工综合体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们的学者、知识分子和作家都拥护他……”

政界领导人中的“新人”也支持戈尔巴乔夫。叶·库·利加乔夫强调,“毫无疑问,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具备大政治家的全部特点。而且,他的智力和体力都不错”;尼·伊·雷日科夫保证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将永远是您的忠实助手。”

戈尔巴乔夫在最后讲话中感谢政治局对他的一致肯定。他指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很复杂的转折时期。我们的经济需要有更大的推动力,我们的民主和对外政策也需要这种推动力。”他还说:“我们不需要改变政策。它是可靠的,正确的,真正列宁主义的。我们必须加速前进,揭露缺点并加以克服,看到我们光明的未来。”<sup>8</sup>

407

讨论过程证明达成了妥协。只剩下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支持政治局决定,结局果然如此。

很难找出戈尔巴乔夫较其前任有更好的背景。人们在电视屏幕上看了20年七八十岁的老人之后,他看上去相对年轻,代表了占全国人口大部分的另一代人。这是个不用讲稿讲话的人,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像他这样级别的党魁,似乎完全丧失了不看讲稿“当众”讲几句话的能力。人们把戈尔巴乔夫视为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自然的人,仅此一点,就使人们对他有巨大好感。

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得到高度评价的第一个大的政治行动,是他的列宁格勒之行。在苏联,人们知道总书记尽可能不去列宁格勒,这个城市在传统上被视为让人为难的城市,由于其公民受教育水平高,他们对莫斯科的事总有自己特别的观点。1985年5月15日—17日戈尔巴乔夫的列宁格勒之行,成了国内轰动一时的政治新闻。从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苏共领导人第一次走上街头与群众见面;他让政府车队停下,接着下车走向群众,回答他们的问题,并试图解释国内在做什么,为什么

这么做,结果给保卫人员带来许多麻烦。后来,过了两年,人们发现他不再回答问题了,而是训人,他“躲着问题”讲话。但是,戈尔巴乔夫走到群众中来了!他的讲话令人惊奇,令人高兴。在报刊不久前掀起一场谴责“私有者本能”的运动之后,他说,现在出现了一个问题:人们有没有从事某种副业的权利,有些理论家说,副业——这是资本主义。他面带苦涩地说:这算什么资本主义?这是一个人干自己事的正常愿望。

这一番话改变了人们以往对总书记的看法。站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位正常的、用“自己的话”实事求是评价形势的人。

1985年5月17日,他对列宁格勒的党员积极分子发表演讲,呼吁听众改变自己的观念:“……最困难的阶段——心理上的改革……当前需要思想大改革……谁无意改革自己的观念……就应当让路,别挡道……”

人们注意到,电视转播了这次讲话,但是报纸没有登载,在苏共列宁格勒州常委就戈尔巴乔夫视察结果所作的决定中,“改革”一词仅仅在涉及日用品生产时提到一次<sup>9</sup>。

这也是一个征兆,表明党的机关不支持自己领导人的思想,而这一点也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是否受到信任的一个重要附加因素。社会使新任总书记面临信任危机,也许,他的任何一个前任都没有遇到过。

## 尤·弗·安德罗波夫的遗产。作为“改革” 第一阶段的“加速”(1985年—1986年)

不难理解,国家公民面临两种选择,要么是虚弱消瘦的老人担任总书记,要么是严格要求、精力充沛的纪律卫士即“铁腕”担任总书记,大部分人选择后者。有人喜欢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干将建立的纪律和秩序,有人喜欢“呈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每周通报,还有人喜欢尤·弗·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被嗜酒者称做“安德罗波夫”牌的廉价伏特加。

安德罗波夫执政的时间虽然只有短暂的15个月,却成了人们理想化的对象。契尔年科治国的几个月成了人们忧郁地怀念安德罗波夫有

力行动的又一个理由。人们期待戈尔巴乔夫继承他的方针。他明白这一点,并且努力继承。如果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安德罗波夫实施他许多构想的工具,那么戈尔巴乔夫在他活动的第一阶段则努力保持继承性。

在苏共中央四月全会上,即按“戈尔巴乔夫的指令”筹备的党的第一个大型活动上,他强调自己忠于列宁,信守社会主义理想,肯定了1983年即安德罗波夫时代以来国家发展的成就<sup>10</sup>。

“加速”成了新任总书记头两年活动的独特“名片”,后来则陆续换为“改革”和“公开性”。正如尼·伊·雷日科夫所说,制定“加速”经济计划早在1983年就已经开始,“加速”这个术语也是在中央审议苏联计委关于2000年苏联经济发展前景的建议时产生的<sup>11</sup>。第十二个五年计划预计把国民收入增加20%—22%,工业产量增加21%—24%,农业增长速度翻一番。郑重提出了2000年在工业生产水平方面赶上美国的任务<sup>12</sup>。

戈尔巴乔夫活动开始阶段的经济构想,在他于1985年6月11日—12日举行的全苏科技进步问题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有过表述。总书记宣布了经济机制构想,它包括加速科技进步、改造国家机器制造业、生产新型机器和设备以及采用高水平的工艺。与此同时,他还提出了下放经济管理权、扩大企业权力、实行经济核算、提高劳动集体的责任和利益的思想<sup>13</sup>。米·谢·戈尔巴乔夫在这次会议上说:“提高苏联机器制造业的生产能力,这是我们发展的主要方向,现在和将来必须坚决坚持。”<sup>14</sup>面临的任务是把对机器制造业的投资扩大一倍。

这并不是新思路,早在1979年,它在上文提到的著名“基里林报告”中已有表述。在报告中,加速发展机器制造业被称做发展物质生产中结构政策的基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这个报告未被理睬。现在,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在制定经济政策中,这个报告的某些论点派上了用场。请读者注意,机器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与国防需求密切相关。

在许多情况下,“加速”的思路并没有经过充分论证,甚至带有冒险性。譬如,1986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陶里亚蒂市苏联最大的轿车



厂讲话时,要求达到并超过世界汽车生产水平,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赫鲁晓夫的“赶超美国”计划。

在戈尔巴乔夫活动的开始阶段,即1987年前,可以极其明显感觉到他继承了安德罗波夫时期的经济政策,在政策的实施方法上也表现得很明显。安德罗波夫把行政手段视为加速经济发展的方法,戈尔巴乔夫的发号施令与这种倾向“异曲同工”,它的独特性在于让民用经济部门采用苏联军工综合体的管理方法。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忆说,在政府中,国家军工综合体委员会被当做管理机构样板,军工综合体委员会把军工方面的所有部和部门联合在一起。部长会议机构中出现了类似军工委员会的专门机构——部长会议机器制造委员会以及后来的燃料能源综合体委员会、化工委员会、社会发展委员会和农工综合体委员会<sup>15</sup>。

试图在经济管理中采用军事行政方法的明显实例,是在工业企业实行国家验收产品制度。苏联历来对军事工业部门实行国家验收产品制度,军工产品由监督产品质量的军官验收。军官从国防部领取自己的薪金,他们独立于工业企业的行政管理,因此,能够严格监督军事装备、武器和设备的质量。

现在,这种对作为订户的军方来说行之有效的制度,推广到了整个工业部门。为此,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庞大的国家验收体系。这一措施带有纯粹的行政命令性质。产品的质量不是由买方监督,而是由官员监督。不过,对国家验收的畏惧很快就消除了,照戈尔巴乔夫身边一位经济理论家委婉的说法,因为用上了“非公务关系”,说白了就是贿赂<sup>16</sup>。

## 与酗酒作斗争和冲击预算

最初,另一个问题——与酗酒和酒癖作斗争,被视为一件完全理所当然的事情。勃列日涅夫在世时,与酗酒作过斗争:处罚酗酒,限制酒类销售时间。与酗酒作斗争、严厉处罚工作时间饮酒,成了安德罗波夫

建立秩序和加强纪律运动的一部分。正是安德罗波夫在世时,中央一级报纸上登载了一系列文章,呼吁采取最果断的措施对付酗酒。因此,“上任的新官”戈尔巴乔夫动手解决与酗酒作斗争这个苏联长期存在的问题,就不足为奇了。请读者注意,当时国内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谴责酗酒的社会运动。安德罗波夫的继承者们比他走得更远。戈尔巴乔夫上任伊始就在工作日记中写道:“1985年3月27日。1. 质量,2. 反酗酒,3. 低收入居民……”<sup>17</sup>

1985年4月4日—6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与酗酒和酒癖作斗争”问题。戈尔巴乔夫坚持加强与酗酒作斗争,指出了酗酒的社会和生物遗传后果。应邀参加会议的国家计委副主席试图证明限制酒类销售会冲击预算,无法弥补50亿卢布的“伏特加酒钱”,惹得戈尔巴乔夫怒气冲冲地反驳道:“你打算坐着伏特加进入共产主义!”<sup>18</sup>

由叶·库·利加乔夫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米·谢·索洛缅采夫领导的一个委员会按照总书记的指示工作。他们俩人都以厌恶酗酒而闻名。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利加乔夫担任托木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时,就有人说他在“争取健康生活方式的斗争”中不无成效地试图把托木斯克变成“禁酒区”。

1985年5月初,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实际上宣布实行“禁酒令”的方针。虽然文件上说应当扩大纯葡萄酒和啤酒的生产,但是实际上酒类销售商店的数量减少了许多<sup>19</sup>,关闭了啤酒馆,取消了玻璃酒具生产,情况竟发展到苏联为数不多的生产葡萄的地区砍毁葡萄园。反对这一决定的有尼·亚·吉洪诺夫和尼·伊·雷日科夫,他们认为禁酒令会给预算带来巨大窟窿,反对者中还有盖·阿·阿里耶夫,作为阿塞拜疆党中央第一书记,他为共和国扩大葡萄种植面积和葡萄酒酿造业亲自做了大量工作。但是,通过简单而又令人信服的决定的方针如此诱人,而且目的又显得如此高尚,致使这些“重商主义的”意见完全被摒弃。运动开始了!运动高潮时连酸牛奶也差点遭禁,因为怀疑它也是酒精饮料!

所有这一切即便不是有害和危险的,也是可笑的。

很快就产生了后果。1985—1988年,葡萄园面积减少了30%。预算遭到了灾难性的打击。一个长期受财政赤字困扰的国家一直在生产的商品退出了市场,预算赤字剧增。国库计算了少收的资金:1985年少收的利润为600亿卢布,1986年为380亿卢布,1987年为350亿卢布,1988年为400亿卢布<sup>20</sup>。预算遭受的打击非常大,以至于其后果到苏联存在的最后日子也没有消除。与“伏特加酒钱”作斗争中的一些试验,促成了长期的负面经济因素——国内通货膨胀、商品短缺加剧。可以说,1992年初叶·盖达尔推行的改革才暂时中止了这一因素的影响。

压缩国营酒类的销售(可以说是停止销售)导致了私人酿酒的急剧扩大。糖从商店消失了,虽说它的销售量从1985年至1988年增长了18%,为928万吨。糖果点心、便宜的块糖和西红柿酱被从商店一扫而光。“民间巧匠”把这些食品的一部分成功地变成了私酿酒。据苏联国家统计局资料,1987年,私酿酒用掉了140万吨糖。

更糟糕的是工业用液体酒精经常丢失,毒品需求增加,这些情况造成了无数中毒事故,其中包括死亡事故。

就负面影响来看,这场运动在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后果也不小。让人不禁想起一句俄罗斯谚语:“你强迫傻瓜祷告上帝,他会把脑袋磕破。”我们认为,酗酒如同在全世界不受欢迎一样,在俄罗斯也从未有过好名声。正常的劳动道德谴责工作时间酗酒。但是,饮酒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婚礼、丧礼和重大节日必不可少的标志。不能用自己的钱购买没有被禁的(!)伏特加,全国所有成年人处于被控犯有酗酒罪的状态,只会使行为能力被限制者火冒三丈<sup>21</sup>。在整个城市或大城区的两三个商店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成千上万的人用生动、“慷慨激昂的语言”数落禁酒运动的始作俑者米·谢·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战友。可是对投机的酒商来说,有了大有作为的机会。不管白天还是夜间,只要付出两倍的价钱,任何时候都能从出租车司机手中买到酒。

官方反酗酒斗争的愚蠢在于,它使国内切实可行的不饮酒运动

告吹。

禁酒运动声名狼藉,到1988年便无声无息地寿终正寝了。

## 继续镇压

戈尔巴乔夫继承了安德罗波夫政策的另一个特点——作为确立个人权力的一种手段,对部分国家机关施以高压,以证明下决心与贪赃受贿和玩忽职守作斗争。

这一次,镇压由内贸领域转向外贸,目标指向对外经济部门。外交部、国家经济联络委员会和外贸部有人被拘捕。被拘捕的一般是副部长级官员。我们不想研究这些逮捕以及随后的严厉判决是否合法。我们只想指出,在苏联历史上,刑事犯罪指控往往掩盖着事件真正的政治原因。 412

被判罪的人中有一个是65岁的B. 苏什科夫,被捕前是外贸部副部长,他留下了回忆录,讲述这件事的过程。他在水外贸系统工作了近40年,为几个特大型汽车厂采购技术设备:在意大利为伏尔加轿车制造厂购买过设备,在美国为卡马重型卡车制造厂购买过设备,直接和勃列日涅夫、柯西金、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过。他被捕后关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列弗尔托沃监狱。在那里,指控他收受谈判对方贿赂,要求他提供勃列日涅夫的亲信、外贸部长尼·谢·帕托利切夫犯罪活动的材料,试图指控他与日本情报机关有联系。苏什科夫未经公开审讯被判刑13年,罪状包括“对资本主义国家公司的态度好”<sup>22</sup>。与苏什科夫一起被捕的还有他的妻子,她被判刑11年,原因——违反关于外国合作方赠送礼品处理办法的内部指示。逮捕令是戈尔巴乔夫本人批准的<sup>23</sup>。

勃列日涅夫会客室秘书Г. 布罗温被捕在报界引起轩然大波,他被捕毋庸置疑有政治的原因,属于搞臭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措施范围。大量报刊文章说,布罗温是勃列日涅夫身边亲信贪赃受贿的化身。他被判有罪,处以长期监禁。布罗温本人对本书作者说,他是在中央委员

会大楼被捕的,第一次审讯也在那里,之后被送往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监狱,在那里,要求他提供假口供,并威胁不经审判枪毙他。

以捷·格德良和 H. 伊万诺夫为首的侦查小组的活动也许能够说明两任总书记推行的镇压政策具有继承性。苏联总检察院特重案侦查员格德良、伊万诺夫和他们的同事被派往乌兹别克调查贪赃受贿事实。那里的犯罪现象虽然具有民族特色,但是直接发源于苏联计划经济的组织。棉花生产是乌兹别克经济的基础,棉花成了这个中亚共和国的单一经济作物。按照计划,棉花生产量应该逐年增加,并得到共和国领导的同意。装运棉花的火车不断驶往棉花加工厂,其中包括驶往俄罗斯,车上不仅装有籽棉,还装有棉花加工废料,有时甚至是空车皮。但发货单上写的是棉花,他们用成百上千吨子虚乌有的棉花骗取国家预算规定的现金!

413 在其他种植棉花的共和国——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sup>24</sup>也发现了类似的犯罪。显而易见,如果各级管理部门——从国营农场经理到共和国一级和全联盟一级的管理部门没有互相勾结,是不可能实施如此大规模的犯罪活动的。

侦查是安德罗波夫批准的。契尔年科当政时期侦查活动有所放松。戈尔巴乔夫上台成了加速侦查的信号。1985年3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原副部长 A. 卡赫拉曼诺夫被逮捕。要求他供出和莫斯科——苏联内务部和苏共中央高层官员的联系。侦查急剧加速。

逮捕实际上波及整个共和国的党政上层人物。被提起诉讼的有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伊·布·乌斯曼霍贾耶夫、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 И. 卡里莫夫、党中央事务管理局局长 T. 乌马罗夫、乌兹别克斯坦内务部部长 X. 叶海亚耶夫、乌兹别克斯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A. 萨利莫夫以及大批党和国家的官员。对犯罪嫌疑人住处的搜查结果令人难以想像:仅在苏共布哈拉州委第一书记家中就发现了高达600万卢布的贵重物品,其中包括130公斤黄金制品<sup>25</sup>。

不过,侦查员们并没有就此罢手。他们执意试图弄清所谓的“乌兹别克案”或“棉花案”与莫斯科的关系。对苏共中央机关的一些高官



提起了诉讼。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二书记、前苏共中央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 B. 斯米尔诺夫、该部副部长 K. 莫吉利尼琴科、数名处长和中央委员会指导员受到了怀疑。

到 1985 年底,总检察院领导人显然是在中央委员会机关的授意之下,试图通过指责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粗暴违反侦查程序(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使调查工作停止下来。但是,“乌兹别克案”是作为政治案件产生的,它后来的发展完全符合苏联法律的传统——以政治和党的需要为前提。1986 年 11 月 11 日,格德良和伊万诺夫在呈送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道:“现在,问题不在于能否证实乌斯曼霍贾耶夫、奥谢特罗夫(乌兹别克斯坦党中央第二书记——作者)、丘尔巴诺夫、斯米尔诺夫等领导人是否构成受贿罪,而在于在追究他们刑事责任中能一锤定音的人不愿意解决显然应当解决的问题。法律对他们犯罪活动的评判是明确的:完全认定他们有罪。”<sup>26</sup>

这是苏联法律别具一格的杰作——不是由检察院而是由“拍板的人”批准逮捕令,不是由法院而是由侦查员的“一致”意见定罪……为了了解侦查的实质,我们指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被格德良和伊万诺夫“一致”指控的尤·丘尔巴诺夫这时还是自由的,直到 1987 年 1 月他才被逮捕,而判刑是在 1988 年。<sup>27</sup>

在调查的两年中已成为政治人物的格德良和伊万诺夫没有放过他们有条件利用政治资源的机会:1986 年 3 月,他们致函戈尔巴乔夫,执意要求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莫斯科两地继续侦查。写信的结果是好的:侦查员们甚至“因有原则地提出问题”而受到口头感谢。以后他们当然还会不止一次地致函戈尔巴乔夫,要求继续侦查。受过法律教育的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刑事调查完全为政治决策所左右的情况是荒唐的。戈尔巴乔夫对获取党的最高领导层战友的负面材料表现出明显的兴趣,并在调整干部时使用了这些材料<sup>28</sup>。

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受到俄罗斯广大阶层支持的对苏联社会中贪赃受贿现象的揭露逐渐变成了一种政治因素。魔鬼从被安德罗波夫打开一条缝的宝瓶里窜了出来。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担心了,后来他在

回忆录中写道：在调查过程中有可能“翻出”有损于他在斯塔夫罗波尔工作时名声的材料<sup>29</sup>，这使他不得不解除费多尔丘克的内务部长职务<sup>30</sup>。这种担心是现实的、普遍的，因为苏联的经营管理体制“在决策方面”带有犯罪性。犯罪性绝非经营管理者特点。当不是经济实力、不是经营管理成效，而是部里或者从区委会到中央党机关官员的意见决定着机床、钢材和配套设备是否给企业，是否为扩大生产拨款，能不能再雇用工人，能不能建厂、修运动场等等之时，在这种把全面“分配资源”作为经营保障方式的条件下，犯罪性是经营管理方式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

实际上，从每一个经营管理者、高级行政官员和党的活动家那里都能找到足以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的材料。这一点在苏联路人皆知。不过，对于那部分把经济体制中的矛盾当做个人发财手段的命官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这种威胁第一次变成了现实。一些能引起社会强烈关注的新闻冲破了桎梏。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当时最受欢迎的《星火》杂志的主编公开指责一些党的高级官员贪赃受贿。从这时起到苏联存在的最后日子，格德良和伊万诺夫一直是两个不安分的安德罗波夫式“公开性”的“私生子”。

415 “乌兹别克案”还有一个在1983年至1987年完全被忽视，但在1988年至1991年成为政治现实的情况。它证明了：几十年来，莫斯科当局一直容忍一部分联邦预算资金在地方民族上层人物中分配。莫斯科给钱，地方上层人物以效忠和驯服回报。从安德罗波夫时期起，莫斯科打破了这种惯例。君子协定被撕毁了，加盟共和国的交易参与者遭到极其严厉的惩处和贬斥。地方上层人物的报复行动很快发生了：就在1986年底，第一次出现了在声势上没有先例的民族动乱，动乱直到苏联存在的最后日子也没有停息，由于政治的惰性，一直持续到苏联消亡之后。

## 传统的断裂

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头几年毋庸置疑是对安德罗波夫执政时期的继

承,但是必须看到,1985年4月以后与以前的明显不同之处。首先,国内的社会情绪变了。“我们期待变革”——这是当时苏联最有名的摇滚乐歌手维克托·措伊唱的一首歌的歌名。国家需要变革。期待变革创造了一种普遍的乐观氛围。年轻的领袖受人信任。这几年,即使是明显不受欢迎的措施,诸如禁酒运动,或者赶超世界汽车制造水平的浮夸任务,引起的与其说是恼怒和怨恨,不如说是嘲讽掩饰下的对形势的理解。戈尔巴乔夫表现出的与贪赃受贿决一雌雄的决心,使大多数人成了他的同盟军。

女记者T. 萨莫利斯1986年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一篇不长的文章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她在文章中援引了大量读者来信,指出“萎靡不振的党政阶层”,即中层官员,是国内进行变革的主要障碍<sup>31</sup>。《真理报》一向被视为总书记的喉舌,这篇文章在《真理报》上发表造成了一种印象:戈尔巴乔夫的看法也是这样的。

在党的高层领导内部出现了必须马上“改变体制”的意向。这一派的非正式领袖是1985年7月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的亚·尼·雅科夫列夫。据他说,早在1985年底,他就给戈尔巴乔夫呈送了一份长篇变革方案,变革规模令人惊叹。该方案建议在苏共基础上建立两党制,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和实行广泛选举,实行国内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这无论如何不是政治局的意见<sup>32</sup>。这些问题从来没有全面提出过,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和其他党的领导人会议上讨论过。正如此后的情况所表明的那样,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赞同雅科夫列夫整个构想(作者认为,这是一种带有空想和闭门造车弊病的脱离国家具体历史、经济和民族特点的构想)。不过,戈尔巴乔夫接受并采纳了雅科夫列夫构想中的某些建议,其中包括容许国内存在反对派的想法。

1986年,戈尔巴乔夫会见新闻界代表时阐述了自己对与反对派相互关系的理解:“……无论在党内或者在国家机关中,都存在着许多由于没有反对派和不同意见造成的思想和行动停滞、守旧、错误和失误。现在,在社会发展的现阶段,我们的新闻界可以成为这种独特的反对派”<sup>33</sup>。

这大概是戈尔巴乔夫有别于安德罗波夫的主要方面——戈尔巴乔夫接受了有反对派的思想,认为反对派是不可避免的,他相信自己的力量,所以不怕反对派。集权主义的传统就这样被中断了。

## 米·谢·戈尔巴乔夫的班子。

### 鲍·尼·叶利钦的出现

实际上,领导班子的变化从戈尔巴乔夫一出任总书记就开始了。早在苏共中央的四月全会(1985年)上,经戈尔巴乔夫推荐,叶·库·利加乔夫进入政治局。利加乔夫一当选,戈尔巴乔夫就提议让他主持全会,这意味着利加乔夫正在成为党内二号人物<sup>34</sup>。中央委员会经济部部长尼·伊·雷日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维·米·切布里科夫成为政治局委员,负责农业的维·彼·尼科诺夫成为中央书记。苏联国防部部长谢·列·索科洛夫元帅和中央负责农业的书记维·彼·尼科诺夫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他们在人数上取得了对“老人”——吉洪诺夫、库纳耶夫、谢尔比茨基和格里申的优势<sup>35</sup>。请读者注意,在政治局班子中保留了“强力部门”的阵地,那里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防部的领导人。

中央委员会的机关班子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阿·伊·卢基扬诺夫成为中央委员会公共部部长,戈尔巴乔夫的同乡Г. П. 拉祖莫夫斯基成为组织和党务工作部部长,原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列·尼·扎伊科夫成为中央委员会国防工业部部长。

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智囊团形成。智囊团成员包括:不久前任驻加拿大大使、后为科学院某研究所所长、现为中央委员会宣传部部长的亚·尼·雅科夫列夫;戈尔巴乔夫秘书处主任、经验丰富的记者瓦·博尔金;哲学家、记者Н. 比克宁;中央委员会科学部部长、经济学家瓦·安·梅德韦杰夫。经常参加智囊团工作的有:中央委员会公共部部长、法学家阿·伊·卢基扬诺夫,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哲学家伊·季·弗罗洛夫,早就在中央工作的法学家、政治学家格·沙赫纳扎罗

夫、国际关系专家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实际上,戈尔巴乔夫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经常参与讨论,当时她已通过以城乡居民生活方式接近为题的副博士学位论文。

这伙人为戈尔巴乔夫起草演讲稿,参与起草重大文件和“改革”构想。著名的经济学家Л.阿巴尔金、阿·格·阿甘别吉扬、斯·谢·沙塔林、尼·佩特拉科夫,科学院和部门学术机构的其他研究人员,外交部、苏联部长会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专家以及一些军人,也经常参与工作<sup>36</sup>。工作地点通常在位于沃伦斯基、新奥加廖沃和扎维多沃的市郊别墅。

1985年4月初,苏共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鲍·尼·叶利钦被调到中央工作。1985年4月3日,中央书记、政治局候补委员弗·伊·多尔吉赫给他打电话,建议他到中央担任建设部部长。叶利钦拒绝了,作为工业潜力几乎超过一些加盟共和国的一个州的领导人,他不认为这一建议值得重视<sup>37</sup>。另一个起作用的因素是,在他之前的两任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安·帕·基里连科和雅·彼·里亚鲍夫,都到莫斯科担任更高的职务:一个在1962年出任中央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副主席,另一个在1976年出任苏共中央书记。但是谈话并没有结束。第二天,叶·库·利加乔夫又给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打电话,要求叶利钦服从党的纪律,赴莫斯科到中央工作<sup>38</sup>。叶利钦服从了。

417

俄罗斯未来的第一任总统的履历不符合党的传统规范。它与大多数党务活动家的履历不同,履历中没有在青年时代“干共青团”工作的一段经历,对一个党机关工作人员来说,这段经历实际上是必不可少的,通常,它是在党内晋升的起始平台。安德罗波夫、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都有这样的经历。

鲍·尼·叶利钦1931年2月1日出生于乌拉尔的一个富裕农民家庭。1931年是“全面集体化”和“没收富农财产”的时期。父母和亲属担心被镇压,被迫外逃,想在离家乡1000公里外的喀山“社会主义建设工地”,即飞机制造厂建筑工地躲藏起来。30年代初,乌拉尔地区的农民经常采取这种方式逃避没收富农财产和强制迁移。



叶利钦的父亲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在这个工地上是队长,哥哥安德里安在他的队里干活。这些乡下来的木工(队里有6个人)大都是逃亡出来的,他们友好相处,干活卖力,不过经常在一起发泄不满情绪。他们抱怨工地上的伙食糟糕且价高,强迫他们认购公债,向他们敛钱“支援奥地利工人”,他们常常回忆以前的好生活。这些话最后让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人知道了,保安总局的人逮捕了他们,以“同乡聚众闹事”罪名对他们提起诉讼。

在审讯中,尼古拉·叶利钦不承认有罪,拒绝承认队里有过反苏言论,但是,这并不妨碍依据最可怕的条款——俄罗斯联邦刑法典第58(10)条起诉。尼·叶利钦、安·叶利钦、И. 索科洛夫、В. 瓦霍鲁绍夫、П. 加夫里洛夫和 И. 加夫里洛夫案被移交特别三人小组审理。由于指控根据不足(也许,最危险的指控是他们“出身富农”),加之1934年实行轻判,结果所有的被告都走运——他们被判处三年劳改,只有И. 索科洛夫一人被判处五年劳改,因为给他算了旧账:1930年他反对过征粮,而且在一次会议上“试图组织对村积极分子的攻击”。尼·伊·叶利钦被判处三年劳改。他的儿子鲍里斯当时三岁。于是,叶利钦一家来到另一个“社会主义建设工地”——北乌拉尔的别列兹尼克化肥厂。

作者认为,这些经历对鲍里斯·叶利钦的命运产生了影响。对于他这个出身于40年代末被没收财产、被判刑的富农家庭的人来说,通往体面专业,尤其是他梦想去船舶建造学院深造的路已被堵死<sup>39</sup>。其实,这件事过去未必公开谈论过。在校学习很好的叶利钦走上了父亲干建筑的路,选择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乌拉尔工学院的建筑系。那里不要求仔细查阅他的“审查材料”,弄清所有近亲和远亲的情况。在大学里,他的体育爱好广泛,而且成绩不错。虽说他在大学就显露出领导者的素质,但是连团干部也没有当上。

1955年工学院毕业后,他开始了建筑工作者的仕途,先后走过职业道路上的每个台阶——工长、施工员、施工主任、总工程师、建筑局长,然后是全国最佳建筑公司之一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住房建筑联合

公司的总工程师、总经理。这段路他走得比较快——用了13年。

叶利钦是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以后入党的,那时,有关他父亲受镇压的材料已不重要,况且,他作为一个高级经营管理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凭职务”才入党的,他的建筑工作者的专业经验比父母履历中的细节重要得多。叶利钦入党时30岁,当时,如果没有党票他在职业上进一步晋升已经不可能。37岁时,叶利钦的建筑工作者履历中出现了大转折——他被任命为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建设部部长。后来叶利钦当上了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书记,1976年成为第一书记。

在首都除外的俄罗斯各地,20世纪70年代末是艰难的时期。居民最必需的食品供应急剧恶化。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情况更加严重,因为它的工业生产规模在全国排第三位,在这项指标上仅次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州,实际上没有自己的农业。全州87%的居民住在城市。只有3%左右的居民在农业中就业。第一书记不得不解决当时的“吃饭问题”。主要的办法就是建立隶属于工业企业的副业(好在有这种起源于战争时期的传统)。州党委以指示和命令的方式要求建温室、养猪场和养禽场。州里建了一些大型畜牧综合体。效果出现了,到80年代初,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食物供应开始明显好于国内其他地区,受到本州居民的普遍好评。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第一书记经常会见各类居民,这在当时是不同寻常的事。请读者注意,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说话口齿不清的列·伊·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当时国内不存在任何“公开性”。而这个时候,叶利钦常常会见工厂工人、创作界知识分子、城市的大学生。在苏共第二十六次代表大会上,他对勃列日涅夫不“顶礼膜拜”,不过分颂扬,这不会不引人注意的。 419

叶利钦因此受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和该州众多居民的衷心支持。他被“调到莫斯科”的消息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喜悦。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是叶利钦的牢固后方,在莫斯科没有这样的支持和后方。

1985年6月29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人事变动政策中的关键一环。这次会议对党和国家最高层的职务进行了

重新分配,力量布局发生了变化。

首先确定了契尔年科去世后一直空缺的国家正式的二号职位——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的人选。以前的协议兑现了,戈尔巴乔夫建议由安·安·葛罗米柯出任这一荣誉职位。

“在这种条件下,”戈尔巴乔夫说,“看来,让苏共中央总书记把精力集中在党领导社会的问题上……更多地关注那些决定国家命运的发展问题……是适宜的。为此我提议,选举最老的党员之一,有丰富的政治经验,不仅闻名国内,而且闻名世界的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同志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所有这一切符合目前的形势,有利于根据当前的任务最合理地配置力量。同志们,你们对此有什么看法?”

政治局的同志们同意这一建议。党的领导人中的元老葛罗米柯保留了自己政治局委员的地位,但是因另有任用,他腾出了外交部长的职位,自1957年以来,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

于是出现了一个问题:谁当外交部长?

戈尔巴乔夫已经准备好提案。请看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记录”:  
“我们找不到第二个像安·安·葛罗米柯那样有经验、熟悉对外政策问题的人,”戈尔巴乔夫说,“不过,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当年在外交生涯刚开始时并不具备现在这样的经验和知识。在德黑兰会议上,他当然不是现在这个样。我和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讨论过谁当外交部长。我们有很多内行的外交官,例如,科尔尼延科……契尔沃年科既做过党的工作,也做过外交工作,还有多勃雷宁。但最后我们有了另外的思路。需要一个大人物、一个我们很熟悉而且信任的人出任外交部部长”。

葛罗米柯插话:“整个外交官队伍已经造就出来。”

戈尔巴乔夫打断了外交元老谨慎地试图影响自己接班人人选的话:“最后我们决定推荐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我和他谈过。他对我说:什么事都能料到,只有这件事料不到。他是一个成熟的活动家,讲原则,注意维护党的利益。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

维奇以实际行动表明自己是个久经考验、坚定沉着、善于找到解决问题办法的人。必须考虑到一个重要的方面：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必须使这一点在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中得到反映。我深信，同志们，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你们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意见？”

一个简直出乎意料的人物。爱·阿·谢瓦尔德纳泽不仅没有葛罗米柯的那些已成为累赘的学衔和学位，而且根本没有受过什么系统的教育。爱·阿·谢瓦尔德纳泽 1928 年出生于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兰奇胡季区的马马季村。18 岁开始做团的工作，后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 20 岁入党，毕业于格鲁吉亚中央党校，任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书记时，毕业于库塔伊西师范学院。在党机关工作不长的一段时间后，谢瓦尔德纳泽又在格鲁吉亚内务部（当时称社会治安部）工作，他青云直上，很快就登上了该部的最高一级阶梯——当了一年副部长，自 1965 年至 1972 年一直为该部部长。1972 年，他调任第比利斯市党委第一书记，同年成为格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sup>40</sup>，接替该职位上的 B. 姆扎瓦纳泽，姆扎瓦纳泽被指控犯有贪赃受贿罪。说谢瓦尔德纳泽是安德罗波夫的亲信不无根据<sup>41</sup>。

值得指出的是，还在 1978 年谢瓦尔德纳泽就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戈尔巴乔夫也是在这一年出任中央书记的。这个党的官员、不久前的内务部领导人，既没有任何国际事务的经验，在这方面也没有受过任何培训。但是，他对上司说话投其所好的本事是有名的，因此，谢瓦尔德纳泽甚至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就是个让人厌烦的人。

富有经验的政治局委员们明白，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打算亲自领导国家的外交活动。他不需要固执的葛罗米柯或者追求功名、受外交部传统和常规束缚的外交官留在这个岗位上。外交官应当执行总书记的指示。这时的戈尔巴乔夫已经具备虽不丰富但是成功的外交活动经验，他想让谢瓦尔德纳泽扮演不折不扣执行他意志的角色。政治局会议的气氛发生了变化，葛罗米柯刚才还试图提醒，说外交部有不少有经验的外交官，现在突然改变了自己的立场。

请接着看会议“工作记录”：

“葛罗米柯：我建议支持。谢瓦尔德纳泽同志是领导核心成员。这对于外交部来说是重要的。”

戈尔巴乔夫：必须给予外交部以应有的重视(?! ——作者)。

葛罗米柯：列宁说过，外交部是中央委员会的一个部。

波诺马廖夫：国际形势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

421 戈尔巴乔夫：我深信，我们推举谢瓦尔德纳泽同志任外交部长是正确的。

利加乔夫：我们支持。

戈尔巴乔夫：鉴于谢瓦尔德纳泽同志的个人素质，鉴于他被推荐为外交部长，应当将他由政治局候补委员转为政治局委员。

……

谢瓦尔德纳泽：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对外交部长来说，最重要的是执行政治局对外交事务的决策。”

当时还通过了解除格·瓦·罗曼诺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职务的决定。他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的潜在对手。但是，这一切没有被记入会议“工作记录”。名义上是“因健康原因”，应个人要求让罗曼诺夫退休的。Л. Н. 扎伊科夫被推荐接替以苏共中央书记身份主管国防工业部门的罗曼诺夫。

随后的一项任命突然引起了争论。戈尔巴乔夫提议叶利钦出任负责建设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在谈及这一提议的理由时，指出有大批未竣工的建设项目，指出“投资停滞不前。我们已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通过了一系列你们都知道的重大决议。我们加强了这一部门，把有建筑方面经验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叶利钦同志调到莫斯科这里来任中央建设部长。也许，应当研究一下，他是否兼任苏共中央书记，这样便于他处理建设问题？”尼·亚·吉洪诺夫突然打破了赞同的气氛。

“吉洪诺夫：他能不能扮演新角色？”

戈尔巴乔夫：提出这样的问题可以理解。不过，叶利钦同志有好阅历：他干过工长、主任工程师、建筑托拉斯总经理，曾任斯维尔德洛夫斯



克住宅建设联合公司总工程师,接着任总经理。后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工作。所以,他了解这个部门,而且有党务工作经验。

**吉洪诺夫:**不过我好像没有感觉到。

**利加乔夫:**叶利钦同志已积极着手工作了,去过许多部,人们愿意接近他。

**多尔吉赫:**叶利钦同志能正确处理和部长们的关系。他与各州党委的关系良好。我和他认识以来还没有发现他有什么弱点。

**戈尔巴乔夫:**建筑领域要做的事情很多,需要一个精力充沛的人。

**吉洪诺夫:**建筑领域是我们最薄弱的环节。

**索洛缅采夫:**应当推荐叶利钦同志任中央书记。他会成长的。他有成长的条件:学历、建筑方面的工程师实践。总之,这是个有前途的人。

**戈尔巴乔夫:**我专门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和大家交换意见。我想检验自己的意见并听取同志们的意见。那么我们怎么办?建议全会选举叶利钦同志为中央书记?<sup>42</sup> 422

**政治局委员们:**对。应当以政治局决定的形式把这事定下来”。

吉洪诺夫在这次会议上批评叶利钦,多半成了大家“同意”叶利钦的因素。政治局委员们深知吉洪诺夫与戈尔巴乔夫复杂的冲突关系。他是加强戈尔巴乔夫地位最彻底的反对者。吉洪诺夫批评叶利钦,证明他认为前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委书记是戈尔巴乔夫的拥护者。

讨论叶利钦任职之后,接着讨论选举列宁格勒州党委第一书记列·伊·扎伊科夫为中央书记和他出任中央国防工业部部长的问题。被指定接替他原先职位的是时任苏联工业建设部部长的尤·菲·索洛维约夫。吉洪诺夫又尖锐批评了这一决定,但这并没有妨碍扎伊科夫升迁。

吉洪诺夫的政治生涯结束了。1985年9月26日,政治局通过了他“因健康原因”退休的决定。雷日科夫坐上了他的交椅——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12月底,退休的人中除了罗曼诺夫和吉洪诺夫外,又增加了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盛传他与莫斯科的“黑手党交

易”有联系<sup>43</sup>，自己想当总书记。另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他是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老一代领导人与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新一代领导人之间有继承性的代表人物，而这种继承性正是戈尔巴乔夫所要努力摆脱的。

戈尔巴乔夫早就准备让格里申退休。据沃罗特尼科夫回忆，12月13日，戈尔巴乔夫对他说，中央收到许多批评格里申的信，党员大会上和集体中有议论，指责格里申摆贵族老爷派头、哗众取宠、不干实事而热中于口号。戈尔巴乔夫说，他已经和其他政治局委员谈过换下格里申的必要性<sup>44</sup>。

12月23日，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室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只有政治局委员、负责党的干部工作的中央书记拉祖莫夫斯基和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说，他和格里申进行了一次艰难的谈话，格里申不得不写信，要求退休和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顾问组。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道：“如果同志们没有反对意见，那么可由我参加苏共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的工作（在形式上只有该市的市委全体会议才能解除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作者）。现在讨论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事关首都的党组织。因此，宜从苏共中央推荐有在大的党组织中工作的经验，而且懂经济、科学和文化问题的人担任这一职务。有人建议推荐鲍·尼·叶利钦同志……我与叶利钦同志谈过话。他明白莫斯科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明白在第一书记职位上工作的困难和复杂性……首都就是首都。这里既是行政中心，又是经济科学文化中心。”

后来成为戈尔巴乔夫助理的A. 切尔尼亚耶夫在自己1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今天是全莫斯科欢乐的日子：终于撤了格里申，换上了叶利钦。”<sup>45</sup>

## 变革的困难

“人们常说，党的改革路线是得到支持的，作出的决定也是正确的，但是，并非总能得到贯彻”<sup>46</sup>，——1986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政治

局向自己的战友讲述视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结果时这样说道。苏共二十七大是1986年的国家大事,但是生活并非按照党勾画的蓝图进行。对于全世界和国家来说,1986年成了切尔诺贝利年。“纳希莫夫号”豪华轮船上的数百人在离新罗西斯克海岸六海里处意外惨死,也震惊了全国。不过,这一年也是“峰会年”,美国总统罗·里根和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在雷克雅未克会晤<sup>47</sup>。

1986年的政治年度是从1月24日的莫斯科市党的代表会议和叶利钦的报告开始的。我们再来看一看切尔尼亚耶夫的日记:“从人们的期待看,就反映变革的深度和规模而言,叶利钦的报告可与苏共二十大报告相提并论。也就是说,无论从报告的精神或字面上看,都体现出新的生活和活动准则。卖《莫斯科真理报》(登载有叶利钦报告的报纸——作者)的报亭前排起了长龙。”

作为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叶利钦遇到了这个庞大城市的无数问题。许多问题出乎他的意料。格里申在管理该市的18年中,不让任何人干预莫斯科事务,他认为莫斯科没有什么问题。格里申的口号是:“我们要把莫斯科变成模范共产主义城市”。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莫斯科确实是个“模范共产主义城市”。这部分人只占莫斯科总人口的百分之几,他们不仅包括那些“由上级任命的干部”——务必经党的机关同意才能任命的党和国家官员,还包括一小部分与他们有着不甚明显但是牢固联系的艺术界、学术界、警方和商界的工作人员。他们享有按苏联标准来说很好的住宅、医疗服务和“紧俏”商品。

但是,还有一个多数人的莫斯科。警察岗哨、门卫、“专用”公务轿车、火车站和机场内形形色色的“贵宾室”把这个多数人的莫斯科同那个少数人的莫斯科分隔开来。在多数人的莫斯科,每四个人中只有一人有机会通过排队得到住房。数十万限额招收的临时工在这里从事最不体面的劳动,他们要苦苦等待10—15年才能成为“莫斯科人”,取得宝贵的“莫斯科户口”。在这个多数人的莫斯科,门诊部和医院的条件极差,在商店购物要排长队,街道脏乱不堪,市政公用设备常年失修, 424

“赫鲁晓夫式住宅”随处可见。

格里申是少数人的莫斯科的市委书记。人们常说,他们这些人、克里姆林宫宫墙里面的这些人过上了共产主义生活。叶利钦是多数人的莫斯科的市委书记,是广大工人和公务员(不包括中央委员、学者、大学教师、院士、即将晋升将军的军官)的市委书记,是大多数莫斯科人的领导人。他站在多数人一边未必出于政治上的盘算。叶利钦在莫斯科开始干过去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做过的事。但是,莫斯科不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全国任何一个地方,两个社会阶层——“官员”和其他所有居民之间不存在表现如此明显的矛盾。叶利钦的行动——郑重其事地视察商店、坐城市公交车视察、对不干工作和干不好工作的人进行严厉惩处、承认莫斯科面临的严重问题、坦诚回答直言不讳的问题以及第一次当众承认他受到莫斯科黑手党的威胁<sup>48</sup>,使他成了罗宾汉式的人物。不过与此同时,他被视为“戈尔巴乔夫班子”的人。叶利钦在数月内罢免了“格里申一班人”的职务,也被人视为戈尔巴乔夫干部政策的继续。

1986年2月25日,苏共召开第二十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的开幕之日恰好是1956年赫鲁晓夫向二十大代表作他的著名报告的那一天。人们期待戈尔巴乔夫在代表大会上发表自己的纲领。他在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总的来说没有辜负这一期待。他在报告中坦率地承认党活动中的问题和缺点:“多年来,不仅由于客观因素,而且首先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和生活本身。国家发展中问题增加的速度甚于解决的速度。惰性、管理形式和方法僵化、工作动力下降、官僚主义增长,所有这一切给我们的事业带来不小损失。社会生活中开始显露出停滞现象。形势要求变革,但是在中央机关(!——作者)以及地方上,一种独特的心理开始占上风:最好改善现状,但什么都别变动。不会是这样的,同志们……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不能回避。采取这种立场会使国家、国家机器和党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让我们大声地讲这个问题!”<sup>49</sup>

报告中谈到了完善苏联社会主义的问题。但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不乏自相矛盾之处,有时给人一种“用布头拼接被子”的印象,旧的传统原教旨主义观点与按新方式思考世界的尝试混杂在一起。这种情况在报告的“当代世界:基本的趋势和矛盾”和“党的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和方向”两部分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报告的“当代世界:基本的趋势和矛盾”部分,贯穿了传统的观点和说法,诸如“世界社会主义——强大的国际构成体,它依靠高度发达的经济、坚实的科学基础和可靠的军事政治潜力”<sup>50</sup>。对资本主义的评价近似于简单的宣传,如“80年代的资本主义,即电子、信息、计算机和机器人时代的资本主义,又把数百万人,其中包括青年和有学问的人抛上街头。财富和权力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sup>51</sup>在列数了资本主义深层次的矛盾后,报告的作者不情愿地承认:“现阶段的全面危机没有给资本主义带来绝对的停滞,不排除其经济增长的可能性。”<sup>52</sup>

报告的“党的外交战略的基本目标和方向”这一部分反复提到了放弃军事冲突、增进世界团结和承担全球责任的思想。报告中说,“赢得军备竞赛如同打赢一场核战争一样,已经成为不可能”,这些漂亮话完全适用于国际会议上的高谈阔论者,但是令人遗憾,却是不折不扣的空想。它掩饰(或者说掩盖——后者似乎更确切)苏联输了军备竞赛而美国及其盟友赢了军备竞赛的事实。

但是,报告并不承认这一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颇有价值的事实,不承认这一令人不愉快但却是现实的情形,而是提出了“不仅通过传统的外交渠道,而且通过直接面向世界社会舆论,以呼吁各国人民”<sup>53</sup>的方式影响世界的愿望。实质上,这是维持和继续那种作为控制世界手段的共产主义宣传;至于说这些思想后来被说成是“新思维”和“全人类的价值”,则是另一回事<sup>54</sup>。

此外,戈尔巴乔夫在报告中只字不提如何在外交活动中维护苏联各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尽管他在报告中为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存在进行了辩解)<sup>55</sup>。

在内政方面,宣布“加速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是战略方针”。

戈尔巴乔夫宣布的与新闻界结盟的方针是新方针。“对于我们来



说，”他在代表大会上宣称，“扩大公开性的问题是原则问题。……没有公开性就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民主以及群众的政治创造力和他们对管理的参与。……有时谈到公开性时，会听到有人打招呼：慎言我们在现实工作中在所难免的缺点、失误和困难。这个问题只能有一个答案，列宁主义的答案：共产党人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需要真理。……因此，我们必须把公开性变成一种不间断起作用的制度”<sup>56</sup>。

426 代表大会后不久，鲍·尼·叶利钦、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尤·菲·索洛维约夫和白俄罗斯党中央第一书记尼·尼·斯柳尼科夫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多年做工会领导工作的亚·帕·比留科娃、多年任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阿·费·多勃雷宁、兼任中央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部长的瓦·安·梅德韦杰夫、保住了组织和党务部部长职位的Г. 拉祖莫夫斯基以及亚·尼·雅科夫列夫（他是苏共中央负责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成了苏共中央书记。

1986年3月13日，苏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对党的最高领导成员的职责进行了重新分工。戈尔巴乔夫亲自掌管政治局工作的组织、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干部配置、总的经济问题、国防和国家安全、外贸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组织和党务部、公共部、经济部、行政机构部、国际部、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联络部、国外干部工作部、事务管理局。戈尔巴乔夫走的比安德罗波夫远得多，后者只把政治局工作的组织、“内外政策的基本问题”、国防和外贸留给自己，而把许多问题交给“第二书记”契尔年科处理。

与契尔年科不同，“第二书记”利加乔夫得到的较少——苏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和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组织权、科学文化问题、农工综合体的领导。他还负责对宣传部、科学和院校部、文化部、农业部的工作实行监督。利加乔夫是个专横、爱面子、惯于发号施令的人，很快就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有两个中央书记同时管意识形态——齐米亚宁和雅科夫列夫，而且后者是戈尔巴乔夫最近的亲信，对他来说，利加乔夫的意见无足轻重。由梅德韦杰夫主管的科学与文化领域也是这种情况，梅德韦杰夫也是戈尔巴乔夫的亲信。而农工生产领域，则完全是原主

管农业的苏共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多年经营的地盘。

职责如此分工只能说明一点：戈尔巴乔夫不想让自己身边有一个有力的“第二书记”和潜在的竞争者。

政治局决定，机器制造业、国防工业、化工工业以及建筑业的发展问题由中央书记扎伊科夫负责，重工业、能源、交通和邮电由多尔吉赫负责，轻工业和贸易由中央书记比留科娃负责，多勃雷宁领导中央国际部的工作，齐米亚宁负责科学、教育和卫生问题，梅德韦杰夫负责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联络，中央书记尼科诺夫负责农业，拉祖莫夫斯基负责党的干部工作，雅科夫列夫负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对外宣传和文化艺术的发展<sup>57</sup>。

在职责分工中，职能的明显重叠引人注目。这不是错误，而多半是戈尔巴乔夫干部政策的原则，意在建立管理中的互相竞争机制。不过，这一原则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主持整个垂直管理……

就是在那次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触及了另外两个重要问题。427  
其一，他维护了非国有经济成分的存在权。“我们仍然对个体劳动活动有恐惧症，害怕个体经济，”戈尔巴乔夫说。“我们这么干只会搞垮集体农庄！只会使社会主义面临威胁！……必须采取灵活的态度。某个地方冒出个私营企业家，这有什么？难道我们从列宁的智慧中已经找不出一点应对这种情况的办法？”

戈尔巴乔夫不得不忧心忡忡地承认，中央与地方必须分担责任：“但愿地方上的人都能动脑筋。不要把一切都推给苏维埃政权。不要造成这样的状况：假若某个城市的商店里空空如也，那就是莫斯科的过错……”<sup>58</sup>应当指出，向地方放权的问题依然被束之高阁。

戈尔巴乔夫的国际问题助理阿·谢·切尔尼亚耶夫曾经指出，二十七大结束后，“戈尔巴乔夫把国内的每一件大事都和对外政策联系在一起”，他把赌注压在和美国领导人的直接对话上，把它作为根本改变国际形势的手段<sup>59</sup>。第一次这样的会晤是1985年11月21日—22日在日内瓦举行的，会晤很成功，创造了罗·里根和米·谢·戈尔巴乔夫彼此友好的气氛。但是，接下来的“高峰”会晤的准备工作遇到了困

难,据莫斯科的看法,被大肆宣传的苏联领导人关于国际关系领域“新思维”的声明,实际上没有被西方新闻界注意。美国从戈尔巴乔夫认为在日内瓦已达成的立场上“后退”了<sup>60</sup>。对苏联来说,美国军舰编队在克里木海岸附近出现具有公然侮辱的性质。为了对美国领导人施压,打算展开宣传攻势,向西欧和美国的社会舆论发出呼吁。1986年4月3日,政治局专门研究了“对抗美国反苏路线的政治宣传措施”问题。

戈尔巴乔夫建议政治局委员们对苏美关系的前景发表意见。苏联外交界元老葛罗米柯首先发言。他指出:

“美国采取了使关系紧张化的方针。怎么办……至于说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忍耐和分寸。总书记多次发表声明,表示愿意缓和苏美紧张关系,但是都没有得到积极回应。但是,我们还要保留沟通的渠道,继续让最高级访问的协议有效……必须进一步利用日内瓦会晤”。

戈尔巴乔夫:“但是美国人不仅不支持缓和,而且也不支持解冻”。

葛罗米柯:“用不着大动干戈,但是必须给予回击。分寸归分寸,但是给予回击是必要的,不过要善于回击,不要万炮齐发。我认为,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

428 多勃雷宁:“……最高级会晤问题应当始终给予关注。不应当转向对骂。应当扩大与美国反对派力量的接触。要不要把苏联和古巴在墨西哥湾的军事演习这一点写上?”

利加乔夫:“……最高级会晤不要取消,不要不予考虑。日内瓦会晤前也有过麻烦。但是我们去会晤了,赢了,在国际社会面前露了脸。美国人为什么这么干?看来,原因在于他们想破坏会晤……我想,必须去会晤”。

索科洛夫(当时的苏联国防部长——作者):“我是这样理解的:现在的问题不是会晤是否适宜,会晤应当举行。不过,美国人做事欺人太甚,提出减少我们驻联合国人员数量的问题,侵入我们黑海领水。我们必须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在和苏联打交道。我们不应当沉默……”

戈尔巴乔夫:“……我们今天讨论的是一个最严肃的对外政策问

题。我们在代表大会上开诚布公地说过,我们受他们左右,他们也受我们左右,需要均衡。我们有强有力的构想。不要偏离这一外交政策构想。我们提出这一构想后,博得了世界社会舆论,甚至美国社会舆论的好评。美国当局担心我们得分、占上风,使它难以推行自己的战争计划。里根受右翼势力摆布。华盛顿的目的是挑起冲突。他们在利比亚、黑海和联合国的行动,都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说我们的宣传措施,它的目的应当是阐明我们在日内瓦会晤之后的方针。必须指出,美国的政策建立在苏联经济薄弱的错觉之上,建立在分化苏联领导层的意向之上。在我们的宣传工作中,应当利用他们的弱点,揭露军工集团,指出他们怎么掠夺世界,怎么利用不发达国家的债务对待这些国家。……我们有进行有效宣传的好基础。让他们着急、犯错误吧。而我们应当镇定自如地行动……因此,应当从文件中删除关于‘由苏联导弹部队和海军远程航空兵举行打击美国海上目标示威性演习’的建议。举行这种演习正中他们下怀。不要在墨西哥湾搞大演习,这种演习是给他们送礼……至于说最高级会晤,这个问题我们现在不做决定。不论在政策上还是在新闻上,不应忙乱。”

戈尔巴乔夫执意促成和里根的会晤。为了加强与他的联系,决定求助于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4月28日,苏联新任驻英大使、富有经验的外交官、不久前担任中央对外宣传部部长的列·米·扎米亚京飞往伦敦,他受托向英国首相转达戈尔巴乔夫的函件和口信<sup>61</sup>。

## 切尔诺贝利悲剧

429

但是,此后不久发生了一件使所有新闻长时间黯然失色的事件。1986年4月26日(星期六)1时23分50秒,离乌克兰首都10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400万千瓦的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由四个机组组成,1号机组1978年投入运行,最后一个机组,即4号机组,1984年投入使用)的4号机组发生爆炸。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回忆说:

“已经准备一早去上班,这时急促的‘转盘电话’<sup>62</sup>铃声让我止住了脚步。电话是能源部长阿纳托里·伊万诺维奇·马约列茨打来的。”他报告说,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事故,但详情还不知道。

半小时后,雷日科夫已经在克里姆林宫,有人向他报告:“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4号机组发生巨大爆炸,之后起了大火。

我还心存侥幸,——雷日科夫回忆说,追问道:

哪儿爆炸? 机房?

不是,——马约列茨回答说,是反应堆。

反应堆爆炸——这是可怕的。反应堆起火——更可怕。电站夜间的电码信号显示:1、2、3、4。这些数字意味着各种危险:核危险、辐射危险、火灾和爆炸。后果——近期的和远期的,无法预料。”<sup>63</sup>

雷日科夫命令马约列茨部长火速飞往乌克兰,查明发生的情况。随即召开了以燃料能源综合体委员会主席鲍·叶·谢尔比纳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调查小组会议。当日晚间8时左右,调查小组抵达切尔诺贝利。它报告了初步情况:4号机组发生了两次爆炸,反应堆和反应堆房完全被毁,被炸碎的石墨部件散落了数百米,反应堆上方升起数百米高的白烟柱——石墨在燃烧,可以看到反应堆内有深红色火光,数百人受到辐射伤,两人已经死亡,辐射情况非常复杂,须由国防部火速援助,需要防化部队<sup>64</sup>和重型直升机……

4月26日夜作出决定,疏散电站附近普里皮亚季城的居民。星期日14时开始疏散,三个小时后,4万居民全部从普里皮亚季城撤出<sup>65</sup>。

在这段时间里,苏联报刊、广播和电视(不论中央的还是地方的)始终保持完全沉默。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南部各州对此事一无所闻。

1986年4月28日,星期一,政治局召开了非常会议<sup>66</sup>。考虑到会上讨论的情况汇报的历史重要性,加之这份文件以往没有公开过,我们援引“工作记录”如下:

“1. 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4号机组事故汇报。



米·谢·戈尔巴乔夫：我们听一听弗·伊·多尔吉赫同志的汇报。

弗·伊·多尔吉赫：4月26日1时30分，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在关闭4号机组准备修理时发生爆炸。全部工作符合操作规程。专家的解释是：下层箱中的氢发生爆炸，致使铀棒受压上冲，撞破顶盖。有17人上班。一人死亡，还有一人未找到。4月28日上午9时反应堆地区的辐射强度为1000伦琴，市内为230毫伦。居民已经疏散。全市4.5万人留下了在电站服务部门、食堂等处工作的5000人。疏散的人已经安置。辐射云扩散到60公里。

尼·伊·雷日科夫：昨天大气上层的辐射云已到达维尔纽斯。

弗·伊·多尔吉赫：有什么办法？正在采取防止喷射的措施，用直升机向反应堆的主喷射口填沙土、红黏土和铅。

米·谢·戈尔巴乔夫：难道没有规定标准措施？

弗·伊·多尔吉赫：需要深入分析事故原因并制定出消除事故后果的相应措施。现在提出来的仅是一种解释。有130人受到辐射。他们已被送到莫斯科。不过，这个数字有可能增加。现在，首要的是把反应堆控制住。4号机组本身报废了。必须把它埋起来。第二是预防另外三个机组出事。在乌克兰，党组织中正在做解释工作。电站的人表现很顽强。现在需要给疏散的人安置工作和找到电力损失的弥补办法。

米·谢·戈尔巴乔夫：沙袋和硼砂袋是空投吧？

弗·伊·多尔吉赫：是直升机空投。已经投了60袋。需要投1800袋。不过，直升机飞行也不是没有危险的。

米·谢·索洛缅采夫：氢气的聚集应当能控制吧？

弗·伊·多尔吉赫：是的。不过我再说一遍，这仅仅是一种解释。

安·安·葛罗米柯：这种现象不能预报？

米·谢·戈尔巴乔夫：目前这仅是猜测，需要对事件的各种情况进行非常认真的分析。结果我们会在政治局会议上研究。不能放弃原子能电站，但是务必采取一切加强安全的必要措施。

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国防部副部长、元帅——作者）：至昨天

晚间,辐射强度在增加。其扩散面积为 600 平方公里,不过,辐射云向西和向南移动。正在采取消除放射性污染的措施。用于这一目的专业队伍明天抵达。我们为当地机构提供了 1.5 万人的帐篷。第聂伯河未发现污染。

米·谢·戈尔巴乔夫:你们认为该怎么办?

谢·费·阿赫罗梅耶夫:只有向反应堆投沙袋和硼砂袋是现实的。

米·谢·戈尔巴乔夫:科研人员行动起来了吗?

弗·伊·多尔吉赫:阿·彼·亚历山德罗夫(苏联科学院院长、苏联核电站建造者之一——作者)等学者正在忙这事。

431 米·谢·戈尔巴乔夫:是否成立不同方向的几个学者小组?

弗·伊·多尔吉赫:已经成立了。

维·米·切布里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作者):从我们系统看,暂时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情况。居民稳定。不过应当考虑到,目前只有小范围的人知道事故。

尼·伊·雷日科夫:弗·伊·多尔吉赫同志详细讲述了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情况。星期六的消息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放心。但是,鲍·叶·谢尔比纳和阿·伊·马约列茨两同志飞到现场后才弄清,实际上情况复杂得多。反应堆内的温度有 900 度左右。必须控制源头。怎么办?选定了沙土和硼砂。第二个控制办法是用铅和铁砂。已运到 150 吨铅。总共需要 1500 吨。已经找到了。切尔诺贝利地区又发现大约 20 个人受到辐射。可能是钓鱼的人。找到了目睹爆炸的人。必须详细分析事故事实,作出必要的结论。

叶·库·利加乔夫:我和基辅市委第一书记 Г. 列文科同志通过话。还和弗·瓦·谢尔比茨基同志通过话。他们正在积极做工作,向居民解释发生的情况。

米·谢·戈尔巴乔夫:报道工作怎么办?

弗·伊·多尔吉赫:必须完成控制放射源的工作。

米·谢·戈尔巴乔夫:必须尽快予以报道,不能拖。应当讲发生了爆炸,正在采取措施控制其后果。这是其一。

维·伊·沃罗特尼科夫:是。

米·谢·戈尔巴乔夫:其二,必须继续做消除放射污染的工作。还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保护公民财产,防止有人趁火打劫。必须为疏散的人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关心饮食、劳动安置、儿童上学等事情。

叶·库·利加乔夫:人员安置得很好。对出事的报道不应拖。

亚·尼·雅科夫列夫:我们对此事的报道越快越好。

盖·阿·阿里耶夫:应当予以报道。

维·米·切布里科夫:对。

阿·费·多勃雷宁:美国人反正会拿爆炸和辐射云扩散事实大作文章。

维·米·切布里科夫:正在对受害者给予必要的帮助。

安·安·葛罗米柯:报道应当写得不至于引起不必要的不安和慌乱。

米·谢·戈尔巴乔夫:我们有 18 座原子能电站。必须彻底弄清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的原因。应当检查我们原子能监督部门的工作。在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保证安全的工作是不是都做了?要知道,我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专门成立原子能监督部门的。事故发生在 4 号反应堆应转入修理的时候。这意味着原子能监督部门的代表应当在场。必须把所有这一切认真查清楚。对这件事需要最严肃、最公正的分析。

432

维·米·切布里科夫:要根据事实提起刑事诉讼。

安·安·葛罗米柯:也许应当向朋友专门通报发生的事?他们从我们这里购买原子能电站设备。

米·谢·戈尔巴乔夫:我们应当首先向自己的公众通报。在最终评估发生的事时,应当注意原子能电站的选址问题,再研究一次电站必须在什么地方选址。

鲍·尼·叶利钦:也许应当禁止人员进入上空有辐射云扩散的地区?

阿·费·多勃雷宁:必须重视美国原子能电站爆炸时消除事故后

果的经验。

米·谢·戈尔巴乔夫：那么让我们通过这样的决定：

听取了弗·伊·多尔吉赫同志关于这个问题的汇报。

继续实施消除事故后果的措施。

苏联部长会议对事故地区的疏散公民采取物质生活保障和劳动安置措施。

起草和发表关于事故的新闻报道。

向中央政治局报告事故的最终调查结果。

政治局委员们：同意。

决议通过。”<sup>67</sup>

当日即星期一晚间，关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的第一个官方消息出现，它简短报道了事故，对那里实际发生的情况未作任何说明。

次日，4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中央书记多尔吉赫报告说，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的情况恶化。反应堆中的温度上升，石墨外喷，辐射强度也增加了。一百多人受到辐射被送往医院。学者和专家建议，继续向反应堆投放（空投）沙土、硼砂和铅。苏联科学院院长、该型号核反应堆的建造者之一阿·彼·亚历山德罗夫提醒，核物质有可能与水接触，会引起严重危险。显而易见，以谢尔比纳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调查小组不能待在切尔诺贝利了，因为它的成员已经受到大剂量辐射。会上对卫生部和民防系统提出了很多要求。政治局决定成立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的行动小组。其成员有：雷日科夫（主席）、利加乔夫、切布里科夫、多尔吉赫、苏联内政部长弗拉索夫以及雅科夫列夫<sup>68</sup>。行动小组最初几乎每天，后来则根据需要，研究和决定切尔诺贝利灾难引发的问题<sup>69</sup>。

433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只有19行字的题为《在苏联部长会议上》的新闻报道稿。报道说：“事故发生在4号动力机组的一座厂房内，造成反应堆楼部分建筑结构破坏、反应堆受损和少量放射性物质外泄。其他三个动力机组已停车，机组完好无损，处于待运行状态。事故中两人死

亡。采取了紧急抗灾措施。目前,电站及周围地区的辐射状况已稳定,正在对受伤人员进行必要的救治……”确切地说,对苏联人民播发的消息到此为止。政治局决定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公民说得多一些:“污染值略超过容许范围,但是没有到需要采取专门措施保护居民的程度”<sup>70</sup>。

这个报道是在预料情况还会恶化,普里皮亚季市4万居民已被迁出、决定把切尔诺贝利方圆十公里划为居民外迁区时出现的。“小白桦”<sup>71</sup>式的新闻报道原则再次完全按苏联方式起作用——向外国公众报道说,辐射污染值“略超过容许范围”,但是,不让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居民知道这一情况。

人们照样欢度无产阶级的节日——五一节。在基辅、切尔尼戈夫、明斯克、戈梅利、斯摩棱斯克和库尔斯克,在一些城市和地区,成千上万的人在春天和煦的阳光下,举行数小时的游行和群众游园。应当指出,各州和共和国的领导人拥有了解放射性污染后果的足够信息。苏联国家水文气象和自然环境监督委员会主席尤·安·伊兹拉埃尔后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报告说,自发生事故第一天起,实际辐射情况每天都向政治局、苏共中央、各共和国部长会议和州执委会报告。有通报,但是秘而不宣,成为悲剧牺牲品的人无从知晓。

5月2日—3日,雷日科夫和利加乔夫视察了切尔诺贝利。雷日科夫实地了解情况后,作出了电站周围30公里内人员疏散的决定。186个居民点的居民应当外迁<sup>72</sup>。

直到1986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才发表电视讲话,介绍切尔诺贝利灾难。

顺便提及,以雷日科夫为首的行动小组在消除切尔诺贝利灾难后果方面做了大量非同寻常的工作,但实际上完全没有报道它的活动,这首先是个大错误,可以说是个政治性错误,因为人们对当局的信任感发生动摇。第二,对那些承担着巨大风险出现在切尔诺贝利、出现在有辐射伤害威胁地方的人,简直是不公正的<sup>73</sup>。

切尔诺贝利灾难引发了无数问题。据国家农工委员会1986年5



月8日的资料,放射性污染扩散到1090万亩农业用地,其中包括750万亩牧场。基辅州、切尔尼戈夫州、戈梅利州、莫吉廖夫州、文尼察州、日托米尔州、布良斯克州和奥尔洛夫州的一部分土地废弃。图拉州和卡卢加州也发现了放射性污染点。辐射波延及波罗的海沿岸地区、乌拉尔和外乌拉尔。苏联整个西南部地区的污染程度普遍增高(是环境指数的10—50倍)。污染扩散到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境内,对饮用水构成了严重的污染威胁。

最为严重的是医疗问题,其中包括与长期辐射伤害后果有关的医疗问题。“在过去的一昼夜内,又有2703人住院……有10198人住院观察和治疗,其中345人有受辐射伤害症状,他们中包括35名儿童。自事故发生时起,有2人牺牲,6人死亡,35人病情严重”,——政治局行动小组的一份记录上这样写道<sup>74</sup>。11万多人背井离乡,他们把几十年积攒的全部家当留在了老家,移居新地方后却发现,那里的污染程度也很严重,因为辐射污点不是静止不动的。

对于千千万万生活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富饶地区的人来说,突然间产生了“清洁的食物”问题。当地的牲畜、牛奶、蔬菜、水果、蘑菇和草莓,成了有害健康的危险品。

儿童生病。社会紧张程度和对当局的不满情绪加剧。

1986年6月3日,政治局召开例行会议,讨论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问题。

会上听取了政府调查小组关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原因报告。这是第一次认真地试图找出过去认为绝对安全的原子能电站为什么发生爆炸的答案。报告人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鲍·叶·谢尔比纳<sup>75</sup>。

“请允许我报告主要情况,”他说。“众所周知,4月26日,切尔诺贝利电站4号机组发生反应堆蒸气爆炸,设备楼被毁,呈放射性碎片和气旋体状的部分燃料从反应堆中喷出。爆炸发生前,反应堆失控‘加速’。由于操作人员粗暴违反工艺规程,加之反应堆结构的严重缺陷,发生了灾难。

不过,这些原因不是最主要的。调查小组认为,操作人员的错误是事故的发端。事故之所以能够发生,首先是由于电站操作人员工作中的严重缺点和这里形成的麻痹大意环境。全部精力都集中在发电上……错误地相信原子能电站完全安全,相信它是整个工业的‘样板’。正如许多原子能专家所说,这种认识极其危险……

发生事故之前,曾经进行过极限设计事故条件下的机组自备供电试验。……进行这些试验的计划制定得草率,没有按规定征得总设计师、总结构设计师、科研工作领导人和国家原子能监督委员会的同意……

电站站长和负责科研工作的副总工程师没有参与上述试验计划的制定和试验的实施。 435

事故保护系统规定,在涡轮机停汽阀关闭的情况下,反应堆自动断开。这一保护系统……应当即使反应堆停车,但却没有发挥作用。……停汽阀于1时23分04秒关闭。从记录中看出,过了36秒才发出反应堆停车指令。数秒钟后(计算出的时间为1时23分46秒)发生了爆炸。

这些事故之前,还发生过另外一起违反工艺规程,实际上导致了反应堆处于事故状态的操作。4月25日,应急冷却系统被断开,在反应堆工作的状态下这是绝对禁止的……

反应堆的结构缺点加上操作人员的错误是这起原子能史上最大事故的原因”。

总之,调查小组认为,导致事故发生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人员犯了最严重的错误和不遵守工艺规程。第二个原因——50年代中期研制的РБМК型反应堆本身有缺点。制造这种技术设备是军工综合体的特权。

戈尔巴乔夫十分恼火,严厉批评核工业部门生产出这样的反应堆。他说:“某些人的唯意志论使国家陷入盲动,难道不是这样吗?”

“垄断现象确实很严重。”谢尔比纳说道。

戈尔巴乔夫追问道:“是谁提的在城市附近建原子能电站的建议?”

这是谁的主意？”

谢尔比纳回答说：“在切尔诺贝利建电站的决定具体是谁作出的，我现在说不准。不过，根据规定程序，选址由国家计委和国家建委研究，由他们提出建原子能电站的建议。”

戈尔巴乔夫厉声说道：“这事您应当搞清楚。”

作者阅读这段对话时总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不论戈尔巴乔夫、谢尔比纳，还是政治局的其他成员，都清清楚楚知道是谁作出的决定。这些决定通常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的，是在征得有关党组织同意或赞成之后，根据中央各大部的呈文作出的。参加这次会议的乌克兰党中央第一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谢尔比茨基，曾为在乌克兰发展核能的规划进行过私下游说。

436 最年长的会议参加者、神奇式的人物叶菲姆·帕夫洛维奇·斯拉夫斯基曾三次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联核计划的早期参加者，1949年因研制苏联第一颗原子弹有功获得了他的第一枚英雄勋章，领导中型机器制造部（该部负责研制核武器、核反应堆和工艺核技术，对外称中型机器制造部）近30年。他不打算讨好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对您给予我们在中型机器制造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的评价感到震惊，似乎我们不在党的监督之下，”斯拉夫斯基说。“至于说切尔诺贝利，我断言，是人为造成的爆炸。沙沙林（Г. 沙沙林，苏联能源和电气化副部长——作者）在这里唱得和大剧院的演员一样。但是他没有说为什么在原子能电站搞这种毫无意义的试验。谁需要这种试验？另外还关闭了事故保护系统。反应堆中的核反应和炸弹里的核反应一个样，不过，在反应堆中是可控的。这一次是蒸气爆炸，但实际上是核反应引起的。糟糕透顶，我们让大量碎片喷到空气中。消防队员因缺乏有关知识牺牲了。4号机组的大火扑灭后就让他们住手了，以防万一。

现在得出这样的结论：似乎中型机器制造部凭长官意志决定怎么造反应堆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自己决定的。问题的历史是这样的：我们的第一座反应堆是РБМК型反应堆。这样的反应堆我

们有几十座。它们工作得很好。它们的设计者多列扎利(尼·安·多列扎利,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电站的总设计师——作者)——久经考验的人。我们的第一座反应堆工作了30年,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我们潜艇上用的也是这样的反应堆。РБМК型是经久耐用的好反应堆。可他们在切尔诺贝利究竟干了些什么?试问,谁主持试验?区工程师?主任工程师、电站站长、库洛夫(国家原子能工程安全监督委员会主席——作者)的代表都在睡大觉。主持试验的是区工程师,而他没有丝毫权利主持。况且,试验的是一个没人用得着的计划……

让我们把所有电站的总工程师叫来问一问,原因在哪儿。区工程师自作主张导致了巨大惨祸,应当是15根棒,而实际上是6根。至于说保护系统,这些问题在亚历山德罗夫(阿·彼·亚历山德罗夫——苏联科学院院长、原子能科学家——作者)主持下在高科技水平上讨论过。如果照章操作反应堆,那么一切都会正常的。……现在冒出了许多自作聪明的人,在这件事上他们自认为什么都懂,什么都能评判”。

戈尔巴乔夫只好把话题从技术方面引到他驾轻就熟的政治方面:“我们毕竟生活在民主社会,人们可以讲出自己的看法。”

斯拉夫斯基用痛苦的语气继续说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懂您的话,我同意这些话。应当考虑不同的意见,可是我们有真正的学者,在这些问题上内行的学者……”

瓦·阿·列加索夫院士是从切尔诺贝利灾难头几天起就在现场、为找到减少辐射后果的办法做了大量工作的学者之一,他承认说:“РБМК型反应堆在某些项目上不符合国际和国家的要求。没有保护系统和剂量测定系统,缺少外罩。”“当然,我们有过错,没有关注这座反应堆,”列加索夫说。“……我个人的过错也在于此。第二,虽然РБМК型不符合某些形式上的要求,但是不能说这机器不好。它的构思是25年前形成的。当然,那个时候的要求不一样。……今年3月我去过芬兰。许多国家的学者在那里聚会,对世界上现有的反应堆根据其工作实况作了评价。认为芬兰的洛维萨原子能电站最好,它安装的

437

就是我们的设备,但是它的全部自动装置都换成了西方的。学者们把美国的一个电站评为第二,把列宁格勒的原子能电站评为第三。知道 RBMK 型的弱点已有 15 年。早在 1962 年美国就发生过类似的事故。不过那里是功率较小的反应堆。原因——操作员出错……”

政治局会议的最后议题是解除一大批与保障核安全有关的部长和副部长的职务。

次日,6月4日,苏共中央政治局消除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事故后果问题行动小组召开第21次会议。会议认为,与核反应堆研制和使用有关的部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指出对维护该技术设备的专家培训严重不足。会上通过了防止地下水受辐射污染的措施。会议批准了《关于在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4号机组事故原因和消除事故后果有关问题的指示》。

该《指示》写道:

“1. 发表讲话和回答问题应遵循苏共中央总书记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 1986 年 5 月 14 日在苏联电视讲话中所阐述的原则和结论。

2. 在介绍消除事故后果时……

——广泛介绍有关电站消除事故和该地区辐射状况的信息。

——指出已经采取大规模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

——表彰群众的英勇劳动精神……

3. 介绍在保障居民安全方面所采取的大规模措施……

4. 指出一些西方国家个别官方人士以及报刊的无理要求和评价是没有根据的,他们称,由于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地区少量放射性物质……扩散,似乎使他们遭受了极其严重的生态损失和物质损失。

5. 提请记者招待会的参加者注意,在当代世界,和平利用核能问题和军事利用核能问题紧密相连。最大限度地利用米·谢·戈尔巴乔夫同志讲话中的一个论点:‘切尔诺贝利事故再次说明,核战争将使人类陷入多么苦难的深渊。核武器本身隐藏着比切尔诺贝利灾难可怕得多的灾难’”<sup>76</sup>。

438

“少量放射性物质”在铯-137 的含量上相当于 300 枚在广岛上空



爆炸的原子弹。切尔诺贝利灾难带来的物质损失根本无法计算,不止一代人需要为“切尔诺贝利灾难”付出代价……

## 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

切尔诺贝利灾难还使苏联付出了另一种代价——政治代价。在报道这次悲剧中,政治局采用了“有控制的公开性”,这不仅仅败坏了自己的名声,而且从准确的法学意义上讲,掩盖真相就是犯罪,因为秘而不宣或者不及时通报,对数十万人的健康和生活造成了危险,苏联政治领导人必须对此承担责任。

切尔诺贝利事件以后,全国掀起了一场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生态运动。在受害特别大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出现了社会运动,指责中央政权对这些共和国的居民犯有“危害种族罪”。

1986年春夏两季令人惊惶不安:反应堆爆炸,在新罗西斯克湾离海岸六海里处,一艘货船撞沉一条客船后,拦腰撞入“纳西莫夫号”豪华内燃机船。初步调查结果证明,两艘船的船员都违反了各种航海规则和条令。发生了和切尔诺贝利事故一样的情况:缺乏纪律和最起码的责任心……

戈尔巴乔夫开始疲于奔命。从一个方面讲,他必须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受到社会积极分子支持的社会领袖。1986年4月,戈尔巴乔夫在陶里亚蒂宣布“改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改造思想和改组工作。”1986年5月举行全苏电影工作者代表大会时,对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表现得淋漓尽致。

从另一方面讲,他试图像安德罗波夫那样扮演斗士角色,与各共和国和莫斯科最高权力集团的贪赃受贿现象作斗争。5月15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来自哈萨克斯坦的上访信接连不断,控告那里的中央第一书记丁·艾·库纳耶夫把自己的亲戚提拔到国家职位上,说他贪赃受贿<sup>77</sup>。过了一个星期,戈尔巴乔夫要求,在乌兹别克斯坦加强与贪赃受贿现象的斗争,对沙·拉·拉希多夫的行为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

“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sup>78</sup>的思想维持到1986年中。但是,这场运动已开始衰退。经济问题悄然增多。苏联的预算赤字1985年为170亿卢布,1986年增加了两倍<sup>79</sup>。国家财政问题越来越棘手。与反酗酒运动同时开始的预算试验,导致物价上涨和增加货币发行量。439 25%的工业企业未完成计划,13%的工业企业亏损,企业超标准库存所谓的有价值物资——材料、原料和“备用”设备,按1986年的价格计算,这些库存物资的价值约为800亿卢布<sup>80</sup>。

1986年8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远东——先后视察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哈巴罗夫斯克、纳霍德卡和阿穆尔河畔共青城。他在那里看到的情况是,“改革”尚未到达远东。戈尔巴乔夫断言:“当官做老爷的人本能地或者有意识地轻视改革。”<sup>81</sup>正是在那里,在远东,戈尔巴乔夫开始公开指责国家管理系统的“中间环节”有缺陷,消极怠工。戈尔巴乔夫从远东回来后,在政治局会议上抱怨说,报刊闭口不谈缺点,有些人念念不忘安德罗波夫时期,党的干部应当调整。他还说,一些准备参与改革的人心存疑虑,他们总是说:“会不会走向深渊。”许多地方组织的作风没有改变,因循守旧<sup>82</sup>。

戈尔巴乔夫尖锐批评中央的一些部、政府的经济部门以及党的机关。他认为,国内没有反对“改革”的政治反对派,但是有保守主义,有因循守旧的思想。沃罗特尼科夫在回忆1986年9月25日的政治局会议时写道,正是在那时戈尔巴乔夫宣布了“炮打司令部”的口号<sup>83</sup>。

政治局成员的矛盾越来越大。矛盾一直存在——关于怎么做和应当做什么的争论此起彼伏,争夺影响力和权力的斗争始终未停。主持苏联部长会议的政治局委员、主持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的政治局委员同他们的“党监”之间的争吵是常有的事。最后,还有复杂的人际关系。不过,政治争论却是异常罕见的。<sup>84</sup>

在1986年10月27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苏共中央收到的来信问题时,爆发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政治辩论。

戈尔巴乔夫向政治局委员们通报说,有些来信尖锐批评食品不足,人们因出现议价商店怨声载道,同样的国产商品在那里卖高价。他还

说,地方上有人指责他搞自己的“个人崇拜”。酒精饮料和肉制品提价使人们恼火。“今年九个月内,中央委员会收到 8000 封反映工业品和食品贸易问题的来信、471 封反映价格构成问题的来信”,戈尔巴乔夫说,“比去年全年还多。有不少写给我本人的措辞激烈的信”,总书记继续说道,“请看实例,一封来自列宁格勒的信:‘我,不仅我,不喜欢您推行的国内政策。说得太多!您每到一个城市,讲的话好,也正确。听着很开心,但是现实中什么也没有!我们的生活改善了吗?我们的工作有进步吗?……与非劳动所得斗争的指示也是这种情况。一开始抓得好。可是现在呢?和谁斗争?和用自己的劳动生产蔬菜和水果的人斗争。为什么?对那些该挨斗的人却不动手……’” 440

要不再看一封来自莫斯科没有署名的信:‘您的乌托邦式的拯救俄罗斯的计划使我们对党的政策完全绝望。请清醒地看一看,国家走到了什么地步。贪赃受贿、投机倒把盛行。这会使我们的祖国全面落后和崇拜资本主义生活方式。您说‘加速’、‘加强’,可这不过是些空洞的毫无根据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变得越来越像被拔都毁灭的罗斯<sup>①</sup>……’”

听完这番话后,葛罗米柯开始发言。他的讲话层次分明,详细具体,显然不是即兴发言。

“首先谈意识形态工作,它应当完全符合我们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葛罗米柯说,“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放任自流,哪怕是在个别地方。而且必须记住:在意识形态问题上,没有比党、党中央及其政治局更高的裁判员。显然,使用警察的方法在这里不适用,必须首先使用信念和解释的力量。但是,毕竟不能回避一个现实:想让我们回头重新评价过去,再次对斯大林、工业化和集体化提出异议的人在我们这里并没有绝迹。这简直不能容许……”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看来,当年对阿赫马托娃、茨韦塔耶娃和曼德

---

① 拔都——蒙古汗,成吉思汗之孙。1236 年率蒙古军远征包括罗斯在内的东欧和东欧,使各国遭受严重破坏,后建金帐汗国。——译者注

尔施塔姆有些残酷。但是,也不能像现在这样,把他们变成圣像。列宁非常善于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我们应当向他学习。英明的列宁教导过高尔基,向他证明我们不能有菩萨心肠。当然,我们也不能有菩萨心肠。这里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政治局委员们前不久想必看过分发给大家的一个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尼科诺夫(A. 尼科诺夫——全苏农业科学院院长、农业科学家——作者)建议为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 A. 恰亚诺夫、H. 康德拉季耶夫、A. 切林采夫和 H. 马卡罗夫恢复名誉。难道能这么干吗? 这是些十足的富农阶级辩护师,列宁反对他们,尽管他们断言,说他们的思想在制定我们的合作化计划中能派上用场。我在讲授政治经济学时,亲自揭露过这些打着保护富农和农庄经济旗号的可怜的理论家。看到了没有? 现在有人建议我们为这些资产阶级伪科学家恢复名誉。当然,这是不能答应的。总之,在对这些问题作决定时,我们应当格外谨慎、冷静。必须善于正确地评价过去”。

葛罗米柯公开反对“新思维”,例如,他不同意在报刊上进行树立没有斯大林迫害的社会主义新形象的初步尝试。还有一件事——政治局起草了一个关于成立继续为政治迫害牺牲者平反委员会的决定,此事已通知了葛罗米柯<sup>85</sup>。他的发言证明,他反对这个决定。

441 戈尔巴乔夫陷入了左右为难。葛罗米柯的威信很高,但总书记不能对他让步。“你们亲眼看到了,”戈尔巴乔夫在总结时说,“我们这次讨论是在相互信任和坦诚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家谈到了苏共中央和政治局的活动,谈到了我们的方针和许许多多现实问题。主要目的在于消除我们在评价基本战略方面存在的分歧,深刻理解这一基本战略不是即兴之作,也不是灵感。这是党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有科学依据的立场,是党的战略路线。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看到除此以外任何令人信服的选择……改革方针触及社会生活本身,触及今天和明天亟待解决的问题,触及大量内外政策问题”。

戈尔巴乔夫一再强调必须“力求正确解决每一个与为苏联人民服务有关的问题。……因为大多数人民的生活远非阔绰,还不富裕。是

的,我们解决了涉及人的社会地位的主要问题。我们给了人民劳动权、受教育权、居住权、保健权(尽管这方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以及基本生存权——能在和平中生活的权利。这是我们给予人民的最主要的东西。但是,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还很落后。新的任务,加速和改革的任务,使所有这些问题更加尖锐地摆在我们面前,产生了不少需要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复杂问题。”

但是,戈尔巴乔夫不打算同意葛罗米柯的观点。他继续说道:“是的,在这一方面我们有一些顽固不化的人,他们把经济和投资搞糟了——可以说把人民的必需品供应搞瘫了……而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些人甚至不让讲新话,不让讲成绩。我想,我们还会碰到这种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可怜理论家,而且不止一次碰到。他们把主要心思放在加强党对整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戈尔巴乔夫全面抨击了葛罗米柯,因为在他看来,原先的政治局成员“把经济搞糟了”,“把供应搞瘫了”,而且还想做“可怜的理论家”(显然是影射葛罗米柯曾经说他青年时代教授过政治经济学)。使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戈尔巴乔夫—葛罗米柯联盟破裂了。矛盾更大了,再用辞职和打发去领养老金的办法已经无法解决。

戈尔巴乔夫执意推行的国家验收产品制度没有得到支持。11月底,沃罗特尼科夫和雷日科夫在政治局内批评国家验收制度,说它是官僚主义的,凭空臆造出来的。而戈尔巴乔夫则执意坚持实行国家验收制度。

政治局内的争论仍在继续。在12月4日的会议上,坚持提高国内物价的部长会议(支持这个主意的有戈尔巴乔夫、雷日科夫、索洛缅采夫、尼科诺夫、穆拉霍夫斯基和比留科娃)的观点与激烈反对的利加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和谢瓦尔德纳泽的立场发生了冲突。反对者断言,在国内2500万居民月收入不足50卢布、5000万居民月收入不足80卢布的情况下不能提高物价。双方的争论非常激烈,戈尔巴乔夫不得不承认:“政治局内有严重的政治分歧。”为了不使矛盾激化,他建议取消部长会议提出的问题,不再讨论,“但是已经到了分裂的边缘”<sup>86</sup>。

442



这样做在策略上是无可非议的。问题在政治局内搁置起来了。其实,经济问题依然没有解决:要不要提高物价?

经济问题在政治局会议上又研究过数次。12月11日,雷日科夫汇报起草完毕的社会主义企业法草案。根据这项法律,企业实行领导人选举制,一长制与民主管理相结合,成立劳动集体委员会。在政治局内对以下问题产生了争论:什么是生产企业的选举制?部起什么作用——批准劳动集体的决定或者劳动集体的决定为最终决定,部能不能撤销它?劳动集体委员会和工会两者的职能是什么关系?在国内实行低价格、所有原料部门靠国家补贴的情况下,企业能不能实行自负盈亏和全面经济核算?

许多担心后来被证明不无道理。该法律通过后,企业领导人选举程序过于烦琐,管理部门与劳动集体委员会产生对立,从而成为工业部门危机现象和局势不稳定加剧的因素。

12月25日,政治局通过了另一个重要决定——关于成立合资企业程序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讲话时指出,关于成立合资企业的决定是必要的。不过条款应兼顾我们和合伙人的双方利益。产品应当面向出口。必须认真研究社会反应和制造社会舆论。

戈尔巴乔夫走上苏联最高职位已经一年半了,这一年半使人思量:好的口号为什么变不成现实?苏共党史中对这个问题有现成的答案:问题在于干部!“实现新的政治方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必须更换中央和地方的干部”,戈尔巴乔夫的战友、改革的思想家之一瓦·安·梅德韦杰夫解释形成的局面时说,“需要不受旧的观念、框框和工作方法束缚的新人……”<sup>87</sup>

1986年秋,准备专门召开苏共中央全会研究党的干部政策。全会经过了长时间的认真筹备。筹备工作由戈尔巴乔夫亲自领导,筹备小组的成员有: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拉祖莫夫斯基、卢基扬诺夫、博尔金、拉祖莫夫和比克宁。筹备阶段要解决的最重要问题有两个,其一——推行干部政策的原则,其二——实施干部政策的方法。过去一年半中,党的领导方针发生了重大变化,党机关中究竟有多少人忠于被

称为“改革”的方针呢(请读者注意,一开始为数不多)。所以,这次中央全会被称为《关于改革和党的干部政策》的全会并非偶然。

党不止一次改变自己的方针,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果”作斗争时改变过,与赫鲁晓夫的“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作斗争时改变过,与勃列日涅夫的“停滞”作斗争时改变过。忠于新领袖一直是干部政策的基本原则。实施干部政策的方法,通常可能是让不合意的党内领导干部退休,如果其行为不符合“上层”旨意的话。自上而下的垂直管理系统,多年来一直正常运行,直到现在它仍基本上保留。不过,实施这一政策的方法第一次发生了根本改变。由于深信戈尔巴乔夫体现了民主化过程,进一步加深这一过程会巩固戈尔巴乔夫及其拥护者在苏共领导中的阵地,于是出台了全新的干部更新方法。

主要的新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全会必须确认共产党员能直接差额选举“一把手”——从基层组织的书记到州委书记和共和国的党组织书记。从理论上讲一直实行的是这样的选举,但实际上,从基层组织到任何一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都不是通过直接投票选举的,而是根据党组织的规模,在党总支、党委、党委常委或者政治局会议上“商定”的,实质上,上一级党机关的批准已经预先决定了这种任命式的选举。另一个新方法是选举过程处于社会监督之下。“公开性”获得了政治意义。允许公开批评成了检验党内职位候选人是否符合“改革”思想的办法。

毫不夸张地说,这两种新办法都是革命性的。苏共领导人有史以来第一次试图放弃由上级任命干部的原则,即放弃影响国家生活各个方面最为重要的手段。苏共领导人希望依靠媒体的社会舆论、依靠普通共产党员的选票作为干部“清洗”的手段,并通过差额选举实现“清洗”,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完全没有先例的。

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们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手段。

另一个问题出现了——国内和党内危机现象的原因在哪里?谁应为此承担责任?这个问题绝不是修辞性的问话,也无须对其进行哲学式的议论。这个问题的辩论突然发生在1987年1月1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当时正在讨论全会关于干部政策的报告稿。争论是由报告中的

以下措辞引起的：“首先是由于主观方面的原因，苏共中央和国家领导人未能及时、充分地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和社会中危机现象增加的危险性……”<sup>88</sup>

叶利钦建议应该具体说明是哪些领导人。他说，国家发展停滞、受阻，当时的政治局成员是有过错的，并建议给他们每一个人作出个人评价<sup>89</sup>（请注意“停滞时期”新组成的政治局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本人、葛罗米柯、谢尔比茨基、阿里耶夫、索洛缅采夫、沃罗特尼科夫，而谢瓦尔德纳泽、多尔吉赫、杰米契夫和切布里科夫那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显然，把笼统的提法如此深化和具体化，把“法不责众”原则改成追究个人责任，没有得到赞同。叶利钦认为，报告中对改革的评价过高，负面现象在国家生活中还很强大，而且对近几年，对“四月以来的”<sup>①</sup>这几年，应以更加批判性的态度进行评价。他认为，国内许多地区变化很小，而且党中央机关仍保留着过去“压制式”的工作作风。

在开始的讨论中有人建议“不算老账”。谢瓦尔德纳泽不无心机地试图逃避责任，为自己同伙开脱，他说：“当年政治局没有合议制度，决定是由少数几个人作出的，没有通过政治局。”<sup>90</sup> 戈尔巴乔夫表示“反对在评价过去中把事情搞成评价前几届领导成员和党中央成员。对于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政治结论以及为未来汲取教训”。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进度缓慢的原因在于干部政策和管理机构的错误<sup>91</sup>。

政治局内的这次争论非同寻常。如果说在此之前政治局内最激进的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以雅科夫列夫为首的“智囊团”，那么，现在政治局成员中则出了一个竟然敢于批评他们的立场、坚持更加激进立场的人。戈尔巴乔夫针对叶利钦说了一番话：国家需要改革，而不是折腾干部，这是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在莫斯科所做工作的评价。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双套马车散伙了。这对叶利钦是个有力打击，因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所必不可少的靠山没有了。

---

① 此处指苏共中央 1985 年四月全会以来。四月全会提出了改革的战略方针。——译者注

戈尔巴乔夫没有宽恕叶利钦的发言。第二天,他给沃罗特尼科夫打电话说,叶利钦的做法是讨好干部、许愿、算旧账,莫斯科的情况没有好转……<sup>92</sup>这个电话预示着一点——戈尔巴乔夫想摆脱让他不快的人。被摆脱的人有吉洪诺夫、格里申、库纳耶夫……现在轮到了叶利钦。

1987年1月27日至28日召开了被称之为“关于改革和干部政策”的中央全会,后来它被评价为改革时代最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表明了戈尔巴乔夫和国家政治领导人继续改革的意向。戈尔巴乔夫的报告重申了“社会中危机现象增长的危险性”<sup>93</sup>,并力图指出这些危机现象产生的原因。为此,戈尔巴乔夫追叙了历史,对他称之为停留在 445  
30年代和40年代立场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进行了尖锐批评。总书记在阐述改革性质时,认为它首先是完善社会主义的新阶段,而完善社会主义应当依靠群众,依靠发扬民主,依靠加强经济,依靠坚决地转向科学。

也有反对这一立场的人。当时的苏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州委第一书记И.波洛兹科夫、织布厂厂长B.戈卢别娃等一些代表在全会上的发言中,都有批评新闻界的内容。他们认为,新闻界越过了客观性界限,给国家过去的历史“抹黑”。

干部政策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党内差额、无记名投票选举问题,在全会上得到了一致赞同。还通过了一个关于召开战后第一次党的代表会议的原则性决定。干部队伍也发生了变化:Д·А·库纳耶夫被撵出苏共中央政治局(详见下文),米·瓦·齐米亚宁被撵出中央书记处。亚·尼·雅科夫列夫成了政治局候补委员,阿·伊·卢基扬诺夫和尼·尼·斯柳尼科夫成了中央书记。

### 社会主义应当是什么样的

“改革”的全部热情——致力于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实现“真正的”、“没有被‘个人迷信’和‘停滞’变形了的”社会主义。势必提出一

个问题:这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中央一月(1987年)全会对社会学家的尖锐批评成为探索“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刺激因素。这种探索仅仅依靠高级党校和社会科学院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研室、依靠苏联科学院的那些因循守旧的意识形态研究所是难以完成的。

文学则不同。意识形态控制的削弱、诗人尼·古米廖夫被恢复政治名誉以及一些流亡作家的作品被准许出版,使20年代和30年代的文学重获新生。米·布尔加科夫、安·普拉托诺夫、鲍·皮利尼亚克、H. 别尔别罗娃、B. 霍达谢维奇、E. 扎米亚京、安·阿赫马托娃、鲍·帕斯捷尔纳克等作家的作品先后面世,他们的作品对国家过去的描述与历史学家的记叙大相径庭。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大量按自己观点揭示国家历史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包括:阿·雷巴科夫描写30年代莫斯科的书,书中的主要人物不仅有“阿尔巴特街的孩子”,而且还有斯大林、基洛夫和叶若夫等政界人士,苏联读者正是在这本历史小说中第一次看到了他们的名字;瓦·格罗斯曼的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不仅展示宏大的史诗般战争场面,而且让人们比较并找出苏联和纳粹德国的国家机器运转过程中的政治相近性;阿·别克的小说《新任命》通过艺术手法分析了苏联的经济,该书的主人公、经济学家Г. 波波夫给苏联的经济组织原则下了定义,说它是与市场关系风马牛不相及的“行政命令制度”;A. 普里斯塔夫金的书向读者讲述了北高加索人民被赶出家乡的故事;丹·格拉宁的小说《顽固分子》讲述的不仅是受迫害的遗传学家H. 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的命运,而且是30—70年代祖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小说还讲述了他们与当局的关系……

在这一阶段,中长篇小说、文章和回忆录取代了专业的苏联社会史学研究,因为它们讲述了大多数读者前所未闻的事实。与此同时,被斯大林镇压和因持不同政见遭受迫害的事实潮水般涌向社会。

从以往历史中找出某个正面理想人物的尝试引人注目。刚刚大肆颂扬过列宁,颂扬他对不同政见有度量,会争论和说服自己的政治反对派(举出他在准备和签署布列斯特和约时的做法作为实例),现在突然



冒出了 B. 索洛乌欣的文章,他在文章中通过援引资料,把列宁说成是无端残酷的人,说他在西伯利亚流放时,用枪托打死被泛滥的河水赶到小岛上的野兔,以此取乐;还出现了有关列宁在 1922 年将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驱逐出国方面所起作用的资料。把尼·伊·布哈林理想化有较多的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斯蒂文·科恩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把布哈林理想化,但是,一个软弱温和的“集体化社会主义”维护者的形象,与他作为肃反委员会审判庭成员所起的起用,与他所说的“从枪毙至劳役的强制措施是用资本主义时代的材料培养出共产主义人类的一种方法”一番话不符合<sup>94</sup>。托洛茨基的情况更糟,当然,他是反对斯大林的,但是,他在组织“红色恐怖”、消灭“阶级敌人”和在顿河“没收哥萨克财产”方面的作用显而易见。

寻找过去的理想人物并不顺利。公开性急速越过了允许的界限,使读者产生了离经叛道的念头:难道需要社会主义吗?这种结果是公开性的创造者们没有想到的。1987 年春天在总书记那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切布里科夫抱怨说:“集体化和没收富农财产的问题也被翻出来了。所有这一切都是作为负面的东西,作为反人民的罪行提出来的。甚至大战的胜利也被歪曲。权威机构必须准确无误地分析历史事实。”<sup>95</sup>

但是,“权威机构”及其学者没能赢得公众的注意。《莫斯科新闻报》、《论据与事实》周报、《文学报》、《消息报》以及《星火》、《新世界》、《我们的同时代人》等刊物登载的有关所谓历史“空白点”的文章,压倒了学术刊物上纯学术性的专著和文章。讲述国家往事的书,是文学工作者写的,而不是专业史学工作者写的。原任《共产党人》杂志部主任后任莫斯科历史档案研究所所长的尤·阿法纳西耶夫是历史学改革的拥护者,该所关于祖国历史“空白点”的公开讲座轰动一时,Ю. 鲍里索夫教授题为《斯大林——个性与象征》的演讲被安排在讲座的开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者在责骂自己的论敌——作家和政论作者忘记了社会主义价值、不懂历史的同时节节败退。阵线变得十分分明。科学院和作家协会于 1988 年春组织了题为《史学家和作家论文学和历

史》的会议,试图以此消除分歧<sup>96</sup>。

从会议的发言中不难找出几个左右整个交锋的话题。首先是几个作家个人的观察与思考,它无情地批判了官方史学。上过前线的作家维·阿斯塔菲耶夫这样评价 12 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说他作为前线战士,“经历的是完全不同的战争”,指责历史工作者说:“我们历史上……没有见过如此伪造和粗制滥造的作品”。文学评论者 A. 兰希科夫在政治局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作出决定之前就指出,党内根本没有过“右倾”,是斯大林杜撰出来的。

史学工作者分化了,其中一部分人指出,史学研究领域存在严重缺点,存在过去埋设下来的“意识形态地雷”,阻碍了史学研究的正常发展。例如,研究卫国战争史的 B. 波利卡尔波夫说,1965 年,党中央科学部部长谢·帕·特拉佩兹尼科夫(苏联科学院史学部通讯院士——作者)指示不再提“个人崇拜”概念,他在这一方面有足够的权威。显而易见,这不能不影响到苏联历史的研究。研究美国问题的专家 A. 富尔先科注意到,党的思想家彼·尼·波斯佩洛夫 1949 年提出的某些论点至今仍被研究苏美关系史采用。

不过,史学工作者阵营中也有不同的声音——指责自己的论敌外行、诋毁过去、忘记了社会主义价值……

新闻界的强大压力、公众对不久以前事件的普遍关注,促使政治局成立了政治镇压受害者平反委员会。这是苏共中央政治局(以前称主席团)为此目的第三次成立这样的委员会。1956 年,维·米·莫洛托夫领导的委员会做这项工作,其后是工作至 1963 年的尼·米·什维尔尼克委员会,现在,1987 年 9 月 28 日,平反委员会第三次出现,由米·谢·索洛缅采夫领导。进入该委员会的有雅科夫列夫(后来由他领导委员会)、切布里科夫、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博尔金以及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格·卢·斯米尔诺夫。委员会的活动既有政治意义,也有道义意义。从政治上说,这意味着与最坏的传统,即过去的镇压制度决裂,道义上的意义在于恢复正义和无辜获罪的人的权利,表明现政治局成员的活动与二十大的思想之间存在着

继承性。

1987年11月2日,戈尔巴乔夫在隆重纪念十月革命70周年会议上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里面谈历史的部分篇幅很长。后来戈尔巴乔夫本人冷静地对它作了评价:“……报告中有局限性的痕迹。有些东西我们有意识地决定不提……报告经过充分斟酌,依我说有些地方非常谨慎,但是,两方面的‘极端人物’都不满意。一些人认为,批判性地分析过去是‘抹黑’……而另一些人则强调说,他们的期望值更大”。戈尔巴乔夫在原地踏步不前,必须完全与过去决裂。应当指出,戈尔巴乔夫在指出斯大林“及其亲信在党和人民面前犯下的大规模镇压和违法”罪行后,马上强调说,“斯大林为首的党领导核心……在思想斗争中捍卫了列宁主义,制定了社会主义建设初级阶段的战略和策略。”<sup>98</sup>这种“从一方面说……从另一方面说……”的立场,与早在1956年形成的党的传统做法没有太大差别。

1988年3月13日,80年代中期<sup>99</sup>最受欢迎的报纸《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了列宁格勒一大学教师H. 安德列耶娃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再度引起对有关过去历史的争论。这篇文章出现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成了一个重要的政治现象,难怪被人称做“反改革力量的宣言”。有关这篇文章引发的争论我们后面再谈。现在的话题是另一方面——对国家不久前历史的态度。应当指出,化学副教授H. 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出现之前,这家报纸还登载了马列主义研究院专业史学工作者B. 戈尔布诺夫和B. 茹拉夫廖夫的一篇文章,题为《我们想在革命的镜子里看到什么?对M. 沙特罗夫的剧本〈继续……继续……继续……〉的思考》<sup>100</sup>。文章断言:“除了在最短的时间内真正跑完从落后到发达工业和农业合作化的道路外,党没有……别的选择。”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以隐晦的方式为斯大林及其领导的党<sup>101</sup>所采取的政策和方法进行解释和辩护。H. 安德列耶娃的文章与它一脉相承,除了“捍卫社会主义先驱的荣誉和尊严”的意向外,又增加了不加掩饰、直接而又公开地为斯大林恢复名誉的呼吁,而

且还带有反犹太主义色彩<sup>102</sup>。

449 文章的作者和编者在竭力“捍卫社会主义理想”的同时，触犯了改革思想家们的绝对权利，而有关过去的争论适逢政治局内雅科夫列夫与利加乔夫之间的竞争加剧，而后者又理所当然地被视为 H. 安德列耶娃文章的后台。因此，政治局不得不采取在《真理报》发表题为《改革的原则：行动中的革命思维》的编辑部文章<sup>103</sup>的方式进行表态。文章的作者断然拒绝以迫不得已和极端异常的条件为借口为过去开脱，“为政治畸形和对社会主义的罪过开脱”。文章写道：“为斯大林辩护，就是企图在我们的生活和实践中保留他的那一套方法……保留他建立的社会和国家机构……而最重要的是维护无法无天的权力。”

由最高党机关权威（包括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确认的定论式的公开评价，一时使公开支持 H. 安德列耶娃的人失去了继续争论的可能性，暂时中断了证明过去正确的尝试，彻底结束了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战。

但是，产生了另一种后果，它比政治局干涉这场历史性争论所造成的政治后果更为严重。过去有过不少这样的先例。这种后果是：在广大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目中，批判 H. 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大概是在批判党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制度全部历史的道路上迈出的最后一步。当然，这不是“改革”的领袖们有意识迈出的一步。所有这些争论都是在政治危机、经济危机和民族关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发生的，历史问题的政论作品以寻找“社会主义的理想人物”开始，最后导致否定在我国条件下作为正面理想的社会主义。

这就为公开的反共思想打开了方便之门。想限制这一过程的努力实际上并不奏效，反而变成了恼怒的抱怨，而且是不再让人生畏的抱怨。让我们以 1989 年 6 月 29 日政治局会议的“工作记录”为例，当时提出了一个问题：能不能允许亚·伊·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在苏联出版？

“戈尔巴乔夫：现在讨论出版索尔仁尼琴作品的问题。”

梅德韦杰夫:《古拉格群岛》——这本书有 13 个印张……既难读又乏味……

雷日科夫:……从列宁时代写起。这是颗定时炸弹……

戈尔巴乔夫:我们疏忽大意了,他创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时,让他接触了档案……

切布里科夫:不,没有让他接触档案。

梅德韦杰夫:他搞到了大约 300 份不同人的回忆录……

戈尔巴乔夫:问题不在于写斯大林,而在于断言他是列宁的忠实学生,继承了列宁的事业。而且还援引列宁的电报、书信。

利加乔夫:我们怎么能允许这么写列宁呢?

戈尔巴乔夫:总之,《古拉格群岛》已经摆在我们面前。我想,他未必会在某个时候成为我们毫无条件的朋友和改革者。

沙赫纳扎罗夫:应当同意出版。

戈尔巴乔夫: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让没有看过它的同志们看一看……

谢瓦尔德纳泽:我同意出版。

戈尔巴乔夫:结果成了把列宁写得越坏越好。让人民受苦受难,牺牲在战壕里……只有权力欲望……蔑视俄国人民……

雅科夫列夫:应当出版。都主张出版:作家协会、出版社……

450

戈尔巴乔夫:如此说来,只剩我们不同意了……”<sup>104</sup>

结果就是这样。党的思想家们不能控制过去。这使得社会主义理想没有了乌托邦的轻松愉快,有碍于再提出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思想或者类似的思想。建筑类似乌托邦的材料太脏,沾满了“争取光明未来的战士”活动时留下的血污。太多的人清清楚楚地看到了这一点……

## 叶利钦“造反”

苏共中央 1987 年一月全会宣布了国内生活民主化的方针,全会



决议中表现出的强劲政治开端并没有导致国家经济的起色。戈尔巴乔夫看到的主要问题仍然是,不论在部里、企业内,还是在党机关中,谁也没有以新的面貌开始工作。1987年3月24日,党的最高层领导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开会,总结对全国的视察情况。他们个人的观察结果并不令人宽慰:人们的生活条件没有改善,工业困难增加,供应糟糕……

1987年夏,全国举行地方人民代表苏维埃——地方权力机关选举。决定进行试验——准许一些选区“按照苏共中央一月全会(1987年)的规定进行投票,即准许差额选举。中央书记Г.拉祖莫夫斯基1987年6月29日<sup>105</sup>呈送的一份报告对试验进行了初步总结:选民对州、边疆区代表投反对票的人数是以往选举的9倍,当局第一次遇到大批选民不到选举站,其中包括“无故”不到选举站投票的情况。而且9个选区第一次没有搞成选举。这还不是政治风暴,不过已能听到远处的头几声雷鸣。

除了这些情况外,再看一看地方选举委员会记下的选票上的手写文字。按照苏联的政治传统,有的选民把选票当成“上访信”,把认为必须向当局说的话写在选票上。这些选票被宣布为废票,但是手写的文字被复制下来,送交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到党的权力部门的“主管机关”。之后,通常把最典型的手写文字汇总,上报党的最高领导层。1987年夏天的情况也是这样的。

我们援引几段文字:

“我赞同禁酒令,赞同关心单身者,赞同与吸毒和吸烟作斗争”。

451 “我希望像60年代一样:食品供应正常,不抢购酒”。

“我们请求增加合作社商店的商品品种”。

“但愿蔬菜供应好一些”。

“整顿砂糖贸易”。

“必须尽快改变生产物美价廉商品方面的落后状况”。

“请多生产鞋子和毡靴”。

“货架上儿童用品少”。

“商店里很多事不像话，售货员卖东西缺斤短两。什么时候整顿好？”

“再开些储蓄所。加强对玻璃器皿的验收”。

“生活必需品什么时候停止涨价？”

“为什么没有平价肉制品，只有议价肉制品？国家生产的产品究竟在哪儿？”

“我们要求公平分配肉制品——凭票”。

“日用品行业和其他为居民服务的部门应该接受消费者的监督”。

在莫斯科，选票上的手写文字比较政治化：

“什么时候不再讲空话？什么时候按照苏共中央决定干实事？”

“只有一个要求——把非党人士任命到领导岗位上。共产党人从小喽啰到大人物都是骗子”。

“只有一个政党就不会有任何好结果”。

“我们请求保护‘纪念’协会的爱国运动”。

“权力归苏维埃，而不是归党。从阿富汗撤军”。

在一些加盟共和国，选票上的手写文字让人警觉。在乌克兰，有些选票上写道：

“我们实行一党制，应当实行多党制，使任何一个党不能压制人民代表苏维埃”。

“选举——纯粹的形式主义，我们的代表在苏维埃中没有地位。实际上全部权力在党机关和执委会，它们决定一切，代替别人决定”。

“关闭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电站不用核燃料，改用天然气或者石油。停止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将其用于苏联的电站”。

在爱沙尼亚：

“苏联军队——滚出阿富汗。停止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新殖民主义”。

“俄国人——滚回老家去！”

“我不相信苏联司法机关”。

我们对这些文字不作评论。它们充分说明了苏联社会的状况、社会政治化的发展和社会矛盾的激化。

1987年5月28日,莫斯科发生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德国飞行爱好者马蒂亚斯·鲁斯特驾机闯入苏联领空,长时间地沿列宁格勒至莫斯科的十月革命铁路线上空飞行,最后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对面红场附近的瓦西里耶夫斯基坡地上顺利降落。他对民警说,他是来见戈尔巴乔夫的。

防空系统、莫斯科卫戍部队和军队丢尽了脸面。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称,“我们的高射炮兵十次瞄准了鲁斯特,并且进行了照相发射,百分之百命中”。但是,他们没有收到实弹射击的命令,因为最高统帅,即戈尔巴乔夫本人,这时正在柏林,谁也没有出来承担责任。不久前的韩国客机悲剧<sup>①</sup>记忆犹新,束缚了防空军官的手脚。最后决定将鲁斯特送交法庭审判(切布里科夫认为,最好将他送回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让他在汉堡受审;戈尔巴乔夫坚持在苏联审判)。国防部长谢·列·索科洛夫因履行职责不力,被解除职务,稍后又被免去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德·亚佐夫接任他的职务),约150名将军和军官受审判或被免职<sup>106</sup>。

军界认为,小青年鲁斯特驾机飞到莫斯科而军方却无所作为,使戈尔巴乔夫这个军事大国的首脑蒙受了耻辱,他因此大为恼火。此外,正如某些军方人士所认为的那样,他想甩掉国防部长谢·列·索科洛夫元帅和防空军司令员亚·伊·科尔杜诺夫元帅,因为他们同美国的谈判中持强硬立场,包括反对取消在建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雷达站。

1987年4月23日,政治局开会讨论苏联的财政状况,由尼·伊·雷日科夫作报告。他指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财政有赤字,坚持提高经济管理中的经济杠杆作用,其中包括所有材料生产部门转为全面经济核算制,减少国家住房开支,实行级差房租,修改价格政策,改变财政

---

① 指韩国民航客机因误入苏联领空被苏空军击落。——译者注

部、国家银行和国家价格委员会的职能。苏联国家价格委员会主席 B. 帕夫洛夫与他争论,指出原料和劳动力价格压得过低,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开采亏本。按帕夫洛夫的意见,这些部门转为经济核算是不可能的<sup>107</sup>。

20 世纪 60 年代初形成的经济问题,其中包括苏联依赖在国外大量购买粮食,在“改革”年代不仅依然存在,而且日益加重(见表 1)。

表 1 1983—1988 年苏联粮食进出口情况 (百万吨) 453

年份	苏联粮食 饲料资源	进口	进口率 (%)	出口	出口率 (%)
1983	122.9	29.6	24.1	3.3	2.7
1984	125.8	52.8	42.1	3.0	2.4
1985	124.9	36.4	29.1	3.0	2.4
1986	123.6	29.1	23.5	3.2	2.6
1987	123.8	33.8	27.3	3.0	2.4
1988	104.4	28.0	26.8	3.2	3.1

国家的财政问题更为严重。应当指出,这些年财政状况急剧恶化(见表 2)。

表 2 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计算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 (10 亿美元)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收入	支出
共计	30.0	44.3	26.4	40.2	26.8	45.4	31.2	56.3	30.3	43.2
差额	-14.3		-13.8		-18.6		-25.1		-12.9	

苏联经济状况的恶化促使政府对外举债。经济的麻醉剂——石油被另一种更为危险的麻醉剂——依赖外债取而代之。国家的外债开始急剧增长(见表 3)。

表 3 以可自由兑换货币计算的苏联债务和偿还贷款情况 (10 亿美元)

年份	债务	偿还贷款	
		共计	其中偿还长期贷款
1981	24.7	6.3	0.7
1985	27.2	7.5	0.8
1986	39.4	15.9	0.9
1987	38.8	19.2	0.9
1988	40.8	20.0	0.8
1989	46.3	21.5	0.8
1990	57.6	11.8	0.7
1991	52.2	14.8	1.0

454 偿还贷款很快就使国家陷入债务泥潭。国家的实际财政状况被严加保密,经常使用变换优先经济项目和口号的方法掩盖财政困难。自1988年起,“加速”这一口号换成了另一个口号——“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投资被不断压缩,优先投资项目被安排在消费部门,集中投资减少了30%,冶金业和燃料发电综合体的投资减少了40%。

1987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了专门研究经济改革构想的全会。全会召开前进行了精心准备。一个由学者和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组成的小组在市郊的沃伦斯基宾馆筹划,小组成员有著名的经济学家阿·格·阿甘别吉扬、Л. 阿巴尔金、С. 西塔良、尼·佩特拉科夫、加·波波夫。如同全会的报告所说,经济改革的实质是提高企业的经济自主性。全会报告的编写者认为,通过企业法<sup>108</sup>后企业就能在经济上自主,而经济上的自主又会使经济管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戈尔巴乔夫在全会讲话中一再敦促各部、部门、部长会议和苏共中央提高责任心。全国开始了经济改革。采取了放弃国家统一供应的措施。国防工业开始转型,由于转型,它们只好为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生产设备。工厂企业的权能扩大了,出现了合作制企业。银行系统进行了改组。

全会上还传出了毫不掩饰的对改革感到不安的声音。鲍·尼·叶



利钦的发言让人另眼相看,他说:“两年过去了,可是改革却没有深入”,他批评了中央书记处的工作,用他的话说,书记处的工作没有丝毫变化,仍旧是文牍主义,仍旧是行政命令。考虑到书记处的工作由利加乔夫领导,难以不把叶利钦的话理解成对他的直接批评。

列宁格勒市委书记尤·菲·索洛维约夫则抱怨该市出现的一些非正式的联合组织<sup>109</sup>。

正是在这几个月中,全国开始涌现出一些社会性的联合组织,它们把保护因各种改造工程正在销声匿迹的历史古迹作为自己的任务。在列宁格勒,掀起了一场保护市中心的“阿斯托利亚”旅馆(谢尔盖·叶赛宁结束自己生命的那座旅馆)的群众运动;在莫斯科,对毁坏祭祀山的不满日益高涨,按照计划,该处要再建一座纪念伟大卫国战争胜利的大型纪念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在市中心广场建大型旅馆的计划激起了民愤……这些抗议破坏历史古迹的群众运动迅速政治化,不仅受到了广泛的舆论支持,而且伴随着支持“改革”、谴责“阻碍”这一进程的声音,甚至出现了一些民族主义的观点。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当局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运动。 455

六月全会还通过了另一项重要决定——召开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代表会议应当根据一月全会的决定筹备,即采用民主程序——按差额原则提出候选人和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组成发生了变化。雅科夫列夫、斯柳尼科夫和尼科诺夫成为政治局委员。原国防部长索科洛夫元帅被解除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接替他的是新任国防部长德·亚佐夫。

1987年5月6日晚,莫斯科马涅日广场上发生了在当时来说人数众多的游行。300—500人打出了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暗中破坏改革的人!”、“给‘纪念’历史爱国主义协会以法律地位!”、“我们要求面见米·谢·戈尔巴乔夫和鲍·尼·叶利钦!”、“我们要求恢复祭祀山!”。这是莫斯科真正的一次群众性游行,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的“纪念”协会组织的。

叶利钦得知这次游行的消息后,没有对游行采取传统的手段——警察、警棍和逮捕。他建议游行的领头者和他见面,说明自己的要求。会见持续了大约两个小时<sup>110</sup>。他们向叶利钦抱怨莫斯科的历史古迹遭破坏、文化美国化,抱怨建筑师准备建新纪念碑,实际上毁坏了作为首都历史性象征物之一的祭祀山。有趣的是,“纪念”协会的头目们把这一切都归罪于“改革反对派”。

叶利钦首先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承认根据1935年的莫斯科发展规划毁坏了两千多处古迹。他也作了争辩,证明莫斯科现在保留下来了大约9500处古迹,修复工程量增加了一倍,对如何处理祭祀山和计划在那里修建胜利纪念碑的问题,他作了思考,没有拍板。他还承认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应当制定举行集会的办法……<sup>111</sup>

叶利钦会见游行破坏了全部戒律,使他的地位变得非常脆弱。第一,他竟然亲自接见抗议者<sup>112</sup>,从而开了危险的先例。第二,经他同意,首都的一个官方礼堂成了举行自由辩论的场所,成为不掩饰抵触情绪者辩论的场所。第三,在莫斯科的知识界,“纪念”协会被视为一个民族主义和反犹太主义组织(作者认为,这完全符合事实!),这使叶利钦背上了黑锅——他为什么会见他们?

数年之后,叶利钦回答自己的对手说:“假若游行者的头挨了警棍,这正中我的反对派下怀。”<sup>113</sup>

456 8月6日,叶利钦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说,集会和游行的申请数量增多,因此,必须制定集会游行办法,对举行集会和游行的人数、地点和时间作出规定,需要由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作出决定。由于近70年来国内所有的游行和集会都是在正式节日五一劳动节和十一月七日的十月革命节举行,所以叶利钦的建议非同寻常。

戈尔巴乔夫“原则上”同意,建议准备提案<sup>114</sup>。

关于莫斯科游行问题的争论,成了叶利钦与利加乔夫关系恶化的又一个导火索。中央“第二书记”本来就习惯于经常插手不直接属于他权限内的问题,他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以及俄罗斯部长会议首脑沃罗特尼科夫的关系中发生过这种情况。叶利钦也遇到了这种

情况。而叶利钦试图和利加乔夫对着干。叶利钦在六月全会(1987年)上对中央书记及其工作方法的批评就是针对利加乔夫的。1987年9月10日,戈尔巴乔夫去外地休假后不久,他们之间的公开冲突在政治局会议上爆发了。用党内的行话说,当时利加乔夫留守“当家”,主持政治局会议。

在9月10日的会议上,利加乔夫开始气愤地指责叶利钦,说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未取得莫斯科市委常委会同意,未与政治局协商,擅自制定、通过而且在《莫斯科晚报》上公布了举行集会和游行的规定。“规定是谁讨论的?和谁讨论过?因为早在8月6日,当你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向政治局提出这一问题时,戈尔巴乔夫让你研究并提出关于举行各种示威、集会和游行办法的议案。你同意了。可做的却是另一套。要知道,莫斯科市劳动者代表苏维埃通过的办法没有界限……”

叶利钦反驳说:“这是苏维埃的事。我可是在政治局报告过,已经‘予以同意’”。

利加乔夫再次对叶利钦发起攻击:“不对。是原则上同意起草举行集会和游行的规则。戈尔巴乔夫说:请提出议案,可您放任自流。需要有一个全国统一的规则。”<sup>115</sup>

支持利加乔夫的政治局成员认为,叶利钦的过错是明显的:他蓄意越过政治局为全苏联制定规则,因为莫斯科无疑开创了这样的先例。而且,他“比谁都冒尖”。而这样的过错是不应该饶恕的。

政治局作出了决定:沃罗特尼科夫、叶利钦、卢基扬诺夫、拉祖莫夫斯基与法学专家和内务部一起,“把问题研究好并提交政治局讨论”。

之后成立了“工作小组”。

之后讨论小组工作结果并起草了给政治局的报告。

之后政治局向苏联最高苏维埃建议,发布有关举行集会和游行规则的相应命令……

9月12日,叶利钦致函在南方休假的戈尔巴乔夫,抱怨他作为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工作得不到支持。叶利钦写道: 457

“我总是尽量讲出自己的观点,即使它与别人的意见不同。结果出现了越来越多不遂心的场面。如果更确切地说——由于自己的风格、耿直性格和个人阅历,我成了个没学会在政治局内工作的人。

我不能不提几个十分原则的问题……

关于叶·库·利加乔夫同志的工作作风。我的看法(还有其他人的看法):尤其是现在,它(工作作风)不适用……他的工作作风正在变成中央书记处的作风。一些‘外省’的党委书记也不加分析地照搬。不过,最主要的是整个党受损失……

党组织落后于所有重大事件。这里实际上没有……改革……

思维和语言是革命性的。可是落实,确切地说是在党内落实,——还是以前的那一套,见风使舵,繁琐哲学,官僚主义,大轰大嗡。这就是党内嘴上革命和与政治立场相去甚远的实际做法不一的根源所在……

……依我看,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作者)的工作不成体统,没有水平。他张口闭口是‘托木斯克经验’,让人心烦。

中央六月全会后,包括9月10日在政治局会议上他对我的攻击,我只能说是别有用心的中伤。执委会关于游行的决定——这是莫斯科市的问题,而且解决得对。我不明白成立委员会有什么作用(后来叶利钦解释说,他指的是利加乔夫成立的中央书记处检查莫斯科工作委员会——作者)。

……中央政治局成员中某些同志的立场让我难过。他们是聪明人,所以迅速‘站到了另一边’。难道能够自始至终地相信他们?他们比较合适,请原谅,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总觉得他们对您更合适……

……我不合适,我明白这一点。和我共事也不容易……今后,在目前的干部状况下,牵扯到我的问题会增多,会妨碍您的工作,我不希望出现这种情况。

……这就是促使我向您提出请求的几个原因和动机。这不是软弱,也不是胆怯。

我请求免去我的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和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

委员。请视本函为正式辞呈。

我想,我没有必要直接向苏共中央全会提交辞呈。

此致敬意。

鲍·叶利钦

1987年9月12日”<sup>116</sup>

叶利钦的信——党的历史上最令人惊奇的文件之一。他自愿要求从党的最高层职位上退下来,这是没有先例的。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信是一份政治文件。他称自己引退的理由是不同意党的政策——口头上大喊拥护改革,而实际上,在他看来依然如故。他认为,利加乔夫是党机关固步自封的代表人物。从叶利钦的这封信可以看出,他已经心灰意懒,对国家的改革感到失望,他不再相信戈尔巴乔夫了。叶利钦的这封信表现出他的巨大个人勇气,近似于绝望、不顾一切的勇气。攀上党的最高层令人难以置信地困难。而丢掉职位,脱离“党的战友们”意味着身败名裂,成为被正统的追逐功名者鞭挞的政治罪人。我们应当指出,叶利钦在自断后路时使用了一些势必冒犯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理由。叶利钦说,由于“自己的耿直性格和个人阅历”,不适合继续在政治局内工作,这番话语意双关,给人以愤世嫉俗,惟我独尊的感觉。 458

这是件丑事,戈尔巴乔夫想把它变成“家丑”。他当时也顾不上这事。他正在利瓦季亚写《为了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为了我们国家也为了全世界》一书。对哈泼—罗、西蒙—舒斯特两家出版公司承担的义务,使戈尔巴乔夫滞留在克里木,在那里再次校订由助理为他撰写的书<sup>117</sup>。叶利钦把电话打到克里木,向戈尔巴乔夫询问他请辞的结果,戈尔巴乔夫避而未答,建议十月革命节后再议这事<sup>118</sup>。戈尔巴乔夫当着他的一伙助理怒气冲冲地说:“他对改革进程、书记处工作和其他许多事都不满意,请求解除他在政治局的工作。他在莫斯科的工作搞得一团糟,现在寻找替罪羊。”富有经验、善解自己“上司”心意的瓦·博尔金指出:“我了解总书记的性格,我认为,问题不在于即将到来的十月革命节,而在于他想在这封信的问题上凉一凉叶利钦,消掉他



的火气,在自己想接见的时候而不是他请求的时候接见这位市委书记。”<sup>119</sup>

戈尔巴乔夫没有回答,这件事被搁在一边,一切照旧。叶利钦照常上班,照常在政治局争论,其中包括争论戈尔巴乔夫即将在十月全会所作报告的内容<sup>120</sup>。

## 1987年苏共中央十月全会

10月21日,苏共中央全会开幕,会议议程包括“与十月革命70周年有关的问题以及某些日常的问题”<sup>121</sup>。戈尔巴乔夫作了报告,这也许是他政治生涯中最好的一个报告。戈尔巴乔夫首先用大量的篇幅回顾国家的历史,内容大多取自政治局档案馆新发现的一些文件,对一些历史事实进行了重新阐释。之后列举改革所取得的“暂时还微不足道的成就”,对各部门领导人、州委书记和中央机关提出了具体意见。

报告一结束,主持会议的利加乔夫礼节性地问道:“……也许谁有问题?没有?好的。没有问题?既然没有问题,那么我们就商量一下”。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有问题。

459 主持会议的利加乔夫同志:那么我们就商量一下。我们要不要讨论?

众人:不需要。

主持会议的利加乔夫同志:不需要。

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同志有话要说。

主持会议的利加乔夫同志:现在由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同志发言。请讲,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sup>122</sup>

显而易见,戈尔巴乔夫坚持让叶利钦发言。叶利钦想不想在全会上发言?时任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的瓦·博尔金回忆说:“我不知道他(叶利钦——作者)是否真的想在全会上讲什么话。只有主席团成

员才看得见。鲍·尼·叶利钦坐在第一排,许多人可能没有发现他举起手。”<sup>123</sup>坐在主席团席的沃罗特尼科夫写道:“在政治局候补委员们坐的第一排,鲍·尼·叶利钦不知怎么犹犹豫豫地举起了手,然后又放下了。”<sup>124</sup>

谁在全会上发言,向来由主席团说了算。是戈尔巴乔夫把叶利钦拉出来发言的。

这件事叶利钦本人是这样写的:“我要指出,我在信中请求解除我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和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务。我还表示,不用由中央全会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过我们(他与戈尔巴乔夫——作者)在全会后见面的话。仅说过‘稍后’见面而已……戈尔巴乔夫一直不作答复。……我明白了,他决定把问题提到中央全会会议上,已经不是一对一地谈,而是在那里安排一场与我的公开谈话。”<sup>125</sup>

作者在研究苏共中央十月(1987年)全会资料时产生了一个印象:叶利钦并没有想在全会上发言,他没有准备发言。“我去参加全会没有准备发言,只是在纸上草拟了七个要点……”既然逼他讲,他就发言了。

后来,许多与会者把他的发言说成是一派胡言。它也不可能被说成别的,在克里姆林宫的全会大厅里即席发言向来没有好结果。

叶利钦重申了9月12日给戈尔巴乔夫信中的许多内容。顺便说一句,倘若他准备发言的话,当然会把这封信的复印件带上。叶利钦批评了利加乔夫,指责他“作风霸道”,说上届党代会上提出的任务(在两三年内解决所有的问题)没有完成,因此,提出新任务时必须慎重。他说改革的发展起伏不定,要么像一月全会前夕那样高涨,要么低落,人们对改革的信心下降;应当汲取历史教训,党内的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听不进批评意见的人手中。叶利钦说,政治局内许多人对总书记歌功颂德。他最后请求退出政治局,说他已经递交了辞呈<sup>126</sup>。

就激进程度而言,叶利钦在十月全会上的发言要比他在9月辞呈中的话和缓。但是,他对改革的进程作了评价,说改革没有带来企盼的  
460

六月全会上讲过,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提到过,在十月全会上重申了这种看法。适逢重大的节日——十月革命70周年即将到来,戈尔巴乔夫刚刚在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报告,从这一角度看,这简直是反革命。我们认为,这样的结果正中戈尔巴乔夫下怀,他需要令人信服的理由指责、贬低叶利钦,然后把他赶出去,而不是让他个人要求退休,不是让他“平平安安”地离开政治局。

在公开的速记记录上,叶利钦的全部讲话不到两页,而谴责他的讲话有48页,这是竞相指责、侮辱叶利钦的48页。首当其冲的是利加乔夫,他指责叶利钦说的话与事实不符,说什么苏联人民对改革的信心低落,这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谢·约·马尼亚金认为,叶利钦的讲话说明他政治上不成熟,因为叶利钦入党晚。他说:“这是(叶利钦)必然的过程和合乎规律的结局”<sup>127</sup>,必须“从严对待”。阿斯特拉罕州第一书记列·亚·博罗金自鸣得意地回忆说,自己在党内的仕途始于斯大林时代,指责叶利钦临阵逃脱。莫斯科州委书记瓦·卡·麦夏茨认为叶利钦“标新立异”,在市委主持全体会议时也是如此,经常会见外国记者和外交官。

叶利钦的同乡、和他一起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过的雅·彼·里亚鲍夫、尼·伊·雷日科夫(他的发言比叶利钦的讲话多一半)和根·瓦·科尔宾也卖力地指责叶利钦。

所有政治局委员的发言无一例外地指责叶利钦。上面提到的雷日科夫说:“他这样说是离间政治局”,叶利钦的“政治虚无主义”开始滋长,讨好外国<sup>128</sup>。沃罗特尼科夫第一个对叶利钦使用了“政治上有奢望”一词,这等于指责。切布里科夫的发言根据充分,考虑缜密,批评中肯。他的发言给人以早有准备的印象。发言中也有套话——叶利钦只为自己着想,不为党、国家和莫斯科着想。“你鲍利斯·尼古拉耶维奇不爱莫斯科人。如果爱莫斯科的话,你今天无论如何不会在这个讲台上这样发言”。切布里科夫指责叶利钦没有弄清莫斯科存在的问题,说他的整个发言为西方的研究分析者帮了大忙<sup>129</sup>。雅科夫列夫对发生的全部事情作了明确的鉴定:叶利钦的“讲话在政治上是错误的,

在道德上是站不住脚的。政治上之所以不对,是因为他不正确估计国内局势,不正确地评价苏共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所持的……立场。……之所以不道德……是因为他把自己个人的奢望、个人的利益置于全党利益之上……”依他的看法,叶利钦热衷于左的革命辞藻和自己的个性<sup>130</sup>。

谢瓦尔德纳泽既找到了优美动听的词句赞扬戈尔巴乔夫的报告, 461  
也为叶利钦的发言找到了评语:“怎么评定它呢? 已经有人使用过各种评语,例如保守主义。我想补充一点:处理问题简单化。不过更确切地说,最切中要害的评语也许是:无责任心。对党无责任心,对人民无责任心,对朋友、同事和政治局的同志们无责任心。”谢瓦尔德纳泽转身对叶利钦说,“您想让中央委员会与莫斯科市的党组织发生冲突,这是不可能得逞的。不可能,不可能得逞!”谢瓦尔德纳泽想以此博得全会参加者的掌声<sup>131</sup>。

枯燥地大谈党内团结的索洛缅采夫,在发言的最后突然提到了“莫斯科话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了议论和一些评价:莫斯科人并不赞同这样的做法。……您怎么竟敢对个人的工作和政治局的工作说三道四?”<sup>132</sup>

颇有名气的工人(施工队长)、多年的苏共中央委员弗·安·扎特沃尔尼茨基作了初步总结。他称,全会在叶利钦身上花的时间太多。“譬如,我们当年在收拾赫鲁晓夫时很快就搞定了。”<sup>133</sup>

戈尔巴乔夫作了最后总结。他原本想让叶利钦讲话,但是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最后自己讲了起来。他在讲话中说,他在南方时叶利钦给他发去一份辞呈,不过,他们商定过了十月革命节再谈这事。“……当时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而是需要行动。同志们,确实没有空闲时间”,戈尔巴乔夫肯定地说,是叶利钦违反了协议,在全会上发言,接下来才是大家纷纷指责叶利钦<sup>134</sup>。

这次全会通过的专门决议指出,叶利钦的发言“在政治上是错误的”。责成苏共中央政治局和莫斯科市委“结合中央全会上形成的意见,研究鲍·尼·叶利钦同志要求解除其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职

务的问题”<sup>135</sup>。

决定倒是通过了,但是没有急于公布,因为有顾虑。虽说宣传完全公开化,但是全会上的发言却秘而不宣。全国传言渐起,使叶利钦的讲话很快具有传奇色彩,添加了子虚乌有的生动细节。出现了伪造版的叶利钦讲话,凡希望叶利钦说的话,都说成出自他之口。其中有:揭露官场特权,批评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说她不仅处处陪着丈夫,甚至陪着他视察军舰,按照俄罗斯军事传统,是禁止女人上军舰的。还说她干预国家事务。还说什么叶利钦在全会上亲自面见戈尔巴乔夫,劝他不要让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干预他的工作,不要让她天天打电话作指示。

462 当时,党的领导人大张旗鼓地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11月2日,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了例行的庆祝会,戈尔巴乔夫在会上作了题为《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的报告。庆祝会开了两天。节日很快达到高潮——11月7日举行了大型阅兵式和莫斯科群众游行,晚上是克里姆林宫的招待会……

一件非常事件打断了正常欢度节日。11月9日晨传来叶利钦企图自杀的消息<sup>136</sup>。他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更确切地说是在办公室隔壁的休息室里,用剪刀刺向自己的心脏。锋利的剪刀插入肋间,从心脏旁边滑过。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断言:“叶利钦佯装自杀未遂。”<sup>137</sup>这种说法没有根据,没有说服力,是戈尔巴乔夫的自我辩解。

戈尔巴乔夫按照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这次事件。他写道:“当时,11月9日,必须马上召集政治局委员们开会。医生再次确认,伤势对生命和健康没有任何危险。……讨论了所有这些情况后,决定必须立即提出叶利钦的工作问题。我亲自打电话和他谈了话。为了不提让他不太高兴的自杀话题,我开门见山地说,情况我都知道了,应当定个日期举行莫斯科市委全体会议。

我觉得他有些不知所措。

——干吗这么着急?给我开了一大堆药……

——给你开药是为了让你镇静,维持健康,推迟召开全会没有必



要。关于你在中央全会上的发言,关于你的健康,莫斯科街谈巷议。所以还是打起精神到市委来,自己把全部情况讲一讲。这对你有好处。”

戈尔巴乔夫正是在同叶利钦的这次谈话中告诉叶利钦不要再参与政治。

戈尔巴乔夫与一个心情还很沉重的人、一个按任何医学标准衡量都是患者的人进行这样的谈话,要求叶利钦11月11日,即企图自杀两天后就直面莫斯科市党委会全体成员,这很难说不是对党内造反者的残酷惩罚和镇压。

叶利钦试图求助于医德,求助于医生所作的希波克拉底誓言<sup>①</sup>,但是被卫生部第四总局为党和国家上层人物看病的医生毫不客气地拒绝了:“我们有自己的希波克拉底!”<sup>138</sup>

11月10日,政治局定下了接替叶利钦出任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的人选,他是列·尼·扎伊科夫。

11月11日,莫斯科市委举行全体会议。戈尔巴乔夫亲自在会上定了调,与会者竞相侮辱被“灌”了药用汽车拉到会场来的叶利钦<sup>139</sup>。

11月12日,星期四,政治局举行例会。像往常一样讨论了许多问题,包括商讨要不要发表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市党委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最后商定不全文发表,而是以摘要形式发表。现根据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讲话如下:

“第一,……叶利钦实质上对改革发起了进攻,对改革的速度和性质表现出不理解。更有甚者,他从蛊惑人心的立场出发,提出了关于政治局和书记处工作的问题,受到了全会的一致谴责。总而言之,应当首先对他进行政治谴责,然后再谈第二个问题,即所谓递交辞呈问题。必须指出,大家并不支持他,虽说当初支持过他,那是在最初阶段,高呼口号的时候,后来就不再支持他了。”

还有一个问题要商量。我们对叶利钦发言的评价是:攻击政治局,

---

<sup>①</sup> 医生行医前保证遵守医生道德守则的誓言,据传守则出自被称为“医学之父”的古希腊医师希波克拉底之手。——译者注

试图搞乱全会的工作,在政治局怎么工作的问题上误导全会。你们认为要不要提这一点?

**杰米契夫:**不用提。

**戈尔巴乔夫:**我认为这一点正好说明他的冒险主义。如果不提的话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中央全会开得那么激烈?大家都知道,他有问题可以在政治局提,可他跑到全会上含沙射影。这种做法引起中央委员们的愤慨,于是他们群起而攻之。因此,为了表明不存在势力强大的反对派,在报道时不应回避这个问题。总之,他不过是个冒险主义者。这么说来,所有这些内容都以摘要的形式发表?

**政治局委员们:**同意。”<sup>140</sup>

但是,把叶利钦开除出党的最高领导班子所产生的效应完全不是这场运动的组织者所希望的那样。如果说以前这种惩治确实会使一个人从政界消失,现在的情况则不然。被罢官的叶利钦马上变成了一个游离于有70年历史的国家政治生活规则之外的政治人物。他成了国内所有不满者的领袖,成了前不久还是其领导成员的那个党的政治反对者。在一个没有反对党的国家,叶利钦成了未来运动的领头人。反对派的领袖人物出现了,许多原先只有不满情绪的人作好了成为反对派的准备,为未来年代的激烈政治斗争和政治对抗创造了重要前提条件。这是“叶利钦案”制造者们所没有想到的。

## 民族问题

苏联已经解决了民族问题,国家的整个官方宣传几十年来一直这么说。民族问题似乎被挤到了社会生活的边缘,仅以所谓民族残余的形式表现出来。在颂扬“列宁主义民族政策”成就的文章、电影和书籍中从来不提这方面的缺点。

464

但是,自80年代后半期起,政治中的民族因素突然有力地显现出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几乎是第一次记录下了这种情况。1986年12月1日,为筹备全会,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召开了一次关于民族问题

的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切布里科夫坚持必须将民族问题提交即将召开的全会讨论。他说,民族知识分子的情况令人不安,有许多“翻老账的麻烦事”。他的建议并无新意——“了解干部政策”、“实行民族干部交换”<sup>141</sup>。

民族关系日趋紧张的最初迹象似乎是偶然发生的。1986年5月,苏共中央书记处听取了关于雅库特民族冲突问题的汇报。冲突的导火线是雅库茨克滑冰场上发生的口角,口角发展成雅库茨克大学雅库特族大学生和俄罗斯族青少年三天的斗殴。学生们要求内务部副部长B.杰季科夫惩办肇事者。学生们认为当局没有必要的措施,于是在州委大楼前示威,有近600人参加。示威者喊出了“雅库特——为了雅库特人”、“俄国佬滚出去”的口号,扬言砸碎内务部大楼,痛殴了一名俄罗斯警察。学生和青年在大学的礼堂集会,会上发言的人指责俄罗斯人搞沙文主义,说俄罗斯人强占了雅库特。

在中央书记处关于这场风波问题的专门决议中,有以下套话:“这些不良表现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没有用苏联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教育青年,思想工作严重薄弱,忽视了民族关系中的某些积垢。党没有关注民族交往问题。对不尊重其他民族的事实往往没有及时给予坚持原则的批判。州党委对一部分社会学家、大学教师以及作家中的不健康情绪没有采取坚持原则的立场。他们相互指责,对雅库特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缺乏科学评价、相互扣民族主义帽子,甚至相互侮辱,所有这一切都对大学生和青年的情绪产生了负面影响……”

中央书记处的文件虽说有些意见是公正的,但是没有阐明促使青年、其中包括青年学生参加民族主义运动的深层原因。

雅库茨克事件成了“第一声警钟”,但是人们没有听到。

1986年12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Д.艾·库纳耶夫因年龄和健康原因提出辞职。这次辞职基本上是戈尔巴乔夫一手造成的,他不止一次发牢骚说,他收到许多来自哈萨克斯坦告发库纳耶夫的上访信。戈尔巴乔夫说,他和库纳耶夫谈过接替他的人选一事,库纳耶夫对哈萨克斯坦部长会议主席

465

努·纳扎尔巴耶夫的评价不好,还说“现在没有可以推举的人(共和国第一书记人选——作者),尤其是当地的哈萨克人。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应由俄罗斯人出任第一书记。”<sup>142</sup>苏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推荐(实质上是任命)最初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工作、后任乌里扬诺夫斯克州党委第一书记、最后任格鲁吉亚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的根·瓦·科尔宾任该职。显然,下一步只剩下技术性的问题了。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常委会和中央全会先后批准了对科尔宾的任命。

但是,这一次旧模式失灵了。12月16日晚,当宣布库纳耶夫退休和科尔宾的任命之后,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开始出现骚动。骚动最初是在阿拉木图国立戏剧艺术学院集体宿舍的学生中爆发的。学生们抗议任命俄罗斯人担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外语学院支持戏剧艺术学院的学生。

次日,即1986年12月17日上午,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该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值班员说,勃列日涅夫广场上聚集了几批青年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行动小组随即出动。广场上有一群(200多人)手举标语喊口号的人。骚动是在民族主义口号下进行的。人数迅速增加,很快达到了数千人,大部分是青年。警察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人试图驱散集会者,集会者使用棍棒、石头和钢筋还击。

为了镇压迅速在全市蔓延的动乱,动用了内卫部队和内务部学校的学员。在1986年12月17日—19日动乱期间,两名内务部工作人员和一名示威者死亡,1200多人接受治疗,其中包括774名警察和内务部队军人,数十辆公务车被烧毁或砸坏。

12月17日后半夜,阿拉木图紧急召集党机关和经济部门积极分子(700人)开会,工业企业也开始开会。莫斯科的政治领导人要求追查肇事者。12月18日,政治局讨论了这个问题,认为可能有某个政治人物背后操纵风波,纳扎尔巴耶夫和库纳耶夫被扣上了这样的罪名。对形势的分析还是没有摆脱老一套的答案——“干部政策错误”。更高层次的政策,即民族政策没有引起怀疑。

其实,哈萨克斯坦的矛盾是多年形成的。表面上看,是几十年来在

哈萨克斯坦进行核武器试验造成的严重生态问题,在该共和国能明显感觉到生态灾难的后果——咸海濒临绝境;哈萨克斯坦北部有许多大规模的冶金综合体。在共和国的北方工业区,俄罗斯人居多数,占全部居民的37.8%;在南方,哈萨克居民占多数。在农业中,两种基本经济类型并存——“垦荒时期”形成的大规模粮食生产基地(在生产粮食的国营农场中,除哈萨克人外,还有俄罗斯人、日耳曼人、战争时期特殊移民的后裔和乌克兰人)和哈萨克人传统的游牧业。另外,在共和国南部,棉花种植业和瓜类作物种植业也很发达。哈萨克斯坦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煤炭开采这类亏损部门的投资,为了维持共和国南部的农田灌溉,也需要大量资金。几十年来,当地的上层社会中形成了独特的权力分配方式,它在很大程度上考虑到了各个“茹扎”(20世纪仍保留的部族组织)的传统存在。

官方的宣传不厌其烦地说,哈萨克斯坦是成功地解决了民族问题的典范。但是,从70年代末起,从该共和国迁出的俄罗斯人数量大增。1979—1988年,有40万俄罗斯人从哈萨克斯坦移居俄罗斯(占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人总人口的6.6%)<sup>143</sup>。80年代,像格德良在乌兹别克搞侦查一样,对地方领导人的贪赃舞弊进行了侦查,这更加引起了当地上层的不满。所有这一切,使哈萨克斯坦的局势同中亚其他各共和国一样,远非安宁祥和。

1987年夏,克里木鞑靼人更大的抗议行动开始了,他们坚持迁回自己的故土——克里木,要求在克里木恢复克里木鞑靼自治区。这一冲突看似简单——恢复鞑靼人根据列宁的法令获得的那种自治,但是它证明了恢复“历史正义”非常复杂。这样的解决方案必然与大量的其他问题“相抵触”。首先会产生一个问题:改变克里木的法律地位,取消赫鲁晓夫1954年将克里木划归乌克兰的决定。而这样做又会挑起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冲突。克里木鞑靼人被驱逐出故乡后的四十多年中,克里木的居民成分发生了变化。以任何方式建立克里木鞑靼自治区都会触及那里居民的利益。伏尔加河德意志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sup>144</sup>



历史上的疙瘩没有解开。

更大规模的无疑会影响苏联命运的民族冲突在外高加索爆发了。冲突的原因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在阿塞拜疆境内拥有自治州地位的一块飞地)的法律地位之争。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亚美尼亚要求恢复统一的风潮 1987 年就开始了,至 1988 年 2 月,已经发展到特别大的规模。毫无疑问,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应作专题研究。本书只阐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是怎么影响苏联政治局势发展的。

467 亚美尼亚人认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是 1923 年在土耳其的外交压力下从亚美尼亚被抢走的。这一冲突在苏联存在的整个时期内一直潜伏着。亚美尼亚人从来没有忘记 1915 年的血腥事件,没有忘记 150 万同胞死于土耳其族穆斯林之手。“公开性”时期,这个话题重新出现在亚美尼亚一些报纸的头版,旧冲突有重新爆发的可能。亚美尼亚人恢复统一的要求成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亚美尼亚人的政治要求,实际上,这一要求得到了亚美尼亚最高权力机关的支持,后来又在法律上得到了它的支持。1 月份,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向苏共中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递交了将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的请愿书。苏共中央和最高苏维埃接受了请愿书并允诺予以“研究”。人们把官僚主义的惯用套话当成了希望的征兆,甚至深信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族的要求会被考虑<sup>145</sup>。这引发了苏联有史以来第一次苏联范围内的共和国间冲突,而且具有民族冲突的形式。大批阿塞拜疆人开始逃离亚美尼亚,首先是从卡范和梅格里地区逃离。

从 2 月初起,亚美尼亚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开始出现群众性的游行、示威以及企业和机关内的集会,提出的口号是保卫“改革”和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回归亚美尼亚。2 月 20 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苏维埃紧急会议通过决定,请求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作出把自治州从阿塞拜疆划归亚美尼亚的决定。这又引起了阿塞拜疆的抗议,该共和国首都巴库及其工业卫星城苏姆盖特举行了游行示威,口号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州——阿塞拜疆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2月21日,星期日,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应对迅速恶化的外高加索局势。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中央的政治对手不是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分子,而是因联邦当局无力为它们的利益解决问题而被激怒的共和国。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党的最高领导层表示,坚决不考虑对方的立场。阿塞拜疆首脑巴吉罗夫甚至拒绝讨论这个问题。苏联政治领导人考虑到两个共和国领导人的利益互相排斥,认为维持现状为上策。但是,这种立场哪一方都不满意。这样一来,当地共和国掌权的上层人物和苏联当局的矛盾,第一次明显地反映出来。共和国的党领导人第一次成了苏联当局的政治对手。

应当指出另一个重要情况:从1988年2月起,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成了电视台、很快出现的纪录片以及无数报刊文章的必谈话题。这是苏联第一个被广泛关注的族际冲突问题。全国都在关注事态的发展,毫无疑问,这场冲突成了未来民族间冲突以及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运动之间冲突的“实验室”。

2月26日,戈尔巴乔夫的告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人民书发表。他指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尖锐而且充满矛盾,导致了紧张局势,甚至导致了超出法律范围的行动。”他呼吁“本着我们全国正在实施的改革和革新政策的精神,集中力量改变业已形成的局面,解决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积累下来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等方面的具体问题。”<sup>146</sup> 468

就在当天,2月26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亚美尼亚创作界知识分子的代表——作家3.巴拉扬和女诗人西·卡普季克扬。戈尔巴乔夫讲了他对局势发展的担忧。他说:“围绕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发生的事情,这是在我们后背上捅了一刀。劝阻阿塞拜疆人颇费苦心,而最主要的是开了危险的先例。全国有几十处潜藏着民族对立危险的温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示范作用会促使那些不敢采取暴力行为的人也做出不明智的事情。”西·卡普季克扬控诉了亚美尼亚族在另一块飞地上(纳希切万)受到排挤,回顾了过去的悲惨事件,不客气地向戈尔巴乔夫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回到亚美尼亚后,能否说总书记坚决保

障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权利？”

“我再说一遍，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只是别提领土问题。”<sup>147</sup>

现在可以有把握地说，戈尔巴乔夫只会见亚美尼亚公众代表，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未来问题，这样做很不明智，尽管总书记在会见中说的话是正确的。在冲突双方彼此越来越不信任的情况下，他有意无意地表明，莫斯科在冲突中站在其中一方的立场上。假若政治领导人明确支持一方，那是可以站在其立场上。但是他并没有支持哪一方！结果令人遗憾的是，就在次日，2月27日，出现了新的强烈的不稳定诱因。

这一天，在巴库的卫星城苏姆盖特镇开始了对亚美尼亚人的血腥暴行，暴行一直持续到2月29日。在1988年2月29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国防部长德·亚佐夫元帅在汇报发生的可怕事件时，讲了这次野蛮暴行的详细情况。据官方资料，32人死亡，100多人受伤，一些房屋和汽车被烧毁，许多亚美尼亚人的住宅遭洗劫，不少人遭殴打、强奸。一些10至100人不等的团伙在市内流窜，寻找下手的对象。当地警察没有干预，而实际上包庇暴徒，被拘留的20个人中16人被释放。

根据国防部长亚佐夫的命令，一所军校的学员开进苏姆盖特制止动乱。亚佐夫讲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细节：“两个女人的乳房被割掉，一个女人的头被砍下来，一个女孩被剥了皮。一些学员看到这种场面后吓得晕倒了。”<sup>148</sup>

469 政治局内发生了争议：要不要在苏姆盖特宣布戒严？Г.拉祖莫夫斯基坚持调兵和戒严。亚佐夫犹豫不决：如果实行戒严，就意味着部队有权开枪。不过他倾向于实行戒严。

戈尔巴乔夫像往常一样，试图找出某种妥协办法。从以下记录中可以看出他的建议。

“准备好武器，但不开枪。要不然会朝街上的游人开火。

亚佐夫：我们发枪但不发子弹，装运子弹的装甲车单独在后边行驶。我们这么干，这么组织。

戈尔巴乔夫：枪和子弹分开。

亚佐夫：如果你们拍板，那么我就下达这样的命令。

政治局委员们：同意……”

戈尔巴乔夫回顾了前不久解决阿拉木图冲突的经过。米·谢·索洛缅采夫反驳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当站着一排军人的时候，反应是不一样的。那时是站着一两排工人，您知道，情况完全不一样。在阿拉木图，工人纠察队制止了激进分子和流氓分子。当我按您的吩咐飞到阿拉木图的当夜3时，我们召开了共和国积极分子会，至清晨5时，就组织好了工人纠察队，他们制止了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党中央组织和党务工作部副部长E.拉祖莫夫支持他的意见：“在阿拉木图，工人阶级解决了全部问题。那里是另一种情况，制止聚会的是工人纠察队，基本上是俄罗斯族工人。”

听完了亚佐夫元帅的汇报后，米·谢·戈尔巴乔夫面带苦涩地说：

“需要情报，可是搞不到，这一方隐瞒不报，另一方也隐瞒不报。都被捆住了手脚，无所作为。阿塞拜疆党中央的同志和亚美尼亚党中央的同志——两边的同志这次都卷进去了。他们都知情。”

葛罗米柯：“总的来说，没有加足马力工作。”

戈尔巴乔夫：“不，是加足了马力工作，只是朝另一个方向干。讨好这种情绪，当了它的俘虏，他们已经难以自拔……”<sup>149</sup>

不能认为苏联政治领导人对危险性估计不足。他们制订了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 调入部队，防止抢夺武器。
- 控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
- 切断国际电话和电报渠道。
- 防止外国记者进入亚美尼亚。

但是，戈尔巴乔夫没下决心采取紧急措施，他说：“我们把希望寄托在政治解决上……在阿富汗我们一事无成，而现在怎么办？发动一场国内战争？”<sup>150</sup>他对苏姆盖特事件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两个共和国领导人还有可能达成协议仍抱有希望。

3月21日,政治局开会讨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以及使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局势正常化的一些紧急措施”问题。戈尔巴乔夫在通报不断扩大的冲突时,介绍了“卡拉巴赫”委员会的工作情况,该委员会已经变成亚美尼亚非正式的权力中心。他说:“如果我们站在社会主义利益的立场上,站在我们多民族国家的立场上看待这些事件,那么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政治意义,它关系到国家兴亡。我想,这个问题远远超出亚美尼亚的范围。我们面临解决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事关我们多民族国家的命运,事关我们由列宁奠定的民族政策……几十年来我们一直治标不治本,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只要息事宁人就行。现在我们也许没有估计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应当坦率地说,同志们,对危险性估计不足。要知道,我们在克里木鞑靼族人和波罗的海沿岸各民族中也碰到了类似的情况……”<sup>151</sup>

由此看来,很难不同意戈尔巴乔夫的说法。他在提到列宁的民族政策时,没有使用党内惯用的套话。列宁的民族政策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这一民族政策的基础是:按民族组建共和国的原则,民族有自决直至分离的权利。列宁提出了由不同民族组成苏联的模式:15个民族有权成立加盟共和国(阿塞拜疆族,亚美尼亚族,白俄罗斯族,格鲁吉亚族,哈萨克族,吉尔吉斯族,拉脱维亚族,立陶宛族,摩尔达维亚族,俄罗斯族,塔吉克族,土库曼族,乌兹别克族,乌克兰族,爱沙尼亚族)。一些民族有权在加盟共和国范围内建立自治共和国(巴什基尔族,布里亚特族,塔吉斯坦族,鞑靼族,卡尔梅克族,卡累利阿族,科米族,马里族,摩尔多瓦族,奥塞梯族,乌德穆尔特族,楚瓦什族,阿布哈兹族,图瓦族,卡拉卡尔帕克族,阿扎尔族和雅库特族)以及“两个民族”(!)有共同组建自治共和国的权利(车臣和印古什两个民族,卡巴尔达和巴尔卡尔两个民族)。

此外,有些民族只能建立民族区,如科米族、汉特族、曼西族、德意志人和楚科奇族。从历史学家和民族学家的观点看,很难或者说未必能解释清楚,为什么如此解决民族问题。完全忽视了这样的事实:在一些自治共和国和加盟共和国,有俄罗斯人,而且在有些地方占多数;另



外,从民族“等级表”中实际上排除了许多民族,在有些地方,他们的人数远远超过那些被赐予建立自己国家机构权利的民族。

把给民族作某种“品行鉴定”作为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起初建立了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和克里木鞑靼人自治共和国,后来又取消了。把车臣人和印古什人驱逐出北高加索,让邻近的民族在他们的故土上居住,后来又恩准他们返回高加索,这样的“裁决”引发了未来冲突。

叶·库·利加乔夫在这次会议上说:“最好在最短的时间内加强这两个共和国的领导”,因为“我斗胆说一句,领导人自己在很大程度上为民族主义情绪所左右”,当地党政官员和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已经不认为继续听命于莫斯科对自己有利。因为群众性的民族运动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各个党组织,对共和国党中央的领导形成了政治压力。基本上由苏共官员组成的当地上层领导试图在实践中实现列宁的“各民族有权自决直至分离”的原则(众所周知,不无成效),这是对列宁主义民族政策命运的戏弄。 471

戈尔巴乔夫指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开始影响到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局势,影响到克里木鞑靼人的要求。他痛心地说:当地党的领导人一会儿和民族主义分子勾勾搭搭,一会儿坚持要莫斯科帮助。他说:“杰米尔强在拖延时间,玩花招……昨天还是英雄,今天就打电话喊救命。”

**利加乔夫:**“说什么别人要夺权。必须调部队实行戒严!”

根据利加乔夫的建议,更换了这两个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在亚美尼亚,阿鲁秋尼扬取代了杰米尔强;在阿塞拜疆,韦济罗夫取代了巴吉罗夫。

这两个共和国的党机关不仅不阻止挑动民族不和,而且变本加厉,亲自积极参与民族主义运动。苏共的民族政策问题被提交到苏共中央十一月(1988年)全会上讨论,但是,越来越明显的是,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主义运动越来越得到党机关的支持。在苏联解体前,早在别洛韦日协定之前,党就开始依照民族原则解体。到80年代末,“苏维埃制

度的核心”(1977年《宪法》给苏共所下的定义)四分五裂了。

与此同时,冲突继续升级,成了一种“不正常的正常现象”。6月14日,亚美尼亚最高苏维埃同意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并入亚美尼亚。6月17日,阿塞拜疆最高苏维埃重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仍旧为阿塞拜疆的一部分<sup>152</sup>。

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事件的背景下,其他共和国的分裂运动也开始了。在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有人开始发难,要求公布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公约的“秘密议定书”,交出1939年至1940年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并入苏联情况的资料。1988年6月初,立陶宛成立了“萨尤迪斯”——以立陶宛退出苏联为宗旨的政治运动。1988年夏秋两季,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出现了人民阵线。这些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作出决定,宣布民族语言为国家语言,使俄语失去了国家语言地位。因为这些共和国俄罗斯人和操俄语居民的人数众多,所以这一措施被视为对“占领者”(人们开始这样称呼俄罗斯人)的歧视。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并没有正式宣布退出苏联。譬如,1988年10月“萨尤迪斯”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写道:“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主权应包括:经营管理、经济、政治、预算编制以及财政、信贷、贸易、税收、海关诸方面的政策。”<sup>153</sup>但是,在提出经济自主的要求之后,政治上分离的口号越来越响亮。

民族问题在历史和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的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显现出来。抗议缩小白俄罗斯语使用范围的一些民族知识分子,不断从白俄罗斯给中央写信。他们在1986年12月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为白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天地。在苏维埃政权的头十年,这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20年代,白俄罗斯共产党和政府遵循列宁主义原则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国家和党的机关、中小学、大学、其他学校和科研机构实行白俄罗斯化,大大促进了白俄罗斯苏维埃文化的繁荣和广大人民群众觉悟的提高。”白俄罗斯文化界人士坚持使“白俄罗斯化”进入新阶段。

他们建议“首先实施以下措施：

一、把白俄罗斯语言作为共和国党政机关（首先是教育部、文化部、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邮电部以及国家出版印刷和图书贸易事业委员会、国家电影委员会、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科学院）以及苏维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工作语言。

二、不论学校使用何种语言授课，中学必须使用白俄罗斯语言进行毕业考试（写作文），八年制学校（不完全中学）必须使用白俄罗斯语言进行毕业考试（听写）。

三、所有高等学校考生（来自白俄罗斯和苏联境外的考生除外）必须使用白俄罗斯语言参加入学考试……”

显而易见，提出上述“白俄罗斯化措施”的文化界人士并没有考虑到下述问题：为什么这个共和国的大多数居民欢迎使用俄语授课？用白俄罗斯语讲授理科课程究竟有多大好处？分离主义倾向在政治、经济和保护人权方面有什么价值？民族因素变成了盲目崇拜的东西，变成了孤立的、变成了保证地方上层人士飞黄腾达的因素。

苏联领导人无力应对民族问题的挑战。实质上，苏共的民族政策有两个理论原则，一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后来改为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原则，二是“民族自决权原则”，前者保障了苏联的统一，后者体现在按民族组成共和国上。

不难发现，两个基本原则相互矛盾。不过这些矛盾在现实政策中成功地得到了解决，其办法是恩威并施，包括坚决镇压“民族主义分子”——从加罪党的领导人，说他们在突出共和国自主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对涉嫌“列宁格勒案”的人进行镇压，让乌克兰领导人谢列斯特和白俄罗斯领导人马谢罗夫退休），到司法迫害、流放和囚禁当地知识分子以及支持民族独立的政治人士。

不过，另一些办法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首先是对加盟共和国经济的经常性补贴，既有直接的补贴，也有通过向这些共和国境内的全联盟企业拨款给予的间接补贴。加盟共和国的居民在受教育方面有很多优惠<sup>154</sup>，入高等学校就读、任命“有封号的”共和国和全联盟权力机构

的一些管理职位都有民族名额。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稳定”意味着地方上各共和国上层人物的地位有所提高。效忠中央换来的是莫斯科基本上不干预共和国事务。地方上层人物对与莫斯科保持联系很关心，因为它是资金的来源，是在联盟范围内获得权势的必经之路。

80年代，风云变幻，局势每况愈下。首先是经济危机限制了联盟预算对共和国经济的补贴和投资。毫无疑问，这个因素成了一个长期的十分重要因素。而且，格德良、伊万诺夫及其同事的侦查小组拙劣地试图用警察手段查清向全联盟纺织工业提供棉花的情况，引起了地方上层人物的愤怒。1988年掀起了一场大张旗鼓揭露“乌兹别克案”<sup>155</sup>被告的宣传运动。莫斯科当局已经无法用武力维持苏联帝国，而在确实需要采用武力时——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最初阶段，却没有使用武力。

当局面临形形色色的民族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抗议活动此起彼伏。摩尔达维亚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种情况。外高加索的矛盾则有不同性质，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矛盾，既有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也有这些国家内部的矛盾（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格鲁吉亚人与奥塞梯人）。中央在冲突中充当维持原有自治的保证人，这引起了民族主义分子的抗议。

在中亚，存在着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渗透的危险，它将置地方上层人物于死地。这里还存在着一种不信任情绪，怀疑中央政府对民族知识分子发难，无力保护地方上层人物。此外，围绕着传统财富——水源和农业用地的冲突不断发生。中亚存在着由来已久的民族冲突根源，一些人对随意将某些民族归并某一共和国（如乌兹别克斯坦的塔吉克人问题）耿耿于怀。

474 俄罗斯有数量众多的自治地区，自治共和国与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平等问题亟待解决。许多自治地区，如雅库特、鞑靼、巴什基尔，拥有超过许多加盟共和国的工业经济潜力。恢复受迫害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木鞑靼人和伏尔加德意志人的权利是个更为复杂的特殊问题。

到处都打出了反俄罗斯牌,千方百计宣传共和国“养活了”俄罗斯和中央政府的思想。在经济危机条件下,一个诱人的想法应运而生——脱离苏联,独自争取经济繁荣。

民族问题的多样化和复杂性,要求对老问题和新问题作出新的回答,要求民族政策具有连续性。联盟政权似乎措手不及,只一味地说服、开导。党和苏联政府“解决民族问题”的手段似乎不适用了。影响各共和国局势的杠杆丧失的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民族问题成了决定苏联命运的一个单独政治因素。

###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苏共中央政治局曾经希望利用党和国家机关作为推行改革政策的杠杆。但是,政治局作为苏联整个国家管理系统的中心和神经中枢的特殊作用,使每一个政治局成员比一般的国家高级官员重要得多,政治局成员也是他主管的许多党和国家机构的直接首长。因此,自勃列日涅夫时代起,就不存在总书记主宰一切的局面,他始终只不过是“平起平坐者中的头号人物”。政治局中的力量对比决定着苏联国家政策的走向。

苏联进行的最后一次社会改革尝试的特点是,这些改革长时间“自上而下地”进行,因为国家居民至少在1989年头几次比较民主的选举之前还没有影响政治生活的手段。除苏联共产党外,国内尚无任何群众性的政党,而政治运动只出现在苏联边远地区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在这种情况下,主观因素(政治局的态度,政治局成员的喜恶)有可能立即引发政治事件。

政治局全体成员一致谴责原莫斯科市委书记叶利钦并将其罢免的闹剧客观上有利于政治局内认为必须加强社会主义信念的那一派,他们是“给我们过去的历史抹黑”的反对者,对西方持不信任和怀疑的态度。不过,得到利加乔夫、索洛缅采夫、沃罗特尼科夫、扎伊科夫、葛罗米柯和切布里科夫支持的这一立场,需要在形式上予以加强——需要



党通过专门决议予以肯定。众所周知,政治局内还有另一种立场,坚持这一立场的有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雷日科夫和梅德韦杰夫,他们坚持国家必须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外交方针必须有重大变革的意见。戈尔巴乔夫必须在政治局内形成的这两派之间作出选择,他的立场对确定今后的“改革”方针具有决定性作用。

政治局内有矛盾,这是全国人尽皆知的事实。另一个情况也是众所周知的,即同时负责意识形态的两个政治局委员,都有可能直接影响两家畅销报纸的办报方针:利加乔夫影响《苏维埃俄罗斯报》,雅科夫列夫影响《莫斯科新闻报》。

3月13日,《苏维埃俄罗斯报》登载了列宁格勒一所高校毫不知名的女教师尼·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我不能放弃原则》。这篇文章是“订做的”。尼·安德列耶娃的一封短信“无意间”上了中央上访信综述通报,后被利加乔夫看中。有人“建议”《苏维埃俄罗斯报》主编B.奇金与这个作者合作撰写一篇文章。于是,该报编辑、经验丰富的记者B.杰尼索夫被派往列宁格勒。

经与安德列耶娃合作,而且再次征得订户“同意”后,一篇完全纲领式的长文出台了,它的标题引自戈尔巴乔夫的一次演讲。表面上看,这篇文章批评M.沙特罗夫的戏剧作品,作者认为,这些作品往列宁脸上“抹黑”。实际上文学批评只不过是幌子。试图提出“改革”的思想纲领,是文章的基本内容。文章作者并不否认对苏联社会进行改革的必要性,但是认为必须按照社会主义价值校正方向。所谓社会主义价值是指国家的历史方针、30—40年代的成就。当然,安德列耶娃在说这番话时,高度评价了斯大林,批判了托洛茨基主义,批判了布尔什维主义的新老反对者。应当指出,这篇与《莫斯科新闻报》、《星火》杂志、《文学报》上的暴露性“唱反调”的文章,显示出它成功地掌握了“改头换面”的批评手法——文章既援引国内尚不知道的西方文章,又提到专门档案馆公开的资料。

安德列耶娃激烈批评“左派自由社会主义”的拥护者,指责他们篡改历史,指责他们“硬要我们相信国家的过去只有错误和罪恶,却只字

不提过去和现在的宏伟成就”。“公开的或者伪装的世界主义倾向、某种群龙无首的‘国际主义’”，被称为“左派自由主义”的另一个特点。

《苏维埃俄罗斯报》的这篇文章写道：“赶时髦作品的作者打着道德和精神‘净化’的幌子，模糊科学思想的界限和范畴，利用公开性推行非社会主义的多元论……”<sup>156</sup>

文章虽反复引用戈尔巴乔夫的话，但主旨不变——矛头指向“改革的施工者”，指向提倡“公开性”和“新思维”的人，说到底是指向戈尔巴乔夫本人及其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 476

这篇文章坚决主张必须回到传统的苏联社会主义价值上去，它的原则性如同其明显的论战性以及与其报上势头日增的暴露趋势抗衡的阵势一样，是无可置疑的。

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出现在苏共中央的报纸上，况且是出现在一份“党内第二把手”利加乔夫做后台的报纸上，因而被视为“上头的指示”，念念不忘明确意识形态目标的党机关把它视为行动的纲领。况且，这种做法在中央得到了支持。一场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开始了：列宁格勒和莫斯科举行了讨论并支持这篇文章的“读者代表会议”，在一些州，党的地方报刊转载了安德列耶娃的文章。这种做法——转载中央报刊上的文章，只适用于非常重要的党的文件。转载这一事实本身证明，这篇文章被视同这样的文件。

报刊沉寂了。给人的感觉是，必须对近20年的历史进行重新评价。令人感到惊奇和害怕的是，刚刚还在大众传媒上大行其道的“公开性”不知何故蒸发了，没有任何人出面谴责这位化学女教师的文章。

戈尔巴乔夫的助理、后任中央公共部部长的瓦·博尔金回忆说，最初，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并没有引起总书记的反对，“在对公开发表的所有文章都认真分析的一班人那里，甚至可能得到了支持。”<sup>157</sup>

但是，在文章登出十天之后，形势突变。这大概是因为，利加乔夫不仅把安德列耶娃的文章当做意识形态方面的绝对命令，还把它当做行动纲领，以修改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十月（1987年）全会纪念十月革命的报告中阐述的方针，推行自己的方针，这一连串的情况引起了不安。

最后的结果是利加乔夫亲自出马和戈尔巴乔夫对着干,安德列耶娃的文章成了政治局内有矛盾和分歧的证据。

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对手开战了。对安德列耶娃文章的最初争议发生在3月23日,在全苏集体农庄庄员代表大会休会的时候。讨论并不像通常那样仅限于交换意见。3月24日和25日两天,政治局开会追究这篇闹得满城风雨的文章的发表经过。这次会议的积极参加者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说:“戈尔巴乔夫打开了话题,说这篇文章非同寻常。它带有破坏性,旨在反对改革。不清楚它是怎么出现在报纸上的。中央有没有人看过?戈尔巴乔夫强调说:据我得到的消息,有人看过,据说在发表之后甚至建议在党组织内讨论这篇文章。这是什么意思?!”<sup>158</sup>

477 戈尔巴乔夫认为,这篇文章是“反改革纲领”,它发表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之前,所以更具有危险性。

利加乔夫辩解说:文章“不是昨天”才写的,《苏维埃俄罗斯报》主编征求过中央的意见,给他的答复是——你自己拍板。登载这篇东西是编辑部自己决定的。中央没有指示在党委内部进行讨论。利加乔夫不仅辩白,还千方百计地和这篇文章划清界限。给人的印象是,他没有料到总书记会作出如此强烈的反应。

沃罗特尼科夫试图用“公开性”为文章“解脱”,说:“我们不是早已决定给编辑部发表文章的自由?”

这句话又引起戈尔巴乔夫一连串的批评:文章是挑唆性的,旨在反对“改革”。

第二天,3月25日,在分析这篇文章的政治局会议上,亚·尼·雅科夫列夫发了言。他赞同戈尔巴乔夫的评价,论证了文章“反改革”的性质以及它试图为过去的罪恶辩白和粉饰的意图。他坚持必须对安德列耶娃的观点作出公开反应。讨论的性质变得越来越明确。尼·伊·雷日科夫、瓦·安·梅德韦杰夫和爱·阿·谢瓦尔德纳泽激烈反对这篇文章。原先谨慎地为文章辩护的人现在开始和它划清界限。报纸编辑部成了替罪羊。响起了“维护政治局统一”的声音。

1988年4月5日,《真理报》发表了由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博尔金会同该报工作人员共同撰写的文章。《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的文章被说成是“反改革力量宣言”,是企图重新评价“改革”期间所做的一切。尼·安德列耶娃成了保守、非布尔什维克力量的某种象征。

发表尼·安德列耶娃文章的事件还有一些后续情况。利加乔夫虽然被留在政治局,但是他的影响力明显减弱了。他逐渐失去了主持苏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权利。雅科夫列夫的作用大增,他成了改革进程的思想家。《真理报》与《苏维埃俄罗斯报》的论战——其实,在这里与其说是论战,不如说是《苏维埃俄罗斯报》挨了国家主要党报的申斥,再次表明政治局成员对实行国内政策有不同的立场。显而易见,在这一阶段,戈尔巴乔夫是政治局内的激进派。

围绕尼·安德列耶娃文章的论战,也许是营造举行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社会政治氛围的主要大事。戈尔巴乔夫写道:“事与愿违,尼·安德列耶娃在客观上给我们帮了忙。从这个意义上说应当为她设立一个……‘阐明立场贡献’奖”<sup>159</sup>。戈尔巴乔夫开的玩笑是有充分根据的:党的领导层中保守势力的地位被削弱了。这为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极其重要的国内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分析这次党代会的工作进程和通过的决定时必须指出,它的代表是选举出来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党员大会上通过差额方式选举出来的。那些因和党机关有矛盾没有当成代表的人也应邀参加了代表会议。 478

##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

1988年6月28日,苏共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开幕,它的主要议题是讨论苏维埃政治体制的改革途径。在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实施的所有政治措施中,这可以说是最激进的改革措施。

戈尔巴乔夫在代表会议上讲话时,号召实现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社

会进一步民主化和经济变革,号召扩大公开性范围。他认为美国可能想把苏联拖入军备竞赛,从而影响国家的经济形势,他坚持党政职能和经济管理职能分家。

在他的讲话中,论证必须改革苏维埃和“恢复苏维埃权能”占有特别地位。拟在各地分别设立代表权力机构(苏维埃)和执行权力机构(执委会)。苏维埃的改革直接触及地方党机关。拟推荐苏共地方组织的第一书记出任苏维埃主席职位。这样一来,苏维埃和苏共即便不会合而为一的话,也会彼此相近,使苏共变成一个在选举中对代表权力机构有约束力的党。

建议改革中央权力机关。决定回到旧的“党的老古董”原则上去——恢复列宁时代的政治制度。建议恢复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最高代表权力机构。拟议部分代表——1500人按差额直选原则选出,另750名代表由正式登记的社会团体——苏共、共青团、工会、学术团体以及从苏联作家协会到集邮者协会的各种创作协会和爱好者联合会选出。头脑简单地指望这些受苏共控制的社会团体为党提供有保障的政治支持。

代表大会应该每年召开数次,大会代表在大会休会期间仍旧从事自己原来的工作。代表大会应从代表中选举出约400人组成的最高苏维埃,最高苏维埃成员的职责是从事立法活动。计划让所有的2250名代表都有机会作为最高苏维埃成员工作一段时间。

479 改革的形势使未来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政治作用陡升,戈尔巴乔夫本人瞄准了这个位置。因此,必须让安·葛罗米柯马上退休,腾出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职位,此事不久便在苏共中央例行全会上宣布了。

戈尔巴乔夫要求改革党的机关,缩减其职能和人员,为此拟将苏共中央机关的一部分职责移交国家机关。

在这次代表会议的众多发言中,党内两派泾渭分明。其中一派(姑且称之为改革派)当时被视为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志同道合者。顺便提及,后者主持了这次代表会议的一系列会议。他们坚持



“完善社会主义”的主张,捍卫戈尔巴乔夫的“多一点民主就多一点社会主义”的方针。

赞同这种观点的有瓦·巴卡金以及经济学家、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Л.阿巴尔金和演员米·亚·乌里扬诺夫等发言者。

不过,代表会议上也出现了另外一派,他们在发言中含沙射影地批评这种主张。作家尤·瓦·邦达列夫把“改革”比作一架升空后不知道该在哪里降落的飞机。他们指责“改革”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破旧但没有立新。他们还尖锐地批评公开性。邦达列夫说:“用报纸既能拍死苍蝇也能拍死人”,这句话博得全场喝彩。根·瓦·科尔宾随声附和,批评“露骨地攻击党的干部”、压制党内不同政见的做法。从这番话中可以看出对那样结束关于尼·安德列耶娃文章的讨论不满。莫斯科大学校长阿·阿·洛古诺夫也随声附和,反对使用“反改革分子”这样的术语和政治帽子。乌克兰作家鲍·奥列伊尼克对以下情况不满:“我们的气度并非总是高尚,在砸偶像的时候朝人民扔石头。”

鲍·尼·叶利钦的发言以及围绕他的发言开展的辩论,在代表会议上占有特别地位。叶利钦当上全国代表会议代表有悖党中央的意愿。由于乌拉尔和全国其他许多地方的党组织广泛支持他,甚至到了如果叶利钦当不上代表就以开始罢工相威胁的地步,才不得不让他参加代表会议。

叶利钦要求发言,他简直是冲上主席台的。他的发言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改革”的评价,它在许多方面与叶利钦在苏共中央十月全会上的发言相近。按他的说法,“改革”实际上没有触及党,把国家搞到危机地步的领导人们应当为自己的活动结果承担责任。他尖锐地批评了“吃不饱的官员们”的特权——他们有“专门的医院”、“特供商店”、“专门的疗养院”。叶利钦提出,党内不应当有“特殊的共产党员”。发言的第二部分涉及他本人。叶利钦请求会议代表们为他“平反”,撤销前不久中央十月全会通过的对他的指责。

但是,叶利钦想保留和部分恢复自己党内地位的努力,遭到不久前全会的“主角”利加乔夫和戈尔巴乔夫激烈甚至是粗暴的回击。对叶

480

利钦又是一片指责声，讲台上又出现了指责叶利钦一无是处的“官方雇用工人”。

对叶利钦的怨恨遮住了这场运动组织者的眼睛，他们的良苦用心完全适得其反。代表会议不是党的全会，代表会议强调的开放性和公开性使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和利加乔夫的争论全国知晓。叶利钦的发言——他对党内实行差额直选的要求、他对官场特权的批评及其想在生前而不是死后（如同苏联历史上经常发生的那样）平反的简单愿望得到了人们的支持。叶利钦昔日在党的领导班子中的同事对他的批评越多、越凶，叶利钦在社会中的个人得分就越高。“党的领导班子中的同事”只办成了一件事——他们多次把叶利钦推出党的大门。

没有过多久他们就十分懊悔了……

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最大的成果是，它为政治改革提供了起始点，为通过选举产生代表权力机构开辟了道路。这是在改革苏联社会主义制度道路上迈出的实际一步。至于后来很快就发现这个制度没有进行改革的能力则是另一回事。

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上，苏共中央机关和整个管理机构受到了尖锐批评，这一状况成了开始改组机构的起点。戈尔巴乔夫不怀疑国内许多问题是机关和官僚主义造成的，他对库宾卡镇苏维埃代表来信的反应可以说明这一问题。后者向党中央总书记反映：“镇上凡是能破坏的都破坏了——商店关了，公路没法走了……在铁路局，人们指着登有‘苏共中央政治局要闻’的报纸让主管民用设施的副局长看，要闻中说：各镇必须天然气化。他们听到的是个回答？让政治局去天然气化吧。您瞧，我们养活了这样的官僚主义！……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干部。打碎这个官场。养出了一些不干实事的人，他们只会讨好上级，对人民置之不理。”<sup>160</sup>

戈尔巴乔夫不明白，政治局决定都上了报纸，为什么还通不了天然气。昂贵的大型工程需要资金，这些资金应当有预算，而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总书记，对致使铁路运输处于这种状态，从而使车站小镇陷入绝望境地的国家预算本身负有责任，对让谁做官和为

什么让他做官负有责任。

1988年9月8日,政治局开会研究戈尔巴乔夫“关于改组党机关问题”的信。讨论表明,这次改组会产生大量复杂的问题。据利加乔夫计算,“我们应当裁减70万至80万人。仅州、共和国、区和市机关就要裁减55万人”。精简造成了机关人心动荡,官员纪律松弛,导致了本位主义情绪。雷日科夫附和利加乔夫的观点,他说得有理:“体制是从30年代起,在50年中形成的。从理论上说一切显而易见,但实际做起来是复杂的。”沃罗特尼科夫担心国家机关不能行使以往由党机关行使的一些职能。

481

雅科夫列夫反对他们的意见,说这是权力职能的革命性变革,必须吸取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经验,重新考虑党在社会中的作用,提高自治的作用。谢瓦尔德纳泽也反对他们的意见,他抱怨党没有认真研究政策,没有认真研究国内政策,尤其是没有认真研究外交政策。谢瓦尔德纳泽说:“例如,我认为,假若所有的民主制度都能够起作用的话,就不会有阿富汗悲剧了。你们都知道,它让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他只字不提自己在1980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上对入侵阿富汗的评价,当时他说入侵是“勇敢的、惟一正确、惟一明智的一步”)。

戈尔巴乔夫支持谢瓦尔德纳泽:“听到你说党没有认真研究政策的话我心里很别扭,当时就想反驳说:那么究竟是谁制定的政策?但是,如果仔细想一想……我在政治局工作(比一些人时间长,比另一些人时间短)和在书记处工作的经验表明,在各个方面的内外政策上,政治局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照搬部门的建议。研究政策,即研究党应当做的事,确实不够。因为政治局和中央听各部门的摆布,我们照搬他们提出来的东西,照搬部长会议向政治局提交的东西,情况竟发展到吉洪诺夫同志不让改动这些建议中的一个标点符号的地步。谁对他的建议作补充,谁就成了他永远不变的、似乎不明白部长会议作用的敌人。”

从总书记的这番话中,除了看出他个人因当年作为负责农业的中央书记挨过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吉洪诺夫的批评而心怀积怨外,还能清楚地看出另外一层更深的意义:有过错的不是党,也不是党的领导,按

照戈尔巴乔夫的说法,有过错的是“摆布”书记处和政治局的部门。因此,责任在它们,而不在党的领导。

就在这次会议上,引发了一系列与机构改组有关的其他话题。负责国防工业部门的中央书记奥·巴克拉诺夫建议:精简机构,将省出的资金分配给留下的工作人员。因此,巴克拉诺夫力主将高水平的人员留在党中央机关工作。戈尔巴乔夫的反应则相反:“那就太肥了。好像应当既让党得到好处,也让人民得到好处。”无意间冒出了工资多少的问题。按戈尔巴乔夫的说法,律师的工资最低。利加乔夫纠正说,文化工作者挣的最少。戈尔巴乔夫反驳说:“现在即使给他们定高工资,他们也挣不出来。”

482 戈尔巴乔夫继续说道:“……现在讨论将来中央机关干部的选择。我要坦率地说,现在的机关人员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得力的。”<sup>161</sup>

党机关对戈尔巴乔夫的创新作出了相应的反应。人们开始记恨他,认为总书记的所作所为是不稳定的根源,它破坏了大家对明天的信心,而这一信心是自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机关的主要成果。苏共中央机关党组书记 K. 莫吉利尼琴科在 1988 年 9 月 29 日给戈尔巴乔夫的报道中写道:“……我们首先应该看到,总的来说,中央机关保持着健康的政治局面和务实的气氛……对改组和精简机关的计划基本上表示理解。工作人员平静地对待取消医疗补助以及消除食堂和生活服务工作中不良现象的其他措施。

不过,虽说没有出现明显负面的情绪和不满,但是由于机关改组,部分负责人员对自己命运甚为担忧……按照计划,苏共中央机关必须精简一半,因此,有大约 700 名负责人员(不含已到退休年龄的 255 人)需要安排工作……有些同志的住房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些同志担心失去到苏联卫生部第四总局第一门诊部就诊的权利……”

戈尔巴乔夫不只是精简了管理机构。他破坏了苏维埃政权年代形成的统治(或者说管理)阶级的稳定。这个阶级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解释的阶级。机关是在 1917 年后作为庞大国有财产的管理工具应运而生的,当时,“土地归农民,工厂归工人”的思想开始变为现实。在苏维

埃实践中,这意味着土地、工厂、商店、银行、报纸、大学、铁路和森林成了“全民财产”,成为由上级任命的、带有明显的阶层、等级、阶级特征的党政官员管理的国有财产。

这一阶层的独一无二和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加入这个阶层具有个别性。所谓个别性是指每一个人都是被单独接纳的。官场的“参赛者”<sup>162</sup>可以竞争职位,迈过职位这道门槛便是通常的官场或者官场无数官阶中的一级。不过,只有证明自己忠于“党的事业”,忠于最终判定他对党、对主管本部门官场者本人忠诚程度的长官,才能迈过这道门槛。这个长官可能是党的区委书记或州委书记、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或总书记本人——完全取决于任命官职的权限范围。总书记处在这种垂直结构的顶端,掌管苏联的整个官场。于是产生了这种独一无二、垂直结构的靠封建主义的私交和个人依附制度结为一体的阶层。

有可能从官场中“掉出来”,在斯大林时代这是很常见的事(通常,这意味着死亡),后来,在他的继任者时代,则很少见了。斯大林的继 483  
承者认为,处分、降职后留用为上策。我们应当指出,至少从40年代和稍晚些时候开始,官员上了官职表,意味着他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职业优势、专业知识和经验,能够管理交给他的那部分“全民财产”。

戈尔巴乔夫不信任机关,不信任任命制,这让人惊讶。他本人与任命制血肉相连,他一生都是在官场里度过的,一步步走过了官场上的每个阶梯——从共青团边疆区区委副科长一直到苏共中央总书记,他似乎最终也没有弄明白它的功能。他走到这个阶梯的顶端后,打破了任命制,其后果比他预料的要严重得多,使人联想到如同儿童想用火柴为黑暗的干草棚照明。似乎注定会支持戈尔巴乔夫的那个社会阶层与他分道扬镳,是拿任命制做实验的最小最直接的后果。“官场私有化”,竭力把原来自己管理的东西据为己有,苏联的垂直管理体制(即任命制)遭到削弱,只不过是这种做法的几个后果。

戈尔巴乔夫的活动遭到了广大居民阶层的公开批评,他的社会支持率开始下降。1988年9月,戈尔巴乔夫视察西伯利亚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时,遇到了人们公开表达的不满。



物价上涨、居民的供应状况恶化、经济危机迹象大增、生态问题、对官场特权的民愤,所有这一切引发了抗议。戈尔巴乔夫每每外出视察或访问,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总是陪伴左右,此事成了“街谈巷议的话题”,成了引起民愤的目击证据。人们指责她“怂恿”丈夫作出最不得人心的决定。有关她追求名贵服装、炫耀珠宝、在国外逛高档商店的传言很多,而且言辞刻薄。

《新闻社》(一家宣传和支 持苏联对外政策的新闻单位)的一名工作人员决定就此事给政治领导人写信。他对美国记者把戈尔巴乔娃在伦敦参观高档商店拍成纪录片一事有怀疑。他写道:“很可能没有这回事。但是,谣言不仅继续流传,而且最近流传得更广。这几天,当部分(莫斯科的,大概不仅莫斯科的)社会舆论很容易接受种种流言蜚语之时,这种情况变得特别明显。现在,诸如‘她去那里干什么?普通公务员哪有权用企业的钱带老婆出差?’之类蛊惑人心的话很容易被人们接受。我再重复一遍:这类蛊惑人心的话不仅盛传,越传越广,而且现在传得非常厉害。”

484 这位老兄竟然在戈尔巴乔夫访美前夕对戈尔巴乔夫夫人的“活动安排”提出了一些建议。他写道:“必须严格遵守以下两条:

1. 不要赶时髦!!! (穿戴打扮要像个苏联人……这并不可笑……在目前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人民的这一心理不能低估。)

2. 与一切奢华的东西保持距离。拒收各种礼品。如果收受礼品(自发赠送的或者非自发赠送的),应强调指出礼品是赠送给苏联某个公共机构、社会机构的……”<sup>163</sup>

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复杂化,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和梅德韦杰夫开始在自己不久前的“阶级敌人”那里、从西方那里寻求支持。积极的外交政策、达成裁军协议,更主要的是让西方承认“改革”成就,可以成为影响国内社会舆论的一个因素。

1988年12月初,戈尔巴乔夫访问美国,他在联合国演讲时提出了一系列政治倡议。他呼吁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这一对外政策工具。他说,苏联准备把自己的军事学说变成纯防御的军事学说,大量裁

减苏联在东欧的军备。当时，戈尔巴乔夫还会见了刚当选的总统乔治·布什及其前任罗·里根。亚美尼亚的悲剧事件——1988年12月7日的大地震使他不得不缩短了访问行程。

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他推广“新思维”的呼吁、苏联新的对外政策倡议对国内政策的影响，这些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是持续了两天（1988年12月27—28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议题。这不仅是1988年的最后一次政治局会议，而且是对五年计划头三年的一次总结。

请看这次会议“工作记录”详细摘录，请听80年代末苏联历史舞台“主要登场人物”的发言：

“戈尔巴乔夫：我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在贯彻路线、倡议、落实新思维方面进入了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的行动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提出的建议已成为强有力的因素，对他们触动很大，它使许多人猝不及防。我觉得我们做得很对，不仅考虑周到，而且提出了实施计划的策略。我们没有坐等谈判，而是主动出击。<sup>164</sup>如果我们在谈判的时候提出这些建议，未免有点儿俗套……”

我们这样主动出击使美国政界的保守分子惶恐不安，忧心忡忡，甚至畏惧。不光美国人，撒切尔夫人也是如此。他们议论纷纷，无非是想压低期望值，散布怀疑情绪，阻挡摧毁“冷战”根基的进程……我们希望并建议建设一个新世界，建立新型的关系，但是必须新的基础上建立。因此，必须拆除旧的基础。反对拆除旧基础的人不多，但是这是一些很有影响的人士。 485

据我们得到的秘密情报，他们公然说：我们不能让苏联把主动权抢过去，主导整个世界……

美国将对我们采取什么政策呢？有各种各样很有趣的说法……有人说，苏联改变政策的原因是因为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陷入了深刻危机，社会主义世界和苏联现在发生的事情是一种倒退，改革是拆社会主义的台，放弃共产主义目标。这种说法被用于贬低我们的和平倡议，说什么这是迫不得已的措施，是走投无路的表现。让他们说去吧。总而

言之,要讲一点现实主义,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并没有这样想过,当然,我们考虑到了国内需求。

根据这种说法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方面无须采取任何措施促使国际关系好转。苏联如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反正已经走投无路,它将一步步地让出自己的阵地……

请看自由派的观点:苏联没有放弃社会主义,而是像当年罗斯福总统借助‘新政’挽救美国资本主义一样在挽救社会主义……

再看自由派人士有趣的论据:苏联在改革时代作出了严于分析和自我批判的榜样,资本主义,首先是美国的资本主义,无论如何下不了决心作自我批判。你们大概已经注意到,《华盛顿邮报》12月就这一问题登载了一篇题为《超级大国与自我批判》的文章,它在文中提出了一个问题:美国人也该作自我批判了。他们自己的问题并不比我们少……

现在我们必须进一步研究我们的论据。不仅要研究论据,还必须就贯彻提出的构想制定长期的实际行动计划。关于这个问题,党中央的一些部门以及外交部、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将把意见提交政治局。由它们制定近期和远期的行动规划……

在纽约逗留期间讨论的所有问题中,主要的问题是改革的未来……会不会走回头路?顺便说一句,这是极右派大作文章的一个话题……

486 苏联人不断听到的是:改革不利,空转,它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好处,领导层和党内意见不一,国内局势正在走向混乱。领导人不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陷入绝境,现领导人的命运危在旦夕,说白了,是说戈尔巴乔夫的气数已尽。据最乐观的预测,也就给我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是不是这么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各种说法都有。

戈尔巴乔夫:你是不想讲出来。这些话都是这么讲的。同志们,我不会说,这些话使我们大为惊讶。我不想说大话,不过,既然他们不满,既然他们试图作这样的预测,说明他们害怕我们的改革。但是,不能由

此得出结论,说我们没有问题,事事都好。我想,我们自己应当实事求是。我们的改革是头等大事,同志们,这可是一切的关键,是现阶段和平进程的的决定性因素……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获悉的情报都说明,他们将努力发展同我们的关系。我们应当知道,布什是个很谨慎的政治家。据说,天生谨慎是他的一大特色,这是他固有的特性。什么能使布什行动起来呢?只有让美国政府的威信丧失。也就是说,我们需要一种环境,为了加强和推动和平进程,我们现在已经通过自己的倡议创造了这样的环境……

总之,我们必须有一个深思熟虑、灵活而又具体的政策。不让以后的执政者叫暂停拖延时间,阻滞我们的政治进攻速度。这一点我们应当注意。我们已经得到通知,说他们深切希望贝克尽快与谢瓦尔德纳泽会晤。这是值得欢迎的,不过,不应忘记在另外一些方向上推进。到时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落后了。

我看了爱德华·阿姆夫罗西耶维奇(谢瓦尔德纳泽——作者)的几份关于日本的材料。日本看到了我们既和中国好,也和美国好,还和西欧好。它是经济强国,但是被冷落在大政治之外,这刺激了它。如果美国觉得有什么事没让他们参与,他们也会受刺激。我们有强有力的步骤。我们应当加强我们在我说的其他方向上的进攻势头。

我认为,可以这样扼要地总结:我们迈出了强劲的一大步,它在世界上引发了新的冲击‘冷战’堡垒的浪潮,为推进我们新思维的外交政策开辟了广阔天地。与此同时,它要求反思我们所有外交机构的活动,坦率地说,也要反思政治局的活动,反思政府的活动……

**雷日科夫:**我认为在政治上迈出了非常大的一步,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如果分析我们两三年来的外交政策,就会发现,它是1986年1月迈出的一步的必然继续……

因此,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完全支持所做的工作……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实事求是的建议。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它不会影响我们的国防能力,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将使我们以另一种思路处理武装力量的结构,处理军事干部的培训系统。这是非常强劲有力的一步,它

487

使我国在世界大家庭中处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地位……

我们再也不能实行我们以前的政策。不能花几十年的时间靠降低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搞军备竞赛。再也不能这样干了。继续旧的政策对改善人民生活没有任何前途。因此,我认为这一步是历史性的一步。它将载入史册……

**戈尔巴乔夫:**美国右派说,戈尔巴乔夫直接在联合国讲台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苏联领导人认为没有必要跟我们打招呼。这证明苏联领导人阴险。

**雷日科夫:**我认为,这说明苏联领导人智慧,有责任心。这样做他们没有料到,他们怎么办呢……我们面临的任务是从理论上思考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引发的一切。这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新的政治思维问题,全人类的首要问题,民族相互关系和全人类相互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些问题原则上讲已经解决,但是仍需在现代水平上进行认真、深入的研究。

**戈尔巴乔夫:**有些东西被视为好像我们拱手让出阵地。

**雷日科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还有一个问题。……这里有一些要求很坚决的报告,说必须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我们不久前通过了一个构想,里面写的比较缓和。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加入倒是可以的,但是加入以后就必须把自己的家底亮出来……他们会对我们指手画脚:怎么保障居民的生活水平,哪些价格可以提高,哪些价格可以降低……

**戈尔巴乔夫:**我告诉你们,纽约出现了惊人的前所未有的场面。美国人是怎么反应的?我想给你们讲讲这件事。纽约人对各种访问司空见惯,没有什么事能让他们感到惊奇。夹道欢迎的人排了几十公里。……令人惊奇,同志们,人民的反应多么强烈……

**谢瓦尔德纳泽:**您说的是纽约的场面。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为什么说今天的人们已经成熟,这样的场面我也没见过。甚至在我们的朋友那里也根本看不到这种场面。……人们涌上街头欢迎,一个有一千万人口的城市(只算市区),民众自发举行的集会。类似的场面



没有见过……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同意您的看法,现在的当政者比较谨慎,比较多疑,也可能比较胆小。不过我觉得,最近几年在苏美关系正常化方面所做的一切,已经成了美国人的财富。最新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0%以上的人从苏美关系正常化角度批评里根的政策。因此,现在的当政者也不得不实行进一步扩大与我们合作的方针。

也许,重新认识所有这一切的意义还需要一定时间……您说得对, 488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主要的是我们必须抢先一步,确保在各个方面——化学武器、战略进攻性武器和人道主义问题诸方面积极开展工作。我们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局面,这样的形势。在人道主义问题方面,我们确实进入了最前沿的阵地。困难是有的,我明白这一点,不过,从塑造我国形象方面说,我们获得了很大成就。

决议草案已经提交。当然,我并不认为这是终稿,因为尚未征得国防部的同意……一些同志不在,但洛博夫同志(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部副总长 B. 洛博夫——作者)在场,许多问题都征得了他的同意,问题不在这里,这不是最重要的。我担心的是……只让最高苏维埃了解军队建设的主要方面,而不让他们了解军队建设计划,会引起强烈不满……

不可理解的是,有人反对决议草案中关于我们从盟国撤军的内容,不同意同我国的朋友讨论这些问题……

据我所知,国防部部长委员会会议上没有讨论撤军的具体时间。我们应当有这样的计划,征得盟友的同意,并且公开宣布,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打算始终如一、有条不紊地坚决兑现现在联合国的承诺。否则,如果像同志们所写的那样,一切都按部就班地办,我们就会被指责不想撤军、改弦更张,不兑现现在联合国大会的承诺。

下面一个问题与我们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讲的有矛盾……我指的是国防部关于使裁减后留在社会主义国家境内的兵力具有很大防御性的提法,我要强调指出,这里说的是很大防御性,虽然是几个字,但是它却有原则性的意义。戈尔巴乔夫同志说的是使这些兵力具有纯防御性,

差别很大,很重要……国外对总书记的讲话难免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不能同意国防部报告中对公开性和开放性问题的解释,今天,公开性和开放性问题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认为,在实施单方面行动中,公开性和开放性应当是最大限度的,否则,不仅不会产生应有的效果,而且不利于宣传工作。我们的反对者会不失时机地借此散布怀疑情绪,说我们的承诺没有全部兑现。

489 他们建议不提最大限度的开放性,而是提可容许的开放性。什么是可容许的开放性?搞不明白。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可容许的公开性和开放性仅仅适用于我们从盟国境内撤军。

**雅科夫列夫:**这个月在纽约发生的事,当然是世界政治中的一件大事。我认为,苏联在确立人道主义方面,在……历史上又迈出了一步。放弃自我孤立……使社会主义开始自己的长征,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关于向美国人施加压力问题,我们还应当考虑哪些情况呢?应当考虑到,美国人很害怕我们的欧洲政策和太平洋政策。他们不愿意跳上正在行驶的火车,何况是飞驰的火车。他们习惯于做司机。

最重要的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看不到敌人了。如果我们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就让军工综合体彻底受冷落了……

**亚佐夫:**为执行国防委员会11月9日的决定,国防部已经制订出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撤军的计划……

**利加乔夫:**……国际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但是并没有失去其阶级性,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在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会议报告中强调了这一点。我们背起了军事预算造成的重负,使我们在经济方面难以根本解决什么问题,而且,承担重负有时候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削弱国防能力。这一点必须直截了当地告诉党内,告诉党的积极分子。

最后……在一些问题上我们真的是失策,因为我们回避解决它。……合作社运动带来的问题堆积如山……然而还有人振振有辞地说:我们赞成合作社,赞成经济活动领域的合作形式。要知道,一些组

织合作社的人贪得无厌,搞投机……

关于对外经济联系。现在真的是人人都想去闯国外市场,尤其是在农工综合体内……

**沃罗特尼科夫:**……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在讲话中强调了对改革的不同态度以及资产阶级人士,其中包括美国资产阶级人士的反应。但是,我们国家以及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很严重的问题。

我们是否应当……把我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写进去?……

**戈尔巴乔夫:**维塔利·伊万诺维奇(沃罗特尼科夫)说,在国内,甚至在家里,有人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怎么‘脱衣’亮相呢?而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则从另一面谈到这个话题——党内应当知情。坦率地说,这些东西我们暂时还是秘而不宣为好……现在,甚至对党内也不能讲,首先必须把秩序整顿好。如果我们今天讲了我们把多少国民收入用于国防,那就会把在联合国的讲话化为乌有。因为任何地方、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这种状况。只有那些贫穷的国家才把一半的预算用于军事。

**谢瓦尔德纳泽:**例如,安哥拉。

490

**戈尔巴乔夫:**……现在说一下我们是否削弱了国防能力,没有。只要我们集中力量抓住主要的方面,抓质量建军,抓提高装备和技术水平,就可以使国家的防御能力得到加强。这些事要赶紧办,越快越好。现在许多人把军队说成“饲料槽”……

另外,不要忘记关心那些退伍的人。

**亚佐夫:**10万名军官。

**戈尔巴乔夫:**其中大部分人服役期满了吗?

**亚佐夫:**截止今日我们有5.8万人服役期满,他们即将退伍。

**戈尔巴乔夫:**然后其他人退伍……”<sup>165</sup>

作者之所以如此详细援引讨论记录,是因为这次政治局会议对改革进行了总结。

公开性带来的兴奋不仅仅冲昏了政治评论员和大众传媒的头脑。由于《苏维埃俄罗斯报》的一名记者开了头,从1985年起,人们把戈尔

巴乔夫的热情拥护者称做“改革的施工者”。人们的信心和信念增强了,认为1985年不仅是在苏联官场上名列前茅的戈尔巴乔夫及其战友个人经历的一个里程碑,而且是整个世界政治的里程碑。一时出现了一种错觉,这在援引的上述文件中能明显地感觉到,认为经济上强大政治上软弱的苏联能够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对“全人类价值”的呼吁、“放弃使用武力”以及与纽约居民见面,既能对美国起作用,也能对全世界起作用;认为在苏联已明显变成现实的“军备领域完全开放和公开”的呼吁,会成为其他国家的准则……

这种兴奋过后是难受:国家经济形势恶化,预算赤字快速增加。国家无力承受军事预算重负,经济军事化不能保证国家正常发挥职能,况且一时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裁军、从东欧和中欧撤军带来无数问题:退伍军官做什么工作?军人家属应在哪里安家落户?数十年一直在遍及全国的工厂生产坦克、大炮、飞机和弹药的千百万工人做什么工作?……

经济危机必然引起其他危机、社会冲突、民族冲突。

当政府励精图治之时,它最糟糕的日子便开始了。苏联在它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在国家随着下一年即1989年的开始进入政治改革时期,不得不面对这个古老的真理。

- 1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М., 1995. Кн. 1. С. 264.
- 2 戈尔巴乔夫在他的回忆录中简单提到了协商的经过,但是没有涉及谈话的实质(见米·谢·戈尔巴乔夫:《生活和改革》,第1册第266—267页)。亚·尼·雅科夫列夫提供了更为详细的情况,感谢他帮助我们搞清楚祖国历史的这一片断。这些事件的重要细节,见安·安·葛罗米柯:《安德烈·葛罗米柯:在克里姆林宫的试验室里:儿子的回忆和思考》,莫斯科,1997年版第82—96页。
- 3 См.: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265.
- 4 В качестве примера см.: Геллер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едьмой секретарь. М., 1996. Кн. 3. С. 11—18.
- 5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М., 1995. С. 75.
- 6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М., 1995. С. 88.
- 7 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库纳耶夫也没有参加会议,他晚些时候才抵达莫斯科参加中央全会(见 В. И. 博尔金:《声望扫地》,第74—75页)。
- 8 《Нам не нужно менять политику...》—заявил М. С. Горбачев при выдвижении его на пост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Публ. А. Чернева// Источник. 1993. №0. С. 34—75.
- 9 См.: Оников Л. КПСС: анатомия распад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аппарата ЦК. М., 1996. С. 93—94.
- 10 См.: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280.
- 11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67.
- 12 См.: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М., 1995. С. 66—67.
- 13 См.: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280.
- 14 Там же. С. 6.



- 15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115—116.
- 16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М. , 1994. С. 39.
- 17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276.
- 18 Там же. С. 39.
- 19 在阿斯特拉罕州,卖酒的商店从 118 家减至 5 家,别尔哥罗德州从 160 家减至 15 家,乌里扬诺夫斯克州从 176 家减至 26 家,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从 521 家减至 49 家。
- 20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96—101.
- 21 这种做法既可笑又有损人格和尊严,例如规定一个人购买伏特加不得超过两瓶,办丧事须出具死亡证明可购买 12 瓶。驻外使领馆新年招待苏联公民不许饮酒,只许喝汽水。上班、坐火车、在家饮酒一旦被发现立刻开除公职和党籍……诸如此类的愚蠢做法不胜枚举。
- 22 Сушков В. Заключенный по кличке«министр». М. , 1995. С. 4—5, 20.
- 23 См. там же. С. 14.
- 24 См. : Гуров А. Красная мафия. М. , 1995. С. 60—61.
- 25 ЦХСД, ф. 89, оп. 24, д. 18.
- 26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записка следователей по особо важным делам при Генеральном прокуроре СССР Т. Х. Гдляна и Н. И. Иванова в ЦК КПСС от 11 ноября 1986 г. (ЦХСД, ф. 89, оп. 24, д. 18).
- 27 См. : Чурбанов Ю. Расскажу все, как было... М. , 1983.
- 28 См. :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16.
- 492 29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251;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30.
- 30 沃罗特尼科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1986 年 1 月 2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罢免费多尔丘克职务的决定。戈尔巴乔夫本人曾经告诉沃罗特尼科夫说,费多尔丘克收集诋毁总书记的材料(见维·伊·沃罗特尼科夫:《事情是这样的》,第 85 页)。
- 31 См. : Самолис Т. Очищение//Правда. 1986. 13 февраля.
- 32 См. : Яковлев А. Н. Горькая чаша. Ярославль, 1994. С. 205—212.
- 33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М. , 1995. С. 284.

- 34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279.
- 35 См. там же. С. 42.
- 36 См. :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101.
- 37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Ростов-на-Дону, 1991. С. 57.
- 38 См. там же. С. 57—58.
- 39 См. там же. С. 22.
- 40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90. №7. С. 132.
- 41 См. : Соловьев В. , Клепикова Е. 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 Тайный ход в Кремль. СПб. , 1995. С. 116—122.
- 42 АП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9 июня 1985г. , л. 1—9.
- 43 这种说法一直未被证实。(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С. 71 ).
- 44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80.
- 45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По дневниковым записям. М. , 1993. С. 63.
- 46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5 сентября 1986г.
- 47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63—64.
- 48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С. 70—83.
- 49 Материалы XXV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М. , 1986. С. 4.
- 50 Там же. С. 7.
- 51 Материалы XXV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С. 9.
- 52 Там же. С. 13.
- 53 Там же. С. 63.
- 54 См. там же. С. 69.
- 55 Там же. С. 21.
- 56 Там же. С. 60.
- 57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3 марта 1986г.
- 58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72.
- 59 См. там же. С. 72—73, 78.

- 60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22—24.
- 61 См. : Замятин Л. М. Горби и Мэгги: Записки посла о двух известных политиках—Михаиле Горбачеве и Маргарет Тэтчер. М. , 1995. С. 25—27.
- 62 政府专线电话。
- 63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163—164.
- 64 化学兵——苏军的特种兵,用于保障武装力量在辐射、化学或生物杀伤条件下实施战斗行动(《大百科词典》,莫斯科,1991年版,第2卷,第595页)。
- 65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165—167.
- 66 米·谢·戈尔巴乔夫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盖·阿·阿利耶夫,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安·安·葛罗米柯,叶·库·利加乔夫,尼·伊·雷日科夫,米·谢·索洛缅采夫,维·米·切布里亚科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彼·尼·杰米契夫,弗·伊·多尔吉赫,鲍·尼·叶利钦,谢·列·索科洛夫,Н. В. 塔雷津,亚·帕·比留科娃,阿·费·多勃雷宁,米·瓦·齐米亚宁,瓦·安·梅德韦杰夫,维·彼·尼科诺夫,Г. П. 拉祖莫夫斯基,亚·尼·雅科夫列夫,伊·瓦·卡皮托诺夫。
- 493
- 67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8 апреля 1986г.
- 68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96—97.
- 69 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Оперативной групп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по вопросам, связанным с ликвидацией последствий аварии на Чернобыльской АЭС, 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в кн. : Ярошинская А. Чернобыль.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 М. , 1992. С. 250—575.
- 70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Галерея лидеров СССР. М. , 1995. Кн. 2. С. 354—355.
- 71 苏联时期供外国人用外汇购买短缺商品的商店。
- 72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172.
- 73 切尔诺贝利的调查小组先后由 Б. Е. 谢尔巴宁、伊·斯·西拉耶夫、列·阿·沃罗宁、尤·德·马斯柳科夫、К. В. 古谢夫、韦杰尔尼科夫、Б. Л. 托尔斯特赫、В. А. 马索尔、П. И. 莫斯特沃伊领导(见尼·伊·雷日科夫:《大动荡的十年》,第173页)。
- 74 Протокол от 12 мая 1986 г. (см. : Ярошинская А. Чернобыль. С. 294).
- 75 Здесь и дальше цит. по: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3 июня 1986г.

- 76 Ярошинская А. Чернобыль. С. 347.
- 77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01.
- 78 См. там же. С. 82.
- 79 Согрин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России. М. , 1994. С. 21.
- 80 Там же. С. 122.
- 81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05.
- 82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08—109.
- 83 Там же. С. 109.
- 84 Здесь и дальше цит. по :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7 октября 1986г.
- 85 См. :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20—321.
- 86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122—123.
- 87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42.
- 88 Там же. С. 45.
- 89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09;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22;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45.
- 90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45.
- 91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09.
- 92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46.
- 93 Правда. 1987. 28 января.
- 94 Цит. по : Лацис О. Перелом//Суровая драма народа: Ученые и публицисты о природе сталинизма. М. , 1989. С. 114.
- 95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35.
- 96 См. : Поляков Ю. А. Наше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е прошлое. М. , 1995. С. 65—72.
- 97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68—369.
- 98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2. С. 212.
- 99 该报从 70 年代末起经常发表抨击经济问题的文章,其中一篇文章提出干部特权问题。正是该报首先推出“改革的施工员”和其他一些象征改革拥护者的概念。
- 100 См. :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28 января.

- 101 См. например: Бурганов А. «История—мамаша суровая…» // Суровая драма народа. С. 31—33.
- 102 См. :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13 марта.
- 494 103 Правда. 1988. 5 апреля. 文章是在亚·尼·雅科夫列夫和瓦·安·梅德韦杰夫的主持下写成的。
- 104 Цит. по: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Семь вождей. Кн. 2. С. 412—413.
- 105 ЦХСД, ф. 78, оп. 12, д. 5.
- 106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160.
- 107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39.
- 108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51—53.
- 109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55—356.
- 110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С. 77.
- 111 См. : Соловьев В. , Клепикова Е. Борис Ельцин: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метаморфозы. М. , 1992. С. 59—62.
- 112 阿·米高扬 1962 年的新切尔卡斯克之行是苏共党的领导人最后一次同抗议的群众接触,这次接触最终以对示威者动用武器、许多人死亡、一些人被判刑和处以死刑结束。
- 113 Ельцин Б. 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С. 77.
- 114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52.
- 115 Цит. по: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53—154.
- 116 Ельцин Б. 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С. 7—9.
- 117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166.
- 118 См. :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26—327;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174—175.
- 119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27.
- 120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68.
- 121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пленума опубликована( см. :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2. С. 209—287 ).
- 122 Там же. С. 239.
- 123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27.
- 124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69.



- 125 Ельцин Б. Н. Исповедь на заданную тему. С. 12.
- 126 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 1989. №2. С. 239—241.
- 127 Там же. С. 243.
- 128 См. там же. С. 255—257.
- 129 См. там же. С. 261—262.
- 130 См. там же. С. 262—263.
- 131 См. там же. С. 265—267.
- 132 См. там же. С. 276.
- 133 См. там же. С. 279.
- 134 См. там же. С. 280—286.
- 135 Там же. С. 287.
- 136 叶利钦企图自杀一事,是戈尔巴乔夫最先向外界透露的(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74 )。
- 137 Там же.
- 138 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встречи Б. Н. Ельцина со слушателями Высшей комсомольской школы 12 ноября 1988г.
- 139 塔斯社在报道 11 月 12 日首都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和 1987 年 11 月 11 日莫斯科市党委全体会议的报道中只字未提叶利钦的名字。见《真理报》1987 年 3 月 13 日。
- 140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12 ноября 1987г.
- 141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14.
- 142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497—498.
- 143 См. : Комарова О. Миграция русских: новые тенденции//Эт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1995. №5. С. 125. 495
- 144 См. :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 1995. С. 13—16.
- 145 См. :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93—195.
- 146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17—18.
- 147 Там же. С. 18—20. См. также: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503—504.

- 148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9 февраля 1988г.
- 149 Там же.
- 150 Там же.
- 151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1 марта 1988г.
- 152 См. :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26.
- 153 Там же. С. 39.
- 154 耐人寻味的是,1979年俄罗斯受过高等和中等(完全和非完全)教育的人数(按每千名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人数计算)落后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见《苏联社会学:社会学理论和社会实践》,莫斯科,1982年版,第1卷第103页)。
- 155 См. : Сельская молодежь. 1988. № 10;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1988. 9 марта; Смена. 1988. №15;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988. 27 июля и др.
- 156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8. 13 марта.
- 157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218.
- 158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198—203. О ходе обсуждения статьи Н. Андреевой см. также: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81—386.
- 159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387.
- 160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31 марта 1988г. , л. 370—371.
- 161 Там же,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8 сентября 1988г. , л. 158—211.
- 162 这种“参赛者”可以是拟受命主持某一社会科学教研室的大学教师,也可以是商店经理、报社编辑、被提名担任将军的军官、厂长、州委书记、部长、大使、艺术家协会秘书或未来的院士。任命的原则是一样的,不同之处仅在于任命他的单位:区委、州委、苏共中央书记处或者中央政治局。
- 163 《祖国》,1992年第1期第10页。
- 164 新总统乔·布什上台使苏美关系出现某些停顿。戈尔巴乔夫的话证明,他试图通过在联合国发表讲话对美国新政府施加压力。
- 165 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1988年12月27—28日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第322—354页。

## 第八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

496

(1989年—1991年)

昨天未赶上,明日不放弃。

——弗·达里:《俄罗斯民间谚语》

504

## 准备选举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回忆起过去不久的事件,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如果说1988年经济改革的进程减速,而政治改革开始跃居首位,那么在已经来临的这一年(1989年——作者),国家的政治变革之势犹如‘九级巨浪’……”<sup>1</sup>1989年成为“改革”的最高点。与此同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以社会主义的方法解决社会主义的问题的“改革”有其历史局限性,而且前途无望。

1989年1月10日召开了苏共中央全体会议。这次会议专为研究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关于即将恢复的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决议的执行问题。在此之前,社会上大部分人显然已形成对选举的竞争性深信不疑的观念。国家沿用了几十年的老模式(一个席位只有一个候选人)在人们的心理上已成为陈旧过时和根本不能再继续下去的东西。在这种刻板的选举方式的所有缺陷暴露无遗的情况下,除了实行直接选举代表的办法以外,还计划从社会团体中选举代表,即从苏共、工会、共青团、作家协会、工业品艺术设计师协会和集邮家协会等组织中选举代表,这一方式要求能够实行差额选举。因此,这次全会的议程(选举苏共的百名代表)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与关注。

然而,这次全会采取了强加于人的老办法:向全会的代表们提供了一份百人名单,要求他们不经讨论投票赞成所有的候选人。是谁拟定了这份名单,为什么进入这份名单的是那些候选人,而不是别的候选人——所有这一切都未经讨论,因而激起了与会者们的气愤<sup>2</sup>。这一百名候选人由戈尔巴乔夫的亲信、中央书记Г. П. 拉祖莫夫斯基事先选定,又经戈尔巴乔夫本人精心“筛选”,而戈尔巴乔夫当时害怕亲自参加普通选区的竞选活动<sup>3</sup>。如此对待选举权引起了急进民主派人士的嘲笑;苏共选举出来的代表得到了一个绰号“红色百人队”。戈尔巴乔夫本人在其回忆录中对这一事件另有一番解释:“无论是当时还是现

在,我都坚信从百名候选人中产生百名苏共的代表是正确的。不可能让当时一些党的领导成员落选,否则立刻会把他们推到秘密或者公开的改革的对抗者营垒之中……我们估计,倘若在候选人的名单里,譬如说列入103—105个姓名,那么得到‘毒眼’<sup>①</sup>数量最多的将是利加乔夫、乌里扬诺夫和雅科夫列夫。即使这份名单再增加10名候选人,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会落选……”<sup>4</sup>前总书记没有料到,这种做法与民主政治毫不相干……

从党和国家机关的角度来看,重心明显摆向刚刚建立的新的权力机关一方。1989年1—2月,苏共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开始大批进入苏联最高苏维埃机关。因为阿·伊·卢基扬诺夫被预先指定担任未来权力机关的关键角色,所以他才提出让苏共中央机关大批工作人员进入正在组建的未来最高苏维埃机关的倡议<sup>5</sup>。新的最高苏维埃应该成为比原先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更有影响力和更重要的权力机关。因此,为未来政权的关键职位物色人选是完全按照上级委任干部的规矩行事的。中央一个部的部长得到了中央选举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的职务,中央一个部的副部长得到了最高苏维埃社会经济部部长职务,中央宣传部的一个教导员则当上了苏维埃组织群众工作部部长。未来的代表们加入了激烈的竞选,他们向自己的选民们发布竞选纲领,作出许诺;而应该一步一步地经常指导这些代表活动的那个机关已在苏共中央内部组建完毕。

## 选举苏联人民代表

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成为全国居民政治化的强大动因。几十年以来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合法的机会,能够发表与党的机关正式确认的观点不同的看法。竞选运动将代表的候选人分为两大集团。一个集团

---

<sup>①</sup> 按照俄罗斯民间迷信的说法,被这种眼睛看过之后,可能遭到不幸。此处“毒眼”喻指反对票。——译者注



是背后有党的机关撑腰的那些候选人,另一个集团是违反党机关的立场、为争取被选举权而斗争的一些人。这是一些具有不同政治观点的各种不同的人,他们或者是社会民主派和主张发展市场经济关系的经济学家,或者是基督教民主派和知名记者。他们与党的机关相对抗常常得到选民们的大力支持。

498 多种民族矛盾浮出水面是最初进行的公开选举的结果。1989年的竞选运动成为在全苏联范围内组建人民阵线、民族运动与民族主义运动的良好环境。这一时期,人民阵线在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影响迅猛扩大。“纪念”运动的拥护者在俄罗斯也搞起了公开的竞选运动。民族院主席阿·爱·沃斯于1989年3月会见了苏联境内<sup>6</sup>的德意志人。他们坚决主张恢复德意志人的自治权,指出这种自治权的或缺会刺激强化人们迁居国外的情绪,1988年迁居联邦德国的人数比1987年多2.3倍。印古什人社团组织代表人物向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苏联部长会议提出坚决的要求:恢复以奥尔忠尼启则市为行政中心的印古什自治区<sup>7</sup>。

竞选运动激化了潜藏几十年的族际冲突:在格鲁吉亚——格鲁吉亚同其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两个自治共和国发生冲突,在摩尔达维亚——讲俄语的德涅斯特河沿岸与讲突厥语的加告兹发生冲突,摩尔达维亚本身也存在民族冲突。以兹·加姆萨胡尔季阿、伊·采列捷利、格·昌图里阿为首的民族主义运动提出了在格鲁吉亚的组成中取消自治权,特别是取消阿布哈兹的特别地位<sup>8</sup>、格鲁吉亚脱离苏联的要求,这些要求成为第比利斯出现大规模群众骚乱的原因。以德·帕季阿什维利为首的格鲁吉亚党的领导人征得莫斯科的同意(即征得留守“处理家务”的叶·库·利加乔夫的同意,因为戈尔巴乔夫在国外——在古巴和英国),决定动用军队驱散游行示威的人。4月8日夜间在同军队的冲突中,19人丧命,数百人受伤,许多人因警察使用瓦斯中毒<sup>9</sup>。

最初的苏联人民代表的选举,即便具备某种程度上的民主,但是选举结果完全不是党的领导人一年前在第十九次党的代表会议上作出关于人民代表选举的决议时所希望看到的那样。苏联共产党不可能进行

有效的竞选运动。尽管它拥有人数众多的职业机构,可以深入任何一个居民点、每一个工业、教学、行政机构,掌握着党的报刊、资金……但是没有思想。不久以前出现的围绕“革新的社会主义”、“加快速度”、“全面改革社会生活”的热情已经枯竭,剩下的是悲观失望、大多数食品凭证购买、购买伏特加的长队,以及关于党的机关贪赃受贿及其无穷无尽的真实与虚构的种种特权的永不休止的议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境内接连不断的冲突令人怀疑国家政权本身的效力。关于所谓的空白点,确切地讲,是关于官方宣传讳莫如深的很久以前或者不久以前的苏联以往事件的历史研究文章,在《星火》、《莫斯科新闻》及《电影艺术》这类杂志上接连刊载;阿·雷巴科夫的作品《阿尔巴特街的女儿们》问世并成为畅销书,这一切即便没有直接清除苏共的“历史领地”,也缩小了苏共的“历史领地”,使苏共的历史变成暴力、罪恶、欺骗的代名词。国家保持一党制的惟一貌似合理和荒诞不经的理由是:“再多一个党,国家不能养。”

选举竟成为对宣称自己是“苏联政治体制核心”的一个党的严峻考验。

党内持不同政见者鲍·尼·叶利钦开始同中央公开抗衡。他开展了强大的竞选运动,在多数居民支持他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彼尔姆两个州发表演说。他的每次讲话都吸引了数千人,他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举行的会晤被电视台向聚集在工厂文化宫前大广场上的人们做了实况转播。然而,叶利钦要在莫斯科进行主要的战斗。从全国许多城市发出的提出本选区的苏联人民代表候选人的200份正式提案中,他选择了莫斯科,这是全国选民人数最多、地位最重要的选区。要在对中央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影响力最为强大的地方——莫斯科当选,意味着向体制公开挑战。有人试图用选举委员会的筛子来阻止叶利钦,他在1989年3月10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受到了威胁。然而莫斯科人却持有另一种意见:叶利钦首先被视为现存制度的对抗者,他与自己的主要政敌——好郑重其事而不容反驳地教训人的戈尔巴乔夫不同,是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的人。他拥有批判体制的特殊权利,他登上了该体

制的顶峰,又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个自愿放弃该体制,因而受到该体制的报复。

在会见选民时,叶利钦号召将最高苏维埃和身为跑龙套角色的代表们变成一个代表人民、而不是代表党的官僚机构来解决自己问题的机关。他批评选举法,称其为不民主的法律,尤其是要求实行社会组织选举的那些条款遭到了他的批判。叶利钦指出,必须向所有公民提供购买商品、享受保健及其他服务的社会平等和同等机会。

莫斯科选区的选举结果令人震惊:89%的莫斯科人投票支持叶利钦。

一些过去不知名的人进入了代表的行列,他们之所以能够当选,就是因为他们与党的机关相抗衡。例如,根·爱·布尔布利斯、阿·亚·索布恰克、尤·尼·博尔德列夫、阿·伊·卡赞尼克、A. H. 克赖科、谢·鲍·斯坦克维奇等都成了代表。通过一系列社会与创作组织而取得了候选人资格的一些大名鼎鼎的人物当上了人民代表,他们是两位院士安·德·萨哈罗夫和德·谢·利哈乔夫、诗人叶·亚·叶夫图申科、经济学家加·哈·波波夫。

但是,有30名左右的苏共州委书记与市委书记未能当选。在列宁格勒、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批评苏共领导的人获得了多数选票。

1989年3月26日,选举在全国结束。3月28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评估选举结果。米·谢·戈尔巴乔夫回忆这次会议道:“多数人的情绪抑郁,笼罩着一片完全失败的气氛<sup>10</sup>。”他试图证明苏共没有输,因为85%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党在人们看得见改革带来的实际变化的地方取得了胜利。然而戈尔巴乔夫遭到了反驳,被提醒注意“现在党内的纪律性比无党派人士还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尤·菲·索洛维约夫说,列宁格勒市参加投票的人不是反对共产党员候选人,而是反对改革。新闻媒体照例受到许多批评,包括以《真理报》为首的党报党刊的整个新闻媒体都受到指责,称它们“正在营造否定党的干部的氛围”。

少数政治局委员发表意见,捍卫选举的结果:亚·尼·雅科夫列夫

认为,选举成为捍卫改革的一次全民公决,因为绝大多数的代表是共产党员;瓦·安·梅德韦杰夫则反驳叶·库·利加乔夫和维·伊·沃罗特尼科夫称,新闻媒体只不过是反映了社会上发生的真实进程而已,许多党的委员会会让选举放任自流。

在最重要的问题(对待选举及其结果的态度)上,戈尔巴乔夫处于少数派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他竭力采取措施,改变苏共中央的人员组成,因为当他同政治局发生冲突的时候,苏共中央全会的立场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中央全会向来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依照这一机关的决议,一些党的高级领导人与著名活动家被辞退和解职——从赫鲁晓夫到贝利亚、马林科夫和朱可夫,都是如此。为了及时防止可能发生政变的危险性,需要改变中央的人员组成。这一任务极为复杂艰难:只有代表大会才有权选举新的委员和不改选老委员。但是戈尔巴乔夫想出了一个非惯用的方式,创造性地发展了列·伊·勃列日涅夫首先使用的一种方法。勃列日涅夫当时坚决要求一些党的颇有威信的活动家“自愿”辞职,这样就使他避开各种党内程序。例如,他强迫尼·维·波德戈尔内、亚·尼·谢列平写出“依自己的愿望”提出辞职的声明。勃列日涅夫很少且很有选择性地使用这一方法。

戈尔巴乔夫还决定采用让中央全体委员中为数众多的领取养老金者“集体辞职”的方法。这些领取养老金者在不久前的过去都是最著名最重要的党和国家的官员。戈尔巴乔夫并非毫无理由地认为,这些人敌视改革及其“工程主任”。解除他们职务的行动戈尔巴乔夫搞得很漂亮。基于同一些颇有威望的领取养老金者谈话的结果,他能够预先获得他们的支持。安·安·葛罗米柯再一次帮助了他。在1989年4月25日召开的例行中央全体会议上,宣读了110名领取养老金者申请自愿辞职的一封信。戈尔巴乔夫还采用另外一种方法:恢复自行加聘制,就是说不经代表大会选举而为中央委员会增设新委员(这是20世纪初曾用过的、几乎已被忘却的充实党的机关编制的方法),用自己的拥护者充实中央。然而,这件事他没做成。利加乔夫强烈反对这种做法,指出了这种程序的明显不民主<sup>11</sup>。



在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后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夕于1989年4月25日开幕的中央全会证实了戈尔巴乔夫原先的怀疑。况且这次全会前夕就已经传出流言：解除戈尔巴乔夫职务的阴谋活动即将实施<sup>12</sup>。

全会上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及方针遭到了猛烈的批评。他被指责经济改革失败，党的机关经常遭到新闻媒体的责难，滥用民主，搞垮了军队，纵容民族主义，脱离党的活动的列宁主义原则。戈尔巴乔夫的活动第一次成为公开谴责的目标。况且批评他的多数人正是他圈定留任的那些中央委员。

戈尔巴乔夫本人找到了反击批评的有效方法。他建议报刊登载会议的速记记录。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们别无选择，只能同意这样做。大家发言的速记记录全文发表实乃前所未有之举，党内“家丑”于是“外扬”。戈尔巴乔夫一下子成了中央“党内保守分子”的牺牲品，并因此获得了舆论界一定程度的支持。

召开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全速进行。戈尔巴乔夫在准备，苏共的反对派也在准备。戈尔巴乔夫为自己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提前开始活动，这一地位能够赋予他国际舞台上不可或缺的声望，此外，在权力转移到人民代表大会的条件下，属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成为全国权力系统中的关键职位。

由于同各州委第一书记进行了商榷，戈尔巴乔夫得到了他们支持推举他登上这一岗位的保证<sup>13</sup>。在1989年5月22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按照老规矩，戈尔巴乔夫提出了应该经代表大会批准的最高国家职务的候选人：即他本人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并兼任总书记，阿·伊·卢基扬诺夫为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尼·伊·雷日科夫为部长会议主席，维·帕·洛马金为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А. Я. 苏哈列夫为总检察长，В. М. 列别杰夫为最高法院院长，尤·格·马尼亚金为国家总仲裁长，谢·约·马尼亚金为人民监督委员会主席。惟一反对全会预先决定国家职务任命的人就是鲍·尼·叶利钦<sup>14</sup>。

反对派也在做准备。代表大会前夕，在莫斯科论坛经常集会的政



治教育之家,提出了一个不同于代表大会议程的方案。该方案经《星火》周刊报道后,为全国所共知<sup>15</sup>。

## 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开幕。在20世纪,这是一个极其罕见的事件,因为这一事件在国人众目睽睽之下进行。代表大会立刻就不像其组织者所设想的那样进行了。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弗·帕·奥尔洛夫未及结束发言,此前任何人都不知晓的里加医生瓦·费·托尔佩日尼科夫未向任何人请示,在所有惊讶的与会者和电视机前被震惊的全国人民万众瞩目的情况下,飞身蹿上讲台,建议代表们悼念在第比利斯驱逐游行示威者的事件中的牺牲者。刚刚宣读完预先准备好的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和宣布了代表大会议程提案之后,讲台上就出现了全国知名的一个人——安·德·萨哈罗夫院士。几十年以来,人们知道他是一个被放逐到高尔基市的持不同政见者,一位氢弹研造者,由于参与捍卫人权的活动被剥夺了3枚社会主义劳动英雄星章。尽管如此,绝大多数人毕竟是第一次看见他和听到他讲话,况且他讲的话非同寻常。他说:“我建议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法令作为代表大会首先审议的一个议程项目。我们在经历一次革命,改革就是一次革命;而‘法令’是这种情况下最合适的字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专有权力就是通过苏联的诸项法律,任命最高的国家官员……据此应该修改苏联宪法中涉及苏联最高苏维埃权力的那些条款……摆在我们面前的第二个原则性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和有没有权力对决定我们国家命运的全部问题进行讨论与辩论,而选举国家的首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萨哈罗夫声称支持戈尔巴乔夫作为这一职位的候选人,不过按照他的话说,这种支持带有“相对的性质”。他坚决主张差额选举最高苏维埃主席,坚决主张必须讨论各位候选人的政治纲领<sup>16</sup>。

他的发言并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雄辩演说家的演说。他不具备

“发号施令的”嗓音,他也没有排列成串的华丽词藻。但他有令人惊异的勇敢气概与负责精神、超越政治计谋的聪慧睿智。他不只是面对代表大会,而且是面向全国讲话。全国都认识了他,记住了他。

全国还听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们的声音。他们的发言乍看起来涉及议会程序的技术问题。其中包括:各共和国的代表有权在代表大会的工作会议上讨论某个问题,如果有三分之二的各共和国的代表支持提出这个问题的话,应该马上通过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并且只有在此之后方可讨论其他各种问题,一些俄罗斯的代表也支持他们。当代表大会的主席戈尔巴乔夫阅读字条“一些代表试图引导大会讨论程序问题——这是非常有害的事情”时,那些注视会议进程的人渐渐明白:程序问题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这正是议会会议(尽管起初人们尚害怕使用“议会”这个字眼)与党的代表大会的不同之处。

就在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第一天,极其尖锐的民族问题就已经显现出来了。格鲁吉亚代表坚决要求调查第比利斯事件,亚美尼亚代表与阿塞拜疆代表则因为苏姆盖特与卡拉巴赫事件相互指责,瓦·伊·阿尔克斯尼斯中校指责拉脱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人歧视本共和国内讲俄语的居民,帕·帕·法尔克代表讲的是恢复德意志人的自治权。

与此同时,会上讨论了谁该当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问题。十分明显而不容争辩的红人是戈尔巴乔夫。向他提出的意见涉及同时担任总书记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两个职务的合理性问题,要求对他在克里米亚建造别墅之事作出解释。鲍·尼·叶利钦担任这一职务的候选人资格有人两次推荐:第一次由 B. A. 比留科夫,第二次由根·爱·布尔布利斯提出,二者均来自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叶利钦拒绝推荐自己为候选人。来自阿帕季特市的工程师 A. M. 奥博连斯基毛遂自荐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件事为代表大会的进程带来些许趣谈,而且他甚至未被列入投票名单。

据投票结果,戈尔巴乔夫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支持者 2123 人,反对者 87 人。

就在代表大会开展工作的最初几个小时和最初几天里,已经在国家历史上留下了一道深深的痕迹。5月与6月,所有的电视机和收音机全都打开了,所有人都在收听与收看代表大会的实况转播。过去很少有人知晓的代表当选者,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变成了声震全国的名人,国人不但眼熟其“面目”,而且耳详其声音。电视破除了党的权力之“神圣秘密”,产生了进行比较与评价,表示赞同与反对的可能与机会。代表大会实况转播成为空前未有的社会政治化的催化剂。人们变化速度之快超乎想像。

代表大会第一次为各共和国与各民族表达观点和信念提供了一个全联盟的讲台。大家亲眼看见,在代表大会工作期间,各共和国与过去仅仅徒具形式相比,现在则更为实际地成为苏联的主体了。令每一个共和国的居民焦虑不安的那些问题均已公开指出。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代表团坚决主张实行共和国经济核算制,拟订了共和国经济独立草案;他们还坚决要求调查里宾特洛普—莫洛托夫公约的签订情况,并对该公约造成的后果进行评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代表团对苏联预算案的制定持有特殊的意见,要求顾及到切尔诺贝利灾难造成的后果。乌兹别克代表则对格德良侦查小组的活动提出了抗议。

代表们在选举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关——苏联最高苏维埃时发生了不可避免的分裂。已经成为反对派领袖的那些人未被列入由机关精心准备的最高苏维埃候选人名单之内。鲍·尼·叶利钦<sup>17</sup>、加·哈·波波夫、米·尼·波尔托拉宁、尤·德·切尔尼琴科、伊·伊·扎斯拉夫斯基及其支持者均不在其中。这就让尤·尼·阿法纳西耶夫有理由对代表大会的代表及其主席戈尔巴乔夫指责道,一个“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式的”最高苏维埃正在形成,并将代表大会的多数派称为“富有敌意而听话顺从的多数”<sup>18</sup>。

紧随阿法纳西耶夫之后发言的加·哈·波波夫宣布成立“跨地区  
504  
议员团”,这实质上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内部的一个政治反对派。

苏联出现正式的政治反对派是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另一成果。

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之后,1989年7月29—30日,跨地区议员团最终成立于莫斯科,在电影之家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尤·尼·阿法纳西耶夫、鲍·尼·叶利钦、B. A. 帕尔姆、加·哈·波波夫、安·德·萨哈罗夫先后担任该议员团的主席。

跨地区议员团纲领的基本原则如下:

- 承认私有制,包括土地私有制;
- 权力分散;
- 各共和国经济独立,加强各共和国的主权<sup>19</sup>。

这次代表大会导致民主进程的反对者走极端。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前莫斯科州委书记瓦·伊·科诺托普,他在1989年6月15日致戈尔巴乔夫与政治局委员们的一封信中写道:

“我同意,我们社会的进程不可逆转,现在来谈这一点为时已晚,但是我还是要向你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了看清我们国家的前进方向,譬如说,有了波兰的‘经验’,难道还不够吗?我们不幸的是,当代形式的民主化与公开性使犹太复国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布哈林分子与托洛茨基分子、形形色色的贪赃受贿分子、新法西斯分子及其他妖魔鬼怪全都起死回生和神龙活现。世界主义者利用几乎所有的媒体,特别是报刊与电视、许多文化机构,散布悲观情绪、对党怀疑的论调,蒙骗愚弄劳动群众,而把培养与教育苏联人具备自古传承的爱国主义情感忘得一干二净。可是扎哈罗夫和卡里亚金,写这种事我感到汗颜难当,这两个苏联人民代表抱着狡狴伪善的图谋,竟然拿最神圣不可侵犯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开刀了……”

正如你们所知,对军队、行政管理机关(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公开而恶毒的攻击已经广泛蔓延。如此巨大规模的叛变性的蛊惑宣传运动世所未见。令人目不忍睹、耳不堪闻的是,有人竟将苏共中央总书记与萨哈罗夫相提并论,而这个萨哈罗夫对苏联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连一句好话都没有说过,相反,坏话倒讲了很多。西方的巨头大亨们会欣然乐意拍拍我们的肩膀,百般夸奖我们的改革,非常满意地搓着手,我认为,他们正在提前体验一种享受——与波兰一起共同吞食

我们时所带来的快乐……

如今民族间的敌对情绪日益严重,以后可能会发生更加惨痛的社会风暴,这是不断剧烈的社会阶层分化和苏联人物质与精神状况不公平引发的社会风暴。费奥多罗夫之流的活动家多次提到什么‘聪明精干’之人(不过我觉得,最聪明的人如今生活与工作在西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口口声声说什么‘水火相容’是绝对不可能的。受到意识形态和哲学界投机分子支持的貌似科学的阿巴尔金主义也在我们这里兴风作浪。

505

我看,我们是在不可饶恕地过早废除计划体制,而没有去完善这种体制,还指望‘非资本主义的自动调节经济’;我们过早地废除党的领导作用,首先是废除党的干部政策,而指望既无适当纪律又无严格制度的子虚乌有的什么自愿的民主政治。仿效资产阶级的样子来建立我们的‘议会’,这是没有希望的蠢事……”<sup>20</sup>

这位早在1985年就已经退休的莫斯科州党委第一书记敢于大声讲出来的这番见解,党和国家机关中他的许多同事都表示赞成。

对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仍需要进行专门的研究。与人民代表大会产生的上述后果一样,应该指出的是,在政治对抗的帷幕后面,在共产主义正统派与产生于苏共内部而令社会特别关注的改良主义派别之间的各种矛盾的帷幕后面,存在着当选为苏联代表的各人民阵线代表人物的长远计划。然而,在人民代表大会会场侧旁的各个休息室里,导致苏联国内各种民族运动的爆发,营造环境与条件,旨在消除苏联的种种因素悄然形成。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恢复造成了具有深远政治后果的与联盟中央相抗衡的合法方式。这种可能性得到了充分的利用。

然而,俄罗斯代表团的组成问题并不简单。在现行体制的最激烈反对者中,有很多人与该体制有关系。这些人不同程度地进入了由上级委任的干部系统。他们当中有尤·尼·阿法纳西耶夫,他一生中相当大一部分时间是在苏共中央干部委任制的庇护下度过的;还有加·哈·波波夫和A.米·叶梅利亚诺夫,他们注定由苏共莫斯科市委



批准担任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又有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少将奥·德·卡卢金，他曾领导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情报系统反间谍机关的工作，后来成为列宁格勒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那些应该对现行体制多多感恩戴德的苏联科学院的各位研究所所长，竟突然以代表的身份变成该体制的反对者，对他们究竟能说些什么呢？……

这次代表大会成为各种不同政治势力的合力。不过，主要的问题则是统一的联盟中央与各个加盟共和国的相互关系。所有“列宁主义民族政策”的锥子已经开始一一钻出口袋。

506 苏联是一个奇特的帝国——“不像帝国的帝国”。如果说帝国的典型特征是殖民地宗主国依赖周边地区、殖民地生存，那么苏联则发生了完全相反的情况。苏联不单依靠军事力量得到巩固；而且为了诱使各共和国广大的居民留在苏联的组成内，中央政府经常向各共和国提供补贴。人们对此事说得和写得非常之少，其实，这种补贴数额极为可观。

在经济危机加剧的条件下，中央政府再也没有能力向各共和国提供资金，暂时顾不上它们的各种问题。由此产生了两种行为模式：对于中央政府而言，这就是利用政治因素，必要时利用军事力量；对于各共和国而言，则是希望摆脱日益衰弱却仍然危险的中央政府，开始独立解决自己的各种经济问题。

### 国内经济危机的尖锐化

1989年各书店里的柜台上出现了一本书，书中各篇文章的作者当时都是颇负盛名，完全能与演艺“名星”们相匹敌的最著名的苏联经济学家。列·阿巴尔金、加·波波夫、奥·拉齐斯、A.阿甘别吉扬及其同事们都是电视上人们期待的常客，很少有一周各家报纸上不登载同他们的长篇访谈录或者他们的文章。全国最广泛的居民阶层之所以对经济学家们感兴趣，是因为相信这些讲得头头是道的人具有用以克服危机的秘密学识。应该做的只是向他们提供实现其谋划的可能与机会。

上面提到的那本书就是经济改革家们的一种宣言。该书称为《这是难上加难的道路：经济改革》<sup>21</sup>，实为对社会主义经济分析研究的结果，并且阐述了经济改革家们试图用以拯救社会主义经济的良方妙策。

值得注意的是，摆脱危机的出路是必须沿着社会主义轨道前进。几位作者坚信对社会主义进行改革的必要性，这是另外一回事。该书编辑列·伊·阿巴尔金写道，“必须在许多方面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社会主义模式的多样性、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面目和社会主义的推动力。”应该选择这种新的模式。然而，“……在向新的模式开始过渡之前，必须制止经济陷入绝境，扭转各种消极趋势。这一点做不到，则任何过渡都无从谈起。”<sup>22</sup>他深信在经济领域，在提高中央管理环节的作用、稳定财政、改善消费市场各方面，必须采取各种非常的措施<sup>23</sup>。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此前当上苏联部长会议副总理的列·伊·阿巴尔金宣布，计划将1990年的国家预算赤字缩减一半。1989年的预算赤字为1200亿卢布，1990年的预算赤字计划缩减到600亿卢布。

同时计划缩减纸币、债券等的发行量，保障日用消费品生产的超前增长<sup>24</sup>。

列·伊·阿巴尔金称，国内存在着没有得到满足的巨大需求。国民手里握有1000亿卢布，可拿这么多的钱却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家家商店空空如也，商品刚一到店，瞬间就无影无踪了，接着不是按官方相对低的价格，而是以大大超过官方价格的市场价格被倒手转卖掉。

阿巴尔金院士所表述的过渡时期的构想包括：依旧留存的行政管理体制同逐渐产生并确立的社会主义经营新模式的成分相结合。为能实行这些非同寻常的，而确切点说，是相互排除的办法——行政管理经济体制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组建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sup>25</sup>。

阿巴尔金的同事帕·格·布尼奇认为，苏联体制的不幸还在于其本身并不是社会主义的。

经济学家奥·罗·拉齐斯指出了苏联经济中发生的奇怪进程：

——苏联1970年的国民收入是美国同项指标的65%；

——到 1987 年这一比例关系几乎没有发生变化,为 64%。然而,苏联在许多方面却比美国生产了多得多的产品。

对美国产量的百分比

	1970 年	1987 年
电力产量	61	110
生铁	103	261
钢	95	197
铁矿石	216	527
拖拉机(发动机总马力数)	145	484
水泥	141	181

苏联生产的康拜因比美国多 9 倍<sup>26</sup>,但这未导致生活质量的变化。经济变得愈益耗费巨大、亏损严重,“为生产而生产”的方针越来越厉害地破坏国家的经济。一个危险的反常现象产生了:苏联的采油量不断上升(从 1964 年的 1.48 亿吨增加到 1970 年的 3.53 亿吨和 1987 年的 6.24 亿吨),但供出口的石油却不够。然而,美国却相反,由于发展节能技术,石油产量不断下降<sup>27</sup>。

国家金融系统的专家——当时的财政部长瓦·谢·帕夫洛夫(未来的苏联内阁总理)和伊·卢基扬诺夫的文章令人严重惊慌不安。帕夫洛夫指出了国家预算支出的增加(自 1985 年至 1988 年增加了 730 亿卢布,增幅为 18%)和国民收入的实际缩减(同期国民收入只增加 465 亿卢布,增幅为 11.1%)之间不断加重的矛盾<sup>28</sup>。这位财政部长指出了国家财政中的一些消极进程——国家预算赤字达到国民总产值的 11%,或者为国民总收入的 15%,国债达到国民总收入的三分之二。帕夫洛夫称,通货膨胀具有明显的预算性质。依赖预算支付款项的居民收入实际上得不到从商品生产与供应、提供服务所获得收入的保障<sup>29</sup>。

508 他的同事伊·卢基扬诺夫写道,1989 年 3 月财政部被迫第一次宣布,年通货膨胀的速度为 2%—4%,而 1988 年的纸币发行量比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平均水平高出了 3 倍。1971 年—1985 年期间,流通中的

货币量增长了 2.1 倍,而日用消费品的生产量和零售商品贸易额只增长了一倍。

伊·卢基扬诺夫利用统计的方法证明,“大众需要”的产品的生产规模持续缩减。据他统计的结果,工业产品总量中消费品所占的份额为(百分比):

1928 年.....	60.5
1940 年.....	39
1960 年.....	27.5
1980 年.....	26.2
1987 年.....	24.9 <sup>30</sup>

这是没有效率的经济,不是以改善人们生活为目标的经济,伴随日益加重的财政危机的经济——经济学家们令人信服地作出了这一诊断。救治这样的经济更为艰难。“过渡时期”的处方是柔和而模糊的,治病妙方是“口念”驱病的咒语——将社会主义计划同面向社会的市场相结合<sup>31</sup>。

然而,“念咒”并没有驱除经济危机。也是在 1989 年,居民的货币收入增长额为 13.1%,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总共为 2.3%。通货膨胀的趋势有增无减<sup>32</sup>。1990 年的国民总产值缩减了 2%,国民收入缩减了 4%,货币收入增长 16.9%(同 1989 年相比)。

自 1988 年起,“加速”的口号被另一个口号——“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所代替。投资的优先方向显然在消费领域。集中投资额缩减了 23%,在冶金工业与燃料动力综合体方面,集中投资额缩减了 40%<sup>33</sup>。

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各共和国与地区向经济核算原则过渡和明确它们在完成全苏规划中的贡献的思路值得注意。”在这种情况下的经济核算,是过渡到能够顾及各共和国的一切收入与支出的共和国预算。这一浅显的思路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每个共和国大多数最大而最重要的企业不是属于各共和国,而是属于苏联,都是“苏联直接管辖的企业”<sup>34</sup>。这些企业的收支预算不是在共和国的首都得到批准,而是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得到批准,由全联盟的预

算为它们直接拨款。为了让读者弄清楚这种经济上的荒谬怪事,仅需指出一点,即便把从俄罗斯联邦到爱沙尼亚的15个加盟共和国的预算加在一起也得不出苏联的预算总额。联盟中央及其各部与各主管部门有自己的收支账,联盟中央好比是“苏联的第16个主体”。各共和国要想实行“经济核算”,就意味着它们拒绝联盟中央管理自己的企业。这样就为苏联埋设了经济地雷。

509 此外,在经济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新经济关系的幼芽出现了。1988年5月,通过了《合作组织法》。这一活动范围开始迅猛扩展。到1990年,参与合作组织的人有100万左右<sup>35</sup>。另外一种金融体制渐渐地开始建立。改革前夕苏联有三家银行——国家银行、建设银行、对外贸易银行。后来银行系统进行了改革,出现了六家银行——苏联国家银行、对外经济银行、农工银行、工业建设银行、社会住宅银行、储蓄银行。过去的银行至少在本国没有实施过那种将货币作为商品利用的经济活动,银行按照国家机关的指示分配资金。

到1990年初,情况开始转变。在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各个国家银行所提供的贷款价格。1990年发放贷款的利率接近1%,1991年的贷款利率达到15%。农工银行则将利率提高到20%—24%,其中包括早先取得的贷款<sup>36</sup>。商业银行的出现对于苏联而言是史无前例的。

由于《合作组织法》的颁布,出现了合并各合作社的财政经费而建立合作银行的可能性。1988年8月24日,第一家商业银行登记注册。从法律上来看,《合作组织法》中有关私营银行的一条表述得并不确切:实际上没有钱可以建立银行。在组建银行这一章中没有提出在专业方面所受教育和工作年限的要求。哈萨克斯坦奇姆肯特的“联盟”银行成为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二家是8月26日出现的列宁格勒的“专利”银行,第三家为莫斯科合作银行,第四家是“莫斯科贷款”银行。第12家是“商业投资银行”,第13家是“伏尔加汽车”银行,第16家是“汽车”银行,第20家是“民航”银行,第25家是“梅纳捷普”银行<sup>37</sup>。这类银行的数目迅猛增长:截止到1989年1月1日有41家,到当年7月1日为143家,其中54家为合作银行。到1991年年中,已超过



1500 家。

这方面具有典型意义的事例就是《消息报》记者 M. 别尔格尔所研究的俄罗斯最大的银行之一“梅纳捷普”银行兴起的过程。该银行未来的行长 M. 霍多尔科夫斯基在莫斯科化学工艺学院负责经济合同的工作。当时各学院能够为各工业企业签订完成科研项目的协议,工业企业拥有这样做的资金。但是,存在着另一种复杂情况:苏联对每个机构都规定了工资基金的限额。钱嘛,可以挣到,但不能把挣得的钱作为工资发放。

那时候,一部分经济合同款项开始经过青年俱乐部收转。1986年,当局准许青年俱乐部拥有自己的结算账户。这些俱乐部多数挂靠高等院校的共青团委员会和工会基层委员会以及共青团区委会。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其同志们成立了一个挂靠共青团区委会的“青年科技创造中心”。此后出现了新的复杂情况。工厂在收到了该中心的工作成果后延迟付酬。当时,工业危机已经开始显现。“霍多尔科夫斯基一伙”为了向工作在青年科技创造中心的工作人员支付工资,决定到银行贷款,并寄希望于用工厂拖欠的款额偿还贷款。然而,实际上办不到。

510

霍多尔科夫斯基及其同事们到社会住宅银行要求贷款,该银行告诉他们,只向银行提供贷款!于是乎,机智灵巧、善于随机应变的共青团员们决定建立自己的银行,起名为“梅纳捷普”,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取得贷款,起初“梅纳捷普”只是青年科技创造中心的辅助机构,后来成为一个强大的金融机构。

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有助于最初的商业银行积累资金的情形。有助于这种积累的原因纯粹是苏联固有的:苏联存在着许多种类型的资金,首先是现款资金与非现款资金。现款资金受到严格的监督与控制,首先是通过工资基金的限制。非现款资金的种类繁多——它们依支出项目加以分配(有些钱可以用来买家具,但不能用来买纸张或者办公用品;而另一些钱(限制使用方式)仅用于建筑工程;还有一些钱附有外汇补偿额等等)。此外,钱的花用必须按规定的期限,这一切

都受到严格的监督,要积累资金是不可能的。

在“梅纳捷普”银行及其同类的金融机构出现的时候,由国家预算拨款的企业将其部分资金转入新成立的商业银行。这部分资金从商业银行回归企业时已被因资金分类“淘洗干净”。这些企业只关心获得商业银行的贷款,却很少关心从这些银行中获取存款利息。对于它们而言,最重要的是保留并按自己的意愿使用资金。但是,商业银行在给新生的合作商业机构贷款时,已经要求借款人支付借款利息了。

稍后买卖外汇业务成为这种收入的来源。现在已经进入世界千家大型银行之列的商业投资银行亦曾有相似的命运。这家银行是在一个青年住宅合作社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建立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什么钱。普列汉诺夫国民经济学院的领导人直接参与了该银行的形成过程,他们在这一实验中主要看重的是教学任务——展示和讲清商业银行的运作程序。

成立商业银行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它是对旧的计划分配的金融体制的否定。与此同时,苏联金融体制的另一组成部分——中央集权制受到了破坏。各加盟共和国里出现了共和国的银行,后来各自治区域也出现了自己的银行,这些银行都不无成就地尝试实行独立于苏联中央银行的政策。

1991年1月,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并实施《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财产法》。根据该法律,俄罗斯联邦恢复了私有财产。私有财产的效用范围在数额与门类方面均未受到限制。承认对土地、资本与生产资料的私有财产权,允许建立任何规模与具有广泛活动范围的私营企业。企业主有权招收任何数量的雇佣工作人员。这是同苏维埃共产主义经济关系的彻底决裂。

苏共中央内部的一些批评者写道:“非国有化、私有化与新企业的建立,纷纷挤上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商业的轨道。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权利平等原则未得到遵守。”与此同时,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与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展始终一贯的工作,将俄罗斯联邦境内的全联盟企业改为由俄罗斯管辖。这样的情况使苏联各主管部门惊慌失措

和恼恨愤怒。

中央准备的调查报告称：“据现有的信息，或多或少明确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转归俄罗斯联邦管理的企业有：国家农业化学协会诺夫戈罗德氮生产联合公司，苏联重型机器制造部列宁格勒起重运输设备生产联合公司，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生产化学纤维并打算建立联合会的苏联化学石油工业部所属 15 家企业和 3 个科研所，图拉‘八度音’生产联合公司，材料学科研所及其所属‘埃利亚’工厂（泽廖诺格勒市，该厂生产总值 3.3 亿卢布），上萨尔金斯克列宁冶金生产联合公司（独家生产含钛轧材，拥有 19500 名职工，商品产值 8.58 亿卢布），加里宁格勒‘琥珀’造船厂（隶属苏联造船工业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木材和制浆造纸工业的各企业由全联盟转归共和国管辖。由于俄罗斯联邦政府的影响，1991 年 1 月 26 日，40 家水泥工业企业签订了一份议定书：组建俄罗斯国家水泥股份康采恩，退出全国性组织——矿物质建筑材料工业联合公司。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派专门工作小组在下列单位中开展目的明确的工作：吉尔汽车联合公司、伏尔加汽车联合公司、荣获劳动红旗勋章的莫斯科列宁共青团汽车厂、诺里尔冶金联合工厂、切列波韦茨冶金联合工厂、乌拉尔农业机械厂、各大型石油和天然气工业联合公司。”

苏联领导人面临丧失对最大型的工业企业的所有权，而这些企业决定着苏联经济、财政和国防的潜力。

俄罗斯领导人的这种活动亦有其政治衡量标准。请继续阅读这一文件：“许多劳动集体都积极开展了反对中央管辖的宣传工作。这种运动实质上是要使所有权脱离社会组织，当然首先是脱离苏联共产党。”

中央委员会已经没有抵抗经济非一体化进程的有效办法了。这一部门的官员仍然寄希望于“向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要求他们研究有关所有权和企业的全国性法律在这些共和国境内生效的问题，目的是不允许取消苏联对一切生产潜力的管理

权”，并“认为必须按规定程序提出建议，对《苏联及各共和国财产权非国有化与企业私有化立法法案》增补以下更加明确的条款（第6、14、20条）：全体劳动人员是企业惟一的所有者；在非国有化与私有化的进程中，向苏联企业的全体人员提供附加优惠条件；对于仍归全联盟所有与管理，并未处于非国有化进程中的企业的全体劳动人员提供保障、补偿和优惠条件。”<sup>38</sup>

全国范围内的经济危机在不断加重。用不着看统计数字，只要从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发现这种经济危机具有越来越严重的性质。商店空空荡荡，衣服鞋子无影无踪，任何家具都无法买到。巨大而空荡的贸易大厅里，售货员们悠闲踱步；橱窗都用塑料布遮挡，堆满了装着陈旧醋渍黄瓜的罐子。不但出现了购肉、油、糖和其他物品的证券，而且还出现了“顾客卡”——能够证明顾客为该城市居民的贴有照片的证件，以免把商品卖给“外人”——过路人。怨恨的人们排着长长的队，候购突然就会从商店里消失不见的香烟，购买在反酗酒运动秘密停止之后一直不曾见到的伏特加酒。商店里连香烟、食盐、火柴都脱销了！<sup>39</sup>城市里时而爆发“香烟”、“伏特加酒”骚乱。有一个传说，好像是戈尔巴乔夫本人在美国讲了一个关于自己的笑话。人们排成巨龙一般的长队，等候进入商店买伏特加酒。一个男子由于长时间等待而感到精疲力竭，声称马上要去宰掉搞成这个样子的戈尔巴乔夫。但是，他很快就回来了。前后左右排队的人问他是否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意愿时，这位男子叹息道：“那里排队想杀掉戈尔巴乔夫的人比排队买伏特加酒的人还多呢！”笑话归笑话，但是，居民对“改革时代的发达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绝对无效的愤恨，如同他们对“苏共内部的改革派”的愤恨一样，已成为一种政治因素。

对政权的痛恨与愤怒日益强烈。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已成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侦查员格德良和伊万诺夫直接控告许多政治局委员收受贿赂的行为受到了群众集会的支持。1989年春夏两季，举行了51次支持他们二人的群众集会，参加的人数达35万之众。几乎90%的群众集会都在莫斯科和莫斯科州举行。此外，列宁格勒、沃洛格达、彼尔

姆、车里雅宾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雅罗斯拉夫尔都举行了群众集会。全国都在更加积极而激烈地讨论党的机关享有特权的话题。虽然遭到了难以胜数的阻碍,不同的城市里还是出版了鲍·尼·叶利钦的回忆录《我的自述》,其中不少篇幅写的是与全国公民生活完全不同的党的高级机关所享有的不公正特权。

## 选举苏联总统

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发动的政治改革飞轮继续飞快旋转。这一次轮到各加盟共和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俄罗斯的情况引起苏联领导人的特别担心。在政治对抗明显加强的条件下,俄罗斯的选举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对全苏联的局势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选举准备工作开始提前进行。1989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主管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机构的委员会。为了巩固苏共在俄罗斯联邦的地位,党的领导人采取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不敢实施的步骤——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513

1990年1月15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该委员会主席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该委员会成员包括: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维·伊·沃罗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亚·弗·弗拉索夫、苏共中央书记奥·谢·舍宁、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和列宁格勒州委书记鲍·韦·吉达斯波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瓦·阿·科普秋格、苏共中央委员科罗廖夫(工人)、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B. A. 库普佐夫和Ю. A. 马纳延科夫、《苏维埃俄罗斯报》主编瓦·瓦·奇金,以及其他一些党的工作人员。

这次会议上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首先正是这次会议提出了关于俄罗斯经济主体这一概念的问题。毋庸置疑,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与研究具有超前的性质,提前研究了未来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但必须指出的是,早在1990年初,苏共中央内部就深入研究过俄罗斯主



权问题,后来正是苏共中央宣布这一问题为异端邪说,而把“主权化”的罪过推到苏共中央的政敌身上。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这次会议指出,俄罗斯开展了积极的竞选运动。选举前的几个月中,平均八个人竞争一个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席位;在各自治共和国的选举中,三个人竞争一个;在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中,一个半人竞争一个。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苏共的社会威望与影响减弱的明显证据。已经成为对抗现行制度象征的叶利钦的拥护者,在全国举行了成千上万次游行示威。

2月4日,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据多种资料,参加这次群众集会的人数为20万—50万。集会的组织者——尤·阿法纳西耶夫、伊·扎斯拉夫斯基、瓦·吉洪诺夫、列·舍马耶夫、С. 克拉萨夫琴科、А. 穆兹坎茨基——号召莫斯科人在选举中支持国家发展民主道路的拥护者。群众集会要求召开“圆桌会议”,为反对派提供机会,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对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戈尔巴乔夫的猛烈批评不绝于耳。

2月25日,莫斯科举行了新的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又有好几十万人要求苏共下台,批判戈尔巴乔夫。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喀山、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许多其他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党的机关没有找到对付这些示威游行的特别有效办法。<sup>40</sup>

国内出现了一种过去不曾知晓的新现象,这不是政党,而是一种群众运动,自称为“民主俄罗斯”(它在晚些时候的1990年10月才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但其实际活动在当年春季就已经开始了)。“民主俄罗斯”的组织遍布俄罗斯所有大城市,它们直接影响到竞选运动,支持那些成为“民主俄罗斯”的拥护者的候选人。国内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了政权的反对派。

1990年3月4日举行了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这一次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为候选人的叶利钦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他的竞选

承诺之一是修订俄罗斯联邦宪法,设立总统职位,以候选人的资格参加俄罗斯总统的全民选举。

在竞选运动中,他号召取消宪法第六条,该条宣布苏共为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他坚决主张通过关于所有制和土地的各种法律。叶利钦声称,俄罗斯应该成为总统制共和国,而未来的总统应该暂时不是其所在党的党员。

他还提出了一项建议,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该项建议: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建立7个俄罗斯共和国<sup>41</sup>。

这些新的政治现实迫使戈尔巴乔夫采取一些政治策略。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已经不能为维护他的政治地位起到保障作用了。就连迫使戈尔巴乔夫经常同日益强烈的反对派情绪作斗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地位也不稳固了。苏联总统职位的设立使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国家的总统“平起平坐”,巩固了他在政权系统中的地位。而且当时有可能不用通过苏联公民投票,而是通过“捷径”,即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总统。诚然,许多代表可能将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同另一种宪法修正案——取消臭名昭著的宪法第六条(该条将苏联的一党专政合法化,宣布苏共为苏联“政治体制核心”)联系起来。在走向总统职位的道路上,必须预先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与例行的中央全会的支持。

1990年3月7日,召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例行工作会议。列入议程的问题如下:

——苏共中央(1990年)三月全会召开程序;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就政治体制(苏联宪法第六和第七条)诸问题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的决议; 515

——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Г. П. 拉祖莫夫斯基就第一个问题——全会的准备问题作报告。戈尔巴乔夫打断报告人:“还有一个问题你没有讲出来。如果代表大会通过决议,建立总统制政权,那么我们还要

开会商讨党内总统职位的候选人。”

政治局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提供的信息使戈尔巴乔夫滔滔不绝地发表一通不满的意见。卢基扬诺夫很了解代表的情况。他说，如果将宪法修改问题（设立总统职位和取消第六条）列入代表大会议程，许多代表可能提出解释总统候选人的问题。这是戈尔巴乔夫不喜欢的事。往后更麻烦。让我们引用《政治局会议工作记录》：

“戈尔巴乔夫：等一下，别吓唬人。

卢基扬诺夫：我没吓唬人，我只不过有什么说什么……有些人已经提出了问题。第一个问题，苏联宪法修改之前不选举总统。有了新宪法再选举。第二个问题，只能在普遍选举的基础上选举总统，这种普遍选举不能立刻举行。应该先修改宪法，之后在普遍选举的基础上选举总统……现在谈谈他们的观点。第一，什么国家的总统？似乎不存在总统是一次选举出来的国家。因为这是邦联，而不是联邦。

戈尔巴乔夫：对于他们来说不存在，而对于我们来说存在。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好让他们有所感觉……不那么放肆。

卢基扬诺夫：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匆忙？为什么现在就做，能不能推迟？

戈尔巴乔夫：为了让他们有自知之明……顺便说说，我同加韦尔谈话的时候，他谈到总统制时说：‘这个我赞成，我赞成。’”

阅读这则《工作记录》，你不但会注意到戈尔巴乔夫对总统职位有巨大兴趣，他每时每刻都在怀疑自己的老战友们不够忠实，而且会注意到他对现实情况的不切合实际的理解。戈尔巴乔夫只求得到加韦尔的支持有什么价值呢？对于政治局委员们来说，加韦尔何许人也？他是一个持不同政见的作家，昨天他还是个流刑犯，一个反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是个敌人。这样的剧作家和不问政治的作家在苏联有好几十个。他们挤满了莫尔多瓦的集中营和精神病医院。正是聚集在政治局会议

大厅里的这些人用飞机将他们运送到国外。他们也会很乐意地把加韦尔打发到更远的什么地方去。可是戈尔巴乔夫却强迫他们这些政治局委员听信持不同政见者加韦尔说的“我赞成”，还希望“布拉格之春”的葬送者的政治继承人支持他。

卢基扬诺夫继续援引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反对派的话说：“最后一点，为什么不是人民做直接的选民呢？这是对人民的不信任。这一切将成为泡沫。”他还提到了一件令人感到鼓舞的事实——跨地区议员团不会提出顶替戈尔巴乔夫的候选人，“但不知何故农业专家团提出了这样的候选人，他们希望有自己的总统，那个艾达克<sup>42</sup>就像掉进冰窟窿里一样东奔西跑，忙得不可开交”<sup>43</sup>。

这次讨论中突然闪现出一个确实令人焦虑不安的念头：如果一些加盟共和国（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的代表团拒绝参加苏联总统的选举，那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是否将意味着，这些共和国可能以此种方式宣布：它们不但拒绝参加苏联总统的选举，而且还不承认它们留在苏联的合法性呢？总统选举会不会成为迈向取消苏联的一步呢？

戈尔巴乔夫立刻就把这一问题化繁为简，用习惯的方式来处理——最好是做做代表们的工作。

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焦心忧虑的权力更多，他说：“不，问题不在于代表们，问题在于各个共和国。”

然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很少能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着急上火。更多地让他着急担心的是他自己当选为总统的程序。谁将向代表大会报告宪法修改之事呢？有两位法律学者——尤·哈·卡尔科夫教授和瓦·尼·库德里亚采夫院士，不过他们又不适合做这件事（戈尔巴乔夫认为“这不大严肃”）。如果让善于驾驭代表大会与最高苏维埃的阿·伊·卢基扬诺夫作报告，那就是另外一码事了。

“阿纳托利·伊万诺维奇·卢基扬诺夫对选他为报告人一再躲避；但这是主席与其第一副主席之间的普通争吵。这一点甚至可以说。我认为，不应该有另一种情况……”——米·谢·戈尔巴乔夫就

这样为争论作出了总结。

1990年5月15日,在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米·谢·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还保住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同时宪法第六条被取消了。在就设立总统职位问题的辩论中,努·纳扎尔巴耶夫第一个发言。他热烈支持设立这一职位,指出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职位的时候已经到了。米·谢·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没有料到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会走这一着棋<sup>44</sup>。

联盟总统职位的出现成为各共和国效法的先例。政治主权化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联盟解体进程被赋予了正式的法律框架。

517 戈尔巴乔夫的战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安·梅德韦杰夫后来写道:“代表大会上我们赞成刻不容缓的总统选举,与其说是出于原则性的理由,倒不如说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而且宪法也规定了全民选举。”<sup>45</sup>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惊讶——苏联向来是中央有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各个共和国,甚至各个州都照搬模仿,向来如此。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但仿效设立总统职位,而且多数加盟共和国也仿效设立总统职位的机灵巧妙的手段——即通过听话的人民代表大会。苏联解体进程具有了新的加速度。

## **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和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国家主权宣言**

政治局的例行会议对俄罗斯联邦的选举进行了总结。直接选举在俄罗斯尚属首次。当局没有采用一年前用过的那种方法,即为各社会组织分配代表名额。入选人民代表大会的妇女、工人和农民较少,各企业和部门的领导人较多,达22%;一大批代表选自各护法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卫生、科学、新闻部门。大约有11%的代表是党的机关的代表。从组织隶属关系来看,86%的代表是共产党员。然而到1990年,统计数字并未使人乐观。党的统一已成为过去。选民们善于把普



通党员和党的官员区别开来。伊万诺沃、卡累利阿、马加丹、诺夫戈罗德、奥伦堡和彼尔姆这六个州党的州委第一书记全都落选了。

其实,对报告选举的结果维·伊·沃罗特尼科夫倒是颇为乐观。据他统计的结果,1029名代表中大约有220—250名坚决支持“苏共民主讲坛”<sup>46</sup>。他认为,反对派将占代表总数的20%—30%。

还是那个沃罗特尼科夫指出,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选举输了。在这两个城市里,60%—90%的当选者支持“民主俄罗斯”的观点。

沃罗特尼科夫尚未来得及结束报告,人们立刻抛出一个又一个问题攻击他。中央总书记助理伊·季·弗罗洛夫院士第一个提出问题:“我有这样一个问题,现在能否认为,俄罗斯的苏维埃政权就是工农政权呢?”沃罗特尼科夫又重复一遍,更加明确地说:“工人和农民占6%,不算集体农庄主席占6.7%。”

戈尔巴乔夫对这一挑衅性的问题给予了回答:“那么以列宁为首的工农政府呢——它是不是这样的政权呢?”

党的官方思想家瓦·安·梅德韦杰夫试图将谈话避开这个危险的话题:“这是另外一码事。”

戈尔巴乔夫并没有忘记严厉而尖锐地狠狠批评党的领导人,因为俄罗斯的代表总数中只有10%多一点的工人。莫斯科市委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替自己辩解——选举运动中工人们放弃自己的候选资格。他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们遇到了严重的麻烦。无论是工人,还是坚持党的立场的科技知识分子的代  
表,他们都不打算参与竞选运动……他们经不住任何竞赛,因为‘民主俄罗斯’打出的口号是:缩短分房排队时间——由10年减到3年。这不完全切合实际吧?  
可是人们就听这个。向每一位莫斯科人提供宅旁园地。然而,我们现在需要50万块宅旁园地……”

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B. A. 伊瓦什科在讲述同时在乌克兰举行的选举时指出,乌克兰代表中的反共分子大约占25%。许多经理、厂长首次当选。此外,他指出,该共和国内传播着这样的流言:乌克兰要把每一千公斤粮食的860公斤卖给莫斯科。伊万什科继续说:

“人们认为,乌克兰生产的工业产品只剩下5%还留在乌克兰……我们对这一点做好了准备,因为立刻脱离苏联的各种问题随后就会提出来。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我想,近时乌克兰将出现一大批政党或者所谓的政党。……我们不想反对各政党的建立。我们深信,这除了可以提高他们的威望以外,暂时还不会导致任何结果。我们倒是希望我们那里的政党尽可能多一些。”这位乌克兰共产党的领导人一边抱怨该共和国的部分共产党员支持民族主义的、反共产主义的运动“鲁赫”,一边讲了当时传遍乌克兰的一个笑话。这个笑话讲的是敖德萨的一个布尔什维克,刚刚庆贺过自己在苏共的70年党龄。当问及入党的情况时,他回忆起1920年,当时他一下子报名加入48个政党,指望其中一个会取得胜利。

伊·季·弗罗洛夫根本没有受到这位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幽默情绪的感染。他在政治局的发言近似于歇斯底里大发作。他强烈抗议过低估计局势的危险性:“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承认我们失败,这明摆着是一次失败。……我觉得,有些数字非常令人怀疑,例如,我们究竟得到了多少支持党员的投票,等等,因为我们都知道——的确有分裂。波波夫还在党内,尤里·阿法纳西耶夫还在党内……然而问题不在于此。我认为,我们最大的疏忽就是没有在生产集体中开展工作。我们抛弃了工人和农民——这就是我要直截了当、开诚布公对你们说的话!我们简直就是抛弃了他们!目前独立运动在列宁格勒开始发展,这不足为怪……阿法纳西耶夫等人不想退党,为的是在代表大会上(即将来临的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作者)炸毁党。我们应该更加坚决地清除老干部,由于他们的缘故我们会丢掉党。我们的情况同东欧其他各国的情况区别不大。……最后一点。他们当然有威力强大的炸弹,我不晓得是什么样的,是热核子弹或者别的什么东西,会采取什么方式,以俄罗斯机构的形式,或者以党的机构形式,或者以这些苏维埃的形式。它们会断送我们的整个联邦。因此,正是波波夫之流及其他人——阿法纳西耶夫和叶利钦倒向他们,这并非偶然……需要的恰恰是党的决议……应该做出明确决定,应该通过决议。应该转入反

攻……否则,代表大会将造成这样的情况——我们自己甚至都没有察觉,我们已经处身于另外一个我们陌生的异国他邦,处身于另外一个我们陌生的政党……”

他的发言得到了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弗·亚·克留奇科夫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的附和。克留奇科夫说:“我们不是最后,也是倒数第二——这是确定无疑的。”雷日科夫则证实,反对派“把重点放在俄罗斯……倘若他们夺取了俄罗斯,那么不用花费很多工夫,就能摧毁联盟,抛弃中央的领导,抛弃党的领导,抛弃苏维埃的领导,抛弃政府”。 519

雷日科夫对报刊、包括党的报刊予以谴责,认为报刊“在打击自己人”。利加乔夫支持他道:“我们对任何印刷出版机构都没有采取过任何实际行动。”这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特殊反应:“叶戈尔·库兹米奇·利加乔夫,我这样理解你的意思,你所讲的‘实际行动’,就是你理解的‘撤职’、‘解雇’、‘开除’。”

戈尔巴乔夫试图安抚自己的同事:“伊万·季莫费耶维奇(弗罗洛夫——作者),我不同意这是失败。……分析表明,党已经脱离了休克状态。许多组织大体上都积极开展了活动……您瞧,多少书记守住了阵地,多少执委会主席和区委书记通过了考验。我想,从这种意义上讲,党开始学会同反对派力量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看到这一点很重要,应该给予支持……目前党正是应该这样采取行动。党应该有机地融入新的政治体系,包括在各级苏维埃中巩固自己的作用与地位。至于俄罗斯联邦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同志们,那是完全有条件取得胜利的。但是需要切实认真地做代表们的工作。”<sup>47</sup>

戈尔巴乔夫使人放心的语调不大符合现实情况<sup>48</sup>。来自跨地区议员团、“民主俄罗斯”群众运动的威胁已经成为近乎习见,除此以外,苏共领导人还不得不面对党内日益强大的反对派。对苏共改革派的批评日益强烈,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梅德韦杰夫、谢瓦尔德纳泽被视为改革派。历史现象的离奇之处在于:两种与戈尔巴乔夫为敌的力量——相互对抗的力量都在想方设法利用新的俄罗斯政治机构来既反

对对方又反对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对于“民主俄罗斯”而言,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与在其基础上组建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就是这样的机构;而对于苏共内部的保守派来说,这样的机构则是正在创建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戈尔巴乔夫腹背受敌,他后来的活动则变成了在这两种力量之间施计用谋,随机应变。

与戈尔巴乔夫领导的筹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相对抗的是苏共内部的共产主义传统派,其中心在一个时期内是列宁格勒。在苏共列宁格勒州州委会的明显支持下,负责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筹备工作的列宁格勒倡议委员会出现了。自1990年4月的头几天起,该委员会开始向俄罗斯所有的党组织发函。所有信息都是由苏共列宁格勒州委使用专电并经州委领导同意发出去的,收电人均均为苏共各边疆区区委、州委、市委和区委第一书记。“倡议委员会委员们”打算于4月21—22日,即比俄罗斯联邦委员会拟定的时间大约提前一个月召开成立大会。他们利用了由苏共控制的报纸,如《俄罗斯文学报》、《老战士报》、《列宁格勒真理报》。

520 然而,对苏共改革派的进攻并不是仅仅限于“倡议委员会委员们”。形势令人不得不回忆起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时刻,其相似之处在于,败坏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谢列平和谢米恰斯内发明的这一术语已被使用了长达30年之久)的材料开始通过各种官方情报渠道呈报苏共中央。戈尔巴乔夫当选总统后成为苏联二号人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阿·伊·卢基扬诺夫,越来越明显地成为谢列平的后继人。1990年4月19日,最高苏维埃向苏共领导发了一份《苏联最高苏维埃所收信函简评》<sup>49</sup>。

这份材料称:“苏联最高苏维埃经常收到公民、劳动集体的呼吁书,提出进行思想道德教育以及报刊、其他大众新闻工具在这方面的作用问题……寄信人——共产党员和非党人士、知识分子代表、工人、村镇居民、战争老兵和老职工,都强烈谴责利用意见多元论来败坏苏联共产党、社会主义的列宁主义原则、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理想的声誉。

有些来信说,‘基础的基础——爱国主义教育已被遗忘’;在介绍我国历史、苏共历史、改革实践时,毫无根据地歪曲真实情况,毫不掩饰地诬蔑所走过的道路,对已经取得的成绩和一些消极现象出现的原因,没有给予鲜明而准确的评价;怀疑我们的道德和精神目标、苏联人民的社会主义选择……

为什么对社会主义的攻击没有得到应有的回击呢?为什么党沉默不语?是不是因为有过一段虐待压迫、违法乱纪的非常糟糕的时期而感到羞愧与尊严受损呢?反对人民的人以公正的口号作掩护,在竭尽全力开展活动。人民群众的意识还没有这么高,每个人还不能独立辨明是非……

醉心于批判与诬蔑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斯大林及其他领导人当政时期所拥有的一切,这难道还不过分吗?人们的情绪不但悲观抑郁,而且有爆炸的危险。战后,人们未曾感到如此艰难和毫无希望,因为一切的一切,苏共、政府、军队、警方,连他们自己在内,都受到了尖锐批评。苏联爱国主义精神现在更无从谈起,人们都想说服我们相信,现在没有任何苏联的东西了,他们说,甚至在落后的国家里反而倒好一些……”

在苏联的政治传统中,类似的简评(这只是许多文件中的一份!)不但是一种信息工具,而且是向政权施加压力的方法。戈尔巴乔夫本人非常清楚这一点,他在自己的圈子里非常气愤地提到卢基扬诺夫说:“他干吗用社会舆论、群众信件吓唬我呢?人民支持我吗……”<sup>50</sup>

对于苏联政治传统而言,官方报刊登载公开批评一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资料实为史无前例之举。1990年5月5日公布的《军人对苏联总统的呼吁书》便是一例,其中猛烈批评了戈尔巴乔夫解决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冲突的政策。

然而,社会舆论根本变化的证据是莫斯科红场5月1日事件,即五一游行时发生的事件。自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年代起,五一游行便是共产主义政权的一种象征。但是这一次五一游行中,数千人举着“政治局下台”、“打倒苏共”、“打倒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标语,高喊“戈尔巴



乔夫下台”；游行队伍举的不是红旗，而是1917年革命后禁止的俄罗斯历史上的三色旗。对苏联共产党、政治局、戈尔巴乔夫本人的羞辱迫使戈尔巴乔夫走下列宁陵墓观礼台。

1990年夏天，一下子发生了几起重大的政治事件——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苏共第二十八次（后来想起，这竟成为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俄罗斯成为主要话题，重心逐渐转到俄罗斯了。

戈尔巴乔夫的地位迫使他于虎穴狼窝之间，在两种威胁之间搞平衡，在寻求未来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机构作为自己避难所的苏共保守派，与以叶利钦为首的指望得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中关键位置的急进民主派之间搞平衡。

考虑到参加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的代表对苏共领导进行严厉而尖锐批评的危险性，由戈尔巴乔夫担任主席的中央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于1990年5月初详细讨论了即将召开的成立大会的准备问题。戈尔巴乔夫向这次会议的参加者讲出了自己的忧虑：“……他们（工人和农民——作者）的意见是，我们没有保卫党，没有推荐他们当苏联人民代表，俄罗斯联邦也没有做成这件事……什么情况在发生呢？目前44%的代表是党的工作人员……代表中工人占9%，集体农庄庄员占3%多一点。总共有136名妇女当选。这一切都非常令人焦虑不安。代表大会和俄罗斯代表会议召开的时候，社会上的人们会说：机关工作人员又聚会了。我们说过这是机关工作人员的党，正是他们在坚守着支撑着，在保卫自己的职位、自己的金饭碗。我几乎是逐字逐句地引证要说的话。……究竟怎么搞成这个样子的？这种进程仿佛是由我们造成的。目前政治局有这样的想法——邀请200和350名工人与农民以嘉宾身份分别参加俄罗斯代表会议与代表大会……邀请嘉宾并提出建议，以便让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向他们颁发当选证书……我认为这是最后的尝试，是我们所能做到的一切……”

不言而喻，这样的翻跟斗同已经宣布的代表大会代表推举的民主程序相矛盾。结果是：在全国各级党组织中的当选者与政治局认为可

以作为嘉宾参加代表大会的工人与农民享有同等权利。政治上的考虑又一次占了上风。与那些当选者相比,被请来的客人将更容易操纵,这样的希望促使重新审定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分配原则。

这次会议的与会者当中有人意识到了紧急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必要性(一位与会者说:“拖延就等于我们的灭亡。我和你们真的快灭亡了,我们真是在受毁坏被驱逐哇……我们已是八方被围,四面楚歌。只要某处一拖延,又会抛出许多帽子……况且你们都知道,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我们已经错过了一切。”)和在即将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提出几种纲领(从正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到社会民主的与改良主义的纲领)的危险性。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这一职位的潜在候选人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负责俄罗斯党组织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尤·马纳延科夫、负责国防工业部门工作的苏共中央书记奥·德·巴克拉诺夫和苏共州委书记伊·库·波洛兹科夫、尼·伊·马利科夫、列·瓦·沙林<sup>51</sup>。

522

1990年5月16日,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工作。从代表大会工作的最初时刻起,就展开了争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这一关键职位的激烈斗争。鲍·尼·叶利钦是这一职位的争夺者,其对手的对手中情况复杂。起初拟议由亚·弗·弗拉索夫竞争这一职位,当时弗拉索夫担任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过去他在西伯利亚(伊尔库茨克和雅库特)是党的工作者,担任过苏共车臣—印古什州委第一书记、苏联内务部长。但是他在代表大会上的表现却不成功。叶利钦也未能获得胜利。获胜者应该得到代表大会与会者50%的选票加一票。他们得了大致相同数量的选票。苏共领导采取了机动灵活的策略,提出了另一位候选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委第一书记伊·库·波洛兹科夫。

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发言时说:“中央多年的帝国政策造成各加盟共和国目前的地位不确定,它们的权利、义务与责任模糊不清。属于这种情况的首先是俄罗斯,由于陈旧过时却仍然拼命挣扎的行政命令体制,俄罗斯受到的损失最多最重。劳动生产

率居全国第一位,而用于社会需要的经费比重却处于最末的第十五位,这样的状况再也不能容忍<sup>52</sup>……不具备生气勃勃的政治主权,便无法解决一个共和国的各种问题。只有政治主权能够协调俄罗斯和联盟的关系,协调俄罗斯内部各自治领域之间的关系……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央,这样的问题还不该提出来吗?”<sup>53</sup>他号召通过俄罗斯国会致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国会与人民书,建议刻不容缓地开始进行谈判,找到新的相互都能接受的合作形式。

无穷无尽的群众集会在莫斯科接连举行,成千上万封书信和电报飞临代表大会会址,表示支持叶利钦。大会代表受到的强大压力未见停止。

523 戈尔巴乔夫本人也干预了竞选运动<sup>54</sup>。他来到大会代表中间,召集一些共产党员开会,要求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叶利钦当选。他的讲话证明了他个人毫不掩饰的对自己政敌的仇恨,而对代表大会的与会者却很少起什么作用。波洛兹科夫同样未能获得所需数量的选票。他在大会上的讲话甚至使得叶利钦的竞选对手的地位有几分恶化了。共产党领导人只好重新恢复弗拉索夫的候选人资格,以为他比波洛兹科夫在代表中间更受欢迎。弗拉索夫确实多得了几张支持自己的选票。但是,据俄罗斯联邦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与会者们所述,原先支持波洛兹科夫的印古什代表的选票都转投叶利钦了。这一情况或者别的什么情况帮助叶利钦比当选要求的票数多得了4票。俄罗斯联邦1060名人民代表中对他投支持票的有535人。他的主要对手亚·弗·弗拉索夫得票462张。

毫无疑问,叶利钦的当选改变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俄罗斯开始成立以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为首政府,西拉耶夫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工业家、航空工程师,具有极其丰富的国务活动经验。他不但是叶利钦的支持者,而且是非常懂得必须在全国与俄罗斯实现经济与政治改革,并致力于在苏联的框架与范围内实现这些改革的人。新政府的方针明显是改良主义的方针,特别是在当时以尼·伊·雷日科夫为首的联盟政府活动的背景下更是如此。可资证明这一点的是任命

格·阿·亚夫林斯基为俄罗斯政府副主席兼国家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亚夫林斯基以前是苏联部长会议机关工作人员,苏联经济向市场关系过渡纲领——著名的“500天”纲领的制定者之一;任命年轻的追求功名的B.Г.费奥多罗夫担任财政部长,此人不但具有联盟权力机关的工作经验,而且具有国际金融组织的工作经验。该政府毫无疑问懂得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由于1992年初全国经济领域中发生的三次巨大变化而被人们不公正地置于脑后的以西拉耶夫为首的头一个政府,在各项改革的准备工作中,在向社会意识灌输全国经济生活实行深刻变革的必要性和现实性的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990年6月12日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联邦国家主权宣言》是业已开始的变革的外在表现。这一宣言几乎是一致通过的。后来该宣言被国内左派力量评价为苏联解体的开端<sup>55</sup>。然而,请读者注意:为了“战胜”自己的政敌,苏共中央本身参与了拟制俄罗斯经济主权构想,迎合了民族主义趋势,即便这种趋势有助于同叶利钦及其拥护者们开展斗争。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大会于1990年6月19日开始工作。当选苏共二十八代表的俄罗斯党组织的代表们参加了大会的工作。大会嘉宾也参与其中工作,成为大会的全权参加者。俄罗斯共产党成立大会的开幕是向苏共改良派的立场发起进攻的开始。发言的代表们无一例外谴责苏共中央政治局,特别是谴责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背叛党的利益;谴责他们姑息纵容,从而“使党受到犯下一切罪过的指责,将历史上的所有污点、面目不清的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贪赃受贿的责任全部推给现在的共产党员。在总书记周围最亲近的一些人有针对性的协助下,我们逐渐陷入一种新的个人(戈尔巴乔夫——作者)崇拜,<sup>56</sup>哪怕这种个人崇拜具有民主的形式,我们对它还不习惯。”

围绕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候选人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结果是伊·库·波洛兹科夫当选为第一书记。此人以不喜欢改革、不喜欢国家发展的任何自由主义倾向而著称<sup>57</sup>。

俄罗斯出现了分裂。共和国立法权力机关的首脑为鲍·尼·叶利

钦,改革的希望同他联系在一起。俄罗斯共产党的首脑是伊·库·波洛兹科夫,他敌视改革,是个正统的共产党人。

国家就这样步步走近苏联共产党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关于苏共二十八次,当时就有许多说法,例如说什么很多与会者对民主制是拥护的,什么大会上保守势力与改良势力发生对抗,什么保守派与改革派发生冲突。然而,这次代表大会给任何一位不抱成见的观察者留下的是“没有什么斗争”的印象。保守派与改革派、改革的拥护者与反对者都已经没有兴趣。党已经退出了全国政治生活中心,它已经陈旧无用了。二十八次的最高潮是叶利钦宣布退出苏共。作为大会代表的他声明,鉴于他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考虑到社会正过渡到多党制”,他不能再执行苏共的决定<sup>58</sup>,于是他示威似地离开了会议大厅。叶利钦离开了戈尔巴乔夫于1987年10月驱逐过他的地方,离开了他曾经试图获得全苏党的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代表保护的地方。他就这样脱离了苏联共产党。

## “500天”纲领的命运

1990年夏天,经济改革的紧张准备工作开始了。无论是联盟领导人,还是各个共和国都意识到了经济改革的必要性。联盟领导人开始准备实行经济改革是在1989年。当时的苏联政府首脑尼·伊·雷日科夫评价这一工作时写道,改革的目的是建设“与现代文明相称的民主社会主义”。客气点说,这是对改革目的下了一个并非很具体而又绝对不科学的定义。我们继续援引雷日科夫的话:“政府1989年选择的方案是,将深化改革的有效的措施同各级管理层的深思熟虑相结合。我们正在走向市场,希望首先能稳定局势,而后朝着商品货币关系更加发达的体制继续前进。”<sup>59</sup>

525 请注意“雷日科夫式经济改革”的两个关键原则。首先,他宣誓忠于社会主义,这有其经济价值:保持国家管理经济的作用,承认国家的社会保障作用,不能把失业视为工业结构变革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其



次,先稳定业已存在的经济,而后再进行改革。然而,这可是一项完不成的任务。国家实际的经济状况证明,政府没有保障稳定所需要的资金<sup>60</sup>。生产规模与产品数量开始压缩与减少,通货膨胀的趋势日益增大,国家预算赤字不断增长,国家的黄金货币储备锐减。1990年苏联的国家黄金储备484.6吨,到1991年9月1日仅剩264吨。1991年进入国家储备的黄金为250吨,而政府拿去出口的黄金达269.1吨。

严肃认真的经济学家当时非常清楚,必须采取改变经济政策的紧急措施,需要实行价格改革,削减对无效生产部门的国家补贴。但是,对各加盟共和国在实行改革中的作用,改革的速度,国家调控的作用如何评价,存在着原则性的区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列·伊·阿巴尔金院士领导的机构拟制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指望成为经济改革纲领的文件。第一份是经济改革构想(后来称其为雷日科夫—阿巴尔金纲领),于1990年4月提供总统委员会和联邦委员会讨论,并于1990年5月24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讨论。这一构想的根据是尼·伊·雷日科夫提出过的三个目标。

另一个构想同样产生于阿巴尔金小组,是年轻的经济学家扎多尔诺夫、米哈伊洛夫和亚夫林斯基制定的<sup>61</sup>,名曰“400天”纲领(后来称做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或“500天”纲领),要求必须彻底地改革经济,其中包括放弃国家的调控作用,广泛实行私有化,放弃国家的价格政策,承认市场的调节作用。雷日科夫写道:“我不把它当回事,我建议不要注意那些次要的事情。”<sup>62</sup>

其他一些人——雷日科夫的政敌却把它当回事。俄罗斯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在解决由谁担任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这一问题的时候,总理的候选人米·亚·博恰罗夫向代表们介绍了这一构想。应该指出:博恰罗夫的讲话对千百万电视观众和无线电广播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印象。博恰罗夫没有获得总理的职务。伊·斯·西拉耶夫当上了政府总理,公众对“400天”纲领(在这一事件的过程中被更名为“500”天纲领,并以此名称著称于世)的兴趣导致到西拉耶夫聘请亚夫林斯基担任政府的副总理。

“500天”纲领得到了俄罗斯政治领导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西拉耶夫的支持。这一激进的纲领受到了新闻媒体的广泛支持。1990年7月底,戈尔巴乔夫与雷日科夫举行会晤。戈尔巴乔夫说,他同叶利钦进行了交谈,叶利钦认为,政府的纲领不会起作用的。“他支持‘500天’纲领。也许,不会发生冲突吧!”照雷日科夫的话说,他赞同与俄罗斯领导人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以叶利钦和西拉耶夫为一方,以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为另一方,双方于1990年7月27日签订的合作协议巩固了这一协商结果<sup>63</sup>。以斯·谢·沙塔林为首的俄罗斯—联盟经济学家小组成立了,该小组受命完成共同改革纲领的制定工作。

这意味着正式拒绝了已提交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雷日科夫—阿巴尔金经济改革构想。

一个问题立刻就产生了:戈尔巴乔夫为什么决定重审已经讨论并赞同的改革计划?或者说,为什么他决定同自己的敌手叶利钦结成仿佛有点反常的联盟?这里至少有好几个原因。首先,二十八大前夕及二十八大期间,曾经受戈尔巴乔夫严厉而尖锐批评的“党内同志”对戈尔巴乔夫的压力日益增大,他从总书记的宝座上下台的危险越来越大。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处境也日益艰难,因为一些坚持不改变苏联的组织原则、并责备戈尔巴乔夫放弃这些原则的代表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后来这一代表团获得了正式的地位和“联盟”这个名称。取代戈尔巴乔夫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阿·伊·卢基扬诺夫成为这些代表公开的庇护人。)

苏联国内的政治形势也日益严峻了。一些加盟共和国通过了主权宣言。1990年3月9日格鲁吉亚通过这一法令,3月11日——立陶宛,3月30日——爱沙尼亚,5月4日——拉脱维亚,6月12日——俄罗斯,6月20日——乌兹别克斯坦,6月23日——摩尔达维亚,7月16日——乌克兰,7月27日——白俄罗斯。联盟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冲突开始“带有国际化的色彩”。哈萨克斯坦、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立陶宛的冲突

数量增加,其他一些国家开始希望充当这些冲突的调停人。为了应对立陶宛与联盟中央之间日益激烈的冲突,充当调停人的弗·密特朗和赫·科尔于5月和6月致函莫斯科和维尔纽斯的领导人。在密特朗与科尔的压力下,通过了暂停实施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恢复立陶宛独立宣言》的决定,双方答应开始举行谈判<sup>64</sup>。

这迫使戈尔巴乔夫宣布必须对苏联进行变革。他在党的二十八大报告中宣称“需要一个真正的主权国家联盟”。将苏联改造成为主权国家联盟的建议没能得到多数政治局委员和苏联最高苏维埃领导人的支持。在这些条件下,戈尔巴乔夫原先的对手、已担任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叶利钦成为他的临时盟友。在联盟与俄罗斯的有关机关赞同“500天”纲领的前提下,实现这一纲领的协同行动将会成为在苏联大部分地区保持统一经济空间的重要保障。 527

城郊的“松树”政府官邸里,联盟中央与俄罗斯的专家和政府官员为修改和协商“500天”纲领继续进行紧张的工作。通过这一纲领对叶利钦与戈尔巴乔夫都具有政治上的利害关系。两位领袖宣称,他们都要亲自监督这一计划的制定工作<sup>65</sup>。对于两位领袖而言,这一纲领将成为新联盟条约和其他在新的基础上巩固联盟的条约的重要组成部分。

1990年7—8月是联盟中央与俄罗斯的领袖们立场相互接近的时期。他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似乎一去不复返了。他们经常相互打电话,向自己周围的人通报协商的结果。当时亲近叶利钦的莫斯科“民主俄罗斯”组织的领导人之一Л. А. 波诺马廖夫曾经对本书作者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明显满意地谈到了他同戈尔巴乔夫关系的改善,谈到了他和戈尔巴乔夫都很关心“500天”纲领的修改工作。据戈尔巴乔夫的助手阿·切尔尼亚耶夫回忆,戈尔巴乔夫也热情洋溢地说道:“最重要的事情开始做起来了,这是转入改革新阶段的彻底性突破……我们正在为改革奠定与之完全相符的基础……”阿·切尔尼亚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无论谈到什么事情,他(戈尔巴乔夫——作者)都不由自主地扯到这个话题。”<sup>66</sup>在所有表示愿意留在苏联之内的各加

盟共和国的范围内转入经济改革的思想得到了这些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联邦委员会和总统委员会在1991年8月30—31日工作会议上支持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500天”纲领。戈尔巴乔夫经常向自己的西方伙伴——M. 科伊维斯托、朱利奥·安德烈奥蒂、乔治·布什、詹姆斯·贝克、D. 赫德谈起他同叶利钦顺利而成功的合作，谈起“500天”纲领得以通过的极大希望，谈起在最近几个月就要开始进行切合实际的经济改革的打算<sup>67</sup>。

然而，这项协议激起了苏联部长会议的强烈反对。首先，“500天”纲领意味着中央要将广泛的职能交给各个共和国。使全部联盟管理机关成为无用多余。因此，这个纲领被指责以“瓦解苏联”作为自己的任务。这种指责绝对是不公正的，这并不是说这个纲领没有缺点，缺点很多。在很大程度上根据“500天”纲领各项原则进行改革的叶·盖达尔的实验说明，该纲领的构想有非常严重的缺点，考虑到改革的规模与范围，这本身不足为奇。更重要的是另外一点：“500天”纲领诞生于苏联部长会议内部，其制定者对于保留苏联都是坚定不移的拥护者，因为他们把苏联统一的经济空间理解为实现这一纲领必不可少的条件。该纲领的构想就是指望整个苏联经济向市场过渡。

528 然而，“500天”纲领的通过使对苏联政府的改革成为不可避免之事，并预先决定了政府首脑尼·伊·雷日科夫的离职。雷日科夫的副手、“稳定先于改革”论的忠实拥护者列·伊·阿巴尔金院士成为“500天”纲领的坚决反对者。中央领导作用的削弱，将一些最重要的经济职能交给各共和国，这一切为联盟国家打下了另一种政治基础，其后果是，联盟中央同各共和国之间存在着条约关系，各个共和国之间存在着双边条约关系。从而导致必须对苏联政治制度，即对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地位与作用进行重新审视。因此，实际上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达成协议的同时，对叶利钦立场的攻击就开始了，对他及其支持者的责难纷至沓来。在攻击叶利钦的同时，戈尔巴乔夫的地位也受到了削弱。

就在1990年7月28日，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互接近的最初

几周,苏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并通过了新建立的俄罗斯共产党书记 B. A. 库普佐夫的简要报告。该报告的名称为《如何看待各种政治组织和运动所发挥的主动精神及其实施的行动》。报告的实质是:确信各反对派势力正在准备于最近几个月夺取全国政权。据他断言,这些势力在各采煤区组织罢工,力求将苏共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B. A. 库普佐夫写道:“反对派的这些步骤同世界舞台上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越来越经常地表白‘不可能’同苏共结盟的思想,表达出相当一部分反对派复辟资本主义的愿望。”报告的作者认为,此情的证据是:反对派的领袖们打算于 1990 年秋季召开民主力量成立代表大会,而后努力达到提前解散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修改苏联宪法。库普佐夫断言道:“他们计划最近在俄罗斯联邦范围内正式核准这一战略。”准备效法东欧各国公民行动委员会或者公民代表大会举行“圆桌会议”和无休止的罢工,施加压力,迫使苏联总统辞职,夺取政权。

这大概是旨在拆散刚刚产生的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联盟的中央第一份官方文件,其中就有对“民主联盟”的领袖们所采取的“同经济和政治稳定相矛盾”的各种措施的指责。

“500 天”纲领尚未正式命名就被指责“旨在反对经济与政治稳定的措施”,或者将党的语言变成合乎常规的语言说,改革被指责蓄意损害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这正是“500 天”纲领所明确反对的。

事情越来越麻烦。8 月 2 日,颁发了苏联总统《关于制定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联盟纲领作为联盟条约基础的总统令》。该命令要求根据以苏联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苏联部长会议和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的共同协议,组建一个负责制定向市场关系过渡构想的工作小组,其成员是斯·谢·沙塔林、尼·雅·彼得拉科夫、列·伊·阿巴尔金、格·阿·亚夫林斯基。该工作小组受命在 9 月 1 日前提交这一构想。 529

一周过去了,1990 年 8 月 10 日,苏联总统办公室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亲信瓦·伊·博尔金向自己的首长呈报了一份《近期劳动者来



信简评》。大部分来信请求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整顿秩序,恢复过去“改革之前的”有价值东西。有的来信说:“报刊为什么要从精神上枪毙诚实的共产党员呢?”“党对自己的过去无可忏悔”。许多来信反对在全国实行经济改革。博尔金援引一封发自明斯克的来信称:“不言而喻,我们需要市场……但是需要的是社会主义市场,需要的是为了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杜绝直接或者间接利用任何形式的所有制剥削他人劳动的社会主义市场。”这些来信直截了当地批评实行经济改革的打算。《来信简评》称:“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渐地在几年使经济改革转向市场关系,并且在此期间要保证居民能够按国家稳定价格买到起码的必需品……从来信看,目前消费市场的状况使共和国(白俄罗斯——作者)居民对激进经济改革的消极后果深感忧虑。布列斯特州巴拉诺维奇市的一个居民写道,瞧一瞧那些空空荡荡的柜台,给人的印象是,仿佛我们的工业部门已经停止生产产品了。然而,要知道企业并没有停产,明斯克的工厂仍在继续生产冰箱和电视机。巴拉诺维奇仍在生产洗衣粉和鞋子。但是,一切东西都是凭票或者按预约销售的<sup>68</sup>。难道这不是怠工行为吗?”

上面我们已经写过,编写简评是影响党的上层人物的一种手段,另一面也是为了向国家的领导人提交他们所希望看到的東西。可以看出,这份简评的构想旨在反对可能实行的经济改革,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相互接近。

按照戈尔巴乔夫的命令组建的专家小组内部的合作未能形成。阿巴尔金及支持他的雷日科夫坚决拒绝接受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作为构想的基础,实际上否定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原先达成的协议,正是这个纲领应该成为向市场过渡的全联盟纲领的基础。

530 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下发了一些充满惊慌忧虑的文件,这些文件中说,“民主派”准备夺取政权,计划在近期组织起义。为了证实这种说法,当局竭力利用民主派人士的任何一种极端主义表现,如果这还不够用,则不惜利用国家安全委员会挑拨离间。值得注意的是,自1990年8月起出现了各地的州委书记与中央机关之间的合作,目的在于批

评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的行为。7月31日,下发了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党内宣传处提供的有关“民主论坛”的观点和思想的一份文件,这些观点和思想是“民主论坛”的代表人物——人民代表维·尼·李森科与瓦·伊·别洛夫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和伊尔库茨克提出的<sup>69</sup>。8月15日,政治局里传阅苏共沃罗涅日州委书记B.斯梅塔宁的一封信,他在信中报告了由B.И.诺沃德沃尔斯卡娅在沃罗涅日组织的群众集会的情况。这位诺沃德沃尔斯卡娅是虽然非常热闹却人数不多的一个名叫“民主联盟”的组织的领导人。她组织的这些群众集会只有几十人参加,他们打出推翻苏维埃制度和苏联共产党的口号,喊叫侮辱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言语,举着“戈尔巴乔夫是齐奥塞斯库,叶利钦是伊利埃斯库”,“打倒苏共!打倒国家安全委员会!”“戈尔巴乔夫是巴库、第比利斯、苏姆盖特的刽子手和杀人犯!”的标语牌。

8月底,有关西部乌克兰和立陶宛政治形势的简要报告出现了,其内容几乎都是关于苏联解体前景的令人惊慌失措的消息<sup>70</sup>。

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挑拨离间行为不仅增加了惊慌不安的气氛,而且导致政治反对派代表人物不可避免采取极端主义行动。以过去无人知晓的“俄罗斯民主论坛”的名义公布的所谓“90年行动纲领”,可以说是最重大的挑拨离间行动。在这份文件中,可以找到供苏共中央的领导人证明民主派正在夺取全国政权所需要的一切,例如号召建立国民行动委员会,建立新政权机构,号召不要服从,要夺取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财产,成立战斗队。当时,俄罗斯民主党、立宪民主党、俄罗斯基督教运动、俄罗斯农民党、社会民主党、“苏共民主纲领”<sup>71</sup>已经合并为全国性反对派组织“民主俄罗斯”,其领导人坚决不同意这个纲领,指出这份文件的作者之一——B.斯库尔拉托夫有同国家安全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嫌疑。

## 莫斯科郊外收获土豆的军队

对抗的气氛日渐浓厚。8月底,戈尔巴乔夫提前结束休假,他一回

到莫斯科,就立刻陷入了关于即将实行的改革的连续不断的激烈争吵之中。雷日科夫公开反对执行戈尔巴乔夫的指示,以自己的辞职和政府的辞职相威胁,十分肯定地说国家正面临着最严重的经济与政治危机<sup>72</sup>。总统委员会成员和联邦委员会的参加者发言反对雷日科夫,实质上赞同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联邦委员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531 如果雷日科夫不同意执行这个纲领,那么他可以辞职。叶利钦在得到其他各加盟共和国的同事支持后也表达了这一观点。

逐渐摆脱前任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阴影并开始独立自主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亚·伊·卢基扬诺夫,向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人声称:“如果你们如此行事,9月份最高苏维埃将抛弃政府,10月份人民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将被解散。决定进行新的选举,不迟于12月就会抛弃总统,撇开你们!”<sup>73</sup>

1990年9月初,《消息报》公布了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500天”纲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开始讨论这个纲领。也是在9月初,俄罗斯共产党在其代表大会上宣布这个纲领是反苏的,是对资本主义的投降。每天有千百份电报摆在戈尔巴乔夫的办公桌上,报告全国日益严重的犯罪情况与抢夺“面包”、“香烟”的骚乱情况<sup>74</sup>。

1990年9月事件中有许多未被彻底查清的情况。可以肯定地说,关于这些情况的许多文件在9月份已经被销毁了。这里所说的是空降兵司令员弗·阿·阿恰洛夫上将于1990年9月8日向一系列空降师(图拉空降师、普斯科夫空降师、贝尔格勒空降师、考纳斯空降师和基洛瓦巴德空降师)的师长下令,在收到“按照南方方案进入一级战斗准备”的指示时向莫斯科推进。<sup>75</sup>亚·伊·列别德一再强调说,命令是口头下达的,尽管曾有书面命令。当时担任空降兵参谋长的E. H. 波德科尔津将军,后来在接受《论据与事实报》记者采访时回忆道,他不得不亲手销毁了有关往莫斯科调动部队的文件。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档案馆里同样没有发现有关9月事件的文件,这一事件以狂潮巨浪之势于9月席卷而来,摧毁了本来就很脆弱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盟。莫斯科市内“按照南方方案”全副武装的空降兵应该执行什么

任务,至今未见这方面的资料。莫斯科不是卡拉巴赫,也不是巴库。莫斯科没有打枪放炮。亚·伊·列别德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的那12辆装载弹药的“乌拉尔”<sup>76</sup>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用来对付什么人的呢?对此,他在其回忆录中仿效当时的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的做法,用了一句笑话敷衍过去。其实,倒不是他们爱开玩笑。只有苏联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能够往莫斯科调动空降兵,正是戈尔巴乔夫在那些日子里公开声明,愿意加强同俄罗斯领导人的正常关系,千方百计地强调自己希望以“500天”纲领为基础改革苏联经济。可以断定,存在着能够直接证明决定在苏联政治生活中使用军队的重要文件,只不过目前尚未被发现罢了。只要这些文件尚未被披露,那就不可能知晓当初军人们所面临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不可能知晓采取这一措施的政治根据。由于这种原因,使我们难以搞清1991年的许多不寻常的进程,正是这些进程最终导致1991年的八月叛乱和苏联解体。目前留存下来的主要是一些间接的证据。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些证据。

1990年9月6日,梁赞州州委举行常委会会议,讨论一个问题。<sup>532</sup>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供的情报,俄罗斯民主派当局计划夺取电视台、广播电台、火车站、飞机场等等。9月9日夜间,梁赞空降师全副武装,携带充足的战斗必需品开赴莫斯科。9月10日开始调动普斯科夫空降师。这些部队都是从吉尔吉斯斯坦的奥什调来的,原是参与解决因为有土地与河流争执而造成的吉尔吉斯人同塔吉克人之间残酷的流血冲突的部队。正是在这些日子里,维捷布斯克空降师转为国家安全委员会指挥。

现在介绍作者亲身观察到的情况。这些天作者正好待在俄罗斯饭店,俄罗斯联邦一些外地的代表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的机关工作人员住在这里。那天,饭店的清洁女工和客房服务员突然都无影无踪了,代替她们发给钥匙的是身着军服、体格健壮的年轻尉官,个个腰间挎着手枪<sup>77</sup>。

还是在那两天,即9月10—1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讨论了

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并以多数票通过了该纲领。

然而,9月11日,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空降部队正向莫斯科推进。他说:“有人试图向我们证明,这是与准备阅兵式有关的和平措施,但是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怀疑的地方。”

空降兵司令员弗·阿·阿恰洛夫上将在《消息报》上对此给予强烈的反驳,他声称,军队抵达莫斯科是为了准备阅兵式,而其他的部队——空降兵则是派来收获土豆的。

这一奇怪而可怕的军事行动是在围绕苏联经济与政治改革的前途展开的斗争已经公开化的背景下实施的,人们当然也是这样来看待这次军事行动的。9月11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在其第四次会议上,开始讨论尼·伊·雷日科夫为政府纲领辩护的报告,并讨论其反对者为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辩护的报告。讨论拖延了好长时间。

9月13日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事件的政治背景不断打乱会议日程。本来要讨论苏共中央机关的新结构,却以争论关于国家在管理经济和掌握苏联命运的作用结束。阿塞拜疆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穆塔利博夫打破了沉默,他说:“如果我现在就不管这些问题(即党的机关直接干预经济——作者),那么就不会有棉花,不会有葡萄,任何东西都不会有了。”<sup>78</sup>在党的机关工作人员看来,这是老生常谈。

米·谢·戈尔巴乔夫试图证明,党应该学会在有反对派的条件下开展工作。但是,阿·穆塔利博夫不但不同意总书记的观点,而且开始反驳道,现在反对派比自称为执政党的那个党更加强大。于是戈尔巴乔夫大发雷霆:“如果我们想在新的条件下成为积极的政治力量,那就请你们注意,运用陈旧的强迫方式,我们将一无所获,只会使自己完全彻底威信扫地……我不止一次讲过这一点,然而在吸取经验教训上,我们大家都是慢慢腾腾的。大家大概都怀念过去……应该变革经济。还应该变革政治程序,摆脱无用的经济军事化,实行非常强大的结构政策。如果连这一点都弄不懂,那根本就是一窍不通。我们不能只考虑



自己的舒适方便,自己的利益好处。”<sup>79</sup>

然而,反对者利用别的证据打击戈尔巴乔夫。还是那位穆塔利博夫证实道:苏联在一步步瓦解,面临即将发生的联盟灾难,在全国范围内整顿秩序的政治任务比经济改革更加重要。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附和穆塔利博夫说:“我们没有打击违法行为。瞧,遗憾得很,古连科同志今天就宣读了‘90年行动纲领’。我非常认真地研究了它。这是公然号召推翻现存政权,公然号召实施违反法律、违反宪法的行为。”<sup>80</sup>

戈尔巴乔夫被一些政治决议搞得精疲力竭,逼得万般无奈。他的政治局的战友们吓唬他说,“民主派”有推翻政权的危险,叶利钦表面上提出就统一行动进行谈判,实际上准备推翻他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相信自己的伙伴,他在法国外交部长 R. 仲马面前抱怨叶利钦唆使一帮人反对他<sup>81</sup>,说叶利钦实际上撕毁了原先达成的共同实施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的协议。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表面上中立、实质上是概念化的决议:委托雷日科夫将自己的纲领与沙塔林—亚夫林斯基纲领合而为一,从而排除了由联盟领导人讨论“内容不可冲淡的”“500天”纲领的可能性。一个基本上反对这一纲领的人,却受托“加工”这一纲领。

9月21日,上午8时25分,在莫斯科高尔基大街与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胡同交叉路口上,一辆牌号为 BA3-2102 的日古利轿车撞上了一辆牌号为 ГA3-3102 的伏尔加轿车,伏尔加车里坐的是叶利钦。日古利车撞到伏尔加车前部右车门,门后正是叶利钦的座位。两个车门都被卡住了,叶利钦得了脑震荡,他的太阳穴和胯股受到了撞击,脊柱受创伤。这一事故中有许多莫名其妙之处,美国政论家 I. 瓦伦塔肯定地说,撞车事件发生在叶利钦与美国代表团会晤后的第二天。美国总统乔治·布什的亲信、布什的竞选运动总部成员 S. 福约是该代表团的团员。9月20日会晤时,叶利钦请 S. 福约安排他同美国总统的会晤事宜。第二天叶利钦就遭遇车祸了,I. 瓦伦塔认为这次车祸的责任应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承担<sup>82</sup>。鲍·尼·叶利钦则认为所发生的事件系普通

的汽车失事,是交通事故<sup>83</sup>。然而就当时的政治心理状态而言,毫无疑问,有人想谋杀叶利钦。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联盟开始破裂了。

534 1990年10月9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议程是《向市场经济过渡条件下的国内形势和苏共的任务》。这次会议的决议以其明显不接受经济改革的思想而令人大吃一惊。这份文件的开头与结尾都把“市场关系”作为全会议程的名称。然而其内容却是“经济关系瓦解的链式反应正在发生,生产规模与数量、国民收入日益缩减……破坏文物的行为不断增加,在反苏和破坏文物的浪潮中,一座座列宁纪念碑倒塌……对共产党员的侮辱与陷害愈演愈烈。全会坚决主张断然制止类似的行为,通过相关的国家法令。”整个文件所表达的就是这样的内容和精神<sup>84</sup>。苏共中央的立场一清二楚:需要的不是经济改革,而是政治决议,目的就是“加强同反共产主义、极端主义势力的破坏行为作斗争”。

正是在召开中央全会的那些日子里,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的题为《稳定国民经济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基本方针》的国情咨文<sup>85</sup>。它是苏联总理尼·伊·雷日科夫及其副手列·伊·阿巴尔金院士战胜“500天”纲领的明显证据。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明确的立场,这就是拒绝在俄罗斯领导人与联盟中央领导人协同行动的条件下向市场过渡的构想。

领导俄罗斯政府的伊·斯·西拉耶夫发表了措词强硬的声明,指出俄罗斯不会放弃实施“500天”纲领。但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利钦对变化与恶化的形势作出了基本回应。1990年10月16日,他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发表了纲领性的讲话,这篇讲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联停止存在之前俄罗斯的发展趋势,它也许就是一个政治预言。

叶利钦说:“这些天要解决一个主要的问题:我们能否实现我们当代表的目的——是为振兴俄罗斯而继续开展创造性的工作呢,或者是屈服于来自中央的各种困难、激烈的对抗,并以不利的政治形势为自己的犹豫不决加以辩护。”叶利钦指出,最重要的工作成果是在最短的期

限内制定激进的经济改革纲领。他详细地讲述了这一纲领制定的情况,指出尼·伊·雷日科夫的联盟政府尽其所能破坏业已达成的协议。苏联总统“支持关于成立沙塔林院士领导的工作组、在俄罗斯纲领的基础上制定现实而明确的联盟纲领的建议。戈尔巴乔夫监督该小组的工作。纲领一旦制定完毕,他即表态赞成。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也赞同该纲领成为联盟纲领。实际上自10月1日起开始计算期限。我们对此作好了准备。然而陷入灭顶之灾的联盟政府向总统施加了压力,他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决定……又一次试图维持已经令人民非常憎恨的制度。”

叶利钦声称:“在这种条件下,有三种行动方案可供共和国的领导选择……第一种方案:俄罗斯宣布不参与执行总统的纲领。分割预算、财产权和一切机构。独立实施自己的‘500天’纲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使用自己的货币,在共和国的所有边境线上设立海关,建立独立的银行系统,组织好独立的对外经济活动。划分军队和武器装备……当然,这是一个代价很大的复杂方案……

535

……第二种方案:这一方案的基础是真正的联盟。新内阁(联盟执行机构)应该在平等的原则上组建。一部分候选人由总统提议,一部分候选人则由我们、根本改革的拥护者提议。

……最后,第三种方案:如果联盟国会通过了现在这个毫无前途的纲领,那么只需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足以证实又一次选择了错误的道路……在当前拟议中的纲领必将破产的结局十分明显之际,俄罗斯联邦应当作好准备,实施自己的稳定经济和向市场过渡的纲领,也许已经不是需要‘500天’了,而是我们的人民所能给予我们的天数了。”<sup>86</sup>

从叶利钦的讲话中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苏联领导人拒绝统一的经济改革纲领,联盟中央力图限制共和国权力,迫使俄罗斯实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

后来果然是这样,直到苏联解体之前,也没有开始进行系统的经济改革。

与此同时,俄罗斯政府也遇到了一些令人不愉快的情况:戈尔巴乔

夫实际上拒绝支持“500天”纲领以后,亚夫林斯基示威似地退出了俄罗斯政府,声称如果苏联当局实施雷日科夫的纲领,则不可能执行“500天”纲领。俄罗斯财政部长鲍·费奥多罗夫很快跟着他这么做。俄罗斯联邦政府、最高苏维埃陷入了极其复杂的境地:俄罗斯已经通过了“500天”纲领,可是这一纲领的主要提倡者却都逃之夭夭了,尽管他们的名字和该纲领联系在一起。

第二天,即10月17日,总统委员会召开会议。实际上破坏了“500天”纲领的那些人要求惩治叶利钦。克留奇科夫、卢基扬诺夫坚决主张对叶利钦采取“严厉的措施”。列文科肯定地说,乌克兰会紧跟俄罗斯采取行动,“也要离去”。雷日科夫歇斯底里地说:“真是不堪忍受啊!政府成了挨揍的孩子。谁都不听话!叫谁谁不来!国家失去了一切管理,正在全速走向崩溃!”<sup>87</sup>

照戈尔巴乔夫的顾问阿·切尔尼亚耶夫的话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竭力要发表反对叶利钦的强烈对抗性的电视讲话,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住他没走出这一步,这一步意味着联盟领导人与俄罗斯领导人之间的新一轮对抗。他们之间的冲突上了新的更高的台阶。

正是在这些日子里,即1990年10月20日—21日,莫斯科最大的“俄罗斯”电影院举行了“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成立大会,从而完成了该运动的组建手续,成为它发展的最高点。“民主俄罗斯”运动的成员包括:俄罗斯民主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苏共民主纲领派,立宪民主党,俄罗斯农民党,自由劳动党,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四月”社会学组织,劳动同盟,“纪念碑”(为政治迫害的罹难者恢复名誉,让他们名垂青史。调查不久以前侵犯人权罪行的组织),承租人联合会,“盾牌”军人工会,“新俄罗斯”联盟等。

成立大会上,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卢基扬诺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的声音不绝于耳<sup>88</sup>。

与会者都表示决不同意“90年行动纲领”,认为这个文件的出笼是

挑拨离间行为。

苏共组织自行解散的自发过程在全国开始了,这一过程一开始出现在一些高等学校<sup>89</sup>。

1990年秋冬两季是急速划清政治界限的时期。紧跟“民主俄罗斯”运动之后,召开了俄罗斯共和党成立大会(11月17日—18日)和俄罗斯民主党成立大会(12月1日—2日)<sup>90</sup>。

左翼政治阵线也得到了加强。这表现于各级地方党组织、区委会和州委会发出大量电报,不但对叶利钦及其拥护者,而且对戈尔巴乔夫进行尖锐严厉的批判。左翼的政治中心为实际上监督苏联最高苏维埃活动的“联盟”议员团,其公开的庇护人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

### **戈尔巴乔夫班子的新变化。 方针——巩固苏联总统的地位**

各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不可能共同行动成为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联盟破裂的政治结局。经济链条已经不能将分崩离析的苏联联结在一起了,保留苏联的政治因素越来越明显地开始跃居首位,作为联合因素的经济地位逐渐被希望使用武力所取代。戈尔巴乔夫并不对西方伙伴隐瞒其对苏联历史发展的新理解。11月9日,他在伯恩对德国总理赫·科尔说:“现在我们已经收到明确的信号,苏联人希望稳定和团结。他们要民主,同时要秩序和纪律,而且坚决反对分立主义和民族主义……社会上人们希望尽快签订新的联盟条约的心情日益迫切……民族主义分子觉得他们的时光将一去不返……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政府的所有领袖或者蹲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那里,或者待在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委主席马斯柳科夫那里,都在为自己的共和国努力争得1992年实际管理经济所需要的一切……他们可以大喊大叫吵嚷嚷嚷要离开,可是你离开了,能到哪儿去呢?”

11月19日,全欧会议在巴黎举行期间,戈尔巴乔夫对美国总统一 537



治·布什说：“人们希望采取更加坚决的、甚至是强硬的措施，因为他们等不及新的联盟条约和其他决议了……我们将沿着原来的方向前进，但我们要实施一些重大的组织变化。实际上这里说的是总统执政，总统体制，在这种体制里执行权将直接归属总统。”<sup>91</sup>

相隔总共只有 10 天的这两次讲话之间，发生了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化。

戈尔巴乔夫总统执政的最初半年使他相信一系列权力制度的毫无效率性。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又当上了总统，他有一段时间将苏共中央机关作为政治权力的工具使用。然而，戈尔巴乔夫不喜欢、不信任、不尊重苏共中央机关，不止一次地裁减其工作人员，并对该机关本身进行改组，这早已成为尽人皆知的事实。地方党的机关习惯上被认为是总书记的可依靠的力量，可它们的状况也未必更好。总统委员会是总统制的组成部分之一。一些部长成为该委员会的成员，他们是：尼·伊·雷日科夫（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瓦·维·巴卡京（苏联内务部长），弗·亚·克留奇科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尤·德·马斯柳科夫（苏联部长会议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爱·阿·谢瓦尔德纳泽（苏联外交部长），德·季·亚佐夫（苏联国防部长），尼·尼·古边科（苏联文化部长）。委员会的成员还包括过去担任过苏共高级领导人的活动家——亚·尼·雅科夫列夫，格·伊·列文科，瓦·伊·博尔金，瓦·安·梅德韦杰夫，以及一些科学家、作家和代表大会代表——斯·谢·沙塔林院士、叶·马·普里马科夫院士和尤·安·奥西皮扬院士，作家钦·艾特马托夫和瓦·拉斯普京，代表大会代表 B. 亚林和库尔斯<sup>92</sup>。

尽管总统委员会里有大量的所谓强力部门的代表，但在该委员会中超群出众的是一批改革的支持者，其中当然首推为实施“500 天”改革纲领而奋斗的斯·谢·沙塔林；另有一些人（叶·马·普里马科夫、亚·尼·雅科夫列夫、瓦·安·梅德韦杰夫）的兴趣在于探索同俄罗斯领导人进行妥协的办法。总统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在政治上混杂不纯，使其完全有别于过去的苏共中央政治局。把总统委员会等同于苏

共中央政治局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政治局里意见一致早已成为习惯,而且分明是预先决定好的,这与矛盾重重四分五裂的总统委员会截然不同。

以雷日科夫为首的苏联部长会议也不能让戈尔巴乔夫称心满意。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在单独进行政治游戏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经常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指示。另一方面,雷日科夫政府在全国甚至在观点与其相近的苏联最高苏维埃已经威信扫地,政府被指责没有效率。雷日科夫经常抱怨,他谁也叫不动,谁都不执行他的指示。雷日科夫政府已经成为无行为能力多余无用的政府了。雷日科夫搞垮“500天”纲领成为他得不偿失的胜利。

需要建立总统政权的其他机制。1990年11月1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在克里姆林宫召开。在这次会议上,“联盟”议员团显示出颇大的影响力。议员们要求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和苏联总统作工作报告。总统的活动和政府的工作遭到了严厉的批评。响起了要求雷日科夫政府辞职的喊叫声。11月16日,戈尔巴乔夫向议员们发表讲话,他的讲话没有起到什么作用。“联盟”议员团的进攻得到了极右势力的支持,政权危机迅猛加剧。这一天,政治局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会议<sup>93</sup>。

538

其实,将这次会议称为政治局和总统委员会的联席会议倒是更准确一些。与会者充分认清了目前形势的危险性。中央国际部部长瓦·米·法林对与会者说,在最高苏维埃例行会议上,所有发言者都提出了一个要求:“应该加强总统机构,使其具有明显效率。”<sup>94</sup>法林直接建议戈尔巴乔夫利用自治权对付各加盟共和国的立场:“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的后备手段就是自治权。”<sup>95</sup>苏共中央书记彼·基·卢钦斯基坚决主张立即签订共和国间经济协定。他认为目前形势下签订联盟条约不现实;只要在签订经济协定之后马上签订政治宣言就足够了。他还建议举行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彼·基·卢钦斯基、C.伊·古连科、努·阿·纳扎尔巴耶夫、伊·库·波洛兹科夫都批评了总统委员会,抨击了亚·尼·雅科夫列夫,一致断言总统委员会的存在削弱了政

治局的地位。苏联最高苏维埃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德·C. 扎索霍夫说,总统应该亲自领导未来的内阁。他还建议联邦委员会——最高苏维埃两院之一,其中有苏联各共和国的代表——要成为苏联总统永久固定的伙伴,与总统分担各项政治决议的责任。他认为,必须促成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一项决议:暂时停止群众集合、游行示威以及如他所说的“对抗”,为期半年<sup>96</sup>。A. 扎索霍夫和中央书记奥·谢·舍宁坚决要求,自12月起全国实行总统执政<sup>97</sup>。苏共中央书记奥·德·巴克拉诺夫则主张实行更加强硬的国内政策。

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实际上要戈尔巴乔夫取消总统委员会,建立内阁以取代苏联部长会议。他认为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改善居民的食品供应状况,因为照他的话说,食品都进入“黑市”了。

戈尔巴乔夫同意莫斯科市委书记的所有建议,说他打算取消总统委员会:“总统委员会已经不合时宜了。”戈尔巴乔夫同意“为稳定食品供应而付出特殊的努力”<sup>98</sup>。

539 苏共列宁格勒州第一书记鲍·韦·吉达斯波夫对各护法机关——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检察院给予了严厉的批评。他还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内务部长巴卡京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他认为,经常性的威胁源于极其恶劣的食品供应状况。这位列宁格勒的共产党领导人说:“早晨我去上班,看着成百上千的人排队(购买食品的队伍——作者)。我就寻思:要是有人砰地一声打碎了橱窗,那么列宁格勒就会爆发反革命动乱。可我们也救不了国家。”<sup>99</sup>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阿·纳扎尔巴耶夫建议戈尔巴乔夫就在第二天,即11月17日,宣布改组政权系统、巩固总统机构的纲领,并许诺解除尼·伊·雷日科夫的职务。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人伊·库·波洛兹科夫从极左的立场上发言。他要求用军事办法整顿秩序,他说:“应当禁止合作制。内战危险来自新兴的资产阶级……让我们走近共产党员代表吧,他们会把我们洗刷得干干净净。他们会执行我们提出的任何方针。”

“你怎么啦!”戈尔巴乔夫忍不住说。<sup>100</sup>

最后决定采取的立场是:加强总统垂直管理体制,改组政府,撤销总统委员会,暂缓进行联盟条约的准备工作,作好在全国采取紧急措施的准备。

11月17日,戈尔巴乔夫登上苏联最高苏维埃的讲台,宣布了改组政权的纲领——新闻媒体称其为“八条”。

总统宣布,部长会议改组为内阁,由他本人管理。显而易见,这就要求即将召开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必须解除雷日科夫的职务。<sup>101</sup> 总统委员会很快就被取消了,代之以安全会议。加强总统权力的计划和采用强力手段保存苏联的打算使戈尔巴乔夫赢得了一天以前还攻击过他的“联盟”议员团的支持。

例行的第四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12月17日召开。列入苏共“党内百名”代表的C.乌马拉托娃(来自车臣—印古什)的发言尤为引人注目。她指责戈尔巴乔夫瓦解苏联,坚决要求把对戈尔巴乔夫进行“不信任表决”作为第一个问题列入大会日程。将近400名代表投票赞成总统辞职。但是,多数代表(其中有叶利钦、波波夫及其许多支持者)投票反对苏联总统辞职。

这届代表大会最重要的轰动一时的事件是外交部长爱·阿·谢瓦尔德纳泽的出人意料的发言。他情绪激动,语无伦次,主动要求辞职,向全国和世界发出了苏联即将实行独裁的警告。关于谢瓦尔德纳泽迈出这一步的原因已经写得很多了。作者认为,在一段时期中,戈尔巴乔夫不信任谢瓦尔德纳泽使他们之间的关系蒙上了阴影。戈尔巴乔夫不喜欢“他的”外交部长逐渐变成一个国际级的大人物,不喜欢看到谢瓦尔德纳泽在外交政策方面赢得的威望。毋庸置疑,这与国家内政的变化有一定的关系。在“加强总统垂直管理体制”之际,许多人(有的高兴,有的恐惧)都在等待独裁的建立。

苏联副总统的问题解决起来颇费时日而且艰难。可能的候选人中包括爱·阿·谢瓦尔德纳泽和叶·马·普里马科夫,可是戈尔巴乔夫坚持由亚纳耶夫作为候选人。亚纳耶夫过去是共青团和工会活动家,

“绝对不是”颇有声望的政治人物。在讨论他的候选人资格时,有人开玩笑说,他之所以能当选为副总统,是戈尔巴乔夫不断施加压力的结果,因为戈尔巴乔夫希望得到他这样一位毫无怨言的执行者。后来的情况证明戈尔巴乔夫失算了。

由于取消了总统委员会,成立了立宪机关——安全会议,其成员包括:瓦·维·巴卡京、新任外交部长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弗·亚·克留奇科夫、瓦·谢·帕夫洛夫(自1月11日起担任总理)、鲍·卡·普戈(不久被任命为内务部长)、叶·马·普里马科夫院士、德·季·亚佐夫、根·伊·亚纳耶夫。

戈尔巴乔夫以前的自由主义战友——亚·尼·雅科夫列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斯·谢·沙塔林没有进入这个机关。

### 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

联盟中央同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关系、同一系列其他加盟共和国——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的关系日益尖锐化了,同俄罗斯的关系尤为令人不安。戈尔巴乔夫总统的权力扩大后,开始制定以强力手段解决这一问题的计划。同坚持亲莫斯科政策的地方共产党的协商开始了。一些地方领导人同苏共中央书记安·尼·吉连科谈话的记录被保存至今,阻止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进一步脱离苏联是他们讨论的重点。从吉连科的谈话记录看,阿·彼·鲁比克斯将当时的形势评估为“具有新法西斯主义成分的大转折的初始阶段”。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领导人认为,拥有自己的战斗组织——工人义勇队的“社会拯救委员会”应该反抗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组织。在这些会晤中,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严厉而尖锐地批评戈尔巴乔夫和内务部长巴卡京软弱无能,缺乏威望。结论是:采用军事的解决办法不可避免,这样的解决办法要么可能是可以控制的,要么可能是自发的。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在其回忆录中写道:“1990年12月底,戈尔巴乔夫召集会议,通过了使用强力手段对付拉脱维亚和立陶



宛的极端分子行动的决议……戈尔巴乔夫态度坚决,不过这并没有增加对他的信任度。”<sup>102</sup>

到1991年1月初,形势变得更为严峻。立陶宛试行了总统直接执政。1991年1月7日,(拥护苏共纲领的)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按照苏联的一贯做法(“根据广大劳动者的请求”),要求戈尔巴乔夫在立陶宛共和国实行总统直接执政,为此,“从当地”还发出了要求“整顿秩序”的一封封电报<sup>103</sup>。1月10日,戈尔巴乔夫向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在立陶宛境内完全恢复苏联宪法的效力。与此同时,当日戈尔巴乔夫指示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在维尔纽斯使用武力。“阿尔法”特种分队的一个小组被派赴立陶宛首都,该小组应该与国防部和内务部的分队共同行动。1月11日,民族拯救委员会的“工人义勇队”和这些分队一起占领了“出版之家”——立陶宛苏共中央出版社。1月12日夜间,苏军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分队占领了维尔纽斯电视中心。“工人义勇队”和立陶宛民族拯救委员会的行动得到了军队的支持,该委员会由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M. M. 布罗基亚维丘斯和立陶宛共产党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尤·叶尔莫拉维丘斯为首的立陶宛共产党正统派的拥护者组成。同居民发生了不大的武装冲突,14人被打死。为了保卫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维尔纽斯市内开始筑起街垒。

波罗的沿海岸共和国里发生的军事行动激起了全国性怒潮。苏联各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劳动集体向苏共中央发了成千上万封抗议电报。顿涅茨克一个以斯科钦斯基的名字命名的矿井的矿工们写道:“……国内目前混乱的形势有助于军事独裁者上台和民主改革遭到失败。以戈尔巴乔夫总统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没有能力稳定国内局势、实行真正的民主改革和经济改革,千方百计保留帝国,不顾及各民族和共和国的利益。因此,我们要求以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最高苏维埃辞职,把制造立陶宛悲惨事件和破坏各共和国国家主权宣言的罪犯送交法院惩治。”

人们纷纷要求撤走军队;呼吁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

收回他在联盟和俄罗斯经济协定上的签字；要求戈尔巴乔夫解除国防部长亚佐夫、内务部长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领导人克拉夫琴科的职务。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他又是苏共中央总书记)和以往一样声称,他一无所知,没有作出过使用军队的任何决定;他过去经常说这种话,现在他又这样说<sup>104</sup>。

维尔纽斯事件特别清楚地证明了苏共领导人为维护国家完整而打算采用的方法。这一事件还证明,经过考验的武力解决方法原来并非有效。

542 维尔纽斯事件的后果是严重和长远的。这一事件证明,联盟中央的领导人有能力使用武力维护旧的政治制度。正如叶利钦及其“周围的人”后来所说所写的那样,维尔纽斯事件给他们的最大经验教训是,不承认使用武力的、实质上违反宪法的措施;向居民寻求支持,号召公民以不服从的方式来反对当局的专横跋扈,诉诸国际社会舆论。遗憾的是,一年半以后,这一切在莫斯科成为现实,直至筑起了街垒和反坦克障碍物。

维尔纽斯事件成为惊惶忧虑的象征,成为俄罗斯新领导人的“灯塔”,它使人思考一个问题,苏联当局能够采用武力解决政治冲突。这使人不得不对这种可能性作好准备,思考对付的方法。正是维尔纽斯事件促使叶利钦及其控制的最高苏维埃发表声明:必须建立自己的、俄罗斯军队,这激起了“联盟中央”拥护者的营垒大发雷霆。

同时应当指出的是,维尔纽斯事件还产生了另一种结果:它促使叶利钦及其他共和国的领导人签订共和国间的双边协定——顾及每个伙伴的利益、以每个共和国在其境内最大限度主权完整为前提的协定。早在1990年底,在俄罗斯同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白俄罗斯开始谈判的时候,就已经明显表现出这种趋势,维尔纽斯事件只不过是这条道路上的补充促进因素。1月1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从塔林归来后立即发表公开声明,表达了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四个共和国领导人的愿望——签订四方协定,不再等待签订联

盟条约。

在苏联国家体制危机的条件下,联盟领导人试图用新的联盟条约来巩固正在瓦解的苏联。

旧联盟条约作为一个“关于独立的各民族共和国的联合问题”产生于1922年秋。早在这一条约的准备阶段,1922年11月18日,斯大林在接受《真理报》记者采访时说:“这一动议是各共和国自己提出的”,指出乌克兰、白俄罗斯、外高加索各共和国——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渴望联合。然而众所周知,作为一个条约国家产生的苏联,很快就变成了一个统一的、强硬(如果不是严酷)的中央集权国家。1989年的苏联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了必须更新联盟条约的问题。请读者回忆一些几乎被遗忘的情况: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曾经建议签订“确保其他必要条约——经济条约、共和国间条约、经营管理条约得到履行的联盟条约”<sup>105</sup>。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的代表曾经坚决要求通过《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经济独立法》。请读者注意,1940年加入苏联的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和摩尔达维亚甚至不是联盟条约的正式参加者,它们没有签署这个条约。

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虽然口头上承认制定新联盟条约,经常重复签订协定的必要性,而实际上在阻挠这一进程。还用说吗,要知道在签订联盟条约的情况下,各共和国经济上的独立自主是不可避免的,这实质上缩小了联盟党和国家中央的权力范围。那些所谓“吃补贴的”、其绝大部分预算靠国家补贴而得以保障的各加盟共和国,都很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主意。 543

时过境迁。各共和国的局势日益紧张化和极端化。大家对可能签订权利平等协定的信心即使不是完全丧失,也是逐渐衰弱了。从兑换1961年版的50与100卢布纸币,向储蓄银行发放现金的最大数额限制在500卢布,到动用空降部队参加议会辩论,联盟中央越来越多地被视为制造这类经常发生的麻烦事情的根源。

与此相对立的是定于1991年3月17日举行的保留苏联的全民公决。请读者注意,在维尔纽斯军方和警察行动失败之后,举行全民公决

的准备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苏联最高苏维埃批准了全民公决的如下问题：“您是否认为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一个能充分保障任一民族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被更新的各主权平等共和国的联邦保留是必要的？”当时就有许多文章指出，这段冗长的文字纯系耍滑头，它要求必须对这一问题（确切讲，是数个问题）作出肯定或否定的回答，然而这一问题本身含有不确定性。保留“被更新的联邦”——通过什么途径保留？用什么手段保障“各主权共和国权利平等”呢？有什么机制能够“充分(?)保障任一民族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呢？就具体性、法律的详尽性和预测之准确性的程度而言，这样的文字表述可以同尼·谢·赫鲁晓夫的一句名言媲美：“这一代苏联人将过上共产主义生活！”

然而，这里主要的是不在于问题的修辞，按戈尔巴乔夫的话说，“我们同助手讨论了好久……在联邦委员会审查了好久，当然也在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会议上审查了好长时间”<sup>106</sup>。问题在于另一方面：全民公决预先就凌驾于未来的联盟条约之上了。不对联盟的各联邦主体做具体的工作，不详细研究各种条约关系，而是沿用党的会议上大家谙熟的重视“多数”意见的投票表决，这种“多数”的意见对于所有其他人而言都是强制性的。这个多数当然是有保障的，因为俄罗斯联邦的人口为1.48亿，乌克兰的人口5170万，而拉脱维亚的人口268万，爱沙尼亚的人口157万。在全苏联范围内的投票表决立刻引发了一个解释投票结果的问题，令人不得不起“医院的平均温度”，何况民族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达不到“民主集中制”习惯的标准。

全民公决是寻找保留苏联的第三种途径的一次尝试。保留的含义——在于苏联本身拥有主权，实质上在于党和国家的联盟管理机构拥有主权；而与所有其他各共和国的关系则是利用新的论据——根据“苏联各族人民的意志”推行原先的政策。

544

可想而知，保障取得全民公决的胜利是这一阶段苏共中央最重要的任务。依照惯例开始对各个政党与运动的领导人进行民意测验。1991年1月23—24日，就是否支持1991年3月17日举行决定苏联命

运的全民公决问题,对 35 个社会政治组织的领导人(代表)进行了电话询问。

呈送中央的简明报告指出,“果然不出所料,被询问者的意见分歧明显;然而,不能简单地认为被调查者分为‘支持’和‘反对’两派,大多数人的回答具有不确定性……”。

下列组织的代表表示坚决“支持”举行这样的全民公决:以萨哈罗夫的名字命名的民主力量同盟(B. 沃罗宁),“纪念碑”(列昂诺夫),独立学者同盟(波将金),俄罗斯中心(科瓦廖娃),“拯救伏尔加委员会”(沙托欣),人权党(库克林),“国民”协会(格尔什费尔特),“教会与改革”(谢尔盖耶夫),自由民主党(日里诺夫斯基),和平党(尼科洛戈尔斯基),苏联民主党(谢留诺夫)。

表示强烈“反对”举行全民公决的是下列组织的代表:俄罗斯基督教民主同盟(奥戈罗德尼科夫),“民主俄罗斯”运动协调委员会(A. 穆拉绍夫),基督教民主党(Ф. 丘耶夫),俄罗斯基督教民主运动(B. 阿克休奇茨)。

对全民公决的合理性表示怀疑的有下列组织的代表:俄罗斯民主党(尼·伊·特拉夫金),俄罗斯共和党(B. H. 李森科),右翼保守运动(拉宁),社会民粹党(罗曼诺夫),绿党(达米耶),立宪民主派——人民自由党(杰里亚金),自由劳动党(科罗维科夫),莫斯科选民联合会(诺维科夫),社会主义工会(马雷金)……

询问者在作总结时确认:“种种答案形成一幅绚丽多彩的图画。实际上所有的被询问者都支持保留联盟,但是这个联盟应该存在于什么原则之上,他们的意见真是五花八门……”

他们的结论总体上是乐观的:“如今,苏共的反对派势力不可能提出反对保留联盟的意见,因为这会使全国居民(选民)都不理解。”一些参加 1991 年 3 月 17 日全民公决准备工作的心理学家的看法较为小心谨慎。在其呈送中央的简要报告中写道,全民公决是在未经很好地预测其结果的情况下宣布的:

“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多数居民可能投票



支持脱离主权国家联盟,尽管这些国家在经济上紧密地与苏联联系在一起。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的大部分居民同样会这样做,而这将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瓦解。其实众所周知,多数并非总是正确的。”

545 心理学家们写道:“直到不久以前,苏共领导人在实行其政策的过程中,总是从一种坚定的信念出发:只要依靠思想动员,依靠群众的热情,依靠群众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支持,任何措施都可以实行。这种办法在某种程度上起到过一些作用。今天情况变了,那就应该从新的实际情况出发。

……为了举行全民公决,首先需要稳定的社会局势。既然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不可能实现社会局势的稳定,那就应该研究不定期地延迟全民公决的可能性,集中一切力量(包括宣传机关)制定并签订联盟条约,该条约的内容令中央和各共和国都感到满意,则有利于在目前的疆土上保留我们的国家。”

科学家们还提出了一整套他们认为必要的措施。他们认为,如果全民公决3月17日仍然如期举行的话,那么这些措施应能保障其成功。这些措施包括:对不同居民施加不同影响;举行戈尔巴乔夫同其政敌的电视辩论;赴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寻找“贬低脱离苏联的号召者讲话的作用与价值的论据,特别是在享有声望的各界人士中寻觅这种证据”;宣传“签订条约的各共和国将得到的”各种好处。这些消息应该通过大众新闻传媒刻不容缓地让我国每位公民知悉,并务必以彻底实施的行动来充实这些消息,而所实施的行动须以令人实际感觉到国家得以保留的好处为宜。”

他们还写道:“同样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苏共领导和政府应对摆脱危机的现实而可靠的途径具有十分具体的构想。时至今日所提议的一切都建立在旧的传统与习惯的基础之上,显示出不确定、不清楚、不合逻辑,而有时候又自相矛盾和蛊惑人心的特征。今天的人们不会接受这一套。此外,一些共和国根本不愿举行全民公决,而另一些共和国在制定自己的对策,苏联总统和苏共领导对这样的局势需要作出鲜明的反应。看来,迫切需要一个同各共和国达成一致并得到更新的联盟条

约的构想,否则,全民公决的思路将失去意义。”

然而,全民公决之所以打算举行,目的是为了代替和偷换联盟条约,显示联盟中央的强大力量和得到全民支持。

苏共中央各个最重要的部门都被吸收到保障全民公决顺利举行的工作中。1991年1月,一份题为《关于组织举行1991年3月17日的全民公决的一些意见》的报告被呈送苏共中央书记A. H. 吉连科。该报告指出必须吸收下列苏共中央部门参加全民公决的准备工作:人文科学和意识形态部,组织部,苏共中央立法动议部,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民族关系部,国际部。该报告还指出了动员资金开展宣传运动的必要性,宣传资金来自国家预算和慈善基金会。

在呈报政治局的苏共中央书记奥·谢·舍宁在各加盟共和国、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的发言稿中,也强调了即将开展的宣传运动的严肃性和重要性。 546

舍宁在报告中指出了“损害和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各种企图”,指出了经济、消费市场、住房建设中的各种危机现象。他忧心忡忡说,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格鲁吉亚的国会领导人都声称不愿签订联盟条约。

舍宁坚决要求提高党的积极性。他写道:“只要党的机构的每一环节都不惊慌失措,共产党员在动员起来的状态中工作的条件下,党就一定能在社会中发挥稳定和团结的作用。”舍宁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事件有自己的评价:“这些天苏共中央收到大量的信函、电报和会议决议,表示支持苏共中央对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事件所采取的立场……”舍宁援引一封信道:“对改革的信心逐渐转变成对改革公开的敌意。苏共中央的无所作为,总书记对党的前途命运的漠不关心,中央和政治局对俄罗斯共产党的冷漠无情导致许多人的困惑莫解。”

针对中央无忧无虑的安乐情绪,舍宁引用了残酷无情的统计数字——脱党的共产党员人数在增加。数据表明:截止到1990年1月1日党员人数为1920万,截止到1991年1月1日为1650万。入党的人数从31.3万下降到10.8万。180万人脱离苏共。被开除出党的人数

增加了3倍。9个月中被开除出党的人数为38万,但因为犯罪被开除的只有0.5万人。这位中央书记断言,党内存在着很多观察员,他们不缴党费,也不交出党证。

在苏共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全体会议前夕,1991年1月30日召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会议上,会议讨论的许多问题当中,有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党的命运和苏联的前途问题尤为引人注目。

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С.伊·古连科抱怨国内困难日益增多,人们再也不能容忍下去了。“他们不去考虑如何减轻这种糟糕状况,却一直想抓住方向盘;而方向盘后面空无一切——没有操纵系统,发动机不工作,生产停顿。可是他们觉得,如果今天我们能抓住方向盘,如果我们依旧把握得住,而且把两条腿劈得开一些,那么一切都会好起来,掌握方向盘的人就会觉得容易一些……我们还是老样子:开个会,把某人‘痛打一顿’,把某人赶出党外。难道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任务吗?”<sup>107</sup>

547 乌兹别克领导人И.卡里莫夫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积极,他抱怨道:“我总有一个感觉,今后两三个月如果物价自发上涨,而我们又找不到对付的办法,或者我们在这一问题上不能确定苏共及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鲜明立场的话,那么我们将成为罪人。那些敌人、反对派、老爷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们会责难我们:你们开了头,那你们就负责收场吧!

我认为,弗拉基米尔·安东诺维奇·伊瓦什科在明天的报告中不可能不讲到这一点。可是,你们看,在报告的第12页上只有一小块地方谈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上面说:‘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仅在12月份,商品零售价就上涨了14%。’那么以后会发生什么事?2月份会发生什么事,3月份会发生什么事……因此,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恳请考虑我的看法……一旦人们走上街头,要把他们拉回来是不可能的。”

在讨论在司法部登记苏共章程的问题时,发生了颇为有趣的转变。党应该在法律上证明自己是一个社会组织。与会者很少操心这件事,令他们感兴趣的完全是另外一件事——党员本身应该通过正式途径证

实他们将继续留在苏共队伍之中。这就出人意外地产生了在党内举行全民公决的危险。但是,事与愿违。

各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意见十分罕见地完全一致。

阿·马洛费耶夫(白俄罗斯):“……更换党证可以晚一些进行。组织和政治基础被破坏得如此严重,在议会的一些议员团里已经看不到党员的身影了。相当一部分,即40%的人根本不确定自己的党派所属关系。每个人都自行其是。”

阿·穆塔利博夫(阿塞拜疆):“如果我们现在宣布进行重新登记,那么,这一行动将成为反对派的财富。他们将利用这件事,说:完了,党完蛋了,同伴们,你们随便跑吧。而我们就会失掉那些今天也许还在惊慌失措、犹豫不决的人。一个主意很诱人:把战士、斗士之辈留下。可这样的人现在很少啊。所以我怎能不着急。”

彼·基·卢钦斯基(苏共中央书记,不久前为摩尔达维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不应该忘记,我们生活在现实世界,存在着现实的人。如果采取这种硬性的做法——重新登记,就像十年前那样,我们一定会失去很多人,这些人今天还方向不明,但明天就确定方向了。我认为,做这件事,况且同时还要更换党证,至少在我们共和国里,时机尚未成熟。这是一次极其严肃的行动。我们将因此失去很多。”

阿·彼·鲁比克斯(拉脱维亚):“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我不得不说,这对于我们而言根本无法接受,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将失去很多党员。我们有许多暗中登记在册的党员,他们通过邮局缴纳党费。如果对他们重新登记,他们就会‘原形毕露’。因此我们将失去很多党员。在代表大会闭幕前,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全体中央委员的意见完全一致:当前这件事做不得。”

M. M. 布罗基亚维丘斯(立陶宛):“整个苏联共产党都不应该做这件事。应该考虑到一些共产党的工作条件。立陶宛共产党1月1日被禁止活动,那里意志较为薄弱的人会寻思:我为什么要继续留在党内呢?”

戈尔巴乔夫:请稍等。为什么立陶宛共产党被禁止了,立陶宛不是

有取缔反宪法行动的命令吗？

布罗基亚维丘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命令不起作用。

戈尔巴乔夫：这是不合法的法律，没有效力。”

戈尔巴乔夫的神圣信念是，他的命令之所以能被执行，只因为他是苏联总统，而他的政治局同事却不以为然。

但是，戈尔巴乔夫必须同意这些反对的意见。他的理由令人感兴趣：“我有这样的印象，目前提出这种思路不是时候，应该在局势比较稳定的时候，在我们解决了联盟问题、积极的进程开始出现和大家都有另一番心情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惊讶。对于他戈尔巴乔夫而言，“解决联盟问题”，在世界上最大的多民族国家建立新的政治、经济、心理关系，原来比用加强党内纪律、统一的党内预算来整顿一个政治组织更为简易。人们害怕“解决党内问题”。“解决联盟问题”则是另外一码事。

政治局讨论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就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问题举行苏联全民公决前党组织应做的工作》。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十分乐观。他对政治局的同事说：“有意见就交上来；没有意见，我们就行动。”但是，他的同事们既有意见，又有问题，还有异议。首先是波罗的海沿岸各共和国，他们对联盟全民公决的答复是，在这次全民公决的前夕，决定举行本共和国的全民公决。

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使用“争取民主独立的立陶宛”这样的措词，这说明它准备对全民公决作出肯定的回答，为脱离苏联寻找法律依据。联盟全民公决尚未举行，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已经开始行动了，从而使各共和国的主权化达到新水平。但是，应该看到，各共和国党组织的领导人对即将举行的全民公决态度冷淡。

这迫使戈尔巴乔夫发表意见：“全民公决的问题是个原则性的问题，我们不应该过于简单地看待它。有人企图吓唬我们，而我们就是想这样提出问题，还要对这个问题进行补充。我们大家都应该注意到一



点,这是社会上层人物的情绪。应当向各共和国和各地方的当局、向全世界表明全民公决的性质,这是行动的基础。这是第一。据我所知,多数共和国已决定参加全民公决。诚然,有些共和国此前已经说过,问题已经很清楚。但是,这毕竟不是全民公决。人民应该对这些至关重要、决定命运的决议发表意见。如果某个共和国作出另外的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最高苏维埃应该和中央选举委员会一起依法采取行动,通过各州举行全民公决,我们不可能有别的做法。要知道,还有代表大会的决议在嘛。可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比方说,人民不去参加全民公决。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在摩尔达维亚,没错,目前该共和国还沉默不语。如果那里的最高苏维埃‘耍滑头’,那我们就要像过去那样,再次采取使局势正常化的措施,到那个时候,德涅斯特河左岸和南部的人们最终会挤得密密麻麻地去投票。今后的形势就是这样,大家都要明白这一点。我深信,半数爱沙尼亚人都会这么做,如果那里能开始机动灵活行事的话。人们一定会去投票的。”

这意味着,全民公决将成为各加盟共和国内部政治斗争的工具,被用来挑起一部分居民同另一部分居民的相互对立。倘若如此,无异于给已经发生的族际冲突火上浇油。

埃·阿·西拉里(爱沙尼亚)立即介入了争论:“17日将发生具有民族特征的对立。我们预料有10%的爱沙尼亚人参加,就是说,将发生民族冲突。目前局势如此紧张,再发生这样的事,事态就更加严重了。”

戈尔巴乔夫:可我要告诉您,一旦没有了紧张局势,那也就不会搞全民公决了……这是符合宪法之路。

西拉里:如果有50%的人参与投票,那全民公决就是合法的。但是我提出的不是全民公决的合法性问题,而是族际关系尖锐化问题。”

保留联盟和举行全民公决的支持者И. 卡里莫夫也警告说:“在准备全民公决的过程中,不少人情绪激动,对居民要做工作。有一部分居民今天安安稳稳地坐着,但是谈到这部分居民,需要想起一则乌兹别克谚语:‘睡狮的尾巴动不得’。动了他们的尾巴,他们就坐不住了,有些

人可能就是这样子。为什么呢……我深信,乌兹别克斯坦的局势会恶化。今天举行全民公决比明天举行好,因为明天就会出现叫嚷泛土耳其主义的势力……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是一回事,而中亚国家则是另外一回事。如果我们那里爆发这种事件,那就很难制止,为此要付出惨重的流血代价……”

米·谢·戈尔巴乔夫不想继续辩论下去了。在克里姆林宫里和老广场,举行全民公决的意见不可动摇。

戈尔巴乔夫的俄罗斯同事伊·波洛兹科夫在1991年1月31日召开的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全会上说,俄罗斯共产党正转入进攻<sup>108</sup>。这无疑是对戈尔巴乔夫立场的最好解释。

显而易见,在维尔纽斯使用过的方法有推行到莫斯科的危险。1991年2月1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联邦的政治形势》的重要决定。其中写道:“谴责使军队和军事化组织介入政治冲突的违法事件……规定:未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同意,而在休会期间,未经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同意,不许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采取紧急状态制度规定的措施。”

当年2月5日,苏共中央书记处决定散发《致苏联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队、苏联内务部内卫部队和铁道兵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公开信中说:“那些所谓的‘独立的’大众传媒正在开展一场系统的运动,诽谤党、武装力量、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的机关与部队,给祖国的历史抹黑。假民主派在意见多元论的掩护下,煽起人民对自己军队的不信任情绪,离间指挥员与部属之间、上下级军官之间的关系,损害祖国保卫者的尊严,他们的用意昭然若揭。军人的天职、军人的光荣、战士的忠诚、战士的誓言——这些崇高的概念现在都受到怀疑。有人试图把当地驻军据为己有,阻碍征兵工作的进行”。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不让俄罗斯领导人有可能对苏联武装力量施加影响的可能性。

2月6日,联盟领导人和俄罗斯领导人上演了新一轮闹剧。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大楼内,发现有一个房间装有连接叶利钦办公

室麦克风的窃听装置,该房间的“主人”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1991年2月7日发生的两起事件对全民公决以后的进程和全国的政治斗争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就在这一天,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关于确保1991年3月17日苏联全民公决和俄罗斯联邦全民公决举行的措施》的决议。该决议写道:“允许俄罗斯联邦中央全民公决委员会在一张选票上列入提交全俄罗斯全民公决的两个问题。”俄罗斯联邦的代表已经知道第二个问题:“您是否认为有必要设立经全民投票选出的俄罗斯联邦总统的职位?”为了将这一问题列入全民公决的选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已经征集了代表们的签名。

同一天,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呈送一封冗长的信,题为《关于全国的政治形势》。

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寄希望于这封信成为联盟领导人1991年的“行动纲领”。克留奇科夫报告说,由于尖锐的政治危机,产生了联盟解体、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崩溃的危险。“俄罗斯国会的首脑和某些政治力量……显然打算建立‘第二中央’,与苏联国家政治领导人相抗衡。”克留奇科夫认为,“对‘民主运动’中有野心的派别实行安抚政策……将导致假民主派毫无阻碍地实现其夺取政权和改变社会制度性质的图谋。”

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坚决反对在全国普及市场关系,主张必须加强同“搞影子经济的商人”进行斗争,强调“这一斗争本身不会增加产品产量,但能够促进更加公平地分配商品”。克留奇科夫写道:“发财致富的过程,按其内在的逻辑吸引‘影子商业’参与争夺政治影响力的斗争,目的是在私有化的范围内,更多地扩大财产增加的规模。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形成‘新生的资产阶级’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551

克留奇科夫将“民主俄罗斯”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宣布为国内主要的政治敌人。他警告说,“在对抗和宣传方面的不均衡在为保留苏联的全联盟全民公决的准备问题上表现最为明显。虽

然‘民主新闻媒体’诽谤全民公决早从其宣布之时就开始了，而中央和党的大众传媒几乎没有发表过有利于全民公决的文章。”克留奇科夫的结论是，必须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

克留奇科夫提出了一系列摆脱危机的办法。除了上述提到的追究“搞影子经济的商人”和监督新闻媒体以外，还建议采取宪法措施。这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肯定地说：“实施机动的空间并不大，但还是有的。作为最具建设性的政治机构，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在谋求摆脱目前危机的出路方面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需要防备受到攻击，积极开展活动，增强这些人民政权机关的创造潜力。”

他还提出了一些方法：“考虑到危机的深重和局势进一步恶化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适当时刻建立一些临时机构的可能性，这些机构负责实施苏联最高苏维埃向总统提出的各种紧急措施。这样的步骤需要强大的宣传工作的参与，需要直接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保留苏联，捍卫社会制度。”克留奇科夫的建议为半年后组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打下了思想基础。

克留奇科夫的意见通报给了苏共中央政治局所有的委员和候补委员、苏共中央所有的书记，实质上成为以后的行动规范。

在准备举行全民公决的过程中，阉割全民公决选票上俄罗斯问题的实质被作为首要任务，其办法是排除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参加将来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可能性。中央的分析家们认为这项任务完全可以实现。

1991年2月15日，270名俄罗斯联邦代表、共产党的支持者要求马上召开俄罗斯联邦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并要求叶利钦向大会作工作报告。当时初步估计，3月17日之前能召开代表大会。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利钦表示抗议的辞职，其本身就是联盟机构在同俄罗斯主要反对者对抗中占上风的最好证明。

552

叶利钦很快就作出了回应。2月19日，他发表了电视演说，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要求戈尔巴乔夫辞职，把治理苏联的权力交给联邦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声称,苏联总统应该承担维尔纽斯悲剧的责任,他要求总统辞职。

然而,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内部,要求叶利钦本人辞职的行动在继续紧张进行。2月21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会议上,斯·戈里亚切娃、鲍·伊萨耶夫、拉·阿卜杜拉季波夫、弗·伊萨科夫、A. 韦什尼亚科夫和B. 瑟罗瓦特科要求叶利钦在俄罗斯联邦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辞职。这些人都曾进入过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的领导班子。除了要求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和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以外,他们还坚决主张,不容许就设立俄罗斯总统问题举行俄罗斯全民公决。

斯·戈里亚切娃宣读了声明。会议上已经有272名代表要求召开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共产党人坚决要求3月5日举行这次代表大会;而他们的反对者则认为,非常代表大会只能在1991年3月底—4月召开。

与此同时,苏共中央和俄共开始同俄罗斯自治共和国领导人进行紧张谈判,目的是不让这些共和国参加俄罗斯的全民公决。俄罗斯面临分裂的危险并没有让苏共中央和俄共中央的官员们焦急不安——外地发生的耸人听闻的政治事件又一次遮住了他们的眼睛。

对抗日益加剧。2月23日,共产党的拥护者和军人在马涅日广场举行集会。集会虽然举行了,但它对于苏共中央而言并非成功。集会“履行”军人“义务”的氛围所笼罩。第二天,2月24日,叶利钦的支持者也在马涅日广场举行了集会。

克留奇科夫大将的建议继续发挥效力。根据他的这些建议,共产党和民族主义力量1991年2月17日实现了大联合,为宣传提供了“强大的支持”。社会政治团体与民族爱国团体代表会议在莫斯科举行。26个政党和运动的代表——从共产党人到贵族后裔、保皇党人、东正教和伊斯兰教的僧侣参加了这次会议。作家尤·邦达列夫、瓦·瓦连尼科夫大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伊·波洛兹科夫、女歌唱家柳·济娜等人在会上发言。

在2月份的最后一天,即2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联邦最



高苏维埃的议员团在苏共中央召开联席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安·尼·吉连科和瓦·米·法林、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书记A. C. 索科洛夫共同主持会议。会上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苏共中央何时最终解决大众传媒的问题?”“叶利钦善于把各种各样的聪明人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为什么苏共中央就做不到这一点?是否有人对‘民主派’的行动作出迅速反应?”会上还有人提出保护“某些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要求,不禁让人想起了克留奇科夫那封信中所说的一段话。

3月1日,库兹巴斯的矿工开始罢工,他们提出了一些政治要求——非政党化,苏共下台,戈尔巴乔夫辞职。1991年3月1日,苏共中央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副部长瓦·米罗年科向苏共中央领导呈送一份题为《关于国内目前政治形势发展的几点看法》的报告。

这份报告有其独特之处。报告对全民公决前夕的国内政治形势进行了详尽分析。米罗年科炫耀自己消息灵通,他报告了苏共的政敌阵营里——鲍·尼·叶利钦周围所发生的一切。米罗年科的结论令人惊恐不安,要求苏共中央刻不容缓采取行动。他似乎“抓住了关键问题”,宣布“今年已经出现了将‘谁战谁’的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的现实可能性”。他把过去的一年评价为政治上失败的一年,是“按照”反对派拟定的“方案”度过的一年。米罗年科写道:“就是在这段时间内,各政党联盟‘民主俄罗斯’正式成立,最终确定了其政治领导人——鲍·尼·叶利钦。”

米罗年科对“指望国内居民低水平的政治意识和文明程度的原始平民主义方法”大加抨击,按他的话说,这是叶利钦的“一帮人”使用的方法,其实他还是承认了这些方法的效力。“例如,密切注视反对派1991年2月23日在马涅日广场举行的群众集会。2月22日和24日在那里举行的预防性和回击性行动使2月23日集会的积极意义化为乌有”。

他认为,苏共中央在全民公决问题上的立场“只可以期待得到几个政治组织(“祖国”人民爱国阵线、“纪念”(瑟乔夫)等等)以及苏联民主党、东正教君主主义联盟、伏尔加拯救委员会、社会党人和民粹主

义者协会的支持。强烈反对的是‘民主俄罗斯’运动,其中表现出最高积极性的是俄罗斯联邦民主党、俄罗斯联邦共和党、俄罗斯联邦社会民主党,1991年2月26日的莫斯科三方会晤中明确宣告了这一点。”

在评价叶利钦的时候,米罗年科着重指出,他在冲突的条件下干得很成功,是摧毁联盟机构的重锤。米罗年科写道:“值得注意的特征是,在著名的电视谈话之后,这次电视谈话实际上是他争当俄罗斯联邦总统竞选运动的发端……支持率(叶利钦的支持率——作者)又开始上升了。”因此米罗年科建议——不要批评叶利钦本人,他不但不怕批评,而且这种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提高他的威望,要批评他那“一帮人”的成员。

这位不久以前的全国共青团的领导人写道:“综上所述,党的一项头等任务就是最大限度地成功举行3月17日的全民公决。在剩下的时间内,应当尝试营造举行全民公决的适当的热情洋溢的氛围。反对派想方设法宣传一种观点:国家领导人一旦取得成功——甚至只在俄罗斯取得成功的情况下——就会马上转入‘以人民的名义’的专政。”为了成功地开展有利于联盟全民公决的宣传运动,他提出了一系列刻板的办法(其中独出心裁而与众不同的办法是,建议在这段时间内,多安排反对派的代表人物去国外出差)。

554

戈尔巴乔夫看了这份报告后作出下面的批示:

“瓦·安·伊瓦什科同志,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书记:

社会政治组织联络部的报告中有一些颇有道理的建议。应该动员全党将这些建议付诸实施。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了,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组织工作,还需要不少的经费(印制和散发传单等)。但是,这是一场政治战役,也许是决定性的战役。如果党能赢得这一战役,就有助于恢复元气,增强党对自己力量的信心。请认真讨论,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整个党的领导机构应转入‘紧急’状态。

米·戈尔巴乔夫。”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已经投入战斗,但他却不信任自己党内的战友。3月5日,中央举行了有共产党中央、州、边疆区以及共

和国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米·谢·戈尔巴乔夫的讲话由于安·尼·吉连科的记录而广为人知：紧急措施太少，俄罗斯的局面需要收场了，搞乱中央的思想来自于美国<sup>109</sup>。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伊·波洛兹科夫在会上发言时，对戈尔巴乔夫讲了语义双关的恭维话：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最近的讲话使我们对党的集体有信心……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您现在已经和保守派站在一起了。”这位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号召在全国实行总统执政。

戈尔巴乔夫的战友阿·谢·切尔尼亚耶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本人对我和伊格纳坚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的运气快完了，他开始焦急不安，害怕有人责问他为俄罗斯做了什么或者没有做什么。’”<sup>110</sup>

为了排除反对派利用广播电视的可能性，加强党对广播电视的监督，3月1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作出了一项专门决定：将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的党组织改组为苏共区委一级的全苏国家广播电视公司下属的莫斯科党组织。

对报刊实行全面控制的一个结果是用俄语对苏联广播的外国广播电台活动更为频繁。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部长阿·杰格佳廖夫和苏共中央国际部副部长B.雷金的一封信专谈此事，该信有一个并非新奇的名称：《关于对付西方广播电台教唆活动的几项措施》，信上注明的日期为1991年3月15日<sup>111</sup>。

3月10—17日期间苏共中央召开了一次新的会议。戈尔巴乔夫在会上的讲话即便不是厚颜无耻的话，也是生硬粗暴。媒体不了解这次会议的情况，戈尔巴乔夫的讲话还是由于安·尼·吉连科的“工作笔记”才为人所知。这篇讲话的实质是：事情正在走向结局，我们应该赢得俄罗斯代表大会。必须严厉监督电视台（作者略去戈尔巴乔夫作出的和吉连科记录中对电视台的评语，这些评语少有适于刊载之处）。吉连科在其工作笔记上写道，“公开性”的创造者要求“让我们的观点占据广播电视。赢得全民公决和代表大会。通过了对莫斯科的决议。莫斯科应该准备举行3月23日的群众集会。”<sup>112</sup>

戈尔巴乔夫的副手瓦·安·伊瓦什科补充道：俄罗斯代表大会前夕应该准备采取一些行政措施。应当保护代表们免受恐怖主义的侵害。

3月5日，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叶利钦的几位激烈的反对者——斯·彼·戈里亚切娃、鲍·米·伊萨耶夫、弗·鲍·伊萨科夫、拉·哈·阿卜杜拉季波夫、B. C. 瑟罗瓦特科、A. A. 韦什尼亚科夫，再一次谈起保护代表免受暴力侵害的必要性。共产党的报纸将“1500亿卢布案”说成是伊·斯·西拉耶夫政府辞职的缘故。该案件的实质是，试图卖出1400亿卢布，购进75亿美元——将近20卢布一美元。（时间和这种说法的作者们开了一个不客气的玩笑：到当年11月初，一美元已经值100卢布，并且还在飞速暴涨。）

受到攻击的叶利钦发表了一系列言辞尖锐的讲话。1991年3月9日，他迈出了新的一步，在竞选期间经常发表演说的地方——“电影之家”发表讲话。他25分钟的讲话竟被热烈的欢呼声打断了20次。叶利钦号召自己的支持者回击共产党复仇的努力，“转入进攻……在‘民主俄罗斯’的基础上建立强大政党的时候到了。我们亲眼看到苏共正在组织起来，我们应该明白：他们正以一个有组织的阵线行动……而3月和今年全年将是决定性的时期，要么民主被扼杀，要么我们（民主派）不但能活下来，而且一定会在年内取得胜利。我们被指责瓦解联盟，究竟谁瓦解了联盟？是谁疏远了7个共和国？是民主派吗？是俄罗斯国会吗？是俄罗斯国会的领导人吗？是俄罗斯政府吗？是总统及其政策把7个共和国推出了联盟。我们不需要以目前形式存在的联盟。我们不需要如此庞大的官僚主义中央。我们不需要各个部门，我们不需要这部官僚主义的庞大机器，这部机器在长达70多年中自上而下武断发号施令。我们应该摆脱这一切……今天印出了联盟条约草案。总统在联盟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又一次骗人说，十分之九的人同意。可是，俄罗斯方面工作组的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并没有签字。

……你们知道，我们完全出于真心诚意，我们认为政治是有道德 556

的,我们大声讲过这一点。可是恰恰相反,没有丝毫道德可言。他们的政治没有道德,肮脏龌龊——这就是他们的政治!或许我们应该像矿工那样,卷起袖子,甚至挥起拳头。

……我主张总统由全民选举产生,选举之前我就讲过这种看法。但我主张在选出总统后所有的政权机构属于人民,也就是说,所有的苏维埃代表由全民选举。第一,那时候不要放过变节分子,因为人民看透了他们。第二,各地建立强有力的执行权力机关和立法权力机关。我们知道应该通过什么人行动”。<sup>113</sup>

同一天晚上,卢基扬诺夫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中发表讲话,将叶利钦的讲话评价为:力图造成剑拔弩张的社会局势,挑起冲突,激起人民反对合法选出的权力机关。

全民公决日益临近。3月15日,戈尔巴乔夫在电视上号召人民在全民公决中投票赞成保留苏联。第二天公布了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告俄罗斯联邦各族人民书》,号召保留苏联,否决俄罗斯全民公决问题。

3月17日举行了全民公决。果如所料,其结果可以作任何一种解释。可以解释为,全国76%的居民支持保留苏联。还可以作出相反的解释:格鲁吉亚、摩尔达维亚、拉脱维亚、立陶宛、爱沙尼亚的多数居民没有参加关系到联盟命运的投票表决。可以说成是,71.34%的俄罗斯联邦居民支持保留联盟。但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的居民,莫斯科与列宁格勒几乎半数的居民反对保留联盟。表面上看,苏共中央与俄共中央立场得到了支持(70%以上前来投票的选民赞成保留苏联),而对于明显反对共产党的一个问题(在1991年3月的具体条件下),要不要设立俄罗斯总统职位的问题,70.88%的选民给予了支持。

期待的结局没有出现。看来,全民公决惟一立即出现的结果是:3月19日苏联内阁作出了《关于零售价格改革和居民的社会保护的决定》。这项决定显然不受欢迎,因为它宣布的是“包括分阶段取消限制的零售价格改革”的方针<sup>114</sup>。可想而知,这项决定在全民公决之前不敢公布于众。其余方面依然照旧。只不过是用在俄罗斯联邦非常人民



代表大会上取得对叶利钦的胜利取代了在全民公决中取得的胜利。

苏联各共和国谋求独立自主的主权化进程,一开始就是联盟机构的党和国家机关的分化,并与各共和国及其政治组织、地方上层人物的公开对立。在这条道路上,突出的里程碑有两座:一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于1990年3月选举米·谢·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此举为其他各共和国开创了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先例,并开启了后来受到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批评的“主权大检阅”;二是准备不足、为时尚早的全民公决,它将一个复杂的大问题(苏联的前途) 557 变成为各种政治冲突的目标、对抗的根源。

### 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和新奥加廖沃进程 ——从对抗到合作

1991年3月20日,报业巨头鲁珀特·默多克访问莫斯科,他向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者提供了自己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会晤的情况。他的文章开头援引了总统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的一段话:“当前,紧张状态达到了极点。暴风雨即将来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密切注视这一切。”<sup>115</sup>

无论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还是他领导的苏共中央,不但密切注视而且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暴风雨。这种准备的第一阶段当然是全民公决。全民公决的倡议者认为,全国多数居民将支持保留苏联的思想,从而使各共和国领导人的立场受到削弱,为同民族分立主义进行斗争创造崭新的基础。这种准备的第二阶段是粉碎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的名字与行为有联系的政治派别。将叶利钦排除于政治生活之外,不容许他参与俄罗斯总统职位的选举,以达到打垮他叶利钦、显示联盟中央制服其他加盟共和反对派的能力的目的。此外,俄罗斯领导人建议并实施的各共和国之间的双边条约,即削弱联盟机关作用的那种条约得以推广的可能性就会被排除。苏联政治发展的对抗

性将不复存在,这种对抗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纲领,取决于他们两人的对立和个人恩怨。

俄罗斯联邦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成为争夺权力的决定性战役的战场。

1991年3月初,苏共中央机关制定一份独特的文件——《行动计划—28》(这个奇异的名称不但证明了文件的拟制者具备侦探文学知识,而且证明了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最终定于1991年3月28日举行)。《行动计划—28》是即将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的详细方案,其中预见到叶利钦及其支持者可能采取的步骤;为了达到解除叶利钦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的目的,该计划拟定了共产党人应该采取的措施。

例如,当时认为,叶利钦的开幕词中应该有下列内容:对政治局势、联盟与俄罗斯的全民公决、各种政治问题的评价,指责共产党人议会党团将代表大会“强加于人”,批判共产党人,确认“中央的罪过”。

558 因此共产党人议会党团的参加者受命从掌握麦克风开始,通过会议程序、主持会议的方法等途径(计划动用10—15人)进行回击。并从那些准备在代表大会上发言或者领导共产党人小组的代表中指定出负责人员。

请看这份文件中的几个片断:“建议由主席和副主席轮流主持代表大会。严格按议事规程主持会议,对一些代表(哈斯布拉托夫之流)的发言不作评论,直到取消哈斯布拉托夫之流主持代表大会的机会(计划动用12—15人)。”

负责人:卡拉什尼科夫, B. B.

……

——坚决要求主席作解释,而不是做报告;

——支持300名代表的要求:紧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只解决一个问题——主席作解释。其他问题不予研究,移交下一届代表大会。想方设法把联盟条约和联邦的话题岔开;

——坚决不让将其他问题列入议程。

负责人:扎哈罗夫, M. M. ……

#### 六、主席的报告

——准备问题,坚决要求报告后给予回答;

——不让使用麦克风 45 分钟;

——书面回答所有收到的问题(准备单独成立一个 40 人的小组)。

负责人:雷布金, 萨延科, 布拉季谢夫, 塔拉索夫

……

#### 九、讨论报告……

——争取做到每两名发言者中、或每三名发言者中有一名要求召回主席(或副主席);

——一旦讨论中提出了政府辞职的问题,则予以支持。激烈批判政府,但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发言中也不提出这一问题。坚持最高苏维埃主席辞职的方针。

负责人:各地区议员团领导人。

#### 十、关于召回主席的问题

——根据发言者的建议,在讨论结束后到通过决议之前,一定把召回主席的问题列入代表大会的日程(计划动用 15—20 人)。

负责人:萨延科, Г. B. , 卡拉什尼科夫, B. B.

——确保以简单多数票通过召回主席的标准。要有代表大会就这一问题准备好的决议草案(计划动用 15—20 人)。

负责人:萨延科, Г. B. , 卡拉什尼科夫, B. B.

这项计划详细拟定了一系列措施,如同上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这些措施的结果应该是鲍·尼·叶利钦必须辞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伊·斯·西拉耶夫为首政府下台(这是最好的情况,最差的情况是司法追究责任)。为此对每一位共产党员代表——选民的受托人的行动进行了详细分工。这些共产党员代表被组成几个小组,承担各种具体任务。

这一政变计划(只能够如此评定这份文件)的倡议者也是那个每

当这个时候躲在俄共背后的苏共中央。苏共中央书记安·尼·吉连科的令人感兴趣的手写草稿被保留至今,上面注明的日期是1991年3月1日。尽管这份手写稿的笔迹十分潦草不清,还是能够看明白将要参加代表大会的俄罗斯共产党代表们的行动次序。还是那些要求:针对叶利钦的报告来准备补充报告,提前准备关于联盟条约和俄罗斯联邦民族国家制度问题的代表大会决议案,准备签署联盟条约,以及关于举行代表大会策略——关于代表大会的议事规程、日程、召回……。俄罗斯共产党人的任务只不过是把这个“苏共纲领”贯彻落实。

3月20日,苏共中央召开会议,主持会议的就是八月叛乱未来的积极参加者苏共中央书记奥·谢·舍宁。他说,从3月23日开始,俄罗斯的局势将更加紧张。对俄罗斯联邦第三次人民代表大会重新提出了几项任务:要求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叶利钦作出解释,由苏联总检察长对俄罗斯政府的行为提出质问,保护共产党员代表免受“民主俄罗斯”支持者可能实施的违法行为的侵害。形势继续紧张。这样的氛围为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奠定了法律基础,并在必要时在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详细制定的计划开始逐步实施。3月25日,苏联内阁通过了《关于莫斯科市暂时停止举行群众集会、上街游行和示威的决议》。此后紧接着是俄罗斯联邦29名共产党员代表提交请求书,请求苏联总理瓦·谢·帕夫洛夫保护他们免受“民主俄罗斯”支持者的侵害。<sup>116</sup>这是事先准备好的举动,在苏共中央的工作会议上被不止一次提到过。按照事先的准备,总理对全国居民发表电视讲话,对自己的政敌进行威胁。他宣布,1991年3月26日—4月15日,莫斯科市禁止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活动、上街游行和示威。帕夫洛夫向共产党员人民代表们许诺说,他一定“保护他们免受野蛮越轨行为与露骨嘲弄话语的伤害”。

3月26日,“提前”通过了苏联总统《关于建立苏联内务部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总局》的总统令。莫斯科民警机关脱离市和俄罗斯的管辖,直接归属苏联内务部,从而排除了莫斯科民警机关被用于反对俄罗斯当局的可能性。

3月27日,在代表大会召开前夕,苏联安全委员会<sup>117</sup>的工作会议如期举行,会议上所讨论的问题不为人所知。然而众所周知的是,第二天早晨,市中心布满了军队。数百辆军用卡车停在莫斯科市中心的大街上。俄罗斯联邦第三届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就这样开始了。

代表大会的会议厅—克里姆林宫狭长的会议厅内嗡嗡作响。这个会议大厅在1934年由19世纪的两个豪华的骑士团大厅——亚历山大厅和安德烈耶夫厅改建而成。<sup>118</sup>来开会的代表多数住在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俄罗斯”饭店,他们步行“穿过”“民主俄罗斯”的支持者及其由民警加强的共产党政敌的“队伍”,去克里姆林宫开会。军队给人以要采取紧急措施的感觉。共产党员代表们试图从最初时刻起就完全按照《行动计划—28》的方案行事。有些人要求“更换计票人”,“要求最高苏维埃主席作出解释”。然而,这一计划的实现开始受挫。大厅里人们的愤怒情绪大爆发。代表大会实际上是在紧急的状态下进行的。大部分代表坚决要求苏联总统把军队撤出莫斯科。220名代表专为此事宣读了《致苏联总统书》。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鲁·伊·哈斯布拉托夫被派去同戈尔巴乔夫谈判。代表大会完全没有按照苏共中央的制订方案者所计划的那样进行。

哈斯布拉托夫回来后通知大家,戈尔巴乔夫“表示尊重代表大会,但他不撤销自己的决定”。戈尔巴乔夫这些话激起了大部分代表再一次大发盛怒。代表们要求中止代表大会,认真研究了把代表大会改在列宁格勒举行的方案。中断代表大会、坚决要求撤离军队、第二天即3月29日重新召集会议的观点最终取得了胜利。

当天,即3月28日晚上,不顾联盟政府的禁令,莫斯科举行了数十万人参加的盛大的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没有遇到挑衅行为,尽管每一位参与者都清楚地知道,当局可能随时会采取暴力手段。但是,这种事没有发生。

代表大会的第一天成了联盟中央领导人失败的雄辩证据。第一,



561 经过精心策划,由代表大会的共产党人议会党团付诸实施的解除叶利钦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职务的图谋未获成功。第二,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企图实际上失败了。军队已进入城内,军队行动的法律依据也准备好了,但面临强大的反对派却不敢冒用。第三,戈尔巴乔夫实施的“莫斯科机动”激起了不合他心意的反响。当时驻伦敦大使列·米·扎米亚京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在“最紧张的时刻,在俄罗斯国会的会议开幕、国会要求把军队撤出城的时候,美国向戈尔巴乔夫公开发表了明确的声明。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玛格丽特·图特维勒宣读了这项声明,美国国务院在声明中呼吁苏联‘不要妨碍人民的言论和表示意愿的自由’。声明中说,美国政府对首都出现坦克和机械化部队表示忧虑,并密切关注莫斯科局势的发展。“我想,苏联清楚地了解我们对使用暴力的看法”。<sup>119</sup>

当天晚上,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召开会议,未来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活动家——副总统根·伊·亚纳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鲍·卡·普戈参加了会议。第二天,军队撤出了莫斯科,“紧急措施”方案被取消。可以断言,正是由于这些事件,戈尔巴乔夫同1990年底—1991年初(当时苏联总统确定了以政治手段保留苏联的方针)攀上权力高峰的那些他最亲近的人彻底划清了界限。戈尔巴乔夫止步于使用武力的界线,不敢承担可能使用武力的责任。戈尔巴乔夫不久前的战友在这种情况下原来都是多余的无用之人,他们明白了这一点。

3月29日,代表大会继续工作。参加大会的民主派已经取得了第一个重大胜利——主动权掌握在他们手中。按照《行动计划—28》行事的尝试已经失去了攻势。共产党人议会党团的两个关键性的报告(弗·伊萨科夫的政治和法律问题报告与尤·沃罗宁的经济政策报告)显然以失败告终。真正产生轰动效应的事件是阿富汗战争的参加者、苏联英雄、俄共中央委员亚·弗·鲁茨科伊上校在大会上的讲话。他激昂慷慨地明确声称,俄罗斯共产党不明白国内发生的事情,俄共的目标与人民的目标相左。他声明退出“俄罗斯共产党人”议会党团,建

立自己的议会党团——“争取民主共产党人”，95名大会代表加入了该议会党团，其中包括“俄罗斯共产党人”议会党团的部分成员<sup>120</sup>。实际上这意味着俄罗斯共产党的分裂。

叶利钦在代表大会上不但保住了自己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位，而且还得到了代表大会赋予的实行改革所需要的补充权力。叶利钦提出了他的在苏联发生了变革条件下的政治纲领。他在谈到准备新联盟条约的必要性时指出：

“联盟中央和共和国一级必须履行下列政治条件：

第一，所有共和国的一切政治力量和职业团体在‘圆桌会议’的原则基础上立即开始对话。

第二，组成包括思想进步的苏共党员在内的各政党、工人运动与各团体的广泛民主同盟。

第三，正式放弃使用武力，包括动用军队作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第四，发展直接的民主政治制度，实施联盟全民公决与共和国全民公决的决议。

第五，真正废除检察机关、司法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军队、国家机关的一党垄断制度；包括国家总统在内，禁止兼任党的职务和权力机关与管理机关的领导职务。

第六，实行三权鼎立制度，作为法制国家建设的开端。立法权力机关立即暂时停止审批各种未达成协议的法案。 562

第七，废除损害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私人权利与自由的联盟与共和国机关的一切违反宪法的决议，建立公民生活的有效保障制度。

第八，切实保障政治多元化，确保实行多党制。

第九，为实现公民获得可靠信息的宪法权利创造条件，保障媒体的独立性。”

叶利钦主张立即建立人民信任与民族和睦的联合政府，尽快签订非签字国可以加入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这种主权国家联盟是联邦制的自愿和权利平等的联合体，刻不容缓建立新的联盟机关。叶利钦说，必须“快速、坚决地……实现经济向市场关系的过渡；否则，不仅瓦解

的进程、离散的进程也将加快。各共和国与各个州试图闭关自守,不是因为日子好过,而是由于经济不稳定,由于完全破坏的状态,由于社会的冷漠无情,而这一切恰恰与各种社会问题未得到解决密切相关。所以尽快满怀信心向市场关系推进才能够——惟一能够!——从经济上将我们各州、我们各共和国、我们各地区紧密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称之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sup>121</sup>。

1991年3月末事件的政治后果尽人皆知。米·谢·戈尔巴乔夫开始明白,靠经过考验的党组织机关的办法不灵了,必须采取妥协的办法。两个似乎不可调和的敌人(苏联总统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令许多人惊讶地开始相互接近了。新奥加廖沃进程——更新苏联的实际尝试开始了。然而,另一方面——“苏联领导人”中准备在1991年3月末取得“彻底胜利”的那部分人开始对戈尔巴乔夫失去信任。

戈尔巴乔夫很快就失去了苏共中央机关和地方机关的支持。党的基层组织、区委会、市委会的成百上千封信寄到中央,要求整顿全国秩序,对戈尔巴乔夫及其支持者亚·尼·雅科夫列夫、瓦·安·梅德韦杰夫提出尖锐、严厉、粗暴、并常常带有侮辱性的批评,谴责他们搞改良主义。这是一场运动,显而易见,对自己的总书记开始“宣战”的苏共中央机关起到了组织作用。1991年4月16日,一些英雄城市党的工作人员在斯摩棱斯克举行会晤,表面上的理由是纪念卫国战争50周年。实质上是为了在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前夕制定苏共保守正统派的纲领。会上讨论了戈尔巴乔夫的活动、“改革”的思想,呼吁为“拯救祖国”采取各种紧急措施<sup>122</sup>。定于1991年4月24日—25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例行全会的筹备工作,是在谴责戈尔巴乔夫方针的口号下进行的。四月全会前夕,戈尔巴乔夫的活动在苏共莫斯科市委和列宁格勒州委的工作会议上遭到了严厉而尖锐的批评。

戈尔巴乔夫周围的情势逐渐紧张得剑拔弩张。1991年4月18日,亚·尼·雅科夫列夫致函戈尔巴乔夫,他在信中警告道:“据我所知,而且对局势的分析也使我作出这样的预测,来自右翼的国家政变正在准备之中<sup>123</sup>。某种类似新法西斯制度的东西即将出现。1985年的

思想将受到践踏。您和您的战友将被革出教门。悲剧的后果简直不堪设想。”雅科夫列夫请求戈尔巴乔夫以首倡者的身份,依据1985年的改革、公民和睦、自愿捍卫统一联盟的思想,创建一个政党或者民主改革运动<sup>124</sup>。据瓦·梅德韦杰夫回忆,戈尔巴乔夫倾向于必须支持中立主义的思想,试图试探各种反对派运动的政治态度<sup>125</sup>,从中寻求支持。

在这样的条件下,戈尔巴乔夫不得不采取机动的战术,开始同一些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合作,这些领导人关注联盟条约的签订,但坚决主张提高愿意加入这个联盟的各共和国主权的水平。为此必不可少的是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协议。1991年4月16日,叶利钦在欧洲议会的工作会议上谈到苏联的命运时说:“我想直截了当和开诚布公地说:更新的俄罗斯绝不同意停止苏联的存在。相反——我们是把自由自愿的联盟——相互用条约联系的主权国家联盟视为整个国家的未来。他们自己共同确定应该以他们的名义在中央一级履行的职能……新联盟应该由各共和国自己自下而上地努力建成。”

明确表达的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愿望成为进行合作与达成未来各种协议的平台。这样的协议终于达成了。莫斯科郊外的政府官邸新奥加廖沃,是一座古老的庄园,距莫斯科35公里,过去曾经是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契尔年科的别墅,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这里是他同罗纳德·里根及其他西方各国领导人举行私人会晤的地方<sup>126</sup>。4月23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苏联总统与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领导人的会晤。这次会晤同其他类似会晤一样,被取名为“9 + 1”——九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加上一个体现联盟中央的苏联总统。

经过历时9个小时的长久而复杂的谈判,最终签署了《关于刻不容缓采取措施稳定国内局势和克服危机的共同声明》(以下简称《共同声明》)。该文件指出,必须“考虑到已经举行的全联盟全民公决的结果,签订主权国家新条约”,必须通过联盟的新宪法,并在此后重新选举联盟权力机关。此外,该声明号召共同采取防止危机的措施,在通过新宪法之前遵守旧宪法的规定,实施一系列社会措施,反对罢工<sup>127</sup>。

564

这项《共同声明》是戈尔巴乔夫的一个非常重大政治举措,因为在四月全会召开之前,他只花一天的功夫,就预先获得了各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戈尔巴乔夫以苏联总统的名义做工作成为新联盟条约得以签署的条件。但是,《共同声明》本身证明了苏联总统应该作出重大的原则性让步。首先,各加盟共和国在不久的将来应该成为“主权国家”。这一文件的正文中没有将“苏联”这一概念运用于未来的联盟,故意不提未来联盟的政治组织形式。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新联盟是社会主义的联盟。由此不难推断,新奥加廖沃会晤的参加者重新审查了1991年3月17日全民公决的一系列规定,并在其中反映出俄罗斯领导人的立场。新宪法通过后必须改选苏联的最高权力机关,这一规定无疑对联盟权力机关造成威胁。

1991年4月24日—25日的中央全会,以党的官员们对戈尔巴乔夫展开严厉而尖锐的批判而著称。戈尔巴乔夫受到的指责是,他“对国家做了敌人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要求他从立法上加强苏共执政党的地位,加强对大众传媒的监督,实行紧急状态。深感委屈的戈尔巴乔夫说,他打算卸掉总书记的职责。他之所以这样说,多少是由于有点儿冲动,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戈尔巴乔夫及其亲信已经有所准备和经过了深思熟虑。戈尔巴乔夫迈出的这一步引起了与会者的仓皇失措。<sup>128</sup>当即宣布休会,紧急召开了政治局工作会议。大家请求戈尔巴乔夫收回自己的声明,他拒绝了。于是政治局通过如下决议:“从国家、人民、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撤销对米·谢·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关于他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务这一提案的审查。”这一提案被提交中央全会审议。绝大多数的与会者不敢冒险投票赞成戈尔巴乔夫辞职,而是支持政治局的建议,让他留任总书记<sup>129</sup>。

戈尔巴乔夫取得了毫无疑义的胜利。首先,他终于得到了多数共和国领导人的支持,出现了不受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共中央约束独立活动的可能性。其次,他主动提出辞职,后来在全会投票中又得到了支持,从而使戈尔巴乔夫在苏共内部所受到的批评暂时有所减少。还应该指出的是,在俄罗斯展开激烈竞选斗争时,戈尔巴乔夫第一次试图袖



手旁观,对俄罗斯总统的候选人不表明自己的态度。

## 选举俄罗斯总统

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非常人民代表大会)发出了在直接普选的基础上选举俄罗斯总统的信号。下一届——第四届代表大会确定了选举的日期——1991年6月12日。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准备开展竞选运动。总统候选人叶利钦显然受到了“民主俄罗斯”运动和产生于1990年的一些新政党的支持。同叶利钦相对抗的是强大的政党组织(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共产党)以及一系列联盟中央的国家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但是,过去这些国家机构观点一致的情况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些机构领导人的观点同其中许多工作人员的意见大有区别。 565

第四届代表大会前夕,苏共中央人文部政治分析和预测处准备了一份题为《俄罗斯联邦总统选举(苏共的目标与策略)》<sup>130</sup>的详尽分析报告。

苏共中央分析家们的预测并不令人乐观。该报告的编写者写道:“可以预想的主要目标如下:

(一)防止鲍·叶利钦当选俄罗斯联邦总统,争取共产党的候选人当选;

(二)防止鲍·叶利钦当选,不以一定要推举我们的候选人当总统为目标;

(三)承认不可能阻止鲍·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千方百计最大限度地利用竞选运动,削弱鲍·叶利钦作为总统的地位,加强共产党的地位。”

第一种,亦即最符合苏共愿望的目标被报告的编写者视为不切实际的方案。有几个原因:社会上形成了“一种看法——苏共的历史罪过导致发生的一切,苏共没有能力防止国家坠入深渊”。苏共没有在威望上能同叶利钦相抗衡的领袖人物,尽管苏联共产党有莫斯科市委

第一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苏联总统下属安全会议成员瓦·维·巴卡京，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之一、1990年冬到1991年春季领导反对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利钦起义的斯·彼·戈里亚切娃等人可能有能力同叶利钦竞争。此外，对叶利钦及其支持者，苏共已经没有能力实施积极的对抗了。苏共中央的分析家们写道：“今天党已经士气低落，纪律涣散。惊慌失措，萎靡不振，冷漠无情，对中央机关在做什么或者做了什么事情一无所知。基层组织的现状就是如此。”

566 第二种方案认为，表面上不受苏共约束、但得到苏共支持的某个人有可能当选俄罗斯总统。这种外表上独立的候选人有两个：一个是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尼·伊·雷日科夫，此人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的“受害者”（他本应退休，但是不久前因心肌梗塞住院）；另一个就是瓦·维·巴卡京，他有自由主义者的名声，被解除了内务部长职务（不过他又得到了苏联总统下属安全会议成员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可推举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内部的反叶利钦派领袖人物（斯·彼·戈里亚切娃、С. Н. 巴布林、弗·鲍·伊萨科夫）为副总统人选。这一方案当时被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报告的编写者认为：“这一方案能够完全或者很大程度上避免反对派打反共牌。同时并不排除推举共产党人当总统的可能性，但这不是来自共产党的直接候选人。况且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也有可能提出我们的候选人；但主要的力量要集中于实现第二种方案，先要深思熟虑一个问题：有哪些组织能够提出‘独立的’候选人？”

然而，苏共中央的分析家们认为，第三种方案——叶利钦当选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人及叶利钦本人一道，本着在政治上加强合作、求同存异的精神，采取一系列有效的重大步骤。……在相互妥协的条件下，‘同意’叶利钦当选。共产党把主要的注意力转移到第二方向——为当选地方权力机关的领导人而斗争，因为共产党在地方上拥有更多成功的

条件和希望。叶利钦的支持者在人数上目前不见得有苏共那样多,他们目前把力量都投入到争取总统选举的胜利。共产党这个时候应该趁机尽最大努力采取获得地方选举的胜利。”

建议苏共提出的或者苏共支持的候选人围绕下列问题开展宣传运动:

“一、批评联盟中央的活动,批评内阁的错误等等。

二、批评苏联总统的无所作为和前后不一致。

三、利用莫斯科与列宁格勒两个市苏维埃为例,利用‘1400亿’这个案例,揭露‘民主派’的实际所作所为。”

与此同时,要求继续破坏叶利钦本人作为俄罗斯总统候选人的声誉。

至少在四个方面中有两个方面证明了苏共面临深刻危机、苏共正在发生分裂,因为不久前还被称为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苏共中央人文部建议公开批评联盟中央(请注意,当时,苏共中央也加入了联盟中央)和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苏联总统。

1991年5月18日,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领导正式支持尼·伊·雷日科夫作为俄罗斯总统的候选人资格,并指示党组织在选举中必须支持雷日科夫。

1991年5月20日,中央选举委员会登记了总统候选人,他们是: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苏联安全会议成员瓦季姆·维克托罗维奇·雷日科夫、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阿曼格尔德·莫尔达加济耶维奇·图列耶夫、伏尔加沿岸—乌拉尔军区司令员阿尔伯特·米哈伊洛维奇·马卡绍夫。稍后加入他们行列的是,此前不久成立的自由民主党主席弗拉基米尔·沃尔福维奇·日里诺夫斯基。 567

在激烈紧张的竞选斗争中,副总统的候选人具有特殊的作用。他们的支持率有助于总统的竞选者揽到最多的选票。

马卡绍夫将军宣布俄罗斯为工农共和国,他强烈反对私有制,支持在1945年的疆界之内保留俄罗斯<sup>131</sup>,他邀请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

委员 A. 谢尔盖耶夫教授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瓦·维·巴卡京邀请罗·格·阿卜杜拉季波夫作自己的搭档,后者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之一,是一位哲学家,过去曾在苏共中央国际关系部工作;这个人批评过叶利钦,但却保留着“中派分子”的名声,而且如同大家的看法,他还得到俄罗斯各民族区域的支持。尼·伊·雷日科夫和鲍·弗·格罗莫夫将军结伴,这位将军之所以成为苏联最著名的军人之一,是因为他在阿富汗指挥第 40 集团军作战,并将该集团军撤离阿富汗。弗·沃·日里诺夫斯基则同 A. 扎维季亚结伴竞选,后者是一个企业家,他在自己的商业活动中与苏共中央事务管理局联系密切。日里诺夫斯基当时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政治家的典型特征,他把竞选当做一种个人的行动,而把他的搭档 A. 扎维季亚当做赞助人。

鲍·尼·叶利钦的情况比较复杂。实质上所有的总统候选人都是针对他而开展自己的竞选运动的。有一点很清楚,在选举中获得的胜利应该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在相反的情况下,选举结果就可能有争议。最好在第一轮就取得胜利,因为社会上人心惶惶。俄罗斯联邦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总统选举法尚不够完善。例如,要求总统应该由登记在册的多数选民选出。这比获得参与选举的选民的大多数要复杂得多。<sup>132</sup>因此,最大限度地动员支持者参加选举的任务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也应该服务于这一目标,副总统候选人应该为总统候选人增加选票。

苏联人民代表、哲学家根·爱·布尔布利斯被认为是可能的副总统候选人,他是在叶利钦的故乡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成为政治家的。系统的思维、分析家的天赋、战略策划才干(他领导 1990 年和 1991 年叶利钦的竞选运动)和策略方面的低能,影响国内政治发展的机遇与能力,以及在交际中“欠缺令人倾倒的魅力”,这一切都奇妙地集于他的一身。

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副主席、经济学家鲁·伊·哈斯布拉托夫被视为另一个副总统候选人。他在 1990 年底—1991 年上半年的暴风

雨般的事件中表明自己是叶利钦的忠实支持者。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前夕,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中没有参与对叶利钦攻击的人为数不多,哈斯布拉托夫就是其中之一。然而,叶利钦却犹豫不决。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令他感到难为情与心神不宁的是,无论是布尔布利斯,还是哈斯布拉托夫,两人都缺乏讨人喜欢和走到普通选民中去的能力。

叶利钦决定让苏联英雄、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争取民主的共产党人”议会党团领导人,以前从未进入过叶利钦亲近之人圈内的亚·弗·鲁茨科伊上校为副总统候选人,此举成为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照叶利钦的话说,提出亚·鲁茨科伊为副总统候选人的建议来自他的演讲稿撰写人鲁·格·皮霍亚和格·尼·哈林<sup>133</sup>。鲁茨科伊作为候选人出乎意料,但却非常有利于竞选运动。亚·鲁茨科伊具有充分体验过战争苦难的勇敢战士的声誉(他负过伤,他的飞机被击落,成为阿富汗反政府游击队的俘虏),因而他在军队和社会上都享有盛誉。他当时在参加苏联人民代表选举的过程中,敢于猛烈批评“民主俄罗斯”及其领袖人物——安·德·萨哈罗夫和鲍·尼·叶利钦。他没有当上苏联人民代表,又参加了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这一次他成功了。他的立场改变了。作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他在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对党的领导,并带走了部分党员,这意味着,部分共产党的选民将投票支持叶利钦——鲁茨科伊这对组合;此外,还寄希望于利用鲁茨科伊的军官荣耀,使反对未来总统的图谋难以得逞。

竞选运动一开始就证明叶利钦这一步棋走得很成功。叶利钦招来鲁茨科伊引起了共产党官员阵营里一片慌乱。反叶利钦势力的喉舌《苏维埃俄罗斯报》写道,从这一选择的后面可以察觉到深远的政治阴谋。也许,叶利钦需要鲁茨科伊作为他在残酷的毫不妥协的政治游戏中的可靠伙伴,想当年,鲁茨科伊在代表大会上使共产党人议会党团分裂,将叶利钦从可能辞职的困境中解救出来。在叶利钦看来,鲁茨科伊好比专门使党的左派队伍分裂的特洛伊木马,叶利钦可以在党的废墟上建立自己的政党,因为目前还没有什么政治力量能够平等地同共产党人角逐权力。其他各家报纸(《独立报》、《俄罗斯报》)写道,鲁茨科



伊候选人资格的选择在政治上毫无错误,因为这本是对雷日科夫推荐格罗莫夫将军的回应措施,是利用“阿富汗效应”的企求,是将军队、内务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吸收到叶利钦支持者队伍中来的谋划。许多大众媒体认为,鲁茨科伊能够招揽许多共产党员和军人、卫国战争与阿富汗战争老战士的选票。他可能成为分裂苏共的一种特殊的“雷管”(《俄罗斯报》)。此外,邀请一名进步的共产党员——这是叶利钦在显示自己有意和解的建设性愿望(《工人论坛》)。

569 就权威和影响而言,在叶利钦和鲁茨科伊之后居于第二位的就是雷日科夫—格罗莫夫的二人组合了。《独立报》对这一组合给予称赞有加的评价:格罗莫夫为雷日科夫增添坚定与果断,扩大雷日科夫的选民范围。雷日科夫以此否认关于自己“犹豫不决”的无稽之谈,支持一种重要的纲领性方针——为共和国的稳定、法律和秩序而斗争。雷日科夫的反对派提出的论点是:这是军人与保守政治家的组合(《俄罗斯报》、《工人论坛》)。

巴卡京多半是被视为戈尔巴乔夫自由主义倾向的继承人。可以看出,他信仰“健全理智的哲学”,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诚实正直,热衷于轰动效应,崇尚平民主义,嗜好无聊的空洞规划,四处许下无法实现的诺言,这一切都与他的秉性格格不入(《消息报》)。

媒体写的最少的候选人,是被大家视为冒冷门的阿·马卡绍夫将军、阿·图列耶夫及弗·日里诺夫斯基。媒体以讥讽的态度对待日里诺夫斯基,断定他是一个不大可信的荒诞不经的人物,指责他恬不知耻地冒名和吹牛,否认他会得到选民的支持。

不过,也有例外情况,《工人论坛》指出了日里诺夫斯基的演说技巧、令人羡慕的攻城槌一般的力量、超乎寻常的精力。“现在有一种预感,各种事件将围绕这位绝非偶然出现于政治当中的人物不停旋转,令人头昏目眩。如果对日里诺夫斯基假以时日,他会让叶利钦丧失非常重要的几个百分点的选票。日里诺夫斯基的成功在于他建议更换里程碑,提出了新的优先方面。他讲了很多有益和正确的道理,其中包括一个大国的庄严宏伟和自豪感的回归。”<sup>134</sup>

媒体的一些简评证实了叶利钦竞选运动的成功。《真理报》断言，提出鲁茨科伊为候选人之后，叶利钦带走了一大部分俄罗斯共产党员。《莫斯科新闻报》据此作出下列预测：叶利钦对自己“副手”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先决定了各种力量的配置。叶利钦注定要同共产党的改良派进行合作。鲁茨科伊的候选人资格十分恰当，这一对组合确保了胜利。《莫斯科新闻报》的专家认为作出如此选择的理由是：

- (一) 显示国民和睦的政策；
- (二) 保证在选举时获得补加的选票；
- (三) 也许这是真诚地履行“9 + 1”协定的条件。

《莫斯科新闻报》的专家们认为，叶利钦表示，他不是反共分子，也不会同共产党人作斗争，因而他夺走了自己主要反对派中的重要王牌。这是十分巧妙的一着棋。但是，专家们对鲁茨科伊在选举胜利之后的作用表示怀疑。鲁茨科伊能够成为叶利钦实行改革的同事吗？他能扮演两个政治阵营的外交调停人的角色吗？他会不会成为变幻无常的党和联盟机构的“特洛伊木马”呢？副总统未必会成为俄罗斯的第二号人物。叶利钦完全相信鲁茨科伊的民主可靠性和其行为的可预见性吗？如果不相信，可能会产生一些大问题<sup>135</sup>。

1991年6月12日，举行了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次总统选举。选举结果如下：鲍·尼·叶利钦获得了57.3%的选票；居第二位的是大大落后的尼·伊·雷日科夫，得票率为16.85%；居第三位的是（这同样完全出乎意料）弗·沃·日里诺夫斯基，得票率为7.81%。新闻媒体预言他的得票率约为1%，可是他却超过了早已成为经验丰富的政治家的阿·莫·图列耶夫（得票率6.81%）、阿·米·马卡绍夫（得票率3.75%）和瓦·维·巴卡京（得票率3.42%）。巴卡京的失败特别引人注目，因为大家都把他视为戈尔巴乔夫方针的体现者。

1991年7月10日，在古老的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在赫鲁晓夫时期专为举行苏共代表大会而修建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里，俄罗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举行了俄罗斯总统就职程序。所有参加者和通过电视关注此事的千百万人都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程序的规模。俄罗斯发展的

历史继承性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大会堂的休息室里,各共和国国徽的上方,陈列着自16世纪至20世纪俄罗斯和苏联的国家奖品、神圣的珍贵纪念品(国家所有宗教和教会——东正教、伊斯兰教、佛教、犹太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书籍)。第一次奏起了此前不久由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批准的新国歌,其主旋律是亚·谢·普希金的同时代人、俄罗斯古典音乐创始人之一——米·伊·格林卡的《爱国者之歌》。

总统鲍·尼·叶利钦宣誓,保证遵守宪法,捍卫俄罗斯的主权,尊重和保护个人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国家元首在74年中第一次得到了全俄大牧首的祝福。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向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表示祝贺。

所有这些华美而庄严的程序证明了一个事实:俄罗斯开始在众目昭彰之下重建,它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具有几百年历史的俄罗斯的继承者。

## **联盟领导层危机尖锐化。 围绕联盟条约草案的斗争**

正如新闻记者和政治学家们所预计的那样,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开始,旨在准备新联盟条约的所有措施,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的私人和解,他们为制定该条约而开展的合作活动,这一切并没有使苏联政治生活中亲共产党和非共产党势力的政治对抗减弱。共产党正在被彻底地排挤出领导地位。1991年4月17日,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民警机关法》,其第20条写道:“民警机关中不允许建立政党及其组织并开展活动。”不久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关于俄罗斯学校非政党化的决议。

“民主俄罗斯”运动积极分子及苏共的其他反对派政党要求就苏共财产民族化问题举行全民公决的行为,引起了苏共中央的严重不安。1991年5月12日,中央办公厅主任尼·叶·克鲁奇纳、中央立法动议和法律问题部部长B. C. 巴比切夫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尤·A. 雷日科

夫共同撰写的一份报告被送呈中央,报告中警告说,在莫斯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下塔吉尔、库兹巴斯、苏梅州及一系列其他州,已经开始了征集签名运动,目的在于就党组织的财产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苏共中央及其在俄共中央的同事表示坚决反对,但是要制止此类趋势,用过去的老办法已经不可能了,于是采用了别的办法。关于联盟条约命运的争论成为联盟领导层(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苏联最高苏维埃)和俄罗斯领导层(叶利钦和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之间对抗的主线。

准备新条约的每一步都很艰难。它需要各共和国协商一致,同联盟权力机关进行激烈争论。只要在达成一致的道路上出现某些成果,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隐藏在其背后的苏共中央就会进行捣乱。

6月3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新联盟条约起草委员会的第二次会议<sup>136</sup>。

6月4日,即第二天,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向最高苏维埃会议通报了联盟条约的起草情况。代表们都支持他的建议:不讨论,也不领取条约文本。苏联最高苏维埃中最大的议会党团——实际上由卢基扬诺夫领导的“联盟”议会党团对这个条约持否定的态度。6月8日,这一议会党团的领导人和该议会党团建立的“联盟”全联盟人民运动作出了《关于签订联盟条约》的声明。这一文件对条约草案进行了谴责,按照声明发表者的话说,因为“重新起草的条约规定将苏联作为一个统一的联邦制国家予以取消,该条约有未经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审核而签订的危险……这将意味着国家政变。”“联盟”议会党团坚决要求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该条约。

1991年7月10日,在阿·伊·卢基扬诺夫主持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工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决议。乍一看,这是一项墨守成规的决议——在最近将要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听取苏联内阁关于国内社会经济形势的通报,实际上准备制造具有久远后果的轰动效应。下面我们再回过头来讲这件事。请读者注意,这项决议是在俄罗斯总统选举前两天通过的。

作为对共产党候选人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回应,1991年6月15日,苏共中央举行了俄罗斯共产党各共和国、边疆区、州党委第一书记会议,苏共中央书记奥·舍宁主持了这次会议。与会者认为,造成失败的主要罪人是戈尔巴乔夫。在这一阶段,对戈尔巴乔夫的憎恨超过了对叶利钦的憎恨。共产党的官员们确信,共和国的全部权力事实上已经转到各政党和各社会政治运动的同盟“民主俄罗斯”的代表人物手中,该同盟已经公开宣布更换现行政治制度的方针。

舍宁在这次会议的总结报告中特别强调:“大家的发言中对如何签订新联盟条约深感忧虑。根据与会者的意见,不容许无视全民公决的结果和苏联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因为全民公决的结果和决议明确规定了新联盟国家的名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联盟及其组建的基本原则。与会者强调指出,只有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才有权通过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终决议。”

请读者注意,这一要求违背了在新奥加廖沃一致达成的名称——苏维埃主权(而不是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舍宁指出,与会者对俄罗斯共和国领导人无视苏联宪法和苏联社会政治团体法在护法机关、高等和中等学校实行非政党化的行为“深感不安”。他向中央写报告说:“许多党委第一书记都指出了基层党组织的强烈意见:党的领导层、中央总书记及其周围的人正在放弃和修正苏共第二十八大的各项决议,各地纷纷提出更换苏共中央领导人的问题。”

舍宁为自己的报告附上俄罗斯联邦各边疆区区委和州委书记签署的声明。这份声明实际上是最后通牒。让我们援引其全文:

“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

最近一段时间,国家党政领导人的行为越来越具有反人民的性质。他们显然打算放弃苏共二十八大的决议。党实际上被剥夺了参与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利。忽视苏联宪法和法律的一小撮人在领导着党和国家。今天正在发生的许多情况与1985年党和人民支持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



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认为必须立刻就以下问题举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全会:

关于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问题。

关于召开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非常代表大会问题,会上应该通过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纲领和章程。”

6月17日,联盟条约草案起草委员会在新奥加廖沃结束工作。该草案当天就分发给联盟各共和国讨论。

同一天,由阿·伊·卢基扬诺夫策划的轰动一时的政治事件爆发了。6月17日,举行了苏联最高苏维埃秘密会议。政府总理瓦·谢·帕夫洛夫、苏联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元帅、苏联内务部长鲍·卡·普戈、苏联国防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在会上发表讲话。 573

这些“强力机构”的领导人谴责苏联总统的行为同苏联的利益相抵触,议员们纷纷谴责戈尔巴乔夫叛变。德·季·亚佐夫说,由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实行的政策,苏联军队正在撤出德国、匈牙利、波兰;德方许诺的军人住宅建设贷款实际上无法使用,因为德方坚持由他们决定在俄罗斯盖房的公司;由于戈尔巴乔夫许诺裁军50万人,10万军官被裁减,其中许多人不能服役到领取养老金,包括只差2—3个月就能领取养老金的人在内。亚佐夫说征兵工作遭到阻挠,特别是各共和国当局反对这件事。他断言,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我们的武装力量将不复存在”。

内务部长鲍·卡·普戈向代表们通报了犯罪率上升和族际冲突加剧的情况。仅在一年中(从1990年8月1日起),内务部就没收了5万枝枪、数吨炸药;在高加索发生的族际冲突中已经用上了重型武器——装甲汽车、机关枪。普戈认为这种情况的责任应由国家的政治领导人承担。

弗·亚·克留奇科夫作了总结。他向代表们宣读了尤·弗·安德罗波夫在1977年1月24日致苏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题为《关于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苏联公民中收买大间谍的计划》的信。这封信指出,“美国中央情报局提出了一项任务:在苏联公民中招募大间谍,培训他们,

之后将他们分派到苏联政治、经济和科学管理部门……美国情报机关领导人的目的明确、态度坚决,要不惜血本,物色对象,寻找一些凭借个人与业务素质,有可能在管理机关中担任职务,完成敌人提出的各项任务的人。”<sup>137</sup>克留奇科夫这番发言有其潜台词:解释为什么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得到了西方的赞成。答案很简单而又符合苏联的政治传统和惯例:西方之所以支持戈尔巴乔夫,就因为他是“大间谍”。改革思想家的情况也是如此:亚·尼·雅科夫列夫于1960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进修过,也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怀疑的对象。

574 总理瓦·谢·帕夫洛夫奉承苏联最高苏维埃,谴责苏联总统和苏联内阁“没有充分开展组织工作,执行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苏联法律,没有运用一切现有的宪法权利和赋予总统的补充权力,以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他要求最高苏维埃赋予他实际上与总统的权力相等的补充权力。

“联盟”议会党团坚决支持帕夫洛夫。哈尔科夫市的代表、出租汽车司机列·伊·苏霍夫在发言中喊出:“打倒戈尔巴乔夫及其周围的黑手党团伙。”他认为这个团伙的成员有亚·尼·雅科夫列夫、爱·阿·谢瓦尔德纳泽、阿·格·阿甘别吉扬。“联盟”议会党团另一位积极的活动家弗·伊·阿尔克斯尼斯警告说,现在国家无政权。С.乌马拉托娃要求剥夺总统的补充权力并移交给内阁。有人问副总统根·伊·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是否知道讨论的情况。亚纳耶夫肯定地说,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个问题,但他看不出其中的政治含义”。他表示出焦急不安,有些人的讲话中把内阁的一些建议视为试图搞政变。然而,事情正是朝着符合宪法的方向转变,因为总统是人民代表大会选出来的,最高苏维埃能够动用罢免总统的程序。

惊慌不安的戈尔巴乔夫第二天来到最高苏维埃的会议上,他宣布不同意帕夫洛夫的讲话,并得到了相应的表决结果。但是,显而易见,他已失去了对最高苏维埃的监控权。

苏联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不可能不成为新联盟条约的反对者。他们害怕最高苏维埃在联盟的改革过程中被解散。他们不敢反对这样的

新联盟条约,把希望寄托在拖延该条约的签订进程,试图在将来为自己创造有利条件。7月5日,他们甚至通过了一项专门决议:代表大会和苏联最高苏维埃无论如何应该工作到其权能终结前——到1994年。

1991年7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一项十分含糊不清的决议:《关于主权国家联盟的新条约草案》。最高苏维埃虽然“基本上”支持该草案,却提出了复杂的表决与批准的程序,试图使新条约的最终签订成为不可能。

7月23日,各共和国领导人再次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会晤。苏联最高苏维埃全体领导人——亚·伊·卢基扬诺夫、伊·德·拉普捷夫、罗·尼·尼沙诺夫悉数到会。参与会晤的还有总理瓦·谢·帕夫洛夫、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外交部长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副总理弗·伊·谢尔巴科夫。米·谢·戈尔巴乔夫向与会者们说:“我感觉到了危险的趋势。应该尽快结束条约签订事宜。”对各个前自治共和国及这些自治共和国曾经加入的各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对征收税款的程序进行了长久而艰难的争论之后商定:1991年8月20日最终签订新联盟条约。对签订程序也进行了讨论。新联盟条约应该在包括外交使团在内的多数应邀人士出席的情况下,在克里姆林宫格奥尔吉 575  
大厅内签订。当时的情况是,与会者们对一切事宜,直到适宜承载这一文件的纸张类型和装订条约文本的专用线绳都经过了深思熟虑<sup>138</sup>。程序问题可能只会成为那些缺乏经验的人的笑料。这一程序实际上排除了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在签订新联盟条约中的任何作用。富有经验的人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将来的联盟中没有这些机关的位置。

新奥加廖沃进程似乎正在顺利推进。宣布希望留在新联盟之内的各共和国——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许多前自治共和国与联盟中央之间就一些极其复杂的关系问题达成了协议。然而,这种情形(联盟改革的现实可能性)却成为促使联盟领导层中的正统派采取坚决行动的刺激因素。当天,《苏维埃俄罗斯报》刊载了一篇政治宣言——《告人

民书》，在上面签名的有未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活动家——瓦·瓦连尼科夫、瓦·斯塔罗杜布采夫、亚·季贾科夫，俄罗斯共产党人思想领袖根·久加诺夫，“联盟”代表团领导人尤·布洛欣，与共产党内民族主义派亲近的文化活动家——尤·邦达列夫、亚·沃洛金、鲍·格罗莫夫、柳·济吉娜、弗·克雷科夫、亚·普罗汉诺夫、瓦·拉斯普京。他们写道：“我们会神智清醒，我们能悬崖勒马，我们不分老少奋起捍卫我们的国家。我们要对那些危害者和掠夺者说‘不’。在抵抗的最后一线，我们决不退却……我们要团结起来……促进苏维埃政权的巩固……苏联是所有各族人民以巨大的努力建造的我们共同的家园和堡垒，是在敌人入侵时期我们从耻辱和奴役中拯救出来的家园和堡垒……”<sup>139</sup>

第二天，7月24日，总统戈尔巴乔夫、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内阁之间的冲突，由于准备联邦条约的新奥加廖沃进程而更加尖锐了。戈尔巴乔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遭到了“联盟”议会党团的尖锐批评。叶利钦的拥护者倒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立场。

1991年7月25—26日，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与会者都不知道这是该党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戈尔巴乔夫实际上不能驾驭党了。从召开会议的最初时刻起，坐落在宁静而舒适的环境中的白色大理石会议厅内就喧闹不止。戈尔巴乔夫的讲话不时被打断，与会者当中时常有人同总书记争吵。会议日程中有讨论苏共新纲领草案和确定苏共提前召开二十九大的日期。但是，更多地令与会者惶恐不安的大概是戈尔巴乔夫如何对待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关于停止政党和群众性社会运动的组织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机关、机构和组织中的活动的命令》，这一命令是本次全会前夕——7月20日通过的。戈尔巴乔夫流利平稳、模棱两可的话语激起了许多党的官员们的切齿愤恨。

与会者谴责苏共纲领的制定者抛弃了共产主义思想，转到了社会民主政治的立场，说他们甚至害怕使用“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制度”、  
576 “合作社”这些字眼，抛弃了关键的概念——“共产主义”；而即使谈及

共产主义,照苏共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鲍·吉达斯波夫的话说,也是“以撰写墓志铭的手法”使用这一概念。苏共纲领草案抛弃了永远尊崇共产主义思想的富有战斗精神的无神论立场,激起了许多发言者的愤慨。与会者指出,苏共正在被迅速排挤出政治生活。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阿·马洛费耶夫说:“共产党……直言不讳地说,已经被剥夺了制定国家政策的权利……就是在苏共内部,骚动、纷争、不协调、明显分裂达到了危险的程度。”

苏共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说:“所提出的纲领草案既没有成为丰富党的理论基础的文件,也没有成为党的行动纲领……我不得不指出,向我们提出的这份文件的制定者在政治意识上自相矛盾,丧失了对现实情况的敏感性。”他尖锐批评了那些使国家陷入深刻危机的“改革”思想家、“60年代的自由派”。鲍·吉达斯波夫随声附和说,非常代表大会必须研究一些组织问题,包括改变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的组成,起用年轻的党员,重新划分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间的职能,讨论总统和总书记由一人兼任的合理性问题。

全会通过决议:1991年11—12月提前举行苏共第二十九次代表大会,会上将通过苏共新纲领。

各级党组织猛烈谴责戈尔巴乔夫活动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在全国展开。各州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全体会议、临时性会议,要求解释清楚党彻底输掉俄罗斯总统选举的原因,坚决要求尽快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萨马拉州、新西伯利亚州、秋明州、普斯科夫州、伊尔库茨克州、车里雅宾斯克州,奔萨和亚美尼亚戈尔诺—阿尔泰自治共和国,列宁格勒州的党组织,军队的党组织发出了成千上万封信,要求惩罚共产主义的叛逆者,对叶利钦发布的关于国家机构非政党化的命令采取反对措施;谴责苏共中央“延误通过苏共新纲领,使共产党人在所谓的民主力量的反对派面前解除了武装”,对戈尔巴乔夫在政治上表示不信任,因为他“在领导党和国家的工作中犯下了错误”<sup>140</sup>。

然而,苏共内部的这些冲突只不过是“杯中风浪”,是即将迅速化为乌有的政治力量的内部事务。然而,事件很快表明,这样断言未免有



点过早。

577 签订新联盟条约是期待已久的重大政治事件。叶利钦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保住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是理想的决策。”<sup>141</sup>事情已经到了需要对联盟条约签订后新联盟如何发展进行讨论的时候。7月29日，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和纳扎尔巴耶夫在新奥加廖沃会晤，专门讨论了这些问题。这次会晤具有秘密的性质。会晤达成了非常重要的协议：副总统亚纳耶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将被逐出新联盟的领导班子。根据叶利钦的提议商定，努·阿·纳扎尔巴耶夫将出任联盟新总理。同时还决定推举米·谢·戈尔巴乔夫担任主权国家联盟总统。

在谈话正酣之时，叶利钦突然不安地说：“有人在偷听我们谈话。”他的担心得到了证实。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次谈话被录音了。也许，这一录音成了1991年8月事件的导火线。”<sup>142</sup>

## 八月叛乱

8月2日，苏联总统在电视讲话中宣布，新联盟条约草案准备就绪，8月20日即将签署。8月4日总统启程赴克里米亚休假。福罗斯别墅期待他前往。它名义上被称为政府别墅（按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术语叫做“曙光”工程），实为由工程兵在1986—1988年在福罗斯海湾沿岸建造的一座总统行宫。4000名部队工程兵用了两年时间建起了一座三层楼的行宫和一栋有200个单间的、供保安和后勤人员使用的大楼。距离福罗斯不太远的别利别克机场被进行了改建，把土运到了别墅附近，栽了上千棵树。在行宫保障系统中，有直升机停机坪和一套卫星通信设备。别墅内设有三层防卫。第一层是在瓦·梅德韦杰夫将军指挥下的一支戈尔巴乔夫和家人的贴身卫队。第二层是所谓的出入

门卫,在别墅内设置的六个岗位上昼夜轮岗。第三层是在别墅区内设置了由负责苏联高级领导人安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九局安排的五个岗哨。别墅外围有边防军 34 个勤务班驻守。从海上看,“曙光”工程设有三层海上防卫——从潜艇到边防军的舰艇<sup>143</sup>。叛乱就是在这里,在福罗斯开始并结束的。尽管有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献资料,8 月叛乱的经过至今仍有一些不解之谜。戈尔巴乔夫大概会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为的是能让世人忘掉他从“福罗斯俘虏”状态中苏醒过来之初说过的错话:“你们永远不会得知全部真相!”作者试图重现这一事件,当然会考虑到“当事人”提供的信息的相互矛盾性。

实行紧急状态的可能性本身如同紧急状态的宣布机制,是立法规定的。1990 年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法》中对此有所阐述。根据这一法律,国家的紧急状态制度可以由苏联最高苏维埃或者是总统宣布实行,但是一定要有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或者是有关共和国最高权力机关的同意或请求。 578

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前夕,1991 年 3 月,实行紧急状态的准备工作开始进行。4 月份当这一计划流产之后,安全会议重新着手制定紧急状态的新文件。这项被称之为“日后有用”的工作不间断进行。戈尔巴乔夫自己就多次说过关于制定“紧急措施”的必要性,这种说法是这位苏联总统特有的。例如,1991 年 8 月 3 日,在去福罗斯的前一天,他在苏联内阁会议上就这样说过。他说,国内一旦进入了“紧急状态”,就有必要采取“紧急措施”。戈尔巴乔夫本人还说:“人民对此会理解的!”<sup>144</sup>戈尔巴乔夫充满活力的花言巧语(这是他的典型特点)完全可能变为行动。俄罗斯的谚语说:“恶人静,莫惊动。”

准备工作慢慢地不声不响地进行着。1991 年 4 月,在苏联总统核准实行紧急状态的筹备工作开始进行的同时,未来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也开始制定。在四月全会前夕(就是在这次全会上,戈尔巴乔夫险些被罢免总书记职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未来的成员亚·季贾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加里宁工厂(一个专门生产现代化武器装备的大型军工厂)厂长、苏联国企和工业、建筑与通信设施协会主

席、一个被视为与苏联军工综合体利益同等重要的人物,拟制了第一份关于实行紧急状态和成立苏联临时管理委员会的命令草案,这个临时管理委员会就是后来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雏形。按照计划,其成员包括奥·谢·舍宁——苏共中央书记,实际上是第二书记,具有主持秘书处会议的权利;奥·德·巴克拉诺夫——中央委员会书记、“军工专家”、火箭技术设备研制者,副主席。另外一位副主席叫瓦·伊·博尔金,他是戈尔巴乔夫的得力助手,也是戈尔巴乔夫最信任的人物,是该委员会秘书处的领导人。这个非常机构的成员还包括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内务部长鲍·卡·普戈、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亚·克留奇科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尤·阿·普罗科菲耶夫、苏联农民协会主席兼图拉州集体农庄主席瓦·亚·斯塔罗杜布采夫<sup>145</sup>。

进入紧急状态的准备工作在悄悄地进行着。这项工作首先应该取得军队、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支持。三大“强力机构”联盟向来被认为是能够顺利进行行政变的必要条件。例如:把赫鲁晓夫从政治舞台上赶下去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几个部门的领导人达成了共识。1991年夏季,苏联部长内阁决定提高军队、内务部、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及铁道兵军官的食品供应标准,以示关怀。因为当时商店里买什么东西都很困难,给军官们提高供应标准是对他们薪金的最实际的补偿。

579

1991年7月20日,国家安全委员会针对有组织犯罪问题召开了全苏联各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安全局领导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检察长尼·谢·特鲁宾、内务部长鲍·卡·普戈。会议指出,经济危机、政治动荡、执行权力机关瘫痪,以及对现行法律的忽视,所有这一切均为有组织的犯罪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制定了在“行政机构处于瘫痪”的条件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内务部联合行动的种种方案。

成功政变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要有地方党组织一级来自下面的支持。1991年夏季,收到了大量的尖锐批评戈尔巴乔夫、要求“整顿秩序”的信件,这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可以得到群众支持。

最后一点,1991年苏联政治生活的现实要求立法机关站在阴谋者一边。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做他们的助手,这一点在

1991年3月的事件中显而易见。何况苏联最高苏维埃不满意联盟条约的准备程序。

重要的是,阴谋者方面还有根·伊·亚纳耶夫这个绝顶的庸人,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执著要求,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统,这一点又是戈尔巴乔夫的悲哀。副总统在总统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下,无论这种“无行为能力”是真还是假,都可以替代总统。亚纳耶夫被吸收参与这一阴谋中大大加强了阴谋者们的地位。

似乎一切必要的条件阴谋者们都已具备,此外还可以再补充一点,就是国内正值严重的经济危机,商店里的商品总是被一扫而光,连最一般的必需品,包括食品、烟草和面包都不能保障。自然,如此巨大的危机,责任要由戈尔巴乔夫来承担。

密谋的消息走漏了风声。6月20日,美国国务卿詹·贝克在柏林向苏联外交部长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通告说,美国情报局获悉准备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有关情况,参与此事的有帕夫洛夫、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这些情报还通过当时的美国大使J.梅特洛克传到莫斯科<sup>146</sup>。

8月5日或者6日,克留奇科夫会晤了亚佐夫,他们商定继续“分析形势”。用克留奇科夫的话说,所有这一切未必不是按照戈尔巴乔夫的直接委托去做的<sup>147</sup>。

8月6日,克留奇科夫向他的两个同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情报局)副局长B.日任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助理A.叶戈罗夫下令制订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的战略预案。空降兵司令帕·格拉乔夫被吸收参与这一预案的准备工作<sup>148</sup>。预测的结果不能让人欣慰。过了两天,分析家们报告说,实行紧急状态不是时候。然而,克留奇科夫反驳说,如果联盟条约签署之后,再想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就不可能了。

8月13日,卢基扬诺夫和戈尔巴乔夫进行了一次电话长谈。卢基扬诺夫通报了有关叶利钦对联邦委员会和国内形势的态度。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亲自给叶利钦打了电话,并且获悉,反对条约的不仅只是苏联最高苏维埃内部的“联盟成员”,还有“民主俄罗斯”的激进分子——

尤·阿法纳西耶夫、叶·邦涅尔和格·斯塔罗沃伊托娃。戈尔巴乔夫感到叶利钦在动摇,他产生了疑问。“总之,我们是在一个很好的氛围中结束的,尽管我心中还留有一些不快,总感觉到叶利钦有一些东西没有讲出来。”<sup>149</sup>可以肯定地说,卢基扬诺夫也得到了信息。他是个经验十分丰富的机关工作者,非常了解戈尔巴乔夫的性格,他很会利用联盟总统的疑心,于是他加大力度挑起戈尔巴乔夫对叶利钦的不信任感。

8月14日,克留奇科夫告诉叶戈罗夫说,戈尔巴乔夫精神失常,不能工作了。所以必须要准备好实行紧急状态的文件。第二天,8月15日,实行紧急状态的主要文件起草完毕。当天,克留奇科夫再次会晤了格拉乔夫、日任和叶戈罗夫。后来奥·巴克拉诺夫也加入进来了<sup>150</sup>。克留奇科夫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准备的建议包括政治、经济、军事领域,甚至包括了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方面,目的是制止国内不稳定的局势,恢复纵、横关系,活跃经济活动,采取紧急措施开始秋收,安排好对居民的食品与工业品供应,加强打击犯罪的斗争……任何极端措施都没有。暂时停止一些政党及组织的活动,服从稳定国内局势的利益。为了拯救国家,落实上述建议,决定向戈尔巴乔夫报告这些建议。”<sup>151</sup>大概在8月15或16日,克留奇科夫下令窃听鲍·尼·叶利钦、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伊·斯·西拉耶夫和俄罗斯国务秘书根·爱·布尔布利斯的一切谈话。

戈尔巴乔夫每天都能得到负面的消息,这些消息能使他确信,国家的形势急剧恶化,福罗斯别墅不断收到报告说,国家正在变得无法控制。有人提示他说,叶利钦去阿拉木图会见纳扎尔巴耶夫不是没有原因的。戈尔巴乔夫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说,当戈尔巴乔夫得知许多加盟共和国领导人都在阿拉木图集会的消息时,他非常气愤。

为宣扬“整顿秩序”的必要性,意识形态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在进行。8月16日,报纸上登载了一篇声明——《从“语言”到行动》,这是不久前《告人民书》这一宣言的后续。这一次,声明是由一个“召开民族爱国运动成立代表大会的倡议团”签署的。日里诺夫斯基的自由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以及苏联国际运动组织也加入到了这次运动中。



第二天,8月17日,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总理帕夫洛夫、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舍宁和巴科克拉诺夫、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和阿恰洛夫将军、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格鲁什科将军等人,在莫斯科郊区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处秘密住宅开会。用克留奇科夫的话来说,所有这些人都不同意近年来戈尔巴乔夫领导下实行的对内对外经济方针。

说到这里,请读者注意下述情况。

当时占据苏联管理系统重要位置的一些党政高官拉帮结派,致力于改变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方针政策。这些人中包括军工综合体代表人物——中央委员会书记巴克拉诺夫,国家企业协会主席季贾科夫和国防部长亚佐夫。

另一部分是党机关的代表人物,他们代表了近年来党内新的实权派领导层,包括1990年刚被选入苏共中央委员会的奥·舍宁,在过去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从中央委员会书记升到了实际上的“党内第二号人物”,把在苏共管理层中占据关键位置的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瓦·伊瓦什科挤掉了。还有一个人是瓦·博尔金,他从一个没有多少人知道的中央委员会书记助理升到了总统办公厅主任。

这一帮人中,有“强力部长”亚佐夫、普戈和克留奇科夫。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作用,毫无疑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代表克留奇科夫是“强力部长”中的最主要人物,他是不满情绪的发动者和提倡者,负责策划和准备。亚佐夫起着保护传统、捍卫苏军利益的作用,为此他和他的部队在叛乱期间被分配干“粗活”。内务部长普戈的作用是最不起眼的。当时他没有被邀请参加文件的拟制工作,“忘了”通知他来参加8月17日的关键性会议。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之所以参与了这一阴谋计划,多半是由于他的职务。

此外,这一帮人中还包括一些苏共高级领导人,这些人在签署了联盟条约之后大概会丢掉自己原有的职务。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副总统亚纳耶夫和总理帕夫洛夫就属于这一类。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同搞阴谋者同流合污。然而,他们的作用与其说是组织指挥和

发号施令,不如说是一种摆设,起着—个招牌的作用,使人以为所发生的事是合法的。然而,在实行紧急状态后,他们自己却尽量回避,不积极参与事件。

这一帮人的近期目的是,力求保住苏联原有的状态,为此应该毁掉1991年8月20日联盟条约的签署程序。

应该指出的是,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倡导者们一开始就不是—个统一的集团,在他们头几次失利以后,内部矛盾就显现出来了。

582 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策略尚在研究之中,此时正在福罗斯休假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成了关键性人物。

当时,去福罗斯的人员已经定下来了。瓦·博尔金、奥·巴克拉诺夫、奥·舍宁、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警卫局局长尤·谢·普列汉诺夫将军、陆军司令瓦·瓦连尼科夫将军等都已经到了福罗斯。留在莫斯科的是克留奇科夫、亚佐夫、普戈、帕夫洛夫和亚纳耶夫—些有实权的人物。克留奇科夫写道:与会者们“决定不管怎么样,还是要再去找戈尔巴乔夫,动员他正确地评价形势,并采取拯救国家的措施……戈尔巴乔夫会采取怎样的决定呢?所有到会者没有—个人对这个问题有清楚的答案。但是仍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再次去找戈尔巴乔夫,试图说服他。会上商定,再次开会讨论总统已经通过的决定”。

可以断言,阴谋者们当时已经预见到事态的发展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

第一种是最好的情况,就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遇到来自苏共领导、国家机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军队以及内务部等方面的联合抵抗之后,不得不批准国家进入紧急状态。这种行为具有法律的透明度。当紧急状态制度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的确认之后,这一制度就成为完全合法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戈尔巴乔夫的命运就会掌握在阴谋者手中,他们先利用他,然后由新的苏联总统将其替代。

第二种情况,是比较现实的一种方案(通信兵准备切断总统的外界联络,因为他们和阴谋者们—起飞到了福罗斯,由此判断,对这个方案也做了准备),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定会采取他所特有的沉默态度。

他曾经在1989年春天第比利斯事件后,就卓有成效地采用了这种做法。而在1991年1月,就是因为他说什么“不知道,没有得到消息”,使他在维尔纽斯事件中获得了一次小小的成功。所以阴谋者们就准备了这个方案——宣布戈尔巴乔夫生病。这样能让戈尔巴乔夫逃避责任,等待阴谋者玩弄把戏的结果,而在这时候,阴谋者就要把亚纳耶夫推出来,由他来替代戈尔巴乔夫行使职权。而戈尔巴乔夫的命运最后将取决于紧急状态的发展结果。他可能试图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协商,继续保住自己的位置,也可能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地位加固的情况下丧失这个位置,最后他还可能声明自己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敌人。

第三种情况,戈尔巴乔夫坚决表示抗议,动用现有的力量(私人卫队),并向苏联和国外求助。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莫斯科还有一班“强力部门”的领导人,他们应该能挫败戈尔巴乔夫的抵抗。当时还设想一种方案,尽管这是令人不愉快的方案,因为外面接连不断盛传戈尔巴乔夫患有重病。根据作者掌握的情况,当时,莫斯科一个精神病医生小组接到了指示,要他们准备开具苏联总统患有精神疾病的诊断书。戈尔巴乔夫可能被宣布为无行为能力之人,而患有重病的人有些时候是会死掉的……

8月18日,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在克里姆林宫和福罗斯两地的阴谋者开始实施计划。早晨8时,亚佐夫在国防部主持召开了会议。莫斯科军区司令尼·加里宁将军受命准备派遣第二近卫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近卫坦克师进入莫斯科。空降兵司令帕·格拉乔夫则受命准备派遣驻扎在图拉的第106空降师进入莫斯科。

11时,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下令第三总局(在苏联武装力量中设有特别处)局长海军中将扎尔杰茨基和宪法制度保卫局局长维·沃罗特尼科夫将军向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派遣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小组。他自己委托副手列别杰夫组建一个监视小组,在必要的时候准备逮捕一批人。被列入逮捕名单的人有70个(从俄罗斯领导人到已退休的戈尔巴乔夫过去的追随者),其中包括雅科夫列

583

夫和谢瓦尔德纳泽<sup>152</sup>。同时下令监视在离莫斯科 30 公里处的“阿尔汉格尔斯克”疗养地的叶利钦<sup>153</sup>别墅周围动态。

8 月 18 日 17 时左右,舍宁、巴克拉诺夫、博尔金、瓦连尼科夫等人来到戈尔巴乔夫的行宫。陪同他们的有国家安全委员会将军普列汉诺夫和格涅拉洛夫。在福罗斯的人没有预料到他们的到来,戈尔巴乔夫过了好长时间才出来接待他们<sup>154</sup>。实际上在这伙人马到来的同时,福罗斯的电话联络已经中断了。最后戈尔巴乔夫终于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他们。舍宁向戈尔巴乔夫说,他们来的目的是要一起讨论一系列国内的形势问题。总统当即发问:“你们代表谁?以谁的名义和我说话?”

按照博尔金的说法,“代表团希望和以往的会晤一样,对相互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而后,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取得准备使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的委托书。可是,谈话从一开始就不投机”<sup>155</sup>。

会晤的参加者(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博尔金)说,一旦出现危急情况,“准备按照他(指戈尔巴乔夫——作者)的委托书采取几种方案”。大家告诉他,无论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军队里,都需要采取紧急措施;大家还说,苏联政府和最高苏维埃都反对通过新的联盟条约,因为这一条约没有征得他们的同意。“总统若有所思,他突然问道,紧急状态措施是否适用于俄罗斯领导人的行为?听到了肯定的答复后,他终于舒口气说:

——最好采用最大限度的民主方式来实现你们所建议的一切……

戈尔巴乔夫挥着告别的手势补充说道:

——好吧,就这么着,干去吧!”<sup>156</sup>

584 戈尔巴乔夫的护卫队长梅德韦杰夫马上发现别墅内通信线路被切断了,他开始怀疑“赫鲁晓夫式的方案”<sup>157</sup>开始了。梅德韦杰夫还把博尔金保持缄默的事情(他们还带来了让总统签字的文件)告诉了总统,但戈尔巴乔夫拒绝签署这些文件。普列汉诺夫向从戈尔巴乔夫身边回来的博尔金问道:“嗯,他那里怎么样?”

——博尔金……回答说:“没什么……没有,他没有签。”



梅德韦杰夫写道：“他回答的时候一副大失所望的样子，但是很镇静，仿佛预料到结果就该是这样的。”<sup>158</sup>

米·谢·戈尔巴乔夫本人对当时情况的描述完全是另一个样。用他的话来说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得到通知说，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并建议他签署实行紧急状态令。巴克拉诺夫列举了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组成，之后指明成员中有卢基扬诺夫；他说，叶利钦从阿拉木图一回来，就逮捕他。如果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不签署紧急状态令，他就要把全权转交给亚纳耶夫。戈尔巴乔夫援引了巴克拉诺夫的话：“您休息一下，我们先来做些‘粗活’，然后您就可以回来了。”<sup>159</sup>

戈尔巴乔夫没有签署这个命令，他说：“对于国内的形势我了解得不比你们少，我的不安也不亚于你们。你们认为需要采取这样的措施吗？我的意见是这样，最主要的一个措施已经准备好了——这就是要签署新联盟条约。”

戈尔巴乔夫接着解释为什么他拥有人数众多的卫队、却没有逮捕阴谋者的原因。“首先我希望，我拒绝接受他们最后通牒式的要求能使阴谋的罪魁祸首们变得清醒……同时还希望，这一次我的强硬态度也许会对他们产生一定的影响。”<sup>160</sup>此外，用他的话来说，逮捕这些人，什么问题也不能解决。阴谋的中心在莫斯科，而戈尔巴乔夫本人实际上已经被逮捕了。

戈尔巴乔夫的护卫队长对形势另有一种看法。梅德韦杰夫写道：“对我，一个卫队长来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那个时候是否有什么危险因素威胁到总统的生命和他个人的安全？可笑的是，什么生命危险，什么逮捕，都根本谈不到，尽管当时的心情是沉重的。告别时，大家都握了握手，代表团离开了戈尔巴乔夫的住处，尽管情绪不好，但是非常平静：没有成功，那就算了吧。他们也预料到了这个结局。”

梅德韦杰夫肯定地说，如果戈尔巴乔夫下令逮捕阴谋者，他们肯定被逮捕。“我手边就有人，一架图-134 备用飞机和一架直升机，都在我的管辖范围。技术上的事，都不成问题，不过是把人抓起来，铐上手铐，带回莫斯科。到了首都再说，在那里还可以再抓他几个。”<sup>161</sup>



让我们对阴谋者的福罗斯之行进行总结。首先要说的是,后来那些成了敌人的人所提供的情况是否属实。

福罗斯之行即将临近。在此之前就有大量的信息从莫斯科传到了福罗斯。用阴谋者的话来说,这些信息都是说服戈尔巴乔夫的,希望他能站到他们的立场上来。戈尔巴乔夫承认,他对于这些信息感到震惊,但是没有同意阴谋者们所建议的做法。

阴谋者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和他们站到一起,但是对此又缺乏信心,于是他们把准备好的命令报告戈尔巴乔夫,但是这个文件的草案却没有拿给总统看。

阴谋者们建议戈尔巴乔夫在他们“整顿秩序”的时候“躲避风头”。

585 无论是戈尔巴乔夫,还是其他见证人都强调指出说:苏联总统失去了联络工具,处于与国家隔绝的状态。请读者注意:早在阴谋政变小组还在福罗斯的时候,戈尔巴乔夫自己就察觉到了。然而,无论是阴谋者们,还是卫队长和戈尔巴乔夫本人,都没有要求阴谋者恢复通信联络。

戈尔巴乔夫拒绝与阴谋者们合作,但态度并不坚决,所以没有导致他与未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代表团关系的彻底破裂。按照戈尔巴乔夫的话来说,他还寄希望于他们能有理智的举动,而阴谋者却认为:“让这种大政治家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同意’两个字是不太可能的。”告别时气氛非常平静,戈尔巴乔夫和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sup>162</sup> 戈尔巴乔夫的警卫人员没有任何理由出来干涉当时的情况。

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是他的敌人都说:苏联总统拥有一支装备精良而又忠实于他的贴身卫队。

阴谋者们确信,他们追求的是要把过去早已经制定好的那些措施变为现实。而戈尔巴乔夫至少从1991年4月起就已经远离这个话题,一再强调说,他坚决反对破坏签署联盟条约的做法,戈尔巴乔夫断言:“这是逮捕总统,篡夺总统的权力”。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拥护者们坚持说,戈尔巴乔夫的行动使人觉得他实际上是赞成他们的计划的,只是不想在形式上予以确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使者从福罗斯一回来,就在莫斯科开展了一场讨

论,博尔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作了记录。帕夫洛夫、亚佐夫、普戈、亚纳耶夫、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卢基扬诺夫、舍宁、巴克拉诺夫、博尔金都参加了在克里姆林宫的讨论。博尔金写道:“与会的人开展了异常热烈的讨论,如果戈尔巴乔夫突然拒绝实行紧急状态那该怎么办,意见分歧严重,争相发表自己的看法:

——既然总统不置可否,那么就一切照旧好了。

——你们还想让他向全世界宣布实行戒严吗?等待他这样做,实在是太天真了,不会有这种事的。

——要知道,国家面临崩溃,再也不能容忍了。没有退路了。最好不要让戈尔巴乔夫处在受攻击的地位,以免影响他的国际威望。应该自己承担责任。”<sup>163</sup>

戈尔巴乔夫却有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他说,当时他坚决反对进入紧急状态。

让我们尝试做出结论。分析现有的资料使人确信,这一阴谋是违背戈尔巴乔夫的意愿的,尽管戈尔巴乔夫经常谈到可以实行紧急状态,他的这种说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图谋的最终成熟起到了“营养高汤”的作用。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合作,但是并没有与他们发生直接冲突。在阴谋实施的最初时刻,他并没有采取坚决果断的镇压措施。让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当时的重要细节:戈尔巴乔夫的卫队始终忠实于他。8月21日,正是他的卫队威胁说要采用武力,拘留了飞到福罗斯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代表团成员,并且强迫他们必须接通与外界的通信联络<sup>164</sup>。而戈尔巴乔夫却出尔反尔,力求逃避责任,把责任推到了直接执行者身上,所有这一切构成了八月政变的特有因素。

然而,让我们再回到8月18日晚上,克里米亚之行的参与者在克里姆林宫向同事们通报了此行的结果。显然,当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只能执行第一方案——不让戈尔巴乔夫参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化了。卢基扬诺夫宣布说,他不能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因为他还要做苏联最高苏维埃的领导工作。卢基扬诺夫的态度是正确的,

586

也是合适的,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最高苏维埃届时应该赞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并给予这些行为以合法的形式,这一点做起来会简单得多,如果卢基扬诺夫在形式上不加入紧急状态权力机构领导班子的话;之所以说是合适的,是因为卢基扬诺夫希望做一个“搏斗观望者”,并保留他对所发生的事件未加干涉的表象,何况当时这件事情还不稳妥,因为戈尔巴乔夫的病假证明还没有拿到。

拒绝参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活动的还有应邀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外交部长亚·别斯梅尔特内赫。他说,参加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将会给他的工作带来不便。

亚纳耶夫那里也差一点出了问题。他在好长时间内拿不定主意是否要签署那个命令。人们反复说服他,并许诺,一旦戈尔巴乔夫恢复健康,还会履行职责的。<sup>165</sup>

亚纳耶夫终于签了字。

电视和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有节奏地宣读:“苏联副总统命令:鉴于身体状况,戈尔巴乔夫不能继续履行苏联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自1991年8月19日苏联副总统开始履行苏联总统职务。莫斯科。1991年8月18日,苏联副总统根·伊·亚纳耶夫”。

阴谋的“潜伏期”结束了。政变开始了。下一步是签署《苏联领导人声明》。声明宣布,“鉴于身体状况”,戈尔巴乔夫总统不能继续履行自己的公职,总统全权移交给副总统根·伊·亚纳耶夫。在“苏联某些地方”实行紧急状态制度,期限为6个月,自1991年8月19日4时起实行;苏联法律在整个苏联全境拥有绝对的主导地位;“为了便于国家管理和有效实施紧急状态”,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有: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奥·巴克拉诺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弗·克留奇科夫、苏联总理瓦·帕夫洛夫、苏联内务部长鲍·普戈、苏联集体农庄协会主席瓦·斯塔罗杜布采夫、苏联国企和工业、建筑、交通、通信工程协会主席A.季贾科夫、苏联国防部长德·亚佐夫、苏联代理总统根·亚纳耶夫。

“星期一是沉重的一天。”——俄罗斯的谚语这样说道。1991年8

月 19 日的星期一对于全国来说都是沉重的一天。受到突然一击的苏联公民从电台、电视听到了这样的消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伊·卢基扬诺夫认为，准备签署的新联盟条约草案不符合苏联宪法，也不符合 1991 年 3 月 17 日全民公决中表达的千百万苏联公民的愿望。电台和电视台的播音员还报告了戈尔巴乔夫身患重病的消息，并宣告产生了新总统——亚纳耶夫，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整顿国家秩序，确保秋收，恢复工业企业间的联系，并给每一位苏联公民提供 0.15 公顷的耕地。古典音乐伴随着这一消息的报道。而苏联人知道，一大清早就听到古典音乐，意味着国家葬礼即将开始。

大家都知道：国内发生了政变，戈尔巴乔夫被撤掉了，如同许多年前赫鲁晓夫身上发生的事件一样。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惩治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及其追随者。

位于普列斯纳大街、离莫斯科河不远的俄罗斯联邦政府和最高苏维埃大楼，在莫斯科被人称为白宫，此时它成了政治生活的中心。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开始实施具体的行动计划。第一阶段主要是营造恐吓气氛。根据亚佐夫的命令，塔曼摩托化步兵师和坎捷米尔坦克师进驻莫斯科；塔曼摩托化步兵师由三个摩托化步兵团、一个坦克团和一个侦察营组成；而坎捷米尔坦克师由三个坦克团、一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侦察营组成。仅这两个师就开进莫斯科坦克 362 辆，步兵战车 140 辆，装甲运输车 148 辆，军用重型卡车 430 辆，军人 3809 人<sup>166</sup>。然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力量还不仅限于这些，图拉空降师也进入了莫斯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还拥有一支“阿尔法”精锐部队，对于这支部队，人们都说，他们用一个排的兵力就能拿下喀布尔的“阿明宫”；此外还拥有被国家安全委员会独立训练中心命名为代号“B”的破坏小组，它实际上是一支专门从事破坏活动的部队。内务部拥有特种警察部队和以捷尔任斯基的名字命名的特种独立摩托化步兵师。

庞大的兵力足以表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定要摧毁政敌意志、使其屈从于自己的决心。以武力相威胁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只要瓦连尼科夫将军从福罗斯飞往基辅，以实行紧急状态进行威胁，乌克兰政治



领导人就会同意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要求。下面援引的一些材料证实,许多加盟共和国都承认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合法性。实行紧急状态的倡议者似乎达到了目的。

但是在俄罗斯,情况并非如此。一些乍看上去不那么重要的怪事却起到了对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作用。8月18日,一个炎热的星期天,俄罗斯的许多高层领导都在位于郊外的俄罗斯部长会议“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村度假。叶利钦总统刚从阿拉木图回来,也来到了这里。一大清早,鲍·尼·叶利钦的房间里,就聚集了許多人,有总理伊·西拉耶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鲁·哈斯布拉托夫,国务秘书根·布尔布里斯,俄罗斯人民代表、法学家谢·沙赫赖,莫斯科副市长尤·卢日科夫和彼得堡市长阿·索布恰克。早晨就已经写好了《告俄罗斯公民书》。

“自1991年8月18日夜间起,解除合法选举的国家总统的权力。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这样做都是正确的,因为我们遇到了右翼的、反动的、反宪法的政变。”——告公民书中这样写道,并指出,联盟条约的签署有夭折的危险。告公民书指出,实行紧急状态是以恢复共产主义制度为目的的国家政变。在告公民书上签名的人有叶利钦、西拉耶夫和哈斯布拉托夫。告公民书全文通过叶利钦别墅的传真机发往各地,发往各家报纸编辑部、新闻通讯社,经过复制,发往全国乃至全世界。即使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还有同俄罗斯领导人磋商的愿望,现在也不可能实现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刚一采取行动,影响政变结局的事件就发生了。1991年夏季,叶利钦在图拉。在那里他经人介绍结识了图拉空降师。这个师的师长是亚·列别德将军。空降兵司令、苏联英雄格拉乔夫将军向叶利钦介绍了这个师的情况。格拉乔夫后来受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的委派,与另外两位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人共同起草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计划。当时已经陷入绝望状态的叶利钦一早就直接给格拉乔夫通了电话。叶利钦提醒格拉乔夫说,格拉乔夫曾经答应向俄罗斯合法政权提供帮助。据叶利钦说,格拉乔夫当时“停顿



好一大阵”。格拉乔夫在作出抉择<sup>167</sup>。一种情况是,他今后还要扮演自己原来的角色,给自己的“战将”名声套上“叛乱参加者”这一“光环”。何况此事还未定准是否成功;另一种情况是,他有可能从此在俄罗斯飞黄腾达,实现苏联英雄们孜孜以求的锦绣前程。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鲁茨科伊上校不是当上了俄罗斯副总统吗!格拉乔夫试图在这种情况下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上说话。他答应叶利钦为了做好保卫工作,他将向“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村派遣一个侦察连(顺便提及,这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格拉乔夫承担了“保卫”白宫的任务。这是在叛乱失败后,在检察机关的审讯中,他在谈到这个早晨的时候如是说:“1991年8月19日,叶利钦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我向他解释说,国家已进入紧急状态,军队正在向莫斯科挺进。我问他,我应该怎么办。他回答说,让我亲自调拨空降部队保卫白宫,我答应了。8时,总统顾问波尔特诺夫来到我这里,于是我们达成了相互帮助的协定。我向列别德下达了任务,让他亲自调出一个营去保卫白宫,亲自带领并向俄罗斯总统报告。列别德带了一个营向白宫出发,在那里部署好了坦克,许多坦克尾部紧贴大楼,以这种方式保护白宫。”<sup>168</sup>

在列别德看来,当时发生的一切似乎有些异样:一开始根本不让他进入大楼,在他看来,这栋大楼需要马上用街垒保护起来。后来他发现,在军队已经开进莫斯科、这一进程受到全面抵制的情况下,他已经丧失了对这个不幸的坦克营的指挥权。<sup>169</sup>最后他还是与俄罗斯总统的国务顾问尤·弗·斯科科夫联系上了。后来,列别德被人带去见总统,总统直截了当地问,执行格拉乔夫的命令来保卫白宫的列别德防范的对象是什么人,对于总统直率的问题,列别德将军回答说:“防范谁呢?当然是要防范所有企图加害岗哨和哨兵本人的人”<sup>170</sup>。他所作出的巧妙回答实际上意味着,列别德准备保卫的是他自己,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位将军要做好两种准备,将来还不知道要听命于哪一方呢。后来列别德将军曾多次谈及和写到此事:如果他接到了命令,让他拿下白宫,那么,不用说他一定能够执行这一命令。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格拉

589

乔夫的行动不积极,给列别德下达命令的就是格拉乔夫。格拉乔夫不采取积极行动的方针很快就不再是秘密了,包括对列别德也不是秘密。当空军总司令叶·沙波什尼科夫了解到格拉乔夫拖延派遣空降兵的事情之后,他便明白了格拉乔夫是在有意“延迟”。<sup>171</sup>

“阿尔法”小组指挥员 B. 卡尔普欣 8 月 19 日一大清早就接到命令,要他监视叶利钦的别墅,后来——他又从无线电里接到命令,要他逮捕叶利钦,并把叶利钦拘留在扎维多沃——一座较远的郊区政府官邸。这个命令他没有执行,对此他解释说:他不想执行这个命令。然而,作者认为,这另有原因:卡尔普欣注意到他这次接到的是口头命令,这绝不是偶然的。<sup>172</sup>这意味着,如果不成功,他卡尔普欣要对所作的一切负全责,他不愿意承担责任。也可能还有另外一种情况:特别行动小组只不过是错过了政府车队,这支车队以最高的速度冲出“阿尔汉格尔斯克”别墅村,风驰电掣般直奔莫斯科。四辆汽车组成的车队以极高的速度行驶,以至于往前飞奔的汽车轮胎带起的小石子儿竟然打碎了汽车的前灯。

白宫里 8 时半的时候一片寂静。一切都跟往常一样:小卖部在营业,报亭在出售当日的报纸,惟一的新闻就是保卫大楼的警察手里出现了冲锋枪。最高苏维埃会议的大厅里不声不响地聚集了机关的工作人员,这些人中大多数是工作多年的老同事。他们悄悄地互相交流着新闻,看得出来,他们对“整顿国家秩序”的前景非常满意。

上午 10 时莫斯科的电视台只有第一频道有节目,其他所有频道的电视节目全部停止播放。

从白宫的窗户里向外望去,可以看到一幅非常令人惊恐的画面。库图佐夫大街上,宽广的加里宁大桥上,坦克发动机轰鸣,一眼望不到头的装甲车冒着黑烟。前面的装甲车驶向白宫,并且已经围住了大楼。

然而,叶利钦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主动权,外交使团代表,外国和俄罗斯的新闻记者应邀来到白宫。10 时 30 分,伊·西拉耶夫总理来到这里,并宣读了《告俄罗斯公民书》。在他发表讲话的时候,叶利钦快

步走上台。他简短地说了几句,请求外交官和记者们把俄罗斯领导人的意见告知国际社会和我们国家的公民,因为遗憾的是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告诉大家。他最后建议外交官们尽快离开白宫,因为坦克已经开始包围大楼。叶利钦讲话的神态,自信以及风趣使人相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定会遇到大麻烦。

此时,俄罗斯的领导人除了法律以外,一无所有,只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法律。在叶利钦“即将被包围”的时候<sup>173</sup>,第59号总统令产生了,这是总统于12时10分签署的,也就是他在白宫旁边的坦克上发表著名演讲的前几分钟签署的。总统令对所发生事件进行法律鉴定,并依照刑法法典予以定性。总统令中说:

“鉴于自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伙人的行为,我决定:

1. 宣布该委员会违反宪法,其组织者的行为是国家政变,是对国家的犯罪。

2. 所有以所谓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名誉做出的决定均系非法,在俄罗斯联邦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只有以俄联邦总统、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主席、所有国家和地方权力以及管理机构为代表的经合法选举的权力机关具有法律效力。

3. 执行上述委员会决定的当事人的行为应按俄罗斯联邦刑法典治罪,并依照法律予以追究。

该命令自签字之日起生效。

俄联邦总统鲍·叶利钦”

新闻记者招待会一结束,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部长会议成员就集合到一起召开了会议。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以绝对多数赞成票支持叶利钦、哈斯布拉托夫和西拉耶夫的《告俄罗斯公民书》,并把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定性为国家政变。会上通过了一项重要决定——8月21日将召开共和国最高立法机关——最高苏维埃的非例行会议。投票反对的只有2人——伊萨科夫和伊萨耶夫。

令人吃惊的是,在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召开的会议上,大家的意见十分一致。出席会议的有俄罗斯最大的工会联合会主席伊·叶·克洛

奇科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立很快被认定是国家政变。部长会议同样支持《告俄罗斯公民书》和第 59 号总统令,号召大家以罢工对付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当部长会议开会的时候,包围白宫的坦克就停在窗外。会议期间,伊·西拉耶夫对大家说,他要和鲍·尼·叶利钦一起去见士兵。坦克就停在大楼的正门前。叶利钦和西拉耶夫在几个贴身卫士的保护下向坦克兵走去。他们登上坦克,向士兵和渐渐聚集到白宫大楼前的人群宣读《告俄罗斯公民书》和第 59 号总统令。此时的叶利钦没有任何故弄玄虚:他就站在坦克上,向士兵发表讲话,如此简单而已。叶利钦的这一举动被 CNN 的记者摄入镜头,后被苏联电视的晚间“新闻联播”采用,一时家喻户晓。

西拉耶夫回到了部长会议的会场上,会议结束的时候,一致通过了政府决议。决议不仅表示支持总统命令,要求俄罗斯所有的国家机构必须无条件遵照执行,而且呼吁其他加盟共和国政府“共同努力,捍卫苏联境内的宪法秩序”。

会议很快就结束了。最后一个发言的是国家国防问题委员会领导人康·科别茨上将。他建议政府成员们,如果谁想参加保卫白宫的战斗,就请到警卫室领取武器。武器很少,几十枝冲锋枪和手枪很快就发完了。这些武器未必就能加大保卫白宫的力量。

白宫外面则是另一回事。俄罗斯领导人的声明和命令因为有传真、复印机和电话等工具的帮助,很快就在莫斯科传开了。在地铁站休息室里出现了贴在墙上的命令复制件。人们向白宫走去,他们对维尔纽斯事件仍记忆犹新。白宫周围筑起了栅栏、街垒,城内出现了群众集会,人流堵住了前进的装甲车,人们和官兵们聊起天,并告诉他们说,这次军队又被拉进了泥潭。亚佐夫、克留奇科夫、亚纳耶夫和普戈的漫画像出现了。公民不守法的现象急剧增长。就在这个时候,苏军的一个分队——C. 叶夫多基莫夫少校率领的坦克连投向了叶利钦,并且后来一直跟随着叶利钦。他有六辆坦克车,没有弹药,这是惟一一支站在俄罗斯总统一边的苏军部队。

8 月 19 日早晨,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阵营里,似乎一切顺利,



都在按计划执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总理帕夫洛夫果真没有参加——他生病了,得了高血压。亚纳耶夫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参加者们通报了情况,并宣读了为他准备的一份材料的部分内容,这份材料有一个漂亮的名字——《关于进入紧急状态的若干公理》。材料中说:“不要丢掉主动精神……不要放过不守法行为的最初的苗头……勇敢面向平民主义……不要拖延向大众通报关于政敌所犯罪行的一切细节……”<sup>174</sup>

苏共中央委员会积极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10时50分,中央委员会向各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共和国党的委员会、州党委会、边疆区党委会第一书记们发出了密电,电报中指出:“鉴于国家进入了紧急状态,请采取措施组织共产党员协助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实际活动中,应遵循苏联宪法。关于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会及其他有关措施另行通知。”电报下面的署名意味深长——“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符合实际情况。在这份电报出台之前召开了书记处会议,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扎索霍夫、斯特罗耶夫、舍宁、吉连科、卡拉什尼科夫、库普佐夫、马纳延科夫、梅利尼科夫、法林、普罗科菲耶夫、波洛兹科夫和苏尔科夫。

19日早晨,各代表团赶来签署联盟条约,签署本来应该在8月20日进行。“一系列共和国”的领导人请求苏联领导人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一事作出解释。亚纳耶夫和卢基扬诺夫告诉他们说,民主进程将继续下去,并且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将在苏联宪法的框架内活动。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表达了共同的愿望——在中央与各共和国之间的政治斗争中,过去的自治共和国绝不再是交易的铜板。就是在这一天,卢基扬诺夫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宣布,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将在一周之后——8月26日召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有了在全国“整顿秩序”的时间,并且将把既成的事实摆在最高苏维埃面前。

各加盟共和国保持沉默,他们显然寄希望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仅限于俄罗斯。也似乎只有在俄罗斯才完全适合采用对付捷克斯洛伐克的方式:动用坦克,逮捕制造混乱的主谋,等候群众集会结束



后任命新的领导人,然后给世界舆论界权利,让他们去评价,按克里姆林宫的规矩所发生的事件。何况在19日上午至中午的这一段时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并没有得到他们的对手大规模行动的消息。克里姆林宫医院正在准备关于戈尔巴乔夫患有重病的鉴定书(后来竟然写出来了!)

但是,俄罗斯的领导人并没有按照规矩行事。他们非但不听命于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及苏共中央领导人,而且向“自称为苏联领导的一拨人”发起了进攻,扬言要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拥护者作为罪犯逮捕,并送交法庭。保卫白宫的人群越来越多。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队伍中出现了紧张慌乱的情绪。俄罗斯领导人利用派去攻打他们的坦克,作为鼓动反对“联盟领导人”的讲台。显而易见,亚纳耶夫的“公理”没有成为现实。

8月19日晚,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情彻底地改变了所发生事件的规模——莫斯科事件变成了全苏联和全世界的一件大事。晚上,苏联中央电视台播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举行的新闻记者招待会。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全国公民“不熟悉面孔”的一伙人,而正是这一伙人打算领导这个国家。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向记者们说了一番很不自信的话,他很紧张,手都在颤抖。他占了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却宣称他非常关注苏联总统的健康:“我希望,我的朋友戈尔巴乔夫总统尽快康复,我们还将在一起工作。”记者就戈尔巴乔夫健康问题提出了直率的问题,有记者问,总统是否同意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他的回答语无伦次,既不具体,又毫无价值。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回答引起了记者们蔑视的笑声。这次新闻记者招待会让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丢尽了脸面。

593 但是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来说,这种不幸还只是刚刚开始。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在报道了有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最新情况后,播送了记者C.梅德韦杰夫利用西方电视镜头和自己的材料制作的报道。屏幕上,叶利钦站在白宫前的坦克上,宣读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文件。公民们亲眼看到了俄罗斯政府不同意国家紧急状态

委员会的做法,俄罗斯总统认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是非法组织,并要求大家不要听从他们的指挥。当天晚上,彼得堡市市长阿·索布恰科在彼得堡电视台也发表了讲话,严厉谴责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为。<sup>175</sup>

抗议活动波及整个俄罗斯。在彼得堡伊萨基辅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举行了成千上万人的集会,阿·索布恰科市长声明:全市和全州不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他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成员,将提出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送交法庭审判的要求;市里所有的报纸均将出版。副市长 B. H. 谢尔巴科夫声明,列宁格勒军区司令 B. H. 萨姆索诺夫将军已保证不派军队进驻这座城市。

群众集会和游行活动在下诺夫戈罗德、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新西伯利亚、秋明、阿尔汉格尔斯克、梁赞、沃罗涅日、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彼得罗扎沃茨克等地方先后举行。

实行紧急状态的第一天结束了。白宫周围有一些不太稠密的人群,篝火在燃烧,人们在搭建着街垒和障碍物。白宫旁边修建了几个月的供热管道工程材料成了他们搭建障碍物的用品。水泥板、供热管、电器配件等都用上了。白宫旁边停有 C. 叶夫多基莫夫少校的 6 辆坦克,这些坦克是由俄罗斯代表引路、通过志愿保卫者组成的包围圈开过来的,远处还有约三十部陆战队战车,不知是用以保卫白宫,还是用来布置白宫的军队包围圈。战车的舱门口打开着,士兵和保卫白宫的人们聊着天,喝着妇女们递给他们的茶水,听着关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消息。白宫大楼里聚集着人民代表、同意总统观点的总统办公厅工作人员,世界上最大的一些通讯社、报纸以及电视公司的记者们在走廊里来回踱步。大楼里出现了“阿列克斯”警卫局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特种警察部队的战士和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老兵。内部的广播电台开始播音,向白宫前的广场播送消息,并且通过无线电台向外播放。播音员是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著名记者库尔科娃和 A. 柳比莫夫。<sup>176</sup>

白宫里的第一夜——19 日夜间过得相当平静。

然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阵营里,焦急不安的情绪在加重。

早在8月19日晚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就已经明白,第一天他们是失败了。以恐吓政敌,保证合法地将戈尔巴乔夫政权转向“苏联集体领导”的企盼落空了。支持俄罗斯总统、不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出现了矛盾。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最明智的成员悄悄逃脱了。19日早晨,苏联总统办公厅主任瓦·博尔金住进了医院,19日中午瓦·帕夫洛夫也住进医院,以后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队伍里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们了。阿·卢基扬诺夫希望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保持一定的距离。弗·克留奇科夫担心他的伙伴有可能会投向敌人一方,所以下令都要听从阿·卢基扬诺夫和根·亚纳耶夫的指挥。这一天的晚上,O.巴克拉诺夫就准备离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了。他在给亚纳耶夫的一封未发出的信中说:“鉴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无能稳定国内形势,我认为再继续参加它的活动是不可能了……”<sup>177</sup>

陆军总司令B.瓦连尼科夫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了一封信,他在这封发自基辅的信中怒不可遏地说:“头几天的情况使我得出结论:大多数执行机构行动很不果断,缺乏组织性。执法机构实际上没有完成任何任务,导致严重的后果……全国人民,全体军人的目光都投向莫斯科。我们大家坚决要求采取措施,消灭叶利钦之流的冒险家。俄罗斯联邦政府大楼必须立即封锁,切断其水源、电源、电话以及无线电通信等。今天国家的命运取决于这个问题的解决,所以,无论是什么人,什么问题都不应该阻止我们达到预定的目标。一切犹豫不决的表现和敷衍的措施都只能促使极端分子和假民主派采取更加严厉和坚决的行动”<sup>178</sup>。

8月20日早晨,一切都变得明朗了:决定性的搏斗越来越近,几乎是不可避免了。早晨8时,A.列别德将军按照格拉乔夫的命令,开始从白宫附近撤离,撤走了“被保卫者说服了”的空降兵营。11时,插着俄罗斯国旗的空降兵装甲车辆离开了大楼。列别德本人被召到总参谋部。

也是那天早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决定,只有《劳动报》、《工人

论坛》、《消息报》、《真理报》、《红星报》、《苏维埃俄罗斯报》、《莫斯科真理报》、《列宁旗帜报》和《农村生活报》可以出版,其他所有的报纸停止发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认为,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产生负面作用(特别使他们懊恼的是一个新的独立广播电台——“莫斯科之声”,它已经成了叶利钦派的扬声器),于是通过了第3号决议,决定对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进行新闻检查,只许他们使用全联盟的正式频道。

中央委员会也全面开展了保证在政治上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给予支持的工作。本来打算在8月20日召开苏共中央委员会特别会议,制定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的计划,但是这个会没有开成。

15时30分,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一份加密电报从老广场发往全国各地。其实这只是一份声明草案,要求各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审阅,而这些书记们就其职务来讲自然也是政治局的成员,而且在此之前通常也是各共和国的总统。声明草案中指出:近年来的局势发展已经导致“国家和社会危机加深,破坏性势力日益猖狂……政权的瘫痪和不遵守苏联法律造成了数十亿的经济损失和成千上万人的牺牲……”由此得出结论,紧急状态制度是正确的:“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认为,在苏联一些地区实行紧急状态是国家领导人极不情愿,但又不得已迈出的一步,其目的是应对在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内……形成的危机形势。政治局接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关于米·谢·戈尔巴乔夫处于绝对安全状态的声明。” 595

政治局接到了答复。乌克兰共产党总书记C.古连科赞成这一声明,同时做了一点不太大的改动。阿塞拜疆总统A.穆塔利波夫和古连科一样。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对声明完全同意。土库曼斯坦共产党第一书记建议删掉下列内容:“政治局认为,实行紧急状态是……极不情愿……不得已迈出的一步。”亲莫斯科的立陶宛共产党领导人M. M. 布罗基亚维丘克支持这一声明,并要求这个文件要更加明朗和准确。明确反对这一声明草案的只有努·阿·纳扎尔巴耶夫,他说:“声明没有反映出真实情况,没有提到各共和国主权问题,没有提到继续进行经济改革和向市场经济转型。应该指出,无论如何不允许流血

和动用军队。”

分析表明：大部分反馈意见表示支持声明草案。也可以勉强地说，苏联各共和国的大部分领导人（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和哈萨克斯坦以外）要么赞成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活动，要么采取中立的立场。

总参谋部的大楼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拥护者们也没有闲着。B. A. 阿恰洛夫副部长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参谋长 M. A. 莫伊谢耶夫、苏联总统军事问题私人顾问 C. 阿赫罗梅耶夫元帅、刚刚从基辅回到莫斯科的陆军总司令瓦·伊·瓦连尼科夫、空降兵司令 C. 格拉乔夫、“阿尔法”小组指挥员 B. 卡尔普欣、“Б”小组指挥员别斯科夫、内务部副部长 B. 戈罗莫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Г. 阿格耶夫，总共有 20—25 人。亚·伊·列别德也参加了会议。

596 他们面临的任务是，达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以军事政治示威手段达不到的目的——摧毁俄罗斯领导人的抵抗，这一次打算采用军事和政治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讨论了攻打白宫的计划，照克留奇科夫的话说，是制定“控制白宫周围出现紧张局势的措施”<sup>179</sup>。打算由国防部、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队实施联合行动。亚·列别德指挥的空降兵分队协同内务部捷尔任斯基师封锁白宫，把包围白宫的人挤迫到克拉斯诺普列斯年斯卡娅沿岸街方向。特种警察部队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大楼周围的封锁线。紧随其后的是“阿尔法”和“Б”小组。“阿尔法”小组冲进楼内，逮捕俄罗斯总统。“Б”小组采用特殊手段消灭楼内的抵抗力量，参与掩护的直升机从空中对进攻提供支持。攻打白宫的计划被命名为“雷”行动计划，总协调人由“阿尔法”小组指挥员卡尔普欣将军担任，进攻时间定在 8 月 21 日夜间 3 时。

然而在实现这一计划的道路上出现了严重障碍。

中午 12 时，举行了一个支持俄罗斯领导人的集会。莫斯科在 1989—1991 年期间有过许多次集会，但像这一次这么多人的集会大概还从未见到过。白宫周围的广场上聚集了将近 20 万人，广场上空飘扬着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以及格鲁吉亚等共和国的国旗。叶利钦及其



拥护者的发言得到了人们热烈的响应,集会持续了5个小时,空气中弥漫着绝不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气氛。在白宫的阳台上,站在叶利钦旁边的人有: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伊·西拉耶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代主席鲁·哈斯布拉托夫、副总统亚·鲁茨科伊、莫斯科市市长加·波波夫、“改革之父”亚·雅科夫列夫、前外交部长爱·谢瓦尔德纳泽等。

成千上万的人实际上成了保护白宫的活的挡箭牌。显然正因为如此,军人们才把占领白宫的行动安排在夜里3时,到那时,大楼的保卫者就不会太多了。

8月20日,保卫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政府大楼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K.科别茨上将、亚·鲁茨科伊副总统、新组建的白宫防御指挥部指挥员A.斯捷尔利科夫上将的努力之下,来自不同地方、以保卫合法政权为目的凑到了一起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类似军事组织的联合体,他们中许多人是军人、阿富汗战争参加者,还有正在接受预备役军官训练的学生和工程师。他们中许多人一手拿着一个“莫洛托夫牌鸡尾酒”瓶子(里面装汽油),一手拿着一根钢筋条,准备用这些东西使坦克的履带无法动弹。现场设置了临时的卫生所,有志愿者医生值班。

白宫内部的形势出现了根本性变化。那里仍然有许多新闻记者,但是没有什么能使人想起8月19日白宫里那种让人压抑、无奈和一片混乱的局面。那种情绪早已消失了。参加保卫大楼的,有职业军人、退役的特种兵军官。武器也有了,而在第一天连武器都没有。大楼内部的防卫工作由A.科尔扎科夫领导的总统保安局负责。大楼的房顶上建起了由水泥板制作的防护屏障,狙击兵就藏在它的后面,飞机一出现他们就准备开火。在许多走廊里,都有持枪的值勤人员。制定了阻滞进攻者行动的措施。庞大的白宫大楼矗立在广场上,对于外面不熟悉它的人来说,白宫已经变成了迷宫,因为它的电梯已经不工作了,障碍物到处都是。总统保卫局的工作人员不慌不忙地劝阻大家不要从直通地铁的地下通道进入大楼,这些要道上都设置了地雷。无线电技术侦

597

察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绩：隶属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部队的无线电谈话都被白宫接收。同事、战友们议论着这几天来发生的事情，他们互相之间都保持着联系，所以对抗双方一有什么动静，大家马上就会知道。消息从封锁白宫的部队、从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它的分支机构不断地传出来。毫无疑问，在保卫白宫的人群中就有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情报员。消息“透明”成了这次事件的一个特点。

留在大楼里的人对于攻打白宫的结局都不抱任何幻想。因为很清楚，一旦攻势真的开始了，那么白宫里不会有多少人能够成功地活下来，不过如果落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手里，那就比死更可怕。因为人们还清楚地记得我国在 1937—1938 年和其他年代发生的镇压和惩罚。在这一天，白宫保卫者们经历了平静的愤怒、怨恨和极大的侮辱，这种错综复杂的感觉变成了他们抵抗的动力，而这种动力确保了他们将根据企图冲进白宫的人的行动来采取相应的措施。

与此同时，俄罗斯的政治领导人继续采取措施，以防因为恢复宪法制度而造成流血事件。早晨 10 时，由亚·鲁茨科伊、西拉耶夫和鲁·哈斯布拉托夫等人组成的代表团向阿·卢基扬诺夫提出了在 24 小时之内与苏联总统米·谢·戈尔巴乔夫会晤的要求；对戈尔巴乔夫的身体状况进行单方面检查，并要有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参加；取消紧急状态行动；把军队撤到原驻地；宣布解散非法成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卢基扬诺夫试图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划清界限，表示有必要继续研究形势，坚持不让叶利钦搞全面罢工。对于提出的实质性问题，卢基扬诺夫没有予以答复。

在准备攻打白宫的消息出现后，叶利钦总统发布了关于在俄罗斯境内指挥苏联武装力量的总统令。叶利钦宣布，从 1991 年 8 月 20 日 17 时开始，俄罗斯境内的武装力量由他指挥，直至全面恢复立宪机构、国家权力机关以及管理机构的活动。叶利钦废除了亚佐夫和克留奇科夫从 8 月 18 日起颁发的所有命令，命令莫斯科军区司令把军队撤回原驻地。

与此同时，俄罗斯领导人采取了建立俄罗斯备用指挥所的措施。

叶利钦的老战友、俄罗斯政府副总理奥·洛博夫和几个同事秘密前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地区,那里有一个供战时使用的指挥所。外交部长安·科济列夫拿到了在境外代表俄罗斯总统的全权后,飞往西欧。俄罗斯联邦内务部长维·巴兰尼科夫要求内务部的高级学校和中等学校领导派出学员保卫共和国的合法政权。

冲突加剧。显而易见,进攻白宫最后无论出现怎样的结局,都将是国家内战的开始。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计划开始破产,甚至连那些当初制定行动计划的将军们都不想再继续执行委员会的命令了,因为他们很清楚,实施这一行动计划将导致巨大的人员伤亡,势必罪责难逃。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第一次打击是,“阿尔法”小组的军官们坚决拒绝参加进攻活动(在这支部队里服役的人员都是军官)。原先给他们下达的任务是:冲进大楼,把它“收拾干净”,向每一个房间里投手榴弹,扫射。“阿尔法”小组中有人要求他们的指挥员 B. 卡尔普欣拿出书面的进攻命令。他回答说,命令是有的,但是是口头命令。“阿尔法”的成员终于明白这是一次危险的冒险行动。首先,他们面临的作战对象是数量巨大的武装人群。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资料,“阿尔法”的成员将近 5000 人<sup>180</sup>(作者认为,这是一个被夸大的数字。但据俄罗斯广播电视公司领导 O. 波普佐夫那些天在白宫内进行的观察,他们将近 500 人左右<sup>181</sup>(作者认为,波普佐夫的判断更加准确)。据他讲,这 500 人中还包括一些“无望成为‘阿尔法’正式成员的人”。但是,参加保卫白宫的人中也有专业人员,就其受训的水平来说,不比要进攻白宫的那些士兵低多少。这些人包括自愿投向叶利钦一边的特种兵军官、参加过阿富汗战争的人、空降兵、特种警察部队战士。一旦在这座双方都不太熟悉的建筑物里发生战斗,抵御方的情绪之高,足以使进攻方遭到更大的损失<sup>182</sup>。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必须对打死白宫里的人承担责任,因为当时白宫里有一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和文化活动家(这里仅举一个人的名字——M. 罗斯特罗波维奇),还有许多外国记者,如果他们被打死,即

便结局有利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其责任仍然可能会落到“阿尔法”军官的头上。而他们已经有了在第比利斯事件和维尔纽斯事件中的经验,当时就是在戈尔巴乔夫的默许下,把事件的责任都推到了军人身上,指责他们“擅自”进行“没有经过核准的”行动。

“阿尔法”小组的军官不顾卡尔普欣将军的压力,坚决拒绝执行攻打白宫的命令,“Б”小组的人员也拒绝执行进攻命令。

599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最高领导层内部也出现了矛盾。根·亚纳耶夫明确表示,他对进攻大楼的后果表示担心,因为大楼周围有几千人。他在8月20日20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说,关于计划攻打白宫的传说根本没有依据。他还建议把没有计划攻打白宫的事向大众媒体发布。他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同事因此和他争执起来,最后达成这样的意见:不对这个问题公开表态。<sup>183</sup>原因很清楚,作出攻打白宫计划的人不想自找麻烦。

但是,早晨作出的计划已经开始付诸实施,尽管很不顺利。莫斯科警备司令H.加里宁将军已经宣布从23时起全城实行宵禁,意在使白宫周围形不成保卫圈,堵住通往白宫的通道。保卫白宫的人都在传说肯定要攻打白宫。20时,白俄罗斯火车站附近响起了射击声。一梭梭曳光弹在白宫对面、莫斯科河另一岸的《乌克兰》饭店上空掠过,气氛骤然紧张。白宫从各种不同渠道得到消息说,夜里两三时开始攻打白宫。总统鲍·尼·叶利钦的安全面临直接威胁。有人建议他躲到离白宫几百米远的美国大使馆去,但是叶利钦拒绝走出这栋大楼。

将近夜里12时,他和莫斯科市长格·波波夫、副市长尤·卢日科夫,总统办公厅的几位工作人员以及贴身护卫一起下到白宫大楼的地下“人防工程”。<sup>184</sup>此时它成为保卫总统的最后一道防线。地下人防工程里有好几个房间:较小的房间供高级领导人使用,大房间里放着几张木板床,还有一个可直接通到楼梯的大厅,那里设有警卫。在大厅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尤·卢日科夫正在给建筑材料厂和汽车运输联合企业的领导们打电话,要求他们给白宫运送预制墙板和建筑构件,在潜在危险的方向上布设重型卡车,以防坦克和装甲车驶近白宫大楼。他兴奋、

自信地打着电话,俨然是一个毫不怀疑自己有权向不太内行者发号施令的大首长。

叶利钦在办公室里打的是另一种电话:他正在同一些国家的元首交谈。

主要事件就发生在距离白宫两公里的地方。在实行宵禁以后,对峙的紧张局面达到了最高水平。白宫实际上仍被包围。任何车辆运行都可能意味着进攻开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精锐部队拒绝参加攻打白宫以后,军队及其最富有战斗力的空降部队就成了镇压抵抗策源地的主要力量。指挥这些部队的帕·格拉乔夫后来在检察院说:“大家都在等待,看着我何时率兵进攻。如果我一动,大家都会跟我动起来,用不着和任何人商量……”<sup>185</sup>这是事实。另外一点也是事实:当时的局面极度紧张,无论是空降兵,还是从其他地方用飞机调到莫斯科来的任何一支部队,或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部队,都有可能发起计划在3时开始的进攻。

然而,却发生了完全另外一种情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步兵战车排已经接近花园环路和加里宁大街的交叉路口。路上步兵战车遇到了障碍,于是这些车辆拐向花园环路地下通道。在地下通道的出口处,步兵战车再次遇到障碍,战车企图冲过障碍,但是战车对面突然冲出了企图阻挡他们的人群,战车又钻了回去。人群里有人向战车投去了石头和钢筋条,战车开始开枪射击,打死了三个人——德·科马尔、弗·乌索夫和伊·克里切夫斯基。在白宫的防御指挥部内,这一事件被视为开始准备攻打白宫。这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后莫斯科出现的第一次流血事件。这件事情严格来说,并没有军事意义。然而,它具有毋庸置疑的政治、心理、道义上的意义,死人的责任落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身上,因为是他们指挥军队进了城。这一事件的直接责任落到了德·亚佐夫元帅的肩上。同时也是他下达了“停火”的命令,取消了已经计划好的行动。攻打白宫的行动没有开始。8月21日凌晨,军队开始撤离白宫。

8月21日早晨6时召开了国防部委员会全体会议。会上多数将



军赞成必须从莫斯科撤军,使高度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恢复常备状态,并且建议国防部长德·季·亚佐夫退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亚佐夫除了不接受“退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一点以外,同意了其他所有的意见。他说:“这是我的苦难,我将忍受到底。”<sup>186</sup>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军事积极性严重受挫,军队实际上已经拒绝服从这些“苏联领导人”。8月21日早晨,武装警察开始进入城里,这支部队是在俄联邦内务部一些忠实于俄罗斯领导人的学校的基础上组建的。但是,这件事情毫无疑问不是当时的主要事件。最主要的事件是白宫内正在举行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

早晨10时,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特别会议召开。全国各地来的代表越过障碍、街垒、穿过支持叶利钦的集会人群,进入白宫。俄罗斯人民代表受到人群热烈欢迎。在军队包围白宫的那两天里,最高苏维埃人民代表的威望迅速提高,许多议员站在保卫议会和总统的民众一边。“政变后的俄罗斯联邦国家政治形势”这一问题被作为会议的议程项目。

601 最高苏维埃会议成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对手们的最重要的政治工具。俄罗斯议会做了很多的事情。最高苏维埃支持叶利钦总统的所有总统令,并且批准那些需要立法权力机关核准的命令生效。这不禁让人想到,8月21日的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是俄罗斯实行议会制的一次盛会——可能也是革命前俄罗斯四次召集国家杜马以及最高苏维埃五十年活动的全部历史的一次最重要的会议。议会保护法律,是政治的决定性因素。议会从法律的角度阐述了国内复杂的政治局势,并明确指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及其一切决议的非法性。这样做一点也没有贬低国家元首和执行权力机关领导人的作用,恰恰证明议会具有在俄罗斯几乎不被人知晓的作用。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电视实况转播的开始意味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彻底失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跑了,他们跑到了弗努科沃政府机场,从那里跑到了福罗斯,到了戈尔巴乔夫那里。几个小时以前看上去还是那么具有能量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

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季亚科夫及其追随者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阿·卢基扬诺夫和副总书记 B. 伊瓦什科此时正在被追捕,开始是在通往机场的路上,后来又打算迫降他们的飞机。白宫的警卫们不想说出逮捕的细节,他们认为这是件很不体面的事情——到底叛乱分子为什么要往福罗斯跑?他们为什么要去找那位曾经被他们宣布为身患重病和被他们免职的人?出现了不确定因素,白宫里的人开始讨论和猜测:在叛乱的背后是否隐藏着戈尔巴乔夫假装暂时退位?福罗斯将送给人们什么样的意想不到的礼物?

根据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决定,副总统亚·鲁茨科伊、总理伊·西拉耶夫、司法部长 H. 费奥多罗夫等人组成的俄罗斯代表团被派往福罗斯。苏联总统所属安全会议的成员叶·普里马科夫和瓦·巴卡京也加入了该代表团。和他们同机前往的还有 A. 斯捷尔利戈夫上校、亚·鲁茨科伊的助理,以及内务部和俄罗斯总统保安局的 36 名军官,因为他们的确担心俄罗斯代表团在福罗斯有可能会被负责戈尔巴乔夫安全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下属部队拘捕。

这个时候,一些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的战友,也就是那些似乎永远忠于苏联总统的人开始争先恐后表态。不过,他们是在现在,在 8 月 21 日中午才声明自己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非法行为极为愤怒。这帮官员总是紧跟形势,而且跟得不无成效,他们只有在许可的情况下才敢于表态。

许多本来在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的共和国领导人这个时候胆子也大点了。8 月 21 日 15 时 5 分,塔斯社播发了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声明,声明中指出,“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非例行会议通过决议之后对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后出现的整个形势进行分析和评估。在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会议作出决定之前,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在乌克兰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恕作者直言,胆子还是不够大(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动的结论哪里用得着三次评估——先由苏联最高苏维埃在莫斯科评估,后由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在乌克兰评估,最后由乌

克兰主席团本身进行评估!)。但是,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毕竟指出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决议在乌克兰境内不具有法律效力。

两天以后——8月23日,在叛乱已被完全平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已经被逮捕后,乌克兰领导人宣布共和国独立。同时宣布在12月1日就独立问题举行全民公决。

格鲁吉亚领导人加姆萨胡尔季阿也胆大了起来,他曾经承认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现在他要求国际社会承认格鲁吉亚实际上和在法律上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很快,阿塞拜疆领导人 A. 穆塔利波夫也给俄罗斯总统发去电报,他以最高雅的文体对叶利钦拯救国家的胆略表示赞赏。A. 穆塔利波夫赞赏的言辞,无疑是受到了几天前事件的影响,三天前,他曾对记者们说,罢免戈尔巴乔夫的总统职务是“导致苏联混乱的政策的结果”。<sup>187</sup>

对形势也有另一种估价。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最高苏维埃在8月21—22日宣布恢复1940年以前的老宪法,并宣布国家独立。

哈萨克斯坦总统努·纳扎尔巴耶夫给苏共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发出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他仍然坚持他于1991年8月20日给政治局的答复中阐述过的路线。他在信中谴责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行为,用纳扎尔巴耶夫的话说,政治局和书记处支持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可耻行为。他提醒说:中央书记处曾经打算在8月20日召开中央委员会非例行全会,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行动,纳扎尔巴耶夫当时就果断地表示反对召开这样的全会。纳扎尔巴耶夫提出退出政治局,退出苏共中央委员会,他代表乌克兰共和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宣布乌克兰共产党退出苏共,并亲笔写下:“建立独立的党”。

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为表示谴责的还有待机而动的布里亚特、楚瓦什和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

也是在8月21日,发表了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的声明。这个党的领导人曾经费尽心机,千方百计诋毁戈尔巴乔夫;同时他们又仇视叶利钦,曾经力主实行紧急状态。现在他们知道,由于他们的这种立场,此

时到了被质问的时候了。俄罗斯共产党政治局的声明以自己的胆怯和两面性令人吃惊。原来,俄罗斯共产党领导人轻信了根·亚纳耶夫关于苏联总统、苏共中央总书记重病的信息,误入迷途。而且他们几乎要与叛乱分子打起来。政治局的声明中写道,俄共中央监督委员会主席尼·斯托利亚罗夫通常就在政府大楼里工作(斯托利亚罗夫加入了鲁茨科伊的“共产党人赞成民主制”议会党团,共产党正统派领导人打算把这些人全部开除出党)。而现在俄共领导人又试图把斯托利亚罗夫变成救命草。俄共政治局呼吁“不要人为地挑起矛盾,加剧对抗,煽动反共情绪”。

苏共中央的同志们一点也不落后于自己的俄罗斯同事,他们在 14 时 39 分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企图证明自己与叛乱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证明党的领导机关一贯反对采取极端措施解决政治问题。 603

让我们回到福罗斯。大概在 16 时左右,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飞到了那里。戈尔巴乔夫的贴身警卫不顾格涅拉洛夫将军的阻止,立即逮捕了他们(!),格涅拉洛夫是被克留奇科夫留下来专门执行“隔绝”戈尔巴乔夫任务的。通讯联系已经恢复<sup>188</sup>,戈尔巴乔夫拒绝与叛乱分子谈话,在有见证人在场的情况下<sup>189</sup>,他会见了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20 时左右,俄罗斯当局的代表也来到了福罗斯,他们来了以后才发现,没有什么人需要他们的解救,正像戈尔巴乔夫自己经常喜欢说得那样,他已经“控制了局面”。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戈尔巴乔夫打了将近四个小时的电话,把克里姆林宫的一个团划归自己直接管辖,与副总理谢尔巴科夫进行了交谈(在帕夫洛夫总理生病期间,暂时由谢尔巴科夫掌管联盟政府事务)。后来又与美国总统乔治·布什交谈,并接受了他的祝贺。与许多共和国的领导人进行了联系,如纳扎尔巴耶夫、叶利钦、杰缅捷伊以及其他总统。俄罗斯代表团的出现最初引起了一阵惊慌。“看到全副武装的鲁茨科伊带着冲锋枪手们赶到福罗斯,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惊恐地问道:‘你们干什么?来逮捕我们吗?’”

‘为什么?’鲁茨科伊惊奇地问:‘是来救人的!’赖萨号啕大哭了

起来。”<sup>190</sup>

这场误会很快就平息了。戈尔巴乔夫像一位热情好客的主人，建议俄罗斯代表团就在福罗斯的别墅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大家一起回莫斯科<sup>191</sup>。鲁茨科伊急忙去执行他的任务去了——马上安排苏联总统和他的家人转移，逮捕那些来到别墅、现正处在戈尔巴乔夫贴身警卫看护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以及那些表面上服从克留奇科夫的军人。半夜时分，一架载着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和俄罗斯使者的飞机飞往莫斯科。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也坐在那架飞机上，这是根据鲁茨科伊的建议安排的，把克留奇科夫当做保证人，以免国家安全委员会打掉这架飞机，乘坐另一架飞机的是在俄罗斯押解队看管下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人员。

夜里2时，戈尔巴乔夫飞到了莫斯科。当时，就在机场上，俄罗斯检察院逮捕了克留奇科夫、季亚科夫和亚佐夫。苏联人民代表巴克拉诺夫是在后来得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同意后，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起被逮捕的。

8月22日中午，戈尔巴乔夫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并邀请他最亲密的战友——雅科夫列夫、巴卡金、普里马科夫、沙赫纳扎罗夫、梅德韦杰夫、阿巴尔金、库德里亚夫采夫、切尔尼亚耶夫来到奥列霍夫会议室——一个只有政治局成员才能来这里聚会的著名房间。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总参谋长莫伊谢耶夫、宪法监督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耶夫、总检察长特鲁宾、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苏联最高法院主席斯莫连采夫<sup>192</sup>。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所有命令都被撤销，所有重要岗位都做了重新任命——米·莫伊谢耶夫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克留奇科夫的副手B.舍巴尔申——曾经领导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外侦察机构工作，现被任命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次任命其实是很糟糕的，莫伊谢耶夫实际上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一个积极的拥护者，叛乱计划就是由克留奇科夫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总局——侦察局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制定出来的。外交部长亚·亚·别斯梅尔特内赫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候选人之一，他之所以没有成为委员会的成员，是因为担心会影



响他执行外交工作。就在那一天,戈尔巴乔夫举行了有俄罗斯和外国记者参加的新闻记者招待会——这次招待会是不成功的<sup>193</sup>:因为记者们提出的许多问题他都没有回答出来,并且说了一些不应该对媒体说的话,例如:“所有真相你们什么时候也知道不了!”还是在那一天,塔斯社发表了对亚·尼·雅科夫列夫的采访,他说:“戈尔巴乔夫的错误就在于他组建了一支背叛者的队伍……从未遂政变中必须吸取的教训是,认识到民主化的道路才是我们国家惟一的道路。”

莫斯科到处都在集会,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街道变得难以通行。人群聚集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内务部的大楼附近,聚集在位于阿尔巴特大街上的国防部门前,聚集在位于老广场的中央委员会大楼周围。人们手中举着标语牌,要求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领导人送交法庭。成千上万人为在8月21日夜间牺牲的三位小伙子——德米特里·克马尔、弗拉基米尔·乌索夫和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送行。

8月23日,在叶利钦的压力下,戈尔巴乔夫撤销了他对一些人的任命,对此他解释说,他来不及搞清形势。重新任命叶·沙波什尼科夫为苏联国防部长;瓦·巴卡金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曾拒绝承认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潘金为外交部长。同一天,戈尔巴乔夫来到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参加会议。在这里,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当天早晨说的那些话是对的,他说“我从福罗斯来到了另外一个国度,我不再是从前的我,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了”<sup>194</sup>。

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叶利钦和俄罗斯最高苏维埃是胜利者。戈尔巴乔夫实际上处在被告的位置。俄罗斯总统向苏联总统宣读了联盟内阁会议的速记记录摘要,内阁大多数成员曾经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背叛了联盟总统。礼堂里响起了要求禁止苏联共产党活动的呼声,因为苏共实际上已经成了政变的思想家。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谴责苏共,但是遇到了戈尔巴乔夫的抵制,“为了缓和气氛”,叶利钦签署了关于暂时停止俄罗斯共产党活动的命令。

叛乱改变了力量的对比。试图用最后力量按照老样子把整个苏联保留下来的联盟中央受到了致命打击,政治机制的“脊梁骨”(苏联共

产党、国家安全委员会、对镇压的恐惧)已经断裂。没有了“脊梁骨”，这个制度就没有了生存力。

605 在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发表讲话的时候，中央委员会的大楼已经被成千上万的示威者封锁了。中央委员会紧急销毁了正在处理中的一些文件，有人企图把一些文献带走。工作人员被疏散，绝大多数人通过正门口走上大街。这着实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谁也没有想到莫斯科居民对老广场的愤恨如此之大(幸运的是还没有过火之举)。中央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和戈尔巴乔夫的工作人员平安转移了——他们是通过连接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一条专门地铁线转移的<sup>195</sup>。

俄罗斯政府档案管理委员会接到命令要确保中央委员文件的完整性。中央委员会整座建筑物的保卫工作由莫斯科副市长 A. 穆济坎斯基领导下的莫斯科警方负责。在警方的帮助下，档案管理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找到了中央委员会一位有经验的官员，在堆满文件的长走廊上，把中央委员会幸运还没有被损坏的档案全部做了查封<sup>196</sup>。这个时候，在大楼内工作的苏联检察院的工作人员搜查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奥·舍宁的办公室，令他们高兴的是，他们获取了舍宁参加叛乱的物证，它可供俄罗斯政府机关代表以见证人身份当场作证。在所获取的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白宫周围街垒设置和封锁白宫部队部署图。这张地图是用手工绘制(准确地说是画出来)的。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共中央领导人舍宁竟然没有一幅像样的俄政府大楼周围地形图。

政变失败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引发了许多问题：为什么这部貌似强大、使全世界恐惧的“苏联领导层”机器陷于瘫痪？是否可以作出如下回答：首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失败是苏联国内经济危机不断加剧的必然结果。这个国家实际上早已无人管理。国家领土上不断爆发的民族冲突没有一个得到有效制止。军队好比消防队，忙于到处扑灭火灾。国家的政治领导人过于顺利地在实践中实现了共产党领导一切的基本原则——凡事由党的领导人决定，而责任却由其他人承担。戈尔巴乔夫担任苏联总统后，这一原则仍然具有现实意义。但是，

经常运用这样的原则必然导致愿意为别人的愚蠢行为承担责任的人越来越少。

人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不是在动乱的三天内发生的,而是早就开始了,但是苏联领导人只是在苏联存在的最后一年的8月底才看到这个变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没有了。这种信仰在“铁幕”之后是坚定的,在人们可以谈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个人崇拜的变形作用”的时代,可以将“早期的马克思”同后来的马克思相比较,把战时共产主义时代的列宁与新经济政策时期的列宁相比较的时代,在相信“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具有人性特征的社会主义”的时代,这种信仰是美好的。坚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事情。公开性的过堂风吹散了这一幻想,使人们看清周围的世界而大吃一惊。

世界也在变化。“冷战”使苏联大伤元气,国家的经济在这场竞赛中萧条了。苏联的“势力范围”开始萎缩,一开始是由于削减对“兄弟党和人民解放运动”的援助,后来苏联在东欧地区的影响力也受到了削弱,抛弃苏联的“温和革命”的浪潮席卷东欧国家,接下来轮到了各加盟共和国,他们举行了“主权大检阅”,最终退出了苏联。苏联“势力范围”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封锁白宫的那个包围圈。正是在那里,这个政权的虚弱、腐朽和变节行为暴露无遗。

606

暂且不谈那些参加叛乱的“英明的将领”。后来才搞清楚,他们不过只是一些执行者。暂且不说他们是如何作战的……与谁作战?为了什么?很难不让人想起亚·列别德对俄罗斯总统说的一句话:他的在白宫前面的空降兵保卫的是他们自己。许多书写到了关于叛乱分子在政治方面的衰退。其实问题并不在这里。要知道参与叛乱的人不仅仅有亚纳耶夫和克留奇科夫,还有季亚科夫这样一位杰出的组织者,有公认为最勇敢的舍宁,有堂堂正正的亚佐夫和政界老手卢基扬诺夫,其政治经验一点也不亚于他的政敌。苏联政权的机制烂掉了,最可怕的是叛乱分子闹起了事——是他们把这辆车发动起来了,但这辆车承受不了如此重量的压力,倒塌了,这是他们始料未及的。这一点其实他们是

应该预料到的。联盟条约是给予生存希望的救命良药,但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车却把它撞翻了。

在叛乱被镇压后的最初日子里,苏联就已经“死掉了”,尽管在形式上她的存在一直延续到1991年12月底。绝症的诊断书从乌克兰传来了:乌克兰共和国宣布独立,并且声称,12月1日将就共和国是否要继续留在苏联和选举乌克兰总统问题举行全民公决。叛乱吓坏了苏联各共和国的领导人,这可不是一般的恐慌。大多数共和国领导人当时不得不接受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结果呢,在莫斯科却不是这样:国家高级领导人被送上法庭,莫斯科要求追查和惩办那些支持过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各共和国争取主权和独立的愿望就更加迫切了。

乌克兰于8月24日宣布正式独立,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8月27日宣布独立,阿塞拜疆——8月30日,乌兹别克斯坦——8月31日,吉尔吉斯斯坦——8月31日,塔吉克斯坦——9月9日,亚美尼亚——9月23日,土库曼斯坦——10月27日。

俄罗斯对发生的事件有自己的评判标准:为什么俄罗斯应该给联盟机构提供资金,而这些机构带给他们的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问题呢?

就像历史上常有过的那样,叛乱分子不经意间消灭了苏联共产党——他们消灭的不是一个政党,而是苏联国家的基本制度。苏联共产党瞬间被从管理体制中清除。8月24日,米·谢·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苏联共产党被清除出管理体制成为必须建立一个崭新的管理机构的原因,这将成为我们专门研究的一个课题。但是,怎样看待社会主义的思想呢?当然,戈尔巴乔夫抛弃了党,不仅仅抛弃了苏联共产党,实质上抛弃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赞成这些观点的政界人士。然而,这也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的观点,也是他的“社会民主派”人士的观点。戈尔巴乔夫的朋友、苏共的思想家瓦·梅德韦杰夫曾这样写道:“后来,苏共的一些中央委员不止一次并通过我向戈尔巴乔夫提出召开全会的问题。我认为,这是中央委员会成员自己的事情,不应该把已经辞去总

书记职务的戈尔巴乔夫拉到这个问题上。戈尔巴乔夫向苏共中央提出的建议也因此未能实现。”<sup>197</sup>他只有一条路可走——在“被更新了联盟”中为自己的政治前途而斗争。

1991年11月6日,过去苏联的重要节日——十月革命周年纪念日前夕,叶利钦“收拾”了苏联共产党这具政治尸体,颁布了总统令,总统令中说:“苏联共产党从来就不是一个党,而是通过把党与国家机构合二为一或者使国家机构直接从属于苏共的途径形成和实现政治权力的一个特殊的机制。”总统令要求:

“——停止苏联共产党和俄罗斯联邦共产党在俄联邦境内的活动,解散其组织机构;

……

——苏共和俄联邦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的财产归国家所有”<sup>198</sup>。

叛乱的余波延及全国各地,新的问题不断产生,老问题变得越来越尖锐化、戏剧化。八月事件之后,车臣人迅速清醒过来,车臣人民全民会议领导人杜达耶夫将军曾经是俄罗斯各自治共和国中为数不多的一个积极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人。然而,车臣事件的迅猛发展完全出乎“民主派”反对者和“党内官僚”们的意料。

## 车臣:悲剧的序幕

如果不了解车臣这个民族的历史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就难以理解车臣事件。在高加索北部,主要在车臣和印古什,居住着大约80万车臣人。从16—17世纪起,高加索地峡、高加索山脉北部的斜面地带就成了这一地区三大国——伊朗、土耳其和俄罗斯三家的角逐场。俄罗斯军事和外交力量介入的结果使这里出现了俄罗斯城堡和哥萨克的村镇。在18世纪期间,俄罗斯加强了自己在高加索一带的力量。20世纪的末期,在捷列克河左岸,形成了一条由莫兹多克和弗拉季高加索两个城市为中心的所谓高加索防线。从19世纪开始,俄罗斯就卷入了一场征服北高加索和解决其归属问题的旷日持久的流血战争。与神权



国家——在车臣和达吉斯坦土地上的伊斯兰教首领的战争成为俄罗斯向高加索推进的顶点，这场战争以在 1859 年征服车臣而告终。<sup>199</sup>

但是，这片土地从来就没有过真正意义上的“和平”。俄罗斯帝国中央机关档案馆里的许多文献证明，在车臣内部一直保留着自己的制度，这甚至引起了曾经允许在高加索地区实行有区别的地方自治的沙皇政府的不满。国内战争期间，布尔什维克政府充分利用了支持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捷列克和库班地区的哥萨克人与要求归还 1859 年后被哥萨克人夺走土地的车臣人之间的矛盾。布尔什维克支持车臣人袭击哥萨克村镇，并为其提供武器。1922 年，车臣自治州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正式成立。然而，具有反布尔什维克性质的起义运动仍在继续发生，为此需要组织大量的军事力量才能把它镇压下去。1934 年，车臣和印古什自治州合并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州。1936 年，改为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分。

卫国战争期间，德国法西斯在北高加索不无成效地推行了旨在鼓励北高加索的穆斯林居民和哥萨克人与占领军合作的特殊政策。1942 年 10 月，车臣在苏军后方成功地组织了几次起义运动，其中包括沙托伊、伊图姆—加林和韦坚及其他一些地区举行的起义。当时斯大林格勒附近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德国军队向北高加索展开攻势，前出至捷列克河流域及大高加索山脉，起义就是在这个时候爆发的。1943 年，德国军队被赶出北高加索后，据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统计，在车臣—印古什境内还有 30 股匪帮和将近 4000 名 1941—1942 年起义参加者<sup>200</sup>。为此，苏联当局决定把车臣人和印古什人从他们的故土驱逐到哈萨克斯坦。1944 年 2 月，苏联军队强迫将近 50 万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徙。这种大规模的驱逐行动无疑是一种犯罪行为，部分居民与德国人合作的事实不能成为犯下这一罪行的理由。当时还把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取消。在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迁出的土地上来了一批新人——俄罗斯人和奥塞梯人。

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之后，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受到了谴责，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发布命令，恢复车臣—印古什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

和国。然而,斯大林时期大迁徙结下的疙瘩要想解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人们从流放地回来了,与那些后来迁到这块土地上来的外来居民的关系日趋紧张。奥尔忠尼启则(弗拉季高加索)市郊区的土地成了北奥塞梯和印古什之间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的缘由,因为奥尔忠尼启则市郊区有印古什人祖上的坟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因为孙扎河流域和马尔戈别克地区的土地问题时常发生争执。和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俄罗斯居民之间的矛盾是因为瑙尔地区和舍尔克地区的土地问题,哥萨克认为这块地方是他们的土地。

车臣—印古什的首都格罗兹尼市是苏联最大的石油加工中心(在19世纪末期,车臣境内就发现了大油田,当时那里就出现了大型的石油加工工业。)80年代末,花费15亿美元<sup>201</sup>对格罗兹尼的石油加工联合企业进行了改造。在这一地区存在着如何解决本地居民在工业企业就业的问题,尽管那里有许多没有正式工作的居民。

在车臣,长期以来保留着把本地居民划分为泰普族人<sup>①</sup>和伊斯兰教信徒(维尔德派和穆里德派)的做法,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并且至今仍在决定着这种传统的社会结构,有助于经受苏联时代各种政治运动和意识形态领域运动的打击。

车臣是个农业人口居多的地区,土地匮乏,大部分男人每年夏季到苏联各地当季节工。但是,车臣居民的文化程度较高。到80年代末,具有劳动能力而又没有在社会生产部门就业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在北奥塞梯将近13%,在车臣—印古什为25%。北高加索地区的局势历来不平静。1973年,苏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格罗兹尼市反社会的民族主义现象》的专门决定,指出车臣—印古什民族主义情绪上升的趋势。几年之后,苏共中央又通过了一项注明日期为1982年1月14日的决定,决定中指出,在北奥塞梯有人公开发表演讲,要求印古什人迁出北奥塞梯,甚至发生了大规模骚乱。决定中说:“1981年10月24—26日,一伙激进分子挑动奥尔忠尼启则市部分奥塞梯居民进行反社会活动……”

609

<sup>①</sup> 根据俄文“тейпы”音译。——译者注

被民族情绪煽动的狂妄分子不少人都是无业游民、酒鬼、吸毒者和曾经受过审判的人,他们冲击社会机构和国家机关,企图破坏城市交通秩序,对印古什族居民进行侮辱性攻击和威胁,导致城市的正常生活和某些企业的正常工作中断数日。”

决定还指出,大量居民手中藏有武器的现象。为此苏联内务部长H. A. 晓洛科夫专门指出必须采取措施“没收北奥塞梯自治共和国和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居民非法窝藏的枪支和冷兵器”。

然而,形势并没有好转。可以说随着“改革”的开始,形势更加恶化。1987年,苏共中央又一次讨论了车臣—印古什和北奥塞梯的局势问题。在当时通过的一份文件中指出,在居民日常生活中,包括共产党员在内,依然保留着穆斯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礼仪。特别是“迄今为止,地方机构在解决各种问题(解决家庭纠纷、召集人们参加农业劳动,参加亡魂祈祷会)时仍求助于宗教权威人士。

统计表明,民族关系日益恶化。这份文件说:“1984—1986年,发生了100多起民族纠纷,其中包括印古什人和奥塞梯人因关系不好发生斗殴和枪杀事件,侮辱俄罗斯人的墓地,对非本地民族农村知识分子的流氓行为”。在这些年中,出现了俄罗斯居民从这两个共和国向外移民的现象。

这份文件还说,“有60多个泰普族人群体相互怀有血恨之仇……居住在两个自治共和国边境上的扬季耶夫为首的泰普族人和哈济耶夫—阿尔巴克夫为首的泰普族人之间相互仇视,酿成了可怕的冲突局势。”该地区吸毒现象极为严重,在北奥塞梯,吸毒人数比全国平均人数多4倍,车臣—印古什多2倍。文件的编写者指出:“但是,共和国内务机构没有破获一起贩毒案件。”

文件中说,车臣山区依然保留真正的奴隶制度,那些奴隶都是俄罗斯人,他们以不同方式来到这些地方。“仅在阿齐哈—马塔诺夫、孙扎和沙林三个地区就发现了65位所谓的长工,其中有嗜酒成瘾者,过去受过审讯的人及没有固定居住地点的人。这些人通常都是被各地的雇主带到这里来的。譬如:埃克图马耶夫家族就拥有近300头羊、27头

牛、29匹马,为了照料这个家业,他使用了阿勃拉莫夫、亚历山德洛夫和索博列夫三个人当长工。哈希耶夫家族——有来自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帕夫洛夫和高尔基州的科托夫。哈利科夫家里的长工——多次受过审判的科斯坚科夫和邦达留克。甚至奥列霍夫村苏维埃党支部书记哈丘卡耶娃同志,以及学校总务主任穆拉多夫同志家里也有长工。”

80年代末,在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政治生活的舞台上出现了新问题——建立独立的车臣共和国和印古什共和国。新的社会团体开始产生——以3.扬达尔比耶夫为首的魏纳赫民主党、B.甘捷米洛夫的“伊斯兰道路”党,以及1990年11月成立的最大的团体——车臣人民全民大会,车臣人民全民大会推举曾任驻爱沙尼亚塔尔图某战略轰炸机师师长焦哈尔·杜达耶夫少将为领导人。杜达耶夫将军的童年时代是在哈萨克斯坦流放地度过的。他在苏联军队中战绩辉煌,曾12次获得政府奖章。他和爱沙尼亚知识分子阶层保持着友好关系,对争取爱沙尼亚独立运动的情况非常了解。

1990年11月23—25日举行的车臣人民全民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关于车臣共和国国家主权”的声明。请读者注意,当时车臣是统一的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的一部分,并不具备主权国家的特征。然而,车臣人民全民大会经常组织的群众集会越来越具有号召力。在1990年11月27日举行的数千人群众集会的压力下,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通过了《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主权宣言》。

车臣人民全民大会成为以多库·扎夫加耶夫为首的车臣—印古什当局——车臣—印古什自治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州党委的反对派,多库·扎夫加耶夫本人是一个优秀人物,他是第一个担任州委书记的车臣人<sup>202</sup>。他坚决执行苏共领导在共和国的方针政策:让共和国的居民不参加关于设立俄罗斯总统职务的全民公决;在竞选运动中组织了赞成雷日科夫的宣传活动。印古什和车臣居民代表团经常提出恢复1990年的共和国主权。

1991年夏天,车臣人民全民大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会上通过 611

了一项决定——建立车臣共和国。从那个时候起,就有了脱离俄罗斯、不参加俄罗斯总统选举的要求。

八月叛乱加速了车臣地区政治进程的发展。以多·扎夫加耶夫为首的最高苏维埃和州党委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持谨慎的观望态度。他们的反对派——杜达耶夫将军和车臣人民全民大会坚决谴责叛乱事件,声称准备用手中的武器对抗紧急状态。叛乱被平息之后,多·扎夫加耶夫面临被指控为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同流合污的地方领导人的危险。格罗兹尼现政权转到了车臣人民全民大会及其组织的群众集会手中。车臣人民全民大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布,车臣一印古什最高苏维埃已被废黜,权力归车臣人民全民大会,车臣将奉行独立的方针。

在这项决议中,至少有两点让莫斯科对所发生的事件做出了不同的解释。对于俄罗斯当局来讲,首要任务是与扎夫加耶夫的“党内权势分子”进行斗争,而对杜达耶夫提出要求独立的声明,莫斯科将其视为政治演说,认为它没有实际意义。另一方面,莫斯科担心俄罗斯的一个自治共和国宣布独立可能成为其他自治共和国纷纷效法的极为可怕的先例。<sup>203</sup>

除了这些政治进程以外(叛乱被镇压之后,在新的政治局势中,车臣的政治进程,包括俄罗斯的政治进程在内,都还刚刚开始),还有许多乍看起来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对车臣内部和围绕车臣问题产生了长期影响的因素。车臣不管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一个比莫斯科政治家们想像得还要传统的社会。俄罗斯议会议长车臣人鲁·哈斯布拉托夫和他的同胞 A. 阿斯拉哈诺夫将军——俄联邦最高苏维埃、法制及反犯罪委员会主席开始积极干预车臣所发生的事件。崇高的政治目的与传统的氏族之间的角逐交织在一起,加大了取得明显政治成果的难度。两位飞行员之间的个人角逐变得没有一点喜剧色彩了。一位是前强击机团团长、后在叶利钦当总统时任副总统、因镇压叛乱事件从上校升为少将的亚·鲁茨科伊;另一位是战略轰炸机师师长、空军的骄子杜达耶夫少将。

高级官员经常出访车臣。9月10日,美国国务卿根·布尔布里斯



及新闻和出版部部长 M. 波尔托拉宁到了那里。9 月 15 日, 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代主席鲁·哈斯布拉托夫来到车臣, 要求车臣—印古什最高苏维埃自动解散。哈斯布拉托夫的要求如愿以偿, 政权从形式上转到了临时最高苏维埃手中, 转到了一个类似长老会议的非法机构中。哈斯布拉托夫的政敌指责他说, 他对冲突的干预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个人目的, 在他在场的情况下成立的这个临时最高苏维埃中, 哈斯布拉托夫的亲戚和拥护者具有广泛代表性。<sup>204</sup> 不管怎么说, 成立这个机构的想法本身就不妥当, 实际权力仍然掌握在以杜达耶夫将军为首的车臣人民全民大会手中。接下来, 一场可以说是自发的、也可以说是计划的占领格罗兹尼市政府机关的战斗开始了。

有消息说, 杜达耶夫将军已被正式提名晋升中将军衔, 在空军指挥部(另一种说法, 在内务部)担任高级职务。但是对于杜达耶夫来说, 更重要的还是总统职务——车臣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

车臣周围的局势在 1991 年 10 月份骤然间复杂化。10 月 5 日夜间, 亚·鲁茨科伊在 A. 阿斯拉哈诺夫将军和俄罗斯内务部长 A. 杜纳耶夫的陪同下, 飞到了格罗兹尼。临行前, 有消息说, 杜达耶夫领导的“民族近卫军”占领了当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大楼, 打伤了一名工作人员, 占领了内务部大楼和电视台。对鲁茨科伊来说, 寻找摆脱车臣危机的出路是总统交给他的最重要的要他独立完成的任务。实际上, 这也是一份此后他是否能够在俄罗斯高级领导层中成为一位独立的政治人物的资格证书。

杜达耶夫和鲁茨科伊通过谈判达成了谅解。双方都认为必须遵守法律, 举行选举<sup>205</sup>。但是各自对遵守法律有自己的理解: 鲁茨科伊正处在八月叛乱被镇压后开始立法、政治意志可以以命令的形式和让听话的最高苏维埃通过变成法律的欣喜之中。而在杜达耶夫看来, 所谓遵守法律应该像爱沙尼亚人民阵线那样, 通过斗争达到一个目的: 俄罗斯的法律与独立的国家没有什么关系。再说, 杜达耶夫认为, 人民的意志、大众的支持是他行动合法化的最重要条件。鲁茨科伊还会晤了印古什各组织的领导人, 他们坚持印古什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组成部

分自治。可想而知,车臣新领导人把这次会晤视为直接挑起政治冲突。

鲁茨科伊从车臣回来之后,对杜达耶夫和车臣人民全民大会进行了严厉的、污辱性的攻击。1991年10月8日,在俄联邦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他说杜达耶夫是匪徒,车臣事件是非法的。最高苏维埃在他的发言之后,通过了一项专门决定,宣布临时最高苏维埃是车臣惟一的合法政权,并要求车臣人民全民大会的武装组织在1991年10月10日之前交出武器<sup>206</sup>。

这实际上是最后通牒。车臣方面第二天就作出了回应,车臣人民全民大会的武装力量宣布总动员,并开始袭击军队。群众集会要求临时最高苏维埃下台。车臣的各工厂里开始发放武器——手枪和机枪。莫斯科企图阻断这个共和国的“创举”,于是作出了新的人事任命,以为新任命的人能够在车臣得到支持(任命A.阿尔萨诺夫为俄联邦总统驻车臣—印古什代表,任命B.易卜拉欣莫夫将军为车臣—印古什内务部新任部长)。然而这一举动的成效不大,其成果只不过是举行了几个谴责车臣人民全民大会的群众集会。

杜达耶夫提出在1991年10月27日举行车臣共和国议会的选举和车臣总统选举,使车臣脱离俄罗斯具有合法性。杜达耶夫在很大程度上,把戈尔巴乔夫在1990年底1991年初准备全联盟全民公决时所指出的那种危险性变成了现实。在他看来,他们追求自治地区主权化和同各加盟共和国平等,只不过是“闹着玩”。叶利钦有句名言:“你们能吞下多少主权就拿多少主权”,他这样说是为了对抗分割俄罗斯的进程。想要多少就拿多少,但是必须在俄罗斯之内。而杜达耶夫呢,他完全是按照现成的公式行动的:选举,全民公决,宣布独立。既然爱沙尼亚、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可以这样做,为何车臣就不能这样做呢?

区别就在于车臣是俄罗斯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具有正式的国家机构。车臣开了个可怕的先例。这对于格罗兹尼来说没有什么,而对莫斯科来说却非常重要的。

10月24日,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在车臣进行选

举是非法的,预先不承认他们的选举结果。

冲突双方都明确表示不愿意妥协。

10月27日,选举开始了。杜达耶夫被选为车臣总统,车臣议会成立了(然而,议会只工作了很短的一段时间)。

11月6日,俄联邦总统派驻车臣—印古什的代表A.阿尔萨诺夫给克里姆林宫发去了令人惊恐不安的电报,电报中称:车臣人民大会的武装团伙正在攻占该共和国的重要设施。他要求采取紧急措施。同一天,叶利钦总统签署了亚·鲁茨科伊事先准备好的关于在车臣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鲁茨科伊被委派去执行这一命令。

然而,总统令执行不下去,鲁茨科伊遭到了彻底失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一败涂地。调集内务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特种部队前往车臣的行动计划考虑不周,执行得更糟。军队使用飞机运送,他们的技术设备在莫兹多克机场着陆,但是人员却降落在别斯兰机场(两个城市都位于北奥塞梯)。格罗兹尼郊区的汉卡拉机场被数千名武装分子封锁,飞机跑道上停着载重汽车。此前不久抵达格罗兹尼的特种部队被围困在车臣—印古什内务局大楼里。从北奥塞梯过来的道路也被封锁了,那是军队抵达车臣的必经之路。与此同时,杜达耶夫威胁说要在俄罗斯采取恐怖行动。11月9日,一架从矿泉水城飞往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飞机被扣留<sup>207</sup>。鲁茨科伊要求找到并惩办对他的计划执行不力的责任人;最高苏维埃开始讨论车臣的局势,鲁茨科伊受到严厉的谴责,响起了把他撤职的呼声;叶利钦撤销了关于进入紧急状态的命令。未酿成流血事件,被围困在格罗兹尼扣留的俄罗斯军队成功撤出。然而商谈以及寻求相互谅解的机会丧失殆尽,并成为永远。 614

事件的政治后果极其严重。车臣冲突对于俄罗斯的邻国来说,成了一个可怕的信号,使他们产生了对“俄罗斯帝国”的忧虑,并引起了俄罗斯自治地区掩饰不住的恐惧。为什么在车臣冲突初期,俄罗斯当局没有动用武力呢?这个问题后来才被提出来,当然需要找到问题的答案。上帝保佑,幸亏没有动用武力。武力解决的代价可能太高了。如果一开始就动用武力,可能使导致苏联迅速解体的一体化进程的所

有根基毁于一旦。

## 俄罗斯国家体制的重建

八月叛乱失败对于联盟管理机关来说是一个“不好的新闻”。但是也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俄罗斯领导人得到的权力越多,责任的标杆升得越高。俄罗斯陷入了令人绝望的经济困境。商品本来就很匮乏,现在就连粮食也短缺了。在政府会议上,几乎每周都要听取关于进口粮食的报告。俄罗斯战略发展的任务与日益尖锐的亟待解决的问题混杂在一起。

摆在第一位的问题是:什么东西应该留在联盟管理范围,什么归属共和国的范围?9月1日,米·谢·戈尔巴乔夫会见了各共和国领导人,就保留统一的武装力量和统一的军事战略空间、对军队、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以及检察院进行彻底改革等问题达成了一致,并且谈到了起草和签署关于建立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问题。

9月2日,召开了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苏联历史上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议一开始,努·纳扎尔巴耶夫代表苏联总统和各共和国领导人宣布,今后人民代表大会不再需要了。紧接着宣布了会间休息,休息之后开始投票。关于解散代表大会的建议没有取得必需的三分之二的赞成票。许多代表表示不满,戈尔巴乔夫威胁说要修改宪法,准备采用简单多数票的方法解散代表大会。有人向他提出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解散代表大会,理由是它没有能力通过建设性决议。代表们让步了<sup>208</sup>。曾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家政治面貌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被解散。

苏联最高苏维埃取代了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最高苏维埃的权力减少了,例如,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被取消。实际上,最高苏维埃濒临死亡,因为宣布独立的波罗地海沿岸共和国的代表已经不参加它的活动了,不仅如此,就连乌克兰的代表也不参加了。其他一些共和国也不派代表参加,只派去了观察员。

新的联盟机构——国家委员会组成了,它的成员是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和以伊·西拉耶夫为首的共和国间经济委员会。

俄罗斯领导层内的情况复杂,矛盾重重。应该承认,叛乱后的第一个月已经失去,其人为的原因是可以找到的,但是政治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应该看到——在这个阶段,在充满社会动荡、陷入沉重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在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中,愿意主动承担责任的人愈来愈少了。“高谈阔论的经济学家”们和那些苏联市场改革的先行者,曾大声宣称他们最了解未来市场发展的前景,此时却带着他们早先并不具有的谦虚态度躲到了一边。觊觎部长职务的名声显赫的经理们的代表人物也没有了踪影。在改革时期由叶利钦总统亲自领导政府工作的决定愈发显得重要。10月28日,叶利钦总统在俄罗斯最高苏维埃宣布,俄罗斯开始执行深化经济改革的计划,要求放开大部分商品的价格,实行私有化,削弱国家对经济的监督权。这就是“休克疗法”纲要,众所周知,这个纲要没有使它的宣传者戴上胜利的桂冠。“平民党党员”叶利钦又一次做出了出乎人们意料的举动,他承担了全部的责任。

10月份,俄罗斯新的管理机构开始组建,1991年11月6日颁发俄罗斯总统令予以确认。组建了两种管理机构,首先是政府。正像已经指出的那样,政府首脑由叶利钦总统担任。政府第一副总理由俄罗斯国务秘书根·爱·布尔布利斯担任(他曾经参加过许多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的制定工作)。副总理叶·季·盖达尔主管经济政策、A. H. 绍欣主管社会政策。有必要提及的是,政府成员中第一次有了一帮文化程度很高的年轻人。他们的“学术”水平显然要高于实践管理水平。布尔布利斯的办公室就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大楼第五层过去苏斯洛夫的那间办公室里。他的会客室里经常挤满了人,他们是来自全国各个城市的苏联和俄联邦的人民代表、学者、演员、官员和军官。内阁通常同时举行至少三个会议。来开会的人坐在那张长长的会议桌旁边,办公室的各个角落里都坐满了人。会议主持人布尔布利斯在这些人的中间来回走动。许多重大的政治行动、国家生活各个领域的改革原



则、干部的任命都是在这里讨论的。在机关里那些老家伙看来,这简直是破坏传统的规矩,是荒唐的行为。但是,这种开会的方式自有它的优越性:把从1992年1月初开始松弛的即将进行改革的那根弦绷得紧紧的。

616 鲍·尼·叶利钦本人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找到了也许是惟一正确的决策。1991年12月中旬,在会见议会的一个名为“接班人”的议会党团的协调人时,他一边解答代表的问题,一边解释自己的行为,他说:“关于政府问题,当然,当时只有这种选择——或者说目的就是要再次调配老干部,把他们从一个地方调换到另一个地方。政治局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这一点我们很清楚。后来,几乎所有的领导人都背叛了戈尔巴乔夫的事实也告诫人们,一定要有一个专门研究改革方向的班子……这个班子应该步调一致的。至于我个人,我不是不参加,而是当然要参加的。我要给他们更大的权力,让他们自己决定,在准备和进行改革方面需要什么样的人,谁更加合适,等等。所以需要作出某种牺牲——或者牺牲年轻的力量,或者牺牲经验。要达到两者理想的结合当然是不可能的。”

部的数量被大大缩减,出现了一些合并后的大部——工业部、经济和财政部、运输部、贸易部和物资部。旧的部门管理模式已被有意识地不加考虑,对管理体制作了专门的研究准备,以便进行市场化改革。所以出现了一些全新的管理机构——俄罗斯联邦国家反垄断政策和支持新经济结构委员会、俄罗斯联邦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在指出管理体制发生变化的时候,必须注意到,1991年11月份俄罗斯已停止对大多数联盟机构的财政拨款。根据俄罗斯总统1991年11月28日的命令,大多数联盟中央的部和部门被取消,它们的职能、人员及财产被转归同行业部门<sup>209</sup>。

俄罗斯总统机关里有了专业化管理机构。俄罗斯联邦国家顾问的设制出现了。在形式上,国家顾问们没有权力干涉执行权力机关的活动,没有权力发布权力机关必须执行的决议和命令。然而他们有权参加政府的会议,可以直接向总统提出建议<sup>210</sup>。顾问小组的成员有 K.

科别茨、H. 马雷舍夫、尤·斯科科夫、C. 斯坦克维奇、A. 格兰贝格、谢·沙赫赖、A. 亚布洛科夫。国家顾问们在日常工作中和俄联邦国务秘书以及第一副总理根·布尔布里斯保持着联系,尽管这种方式没有被用法规确认。

这样一来,根·布尔布里就成了一位把总统办公厅和政府所有的一系列职能集于一身的政治人物。

出现了一个问题:被视为国家“第二号人物”的副总统亚·鲁茨科伊的职责究竟是什么呢?显然,他的竞争对手根·布尔布里“施舍”给副总统的职责并不多。在1991年11月6日发布的《关于经济改革条件下政府工作安排的决定》中,有这样几句话是专门论述副总统职权的——他有权参加政府工作会议,“俄罗斯联邦副总统配合俄联邦政府和俄联邦总统所属管理机构的工作,在总统赋予的权限内履行总统委托的组织和监督职能。”<sup>211</sup> 617

政府第一副总理、俄联邦国务秘书的权力比副总统的权力大得多,根·布尔布里斯有权任命副部长、安排副总理的工作,发布务必执行的命令,等等。

亚·鲁茨科伊在车臣出师不利使他本来就不多的职权进一步受到了限制。1991年11月19日颁布的总统令规定,如下委员会由副总统领导:卫生防疫监督委员会,工业部门生产安全监督委员会,俄联邦经济利益保护委员会,国家标准、计量、许可证发放委员会等。<sup>212</sup>

可想而知,鲁茨科伊对此甚为不满。1991年11月底12月初,他前往西伯利亚西部地区。在新西伯利亚市和巴尔瑙尔市对即将开始的经济改革的构想以及领导层内他的对手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毫不掩饰地责备总统,说“政府里面学者多余,有实践经验的专家不足”,还说他不相信“穿红裤衩的小孩子”,“不想成为中国式的木偶总统”。鲁茨科伊没有想到他的激烈言辞后来上了报纸。事情闹大了,布尔布里斯说,鲁茨科伊说的话“只会让人心凉”,国家领导人会进一步明确“鲁茨科伊在改革中的位置”。<sup>213</sup>

政治利益的第三中心在最高苏维埃中逐渐形成。鲁·伊·哈斯布

拉托夫起步相对晚一点,在迈向独立活动的道路上,他十分艰难地一步步向最高苏维埃主席的位置靠近。从最高苏维埃副主席到当选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这个过程从1991年7月一直延续到10月底。到了10月28日,才在“争取民主共产党人”、“民主俄罗斯”、“工人联盟”以及“无党派”等议会党团的支持下,鲁·伊·哈斯布拉托夫终于当选了最高苏维埃主席的职务。曾经有一段时间,他一直处在自己的前任——鲍·尼·叶利钦之后的位置,不引人注目。最高苏维埃支持所有激进的建议,赋予总统进行经济改革的附加权力,从法律上确定恢复历史上的三色旗为国旗。很难想像到最高苏维埃还能够成为总统政权的反对派。不过这是后来1992—1993年的事情了。

激进的经济改革始自1992年初,改革的“潜伏期”是一个艰难、细心探索,伴随着许多错误和有所收获的时期。有必要指出的是,俄罗斯管理体制的基础是在3个月的时间内建立起来的,这一体制要来接替苏共中央委员会各个部和联盟中央各部门的工作,尽管“接替”这个词在这里并不是那么合适,因为新的俄罗斯机构面临解决以前没有遇到的课题。

### 从新奥加廖沃进程到“别洛雅日丛林”

叛乱被镇压后不久就响起了恢复新奥加廖沃进程的呼声,这是一种很自然的愿望,试图回到并不遥远、没发生叛乱前时的往日,似乎往日也并不那么坏。然而时光不会倒流。

叛乱被镇压后不久就开始出现各种意想不到的问题。苏联各共和国“民主派”的人民代表,共同起来反对苏共中央和联盟中央部门的控制。这种斗争似乎能确保俄罗斯与新成立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合作,这些国家的人民代表似乎能够与俄罗斯的人民代表持同样的政治主张。然而实际上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局面,问题反而一下子多了起来。各共和国之间突然出现了边境问题,出现了有关共和国财产、文化遗产的争端。还有一个问题,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

人转眼之间就变成了“非本地居民”、“帝国意识的载体”、“占领者”，他们面临证明自己有权继续生活在曾经生活过几十年的地方。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人为数众多，据1989年进行的人口普查，居住在俄罗斯境外的俄罗斯人数量如下<sup>214</sup>：

苏联各共和国	俄罗斯人数量(万)	占总人口比例(%)
乌克兰	1135.56	22
哈萨克斯坦	622.75	37.8
白俄罗斯	134.2	13.2
乌兹别克斯坦	165.35	8
吉尔吉斯斯坦	91.66	21.5
拉脱维亚	90.55	37.6
摩尔达维亚	56.2	13
爱沙尼亚	47.48	30
阿塞拜疆	39.23	5.5
塔吉克斯坦	38.85	7.6
格鲁吉亚	34.12	6.3
立陶宛	34.45	9.3
土库曼	33.39	9.4
亚美尼亚	5.15	1.5

1991年8月25日，叶利钦的新闻发言人沃夏诺夫指出，俄罗斯在认为自治权不容置疑的同时，也承认“存在边境问题，但这个问题只有在具备相关的联盟关系条约的情况才可以暂不解决”。沃夏诺夫在发言中说，如果随意划定边界，举行所谓的“乌克兰并入俄罗斯”周年纪念活动，企图把有大量俄罗斯人居住的克里米亚划归乌克兰，把赫鲁晓夫“开垦荒地”时期划出的鄂木斯克州和奥伦堡州永远归属哈萨克斯坦，那么俄罗斯将不认为这种观点是正确的。

619

他的声明在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引起了愤怒和坚决拒绝讨论这些问题，指责“俄罗斯帝国主义”的声音此起彼伏。所以，建立各共和国

之间正常关系的问题尤为重要。

此时在各共和国领导人的参与下,由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主持的苏联国家委员会出面,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手段。于是,1991年10月11日召开了国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在这一次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坚持恢复主权国家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坚持签署经济协定,坚持保留统一的军队。经济协定的起草工作由仍在“戈尔巴乔夫班子”中的格·亚夫林斯基负责。与会者对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叶利钦在对亚夫林斯基的建议表示同意的同时说,俄罗斯将不向那些联盟条约中未规定的联盟机构提供资金。<sup>215</sup>

列·M.克拉夫丘克的立场更为微妙。宣布在乌克兰举行全民公决和第一任总统竞选使克拉夫丘克与联盟领导层保持距离。所以他提前告知说,在举行全民公决之前,他不可能参加联盟条约的起草工作。苏联国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最重要成果是一致同意于10月18日在莫斯科签署经济协定。苏联总统新闻发言人格拉乔夫精辟地指出,经济协定是1985年以来苏联所执行的政治方针的最后一个成就<sup>216</sup>。

11月4日,举行了国家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叶利钦姗姗来迟。戈尔巴乔夫一开始就批评俄罗斯总统10月28日的发言。值得一提的是,正是那天,俄罗斯宣布独自开始实行经济改革,随即发布了一系列俄罗斯总统令,旨在为进行改革作准备。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决不允许破坏市场……不经过商量就放开价格,等等。我要直截了当地说:金蝉脱壳的办法救不了任何人。”<sup>217</sup>然而戈尔巴乔夫的告诫只是使人又一次想起“500天”计划的失败,想起他几年来总在喊实行经济改革,可是最终也下不了决心采取这一明知不受欢迎的措施。

叶利钦到会后,不同意把俄罗斯的计划提供各共和国领导人讨论。他批评联盟中央看不到近几个月内在各共和国发生的变化,警告说,俄罗斯将大幅度裁减对联盟各部门的财政支出(例如,对联盟外交部的拨款额将减少到原来的十分之一)。与此同时,叶利钦坚持应该对正在瓦解的苏联的武装力量实行统一指挥。他说,在苏联各加盟国中,俄



罗斯不首先组建自己的军队,也不会成为第二、第三或第四个组建自己军队的共和国。

俄罗斯分明想扮演苏联的继承者的角色。早在10月2日,俄联邦国务秘书格·布尔布利斯在与俄罗斯议员们会晤时就说过,俄罗斯是惟一能够和理应成为苏联及其所有机构的继承者的共和国。<sup>218</sup>后来,这一观点在所谓的布尔布利斯备忘录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俄罗斯在俄联邦境内抢占苏联财产的劲头丝毫不亚于乌克兰和其他加盟共和国。至于说俄罗斯是“联盟中央”所在地,争夺“苏联财产”绝不会导致戈尔巴乔夫大怒道:如果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者,那么“其他加盟共和国怎么办?他们又算是谁的孩子?是孤儿不成?”则是另一回事。<sup>219</sup>问题在于俄罗斯剥夺了联盟的管理机构,因而使联盟的存在丧失了意义。

11月14日召开的国家委员会会议上就联盟条约草案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问题的焦点是:建立联盟的邦联制国家,还是各加盟国家的邦联。戈尔巴乔夫坚持联盟的国家。在他的意见没有得到支持时,他便威胁说要辞职。他的对手鲍·尼·叶利钦和С.舒什克维奇则提出另一种方案:建立一个拥有统一武装力量的国家邦联。叶利钦对舒什克维奇的观点作了补充,他说:不单单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还要有共同的交通、共同开发航天事业、共同的生态环境政策。<sup>220</sup>叶利钦还表示担忧:“我们应该想办法,一定不让乌克兰离开我们。”舒什克维奇表示希望“他们都能够加入邦联”<sup>221</sup>。

在急剧崩溃的苏联这块土地上,邦联被认为是保留统一政治空间的最后一个机会。但戈尔巴乔夫另有心病——他想的是一定要保住统一的国家,统一的、全联盟的管理体系。他不识时务地对叶利钦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感到很惊奇,你怎么能这样坑害我。”<sup>222</sup>他像对待小学生那样对待叶利钦,极力说服叶利钦继续给中央直属的部级单位提供资金,其中包括向财政部和经济部提供资金,以延长他们的生命。

戈尔巴乔夫缺乏远见卓识和缺乏“超前工作”的能力最终变成了加速解体进程的政治因素。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国防部长叶·伊·

沙波什尼科夫元帅回忆说：“我本以为，八月事件能帮助戈尔巴乔夫认清自我，会在许多问题上有更明确的立场，然而八月事件之后他的‘摇摆不定’依然如故……大约是在1991年11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已经很晚了，米哈伊尔·谢尔盖维奇邀我到克里姆林宫。

……可以把他说过的话归结为寻求摆脱危机的各种出路。他认为，最可行的办法是：

621 ——你们军人应该抓权，‘要求成立’你们满意的政府，之后等局势稳定下来后，走到一边去。

——然后直接前往‘水兵寂静’监狱。——我插话说，——要知道，八月事件的时候有过类似的事情！

——叶尼亚，你怎么了，——戈尔巴乔夫说，——我让你去做什么了吗？我只不过是设想各种可能的方案，有什么说什么。”<sup>223</sup>

戈尔巴乔夫低估了、而且也没有真正认识到乌克兰在苏联命运中所具有的作用。很了解戈尔巴乔夫的A. C. 切尔尼亚耶夫多次指出过苏联总统个人与这个加盟共和国的关系，说总统极力想抓住所有使他感到安慰的信息<sup>224</sup>。他始终没意识到1991年12月1日全民公决会带来怎样的后果。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想为保留苏联斗争到底，不接受邦联的思想，使他在苏联国家委员会中失去了同盟者。

不久，11月19日，列·M. 克拉夫丘克在答《劳动报》记者问时意味深长、十分精确地勾画了苏联的未来：“……我想，难以解决的问题成堆也不是件坏事……某些共和国，比如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提出成立一个参加国权利均等的共同体，……大家齐心协力一起解决这些问题，大家都是没有什么政治中心的国家。”<sup>225</sup>

11月25日，召开了国家委员会例行会议。戈尔巴乔夫提议签订联盟条约草案。这一提议被叶利钦否决，他说，在俄罗斯原先所持的立场中，出现了“新的因素”，使他不能在原先的条约上签字<sup>226</sup>。这里所说的“原先的条约”是指联盟国家条约，而不是邦联国家条约。<sup>227</sup>在乌克兰全民公决之前，要签署这个文件是可以的，但先决条件是乌克兰提前表示不参加未来的共同体。而没有乌克兰的参加，这个共同体在很

大程度上便失去了意义。12月1日,乌克兰举行了全民公决,90.32%的居民赞成独立。独立的思想得到了几乎全体乌克兰居民的支持,其中包括克里米亚和居住着众多俄罗斯人的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居民。

克拉夫丘克当选为乌克兰总统。同一天哈萨克斯坦也举行了总统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得到98.8%的选票,当选为哈萨克斯坦总统。在苏联“总统俱乐部”里,只有一人没有经过全民选举,他就是“俱乐部”的创始人米·谢·戈尔巴乔夫。他当总统的权利来自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一个在他本人参与之下停止存在的政治机构。

12月2日,俄罗斯承认乌克兰的全民公决结果。

12月5日,克拉夫丘克总统宣布乌克兰退出1922年签订的联盟条约,就是那个促成建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条约。1922年乌克兰曾经是苏联缔造国之一,现在乌克兰宣告这个条约已经无效。从法律上讲,它已经与那个已经“过去了”的新奥加廖沃进程没有了关系。

在越来越复杂的新条件下,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政治领导人彼此都迈出了果断的一步,决定重新回到一年前没被采纳的政治方案。新关系的模式可以是三方或四方(在哈萨克斯坦参加的情况下)条约,时值1990年末1991年初,这些共和国正在寻找新型的关系模式,彼此签订了双边协定,并准备签订多边协定。当时这个协定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满,所以,准备签订四个共和国协定的事被搁置了。 622

俄罗斯总统、乌克兰总统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舒什科维奇相聚在白俄罗斯自然保护区——以欧洲惟一还有野牛种群著称的“别洛维日丛林”狩猎场,三个人很快就被媒体称为“别洛维日的野牛”。12月7日和8日,起草了促成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议,并宣布苏联停止存在。

戈尔巴乔夫绝对不接受邦联思想的立场也得到了考虑。但是,他被排除出准备新协议的进程。

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代表团的会晤是在明斯克举行的。稍后,1991年12月14日,在别洛维日协议签订后不久,叶利钦在会见

“新政策——换班”议会党团协调人时说：“正如军工领域的工作人员所说，我们俄罗斯人创造了个真正的奇迹：与白俄罗斯交换了经审批的文本……这么说吧，这是我们的第一个正式的理由。实际上是我们这样操作的。第二个正式协议是1992年有关经济的协议，这些文件我们也是在明斯克签署的。也就是说，我们完全是专门为这个问题去的明斯克。同时我们也谈好要搞清楚与乌克兰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乌克兰还没走得太远，就要想办法在最后时刻把它挽留在那个共同体或联合体中。”<sup>228</sup>叶利钦告诉议员们说，他与纳扎尔巴耶夫已经进行过初步磋商。他说：“去明斯克之前，我和纳扎尔巴耶夫通过话，他对此举动，反应正常，但考虑到今年他们已经签署了“五国”条约，即哈萨克斯坦和四个中亚共和国，他说我应该同那四个国家商量一下，然后决定怎么办。星期天我从明斯克第二次给他打了电话，而且把协议的全文给他读了一遍，也就是说，一切行动是在他同意之后进行的……他来莫斯科时，我在“多莫捷多沃”机场上见到了他……他说，他原则上同意。”<sup>229</sup>

纳扎尔巴耶夫没有去明斯克，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及时接到参加会晤的邀请信，当他见到邀请信时，他已经在回阿拉木图的途中。当然也不排除这是会晤的组织者有意这样安排的。因为组织者得到消息，哈萨克斯坦总统原则上同意参加协议的起草工作。但如果戈尔巴乔夫对此干预的话，直接会晤就有可能被取消，因为戈尔巴乔夫与纳扎尔巴耶夫有着紧密的联系。当然，即使这样，事情的实质也不会有所改变，只是戈尔巴乔夫的干预会增添一些麻烦。

623 在这次会晤中，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还是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叶利钦利用了最后一个保住联盟的机会。乌克兰总统克拉夫丘克在1991年12月11日向记者们透露说：“叶利钦带来了戈尔巴乔夫关于建立联盟的文本。戈尔巴乔夫给我提出以下建议：乌克兰有权对条约作任何修改，可以重新审核所有条款，甚至可以重新起草，但前提是乌克兰一定要在条约上签字。叶利钦把文本放到桌上，向大家转达了戈尔巴乔夫的问题：‘条约可改，可不改，但你们到底签字，还是不签

字?’叶利钦自己说,只要我签了,他也会签。这样一来条约最后的命运就完全取决于乌克兰了。我回答说:‘不签’。当即出现了起草新文件的问题。专家们工作了一夜。”克拉夫丘克补充说:“看来,只要路上没有被称之为‘中央’的这根‘木头’挡路,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sup>230</sup>

12月8日,俄罗斯总统、乌克兰总统和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通过了一个声明。现将苏联历史上这个最重要的文件照引如下:

“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国家元首声明:

我们——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的领导人

——注意到,关于准备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经走入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建立独立国家的客观进程已经成为现实;

——认为,中央目光短浅的政策导致出现深刻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导致生产崩溃,使社会各阶层的生活水平灾难性下降;

——注意到,前苏联许多地区社会紧张局势日益加剧导致族际冲突和众多人员伤亡;

——意识到,对本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责任,以及实现政治与经济改革的迫切需求,我们宣布组建独立国家联合体。各方于1991年12月8日签订了协定。

由白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乌克兰共和国组成的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大门对苏联前所有加盟共和国敞开,对所有赞同本协定宗旨和原则的国家敞开……

1991年12月8日。明斯克”<sup>231</sup>。

叶利钦、克拉夫丘克、舒什科维奇宣布:“苏联作为国际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现实已经停止其存在”。

在白俄罗斯通过的决定当天就告知米·谢·戈尔巴乔夫。

12月10日,别洛维日协定被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议会批准。

12月12日,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以绝大多数票(188票赞成,6票反对,7票弃权)在掌声中批准了该协定。

那一天原本打算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结果没有开成。没有人提议让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苏联人民代表参加工作,而乌克兰的人



民代表早已经不在那里工作了。

建立独联体的思想马上得到各共和国支持。12月11日,吉尔吉斯斯坦和亚美尼亚加入了独联体。12月13日,在阿什哈巴得举行了中亚国家和哈萨克斯坦的会晤,与会者表示同意加入独联体,但提出了要与最早的成员国保持平等地位的条件。这些条件立即得到了同意。

1991年12月14日,叶利钦会见了“新政策—换班”议会党团协调人,叶利钦告诉他们说,12月21日要在阿拉木图签署参加独联体协定。他强调说:“在平等这个问题上,我们会严格遵守诺言的。就是说,没有大哥哥、小弟弟之分,俄罗斯无论如何不想当什么领袖,我们大家一律平等。”

他向议员们透露,有10个前苏联加盟共和国打算签署这个协定,曾经拒绝在苏联国家委员会框架内合作的亚美尼亚和摩尔多瓦也准备加入独联体。

叶利钦说,在“只要我们还没签署有关防御联盟、国防会议和战略部队总指挥部的条约”,俄罗斯就坚持保留统一的国防部。就是以后,俄罗斯也打算保留对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我们已达成一致:战略武装力量必须统一指挥。这包括空军、海军、导弹、核武器以及战术核武器、侦察机关。战略武装力量的这五个组成部分是统一的整体,由统一的中心来指挥。”

但也出现一些分歧:乌克兰要求陆军归他们指挥,而且要分走一部分黑海舰队。总统对议员们说:“我们一致的看法是,现在先不动军队,但要时刻保持戒备状态。”

也有人反对总统的说法,说军队已经成了无帅之军。叶利钦说,对于俄罗斯来讲,更重要的是战略力量的统一指挥。叶利钦完全赞成签署专门协定,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俄罗斯的安全,另一方面还可以避免花费过多的经费来保留苏联庞大的军事体系。他说:“至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我们与它们每一个国家都有现成的协议,防空部队暂时保留不动,因为把防空基地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北部迁走耗资巨大……我们所有重型和最现代化的防空装备都在那里……把他们迁移到俄罗斯

边境要耗资数十亿卢布,而且要花费许多年工夫。”

“没有大哥”,“没有联盟中央”的、平等的、新的国家联合体的思想在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迅速赢得了支持者。

12月21日,除了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和格鲁吉亚(不久格鲁吉亚也加入了独联体)以外,前苏联所有共和国的元首都参加了阿拉木图会晤。11个曾经签字支持别洛维日协定的国家元首在宣言上签字。他们宣布:“自独立国家联合体成立之日起,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停止存在。” 625

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签署命令,放弃苏联总统的权力,并通过电视台宣布。

1991年12月25日19时38分,克里姆林宫的苏联红旗降下,升起了俄罗斯三色旗。

## 注 释

- 1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Из дневника члена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М., 1995. С. 241.
- 2 Там же. С. 245—246.
- 3 См.: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Штрихи к портрету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М., 1995. С. 338—339.
- 4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М., 1995. Кн. 1. С. 424.
- 5 ЦХСД, ф. 98, оп. 30, д. 18.
- 6 Там же, ф. 89, оп. 30, д. 8.
- 7 Там же.
- 8 См.: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256.
- 9 См.: Тбилиси, апрель 1989-го/Публ. С. В. Попова, Ю. В. Васильева, А. Д. Чернев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 3. С. 95—122.
- 10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427.
- 11 См. там же. С. 431—432.
- 12 См.: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По дневниковым записям. М., 1993. С. 261—262.
- 13 См.: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42—344.
- 14 См.: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А было это так. С. 269—271.
- 15 См.: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293.
- 16 См.: Первый Съезд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25 мая—9 июня 1989 г.: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 1989. Т. 1. С. 9—11.
- 17 叶利钦没有被选进苏联最高苏维埃显然是一大丑闻,以至于代表大会的领导人立即对议员 А. И. 卡扎尼克关于把自己在最高苏维埃的席位让给鲍·尼·叶利钦的建议抓住不放。
- 18 Первый Съезд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С. 223—224.
- 19 ЦХСД, ф. 89, оп. 9, д. 12. См. также: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XX столетия. М., 1995. С. 309.

- 20 См. : «Демократизация и гласность воскресили нечисть...» // Источник. 1993. № 3. С. 157—158.
- 21 Абалкин Л. И. и др. Этот трудный,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реформа. М., 1989.
- 22 Абалкин Л. И. Проблемы и противоречия советск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в переходный период // Абалкин Л. И. и др. Этот трудный,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С. 8.
- 23 См. там же. С. 9.
- 24 См. там же. С. 10.
- 25 См. там же. С. 13.
- 26 См. : Лацис О. Вес ускорения // Абалкин Л. И. и др. Этот трудный,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С. 40.
- 27 Там же. С. 43—46.
- 28 Павлов В. Стратегия финансовых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й в контекст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 Абалкин Л. И. и др. Этот трудный,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С. 94.
- 29 См. там же. С. 95—96.
- 30 Лукинов И. Состояние валютно-финанс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и меры по преодолению инфляции // Абалкин Л. И. и др. Этот трудный, трудный путь. С. 105—111.
- 31 苏共中央批准的《苏联 1986—1990 年和 2000 年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中规定,计划把国民收入翻将近一番,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 1.3—1.5 倍。拟将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年均 3.1% 提高到第十四个五年计划年均 5%。这种愿望当然很好,但是能够实现吗?
- 32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М., 1994. С. 103.
- 33 См. там же. С. 6—7.
- 34 Отметим к тому же, что значительная часть этих предприятий была связана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м комплексом.
- 35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М., 1995. С. 225.
- 36 См. там же. С. 14.
- 37 См. : Бергер М. Первые банки, или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денег // Известия.

1995. 11 апреля.
- 38 Записка была приложена к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ю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датированному 27 марта—10 мая 1991 г., и подписана О. Баклановым, П. Лучинским и Ю. Власовым.
- 39 См. : например; Московская правда. 1990. 31 октября.
- 40 См. :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С. 316.
- 41 Автоматика (многотиражная газета НПО Автоматика, г. Свердловск). 1990. 6 февраля.
- 42 А. П. 艾达克——集体农庄主席, 苏联人民代表, 苏联最高苏维埃农业小组组长。
- 43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7 марта 1990 г.
- 44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485.
- 45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110.
- 46 Эта группировка в КПСС разделяла взгляды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России».
- 47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22 марта 1990 г.
- 48 ЦХСД, ф. 89, оп. 9, д. 110.
- 49 Там же, оп. 8, д. 39, л. 1—7.
- 50 См. :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76.
- 51 ЦХСД, ф. 89, оп. 42, д. 28.
- 52 В СССР, как известно, было пятнадцать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 53 Известия. 1990. 25 мая.
- 54 ЦХСД, ф. 89, оп. 9, д. 123.
- 55 См. , например;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524.
- 56 См. там же. С. 536.
- 57 从此,大量党员退出苏联共产党,俄罗斯的苏共党员自动“报名加入”新成立的俄罗斯共产党。但是,许多党员不愿意听从波洛兹科夫的支配,有些正式退党的人(如本书作者)宣布,他加入的是苏联共产党,而不是俄罗斯共产党,因此他不是俄共党员。
- 58 Известия. 1990. 13 июля.
- 59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414.
- 60 См. табл. 2 в гл. 7 настоящего издания.



- 61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430.
- 62 Там же.
- 63 См. там же. С. 431—433;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572.
- 64 См. :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Белая книга: Документы и факты о политике М. С. Горбачева по реформированию и сохранению много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М., 1995. С. 106—107.
- 65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436.
- 66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365.
- 67 См. там же. С. 366—367. 627
- 68 预购登记是商品定额分配的一种方法,购买到商品的可能性取决于是否预先订购,通常要提前几个月订购。
- 69 ЦХСД, ф. 89, оп. 8, д. 31.
- 70 Там же, оп. 5, д. 2, 52.
- 71 См. :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С. 313.
- 72 См. : Рыжков Н. И. Десять лет великих потрясений. С. 414—444.
- 73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369—370.
- 74 См. там же. С. 371.
- 75 Лебедь А. За державу обидно... М., 1995. С. 343—350.
- 76 这里所说的“乌拉尔”系指当时苏军使用的具有高度越野能力的重型载重汽车。
- 77 Сведения о депутатах, в панике покидавших здание гостиницы, относятся скорее к «охотничьим рассказам»—жанру, не обойденному и А. И. Лебедем в его мемуарах (см. : Лебедь А. За державу обидно... С. 345, 384).
- 78 ЦХСД, ф. 89, оп. 42, д. 29. л. 65—66.
- 79 Там же, л. 66.
- 80 Там же, л. 69.
- 81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371.
- 82 См. : Валента И. Мои встречи с Ельциным в США и в России// АиФ. 1996. № 25 (818).

- 83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М. , 1994. С. 45—46.
- 84 Правда. 1990. 13 октября.
- 85 Там же. 18 октября.
- 86 Вечерняя Москва. 1990. 17 октября.
- 87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381.
- 88 ЦХСД, ф. 89, оп. 12, д. 29.
- 89 Там же, оп. 8, д. 65.
- 90 Там же, оп. 11, д. 182.
- 91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386.
- 92 См. :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73;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165—166.
- 93 ЦХСД, ф. 17, оп. 42, д. 30.
- 94 Там же, л. 1.
- 95 Там же, л. 6.
- 96 Там же, л. 5.
- 97 Там же, л. 11.
- 98 Там же, л. 15—16.
- 99 Там же, л. 20.
- 100 Там же, л. 26—27.
- 101 尼·伊·雷日科夫没有干到正式退休。他因心肌梗塞住院,直到退休。瓦·谢·帕夫洛夫被任命为总理。
- 102 Крючков В. А. Личное дело. М. , 1996. Ч. 2. С. 30.
- 103 ЦХСД, ф. 89, оп. 8, д. 5; оп. 11, д. 70.
- 104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07.
- 105 См. :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А. М. Бразаускаса на I Съезде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 I Съезд народных депутатов СССР. Т. 2. С. 73—75.
- 106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17.
- 628 107 Здесь и дальше цит. по: АП РФ, Рабочая запись заседа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КПСС 30 января 1991 г.
- 108 ЦХСД, ф. 89, оп. 11, д. 183; оп. 42, д. 31.
- 109 Цит. по записи совещания, сделанной секретарем ЦК КПСС А. Н. Гиренко.

- 110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432.
- 111 ЦХСД, ф. 89, оп. 2, д. 15.
- 112 Там же.
- 113 Ельцин—Хасбулатов: Единство, компромисс, борьба. М., 1994. С. 67—69.
- 114 Это решение вызвало волну протестов в Верховном Совете РСФСР.
- 115 Цит. по: Замятин Л. М. Горби и Мэгги: Записки посла о двух известных политиках—Михаиле Горбачеве и Маргарет Тэтчер. М., 1995. С. 140—142.
- 116 必须指出一个重要情况:在 1989—1991 年“民主俄罗斯”组织的大规模示威游行中,没有发生过一次与政敌的肉体冲突,没有发生过任何示威游行引发的暴力事件。
- 117 См.: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1. С. 591.
- 118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叶利钦总统下令将这两个大厅推倒,按照亚历山大和安德烈耶夫厅的原样重建。这一决定无疑具有象征意义。
- 119 Замятин Л. М. Горби и Мэгги. С. 140—142.
- 120 См.: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Руд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М., 1994. С. 25.
- 121 Ельцин—Хасбулатов. С. 70—73.
- 122 См.: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35.
- 123 А. Н. Яковлев использовал политическую терминологию конца 80 - х гг., когда «правыми» в СССР называли коммунистов - фундаменталистов.
- 124 Цит. по: Яковлев А. Н. Горькая чаша: Большевизм и реформация России. Ярославль, 1994. С. 263.
- 125 См.: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181.
- 126 См.: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395—396.
- 127 См.: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153—157.
- 128 См.: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38—539.
- 129 13 голосов—против, 14—воздержалось(ЦХСД, ф. 89, оп. 12, д. 26).
- 130 报告稿在 1991 年 5 月 17 日前,亦即在俄联邦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前写成。根据报告的内容可以确定写成的日期。
- 131 这意味着俄罗斯对赫鲁晓夫移交乌克兰管辖的克里木以及对在开垦荒地时

期并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一系列地区有领土要求。

- 132 据 O. M. 波普佐夫说,鲍·尼·叶利钦在竞选过程中说过这样的错话:如果被列入投票名单的选民有半数以上投他的票,就可以认为总统是通过选举选出来的。波普佐夫的说法不正确,最高苏维埃主席鲍·尼·叶利钦绝对准确援引了相关的法律文书。至于说这一规定使选举程序过于复杂化,那是另一回事(见 O. 波普佐夫:《“鲍里斯皇帝”时期纪事。俄罗斯。克里姆林宫。(1991—1995)》,莫斯科 1996 年版第 59 页)。
- 133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46—48.
- 134 Обзор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есяти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газет за 20—25 мая 1991 г.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етендентов на пос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СФСР.
- 135 Обзор материалов десяти центральных газет за 27 мая—1 июня 1991 г.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 претендентов на пост Президента РСФСР.
- 136 См. :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160—162.
- 137 См. : Политика. 1991. № 7. Июнь; см. также: Крючков В. А. Личное дело. Ч. 2. С. 387—392.
- 138 См. :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167—172.
- 139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91. 23 июля.
- 629 140 ЦХСД, ф. 17, оп. 8, д. 3; оп. 11, д. 181; оп. 11, д. 180; оп. 22, д. 64; оп. 11, д. 179.
- 141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54.
- 142 Там же. С. 56.
- 143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Версия следствия. М. , 1992. С. 10.
- 144 См. : Лукьянов А. И. Переворот мнимый и настоящий. Воронеж, 1993. С. 10.
- 145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46. В списке А. Тизякова упоминается еще Г. В. Костин, сведениями о котором мы не располагаем.
- 146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77—79.
- 147 См. : Крючков В. А. Личное дело. Ч. 2. С. 147.
- 148 См. там же. С. 148.

- 149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53.
- 150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84—85.
- 151 Крючков В. А. Личное дело. Ч. 2. С. 148—149.
- 152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90.
- 153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20—21.
- 154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Человек за спиной. М. , 1994. С. 276—277.
- 155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15.
- 156 Там же. С. 17.
- 157 Медведев В. Человек за спиной. С. 278.
- 158 Там же.
- 159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58—559.
- 160 Там же.
- 161 Медведев В. Человек за спиной. С. 278—279.
- 162 Этот факт подтвердил сам М. С. Горбачев в Прокуратуре России при расследовании дела ГКЧП (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17).
- 163 Болдин В. И. Крушение пьедестала. С. 18.
- 164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69—570. Узнав о приезде в Форос 21 августа Язова, Крючкова, Бакланова, Ивашко и Лукьянова, Горбачев приказал: «Взять под стражу. Передать требование — принимать никого не буду до тех пор, пока не будет включена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ая связь».
- 165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89—90.
- 166 См. : там же. С. 108—109.
- 167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83—84. См. также: Филатов С. На пути к демократии. М. , 1995. С. 25.
- 168 Гульбинский Н. , Шакина М. Афганистан... Кремль... «Лефортово»...? Эпизод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биографии Александра Руцкого. М. , 1994. С. 112.
- 169 См. : Лебедь А. За державу обидно... С. 384—389.
- 170 Там же. С. 390.



- 171 См. : Шапошников Е. Выбор. М. , 1995. С. 27—28. 沙波什尼科夫后任苏联国防部长,苏联解体后任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司令。格拉乔夫在他之后任国防部长,至1996年年中。
- 172 См. : Карпухин В. Ф. Группа «А»: от Кабула до Белого дома // Общая газета. 1999. 5 августа. № 31.
- 630 173 总统令全文由总统新闻秘书 П. 沃夏诺夫、总统发言稿撰稿人 Л. 皮霍亚、国务秘书格·布尔布利斯、总统法律问题顾问谢·沙赫赖起草。
- 174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122—123.
- 175 См. : В августе 91 - го: Россия глазами очевидцев. М. ; СПб. , 1993. С. 17—20.
- 176 См. : Попцов О. Хроника времен «царя Бориса». С. 168.
- 177 Черновик этого заявления был обнаружен при обыске кабинета О. Бакланова(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149).
- 178 Там же. С. 149—150.
- 179 Крючков В. А. Личное дело. Ч. 2. С. 191.
- 180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172—173.
- 181 См. : Попцов О. Хроника времен «царя Бориса». С. 168. 据 К. 科别茨将军估计,当时白宫里面有 500—600 杆枪。守卫白宫的人手里的武器估计有 4000 枝。
- 182 后来没有少吹捧过以前的特种勤务工作人员,说什么他们能在几分钟之内“疏散”白宫的保卫者。谢天谢地,幸亏没有到发生公开冲突的地步。作者以为,没有发生冲突的一个原因是,这种评价没有得到为了给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增光而不得不“引颈送死”者的支持。
- 183 См. : Крючков В. А. Личное дело. Ч. 2. С. 105.
- 184 Автор этих строк, человек сугубо гражданский, работавший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м Архивной службы России, в эти дни оказался в охран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и находился в этом бункере.
- 185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176.
- 186 См. : Шапошников Е. Выбор. С. 41—46.
- 187 ТАСС. 20 августа 1991 г. , сводка № 1.
- 188 通讯联系是否被切断,至今仍不清楚。有证据表明,戈尔巴乔夫当时可以使

用电话联系,他的警卫人员经他许可也可以使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可能切断苏联总统使用的通讯工具。

- 189 См. :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71—572.
- 190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127.
- 191 Показания Н. С. Силаева ( см. : Степанков В. , Лисов Е. Кремлевский заговор. С. 208—209 ).
- 192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199.
- 193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489. См. , в частности, информацию ТАСС от 22 августа 1991 г. о стать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й в «Файнэншл таймс». « Не исключено, — писали журналисты, — что весь этот странный переворот был частью какой-то тщательно продуманной пьесы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 театре. . . . Автором инсценировки мог быть сам Горбачев ».
- 194 Горбачев М. С. Жизнь и реформы. Кн. 2. С. 575.
- 195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491—492.
- 196 Пихоя Р. Г. Архивные страст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95. № 1 (119). С. 241—243.
- 197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212.
- 198 Сборник указов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ктябрь— декабрь 1991 г. М. , 1992. С. 16—18.
- 199 См. :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М. , 1994. С. 399.
- 200 См.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996. 23 июля.
- 201 См. : Сосламбеков Ю. Чечня ( Нохчичоь ) — взгляд изнутри. М. , 1995. С. 36.
- 202 См. там же. С. 10.
- 203 См. : Гульбинский Н. , Шакина М. Афганистан. . . С. 142—144.
- 204 См. : Сосламбеков Ю. Чечня. . . С. 11.
- 205 См. : Гульбинский Н. , Шакина М. Афганистан. . . С. 146—147.
- 206 См. там же. С. 147.
- 207 См. там же. С. 152—162.
- 208 См. : Медведев В. А. В команде Горбачева. С. 204—206.

- 209 См. : Сборник указов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ктябрь— декабрь 1991 г. С. 63—67.
- 210 См. там же. С. 244.
- 211 Там же. С. 24, 26.
- 212 См. там же. С. 241.
- 213 Неизвестный Руц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ортрет. С. 29—30.
- 214 Народы России. С. 271.
- 215 См. : Грачев А. Дальше без меня... Уход президента. М., 1994. С. 48—51.
- 216 См. там же. С. 64.
- 217 См. там же. С. 120.
- 218 См. :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135.
- 219 Грачев А. Дальше без меня... С. 105.
- 220 См. там же. С. 145.
- 221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246.
- 222 См. : Грачев А. Дальше без меня... С. 147.
- 223 Шапошников Е. И. Выбор. М., 1995. С. 137—138.
- 224 См. : Черняев А. С. Шесть лет с Горбачевым. С. 494.
- 225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256.
- 226 См. : Грачев А. Дальше без меня... С. 160.
- 227 См. :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258.
- 228 我们下面还要介绍俄罗斯总统鲍·尼·叶利钦 1991 年 12 月 14 日会见俄罗斯“新政策—换班”议会党团的速记记录,这是独联体刚刚形成时产生的一份极其有价值的文献。
- 229 См. также: Ельцин Б. Н. Записки президента. С. 153—154.
- 230 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 (Киев). 1991. 11 декабря (цит. по: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307).
- 231 Союз можно было сохранить. С. 301—302.

## 结 束 语

632

20 世纪结束了,在整个俄罗斯历史中,20 世纪是最蓬勃发展,也是最具悲剧色彩的世纪。在这段时间里,俄罗斯存在过四种国家制度:君主制度,后被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取代,但时间不长;1917 年的伟大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了苏维埃制度。它后来又被总统享有强大权力的议会制共和国所取代。在这一百年里,国家生活的社会经济基础几经改变。俄罗斯经历了数次移民浪潮,恐怖浪潮,还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在这一百年的时间里,俄罗斯帝国和沙皇专制制度,以及苏维埃联盟,看起来都是不可动摇的。俄罗斯帝国和沙皇专制制度在灭亡前三年的时候,还隆重地举行了王朝统治三百周年庆祝活动;而苏联的国徽上画的是一个地球,这是对社会主义思想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充满信心的象征。这两种政治制度都走向了死亡,走进了历史研究和传说的领域。众所周知,“苏维埃面貌”的社会主义对社会主义思想没有起到好的作用,而是严重地损害了它。本书所研究的国家历史的这个时期(1945—1991 年),是一个超级大国产生、巩固、危机和灭亡的时期。对国家这数十年的政权史进行研究,不可避免地要弄清许多问题,特别是一个最引人关注的问题:苏维埃联盟作为一种政治制度的特点是什么?

苏维埃制度决定了执行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这三种权力原则上是不可分割的。从本质上讲,这三种权力是掩饰权力精英大权独揽的屏风。最高权力环节拥有颁布法律、领导执行权力机关和监督法律执行情况的全部权力。这一原则在1918年的宪法中就已经做了规定,而在1936年和1977年的宪法中,这一原则实际上被保留了下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称苏联部长会议)和人民委员会议(后称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职能在许多情况下是重叠的。这两者都是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执行权力。执行权力机关干预了司法机关的工作,代替了司法机关(例如,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部机关中运作的“特别会议”,其20年的历史就是例子。另外一个例子是,对最重大的政治案件的判决,事先要经过国家领导人的批准,约·维·斯大林时代是这样,在尼·谢·赫鲁晓夫时代和列·伊·勃列日涅夫时代也是这样)。

在苏联,只存在着一种所有制形式,正式的名称叫全民所有制。就其本质而言,全民所有制就是国家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讲,在所有制形式方面,不存在阶级和阶层的本质划分。各阶层和各职业团体的居民,归根结底都依赖国家。而这一原则又将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成功与失败的责任,都交到了最高政治领导人的肩上。

633 经济国有化存在着对政权不利的一面:个别人或个别工厂企业经济形势不利的责任,以及一个地区或整个国家在发展中出现失误的责任,都推到了政权机关的身上,政权机关始终有过错,在一切方面都有过错。政权机关是可识别的,是很具体的:只要打开电视,或者看看五月或十一月例行的游行队伍中,沿大街两旁的画像,就足够了。

苏联经济中存在的问题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历史的公正性在于,对苏维埃制度的报复来自俄罗斯农村。农村在30年代被没收了生产资料和土地,在战争年代失去了男人,在战后时期因为沉重的税收而贫困,在赫鲁晓夫时期因为新的农业政策而痛苦不堪,而到了列·伊·勃列日涅夫时期,又因为收入有保障但收入却不与具体的劳动成果挂钩的政策而浪费了时光。农村经济成了苏联经济的致命弱点,而从60年



代起,变成了一个填不满的漏斗,国家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却仍然养活不了苏联公民。在不同的年份里,为购买粮食,苏联花费了大量的资金:1963年动用黄金372.2吨,1972年为458.2吨。考虑到每年的收成不同,1974年购买的粮食占苏联国内粮食总产量的6.8%,而1981年这一数字达到了41.4%。1971—1975年,苏联花费了1251.8吨黄金用于采购粮食和食品。

开发西西伯利亚储量最丰富的油田所获得的“石油”收入,就像投入黑洞一样地消失了。“石油收入”变成了苏联经济的“毒品”,它使得苏联推迟了经济改革,放弃了经济改革,只顾发展军事工业,从而损害了民用部门的发展。

在“改革”的年代,苏联曾多次试图对国家的经济进行改革。为进行改革,最初采取了军事行政式的经济管理方法,实行了工业企业生产的产品全部由国家接收的制度。经济中日前明显的危机现象,推动了市场关系要素的采用,然而,市场本身所固有的属性(生产资料私有,国家放弃对大多数产品价格的调整)与在整个苏维埃时代占据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思想制度的基本原则相矛盾。

1985年草率推行“禁酒令”的行动损害了国家预算,使预算损失了数百亿卢布。国家陷入了经济问题的泥潭里。1981—1983年,国家预算赤字按可兑换外汇计算,年均达到了13亿美元,而从1985年到1989年(含),每年的预算赤字为78亿—251亿美元。国家外债增长。1981年,外债额为247亿美元,1988年为408亿美元,而到了1991年,已经达到了522亿美元。1991年,苏联国家基金收入250吨黄金。同年,政府出口了269.1吨黄金。

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与越来越严重的政治危机结合在一起。苏维埃制度一个最重要的特征是,国家制度是靠政治组织起来的。这一制度的核心,正如1977年的苏联宪法所规定的,是共产党。作为社会政治结构要素之一的多党制度,是完全遭到排斥的,就像共产党本身内部不允许存在不同思想和派别一样。苏联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是将政权的决定传达到最广泛阶层民众中去的工具,是思想控制与监督的工具。

634

苏维埃制度的运作方式是“自上而下”。苏联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不断增长。

苏共党员和候补党员人数

日期	苏共党员	候补党员	总计
截止 1981 年 1 月 15 日	16763009	717759	17480768
截止 1986 年 1 月 1 日	18288786	715592	19004378
截止 1990 年 1 月 1 日	18856113	372104	19228217

积极争取入党者首先是那些拥有高等教育学历的人,因为具有党籍后,就有可能在职务上步步高升,党籍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必备条件。许多活动领域只有党员才能够进入。这些领域包括司法、外交、国家安全委员会部门、军队里的军官、工业部门、地方权力机关中的高级管理职务等。尽管限制接纳“知识分子”入党,但是,知识分子在党组织中的比重持续增长。对于他们的职业仕途来说,党员资格是必不可少的,但与此同时,却引起了党内的抗议行动,特别是在危机增长的情况下。

像苏联共产党这样庞大的国家政治组织所拥有的无限权力,导致社会结构政治化。截止到 1990 年 1 月 1 日,苏联计有 433192 个基层党组织。其中的大多数规模不大:39.8% 的基层组织人数不足 15 人,40.1% 的基层组织人数在 15—45 人之间<sup>1</sup>。

作为党组织建设基础的“生产原则”,渐渐地产生了这样的情况:行业利益、生产利益、车间利益不可避免地“全党”利益相碰撞。

这种有分支机构的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整体运作还是顺利的。必须举行会议,必须履行“积极参加党组织工作”的要求,迫使苏共党员“表现出”政治积极性,学习政治活动的方式方法。并非偶然的是,在苏共二十大后,恰恰是苏共的各级党组织立即开始批评当局在谴责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产生原因方面,没有持之以恒地开展工作。

为苏共政权创造独特的“新正统”思想,是米·谢·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拥护者,首先是阿·伊·卢基扬诺夫和亚·尼·雅科夫列夫的杰

作。他们试图依靠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公民选举权的方法来实现这一目标。按照设想,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书记由地方苏维埃领导人选举产生,而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在新的(不过也可以叫做“恢复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按照米·谢·戈尔巴乔夫拥护者的意图,包括总统在内的国家最高领导职务候选人,应当由苏共代表大会推荐和批准。恰恰是苏联共产党应当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政治改革的倡导者们认为,苏联共产党纪律性强,采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方法,掌握着全国全部的大众传媒,并且,能够大规模地清洗固执己见的党员。这样的—个党应当能够保证选举的成功。

然而,当“金字塔”倾覆的时候,人们发现,基层党组织的1900万共产党员,维护的是与“克里姆林宫”的利益相悖的自己的行业利益、阶层利益、民族利益、政治利益和其他利益。从1978年至1991年,苏联共产党变成了一个等级制度的代表组织,分裂成了大量独立的、代表着行业集团和等级制度集团具体利益的政治派别。政治体制改革计划的失败,早在第十九次全苏党的代表会议上就已经很明显了。当时,党内切实出现了不同的派别,这是自苏共十大以来所不曾有过的。从这个时候开始,一直到苏共二十八大,党内实际存在着独立的政治集团,它们从内部破坏了苏共作为苏联政治制度传送带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早就灭亡了,远远早于1991年8月它被取缔之时。而在那个时候,这种取缔行动已经是“打扫卫生”的行动了,实际上已经不会引起苏共普通党员的激烈抗议了。

“加速前进与改革时代”出现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掌握政权的精英发生了分裂。政权赖以生存的许多基础遭到了破坏。

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一些加盟共和国宣布了脱离苏联的方针,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摩尔达维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亚美尼亚、乌克兰和中亚一些共和国发表了对联盟中央不满的声明,由于苏联国家政权上层人物的分裂,这些举动和声明看来是可能实现的。苏联的天空中,分立主义的阴云越来越浓厚。在许多情况下,分立主义的倾向是由当地党的领导人煽动起来的。苏联已经无力解决卡

拉巴赫地区的流血冲突,这成了苏联软弱不堪的明显例子。一些地方当局认为,苏联已经不能向其边远地区提供补贴了。按照地方上层人物的意思,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情况下,中央无力向加盟共和国提供资金,帮助他们解决一时的困难。由此产生了两种行为模式:对于中央来说,采取政治解决的方法,而在必要时,动用军事力量;而对于加盟共和国来说,希望摆脱衰弱不堪但依然危险的中央,并开始自行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

俄罗斯内部也出现了相似的复杂进程。地方政权对中央的依赖关系彻底地削弱了。从这个时候起,中央成了产生不愉快和麻烦的根源,而不是恩惠的来源了。党的机关开始出现的人事动荡,使人们不由地回想起尼·谢·赫鲁晓夫“唯意志论的年代”。1986—1989年,在俄罗斯,区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更换了82.2%,而州委书记、边疆区区委书记和共和国党委书记被更换了90.8%。<sup>2</sup>

到这个时候,被解职的官员们已经不将这件事看成是悲剧了。这些人眼睁睁地看着独立于中央的政权——金钱政权建立起来了,而在这个政权下,他们已经给自己准备好了位置。1988年5月,《合作组织法》被通过。其结果是出现了商业银行制度。1989年1月1日,商业银行有41家,到了1989年7月1日,商业银行的数量达到了143家,而到了1991年中,商业银行的数量达到了1500家。许多银行是在大的工厂企业的名下成立的,在许多情况下,建立商业银行的倡导者就是党的机关。

国有财产和党的财产开始实行股份制。各州党委纷纷申请对印刷厂、高级党校驻地、出版社和汽车运输企业实行股份制度,苏共中央及中央事务管理局对此应接不暇。全国到处都出现了将党的资金大规模地投入商业银行的风潮。“新俄罗斯人”在更大程度上是依靠旧的官职才形成的。而他们也已经知道,今后将不能再依靠苏共中央书记处的决议生活了。

政权的最高层发生了分裂。

在米·谢·戈尔巴乔夫的挑动下,鲍里斯·叶利钦退出了权力机

关,给这个政权提供了另外的选择,也使广大的居民产生了新的希望,而这一次,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叶利钦的身上,他是与无所作为的制度作斗争的斗士。鲍里斯·叶利钦广泛利用了党的锈迹斑斑的武器——社会平民主义,呼吁实现社会平等。在一定的情况下,叶利钦的行动具有反对官员的性质,这使他变成了国内家喻户晓的著名人物。

叶·库·利加乔夫与亚·尼·雅科夫列夫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其外在表现是 H. 安德烈耶娃在《苏维埃俄罗斯报》上发表的文章和《真理报》对这篇文章的修改。而这一冲突并非两位政治局委员之间的一般争吵。这可是“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内 600 个用户之间的又一次分裂。后来,这种冲突数量越来越多,将最高权力层分裂成了互相对抗的两个集团,它们已经无法推行任何一项协调一致的政策。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和苏联最高苏维埃运作中完全暴露出来的民族反对派运动,也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出现了。1990 年,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工作开始了。1990 年春,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工作第一次举行。鲍里斯·叶利钦成了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在第一届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上,人民代表们以相当大的多数票通过了俄罗斯联邦主权宣言。主权宣言被通过一个月后,在苏共二十八大上,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鲍·叶利钦宣布退出苏联共产党。下一步的政治发展方向也就这样确定了:独立的俄罗斯没有共产党政权。

苏联民众的失望情绪,苏维埃社会独特的社会思想危机,也产生了同样重要的作用。人们对“光明未来”的希望破灭了,许多年来,这一希望是苏维埃制度政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喋喋不休的“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刺激人们做出比较和对比。如果说过去的“个别缺点”能够用战争后果和“帝国主义封锁”来解释的话,那么对于战后的一代人来说,旧的论点也就失去了说服力,因为产生了新的问题与新的对比。

最高权力层与绝大多数国民越来越疏远。苏联社会的单一性,不仅仅是口头上宣布的,而且,也是由于前面所讲的原因而在相当程度上



实现了的。这种单一性具有危险的政治潜力。在出现危机的情况下，这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反对当局”。鲍·叶利钦以罕见的高得票率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谜底也就在这里，当时，他获得了莫斯科民众 89% 的支持率。而政权本身也失去了其在 80 年时间里的垄断地位。

民众对当局普遍感到不满，而当局又无力采取反击行动（联盟中央只是在 1991 年 1 月波罗的海沿岸各加盟共和国发生的事件中、1991 年 8 月在莫斯科发生的事件中采取了反击行动。而苏联的垮台加剧了高加索地区、摩尔达维亚和中亚地区数十年来暗存着的分立主义倾向和民族冲突，那是另一回事。）由于这两种因素的结合，苏联垮台的多幕悲剧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sup>3</sup>而这场悲剧的序幕是一些加盟共和国所通过的主权宣言：格鲁吉亚于 1990 年 3 月 9 日通过主权宣言，立陶宛——3 月 11 日，爱沙尼亚——3 月 30 日，拉脱维亚——5 月 4 日，俄罗斯——6 月 12 日，乌兹别克斯坦——6 月 20 日，摩尔达维亚——6 月 23 日，乌克兰——7 月 16 日，白俄罗斯——7 月 27 日。

接下来就是“八月叛乱”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联盟中央威信扫地，此前达成的关于签署联盟条约的协议被废弃。

最后，乌克兰举行的关于退出苏联的全民公决和别洛维日协定，成了危机的最后一个阶段。别洛维日协定绝不是苏联样式的国家制度停止存在的原因。一个在其大部分历史中以独特的、高度中央集权形式存在的国家的覆灭，是政权危机中经济、政治和社会思想因素雪崩似增长的后果。

对于苏联来说，20 世纪是从一个帝国的灭亡开始的；而世纪之末，以苏联从世界地理版图上消失为标志。

苏联于 1922 年 12 月 30 日成立，1991 年 12 月 25 日停止存在。俄罗斯依然存在。在其多个世纪的历史中，在再次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结构形式后，俄罗斯依然是俄罗斯，但它也发生了变化，因为它在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 exist 了 69 年，在布尔什维克党的政权下 exist 了 74 年。

俄罗斯的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

## 注 释

- 1 См. : Материалы делегату XXVI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М. ,1990. С. 16.
- 2 См. там же. С. 18,20.
- 3 联盟中央的对抗行动仅在 1991 年 1 月发生在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加盟共和国和 1991 年 8 月发生在莫斯科的事件中才可以明显觉察到。至于说苏联的崩溃加剧了高加索、摩尔达维亚和中亚地区长达几十年的分离主义倾向和民族冲突,则是另外一回事。

## 再版的话

我从1992年3月开始动笔写这本书,1996年脱稿。选中这个课题完全出自作为历史学家的我的一种自然而然的愿望:试图搞清楚我们国家在20世纪末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为什么苏联停止存在,为什么它在短短的几个月中化为乌有。苏联解体以后,世界秩序开始发生变化,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那种政治结构再也不复存在,世界历史的一个阶段结束了,我们有幸成为这一事件的见证者。毫无疑问,苏联解体和苏联政权崩溃将成为今后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我国和世界各国历史学家研究的主要课题。

写这本书的另一个动因是个人兴趣。这本书基本上是在我主持俄罗斯档案工作期间写的,作为俄罗斯国家档案馆(俄罗斯最大的国家档案馆)的领导人,我有幸在五年的工作时间内(1990年至1996年初)“近水楼台先得月”,对处在我国历史转折时期和危机阶段(诚然,在这五年中也有不少危机!)的苏联政权的活动进行研究。直截了当和更准确地说,我有幸亲眼目睹苏联、苏联共产党及其一些重要机构如何消亡,亲自见证(或者亲身参与)了新制度的诞生和十月革命前的国家体制旧传统的恢复<sup>1</sup>。

不能不发人深思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今天的发展选择要对照昨

天“削足适履”，而且往往被推到明天付诸实施。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这是怎样形成的？由谁造成的？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忽然产生了一种使我感到后怕的想法：具体的历史进程如此丰富多彩，绝非仅限于我所援引的这些历史资料，也不是档案夹和图书馆的图书目录所能容纳的。某一个执政人物或者某些社会人群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情绪和思维，取决于人的世界观，受教育的程度和特点，取决于社会对他们的期望值 and 个人的奢望。总而言之，往往取决文献资料中所没有的那些东西。任何分析研究人员，任何机关工作人员或者执政者“周围的人”，任何官方权力机关都不能取代确定“执政者”（包括任何一个人）行为的“补充性原则”<sup>2</sup>。

除了职业化的历史研究方式和方法以外，这种难以觉察的自我意识也是认识过去和现在、洞察“历史精神”和历史的内在含义的一种手段。当代历史学家、置身于他所研究的历史进程之中的历史学家（无论他以这一进程的何种身份出现），往往被指责抱有成见——这种指责是公正的<sup>3</sup>，因为他不得不违背古希腊历史学家的金科玉律——不怀愤恨和不带偏见地看待过去。所幸的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反映他所了解的真实情况<sup>4</sup>，利用他所处时代特有的历史研究方法，用职业历史学家所掌握的知识，对当代人——事件参加者刚刚具有的认识给予补充。

639

本书是把我自己所掌握的历史研究方法同作为一个“政权过来人”的我的观察和认识相结合的一次尝试。这里必须指出的是，由于“档案馆对外开放”和大量重要文件进入科学研究流通领域，才使我有机会进行比较、思考和从中得出结论，有机会把过去的那些美好愿望同这些愿望的实现情况进行对照。

本书于1998年由俄罗斯国家职务研究院出版，问世后引起了一定的关注，学术刊物和媒体上<sup>5</sup>的评论和职业界的争论证明了这一点。大家的意见主要涉及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对史料研究的评价。

第二个问题是对书中涉及问题所依据的文献资料的评价。

所以,我想在“再版的话”中主要讲这两个问题。

首先我想指出,史料研究的情况与能否得到和能否研究文献资料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依赖性和相互制约性。

我还想指出,研究俄罗斯历史使我不得不得出一个结论:历史进程不仅具有继承性和连续性,而且具有间断性和不连续性。这种间断性和不连续性要么是革命事件造成的,要么是试图使下一个阶段的历史成为“空白页”的政治趋势造成的<sup>6</sup>。研究战后苏联的政权史不能不考虑到这种间断性以及不同的时期在克服这种间断性方面所作的尝试。因此,在史料研究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根本不指望史料完整性的“历史插曲”。

## 关于史料研究

《新世界》的建设者们向来不太重视从我国的历史中吸取“有益的教训”。与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一道被誉为教育理论家的尼·伊·布哈林,在他的一篇题为《共产党员在生产领域的主要任务》的文章中指出,共产党员只要了解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和历史唯物主义就足够了。他写道:“因此,不能提出存在某些不可逾越的永恒的文化价值的问题……当然,许多人会说,这是从文化的观点向文明的观点转变……不过,我觉得,为了确保共产主义取得胜利,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观点向文明的观点转变。”<sup>7</sup>

640 急于“从文化的观点向文明的观点转变”的苏联文化革命的缔造者们,甚至还打算废除俄文字母的基础——基立尔字母,改为使用拉丁文字母。这种“世界革命”的思想得到了时任苏联教育人民委员的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的赞同,他在1930年说:“俄文字母不仅使我们远离西方,而且使我们远离东方……”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从20年代末开始加紧实现改用拉丁文字母的事业<sup>8</sup>,教育人民委员部下属的科研机构、博物馆和艺术部门管理总局成立了一个俄文字体拉丁化工作小



组,宣布俄文字母是“18—19世纪俄国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书写法的残余”。<sup>9</sup>

时任苏联副教育人民委员的米·尼·波克罗夫斯基说:“我们终于明白(不过晚了点),所谓‘俄国历史’就是一个反革命的口号加上一面三色旗和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国家’。”他的话得到了布哈林和卢那察尔斯基的附和。<sup>10</sup>

波克罗夫斯基还写道:“那种把俄国历史的含义归结为建立一个被称之为俄罗斯帝国的庞大国家的理论……一经出现就已经陈旧……”<sup>11</sup>

由此可见,他们不仅要抹掉关于俄罗斯过去的记忆,而且要把历史研究的方法斩尽杀绝。联共(布)中央书记约·维·斯大林本人也研究过历史科学问题,他在写给《无产阶级革命》杂志编辑部的一封信题为《关于布尔什维主义历史的某些问题》的信中,对一位名叫斯卢茨基的人的观点进行了反驳。斯卢茨基认为,“还没有找到足够的文献资料可以证明列宁(布尔什维克们)同中派主义进行过坚决的、不妥协的斗争”。斯大林认为,“他(指斯卢茨基——作者)是在利用官僚主义的论题作为无法反驳的论据……”让斯大林大为不满的是,该杂志编辑部居然还开展讨论,“反对这种胡说八道和吹毛求疵,这有什么好讨论的呢?难道斯卢茨基试图通过谈论文献资料以掩盖他的无知和欺骗性还不明显吗……他需要什么样的文献资料……除了啃档案的老鼠以外,谁都知道,检验一个政党和党的领袖人物首先要看他们的行动,而不能只看他们的宣言。”<sup>12</sup>

后来,党的领袖们对我国文化和历史学的态度逐渐有所改变。在1930年初,在集体化达到最高潮和农民的不满情绪大量流露的情况下,联共(布)中央不得不放弃改用拉丁字母的计划。1934年,在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和我国的外交形势复杂化以后,斯大林、基洛夫和日丹诺夫抛出了《对苏联历史教科书提纲的若干意见》,要求教科书的编写者必须阐述今天的苏联和苏联境内过去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继承性,阐述我国发生革命的合理性。党的领袖们写道:“我们需要的

641

是说明大俄罗斯的历史不脱离苏联其他各民族历史的苏联历史教科书……”<sup>13</sup>

祖国的历史被纳入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轨道。所以,布哈林和波克罗夫斯基原先的那种贬低俄罗斯历史的态度受到了党的谴责。<sup>14</sup>

至于说到研究苏联的最新历史、研究当代历史,则是另一回事。像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那样采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样的方法有悖于党的“方针”。1938年出版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被视为该书的作者)<sup>15</sup>成为经党的最高领导人赞同的解释和认识不久前历史的基本“方针”。1938年11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与出版〈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有关的党的宣传工作安排的决定》,要求“……加强党对党史编写工作的统一领导,对联共(布)历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问题的解释必须置于联共(布)的监督之下,不允许任何随意解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问世将使以前出版的一系列党史教科书在介绍党的历史和解释重要的党的理论和历史问题中出现的随心所欲和观点混乱的现象一去不复返。”<sup>16</sup>

后来,苏共中央把这种“官方解释权”进一步据为己有,规定未经克里姆林宫和老广场的同意,不得对执政党和国家的历史进行有别于官方的解释。

战前规定的这一方针始终未变,战争、二十大和所有的改革都没有使这一方针受到任何触动。所不同的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地位被《苏联共产党历史》取而代之。《苏联共产党历史》由苏共中央国际部部长鲍·尼·波诺马廖夫主持编写<sup>17</sup>,此后不久他就升任苏共中央书记。他主持编写的这本党史受到了苏共中央的表扬,并被推荐作为党史教材使用。出版党的文件必须经过党的最高机关批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出版的《苏共中央通报》上,刊载每一份文件都必须预先征得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B. И. 博尔金和政治局委员亚·尼·雅科夫列夫的同意。

研究战后时期国家历史的历史学家被剥夺了接触重要文件<sup>18</sup>的权

利,他们不仅无权阅读这些文件,而且被限定只能利用明显不可信的、属于苏共领导人报告中的“历史插曲”的那些文献资料。

试举几个例子说明当时的史料研究状况。例如,在1961年10月召开苏共二十二大期间,赫鲁晓夫在致闭幕词时详细讲述并提请代表们回忆1957年六月中央全会和同所谓的“反党集团”进行斗争的情况。赫鲁晓夫说:“稍后,在195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对前国防部长朱可夫走冒险主义道路的企图进行了坚决反击……党抛弃了这些派别活动分子、阴谋家和追求个人名利地位的人后,反而更加团结……”<sup>19</sup>可见,除了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以外,朱可夫也被视为赫鲁晓夫的政敌。 642

实际上,正是朱可夫的积极支持和他在1957年夏天以动用军队相威胁才挽救了赫鲁晓夫。朱可夫在中央全会上针对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卡冈诺维奇的令人信服和言辞尖锐的发言保护了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在二十大上的报告”是最大的一次造假事件。那份反斯大林的报告实际上是代表大会结束后向代表们宣读的一份材料<sup>20</sup>。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历史学家们所拥有的史料当然只剩下反映国家日常生活的中央级和地方一级的报刊、地方权力机关和工厂企业的档案材料以及各种各样的经济统计数字。此外,他们可以利用社会学研究的成果和口头讲述的事件。但是,所有这一切要求历史学家具备另一种职业素质,它有别于研究苏共和苏联社会所必须具备的那种“本领”。<sup>21</sup>

研究苏联时期的历史并非仅属于人文科学范畴,按照当时的行话讲,它还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因此,研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时期的历史成了党意识形态活动的一种特殊形式。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在这里当然完全不适用。

在被视为苏联历史学家“指南”的出版物——《苏联历史科学史论》中,对史料研究是这样下定义的:“史料研究是一门研究人类社会史、历史研究方法完善史、各种流派在解释社会现象、反映阶级斗

争领域的斗争史、揭示历史发展规律史、马克思列宁主义史学战胜伪科学的历史的科学。”<sup>22</sup>

研究过我国史学现状的 A. A. 西多罗娃指出：“‘党性原则’被称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性原则”，西多罗娃援引《苏联历史科学史论》中的一段话继续写道：“它与资产阶级学者关于科学的‘公正性’和‘客观性’的伪善说法相对立。”史料研究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阶级斗争的反映，“苏联的史料研究不是追求客观性，不是从确定某些历史现象出发，而是从气势汹汹和唯我独尊的党性出发。”<sup>23</sup>

643 在介绍苏联现代史时，只要遵照党机关的指示、遵守“意识形态纪律”，就可以平安无事和有利可图。许多个人和集体编写的著作就是这样写出来的，我不打算一一列举这些作者的名字。读了这些著作后只会让我陷入深思：这些绘声绘色、貌似科学、引经据典、图文并茂的著作究竟说的是哪一个国家？反正不是我居住的这个国家。

这种“遵命科学”的状况不可能不引起职业历史学家的不满。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历史学家们曾经寄希望于苏共中央发善心，满以为“二十大精神”将有助于档案材料公开<sup>24</sup>，其结果众所周知。1962年11月13日，苏共中央秘书处查封了《历史档案》杂志（该杂志从1961年起停刊）。<sup>25</sup>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有人冒险进行了一次尝试——诉诸社会公论。历史学家 C. И. 雅库鲍夫斯基和 B. П. 丹尼洛夫给《新世界》杂志寄去了一篇题为《关于历史学中避而不谈的人物》的文章。《新世界》杂志的主编亚·特·特瓦尔多夫斯基认为，“这是个很重要和应该讲的问题，我同意发表……”<sup>26</sup>然而，这篇文章并没有发表，它被新闻检察机关扣下了。

报刊事务委员会主席 H. 米哈伊尔在呈送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写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正确指出了在个人崇拜年代阐述苏联社会和苏联共产党的历史时存在的某些缺点。但是他们断言，无论过去或现在都存在着妨碍研究历史真实情况的外部原因，其中最为严重的是不让提到某些人物，例如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一些著名的革命家……

这篇文章的作者认为,这种做法使国内战争史内容贫乏,对研究党的代表大会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工作具有破坏性的后果。”

H. 米哈伊洛夫在详细介绍和分析这篇文章的内容后指出,“B. П. 丹尼洛夫和 С. И. 雅库鲍夫斯基试图证明,学术著作、文学和艺术作品中避而不谈某些人物的现象具有一定的政治基础。他们认为,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中长期以来‘两种真理’的理论占主宰地位,为避而不谈某些人物的现象奠定了基础……这种现象不仅过去有,现在也有。

作者在文章的结束部分试图证明,苏联历史学的状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妨碍‘年轻的一代和全体人民’了解真相、信任和尊重党和苏联社会的历史。”<sup>27</sup>

B. П. 丹尼洛夫和 С. И. 雅库鲍夫斯基用“避而不谈”这几个字给苏联的史料研究下了一个最准确、最富有思想的定义。苏联史料研究的这一特征一直保留到苏联共产党存在的最后一些日子,例如,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长格·斯米尔诺夫 1990 年 12 月向上级报告说,归他管辖的某个机构有大量从未发表过的列宁的著作。他提示说: 644

“至于说到弗·伊·列宁作为国家领导人从事具体政治活动的文献,其中一些文献如果将其公布于世,在目前的社会政治形势下可能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例如,某些文献的内容可能被解释为鼓励对某些国家——印度、朝鲜、阿富汗、英国、波斯湾地区、土耳其、希腊等使用暴力……”

斯米尔诺夫认为:“目前公布这一类文献不合适”。

由此可见,即便在公开性时期,“避而不谈”的现象依然存在。

走出这条史料研究死胡同的途径不是掩盖某些“空白点”<sup>28</sup>,不是苏共中央 1987 年十月全会的“历史性报告”或者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的宣传提纲<sup>29</sup>,不是呼吁回到“列宁提出的非暂时性要求”<sup>30</sup>上来,不是发表各种文章和出版文集<sup>31</sup>,不是重编历史神话<sup>32</sup>,而是对文献资料进行认真的大规模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尤其是 90 年代下半期,我国的史料研究危机得



## 关于文献资料

到了极其有效和迅速克服。史学摆脱了它所不应该具有的“意识形态辩解”功能,摈弃了对待历史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出现了一系列不带意识形态色彩和根据最新资料编写的学术专著和历史研究著作。<sup>33</sup>

作者认为,20世纪头几十年形成的我国近代史研究的“脱节现象”在20世纪末开始得到克服。

战后,苏联的档案馆扮演了当局所需要的“潘多拉盒子”的危险角色。1952年6月21日,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sup>34</sup>局长B.斯特罗夫颁发了《关于公开出版物介绍国家档案馆的组成、活动和馆藏的程序》的秘密通令,谴责在出版物上披露“……档案馆文献资料的数量和国家档案馆的组成情况……有些档案馆委托不是档案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撰写关于国家档案的文章,使这些人了解到档案馆的详细情况……”<sup>35</sup>

在当局看来,不需要的、不重要的或者有危险性的档案材料都应该销毁。20—30年代令人忧伤的“收废纸运动”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再度兴起。1945年被销毁的档案共计870万件,1950年为3070万件,1955年为6810万件,1957年为8710万件,1959年为8780万件。<sup>36</sup>为了说明被销毁档案的数量之多,作者想提请读者注意,到80年代末,俄罗斯联邦档案总局下属的所有档案一共只有9000多万件档案。

苏共中央不断加大对文献资料的监督力度。苏共中央秘书处1966年12月28日批准的《苏联共产党档案馆藏管理条例》规定:

“——党的档案馆保存的苏联共产党的文献资料通常只供苏共党员查阅,且事先须经相关党的机关许可;

……

——中央党的档案馆存放的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弗·伊·列宁的文献以及未曾公布的苏共中央和与苏共中央有联系的国际组织的文献资料属于特别重要的档案,调阅这些档案须经中央档案馆领导人批准,并且必须事先征得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院务委员会的同意,必

要时须征得苏共中央同意。”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70年批准的《州、边疆区、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分院党的档案馆工作基本条例》规定：

“——允许党员、候补党员、共青团员以及相关组织和机构的无党派人士在党的档案馆里从事研究工作……共青团员和无党派人士(学者、作家、档案工作人员)通常只许他们接触非党内的馆藏档案；

……

——不向研究人员提供未发表过的弗·伊·列宁的文献、中央(全联盟)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决议；特殊公文，清党委员会记录；接纳党员和干部登记的档案，共产党员的个人档案，与国防有关材料，有关伟大卫国战争年代党团组织从事地下活动的文件，以及其他如果公开可能有损于党和国家利益的秘密文献。”

646

在《苏共中央机关文件使用守则》(苏共中央秘书处1989年9月12日批准)、《加盟共和国、边疆区、州党机关文件使用守则》(苏共中央秘书处1989年6月19日批准)、《自治区、市和区党机关文件使用守则》(苏共中央秘书处1989年7月19日批准)中，国家秘密和党的秘密这两个概念被等同视之。所以，“在含有党和国家秘密的苏共中央文件的封面上应该按照秘密等级分别印上‘秘密’、‘绝密’、‘特别重要’字样。在需要特殊对待或限制阅读范围的文件上应标明‘特殊公文’或‘仅供个人’字样。”

公开苏共中央的决议只能由苏共中央公共部批准，并且必须征得苏共中央书记同意。苏共中央工作人员接触印有“特别重要”或“特殊公文”字样的文件必须经过苏共中央书记和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的批准。

《苏共中央机关文件使用守则》规定，“苏共中央各个部保管的文件不得超过五年，之后送交苏共中央公共部统一存放”。

苏共中央秘书处日常使用的公文存放在苏共中央公共部第七处(苏共中央秘书处档案室)；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文件存放在苏共中央公共部第六处(又称政治局档案室)。这两个档案室非同寻常，可以

毫不夸张地说,知道有这两个档案室的人为数不多。

在莫斯科普希金大街上有一座用白色大理石建造的建筑物,建筑物的正面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浮雕像,这里是中央党的档案馆所在地。在该档案馆有史以来第一次印发的档案馆指南中小心翼翼地写道:“就活动性质和存放文件的种类而言,中央党的档案馆是苏联共产党的科学和历史档案馆”。<sup>37</sup>该档案馆存有共产国际的重要文献、欧洲社会主义思想史文献以及党的活动家的个人文献资料。

反映苏共中央日常活动的文献资料一般不送交中央党的档案馆存放。<sup>38</sup>

647 不仅在斯大林时期,在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保守秘密和“充分认识工作的机密性”<sup>39</sup>也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必须遵守的一项要求。“充分认识工作的机密性”是多年担任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后任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康·乌·契尔年科提出的一项要求,他对苏共中央公共部第六处(政治局档案室)的工作性质有过详尽的说明:“第六处应有尽有。但是,没有领导人的相关指示,它不向任何人提供任何档案。”<sup>40</sup>这里所说的领导人是指通过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传达自己意愿的苏共中央总书记。

地方党组织规定,带有“特别重要”、“特殊公文”字样的文件由地方党委确定存放期限,之后仍由地方党委决定是否送交党的档案馆或者按规定销毁。密件、手稿、带有“特殊公文”字样的材料须放入加上铅封(印封)的废纸箱内等待销毁,其他文件用切纸机销毁。

按照规定,只有非机要文件方可按规定程序移交地方党的档案馆存放。

如同国家档案馆的馆藏一样,党的档案馆的馆藏也遭到了“彻底清理”。20世纪60—70年代,被清理销毁的党的档案超过2500万件,其中包括:党委收到的业务文件,苏共中央候补委员的档案,党员个人档案<sup>41</sup>(到1991年,苏联共产党档案的总馆藏量不到8000万件)。

据作者观察,除了这些被统一清理销毁的档案以外,还单独有选择地销毁过一些重要的文献资料,斯大林本人就干过这种事(请读者注

意,斯大林曾经指示设立“私人档案室”,其目的显然不是让别人能够利用他的文件)。斯大林死后不久,3月5日,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常委马上“委托马林科夫、贝利亚和赫鲁晓夫同志采取措施,整理斯大林同志使用和存放的文件和公文”,这并非偶然。<sup>42</sup>

尼·谢·赫鲁晓夫想方设法不让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插手“整理”约·维·斯大林的文件和公文,因为他担心涉及他本人和50年代初的一些文件落入他人手中。作者听说,斯大林死后,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办公室中的许多由第六处保管的档案被投入赫鲁晓夫别墅的壁炉内焚烧。

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曾经专门作出了一项决定:销毁所有涉及监视苏联高级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文件。稍后,1957年召开的一次中央全会指责马林科夫说,他的助手苏哈诺夫仍然存有诋毁高级军事将领的材料。<sup>43</sup> 648

此后又有过大规模“清理”档案的尝试。1991年3月23日,苏共中央秘书处作出了《关于妥善存放苏联共产党档案文件的某些问题的决定》,但是这份文件说的却是另外一件事——关于销毁部分文件的必要性。

决定中说:“最近,反共和反苏势力窃取党的档案和以破坏为目的利用苏联共产党文件的危险性加大。因此,目前应采取措施保护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乌克兰西部一些州的党的档案资料。但是,有必要采取更大规模的行动,确保苏联共产党档案馆的安全。”

根据苏联共产党档案馆藏条例,“……为了改善档案存放条件,确保文件的存放、登记和使用,建议对1946—1985年期间的馆藏文件的价值进行一次全面鉴定,查明不需要长期存放的文件……其中包括接纳党员的档案,领导干部登记材料,党员受处分的档案,以及党委日常收到的一般性文件。

为了开展这项工作,各档案馆应该成立鉴定和检查小组,写出鉴定报告……

请各加盟共和国、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党委向各档案馆提供必要帮

助,尽快成立鉴定和检查小组,把重要文件移交苏共中央档案馆统一保存,对不需要长期存放的文件予以合理销毁。

允许各地党委在特殊情况下(档案文件的安全面临威胁时)作出关闭档案馆的决定和采取其他相应的措施。”

“清理”工作开始了,报刊上反对销毁文件<sup>44</sup>的声音被置之不理。64个共和国、边疆区、州完成了档案鉴定任务,需要销毁的档案6569062件,实际销毁2324213件。

1991年8月24日,俄罗斯总统颁发了《关于党的档案馆的总统令》,要求马上停止销毁文件,并把重要档案移交俄罗斯档案局。

综上所述,苏共中央一开始不允许对党和国家的历史进行任何有别于官方的解释,后来则干脆把那些比较重要的国家档案馆全部关闭,<sup>45</sup>其结果是,将近20%的国家档案馆和超过90%的党的档案馆“谢绝入内”,那些有关党的最高机关活动的文件从来不公开。

649

\*

\*

\*

1991年8月事件为研究我国的历史开辟了新局面。这是因为:

第一,这些事件意味着苏共退出了国家管理领域,意味着意识形态控制和史料研究的操纵手段不复存在。

第二,这些事件导致苏共的文件被移交国家管理,党的大量档案归属国家档案局(不归国家档案局管辖的档案下面将另外介绍)。

第三,俄罗斯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为档案事业立法。

第四,在俄罗斯有史以来首次实行民主变革的情况下,公开文献资料成为档案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当局第一次面临如何满足公众对公开档案的要求。

1991年8月23日,位于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大楼内的所有档案室均被查封和派人守卫。8月24日,根据总统令把苏共的所有档案移交俄罗斯档案局管辖。在中央委员会大楼内共发现47个档案室,每个档案室存放的档案为几百件到几万件不等。此外还发现了大量日常使用的公文,这些公文被捆成18000捆。大楼内最大的档案室是苏共中央秘书处档案室——所谓的苏共中央公共部第七处。



该档案室存有：

- 苏共中央机关、苏共中央各个部、苏共中央办公厅、党的监督委员会和苏共中央公共部第七处日常使用的参考材料；
- 1952年到苏共十九大的苏共中央秘书处文件；
- 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文件；
- 党的监督委员会的档案；
- 领导干部考察处的档案；
- 苏共中央意识形态、文化和国际联络事务委员会的档案；
- 俄罗斯联邦苏共中央委员会档案；
- 有关代表团和某些人出国的资料；
- 1919—1991年人事卡片索引；1976—1990年苏共中央秘书处决议卡片索引，等等。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中央党的档案馆被改为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现更名为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sup>46</sup>

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室（即所谓的第六处档案室）的命运更为复杂<sup>47</sup>，从1990年起它成为苏联总统档案馆。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俄罗斯总统1991年8月24日颁发的总统令对该档案馆不具有效力。 650

从1992年初起，该档案馆归属俄罗斯总统。也是在那个时候，俄罗斯档案馆向总统提出了把该档案馆的档案移交国家档案馆的建议。

总统对这一建议原则上表示赞同。从那个时候起到90年代末，该档案馆的历史档案被逐步移交国家档案局的下属机构。

其中移交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的档案包括：

- 俄共（布）和联共（布）中央代表大会和全体会议的文献；
- 联共（布）和俄共（布）中央常设委员会的文献，联共（布）中央会议的材料（从1921年到1952年10月）；
- 苏联国防委员会的正本文件（1941—1945年）；
- 个人档案，其中包括谢·雅·阿利卢耶夫、安·安·安德烈耶夫、格·康·奥尔忠尼启则、扬·埃·鲁祖达克、亚·谢·斯瓦尼泽、

约·维·斯大林、Я. З. 苏里茨、М. И. 乌里扬诺娃、Г. В. 奇切林、Ш. З. 埃利亚瓦、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Н. И. 叶若夫、尼·伊·布哈林、Г. Е. 季诺维也夫、Л. Б. 加米涅夫、Г. Я. 索科利尼科夫、А. И. 李可夫、列·达·托洛茨基、Р. В. 马利诺夫斯基的个人档案；

移交现代文献保存中心的档案有：

——苏共代表大会和苏共中央全会(从苏共十九大起)的档案；

——国际会议和与各国共产党、工人党谈判(从1956年起)的记录；

——政治局会议记录和有关材料；

——克·叶·伏罗希洛夫、阿·伊·米高扬、尼·谢·赫鲁晓夫、安·亚·维辛斯基、拉·莫·卡冈诺维奇、格·马·马林科夫、维·米·莫洛托夫、格·康·朱可夫、安·安·格列奇科、尼·米·什维尔尼克、列·伊·勃列日涅夫、米·安·苏斯洛夫、尤·弗·安德罗波夫、米·谢·戈尔巴乔夫、阿·雅·佩尔谢的个人档案。

苏联共产党、国家安全委员会、苏联最高苏维埃、俄罗斯联邦、许多部和工业企业的文献移交国家保存,这在20世纪的历史上尚属首次,国家保存的档案数量因此增加了两倍。1992—1993年,移交国家保存的苏共档案7400万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60多万件、已被取消的部和部门的档案将近40万件,此外还有大量前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文献。如果说到1991年年中国家保存的档案为9300万件,那么到1992年则增至2.04亿件。目前,国家档案局下属各机构的馆藏总量为2.5亿件。

651 在“8月后的俄罗斯”,档案资料的公开过程经历了几个阶段。在1991年底到1992年为公众、报刊、历史学家和法律工作者“攻打档案馆”阶段。一些过去不能接触的档案被利用和公开引起了巨大国际反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要求开放档案馆和指责不让接触秘密档案的文章。

但是,取消限制接触档案的工作困难重重。档案工作者有一段时间处在两难的境地,他们既要想方设法满足公众要求,公开一些以前被

视为秘密的材料,又要遵循原先的规定,实行必要的限制。但是,无论他们怎么做都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批评。<sup>48</sup>

1992年,根据当时的法律公开档案的工作受到了一些政界人物的尖锐批评。在宪法法院就“苏联共产党案”<sup>49</sup>举行辩论的过程中,有人指责公开档案不合法,这一意见得到了左派报纸的广泛支持。另一方面,以B.布科夫斯基<sup>50</sup>、Ю. А.阿法纳西耶夫为首的右翼激进分子和部分报纸则要求立即公开所有档案。

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声音,公开档案的工作还是取得了巨大进展,出现了系统公布文献资料的可能性。从1992年起,一些档案定期出版物、如《历史档案》、《文献资料》杂志开始问世。许多档案馆开始大量发行自己的出版物,有的档案馆开始同俄罗斯和外国学术机构<sup>51</sup>实现合作出版项目。档案馆藏简介的出现是档案事业变革的重要成果。<sup>52</sup>

在最初的一些文献资料汇编出现之前,已有大量的回忆录作品问世。阿·伊·米高扬的回忆录<sup>53</sup>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况,格·康·朱可夫关于50年代事件<sup>54</sup>的回忆提供了以前鲜为人知的重要事实。但是,回忆录作者的主力军是一些80—90年代的政治家,《一号自动电话系统用户名册》中的许多政界大人物都有回忆录面世,没有写回忆录只有个别政治局委员、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总书记助手和贴身警卫以及外交部长。米·谢·戈尔巴乔夫、鲍·尼·叶利钦、维·伊·沃罗特尼科夫、亚·尼·雅科夫列夫、阿·伊·卢基扬诺夫、奥·谢·舍宁、弗·亚·克留奇科夫、B. И. 博尔金、B. B. 法林、阿·伊·多勃雷宁、O. A. 格里涅夫斯基、安·米·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阿·谢·切尔尼亚耶夫、B. 普里贝特科夫等人都写了回忆录,他们每个人都想通过写回忆录阐述自己的历史作用,并力求利用别人的回忆录和已公开的个人档案资料予以证实。 652

随着档案资料的逐步公开,出现了对这些回忆录作者的叙述进行验证、对那些把历史进程“人性化”的活动家描绘的历史画面进行补充的可能性。

被 E. Ю. 祖布科娃称谓“儿童图书”的领袖子女回忆录的面世堪称史无前例,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包括斯大林、赫鲁晓夫、贝利亚和马林科夫的子女。<sup>55</sup>

我在 1992 年动笔写这本书时再次感到我国的史料研究现状尚不尽如人意,缺少足够的可依据的文献资料。我国大部分有关文献资料的主要学术专著是在 1995 年以后才陆续问世的。<sup>56</sup>

未曾公布的苏共中央秘书处和政治局的文献成为我写这本书的主要文献依据,其中最重要的文献是康·乌·契尔年科担任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后从 1966 年开始记录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工作记录。它一开始由先后担任公共部部长的康·乌·契尔年科和克·米·博戈柳博夫负责记录,后来由职业速记员记录。

《工作记录》经打印后每季度或每个月(视会议次数和会议持续时间而定)用绿色装订布装订成册,A4 开本大小,厚 200—250 页,封面上标有“仅此一册”的字样。B. И. 博尔金任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后,《工作记录》的原文被用复印机复印后装订若干册,改为小开本深红色封面,每一册上仍标有“仅此一份”字样。公共部这样做的目的大概是为了使苏共高级领导人人手一册。

《工作记录》的优点是详细记录了政治局会议参加者的发言,有助于判断政治局通过一系列决议的程序。但是不要被它所迷惑,因为最重要、最重大的决策不是在政治局会议上作出的,而是在克里姆林宫邻近政治局会议室的那个所谓的“胡桃木房间”中作出的,那里通常只有政治局委员们才能进入,而公共部部长此时则在《工作记录》上写道:“该问题在胡桃木房间讨论,没有记录。”

少数领导人在克里姆林宫外,例如在克里米亚或莫斯科郊外别墅召开的会议没有被记录下来。1968 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决定就是在克里米亚作出的;1979 年 12 月在勃列日涅夫的别墅作出了出兵阿富汗的决定。

653 1954 到 1965 年任苏共中央公共部部长的 B. H. 马林所作的政治局会议简要记录堪称一绝,他经常使用大号卡片记录苏共中央主席团

会议的情况,不过,他只是在最重要的情况下采用这种记录方法。但是,多亏马林的简要记录,才使后人了解 1956 年波兰危机和匈牙利危机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发生的争论,了解 1964 年 10 月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讨论罢免赫鲁晓夫的详细经过。

说实话,报刊,特别是党报党刊是我利用的最重要资料。苏共中央机关出版物、如《共产党人》杂志、《经济问题》月刊、《真理报》、《苏维埃俄罗斯报》等,不仅刊载有各种动态信息、当前大家关注的事件和几个月后成为“谋反”起因的迫切问题,而且从中可以窥见最高领导层的不同意见和不同观点。在许多情况下,从报刊上可以捕捉到比党的决议中所说的更为详尽和更有理由的必须进行改革的根据。

这里我想举出两篇文章。一篇是 1962 年先发表在《经济问题》月刊上后发表在《真理报》上的 E. Г. 利伯曼的文章,它阐述了阿·尼·柯西金的未来改革构想;另一篇是历史学家 E. M. 茹科夫、B. Г. 特鲁哈诺夫斯基和 B. И. 顺科夫合写的文章,刊载在 1966 年 1 月的《真理报》上,该文的作者断言,我国不存在什么“个人崇拜时期”。在苏联报刊上,确实在长达 20 年时间里不再使用“个人崇拜时期”这一术语,但是当局从来没有打算重新审查“二十大决议”中使用的这种提法。

如果没有 1988—1991 年期间发生的以《莫斯科新闻》和《苏维埃文化报》为一方、以《苏维埃俄罗斯报》为另一方的众所周知的对抗,就未必能够理解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政治局的政治趋向。只有从《苏维埃俄罗斯报》上才能发现一系列说明苏共领导层中“正统派”所持立场的信息,才能获悉“联盟”议员团、俄共领导人、苏联最高苏维埃、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在 1990—1991 年准备采取的实际行动。

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今后可供研究战后苏联政权史的文献资料将大量增加,这首先是由于:

——保存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的苏联部长会议及其下属机构以及一系列部和部门的大量文献已被投入研究领域;<sup>57</sup>

——俄罗斯国家经济档案馆保存的重要经济文献资料已被开始研究;



——从总统档案馆移交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历史档案馆和俄罗斯国家现代史档案馆的大量文献已经公开；

——苏共中央全会和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的材料已经公开；

——有助于认识我国政治进程的苏共中央公共部的重要文献已被开始研究；

654 ——系统分析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决议的工作已经开始。

人们有理由寄希望于出现一些揭示最高领导层作出决策的动机的新文献，例如，找到像 B. H. 马林的简要记录一类的珍贵文献。

显而易见，深入研究政权问题有赖于对文献资料的综合分析，有赖于密切关注改进史料研究方法，<sup>58</sup>有赖于出现大量的研究文献的专著、馆藏介绍和档案材料汇编，有赖于使用科学的史料研究方法编写的现代史学术专著面世。

可以肯定地说，90年代在史料研究领域出现了新保守主义的观点，其实质是主张采用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和与现代文献研究进程相适应的经典的史料研究方法。<sup>59</sup>

作者认为，一些有关俄罗斯20世纪历史的教科书陆续问世是我国史料研究危机得到成功克服的最好证明。<sup>60</sup>这些教科书是根据新的文献资料编写的，同时考虑到了近十年来史学领域出现的新动向。

遗憾的是，不少学术著作是在本书完稿后面世的。我在本书再版的准备工作中没有利用这些学术著作的打算，因为那样有可能使我不得不对这本书的结构进行重大改变。

## 注 释

- 1 例如,我参加过 1991 年俄罗斯总统就职程序的筹备工作。1991 年 8 月主持过苏共中央文件的接收工作。担任过俄罗斯国徽设计小组的领导人。作为俄罗斯总统的特使携带有关卡廷事件的文献资料晋见波兰总统莱·瓦文萨。为审理“苏联共产党案”的宪法法院起草过文件。参加过制定俄罗斯历史上的第一部档案法。
- 2 См. : Бор Н. Атомная физика и человеческое познание. М. , 1961.
- 3 我大学时代的老师 М. Я. 休久莫夫教授在 60 年代说,十二月党人起义后写的所有关于俄罗斯历史的书都不能算是历史研究著作,而只能算作定期出版物……依我看,他这样说不仅恰到好处,而且符合认识论。
- 4 Напрашивается аналогия со спором двух ученых людей, причастных к власти, спором, из которого вышли вс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второй половины XVI в. , — с перепиской Ивана Грозного с Андреем Курбским.
- 5 Данилова Е. Рец. : Рудольф Пихоя.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М. , 1998 // Профиль. 1998. № 43. 23 ноября. С. 73; Блажнова Е. История и власть. Рец. на кн. : Пихоя Р. СССР: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М. , 1998 // Книж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1998. 1 декабря; Разуваев В. Рец. : Пихоя 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М. , 1998. 736 с.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8. № 51. 30 декабря; Ильин О. «Зри в корень». О недавнем прошлом без гнева и пристрастия. [Рец. ] Пихоя Р. Г.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М. : Изд-во РАГС, 1998. 736 с. //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9. 15 января; Авдеенко С. В истории нет мелочей. Старая партократия глазами нынешней партии власти // Итоги. 1999. 16 февраля. С. 25;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Т. «Правда о прошлом все равно вылезет». Интервью с историком, профессором Р. Пихоя // Век. 1999. № 8. 26 февраля— 4 марта; Согрин В. В. Осмысливая советский опыт. О новейших трудах по истории XX века//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1999. № 3. С. 114—121; Попов В. П. Власть в потоке времени // Дружба народов. 1999. № 6. С. 126—133; Гусев К. В. Р. Г. Пихо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стория власти. 1945—1991. М., 1998 //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2000. № 1. С. 190—194. Отмечу также обсуждение книги на «круглом столе»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службы 16 ноября 1999 г.

- 6 См.: Пихоя Р. Г. О мест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знания в подготовк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лужащих // Ежегодник 98: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лужба России. М., 1999. С. 6—12.
- 7 Бухарин Н. И. Борьба за кадры. М.; Л., 1926. С. 60—67.
- 8 Сведения об этой кампании хранятся в фонде «Всесоюзный ЦК нового алфавита при Президиуме ЦИК СССР. 1926—1937». ГАРФ, ф. Р - 7544; а также в фонд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ченого совета Наркомпроса РСФСР. 1919—1933. См.: ГАРФ, ф. А - 298. Возможные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латинизации вполне предсказуемы — вся письменность, 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материальных носителей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оказались бы чуждыми для жителей страны в течение одного поколения.
- 9 Проблемы «латинизации русского алфавита» / Публ. В. Н. Денисова // Источник. 1994. № 5. С. 107—112.
- 10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трудам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историков-марксистов. М., 1930. Здесь, как кажется, и ключ к пониманию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я «дела академиков» — попытки (небезуспешной!) физически уничтожить в СССР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историков. Подробнее см.: Академическое дело 1929—1931 гг. Вып. 1. Дело по обвинению академика С. Ф. Платонова. СПб., 1993. С. XIV—XVI.
- 11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и борьба классов. М.; Л., 1933. Вып. 1. С. 29.
- 12 Сталин И. В. О некоторых вопросах истории большевизма. Письмо в редакцию журнала «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агитация в решени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КП(б). М., 1947. С. 281—291.
- 13 Сталин И., Жданов А., Киров С. Замечания по поводу конспекта учеб-

- ника по «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 //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агитация в решени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КП(б). С. 321—323.
- 14 См. , в частности,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 « В Совнарком Союз ССР и ЦК ВКП(б) » от 27 января 1936 г. В ряды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Покровского перебежал и Бухарин. См. : Чернобаев А. А. « Профессор с пикой », или Три жизни историка М. Н. Покровского. М. , 1992. С. 202.
  - 15 См. : Маслов Н. Н. « Краткий курс истории ВКП(б) » —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культа личности Сталин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88. № 11. С. 51—67.
  - 16 О постановке партий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в связи с выпуском « Краткого курса истории ВКП(б) » // Пропаганда и агитация в решениях и документах ВКП(б). С. 365—381.
  - 17 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М. , 1960 ( первое издание ). Последние главы этого труда, многократно переизданного в течение четверти века, регулярно переписывались после каждого съезда КПСС.
  - 18 研究战前历史的人的研究条件要稍好些。特别是 20 年代到 30 年代初有大量的报刊, 20 年代出版了一些学术著作, 30 年代前的那些统计数字还算可靠。另外, 西方国家收集了所谓的斯摩棱斯克档案馆的档案资料, 有关国内战争的大量文献、十月革命前俄罗斯活动家和非共产党活动家的个人档案资料被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学术机构收藏。见格里姆斯泰德·肯尼迪:《外国收藏的俄罗斯和苏联档案资料》, 载《祖国档案》1993 年第 1 期第 20—53 页。
  - 19 Материалы XXII съезда КПСС. М. , 1961. С. 95.
  - 20 材料和报告的差别在于, 前者是供代表们听的, 后者是一定要讨论的。所谓的《二十大报告》在宣读它的那一天是被禁止讨论的, 后来才在全国各党组织宣读。
  - 21 Специальность или специализац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существовавшая на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факультетах ряда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в, имела особый учебный план, еще более «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 заостренный », отличавший ее от традиционн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за счет уменьшения времени на

классическ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 считавшиеся обязательными для подготовки историка.

- 22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и в СССР. М., 1995. Т. 1. С. 5.
- 23 Сидорова Л. А. Оттепель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Советск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первого послесталинского десятилетия. М., 1997. С. 176.
- 24 См. там же. С. 109—161.
- 25 См. там же. С. 328—330.
- 26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ая статья «О фигуре умолчания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В. П. Данилова и С. И. Якубовской (1965) / Публ. А. А. Курносова //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за 1992 г. М., 1994. С. 324—333.
- 27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М., 1997. С. 159—163.
- 28 Историки отвечают на вопросы / Под ред. Н. Н. Маслова. М., 1989. Вып. 1; Историки отвечают на вопросы / Под ред. В. В. Поликарпова. М., 1990. Вып. 2; История без «белых пятен». Дайджест прессы. 1987—1988. Л., 1990;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Дайджест прессы. 1988. Л., 1989.
- 29 Тезис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ПСС к XIX Всесоюзной партий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Одобрены Пленумом ЦК КПСС 23 мая 1988 г. М., 1988; Смирнов Г. Л.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Октября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88. № 2.
- 30 Наумов В., Рябов В., Филиппов Ю.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ути КПСС в свете нового мышления //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Факты. Проблемы. Уроки / Под ред. В. И. Купцова. М., 1989. С. 41.
- 31 С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Ответы историка // Правда. 1988. 26 июля; Иного не дано / Под ред. Ю. Н. Афанасьева. М., 1988; Смирнов Г. Л.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пыт Октября и перестройк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1988. № 2; Наумов В. П., Рябов В. В., Филиппов Ю. И. Об историческом пути КПСС: поиски новых подходов. М., 1990;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М., 1988. Вып. 1;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 Факты, проблемы, уроки / Под ред. В. И. Купцова. М., 1989. Вып. 2.
- 32 Окол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труды Ю. Н. Афанасьева, Р. А. Медведева, В. Сув-



орова и ряда других публицистов от истории заслуживают отдельного анализа.

- 33 Так как предметом нашего обзора является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отмечу, в частности: Последняя « антипартийная » групп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июньского ( 1957 г. )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3. № 3—6; 1994, №1—4; переиздан позже как: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М., 1998; Бабиченко Д. Л. Писатели и цензоры. Совет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1940-х годов под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контролем ЦК. М., 1994; Ватлин А. Ю. Коминтерн; первые десять лет. М., 1993; Попов В. П. Российская деревня после войны ( июнь 1945 — март 1953 г. ):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 1993; Он же. Паспортная система в СССР. ( 1932—1976 гг. ) //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1995. № 8. С. 3—14; № 9. С. 3—13; Зубкова Е. Ю. Общество и реформы. 1945—1964 гг. М., 1993; Адиебеков Г. М. Коминформ и послевоенная Европа. М., 1994; Власть и оппозиция: Российский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процесс XX столетия / Под ред. В. В. Журавлева. М., 1995; Данилов А. А.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России: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 1917—1993 гг. Уфа, 1995; Симонов Н. С. Военно-промышленный комплекс СССР в 1920—1950-е гг.: темпы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оста, структура,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управление. М., 1996; Посетители кремлевского кабинета И. В. Сталина: Журналы ( тетради ) записи лиц, принятых первым генсеком. 1924—1953 гг.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4. № 6; 1995. № 2—6; 1996. № 2—6; 1997. № 1; 1998. № 4; СССР — Польша. Механизмы подчинения. 1944—1949 гг.: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 Под ред. Г. Бордюгова, Г. Матвеева, А. Косеского, А. Пачковского. М., 1995; Пихоя Р. Г. О внутривластной борьбе в советском руководстве. 1945—1959 //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 6. С. 3—14; Холодная война. 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новые документы / Под ред. М. М. Наринского. М., 1995; Аксютин Ю. В., Пыжиков А. В. Постсталин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 проблема лидерства 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я власти. М., 1999; Козлов В. 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e (1953— начало 80-х гг.).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 Политбюро и церковь. 1922—1925.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Кн. 1.

- 657 34 В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 СССР архивы до 1961 г. находились в ведени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 35 История советск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цензуры. Документы и комментарии / Сост. Т. М. Горяинова и др. М., 1997. С. 533—534.
- 36 См.: Хорхордина Т.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и архивы. 1917—1980 - е гг. М., 1994. С. 296—297.
- 37 Краткий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Фонды и коллекции, собранные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партийным архивом / Под ред. Ю. М. Амиантова. М., 1993. С. V.
- 38 这个档案馆的馆藏补充特点令人想起法国作家 A. 法朗士的《企鹅岛》一书中的一段对话:  
“——潘特,您说这些文献有伪造的吗?  
潘特笑道:  
——有经过处理的。  
——我说的就是这个。有经过处理的——那更好! 经过处理的文献可以作为证据,证明伪造的文献比真文献珍贵首先是因为它们是为某种需要伪造的……此外,它们更讨人喜欢还由于能把人的思维带进理想世界和脱离现实世界……(A. 法朗士:《企鹅岛》,B. 德尼克译,莫斯科 1974 年版,第 162—163 页)
- 39 Из текста записи беседы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К. У. Черненко с ведущими секторами Общего отдела ЦК КПСС 28 июня 1976 года. Цит. по:《Кто же мы есть?》Инструктаж К. У. Черненко в Общем отделе ЦК КПСС/ Публ. В. Зубока // Источник. 1999. № 5. С. 91.
- 40 Там же. С. 94.
- 41 С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КПСС № Ст-21/ 6г от 29 марта 1991 г.
- 42 Последняя отставка Сталина // Источник. 1994. № 1. С. 110.
- 43 См.: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С. 42—43.
- 44 Челиков В. Если архивы уничтожают, значит, это кому-нибудь нужно? //

-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991. 26 июля.
- 45 См. : Пихоя Р. Г.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б архивной реформе //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за 1994 год. М. , 1996. С. 3—17.
  - 46 О составе фондов см. : Краткий путеводитель. Фонды и коллекции, собранные Центральным партийным архивом.
  - 47 О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и архива Политбюро см. :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е годы: Сб. документов / Сост. О. В. Хлевнюк и др. М. , 1995. С. 14.
  - 48 Пихоя Р. Г.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б архивной реформе. С. 317.
  - 49 См. : Рудинский Ф. М. «Дело КПСС»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м суде. Записки участника процесса. М. , 1999. С. 136—137.
  - 50 См. : Буковский В. Моск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Париж; М. , 1996. С. 57—63.
  - 51 Сводку публикаций документов за 1985—1995 гг. см. : Открытый архив. Справочник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XX века из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 семейных архивов (по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периодике 1985—1995) / Сост. И. А. Кондакова. М. , 1997.
  - 52 Архивы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и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Справочник-обозрение и библи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указатель / Сост. В. П. Козлов и П. Гримстед Кеннеди. М. , 1997.
  - 53 Микоян А. Так было. 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минувшем. М. , 1999.
  - 54 «Я пишу, как было, я никого не пощажу». Неизвестная глава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маршала Г. К. Жукова / Публ. Ю. А. Абрамовой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рхив. 1999. № 3. С. 38—74.
  - 55 Зубкова Е. Ю. 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е» и других проблемах нашей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памяти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М. , 1996.
  - 56 Отмечу лишь некоторые из этих изданий, посвященных послевоенному времени: Невежин В. А. , Пруцкова О. А. Издани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кризис или стабилизация? //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в России. Тенденции Последних лет / Под ред. Г. А. Бордюгова. М. , 1996. С. 22—36; Архивы Кремля и Старой площади. Аннотированный справоч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представленных в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й суд Российской

- Федерации по «Делу КПСС» / Сост. И. И. Кудрявце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5; Культура и власть от Сталина до Горбачева: Документы / Сост. Е. С. Афанасьева, В. Ю. Афиани, Л. А. Величанская, З. К. Водопьянова, Е. В. Кочубей. М., 1998;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ЦК КПСС.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 Сост. Е. С. Афанасьева и др. М., 1998; СССР и германский вопрос. 1941—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з архива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Сост. Г. П. Кынин и др. М., 1996; Восточная Европа в документах российских архивов. 1944—1953. Т. 1. 1944—1948 / Под ред. Г. П. Мурашко. 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7;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венгерский кризис 1956 г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 Сост. В. Ю. Афиани и др. М., 1998; Совецания Коминформа. 1947, 1948, 1949: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 Сост. Г. М. Адиебеков и др. М., 1998;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ЦК КПСС. 1958—1964: Документы / Сост. Е. С. Афанасьева и др. М., 1998; Молотов, Маленков, Каганович. 1957. Стенограмма июньского Пленума ЦК КПСС и другие документы / Сост. Н. Ковалева и др. М., 1998.
- 57 С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Особая папка Сталина». Из материалов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НКВД — МВД СССР. 1944—1953 гг.; Каталог документов / Под ред. В. А. Козлова и С. В. Мироненко //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М., 1994.
- 58 О процессе выработки археографии современ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см.: Покровский Н. Н.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РКП (б) — ВКП (б) первой половины 1920-х гг. // 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за 1994 год. М., 1996. С. 18—46.
- 59 См., в частности, ряд публикаций документов, подготовленных историками, специализировавшимися прежде по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феодального периода: В. Ю. Афиани, А. В. Коротковым, Н. А. Кривовой, Р. Г. Пихоей, Н. Н. Покровским.
- 60 Среди уже изданных отмечу: Данилов А. А., Косулина Л. Г.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М., 1995; Данилов А. А.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XX век. Справоч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М., 1996; История СССР. XX век / Под ред. В. П. Дмитренко. М., 1997;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Отечества. XX век. В 2 т. /

Под ред. А. Ф. Киселева, Э. М. Шагина. М., 1998; Соколов А. К.,  
Тяжельникова В. С. Курс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и. 1941—1991. М., 1999.



## 人名索引

### A

- Абакумов В. С. 阿巴库莫夫, 维·谢· 17, 34, 36, 39, 41—43, 47, 48, 50, 58, 59, 61—73, 77, 78, 81, 88, 91—93, 95, 99, 107—109, 114, 121, 125, 136, 150, 158, 164
- Абалкин Л. И. 阿巴尔金, Л. И. 416, 454, 479, 506, 507, 525, 526, 528, 529, 534, 603, 625, 626
- Абдулатипов Р. Г. 阿卜杜拉季波夫, Р. Г. 552, 555, 567
- Абель Р. И. (Фишер В. Г.) 阿贝尔, Р. И. (菲舍尔, В. Г.) 108
- Абрамов 阿布拉莫夫 610
- Абрамов Ф. А. 阿布拉莫夫, 费·亚· 257
- Абрамова Ю. А. 阿布拉莫娃, Ю. А. 657
- Абуладзе Т. Е. 阿布拉泽, Т. Е. 96
- Авалов Р. Г. 阿瓦洛夫, Р. Г. 132
- Авдеенко С. 阿夫杰延科, С. 655
- Аганбегян А. Г. 阿甘别吉扬, 阿·格· 416, 454, 506, 574
- Агеев Г. 阿格耶夫, Г. 595
- Адамов В. В. 阿达莫夫, В. В. 314, 316
- Аджубей А. И. 阿朱别伊, А. И. 231, 235, 237
- Адибеков Г. М. 阿季别科夫, Г. М. 656, 658

- Айдак А. П. 艾达克, А. П. 516, 626
- Айтматов Ч. 艾特马托夫, 钦 · 537
- Акоста Т. Д. 阿科斯塔, Т. Д. 241, 242
- Аксенов В. П. 阿克肖诺夫, В. П. 254
- Аксенов Ю. С. 阿克肖诺夫, Ю. С. 60, 82, 83
- Аксютин Ю. В. 阿克休京, Ю. В. 656
- Аксючиц В. В. 阿克休奇茨, В. В. 544
-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德罗夫 610
- Александров А. П. 亚历山德罗夫, 阿 · 彼 · 117, 430, 432, 436
-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 Т. 亚历山德罗娃, Т. 655
-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 А. М. 亚历山德罗夫—阿根托夫, 安 · 米 · 228, 236, 244, 651
- Алексеев А. А. 阿列克谢耶夫, А. А. 189, 190, 202
- Алексеев А. И. 阿列克谢耶夫, А. И. 241, 242
- Алексеев И. А. 阿列克谢耶夫, И. А. 129
- Алексеев С. С. 阿列克谢耶夫, С. С. 603
- Алигер М. И. 阿利格尔, 马 · 约 · 317
- Алиев Г. А. 阿利耶夫, 盖 · 阿 · 334, 377, 384, 385, 405, 410, 431, 444, 492
- Аллилуев С. Я. 阿利卢耶夫, 谢 · 雅 · 650
- Алкснис В. И. 阿尔克斯尼斯, В. И. 503, 574
- Амальрик А. А. 阿马尔里克, А. А. 255
- Амбарцумов Е. А. 安巴尔楚莫夫, Е. А. 312
- Аменов Т. 阿梅诺夫, Т. 262
- Амиантов Ю. М. 阿米安托夫, Ю. М. 657
- Амин Х. 阿明, Х. 350, 352—356, 587
- Амосов И. А. 阿莫索夫, 伊 · 阿 · 241, 242
- Андреев 安德烈耶夫 148
- Андреев А. А. 安德烈耶夫, 安 · 安 · 13, 46, 74—76, 103, 105, 106, 650
- Андреев Л. 安德烈耶夫, 列 · 319

- Андреева Н. А. 安德烈耶娃, Н. А. 448, 449, 475—477, 479, 495, 636
- Андреотти Дж. 安德雷奥蒂, 约 · 527
- Андрианов В. М. 安德里阿诺夫, В. М. 76
- Андропов Ю. В. 安德罗波夫, 尤 · 弗 · 6, 7, 137, 138, 231, 237, 256, 263, 274, 275, 279, 283, 284, 287, 289—291, 299, 304, 307, 308, 319, 320, 323, 334, 348—351, 359, 360, 362, 363, 365—367, 373—381, 383—386, 389—393, 396, 397, 399, 400, 406, 408—411, 413, 414, 416, 417, 420, 426, 439, 492, 573, 650
- Антонов С. 安东诺夫, 谢 · 254, 318
- Анциелович Е. 安采洛维奇, Е. 71
- Апро А. 阿普罗, 安 · 140
- Арбузов А. Н. 阿尔布佐夫, 阿 · 尼 · 254, 318
- Аристов А. Б. 阿里斯托夫, 阿 · 鲍 · 76, 122, 124, 125, 127, 144, 152, 158, 159, 164, 167, 237
- Арсанов А. 阿尔萨诺夫, А. 612, 613
- Артемьев П. А. 阿尔捷米耶夫, П. А. 89
- Арутюнян С. Г. 阿鲁秋尼扬, 谢 · 格 · 471
- Архипов И. В. 阿尔希波夫, 伊 · 弗 · 359
- Арцимович Л. А. 阿尔齐莫维奇, 列 · 安 · 255
- Аслаханов А. А. 阿斯拉汉诺夫, А. А. 611, 612
- Астафьев В. П. 阿斯塔菲耶夫, 维 · 彼 · 447
- Афанасьев Е. С. 阿法纳西耶夫, Е. С. 658
- Афанасьев Ю. А. 阿法纳西耶夫, Ю. А. 651
- Афанасьев Ю. Н. 阿法纳西耶夫, 尤 · 尼 · 446, 503—505, 513, 518, 580, 656
- Афиани В. Ю. 阿菲阿尼, В. Ю. 658
- Ахматова А. А. 阿赫马托娃, 安 · 安 · 47, 48, 440, 445
- Ахромеев С. Ф. 阿赫罗梅耶夫, 谢 · 费 · 430, 595

Ацель Д. 阿采利, Д. 288  
Ачалов В. А. 阿恰洛夫, В. А. 531, 532, 581, 595  
Ачесон Дж. 艾奇逊, 迪 · 25, 26

## Б

Бабичев В. С. 巴比切夫, В. С. 571  
Бабиченко Д. Л. 巴比琴科, Д. Л. 656  
Бабурин С. Н. 巴布林, С. Н. 566  
Багиров К. М. 巴吉罗夫, К. М. 467, 471  
Багиров М. Д. 巴吉罗夫, М. Д. 87, 88, 104  
Байбаков Н. К. 巴伊巴科夫, 尼 · 康 · 246, 361  
Бакатин В. В. 巴卡京, 瓦 · 维 · 479, 537, 539, 540, 565—  
567, 569, 570, 601, 603, 604  
Бакланов Г. Я. 巴克拉诺夫, Г. Я. 318  
Бакланов О. Д. 巴克拉诺夫, 奥 · 德 · 481, 522, 538, 578,  
580—586, 594, 601, 603, 626, 629, 630  
Балаян З. 巴拉扬, З. 468  
Бао Дай 保大 345  
Барамия М. 巴拉米亚, М. 58  
Баранников В. П. 巴兰尼科夫, В. П. 598  
Барбирек Ф. 巴尔比列克, Ф. 271, 285, 300  
Барсуков Н. А. 巴尔苏科夫, Н. А. 242  
Барто А. П. 巴尔托, А. П. 254  
Барух 巴鲁赫 24, 25  
Басов А. В. 巴索夫, А. В. 179  
Батиста Ф. 巴蒂斯塔, 菲 · 185  
Бачурин А. В. 巴楚林, А. В. 252, 306  
Безнин М. А. 别兹宁, М. А. 79  
Безответных А. Н. 别佐特维特内赫, А. Н. 107  
Бейкер Дж. 贝克, 约 · 486, 527, 579  
Бек А. А. 贝克, 亚 · 阿 · 242, 317, 445

Бектасов А. Ж.	贝克塔索夫, А. Ж. 262
Белиловская	别利洛夫斯卡娅 178
Белкин М. И.	别尔金, М. И. 71, 72
Белобородов Н. К.	别洛博罗多夫, Н. К. 193, 197, 205, 206, 241, 242
Белов А. Л.	别洛夫, А. Л. 50
Белов В. И.	别洛夫, 瓦·伊· 257, 530
Беляев Н. И.	别利亚耶夫, Н. И. 144, 150, 152, 158, 159, 167
Бен Белла А.	贝拉, 艾·本· 230
Бендерский	边杰尔斯基 95, 107
Берберова Н. Н.	别尔别罗娃, Н. Н. 445
Берггольц О.	别尔戈利茨, 奥· 146
Бергер М.	贝格尔, М. 509, 626
Березин Е. И.	别列津, Е. И. 176
Берия Л. П.	贝利亚, 拉·帕· 16, 17, 35, 38, 44—46, 48, 50, 52—58, 60—62, 64, 66, 67, 76—78, 81, 83, 85—105, 107—115, 120—122, 125—127, 129—131, 135, 136, 150, 151, 153, 155, 159—161, 163—165, 208, 211, 280, 376, 500, 647, 652
Берсенеv	别尔谢涅夫 326
Берут Б.	贝鲁特, 博· 136, 137
Бесков Б.	别斯科夫, Б. 595
Бессмертных А. А.	别斯梅尔特内赫, 亚·亚· 540, 574, 579, 586, 603, 604
Биккенин Н. Б.	比克宁, Н. Б. 416, 442
Биляк В.	比利亚克, В. 270, 271, 276, 279—285, 289, 294, 296, 298, 300, 301, 303, 304, 308, 309
Бирнс Дж.	伯恩斯, 约· 22, 23
Бирюзов С. С.	比留佐夫, 谢·谢· 190
Бирюков В. А.	比留科夫, В. А. 503
Бирюкова А. П.	比留科娃, 亚·帕· 425, 426, 441, 493



Биссел Р.	比斯尔, Р. 187
Блажнова Е.	布拉日诺娃, Е. 654
Блохин Ю.	布洛欣, 尤 · 575
Бобров В. А.	博布洛夫, В. А. 325, 326
Бовкун-Луганец И. Т.	博夫昆—卢加涅茨, И. Т. 82
Богданов С. И.	波格丹诺夫, С. И. 34
Боголюбов К. М.	博戈柳博夫, 克 · 米 · 652
Богораз Л. И.	博戈拉兹, Л. И. 255
Бодя	博加 272
Болдин В. И.	博尔金, В. И. 404, 416, 442, 447, 458, 459, 476, 477, 491—495, 529, 537, 578, 580—585, 594, 625—629, 641, 651, 652
Болдырев Ю. Н.	博尔德列夫, Ю. Н. 499
Большаков В.	博利沙科夫, В. 198, 206
Большов	博利绍夫 316
Бондарев Ю. В.	邦达列夫, 尤 · 瓦 · 479, 552, 575
Бондаренко Л.	邦达连科, Л. 313
Бондарюк	邦达柳克 610
Боннэр Е. Г.	博内尔, Е. Г. 580
Бор Н.	博尔, Н. 654
Бордюгов Г. А.	博尔久科夫, Г. А. 656, 657
Борисов Ю. С.	鲍里索夫, Ю. С. 460
Бородин Л. А.	博罗金, 列 · 亚 · 460
Ботвинник М. М.	博特温尼克, 米 · 莫 · 117—120, 164
Бочаров М. А.	博恰罗夫, М. А. 525
Бразаускас А. М.	布拉藻斯卡斯, А. М. 627
Братищев И. М.	布拉季谢夫, И. М. 558

- Брежнев Л. И. 勃列日涅夫, 列·伊· 6, 7, 76, 97, 134, 143, 144, 150, 152, 156, 158—160, 168, 170, 222—228, 231—233, 236—240, 243—249, 253, 255, 259, 260, 265, 270, 272—278, 280—290, 293—304, 306—308, 310, 315, 317, 319—321, 323, 334, 335, 348—351, 358—362, 364, 365, 367, 372—378, 380, 384, 390, 396, 399, 404—406, 409, 410, 412, 418, 419, 443, 474, 500, 632, 633, 650, 652, 656
- Брежнева Г. Л. 勃列日涅娃, Г. Л. 374
- Брейтштраус О. Я. 布赖特施特劳斯, О. Я. 146
- Бринд 布林德 107
- Бро 布罗 146
- Броверман Я. М. 布罗维尔曼, Я. М. 39, 68, 108
- Бровин Г. Д. 布罗温, Г. Д. 412
- Брусиловский М. 布鲁西洛夫斯基, М. 254
- Буденный С. М. 布琼尼, 谢·米· 33, 184
- Будников А. В. 布德尼科夫, А. В. 36, 93
- Бузаев 布扎耶夫 179
- Буковский В. К. 布科夫斯基, В. К. 255
- Буковский В. С. 布科夫斯基, В. С. 651, 657
- Булгаков М. А. 布尔加科夫, 米·阿· 258, 445
- Булганин Н. А. 布尔加宁, 尼·亚· 34, 35, 37, 52, 54, 62, 67, 76, 86, 87, 89, 91, 96, 98, 99, 101, 105, 106, 109, 122, 134, 139, 141, 149, 150, 151—153, 156, 157, 159, 161, 165, 209, 244, 642
- Бунин И. А. 布宁, 伊·阿· 319
- Бунич П. Г. 布尼奇, 帕·格· 507
- Бурбулис Г. Э. 布尔布利斯, 格·爱· 499, 503, 567, 568, 580, 588, 611, 615—617, 620, 630
- Бурганов А. 布尔加诺夫, А. 493

Бурлов А. М.	布尔洛夫, А. М. 205
Бурокаявичюс М. М.	布尔克亚维丘斯, М. М. 541, 548, 595
Бурьличев П. Г.	布雷利切夫, П. Г. 55
Буряце Б.	布里亚采, Б. 374
Бусалов	布萨洛夫 70
Бутенко А. П.	布坚科, А. П. 311
Бухарин Н. И.	布哈林, 尼·伊· 4, 96, 129, 148, 446, 639— 641, 650, 655
Буш Дж.	布什, 乔治· 484, 486, 495, 527, 533, 537, 603
Быков В.	贝科夫, В. 326
Бэрт Р.	伯特, Р. 391

## В

Валенса Л.	瓦文萨, 莱· 654
Валента И.	瓦伦塔, И. 533, 627
Валье Хименес	巴列, 希门尼斯· 200
Вандерберг Г.	范登堡, Г. 25, 28
Ванников Б. Л.	万尼科夫, 鲍·利· 57, 67, 108
Варга Е. С.	瓦尔加, 叶·萨· 26, 311
Варенников В. И.	瓦连尼科夫, 瓦·伊· 552, 575, 581—583, 587, 594, 595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А. М.	华西列夫斯基, 亚·米· 31, 36, 37, 89
Василенко В. Х.	瓦西连科, 弗·哈· 69, 71
Василенко Г. И.	瓦西连科, Г. И. 375
Васильев Ю. В.	瓦西连科, Ю. В. 625
Ватлин А. Ю.	瓦特林, А. Ю. 656
Ваупшасов С. А.	沃普沙索夫, С. А. 108
Вахрушев В.	瓦赫鲁舍夫, В. 417
Ваш З.	瓦什, 佐· 140
Ведерников	韦杰尔尼科夫 493
Везиров	韦济罗夫 471

Вейцман М.	魏茨曼, М. 91
Вейцман Х.	魏茨曼, Х. 91
Величанская Л. А.	韦利昌斯卡娅, Л. А. 658
Верблян	韦尔布良 363
Верт Н.	韦尔特, Н. 79
Вершинин К. А.	韦尔希宁, К. А. 35
Вешняков А. А.	韦什尼亚科夫, А. А. 552, 555
Виноградов	维诺格拉多夫 316
Виноградов В. М.	维诺格拉多夫, В. М. 49, 50, 67, 69—71
Вирта Н. Е.	维尔塔, Н. Е. 60
Власик Н. С.	弗拉西克, Н. С. 50, 66, 70, 71, 76, 114
Власов А. В.	弗拉索夫, 亚·弗· 432, 513, 522, 523
Власов Ю.	弗拉索夫, 尤· 626
Влодзимирский Л. Е.	弗洛齐米尔斯基, Л. Е. 107
Вовси М. С.	沃夫西, М. С. 69, 92, 113
Водопьянов З. К.	沃多皮亚诺夫, З. К. 658
Вознесенская М. А.	沃兹涅先斯卡娅, М. А. 53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А.	沃兹涅先斯基, А. 254, 317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А. А.	沃兹涅先斯基, 安·安· 52, 53
Вознесенский Н. А.	沃兹涅先斯基, 尼·阿· 46—48, 50—53, 57, 68, 72, 81, 121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А.	沃尔科戈诺夫, Д. А. 80, 163, 349, 400, 401, 493, 494
Волкотрубенко И.	沃尔科特鲁边科, И. 41
Волобуев П. В.	沃洛布耶夫, П. В. 314, 315, 369
Володин А.	沃洛金, А. 575
Волокитина Т. В.	沃洛基京娜, Т. В. 80
Вольпин (Есенин) А. С.	沃尔平(叶谢宁), А. С. 255, 274
Во Нгуен Зиап	武元甲 265, 266
Воробьев Е.	沃罗比约夫, Е. 317
Воробьев П. Г.	沃罗比约夫, П. Г. 112

Воронин В.	沃罗宁,弗· 544
Воронин Л. А.	沃罗宁,列·阿· 493
Воронин Ю.	沃罗宁,尤· 561
Воронков	沃龙科夫 254
Воронов Г. И.	沃罗诺夫,根·伊· 222, 231, 233, 237, 297, 302, 323
Воронов Н. Н.	沃罗诺夫,尼·尼· 33, 68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沃罗特尼科夫,В. 583
Воротников В. И.	沃罗特尼科夫,维·伊· 373, 375, 380, 385, 387, 394, 397, 400, 401, 406, 422, 431, 439, 441, 444, 456, 459, 460, 474, 476, 477, 481, 489, 491—496, 500, 513, 517, 625, 651
Ворошилов К. Е.	伏罗希洛夫,克·叶· 6, 33, 54, 60, 74—76, 78, 85, 87—89, 96, 100, 103, 105, 114, 121, 123, 124, 137, 138, 141, 150—152, 155, 156, 159, 563, 650
Восс А. Э.	沃斯,阿·爱· 498
Воцанов П. И.	沃夏诺夫,П. И. 618, 630
Вучетич Е. В.	武切季奇,叶·维· 255
Вышинский А. Я.	维辛斯基,安·亚· 18, 76, 650
Вэнн Дж.	维恩,约· 346

## Г

Габай И. Я.	加拜,И. Я. 258
Габор П.	加博尔,П. 73
Гавел В.	加韦尔,В. 515, 516
Гаврилов И.	加夫里洛夫,И. 417
Гаврилов П.	加夫里洛夫,П. 417
Гаврилов С. П.	加夫里洛夫,С. П. 358
Гайдар Е. Т.	盖达尔,叶·季· 411, 527, 615
Гала И.	加拉,И. 129



Галансков Ю.	加兰斯科夫, Ю. 255
Галкин	加尔金 52
Галкин А.	加尔金, А. 326
Гамсахурдия З.	加姆萨胡尔季阿, З. 498, 602
Гантемиров Б.	甘捷米罗夫, Б. 610
Гарбуз Л.	加尔布兹, Л. 193
Гарбузов В. Ф.	加尔布佐夫, В. Ф. 246
Гарриман А.	哈里曼, А. 72
Гафуров Б. Г.	加富罗夫, Б. Г. 312
Гдлян Т. Х.	格德良, Т. Х. 381, 412—414, 466, 473, 491, 503, 512
Гегечкори Н. Т.	格格奇科里, Н. Т. 56
Гейштор А.	海什托尔, А. 9
Геллер М.	黑勒, М. 81, 491
Гендрих	海因里希 271
Генералов В. В.	格涅拉洛夫, В. В. 583, 603
Георгиу-Деж Г.	乔治乌—德治, 格· 230
Герасимов	格拉西莫夫 45
Герё Э.	格罗, 埃· 136, 138—140, 165
Герек Э.	格列克, Э. 358, 359
Гершфельд	格什费尔德 544
Гефтер М. Я.	格弗捷尔, М. Я. 311, 314
Гидаспов Б. В.	吉达斯波夫, Б. В. 513, 539, 576
Гиндин И. Ф.	金丁, И. Ф. 314, 369
Гинзбург А. И.	金兹堡, А. И. 255, 278
Гиренко А. Н.	吉连科, 安·尼· 540, 545, 552, 554, 555, 559, 592, 628
Гитлер А.	希特勒, 阿· 97, 640
Глинка М. И.	格林卡, М. И. 570
Гоглидзе С. А.	戈格利泽, С. А. 64, 92, 104, 107
Гоголь Н. В.	果戈里, 尼·瓦· 176

Голиков Ф. И.	戈利科夫, Ф. И. 33, 182
Голованов	戈格瓦诺夫 146
Голубева В. Н.	戈卢别娃, В. Н. 445
Голубов (Потапов) В. И.	戈卢博夫(波塔波夫), В. И. 59
Гольдштейн И. И.	戈利德施泰因, И. И. 59
Гольдштюккер Э.	戈利德什丘克尔, Э. 280
Гомулка В.	哥穆尔卡, 瓦 · 136—139, 142, 148, 272, 275, 277, 279, 288, 289, 293, 299, 301, 303
Гонор Л. Р.	戈诺尔, Л. Р.
Горбаневская Н. Е.	戈尔巴涅夫斯卡娅, Н. Е. 255
Горбановский Л.	戈尔巴诺夫斯基, Л. 326
Горбатов А. В.	戈尔巴托夫, А. В. 34
Горбачев М. С.	戈尔巴乔夫, 米 · 谢 · 7, 161, 168, 244, 334, 593, 595, 597, 598, 601—606, 613, 614, 616, 619—623, 625—631, 634—636, 650, 651, 658
Горбачева Р. М.	戈尔巴乔娃, Р. М. 416, 461, 483, 557, 603
Горбунов А. В.	戈尔布诺夫, А. В. 505
Горбунов В. В.	戈尔布诺夫, В. В. 448
Гордов В. Н.	戈尔多夫, 瓦 · 尼 · 38—41, 81
Горлинский Н. Д.	戈尔林斯基, Н. Д. 113
Горький М.	高尔基, 马 · 64, 69, 440
Горяинова Т. М.	戈里亚伊诺娃, Т. М. 657
Горячева С. П.	戈里亚切娃, 斯 · 彼 · 552, 555, 565, 566
Готвальд К.	哥特瓦尔代, 克 · 281
Грабский С.	格拉勃斯基, С. 363
Гранберг А.	格兰贝格, А. 616
Гранин Д. А.	格拉宁, Д. А. 446
Грачев А.	格拉乔夫, А. 619, 631
Грачев П. С.	格拉乔夫, П. С. 579, 580, 583, 588, 589, 594, 595, 599, 629
Гречко А. А.	格列奇科, 安 · 安 · 282, 283, 288, 292, 650

Грибков А. И.	格里布科夫, А. И. 193, 205, 241
Григорьян В. Г.	格里戈良, В. Г. 89
Григорьян Г. М.	格里戈良, Г. М. 36, 93
Гримстед Кеннеди П.	肯尼迪, 格里姆斯特德·П. 655, 657
Гринберг З. Г.	格林贝格, З. Г. 59
Гриневский О. А.	格里涅夫斯基, О. А. 651
Гринштейн А. М.	格林施泰因, А. М. 92
Гришин В. В.	格里申, 维·瓦· 231, 235, 256, 287, 297, 320, 323, 375, 379, 386, 394, 397—399, 403, 405, 416, 422—424, 444
Громов Б. В.	格罗莫夫, Б. В. 357, 370, 567—569, 575, 595
Громыко А. А.	葛罗米柯, 安·安 6, 25, 189, 195, 196, 198, 282, 284, 286, 288, 291, 307, 343, 344, 349—352, 357, 359, 360, 362, 373, 375, 376, 383, 384, 388, 389, 394, 396—398, 402—405, 419, 420, 427, 430—432, 440, 441, 444, 469, 474, 478, 491, 492, 500
Громыко Анатолий А.	葛罗米柯, 阿纳托利·安· 402, 403, 491
Гроссман В. С.	格罗斯曼, В. С. 445
Грушко В. Ф.	格鲁什科, В. Ф. 581
Губенко Н. Н.	古边科, 尼·尼· 537
Гульбинский Н.	古利宾斯基, Н. 629, 630
Гумилев Н. С.	古米廖夫, Н. С. 445
Гуренко С. И.	古连科, С. И. 533, 538, 546, 595
Гуров А. И.	古罗夫, А. И. 381, 400, 401, 491
Гусак Г.	胡萨克, 古· 276, 289, 303, 309, 322, 361
Гусев К. В.	古谢夫, К. В. 493, 655

## Д

Давид	达维德 278
Давиденко В. А.	达维坚科, В. А. 116

Давыдов В. Б.	达维多夫, В. Б. 81
Даллес А.	杜勒斯, 艾 · 25, 118, 187
Даль В.	达里, В. 496
Дамье	达米耶 544
Данилов А. А.	丹尼洛夫, А. А. 656, 658
Данилов В. П.	丹尼洛夫, В. П. 643, 656
Данилова Е.	丹尼洛娃, Е. 654
Даниэль Ю. М.	达尼埃尔, Ю. М. 253, 254, 257, 326
Дворский	德沃尔斯基 272
Дегтярев А.	杰格佳廖夫, А. 554
Дедиков В.	杰季科夫, В. 464
Деканозов В. Г.	杰卡诺佐夫, В. Г. 107
Дементей Н. И.	杰缅杰伊, Н. И. 603
Дементьев А. А.	杰缅季耶夫, А. А. 186
Дементьев П. В.	杰缅季耶夫, П. В. 35
Демирчян К. С.	杰米尔强, К. С. 471
Демичев П. Н.	杰米契夫, 彼 · 尼 · 216, 231, 256, 257, 275, 278, 283, 299, 303, 384, 385, 394, 406, 444, 463, 492
Денисов В.	杰尼索夫, В. 475
Денисов В. Н.	杰尼索夫, В. Н. 655
Денякин	杰尼亚金 148
Дерягин А. В.	杰里亚金, А. В. 544
Джавахишвили	贾瓦希什维利 216
Джонсон Л.	约翰逊, 林 · 291, 336
Дзасохов А. С.	扎索霍夫, А. С. 538, 592
Дзержинский Ф. Э.	捷尔任斯基, 弗 · 埃 · 219
Дзур	楚尔 285, 309
Димитров Г.	季米特洛夫, 格 · 70, 108
Дмитренко В. П.	德米特连科, В. П. 658
Доби И.	道比, 伊 · 165

Доброхотов	多布罗霍多夫 123
Добрынин А. И.	多勃雷宁,阿·伊· 651
Добрынин А. Ф.	多勃雷宁,阿·费· 198,206,242,419,426, 428,431,432,493
Дожд	多日 129
Доланский	多兰斯基 271
Долгих В. И.	多尔吉赫,弗·伊· 386,417,421,426,430, 432,444,492
Доллежалъ Н. А.	多列扎利,Н. А. 436
Донат Ф.	多纳特,弗· 140
Дорон А. П.	多龙,А. П. 72
Дорош Е. Я.	多罗什,Е. Я. 254
Дорошенко	多罗申科 174
Дубчек А.	杜布切克·亚 271—273,275—290,294—300, 302—304,309,322
Дудаев Д.	杜达耶夫,Д. 607,610—613
Дудинцев В.	杜金采夫,弗· 146,326
Дудоров Н. П.	杜多罗夫,Н. П. 156,212
Дунаев А. Ф.	杜纳耶夫,А. Ф. 612
Дунаев Э.	杜纳耶夫,Э. 313
Дынник В.	登尼克,В. 657
Дэн Сяопин	邓小平 264
Дюма Р.	杜马,Р. 533

## Е

Евдокимов С.	叶夫多基莫夫,С. 591,593
Евтушенко Е. А.	叶夫图申科,Е. А. 224,317,318,326,499
Егоров А. К.	叶戈罗夫,А. К. 579,580
Егоров П. И.	叶戈罗夫,П. И. 49,50,69—71
Егорычев Н. Г.	叶戈雷切夫,Н. Г. 226,227,253



Ежов Н. И.	叶若夫, Н. И. 4, 44, 45, 56, 57, 60, 96, 111, 114, 121, 445, 650
Елисеев	叶利谢耶夫 112
Ельцин А. И.	叶利钦, А. И. 417
Ельцин Б. Н.	叶利钦, 鲍·尼· 416—419, 421—425, 432, 444, 450, 454—463, 474, 479, 480, 492, 494, 499, 501, 503, 504, 512—514, 518, 521—536, 539, 541, 542, 550—563, 565—572, 575—577, 580, 583, 584, 587—591, 593, 594, 596—600, 602, 604, 607, 611, 613—615, 617—625, 627—631, 636, 637, 651
Ельцин Н. И.	叶利钦, Н. И. 417
Елютин В. П.	叶留金, В. П. 144
Емельяненко Н. Я.	叶梅利亚年科, Н. Я. 240
Емельянов А. М.	叶梅利亚诺夫, А. М. 505
Епишев А. А.	叶皮谢夫, 阿·阿· 284
Еремин Д.	叶廖明, Д. 254
Ермолавичюс Ю.	叶尔莫拉维丘斯, 尤· 541
Есенин С. А.	叶赛宁, С. А. 454
Есенин ( Вольпин ) А. С. ( см. Вольпин( Есенин) А. )	叶赛宁( 沃尔平 ), А. С. [ 见沃尔平( 叶赛宁 ), А. ]
Ефремов Л. Н.	叶夫列莫夫, Л. Н. 74, 75, 84, 231, 234, 312

## Ж

Жабиньский	热宾斯基 363
Жардецкий	扎尔德茨基 583
Жданов А. А.	日丹诺夫, 安·亚· 17, 28, 33, 35, 42, 45, 50, 58, 69, 71, 78, 82, 124, 640, 655
Жданов Ю. А.	日丹诺夫, 尤·阿· 49
Жебрак А. Р.	热布拉克, А. Р. 82
Желицки Б.	热利茨基, Б. 166

Жемчужина П. С.	热姆丘任娜, П. С. 60, 75, 84, 92
Живков Т.	日夫科夫, 托 · 277, 293, 299, 301, 303
Жижин В.	日任, В. 579, 580
Жириновский В. В.	日里诺夫斯基, 弗 · 沃 · 544, 567, 569, 570, 580
Жолнин С. А.	若尔宁, С. А. 55
Жордания Н.	若尔达尼亚, Н. 56
Жуков Г. К.	朱可夫, 格 · 康 · 4, 33, 35, 37—43, 61, 62, 77, 80, 83, 88, 89, 104, 133, 134, 139, 141, 144, 150—156, 159—161, 165, 182, 184, 238, 240, 244, 274, 500, 642, 650, 651, 657
Жуков Е. М.	茹科夫, Е. М. 312, 653
Журавлев В. В.	茹拉夫廖夫, В. В. 448, 656
Журавский В.	茹拉夫斯基, В. 308

### 3

Забабин Е. И.	扎巴宾, Е. И. 116
Завгаев Д. Г.	扎夫加耶夫, Д. Г. 610, 611
Завенягин А. П.	扎韦尼亚金, 阿 · 帕 · 57, 62, 67, 108
Завидия А. Ф.	扎维季亚, А. Ф. 567
Задорнов М. М.	扎多尔诺夫, М. М. 525
Зайков Л. Н.	扎伊科夫, Л. Н. 416, 421, 422, 426, 462, 474
Зайцев	扎伊采夫 181
Заметин	扎梅京 179
Замятин Е. И.	扎米亚京, Е. И. 445
Замятин Л. М.	扎米亚京, Л. М. 359, 428, 492, 560, 628
Запотоцкий А.	扎波托茨基, А. 281
Запрягаева Л. П.	扎普里亚加耶夫, Л. П. 9
Заславский	扎斯拉夫斯基 178
Заславский И. И.	扎斯拉夫斯基, 伊 · 伊 · 503, 513
Затворницкий В. А.	扎特沃尔尼茨基, В. А. 461

Захаренков Е. А.	扎哈连科夫, Е. А.	116
Захаров М. А.	扎哈罗夫, М. А.	504
Захаров М. М.	扎哈罗夫, М. М.	558
Захаров П. А.	扎哈罗夫, П. А.	113
Збарский Б. И.	兹巴爾斯基, Б. И.	66
Зверев Н. Г.	兹韦列夫, Н. Г.	76
Зельдович Я. Б.	泽利多维奇, Я. Б.	166
Зимянин М. В.	齐米亚宁, 米·瓦·	287, 331, 359, 386, 426, 445, 493
Зиновьев Г. Е.	季诺维也夫, Г. Е.	51, 126, 129, 148, 643, 650
Зорин В.	佐林, В.	198
Зоценко М. М.	左琴科, М. М.	47, 48
Зубкова Е. Ю.	祖布科娃, Е. Ю.	78, 652, 656, 657
Зубок В.	祖博克, В.	657
Зускин В. Л.	祖斯基, В. Л.	59
Зыкина Л. Г.	济金娜, Л. Г.	552, 575
Зыонг Ван Минь	扬文明	345
Зысин Ю. А.	济辛, Ю. А.	116
Зюганов Г. А.	久加诺夫, 根·亚·	575

## И

Ибаррури Д.	伊巴露丽, 多·	108
Ибрагимов В.	易卜拉欣莫夫, В.	613
Иван Грозный	伊凡雷帝	56, 76, 654
Иванов	伊万诺夫	179
Иванов Н. И.	伊万诺夫, Н. И.	412—414, 473, 491, 512
Иванов С. П.	伊万诺夫, С. П.	191
Ивашко В. А.	伊瓦什科, 瓦·安·	518, 547, 554, 555, 581, 601, 603, 629
Ивашутин П. И.	伊瓦舒京, П. И.	179
Игнатенко В. Н.	伊格纳坚科, В. Н.	554

Игнатов Н. Г.	伊格纳托夫,尼·格· 76,153,159,174,235
Игнатъев С. Д.	伊格纳季耶夫,С. Д. 61,64—66,68—73,76,77,85,87—89,91,92,99,104,111,114,127,158
Иден А.	艾登,安· 22
Израэль Ю. А.	伊兹拉艾尔,Ю. А. 433
Илиеску	伊利埃斯库 530
Ильин О.	伊林,О. 654
Ильиных	伊利伊内赫 266
Ильичев Л. Ф.	伊利乔夫,列·费· 224,225,231,237,273
Ильф И.	伊利夫,И. 60
Ильюшин С. В.	伊柳申,谢·弗· 35
Индра А.	英德拉,阿· 272,282,283,285,289,294,300,301,308
Инчаустеги	因恰斯泰基 198
Иорыш А. И.	约雷什,А. И. 164
Исаев Б. М.	伊萨耶夫,鲍·米· 552,555,590
Исаков В. Б.	伊萨科夫,В. Б. 552,555,561,566,590
Исаковский М. В.	伊萨科夫斯基,М. В. 317
Иткин	伊特金 72

## К

Кабанов И. Г.	卡巴诺夫,И. Г. 76
Каверин В. А.	卡韦林,В. А. 317
Каганович Л. М.	卡冈诺维奇,拉·莫· 6,55—57,60,72,75,76,78,83,85—87,89,94,96,103—106,121,123,124,138,139,141,150—153,155—159,167,387,388,642,650,656—658
Кадар Я.	卡达尔,亚· 136—138,140,141,143,275—279,286,288,289,293,297,299—301,303,323,361
Кзаков Ю.	卡扎科夫,尤· 254
Казанник А. И.	卡扎尼克,阿·伊· 499,625

Калашников В. В.	卡拉什尼科夫, В. В. 558, 592
Калинин М. И.	加里宁, 米·伊· 6, 69, 103
Калинин Н.	加里宁, Н. 583, 599
Каллистов	卡利斯托夫 123
Калмыков Ю. Х.	卡尔梅科夫, Ю. Х. 516
Калугин О. Д.	卡卢金, О. Д. 505
Кальченко	卡利琴科 237
Каменев Л. Б.	加米涅夫, Л. Б. 96, 126, 129, 650
Кан Шен	康生 264
Каня С.	卡尼亚, 斯· 360—364
Капек А.	卡佩克, 安· 300, 308
Капитонов И. В.	卡皮托诺夫, 伊·瓦· 257, 291, 299, 323, 331, 384, 493
Капица П. Л.	卡皮察, 皮·列· 57, 117, 255
Капустин Я. Ф.	卡普斯京, Я. Ф. 51—53, 72
Капутикян С.	卡普季基扬, С. 468
Карамзин Н. М.	卡拉姆津, Н. М. 640
Карасев Н. А.	卡拉肖夫, Н. А. 107
Карелин	卡列林 146
Каримов И. А.	卡里莫夫, И. А. 413, 546, 549, 595
Кармаль Б.	卡尔迈勒, 巴· 350, 352, 354—356, 364
Карпай С. Е.	卡尔帕伊, С. Е. 69, 70
Карпухин В. Ф.	卡尔普欣, В. Ф. 589, 595, 596, 598, 629
Карякин	卡里亚金 368
Карякин Ю. Ф.	卡里亚金, Ю. Ф. 368, 504
Кастро Р.	卡斯特罗, 鲁· 190, 191
Кастро Ф.	卡斯特罗, 菲· 185—191, 195, 200, 202, 205, 206, 230, 242, 284
Катушев К. Ф.	卡图谢夫, 康·费· 280, 293, 294, 299
Кафка Ф.	卡夫卡, Ф. 10, 258
Кахраманов А.	卡赫拉曼诺夫, А. 413



Каюков М. М.	卡尤科夫, М. М.	39
Квитко Л. М.	克维特科, Л. М.	59
Кедрин З.	克德林, З.	254
Келдыш М. В.	克尔德什, М. В.	237
Кеннан Д.	凯南, Д.	23, 24
Кеннеди Дж. Ф.	肯尼迪, 约 ·	184, 187, 188, 191, 194—204, 206, 230, 242
Кеннеди Р.	肯尼迪, Р.	188, 198, 206
Киевская Л.	基耶夫斯卡娅, Л.	165
Кикоин И. К.	基科因, 伊 · 康 ·	108
Ким Ир Сен	金日成	30, 31
Ким М. И.	基姆, М. И.	312
Кириков В. И.	基里科夫, В. И.	325, 326
Кириленко А. П.	基里连科, 安 · 帕 ·	231, 234, 275, 294, 299, 303, 322, 373, 374, 417
Кириллин В. А.	基里林, В. А.	333, 409
Кириченко А. И.	基里琴科, А. И.	104, 105, 150, 152, 167
Киров С. М.	基洛夫, 谢 · 米 ·	46, 124, 129, 216, 445, 640, 655
Кирсанов П.	基尔萨诺夫, П.	396
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夫	148
Киселев А. Ф.	基谢廖夫, А. Ф.	658
Киселев Б.	基谢廖夫, Б.	165
Киселев Т. Я.	基谢廖夫, Т. Я.	383
Киссинджер Г.	基辛格, 亨 ·	336, 337, 342—345
Китинг	基廷	195
Клейменов И. Т.	克列伊苗诺夫, И. Т.	63, 64
Клепикова Е.	克列皮科娃, Е.	400, 492, 494
Клочков И. Е.	克洛奇科夫, И. Е.	590
Клыков В.	克雷科夫, В.	575
Клюева Н. Г.	克柳耶娃, Н. Г.	48, 82

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克柳切夫斯基, В. О. 641
Кноблех	克诺布洛赫 343
Кобец К. И.	科别茨, К. И. 591, 596, 616, 629, 630
Кобулов А. З.	科布洛夫, А. З. 54, 61, 107
Кобулов Б. З.	科布洛夫, Б. З. 92, 104, 107
Кобулов В. В.	科布洛夫, В. В. 72
Ковалева	科瓦廖娃 544
Ковалева Н. В.	科瓦廖娃, Н. В. 167, 658
Ковач И.	科瓦奇, И. 138, 140
Коган Б. Б.	科甘, Б. Б. 92, 113
Кожевников В. М.	科热夫尼科夫, В. М. 255
Козлов	科兹洛夫 113
Козлов В. А.	科兹洛夫, В. А. 656, 658
Козлов В. П.	科兹洛夫, В. П. 657
Козлов Ф. Р.	科兹洛夫, Ф. Р. 53, 146, 152, 159, 167, 180, 181, 218, 222, 233, 234, 244
Козлова О. В.	科兹洛娃, О. В. 55
Козырев А. В.	科济列夫, А. В. 598
Койвисто М.	科伊维斯托, М. 527
Кокурин А. И.	科库林, А. И. 83, 163
Коларж	科拉日 285, 308
Колбин Г. В.	科尔宾, Г. В. 460, 465, 479
Колдунов А. И.	科尔杜诺夫, А. И. 452
Колеватов А.	科列瓦托夫, А. 374
Коллонтай	柯伦泰 244
Колодкин А. Л.	科洛德金, А. Л. 242
Коль Г.	科尔, Г. 526, 536
Кольдер Д.	科尔德, Д. 271, 278, 282—284, 289, 300, 308
Комаров В. И.	科马罗夫, В. И. 64, 68, 73, 108
Комаров П. К.	科马罗夫, П. К. 122, 158, 164
Комарова О.	科马罗娃, О. 495

Комарь Д.	科马尔, Д. 600, 604
Кондакова И. А.	孔达科娃, И. А. 657
Кондратович А. И.	孔德拉托维奇, А. И. 316
Кондратьев Н. Д.	孔德拉季耶夫, Н. Д. 440
Конев И. С.	科涅夫, 伊·斯· 38, 143, 153, 160, 181, 183, 281
Конотоп В. И.	科诺托普, В. И. 504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 Ф. В.	康斯坦丁诺夫, Ф. В. 311
Копелев Л. З.	科佩列夫, Л. З. 316, 318
Коптюг В. А.	科普秋格, 瓦·阿· 513
Коржаков А. В.	科尔扎科夫, А. В. 596
Коржихина Т. П.	科尔日希娜, Т. П. 306, 369
Корзенко И. В.	科尔津科, И. В. 111
Коркач	科尔卡奇 181
Корниенко Г. М.	科尔尼延科, Г. М. 79, 352, 354, 370, 392—394, 401, 419
Коровиков	科罗维科夫 544
Королев	科罗廖夫 513
Коротков А. В.	科罗特科夫, А. В. 9, 80, 81, 167, 306, 369, 658
Коротченко Д. С.	科罗琴科, Д. С. 76
Коряков С. Д.	科里亚科夫, С. Д. 14
Косеский А.	科谢斯基, А. 656
Костенков	科斯坚科夫 610
Костерин С. И.	科斯捷林, С. И. 112
Костин Г. В.	科斯京, Г. В. 629
Костов	科斯托夫 12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	科斯特尔琴科, Г. 84
Косулина Л. Г.	科苏林娜, Л. Г. 658
Косульников	科苏利尼科夫 315

- Косыгин А. Н. 柯西金,阿·尼· 57,76,219,221,222,227,231,232,235,236,238,239,251,264,265,273,274,277,280—285,288—291,297,302—304,308,323,333,352,373,399,412,653
- Котов 科托夫 610
- Коулс 库列 537
- Коуцкий 考茨基 271
- Кочарянц С. Г. 科恰良茨,С. Г. 116
- Кочелек 科切列克 363
- Кочетов В. С. 科切托夫,В. С. 323,324
- Кочубей Е. В. 科丘别伊,Е. В. 658
- Козн С. 科恩,С. 446
- Кравченко Л. П. 克拉夫琴科,Л. П. 541,577
- Кравчук Л. М. 克拉夫丘克,Л. М. 619,621—623
- Крайко А. Н. 克赖科,А. Н. 499
- Красавченко Н. П. 克拉萨夫琴科,Н. П. 55
- Красавченко С. Н. 克拉萨夫琴科,С. Н. 513
-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 克拉西利尼科夫 146
- Кривова Н. А. 克里沃瓦,Н. А. 9,240,658
- Кривоногов В. Я. 克里沃诺戈夫,В. Я. 315
- Кригель Ф. 克里格利,Ф. 284,285,287,289,293,297,302,303,308
- Кричевский И. 克里切夫斯基,И. 600,604
- Круглов С. Н. 克鲁格洛夫,谢·尼· 17,58,61,63,92,111,113,115,211
- Крупская Н. К. 克鲁普斯卡娅,娜·康· 639
- Кручина Н. Е. 克鲁奇纳,Н. Е. 382,571
- Крюков В. В. 克留科夫,В. В. 34,42,184
- Крючков В. А. 克留奇科夫,弗·亚· 308,394,402,449,486,518,535—537,539—541,550—553,561,573,577—583,586,588,591,594,595,597,601,603,606,627—630,651

Кублановский Ю. М.	库布拉诺夫斯基, Ю. М. 372, 400
Кудрявцев В. Н.	库德里亚夫采夫, В. Н. 516, 603
Кудрявцев И. И.	库德里亚夫采夫, И. И. 657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 181
Кузнецов А. А.	库兹涅佐夫, 阿·亚· 4, 34, 35, 42, 46, 47, 50—53, 70, 72, 73, 78, 96, 99, 121
Кузнецов В. В.	库兹涅佐夫, В. В. 76, 198, 373
Кузнецов В. И.	库兹涅佐夫, В. И. 34
Кузнецов Н. И.	库兹涅佐夫, Н. И. 108
Кузьмичев С. Ф.	库兹米切夫, С. Ф. 76, 95, 107
Куйбышев В. В.	古比雪夫, В. В. 64, 69
Куклин	库克林 544
Кулаков Ф. Д.	库拉科夫, Ф. Д. 257, 299
Кулик Г. И.	库利克, 格·伊· 38—41, 81
Кулик-Симонич	库利克—西蒙尼奇 38
Куликов В. Г.	库利科夫, В. Г. 362, 367
Куликов Д. Г.	库利科夫, Д. Г. 325, 326
Куликов М.	库利科夫, М. 224
Куликова	库利科娃 326
Кулов	库洛夫 436
Кунаев Д. А.	库纳耶夫, Д. 艾· 297, 320, 323, 375, 383, 398, 416, 438, 444, 445, 464, 465, 491
Куперин И. И.	库珀林, И. И. 85, 86
Куприн А. И.	库普林, А. И. 319
Купцов В. А.	库普佐夫, В. А. 513, 528, 592
Купцов В. И.	库普佐夫, В. И. 656
Курбский А.	库尔布斯基, А. 654
Куркова Б.	库尔科娃, Б. 593
Курносов А. А.	库尔诺索夫, А. А. 656
Курочкин	库罗奇金 179
Курчатов И. В.	库尔恰托夫, 伊·瓦· 57, 108, 117



Куусинен О. В. 库西年,奥·维· 76,159  
Кынин Г. П. 克宁,Г. П. 658

Л

Лавочкин С. А. 拉沃奇金,谢·亚· 35,111  
Лазарев 拉扎列夫 179  
Лазуркина Д. А. 拉祖尔金纳,Д. А. 217  
Лазутин П. Г. 拉祖金,П. Г. 52,53  
Лакшин В. Я. 拉克申,В. Я. 316,368  
Ланг 朗格 70  
Ландау Л. Д. 兰道,列·达· 243  
Ландсбергис В. 兰茨贝基斯,В. 505  
Ланин 兰宁 544  
Ланщикова А. П. 兰希科夫,А. П. 447  
Лапин 拉平 178  
Лаптев И. Д. 拉普捷夫,И. Д. 574  
Ларионов А. Н. 拉里奥诺夫,А. Н. 174,215,237  
Лацис О. Р. 拉齐斯,О. Р. 493,506,507,625  
Лебедев 列别杰夫 583  
Лебедев В. А. 列别杰夫,В. А. 80,165  
Лебедев В. М. 列别杰夫,В. М. 501  
Лебедев И. В. 列别杰夫,И. В. 242  
Лебедь А. И. 列别德,亚·伊· 531,588,589,594,595,606,  
627,629  
Ле Ван Тхинь 黎文兴  
Левин Б. С. 莱温,Б. С. 64,69  
Левит 列维特 312  
Левитан Ю. Б. 列维坦,Ю. Б. 197  
Легасов В. А. 列加索夫,В. А. 436,437  
Ле Дык Тхо 黎德寿  
Ле Зуан 黎笋

- Лейбович О. 列伊博维奇, О. 78, 240
- Лембергский И. Г. 连贝尔斯基, И. Г. 69
- Ленин В. И. 列宁, 弗·伊· 4, 66, 90, 97, 100, 103, 106, 117, 123, 125, 126, 128, 129, 148, 150, 159, 180, 215—217, 219, 234, 248, 256, 258, 263, 311, 312, 314, 321, 373, 408, 420, 440, 446, 449, 470, 475, 504, 517, 534, 605, 640, 644—646
- Ленарт Й. 列纳尔特, 约· 272, 276, 278, 282, 285, 289, 295, 309
- Леонов 列昂诺夫 544
- Леонов А. Г. 列昂诺夫, А. Г. 64, 68, 71, 73, 108
- Лечуга К. 列丘卡, К. 198, 242
- Либерман Е. Г. 利伯曼, Е. Г. 653
- Ливанов 利瓦诺夫, 113
- Лигачев Е. К. 利加乔夫, 叶·库· 382, 397, 403, 404, 406, 410, 416, 417, 421, 426, 428, 431—433, 441, 448, 449, 454, 456—460, 470, 471, 474—477, 480, 481, 489, 492, 497, 498, 500, 519, 636
- Липпман У. 李普曼, 华·
- Лисичкин Г. 利西奇金, Г. 312
- Лисов Е. 利索夫, Е. 629, 630
- Ли Сын Ман 李承晚 30
- Литвинов 利特维诺夫 274
- Литкенс 利特肯斯 95, 107, 114
- Лихачев 利哈乔夫 42, 45
- Лихачев Д. С. 利哈乔夫, Д. С. 499
- Лихачев М. Т. 利哈乔夫, М. Т. 64, 68, 108
- Лобов В. Н. 洛博夫, В. Н. 488
- Лобов О. И. 洛博夫, О. И. 598
- Логунов А. А. 洛古诺夫, А. А. 479
- Ло Жуйцин 罗瑞卿

Лозовский С. А.	洛佐夫斯基, С. А. 59, 60
Ломакин В. П.	洛马金, В. П. 501
Ломский В. П.	洛姆斯基, В. П. 275, 276, 278
Лужков Ю. М.	卢日科夫, Ю. М. 588, 599
Лукинов И.	卢基诺夫, И. 507, 508, 626
Лукьянов А. И.	卢基扬诺夫, 阿·伊· 416, 442, 445, 447, 456, 497, 501, 515, 516, 520, 526, 531, 535, 536, 556, 565, 571, 573, 574, 580, 581, 584—586, 592, 594, 597, 601, 603, 606, 629, 630, 634, 651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 В.	卢那察尔斯基, А. В. 640
Лучинский П. К.	卢钦斯基, П. К. 532, 538, 547, 626
Лысенко В. Н.	李森科, В. Н.
Лысенко Т. Д.	李森科, 特·杰· 49, 82, 235
Любимов А.	柳比莫夫, А. 593
Лю Шаоци	刘少奇 141, 264
Лю Сяо	刘晓 264

## М

Мазур	马祖尔 178
Мазуров К. Т.	马祖罗夫, К. Т. 232, 234, 282, 284, 291, 297, 299, 322
Майорец А. И.	马约列茨, А. И. 429, 431
Майоров	马约罗夫 49, 70, 71
Майрановский Г.	迈兰诺夫斯基, Г. 71
Майский И. М.	迈斯基, И. М. 21, 291
Макаров Н. П.	马卡罗夫, Н. П. 440
Макашов А. М.	马卡绍夫, 阿·米· 567, 569, 570
Маккеллар	麦克勒尔 25
Макклой Д.	麦克洛埃, 约· 198
Максимова Э.	马克西莫娃, Э. 81

- Маленков Г. М. 马林科夫, 格·马· 4, 17, 21, 35, 37, 43—46, 48, 50—59, 61—66, 68, 72—74, 76, 78, 81, 83, 85—93, 95—109, 111, 115—118, 121—124, 127, 130, 135, 136, 141, 144, 148—153, 155—159, 161, 162, 164—167, 169, 209, 244, 250, 387, 388, 500, 642, 647, 648, 650, 652, 656—658
- Малин В. Н. 马林, В. Н. 138, 164, 228, 232—237, 244, 652, 654
- Малиновский Р. В. 马利诺夫斯基, Р. В. 650
- Малиновский Р. Я. 马利诺夫斯基, 罗·雅· 160, 182, 189, 190, 193, 197, 205, 227
- Малофеев А. 马洛费耶夫, А. 547, 576
- Малыгин 马雷金 544
- Малышев В. А. 马雷舍夫, В. А. 49, 65, 76, 82
- Малышев Н. Т. 马雷舍夫, Н. Т. 616
- Мальков Н. И. 马利科夫, Н. И. 522
- Мамулов С. С. 马穆洛夫, С. С. 62, 72
- Манаенков Ю. А. 马纳延科夫, Ю. А. 513, 522, 592
- Мандельштам О. 曼德尔施塔姆, О. 440
- Манякин С. И. 马尼亚金, С. И. 460, 501
- Манякин Ю. Г. 马尼亚金, Ю. Г. 501
- Мао Цзэдун 毛泽东 10, 230, 263, 264
- Маркиш С. П. 马尔基什, С. П. 59
- Маркс К. 马克思, 卡· 90, 103, 128, 258, 311, 312, 383, 605, 645, 646
- Марченко А. Т. 马尔琴科, А. Т. 258
- Марчук Н. И. 马尔丘克, Н. И. 370
- Маршалл Дж. 马歇尔, 乔· 25—28, 80
- Маслов Н. Н. 马斯洛夫, Н. Н. 655, 656
- Маслюков Ю. Д. 马斯柳科夫, 尤·德· 493, 536, 537
- Масол В. А. 马索尔, В. А. 493

Матвеев Г.	马特维耶夫, Г. 656
Махнеев В.	马赫涅耶夫, В. 57
Машеров П. М.	马谢罗夫, П. М. 297, 323, 473
Маяков	马亚科夫 179
Медведев В. , генерал	梅德韦杰夫, 瓦·, 将军 400, 577, 583, 584, 629
Медведев В. А.	梅德韦杰夫, 瓦·安· 382, 416, 426, 442, 449, 475—477, 484, 491, 493, 494, 500, 516, 517, 519, 537, 540, 562, 563, 603, 606, 626—628, 630
Медведев Д. Н.	梅德韦杰夫, Д. Н. 108
Медведев Ж.	梅德韦杰夫, Ж. 82
Медведев Р. А.	梅德韦杰夫, Р. А. 400, 656
Медведев С.	梅德韦杰夫, С. 593
Медунов С. Ф.	梅杜诺夫, С. Ф. 380, 381, 387, 400
Мелиан П. Г.	梅利安, П. Г. 241
Мельников	梅利尼科夫 592
Мельников Л. Р.	梅利尼科夫, Л. Р. 76, 87
Мельчин С. А.	梅利钦, С. А. 9, 165—167, 243
Менон	梅农 85
Мердок Р.	默多克, Р. 557
Меркулов В. Н.	梅尔库洛夫, В. Н. 38, 58, 72, 107, 109, 218
Месяц В. К.	麦夏茨, В. К. 460
Месяцев Н.	梅夏采夫, Н. 244
Метлок Дж.	麦特洛克, 约· 579
Мехлис Л. З.	梅赫利斯, Л. З. 218
Мешик П. Я.	梅希克, П. Я. 107
Мжаванадзе В. П.	姆扎瓦纳泽, В. П. 216, 232, 234, 287, 420
Микоян А. И.	米高扬·阿·伊· 6, 13, 35, 57, 62, 74—76, 78, 83, 85, 87—89, 101, 105, 114, 123, 128, 129, 138—143, 150—152, 159, 180, 185, 189, 198, 219, 221, 222, 225, 232, 235—237, 320, 494, 650, 651, 657



Милевский	米列夫斯基 366
Минц И. И.	明茨, И. И.
Мирзаханов И.	米尔扎哈诺夫, И. 41
Мироненко В.	米罗年科, В. 553
Мироненко С. В.	米罗年科, С. В. 163, 243, 658
Миронов	米罗诺夫 107
Миронов Н. Р.	米罗诺夫, Н. Р. 227
Миттеран Ф.	密特朗, 弗 · 526
Михайлов	米哈伊洛夫 525
Михайлов А.	米哈伊洛夫, А. 306
Михайлов В. Н.	米哈伊洛夫, В. Н. 116
Михайлов Н.	米哈伊洛夫, Н. 643
Михайлов Н. А.	米哈伊洛夫, Н. А. 76, 100
Михалков С. В.	米哈尔科夫, С. В. 254
Михоэлс С. М.	米霍埃尔斯, С. М. 47, 59, 68, 92
Мичурин	米丘林 49
Млынарж Э.	姆利纳日, 兹 · 275, 289, 307, 309
Могильниченко К. Н.	莫吉利尼琴科, К. Н. 413, 482
Можаев Б. А.	莫扎耶夫, Б. А. 257, 317, 318, 326
Моисеев М. А.	莫伊谢耶夫, М. А. 595, 603
Мокроусов Б. Н.	莫克罗乌索夫, Б. Н. 180, 181
Молотов В. М.	莫洛托夫, 维 · 米 · 6, 10, 22, 23, 25, 27, 29, 35, 54, 60, 74—76, 78—81, 84—90, 92, 94, 96, 97, 101—103, 105, 106, 109, 114, 121, 123, 124, 133, 135, 137—139, 141, 150—159, 165, 167, 244, 261, 387, 388, 447, 471, 503, 642, 650, 656—658
Моргун Ф. Т.	莫尔贡, Ф. Т. 334, 369
Морозов	莫罗佐夫 106
Мосин Г. С.	莫辛, Г. С. 254
Москаленко К. С.	莫斯卡连科, К. С. 99, 153, 281

Мостовой П. И.	莫斯特沃伊, П. И.	493
Музафаров	穆扎法罗夫	381
Музыкантский А. И.	穆兹坎斯基, А. И.	513, 605
Мурадов	穆拉多夫	610
Мураховский В. С.	穆拉霍夫斯基, В. С.	441
Мурашко Г. П.	穆拉什科, Г. П.	80, 658
Мурашов А.	穆拉绍夫, А.	544
Мурин Ю.	穆林, Ю.	165
Мусатов В. Л.	穆萨托夫, В. Л.	165, 166
Муталибов А.	穆塔利博夫, А.	532, 533, 547, 595, 602
Мухаммед Дауд	穆罕默德, 达乌德	351
Мухитдинов Н. А.	毛希丁诺夫, Н. А.	150, 152, 167
Мюнних Ф.	明尼赫, 费 ·	140, 143

## Н

Набатов И. С.	纳巴托夫, И. С.	112
Нагибин Ю. М.	纳吉宾, Ю. М.	317
Надь И.	纳吉, 伊 ·	136, 139—141, 143, 165, 166, 288, 289
Назарбаев Н. А.	纳扎尔巴耶夫, 努 · 阿 ·	465, 516, 538, 539, 577, 580, 595, 602, 603, 614, 621, 622
Назаров Р.	纳扎罗夫, Р.	306
Наринский М. М.	纳林斯基, М. М.	80, 656
Насер Г. -А.	纳赛尔, 加 · 阿 ·	230
Наумов В. П.	瑙莫夫, В. П.	164, 656
Нго Ван Ви	吴文伟	345
Нго Динь Дзу	阮廷祖	345, 346
Нго Динь Дьем	阮廷艳	345
Нгуен Ван Тхиеу	阮文绍	337, 342
Нгуен Зиап	武元甲	265
Нгуен Кхань	阮庆	345

Нгуен Хюи Ань	阮辉英 346
Невежин В. А.	涅韦任, В. А. 657
Нежинский Л. М.	涅任斯基, Л. М. 79, 80, 369
Некрасов В. П.	涅克拉索夫, В. П. 224
Некрич А. М.	涅克里奇, А. М. 81, 324
Немелков	涅梅尔科夫 145
Немчинов В. С.	涅梅奇诺夫, В. С. 251, 306
Нестеров	涅斯捷罗夫 146
Нестеров В. Е.	涅斯捷罗夫, В. Е. 132
Никологорский	尼科洛戈尔斯基 544
Никонов А. А.	尼科诺夫, А. А. 440
Никонов В. П.	尼科诺夫, 维·彼· 416, 426, 441, 455, 493
Никсон Р.	尼克松, 理· 336, 337, 339, 344, 345
Нишанов Р. Н.	尼沙诺夫, Р. Н. 574
Новиков	诺维科夫 544
Новиков А. А.	诺维科夫, А. А. 35—37, 39, 46, 93
Новиков В. Н.	诺维科夫, В. Н. 333
Новодворская В. И.	诺沃德沃尔斯卡娅, В. И. 530
Новомесский	诺沃麦斯基 309
Новотный А.	诺沃特内, А. 270—278, 284
Нониев С. Г.	诺尼耶夫, С. Г. 379
Носкова А. Ф.	诺斯科娃, А. Ф. 80
Носов	诺索夫 113

## О

Обичкин	奥比奇金 106
Оболенский А. М.	奥博连斯基, А. М. 503
Обручников Б. П.	奥布鲁奇尼科夫, Б. П. 61, 63
Огарков Н. В.	奥加尔科夫, Н. В. 393, 394, 396
Огольцов С. И.	奥戈利佐夫, С. И. 59, 64, 67, 68, 72, 92
Огородников	奥戈罗德尼科夫 544

Одзяцкий	奥德利亚茨基 113
Окуджава Б. Ш.	奥库贾尼, Б. Ш. 316, 318
Окулицкий Л.	奥库利茨基, Л. 22
Олейник Б.	奥列伊尼克, Б. 479
Олейник В. И.	奥列伊尼克, В. И. 399
Ольшовский	奥尔索夫斯基 363
Оников Л.	奥尼科夫, Л. 491
Орджоникидзе Г. К.	奥尔忠尼启则, 格·康· 650
Орехов А. М.	奥列霍夫, А. М. 166
Орехова Е. А.	奥列霍娃, Е. А. 166
Орлов В. П.	奥尔洛夫, В. П. 502
Орлов Ю. Ф.	奥尔洛夫, Ю. Ф. 132, 165
Орловский К. П.	奥尔洛夫斯基, К. П. 108
Осетров	奥谢特罗夫 413
Осипович	奥西波维奇 392
Осипьян Ю. А.	奥西皮扬, Ю. А. 537
Островский А. Н.	奥斯特洛夫斯基, А. Н. 310
Островский В. Б.	奥斯特洛夫斯基, В. Б. 78
Охаб Э.	奥哈布, 爱· 137
Охотин Н. Г.	奥霍京, Н. Г. 163, 243

## П

Павел Й.	帕维尔, 约· 280, 285, 287
Павлов	帕夫洛夫 610
Павлов В. С.	帕夫洛夫, 瓦·谢· 452, 507, 540, 559, 573, 574, 579, 581, 582, 585, 586, 591, 594, 603, 625, 627
Павловский А. И.	帕夫洛夫斯基, А. И. 116
Палкин А. М.	帕尔金, А. М. 68, 72
Пальм В. А.	帕尔姆, В. А. 504
Панкин Б. Д.	潘金, 鲍·德· 604

Панников В.	帕尼科夫, В. 306
Паперный З.	帕佩尔内, З. 324
Параджанов С. И.	帕拉贾诺夫, С. И. 254
Парамонов	帕拉莫诺夫 107
Парфенов И. А.	帕尔菲奥诺夫, И. А. 55
Пастернак Б. Л.	帕斯特纳克, Б. Л. 319, 445
Патиашвили Д.	帕季阿什维利, Д. 498
Патоличев Н. С.	帕托利切夫, Н. С. 45, 76, 151, 412
Паустовский К.	帕乌斯托夫斯基, 康 · 146
Пачковский А.	帕奇科夫斯基, А. 656
Пашкевичус	帕什克维奇 111
Певзнер М. И.	佩夫斯纳, М. И. 69
Пегов Н. М.	别哥夫, Н. М. 76, 89
Пекарский Л.	佩卡尔斯基, Л. 313
Пеликан И.	佩利坎, И. 296, 297
Пельше А. Я.	佩尔谢, 阿 · 雅 · 275, 284, 287, 297, 322, 384, 399, 650
Пеньковский О. В.	佩尼科夫斯基, О. В. 194
Первухин М. Г.	别尔乌辛, 米 · 格 · 57, 76, 85, 87, 105, 139, 144, 150—153, 156, 157, 159, 208
Пермитин Е.	佩尔米京, Е. 111
Пестовы	佩斯托夫 326
Петраков Н. Я.	佩得拉科夫, Н. Я. 416, 454, 529
Петров Е.	彼得罗夫, Е. 60
Петров Н. В.	彼得罗夫, Н. В. 83, 163, 243
Петровский Г. И.	彼得罗夫斯基, 格 · 伊 · 147
Петрыгин М.	彼得雷金, М. 147
Печенев В.	佩切涅夫, В. 401
Пешков М.	佩什科夫, М. 69
Пиллер Й.	皮列尔, 约 · 300
Пильняк Б. А.	皮利亚尼克, Б. А. 445



- Пиньковский  
 Питовранов Е. П.  
 Пихоя Л. Г.  
 Пихоя Р. Г.
- Платонов А.  
 Платонов С. Ф.  
 Плетнев Д. Д.  
 Плеханов Ю. С.  
 Плешаков Л.  
 Плиев И. А.  
 Плятт Р. Я.  
 Подгорный Н. В.
- Подколзин Е. Н.  
 Пожаров А. И.  
 Покровский М. Н.  
 Покровский Н. Н.  
 Поликарпов В. В.  
 Поликарпов В. Д.  
 Полозков И. К.
- Полторанин М. Н.  
 Полукаров  
 Поляков В. И.  
 Поляков Ю. А.  
 Полянский Д. С.
- Пономарев Б. Н.
- 皮尼科夫斯基 360  
 皮托夫拉诺夫, Е. П. 64, 68  
 皮霍娅, 柳·格· 568, 630  
 皮霍亚, 鲁·格· 9, 83, 240, 349, 369, 630, 654—658  
 普拉托诺夫, А. 443  
 普拉托诺夫, С. Ф. 655  
 普列特尼奥夫, Д. Д. 64, 69, 123  
 普列汉诺夫, Ю. С. 582—584  
 普列沙科夫, Л. 326  
 普利耶夫, И. А. 180, 191, 193, 205  
 普利亚特, Р. Я. 254  
 波德戈尔内, 尼·维· 217, 226—228, 231, 232, 236, 239, 245, 274, 280, 282, 284, 287, 292, 297, 302, 304, 307, 320, 322, 500  
 波德戈尔津, Е. Н. 531  
 波扎罗夫, А. И. 163  
 波克罗夫斯基, М. Н. 640, 641, 655  
 波克罗夫斯基, Н. Н. 658  
 波利卡尔波夫, В. В. 656  
 波利卡尔波夫, В. Д. 447  
 波洛兹科夫, И. К. 445, 522—524, 528, 539, 549, 552, 554, 592, 626  
 波尔托拉宁, 米·尼· 503, 611  
 波卢卡罗夫 113  
 波利亚科夫, В. И. 226, 231, 234, 237, 244  
 波利亚科夫, Ю. А. 493  
 波良茨基, Д. С. 226, 229, 231, 234—239, 244, 278, 282, 299, 304  
 波诺马廖夫, 鲍·尼· 231, 237, 275, 289, 294, 322, 331, 352, 354, 406, 420, 641

Пономарев Л. А.	波诺马廖夫, Л. А. 527
Пономаренко П. К.	波诺马连科, 潘·孔· 76, 87, 88, 97, 105, 170
Попков П. С.	波普科夫, П. С. 51—53, 72
Попов В. П.	波波夫, В. П. 78, 79, 655, 656
Попов Г. М.	波波夫, 格·米· 35, 55
Попов Г. Х.	波波夫, 加·哈· 242, 446, 454, 499, 503, 506, 518, 539, 596, 599
Попов С. В.	波波夫, С. В. 240, 625
Попцов О.	波普佐夫, О. 598, 628, 630
Портнов	波尔特诺夫 588
Поскребышев А. Н.	波斯克列贝舍夫, А. Н. 36, 67, 76, 114
Поспелов П. Н.	波斯佩洛夫, 彼·尼· 87—90, 105, 106, 117, 119, 120, 122, 123, 125—127, 144, 150, 152, 153, 158, 159, 164, 167, 312, 315, 447
Потемкин	波将金 544
Прибытков В. В.	普里贝特科夫, В. В. 334, 369, 400, 401, 652
Примаков Е. М.	普里马科夫, 叶·马· 402, 537, 540, 601, 603
Приставкин А.	普里斯塔夫金, А. 446
Прокофьев Ю. А.	普罗科菲耶夫, Ю. А. 513, 517, 533, 538, 565, 576, 578, 585, 592
Прохазка Я.	普罗哈兹卡·亚 280
Проханов А.	普罗汉诺夫, А. 575
Пруцкова О. А.	普罗茨科夫, О. А. 657
Прхлик В.	普尔赫利克, В. 285, 286, 293, 308
Пуго Б. К.	普戈, 鲍·卡· 540, 541, 561, 573, 577—579, 581, 582, 585, 586, 591
Пуговкин	普戈夫金 63
Пузанов А. М.	普扎诺夫, А. М. 76
Путилин Б. Г.	普季林, Б. Г. 241
Путинцев	普京采夫 52, 53, 64
Пушкин А. С.	普希金, А. С. 570

Пыжиков А. В.

佩日科夫, А. В. 656

Пэн Чжэнь

彭真 264

## Р

Радек К. Б.

拉杰克, К. Б. 4

Разуваев В.

拉祖瓦耶夫, В. 654

Разумов Е. З.

拉祖莫夫, Е. З. 442, 469

Разумовский Г. П.

拉祖莫夫斯基, Г. П. 416, 422, 426, 442, 447, 450, 456, 469, 493, 496, 515

Райк Л.

赖克, Л. 129

Райхман Л. Ф.

赖赫曼, Л. Ф. 72, 73, 95, 107

Ракитский Б. В.

拉基茨基, Б. В. 311, 313

Раковский

拉科夫斯基 363

Раковский Х. Г.

拉科夫斯基, Х. Г. 129

Ракоши М.

拉科西, 马 · 27, 31, 80, 136—138, 165

Раск Д.

拉斯克, Д. 198, 290, 335

Распутин В.

拉斯普京, 瓦 · 537, 575

Рахманин О. Б.

拉赫马宁, О. Б. 359

Рашидов Ш. Р.

拉希多夫, 夏 · 拉 · 190, 232, 235, 244, 297, 323, 383, 438

Реваи Й.

雷瓦伊, 约 · 136, 137

Ревенко Г. И.

列文科, 格 · 伊 · 431, 535, 537

Рейган Р.

里根, 罗 · 392, 423, 427, 428, 484, 563

Рекунков А. М.

列昆科夫, А. М. 378, 399

Репин А. К.

列平, А. К. 35, 36, 93

Риббентроп И.

里宾特洛甫, 约 · 10, 137, 261, 471, 503

Риго

里戈 289, 300

Рогинский А. Б.

罗金斯基, А. Б. 163, 243

Родионов М. И.

罗季奥诺夫, М. И. 51—53, 114, 121

Родос Б.

罗多斯, 鲍 · 123

Рокоссовский К. К.

罗科索夫斯基, 康 · 康 · 31, 32, 38, 138

Романов	罗曼诺夫 544
Романов А. И.	罗曼诺夫, А. И. 325, 326
Романов Г. В.	罗曼诺夫, 格·瓦· 374, 375, 382, 383, 386— 388, 395, 400, 406, 421, 422
Романов С.	罗曼诺夫, С. 395
Романов Ю. А.	罗曼诺夫, Ю. А. 116
Ромашко	罗马什科 113
Ромашов Б.	罗马绍夫, Б. 60
Роскин Г. И.	罗斯金, Г. И. 48, 82
Ростоу У.	罗斯托, 维·
Ростропович М. Л.	罗斯特罗波维奇, М. Л. 598
Рубикс А. П.	鲁比克斯, 阿·彼· 540, 547
Рублев	鲁布廖夫 113
Рудаков	鲁达科夫 146
Рудаков А. П.	鲁达科夫, А. П. 231
Руденко Р. А.	鲁坚科, Р. А. 108, 144, 158, 319
Рудзутак Я. Э.	鲁祖达克, 扬·埃 650
Рудинский Ф. М.	鲁金斯基, Ф. М. 657
Рузвельт Ф. Д.	罗斯福, Ф. Д. 79, 485
Румянцев А. М.	鲁缅采夫, А. М. 310—313, 368
Русаков К. В.	鲁萨科夫, К. В. 280, 284, 293, 294, 366, 367
Русланова Л. А.	鲁斯兰诺娃, Л. А. 34, 42, 184
Руст М.	鲁斯特, М. 452
Рухадзе Н. М.	鲁哈泽, Н. М. 67, 77, 91
Руцкой А. В.	鲁茨科伊, 亚·弗· 561, 568, 569, 588, 596, 597, 601—603, 611—614, 616, 617, 628, 629, 631
Рыбаков А. Н.	雷巴科夫, А. Н. 317, 445, 498
Рыбаков Б. А.	雷巴科夫, Б. А. 312
Рыбальченко Ф. Т.	雷巴利琴科, 菲·特· 38—41, 81
Рыбкин И. П.	雷布金, И. П. 558
Рыжиков	雷日科夫 70

РЫЖКОВ Н. И.	雷日科夫, 尼·伊· 252, 306, 331, 369, 377, 382, 399, 401, 403, 406, 408—410, 416, 422, 429, 430—433, 441, 442, 449, 452, 456, 460, 475, 477, 481, 486—489, 491—493, 501, 516, 518, 519, 522—526, 528—530, 532—539, 565—567, 569, 570, 610, 626, 627
РЫЖКОВ Ю. А.	雷日科夫, Ю. А. 571
РЫКИН В.	雷金, В. 554
РЫКОВ А. И.	李可夫, А. И. 4, 148, 650
РЮМИН М. Д.	留明, М. Д. 64, 65, 67, 69, 91, 99, 108
РЯБОВ В. В.	里亚博夫, В. В. 656
РЯБОВ Я. П.	里亚博夫, Я. П. 417, 460
РЯСНОЙ	里亚斯诺伊 89

## С

Сабуров М. З.	萨布罗夫, 马·扎· 76, 85, 87, 105, 123, 141—143, 150—153, 156, 157, 160, 167
Савинков Б.	萨温科夫, Б. 326
Садовский Ш.	萨多夫斯基, Ш. 271, 282, 285
Садыков Ф. Б.	萨德科夫, Ф. Б. 369
Саенко Г. В.	萨延科, Г. В. 558
Сазыкин Н. С.	萨济金, Н. С. 61, 107, 114
Сайкин В. Т.	赛金, В. Т. 179
Салаи Б.	萨拉伊, Б. 165
Салиманов	萨利马诺夫 65
Салимов А.	萨利莫夫, А. 413
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 М. Е.	萨尔特科夫-谢德林, М. Е. 85, 172
Самарин	萨马林 42
Самолис Т.	萨莫利斯, Т. 415, 492
Самсонов В. Н.	萨姆索诺夫, В. Н. 593
Санто Э.	桑托, 埃· 140



Сатюков П. А.	萨秋科夫, П. А. 368
Сафронов В. П.	萨夫罗诺夫, В. П. 79
Сахаров А. Д.	萨哈罗夫, 安·德· 57, 116, 237, 244, 255, 261, 327, 329, 499, 502, 504, 568
Сванидзе А. С.	斯瓦尼泽, 亚·谢· 650
Свердлов А. Я.	斯维尔德洛夫, А. Я. 71, 95, 107, 114
Свердлов Я. М.	斯维尔德洛夫, Я. М. 71
Свифт Д.	斯威夫特, Д. 168
Свобода Л.	斯沃博达, Л. 276, 279, 284, 297, 302, 304, 309
Севостьянов Г. Н.	谢沃斯季亚诺夫, Г. Н. 9
Седова-Троцкая Н. И.	谢多娃-托洛茨卡娅, Н. И. 129
Секачев А. Я.	谢卡切夫, А. Я. 55
Секу Туре А.	塞古, 杜尔·艾· 231
Селезнев Н. П.	谢列兹尼奥夫, Н. П. 36, 93
Семенов, референт Шкирятова	谢苗诺夫, 什基里亚托夫的顾问 125
Семенов,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ь ДПР	谢苗诺夫, 俄罗斯民主党主席 544
Семичастный В. Е.	谢米恰斯内, 弗·叶· 174, 210, 212, 225— 228, 240, 256, 376, 520
Сенин О. М.	谢宁, О. М. 325, 326
Сергеев	谢尔盖耶夫 544
Сергеев А.	谢尔盖耶夫, А. 567
Середа В. Т.	谢列达, В. Т. 166
Серов И. А.	谢罗夫, 伊·亚· 4, 34, 37, 42, 43, 61, 62, 115, 123, 143, 144, 151, 157, 158, 160, 211, 212
Сивицкий	西韦茨基 366
Сигачев Ю.	西加切夫, Ю. 167, 243
Сиднев А. М.	西德涅夫, А. М. 41
Сидорова Л. А.	西多罗娃, Л. А. 642, 656

Силаев И. С.	西拉耶夫, 伊·斯· 493, 523, 525, 526, 534, 555, 558, 580, 587—591, 596, 597, 601, 615, 630
Силлари Э. -А. А.	西拉里, Э. -А. А 549
Симонов К. М.	西蒙诺夫, К. М. 74, 254
Симонов Н. С.	西蒙诺夫, Н. С. 78, 656
Синявский А. Д.	西尼亚夫斯基, А. Д. 253, 254, 257, 326
Ситарян С. А.	西塔良, С. А. 454
Ситнин В.	西特宁, В. 252, 306
Скали Д.	斯卡利, Д. 202, 205
Скобельский И. М.	斯科别利斯基, И. М. 262
Скоков Ю. В.	斯科科夫, Ю. В. 589, 616
Скурлатов В. И.	斯库尔拉托夫, В. И. 530
Славик	斯拉维克 284, 287, 293
Славский Е. П.	斯拉夫斯基, Е. П. 435, 436
Сланский Р.	斯兰斯基, Р. 129, 280
Слуцкий А. И.	斯卢茨基, А. И. 640
Слюньков Н. Н.	斯柳尼科夫, Н. Н. 383, 425, 445, 455
Сметанин В.	斯梅塔宁, В. 530
Смирнов В.	斯米尔诺夫, В. 254
Смирнов В. И.	斯米尔诺夫, В. И. 413
Смирнов Г. Л.	斯米尔诺夫, Г. Л. 447, 643, 656
Смирнов-Сокольский Н. П.	斯米尔诺夫-索科利斯基, Н. П. 112
СМИТ	斯米特 18
Смоленцев Е. А.	斯莫连采夫, Е. А. 603
Смолянкин	斯莫利亚金 132
Смрковский Й.	斯莫尔科夫斯基, Й. 272, 276, 278—282, 284, 285, 289, 294—298, 302, 309
Соболев	索博列夫 610
Соболев Л.	索博列夫, Л. 254
Собчак А. А.	索布恰克, А·亚· 499, 588, 593
Согрин В. В.	索格林, В. В. 493, 655

Соколов ( зам. нач. Следст. части)	索科洛夫( 侦查处副处长)	68,369
Соколов	索科洛夫	379
Соколов А. К.	索科洛夫, А. К.	658
Соколов А. С.	索科洛夫, А. С.	552
Соколов И.	索科洛夫, И.	417
Соколов С. Л.	索科洛夫, 谢·列·	416, 428, 432, 452, 455, 492
Соколова М. В.	索科洛娃, М. В.	375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В. Д.	索科洛夫斯基, 瓦·丹·	26, 34, 160
Сокольников Г. Я.	索科利尼科夫, Г. Я.	650
Солженицын А. И.	索尔仁尼琴, 亚·伊·	224, 256, 257, 261, 306, 316, 318—321, 326, 369, 376, 381, 388, 449
Соловьев В.	索洛维约夫, В.	400, 492, 494
Соловьев Н. В.	索洛维约夫, Н. В.	51, 52
Соловьев Ю. Ф.	索洛维约夫, Ю. Ф.	422, 425, 454, 500
Соломенцев М. С.	索洛缅采夫, 米·谢·	278, 299, 320, 323, 373, 397, 410, 421, 430, 441, 444, 447, 461, 469, 474, 492
Солоухин В. А.	索洛乌欣, В. А.	258, 446
Сон Дон Вин	孙淳元	396
Сосламбеков Ю.	索斯拉姆别科夫, Ю.	630
Сотников	索特尼科夫	181
Соренсен Т.	索伦森, Т.	198
Софронов А.	索夫罗诺夫, А.	60
Спиридонов	斯皮里多诺夫	216
Спиридонов Н. К.	斯皮里多诺夫, Н. К.	89

Сталин И. В.	斯大林, 约·维· 4, 6, 9—11, 16, 17, 22, 23, 29—51, 53—56, 58—92, 95—98, 100—112, 114—116, 122—135, 137, 139, 145, 147—150, 153, 155—163, 165, 169, 182, 183, 207, 215—219, 234, 240, 248, 253, 255—257, 263, 274, 318, 321—324, 339, 369, 374, 376, 377, 382, 388, 389, 440, 443, 445—449, 460, 475, 482, 483, 513, 520, 632, 634, 640, 641, 647, 650, 652, 655—658
Стаменов	斯塔梅诺夫 109
Станкевич С. Б.	斯坦克维奇, 谢·鲍· 499, 616
Старков Б.	斯塔尔科夫, Б. 163
Старовойтова Г. В.	斯塔罗沃伊托娃, Г. В. 580
Стародубцев В. А.	斯塔罗杜布采夫, В. А. 575, 578, 586
Старостин М.	斯塔罗斯京, М. 85
Стаханов Н. П.	斯达汉诺夫, Н. П. 64
Стаценко И. Д.	斯塔岑科, И. Д. 192, 197
Степанков В.	斯捷潘科夫, В. 629, 630
Степанов	斯捷潘诺夫 146
Степанов А. С.	斯捷潘诺夫, А. С. 9, 81, 167, 243, 332, 369
Стерлигов А. Н.	斯捷尔利戈夫, А. Н. 379, 400, 596, 601
Стеттиус Э. -Р.	斯退丁纽斯, Э. -Р. 22
Стивенсон Э.	史蒂文森, Э. 198
Стильве	斯季利维 146
Столяров Н. С.	斯托利亚罗夫, Н. С. 602
Строев Е. С.	斯特罗耶夫, Е. С. 592
Струев А. И.	斯特鲁耶夫, А. И. 379
Стыкалин А. С.	斯特卡林, А. С. 166
Стыров В. Д.	斯特罗夫, В. Д. 98, 645
Суан Тхюи	春水 337, 342
Субоцкий Ю.	苏博茨基, Ю. 313
Суворов В.	苏沃洛夫, В. 656

Судоплатов П. А.	苏多普拉托夫, П. А. 61, 71, 107—109, 164
Сурков А.	苏尔科夫, А. 254
Сурков А. П.	苏尔科夫, А. П. 592
Суриц Я. З.	苏里茨, Я. З. 650
Суслов М. А.	苏斯洛夫, 米·安· 17, 55, 56, 76, 89, 139— 143, 150—152, 155, 157, 159, 160, 167, 222, 225, 231, 232, 234, 235, 238, 239, 257, 284, 287, 294, 297, 319—322, 334, 352, 359, 361, 363, 367, 399, 615, 650
Суханов Д. Н.	苏哈诺夫, Д. Н. 648
Сухарев А. Я.	苏哈列夫, А. Я. 501
Сухов Л. И.	苏霍夫, Л. И. 574
Сушков В.	苏什科夫, В. 412, 491
Сыроватко В. С.	瑟罗瓦特科, В. С. 552, 555
Сычев	瑟乔夫 553
Сюзюмов М. Я.	休久莫夫, М. Я. 654

## Т

Тагер И. Л.	塔格尔, И. Л. 111
Талызин Н. В.	塔雷津, Н. В. 492
Тамм И. Е.	塔姆, И. Е.
Тангиев	坦吉耶夫 64
Тараки Н. -М.	塔拉基, Н. -М. 352—356
Тарасов Б. В.	塔拉索夫, Б. В. 558
Тарле Е.	塔尔列, Е. 402
Тарновский К. Н.	塔尔诺夫斯基, К. Н. 314, 368
Тафт	塔夫脱 25
Твардовский А. Т.	特瓦尔多夫斯基, А. Т. 224, 316—318, 368, 643
Твердохлебов А. Н.	特维尔多赫列博夫, А. Н. 327
Тверитинов Б. С.	特维里季诺夫, Б. С. 379



Тевосян И. Ф.	捷沃相, И. Ф. 76, 106
Тейлор	泰勒 188
Телегин К. Ф.	捷列金, К. Ф. 34, 41, 42
Тендряков В.	坚德里亚科夫, В. 317, 318, 326
Терехов	捷列霍夫 123
Тизяков А. И.	季贾科夫, А. И. 575, 578, 581, 586, 601, 603, 606, 629
Тимашук Л. Ф.	季马舒克, Л. Ф. 49, 50, 69—71, 82, 92
Тимофеев-Ресовский Н. В.	季莫费耶夫—列索夫斯基, Н. В. 446
Тимошенко С. К.	铁木辛哥, 谢·康· 33, 183
Тимошенко Ю. Т.	季莫先科, Ю. Т. 176
Тито И.	铁托, 约· 111, 143, 148, 284, 290
Титов В. Н.	季托夫, В. Н. 231, 237
Тихонов В.	吉洪诺夫, 瓦· 513
Тихонов Н. А.	吉洪诺夫, 尼·亚· 334, 364, 373, 375, 383—388, 394, 397, 398, 406, 410, 416, 421, 422, 444, 481
Тихонов Н. С.	吉洪诺夫, Н. С. 254
Токуда	德田球一 70
Толкачев А. С.	托尔卡切夫, А. С. 85, 86
Толмэн Р.	托尔曼, Р. 346
Толпежников В. Ф.	托尔佩日尼科夫, В. Ф. 502
Толстых Б. Л.	托尔斯特赫, Б. Л. 493
Томилина Н. Г.	托米林娜, Н. Г. 9
Томский Н. В.	托姆斯基, Н. В. 323
Торез М.	多列士, 莫· 70
Травкин Н. И.	特拉夫金, Н. И. 544
Трапезников С. П.	特拉佩兹尼科夫, С. П. 310—313, 382, 447
Трегубов Н. П.	特列古博夫, Н. П. 379
Третьяков А. Ф.	特列季亚科夫, А. Ф. 86, 89
Трифонов Ю.	特里福诺夫, Ю. 317

Трофимов Ю. А.	特罗菲莫夫, Ю. А. 113
Троцкий Л. Д.	托洛茨基, 列·达· 4, 71, 113, 126, 129, 326, 446, 643, 650
Трубин Н. С.	特鲁宾, Н. С. 579, 603
Трумэн Г.	杜鲁门, 哈· 22, 28, 38
Трутнев Ю. А.	特鲁特涅夫, Ю. А. 116
Трухановский В. Г.	特鲁哈诺夫斯基, В. Г. 653
Тулеев А. М.	图列耶夫, А. М. 567, 569, 570
Туполев А. Н.	图波列夫, А. Н. 35
Турко И. М.	图尔科, И. М. 52
Турчин В. Ф.	图尔钦, В. Ф. 327
Тутвилер М.	塔特怀勒, М. 560
Тухачевский М. Н.	图哈切夫斯基, 米·尼· 4, 40, 382
Тэтчер М.	撒切尔, М. 428, 485, 492, 628
Тяжельникова В. С.	佳热利尼科娃, В. С. 658

## У

Уборевич И. П.	乌博列维奇, И. П. 40
Угринов	乌格里诺夫 262
Узлов	乌兹洛夫 326
Ульбрихт В.	乌布利希, 瓦· 293, 295, 299, 301, 303
Ульянов М. А.	乌里扬诺夫, М. А. 479, 497
Ульянова М. И.	乌里扬诺娃, М. И. 650
Ульяновский Р. А.	乌里扬诺夫斯基, Р. А. 354
Умалатова С. З.	乌马拉托娃, С. З. 539, 574
Умаров Т.	乌马罗夫, Т. 413
Усманходжаев И. Б.	乌斯曼霍贾耶夫, И. Б. 383, 413
Усов В.	乌索夫, В. 600, 604
Устинов В. И.	乌斯季诺夫, В. И. 107
Устинов Д. Ф.	乌斯季诺夫, 德·弗· 6, 257, 283, 291, 304, 323, 349, 350, 354, 359—362, 365—367, 375, 376, 383, 384, 387—389, 392—394, 397—399

У Тан 吴丹 198,202,203  
Утехин Г. В. 乌捷欣,Г. В. 68,95,114  
Ухабова 乌哈博娃 326

Ф

Фадеев А. А. 法捷耶夫,А. А. 60  
Файмонвилл 费蒙威尔 72  
Фалин В. В. 法林,В. В. 651  
Фалин В. М. 法林,В. М. 538,552,592  
Фальк П. П. 法尔克,П. П. 503  
Фам Ван Донг 范文同 266,339,340  
Фаркаш К. 法尔卡什,К. 136  
Федин К. А. 费定,К. А. 254,317  
Федоров 费奥多罗夫 70  
Федоров Б. Г. 费奥多罗夫,Б. Г. 523,535  
Федоров Н. Т. 费奥多罗夫,Н. Т. 601  
Федорчук В. В. 费多尔丘克,维·瓦· 381,396,414,492  
Федосеев И. И. 费多谢耶夫,И. И. 63,64  
Федюнинский И. И. 费久宁斯基,И. И. 34  
Феклисов А. С. 费克利索夫,А. С. 242  
Фельдвари Р. 费利德瓦里,Р. 165  
Феокистов Л. П. 费奥克蒂斯托夫,Л. П. 116  
Фефер И. С. 费费尔,И. С. 59,61,63,64  
Филатов С. 费拉托夫,谢· 629  
Филиппов Ю. 费利波夫,尤· 656  
Филитов А. М. 菲利托夫,А. М. 79  
Фитин 菲京 72  
Фишбах 费什巴赫 363  
Фойо С. 福约,С. 533  
Фок 福克 288  
Фокеев М. Г. 福克耶夫,М. Г. 325,326

Фомин( Феклисов) А.	福明( 费克利索夫), А. 202, 205
Франс А.	法朗士, А. 657
Френкель М.	弗伦克尔, М. 326
Фролов И. Т.	弗罗洛夫, И. Т. 416, 517—519
Фурсенко А. А.	富尔先科, А. А. 447
Фурцева Е. А.	福尔采娃, 叶·阿· 144, 150, 152, 159

## X

Хаддад В.	哈达德, 瓦· 348, 349
Хадзиевы-Албаковы	哈济耶夫-阿尔巴科夫 609
Хазанов А. М.	哈扎诺夫, А. М. 370
Ханин Г. И.	哈宁, Г. И. 401
Хариковы	哈里科夫 610
Харин Г. Н.	哈林, Г. Н.
Харитон Ю. Б.	哈里顿, Ю. Б. 57, 116
Харрис Б.	哈里斯, Б. 188
Хасбулатов Р. И.	哈斯布拉托夫, 鲁·伊· 555, 558, 560, 567, 568, 587, 588, 590, 596, 597, 611, 617, 628
Хачукаева	哈丘卡耶娃 610
Хашиевы	哈希耶夫家族 610
Хворостухин	赫沃罗斯图欣 237
Хегедюш А.	赫格居斯, 安· 137—140, 165, 166
Хейг А.	黑格, А. 357
Хейман С.	海曼, С. 306
Херд Д.	赫尔德, Д. 527
Хидаш И.	希达什, И. 165
Хлевнюк О. В.	赫列夫纽克, О. В. 9, 657
Хноупек Б.	赫努佩克, 博· 286
Хо Ши Мин	胡志明 264, 266, 337, 339
Хоанг Ань	黄英 341, 342
Ходорковский М. Б.	霍多尔托夫斯基, М. Б. 509, 510

Ходасевич В. Ф.	霍达谢维奇, В. Ф. 445
Холин В.	霍林, В. 400
Хорхордина Т. И.	霍尔霍尔金娜, Т. И. 657
Хруничев М. В.	赫鲁尼切夫, М. В. 35
Хрущев Н. С.	赫鲁晓夫, 尼·谢· 4, 6, 7, 15, 16, 19, 44, 49, 54—56, 58, 62, 72, 74, 76, 78, 81—83, 85—91, 93, 94, 96—102, 104—111, 113, 115, 117, 121—144, 147—160, 162—165, 168—175, 177, 178, 181—186, 189—191, 193—213, 215—246, 248—250, 253, 254, 263, 270, 273, 274, 305, 319, 320, 330, 368, 374, 377, 387—390, 407, 424, 443, 461, 466, 500, 513, 520, 543, 563, 570, 578, 587, 628, 632, 636, 641—643, 647, 650, 652, 656
Хрущев С. Н.	赫鲁晓夫, 谢·尼· 227, 241, 242, 244
Худик М.	胡迪克, 米· 270, 271
Худяков С. А.	胡佳科夫, С. А. 35
Хэ Лун	贺龙 264

## Ц

Цанава Л. Ф.	察纳娃, Л. Ф. 59, 92
Цветаева М. И.	茨韦塔耶娃, М. И. 440
Цвигун С. К.	茨维贡, С. К. 374
Церетели И.	采列捷利, И. 498
Цикулин В. А.	齐库林, В. А. 242
Цирков Г. А.	齐尔科夫, Г. А. 116
Цисарж Ч.	齐萨日, Ч. 284, 285, 287, 289, 293, 295, 297, 303, 308, 309
Цой В.	措伊, В. 415
Цюрупа А. Д.	秋鲁帕, А. Д. 219



## Ч

Чазов Е. И.	恰佐夫, Е. И. 375, 404
Чалидзе В. Н.	恰利泽, В. Н. 327
Чан Бен Ир	陈冰英 396
Чан Ван Куанг	陈文光 345, 346, 370
Чантурия Г.	昌图里亚, Г. 498
Чаушеску Н.	齐奥塞斯库, 尼 · 284, 290, 361, 530
Чаянов А. В.	恰亚诺夫, А. В. 440
Че Гевара Э.	格瓦拉, 埃 · 186, 191
Чебриков В. М.	切布里科夫, 维 · 米 · 388, 392, 394, 397, 406, 416, 431, 432, 444, 446, 447, 449, 452, 460, 464, 474, 492
Челиков В.	切利科夫, В. 657
Челинцев А. Н.	切林采夫, А. Н. 440
Чельшев И. А.	切雷舍夫, И. А. 79, 80, 369
Чень И	陈毅 264
Червоненко С. В.	契尔沃年科, 斯 · 瓦 · 272, 276, 283, 286, 287, 289, 299—302
Черепанов	切列帕诺夫 181
Черепнин Л. В.	切列普宁, Л. В. 369
Чернев А. Д.	切尔涅夫, А. Д. 9, 80—82, 163, 165, 491, 625
Черненко К. У.	契尔年科, 康 · 乌 · 6, 331, 334, 350, 359, 373, 375—377, 381, 383, 384, 386—389, 393, 396—399, 401—406, 413, 419, 426, 563, 647, 652, 657
Черник О.	切尔尼克, О. 271, 272, 278, 280—282, 284, 285, 287, 294, 295—297, 299, 302, 303, 309
Черниченко Ю. Д.	切尔尼琴科, 尤 · 德 · 368, 503
Чернобаев А. А.	切尔诺巴耶夫, А. А. 9, 80, 655
Чернов	切尔诺夫 108
Черномырдин В. С.	切尔诺梅尔金, 维 · 斯 · 245

Чернышев В. В.	切尔内绍夫, В. В. 61
Черняев А. С.	切尔尼亚耶夫, 阿·谢· 416, 423, 427, 492—494, 527, 535, 554, 603, 621, 625—628, 630, 631, 652
Черняк М. И.	切尔尼亚克, М. И. 146
Черчилль У.	丘吉尔, 温· 10, 22, 79
Чесноков Д. И.	切斯诺科夫, Д. И. 96
Чжоу Эньлай	周恩来 264
Чикин В. В.	奇金, В. В. 475, 513
Чичерин Г. В.	奇切林, Г. В. 650
Чуев Ф.	丘耶夫, Ф. 81, 544
Чуйков В. И.	崔可夫, 瓦·伊·
Чуковская Л. К.	丘科夫斯卡娅, Л. К. 316, 318
Чуковский К.	丘科夫斯基, К. 254
Чурбанов Ю. М.	丘尔巴诺夫, Ю. М. 374, 381, 413, 414, 491

### Ш

Шабуров	沙布罗夫 326
Шакина М.	沙金纳, М. 629, 630
Шамиль	沙米尔 607
Шапиро Л.	沙皮罗, Л. 242
Шапошников Б. М.	沙波什尼科夫, Б. М. 40
Шапошников Е. И.	沙波什尼科夫, 叶·伊· 589, 604, 620, 629—631
Шарин Л. В.	沙林, Л. В. 522
Шаров А.	沙罗夫, А. 326
Шаталин Н. Н.	沙塔林, Н. Н. 87, 88, 113
Шаталин С. С.	沙塔林, 谢·沙· 416, 525—527, 259—534, 537, 540
Шатохин	沙托欣 544
Шатров М. Ф.	沙托罗夫, М. Ф. 448, 475

Шатуновская	沙图诺夫斯卡娅 62
Шауро В. Ф.	绍罗, В. Ф. 318
Шафаревич И. Р.	沙法列维奇, И. Р. 261, 307, 327
Шахназаров Г. Х.	沙赫纳扎罗夫, Г. Х. 416, 449, 603
Шахрай С. М.	沙赫赖, С. М. 588, 616, 630
Шахурин А. И.	沙胡林, А. И. 35, 36, 46, 93
Шашарин Г. А.	沙沙林, Г. А. 436
Шварцман Л. Л.	什瓦尔兹曼, Л. Л. 64, 72, 73, 88, 91, 93, 114
Шверник Н. М.	什维尔尼克, 尼·米· 62, 76, 85, 87, 88, 105, 122, 150, 152, 158, 159, 164, 167, 216, 225, 231, 237, 447, 650
Швестка О.	什维斯特卡, О. 289, 300, 308
Шебаршин Л. В.	舍巴尔申, Л. В. 603
Шеварднадзе Э. А.	谢瓦尔德纳泽, 爱·阿· 334, 335, 349, 351, 406, 419—421, 441, 444, 449, 461, 475—477, 481, 484, 486, 487, 490, 492, 519, 537, 539, 540, 573, 574, 583, 596
Шейнин Л. Н.	舍伊宁, Л. Н. 71
Шелепин А. Н.	谢列平, 亚·尼· 4, 115, 212, 213, 215, 216, 219, 221—223, 226—228, 231, 234, 235, 238—240, 243, 248, 275, 278, 282, 284, 287, 297, 303, 305, 323, 387, 389, 500, 520
Шелест П. Е.	谢列斯特, П. Е. 232, 233, 277, 278, 282, 285, 287, 292, 297, 304, 322, 473
Шемаев Л. С.	舍马耶夫, Л. С. 513
Шенин О. С.	舍宁, 奥·谢· 513, 538, 546, 559, 571, 572, 578, 581—583, 585, 592, 605, 606, 651
Шепилов Д. Т.	谢皮洛夫, Д. Т. 4, 74, 89, 124, 127, 134, 141, 142, 144, 150, 152, 153, 157—159, 165
Шопова Н. А.	舍波娃, Н. А. 241
Шерешевский Н. А.	舍列舍夫斯基, Н. А. 69

Шестаков	舍斯塔科夫 63
Шик О.	希克, О. 271, 278, 285, 293, 303, 308
Шиманов Н. С.	希曼诺夫, Н. С. 35, 36, 93
Шимелиович Б. А.	希梅利奥维奇, Б. А. 59
Шимон Б.	希蒙, Б. 302
Шимунек	希穆涅克 271
Шкирятов М. Ф.	什基里亚托夫, М. Ф. 34, 52, 59, 62, 64, 66, 76, 82, 85, 125
Шкловский В. Б.	什克洛夫斯基, В. Б. 254
Шлюгер	什柳格尔 107
Шноре	什诺列 111
Шолохов М. А.	肖洛霍夫, 米·亚· 253
Шохин А. Н.	绍欣, А. Н. 615
Шпачек Й.	什帕切克, 约· 285, 289, 293, 302, 308
Штейн А.	施泰因, А. 318
Штеменко С. М.	什捷缅科, 谢·马· 31, 32
Штерн Л.	施特恩, Л. 59
Штроугал Л.	什特劳加尔, Л. 284
Штыков Т. Ф.	什特科夫, Т. Ф. 30
Шубняков Ф. Г.	舒布尼亚科夫, Ф. Г. 59, 64
Шуваев	舒瓦耶夫 181
Шуйский Г. Т.	舒伊斯基, Г. Т. 235
Шульц Д.	舒尔茨, Д. 392, 396
Шунков В. И.	顺科夫, В. И. 653
Шушкевич С. И.	舒什克维奇, С. И. 620, 622, 623

## Щ

Щагин Э. М.	夏金, Э. М. 658
Щедрин Г. И.	谢德林, Г. И. 132
Щедров И.	谢德罗夫, И. 356, 357
Щелкин К. И.	晓尔金, К. И. 116

Щелоков Н. А.	晓洛科夫, 尼·阿· 319, 320, 374, 380, 381, 287, 609
Щербаков А. С.	谢尔巴科夫, А. С. 64, 67, 69, 70
Щербаков А. С., посол	谢尔巴科夫, А. С. 大使, 266, 342
Щербаков В. И.	谢尔巴科夫, В. И. 574, 603
Щербаков В. Н.	谢尔巴科夫, В. Н. 593
Щербина Б. Е.	谢尔比纳, Б. Е. 429, 431, 432, 434, 435, 493
Щербицкий В. В.	谢尔比茨基, В. В. 323, 375, 383, 398, 404, 416, 431, 435, 444

### Э

Эдери	埃德里 288
Эйзенхауэр Д.	艾森豪威尔, Д. 116, 160, 186
Эйтингон Н. И.	艾廷贡, Н. И. 61, 71, 72, 107, 108, 109
Эйхе Р. И.	埃赫, Р. И. 124
Эктумаевы	埃克图马耶夫家族 610
Элиава Ш. З.	埃利亚瓦, Ш. З. 650
Энгельс Ф.	恩格斯, 弗· 90, 103, 128, 258, 312, 645, 646
Эренбург И. Г.	爱伦堡, 伊·格· 49, 82, 254, 316
Этингер Я. Г.	埃廷格尔, Я. Г. 64—67, 70, 71

### Ю

Юдин П. Ф.	尤金, П. Ф. 68, 76
------------	------------------

### Я

Яблоков А. В.	亚布洛科夫, А. В. 616
Яблоньский	亚布隆斯基 363
Явлинский Г. А.	亚夫林斯基, 格·阿· 523, 525, 527, 529—533, 535, 619
Ягода Г. Г.	亚戈达, Г. Г. 96, 111, 114



Язов Д. Т.	亚佐夫,德·季· 452,455,468,469,489,490, 531,536,537,540,541,573,574,577—583, 585—588,591,597,600,601,603,606,629
Якир И. Э.	亚基尔,И. Э. 155
Якир, сын	亚基尔,儿子 274,320
Яковлев Н.	雅科夫列夫,Н. 41
Яковлев А. Н.	雅科夫列夫,亚·尼· 9,382,383,402,403, 415,416,426,431,432,442,444,445,447,448, 450,455,460,475—477,479,481,484,489, 491—494,497,500,519,524,537,538,540,562, 563,573,574,583,596,603,604,628,634,636, 641,651
Яковлев А. С.	雅科夫列夫,А. С. 35,165
Якубовская С. И.	雅库鲍夫斯卡娅,С. И. 643,656
Якубовский И. И.	雅库鲍夫斯基,И. И. 282
Ян Ченьу	杨成武 264
Янаев Г. И.	亚纳耶夫,根·伊· 540,561,574,577,579, 581,582,584—587,591,592,594,598,602,606
Яндарбиев З.	扬达尔比耶夫,З. 610
Яндиёвы	扬季耶夫 609
Яник	亚尼克 271
Янко, генерал	扬科,将军 280
Ярин В.	亚林,В. 537
Ярославский Е. М.	雅罗斯拉夫斯基,Е. М. 650
Ярошинская А.	亚罗申斯卡娅,А. 493
Ярузельский В.	雅鲁泽尔斯基,沃· 360,362—368
Ясин Е.	亚辛,叶· 313
Яхъяев Х. Х.	叶海亚耶夫,Х. Х. 413

[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

书名 = 苏联政权史 ( 1 9 4 5 ~ 1 9 9 1 )

作者 = ( 俄 ) 鲁 · 格 · 皮霍亚著 徐锦栋等译

页数 = 8 8 3

出版社 = 东方出版社

出版日期 = 2 0 0 6 年 0 5 月 第 1 版

SS号 = 1 1 5 8 7 4 5 0

DX号 = 0 0 0 0 0 5 9 8 2 3 1 0

u r l = h t t p : / / b o o k . d u x i u . c o m / b o o k D e t a i l . j s p ? d x

N u m b e r = 0 0 0 0 0 5 9 8 2 3 1 0 & d = 9 6 3 5 0 9 3 9 6 C 3 B 6 D A 5 3 0 5 3 C

F D 3 C E 4 F D 0 6 C & f e n l e i = 0 4 0 8 0 3 & s w = % C B % D 5 % C 1 % A A % D

5 % F E % C 8 % A 8 % C A % B 7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苏联的社会政治发展（1945年—1953年）

第二章 缓慢消融的坚冰（1953年3月—1957年底）

第三章 尼·谢·赫鲁晓夫下台的原因

第四章 从稳定到停滞（1964年11月—1968年）

第五章 从停滞到危机（1969年—80年代初）

第六章 领导人相继去世（1982年—1985年）

第七章 改革，公开性，社会政治危机加深（1985年—1989年）

第八章 从苏联到俄罗斯（1989年—1991年）

结束语

再版的话

人名索引